

莊兒台

黃埔風云

HUANGPU FENGYUN

上册

吴昌华 / 著



陸軍軍官學校



大眾文藝出版社

莊兒台

黃埔風雲

HUANGPU FENGYUN

下冊

吳昌華 / 著



陸軍軍官學校



大眾文藝出版社

黃埔風雲

張國華 著

鮑州文藝

台兒莊

人民文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埔风云/吴昌华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80171-045-2

I. 黄…

II. 吴…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220 号

黄 埔 风 云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8 字数 883 千字 插页 8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套

ISBN 7-80171-045-2/I·30

定价:50.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陆军军官学校

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
斷無成就

孫文

孙中山手迹

官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

民國十三年冬

廖仲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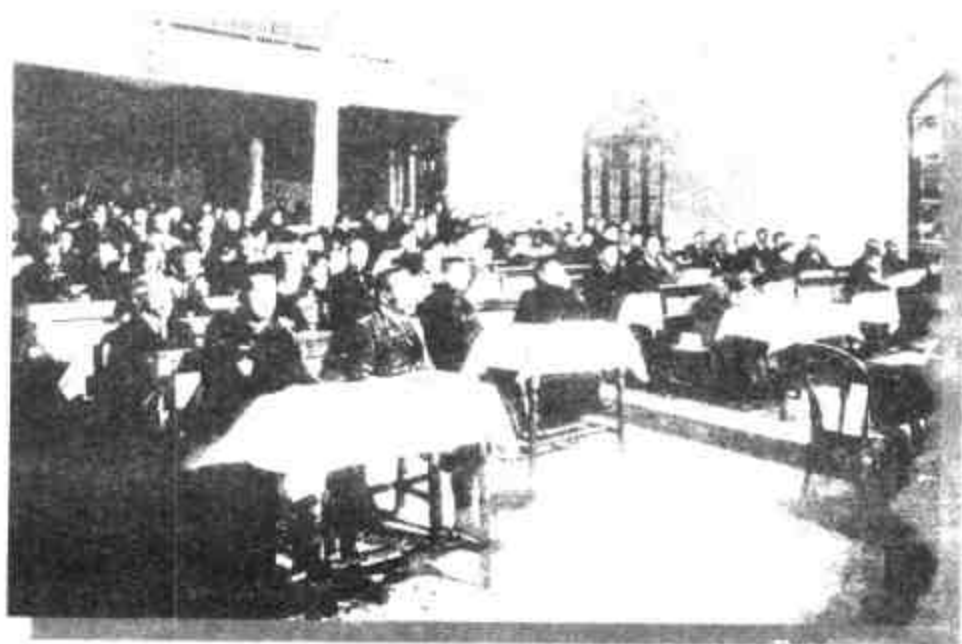
廖仲愷手迹



1924年，黄埔军校筹建期间，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在广场



孙中山和党代表廖仲恺在一起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场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等出席大会



杜聿明担任过昆仑关战役的指挥官。



英雄
风采

1938年10月16日，陈赓率部伏击日军，两小时歼敌1500余人



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作战斗动员



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国民革命军第四独立团团长叶挺



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



政治教官恽代英



政治教官萧楚女



军事教官顾祝同



教官陈诚



第二次北伐时，蒋先云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1927年5月28日，在河南与奉军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25岁。



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苏联
顾问铁罗尼在交谈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
宗仁将军在收复台儿庄后
于车站留影。



军校政治部和秘书兼政治教官聂荣臻与政治部人员合影



总理孙中山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



校长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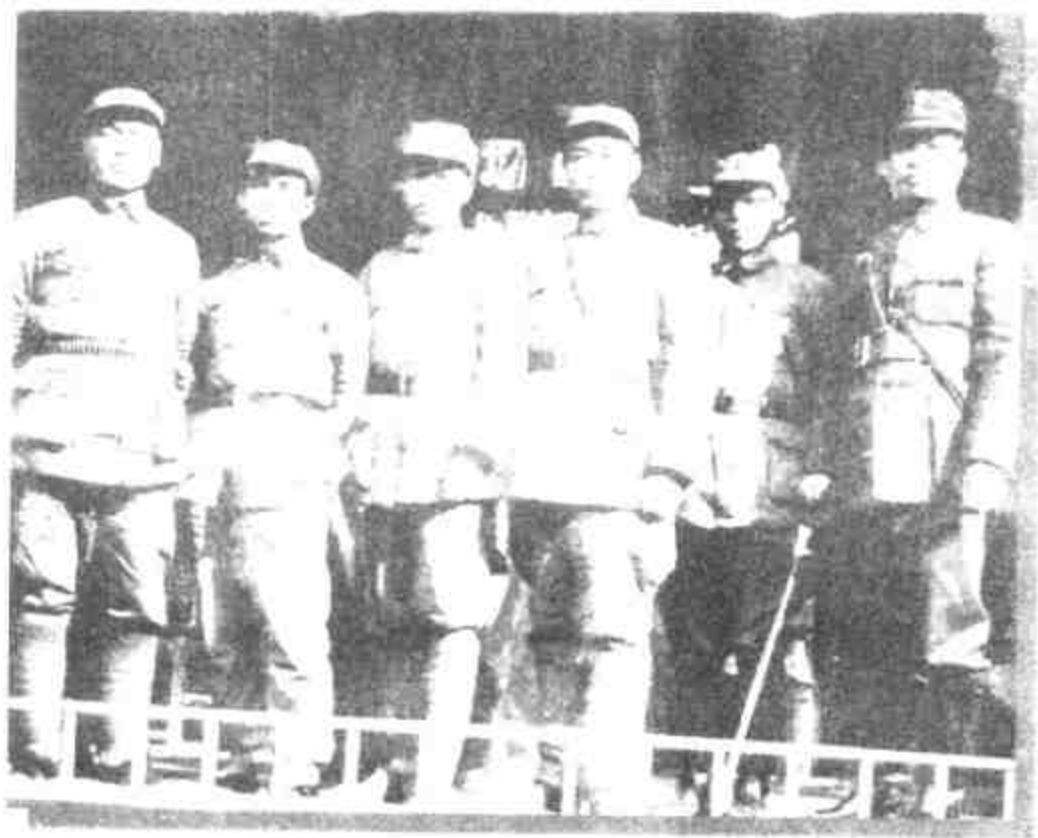


党代表廖仲恺



副校长李济深





1934年11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在长江南岸创立抗日根据地，这是
10月间和第四军部分领导合影。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新四军
政委项英和陈毅在一起。



1935年11月5日，赵
一曼带领战士在铁北左撇
子沟被日军包围。这位
日本人眼中的“白马上
的美女”牺牲时才31岁。



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毛泽东陪同程潜、陈明仁将军等游北京天坛公园。



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北京颐和园会见黄埔校友。



序 言

夜阑人静,在柔和的灯光下,当我动笔为《黄埔风云》这部章回体传记文学写前言时,感情之舟仿佛航行于碧波万顷的大海之中:霞光、浪花、鸥鸟、岛屿……海面上的一切都充满了艺术魅力。此时,我想起我国 20 世纪 20 年代那遥远而清晰的黄埔军校的史实。

黄埔军校,是 20 世纪 20 年代由孙中山倡议,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创办的。这所军校是世界四大著名军校之一,它为中国革命培养与造就了一大批显赫的军事和政治人才。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叱咤风云、戎马倥偬的传奇经历与时代的变迁、民族的兴衰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其事关个人的穷达、荣辱、生死的身影中,无不反映着时代风雨变幻更替的深深的印记。他们的爱与恨、利与义、希冀与绝望的感情冲突,他们的困惑、迷惘和追求,及其在不同的舞台背景中所演出的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悲喜剧,有如蛛网那样编织着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史。

然而年华逝水,世事沧桑。如今黄埔耆宿大多已乘鹤仙去;当年一至六期黄埔军校的八千多毕业生,而今健在者也寥寥矣。由于作者的先父是大陆黄埔军校最后一期政治部主任,作者本人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 22 期,因而在近半个多世纪的岁华流影

中,作者亲自耳闻目睹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军校的轶事。为了把这些极为生动且丰富的素材载入史册,以弥补目前文化市场上散见的或引经据典、或详录文献、或个人立传,但都无法窥其黄埔全貌之缺憾,所以在参阅大量文史资料和走访黄埔前辈的基础上,作者倍尝艰辛,不辍笔耕,撰写了八十回《黄埔风云》一书,全书近91万字。

面对《黄埔风云》,掩卷思之,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屡拂而不去,只好也就信马由缰地说几句。

从总体来看,这是一部时代剪影式的巨著。书中记叙了百余位黄埔军校的传奇人物的故事。在这些曾为中国风云式的人物中:有令人高山仰止的、共和国首批授予将帅军衔的政坛巨星和军事人才;有在中国现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国民党方面的军政要员;有在革命历史漫长进程的沙场征战中为国捐躯的中华英雄;有在党的左倾路线下被迫害而含冤九泉的悲壮英烈;有在国民党剪除异己中英勇就义的忠良之秀;有经过半个世纪的较量,于真理面前服输的国民党爱国将领。然而,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为了展示历史的本来足迹,书中自然也对卖国投敌的汪精卫和叛党变节的张国焘之流做了适当地涉及。

从微观角度来说,在书卷长廊中那些作者简笔传神的“人物速写”,及其于叵测风云中个人的真实行迹,不但给中国现代史增添了异彩纷呈的光芒,而且也给广大读者携来一缕浓郁馨香的时代气息。

明代于谦说过:“名义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书中在有些非凡人物身上,作者着力突出其傲视群雄的闪光点。具体说,这闪光点就是他们“临大节而不可夺”的高风亮节:或处逆境之中信守不渝,或临危难之际百折不回,或置生死关头从不退缩。这种直道而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华民族的气节值得后人发扬

光大。这说明作者深谙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儒道哲学,其“尽心知性”的底蕴,是作者在刻画人物中用笔娴熟的基石所在。

大家知道,文学作品是通过对人物刻画而获得成功的。书中作者在描写人物的命运时,总是不忘着力于把握和揭示儒道两种哲学文化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体现,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创造。这对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背后十分广阔的人文景观,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样,作者就把作品中人物的伟岸身影与他们独有的敏锐而细腻的内心世界——向往和平生活的情愫,慷慨悲歌的血性,眷恋家人的思绪,视死如归的气概等血肉相连地结合起来,因而使主要人物的塑造获得了成功。真可谓笔触所及,人木三分呢!

至于作品的语言风格,简而言之,既有充溢的刚健之气,又不乏清丽典雅之美,是两者和谐的统一。从作品所采用的素描式的记叙人生简历、事业里程和灵性之悟中,均可察而拾之。

书名《黄埔风云》,是在三易之后定下来的。先说“黄埔”:其一,作者的人生佳境是在军校的校园中度过的,颇多喜爱,人之常情;其二,书中的人与事,文脉相通,一气贯之,与其有穿珠生辉之妙处相关。再说“风云”:依“东风暗换年华”的佳句,得知风的威力之奇之大,不由人产生钦慕之心。再说,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作者曾给报刊撰写随笔短文,笔耕之习甚深,对那段不测风云自有深悟。因此“风云”的象征之义,就和悠悠岁月、黄埔史实相联系了。这就是书名定为《黄埔风云》的缘由。

在这部长篇传记文学的创作中,应作者之邀请,尽管初觉个人为学为文历浅且陋,惟恐有“滥竽”之憾,但终也随缘而应,操笔弄墨,于书页间记下偏隅零星之见。这算作两人一段苦乐相伴岁月的纪念吧!

《黄埔风云》毕竟属长篇巨著,即使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力求

史料真实,评价公允,不隐恶、不溢美、不杜撰、不虚饰,即使在字法、词法、语法、文理等方面,未敢半点散漫,但因出书仓猝,流于草率疏漏,错讹不妥之处,在所难免,祈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另外书卷既成,该书的面世曾得到山东友谊出版社张萍等同志的支持。谨此致谢。

祖国要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我的感情之舟渐次靠近港湾时,恍若听到曹操正唱他的《观沧海》,其中“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也可以借来对作者说。作者祈盼着海峡两岸的同胞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早日携起手来,为实现统一大业共书更新的篇章。

曹树青
2001年1月
于青島海滨

作者的话

自古天下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秦吞七国，三国鼎立，五胡乱华，明清一统。分合迎拒，治乱盛衰，实乃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有如日月盈昃，辰宿列张，不可抗拒。

我国 20 世纪 20 年代，由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是世界著名的军校之一。“美国有西点军校，中国有黄埔军校”已成世界军史的共识。

黄埔军校培养与造就了大批中国现代、当代显赫的军事将帅与政治巨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国共两党曾经有过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合作；又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两次分裂。分分合合，黄埔师生为各自信奉的主义、理想，在战场上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悲喜剧，一部黄埔军校校史，浓缩着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史。

岁月悠悠，物换星移。1924 年至 1927 年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一至六期学生共计 8000 余人，如今仍健在者为数寥寥。当年那些沙场征战的黄埔风云人物，大都是国共两党的精英，他们个人的荣辱沉浮，一方面展示了他们戎马倥偬的传奇经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共两党合作与分裂对国家，对民族和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海峡两岸分离近半个世纪，黄埔师生对“台独”深恶痛绝，分离使黄埔师生亲人不能团聚，也违背孙中山统一祖国的遗愿，虽然国民党在台湾成了在野党，但黄埔军校在台湾军队中

的实力仍占重要地位,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分裂局面的结束,实现祖国统一。

《黄埔风云》一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有百余人,他们的荣辱与恩怨,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功过是非,沉浮得失,自有后人评说。作者本着事实求是的态度,尊重历史人物本来的面貌,澄清历史垢尘,如实反映真相,让世人对黄埔军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对人物的褒贬只能用历史的眼光去品评。作者在写此书时,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自信书中每一个细节,都有根据可查,当然,如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江泽民主席《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发表已六周年,值此关键时期,向读者呈献《黄埔风云》一书,重温走过来的历史,有助于号召海内外黄埔同学共同继承与发扬黄埔革命精神,高举爱国统一旗帜,促进海峡两岸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此书出版前,承蒙全国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程元同志,山东黄埔同学会副会长陈镇中、熊顺义同志给此书题词,并给予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谨识

2001年6月16日

黄埔建校77周年纪念日

关于黄埔军校“一百零八将”的说明

话说我中华民族，在 5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长河中，既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华夏文化，又流传着许多令人神秘莫测的历史之谜。就拿数字来说，中国自古以来，“三十六”和“七十二”就是两个饶有趣味而神秘的成数和术语。这两个数字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被广泛运用着，成语中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说；古诗中形容宫殿繁多时常用“三十六宫”，皇室也有“三十六宫，七十二妃”的记载；《水浒》作者用一百零八将这个数来写梁山英雄，分为“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这“三十六”和“七十二”之和刚好是一百零八；寒山寺的晨钟暮鼓名扬四海，它整整敲一百零八下。据《鸿雪因缘图记》说：“素闻撞钟之法，各有不同。河南云：前后三十六，中发三十六，共成一百零八声任；京师云：紧十八，缓十八，六遍凑成一百八。”受我国华夏文化的熏陶，鉴真和尚将佛家法规传到日本，至今除夕之夜，全国寺院钟声仍敲一百零八；承德避暑山庄也有清朝乾隆命名的“三十六景”；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只有七十二人；汉高祖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曹操死后有七十二疑冢之说；人们都熟悉孙悟空会七十二变；道教把我国的名山胜地分为十大洞天，三十六个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人们通常喜欢用三十六峰、七十二峰来形容山峰之多，武当山、武夷山、黄山、衡山、嵩山皆有七十二

峰之称；明人郎瑛著《七修类稿》卷四一说：“叩一百八声者，一岁之意也。盖年有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正得此数。”闻一多也说：“‘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的五等分数，而这个数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的一种术语……它是一种文化活动的表征。”。佛教认为人有一百零八种烦恼，敲一百零八下，人们听后可消忧解愁；中国古律中，“徵”的律数为一百零八；山东济南有趵突、黑虎、珍珠、五龙潭四大泉群，共有泉点一百零八处；中国武术中有一百零八处制人的穴位，等等。由此看来一百零八乃是一个吉祥之数，故古人百用不厌。另外，十月太阳历把一年分为十个月，每个月有三十六天，又用雌雄（阴阳）区分五行，将一年分为五季，一季分雌雄两个月，每季共七十二天，“三十六”“七十二”作为历法中的两个基本计算数，共一百零八。

为了延取这个吉祥之数，笔者写《黄埔风云》一书时，国共两党黄埔师生有名有姓的人物也确定为 一百零八。他们当中有共和国五大元帅、三位大将、七位上将、井冈山三骁将、新四军三首长、黄埔三杰四凶等；国民党方面有黄埔四巨头、黄埔八大金刚、十三太保、五虎将、三鼎甲、军统三神以及功德林八败将等；加上战场、刑场牺牲的民族英雄、烈士和白色恐怖和左倾路线下的冤魂忠烈，正好一百零八将。他们是黄埔的风云人物，像寒山寺的钟声，震撼过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佛教中有一百零八尊菩萨，其敲钟、念经、拨动佛珠，皆一百零八遍，表示对佛教的虔诚。而笔者在下面的八十回传奇故事中，陆续介绍黄埔的一百零八将，他们同是黄埔的师生。为了各自的信仰和主义，他们同室操戈，反目为仇，战场厮杀、相煎何急，演出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喜剧：是血与泪的洗礼、仇与怒的燃烧、生与死的决斗。元帅与战犯同台，英雄与枭雄同在，忠臣与奸臣同存。英雄们的侠胆忠义事迹感苍天，虎啸龙吟精神泣鬼神。徐向前元帅 1988

年3月曾为《黄埔》杂志题词曰：“为黄埔同学立言，为祖国统一尽力。”黄埔军校改变了一个世纪的历史，黄埔风云人物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请读者细细品味，正是：

春华秋实沙场擢秀，
坤倪乾端武林探源。

黄埔风云人物大部分已乘鹤归道山。“长青树下埋忠骨，万花丛中慰英灵。”笔者希望通过此书，给后人留下一些印象。那饱尝战场硝烟的一百零八位黄埔将军，寺院的钟声就是他们的理想归宿；身经百战的将军葛衣素食，隐居深山，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但黄埔风云人物的传奇故事，却令我们凡人乐此不疲地去探视，去研讨，去追究，以满足心灵的猜想。“人间有味是传奇”，一点不假。

黄埔军校“一百零八将”简介

黄埔军校三十六官佐

孙中山(1866~1925) 广东香山人,黄埔军校总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中国国民党总理,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

蒋介石(1887~1975) 浙江奉化人,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军统帅,特级上将。

廖仲恺(1877~1925) 广东惠阳人,黄埔军校第一任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

李济深(1885~1959) 广西苍梧人,黄埔军校副校长,教练部主任,国民革命军四军军长,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周恩来(1898~1976)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和国总理。

邵力子(1882~1967) 浙江绍兴人,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少将,早年加入共产党,后为国民党党员,共和国政务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汪精卫(1883~1944) 浙江绍兴人,黄埔军校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上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叛逃投日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席,汉奸头目。

方鼎英(1888~1976) 湖南新化人,黄埔军校教育长,代理校长,国民革命军中将,北伐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国民革命军新编十三军军长。解放后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何应钦(1889~1987) 贵州兴义人,黄埔军校军事总教官,教育长,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军政部长,陆军总司令,台湾“国防部长”,“行政院长”。

王柏龄(1889~1942) 江苏扬州人,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教育长,参谋长,国民党中将,北伐军总预备队指挥官,教导师师长,一军副军长兼一师师长。

邓演达(1895~1931) 广东惠阳人,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后被蒋枪杀。

陈 诚(1898~1965) 浙江青田人,黄埔军校特别官佐,炮兵科长,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参谋总长,行政院长,国民党副总裁,台湾“副总统”。

包惠僧(1894~1979) 湖北黄冈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早年加入共产党(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户政司长;建国后任国务院参事。

顾祝同(1891~1987) 江苏涟水人,黄埔军校战术教官,管理部代主任;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台湾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代“国防部长”。

聂荣臻(1899~1992) 四川江津人,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共产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治中(1890~1969) 安徽巢县人,黄埔军校入伍,任总队代理总队长,军官团团团长,教育长,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早年加

入国民党；后加入民革，为中央副主席，湖南、新疆省主席，军委会政治部长，国共和谈国民党首席代表；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叶剑英(1897~1986) 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陈继承(1893~1971) 江苏靖江人，黄埔军校教官，教育长，国民党陆军中将，一军军长，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

陈果夫(1892~1951) 浙江吴兴人，黄埔军校招生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

刘峙(1892~1971) 江西吉安人，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官，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

严 重(1892~1944) 湖北麻城人，国民党陆军中将，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

蒋鼎文(1895~1974) 浙江诸暨人，黄埔军校学生队区队长，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一战区司令长官。

钱大钧(1893~1982) 江苏吴县人，黄埔军校兵器教官，参谋处长，代教育长，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淞沪警备总司令，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

鲁 易(1900~1932) 湖南常德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少将，北伐军一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副主任。

熊 雄(1892~1927) 江西宜丰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中共广东区委军事

部长。

李宗仁(1891~1969) 广西临桂人,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陆军一级上将,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1965年7月由美国回到大陆定居。

毛泽覃(1905~1935) 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之弟,黄埔军校政治部科员,共产党员,工农红军独立师师长。

恽代英(1895~1931) 江苏武进人,生于武昌,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北伐军中央独立师党代表,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肖楚女(1893~1927) 湖北汉阳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专职教员,中共中央特派员。

白崇禧(1893~1966) 广西临桂人,黄埔军校校务委员,保定军校毕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参谋总长,国防部长,华中军政长官,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

周佛海(1897~1948) 湖南沅陵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叛国投敌后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市长。

缪斌(1899~1946) 江苏无锡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原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江苏省民政厅长,叛国投敌后任汪伪政府立法院副院长。

张国焘(1897~1979) 江西萍乡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红军总政委,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1938年叛党投蒋,任国民党六大中央执委。

张申府(1895~1986) 河北献县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后退党加入民主同盟,解放后为全国政协委员。

陈毅(1901~1972) 四川乐至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中共武汉分校党委书记,新四军代军长,三野战军司

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

高语罕(1888~1948) 安徽寿县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早年加入共产党,后因托派被开除党籍,曾任安徽党务学校负责人,中共出席国民党“二大”党团书记。

黄埔军校七十二弟子

陈赓(1903~1961) 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毕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

蒋先云(1902~1927) 湖南新田人,黄埔一期毕业,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国民革命军 11 军 77 团团长,中共黄埔军校支部书记。

蔡炳炎(1900~1937) 安徽合肥人,黄埔一期毕业,国民革命军 1 军 3 师 8 团团长,1 师参谋长兼开封警备司令,国民党 18 军 67 师 201 旅旅长;抗日时牺牲,追为陆军中将。

蔡申熙(1906~1932) 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毕业,国民革命军 11 军 24 师参谋长,共产党员,八一南昌起义后任工农红军 25 军军长。

廖运泽(1903~1987) 安徽寿县人,黄埔一期毕业,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大队四队长,早年加入共产党,后加入国民党,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96 军军长,20 集团军副总司令,回大陆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陈明仁(1903~1974) 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毕业,黄埔五期队长,国民党陆军中将,曾任国民党 1 兵团司令,起义后任解放军上将,解放军四野 21 兵团司令员。

邓文仪(1905~1998) 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毕业,黄埔军

校政治部代主任,国民党陆军中将,国防部政工局长,复兴社助理书记。

曾扩情(1893~1983) 四川威远人,黄埔一期毕业,国民党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杜聿明(1904~1981) 陕西米脂人,黄埔一期毕业,国民党陆军中将,中国远征军副司令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工兵团司令官。

范汉杰(1895~1976) 广东大埔人,黄埔一期毕业,黄埔军校教育处长,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鄧 悌(1903~1938) 湖南湘阴人,黄埔一期毕业,黄埔军校政训处长,国民党陆军少将,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复兴社书记。

桂永清(1900~1954) 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黄埔军校教导总队长,国民党一级上将,海军总司令,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

关麟征(1905~1980) 陕西户县人,黄埔一期毕业,黄埔军校教育长、校长,国民党陆军中将,陆军总司令。

贺衷寒(1899~1972) 湖南岳阳人,黄埔一期毕业,国民党陆军中将,军委会政训处长,政治部一厅厅长,台湾“交通部长”。

侯镜如(1902~1994) 河南永城人,黄埔一期毕业,早年加入共产党,后加入国民党。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17兵团司令。

胡宗南(1896~1962) 浙江孝丰人,黄埔一期毕业,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台湾澎湖列岛防守司令官。

黄 维(1904~1989) 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原国民

党陆军中将,12兵团司令官。

徐向前(1901~1990) 山西五台人,黄埔一期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李之龙(1897~1928) 湖北沔阳人,黄埔一期毕业,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海军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

李默庵(1904~) 湖南长沙人,黄埔一期毕业,早年加入共产党,后加入国民党,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32集团军总司令,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

郑洞国(1903~1991) 湖南石门人,黄埔一期毕业,早年加入共产党,后加入国民党;国民党陆军中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一兵团司令。

许继慎(1901~1931) 安徽六安人,黄埔一期毕业,共产党员,工农红军1军长。

刘 戡(1907~1948) 湖南桃源人,黄埔一期毕业,国民党陆军追赠上将,36集团军总司令,整编29军军长。

宋希濂(1907~1993) 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毕业,早年加入共产党,后加入国民党,国民党陆军中将,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14兵团司令官。

左 权(1905~1942) 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毕业,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八路军副司令员兼2纵司令员。

宣侠父(1899~1938) 浙江诸暨人,黄埔一期毕业,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8集团军高参。

唐 澍(1903~1928) 河北易县人,黄埔一期毕业,共产党员,西北工农革命军总指挥。

王尔琢(1901~1928) 湖南石门人,黄埔一期毕业,共产党

员,红四军参谋长兼 28 团团长。

周士第(1900~1979) 海南琼海人,黄埔一期毕业,共产党员,红二方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防空军司令员。

张耀明(1905~1972) 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毕业,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 4 集团军副总司令兼 38 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

阎揆要(1904~1994) 陕西佳县人,黄埔一期毕业,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解放军一野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邱清泉(1902~1949) 浙江永嘉人,黄埔二期毕业,国民党追赠上将,国民党工兵团司令官。

廖 昂(1902~1967) 四川资中人,黄埔二期毕业,国民党陆军中将,整编 76 师师长。

卢德铭(1905~1927) 四川自贡人,黄埔二期毕业,共产党员,工农红军 1 军 1 师总指挥;参加过秋收起义。

余洒度(1905~1934) 湖南平江人,黄埔二期毕业,先加入共产党,后加入国民党,工农红军 1 军 1 师师长,国民党少将,61 军政训处长。

覃异之(1907~1995) 广西宜山人,黄埔二期毕业,早年加入共产党,后加入国民党,国民党陆军中将,8 兵团副司令官兼 52 军军长。

郑介民(1897~1959) 海南文昌人,黄埔二期毕业,国民党追赠陆军一级上将,军统局局长,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

周逸群(1896~1931) 贵州铜仁人,黄埔二期毕业,共产党员,红二军团政委。

陈修和(1897~) 四川乐至人,黄埔三期毕业,陈毅之胞兄,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联勤总部 90 兵工厂厂长,解放

后任沈阳兵工厂厂长,国务院参事。

戴安澜(1904~1942) 安徽无为,黄埔三期毕业,国民党追赠陆军中将,国民党第5军200师师长。

姜镜堂(1903~1931) 湖北英山人,黄埔三期毕业,共产党员,红4军12师政委,中共皖西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康泽(1904~1967) 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毕业,国民党陆军中将,内政部青年训导主任,复兴社中央书记长。

毛人凤(1898~1957) 浙江江山人,黄埔三期(潮州分校一期)肄业。国民党追赠陆军上将,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情报局局长。

王耀武(1904~1968) 山东泰安人,黄埔三期毕业,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74军军长,24集团军总司令,4方面军司令官。

常乾坤(1904~1973) 山西垣曲人,黄埔三期毕业,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局长,空军副司令员。

段德昌(1904~1933) 湖南南县人,黄埔四期毕业,共产党员,红6军军长。

郭化若(1904~1995) 又名郭俊英,福建福州人,黄埔四期毕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红1方面军代参谋长,毛泽东的军事秘书,三野9兵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李弥(1902~1973) 云南腾冲人,黄埔四期毕业,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13兵团司令官兼8军军长。

刘志丹(1903~1936) 陕西保安人,黄埔四期毕业,共产党员,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28军军长。

林彪(1907~1971) 原名林育容,湖北黄冈人,黄埔四期毕业,共产党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抗大校长,解放军四野

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后叛党叛国被开除党籍。

张灵甫(1903~1947) 陕西长安人,黄埔四期毕业,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74军军长,有国民党“王牌军”之称。

唐生明(1906~1987) 湖南东安人,黄埔四期毕业,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1兵团副司令官。

吴起舞(1904~1969) 湖南桃源人,黄埔四期毕业,原国民党陆军少将,黄埔军校最后一任政治部主任。

曾中生(1900~1935) 在校名曾钟圣,湖南资兴人,黄埔四期毕业,共产党员,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

谢晋元(1905~1941) 广东蕉岭人,黄埔四期毕业,国民党追赠陆军少将,国民党第88师524团团团长。

彭士量(1904~1943) 湖南浏阳人,黄埔四期毕业,国民党追赠陆军中将,国民党第73军暂编5师师长。

李运昌(1908~) 即李芳岐,河北乐亭人,黄埔四期毕业,共产党员,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热河军区司令员。

伍中豪(1905~1930) 原名伍昭萑,湖南耒阳人,黄埔四期毕业,共产党员,红一军团第12军军长。

许光达(1908~1969) 在校名许德华,湖南长沙人,黄埔五期毕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邱行湘(1908~) 江苏溧阳人,黄埔五期毕业,国民党陆军少将,国民党整编206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

赵尚志(1908~1942) 辽宁朝阳人,黄埔五期毕业,共产党员,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兼7师师长,第2路军副总指挥。

郭汝瑰(1907~1997) 四川铜梁人,黄埔五期毕业,早年共

产党员,后国民党员,晚年重新加入共产党,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 22 兵团司令官兼 72 军军长。

廖运周(1903~1996) 安徽凤台人,黄埔五期毕业,共产党员,民革成员,国民党陆军少将,国民党 85 军 110 师师长,解放军少将,解放军高级炮兵学校校长。

陶铸(1908~1969) 湖南祁阳人,黄埔五期肄业,共产党员,广州军区政委,国务院副总理。

郑庭笈(1905~) 广东文昌人,黄埔五期毕业,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 49 军军长。

赵一曼(1905~1936) 女,四川宜宾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六期肄业,共产党员,东北人民革命军 3 军 1 师 2 团政委。

廖耀湘(1906~1968) 湖南邵阳人,黄埔六期毕业,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 9 兵团司令官。

戴笠(1896~1946) 浙江江山人,黄埔六期肄业,国民党陆军中将,国民党军统局代局长,复兴社特务处处长。

孙明瑾(1905~1943) 江苏宿迁人,黄埔六期毕业,国民党追赠陆军中将,国民党陆军预 10 师师长。

罗瑞卿(1906~1978) 四川南光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六期肄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共和国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

王诤(1909~1978) 原名吴人鉴,江苏武进人,黄埔六期毕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程子华(1905~1991) 原名程世杰,山西解县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六期肄业,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 13 兵团司令员。

目 录

序言	曹树青	(1)
作者的话		(1)
关于黄埔军校“一百零八将”的说明		(1)
黄埔军校“一百零八将”简介		(1)
第 一 回	十月革命 马林会晤孙中山 孙越宣言 国共首次谈合作 (1)
第 二 回	筹备黄埔 蒋介石率团访苏 联俄联共 国民党宣布改组 (11)
第 三 回	以俄为师 鲍罗廷担任顾问 广聘师资 众将帅云集黄埔 (23)
第 四 回	秘密招生 毛泽东推荐英才 鹤立鸡群 蒋先云名列榜首 (34)
第 五 回	总理提名 蒋介石首任校长 以党治校 廖仲恺任党代表 (45)
第 六 回	开学典礼 孙中山慷慨陈辞 制订校训 总理题“亲爱精诚” (57)
第 七 回	商团叛乱 学生军初试锋芒 受党委托 周恩来主管政治 (70)
第 八 回	良莠不齐 王柏龄金屋藏娇 苦练三九 张治中从严治校 (83)

- | | | | |
|--------|--------------|--------------------|---------------|
| 第 九 回 | 贼心不死
同仇敌忾 | 陈炯明卷土重来
教导团誓师东征 | …………… (95) |
| 第 十 回 | 孙良脱逃
总理逝世 | 蒋介石大义灭亲
胡汉民推迟报丧 | …………… (108) |
| 第 十一 回 | 势不两立
广州突变 | 赤白系大动干戈
廖仲恺遇刺身亡 | …………… (121) |
| 第 十二 回 | 血战惠州
虎落华阳 | 陈明仁率先登城
陈赓冒死救校长 | …………… (134) |
| 第 十三 回 | 何迷之有
排除异己 | 中山舰事件揭密
李之龙蒙冤撤职 | …………… (147) |
| 第 十四 回 | 整理党务
不准跨党 | 蒋介石大权独揽
黄埔生分道扬镳 | …………… (160) |
| 第 十五 回 | 誓师北伐
进攻两湖 | 革命军阵营坚强
独立团所向披靡 | …………… (173) |
| 第 十六 回 | 三打南昌
攻克永定 | 王柏龄缪斌失踪
郑洞国崭露头角 | …………… (186) |
| 第 十七 回 | 武汉建校
翻云覆雨 | 邓演达功不可没
周佛海卖身投靠 | …………… (197) |
| 第 十八 回 | 风云突变
大开杀戒 | 蒋介石背叛革命
上海滩血流成河 | …………… (210) |
| 第 十九 回 | 清党反共
同室操戈 | 黄埔岛腥风血雨
钱大钧追杀熊雄 | …………… (222) |
| 第 二十 回 | 二次北伐
独善其身 | 先云热血溅临颖
严重辞官隐匡庐 | …………… (236) |

- 第二十一回 罗易泄秘 汪精卫携冯反共
金蝉脱壳 蒋介石被逼下野 (249)
- 第二十二回 南昌起义 东方破晓第一枪
浴血会昌 叶挺击败钱大钧 (262)
- 第二十三回 霹雳一声 湘赣边秋收起义
进军井冈 卢德铭中弹牺牲 (275)
- 第二十四回 广州起义 叶剑英首先发难
星火燎燃 黄埔生揭竿而起 (288)
- 第二十五回 龙潭大捷 陈诚有功反被贬
隔岸观火 鄧悌效忠受青睐 (302)
- 第二十六回 蒋宋联姻 蒋宋孔陈成一家
东山再起 坐收渔利揽大权 (315)
- 第二十七回 北伐成功 蒋介石北平哭灵
论功行赏 嫡系部备受恩宠 (329)
- 第二十八回 浴血奋战 井冈山朱毛会师
高举红旗 刘志丹渭华起义 (343)
- 第二十九回 魔窟钓鱼 陈赓初闯上海滩
不幸被捕 校长暗施“连坐法” (357)
- 第三十回 中原血战 蒋冯阎桂争霸主
分化瓦解 八大金刚显神通 (371)
- 第三十一回 龙岗伏击 红军活捉张辉瓒
利用亲情 康泽诱降黄公略 (385)
- 第三十二回 弹尽援绝 伍中豪安福遇难
肃反左倾 姜镜堂蒙冤光山 (400)

第三十三回	陷害师弟 仇快亲痛	曾扩情施反间计 许继慎死不瞑目	…………… (413)
第三十四回	天下奇闻 来迟一步	校长谋杀教育长 庆龄愤怒掀茶儿	…………… (426)
第三十五回	告别上海 叛徒告密	周恩来巧进苏区 恽代英血洒金陵	…………… (440)
第三十六回	中敌埋伏 火线肃反	周逸群洞庭献身 贺军长痛失德昌	…………… (454)
第三十七回	陈毅不归 见死难救	肖菊英投井自尽 徐向前爱人被杀	…………… (468)
第三十八回	蒋氏三骂 天子门生	贺衷寒创复兴社 十三太保闹中华	…………… (484)
第三十九回	拉拢同窗 翻脸成仇	胡宗南重金劝降 蔡申熙血染黄安	…………… (498)
第四十回	杀人魔王 阴风腥雨	戴笠靠军统起家 特务间明争暗斗	…………… (511)
第四十一回	冤家路窄 三打苏区	林彪善用迷魂阵 陈诚兵败草台冈	…………… (526)
第四十二回	铁桶围剿 战略转移	莫雄暗献绝密图 红军踏上长征路	…………… (540)
第四十三回	逼蒋抗日 讨伐张杨	张学良西安兵谏 何应钦戏中有戏	…………… (556)
第四十四回	五次谈判 共同御敌	国共两党再合作 赤白黄埔又携手	…………… (575)

第四十五回	淞沪抗战 寸土必争	张治中请缨杀敌 谢晋元死守四行	…………… (590)
第四十六回	威镇敌胆 腹背受敌	林彪大战平型关 京城军民陷魔掌	…………… (606)
第四十七回	黄陵祭祖 巾幗英雄	张国焘叛党求荣 赵一曼慷慨就义	…………… (620)
第四十八回	丧尽天良 轻信老师	蒋鼎文出卖学生 宣侠父尸弃枯井	…………… (635)
第四十九回	兰封战役 保卫武汉	桂永清二次免死 周恩来临危不惧	…………… (650)
第五十回	长沙大火 心怀鬼胎	酆悌当了替罪羊 汪某做了卖国贼	…………… (664)
第五十一回	湘北大捷 昆仑之战	关麟征气冲牛斗 杜聿明打出威风	…………… (678)
第五十二回	曲线救国 沆瀣一气	唐生明神秘莫测 蒋汪日联手反共	…………… (693)
第五十三回	百团大战 深入虎穴	陈赓敌后反扫荡 聂帅大闹五台山	…………… (708)
第五十四回	皖南事变 千古奇冤	顾祝同执行密令 叶挺项英遭劫难	…………… (724)
第五十五回	远征缅甸 西辽突围	戴安澜马革裹尸 左将军为国捐躯	…………… (740)
第五十六回	湘西会战 日寇投降	王耀武耀武扬威 黄埔英烈垂青史	…………… (756)

- | | | | |
|-------|--------------|----------------------|---------------|
| 第五十七回 | 重庆谈判
为了和平 | 两宿敌初次握手
张治中三飞延安 | …………… (772) |
| 第五十八回 | 抄斩群奸
罪有应得 | 军统头大摆“鸿门”
周佛海瘐死虎狱 | …………… (789) |
| 第五十九回 | 撕毁和约
以退为进 | 蒋介石挑起内战
毛泽东胸有韬略 | …………… (806) |
| 第六十回 | 进攻延安
虎口拔牙 | 胡宗南吹牛破产
张灵甫命丧孟良 | …………… (822) |
| 第六十一回 | 撒豆挡兵
廖昂被围 | 陈明仁死保四平
许光达飞函晓义 | …………… (838) |
| 第六十二回 | 黄鹤领头
陈赓强攻 | 中训团将官哭陵
邱行湘兵败洛阳 | …………… (853) |
| 第六十三回 | 惨败宜川
攻克济南 | 刘戡以手榴自戕
王耀武束手就擒 | …………… (869) |
| 第六十四回 | 林彪围城
兵不血刃 | 范汉杰锦州被俘
曾泽生长春起义 | …………… (886) |
| 第六十五回 | 鸿雁传书
辽西被围 | 郑洞国弃暗投明
廖耀湘兵败黑山 | …………… (903) |
| 第六十六回 | 一门三将
刘峙无能 | 大难临头各自飞
固淮守江成泡影 | …………… (920) |
| 第六十七回 | 敌营廿年
陷入重围 | 廖运周孤雁归队
双堆集黄维被俘 | …………… (938) |
| 第六十八回 | 拒绝劝降
困兽犹斗 | 杜聿明陈庄落网
邱清泉突围阵亡 | …………… (955) |

第六十九回	桂系逼宫 平津战役	蒋介石三次下野 聂荣臻兵临城下	…… (972)
第七十回	和谈破裂 风卷残云	雄师百万过大江 陈毅穷追汤恩伯	…… (989)
第七十一回	驰骋江南 开国奠基	陈赓挥师回南昌 毛泽东进中南海	…… (1006)
第七十二回	垂死挣扎 白皮红心	毛人凤血洗重庆 郭汝瑰宜宾义举	…… (1023)
第七十三回	追歼残敌 众叛亲离	解放军逼近成都 蒋介石逃离大陆	…… (1039)
第七十四回	穷途末路 沧海桑田	宋希濂峨边被俘 黄埔校喜获新生	…… (1057)
第七十五回	水底捞月 兵败大陆	胡宗南梦落西昌 蒋政权偏安台湾	…… (1075)
第七十六回	论功行赏 刘帅办学	黄埔将帅授军衔 战场对手会金陵	…… (1094)
第七十七回	网开一面 把盏言欢	战犯特赦重做人 师生一笑泯恩仇	…… (1112)
第七十八回	心向祖国 风流诸葛	李宗仁叶落归根 白崇禧暴死台北	…… (1125)
第七十九回	恩怨未尽 巨星殒落	蒋介石梦断宝岛 周恩来临终遗恨	…… (1143)
第八十回	黄埔建会 老骥伏枥	海峡两岸情谊深 统一祖国待同舟	…… (1162)

第一回 十月革命 马林会晤孙中山 孙越宣言 国共首次谈合作

1921年12月初冬季节,长沙秀丽的岳麓山枫叶由暗紫变成了一片深红。时值风云动荡之际,那红枫恰似一把炽烈的火炬,把祖国江南初冬的原野点缀得生机盎然。

文化书社坐落在长沙潮宗街,它的成立标志着湖南有了一个马列主义传播的基地。这是毛泽东一年前的杰作,如今已是湖南医科大学校址。文化书社是租佃的一栋旧公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墙,中间开个黑漆大门,正中有一巨匾,黑漆金字,上书《文化书社》;落款乃赫赫有名的前清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闿。正是因为有谭延闿的“拓牌”,才使军阀、政客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见此打道回府。进门是一青砖铺地的院落,院北有一长排房屋,靠东的两间木房,就是文化书社的营业铺面。院东有个长方形厅堂,这里曾是毛泽东经常会客的地方。当年新民学会成立,何叔衡、谢觉哉、周世钊都是在这里入的会。

这几天文化书社来了两位贵宾。一位是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马林是化名,他的真名叫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生于荷兰鹿特丹。他30多岁,长得一表人材,谈吐彬彬有礼,举止文雅,一看就是书香门第出身。此人早年在荷京大学读书,后来参加工人运动,是荷兰社会民主

党党员，曾去荷属爪哇组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去年7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委。今年6月绕道欧洲辗转来到上海，帮助筹组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2楼认识了毛泽东，对毛泽东在湖南发起成立文化书社、大量销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进步书刊、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活动赞不绝口，并说好要来湖南专程拜访。凑巧，经李六钊介绍，由张太雷陪同，马林准备去广西桂林大元帅府会见孙中山，假道长沙时作短暂停留，这才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另一位是马林的助手兼翻译张太雷，20多岁，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他英俊潇洒，聪明机智，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英语水平也不低，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刚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被选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

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的客厅里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位贵宾，他们彻夜长谈，一见如故。当时湖南的共产主义活动方兴未艾。毛泽东刚刚送走了从法国勤工俭学被迫遣送回国的李立三，安排他到安源煤矿去找蒋先云；继而又介绍湖南劳工会发起人、中国工运先驱黄爱、庞人铨与马林见面。一年前，他两人在长沙省教育会前坪召开近千人的大会，正式成立“湖南劳工会”。当时，参加工会的有22个行业，工会的办公地点设在长沙市皇仓街唯楚化学社内，黄爱任教育部主任，庞人铨任出版部主任。马林对中国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尤加赞赏，毛泽东也认为这是反抗资本家和军阀最有效的手段，他自己曾亲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当马林对黄爱鼓励有加的时候，黄爱谦逊地说：“润之大智若愚，我则锋芒太露，润之是将才，我不过是个过河的卒子而已！”不想马林与他们的头一次见而竟成了永别。黄

爱、庞人铨于1922年1月因工潮被湖南省军阀赵恒惕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的铁桥边。当时下着大雪,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雪地。黄爱时年25岁,庞人铨仅24岁。

毛泽东送马林、张太雷上火车南下时,意味深长地祝他俩马到成功,千万不要忘记请孙中山考虑创建革命的军官学校,建立革命的武装组织。这就是后来孙中山在广东创立黄埔军校的最早契机。如果说马林是黄埔军校成立的最早倡议人,还不如说毛泽东也是黄埔军校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因为他们这一建议,对孙中山有决定性的影响。

马林、张太雷日夜兼程来到广西桂林,在独秀峰下的原清桂王府见到了他们景仰的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重新建立军政府,准备举兵北伐。同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广西桂林,在此设立北伐大本营。马林、张太雷12月23日来到这里,孙中山专为马林发了参字第189号特别出人证。马林,这位西装革履,留着两撇八字胡的这位外国客人,引起了不少官兵的注意。由于语言不通,许崇智、胡汉民只打个招呼,而宋庆龄、陈友仁却可用英语与马林随便交谈。马林是位有识之士,在临来中国之前,就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书刊,对孙中山的革命传奇经历略知一二。他知道孙中山确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也了解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从莫斯科动身前来中国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再三叮嘱他不仅要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而且要团结中国国民党左派,尤其要争取孙逸仙向共产国际靠拢,以便将来壮大共产党队伍。

孙中山与马林经过三次畅谈,双方非常融洽,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千头万绪。最后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一是改组国民党,

联合社会各阶层力量共同革命,铲除军阀,尤其要依靠广大工农群众;二是谋求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三是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孙中山表示接受建议。这次会晤,首次将黄埔军校的孕育和诞生提到革命议事日程。

早在1903年8月,孙中山于日本东京青山就建立过革命党人第一所秘密军事学校。那次经日本友人犬养毅介绍,聘请日本现役军人日野熊藏少佐任校长,地址设在东京牛道区。学校招收了14名革命党人秘密学习兵器学、战术学等。开学一个月后,孙中山因事前往檀香山,临走前曾以校事委托冯自由管理。数月后,因校中意见分歧,最后不得已只好宣布解散。孙中山回想自己从反清、讨袁、护法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感到革命征程总是遍布着坎坷与荆棘。后来他把希望寄托在会党与新军运动,但终被军阀利用。他气极时破口大骂:“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马林向孙中山建议办军官学校之事,孙中山时刻记在心间,只是忙于北伐,还抽不出时间来认真研究。马林、张太雷在会晤孙中山之后,也顾不得游山玩水,连阳朔那处胜景也没有去,就日夜兼程赴广州办事去了。

且说孙中山来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民众十里长街夹道欢迎的动人场面使他彻夜难眠。他一心以武力统一中国,谁知他“借别人的窝,孵自己的蛋”,却又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原来他所信任的心腹爱将陈炯明与他貌合神离,在马林、张太雷走后不到半年,陈在广州兵围白云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的北伐又成泡影。

陈炯明何许人也?原来也是个大军阀。他是清末秀才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都督,护法时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后,仍任命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军政大权在握。陈炯明虽有野心,但他仅满足于在两广称王而已。他不理解孙中山北伐

拯救全中国的远大抱负,因此不断抬出“联省自治”的招牌反对孙中山“统一中国”。陈炯明刁难阻挠北伐的活动变本加厉,先是不给军政府一粮一粟,后是于1922年3月21日指使人在广州沙头广九车站杀害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粤军参谋长兼粤军第一师师长邓仲元。在孙中山4月21日撤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及内务总长之职后,仍保留他陆军总长之职,希望他回头,以大局为是。但陈炯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与孙中山撕破了脸皮,于6月16日炮轰总统府。当时孙中山几乎只身逃难,登上永丰舰;宋庆龄在危急中由卫士护送幸免罹难,也上了永丰舰。叶剑英在护送宋庆龄时立下汗马功劳,可惜宋庆龄惟一怀下的孩子在危难中流产,使她终生留下遗憾。

孙中山牢记这6月16日蒙难的日子,以后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就定为6月16日。孙中山经过这一次创伤,对寻求苏联的帮助,建立自己的军官学校,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就更感到迫不及待了。这是孙中山陷人绝境后的正确抉择。

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所生二女,长女名姪,早年病逝;次女名婉,与戴恩赛先生结婚后生了一子一女。孙婉之女诞生时,正值孙中山在桂林北伐,殷望一举成功,故孙中山特为外孙女取名“成功”。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坐镇“永丰”舰讨伐叛军。适于此时,孙婉的儿子出生,孙中山遂为其命名“永丰”,以资纪念。

孙中山在“永丰”舰与陈炯明相持了50多天,由于北伐军胡汉民在韶关一战失利,北伐军全线退却。1922年8月6日胡汉民部分别向江西、湖南转移,北伐军首尾被截成数段,彼此中断联络,无法集中兵力回师广州讨伐陈炯明。8月9日,孙中山决心暂时离开广州,偕蒋介石、陈策等人离开永丰舰,乘英国摩汉号炮

舰,由广州经香港,于16日抵达上海,并立即发表宣言,向全国公布陈炯明祸国殃民、作乱纵兵的滔天罪行。第二次护法运动又遭到沉重打击,孙中山大声疾呼:“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从此,孙中山加快了联俄的步伐。8月25日,他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自己的寓所会见了李大钊,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有“南陈北李”的称谓。“南陈”指陈独秀,“北李”就是指的李大钊。孙中山对李大钊的多次单独拜访与诚挚帮助十分感谢,并提出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问题。几天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中共主要负责人,由国民党元老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持,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举措,缘于一个多月前,即1922年7月16至23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上的决议;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具体形式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二大决议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建议,并由李大钊和马林向孙中山说明了党中央的主张,孙中山欣然表示同意,所以才有国、共两党跨党籍的由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为9月4日改组国民党的准备会议奠定了基础。

且说孙中山联俄联共心切,1922年9月下旬,他又令廖仲恺与夫人何香凝离沪赴日本。这次赴日,表面上是去参加北京政府驻日本代公使廖恩焘家兄弟六女承麓与许崇清即将在10月在东京举行婚礼,但其真实意图是与苏俄代表越飞及其随员谈判中俄合作,并与东京的国民党人联络一系列重大使命。廖仲恺夫妇因越飞的代表未去日本,未达目的而返。1923年1月17日,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南下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并于26日

发表了《孙中山越飞宣言》，次日离上海经日本回国。廖仲恺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受孙中山委托，以带女儿廖梦醒赴日治病为由，与越飞诸人同乘亚洲皇后号客轮于2月1日抵达东京。由于越飞病重，廖仲恺多与其秘书谢瓦尔沙龙等继续会谈，中心议题是进一步讨论苏联政府对孙中山革命政府的态度及政策，探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异同，中苏联合反对帝国主义，苏联帮助在中国建立军官学校，援助军械，打倒军阀，完成中国统一大业。苏联废除以前沙俄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等诸多问题。这是《孙越宣言》的进一步具体实施的方案。《孙越宣言》的公开发表，宣布“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诚挚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这意味着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确立。孙中山为中国进行“根本之改造”，还亲拟电稿致苏联政府，表示愿意赴俄国考察。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去成，始有由蒋介石代表孙逸仙博士赴俄考察的事。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陈独秀在批评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倾向时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于1923年1月被派往海参崴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马林在1924年4月回到荷兰，积极参加荷兰共产党的活动。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他的故乡，马林又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1942年3月6日，马林不幸落入法西斯匪徒手中，他在狱中坚贞不屈；4月7日在法庭审讯时，他怒斥法西斯暴行。他自知难逃厄运，在4月11日给女儿菩菩和女婿桑顿写了诀别书。4月14日马林视死如归，倒在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54岁。马林是向孙中山建议创立黄埔军校的外国朋友，但他却难想到黄埔军校竟会成为中国将帅成长的摇篮。他的功劳，改写了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

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出生在俄国克里米亚一个商人家庭，本

名阿道夫·亚伯拉莫维奇，十九世纪从事俄国社会主义运动。1908年，25岁的越飞跟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2年被沙皇政府逮捕，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度过了5年的流亡岁月。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再次跟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并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苏俄驻德国大使，1922年8月作为苏俄特使来北京，与北洋政府洽谈建交等问题。1923年1月下旬他转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26日发表《孙中山越飞宣言》，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基础。越飞返回苏联后，很快被卷入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纷争，越飞因与托洛茨基的见解相近，一直得不到重用，甚至被完全停止政治活动。越飞因此身体日渐衰弱，1927年9月，医生建议他赴西欧疗养，但联共(布)中央只同意支付他一千美元的医疗费，无法遂愿，在国内也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当时，国外有人以两万美元巨款为诱饵，建议越飞撰写出版他的自传，越飞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拒绝了这一要求。1927年11月初，越飞终因神经剧痛而卧床不起。11月15日深夜至16日凌晨，他决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宝贵生命。临终前，他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很长的诀别信。信中说：“我屡次亲耳听见列宁讲，1905年不是他，而是你才正确。临死之前，我决不撒谎，现在我特地把此事告诉你。”这封绝命书，1928年2月1日曾发表于美国纽约的报刊《民族》(《Nation》)，同年又被译成中文，登载于上海嚶嚶书屋出版的《当代》杂志第一卷第二编。越飞自杀时，年仅44岁。越飞帮助孙中山彻底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幻想，正式确定“联俄联共”政策，对国共第一次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首批8000支步枪，就是越飞回国后说服列宁等而运抵黄埔港的，他的功劳应当在

校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提起国共第一次合作,不能忘记国共两党领导人会晤的牵线人孙洪伊。孙洪伊乃天津人氏,生于1872年,字伯兰,1920年11月被孙中山聘任为广东政府高等顾问。孙洪伊一生中最闪光之处,是他为李大钊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原来,孙中山、李大钊都与孙洪伊交谊颇深。李大钊因发表反对袁世凯的文章《大哀篇》,袁世凯指使其部下准备暗害他。孙洪伊获知后,立即召李大钊到孙家暂时避居,不久资助李大钊赴日本留学,以逃避袁世凯的暗算。孙洪伊在北京任内务总长时,又聘请李大钊等代拟有关《地方自治法规》。1921年10月,孙中山为改组国民党,筹划国共合作,致函国民党上海支部:“已委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请孙伯兰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1922年8月中旬,李大钊离京赴沪。一是参加中央全会,二是与孙中山会谈国共合作问题。当时李大钊来上海后就住在孙洪伊的寓所。8月20日至22日,李大钊在杭州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特别会议。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便去上海拜访孙中山,当时会谈的地点是孙洪伊的寓所。以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与孙中山接触,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孙洪伊在两党领导人中间牵线搭桥,功不可没。

说到这里,许多人弄不明白孙中山派出的代表团怎么叫“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呢?有的书中又称孙中山为孙文,还有的书称孙中山为中山樵。这里不妨将孙中山的家世简单介绍一下。

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珠海两市和斗门县一部分)翠亨村人。孙中山的先祖是由东莞县上沙乡迁来香山定居的,幼名帝象,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来因为日新的粤语谐音,改号逸仙。1897年,他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化名中山樵,

简称中山,辛亥革命后,人们便称他孙中山。据广东省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李伯新等人反复考察,证明孙氏祖先不是来自紫金县的公馆背村,而是来自东莞县的上沙乡。人们在位于翠亨村东北方两公里处的孙氏祖墓,找到了孙氏 11 世祖孙瑞英,12 世祖孙珽昌,13 世祖孙迥幹的墓。从墓碑提供的史实,说明孙中山的先祖从明代开始即已定居香山县,加上《孙氏家谱》,《孙中山先生的父亲孙达成、叔父孙学成、孙观成批垦祖先荒地的契据》等提供的资料,以及 1912 年 5 月 11 日在广州举行的《广东孙族欢迎中山先生悬亲大会纪念》的相片,都证明孙中山祖籍原在东莞市长安上沙乡。当年参加垦亲会的十多名代表之一的孙同发的儿子孙衍佳将照片保存了下来。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哲嗣孙科即为卢氏夫人所生,后与陈淑英女士结婚,生有两子:治平、治强。长孙治平生于 1913 年,适逢民国初建,中山先生殷望国治民安,期臻太平盛世境域,乃为他取名“治平”;次孙治强生于 1915 年,时值袁世凯酝酿帝制渐趋表面化,孙中山有感于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为其取名“治强”。原配夫人还生有二女,一名姪,一名婉。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后,孙科夫妇对宋庆龄非常尊敬,称呼“婆婆”;宋氏夫人则用英语称孙科为 Mister Foo(粤语“科”发 Foo 音)。孙中山夫妇对两个孙儿极其喜爱,每有美味佳肴,必定留给孙儿。孙中山的家庭一向和美,堪称中国家庭之楷模。孙中山毕生从事民主革命,历经险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信迷信,爱书如命,轻淡名利,勇于解剖自己,不断校正革命的航向,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使革命事业绝处逢生,焕发出青春的朝气,表现出一位成熟者的睿智和长者的辉煌。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筹备黄埔 蒋介石率团访苏 联俄联共 国民党宣布改组

话说 1922 年 6 月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孙中山与廖仲恺、宋庆龄与何香凝死里逃生,不能不算是这场灾祸中的万幸,宋庆龄事后评论陈炯明叛乱的观点是“陈炯明不除,广东难以安身”。孙中山一方面积极在上海谋求得到苏俄与共产党的支持,一方面又在筹划重振旗鼓,组织力量讨伐陈炯明,打回广东去。1922 年 12 月,孙中山联络驻在广西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支军队,组成了西路讨贼军,配合在福建的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东西两路夹攻陈炯明的叛军。经过激烈的战斗,不可一世的陈炯明不堪一击,接连失败,部队纷纷倒戈反正,于 1923 年 1 月 16 日夜退出广州,率残部窜逃惠州、潮州及琼崖老巢。2 月 17 日,孙中山途经香港,于 21 日到达广州,在滇军杨希闵让出来的东郊农业实验场设立大元帅府,3 月 1 日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任命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胡汉民为总参议,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程潜为军政部长,孙中山则为陆海军大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广州革命政权建立后,即遭到反革命势力从四面八方包围和进攻:先是 4 月 16 日沈鸿英部在广州叛变,孙中山不得不亲自出马督战,率领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

寰部将沈鸿英部赶出广州；稍后5月9日，陈炯明从东江再次叛乱，勾结沈鸿英部向广州反扑；其次是北洋军阀吴佩孚从广州北面猖狂反攻，孙中山两面受敌。再说许崇智的粤军、杨希闵的滇军及刘震寰的桂军又不听指挥，孙中山手中仍然没有自己的一兵一卒，要贯彻他制订的军事计划，都要商量于各军司令部，只好仰人鼻息。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大元帅府的参谋长，经常随孙中山到前线视察督战，但这些地方军阀打着革命的旗号，遇到有损于自己的事，他们就公然抗命，不听调遣。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就不接受攻打陈炯明老巢惠州的计划，他在潮汕打了败仗，也迁怒蒋介石，以致他感到“参佐军务，不为人谅，反遭齟齬”。经过反复周折，孙中山总算于6月中旬把广州的局势稳定了下来。周恩来在《关于1924年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对孙中山有如下的评价：“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军事投机，甚至完全成了与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破产。”孙中山他那为革命不屈不挠的精神，勇于探索真理的气概以及他崇高的人格力量已为世人所公认。伟人也有失误，纵观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及时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广州局势稳定之后，孙中山开始考虑筹建军官学校的问题，虽然为时稍晚，但毕竟已经起步，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他开始积极筹办建立黄埔军校。

话分两头。先说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其政治、党务和军事的事，孙中山周围有许多精兵强将，资历比蒋介石深的大有人在，为何孙中山偏偏选中了蒋介石呢？这话得从头说起。

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乃浙江吴兴人氏，字英士，早年学典当业与丝绸业，从事政治活动

以后,一直追随孙中山,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长。孙中山要求入党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世家出身的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黄兴(克强)则坚决反对这帮会一套陋规,而陈其美却是第一个宣誓打手印的党员,因此受到孙中山的器重与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再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中山避难永丰舰(后改为中山舰)50多天,蒋介石在上海闻讯后应召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并肩战斗40天,真是“间关赴难,临危授命”。后来孙中山为蒋介石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其中称赞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兹纪殆为实录。”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军事才能深信不疑,把蒋喻为“如身之臂,如骖之靳”。赞扬蒋“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蒋在永丰舰上的表现深深打动了孙中山。“爱屋及乌”,陈其美曾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1916年5月在上海被袁世凯的爪牙杀害后,念蒋是陈的学生,因此受到孙中山的信任与重用。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说:“以英士(陈其美)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孙中山为了筹创黄埔军校,虽然国民党内学过军事的人才不少,但如邓鏞已被害,朱执信也牺牲了,许崇智作风老朽,不堪重任,故孙中山说:“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蒋介石)之勇敢诚笃,可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孙中山考虑蒋介石年轻有为,又懂军事,所以物色他赴苏考察,至于是否在将来要他当黄埔军校的校长,暂且不提。

蒋介石的生平事迹,国内外早有传记流传。蒋介石是黄埔军校“四巨头”之一,又是第一任校长。可以说是靠黄埔起家,在此,有必要作简单叙述。

蒋介石于公元1887年10月30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生于浙江省奉化县(今奉化市)溪口镇一个盐商家庭。起名蒋固泰,乳名瑞元,从政后改名蒋中正,字介石。他的祖父蒋斯千,字玉表,贩盐为业,到了晚年在溪口镇上开设玉泰盐铺,算得上镇中富户。父亲蒋肇聪,字肃庵,又名明火,继承家产经营玉泰盐铺,兼营酿酒、食米及石灰等业务。肇聪先后娶了三个妻子,原配徐氏,生女名瑞春,子名周康,字介卿,号锡侯。徐氏病故,续娶孙氏为继室,不久亦病故。蒋介石的母亲名王采玉,22岁嫁给蒋肇聪为填房,婚后生瑞元(即蒋介石),长女瑞莲,次女瑞菊,幼子瑞青,除瑞莲、瑞元外,瑞菊、瑞青均先后夭折。蒋介石这个名字是1912年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时用的笔名,1917年以前上学均用蒋志清,投奔孙中山之后用蒋中正。蒋介石8岁月丧父,关于他的家世至今社会上流传各种说法。唐人著《金陵春梦》中说,蒋介石本不姓蒋,而姓郑;不是浙江人,而是河南许昌人。另据有关资料介绍,蒋5岁在家庭教师任介眉名下发蒙,他15岁以前,先后就读于蒋谨藩、姚宗元、毛凤美、竺景崧、毛思诚老师所开的私塾馆,接受封建的旧式教育。郑发(即郑绍发)与蒋介石根本沾不上边。据郑绍发的老婆说,郑绍发与蒋介石是同胞兄弟。郑行大,蒋老三。当时因河南闹灾荒,郑家老父死去,他们的母亲无法支持,就带着老三嫁给一个商人,跟到浙江去了。后来老三改名蒋中正,即“蒋宗郑”之意。郑老大(绍发)认为老三已飞黄腾达,就应当“还姓归宗”。那时候汤恩伯驻在河南,汤即送郑去重庆认亲。这年正是1941年,蒋介石正大讲“新生活”运动,吹嘘四维八德,而且“事亲至孝”,蒋介石自然不好下令戴笠把郑杀掉;蒋不发话,戴笠也不敢乱动,只好“优待”起来,把郑关在贵州息烽集中营,优待有加,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开释返回河南。但解放后从浙江嵊县发现蒋介石生母王采玉家

的《王氏家谱》，据其记载，蒋介石生母王采玉，生于1864年，浙江嵊县葛竹村（现划归奉化市）人。王采玉青年丧夫，在葛竹守寡，适逢蒋介石生父蒋肇聪丧妻。在肇聪开的玉泰盐铺当伙计的王贤东，是王采玉的堂兄，采玉由王贤东介绍给蒋肇聪填房，时年23岁。第二年（1887年）王采玉生下蒋瑞元（即蒋介石）。1895年蒋肇聪染时疫去世，王采玉又寡居，她除了诵经拜佛之外，就是抚养儿子，直到1921年去世。

抗战时曾有流言传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名叫郑三发子，其兄郑绍发曾到重庆找蒋介石认亲等等。这种传说甚至连台湾号称“台湾狂生”的李敖也持此看法。经过调查，王采玉不论是最早嫁与曹家田竺其为妻，还是青年丧夫后与溪口蒋肇聪结婚，都未曾迈出奉化县境半步；蒋肇聪一直生活在溪口，光绪十年（1884年）并未到过河南。此外，蒋介石是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生于溪口镇玉泰盐铺楼上，不可能如郑绍发说的蒋介石就是光绪十年已经8岁的郑三发子。南京总统府保存民国档案虽有郑绍发致蒋介石的两封信函，但只能说这是郑绍发攀龙附凤，一厢情愿认蒋介石为亲，当然蒋也不会承认有这么个河南老兄。蒋介石身世之争长达60多年，想必应该澄清是非，不能再武断臆测了。蒋介石在《蒋总统集》中自陈：“9岁丧父，一门孤寡，莪子无依。其时清政不纲，吏胥势豪，夤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覬觎之的，欺凌胁迫，靡日而宁，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产业被夺，先畴不保，甚至拘陷公庭，迫辱备至；乡里既无正论，戚族亦多旁观，吾母子含愤茹痛，荼蘼之苦，不足以喻。”蒋介石亲自回忆，当属可信。

蒋介石15岁娶奉化县岩头村毛福梅为妻，1910年生蒋经国。毛氏于1938年被日本飞机炸死于溪口。蒋介石与毛成婚后，即1903年入奉化县城里的凤麓学堂开始受新式教育。1906

年蒋介石毅然剪掉辫子,东渡扶桑,在日本东京清华学校学日语,结识陈其美,加入同盟会。1907年蒋介石回国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年被派往日本入振武学校学军事,1910年冬蒋毕业后,以上官候补生被分配到驻扎在日本北海道新泻县的野炮第13联队实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和张群等23名同学不辞而别,回国奔赴革命疆场。蒋介石并未上过日本士官学校,但他在履历表中总是写着这一学历。据了解,1928年7月,蒋介石下野复出不久以总司令的名义驻节北平时,派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会的刘宗纪接洽,并以蒋氏为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的名义捐款5万元,作为同学会的经费。当时有些人向刘宗纪质问:“从何处冒出这么个叱咤风云的贵同窗?”刘宗纪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后来士官同学会中就有蒋介石的大名。李宗仁先生对此曾评价道:“英雄不问出身,蒋先生实在是多此一举。”蒋介石追随陈其美任沪军第五团团长,1914年经陈其美介绍第一次单独会见孙中山,参加讨袁、护法战争。1918年奉孙中山之命,赴粤襄助陈炯明,相处7年,但他不愿寄人篱下,“宁为鸡首,不作牛尾”,几次离职返回溪口,后孙中山多次召回,始想赴苏俄和德国考察军事。

且说以蒋介石为代表团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4人组成,蒋任团长,张太雷(当时任中共“三大”后补中央委员),沈定一(中共党员),王登云(曾任黄埔军校教导团党代表,军校英文秘书)为团员;张太雷兼俄文翻译,王登云为英文翻译。代表团于1923年8月16日乘日轮“神田丸”从上海出发,19日抵大连改乘火车,25日至满洲里边界改换车辆后入苏联境内。然后经由西伯利亚,乘车9天,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从上海出发时,蒋经国、蒋纬国前来送行,蒋介石曾作《所感》一篇,哀叹:“从此道途日远,何时复得回乡扫墓,顾前思后,悲戚无异于二十年

前初就外傅之日……”蒋介石在途中每天都写日记,记下沿途的风光、地名及车站名,还不时大发感叹。江南的8月正是酷暑当空,而西伯利亚的夜晚却寒气袭人。蒋介石头一次看见那西伯利亚的广漠与荒凉,这使他自然地想起苏武牧羊时流放的边塞是何等凄苦与贫瘠!抵达莫斯科时,恰逢成千上万群众在大街上游行示威,也使蒋耳目一新。当时列宁因病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吾尔克村别墅,没有接见代表团。蒋介石先后会见了托洛茨基、齐采林、加里宁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等党政军领导人,并参观了莫斯科与彼得格勒两地的工厂、农村、学校和军营。他还列席了全苏维埃代表大会与共产国际会议。10月3日蒋介石又会晤了流亡在莫斯科的越南爱国人士胡志明。代表团于10月10日双十节宴请莫斯科东方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有后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的中共党员熊雄。蒋介石与熊雄的一笔生死血债暂且不表。

且说蒋介石对托洛茨基印象很深,托说:“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为之。积极援助。”蒋赠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了两万人的红军阅兵式,蒋介石应邀参观。红军威武雄壮,炮车辚辚,战马得得,飞机凌空呼啸而过的场景,使他深深地陶醉在对未来的幻想之中。

代表团在苏联参观了三个月,最令蒋介石吃惊的是红军官兵上下级平等,革命政权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红军的政治委员制以及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11月29日蒋介石一行4人从莫斯科启程,循原路线回国,12月8日到达满州里,15日抵上海。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业明,陈果夫均赶到船上劝蒋介石理应立即向孙中山与全党报告赴俄考察情况,但蒋除上岸

会见张人杰之外,不再见任何人。当日下午三时他乘船回溪口老家,次日抵宁波,乘轿子返慈庵里。蒋介石之所以急急忙忙赶回老家,原来这一天是他母亲的60岁冥诞,又是他建筑的三间洋房慈庵落成典礼。孙中山12月30日打电报给蒋介石:“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蒋介石于12月15日寄给孙中山一份《游俄报告书》,蒋认为:“俄共政权如一但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孙中山对蒋的看法给予批驳,批评他“未免顾虑过甚”。蒋介石如不去苏联考察,也许不会如此坚决反共,正是因为他到苏联亲眼看见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才认为苏俄的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从而有了后来的国共分裂。蒋介石赴苏考察,为他日后掌权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埋下了祸根。

再说国民党接受中共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后,孙中山于1923年1月1日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反帝反封建、改善工农生活等新方针。《宣言》中许多内容是过去孙中山在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历次宣言中所没有的,《宣言》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孙中山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实行普选,确定人民有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自由、保护工农利益以及使用土地法、地价税法的权利。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的原则,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同年10月24日,国民党设立改组国民党的执行机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中央执委廖仲恺、谭平山、胡汉民、林森、吴铁城、孙科、陈树人、杨庶堪、邓泽如,共9

人。候补委员李大钊、汪精卫、古应芬、许崇智、谢英伯，共5人。聘请刚刚抵达广州的苏联顾问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执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开始筹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也于12月25日发出由书记陈独秀，秘书罗龙章签署的第13号通告，指示各级党组织要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无论是国民党或共产党，其中反对改组的呼声此起彼伏。国民党的实力派人物范石生、刘震寰、杨希闵等拥兵自傲，根本不可能真心实意听从孙中山的指挥；国民党元老派胡毅生、李石曾、谢持、冯自由、邓泽如、张继、居正、戴季陶等则是从骨子里就反对三大新政策；李烈钧、许崇智表面上服从，内心里则有另一套打算。国民党内仅有廖仲恺、何香凝、柏文蔚、邓演达、宋庆龄等积极拥护国民党改组。

1924年1月20日上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院那座高高的塔楼内的礼堂里隆重开幕，165名代表到会，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等参加会议，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在开幕词中说：“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策力量去改造国家。”1月20日下午，孙中山又作了《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他说：“中国之革命党，经验不多，遂令反动派得尽其技，没有俄国那种好方法，以防范反革命派使其不能从中破坏，故俄国虽迟我六年革命，而已成功，我虽早六年革命，而仍失败。”正当“一大”会兴正浓时，列宁1月21日逝世，国共两党沉浸在悲痛之中。孙中山决定在广州举行各界追悼大会，他宣读祭文曰：“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为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达此新国，跻我犬同。并世而主，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艰，我事百厄，所冀诸君，同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

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两党共同努力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广州一片欣欣向荣的革命气象。

就在列宁逝世追悼大会召开的1月24日,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指定校址在广州黄埔岛。国民党“一大”选出新的领导机构采取委员制,孙中山被继续推举为国民党的总理,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委员17人。执委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候补委员中林伯渠、沈定一、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于方舟、韩麟符10人为共产党员。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并没有蒋介石的位置,孙中山在2月3日只任命蒋介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孙中山要蒋介石专心筹备军校,不必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这对蒋介石无异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使他终日不安,如坐针毡。蒋介石自命跟随孙中山多年,军事上有过贡献,又是永丰舰上护侍孙中山的有功之臣,思之再三,一纸辞办军校的呈文于2月21日向孙中山送去,并且没等孙中山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他就擅自离开了广州,回到老家奉化去了。

黄埔军校的酝酿、筹备工作,同国民党的改组,国共合作的建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没有国民党“一大”的召开,黄埔军校就没有共产党人的参加,学生来源也会大大受到影响。孙中山在桂林接受了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后,曾指定廖仲恺和鲍罗廷着手筹划。当初派蒋介石赴苏考察,着重参观苏联的军事院校,学习他们创建红军的经验,孙中山有委派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的打算,所以在“一大”期间,就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不想他突然擅自拒不从命,这使孙中山非常着急。2

月 23 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代理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抓紧筹备工作。25 日又派邓演达专程去奉化请蒋介石回广州。26 日中央执委又以公文的形式给蒋介石发电报,通知他的辞职呈文总理没有照准。29 日孙中山又亲自打电报给蒋介石:“现在筹备即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为了与旧国民党有所区别,国民党“一大”后正式将国民党改称“中国国民党”,由孙中山任总理,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说明,将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组建了中央党部,会议选出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中央执委常委,处理日常工作;确定谭平山任组织部长、廖仲恺为工人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戴季陶为宣传部长、邹鲁为青年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蒋介石则在许崇智领导下任秘书。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为“一大”的成功召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谭平山后来评价廖仲恺时说:“廖仲恺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和有力助手,廖先生坚决促成和推动革命的‘三大政策’。在中国革命党进行改组的激烈斗争中,廖仲恺先生极力协助孙中山先生,击败了反动分子的阻挠和破坏。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帮助和直接参与下,终于在 1924 年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当时革命的行动纲领,形成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第一次的统一战线。”谭平山的评价十分中肯,在国、共两党内,对廖仲恺、何香凝的功勋,是有口皆碑的。

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苏联驻北京代表加拉罕致电祝贺。1924 年 1 月 24 日,孙中山复电致谢。会后,广州各界群众数十万人举行庆祝游行,热烈拥护国民党改组,拥护国共合作。黄埔

军校就是在共产党的全力支持下才开始着手筹建的。

孙中山为大会题词曰：“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联俄联共，最早是1920年5月。孙中山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改为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有了联系。陈独秀主持出版《新青年》月刊“劳动节纪念号”，孙中山笔书了“天下为公”的题字。这年5月1日，孙中山在上海主办的《建设》杂志刊载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和李汉俊译的《道德的经济基础》。1920年10月，孙中山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增刊总编辑就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邵力子。孙中山几乎与列宁同时接触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因此，筹办军校以俄为师是办校的主要方针。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国共合作黄埔催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以俄为师 鲍罗廷担任顾问 广聘师资 众将帅云集黄埔

话说由孙中山任命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提出辞呈，擅自离职返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蒋介石住进刚落成的慈庵，每日拂案焚香，烧纸祭母，绕坟植树，带着蒋纬国在林间小道散步，好不清闲自在。其实，他的内心斗争却很激烈。临走前，他对英文秘书王登云说：“黄埔军校已决定不办了，筹备委员会马上解散。”害得王登云连忙召集筹备人员，当场传达蒋的指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这时，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在进行招生考试，湖南毛泽东更是忙得不亦乐乎，积极选送共产党员及优秀青年赴上海参加复试。孙中山一连让廖仲恺发了六封电报去催，又派邓演达亲自赴溪口劝驾，蒋介石不为所动。原来，他想借此事作为以退为进的手段，抬高他的身价。1924年3月2日，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重提陈炯明叛变时，他如何与其“共患难同生死”，并攻击当时孙中山所依靠的“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阿谀谄之徒”。蒋含沙射影地攻击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提出“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系统于不顾”，从而表明他和孙中山在政治上的不一致，反对他的联俄、联共政

策。3月14日他又给廖仲恺写信,责备孙中山“对人对事之要点”不合中庸之道,劝廖不要过于相信苏联,说“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又说“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国共合作伊始,蒋介石从言论到行动,都明显地站在右派的立场上。

孙中山见蒋介石迟迟不回,于2月23日委派廖仲恺代理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抓紧筹备工作。筹备委员会有七个委员,他们是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和宋荣昌。在广州南堤设立筹备处,廖仲恺担起了这副重担。孙中山又请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鲍罗廷为黄埔军校总顾问。

鲍罗廷何许人也?鲍罗廷全名叫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年他生于俄国拉脱维亚,早年读完大学,青年时期即从事革命工作;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被沙皇政府逮捕关在监牢里;出狱后到英、美等国宣传革命,加入美国社会党,他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18年7月回国,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参加共产国际,先后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又派往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德国、英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帮助建立墨西哥共产党;1922年8月在英国被捕,判劳役半年;1923年返回苏联,10月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帮助中国国民党改组。鲍罗廷是职业革命家,经验丰富,刚健沉着,胸有成竹,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曾说:“凡是关于政治的,应听鲍罗廷的指导。”鲍罗廷根据苏联建军经验,为黄埔军校的建设制定了具体规划,并指派列沙托夫、加伦、切列潘诺夫、巴富罗夫等人为黄埔军校军事顾问小组成员,具体负责顾问工作。鲍罗廷上任后首先提出镇压1924年10月在广州

发生的商团叛乱,学生军大显身手,初战告捷,令各地军阀和英帝国主义分子不敢小看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娃娃。由于鲍罗廷对蒋介石的许多反共举措采取妥协和让步,没有及时制止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1927年6月由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会通过解聘鲍罗廷顾问的决定,7月鲍罗廷与其他苏联顾问返苏。鲍罗廷回到莫斯科后,任最高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塔斯社代负责人等职务。1949年2月,苏联政府指控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间谍”,鲍罗廷由于与她在《莫斯科新闻》共事而遭到株连被捕。1951年5月29日,鲍罗廷在苏联远东一所劳动营中含冤死去。1956年苏联共产党为鲍罗廷平反,恢复名誉。可惜,鲍罗廷未能看到当年他呕心沥血创建的黄埔军校培养了像徐向前、陈赓、陈毅这样的将帅。不过,凡是上过黄埔军校的学生,都不会忘记鲍罗廷的名字。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他为救鲍罗廷的夫人曾丢了乌纱帽,令人可敬可佩。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7年2月,苏联派往远东帮助中国共产党的鲍罗廷夫人鲍罗廷·发年与外交邮务员3人乘苏轮《皇后》号由武汉赴上海,轮船行至南京浦口停泊时,被直系军阀张作霖的部属、盘踞在南京的张宗昌部逮送济南转解北京,5月,京师高等警察厅认为鲍妻等均系苏共党员,以内乱罪提交国民党京师高等审判庭庭长何凤丹审理。何凤丹1913年毕业于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1925年担任审判庭长,早年接受民主思想教育,北京求学期间曾研读过马列主义,对《共产党宣言》中“各尽其力,各取所需”与“工农为世界真正创造者”尤为醉心。他承办鲍案,经阅卷认为:该4人虽是苏俄共产党员,并未参加我国的军事、政治活动,无罪可言,遂不顾生命安危,于7月12日毅然裁定,谕知不起诉,随即签发释票,恢复该4人自由,因而

鲍夫人才得以脱险，秘密返苏。张作霖得知此事，本欲干预，但碍于宪法规定的独立审判权，遂诬何凤丹接受过鲍夫人的贿赂，于当天下午派出百余名军警包围何的寓所；因何已避他处，张作霖又派 200 多名密探遍索京津两地未获，又通令全国军警机关严缉。7 月 13 日北京《顺天日报》无端报道何凤丹办鲍案受贿银元 20 万元。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沈家驥与何的亲戚均被监视，何妻施渊如、堂弟何简受株连被关押 317 天。1928 年张学良接管省府他们才获释。何凤丹义释鲍罗廷夫人后，自己也封印弃职南归。为逃避当局通缉，何凤丹乔装打扮成商人，历尽周折，辗转 4 个多月才返回老家，隐居在离斜滩 6 里的坑底山楼中。北洋军阀垮台后，何凤丹才于 1930 年重新北上，在天津任律师。1952 年，67 岁的何凤丹义士病逝于故乡斜滩。

话再回头。且说蒋介石专程到上海，在他过去从事过经纪人炒股的汉口路证券大楼，拜见了他的盟兄张人杰（张静江）、戴季陶。佩戴陆军中将军衔的蒋介石一身戎装，突然出现在他俩面前，着实使他俩一惊。张静江乃浙江湖州四大富豪之一，比蒋大 7 岁，腿有点瘸。据说是在家乡一次火灾中因上屋救火不慎跌伤成残疾，故常年拄着一根文明棍。此人与孙中山交往不浅。1902 年 5 月杭州人孙宝琦出使法国，张静江夤缘以参赞名义随孙出国。在轮船上张静江与孙中山邂逅相识，孙中山见张青年有为，遂以真情相告。张静江灵机一动，愿意加入反清革命组织。当时孙中山正要赴欧美等国向华侨募捐。张静江即表示以白银 3 万两相助，立即致函他在纽约通运公司任经理的妻舅姚叔兰，凭信付银两。孙中山到了美国，果然凭信取得白银 3 万两，对张萍水相逢热心相助颇有好感，后来张继续输财相助，孙中山对他十分重视。

蒋介石向张静江倾吐筹办黄埔军校困难重重，无钱无枪，还

要受当时掌管广州财政大权的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的窝囊气,真不愿意干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张静江说:“对,不任命你为校长,你就不要出山。”张静江本想凭他与孙中山的交情,为蒋说项,又怕人到广州,正式委任状也公布了。最后,还是戴季陶劝蒋速回广州赴任。戴季陶说:“上海的证券可输可赢,而辅佐孙中山,此机不可失!”张静江也劝蒋应该和许崇智在广州扎下根,我们在上海捞钱,共创天下,若蒋手头吃紧,张表示愿意资助。在上海,蒋还见到了风姿绰约、魅力慑魂的宋美龄。两人在张静江的怂恿下缓缓步入舞池,翩翩起舞。虽然蒋介石在广州孙中山家中见过宋美龄一面,但没有交谈,这次意外相逢,使蒋介石萌发了想与宋美龄进一步建立友情的念头。蒋介石和宋美龄如何成亲,如何与孙中山攀亲,暂且不提,以后再详细道来。

且说刚才戴季陶提到“机不可失”,使蒋介石忽然想起这次在溪口上雪窦寺找太虚和尚为他算命的事。太虚和尚也说了“机不可失”四个字,怎么如此巧合?莫不是我命该在黄埔了?戴季陶与蒋介石关系不同一般,蒋以恩师称之,对戴的话他总是言听计从。戴虽比蒋小3岁,当年许崇智、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结拜兄弟时,戴为老四。戴季陶与张静江同是吴兴人,本名戴无仇,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1920年曾和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赴川,行至宜昌闻战火又起,他认为入川希望终成泡影,遂投江自尽,而被救之后,从此皈依佛门,取名不空。1922年戴季陶返沪一心从商,当交易所经纪人,想做朱陶公,又改名季陶。后来说孙中山是继承周公文武孔子的圣人,他自己则以贤人自居,所以再改名传贤。戴季陶好色惧内,瞒着妻子在日本留学时与津渊美智子同居生下一子,不敢领回家,只好与盟兄蒋介石相商代为抚养。正好蒋介石的二房姚冶诚身下无子,乐意抚育,此子就是蒋纬国。

话说蒋介石在溪口正忙着为亡母坟莹植树修缮,坚信肖萱这位风水先生选定的墓地是风水宝地。此坟选在溪口北面3华里的白岩山鱼鳞岙中茔。从整个地形看像座弥勒佛,墓穴就点在弥勒佛的肚脐眼上,山下就是白岩庙。肖萱说墓穴乃龙脉所在,地理之道重龙,凡龙蟠虎踞之势,必出大贵之人。蒋深信肖萱的预言,将来自己必腰缠紫金,荣光无比。当蒋沉浸在梦幻之中时,他的盟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来到了溪口。

许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二期毕业,原籍广东番禺,生于广州,字汝为。辛亥革命后任福建革命军司令;追随孙中山后,曾当过粤军第二军军长,对蒋十分器重。

许的到来,令蒋一惊。许崇智乃王孙公子出身,为前清浙闽总督许应骙之孙,号称花花太岁。他此行的目的是受孙中山之托劝蒋速回广州。许对蒋说:“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孙中山已经从苏俄要了几千条枪,大批款项,四周的军阀都红了眼。你倒好,却把个聚宝盆拱手相让!”蒋聚精会神地听着。许又说:“你要再不回去,可就错失良机!告诉你,孙先生已发言,若你再不回来的话,校长一职将考虑他人。”蒋介石经不住许崇智的激将,真怕坐失良机,便连夜打点行李,于4月14日动身。21日到达广州后,26日他就进入黄埔军校正式办公。蒋介石这一去就是两个月,军校筹备的重担全落在廖仲恺肩上。

话说廖仲恺代理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实干快干,甚至专到南堤1号筹备处办公,处理日常重大事务。广州当时有旧式军队以及打着革命招牌的各式军校。如有程潜办的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实际由李明灏负责)、湘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粤军军官学校及桂军讲武学校等。他们对孙中山办黄埔军校评头品足,袖手旁观,等着看笑话。甚至有的人则刻意刁难,根本不希望出现一支新

型的国民党军与自己“分庭抗礼，平分秋色”，抢自己的饭碗。筹备处当时有两位得力干将：一位是从粤军第1师第3团兼团长职务岗位上抽调来的邓演达；另一位就是被廖仲恺十分器重的青年爱国军人——当时任粤军第8旅参谋长的叶剑英。邓演达是粤军第1师师长李济深的心腹主将，叶剑英则是粤军第8旅旅长张民达的左右手。廖仲恺为借调这两位能人费尽了周折，最后终因黄埔军校筹备处执意坚持，他两人才来筹备处报到。邓、叶在廖仲恺的领导下，开始了艰难的军校筹备工作。

1924年1月24日，即在国民党“一大”召开之际，孙中山决定将筹备中的“国民革命军官学校”改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这是因校址设在广州黄埔岛的一种习惯称谓。军校成立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该委员会委员长，而实际上由廖仲恺负责。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最后选定广州东南黄埔岛旧有的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和海军学校为黄埔军校校址。

黄埔岛距广州市20公里，在珠江之中，四面环水，远离城市，南连虎门，背负升旗山，全岛有10平方公里，山峦起伏，林木葱翠，是当时广州的一方净土，也号称广州的第二门户，实可谓培养军官的理想之地。然而谁会料到，后来黄埔岛竟为中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显赫的将帅，成了中国培养将军的摇篮呢！

叶剑英这位风华正茂的军官，1922年秋被任命为东路讨贼军第8旅参谋长。调来黄埔军校后，任教授部副主任，时年27岁。他负责掌管军事理论教育，亲自讲授兵器学，是当时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叶剑英原名叶宜伟，广东梅县人，生于1897年4月28日，7岁上私塾，以后进三堡学堂；辛亥革命后，进入梅县务本中学读书，由于品学兼优，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22岁报考云南讲武堂，为该校第12期炮科学生；毕业后追随孙中山从

事革命活动, 前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见习官, 后到广州孙中山组织的军政府副官处工作, 并经吴铁城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后, 他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 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经梧州东下广州。1922年6月, 陈炯明叛变, 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由叶剑英、陈策等人护卫, 先登“宝璧舰”避难; 后来叶剑英察觉“宝璧舰”官兵不可靠, 遂护卫孙中山改乘“永丰舰”前往黄埔。叶在孙中山广州蒙难中忠心耿耿, 临危不惧, 表现了一个革命军人应有的胆识; 1922年秋又被任命为第8旅参谋长。他调到黄埔军校任教后, 对创建革命的军官学校起了积极作用。叶剑英对古代兵器中的宝剑十分偏爱, 当他投笔从戎时, 便将自己的名字叶宜伟改为叶剑英, 取其“要做剑中英雄, 以武报国”之意。叶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 一生中英勇善战, 机智果断, 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始终陪同周恩来参加国共多次谈判, 号称儒将, 他的传奇故事暂且不表。在黄埔军校筹备期间, 叶剑英亲自参与编写讲义、制订教育计划; 从布置校舍到招生、聘请教职员等事宜, 都事必躬亲, 努力做好。苏联第一个军事顾问组切列潘诺夫等应邀参加了军校的筹备工作。

1924年3月1日, 黄埔军校新生入学试验委员会成立。虽然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 但他仍在老家溪口闹情绪, 迟迟不归。不得已, 孙中山委任李济深兼代, 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等9人为委员, 积极准备迎接新生入学考试。

黄埔军校各项筹备工作如期顺利进行。仅2月至5月短短4个月中, 廖仲恺亲自主持召开筹备处会议32次, 先后完成了制定校章, 修理校舍, 任免教职员, 招考学生, 审查教职员及学生资格, 决定第一期教学计划, 决定全校师生须加入国民党, 设计学生制服、帽徽、领章样式以及书籍购买等一系列事项。

黄埔军校在干部的配置问题上,也经过一番周折。他们广聘天下贤士,接纳全国优秀军事、政治人才。由李大钊介绍来准备担任广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共产党员张申府,积极向廖仲恺推荐英才。在廖仲恺的恳求下,张申府很快列出一个包括周恩来、周佛海在内的15人名单。廖仲恺欣闻尚在法国的周恩来回国怕旅费不足,连忙汇去路费,促其来黄埔就任要职。

为解决黄埔军校基层干部之不足,3月24日筹备处会议决定:从广东警卫讲武堂和江西讲武堂等学校的毕业生中挑选50人充任军校学生队正副队长之职。

到1924年5月止,黄埔军校领导机构组成。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校本部,是军校的 highest 领导机构,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以下设六部、一室、一厅。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后来由周恩来继任,副主任张崧年;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副主任吴子泰,后来由陈适继任;军需部:主任周骏彦,副主任俞飞鹏;军医部:主任宋荣昌,后金诵盘继任;总教官室:由何应钦任军事总教官;校长办公厅:为军校的领导办事机构,以邵力子为秘书长。

总教官室人才出类拔萃,战术教官有顾祝同、刘峙、陈继承、严重、陈焯、邹竞等人;兵器教官有钱大钧、文素松等。后来汪精卫、鲁易、邵力子都任过政治部正副主任,聂荣臻任秘书。从1926年第四期开始,吴稚晖(敬恒)、顾孟余、陈公博、高语罕、陈其瑗、于树德、安体诚、张庆人、肖楚女、恽代英、许德珩、张申府都当过政治教官。施复亮、沈雁冰、孙炳文、项英、曾泽生、成仿吾、王昆仑、季方、汤恩伯、张治中、张静愚等均云集黄埔,一时成为全国著名学府。“严师出高徒”,在国共两党精英会聚的黄埔军校,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在“以俄为师”的思想指导下,孙中

山毅然决定：黄埔军校汲取苏联红军建军经验，接受苏联政府援助的 200 万卢布、8000 支步枪，大量吸收中国共产党人到校任教。当时，中外军事家、政治家“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无不惊叹孙中山招贤纳士，藏龙卧虎之襟怀。

在当时军阀割据的情况下，黄埔军校能独树一帜，异军突起，除了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外，主要有苏联红军的榜样，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参与。国共两党精英办校，是各路军阀所难以容忍的，他们拉山头，占地盘，招兵买马，重用亲戚，讲究行帮义气。不管他们是办的什么讲武堂，还是军事学校，但培养出来的军官皆胸无大志，而只能替军阀卖命，其前途自然可悲。黄埔军校师资来自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滇军、粤军、黔军、湘军、桂军所办的讲武学校。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如邓演达、张治中等，都是当时年青有为，爱国热忱极高的少壮派军官。

邓演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总队长、教育长之职。他 1895 年 3 月 1 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永湖乡，保定军校 6 期毕业。此人才华横溢，英气勃发，一身正气，他是蒋介石生平最嫉妒的竞争对手。他练兵具有坚定刻苦的精神，取下极严，但处处以身作则。他对学生训话，始终保持上台台下立正姿势，常常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虽酷暑严寒，也从不例外。他认为军人不能耐数小时立正之训，只配当土匪，不配做革命军人！邓后来虽被蒋逼走，但他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威望，甚至高于蒋介石。然而邓演达终未能跳出劲敌蒋介石的手心，他如何被蒋谋杀的，留在后面再详细道来，在此暂且不表。

黄埔军校 1925 年 10 月增设了入伍生部，由方鼎英任部长，唐星任副部长。另外黄埔军校还设有特别官佐，先后担任特别官佐的有陈诚、徐坚、季方、徐成章、吴嵎、黄为材、简作桢、刘宏宇、严伯威、杨本烈、徐光武等。

且说陈诚，此人有“袖珍领袖”的绰号。他是浙江青田人氏，字辞修，1898年1月4日出生，毕业于保定军校第8期炮科，1924年任黄埔军校上尉特别官佐。他在黄埔军校初创阶段并非显赫官佐，但自在校长办公室任职后，经常与蒋介石接触，受到校长器重，官至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参谋总长、台湾国民政府副总统，权倾一时。他是国民党“黄埔系”中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成为蒋介石逃往台湾后的主要助手。

黄埔军校创办初期有“黄埔四巨头”之称，他们就是蒋介石、周恩来、何应钦、王柏龄四位名人。蒋介石、周恩来可说是国共两党的魁首，在黄埔军校创建时，他们就共同战斗过，以后又分道扬镳。在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他们打过不少交道，也称得上是冤家对头。蒋介石、周恩来是传奇中的主角，他们的恩恩怨怨，以后的章回中将会陆续提到，暂且不表。

且说何应钦、王柏龄这两位干将的简单历史。何应钦在黄埔身为战术总教官，后来他与蒋介石共事长达半个多世纪。1979年3月11日何应钦90大寿时，国民党元老谷正纲借用《易经》之典故，将蒋介石与何应钦的关系形容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毕生依蒋而贵，离蒋则衰。这位来自贵州山区的国民党一级上将，乃日本士官学校第11期生，与蒋师兄师弟相称。王柏龄则是沾日本振武学校同学的光，曾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有一些军事教育的经验，被蒋邀请进了黄埔军校任教授部主任。此人为人荒唐，思想反动，惟蒋介石马首是瞻。黄埔军校因广聘师资，延揽人才，才有日后的声望。正是：网罗天下栋梁材，赢得桃李满园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秘密招生 毛泽东推荐英才 鹤立鸡群 蒋先云名列榜首

话说广州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孙中山就频繁向出席大会的各省、市代表提出：他们返回后千万要为黄埔军校宣传，并尽一切努力多推荐一些优秀青年参加军校招生考试。《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7日刊登《陆军军官学校考试委员会启事》，内容如下：

本会奉帅令组织执行章程规定之职权，所有考试及审查方法，要以公正无私、细密严谨之要旨行之，以期选拔人才，无负重托。而连日以来本会各职员接获各方同志友好推荐要录之函件甚多，稍有徇私，不特无以示大众，亦违本会组织之本旨，与五权宪法中考试权独立之精神相抵牾，貽弊滋多，尚祈信仰主义，各守规律之各同志友好深予体谅，不甚厚幸，特白。

1924年春，我国处在军阀割据的黑暗统治下，曹锟用贿选手段刚当上了总统。北洋军阀政府内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3月29日北京各校学生及民众团体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北京军阀政府无条件承认苏联。当列宁逝世的噩耗传来，广州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追悼大会。全国正直青年对联俄联共政策热烈拥护。他们视广州为国民革命策源地，是黑暗统治下的

中国放射出的一线希望之光。广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纷纷南下,以参加黄埔军校考试为荣,立志报国。

在赵恒惕的反动统治下,湖南以联省自治为旗号,实际上是依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都不能公开,自然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也就秘密进行了。毛泽东和何叔衡出席广州国民党“一大”会议以后,就返回这里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他们积极向各基层党组织提出要求:抓紧时间推荐优秀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三湘子弟蒋先云、贺衷寒、陈赓(即黄埔三杰),石门进步青年王尔琢、郑洞国,桃源的刘戡、刘铭等大批热血健儿都纷纷报名。当时应试的作文题目是《试述投考黄埔军校的志愿》,数理化没有考。考后,何叔衡按照黄埔军校的规定录取了15名,另外又备取3名,并吩咐他们秘密分散搭火车抵汉口,再乘轮船赴上海去见毛泽东委员,然后参加上海的复试。

巴山蜀水、赣江南北、三晋大地、齐鲁故乡、荆州东西、陕北高原、黄河两岸、长江首尾、浙闽两广的文才俊秀纷纷南下广州,“到黄埔去!”一时成为革命青年最向往的口号。贺衷寒由湖北省党部农工厅厅长董必武介绍直接找廖仲恺入的校。陈赓等20多名考生坐着太古公司的一艘又脏又乱的渡船刚上广州码头,就兴冲冲地打听黄埔军校招生地址,结果竟考错了学校。徐象谦(徐向前)1924年1月就告别了父母,冒着严寒,邀了白龙亭几位五台同学赴上海报考。徐向前在广州参加复试后,政治、作文考得不错;数学因无基础,几乎交了白卷。有几位同乡因考试成绩太差,心也凉了。大家每天只好蹲在小旅馆里,一边等消息,一边谈论怎么办的问题?有人说考不上就“卖猪仔”去国外做苦力,或者是半工半读。当时他们想去的地方是俄国和法国。没有等多久,忽然来了通知,他们山西来的几个同乡全部被招生

委员会录取了。当时北方报考的青年人不多,为了照顾西北偏远考生,孙中山特别关照北方的青年人学。在这种情况下,22岁的徐向前有机会成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学生。

湖南湘乡青年陈赓、宋希濂、李默庵从长沙育才中学初试录取后结伴而行,来到广州。陈明仁、左权、肖赞育、蔡昇熙、刘咏尧、李仁干、苏文钦等乘船抵达广州,肖赞育诗兴大作,在船上赠给苏文钦七绝一首:“妙龄壮志慕终军,跋涉湖山万里云;莽莽神州方丧乱,好凭巨臂扫烟尘。”诗中的英雄气概,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壮志。他们投入了大元帅府办的军政部讲武学校。该校由程潜主办,后来并入黄埔军校,同学们编入第一期第六队。陈明仁密赴黄埔向蒋介石反映情况,后因事为程潜得知,他下令集合全校师生,将陈明仁罚打手掌三百,由少将校监督周贯虹亲自执行,打得陈明仁直在地上打滚。后来陈明仁打趣地说:“进了黄埔军校,挨三百棍也值。”

浙江孝丰考生胡宗南因个子矮,差点没被黄埔招生委员会拒之门外,幸而廖仲恺相中了他,放宽录取,侥幸中成了黄埔第一期学生。湖南石门的郑洞国赶到广州时,由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报名日期已截止,同乡贺声洋唉声叹气地说:“只好留在广州等待第二期招生。”郑洞国也一筹莫展,深悔当初未能早动身几日。正难过之间,同乡湖南临澧人黄鳌说:“我有个办法,不知能否一试?”郑洞国喜出望外地忙问:“什么办法?”黄鳌为他道出了事中的真相。原来他初到广州时,怕一次考不取,先后两次报名,谁想第一次考试就被录取,却还空着一个名额,建议郑洞国顶着黄鳌的名字去考试。郑洞国想了想,觉得别无他计,就决定大胆冒名一试。结果郑洞国不费力就考取了。同时录取的还有王尔琢、贺声洋。事有凑巧,郑洞国与黄鳌同编在第二队,区队长点名时,出现了两个黄鳌,引得同学大笑不止。假黄鳌郑洞国

再也隐瞒不住，只好向中队长吐露了真情，并请求重新单独进行入学考试。但校方表示谅解，恢复了郑洞国的真名，从此郑了却了一桩心事。同在第二队的黄维、俞济时、李延年、桂永清、周士第、邦悌、李之龙等，后来都成了国共两党赫赫威名的战将。

陕西米脂杜聿明刚完婚正度蜜月，忽然在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上看到广州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他顾不得新婚燕尔的柔情，毅然邀集陕西籍同乡关麟征、张耀明等 11 人踏上了南下的行程。他们下榻陕山会馆。一见考生逾千，杜聿明生怕落榜，联名给国民党元老、原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致函，请求为之疏通。半个月后，才接到于右任的回信，约杜等在饭店见面。于见家乡青年不远万里投笔从戎，语多勉励，表示愿意鼎力推荐。4 月 28 日发榜，杜聿明、关麟征、张耀明、马励武、董钊、马师恭、杜聿昌等 11 人榜上有名，这当然与于右任的保荐不无关系。于右任爱才若渴，临别时还送杜聿明一幅亲笔抒怀的条幅：“安危天下重，博大圣人心。”陕西鄠县（今户县）的关麟征原名关志道，因家境变故，中途辍学，正愁前途无望。忽然他听一位朋友说：“孙中山在广州闹革命，开办一所军官学校；于右任在上海秘密招生，弄了两张报名卡，写了两个名字，除我以外，还有一个吴麟征，但吴嫌远不想去，你如想去，把吴改成关就行了。”关麟征听了非常高兴，当即带上他父亲为他筹措的 25 块银元，与朋友从西安启程赴上海，转道到广州，关志道就改名关麟征了。15 年后，关麟征的名字，响彻了抗日战场，成为著名的“关铁拳”。

1924 年春，在上海环龙路 1 号，毛泽东负责接待各地前来报考黄埔军校的学生的复试工作。上海地区包括湖南。他对湖南老乡没有照顾。郭一予撰写的《关于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介绍：“来上海复试的 18 名湖南考生，只取了 8 名。毛泽东的国文

基础十分扎实,因此,经他眼里筛选过的文章十分出色”。“黄埔三杰”之一的蒋先云,1921年10月与毛泽东在衡阳结识,并由毛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19年蒋刚满19岁,领导了衡阳的“五四”运动,并任湖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蒋先云身材魁伟,才华出众。南下广州前,长沙、衡阳等地贴满水口山矿警军营部的通缉令:“通缉水口山矿聚众闹事者蒋先云,凡拿获解部者,赏洋一千元;来部引导,因而拿获者,赏洋五百元。”蒋先云由党组织安排,他告别正在热恋中的堂妹,来到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3月29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人头攒动,1200余名报考者在这里进行总复试,先考国文,一道作文题曰《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蒋先云乃才子,又是共产党员,对这道作文题,他引经据典、纵横捭阖地就写出了一篇妙文华章,而且是第一个交卷。蒋先云是湖南省立第三师范优等生,早在上国民小学时,作文就超群出众。一次,老师让用“月”字造句联对,蒋先云造的是:“残月西斜,凄洒人间;日出东升,大地红遍。”老师当即批道:“表于景,寓理于景,含义深厚,超脱异常。”蒋先云曾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从事工人运动时他就练出一副好口才,写文章文笔流畅,说理透彻。因此,蒋先云入学考试名列第一名是意料之中的事,可谓之金榜题名,头名状元矣!

成为国民党复兴社台柱的贺衷寒,湖南岳阳人,21岁被武汉学生会推选为代表赴苏俄考察,回国后在武昌一中教书,曾一度加入了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因意见不合而退出,后来到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批评时政,提倡民主,主张革命。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之一。毛泽东的战友黄爱、庞人铨领导长沙工人斗争被湖南督军赵恒惕捕杀后,贺衷寒冒着生命危险,以极大的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对赵大加抨击。赵恼羞成怒,把贺衷寒逮捕,关了三个多月。在狱中贺受尽折磨,几乎丧命,

后经人保释出狱返回岳阳老家。其父劝他安心在家教书,不要在外面惹事生非。贺衷寒哪里听得进去,还是跑到武汉找董必武介绍去了上海,投考黄埔军校。当他到达上海轮船码头时,不料满载乘客的轮船刚离岸开往江中,直奔广州。贺衷寒立即雇了小舢板紧追该轮,幸被当时投考黄埔军校之一的船客伸手援助,他才得以攀登上船。贺向援助他的船客询问姓名,才知是胡宗南。后来在黄埔军校他俩人情同手足,私交甚深。贺衷寒因胡宗南的一臂之力,没有误了考期,也称他机遇非浅。后来贺虽飞黄腾达,但因得不到校长的信任,终究仕途暗淡;而矮个子胡宗南以浙江同乡的优势,后来成为举足轻重的“西北王”。安徽六安人许继慎是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曾任省学联常委兼联络部长,因积极参与与领导了反对三届安徽省议会贿选,及驱逐皖系省长李兆珍等一系列学生运动,1923年秋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被迫逃亡上海。1924年春,他又毅然南下广州投考了黄埔军校,后来成为红1军军长。他是共产党早期著名的军事将领之一。

如果说,黄埔军校仅仅招收知识青年那就错了。为了革命,当时许多身为要职的军官,也想投考黄埔军校。如著名的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比起蒋先云、贺衷寒等人,才学与胆识均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15岁就考入了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的青年,19岁又进了烟台海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1921年他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同年8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初,李之龙任中共汉口地委执行委员。国民党“一大”后,奉命调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的英文翻译兼秘书。当时他年过27岁,比起宋希濂、胡宗南,可称得上是老大哥了。李之龙强烈要求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后来党组织安排他一边当学生,一边仍兼任鲍罗廷授课时的翻译。他是黄埔一期学生中年龄偏大的一

位学生。不过,在履历表上,他填的是 25 岁,实际上李之龙生于 1897 年 12 月。1928 年 2 月 8 日驻广州国民党海军第 4 舰队司令陈策以“策动海军叛乱”罪名,将李之龙判处死刑,鲜血洒在广州黄花岗,时年 31 岁。李之龙死于非命,惜之深矣!

在黄埔考生中,以范汉杰的资历最深。1924 年投考黄埔军校前,曾任江平舰舰长,桂军刘震寰的中校参谋,作战课长,第 6 路军司令。他宁肯丢掉司令这顶乌纱帽,甘入黄埔当学生,毕业后再从少尉排长干起,实乃黄埔学生中绝无仅有之人物! 1947 年范汉杰官至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虽兵败被俘,一生中传奇经历也颇耐人寻味,暂且不表,留在以后再述。

当然,黄埔学生中,也不乏有识之士的大学生,如侯镜如入黄埔前,曾就读于河南大学理科;宣侠父受党的指派入黄埔军校前,已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水产专业;孙元良是由李大钊遴选到广州考入黄埔,入黄埔前在北京国立法政大学修政治专业;周逸群是黄埔 2 期毕业,进黄埔前,曾毕业于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政治经济系,入黄埔时,写下诗句:“废书学剑走羊城,只为黎元苦匪兵。斩伐相争廿四史,岂无白刃可忘秦?”伍中豪曾毕业于北京大学,可见当时“要革命的到黄埔去!”的口号是多么深入人心! 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成为热血爱国青年志士的一种追求与理想。当然也有“走后门”入学的。俞济时 18 岁时在奉化城里一家米店当学徒,后经族叔俞飞鹏介绍,考入黄埔一期。族叔就是黄埔军校军需处长,又是蒋介石的同乡。俞济时以后飞黄腾达,逾格提携,官至国民党第 10 集团军副总司令、蒋介石的侍卫长,赴台后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主任,权倾一时。

广州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各地热血青年争相南下,报考黄

埔军校，一时成为时尚。中共中央为了支持办好黄埔军校，分别于1925年11月1日发出第60号通告，1926年10月又发出第22号通告。通告要求：各地党团组织选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青年投考黄埔军校，强调“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李大钊还亲自推荐李运昌（四期）、周仲英（六期）投考黄埔军校。毛泽东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亲自主持考生的复试工作。湖南省的何叔衡、陕西的于右任为选拔优秀青年入黄埔军校，不遗余力。从1924年春至1926年底，邓文仪、黄维、李仙洲、周士第、廖运泽、彭干臣、王叔铭、阎揆要、袁仲贤、张镇、曾扩情、左权、邱清泉、廖昂、卢德铭、覃异之、余洒度、郑介民、周逸群、常乾坤、戴安澜、方先觉、康泽、毛人凤、王耀武、曹广化、段德昌、郭化若、李弥、吴起舞、李运昌、林彪、林伟俦、李天柱、刘志丹、倪志亮、唐生明、唐天际、文强、伍中豪、肖芳、谢晋元、严明、张灵甫、赵尚志、郭汝瑰、廖运周、莫文骅、邱行湘、宋时轮、陶铸、许光达、张平化、郑庭笈、赵一曼、陈伯钧、程子华、戴笠、廖耀湘、罗瑞卿、宋绮云、王净等人，陆续进入黄埔军校学习。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大将军衔的湖南长沙籍黄埔五期炮科毕业生许光达（即许德华），1921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受党的推荐，考入黄埔军校。临行前，他写下抒发豪情壮志气吞山河的《无题》诗：“誓要去，上刀山。浩气壮，可入鬼门关。男儿气短，豪情无限。地狱也独来独往还。”他将报考黄埔学校当作人生追求真理的起点，即使上刀山，入火海也在所不辞，义无反顾！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就这样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1924年3月27日，由广州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分别主持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招生考试工作，各地推荐来的1200

多名考生参加,考试安排3天,科目有作文、数理化等。这次考务工作因考生成绩较好,酌情放宽了录取名额的限制,未出现埋没人才的憾事,4月28日那天发榜,正取学生350名,备取学生120名。共产党员蒋先云以优异成绩名列第一,真是一石惊天,引人注目。

开始时,黄埔军校第一期编为步兵4个队,后来,从军政部讲武堂等单位拨来一批学生,编为第6队。原定修业期限一年,旋因革命战争急需人才,缩短为半年,而且日夜加紧训练步伐。从第二期起开始分科授课,由单一步科增为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宪兵五科。1924年10月、12月创建直属校本部的教导第一、二团,以何应钦、王柏龄为团长。所谓“黄埔建军”,从一开始,国共两党党员的汗水、鲜血就是流在一起的。第二期有学生499人,第三期招学生1233人,第四期猛增至2654人,第五期2620人,第六期分别由黄埔和南京招生,学校正式改组。从1924年5月至1930年9月这段时间史称黄埔军校。国共合作期间一至五期办学共毕业学生7390多名。1927年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继续办第六期,毕业学生718名,第七期毕业学生666名。1930年9月正值第七期学生毕业之际,蒋介石电令“第七期毕业后,埔校停办”。10月下旬发给官佐薪饷,要求两个月内遣散。于是闻名遐迩的黄埔军校停办,黄埔时期也遂告结束。黄埔军校办学期间曾三易校名,建校时校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所属各军自办的军官学校、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校名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8年5月15日,校名改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

且说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和潮州、南宁、武汉、长沙分校,都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也是根据国民革命的需要迅速发展

壮大的。从1924年创建到1927年6月三年期间,从步兵单兵种发展为包括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多兵种以及经理、政治、通讯等多学科;学生从500人发展到两万多人,增长40倍。其间,除黄埔军校本校培养的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外,潮州、南宁、武汉、长沙四处分校也为国民革命军输送了大量的军事人才。

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武汉分校。武汉分校又称中央军校第二分校。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以邓演达为主任筹建的。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500多名学生跟随北伐军迁至武汉,邓演达兼政治科主任。同年11月1日武汉分校成立招生委员会,邓演达为主席,郭沫若、彭漪兰、王法勤、杨树森、王乐平、陈公博、李汉俊、董必武、刘芬、包惠僧、纪钱、郑强、李民治(即李一氓)等14人为委员。12月8日录取各地男生986名,女生195名,编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招收女性参加系统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训练的。1926年12月本校第五期炮兵科、工兵科学生1200余人迁往武汉。1927年1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改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蒋介石兼校长,汪精卫兼党代表,邓演达代理校长职务,顾孟余代理党代表职务,张治中任教育长兼训练部主任,周佛海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后由施存统(施复亮)任政治部主任。政治总教官恽代英,代理政治总教官李达,政治教官有高语罕、沈雁冰、吴文祺、陶希圣、樊仲云、许德珩等。此外,还聘请周恩来、李富春、郭沫若、李季、蔡畅、章伯钧、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项英、彭泽湘、陆沉、郭冠杰和苏联顾问铁罗尼等任政治教官;军事总教官为兰腾蛟。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开学典礼,出席典礼大会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吴玉章、于树德、徐谦、董必武、詹大悲等要员。武汉分校规模之宏大,教官人才之众多,不亚于

黄埔本校。赵一曼、陈伯钧、程子华、郭天民、胡兰畦、廖耀湘、罗瑞卿、盛文、沈策、王诤、谢冰莹、张瑞华等均是武汉分校学生。武汉分校由于有大批共产党员及左派人士参与执教，因而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他们为今后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的罗瑞卿，著名抗日巾帼英雄赵一曼（赵淑宁）两人就是由黄埔军校重庆招生办事处介绍，结伴乘船东下，来到武汉报考黄埔军校的。

罗瑞卿1926年时18岁，原在四川南充中学读书。南充中学的校长张澜（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文教员周鸣柯都是参加了革命党的。在他俩的教育下，罗瑞卿思想觉悟提高很快，曾带头反对当地封建军阀何光烈，又打了地头蛇秦同淮，因而他成为何光烈的眼中钉、肉中刺，南充当地土豪劣绅视之为“不肖”子孙、异端分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罗瑞卿不顾外公、父母的反对，毅然奔赴重庆，报考了黄埔军校。罗瑞卿临别故乡时，曾愤愤地说：“他妈的，岂有此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老子考黄埔军校去，当兵吃粮方不亏我这副好身板。”罗瑞卿身无分文，流落在重庆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就只好到一家“老虎灶”去讨口水喝，以水充饥，不料竟晕倒在地，右手被滚烫的开水灼伤。此时罗凑巧遇上赵一曼，赵一曼帮他支付了药费。事后他们又一同去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找杨闇公（杨尚昆胞兄）帮忙，并从省党部取来了介绍信、轮船票、路费，双双登上“希望”号江轮，告别了家乡父老，来到武汉进入黄埔军校。正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危难之中遇贵人。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总理提名 蒋介石首任校长 以党治校 廖仲恺任党代表

话说蒋介石于1924年4月21日由溪口动身抵达广州。这时,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生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考试已基本结束,录取学生的名单、学生的政审也业尽尾声。蒋介石这时返回广州,只等走马上任。关于孙中山最后圈定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一事,在溪口时廖仲恺已函告。蒋介石从廖仲恺的来函中得知事已到了紧要关头,再不返回怕真的错过良机了。忠厚老实的廖仲恺致函蒋介石的文字,话并不多,却很有分量:“如果党要办军校,而你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是要开罪全党的;将来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在廖的殷言相劝之下,蒋介石于4月26日进入黄埔岛开始正式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其实,关于黄埔军校校长人选,孙中山早有他更为成熟的打算,并非只有蒋介石一人。据称,孙中山考虑了4位人选:一是当时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二是国民政府军事部长陈树人之子陈翰誉,三是孙中山的卫士大队长姚观顺,还有蒋介石。许崇智比蒋介石大一岁,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许出身豪门,有花花太岁之称,当然竞争不过蒋。陈翰誉、姚观顺论资历、战功、学历皆浅,难以与蒋抗衡。因此,更为合适的人选是由蒋来担任校

长。蒋曾率团出访苏俄，办黄埔军校既然要苏联的援助，就必须物色一位苏俄政府认可的校长，好把将来的关系搞得更融洽。蒋介石知道，在孙中山眼中他是受重视的一员。“永丰”舰蒙难时，孙中山曾与他彻夜长谈，孙感叹地说：“我知道我至多能再活10年，而你却至少能再活50年。如果将来不发生什么不幸，那么希望你为我们的主义再奋斗50年，这是一点不过分的。”“永丰”舰上的平乱战斗，蒋介石忠诚可嘉，给孙中山留下深深的印象。因此，校长人选中，自然地将蒋介石放在优先的位置上来考虑。事实上，蒋介石在当时也确是最合适的人选。

解放后，有人说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校长是程潜，致使广大黄埔师生甚为惊诧。1989年5月10日黄埔军校北京同学会致函辟谣，认为“遍查黄埔军校校长任命的历史资料和程潜先生在大革命时期的履历，程潜都不曾有过黄埔军校校长的头衔。洪顺文章所谓‘首任校长’，当在1924年5月3日蒋介石被正式任命之前。可是在这次任命之前，皆称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而不称校长；即使程潜曾被议论过，也不可能冠以‘首任校长’，更何况连议论或代理也未见诸正式文件呢。由此不难断定，洪顺所辑与史实不符，应予更正”。据笔者查遍的历史资料看，程潜曾任过广州国民政府军政部讲武学校校长，该校建校地址当时也在黄埔，后来黄埔军校将该校学生并入，编入第一期第六队。陈明仁、李默庵、左权、肖赞育、苏文钦等均系从程潜办的军政部讲武学校转入黄埔军校学习的学生。

蒋介石逃离大陆后，于1951年在《过去军事教育之检讨和高级班成立之目的》一文中曾追忆办黄埔的情景：“我有一个志愿，就是希望我毕生能够办一个军事学校，照我自己的理想来训练一般有志的青年，完成建军、建国的使命。而且当时相信我这一个志愿如能实现，中国军事教育一定可以成功。在这一种军

事教育制度之下训练出来的官兵,不仅能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并且还可以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所以我在民国 12 年至 13 年之间,什么事都不愿做,而只要创办军官学校,教育全国青年军人,为我惟一的志愿。”

不管蒋介石当年想法如何,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他确实是靠办黄埔军校起家的。当年如果蒋介石忸怩作态、拒不回广州办黄埔,或许历史又会重新改写吧。

话说蒋介石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后,于 5 月 12 日就职视事,启用关防,并呈报及布告各机关查照等。在黄埔军校校长会客厅他召见了校本部各级官佐,安排人事任免,以狂热的情绪,忘我的工作态度,全力以赴地投入建校工作之中。据 1924 年 5 月 3 日《中华民国史事记要》(初稿)载称:“对诸般校事,钜细躬亲,千绪万端,殚精擘画。尝于案头,置多册子,曰《筹备录》,曰《办事提要》,曰《会议提要》,凡有所举,先记其中,少则十余条,多或百余项,以资按次施行,其尽劳可想见矣。”

蒋介石一向恭称孙中山为“老师”。在老师面前,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在那动乱年代,他借助老师的提携,登上了校长宝座。他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诩,既要应付那些国民党元老,又要玩弄革命词藻,高喊联俄联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施展平衡之技,以便逐步壮大自己的势力。他想效法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的前事,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并依靠这支军队,慢慢地去收拾南北各路军阀,统一国家政权。用他惯用的话说“有枪便是草头王”,只有枪杆子里头出政权。这几乎成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座右铭,即使是共产党,也笃信这一法宝。最初蒋介石也没有想到,黄埔军校竟会成为他发家的风水宝地,这也许应验了风水先生肖萱的预言。自从将母亲葬于溪口“慈庵”后,他就时来运转,此后便开始飞黄腾达。蒋

介石还极为赞赏先祖在溪口“碧潭”的一首诗，曰“水碧涟漪静，羡鱼别有天，为龙应不远，飞去只当前。”这“为龙应不远”莫非就是“龙脉”起动。蒋介石当了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在官场上可谓平步青云。到了1926年，他便荣升为北伐军总司令。蒋如何官运亨通，暂且不表。

且说蒋介石来到黄埔军校之后，励精图治，处处以大将风度率先垂范，确立威信，在言行举止、服饰装戴方面，他也都刻意装扮与不乏修饰。蒋介石在校园巡视时，总是身披德式黑大氅，全身披挂，马靴锃亮，龙行虎步，目不斜视。身后跟有一对全副武装的卫兵，威风凛凛，令人肃然起敬。从他踏上黄埔岛的第一天起，就经常召集官佐、学生听他训话，而且聆听训示时必须两腿并拢取立正姿势。他不喊“稍息”，即使训话两三个小时，也只得肃然立正，不敢稍有懈怠。他就是想通过训话来抬高自己的威信的。每次训话之前，他都要作一番准备，十分讲究演讲技巧，声音的抑扬顿挫，手势的启承转合，无不用心钻研。据《中华民国史事记要》（初稿）载：“蒋校长致词时，神采焕发，目光如电，能射人数百步外，喉舌尖亮，声浪远振四周。”当年先父吴起舞曾在黄埔多次聆听过蒋介石讲话；1949年笔者在成都也听过他的训话，那年他62岁，其威风不减当年。除了集体训话外，蒋介石几乎每日要召见几位学生个别谈话。据徐向前元帅写的《回顾黄埔军校》一文说：“毛泽东同志说过，蒋介石是靠办黄埔起家的。蒋介石这个人，有许多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以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不过见面谈话的时间有长有短而已。他坐在办公室内，要学生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我们山西十个人，蒋介石都单独谈过话。他总是用尽手段笼络人心。他还常常训话，每一次都说到三民主义，但讲多

了,人们也都腻了。不过蒋介石借助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的方式,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有一天,轮到徐向前见校长了。“你叫什么名?”蒋介石问。“徐象谦。”“什么地方人?”“山西人。”“在家都做过什么?”“当过教员。”一问一答,是那么的无趣。在蒋介石眼里,徐是个“没出息”的学生。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就是眼下这个徐向前,在几年之后,竟然成为威震中国的红军名将;在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称号。

蒋介石一生奉行“宁为鸡首,不作牛尾”的信条。当年在许崇智的粤军中任参谋长,许那么信任他、重用他,然而蒋仍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经常拂袖而去。他曾说:“参佐军务,不为人谅,反遭齟齬”。而到黄埔任校长后,他一反常态,振作精神,处处给人以“励精图治”、“热情洋溢”、“严肃认真”的印象。平心而论,由于蒋介石从小受过儒家学说的教育与熏陶,儒学中那种强烈“入世”的倾向,很符合他“出人头地”的志向,当然他也从不讳言功名利禄。蒋内心最为服膺的是以孟子、王阳明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且又常以曾国藩、拿破仑为偶像,十分重视修身养性。他熟记孟子格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而后增益其所不能。”四书五经、文辞、策论、诗文他也无所不习,因而有深厚的国学基础。蒋介石一生产于律己,不抽烟、不喝酒,常年清水一杯,总是一副清心寡欲的模样。蒋介石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迹股票市场时,倒是吃喝嫖赌无一不精,然而转瞬间却摆出一副道学先生的架式,不再越雷池半步,这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蒋介石住在学校里,起床号一响,他就进入学生寝室巡视。人们常见“在天色还朦胧未明的清晨,他一个人便站在校园中,凝神沉思”。一天早晨,他发现教官刘峙、顾祝同、陈继承睡懒

觉,便立即不顾情面严加责斥,致使他们面红耳赤,奇颜无所。在练兵场上,只要他一出现,全场官兵就无不肃然起敬。他具有训练有素的标准军人的风姿,昂首挺胸、腰杆笔直,威严有度,尤其那标准的步幅和步速,加上一身戎装,更加使其仪表整齐端庄。他常常戴一副白色手套,举手还礼,姿态刻板而略显真诚大度。这自然与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受过严格的军官培训相关联。如果学生、官兵在路上遇见他,没有向他敬礼,他一定要追究给予处分。有一次,他经过禁闭室,听到有位学生在里面号啕大哭,马上板起面孔,高声训斥:“革命军人是有价值的,自爱的,犯了校规受处分,认错悔改就是了。哭!丧失了革命军人的人格,错上加错,特再加禁闭3天。”说罢,通知值日官执行,然后扬长而去。在短短的40天内,即从1924年5月5日第一期新生入学,到6月16日开学典礼这段时间,蒋介石对学生共进行“精神训话”11次。其主要内容是讲革命与做人的意义、黄埔军校办学的方针以及如何遵守纪律、团结同志和爱护老百姓等,自然也不忘谈他过去追随中山先生的光荣革命经历。蒋介石还亲自教唱校歌。他经常对学生们说:“我们跟孙总理干革命,就应当不怕苦,不怕死;怕苦怕死,就干不了革命!我国受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欺凌,国内军阀各据一方,横征暴敛,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救国救民,由我们之手建立富强的新中国,实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是孙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谁反共我们就反对谁。我们共同努力,如果我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打倒我。”后来他搞清党反共,许多聆听过这次训话的黄埔学生,就高举义旗,出师有名反对他,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巧合吧!在节假日,蒋介石也师生同乐,常邀请学生来他官邸做客。当大家玩得最高兴时,他就说:“我家里藏有三件宝,谁找到

了大大有赏。”大家既好奇又有趣地翻遍每个角落，搜出的东西送到校长面前，校长均摇头微笑不语。眼看无人猜着，这时蒋介石的三房陈洁如便悄然对李之龙耳语几句。李之龙随即在校长床铺枕头底下搜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俾斯麦传》和《曾文正公家书》。校长见状高兴得眉开眼笑，说：“之龙到底是我的好学生，懂得我的心意。这三部书我每天必读。因为做人做事，成大业做大事，教育儿女都少不了。希望你们认真领会其中的奥妙！”他的高足李之龙，4年后竟死于校长手下，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蒋介石与陈洁如缔结良缘何地何日不详，据周榆瑞和克洛席尔合著的《蒋介石传》关于蒋陈婚姻有如下描述：“以上海的金钱、权力和腐化，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对蒋介石的吸引从未褪色。由陈其美的引导，蒋始涉足上海的销金窟。就在此时，蒋陈邂逅。蒋当时很潦倒，住在一个密不通风的陋室里，到长三堂子去，对他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慰藉。蒋陈先同居，后结婚。直到宋美龄介入为止。”估计蒋陈缔婚当在1921年。唐纳文所摄蒋陈婚照时间是1922年，1927年离婚，前后共同生活了6年之久。陈是继毛福梅、姚怡诚之后的第三夫人，比蒋小10岁。关于陈的出身，过去曾有过多种说法，其中“艺妓说”流传最广。据陈洁如在回忆录中自述，她祖籍镇海，乳名阿凤，父亲是纸商，兼经营土特产及手工艺品。蒋陈是在张静江（即张人杰）家中相识的。1919年夏，孙中山、蒋介石、戴季陶去看望张静江，正巧遇到张静江续弦的好友陈洁如。那时14岁的洁如身材苗条，眼大鼻高，面目清秀，充盈着少女的纯真和娇艳，令蒋怦然心动。从此蒋开始对陈热烈地追求，但数次求婚都被陈母拒绝，直到1921年陈父因心脏病猝死，蒋登门吊祭时，才赢得陈及其家人的好感。在答应与元配夫人毛福梅、二房姚怡诚脱离夫妻关系

后,蒋陈才举办了婚礼。陈比姚怡诚的运气好得多,蒋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陈独享蒋夫人的风光。据黄埔一期学生宋希濂回忆:“傍晚,蒋陈携手散步,有时牵着活泼天真的纬国,我们经常看见。”陈洁如年轻美貌,有文化,且善解人意,因而深得蒋的宠爱。后来要不是宋美龄闯进蒋介石的生活之中,为了“政治”联姻,与孙中山攀亲,陈洁如的婚变是不会出现的。宋美龄取代陈洁如成为蒋介石夫人后,于1927年8月19日陈乘船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并获硕士学位,1933年返回上海定居,蒋批给她5万元的生活费。上海解放后,陈洁如被邀为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陈洁如获得周恩来的批准去香港定居,改名陈璐。蒋经国闻悉后,特为她在九龙窝打老道买了一套公寓,赠给“上海姆妈”作为养老的安乐窝。1962年,蒋介石75岁时,曾派戴季陶之子戴安国秘密送去一封亲笔信给陈洁如,信中说:“曩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指,未尝须臾去怀。”在这种安慰之词的背后,也略致歉疚之意。1971年2月21日,陈在寓所中风去世,享年65岁。临终前,她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道出了心中长期的积郁:“30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国家荣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陈曾获杜月笙一笔巨款,使她生活上绝无匮乏之虞,但她终身未再嫁。死后,陈的骨灰被送回美国安葬。异乡孤塚,正和她生前一样,无人过问,在寂寞中来,亦在寂寞中去。此话离题太远,暂且停住,话归原处。

且说蒋介石在黄埔大出风头时,但他对黄埔军校经费拮据一事,却不闻不问,一概交给校党代表廖仲恺问津。廖仲恺才真正是黄埔军校的“慈母”,他为蒋分担了不少忧愁。

廖仲恺是孙中山麾下的三员大将之一,另两位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1877年4月23日

出生于美国旧金山一个华侨家庭。父亲廖竹宾为旅美华侨。廖仲恺幼年在美国求学,1893年回国,在家乡广东惠阳读私塾,学习经史策论。甲午战争爆发后,廖仲恺受维新思潮影响,放弃旧学,于1896年入香港英国皇仁书院学习,1902年赴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读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1909年毕业回国,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考中法政科举人,后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任翻译。他以这一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反清活动,与林伯渠、宋教仁一起策划反清武装斗争,后被清政府侦知,宋出走日本,廖因与陈昭常同乡,得以潜伏下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廖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1914年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任财政部副部长,秘密奔走于上海、广东等地,1923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财政部长,5月调任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坚定地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他是中国国民党中最坚定的左派人士,受到国共两党的尊敬与爱戴。据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尚明轩所著《廖仲恺传》介绍说,廖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学说介绍者之一。他曾以“渊实”为笔名,先后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之二派》、《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和《虚无党小史》等文章,并参与了20世纪初期中国人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廖仲恺兼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在黄埔军校初创期间,由他主持召开的筹备会议达32次之多,他经常一天工作15个小时。孙中山指定广东省财政厅等机关每月拨给黄埔军校经费3万元,但实际上每月能给黄埔的不过6000元左右,这是财权掌握在滇、桂军范石生、杨希闵手中所致。武器奇缺,经费捉襟见肘,全部依赖廖仲恺一人东奔西跑勉强苦渡。在忙完公务后,他不辞劳苦经常于深夜到杨希闵公馆等他签字拨款。杨是个大烟鬼,廖来后要强忍住刺鼻的烟味。在杨

床边他苦苦哀求,诉说衷肠,恳切希望杨签字,这样才能领到款子,然后再连夜送到黄埔军校,以解决几百名师生的伙食费问题。据何香凝回忆:“我记得有几晚廖先生半夜两点多钟才回家,有一夜到4点钟才回家。我十分生气地骂他,他含泪长叹一声说:‘我晚上是在杨希闵家等他抽完大烟才拿这几千元给我,不然,黄埔学生两天后便无米下锅。’”何香凝得知丈夫如此操劳,心痛极了,就连忙帮他打水洗澡。何香凝回忆说:“有一次学校买东西,钱不够,向我要400元,我又没有这么多钱,只好借了女工的30元钱才凑足,解决了燃眉之急。”

1924年5月9日,孙中山正式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党代表制是学习苏联红军经验而确立的。建立党代表制的目的,在于加强党对黄埔军校的领导,保证党的主义和方针政策在军校贯彻落实。党代表是代表组织对军校各项工作实施监督与指导,与校长同等职权,军校签发的任何文件与命令,没有党代表签署就没有效用,党代表还具体负责党务和政治训练工作。

黄埔军校初创阶段其装备、经济之困窘确属实事。据王柏龄所著《黄埔创始之回忆》中说:“孙中山在开学前,批发300支粤造七九毛瑟枪给黄埔军校。但是当时的兵工厂,并不以黄埔军校为重,只知道拍军阀的马屁。廖先生交涉了不少时日,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供给卫兵守卫。开学两三个月后,所批发的枪支仍然石沉大海,毫无动静。”后来孙中山责令广州石井兵工厂厂长马超俊拨黄埔步枪500支,到5月2日蒋介石致廖仲恺的一封亲笔信证实了这一点,现全文照录如下:

仲恺先生大启:

本校步枪,除已领到二百三十杆外,尚差三百五十杆,其中三百杆,本月十五日以前须发学生枪操,不然

恐于预定课程,有所妨碍。如万不得已,则于本月二十日以前,缴足三百杆,其余五十杆,或在月底缴齐亦可。务请转催马厂长,设法办到。现值战时,子弹虽不能配足,但最少每枪亦要配五十颗才可,祈作为说明。如昨日领来之枪,未有粒弹,则不可也。以后每枪还须请其补足百颗为禱。此请近安。

弟中正

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廖仲恺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尤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当时滇、桂、粤省军阀说廖是孙的“钱袋子”,对他恨之入骨,但表面上还得应付。蒋介石与廖共事多年,廖处处对蒋礼让三分。他是个没有野心的人,与他合作只会得到无私地帮助而无须提防之。同时蒋又知道廖是一个坚定的左派,说话得掌握分寸,所以蒋、廖在黄埔合作得非常融洽。孙中山闻之也十分欣喜。蒋一再提高每月学生伙食费标准,由原来6元增至8元,他只管支出,不管钱的来路。因此,廖只好到处筹措经费,满足每月8元的伙食标准。这难怪后来政治教官恽代英开玩笑地说:“广东大学学生,是文而雅又弱;岭南大学学生,是香而艳又骄;黄埔学校的学生,是黑而臭又壮。但却是姑娘追求的目标。”

廖仲恺在黄埔人称“黄埔慈母”,但他那段巧合天成的姻缘却鲜为人知。廖夫人何香凝乃百万富翁何炳桓的第九位千金。

说到廖何缔结良缘的事,还需从廖仲恺之父临终时遗留给廖的择偶提亲条件说起。原来,廖仲恺的父亲是广东的“客家人”,崇尚读书及女子不缠足。其临终遗嘱两条:第一,按照客家人的习惯,儿子将来一定要娶个大脚的媳妇;第二,小脚女人在外国被人看不起,因此儿子一定要遵办。16岁的廖仲恺含泪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廖仲恺归国不久,即由叔父廖志岗介绍到香

港求学。当叔父督促他成家时,他就将父亲的遗嘱提出来,他说:“我要讨一个大脚的女子为妻。”当时,廖志岗是一位有身份的洋务官绅,照此推理,他的侄儿媳妇当然不会是位目不识丁的大脚村姑,而必是一位名门的大脚“千金”。世间之事自有巧合,廖家经过打听,何公馆的九小姐就留有一双“天足”,完全符合廖仲恺的提亲条件。再说何香凝那双“天足”是几经反抗缠足才保住的。原来,何幼时在家里常听人讲述太平天国女将的故事,知道这些女将都是“天足”。她们行军打仗,健步如飞。于是她暗自下定决心,自己要学太平天国的女将,无论如何不缠足。何小姐7岁时,母亲强行施以缠足术:先将幼嫩的小脚用温水浸泡,再缠上长长的裹脚布,最后缝上密密的针线。晚上,何双脚肿胀难忍,她就趁大伙睡熟,偷用剪刀将裹布剪开,收藏起来。第二天,母亲发现后,又强行将何香凝的脚裹起来;晚上,她又照样用剪刀剪开,将裹脚布藏在祭坛下面。就这样,裹一次,剪一次。大概经过十来个回合,她父亲终于说话了:“由她去吧!”母亲授意,只得作罢,但天天愁女儿嫁不出去。

在时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廖仲恺虽未享受自由恋爱的幸福,但巧合天成却结为终身革命伴侣。廖何于1897年10月在广州举行了婚礼。正是:廖何姻缘巧合天成,革命伴侣千古留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开学典礼 孙中山慷慨陈词 制订校训 总理题“亲爱精诚”

话说黄埔军校经过积极筹备：1924年4月28日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考试发榜；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校长；5月5日第一期新生入校；5月9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为国民党驻黄埔军校党代表；5月10日第一期备取生入校。一切均已就绪，只等择日举行开学典礼。为此蒋介石多次催请孙中山拿个日子，以便着手筹备。他想开学典礼一定要办得盛大而隆重，庄严而肃穆，虽比不上像汉高祖刘邦筑台授印于韩信那样的“登台拜将之礼”，至少也要让党国要人、各路军阀认识黄埔建校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在这次庆典中他想大显身手，以汉室功臣韩信自居，在众多军政要人前大露其脸面，从而提高他的政治地位。

军校学生已开始练兵，但开学典礼却迟迟不见举行，蒋介石急得心神不定。孙中山稳坐钓鱼台，似乎是早已胸有成竹，秘而不宣。原来，孙中山有他自己的打算，这个开学典礼，他要定于6月16日举行，因为这天是军阀陈炯明在广州炮轰观音山，逼他在“永丰”舰蒙难两周年的纪念日。血的教训使他认识到没有革命军，革命党就必然屡遭失败。黄埔军校是革命党办的军官学校，他要在6月16日这天举行开学典礼，目的就是要求广大的黄埔师生永远记住这个血的教训，永远不忘6月16日是国共合作后由他亲自组织、掌握的第一支革命军的诞生日。所以后

来正式将这一天定为黄埔纪念日。

6月15日是开学典礼的前一天,下午7时许,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广州特别市党部,联合公宴黄埔军校的200多位官佐及500名学生。据1924年6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凤蔚所撰《广州陆军军官学校开幕纪盛》载,此次公宴在1924年6月16日晚举行,以致后来一些民国史的研究者均从此说。这种以讹传讹的做法,实应在此更正。据当时在场的黄埔一期学生回忆,6月15日晚,地处黄埔军校后面的大操场,三山环拱,一地平开,夕阳西下,翠霭人筵,不在乎酒席之丰盛,而是其气氛热烈为当时之绝无仅有。黄埔师生700余人,按班队编席,端庄肃整,由校长蒋介石带领进入席间。出席公宴的党国要人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张继、谭延闿、柏文蔚、邹鲁、戴传贤、彭素民、谭平山、徐苏中等。广州市国民党党部有孙科、吴铁城、马超俊、陈其媛、邓演达、黄季陆等。黄埔学生乍见这些达官显贵,虽无受宠若惊之感,但也感到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今后的责任非同凡响。曾几何时,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如杜聿明、关麟征、刘戡、王敬久、石祖德、王叔铭、甘丽初、孙元良、李仙洲、李延年、丁炳权、宋希濂、张耀明、范汉杰、陈明仁、李默庵、侯镜如、胡宗南、曾扩情、廖运泽、黄继、霍揆彰、鄧悌、王尔琢、王泰吉、左权、冯达飞、刘畴西、许继慎、李之龙、陈赓、徐向前、唐澍、黄鳌、阎揆要、蒋先云、蔡申熙、董朗、周士第、袁仲贤、彭干臣等,都成了国共两党的军中名将,威风远比当时的国民党元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对他们的恩怨暂且不提,言归正传。

且说这次宴会的目的,从公的方面来说,是为庆祝6月16日的开学盛典;从私的方面来说,一些党政要员也有借机联络感情的个人目的。因此,席间觥筹交错,敬酒应酬,气氛十分融洽。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祝酒词,他口若悬河,滔滔

不绝。他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今本校学生，皆属同志，皆属有主义者。异日学成，当为有主义之学，此本校与其他军官学校绝异之特点，亦即本党对于诸同志学生之最大希望。”汪说毕，环视席间，高擎酒盏，朗朗祝诸位师生“今日酒食虽薄，但本党同志特藉以表示相依为命之精神，请以最诚恳、最亲切之心意，再奉校长、教职员、学生、诸同志酒一杯”。孙中山的公子孙科代表广州特别市党部也讲了话，他说：“学生诸同志每早5时起，受严格之训练10余小时，辛苦可云已极。然诸君若以升官发财之意思而来，此诚苦；今诸君皆以本党为全国人谋幸福之意而来，肉体虽苦，精神良慰，诸君乐此不疲，此足证诸君爱党爱国之热诚，诚不胜其欣愿。谨奉诸君酒一杯；祝诸君努力。”学生代表也致以热情洋溢的答辞，表示当谨遵中央执委之教，为党为主义而献身。蒋介石神采飞扬，兴致盎然，即席致词：“今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广州市党部，特至此欢宴我等，系含最深之意味，与普通之宴会绝殊。汝等须知，我等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款待，不自今始，本校系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办，我等所衣、所食、所住、所用，何一非自中央执行委员会而来。今兹之宴，不过乘庆祝明日开学机会，如汪先生所言，藉以表示相依为命之精神。汝等今日所饮之酒，不啻饮血，本党当此财政奇窘之际，一丝一粒，实不知费几许血汗得来，汝等切勿忘记。适倾汪先生所言牺牲，方不负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广州市党部诸同志之厚望。”蒋氏这番答词，情殷意切，使在场各位要员深为感动，特别是两次提到汪精卫刚才的训话，使汪心里十分受用。殊不知蒋有过人之智，颂汪也许会有不备之需。言毕，蒋率师生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欢宴至8时半宾主乃尽欢而散。

1924年6月16日，是广州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的庄严日

子。一个甲子过去了,台湾凤山军校和大陆各地黄埔同学会,仍然每年坚持过黄埔建校的校庆日。为了再现当时的历史现实,笔者采撷当事人的一些回忆,让读者再次目睹这一盛典之实况。黄埔一期生冷欣对当时的情景有详细生动的回忆:

“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清晨,我们全校员生,在校长蒋公和廖党代表仲恺先生率领下,列队肃立在学校门首,恭迓总理莅校主持开学典礼;因为总理是乘专用汽艇“大南洋”号(广东人叫‘电船’,可载四五十人,总理大本营在广州珠江对岸,每次到广州、黄埔,都乘这艘船,有时校长也乘用),从广州直驰黄埔,码头就在学校门前,我们四百九十九个武装学生,穿着新发的草鞋,鹄立在校门口恭候,正式齐集码头迎驾。上午八时(应是七时四十分——笔者注),总理着白色翻领学生服(今称中山装),偕夫人莅校。只见总理伉俪在前先行,精神洋溢,态度安详;后面随行人员,有拖刀的军官,也有穿西装和长袍的文官,一批一批在后随从,以后才知道这些随员中,有胡汉民、吴敬恒、林森、谭延闿、张继、邵元冲、孙科等党政要人,及许崇智、李福林等高级将领。总理人内后,即由校长陪同到校长室休息,我们则整队到大礼堂候训。”

又据资料说,孙中山系乘“江固”舰,由“江汉”舰护卫抵达黄埔码头。孙中山是黄埔军校总理,他饶有兴趣地浏览了职员及教官设计的各类教授计划及图表。时而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带领各教官与孙中山一一见而;时而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则带领各队长及特别官佐与孙中山一一见而。来自全国各地的英才济济一堂,谈笑风生,相敬如宾,气氛十分融洽。8时50分,孙中山巡视了黄埔军校讲堂与寝室;9时20分,在校长室稍事休息后,随即赴礼堂演说。在来宾中,还有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次长胡谦、外交部长伍朝枢、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等。

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女士莅临，他身穿白色中山装，头戴“拿破仑”式白帽子，显得神采奕奕。蒋介石则表露出志满意得的模样。

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登上主席台，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演说。即使时过六、七十年后再重温这篇演说词，仍然令人心情振奋。后人有的将孙中山的这次演说与美国第一任总统林肯的就职演说词相媲美，这是言不为过的。可惜笔者不能在此全文照录，只得忍疼割爱，择其要点加以引述，以飨读者。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

今天是本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自辛亥革命以来过了十三年，现在得到了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

至于世界上的革命，在我们以后发生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六年之前，有一个邻国，同中国毗邻有一万多里，跨欧亚两洲来立国，比中国还要大；在欧战之前，是世界上头一个强国；当欧战期内，便发生革命，他们的革命后过我们六年。这个邻国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革命虽然是在中国革命六年之后，但是说到结果，他们是彻底成功的。

……

我们的革命，便有一部分的成功。但是后来没有革命军继续革命党的志愿，所以虽然有一部分的成功，到了今天，一般官僚军阀，仍敢明目张胆，更改中华民国的正朔，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个也没有。这个原

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

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什么东西叫做革命军呢?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要怎么样立志才可以做革命军呢?我们要知道怎样可以做革命军,便要拿先烈做模范;要拿先烈做模范,就是要学革命党,要学革命党的奋斗。有和革命党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

他要求革命军有“革命先烈那一样的行为”：“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要求“明白革命主义”，“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并且“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政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孙中山讲到建立革命军的必要性时指出：“我们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中国革命有了十三年，到今天还要办这种学校，组织革命军，可见大凡建设一个新国家，革命军是万不可少的。”

讲到怎样做革命军时,他指出:“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有没有革命志气,不在武器之精良与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军、陆军都有很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到了武昌起义之后,便都归革命党所用”;立志做革命军,“要有高深的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的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了”;当革命军的资格,“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力,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和大决心,我们便能够一个人去打一百人”,“敌人的观念,要生才以为是享幸福;我们的观念,要死才以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观念,在敌我两方面的精神过于悬殊,自然不能敌对,自然是我们有胜无败”,“要求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

孙中山娓娓而谈,在演说中,他特别提到“……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这是孙中山郁结已久的心理话。他选择6月16日作为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正是为了告诫大家不要忘记军阀基于一己私利而倒戈相向的历史教训,从而创建一支真正的革命军。

演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孙中山演讲毕,在场官佐学生情绪激昂,高声齐呼:“孙总理万岁!”喊声惊如春雷破晓,猛如万马奔腾。就是这500位黄埔学生,他们像500尊罗汉,后来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悲喜剧。他们的恩恩怨怨,暂且不提,留在以后慢慢道来。

11时半,全体师生集合于操场,举行开学仪式。先向党旗行了三鞠躬礼,再向校旗行三鞠躬礼,又向孙总理行三鞠躬礼。

总参议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勇矢勤，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汪精卫代表中央执委会宣读贺词：“三民五权，革命宗旨。谁欵实行，责在同志。民国肇造，倏逾周纪。纷乱相寻，吾党所耻。誓裼血诚，与众更始。尽涤瑕秽，实现民治。军校权舆，国命所系。觥觥诸君，忠义勇起。勤于所事，以继先烈，以式多士。披坚执锐，日进无己。谨贡清言，愿同生死。”

总理书面训词当即作为黄埔军校校训。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又重新创制乐谱，明令定为国歌。后来孙中山经过认真研究，反复琢磨，最后以“亲爱精诚”四个字为黄埔军校正式校训。此校训来自1924年5月创作的陆军军官学校校歌，歌词是：“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民国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了武汉三镇。当时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兴奋异常，校内校外广泛开展庆祝胜利的各项活动。第五期入伍生经过考试升学，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找到政治教官陈祖康说：“到现在，五期学生已开学，万事俱备，惟新校哥尚付阙如，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政治部方面，大家都认为你对诗歌独具专长，要你写一篇校歌的歌词。请你立即动笔。”当时陈祖康见熊雄如此坦率，不便推辞，便提出请音乐教官林庆梧来商量的要求；后来由陈祖康写词，林庆梧谱曲，黄埔军校新校歌就诞生了。歌词原文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

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这首校歌,黄埔学子均会唱,而且一直延续唱到现在,其亲切感仍不减当年。

话再回头说。且说6月16日下午3时,在蒋介石校长的陪同下,孙中山大元帅兼黄埔军校总理,在大操场上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阅兵式。全体学生499人及教官职员200余人,列队受检,场面壮观。据黄埔一期毕业生冷欣回忆说:“下午3时,又列队到大操场,在阅兵指挥官、教练部主任何应钦的指挥下,肃后大元帅阅兵。只见台上总理慈祥悌悌,满面春风;校长戎装佩刀,神采奕奕,庄严地肃立在左侧。我是当时派出来的四个标兵之一,分站在阅兵台前两侧,做队伍向台前分列行进时的目标。我能在总理面前当标兵,也真够荣耀的。”黄埔军校从诞生迄今,已整整74个年头,台湾凤山军校仍然于每年校庆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时过境迁,在1949年四川成都军校学习时,笔者也参加过几次这样的校庆阅兵仪式,那当然不是499位学生,而是十倍于此,阅兵仪式往往要进行一整天。

黄埔军校校训“亲爱精诚”乃孙中山总理亲自审定。原为“亲爱精诚,继往开来”,后习惯只用“亲爱精诚”四字为校训。据蒋介石撰写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所称:“阅墙之祸,甚于外侮之内侵;革命之成,全凭同志之相亲与相爱。传云:‘亲亲面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能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深知欲革命之成,必使革命同志以维精之理,至诚之意,团结精神,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以亲亲之道而亲同志,以爱物之理而爱同志,则主义实行,其有豸乎!子思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则亲、诚则爱、诚则精,面诚则成矣。……不亲则离,不爱则妒,不精则

杂,而不诚且无以致亲、致爱、与致精也。诚则明,诚则强,诚则金石且为之开,而况于人乎;于同志乎?吾同志其勉旃!十四年十二月五日蒋中正序于潮安行营。”不论蒋介石如何引经据典阐释校训,但主要的,是依据孙中山在开学典礼时的演讲精神,体现“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和“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宗旨。概括地说,就是“爱国、革命、亲爱精诚”。后来由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安体诚于1926年9月23日《黄埔日刊》第一版撰文,正式提出了“黄埔精神”,也就是校歌中最后两句“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安体诚说:“一个团体,一种组织,只要它能继续存在而成为一种势力,必定具有也必定形成一种特殊精神;能使它的正当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扬与光大,这种团体必定能完成其使命而创造出无限之价值的……总结黄埔学校这历史的和客观的特殊性质,我们现在可以说:黄埔精神,是坚信并实行总理所定联俄联共拥护工农三大政策的革命军人的精神!”黄埔精神的精髓乃是爱国家、爱百姓,为革命。这种精神鼓舞着成千上万黄埔学生披坚执锐,所向披靡。

且说孙中山带领滇、桂、粤、湘等军的总司令、军长、师长、旅长等参加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一方面是显示革命军从此有了自己的军官学校,将来再也不仰仗地方势力的施舍;另一方面也有敲山震虎的意思在其中,暗示刘震寰、杨希闵之流不要太猖狂。这对当时那些脚踩两只船,心怀鬼胎的人来说,无疑是敲了一次警钟。

参加开学典礼阅兵仪式的外宾有苏联军事顾问团以鲍罗廷为首的一批军事专家:切列潘诺夫首席顾问(即鼎鼎大名的蔡顾问)、加伦将军、巴甫洛夫将军、步兵顾问舍瓦尔金等。他们亲眼见到中国有这样一支由他们红军帮助建立起来的革命军队,也深感由衷的高兴。在场的学生身着苏联式的黄卡叽布军装,脚

穿翻毛皮鞋,英气勃勃,军容极盛。当初,黄埔初创,异常困难。军阀范石生就曾当面奚落向他要钱的蒋介石:“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那几根‘吹火筒’顶个屁用,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此话也并非夸口。蒋介石在溪口逍遥自在之时,廖仲恺为办黄埔,要陪着笑脸在半夜三更来到范石生或杨希闵抽大烟的床前,几经曲意周旋,才能要到一点钱好让学生充饥。当初孙中山批条子,也只拨来 30 支枪,为此事兵工厂厂长马超俊还受到范石生的拘禁,后经由大元帅手令,始将马超俊释放。

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在阅兵仪式结束后,郑重其事地将一枚刻有“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关防”的大印交给蒋介石,大小官员纷纷离校返回广州。

从此蒋介石开始住在黄埔岛上。他一心一意培养训练来自四面八方的黄埔莘莘学子。在长洲岛上,他还竖起了一面相当气派的红旗,上面写着一个斗大的“蒋”字,以示他这位黄埔军校校长兼长洲要塞司令的威风。

黄埔军校大门上,由谭延闿书写的“陆军军官学校”六个大字,浑厚而凝练,风风雨雨七十多年,仍然保存完好。当年他为毛泽东书写的“文化书社”四个大字,今天应该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加以保存。谭延闿任过湖南省督军、省长,1920 年被湘军总指挥赵恒惕赶下台后,投奔孙中山,1923 年任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部长、建设部部长。此人乃清朝举人,1904 年中清朝进士,任过翰林院编修、湖南长沙明德学堂总办。他写得一手好字,谭留下的这十个大字,将比他本人的身价还高 10 倍。

且说从孙中山在黄埔军校演讲之后,就有人根据总理的讲话精神,书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曰“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曰“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为“革命者来”。在黄埔军校彩门两侧的这幅对联,曾经鼓舞着成千上万名黄埔师生出生入死,杀身

成仁,舍生取义。这幅对联的史料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为了黄埔军校的创建,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是不应忘记的。据部分当事人回忆,从1924年至1926年,在黄埔附近的地区先后起卸了约5批军械:第一次东征前有两批,第二次东征前一批,北伐前两批。1924年,运来苏式步枪8000支,全部配有刺刀,子弹400万发;1925年,提供军火总值56.4万卢布;1926年,运送日造来福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苏造来福枪14000支,子弹800万发,机关枪90挺,弹带4000个,大炮24门、炮弹1000枚。在财政经费方面共拨给黄埔军校办学费用200万卢布,其中并不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翻译、秘书人员的工资。当时黄埔军校苏联顾问工薪用港币支付,高级顾问月支港币约700元,翻译、秘书月支港币150~200元不等。这笔开支到1927年止,也是一个偌大的数目。当年在广州的各省军队装备落后,武器陈旧,见黄埔军校师生领到崭新的苏式武器,许多军阀甚至屈尊到蒋介石面前,央求分得一杯羹。蒋介石把一部分收缴来的陈旧武器拨给他们,难怪有的军阀于失望之余,常有“俄国人给的都是破枪”的抱怨。苏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无私援助中国创建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这是中国人民永远铭刻在心的。

苏联军事顾问巴甫洛夫来华前是士官生混成师的师长,红军将领,他作战骁勇,屡挫白匪军。1924年被派来中国后,他向孙中山建议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军委会提出了六条具体建议:军、师设党代表;创办军官进修学校;在广州设立防卫区;建立装甲兵;组织广泛的农民运动;设立军事检查机关。他与鲍罗廷多次到黄埔军校视察和听取汇报,并给予具体而明确的指示。1924年7月18日,也就是刚参加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

的一个月零两天，他陪同孙中山亲自督师东征，设大本营于石龙。巴甫洛夫乘坐一小船去东江石龙河考察地形，不幸失足落水光荣献身。后来据说他当时站在船舷上，因专心忙着回答一个卫兵的敬礼，不慎失足落水。时值黑夜，水流湍急，抢救不及，就这样因公殉职，死时年龄刚满 32 岁。

孙中山闻讯极为哀痛，亲拟悼文如下：

沉痛悼念巴甫洛夫将军逝世，他是俄国为着中国自由而战的第一位捐躯者。我国邻近——贵国的这位勇敢崇高的儿子并没有白白牺牲。他的牺牲密切了俄中两国关系，使国民党更加坚定地把为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巴甫洛夫牺牲后，苏联改派加伦将军接替他的工作。

加伦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苏联著名军事家，1935 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24 年来华，接替巴甫洛夫任黄埔军校总顾问。加伦曾积极建议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一次东征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巩固广东根据地。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加伦随最后一批苏联顾问离华返国，1938 年，因涉嫌日本间谍被斯大林处决。斯大林去世后加伦被平反，恢复名誉。正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国际友谊万年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商团叛乱 学生军初试锋芒 受党委托 周恩来主管政治

话说黄埔军校开学大典之后，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双管齐下进行着。第一期学生于5月5日入校，第二期学生8月1日入校，到年底第三期学生又开始陆续踏进黄埔岛。在苏联军事顾问和各级教官的督促下，学生黎明即起，晚上10点才吹熄灯号，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讲课和操练，常常弄得师生精疲力尽、倒床就睡。生活之紧张，纪律之严明，凡是进过黄埔军校的人，都有深切体会。当年练就一个强壮的身体，到老还腰板笔直，走路昂首挺胸，这几乎是黄埔健儿一生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黄埔军校的教育，吸取了苏联红军的经验，实行军事和政治并重的方针。为了加强政治教育，由政治部制定了《政治教育纲要》。纲要中阐述了总理学说与三民主义之根本原理、中国革命的性质、党的主义与政策的意义、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性等问题；介绍了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方面各种重要的情形和趋向，以及革命运动起于工农群众的物质要求，并依靠民众实力贯彻党的策略方针的主张；同时还指出军事学术与军事锻炼互相结合的必要性，从而使黄埔学生认识 and 了解个人在军队中的责任，认识 and 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应注意的事项，以求得自己完全适应于伟大革命事业的需要。为了贯彻《政治教育纲要》对学生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政治教育，黄埔军校确定了政治教育科目。

基本科目有《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科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等 18 门课程。军事课程有《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筑城学》、《交通学》、《地形学》、《马学》、《卫生学》、《经理学》等,这使学生掌握和学会运用一般军事学的原理、原则。术科课目有《制式教练》、《阵中勤务》、《典范令》、《服务提要》、《技术》、《马术》、《劈刺术》以及野外演习、战术实习、野营演习等,这使学生掌握各种阵中勤务及技术原则,培养指挥小部队作战的能力。高教班还要学习特种战略战术学、战史、作战计划、动员计划、参谋勤务、后方勤务、兵棋、国际法等。入伍生则从最基本的科目如基本教练、散步教练、班排连教练、射击教练、战斗教练、散兵壕构筑法等学起,使之达到上等兵及军士教育的初步要求,为升入本科打基础。从第二期分科起,军事课程根据兵种不同,还有更详细的分类。

军令如山倒。在平时,无情的军事法规是一种有力的监督体制,督促一名真正的军人锻炼成为品学兼优的高材生;而战时则是激励黄埔学生冲锋陷阵、毫无畏缩、流血牺牲、死而后已的强大约束机制。黄埔军校制订了一系列军事法规,先后有《学生队学生遵守规则》、《革命军惩罚条例》、《革命军连坐法》、以及《革命军刑事条例》等等。任何人违反,都要受到惩罚。在黄埔岛上设有类似监狱的军人禁闭室,分为重禁闭、轻禁闭、禁足三种。如犯损坏枪械、毁弃服装、遗失子弹、私取公物、藐视官长、凌辱同人、无故开枪、有意毆人者,则处一日以上二月以下之重禁闭;如犯执务怠惰、服装秽乱、酗酒滋事、聚众赌博、玩忽走火者,则处一日以上二日以下之轻禁闭。至于犯有疏忽失礼、嬉笑无礼、粗蛮无礼、大声叫嚣、随意漫骂、语言秽杂、仪容颓唐者,处禁足一次至五次。所谓禁足就是放假不准出校门。

有一次蒋介石曾对一位进校前散漫惯的学生因其违反校规,惩罚立正 5 分钟。因该学生不服惩罚,校长就以此为例,决定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教训:“今天有一个学生,因为他不守规则,罚他五分钟的立正,他不肯立正,还要与长官强辩,毫不懂得做学生做党员的纪律。他起先不照命令做事,已经犯了军纪,后来罚他立正,他偏不肯立正,就是犯了两重纪律,所以要罚他坐禁闭室。当时他还要违抗,说是用强力压迫他,说是饭吃不惯,讲了好多没有道理的话。这种藐视官长违抗命令的事,别的军事学校里都很少,而我们革命党军官学校,号称为青年同志守纪律的学生,倒犯了出来,岂不可叹。”蒋介石对学生的军容风纪十分重视:着装风纪扣子不扣、帽子戴歪或者与老师及上级相遇时不行军礼,规定都要挨尅。有一次他对卫兵训话:“你们卫兵自己格外谨慎,格外守规矩,不可做违反风纪的事情出来。你们能够服装穿得整齐,寝室扫得干净,拿枪拿得好,带刀带得正,立像立,坐像坐,人家一看见你们,就晓得这个学校是很整顿的。倘如你们寝室不干净,纽扣上下不正,领头参差不齐,衣服肮脏,军帽歪斜、懒惰骄慢,一些人没有姿势,没有精神,人家进得学校第一重门,看见你们卫兵不良,就知道这个学校的内容是很腐败的。”黄埔军校风纪严明,这种优良传统一直保持下来,在这方面受到军事专家的好评。

言归正传。且说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经过近半年的严格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他们成为生龙活虎般地标准革命军人。平时他们在沙盘上演习,在野外操练,虽属纸上谈兵,但却斗志昂扬,练就了过硬的技术本领。经过卧薪尝胆,几个月下来,当初的文弱书生如今已调教成一支精锐之师,犹如一把待出鞘的利剑,正欲一试锋芒。恰巧广州发出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陈廉伯利用商团叛乱,孙中山于 1924 年 10 月 14 日下达平定商团的

手令：

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航空局长陈友仁、甲车队长卢振柳、工团军团长施卜、农民自卫军主任罗绮园、讲武学校监督周贯虹、滇军干部学校校长周自得、兵工厂马超俊、警卫军司令吴铁城：

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此令。

为什么要平定商团叛乱呢？说起来话长。原来，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由岑伯著任团长，陈鉴持任副团长，以“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维持公安”为宗旨。商团有枪械可以自卫，协助警察站岗，相当于保安部队。1919年，由与英帝国主义分子有密切关系的陈廉伯任团长，此人乃广东南海西樵简村人氏，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在广州最具金融实力的汇丰银行工作。当上买办后，他开辟园林，大兴土木，在广州西关建英式大厦，过着富豪的荒淫生活。陈廉伯勾结军阀、官僚、政客，投靠英帝国主义资本家，而视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为眼中钉，肉中刺。在广州沙面租界他招兵买马，培训商团团丁，企图建立“商人政府”。黄埔军校开办后，本来与商团无矛盾，据密报孙中山得知陈廉伯私购军火，意欲颠覆广东革命政权，就下令蒋介石注意来往船支，查缉走私军火。1924年8月10日，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的价值百万元的德式枪械1万余枝，手提机枪42挺，大炮两门，由悬挂挪威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运往广州。刚入口岸，该商船就被黄埔军校派来的学生扣留，并将军械起存于学校。于是陈廉伯以广东革命政府扣留枪

械为借口,动员了两千多名团丁包围了大总统府,煽动商民罢市。8月13日,廖仲恺以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名义,请蒋介石派两队学生前往广州市内维持治安,向民众宣讲扣械真相,驳斥敌人谣言。当时黄埔军校枪械奇缺,学生强烈要求把扣留的枪械发给他们。蒋介石说:“如果党里说这个军械我们可以取用,我们就取用;如果党里说我们要始终保管,那就要保管,要完全做一个革命军的模范给大家看,这是我对扣械案的主张。”8月25日,商团胁迫广州及附近周边大小百多个城镇罢市;28日,英国派出9艘军舰集中广州白鹅潭水域,公开进行恫吓;9月初,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这是讨伐北洋军阀的有利时机,加上他想借此调一批军阀部队离开广州,缓解地方财政困难,因此便准备出师北伐。蒋介石虽然不十分同意孙中山的北伐主张,但还是派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跟随到韶关。孙中山离开广州后,大元帅由胡汉民代理。胡汉民对商团采取妥协态度,致使商团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他们把黄埔学生视为“娃娃兵”,没有放在眼里。经过反复做工作,商团枪械发还35000支,由广州市市长兼全省民团统率处督办李福林出面交涉运回广州。此事本来可以协商和平解决,但商团得寸进尺,他们拿到被扣的武器后,突然宣布全省实行第二次总罢市。这天正好是“双十”节,陈廉伯决心要在这一天大闹广州。国庆节,按照惯例将举行庆祝游行,一大早,在观音山下的第一公园里,已是人潮汹涌,中共两广区委决定在这里举行“双十”节庆祝大会。这一天,黄埔军校的学生一部分留在黄埔举行阅兵仪式,一部分前来广州参加国庆游行活动,以显示强大的革命力量。黄埔军校学生队伍军装整齐,朝气蓬勃,英姿飒爽,他们所到之处,群众夹道欢迎。刚从法国回来的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主持庆祝大会。此时他还没有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职务,

但廖仲恺就已打定主意,要周来黄埔军校挑大梁。周恩来如何来黄埔,暂且不提。

且说庆祝大会后,接着举行示威游行,在标语口号中有“打倒商团”“拥护革命”等内容,愤怒的声讨声使商团团丁恨之人骨,但又不敢对抗。当工农群众和黄埔学生游行队伍经过广州市太平南路时,被商团截住,说前面正在装卸货物,勒令游行队伍改道而行。双方争执起来,先是互相对骂,然后是推推搡搡。商团惊恐地发现人群愈集愈多,怒吼之声震耳欲聋。商团团丁胆虚,突然开枪,打死学生、市民 20 多人。面对商团的公然侮辱攻击,孙中山态度强硬起来。13 日,孙中山下令吴铁城率领警卫军从韶关返穗,蒋接到“平叛令”后,立即部署作战。当日下午,蒋介石由广州北较场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回城内。出发时,车刚发动又熄了火,司机下车修理,蒋等得不耐烦,换车先行,令警卫排长黄友文等人随后乘他的车进城。他的车挂着青天白日旗,很醒目。不久车修好上路,行至东坡楼时,突然遭到乱枪伏击,汽车油箱被打裂,司机中弹,慌乱中车翻,黄友文和卫士都被打死。事后查询,是驻军杨金龙旅被商团用重金收买,伏击蒋介石。杨对执行伏击任务的两个连长说:“发现插有青天白日旗子的车,就集中火力把车打翻,把车内所有的人打死,而后有重赏。”但也许上天保佑,蒋改乘了汽车,才得以幸免于难。人们纷纷说,这是蒋母葬在风水宝地的缘故。蒋也深信不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蒋介石日后对风水先生肖萱还有提携,此是后话。

且说 15 日凌晨 4 时,黄埔军校为主的各路大军 4 千余人,兵分五路包围了商团驻地西关,恰如疾风扫落叶,仅仅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就把商团军的叛乱镇压下去了。参战的黄埔一期学生关麟征操着陕西口音大声吼道:“火攻,烧他娘个蛋!”此话

点拨了蒋介石。蒋怕火烧民房影响不好,经请示孙中山后进行火攻。于是学生军用汽油点燃杂物,一时火光冲天,风助火势,火焰四处乱窜,直扑街垒,烧得商团军一败涂地。商团首恶分子乘火光连夜偷偷弃兵丁逃往香港,团丁被缴械投降。16日,孙中山电令将两西濠口商团的大新公司占领充公,指示胡汉民“不必畏惧外人干涉”。23日,孙中山又电令将所有商团各机关房所悉数充公,永不发还。参加平叛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三队学生,有黄维、李延年、郑洞国、周士第、许继慎、鄧悌、曹渊、关麟征、李仙洲、陈赓、杜聿明、廖运泽、李之龙等。商团的陈廉伯能与黄埔这些未来的将星交手,也算得他独享的一种殊荣吧!平叛商团这一仗打出了黄埔军校学生的威风。战斗结束后,他们仍感到“不过瘾”。初试锋芒,杀鸡竟然用上了牛刀。商团叛乱被镇压,解除了广州革命政府的一个“心腹之患”,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军阀及右派势力,使广州这块革命策源地得以巩固下来。黄埔军校师生从扣留商团枪械到镇压商团叛乱,始终起到了模范、先锋作用,显示了这支革命武装力量的威力。对此,孙中山十分欣慰。蒋介石也因之名声大震。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曾就平定商团叛乱写道:“黄埔军校虽然参加人数不多,但却成了政府军的核心,革命党人纷纷集合在它的周围。”

且说黄埔军校在创建过程中,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积极贯彻落实三大政策,另外有共产党的参与和苏联的帮助,所以终于打开了局面。国共两党输送的优秀青年,经过半年多的培养教育,在平定商团叛乱中他们初露锋芒;革命军官的培养也初见成效。在此基础上,黄埔军校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按照总理的办校宗旨,尽快地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军官。然而黄埔军校建校之初所设立

的政治部,却形同虚设。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很少到黄埔办公。接事近3个月中,其就因与国民党元老张继不合,对政治部的工作心灰意懒,而悄然溜回上海,不再过问黄埔军校的事。政治部在几个月中没有主任,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更无具体组织,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后由邵元冲代理政治部主任。这位国民党要员乃前清举人,封建思想浓厚,根本不懂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去做。他性格孤僻,平日里既不联系学生,也不接近党代表和苏联顾问,只是每隔几天从广州乘船来学校走一趟,看看公文而已。他是一个十足的官僚,间或偶尔向学生演讲,但因口才极差,内容陈腐无聊,被学生戏谑为“催眠曲”。不久,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不再过问政治部的工作。党代表廖仲恺经蒋介石同意,找加伦顾问商量,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来做政治部主任。

廖仲恺首先想到了张申府,想请他向中共中央反映,代为物色恰当人选。张申府乃河北献县人氏,原名张嵩年,字申甫,北京大学毕业,与李大钊创办过《每周评论》,任《新青年》编委。1920年10月他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3月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共旅法小组,曾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他在柏林成立中共旅欧总支部,1924年返国任蒋介石的英文、德文翻译,曾与廖仲恺一同参加黄埔军校筹备工作,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第一任副主任,因与主任戴季陶有隙,又不满蒋介石飞扬跋扈的作风,上任仅一个月就辞职离校。但张与廖仲恺私交甚密,廖通过张要求共产党选人才,想必是十拿九稳的。张申府与陈独秀关系很好,曾向廖仲恺推荐上海大学一批老师来黄埔任政治教官,如恽代英、高语罕、肖楚女、沈雁冰、阳翰笙(欧阳本义)等。

坐落在上海青云路师寿坊第三条弄堂的上海大学,虽不挂校牌子,但它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最早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府,曾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说。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在改组升格之际,原准备由陈独秀任校长,后因陈的政治色彩太浓,便改由刚从陕西抵沪的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为校长。孙中山对上海大学情有独钟,1923年春曾亲批月拨万元资助上海大学办学。当时在这所大学上学的有李硕勋(李鹏之父)、杨之华(瞿秋白之妻)、王稼祥、博古、吴熙(陈独秀外甥)、康生(张耘)、孟超、杨尚昆、白善明、陈赓等。这些人后来都是中共的重要干部。张申府向中共中央推荐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于1924年9月返国,党派周恩来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陈延年任委员长后,周恩来改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当时很多人都称他为总教官。1924年11月,孙中山正式任命周恩来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年,周恩来才26岁。

周恩来,号翔宇,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早年读私塾;1910年随伯父到东北,先后在铁岭银冈书院、沈阳关东模范学校读书;1913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在校曾组织“敬业乐群会”的学生团体,亲自编辑出版《敬业》杂志,同时担任学生会校刊《校风》主编。19岁毕业后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离开祖国时,他曾写下一首充满济世豪情的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21岁的周恩来忧心如焚地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报》,猛烈地抨击孔孟旧礼教,提倡科学、民主和改革;组织著名的进步团体《觉悟社》,提出了最终要铲除剥削阶级的奋斗目标;同年9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

文科,与邓颖超、马骏、郭隆真等主编机关刊物《觉悟》杂志。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同年6月,与赵世炎、李维汉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作为中共“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他经常奔波于巴黎和柏林之间。他主编的《少年》(后改为《赤光》月刊),起了中共在欧洲的“喉舌”作用。1923年初,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积极从事国共合作。他因协助国民党特派员王京岐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绩斐然,而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1924年春,他在法国建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他的卓越才能引起了孙中山和廖仲恺的瞩目。廖仲恺与中共有关部门协商后,请周恩来的旅欧老朋友、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写信并汇款到巴黎,特邀周恩来回国,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廖仲恺亲自把周恩来接到黄埔。码头上,38岁的蒋介石与26岁的周恩来握手。据宋庆龄回忆,周恩来当时青年有为,英姿飒爽,才华横溢,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难怪张申府向廖仲恺推荐的那份15人的名单上,第一名就是周恩来。张申府与周恩来相识于天津《觉悟社》,周那时刚20岁出头。他代表觉悟社发言时思路敏捷,对社会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那次侃侃而谈,加之周待人诚恳而热情,这一切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法国留学,张对周的胆识才学、为人品德赞叹不已,称他为中国新世纪的雄才。来黄埔军校后,周恩来当然不负众望。在任政治总教官时,他给黄埔第一期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由于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倍受学生爱戴。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后,立即开展各项政治工作,他认真研究了西欧和苏俄的军事经验,认为“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目的也对,方法极好”,是效法的榜样。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他首先健全了组织,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从第一期毕业生中选拔王逸常

黄鳌、杨其纲等中共党员任主任，制定了教导团士兵政治训练计划，开展学生政治讨论活动，出刊物，办壁报，工作日趋活跃。政治部还建立周会制度，邀请廖仲恺、张太雷、宋庆龄、邵力子、鲁迅在周会上讲话，周会的学术空气极浓。据王逸常回忆：“周主任每天除用少量时间浏览政治部工作人员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志、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适度，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周恩来从平定商团叛乱之后正式到黄埔军校上任。其实，在这之前，他曾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直接与中共黄埔军校支部联系。当时，进入黄埔军校的中共党员有熊雄、金佛庄、毛延楨、郭俊等教职员及官佐；有蒋先云、陈赓、李之龙、张其雄、杨其纲、徐向前、王尔琢、游步仁、许继慎等一期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当时侯镜如、李默庵、郑洞国也是中共党员。蒋先云是中共黄埔军校支部书记，王逸常任宣传干事，杨其纲为组织干事，许继慎、陈赓是候补干事。这批共产党员当时直接接受“明星”的领导，“明星”即中共广东区军委的代号。说来奇怪，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国、共两党党员均可报名入校。但蒋介石却另立章程：凡新生入校，即发表，登记入册。登记后，即为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样，入校的共产党员也成为国民党员。这种状况直到国共分裂，才不再允许跨党当“两栖”党员。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后，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第二期学生陆续入校。他千方百计将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学生安插到黄埔军校刚建立的教导一、二团任连党代表，为以后的东征、北伐培养了大批骨干。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共产党员虽不公开活动，但实际上亦堪称为人表率。蒋先云是

水口山矿的职业革命家，威信高，群众拥护；陈赓诙谐，在湘军、上海大学都涉足过，人缘极好；李之龙来黄埔前就是海军军官，素质高、能力强；金佛庄则是学生队队长，深受学生爱戴。徐向前在《回顾黄埔军校》一文中写道：“蒋先云学习十分刻苦，往往深夜还挑灯夜读。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党的重要指示，周恩来一般都是通过蒋先云来传达，蒋成了政治部联系中共党员学生的桥梁。第二期学生入学后，许多进步青年都纷纷加入共产党，像周逸群、卢德铭、古宜权、陈恭、邝鄘、胡秉铎等，都是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培养与吸收的优秀党员。周恩来在黄埔还协助蒋先云发起成立左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组织与团结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军官。后来，由王柏龄出面组织了一个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由缪斌、贺衷寒、冷欣、潘佑强、邓文仪为骨干；杨引之、胡宗南也成为该会的活跃分子，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团体组织。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双方甚至动拳头，打得头破血流。黄埔军校两派为何斗争，结果如何，这里暂且不表。

且说周恩来虽然离开了广州文德路那幢坐落在小楼二层的中共广东区委办公室，但他除了紧张地工作外，还时常与远在天津的恋人邓颖超经常鸿雁传书。已经整整5年没有见面了，周恩来仍然不能忘怀天真、活泼、性格开朗的“小超”。邓颖超与周恩来是1919年认识的，那时候《觉悟社》刚成立，郭隆真特别介绍了一位15岁的少女，她就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让敌人头疼的女演说家邓文淑（即邓颖超）。周恩来对邓印象很好，在北京陶然亭的相聚，那时两人还仅仅是《觉悟社》志同道合的同志。以后周恩来留学法国，周、邓全靠鸿雁传书建立感情。周恩来回国后，邓颖超作为中国国民党天津代表前来广州参加“二大”。临行前她给周恩来先写一封信，说明了准确的时

间及上岸地点。周恩来派陈赓到珠江码头去接，周恩来还特地给陈赓一张邓的照片，以免认错人。陈赓是近视眼，他在码头等乘客一个个走完了，还是没有迎接到“新娘子”，回来时非常懊恼。哪知陈赓到了周恩来的住所时，邓颖超已先行到了。

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所在地正式当了周恩来的新娘。然后，邓正式调到中共广东区委担任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邓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1925年初转为共产党员。她的父亲是广西人，而她自己则是在1892年生于河南。她同周一样，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也同周一样，没有了父亲，全靠母亲抚养成人。1915年邓考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最感兴趣的是地理、历史、音乐、汉语，最不喜欢针线活。周、邓结婚时，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了他的“八互”信条，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正是：一对模范的革命夫妻，两位互敬的历史伟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良莠不齐 王柏龄金屋藏娇 苦练三九 张治中从严治校

话说黄埔军校既然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理所当然的就会有左、右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也是以后长达多半个世纪国共两党大规模较量的前奏。蒋介石陪着孙中山于1924年6月16日在黄埔军校举行第一期学生开学典礼后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18日，国民党元老中的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以中央监察委员的名义，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弹劾案”。大意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党的党团秘密活动，这是非法的，请中央执委会“从速严重处分”，并提出国共两党应“分道扬镳”、“分作两起”，这样“更佳”云云。这个弹劾共产党的提案“事前征得蒋中正校长同意”。蒋介石在国民党右派元老中总是装扮成国民党的忠实信徒，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同时在孙中山、廖仲恺、周恩来的面前，却又表现积极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如在1924年6月24日和29日对黄埔军校学生训话时，他都号召“向俄共党员学习”，说俄共党员“个个肯负责任，守纪律、始终努力奋斗，视死如归”，“俄国共产党党员只愿为国家、为群众谋幸福”，“他们一举一动都以主义为前提，都以精诚来团结”，竭力讨好苏联军事顾问。1925年10月他还亲自送长子经国赴苏联孙逸仙大学学习。该校后来改名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由国共

两党推荐,鲍罗廷审定。如谷正纲、邓文仪、皮以书、屈武(于右任的女婿)、王新衡、白瑜、冯洪国、冯弗能、于芝秀(于右任之女)、韦永成、卜通明等,以上都为国民党要员子弟,包括蒋经国在内。共产党方面有邓小平、廖承志(廖仲恺之子)、林祖涵、杨尚昆(杨闇公之弟)、乌兰夫等。蒋经国、廖承志、陈复(陈树人之子)号称“留苏三公子”。如果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岂能将亲生儿子送往苏联呢?蒋介石送子女赴苏留学。这一招他蒙蔽了不少党国要人及黄埔师生。其实,蒋经国当年不过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因参加上海“五卅惨案”游行被校方开除。后来他又进北京吴稚晖办的北京外语补习学校,因反北洋军阀面被捕关了两周。蒋介石见儿子不好好念书,到处闹事,又执意要往苏联,就顺着儿子的意思,让他到俄罗斯去磨练磨练。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蒋以此为“资本”,大肆吹嘘“谁反共谁就是反革命”。以后他自己倒应验了这句“口头禅”,自食其果,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蒋介石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后,他身边有两位左、右手,也就是本书第三回提到的“黄埔四巨头”之中的王柏龄、何应钦。蒋介石、周恩来则是“四巨头”中的魁首,也是今后国、共两党的首领,本书挂帅的人物。

王柏龄何许人也?此人乃江苏江都人氏,字茂如,生于1888年,比蒋介石仅小1岁,少年时好习武,14岁入南京陆军小学,以成绩优异被保送陆军速成学校(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学习,1908年与蒋介石一同考取留学日本的官费生,上振武学校学习。他与蒋介石同窗3载,毕业后又一同分配到野炮13联队实习,辛亥革命后一同返国参加光复沪宁之役,王柏龄与蒋介石情同手足。蒋介石发迹后,总忘不了提携这位同窗。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后,王再次东渡日本,进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学习,毕业后回国,经陈其美、蒋介石推荐,加入居正领导的山东讨

袁军任总司令部参谋、代参谋长、旅长等职。1917年应唐继尧之邀,出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云南高等军事学校炮兵科长等职,历时7年之久,具有一定的军事教育经验。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后,任命王柏龄为大元帅大本营高级参谋。黄埔军校成立后,王柏龄任筹委会委员、教授部少将主任。说实在的,王柏龄在筹备军校和制订教育计划、教材编写、规章制度的制定方面,确实花费大量心血。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至少每天要工作18小时,三、四个月下来,人并不觉苦,内心的热忱,也并没有减低,真是精神振奋,身体就不成问题。”

其实,谁都知道,王柏龄的功劳,有一多半是他的“得意门生”叶剑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叶剑英当年投考云南讲武堂时,王柏龄是该校的教育长。王柏龄从粤军第8旅张民达旅长那里借调旅参谋长叶剑英来黄埔,张民达真舍不得放叶走,但碍于廖仲恺的情面,只好对廖妥协。所以临走时,张民达对叶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大本营指名调你,不能不放行,但有一个条件,你还是8旅的参谋长,作为8旅代表去参加办校,办完就回来。”叶剑英答应了张民达的要求,才来到黄埔的。孙中山最值得称道的有粤军中的“两达”:一是第一师第3团团团长邓演达,再就是8旅旅长张民达。孙中山经常说:“干革命,有‘两达’就有希望。”叶剑英当年护卫孙中山登“永丰”舰避难表现出的临危不惧的精神,也是王柏龄十分欣赏的。“拔剑角群雄”。王柏龄依靠叶剑英,把个教授部办得井井有条,不仅得到了校长、党代表的嘉许,也乐得他逍遥自在,三天两头地往广州跑。王柏龄娶了三个小老婆,分居在不同地方,生活糜烂,还常常去逛妓院,烟酒嫖赌,样样都会。有一次,王柏龄喝得醉醺醺的,一头闯进邓演达的房间,喋喋不休地大谈嫖经:“像咱们这种身份的人,要嫖就去‘清吟小班’(头等妓院)、“下处”(三、四等妓院)是去不得的,

不然弄上一身‘广疮’（梅毒），可就得不偿失。清吟小班打茶围，每次大洋一块，叫‘开盘子’，像你一身无牵挂，完全可以一月付30元大洋‘包盘子’嘛！”以上情节摘录自尹家民先生著《蒋介石与黄埔“四凶”》一书，决非笔者杜撰。据说，王柏龄由蒋介石介绍来黄埔“做官”，常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居，被人称为蒋的“第一只手”，办学只会“纸上谈兵”，打仗实为常败将军。

王柏龄于1924年年底兼任黄埔军校教导第2团团团长。东征淡水一役见敌势凶猛，他不顾防线的完整和友军的安全，率领团指挥所先行后撤，以至所部失去信心，防线被敌人冲开缺口，幸被教导第1团及粤军一部赶来增援，才稳住阵脚。战后，蒋介石下令撤了王柏龄的团长职务，念其办校有功，调任他为黄埔军校参谋长，后升为教育长。王柏龄对蒋唯命是从。蒋为了排斥打击军校内的共产党和左派力量，指使王柏龄等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同周恩来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当时，王柏龄是黄埔军校内最顽固的反共人物，对“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他出谋划策，积极支持，而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则百般刁难，千方百计诋毁与打击。只醉心于风花雪月、酒楼妓院的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学生眼中是个“花花太岁”。他不仅经常逛妓院夜不归宿，而且还在教育长任内大肆挥霍有限的经费。蒋介石恨这位同窗太不争气，在以后的官场生涯中，几次提拔，几次撤职。蒋介石只是在黄埔军校左右两派斗争中，把他推到前台当打手，而对他人品则流露出鄙夷。在左派学生中，像王柏龄这样的人品，简直是黄埔的耻辱。王柏龄与邓演达的一场纷争，以及他如何秉承蒋介石的意志与周恩来周旋相斗，以后再详细交待，在此暂且不表。

再说黄埔军校开办以后，名声越来越大，全国各地热血有为

的青年,千里迢迢报考黄埔军校。国民党、共产党各省市基层组织也源源不断地推荐优秀党团员前来报名入校,一时广州人才济济。

黄埔军校的确由于它的革命性而受到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的爱戴,一批有真才实学的青年军官,陆续慕名而进入黄埔军校,这里先不提号称“黄埔八大金刚”的何应钦、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刘峙、陈继承,单说一位后来国共两党都一致公认的“和平将军”张治中。他乃“八大金刚”中惟一留在大陆的爱国不反共的将军。也有人称张治中、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为“黄埔四凶”。张治中这位传奇人物,国民党右派忌恨他,称他为“四凶”之首;左派尊重他,称他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他一生都是处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渡过的,从1924年年底他进入黄埔军校开始,直到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前后在蒋介石手下效力达25个年头,以自己的忠诚、质朴、勤勉、敢于直谏和聪慧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张治中也是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时间最长的一位军事教育家,前后干了10年,真是“桃李满天下”。为“和平”他四方奔走,不遗余力,三上延安,与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私交很深,也受到中共领导的欢迎与敬仰。邓颖超在为《张治中回忆录》所作的《序》中说,“文白先生是同我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他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将世代代为人民所纪念”。郭沫若对张治中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个人对于那独夫异常忠诚,但是对中共的友谊还是比较持久,比较有诚意。这个人爱国,却又实际参加了独夫的一些卖国勾当。这个人是个大官僚,却也常常讲点民主。”郭沫若的话,可说比较客观而中肯,道出了张治中在政治斗争中的矛盾心情和政治生涯的传奇经历。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1890年10月27日出生于安徽省

巢县西乡洪家疃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6岁入私塾发蒙,16岁在杂货店当学徒,流浪于扬州、安庆等地。他在扬州盐防营当过兵,后当警察,感到世态炎凉,飘零四方。当时他给自己起名为“警魄”,后取警、魄中的文白作字,以纪念青少年的凄苦境遇。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上海参加学生军,1912年冬入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学习,1916年毕业,分配到安徽安武军倪嗣冲部见习。北洋军阀的腐败使张治中难以忍受,终于使他出走转赴广州,追随孙中山护法,在桂军中任连、营长、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大队长等职,为刘震寰主办的靖国军培养了一批基层军官。

张治中入黄埔军校由廖仲恺向蒋介石推荐,1924年12月正式被委任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上校总队附,后代理总队长。王耀武、常乾坤、陈修和(陈毅胞弟)、方先觉、戴安澜、康泽、刘安祺、肖人鹄、毛人凤这些著名的战将,当初都接受过张治中的严格训练。张治中刚到滇军任毓瑞的第八旅上尉差遣时,就不甘寂寞,将身边的三个勤务兵集合起来,天天训练,后来慢慢增加到十多人,最后增至50多人,把一群旅部散漫惯了的士卒训练得有模有样。这使任旅长十分欣赏,于是他下令再征集一些士兵,成立旅部警卫队,由张治中当队长,从此开始了他带兵的戎旅生涯。张治中靠三个勤务兵起家,从严治军,天天与学生一起生活与操练,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实干,赢得师生的敬仰。张治中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很融洽,这得追溯到两年前的往事。1922年他脱离军队,带着夫人洪希厚及长子一真,赁居上海法租界的一个楼面,每月房租大洋16元。他专心入青云路师寿坊第3条弄堂的上海大学补习俄语。他与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高语罕等共产党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喜欢听高语罕的课,对社会主义思潮有了初步认识。来到黄埔军校后,上海大学的

恽代英、高语罕、肖楚女都令张十分景仰。尤其是目睹了周恩来、邓演达、熊雄这些人的崇尚实干、不求当官的作风后，他与他们的交往自然就十分频繁起来，言论也逐渐左倾。张治中来黄埔不久，曾向周恩来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请示上级后回答他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太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候，等以后有机会再说，你看怎么样？”张治中虽未入党，但他在以后军校两派的斗争中，始终旗帜鲜明的支持“青年军人联合会”，对“孙文主义学会”的某些干将如贺衷寒、邓文仪、冷欣等不屑一顾。在表面上，他则站在中间偏左的立场上。

张治中亲共的表现，一度使蒋介石怀疑他是不是共产党，曾密询心腹干将王懋功。王经过调查力言并无其事，流言不足信，为张治中说了许多好话；加上张治中在黄埔军校的保定同学都为他开脱，这才打消了蒋介石的顾虑。然而张治中毕竟是有用之才，几番踌躇，蒋终于还是以怀柔为主，将张治中笼络在身边了。

1925年2月，黄埔学生军出师东征，张治中率入伍生总队留守后方并维持校本部正常训练。6月，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叛乱，东征军回师平叛，张治中率留校学生组成突击队，包抄叛军后路，由猎德强渡珠江，攻占石牌车站，摧毁滇军指挥所，并乘胜扩大战果，会同东征军平定刘、杨叛乱，为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做出很大的贡献，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不久，张治中调任东征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谋，协助指挥作战。以后蒋介石先后委任张治中为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团团长。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改组，张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黄埔军校在一、二、三期毕业生的基础上成立军官团，他又被委任为军官团团团长。至此，张治中一身兼八职，蒋介石对他的重用可想而知。张治中每天从早到晚，乘坐汽车、汽

艇往返于广州与黄埔之间,其劳累可说在当时的黄埔军校高级官佐中是独一无二的。在黄埔岛上,他与邓演达算是比较正派的革命军官。

张治中 35 岁当上校,在黄埔军校中并不多见。他不是靠读书、靠圆滑处世或吹牛拍马而升迁,而是靠刻苦学习、真枪实弹中打出来的。张治中曾回忆说:“我带兵,无论到什么地方,决不带行军床,总是等士兵睡下后,躺在他们的空档里;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把士兵安顿好,自己才休息。吃饭当然是同在一起,兵吃什么我吃什么。作战我总是站在第一线。”在黄埔军校带入伍生,他是最先起床的一个人,也是最晚睡觉的一个人。早晨,他带着学生,围着黄埔岛要跑步 20 多华里;深夜紧急集合急行军,身为总队长的张治中总是在学生当中,与学生同甘共苦。由于他的严谨治校,精心育人,黄埔军校入伍生优良的训练传统,一直传到笔者这一代人的身上。笔者至今回忆当入伍生的紧张生活,还感到不可思议,吃饭 5 分钟,一吹哨子就动碗筷,一听哨声就终止进餐,不管你吃完没吃完,动作慢了就得挨饿。最热的时候专到太阳底下练操;最冷的季节,就穿衬衣练“劈刺”,用汗水来抵御严寒。考入黄埔军校,入伍生训练是一关,好多人都是过不了这一关而被淘汰。张治中十年执教,五度统兵,不仅是著名的军事教育家,而且也是抗日战争中的名将。以后的事,暂且不提。

再说说黄埔军校另一批值得一提的风云人物。首先介绍军事教育的骨干力量,那当推军事总教官何应钦,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战术教官严重、陈继承、顾祝同、刘峙,兵器教官钱大钧;以后陆续进校的还有副校长李济深、教育长方鼎英、胡谦等;至于陈诚、蒋鼎文、汤恩伯这些后起之秀,当年在黄埔不过是名不见经卷者,只能称为一般官佐而已。

政治教官方面,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张申府、邵力子(仲辉)、熊雄这些上海大学的元老派进黄埔,聂荣臻、包惠僧、成仿吾(成灏)、鲁易、陈奇涵、肖楚女、恽代英、陈潭秋、高语罕、毛泽覃、邓初民、陈毅、郭沫若、李达、李富春、沈雁冰、孙炳文、项英、阳翰笙(欧阳本义)等,这批赫赫有名的文臣太斗,也陆续被聘为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或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因而,使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充满活力。

自然,陈公博、周佛海、缪斌、陈立夫、陈果夫、张国焘这些人物,也在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执过教鞭。像“二陈”(陈立夫、陈果夫)因其父乃同盟会元老陈其美,与蒋介石有师徒关系,所以陈立夫成为蒋介石校长办公厅的英文秘书,而其兄陈果夫则为黄埔军校招生委员会委员。当时“二陈”是黄埔军校极红的人物。

何应钦两度赴日本求学,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经同学王柏龄的推荐,来到黄埔军校任少将军事总教官。何应钦 1889 年 4 月生于贵州省兴义县泥荡村,祖籍江西临川,父亲何其敏经商,母史氏。他在五兄弟中排行第三。何应钦 17 岁保送入贵州陆军小学,1909 年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同年去日本人振武学校,以后又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6 年学成回国,被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任命为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并负责筹办贵州讲武学校和组织新军训练,7 月任该校校长兼黔军援川支队参谋长。这年 4 月,何应钦与贵州督军刘显世的外甥女,王文华的胞妹王文湘结为夫妻,因而受到重用提拔,从此名声渐起,崭露头角。1920 年王文华在沪遇刺身亡,新派势力落入黔军第 4 旅旅长谷正伦手中,何被迫离开贵州去昆明,投奔云南督军顾品珍。何到昆明后,被贵州守旧派势力收买的凶手用枪击伤胸部,幸得一位法国医生治疗,才恢复健康。何应钦于 1924 年 1 月来到广州,通过保定,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关

系,在孙中山大元帅府当参谋,并协助筹建黄埔军校,考选下级干部,负责学生的短期训练。

何应钦从小就受过良好的军事素养教育。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下,他是一位标准的军人,理论与实践水平都很高,作风正派。当年留日时,中国留学生以与日本女孩谈恋爱为时髦,而何应钦算是最本分的,从不近女色。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时,他身为阅兵指挥官,站在队伍前列,立正屏息聆听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的训话,有如木桩,一动也不动,而且总是全神贯注,毫无一丝倦意,这在所有教官中是独一无二的,也给蒋介石极其深刻的印象。开学典礼那天下午举行的阅兵仪式,499名第一期的学生,分作4队,由各队队长、副队长引领,在何应钦的统一号令下,正步通过检阅台,步伐整齐,英姿飒爽,精神抖擞,得到孙中山的频频招手称许;紧跟着又进行了分列式方队表演和训练演示。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阅兵仪式,使在场的粤、湘、滇、桂军的头领为之侧目,深表佩服。何应钦为了这一天的阅兵,他花费不少心血。半个月前,第一期学生预备教育期满时,他就进行了一次预演,对训练中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莫不遵循操典教范,严格要求。他总是以身示范,为人师表,受到师生的敬佩。何应钦进入黄埔军校任军事总教官,算是任人唯贤,选中了对象。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中,他可说位极人臣,被人称为“福将”。

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885年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他的先祖是江苏人,明代始迁广西落户,祖父是清代秀才,父亲是廪生,都以教书为业。李济深6岁丧父,跟随叔父读书,12岁就入“大馆”(私塾一类启蒙馆)学做八股文,国学基础较好,18岁入广东陆军速成学堂,1919年被选送保定陆军大学深造,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当过粤军第1师师长。1926年5月他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因与蒋介石关系不好,无论

是当教练部主任或副校长,仅是挂名而已,很少到黄埔军校上班。他追随孙中山,与邓铿乃莫逆之交。在东征、北伐战争中,他带兵打仗,很勇猛。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经历汀泗桥、武昌战役,一路势如破竹,有“铁军”之称。

黄埔军校战术教官顾祝同也是“黄埔八大金刚”之一。此人乃江苏涟水人氏,1891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靠叔祖父启蒙及赵启录资助,得以继续求学,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6期,曾任连、营长,1922年到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任军事教导队区队长。当时蒋介石是许崇智的参谋长,粤军素有排外风气,蒋介石要在粤军中立足,必须团结一批非粤籍的中级军官,以为根基。作为蒋介石的下属,江苏籍的顾祝同引起了蒋的注意。黄埔军校成立,蒋特邀顾到军校任中校战术教官,1924年10月调军校管理部代主任。蒋介石认为顾祝同敦厚诚实,可信可用,因而对他格外垂青。在东征北伐战争中,顾祝同因小有战功而官位连升,从初入黄埔军校时的一名中校教官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辖涂思宗、黄国梁、陈诚3个师,1929年后改调第1军军长,抗战时与卫立煌等号称“五虎将”。

顾祝同当教官时,有一本有关黄埔的书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顾祝同上操迟到,正巧遇上蒋校长集合全体师生训话。一见顾祝同光着头,边扣军衣边往队里插,不禁火冒三丈,立即喝令出列,当场下跪示众,以儆效尤。不知是偶尔疏忽,还是要给部下点颜色看,蒋校长训斥完毕,竟扬长而去,忘记了直挺挺跪在地上的中尉军官。第二天早操,蒋介石抬眼见一个人僵硬地跪在操场上,头上、背上已蒙上一层白皑的霜片,便问跪者何人,为何跪在那里。当他知道是自己做事荒唐,被自己头天罚跪的战术教官时,不禁大为感动,觉得此人忠心耿耿,诚实可嘉,便亲自将顾祝同扶到校长接待室,连连赞赏。当蒋介石得知顾祝同也是保定陆

军军官学校毕业时,略加思忖,当面宣布:委任顾祝同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战术教官,兼任管理部主任。顾祝同因祸得福,虽被罚跪 24 小时之久,却跪得个官运亨通,连升三级。这对从小就练就‘跪功’的顾祝同来说,当然是值得的。”

俗话说“史重典实”,顾祝同“罚跪 24 小时,跪出个中校教官来”,这只能当“传说”,而无实据。顾进黄埔军校前已认识蒋,而且官阶已是中校,军校没有中尉当教官的,最多是个助教,并非笔者为顾溢美,失实之传说不可信,只能姑妄听之。顾祝同在抗日战争中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遵照蒋介石的秘令一手制造了“皖南事变”,成为千古奇冤,此是后话,暂且不表。顾祝同与刘峙争宠,与陈诚暗斗,只不过是个才能平平的军事将领。毛泽东把顾祝同列为仅次于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之后的第 5 号战犯,是和他一贯反共有密切关系的。1950 年 3 月 20 日,顾祝同和蒋经国要不是在西昌坐飞机逃得快,迟 10 分钟就会成为共产党的俘虏。

战术教官刘峙也是“黄埔八大金刚”之一。刘峙,字经扶,小名蠢子,别号天岳,1892 年 6 月 30 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一个农民家庭。父被邻村一个恶霸打死,其母胡氏被迫改嫁,他随母寄人篱下,备尝人间艰辛,从而养成他谨慎、畏缩和善于忍耐的性格。刘峙 1914 年入保定军官学校二期步科,1924 年 5 月由何应钦介绍,到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后调校本部参谋处当科长。蒋介石对刘峙比较器重,经常单独找他谈话,施以恩威。刘论才干平庸无奇,论魄力迟疑逡巡,只是靠着忠心效蒋而平步青云。北伐中他也算一员虎将,人称“福将”,中原大战中的“悍将”,抗战初期的“逃将”和解放战争中的“败将”;又有人称刘峙为“长腿将军”,撤退时跑得最快。正是:救得命来就是福,韬晦思过也不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贼心不死 陈炯明卷土重来 同仇敌忾 教导团誓师东征

话说 1924 年“双十”节前后，黄埔军校师生一举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个个意气风发。平时他们纸上谈兵，如今已真枪实弹的打了一仗，大获全胜。11 月 8 日起，黄埔一期的学生在鱼珠墟及珠村附近举行毕业实战演习，由教授部主任何应钦任总指挥，红蓝两军对垒，学生分别任排、连、营长，指挥刚刚组建的教导一、二团学兵参加演习。枪林弹雨中的实战演习，如同战场，这使刚刚训练结束入伍的第二期学生羡慕不已。

黄埔军校教导团的组建，标志着新的革命军队的正式诞生。1924 年 11 月教导第一团正式成立，何应钦任团长，王登云、缪斌先后任团党代表。一团辖 3 个营，沈应时、刘峙、王俊为营长；教导二团于同年 12 月成立，王柏龄任团长，张静愚任团党代表，顾祝同、林鼎祺、刘尧宸、金佛庄先后任各营营长。教导团的学兵均由国共两党从各省秘密招募而来，年龄均在 18 至 24 岁之间，身体强壮，精通文理的有志青年，授之以军士、准尉军衔，为革命军培养下级干部。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学生，如蒋先云、陈赓、陈明仁、侯镜如、关麟征等，均分配在教导团担任连长或连党代表，成为教导团的一批骨干。教导团的成立，奠定了“党军”的基础。1925 年 4 月 6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77 次会议通过了由廖仲恺提议建立“党军”案。4 月 13 日，国民党中央决议以

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为基础,编为党军第1旅。4月21日教导3团成立,钱大钧任团长。不久,“党军”从3个团扩编为5个团,加上炮兵营、宪兵营相继成立,“党军”第1旅扩编为第1、2两师,后来终于建建成国民革命军第1军。所谓蒋介石的嫡系,就是指由黄埔学生为主的第1军而言,第1军为国民党以后建军的千军之源。

话说教导团刚刚建成,孙中山为国家统一大业着想,于1924年10月应直系将领冯玉祥电邀,准备北上共商国是。不久前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故宫,段祺瑞就任“临时总执政”,张作霖也进驻北京。全国民众把希望寄托在广州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孙中山于11月3日特地抽出时间来黄埔军校视察,并作告别训话。这天,黄埔军校大礼堂坐无虚席,连广东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也都赶来,聆听总理教诲。孙中山目光炯炯,深情地凝望着台下的莘莘学子。他说:他此行的目的并不是对北方的各路军阀抱什么希望,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做宣传,联络各省同志,为革命打好基础。他殷切希望黄埔军校师生努力学习,将来为革命贡献一切。10天后,孙中山启程北上,临行前仍对黄埔念念于怀。这时,蒋介石已率全体师生列队于校门外码头恭迎。孙中山下船后,由蒋介石陪同莅校巡视,观摩第一期学生即兴表演了战守演习。孙中山频频招手点头,异常高兴,他对着师生感慨万端,叹曰:“嗟乎,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然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本党主义,今我可以死矣。”言毕,不胜凄楚。谁知这也许是噩耗的预兆,四个月后,孙中山确诊为晚期肝癌,死于北京协和医院。

且说孙中山北上后,军阀陈炯明又伺机攻打广州,以“救粤军总司令”的名义,率部向广州革命政府逼进。他号称拥有10万大军,要踏平黄埔。陈炯明选择孙中山北上作为卷土重来之

机,并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因而遂于1925年1月7日下达了反攻广州的命令。27日,前锋逼近虎门,广州处于一夕三惊之状态。广东革命政府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决心讨伐陈炯明,由代行大元帅胡汉民任命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东征,分左、中、右三路作战。右路军是东征主力,由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第二期步兵总队、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及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等组成,共计3000余人。这些人组成了校军,参加右路许崇智率领的粤军作战,并担任东征先锋队。校军由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指挥,何应钦、王柏龄、钱大钧、陈诚、顾祝同等军校教官分任教导团团长、营长。共产党员任各级党代表。这是而后国共两党军队实行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制的缘由。东征途中,特地邀请了苏联顾问斯塔维诺夫就苏联红军党代表制度作了专题介绍。根据建军计划,党代表的权限是较为宽广的,“除实施政治训练外,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须受其节制,以示党化云”。说通俗些,就叫“党指挥枪”。

1925年2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布总动员令,宣布了第一次东征开始。黄埔军校教导一团率先乘“福安”舰驶离黄埔岛。船过虎门时,沿途各炮台鸣炮致礼,欢送校军出征。他们沿广九铁路向东开进。2月5日,校军在东莞与敌交锋,敌稍战即退,如惊弓之鸟,作鸟兽散。此后一路顺风,克石龙,取樟木头,占平湖等地。身着新式翻领军服,颈上系着一条红巾的校军意气风发,沿途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秋毫无犯,成为沿途百姓罕见的一支新式军队;2月14日进至淡水附近,此地距惠州70公里,仅一日路程。蒋介石没想到东征一路顺风,于10日这一天写下了一首五言诗。诗曰:“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鸢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奋,挥剑长空泪涕横。”但事有逆转,这淡水乃一座石头城,城池固若金汤,陈炯明以洪兆麟一个旅的兵力在淡水固

守,而东征军必须在敌援军未到之前拿下它,因此,攻取淡水城成了出征以来的第一场硬仗。淡水守敌是洪兆麟所属的一支精锐,由翁辉腾指挥,防御工事分上、中、下三层,火网密集,互相支援,这是易守难攻的一场恶仗。校军从教导一、二团迅速抽出10名军官和100名士兵组成了奋勇队(即敢死队),这10名军官除了营党代表蔡光举、连党代表冷欣以外,其余均是共产党员;连党代表有:黄埔一期毕业生刘畴西、彭干臣、张际春、游步仁、李奇中、张隐韬、李汉藩等。蒋先云也在名单上,蒋介石实在太喜爱这位青年军官了,不忍心让他英年早夭,因而暗中将他的名字给划掉了。当时,蒋先云任教导一团四连连长。他在1925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军人》第二期上撰文说:“在学校时,大多数同学的心理,很想借一个机会,试试金石。去年双十节商团杀毙工农,一般的同学很想与商团作一个最后的决斗。这次出发东江,大多数总是眉飞色舞,除樟大头、塘头厦与敌稍有接触外,一路见不到敌人,同学非常懊丧。当营连党代表、当下级干部的都是我们的同学。打淡水城时,同学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么生死,同学李青,头打伤了,用自己的手巾裹着血头,仍奋勇登城。同学蔡光举,他打穿了肚子,我奉校长命去扶侍他,他只说:‘光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待我们痛杀!’这种精神,亦就是平日主义训练的结晶。”蔡光举由于伤势严重,当场壮烈牺牲。15日晨,蒋介石亲自起草了攻击令,令曰:“陈贼余孽,久稽天诛,本校长。校党代表率师申讨,经于本月十四日兵临淡水,胆敢据城抵抗,本校长、校党代表不忍我将士旷日相持,爰特挑选奋勇队,誓于最短时间攻破淡水。尔等务体此意,共矢为党为国之决心,奋勇无前,可进不可退,则克城在转瞬间也。其各勉旃。此令。”15日拂晓,奋勇队挟梯攻城,炮兵一连上尉连长陈诚在蒋介石、何应钦的督战下,首先开炮,步枪、机关枪继之。奋

勇队在炮火的掩护下,首先发起冲锋,冒死攻城,用人梯缘墙而上,经过激战,奋勇队伤亡过半。教导一团首先登城,二团继之,黄埔健儿蜂拥城下,淡水城终于被攻破了。粤军第二师张民达师长、叶剑英参谋长乘势入城,敌军败走。当时孙中山卧病北京,接到校军攻克淡水的捷报,不胜欣慰。淡水之役,营长蔡光举、连长余海滨和排长叶彧龙、刁步云、江世麟光荣牺牲;连党代表刘畴西被打断右臂仍坚持指挥。此役共俘敌千余人,缴获枪械2600余支。淡水之役取胜,校军信心百倍,军威大振,为第一次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团一营在清理营长蔡光举的遗物时,发现一封战前写给胞兄尚未发出的信,读了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长兄:

一别半年之久,不知家况如何。我已于军校毕业,东征讨贼。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敌拼杀,如有不测,此信便作我临终遗言。

兄弟不孝,弃父母而去。我也料到,双亲不知如何每日提心吊胆地盼我回归。妻子怎样地望眼欲穿。唉!吾复何言、吾复何言?自知我有愧于父母养育之恩,有愧于娇妻恩爱之情。负生、负死、负人、负己,但我敢说,决不负那党国,至头可杀,身可断,我的初志,深信是永远不变的。

为革命者,只有“死”和“血”,才能促成革命之成功。“主义”之花,需用鲜血浇灌。因此,我已抱定死之决心,以我之血,浇灌主义之花。

出征之时,想到双亲,则泪往心流。恐老母爱子心切,闻我噩耗,痛不欲生。我妻生性怯弱,难经此打击,闻我丧生,必肝肠寸断,悲恸而不可抑。还有我未曾见

面的黄口小儿,令我牵肠挂肚。家中诸事,皆拜托兄长,为弟尽孝,养老送终。替妻择夫,育儿成器……弟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诚心恭祝家中各位心宽、神安。

不孝兄弟 光举

蔡光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贵州遵义人,牺牲后葬于东江阵亡烈士墓。60个春秋过后即1986年秋,与蔡光举一起参加敢死队的黄埔一期同学郑洞国,趁到广州参观全国运动会之机,携孙子又一次登上黄埔岛,来到东征烈士墓拜祭。老人偕孙子拆下树枝,采来野花和野藤萝,扎3个花环作为花圈,恭恭敬敬地放在蔡光举的坟前。老人含着热泪大喊一声:“蔡大哥,我看你来了!”那一份肝肠寸断的同窗真情,令在旁陪同的人员也潸然泪下。郑洞国后来成为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1948年率国民党1兵团和新7军在长春向解放军投诚,他的事迹以后再说。言归正传,且说淡水一役虽然旗开得胜,这仅仅是东征的前奏,几场恶仗还在后头。为什么黄埔校军出现蔡光举这样视死如归的革命军人呢?话还得从周恩来说起。

东征军政治工作令人瞩目。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由陈独秀之子陈延年接替,周恩来随军东征。黄埔军校组建时间短,训练时间也短,且人数又不多。这样一支新军能够出人意料地屡屡挫败敌人锐气,壮己威风,取得令人难以相信的辉煌战绩,出现众多敢死队员,这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鼓动宣传工作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周恩来的辛苦,更加令人敬佩。在东征誓师大会上,一幅巨大的红色横标写下赫然醒目的4个大字:“杀陈炯明!”这是东征军宣传总队的杰作之一。东征校军在沿途行军中,由中共党员周逸群、卢德铭、吴

振民、毛伯苍、黄锦辉等组成的宣传队，每到一地，就搭台子又唱又说。一些老百姓原来已经避开，但结果经不起锣鼓歌声的诱惑，又纷纷返回观看演唱，竟不知不觉地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喊“打倒陈炯明”。东征校军确实与军阀部队截然不同。他们纪律严明，军服整齐，精神焕发，令群众耳目一新，油然而敬。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第3期刊登的《东征纪略》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宣传工作。文中说：“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发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此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总政治部为之统率……”周恩来在东征前，指示由政治部印发了孙总理肖像、革命军东征宣传标语、传单、编印了《杀贼歌》，内容为：“同志向前进，向前进进进，向前进进进，要记得我们国民革命军，革命军要先杀，杀杀陈炯明，不杀不甘心；军阀列强，我们敌人，要去打倒他，第一就要去杀陈炯明，民族民权民生，就是我们的生命。”编印了《爱民歌》，内容有：“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田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校军的口号是：“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学生每天高唱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校军凡是让民间百姓担任挑夫和响导的，统统由政治部办理，给百姓报酬规定：每10华里付银4厘；并且从不敢以赊账方式买东西，而是全部付现金。东征誓师时，政治部就印发了《革命军之禁令》，其中犯有纵兵殃民、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者，阵中枪毙；强占民房、私买公物、擅封车舟、硬拉夫役、接受贿赂、包赌庇烟、藉势凌人、借端勒索、调戏妇女、吃食鸦片、强迫买卖、夺取禽畜者，处以监禁。校军出发后，沿途纪律严明，对百姓秋

毫无犯,堪称“仁义之师”。蒋介石知道,民心的背向,也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所以他在出征后除了不断下达战斗命令外,还不停地叮嘱黄埔官兵要严守纪律。他说:“这次我们出去打仗,一定可以杀灭陈炯明,肃清东江,因为我们处处爱护百姓,百姓也处处帮助我们,军队只要百姓帮忙,必打胜仗,这是天经地义,不能更改的。”“如有骚扰人民,违反军纪的,上自校长,下至士兵,都要枪毙,因为法律无情,能守法就是革命军,否则就是反革命军,人人都是可以杀他。”

校军宿营之时,只住庙宇祠堂,不住民房。政治部在每一处宿营地,都提前做好住地必不可少的粮食、蔬菜、油盐 and 稻草。每当部队撤走,政治部要求各连党代表必须派人将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捆好用过的稻草,归还所借物品,替百姓挑水,爱民如子,并发表《告百粤父老兄弟姊妹书》。其内曰:“有违反我们所宣传行动者,请不必客气,具实向我们的官长报告,定必依法严惩。”蒋介石、周恩来坚定地运用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充分鼓动士气,激励斗志,因而校军披坚执锐,所向披靡。东征中,黄埔一期毕业生桂永清,后来当了国民党的海军总司令,挂上将军衔。此人贪图小便宜,在战场上私自将缴获的细软装点邮回江西贵溪老家。案发后,蒋介石大发雷霆,曾动过杀机,认为这是黄埔军校第一耻辱。如果不是党代表廖仲恺宽仁厚道,为之说情,桂永清恐怕就人头不保。后来看他检讨深刻,又赔了赃物,便撤职查办了事。抗日战争中,桂永清在兰封战役中又差点丢了脑袋。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第一次东征打下淡水后,由于东征联军中的左翼杨希闵部、中路刘震寰部与陈炯明部之林虎早有勾结,其始终按兵不动,致使林虎得以从容集中主力两万余人,从兴宁、五华一带抄袭校军的后路。右翼军出师月余,深入敌后 400 多公里,后方补

给跟不上,陷入进退两难之境,敌我双方严阵以待,准备决一死战。校军2月20日从淡水出发,直驱平山、白芒市、赤石圩。此时陈炯明由汕尾败逃香港。28日校军与粤军第2师会师进驻海丰城,海丰人民夹道欢迎校军,农民争先恐后为校军运送物质弹药器材,县城举行祝捷大会;接着又攻克潮安,敌军逃至闽粤边界。3月12日,敌林虎率万余人向棉湖反扑,企图消灭东征军。林虎是陈炯明手下一员最得意的猛将,善于打恶仗,他以10倍于校军的兵力,死围不退,想一举歼校军于棉湖,以效犬马之劳。

蒋介石当即下达总攻击令,教导一团与敌万余人遭遇,随即被围,救援之部也先后被围。在此紧急情况下,各营、连独立作战,与数十倍之敌周旋拼杀。中午,敌前锋距教导一团指挥部仅300多米,惟有靠陈诚指挥的炮兵连援护,勉强支撑。战至下午,敌发动最后攻击,而教导一团指挥所只剩下10多人。在前沿指挥作战的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苏联顾问加伦将军都焦急万分。蒋介石急红了眼,下了死命令,令何应钦必须坚决顶住,不准后退。蒋明白,此役“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生死存亡,在此棉湖一役。

何应钦身为一团之长,深知千余官兵之生命全系于他一人之手,在目前与教导二团、粤军许济第7旅联系不上的情况下,只好情急生智,命令卫生员把团部所有的旗帜都插出去,紧接着把团部的警卫连以及所有人员组织起来,从正面阻击冲过来的敌人。敌军在旗帜林立、炮声隆隆之中顿生疑虑,徘徊顾盼,踌躇不前。此时,教导二团也自鲤湖疾趋增援,突击敌军侧背。一阵猛打,敌军抵挡不住,只好放弃“擒王”的奢望,败退而去,因此教导一团得以反败为胜。这时候,蒋介石、周恩来、廖仲恺、加伦将军都赶到一团指挥所探望。蒋当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名义，奖励该团 1000 元。加伦将军更为豪爽，当场解下身上佩带的短剑，赠送给何应钦。何应钦受此殊荣，直到日后当上了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他仍然念念不忘加伦的这柄短剑。

棉湖之役，是东征中第一次最惨烈的一场硬仗。校军士气昂扬，凭借以一当百之精神，以一团之兵力，抵挡住林虎、刘志陆等率领的近万人的进攻，以少胜多，以寡敌众，实为战史中所罕见。多年来，何应钦回忆当年的棉湖战役时说：“棉湖战役在今天看起来是一个很小规模的战斗，但在当时却是吃力的一战。那时的炮兵不像现在，有马匹或车辆的拉曳，那时的炮，要由人扛抬，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身为连长的陈辞修（即陈诚），不论步兵行军多快，他总是使他的炮兵跟得上，每次都能完成任务。虽然炮弹有限，但他弹无虚发，对促使这一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最有功劳的人之一，那时我就看得出他是一个勇敢沉着的人。”陈诚在棉湖战役中的确也大显身手，他不愧为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毕业的优秀军官。在团指挥所受围的严峻情况下，蒋介石问在身边的炮兵连长陈诚：“你几门炮难道都打不响吗？你自己为什么不亲自试一下呢？”

陈诚经不住校长激将，顿时鼓足勇气，就在团指挥所架起那几尊旧式七五山炮来，亲自瞄准，亲自拉火，真是老天爷助陈诚一臂之力，这几门刚才因发热而打不响的“哑”炮，竟然一鸣惊人，炮弹轰地一声冲出炮膛，一炮恰好打中了对面小河边陈炯明部密集的战壕；接着另几尊炮也相继响起来，打得敌人抱头鼠窜。这时，何应钦率部冲杀，忘了吃饭，忘了自己有羊痫疯病，居然大获全胜。

棉湖战役取得胜利，蒋介石高兴得手舞足蹈，马上兴冲冲地向陈诚宣布：“给炮兵连记荣誉功一次。”当别人赞不绝口颂扬陈诚在棉湖战役中建立奇功时，陈诚却谦逊地说：“我当时并没有

十分把握,也许是总理在北京暗中护着我们!”

3月12日,这一天是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黄埔校军在第一次东征中取得了棉湖战役的胜利,这一辉煌战果奠定了他们日后平步青云、获取庞大权力的坚实基础。以后每逢此日,蒋介石都要设宴,由何应钦出面组织参加棉湖战役的黄埔师生聚餐祝贺。也正是这一天的早晨9点30分,远在北京的黄埔军校总理孙中山,因晚期肝癌溘然长逝。1925年3月13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到黄埔军校,黄埔岛上师生一片悲声,代大元帅胡汉民下令降半旗致哀,全校师生停止操练讲课,一律臂缠黑纱表示悼念。为了避免影响东征军心,孙中山逝世的噩耗秘而不发,仅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几个上层领导人知道。蒋介石在3月13日,还大张旗鼓地向孙中山发出告捷电,但他这几天神色不安,朝夕惘惘,一个人偷偷地跑出指挥所,面向北方遥望,告祭总理在天之灵,叹人生苦短,前途艰险。

棉湖之役,校军教导一团千余人抗敌万余精锐,战后清点人数,伤亡近三分之一,全团9位连长,6位阵亡,3位负伤。王俊领导的第3营,战斗开始前,官兵385人,战后只剩下111人,营党代表、副营长阵亡,3个连长两死1伤,排长9人,还剩2人,1人还是重伤。仅仅一天的战斗,牺牲之大,可见一斑。3月15日,党代表廖仲恺在河婆向校军全体官兵讲话中指出:“本军将士此次为革命而奋勇的同志,得到这样的胜利,这是各同志平日受本党主义感化为人民奋斗的结果。我们革命军不过受了4个月的训练,而能得此成绩,可与黄花岗烈士媲美。”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也说:“棉湖之役媲美欧战,可以证明诸位对于中国革命能尽极大之义务,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了。”1925年3月28日的《商报》上,刊载过一篇战地报道,对黄埔军校教导团东征有过淋漓尽致的记载:

“初出茅庐的黄埔学生军教导团，尤出类拔萃，每战必克，每攻必举。……奋不顾身，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学生军之受人欢迎，初不在战功卓著，而其纪律，亦有足令人起敬者……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姬妇孺，喜而齐观。鸡犬不惊，商市安堵。入夜无公家空房，则扎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的革命军。而学生军聆此好誉，益自勉励，盖此右翼之长驱直入，遇危不乱者，实学生军之功居多。而粤军因有学生军之良好印象（亦足以励其进取之志一、激其奋）勇之心，此右翼大胜之原因也。林虎闻学生军奋勇善战，尝笑曰：咄！何物学生军，不过小孩子胡闹把戏而已，你们看我杀他个片甲不留。咄咄，何物学生军！不料林隐青（林虎）轻视学生军，出此狂言。适至潮汕失守，林虎军挥军反攻，以一万兵力包围学生军二千，卒被突围而出，得许济之援助，反败为胜，学生军奋勇追击，追敌千里，俘获林军团长黄济中一名，营、排长八人，枪支七百余支，俘兵士 500 余人。林始惊顾失色。”

3月18日夜，教导一团抵五华县城，进行分兵围击，适敌军连长出巡被我抓获用为响导。共产党员李之龙率部分士兵，假扮敌军进入五华城，敌军纷纷向兴宁、赣边逃窜。李之龙俘敌军参谋长以下数百人和大批武器弹药。3月20日教导二团攻克兴宁，黄埔一期生宋希濂是第4连1排长。他率先充当尖兵排入城，使敌军望风披靡，溃不成军，敌军头目林虎仅以身免。五华、兴宁之役校军教导团有营长刘尧宸等官兵 63 人负伤。4月11日，校军由兴宁进驻梅县，叶剑英被任命为梅县县长，第一次东征遂告胜利结束。在第一次东征中，黄埔军校官生阵亡 156 人，负伤 182 人。黄埔名将关麟征、侯镜如、唐星、甘丽初、孙元良、萧赞育等，都在东征中负伤。蒋介石在《黄埔第一期同学录》

的序言中叹曰：“而乃出征两月……阵亡及伤残废者，共计六百余人，以第一期随余出征五百之子弟，与教导团三千同志之军，死伤几达三分之一。言念及此，能不痛心！呜呼！吾校同志前仆后继，每于肉搏登城碧血淋漓之时，毫无恻怖状，浩然捐生，乐如还乡，其果何为而使然也？无他，总理主义之所感，而诸生精诚之所出也。”正是：英烈精神万古存，取义成仁浩气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孙良脱逃 蒋介石大义灭亲 总理逝世 胡汉民推迟报丧

话说黄埔军校成立教导一、二团后，立即参加了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淡水、棉湖之役，敌军林虎锐气受挫，陈炯明逃往香港，校军军威大振，娃娃军也成了气候。这是当时那些骄横不可一世的诸路军阀始料未及的。黄埔学生之所以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热情、旺盛的革命斗志、勇敢的牺牲精神，这是与黄埔军校两位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分不开的：一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校党代表廖仲恺；一是校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中共广东区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这两人是黄埔革命精神的缔造者。东征中，他两人战斗在最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斗志。但是，仅靠正面鼓励仍是不够的，革命的军队还需要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校规军法。“军令如山倒”，蒋介石制定了《革命军连坐法》、《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和《学生队学生遵守规则》。这是黄埔军校军事法规的典型，这些军事法规的拟订，是与军法处处长周恩来的领导分不开的。

蒋介石别出心裁制定的《革命军连坐法》虽然使周恩来等人感到过于严厉，但为了防止临阵退缩，却也无可挑剔，终于由军法处明令执行。按《革命军连坐法》规定，各级指挥官如擅自率部队退却，则杀该指挥官；如指挥官不退部下退，以致该指挥官阵亡，则杀下一级所属之指挥官。毛思诚著《蒋公介石年谱初

稿》中沿引蒋介石对学生的解释说：

“比方打仗的时候，上官没有命令，一班人同退，就枪毙班长，一排人同退，就枪毙排长，一连人同退，就枪毙连长，一直至于一营一团退下来，就枪毙营长团长。像这样说，所杀不过三五个人，似与士兵完全没有关系，其实不然，你不曾细思此法一行，就是百万兵士一时前进后退，我也都有查考，所枪毙的虽只几个人，不怕你百万人都退不得，你听我说这缘故。比方一团人同退，那司令官必定枪毙他的团长，如此团长见他部下退时，他决不敢退；若是他不退，必被敌人打死，我便要枪毙他的营长来偿他团长的命，如此营长也不敢退，营长不退，若被阵亡，他的部下连长都该杀，连长怕枪毙便不敢退；他部下排长怕阵亡了连长，司令官枪毙他，他也不敢退；排下士兵恐怕排长阵亡；一排士兵都要枪毙，便都护着排长不退。如此不是我军所死的只有阵亡的部下三五个人，便是百万人也要同心。哪个还敢轻先退去呢？”

蒋介石用杀头来治军，这与旧式军阀和作法一脉相承，但在战时用此非常手段也是情有可原的。淡水之役，打扫战场刚一结束，指挥部战士就把临阵脱逃的教导二团一营七连连长孙良押到了蒋介石面前。孙良如丧家之犬，浑身筛糠似地颤抖，耷拉着头，不敢见站在面前的表兄。孙良是蒋介石的一个远房表弟，黄埔建校时，孙良投奔表兄谋了个一官半职，本想光宗耀祖，升官发财，谁知刚上任不久就派往王柏龄领导的教导二团，参加了东征战斗。战场硝烟弥漫，枪声大作，孙良吓得魂不附体，只顾逃命，哪里还想到自己的一连官兵。孙良脱逃引起连内官兵极大的愤慨，终于在战斗结束后被连内一位士兵擒获，押送到东征军指挥部。

蒋介石见孙良押来，倏地从腰间掏出了手枪，气愤地说：“还有脸来见我！”

孙良自知性命难保,但心想你看在亲戚份上,也得手下留情。他抱着一线希望,泪流满面,苦苦哀求:“表哥,饶了我这一次吧!饶了我这一次吧!”

孙良见表哥怒而不语,脸色铁青,又双膝跪在周恩来面前求饶。孙良知道周主任平时关心部下,总是宽厚待人,希望周主任在表兄面前说说情。周恩来怒目相视,厉声道:“怯敌逃命,该当何罪?你身为黄埔军连长,罪更难饶。”

东征军刚刚进入战斗,执法不严,后患无穷。蒋介石想到《革命军连坐法》,临阵脱逃罪该杀头,于是把手一挥:“把他拉出去,枪毙!”

孙良是校军第一次东征时被军法论处的连长,而且又是蒋介石的表弟,《革命军连坐法》的第一个开刀对象竟然是孙良,令全军震慑。

同时,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因作战时敌情不明,让二团的炮兵误向自己部队轰击达一刻钟之久,造成不少伤亡;而在敌军反扑时又不知自己团营连的位置,几乎使一营被敌军包围歼灭。王柏龄虽然资格老,又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同在日本留学,但这位老兄实在太不争气,战斗打响后,又带着卫兵到老百姓家里忙着弄吃的去了,置部下于不顾。蒋介石亲自上前沿阵地督战,就离宋希濂所在连队不远的地方指挥。一会儿,吃得酒足饭饱的王柏龄气喘吁吁地跑来,面见蒋介石时自知有愧。蒋介石把脸一沉,气愤地吼道:“我叫你当的是团长,不是当连长!”当时王柏龄确实不知道他的几个营在哪里,只得毕恭毕敬挨了兄弟一顿臭骂。2月8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免去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职务,调校本部另行安排;同时晋升在淡水战役里攻城时受伤的教导一团一营营长沈应时为教导二团团长;提升蒋鼎文为一营营长。沈应时养伤期间,暂由钱大钧代理二团团长。王柏龄

虽然受了惩罚,但他毕竟是蒋介石的心腹,日后自然另有任用,在此不表。蒋介石用人标准历来是“举贤用不肖”,忠贤兼备,择优用之;忠贤不两全,则取其忠而不顾其贤。王柏龄虽然品节有亏,但绝对听话,毫无贰心,蒋介石撤了王柏龄的团长职务,这对东征有利,让他回黄埔军校再当什么官呢?蒋介石心中有数,留在以后再说。

且说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在黄埔军校告别了诸师生后,于1924年11月13日乘“永丰”舰北上,途中绕经香港、上海、日本,于12月4日抵达天津,住在张园。当晚他即拜会了张作霖,返回住所后即感到浑身不适,发冷发热,肝部阵阵作痛。宋庆龄、孙科日夜在总理身边照料。大家原以为总理这次北上,日夜兼程,舟车并举,沿途又发表演说,劳苦异常,到天津后正逢隆冬,与他长期在亚热带地区居住的气候变化太大,一时可能不适应,休息几天也许会好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肝癌已到晚期,生命垂危。孙中山是学医出身,本来应该抽时间去医院检查一下,但他忧国忧民,公务繁忙,哪有闲暇去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正当他抱病北上,辗转于途中时,北京的政局又发生了变化,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进入京城,段祺瑞临时执政,冯玉祥带兵退守南口。

这段执政卖国求荣,发表一通致外国使团书,胡说什么“外崇国信”,要尊重历年来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企图以此博得列强的欢心。12月18日,段祺瑞派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来到天津,孙中山在病榻上问:“听说段祺瑞打着‘外崇国信’的幌子,承认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否真有此事?”叶、许二人回答:“确有此事,但照会尚未送出。”孙听后勃然大怒,厉声斥责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

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为何还来欢迎我呢?”段祺瑞本来不赞成孙中山的反帝主张,故想派叶、许前来劝说,不想孙中山态度如此坚决,只好拐弯抹角地说:“先生说话最好能平和些,不要过激,免得引起列强干涉。”孙中山听后忿忿地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叶、许二人见状,只好灰溜溜地告辞返京禀报段祺瑞去了。

且说孙中山抵天津的第二天,他就打电报给广州的胡汉民、廖仲恺:“大病少苏,闻东江将战,复添系念。望诸兄努力破敌,以安内而言威信于外。引领南望,不尽欲言。”正在东江作战的黄埔校军官兵读此电报,无不感激涕零,同仇敌忾之心因而益坚,各将领更勇气百倍!东征捷报传来,孙中山不胜欣慰,精神为之一振,他嘱汪精卫“代电奖勉各将士,努力杀敌,以期三民主义之实行”。胡汉民、廖仲恺因孙中山病情转危,拟入京省视,孙中山致电胡汉民:“粤事重要,东江正有捷报,可勿来京。”又嘱咐何香凝:“仲恺不可离广东,请勿来京。”

1924年除夕,孙中山扶病人京。北京灰云密布,寒风凛冽,尘沙弥漫,数万群众手执青天白日旗在前门车站热烈欢迎孙中山的莅临。冯玉祥的代表、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生怕前门下车人多杂乱,不便保卫,特地赶到永定门请求孙中山在永定门车站下车。此刻的孙中山正躺在卧铺上,尽管面容憔悴,还是坚持到前门车站下车,以免辜负学生与民众的一番热情。孙中山没有向欢迎的群众发表演说,只用传单的形式散发了几万张《入京宣言》: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

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

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

来与诸君救国的。13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清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清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予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

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亦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地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孙文

1925年元旦,段祺瑞电邀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并派其子段宏业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前往北京饭店给孙中山拜年。孙中山坚决反对“善后会议”,并以召开国民会议促进会与之相对抗。正当孙中山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同北洋军阀坚决斗争的时候,无情的死神正一步步向这位革命先行者悄然逼近。1月20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体温忽升忽降,25日病势转危竟整日不能进食。26日下午3时,孙中山被送往协和医院,孙科、孔祥熙、宋子文、汪精卫和鲍罗廷在手术室内守候,协和医院院长命最好的大夫为孙中山作手术。在打开腹腔后,发现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面上长满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整个脏器已粘连在一起。主刀医生仅切下小块组织,就立即把腹腔缝合,化验结果证实孙中山患的是晚期肝癌。广州闻讯,国民党要员纷纷进京,张静江、李石曾见西药、放射疗法无效,建议请中医治疗。2月18日,孙中山迁居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寓所。在于右任、蔡元培、胡适的推荐下,请来北京名中医陆仲安为孙中山治病。陆仲安为孙中山请脉后,写述脉案:“惊惶忿怒,都伤肝经,血沸气滞,淤浊闭塞,转为肝硬,由硬而疽,日久成脓,升降之机失度,血气因之大耗……”根据病情,他使用了黄芪、党参等通调气血为主的药物。孙中山服后,脚肿

见消,诸症化顺。20日,陆仲安再次诊治,在处方内加石坏、石斛、野山人参等煎饮,病情好转,但不久就恶化。孙中山自知病情严重,对服中药本没有信心,但不忍拂众人之心。他已预感到死期将至,遂开始准备身后事宜。2月24日,汪精卫、孔祥熙、孙科来到孙中山榻前,面请总理指示数语。孙沉默良久,始张目谕曰:“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我如果是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那么我还有什么话可讲呢?”言毕又闭上了眼养神。在汪等恳求下,孙中山问道:“你们要我说话什么话呢?”汪答道:“我现在预备好了。”随即从衣袋里取出一稿,低声读着:“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孙中山静听毕,点首谕曰:“好的,我很赞成!”孔祥熙接着说:“总理对于家属可不可以照这个样子,说几句话呢?”孙中山说:“可以。”汪又取出一份文稿读曰:“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我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孙中山又点首说道:“好的,我也很赞成!”汪请求总理签字。这时孙夫人站在卧室外泣不成声,孙中山怕夫人悲痛绝望,说道:“现在还用不着,等几天以后再签。”3月11日,病状已濒临危急之境的孙中山忽然神志清醒,召宋庆龄、孙科、汪精卫于榻前,在场的宋子文取下孙中山女婿戴恩宥的钢笔,递给宋庆龄,由宋把扶着,孙中山用这支笔颤巍巍地在遗嘱上签了名。据何香凝回忆,签字时还发生过小小的风波,孙中山本来签下三份遗嘱,一是《国事遗嘱》,一是《家事遗嘱》,一

是《致苏联遗书》。这最后一份是由英文秘书陈友仁呈上,由宋子文念一遍,孙中山听后用英文签上自己的名字:孙逸仙。后来国民党右派戴季陶、邹鲁、吴敬恒等否认这份《致苏联遗书》的合法性,认为这是“共产主义者们在不为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擅自草拟,并且事先未作说明,而是在孙中山临终的时候才由何香凝提出来的”。3月12日上午,孙中山转侧频繁,状极不安,喉中哼哼作声。看护送来麦粥汤少许,已不能纳,多溢出牙床之外;天尚未明,喘愈甚,以手抚胸不止,人气甚微;早晨8点35分,看护再送牛乳来,已不能启齿。在京国民党要员先后应召云集行馆,9点10分,孙中山两目向上直视,呼吸更加困难,心跳每分钟只有18次,而脉搏则高达150次之多,精神疲倦,不能连续说四五字的话,只在弥留之际,微声断断续续说:“和平……奋斗…救中国。”9时30分,一代伟人孙中山溘然长逝。遵照孙中山的遗愿,当天上午11时10分,治丧处将孙中山的遗体从铁狮子胡同行馆运往协和医院设法保存,3日后施行内脏摘除及防腐手术,然后用棺木装殓遗体。3月19日,北京天色阴暗,助人悲凄,孙中山灵柩定于这天奉移社稷坛大殿,4月2日,再移至西山碧云寺停厝,4年后,举行移灵奉安大典,安葬在他生前指定的南京紫金山。

且说孙中山逝世的消息3月13日就传到了黄埔军校,代大元帅胡汉民虽然在广州和黄埔岛下令举行追悼会,但为了怕影响东征前线教导团的士气,他果断地电告蒋介石,决定将这一噩耗秘而不发,直到棉湖血战告捷,才在前线向官兵正式公布。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东征军将士对总理的死无不悲恸欲绝,嚎啕大哭,悲戚之状,溢于言表。俗云“哀兵必胜”。黄埔师生个个悲愤不已,其锋芒如新砺之刃,所向披靡。3月27日,校军一鼓作气攻克兴宁县城。蒋介石于3月30日在兴宁县北门广场

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及东征中阵亡将士的大会。教导一、二团官兵全部参加。追悼会由蒋介石主祭，周恩来立于其侧。蒋介石向全体官兵发表了《如何上慰总理在天之灵》的训词。他说：“我们自黄埔出发，到了兴宁，走了千余里的路，打了很多的大仗，激战非常勇敢，非常耐苦，这是何等精神！还要知道我们保护人民，就是实行主义。即使总理在此看见这样的情景，一定非常欣喜。但是现在总理虽死，他的灵魂在上，也是可以非常欢慰的，他的灵魂一定会来保护我们的。只要我们能努力奋斗，总可以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继而带领全体官兵宣誓：“我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党员，敬遵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谨誓。”

追悼大会主席台正中安放总理灵位，两侧有“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月”的巨幅挽联，横额为“高明配天，博学配地”。同时又挽东征牺牲将士联，曰：“讨逆立功先我死；冲锋摧敌世尽惊。”横幅为：“主义之花”、“革命结晶”、“死而荣”。蒋从这一天起，尊称孙中山为国父，1940年4月1日由国民党、国民政府正式定制。

第一次东征之役，黄埔军校一期阵亡学生有营长蔡光举，连长余海滨，排长叶彧龙、于步云、江世麟、刘赤枕、林冠亚、樊崧华等多人，他们的英名将永垂青史。

东征将士为悼念总理孙中山，写下了不少令人称道的挽联，尤其是黄埔军校，人才辈出，能文能武者，堪称一流，可惜当时无人记录下来，实为憾事。据称1929年6月1日，中国国民党将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运往南京时，全国为之哀悼。在北京南京所收录的1400多幅挽联中，由共产党创始人、国共合作的牵线人李大钊撰写的那幅长达214个字的挽孙中山联，可谓举世公认写得最好的一幅。如果用当今的眼光来评价，仍不失为“挽联

之最”。现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上联曰：“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子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下联曰：“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袭，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国家；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振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其对仗工整，气势磅礴，堪称当时在北京中央公园灵堂上最富感情的长挽联之一。

还有一幅长挽，详尽评估中山先生之煌煌业绩，居其冠者，竟达 256 字，其曰：

“天心太不仁矣，胡丧斯空前绝后之完人，揖让迈尧，征诛踵武，辨才优于邹孟，博爱广于墨翟，平等真于释迦，数千年专制威权，纯赖苦衷改革，旗张白日，初困雷乡，血染黄花，再挫南越，论到援宁救鄂，策划尤艰，光复汉山河，巍巍元首，敝屣尊荣，岂期约法无灵，群雄多僭名割据，珠江开帅府，挥泪兴师，利纯非所知，惟有鞠躬尽瘁死；

“国运亦奚衰乎，谁竟此三民五权之主义，克强早逝，松坡云亡，倾城深负公托，黄陂徒有公心，河间真与公敌，二万里共和乐土，渐成满目疮痍，神圣劳工，畴为主宰，职业政治，痛失导师，记得行易知难，学说不朽，淘溶新社会，眷眷同盟，仔肩责任，自愧壮怀虚抱，昔时曾受命陆危，行馆读遗书，服膺垂诫，精诚永相感，何容世乱苟全生。”

灵堂内外，挽联万千，最短的如“天地正气，民国元勋”、“国有以立，民无能名”、“一生革命，千载伟人”等仅8个字。

再说北京临时执政府段祺瑞发表了恤令，要举行国葬，而广东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按兵不动，目的是“养寇自重”。他们一听孙中山逝世，杨希闵就跑到香港去勾结英帝国主义，段祺瑞也派密使赴香港，以许诺杨希闵任广东军务督办，刘震寰在事成之后可分得广西地盘为诱饵，唆使其二人背叛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尸骨未寒，滇、桂军就公然不听广东革命政府指挥，纷纷向广州开拔，表明杨、刘的反革命叛变形迹暴露无遗。这两位军阀原本是借重孙中山的声望为自己打“江山”，他们在广东抢占地盘，擅任官吏，私定捐税，大开烟馆赌局，强令征收苛捐杂税，对百姓百般勒索榨取。杨希闵的口号是“有一分钱，打一分仗”，不给钱就不打仗。孙中山为了对付沈鸿烈叛乱，防止陈炯明、邓本殷的进犯，实行他日思夜想的北伐大业，才勉强依靠滇、桂军力量。如今孙中山溘然辞世，杨、刘喜形于色，磨刀霍霍，蠢蠢欲动。滇系军阀总头子唐继尧迫不及待地于孙中山辞世后6天，就不知廉耻就任副元帅职，诡称：“尔时军国大事，夙愿大元帅主持，未便遽膺崇秩；今不幸大元帅在京逝世，一切未竟之主张，皆吾辈应负之责任。”唐继尧企图取代广东革命政府，独占西南半壁江山的野心昭然若揭。杨、刘两人向唐继尧献媚邀宠，并拥戴唐继尧为西南盟主，且与唐于4月初订立了“在广州发动政变”的秘密协定。

5月中下旬，杨、刘分别以暗地潜人香港为借口，参加了由北洋军阀段祺瑞、英帝国主义买办之流在香港皇后酒店60号房间所召开的颠覆广州革命政府的阴谋会议，并冠冕堂皇地将滇唐之间的间谍、云南兵站总监马自祥迎来广州密谋，而且明目张胆地占领了广州市城北的狗头山、观音山等重要阵地，同时派兵

控制了广州电报局、汽车站、火车站、轮船码头等重要地段。广州危急,此时蒋介石已任党军总指挥,廖仲恺任党军代表,从广州赴汕头粤军驻地,与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研究如何平定杨、刘的作战计划,决定调粤军和驻防梅县的黄埔党军第一旅回师广州平叛。代理大元帅胡汉民是个傻瓜和懦夫,由于对时局认识不清,又怕得罪这些心怀鬼胎、貌合神离的军阀,因而他压根儿没有讨伐杨、刘的打算。等到事态发展严重。杨、刘兵临城下,胡汉民才不得不避到沙面租界,后又移到“永丰”舰上办公。5月21日,蒋介石率黄埔党军第一旅由梅县出发,粤军第一旅和第四师从汕头出发,同时回师平叛。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汪精卫5月8日从北京返回广东不久,即偕夫人陈璧君赴东征前线的潮州看望蒋介石,想拉拢蒋支持他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用李宗仁后来的话来评价:“这个人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之循吏有余,为乱世乾坤的领袖却不足。”他本人也无当大元帅的野心。许崇智虽为粤军总司令,又是大元帅府的军事部长,但他毕竟是军阀出身,在党国要人眼中,还够不上当大元帅的资格。再就是廖仲恺,他在党内颇有威信,与共产党合作亲密无间,但为国民党右派所不容,戴季陶、邹鲁、谢持、吴敬恒这批元老不会投他的赞成票。蒋介石虽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又参加东征,是右翼军指挥,但他在党内的资历浅,爬上大元帅宝座,暂时还有阻力。至于程潜、谭延闿、于右任、张继、林森这批要人,均不足以鹤立鸡群。因此,汪精卫与蒋介石两个人一拍即合,汪需要蒋的实力支持,蒋需要

汪的提携,而在争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角逐中,汪精卫自信能独占鳌头。为了夺取党、政、军大权,汪精卫的政治态度急速向左转:在言行上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同苏联顾问加强联系,积极支持工农运动;在军事上选中蒋介石为他的盟友。这样,孙中山的继承人,非汪精卫莫属。俗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汪精卫苦心孤诣求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被蒋介石取而代之。在杨希闵、刘震寰蠢蠢欲动之时,蒋介石一心经营黄埔军校,积极扩充势力,将东征军校军教导一、二团改编成党军第一旅,即国民党党民,同时于东征中报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通过,并于1925年4月授党军军旗。党军第一旅由何应钦任旅长,王俊任参谋长,由刘峙、沈应时、钱大钧、刘尧宸、蒋鼎文分别任1至5团团团长。党军组建党军司令部,由蒋介石任党军司令,廖仲恺任党军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率党军第一旅于6月6日抵达广州市外围。同日,廖仲恺以工人部长的身份,在中共组织的帮助下,策动广九、广三、粤汉铁路及两河近海船舶员工,同时罢工,以断绝杨、刘部队之调动,使滇、桂军无法集结。黄埔军校政治部以李之龙为宣传队长,选印讨伐叛军的宣传品16种,由航空队从空中散发。6月9日党军攻占石滩,12日占白云山。张治中率黄埔三期入伍生总队由猎德村渡河攻击广九铁路之敌,炮火击毙敌师长赵成梁,俘虏桂军师长陈天泰,叛军伤亡惨重。当日杨、刘逃往沙面租界,15日逃往香港。从5月21日至6月12日,为时23天,革命军平定了杨、刘叛军,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正是:东征四剑斩杨刘,扫除妖蠱靖人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势不两立 赤白系大动干戈 广州突变 廖仲恺遇刺身亡

话说黄埔军校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建的，从建校前的筹备、招聘师资以及招收学生，都由两党的精英参与其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黄埔军校内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内部两种思想及两种势力的斗争。

早在建校初期，国民党右派势力如戴季陶、邹鲁、谢持这批元老就极力反对国民党改组，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只是在孙中山的威望下，不敢公然对抗。孙中山在世时曾对这批元老进行过坚决斗争。他说：“你们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可以退出国民党，我就解散国民党，自己加入共产党。”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主张，才建成黄埔军校。最先挑起事端，兴风作浪的，当首推黄埔军校最早的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他看不惯共产党在军校内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对苏联顾问评头品足，在开学不久就与共产党意见不合而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去了。后来有人问周恩来：“戴主任对黄埔有哪些贡献？”周恩来答道：“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走得早。”此话一点不假，要是戴季陶留在黄埔不走，也许黄埔就是一家的天下了，然而戴走后，黄埔军校内部的两种对立的思想斗争却并没有停止，只不过这种斗争没有公开化，在学生中也没有形成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而已。当时国共合作是黄埔内部国共关系的

主流,共产党员的身份往往是秘密的,他们从进校的日子起,凡学生一律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因此,即使是入校前的共产党员,入校后也是国民党员。如一期学生李之龙、蒋先云、陈赓、王一飞等,都是跨党党员。校内两党的尖锐斗争,是在黄埔一期快毕业时,即1924年年底到1925年初才开始的,它的突出标志就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相继成立。前者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组织,后者则是一个国民党右派组织,两会针锋相对,势不两立。

国民党在黄埔军校设有特别区党部,后改为特别党部。国民党组织按行政组织编组,一个班编一个党小组,一个连编一个分部,机关各部处编为直属小组,统归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领导。特别区党部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1924年7月成立至1927年4月,3年多时间共改选了5届。第1届特别区党部选举了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为执行委员,其中蒋、陈为国民党员,其余3名为共产党员,以后各届中,国、共两党党员均有,直到1927年4月15日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国民党进行清党,中共党员才被迫相继离职,党务工作停顿。

再说中国共产党自从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后,凡在黄埔军校工作或学习的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中共在黄埔军校设有支部、特别支部和党团领导小组,统由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但在黄埔军校的中共组织并不公开,除像周恩来、金佛庄等少数领导干部公开中共党员身份外,大多数中共党员身份是秘密的。同学们互相探询党籍时,共产党员也是秘而不宣。国民党员当获悉某某是C.P时,往往说“这位同学是走马路的”,马即马克思。每逢星期日休假,共产党员去广州参加党的各种活动,事先总是三三两两相互耳语通知,约定到革命俱乐部相见,而且要说明是A、B、C三个

不同的集合点中的哪一个。“革命俱乐部”是集合地的总称,A是指广州市东皋大道1号番禺学宫农民运动讲习所;B是指省港罢工委员会;C是指国光书店。农讲所经常有讲演会、报告会,连C、Y(共青团员)升级转为C.P(共产党)的仪式也在此举行。由于到农讲所的,以湖南籍的最多,因而许多人把农讲所叫“湖南同乡会”,蒋先云、陈赓、宋希濂、郑洞国等便是常客。

中共黄埔军校第1届支部于1924年8月成立,蒋先云任书记,王逸常任宣传干事,杨其纲任组织干事,许继慎、陈赓任后补干事。在黄埔一期学生中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60多人,约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第二期入校后,中共党员有43人,到第四期时,仅一个政治班就有中共党员99人,占该班460人的四分之一,其中不少是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也积极地选派优秀党团员入黄埔。192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第62号通告:

各级同学们:

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名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同学及民校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

钟英白

1925年11月1日

这是一份秘密通知,“钟英”,是中共“中央”的谐音,意为中央告白;“各级同学”指“各级党组织”;“少校”指“共青团”;“民校”指“国民党”。由于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选派党团员报考黄埔军校,因此,从第4期起,共产党员学生日益增多。其中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如李运昌、林彪、郭化

若、曹广化、李鸣珂、李天柱、李逸民、陶铸、刘志丹、倪志亮、唐天际、伍中豪、曾中生、袁国平等都是黄埔第4期毕业生。

早在1924年9月，据周逸群回忆，商团叛乱发生前，蒋介石、廖仲恺根据孙中山的意旨，命令黄埔军校学生与各军取得联系，组织青年军人代表会。该会以团体为代表，成员有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粤军讲武堂、军政部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等，每个团体派两名代表参加，每周开会一次，由各代表轮流担任主席，会址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军人代表会还在广州设立青年军人社，有大多数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及进步学生前往该社参加演讲、联欢等活动。当时的口号主要是：“革命军人联合起来”、“拥护革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等。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后，觉得有必要对青年军人代表会加以改组，遂于1925年1月25日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筹备会。30日，该筹备会召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组成临时执行委员会。大会选出蒋先云、曾扩情、贺衷寒、何畏能4人组成筹委会。2月1日，在广东大学大操场隆重召开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到会各界代表近千人，廖仲恺代表黄埔军校、邹鲁代表广东大学致贺词，并当即起草了总章，发表宣言，选出正式执委，同时决定出版发行会刊《中国军人》杂志。《中国军人》创刊宗旨是：“团结革命军人，统一革命战线，拥护革命政府，宣传革命精神。”刊址设在广州市小市街88号，后移到大沙头，再迁至南堤二马路河南大本营。该刊以鲜明的革命性赢得了广大读者。青年军人在其感召下，纷纷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最多时达到两万余人。其中黄埔军校学生发挥了骨干作用，活动范围延展到在粤的军队和滇、桂、湘所设的军官学校，进而波及全国，影响了一代青年军人，使许多人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建立之初，不仅有左派参加，而且许多右派也加入，但终

因有孙文主义学会的出现,致使像贺衷寒、曾扩情这些人退出来,所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就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在黄埔军校官佐中有金佛庄、郭俊、唐同德、茅延楨、鲁易、胡公冕等;在学生中有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傅维钰、徐象谦(徐向前)、陈赓、王一飞、许继慎、左权、陈启科、黄鳌、李汉藩、杨其纲、袁策夷、刘云、张际春、王逸常、余洒度、周士第、阎揆要、彭干臣、王尔琢等。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许多人后来成了共和国的将帅。

贺衷寒、曾扩情等一批人退出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另立门户,这就是后来由戴季陶、王柏龄暗中支持的孙文主义学会。

且说孙文主义学会,它的前身叫中山主义研究社。1925年4月25日,孙文主义学会在潮州正式成立,那时候正处在第一次东征途中,参加的人数不多。第二次东征结束后,部队回到了广州。12月27日,孙文主义学会在魏芳廷家开了一次会,到会的有两百多人,12月底在广东大学操场上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负责人有戴季陶、王柏龄、贺衷寒、缪斌、胡宗南、潘佑强、杨引之、林振雄等。后来冷欣、桂永清、鄧悌、余程万、贾伯涛、曾扩情、杜从戎、蒋伏生、谢廷献、欧阳格、陈策、陈肇英、吴铁城也纷纷加入该会;上海方面由肖叔宇、段锡朋和西山会议派童理章、喻育之等也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广州互相呼应。

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之后,就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时常发生摩擦,明争暗斗,非常激烈。孙文主义学会打着研究三民主义、孙中山学说的幌子,专事攻击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学说。他们出版了会刊《国民革命》、《革命导报》、《革命青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出版,宣扬他们的戴季陶主义,攻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持助工农”政策。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平时专门监视学生中共

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活动,甚至深夜里偷窃共产党员的文件。有一次,孙文主义学会头目、军校管理处处长林振雄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共产党员李汉藩发生口角,林竟然拔出手枪向李开了一枪,幸未打中。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终以林振雄撤职、李汉藩记大过一次而了之。两会会员各自为“主义”“信仰”而互相争执,不仅舌战,而且在刊物上也针锋相对,口诛笔伐。当时黄埔军校流传着这样的佳话:“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蒋先云在《中国军人》刊物上发表文章署名“巫山”;贺衷寒发表文章就署名“君山”,硬要压过蒋先云。一天,一张漫画出现在黄埔校园中,画面上,戴季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疙瘩小帽,十分吃力地背着一尊孙中山的塑像,朝着阴森破败的孔庙走去。这幅漫画一针见血地揭出戴季陶主义的要害,企图将孙中山的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义篡改为封建腐朽的儒家学说。戴季陶怎么也没有想到,他那点受孙文主义学会会员普遍喝彩的货色,竟在黄埔军校的学生面前难以推销。为这幅漫画,左、右两派学生大打出手,互不相让。孙文主义学会的某些铁杆学生,诬蔑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拿钱买通的组织,弄得双方又动干戈。由共产党员李之龙等组织了一个“血花剧社”,在大操场演出《皇帝梦》,蒋先云演袁世凯,陈赓扮演五姨太,观众哄笑不止。忽然对面一阵锣鼓喧天,孙文主义学社亮出了“白花剧社”的兰布横幅,请来了四个舞女在台上扭腰卖弄风骚,有意扰乱会场。结果双方又互打起来,杜聿明、李仙洲从中调停,一场殴斗始告平息。孙文主义学会第一号打手要数杨引之,此人生性残暴,是黄埔学生中有名的“泼皮”,偷共产党员的文件就是他干的。东征途中,两会为了争夺宣传阵地,也常常大打出手。蒋介石闻讯大怒,认为两军对垒之前,自家人却先打起来,这成何体统! 于是一道命令下来,贺衷寒被撤职查办,李之

龙调回黄埔本校,各打五十大板,贺衷寒当然挨的板子重些。东征从广州出发,一直进发到潮梅,因而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也一直摩擦到潮梅。第二次东征时,双方在广东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又打了一次大架。1926年4月7日,蒋介石发布了取消党内小组织的校令,两会同时解散,由黄埔同学会取而代之。从此,有“赤黄埔系”与“白黄埔系”之分。正是: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

且说1925年乃多事之秋,孙中山逝世不久,上海又爆发了工人大罢工,帝国主义分子与军阀勾结,制造了“五卅”惨案。6月23日,黄埔军校学生与广州工人举行示威,遭受英军及其炮舰射杀,发生沙基惨案。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7连排长文起代,三期学生钟煜光、郑逢良、刘著录等11名在惨案中殉难。接着东征军平叛杨希闵、刘震寰骚乱。黄埔军校学生安心在课堂听讲的时间少,在战场真枪实弹打仗的时间多。

7月1日,广东军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当上了主席,成了孙中山的正式接班人,党军正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在国民政府成立不久,被称为“代帅”的胡汉民原本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不满,只是慑于孙中山的威望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如今国民政府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心胸狭窄的“代帅”因大权旁落怀疑是苏联顾问与中共方面做了手脚,由此而迁怒到廖仲恺身上。为了准备国民政府选举,胡汉民寓所总是宾朋满座。除了西山会议派的主角戴季陶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攻击国民党左派外,骂得最凶的当数胡汉民的党弟胡毅生,此人是极右分子,在广州经营了一间类似俱乐部性质的“文华”。这里是右派聚会的地方,他们常在此聚赌吃喝。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出资几十万元收买凶手企图谋杀廖仲恺,国内的右派分子、无

聊政客、失意军人也与之呼应，频频聚会，密谋策划。

7月初，广州市东山胡汉民寓所里，邹鲁、伍梯云、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拯民、孙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余和鸿等密谋暗杀廖仲恺的计划，已初步拟出。一个月后，位于珠江畔的海珠酒店二楼左角，胡毅生与朱卓文喝得酩酊大醉。朱卓文边喝边骂娘：“廖仲恺撤了我的县长职，他妈的！非干掉他不可！”胡毅生边满酒边说：“杀了他，不仅可解兄弟一箭之仇，也是党国之幸！”何香凝那几天也听到有人要谋害廖仲恺的消息，劝他要多加防范。谁知廖仲恺不以为然，他说：“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想到谋杀我，很可以装扮成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防备也是没有用处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就在廖仲恺讲这番话不久，暗杀之事就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早晨，廖仲恺偕夫人何香凝乘车到惠州会馆中央党部开会，中途遇上陈秋霖，因陈要找廖，廖就让陈上了车。车刚开到中央党部大礼堂前，廖、陈先后下车，就响起了枪声。何香凝还以为是谁在放爆竹，等她一转脸，就看见廖仲恺已倒在血泊中，陈秋霖痛楚地挪着步子，也倒下去，身边卫兵也受伤躺在车边。这时她才意识到有人行刺，便立即俯下身子抚着仲恺，此时仲恺已不能答话。接着又是一阵枪声，子弹从何香凝头上嗖嗖地飞过，如果不是她迅速弯下身子，那也会中弹身亡。何香凝将廖仲恺架起来，只见他衣服上满是鲜血，还未到医院，就断了气。几天后陈秋霖也死在医院里。廖仲恺身中4弹，

终年 48 岁。正在省城军校办事处的蒋介石获悉廖仲恺遇刺后，即刻赶到现场，分开众人，抚尸大哭。蒋介石目睹此惨状，联想到自己不久前遇刺一事，于是决定大动干戈，彻底清查。

刺杀廖仲恺的凶手陈顺被当场击伤。从他身上搜出一些单据，按日期顺序，早几天的是当衣物的当票，后几天的是分钱的单子。这证明此人并非阔老，而且很穷，是在重金收买下才干此伤天害理的勾当的。据凶犯交代，这次行刺事件，是朱卓文一手布置的，另有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林直勉等人参予其谋。嫌疑人还有张国桢、梁士锋、招桂章、杨锦龙等。

刺杀廖仲恺，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联合广东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左派进攻的信号。右派本想杀一儆百，造成恐怖气氛，把革命势力压下去。但事与愿违，廖案激起左派和黄埔师生无比愤慨。人们称廖为“黄埔慈母”，生前他为创办黄埔军校，东奔西走，呕心沥血，吃尽了苦头。同时廖的遇害，也激起省港工人的愤怒，群众纷纷要求追查凶手。廖案发生的当天，蒋介石以卫戍司令的名义，宣布广州戒严，并命令何应钦率领部队控制广州观音山制高点，防止突变。国民政府组成了“廖案检察委员会”，周恩来、杨匏安等共产党人也参与审案。后经查明，暗杀行刺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他们在胡汉民家开了数次“倒廖会议”，并接受了香港政府 200 万元的贿赂。其暗杀对象不仅仅有廖仲恺，连蒋介石、周恩来都列入黑名单，还有邹鲁、林直勉、许崇智、吴铁城以及其他右派成员。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英国人许诺，事成之后，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广东省长。

8 月 25 日早晨，蒋介石命令黄埔教导第 5 团由黄埔开进广州市，捉拿罪犯。然而主要罪犯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已逃往

香港,只抓住了林直勉一个人。林原是孙中山的秘书,在廖案中因查无实据,被驱逐广州了事。蒋介石对梁鸿楷早就想除掉之,此次发现他与英帝有勾结,就先下手为强,将梁逮捕,顺势解除梁的军权,部队被收编。凶手陈顺不久死亡,涉嫌者多与胡汉民、许崇智的部属有关。由于未抓到主犯胡毅生、朱卓文,案情扑朔迷离,所以廖案审理最终未有重大突破。

在廖遇刺后,周恩来赶往东山医院看望何香凝及其子女廖梦醒、廖承志,整整两天两夜未回家。原本与蒋介石商定8月20日晚11点动手搜捕凶手,结果因戒严时间提前到9点,口令也临时改了,未果。当时周恩来驱车到司令部去时,门卫突然喝问口令,随即开枪,司机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周恩来机警地卧倒在车座下,才幸免于难。周恩来命陈赓追查,才始知上司有令:口令不对可立即开枪。周险遭不测,让刚到广州的邓颖超颇为吃惊。

且说元凶在逃,买的打手毙命,廖案涉嫌者皆许崇智部属,近而又牵连到胡汉民的堂弟,这使蒋介石左右为难。俗云:“趁火打劫。”孙子兵法中也有“乱而取之”的谋略。当年被称为孙中山麾下“三杰”的廖仲恺遇刺身亡,逐鹿中原的对手只剩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自然同意汪精卫的意见,于8月25日将胡汉民押解到长洲要塞司令部软禁起来。9月8日胡以养病为由获释,后又以“出使苏俄”为名,从黄埔港登上俄国“蒙古”号轮船,灰溜溜地被排挤出广东。汪精卫除掉了“代帅”,心中暗自窃喜,只要他表面上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牢牢依靠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这把交椅是坐定了。

蒋介石对他的老上司许崇智并不手软,他以纵容部下刺廖涉嫌为由,于9月19日深夜将许崇智软禁。20日晨包围许崇智的许济、莫雄两个师,一弹未发,便使之缴械投降。同时,蒋介石

派人给许崇智送去他的亲笔信，信上历数许的罪状，强令其卸职并要求他“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否则，许之“革命之生命告终”。信的末尾并有“皇天后土，实所共鉴”字样。许崇智看信后，连给蒋介石打了两次电话，蒋不接。没有办法，许崇智只好吞下这杯“苦酒”，接下陈铭枢送来的赴沪船票和两万元现金，于当日下午3时登船离开了广州，悄然去沪。后来，蒋介石大权在握，想起在许崇智手中的那封言之凿凿的许诺信，不免有些后悔。张静江看出蒋介石的心事，便在蒋、许之间穿针引线，由蒋又送去一大笔钱，算是给这位把兄弟的一点意思，并将原信索回。不料原信回到蒋介石手中时，他发现每张信纸的四角都有图钉的痕迹，这表明许已把信照了相。原信虽退回，但因为把柄仍握在别人手中，所以蒋介石想起此事，就怏怏不乐。后来许崇智对人说起此事，笑道：“知蒋者莫如我也。我就要让他晓得我手中有信的照片，到时候我问他要钱，他不敢不给！”许崇智被蒋介石礼送出境，一封信就释了兵权，皆缘于许是军界前辈，手中握有兵权，又是蒋的顶头上司。蒋最大的障碍就是许崇智，如今利用“廖案”落井下石，也就顾不得结拜兄弟，海誓山盟了。

胡汉民和蒋介石之间，还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权力争斗。那是1931年2月28日，蒋在其寓所将胡扣留，3月1日送南京汤山软禁。其原因是蒋要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胡则主张党权高于一切，后来在舆论压力下，被迫放了胡。胡汉民反蒋也反共，1935年11月，胡汉民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1936年5月因脑溢血逝于广州。

许崇智被迫离开广东后，曾任过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副院长，1965年病逝于香港，享年78岁。

言归正传。且说蒋介石通过“廖案”，他所得到的东西是很

多的。在驱胡倒许后，促成了蒋汪联盟。许崇智手下的亲信如广东财政厅长李鸿基、军需局长关道职以“侵吞公款，接济反革命军队”罪而被逮捕；梁鸿楷的军队已被收编，处决了张国桢；通缉朱卓文、魏邦平；许崇智的一班人马被打得落花流水，为蒋介石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取代许成为“军界领袖”；国民党元老辈的右派也因涉嫌“廖案”而纷纷离开广东革命政府，使蒋介石这位晚辈能进身到国民党领袖位置。这真是一箭双雕，连他自己也料始未及。

1936年，朱卓文化名朱玄鼎办了一份《中山日报》，称：“在廖案发生之前的一星期，曾有将鲍罗廷、汪兆铭、廖仲恺等一齐暗杀的计划，但被获悉情报的公安局长吴铁城所制止，以致未能实行。”这消息后来由日本人古屋奎二撰写的《蒋介石秘录》收入。何香凝认为，当时身为公安局长的吴铁城是对廖仲恺的遇害负有一定责任的，他在中央党部开会时为什么没有门岗，最大嫌疑犯朱卓文漏网，这又是为什么？何香凝还怀疑：廖仲恺身中四枪，三枪伤口较大，查明是大口径手枪射击的结果，这与凶手陈顺手持手枪口径是一致的，而另一处伤口较小，应是小口径手枪所射，但凶手没有这种枪，这又是为什么？廖仲恺那天开会原本定为上午9时，一贯反共，又经常到胡毅生处去玩耍的邓泽如却很早就来到中央党部，所以这小口径手枪伤口，也许是邓泽如的卫士所打。

廖案迄今仍是一桩悬案，除张国桢处决、凶手被击伤致死外，其余案犯均未缉拿归案，以后竟不了了之。胡毅生逃到上海后，还公开发表《告国内外同志书》，矢口否认与“廖案”有关；朱卓文逃跑后长期隐名埋姓，一再表白“廖仲恺骤遭阻击，实为民众最后之裁判”，坚决否认自己参与谋杀活动。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又是共产党的朋友,无产阶级同路人,他的死,使广大黄埔师生极为悲痛。9月1日出殡那天,参加执绋的达10万人,从惠州会馆到驷马岗的道路两旁,停立着肃穆的人群,真是哭声震南海,悲泪洒羊城。中国共产党为廖仲恺遇难唁电国民党,表示沉痛哀悼,并给予廖仲恺以崇高的评价。周恩来、恽代英亲自撰写悼文,称颂廖仲恺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继承者”,是国民党中“最急进最不妥协”的领袖。

廖仲恺灵柩暂厝广州东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内,迨至1934年3月,由南京国民政府迎灵柩至南京天堡城山下明孝陵右侧正式国葬。解放后,广州市和归善县(今惠阳)分别建造了廖仲恺先生纪念碑,1982年又在广州创建了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以追思这位对民主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革命家。正是:黄埔慈母虽死犹生,驱胡倒许一箭双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血战惠州 陈明仁率先登城 虎落华阳 陈赓冒死救校长

话说蒋介石刚借廖仲恺遇刺事件，替汪精卫清除了“代帅”胡汉民，反过来又得到汪精卫的默许，礼送他的把兄弟许崇智出境，一箭双雕，皆大欢喜。因而汪、蒋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1925年9月14日，由汪精卫继廖仲恺出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并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批准，从此汪、蒋在党、政、军方面进入最高权力决策阶层，他们的话一言九鼎，连国民党一批元老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当时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讨伐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国民党左、右两派斗争尖锐。陈炯明趁机纠集起东江、粤南、北江各路反革命军队约4万多人，重新占领了东江一带。在英帝国主义分子支持下，他伺机再度兴兵威逼广州，一举捣毁广东革命政府，企图重温广东霸主旧梦。9月27日，陈炯明的先头部队已攻占距广州仅150公里的平山，广东国民政府岌岌可危。

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匆忙之中作出二次东征的决定，9月28日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原党军已于国民政府成立时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由包惠僧担任，当时有前方主任、后方主任之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下辖两师，何应钦为第1师师长，王懋功为第2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这次东征，以第

1军和第4军为主编成3个纵队,分别由何应钦、李济深、程潜担任1纵、2纵、3纵队队长,采取中央突破的办法,直捣陈炯明的老巢惠州。10月1日蒋介石率领东征军从广州出发,9月抵达惠州附近,10日扫荡了惠州城外之叛军,11日开始准备攻城。

且说惠州城坐落在东江左岸,三面环水,一面临山,飞鹅岭横亘于南,形势险要,且城高10米,石头砌成,易守而难攻,城外有4米深的护城河,相传自唐代以来,有37次攻城的尝试,无一次获胜。《惠州县志》形容惠州之险势曰:“铁练锁孤身,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不忧。”惠州是由陈炯明手下的一员土匪出身的骁将杨坤如所镇守。杨坤如率部3000多人在城内修筑碉堡,加固城防;东西两城7座城门均用铁皮包裹,圆木顶死,里面还填满石块、柴棒及泥土,固若金汤。第一次东征时,由于桂军刘震寰心怀鬼胎,暗中私通陈炯明,何应钦对惠州围而不攻,未克惠州,实为遗憾。此次东征,蒋、何两人都抱有不克惠州就不见广州父老之志。攻城之前,蒋曾给杨坤如拍电报劝降,但杨以为蒋攻城信心不足,于是更加负隅顽抗。

蒋介石亲临惠州召集部属制定攻城计划,并组织攻城敢死队,共650余人,每10人为一组。敢死队交2师4团团团长、原黄埔军校教官刘尧宸带领。刘团长向敢死队员训话,激励斗志。刘是共产党员,第一次东征棉湖时,他任营长。在何应钦被重敌围攻之时,他率部直扑和顺司令部,在紧急关头助了何应钦一臂之力,因而名声大震,棉湖之战结束后,以军功升任团长。攻打惠州挑选第一军战斗力最强的2师4团,这是由于这个团中共产党员较多,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蒋先云、陈明仁等这些未来的将军当时都身为连长,他们均参加了敢死队。10月13日上午9时,东征军开始攻城,蒋介石的指挥所及炮兵阵地设在飞鹅岭附近的小山上。第1军第4团、7团、8团,是攻城部队的主

力,北门是攻击的重点,当天环攻一次,没有奏效。在炮兵营长陈诚的指挥下,11门山炮分别从北、西、西南三个方向轰击惠州城,两门野炮集中攻击第4团将要攻占的北门,一发发炮弹命中目标,打得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杨坤如以三千一色英式优良装备的兵丁凭险据城固守,火力交叉扫射,杀伤力很大。东征军野炮虽然击崩了城北一带的墙垛,但主攻部队冲到城下后,由于敌以机关枪扫射,我军伤亡依然惨重。当时第4团团团长刘尧宸、副营长、共产党员谭鹿鸣等相继阵亡于北门。战士轮番一次次冲锋,营长杜从戎、冷欣又负伤。敌人除用机枪、步枪、手榴弹进行还击之外,还把石灰、滚木、燃烧的火把和烧得滚烫的焦油一齐向城墙下倾泻。敢死队再三逼近城墙根,终因封锁太严,云梯、人梯无法攀登,而攻城暂时受挫。黄昏时分,攻城部队极度疲劳,遂下令暂停进攻,并撤回防地进行整休。其间从3师调兵进一步充实了4团攻城的力量。

14日凌晨4时,何应钦再次组织部队向城墙上的顽敌发起攻击,又受挫,敢死队员伤亡过半。蒋介石在指挥所急得像头狮子,暴跳如雷。他不断地喊:“何应钦,你一定要把城攻下来!”连说了几遍,又提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参谋长胡谦对攻城失去信心,要求蒋介石放弃攻城的作战计划。然而周恩来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却力主攻打,认为一旦放弃攻城,则前功尽弃。何应钦与苏联顾问分析敌情后,决定暂停进攻,等太阳偏西,阳光刺眼时再作攻城打算。下午3时30分,何应钦调来8团投入战斗,由他亲自在北门前担任攻城指挥。炮兵再次向北门城墙轰击,边打边将炮位向前推进,直移到距敌400米处,才对准敌城防指挥所发起一阵猛轰。蒋介石亦到前方督战,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向城墙逼进,攻城敢死队携带梯子组成链条式的进攻。在12挺机枪的猛烈火力掩护下,共产党员率先向城墙靠拢,前仆后

继,斗志高昂,蜂拥而上。陈明仁当时是连长,因营长阵亡,他把带领的4团临时组编为7个队,冲锋陷阵,死伤严重。在最关键的时刻,他拿着一面旗子,命令一个号兵跟随在身后,吹着冲锋号,高举着旗帜,勇猛向前。号兵阵亡后,陈明仁浑身是胆,又在两名战士的簇拥下,决心爬城。4时许,陈明仁终于一跃面登上城墙。他先以手枪射击敌人,接着抛掷手榴弹,吼声、枪声连成一片,杀声震天。最后将青天白日党旗插上城楼的最高处。第4团官兵在一片冲锋号声及战士吼声中,终于登上了北门城墙,后续预备队也迅速跟进。前后历经40多个小时的战斗,这个号称“东江门户”的惠州城被一举攻克。陈赓入城后,一马当先,追击逃敌,突然一块弹片打中了他的脚跟,他晃了一下,一咬牙将弹片拔了下来,也顾不上瞅一眼,又继续冲上前去。杨坤如见大势已去,遂无斗志,带卫队匆匆而逃。

惠州城攻克,蒋介石一扫昨日之愁云,立即向广州国民政府报捷,电内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惠州夙称天险,有宋以来,从未破城,今为我革命军一鼓攻克,虽将士奋勇用命,亦我先大元帅在天之灵有以佑之。从此努力前驱,肃清逆氛,指日可期,吾党前途大放光明,除抚辑地方外,捷电以闻。

俗云:“一将成名万骨枯。”蒋介石惠州破城,共伤亡官兵400多人,黄埔第二期同学伤亡占一半。刘尧宸团长率领的40名战士攻城,仅17人生还,该团12个连长都是共产党员,死伤多半。事后蒋介石也承认:“名城虽克,实不能偿本校精华之损失也。”惠州城是用黄埔官兵累累白骨、滴滴碧血换来的。

话说蒋介石在前线督战,突见敌军败退,青天白日旗在城上飘扬,欣喜若狂地问:“手持大旗,第一个登城的是谁?”参谋长答

道：“你的学生陈明仁。”蒋对陈明仁是很熟悉的。陈明仁乱世从军入了程潜主办的军政部讲武学校，因为他带头转学进了黄埔第一期，所以左权、刘咏尧、肖赞育、李默庵、刘戡、李文这批学生才集体并入黄埔。为此陈明仁还挨了讲武学校校监周贯虹的三百大板。此次攻城有功，蒋在庆功会上命令吹三番号向陈致敬，并由连长升为营长。

且说陈明仁从惠州之役一举成名后，少年得志，心高气傲。如果他入黄埔军校前不是成了婚，蒋介石还有意当月下老人，介绍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与他成亲哩！因此，在提及该事时陈只好用“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妻不能忘”这句话来委婉推辞了之，这越发受到蒋介石的器重。陈明仁不当陈世美，更加思念在家从小患难与共的爱妻谢芳如，向爱妻寄去了自己的奖状、功勋证书。

陈明仁，字子良，1903年生于湖南醴陵，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先后任排、连、营、团长，后在陆军大学深造，曾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参加了抗击日寇的九江会战、桂南会战，并在滇西和缅甸北部给日军以重创。抗战初期，他一枪不发，为蒋介石智取了川南8县。他曾因为军容一事与蒋人吵一场，愤激之下，竟失掉陆军中将的金领章。当时蒋盛怒，斥他侮辱领袖，要将其法办，后经滇省主席龙云说情，才得以“宽宏”。陈明仁从预2师师长调到71军就任副军长，一干就是两年，直到1943年，才兼昆明干训团副教育长。在打通中缅公路的迥龙山战役中，他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从此扬名海外。1946年他随蒋介石参加内战，因死守孤城四平达40多天，受到蒋嘉许，擢升为国民党7兵团司令。1949年8月4日他与程潜在古城长沙通电和平起义。起义后，他来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19日，他陪毛主席游览了天坛公园。走到祈年殿前，毛主席

停步说：“陈将军，我们俩来单独照个相。”陈明仁恭恭敬敬地和毛主席照了张双人半身相片。照完相后，毛主席对陈明仁说：“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又说杜聿明被共产党五马分尸了，王耀武被剥皮凌迟了。开完政协会，你可到济南看看他们，将实际情况向外宣传解释一番。”“好，我一定照主席的意思去办！”陈明仁答道。毛主席又说：“你还可以把我们合影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同学，只要能送到的，统统送一张，让他们看看。后天21日，我们新政协就要开会了，各方面代表人物都有了，惟独还缺少蒋介石黄埔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就都全了！”陈明仁听到这里，非常感动。政协会议一结束，他按毛主席的嘱咐前往济南，看望了昔日黄埔同学、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和王耀武等人，并把他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分赠给他的师兄师弟，勉励他们好好地改造，重新做人。

陈明仁起义后，先后任湖南临时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兼55军军长。1955年，这位国民党陆军中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上将军衔。陈明仁是比较开明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将领，会带兵打硬仗。解放战争中，他与杜彪决战四平街。四平之役结束后，他感慨万端地说：“我当了二十年丘八，从来也没有打过这么硬的仗。”究竟陈明仁与林彪在四平如何较量的，他又是如何弃暗投明、授封上将的，他的结局如何？在此暂且搁笔，留在以后慢慢道来。不过，陈明仁在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是比较敢碰硬的一员悍将，毛主席曾宽怀地安慰过陈明仁，说：“两军相战，各为其主嘛，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

言归正传。且说第二次东征拿下惠州城之后，于10月16日上午，东征军在惠州第一公园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重申第二次东征的伟大意义。下午，全体官兵在第一公园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攻城阵亡的将士。国民政

府追赠刘尧宸团长为陆军中将，并抚恤其家属大银 5000 元。这次攻城之激烈，画家梁鼎铭数年后画成《惠州之战》的油画，其复制品现存台湾。追悼会上，周恩来在悲痛的心情下发表演说：“孙总理之志愿，第一统一广东，第二统一中国，第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现在可以说刚起首，才达到总理遗志的一点。我们要想现在有第一军的力量，已有这样的成绩，假使能够把各军都化成和第一军一样，那么广东统一就在目前了，进一步就可统一中国……”

10 月 17 日，东征军稍事休整，即乘胜分左、中、右三路挥师继续东进。

话说东征军从惠州分头进军时，蒋介石以及东征军总指挥部，随谭曙卿所率领的第 3 师出发。谭师在打下惠州后，居功骄傲，以为可以一举荡平潮汕，于是轻敌冒进。10 月 27 日下午，蒋介石一行到达距五华县华阳墟 10 公里的羊高墟时，谭师长送来急报：“今晨 4 时出发，7 时半在塘湖地区遇敌。敌有人马万余，抵抗顽强。职部兵力，尚嫌单薄。恳请调兵向梅林、龙村两翼增援，以期一鼓歼灭。”蒋见此急报，觉得很蹊跷，怎么所向无敌的东征军还要求增援，莫非中了敌人埋伏。原来，谭师懵懵然陷人敌丛后，遭到凶狠强悍的林虎属下黄任寰部的突然猛扑，因力量悬殊过大，战至中午，第 3 师被重重包围，谭师牺牲了自团长以下的官兵近千人，其中 1 名团长、1 名代理团长、8 名党代表、8 名连长，这是第二次东征以后革命军牺牲最惨的一次败仗。蒋介石得讯后，立刻命令 4 团连长陈赓前去第 3 师传达命令：“坚决抵抗，不准退却。”谭见令后曾组织反击，蒋介石也赶到华阳督战，但兵败如山倒，敌林虎部从侧面袭击，枪声大作，谭师复又大溃，同时，总指挥部的人员也被冲散了，情况十分严重。蒋介石命令陈赓：“你代理

第3师师长,立即收容溃散的官兵,重新组织抵抗。”由于第3师系粤军许崇智部新近改编,素少训练,所以一败涂地,溃不成军,纷纷后撤是必然的。蒋介石目睹此现状,立即明白,无论是谁,纵有天大本事也难扭转此败局。乐极生悲,也许是惠州攻城首战告捷,头脑过于发热。俗云“骄兵必败”,眼前的事实完全出人意料,“谭曙卿害苦我也”。蒋介石心中暗自心悸,他的自尊心简直无力承受这种打击,想到追兵在即,顿感前途绝望。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蒋竟然想到死,他悲伤地对陈赓说:“我唯有自杀以成仁,否则无颜再见父老百姓!”陈赓蹲下来劝慰道:“校长,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这仅是一个新编过来的师,你是总指挥,考虑的应该是战争的全局。这里太危险,请校长赶快离开!”说完,陈赓一边指挥部队对追兵进行阻击,一边果断地背起已经茫然不知所措的蒋介石,向安全地带撤离,来到几里外的小河边,又护送蒋过河逃出险境。这时天已黄昏。

且说何应钦、周恩来率领的第1师,于10月23日占领公平墟后,25日进至河田,26日占领河婆。当第3师受挫于华阳时,何应钦急欲策应,但顽敌林虎部在华阳得手后,趁势南下,同退守棉湖一带的洪兆麟部,分三路转攻第1师,使他分不开身。蒋介石此时焦躁不安,指挥部的东西丢个精光,连他爱不释手的书如《孙子》、《拿破仑战史》、《胡林翼全集》以及《曾国藩全集》等也被卫兵丢弃了。蒋介石惊魂甫定,急着要和第1师取得联系,可是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谁都不愿揽这苦差事。蒋介石用目光询问总指挥部的几位军官:“我要同何应钦他们取得联系,你们谁辛苦一下,去送个信。”军官们面面相觑。又是陈赓一步跨了出来,表示接受任务,蒋大为感动。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他说:“那好吧!只是你太辛苦了!”他想到陈赓背他的情景,觉得陈赓是可信赖并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从这里到合浦约

160华里,而且渡过西枝江便是陈炯明盘踞的地区,中间还隔着一座莲花山脉,土匪出没,虎豹横行,陈赓道又不熟,其困难可想而知矣。再说蒋介石命令第二天上午10时前必须将信送到,从现在起,仅有一晚时间。

蒋介石写好亲笔信,嘱咐陈赓:“你装扮成农民,一路上要多加小心!”陈赓化装后摸黑上路,身上带了50块银元,提了一根木棍消失在远方。山路崎岖险隘,丛林深邃莫测,陈赓虽从小在湘军当兵,但毕竟只有22岁,对疲劳、饥饿、双腿疼痛尚能克服,最怕的是可能随时遇到敌人、土匪或老虎。果然不出所料,只听一阵梆子声,接着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划破寂静的山林。“干什么的?”突然有人拦路盘问。陈赓知道这是“山大王”,只要“留下买路钱”就可放行。他沉住气答道:“赶路的”,边说边从口袋里掏钱,笑咪咪不见半丝惊慌:“帮帮忙,我有急事。”一个“土匪”说:“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一定是个当兵的。”这些“土匪”原来不过是附近逼上梁山的农民。陈赓也不隐瞒,承认自己是广州来的革命军,现身负重任,请山大王放行。一个头目听说陈赓是革命军,当即将钱退还了一半,还用一张纸划了个圆圈,再点上几点,说此是他的手令,再遇他的兄弟,见这符就会通行无阻。陈赓终于在次日下午1时赶到河婆。何应钦、周恩来见信,立即派一支部队前往,把蒋介石接了回来。后来陈赓将这段趣事绘声绘色讲给蒋介石听的时候,蒋介石也听得十分入神。他告诉陈赓,这叫作“盗亦有道”。据说陈赓一夜飞走160华里,机智应付“山大王”,背着校长一口气跑了几里路,这些传奇故事广为流传。在尹家民著《蒋介石与黄埔三杰》一书中就有“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的赞誉。陈赓冒死救校长后,蒋介石立即调他任侍从参谋,可以随便出入蒋介石住所,乃当时第一“近臣”。如果陈赓是个贪图功名富贵之人,以他的才华,以蒋

介石的性格脾气,陈赓早青云直上,成为蒋介石心腹之心腹,嫡系之嫡系。但东征指挥部不久移畸庐,蒋住一楼,周恩来住二楼,陈赓也住二楼。

有一天,陈赓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发现一本花名册,像是黄埔官佐简历表。他看见每位共产党员的名字上都有一个红圈,而在陈赓的名字下则注曰:“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陈赓自问:校长竟对共产党员如此防范,我这个侍从参谋又能干多久呢?一气之下,第二天他就托词母亲有病,请假回湖南探亲。蒋等陈返回时,随即委任他为黄埔军校中校队长。陈赓于是被削去了进入侍从室的特权。在就任黄埔军校队长之前,蒋介石虽对陈赓是共产党员感到遗憾,但他还是做了最大的努力,劝陈脱离共产党。陈赓斩钉截铁地说:“这不行!”蒋劝道:“陈赓,有些事情你还无法了解,你年轻有为,何去何从,将决定你一生的命运!”陈赓回答:“校长,你不是说,三民主义同志和共产主义同志非联合不能完成国家革命,为什么要分开呢?我不明白。”蒋说:“你不要钻牛角尖,我说过许多话,几乎每周都对你们训话,我不能一一记清。我明白告诉你,一切共产党分子迟早要退出国民党,你还是早下决心为妙。怎样?”陈赓终于选择了回老家探亲的道路。

且说陈赓原名陈庚康,字传瑾,1903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龙洞乡泉湖村,6岁读私塾,13岁入湘乡东山高小就读,14岁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毅然弃学从戎,投湘军第2师3旅6团当兵,18岁升为上士,参加护法战争、驱张(敬尧)战争及湘鄂之战,亲眼见到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后便弃军到铁路上当了职员。在长沙他报考了毛泽东、何叔衡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经易礼容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底,陈赓受

党组织委派，考取广州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黄埔军校成立后，他与陈明仁等离开讲武学校，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他的带动下，讲武学校 100 多名学生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为第 6 队。这批学生如丁德隆是国民党第 37 集团军中将总司令；陈大庆是台湾“国防部”部长、陆军一级上将；陈明仁是国民党 1 兵团中将司令、解放军 21 兵团司令，授上将军衔；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兼第 2 纵队司令员；蔡升熙是红 25 军军长。他们都在国、共两党军界举足轻重。

陈赓在黄埔军校曾做过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工作，团结进步青年，及时发展革命力量。他还接受了周恩来的领导，在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作斗争中，机智勇敢，谈笑风声，出奇制胜。在半年前的平叛杨、刘军阀的战斗中，他奉命渡珠江到沙面侦察敌情。当时陈赓脱掉军装，换上西服，坐船北渡沙面，船刚划到江心，对岸敌人突然响起了枪声。划船的渔家姑娘吓得脸色煞白，不知所措。陈赓却从容自若地安慰渔家姑娘说：“不要怕，子弹是长眼睛的，不会碰咱们过路人！”姑娘终于稳住了神，把船划到了沙面。陈赓在沙面找到了接头地点后，又进入了广州闹市。他见叛军正在沿路散发反共、反革命传单，就顺手捡了一大捆。以后每次出门侦察敌情，他都装成散发传单的人，遇到滇军搜查时，他就故意把传单塞给他们。这东西简直比通行证还灵，使他在敌人的关卡、哨所畅通无阻。经过 3 天的侦察，陈赓将叛军的兵力、装备、阵地部署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并绘制了详细的地图，为消灭叛军立了头功，这引起了蒋介石的第一次注意。陈赓快要在黄埔军校毕业的时候，正遇上广州商团叛乱。1924 年 10 月 15 日凌晨，蒋介石下令炮击西关，打了六发炮弹，火势蔓延开来，商团军被迫西撤，陈赓被编在 14 人组成的机枪队里，追击逃敌。忽然从墙脚闪出一个人影，陈赓躲避了一下，又立即追赶过去厉声吼道：“站

住！开枪啦！”那人影露出身来，原来是一个商团军小头目，两腿吓得发软。几个学生上前抓住他，开始搜身，只在口袋里找出一把小梳子。陈赓不信，问：“手枪呢？”小头目撒谎说：“枪丢了。这个皮套慰劳你们吧，还有一把军刀，也送给你们。”陈赓抓起军刀斜挎在肩上。这时，蒋介石和几名卫兵骑着马冒雨走了过来，陈赓立正，将缴获的军刀双手递上。蒋介石刚要去接，那个小头目挣脱看守，一个箭步冲到马前，哗地抽出刀向蒋介石砍去。陈赓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小头目的手腕，脚下一绊，将小头目放倒。这时马也受惊，扬蹄嘶叫，一下将蒋介石掀翻在地。蒋挣扎着爬起来，重新骑上马，愤愤地说：“我死都不怕，还怕摔么？”蒋介石转过脸，温和地拍拍陈赓的肩膀，笑着说道：“很好，干得不错，要严惩这个刺客。另外，我要转告金佛庄队长，嘉奖你！”蒋介石落马，陈赓第一次救校长的命。

第二次东征，蒋介石在华阳遇险，陈赓第二次又救了校长的命。蒋介石是在上海十里洋场打过滚的人，江湖义气在他身上有明显的烙印，睚眦必报，快意恩仇。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疗伤时不幸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蒋介石念他有“救命之恩”，不忍杀之，遂亲自接见，许以高官厚禄，软化劝降，但他没有屈服与动摇，5月初在党组织以及宋庆龄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的积极营救下，终被救出，然后去了苏区。陈赓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于1926年7月北伐誓师大会后，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组织群众搞武装暴动的经验。翌年2月返回上海，在唐生明警卫团任特务营长，实际上是担负着中共中央的警卫工作。1928年4月，陈赓腿伤初愈，党组织派他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化名王庸，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负保卫中央机关安全，搜集重要情报和进行反间谍斗争等工作。长征中他一直随中央纵队，任干部团团长，那时才33岁。据杨得志回忆，陈赓性格豪爽开

朗,豁达坦率,生活上可以说不拘小节。就餐时,他能和战士抢肉吃;休息时可以夺警卫人员或者老乡的烟袋,作“吐烟圈”的游戏。有时在大庭广众下和他夫人随便开那种别人开不出来的玩笑,甚至在毛主席作报告时,跑到台上去喝毛主席缸子里的水。指战员们非常喜爱他,信任他,尊敬他。陈赓是共和国大将,他的传奇经历以后再详细道来,暂且不提。

言归正传。且说蒋介石在华阳逃险后,10月26日东征军占领河婆,30日,何应钦、周恩来率师与二纵队会合,两军夹击,敌败走安流双头。随后,第3师前来助战,敌在双头被东征军四面包围,除小部分敌人逃往汤坑之外,林虎主力全歼,俘4000余人。11月1日,洪兆麟领兵5000余人袭击留守河婆的第1师1团,东征军反击,伤洪兆麟大腿,残军分头逃窜。11月3日,第一军再克潮州、汕头。当晚8时,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首先入城,汕头群众夹道欢迎,街巷为之堵塞。5日,蒋介石率总部进驻汕头。李济深的第二纵队、程潜的第三纵队也于11月上旬进抵梅县、饶平、大埔地区。至此,东江地区全部平定,陈炯明彻底失去东山再起的凭藉,第二次东征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国民政府消除了来自东面的威胁,广东局面蔚然改观。国民政府为了纪念黄埔军校在两次东征及其他战役中的牺牲者,在1926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两周年之际,修建了平冈东江阵亡烈士墓。正是:东江一战歼陈逆,烈士英名贯长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何迷之有 中山舰事件揭密 排除异己 李之龙蒙冤撤职

话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合谋在广州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以后不到三个月，即于1925年11月间，国民党一批右派元老林森、邹鲁、张继、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在这个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上，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因反对共产党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者分别恢复党籍”等反革命决议。以后他们又在上海成立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更有组织地进行分裂破坏活动，这就是当时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的祖师爷就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戴季陶，其主张后来称之为“戴季陶主义”。他的理论被权威化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这两本书比较明确地阐述了他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是拓展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孙中山说成是继承孔子的儒学道德家，把三民主义说成是继孔子之后两千年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强调团体的“排拒性与独占性”，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戴季陶本人虽想参加西山会议，却遭到一批老右派的反对。老右派们认为他参加过共产党的筹建活动，是国

民党的叛徒。戴无可奈何地返回上海。看来读者有点奇怪,怎么不让西山会议派的祖师爷参加西山会议呢?原来国民党元老中的右派也有新老之分,他们认为戴不过是蒋的代言人,对他还信不过。黄埔军校以汪柏龄、贺衷寒、缪斌、胡宗南、潘佑强、杨引之为首的一批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不遗余力地宣扬戴的主张,认为戴季陶讲的“共信不立,互相不生;互相不生,团结不固”乃绝顶高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鹊巢鸠占,孙中山等人辛辛苦苦组建的国民党,会被共产党取而代之。戴季陶一再宣扬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作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的。”

东征已结束,蒋介石与周恩来同住在汕头市联兴里适宜楼。一天,蒋突然邀周参加一个在潮州西湖饭厅举行的一次军官宴会,到会的有连以上军官及党代表。在宴会开始前蒋说道:“本人虽为三民主义之信徒,对于共产主义之同志,敢自信为最忠实同志。”说完,向周恩来举杯示意。周恩来说:“为第一次东征以来死伤的百余人,为第二次东征阵亡的 597 人,祭酒!”蒋介石不喝酒,只是文雅地撕着鸭肉吃,何应钦输了拳也不抵赖,俯首贴耳地喝酒,惟有苏联顾问,他们酒量极大,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并翘大拇指连声称赞道:“无论中国将来怎样变,你总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向来不畏酒,他与邓颖超结婚那天,就喝得醉成烂泥,本是洞房花烛夜,却叫新娘子守了个空房。事隔若干年后,每提起这件事,邓颖超就大笑不止,深有感触。周恩来与何应钦打起了通关,输了拳就痛快地干杯,赢了就严肃地举起杯等待对方喝酒,他那执行酒令时的坦荡襟怀,全场军官无不为之喝彩。

酒过三巡,蒋介石见周恩来似醉非醉,认为火候已到,起身走到周身边,挽住他的手臂,领着他来到门口,小声问:“请你把

军中和校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我,我看一看。”蒋以为趁酒兴周一定会和盘托出,谁知周恩来为并没有醉,笑道:“哎哟,这么大的事,我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你先等着吧,我去把那半瓶酒喝了再说……”宴会结束,蒋、周乘船返寓所。事后,周恩来有所警觉。他想:蒋介石要共产党员名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于是召开黄埔特支主要成员会议,介绍宴会情况并提醒大家:“蒋搞突然袭击,大家应提高警惕,更严峻的斗争就会到来!”

的确,蒋介石在开始处心积虑,苦思冥想如何解决共产党在军中日益发展的威胁问题。黄埔军校内 C.P 究竟有多少,无从统计,但他估计最多不超过两千人,像李之龙、陈赓、蒋先云、许继慎、周逸群这些学生,都是出类拔萃的。就是在军队中,共产党员也占据重要位置:国民革命军为准备北伐扩充为 6 个军,6 个军的军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蒋的嫡系第 1 军是他的看家军,3 个师的党代表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在 9 个团的党代表中,有 7 个是共产党,仅在第 1 军,共产党员就达一千多人。如果从舆论上搞垮共产党显然是不可能的,只得另想办法。

在 1925 年 12 月,蒋介石又召集第 1 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团结问题,并提出《调和党争办法》。他既未采纳西山会议派的主张,国共分家,也不愿看到周恩来在黄埔发展共产党员,喧宾夺主。经过再三思虑,他来了个折衷调和,规定校内共产党的活动均应公开。因为总理准共产党员跨党,而未准国民党员跨共产党,然亦未言明不准,所以本校亦不禁止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但须向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声明并请照准。

1926 年春,在国民党右派策动下,黄埔军校进行了党籍甄别登记。这次登记却规定有双重党籍师生只准保留一个党籍,

不准跨党。蒋介石从周恩来嘴里没有诱出来的共产党员名单，他想从《调和党争办法》中弄到手，从而迈出了分共的第一步。

接着，蒋介石开始寻求一个突破口，但由于国民党“二大”的召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会上占绝对优势，有五分之三的代表是中共党员因而一时难以如愿。在大会开幕前几天，周恩来从汕头来到广州，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商定了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扩大左派的策略，并且拟订在大会上宣布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回击“准备叛变，但尚未公开背叛三大政策的新右派”。蒋介石从第1军中撤出中共党员，另组国共合作部队。然而，总书记陈独秀否定了周恩来的建议，并派张国焘任国民党“二大”中共党团书记，来广州执行他的妥协退让政策。共产党虽然退让，而一批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二大”会场却到处散布“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等谣言，以蛊惑人心，煽动反共。当时蒋介石耳朵里也有各种传闻：如“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账，说蒋介石有贪污”、“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这些谣言看似荒唐，但对于生性多疑的蒋介石来说，却是危言惊心。

蒋除了与周恩来有矛盾外，对苏联顾问在北伐问题上也有分歧，而汪精卫未通过他就任命李之龙为海军局中将局长，更是使他难于忍受。王懋功在二次东征时留守广州，以第1军2师师长身份代理广州卫戍司令。这个靠出卖许崇智而投靠革命军的军官，最近与汪精卫走动颇勤，这使蒋介石老大不快，早就想寻找机会给王懋功一个下马威，苦于找不着借口。1926年2月26日清晨，2师师长王懋功带着4名卫士，登门到蒋介石住的东山公寓。刚上台阶，从旁窜出七、八名士兵，不容分说，下了他卫士的枪。王懋功大吃一惊。那天他见蒋也未见着，一名副官走上来告诉

他：“蒋先生要我通知你，你已被解除职务，这里是3千块钱，一张船票，马上离开广州。”王懋功刚接过钱和船票，又听到那位副官补充一句：“蒋先生说你的处境危险，为了保全你，你最好立刻动身！”当时王懋功心里摸不着底，只得含着泪水退出蒋的官邸。蒋介石惯技重演，廖仲恺遇刺时，他就是以这种方式逼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他认为王懋功是广州卫戍司令，先要断了他与汪精卫的联系，免得日后生变，这叫做“船票释兵权”，比起“杯酒释兵权”来说，当然化费要大些。不久，李之龙又把蒋介石的把兄弟、虎门要塞司令的走私活动向汪精卫报告，汪知道陈是由蒋的保荐而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便下令将陈肇英撤职查办。蒋闻讯后气得七窍生烟，更加对汪精卫抱有成见，他对汪插手军队愤愤不平，尤其是提拔李之龙更为不满。蒋介石经过三思，决心向身兼数职，一时红得发紫的李之龙开刀，以此为突破口，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打击了共产党、挫败国民党左派及苏联顾问季山嘉的锐气。这就是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这一事件又称“广州事变”或“三·二〇事件”，中外史学界还有人将此案列为“千古疑案”。

且说3月18日晚，蒋介石打电话到李之龙寓所。说黄埔港发现走私海盜，速派军舰来黄埔待命。李之龙放下电话，海军学校校长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给他送来一封海军局的公函，公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禱。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

三月十八日

李之龙遂用笺纸写了两张命令：一交宝璧舰舰长，一交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命令略云：“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19日早晨，宝璧、中山两舰先后抵达黄埔。因蒋介石不在黄埔，章臣桐即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并请示任务。邓演达说不知此事，可稍待请示蒋校长。蒋接到邓的电话时，竟说自己不知道此事。未几，海军局作战科邹科长报告说，苏俄参观团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向蒋介石请示后，当晚中山舰返回广州。

傍晚，中山舰启程返广州的同时，蒋介石在卫队保护下，从卫戍司令部来到越秀南路火车站附近的第1军经理处。在这里，他开始导演了一场国共分裂的好戏，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发动突然事变。他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命令全城戒严，派惠东升带领一团兵力，配合广州市公安局的武装警察包围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和共产党机关及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其卫队枪械；又以保护为名包围汪精卫寓所，派蒋鼎文率部占领海军局，解除其武装，命令缪斌、贺衷寒拘捕黄埔军校及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并秘密监视教育长邓演达；再派陈肇英于20日凌晨3时，冲进李之龙的住宅，把李之龙及新婚不久的夫人潘慧勤从床上拉下来，拳脚齐上，一顿毒打，然后将李之龙押解到第1军经理处，由徐桴处长审讯。这时陈肇英也公报私仇，吩咐士兵：“校长命令，把这个王八蛋再捆紧些，然后押到造币厂，校长要亲自提审！”李之龙无故受冤，硬逼他承认“中山舰”是共产党阴谋劫持蒋介石到海参崴去。李之龙愤慨地说：“这是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中山舰是奉命行动，并非暴动。”周恩来在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上午10时，接到包惠僧的电话，为营救被捕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卫士驱车赴黄华路造币厂。惠东升部缴了周恩来的卫

士的枪。周恩来义愤填膺，质问蒋介石。蒋张口结舌，只好命令惠东升把武器送还周恩来的卫士，令东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马文车送周恩来出门。周恩来接着驱车去看望汪精卫。汪在养病，获悉住宅被“保卫”，气得把电话筒摔在地上。他受刺激后，病情加重，面色苍白地躺在客厅的一张帆布床上，见周恩来进门，颇为费力地坐起来，气喘吁吁地说：“我是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黄埔军校党代表，蒋介石有何权力在广州宣布戒严、调动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他事先也不向我请示报告，这不是造反吗？”汪精卫怒火冲顶，眼前一阵发黑，头晕倒床，长久不语。周恩来见此情景，原打算同他商量对策的，也就打住，心想：你汪主席这么弱不禁风的精神状态，怎么能斗得过蒋介石。

周恩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事件发生后，极力主张对蒋进行反击，但遭到苏联顾问和陈独秀的反对。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之子陈延年气得顿足道：“老头子，老糊涂！”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当时任黄埔军校四期连长的陈赓丝毫不知风声。张治中找到他，叫他表明一下政治态度，陈赓仅从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那里获悉：一支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军队正由陈继承带领，要在黄埔登陆；支部决定动员军校四期师生不许陈继承登陆。大家一致推选陈赓负责，带两连学生沿黄埔岛巡逻，严阵以待。刚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教官的聂荣臻，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是公开的，理所当然也在蒋介石排除的名单之中。3月20日那天正是星期日，一大早他到广州去办事。船到广州时，经过中山舰旁边，看见不少共产党员被软禁，互不讲话，到下午就释放回去了，广东区委空荡荡不见人，原来大部分人已疏散。张治中、邓演达闻讯怒发冲冠，张治中当然不知道蒋介石已派人秘密监视他。张治中质问蒋说：“校长这种做法，是否顾虑到一般革命同志的信仰和一般革命青年的同情？”蒋神色不动，反而

温言抚慰道：“事情已解决了，没有什么，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没有问题。大家好好地干吧！”两人出来后，邓演达望着张治中说：“你真冒失，真大胆！”张治中是“红色教官”，但并非共产党员，而他那嫉恶如仇的脾气容不下蒋这么胡作非为。

李之龙的行动全是奉命而为，一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找不到任何“罪证”，但仍被囚禁不放，直到北伐前夕，才恢复了李之龙的自由。

3月2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送上了一个呈文：

为呈报事，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兵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项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尽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令派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幸赖政府声威，尚称安堵。惟此事起于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察核。谨呈军事委员会。

蒋中正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这份至今仍存广东省档案馆的呈文复制件，说明中山舰事

件是蒋介石独断专行和多疑善嫉的“杰作”。虽然蒋介石造谣说“中山舰擅开黄埔，图谋不轨”，但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只好释放除李之龙以外的全部被扣共产党员。当时被捕的黄埔军校著名共产党员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高语罕、李合林以及苏联顾问，这次都领略了蒋介石的“关怀体贴”，因而他们不得不离开黄埔军校。高语罕劫后写下一首诗，最能表达那种被逐者的悲愤惆怅心情：“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高语罕后来写了《一封公开的信致蒋介石先生》，虽然字里行间有将蒋介石奉承到九重天的嫌疑，但信中也暗隐讥讽，批评也是锋芒毕露的，这与6月4日陈独秀发表的《给蒋介石的一封信》比较，显然没有那种软弱无力的退让心态。陈独秀在信中一迭连声地要求蒋介石对“中山舰事件”讲出实情，拿出证据，使蒋介石难堪之极。陈独秀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错误，不在于写了这封公开致蒋介石的信，而在于当“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未能引起警惕，组织力量，发起有效的反击，过于追随听从共产国际和苏联顾问的意见。他的软弱，使得黄埔军校和第1军的共产党员含泪告别了黄埔校园及军队，让蒋介石的阴谋得逞，达到了他“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的目的。

话说李之龙也非等闲之辈，他字在田，号赤显，1897年12月10日出生于湖北沔阳县杜家窑乡李家垵的一个农民家庭，祖辈务农，父亲李国元当过商店伙计、小职员。李之龙1912年考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对文化艺术也感兴趣。他曾组织剧社，创作剧本，《叶老爷现丑记》就是他创作的一出讽刺封建官吏的新话剧。对该剧他自扮角色，化装上街演出，由于观众很多，曾遭到反动军警的追查。1913年仅16岁的李之龙就参加了李烈钧领导的“讨袁”战争。1916年秋，李之龙入烟台海军军官学

校学习军事,并广泛接触《新青年》、《每月论坛》等进步刊物。1921年6月,烟台海校领导非法克扣军饷,激起师生员工的不满,李之龙挺身而出,发动停工罢航,结果被校方开除军籍和学籍。

1921年8月,李之龙在上海结识了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同年底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兼中山舰长,同时晋升为中将,全权负责海军工作,成为当时广东革命政府惟一掌握海军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共产党人。对此,欧阳格就想方设法要除掉他。王柏龄、缪斌、贺衷寒、欧阳格等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大肆造谣中伤李之龙,说:“共产党阴谋暴乱,要推翻国民政府,唆使中山舰开赴黄埔,开起火炮,企图轰击军校,劫走蒋介石,送往海参崴转莫斯科,事态万分严重……”遂导演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为掩饰“中山舰事件”真相,被迫于1926年4月14日释放了李之龙,把协助他制造这次事件的海军舰队临时总指挥欧阳格免职并予扣留,免去王柏龄22师师长职务,撤销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的职务,责令离开广州,免去吴铁城新编17师师长和广州曾在中学边教书边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后受中共武汉区委委派在湖北全省工会联合会负责联络工作,参加了著名的“二七”大罢工。1924年初,李之龙任中共汉口地委执行委员。国民党“一大”后,他奉命调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的英文翻译兼秘书。黄埔军校成立后,党组织派他人校参加第一期学习,仍兼任鲍罗廷的授课翻译工作。李之龙精力充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博得了党代表廖仲恺的好评,毕业后被留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1925年1月,他和蒋先云、陈赓等人正式成立血花剧社,并参加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1925年10月,李之龙调任广东国民政府海军政治部少将主任,是当时黄埔一期毕业生中军衔最高的。以后他又升任代理海军局长、参谋厅长、公

安局长职务。“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的第一次行动。蒋本人说：“你们若要知道此次事变的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吧！”1974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魂归西天，他的日记已公布出来，但这是作了处理的，不是原始日记，有待史学家进一步研讨。但可以肯定，即使蒋介石日记原文面世，也不可能再藏有什么准确打开此谜的钥匙。其实，蒋介石早已露了底，在他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驰海参崴，送往俄国。”

这叫不打自招，何迷之有？可怜李之龙成了冤大头，“中山舰事件”乃是蒋介石疑心恐惧心理支配下遽然发生的事件，说是偶然，也是必然，历史终于能澄清一切迷雾。邓演达是“黄埔四凶”之一，他在事件发生后，当着蒋介石的面毫无顾忌地指责道：“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蒋介石还未遇到如此尖刻的反驳，他只好把气吞在肚里。对这位教育长，他既爱惜看重人才，又不会拿“原则”迁就他。邓演达以后也走上了李之龙的道路，那是后事，暂且不提。

且说李之龙蒙冤被监禁，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极力主张对蒋介石反击，但遭到苏联顾问和陈独秀的反对，因而未能采取积极措施。李之龙才华出众，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留校在政治部工作，东征时当连党代表、营党代表，后又擢升至海军局代理局长。少年得志，鹤立鸡群。他在东征中与贺衷寒大打出手，结果被蒋介石各打50大板，一纸调令要李之龙回黄埔军校另作安排。李之龙恃才傲物，生活作风浪漫，爱讲排场，新

婚燕尔,金屋藏娇,经常走汪精卫的门子,因此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嫉恨,也使共产党内部对他的为人处世评价不一。他曾一度受到党纪处分,陈独秀还一度怀疑李之龙加入了反动派,没有积极采取营救措施。他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中山舰事件”过后,一切恢复平静,惟独仍将李之龙关押不放,后来由于即将北伐,国共两党要一致对付北方的军阀,才将李之龙释放了。他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他协助邓演达做宣传工作,兼任新剧团主任,率领文艺队伍随军出师广东、湖南、江西。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总政治部筹备成立中央人民俱乐部,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李之龙为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兼《血花日报》社社长。李之龙自编自演了许多文艺作品,尤其是新剧、话剧,倍受群众欢迎,如《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山河泪》、《此恨何时灭》、《国魂兮归来》、《二七惨案》等,配合了北伐战争的进行。

大革命失败后,李之龙从武汉秘密转往上海,又到广州与爱妻潘慧勤及女儿们同住在岳父家中。他装扮成香港商人,从事兵运活动,遵照党的指示,秘密策动海军官兵起义。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李之龙被迫东渡日本避难。1928年2月6日,李之龙从日本经香港回到广州与家人团聚,不幸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当晚被捕。两天后,他的死对头、驻广州国民党海军第4舰队司令陈策以“策动海军叛乱”罪名,将李之龙判处死刑,时年31岁。李之龙就义前,给爱妻潘慧勤留下一封遗书:“我革命的义务现在结束了,不要悲伤。希望你把孩子抚养成人,继承我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生前,李之龙撰写了《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一文,揭露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罪行。一代英才,牺牲在“蒋校长”手下,实为恨事。

多少年后,蒋介石的心腹王柏龄多次得意地谈起1926年3月20日凌晨3时发生的事件时说:“中山舰之事,烟幕也,非真

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事已清楚,历史公案应当了结矣。

以“钦差大臣”出面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张国焘,代表陈独秀专程于“中山舰事件”后的4月初来到广州,解决国共纠纷。在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上,张国焘横蛮压制陈延年,说他太不冷静;对周恩来则说:“报告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介石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会后,张国焘由周恩来陪同乘船抵黄埔岛,与蒋介石晤谈。张国焘主动寻找妥协办法,摧眉折腰地说:“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蒋先生的,希望彼此仍然精诚无间地合作,使广东的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到全国统一的革命愿望。”蒋介石表示了类似的意向,然后以无可争辩的口气直截了当地提出:“为了避免中山舰事件之类的误会再度发生,我希望共产党人退出第1军和黄埔军校,否则要交出名单。”张国焘当即表示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并虚心求教,询问对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如何安排。蒋介石即将北伐,他说:“黄埔中的中共党员都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今后也一定重用他们。”虽然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但为顾全大局,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正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整理党务 蒋介石大权独揽 不准跨党 黄埔生分道扬镳

话说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掀起了反共的第一个浪潮，为国共交恶作了初步尝试，同时也打击了国民党左派力量。汪精卫这位一身任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三个职务的国民党最高领袖，事前一无所知。他的官邸周围密布着警卫，名为保护，实为软禁。他真不知道蒋介石目的何在，一气之下，称病拒不会客。他对蒋目无主席的潜越行为大为震怒，认为这是“造反”。他曾要求国民革命军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几位军长“把军队撤出广州，以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搞法”，但没有得到各军军长的积极支持。苏联顾问团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山舰事件”的意见也不一致，张国焘采取妥协态度，这使汪精卫感到自己已无法行使职权。

3月23日汪声称“病了”，要到外地就医。25日，汪表示“不再负政治责任”，然后他的行踪不可察，一个堂堂的国民政府主席就此“失踪”了。汪精卫当时是被公认的国民党左派，黄埔军校学生看到许多共产党员被捕和党代表被迫离职，非常痛心和不满。他们在校园内外张贴“打倒新军阀！”的标语，质问蒋介石：“校长要我们真诚团结，请问我们的汪党代表哪里去了？”弄得蒋介石面红耳赤，无话可答。汪精卫无奈采取的借病愤然去职的行动，也确实给蒋介石造成某种压力。但蒋介石知道，汪的

“失踪”表明在他的前进道路上又清除了一个“政敌”。为了抵消汪精卫被迫离职造成的不良影响，蒋介石也耍了一个“以退为进”的花招。他向军事委员会提出“自请处分”的呈文，同时分函给各军军长和宋子文，说他也要“休养”，请他们“促汪即出山”，然后带着他的亲信陈立夫跑到虎门怡然自得地去观海景去了。

且说汪精卫。此人大名鼎鼎，老百姓都知道他是大汉奸，是当代的秦桧，人人皆曰可诛，这是汪精卫的晚节所使然。而他年轻时，也是位风流倜傥的人物，不仅才华溢众，而且英俊潇洒。

他生于1883年，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在广东番禺（今广州），原名兆铭，字季新，青年时期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他曾参与筹建同盟会，多次参加反清武装起义。1910年3月，他和黄复生、喻纪云潜人北京什刹海甘水桥炸清朝摄政王载沣，结果事泄，汪、黄被捕，并被判处永远监禁，从此开始了在刑部狱中的铁窗生涯。

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乃南洋华侨巨商的女公子，为营救夫君，千里迢迢赴京探监，曾给汪送鸡蛋，中藏“忍死须臾”，汪血书回音曰：“信到平安”。这真是钟情郎对痴情女，吴稚晖称陈为“女中豪杰”。汪在狱中传出《被逮口占》一首，其中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曾博得不少人的喝彩。汪精卫赴京暗杀摄政王，临行曾咬破指头向胡汉民血书“今我为薪，兄当为釜”8个大字，囑交《中兴日报》发表。汪还引用柳宗元语“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人都门也”表达心境。汪精卫在京被捕，胡汉民得知后，立即写了一首《在星州得港讯知精卫等失陷》，诗如下：“挟策当兴汉，持椎复人秦；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如此情深意切，不愧为生死之交的挚友。

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被称为孙中山麾下的“三杰”，都有资格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廖仲恺遇刺，胡汉民出走，如今轮到汪精卫了。汪精卫在“中山舰事件”中说“易地就医”，实际上他并没有离开广州，而是隐匿起来，观察局势发展。他希望中共和苏联顾问能压倒蒋介石，以便自己东山再起。当他看到陈独秀和鲍罗廷步步退让，而蒋介石的声势却咄咄逼人，局势无可挽回时，15年前那种英雄豪迈之气概一扫无余。这时他灰心丧气，于5月11日轻装简从，悄悄离开广州，启程去巴黎。真是无巧不成书，当他从广州天字码头上船时，恰巧遇上第二次受蒋介石冷遇，只身离粤的胡汉民也搭乘同一条船去香港。这两位当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早年有生死之交的挚友，一个成为左派领袖，一个成为右派领袖，如今又一同被蒋介石逼走他乡，真是同舟不共济，相对无话谈。

且说1926年5月15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蒋介石等以“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为名，提出了一系列的《整理党务案》。所谓“整理党务”，是一起蓄谋已久的阴谋活动，是蒋介石对孙中山提出的“三大”革命政策的直接背叛。早在4月3日，蒋介石就提出《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建议》，要求军队中的共产主义分子暂时退出军队。黄埔军校校本部接着于4月7日发布《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

本校为造就革命军人之机关，所有全体官生应如何努力研究学术，接受党训，始能期思想行动之一致。近查校内各官生于本校特别党部所属组织外，尚有其他组织，实于集体化、纪律化之旨相妨碍。自本令公布日起，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由党部加意工作外，

其余各种组织着即一律自行取消,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如稍有违犯,一经查出,实行严重究办,以维纪律。着各级官长严行告诫,饰所属一体知照遵行。此令。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3天后发布《解散通电》,表示“本会拥护革命而始,亦以拥护革命而终”,“为巩固革命势力,统一军人观念,取消骈枝国弊不可滥费起见,特决定自行解散”。右派分子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也于4月21日发布自动解散宣言称:“学会本以团结本党革命信徒始者,难免不将因谣逐而使革命者离散,因特本会自行取消,以杜绝造谣者之对象。”国共两党各自支持的群众性军人组织奉校令如期解散,后来由蒋介石提议,于国民党“二大”二次全会结束后,成立了一个黄埔同学会。

4月24日,蒋介石令贾伯涛、李正韬、曾扩情、伍翔、余程万、杨麟、梁广烈、钟焕群、蒋先云等人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组织筹委会,拟订简章。北伐前夕,该会正式成立,后来变成蒋介石个人统治黄埔学生的工具。4月8日,蒋介石向黄埔军校全体师生讲演,提出军队中的“清党”问题。黄埔军校实行党籍甄别登记,黄埔学生不准跨党,要么参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要么参加国民党,退出共产党。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二者择其一。4月10日,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250多名退出国民党。蒋介石最得意的黄埔一期学生蒋先云,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他们随后离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黄埔军校。而第一个声明退出共产党的,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李默庵,另外还有曾扩情、郑洞国等37人。黄埔一期毕业生、当时任第一军1师3团1营副营长侯镜如,刚由周恩来、郭俊介绍加入共产党,尚未暴露身份,仍留1军做秘密工作。黄埔一期毕业的宋希濂“清党”时在新编21师63团任1营营长,也是刚刚加入共产党,没有被人发现,但

他以后决定跟蒋介石走，脱离了共产党，那是以后的事了。

蒋介石清楚，苏联人还需利用，因为鲍罗廷回国述职答应还支援枪炮。中共也不能赶尽杀绝，未来的北伐还可借助他们的力量。但为了消除这个“隐患”留在自己身边，限令在看家之本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内的共产党员必须限期退出，名之曰“礼送出境”，以免让共产党近在肘腋，钻进心脏。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官佐如熊雄、鲁易、聂荣臻、金佛庄、肖楚女、恽代英、成仿吾、高语罕、王逸常、杨其纲等一大批精英的离去，使蒋介石感到一丝遗憾和震惊。共产党员居然在第1军和黄埔军校内荟萃了那么多的人才，让他们离开，又何尝不“心痛”。他一再强调，只要愿意脱离共产党，仍然可以留下来工作，他仍然一视同仁，重用如常。据说，在“清党”之前，蒋介石嘱意曾扩情专门找陈赓谈心，并递给他一张国民党党员登记表，轻声说：“校长并没有忘记你，只是希望你脱离C.P，跟他走。”曾一再郑重其事地说：“这是顶顶重要的时刻，顶顶重要的时刻！”当时陈赓却以令人难堪的目光盯着曾扩情，严肃认真地说：“本人要当着众人宣布，我曾经是个跨党分子，现在声明，本人也是一个主义，即共产主义；一个党，即共产党！”蒋介石对周恩来特别敬佩，见面总是和颜悦色，非常有礼貌，他曾经单独邀请周恩来长谈，同周恩来认浙江同乡，请他在广州大佛寺先担任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部主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主任，集中训练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撤出的300多名共产党员，时间三个月，请邓中夏、恽代英、阮啸仙、苏兆征先后到这个班授课，毕业后主要分配到除第一军以外的其他部队中工作，等这个班结束后，蒋表示还要重用他。周恩来在“中山舰事件”后，主动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全力办好特别政治训练班，为将来的北伐培养骨干力量。蒋介石在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清党”，为在国民党“二大”二中全会提

出《整理党务案》做了铺垫。为了进一步了解蒋介石的用心，不妨将《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来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联席会议追认。

八、国民党党员未准予脱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国民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国民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5月20日，《整理党务案》顺利通过。鲍罗廷4月29日从莫

斯科回到广州后,与中共中央领导商讨如何面对国民党这一企图限制和削弱中国共产党的严峻问题。可是大家意见不一致,发生了争执,讨论了7天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签字接受之。人们都感到鲍罗廷此刻右得出奇,蒋介石也利用当时他控制的局势对鲍罗廷软硬兼施,一再声称解聘季山嘉纯属个别人问题,不影响国民党对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撤出是为了减少国共两党之间的磨擦,更好地亲密合作,共同北伐;同时他又一再向鲍罗廷表示要坚定不移地奉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蒋介石看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弹药又陆续运抵广州后,他联俄的调子唱得更高了。他说不但“应该和第三国际联络,而且还承认它是在指导的地位”。蒋还在演讲中称“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大批苏联军火运到广州后,周恩来要求鲍罗廷拨给中共中央5000支步枪,以便武装工农群众协助北伐。这项要求遭到鲍罗廷的拒绝后,周恩来怒不可遏,大声吼道:“你被国民党绑票了!”身材高大、棕发蓝眼、留着一撮胡子的鲍罗廷听后暴跳如雷,他向周恩来摊了底牌:“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的意旨。中共命中注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

《整理党务案》公布实施后,共产党员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均被国民党右派分子所替代。原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刘芬、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祖涵(林伯渠),均以身为共产党分子于当日向常务委员会辞职。6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决定:任命叶楚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5月28日,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张人杰(张静江)提议,任命蒋介石为组织部长,顾直余为代理宣传部长,原青年部长甘乃光调任农民部长,以邵元冲继任青年部长。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篡夺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他的盟兄张人杰被

推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以代替不辞而别的汪精卫。接着,中共党员彭泽民被解除外交部长职务,杨匏安被解除中央执委秘书处秘书职务。蒋介石玩弄了许多两面派的手法,使他左右逢源,如鱼得水,蒙蔽了许多群众的眼睛。即使最顽固的西山会议派分子也被蒋介石的假象所迷惑。当“中山舰事件”发生时,西山会议派正在上海召开他们的所谓国民党二中全会,闻讯后致电蒋介石,祝贺他“以迅速手段,戡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但“祛恶必须彻底”,还应该继续清理党籍,勸勉他“努力为之”。蒋介石这次炮制一个《整理党务案》,谢持、邹鲁这批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更是十分高兴。他们以为蒋介石开始转舵向右航行了,但没想到却吃了蒋介石一顿大骂。蒋介石认为公开反共时机尚未成熟,目前还要国共合作,要和共产党加强团结来努力进行国民革命,不能被西山会议派所利用。《整理党务案》出笼后,蒋介石一再声称“这不是限制,乃是合作的一种办法”,目的是“系谋内部团结革命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此案实行后,即出兵北伐,实行本党主义”。蒋介石还说“如离开共产党,国民党革命亦不成”,所以“希望本党同志及共产党同志,实力团结,努力国民革命工作”。蒋介石利用两面派的手法,从夺取军权到进一步夺取党权,又利用党权去进一步扩大军权,逐步实现他独揽党、政、军大权的计划。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廖仲恺案”中被蒋介石“礼送”出境,到苏联走了一趟。这次与鲍罗廷一道回国,见蒋介石故意冷落他,并将右派的头面人物、广州市市长伍朝枢以破坏省港罢工的名义逼他再次出境。蒋介石断绝了胡汉民想与他合作反共的希望,胡汉民只好灰溜溜地再度出走香港。他走后的第三天,国民党二大二中全会召开,《整理党务案》正式被大会通过。胡汉民、汪精卫被挤走后,蒋介石已将党权、军权初步抓到手。这时,他

又想到抓政权,但鉴于想到凭自己的资历,要想一步登天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职位,怕那些国民党元老不会买账,再说国民革命军仅第1军他能掌握,其他各军如谭延闿的第2军、朱培德的第3军、李济深的第4军、李福林的第5军、程潜的第6军、李宗仁的第7军、唐生智的第8军,这些人物都来头不小,非他一时所能驾驭,所以他决定拉拢曾任湖南督军、现为广东军界头面人物的谭延闿,以助他一臂之力。谭延闿与孙中山有深厚的感情,1924年10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建国军北伐总司令,率湘、滇、豫、闽各军,总兵力超过10万,进军江西,后被北洋军阀方本仁部击败,退驻北江地区。在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中,立过大功。谭延闿的夫人逝世后,孙中山曾介绍他的小姨子宋美龄给谭作续弦,谭以自己年迈体弱无法消受而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美意,而把宋美龄当作干女儿看待,因此,宋美龄常到干爹家走动。

“中山舰事件”后的一个多月,谭延闿在感情上仍然倾向汪精卫;蒋介石殚精竭虑想叫谭延闿成全他与宋美龄的婚事,因此,准备抬高谭延闿的身价,联络感情。他把孙中山生前给自己的书信,用上等好纸精印成《孙总理翰墨手迹》送给谭延闿,谭延闿乃清朝进士,在翰林院任过偏修,有名的湖南大书法家。毛泽东当年办“文化书社”曾请他写招牌,可见书法功底之深。谭睹物思人,涕泪交加。当他读到孙中山批评汪精卫为一介书生那段话时,感情的天平骤然倾向蒋介石一边:蒋打击汪,看来是总理生前本意。在汪出走后,谭延闿被推上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的宝座,蒋介石扶谭上台,一来是想通过谭说情,便于与宋氏三姊妹联系,二来是谭已年老体弱,当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不过是他的傀儡罢了。若干年后,谭延闿的干女儿宋美龄真的嫁给了蒋介石,宋美龄也没有忘记干爹的恩情,因此将干爹的女儿谭祥介绍给陈诚作妻子。陈诚夫人谭祥与宋美龄原在美国留学时是同窗

好友。陈诚如何飞黄腾达，与这桩婚事有关，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后，于4月16日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议案。7月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因张人杰（张静江）患足疾辞职，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接受总司令的指挥。这样，蒋介石应了风水先生肖萱的预言，其母经他点葬后，官场上可谓平步青云，不到5年功夫，就荣升为北伐军总司令，垄断了国民党。北伐军、国民政府的所有大权，他代替了汪精卫，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

且说《整理党务案》公布实施以后，国共两党逐渐拉开了距离，蒋介石虽然口头上高喊“国共继续合作”，但内心深处早已将共党当作异己分子看。不过，北伐在即，他有打有拉，在1926年4月14日《忠告军校同学书》中，再一次挥动橄榄枝，希望共产党内的黄埔将士师生重归他的麾下：

吾惟望吾离队之同学，不再诬蔑总理之人格，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一本亲爱精诚之校训，不宿怨，不寻仇，不灰心，以光明之态度、亲爱之精诚，捐弃前嫌，续欢同学。人非木石，谁能无感？吾知军中同学必能坦怀释疑，恢复旧谊，终有共同努力于革命战线之一日也。

蒋自我认为,黄埔学生都是他的“门生”,都俯首贴耳地听“校长”的指挥,但他的“清党”使黄埔学生面临严峻的考验。6月7日,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要求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坚定地站稳立场,不入蒋介石的圈套。蒋先云说:“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6月28日,蒋介石进一步提出:“凡在本校本军里的C.P同志,不管是愿意脱离C.P,或者愿意脱离国民党,他总要做一个纯粹的党员。”并限期3天,由各连连长汇总执行情况,向他报告。在蒋介石的压力下,黄埔军校和第1军中凡身份已暴露的共产党员都退出了国民党,致使国共合作在这两个单位首先遭到破坏。

邓演达并非共产党员,也受到蒋介石的怀疑,受到排挤,被派到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任教育长;连蒋最信任的陈诚,当时也离开了黄埔,到第1补充师筹备处第3团当团长去了。退出第1军的共产党员一部分安排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由叶挺领导的独立团。

继任独立团团长的周士第,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55年被毛泽东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据他回忆,当时“从黄埔军校调来的杨林,又名毕士梯,共产党员,朝鲜人,任第3营营长;董仲明,即董朗,共产党员,四川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任参谋;吴兆生,又名吴道南,共产党员,湖北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任第2连连长;卢德铭,共产党员,四川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组织干事,任第4连连长;袁炎烈,共产党员,湖南人,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干事,任第6连连长;练国梁,共产党员,贵州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任机关枪连连长。蔡晴川,共产党员,湖南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任监视队队长,这个队均为十几岁的青年,又称青年队;张堂坤,共产党员,浙江人,黄埔军校

第二期毕业,任担架队队长……后来,又调来曹渊,共产党员,安徽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任第1营营长;许继慎,共产党员,安徽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任第2营营长;胡焕文,共产党员,湖南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任第9连连长。独立团建立共产党支部,团部直属队和各营建立党小组。初成立时全团有党员二十名左右。”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主张在国民革命军中多建立像独立团这样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部队,作为核心力量,许多人均表示同意,但因遭到陈独秀、张国焘及鲍罗廷等人的反对,未能实现这个计划。

蒋介石虽然在黄埔军校及第1军中“清党”,但许多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师生,继续以国民党员身份留在原单位工作或学习,为未来红色武装力量的发展保存了“火种”。邵力子与陈独秀、李达等于1920年5月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又参加共产主义小组。鉴于邵力子所处的社会地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批准他为特别党员,即参加党而可以不过组织生活又以国民党员身份为党工作。到黄埔军校后他任少将秘书长兼政治部副主任,正式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1926年7月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7月29日奉命代表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便于在国民党上层活动,邵力子奉命退出中国共产党。大汉奸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1924年5月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被聘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不久又兼广东大学秘书。他和广东大学校长、西山会议派骨干邹鲁参加国民党右派活动,并发表宣言反对广东革命政府。周恩来等劝他检点自己的行为,周佛海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变本加厉公开背叛共产党的纲领。1924年9月,中国共产党将其开除出党。以后,周佛海追随蒋介石,北伐时任总司令部中校秘书。1927年1月,被

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少将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候补监察委员。这时，周佛海拥护和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1927年5月，周佛海趁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到前方同夏斗寅叛军作战，自己留守军校之机，率妻儿逃出武汉，乘船前往上海投靠蒋介石，并在轮船上写下了《逃出了赤都武汉》一文，公开进行反共宣传。但当他一家大小抵达上海时，却被上海清党委员会负责人陈群和上海警备司令杨虎逮捕，以他是中共分子为由被关押，性命危在旦夕。在其夫人杨淑慧多方求救之下，周佛海表白自己不是共产党，后通过张治中、吴稚晖、陈铭枢等向蒋介石求情，始获释放。由于他曾与戴季陶私交甚笃，随即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1928年12月，由于他写了一本《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的小册子，被蒋介石纳为御用文人之一，后升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少将主任。此公后来跟着汪精卫叛国投敌，当了汉奸。那是后话，暂不提及。

话转回头，且说蒋介石抛出《整理党务案》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开始出现裂痕，黄埔军校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开始泾渭分明。俗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黄埔同学各为其主，分道扬镳，以后同室操戈，分庭抗礼，强弱斗智，血溅沙场，演出了兄弟阋墙的一幕幕悲壮人间戏剧。正是：冤家宜解不宜结，怨怨相报何时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誓师北伐 革命军阵营坚强 进攻两湖 独立团所向披靡

话说 1926 年是一个多事之秋的年份。3 月 18 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李大钊等人领导下,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 8 国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抗议日舰 12 日对大沽口的炮击。会后两千多群众游行请愿。段祺瑞政府出兵镇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20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就在同一天,广州的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掀起反共浪潮,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的右倾退让妥协,使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撤出去,极大地影响了国共合作的良好关系。一个月后,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在北京会师,国民军驱逐段祺瑞下台,临时执政府在全国人民声讨中倒台。全国人民的心向往着广东国民政府,希望国共两党合作完成孙中山的遗志,早日北伐,以粉碎直、奉系军阀联合“南北讨赤”的阴谋,统一全中国。

7 月 1 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宣言》,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了“北伐动员令”。动员令说:“本军继承先大元帅孙中山的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义,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当时黄埔军校一、二、三期学生共 2325 名,全部分配

到国民革命军的 8 个军中工作,第 1 军接收黄埔军校毕业生最多,第 4 军次之。他们均担任排、连长、营长或党代表,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一批新生力量。黄埔军校第四、五、六期在校学生共 8072 人正在学习。第四期的 2274 名学生于 1926 年 10 月毕业后,也全部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中参加北伐。

北伐军总兵力约 10 万人,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白崇禧任总参谋次长兼行营参谋长,军事总顾问为苏联加伦将军,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1926 年 11 月任职),总政治部顾问苏联铁罗尼将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从开始的 8 个军逐步扩展到 41 个军,另外还新编了 7 个军,人数竟多达 80 余万。广州誓师北伐的 8 个军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副党代表缪斌。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副党代表李富春。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副党代表朱克清。

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副党代表廖乾吾。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副党代表李朗如。

第六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副党代表黄绍竑。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副党代表刘文岛。

北伐军怎么光有副党代表而没有党代表呢?这里蒋介石有一个用人的原则:凡在一个单位正、副职的任命,用国民党员任正职时,则可用共产党员任副职;或以左派分子任副党代表时,党代表则由右派骨干充任,使其互相牵制。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共产党员李富春、廖乾吾、林伯渠等任副党代表,如果无党代表,宁可暂缺着,也不能由副职转正职。蒋介石最精于玩弄权术,这是他日后驾驭军队的一着妙棋。

这次北伐在军事上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为重点，第二个阶段则全力讨伐五省联军首领孙传芳，再分进合击奉系军阀张作霖。

当时，全国的军阀部队有三支：一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此人与陈炯明一样，也是秀才出身，山东蓬莱人，自诩戚继光转世，文韬武略，气魄胆识皆胜孙传芳、张作霖一筹。他本有夺天下之志，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却因冯玉祥倒戈而惨败，但旋败旋起，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南部等地，拥兵 20 万，声势浩大。二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各省和平津地区。此人乃马贼出身，奉天海城人氏（今属辽宁），字雨亭，自封安国军总司令及海陆军大元帅，人关盘踞北京，堪称一代枭雄，拥兵 35 万，气焰嚣张，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就死于他的屠刀之下。当时张作霖进则人主中原，退可回东北为王。三是原为直系，后来独立自成一派的军阀孙传芳。他据有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山东历城人。此人善于用兵，并非无能之辈，拥兵 20 万，乃一野心勃勃之军阀。这些军阀在各自依靠的帝国主义支持下，互相争夺地盘，都想独霸天下。北伐在即，他们又沆瀣一气，联合起来对付革命。但孙与吴、张有矛盾，北伐军在战略上先专讨吴，后再讨孙，而且在讨吴时，不但不与孙决裂，还与孙虚与委蛇，防止他在讨吴时向广东革命政府进军，以便各个击破，最后夹击张作霖。

从兵力上看，三大军阀拥兵 75 万，而国民革命军才 8 个军，共有兵力 10 万左右。这不难看出，敌人的力量占着明显优势。但中国的军阀历来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互不团结，拥兵自保，各霸一方，各不相谋。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建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得到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拥护。

7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扩大执委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

于时局的主张》，提出 23 条政纲，号召各阶级革命的群众，要巩固“国民的联合战线”，“以此推翻国内军阀，推翻世界帝国主义”。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后，派张治中担任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主管编制、人事和事务。张治中建议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请周恩来充任，以便两党合作如初。蒋介石说已派邓演达充任，如果周恩来愿意参加北伐，可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张治中把蒋介石的意思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一笑，摇摇头说：“不必了！”后来，由于邓演达再次建议蒋介石亲自找周恩来谈谈，不能怠慢和埋没了有用的帅才，因而蒋介石才设宴请周恩来共叙家常。几杯酒下肚，蒋用白开水当酒以示尊重。然后说：“凡是同我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我都以知己看待。”蒋态度诚恳，也确实渴求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我最近忙，叫邵力子、张文白（张治中）经常来看看你，希望恩来兄能一道北伐。”周恩来微笑不语。蒋又说：“你和恽代英都是我的浙江同乡嘛！”恽代英是陪周恩来一道来的，蒋对恽代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因为他曾看过恽写的文章，文中提到他蒋介石在黄埔建校之初如何卧薪尝胆等语，心里颇多好感。蒋介石见周仍不表态，又进一步劝慰道：“你不愿担当财经委员会主任，可以担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么，还有包惠僧，仍可回 20 师任党代表的原职。”周恩来突然笑起来，答道：“我的弟弟恩寿已在北伐军中，我就不必了。”蒋接着说：“这有什么！择生（指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他的哥哥竞生不一样在第四军当参谋长吗？北伐乃国共手足并进，还望周先生就任。”周只好推说：“此事只能由中央裁定，个人难以的择决。”恽代英笑道：“那我跟你上前线！”蒋叹气道：“行是行，可前线不需要写文章，你还是留守为好。”这次周恩来与蒋会面以后，全力投入北伐准备工作，他积极协助邓演达组建北伐军总政治部，推荐了一批有能力的共产

党员如郭沫若、阳翰笙(欧阳继修)、肖劲光、朱代杰、沈沛霖等均进入北伐军总政治部或各军任职。周恩来应邀为国民革命军开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作题为《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重要讲话。北伐前夕,周恩来在广州太平餐馆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和亲信张治中、刘峙、钱大钧、王柏龄、俞飞鹏等送行,晚宴上周恩来风度翩翩地举杯衷心预祝他们北伐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蒋介石全力准备北伐,但仍未忘记他的黄埔军校。当时李济深为副校长,按说蒋北伐后,黄埔军校应由副校长替代校长行使职权,可蒋不放心,经他再三考虑,决定由教育长方鼎英代理校长。方为日本士官学校 8 期毕业,颇有军事教育经验。方就任代理校长后,黄埔军校进入全盛时期,他与蒋介石有言在先,凡涉及党派斗争问题,他概不负责任,并表示继续贯彻国共合作办校宗旨,依靠共产党人悉心办学。因此,第五期学生进校后,黄埔校园里因“中山舰事件”而形成的那种压抑窒息的政治气氛又呈现宽松。当时第四期学生尚未毕业,国、共两党跨党党员没有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也解散了,一批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如邓文仪、贺衷寒、杜从戎、肖赞育、郑介民、康泽等 37 人又赴苏留学,同学之间虽有不同党派,但在方鼎英领导下,和平共处,共同学习,相互斗殴的事不再发生。许光达(许德华)、杨至成、宋时轮、张宗逊、谭希林、陶铸、赵尚志、潘忠汝这些共和国的将军,当时尚能安心求学。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发动政变,方鼎英愤然辞职,以后进入国民政府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蒋介石亲自培养与组织起来的第 1 军,由于共产党员全部退出,元气大伤,战斗力一落千丈。他的亲信何应钦、缪斌、刘峙、王柏龄、陈继承、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这些当年黄埔军校的教官,都晋升为师长以上的职务。黄埔一期毕业的胡宗南、郑

洞国、黄维、桂永清、李汕洲、李默庵、李延年等，都在第1军任营长或团长。这些人以后都成了蒋介石的嫡系，掌握了国民党的军队领导权。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较场举行了北伐誓师大会，到会军民数万余人，黄埔军校师生也列队参加。这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蒋介石全副戎装，吴铁城主持大会，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几位国民党元老出席宣誓仪式，由吴稚晖授印，授旗，仪式简短而隆重。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演说：

中正我当此重任，有三件大事要宣告国人：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第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进而要求全国人民共负革命之责任……

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还分别发表《告广东全省人民书》、《告士兵同志书》及《告海外同胞书》等，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万众齐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封建主义！”的口号下，正式出师有名了。

且说蒋介石视北伐誓师如“汤武革命，莫不誓师”，因而北伐誓师大典丝毫不能儿嬉。本来北伐誓师典礼定于7月7日，后来蒋介石听说主席台面向东方，实为不吉之向。邓演达连夜把主席台改朝南方，应皇帝“面南称孤”的兆头，蒋介石这才放心。但北伐誓师所选的黄道吉日7月7日只好放弃了，这又使蒋心头不快。

广州北伐誓师典礼结束后，参加第一期北伐作战的计划是

出师湖南、湖北,以消灭吴佩孚为目标,准备在两湖取胜后,再向长江中下游发展,消灭孙传芳的部队,尔后伺机向长江以北进击,消灭张作霖。当时有个口号叫“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形象地说明了北伐军的战略意图。根据北伐的军事部署,兵分三路:第一路为4军、7军、8军,攻湖南,直取湖北,以消灭吴佩孚为己任;第二路为2军、3军、6军,攻入江西,消灭孙传芳部;第三路为第1军,转进福建、向浙江进军。战略重点摆在第一路,故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随4军、7军、8军北上湖南。北伐军出征时,有省港罢工工人组成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等随军出发,在湖南省有毛泽东发动的农民协会积极参加,还有粤汉铁路工人、萍乡矿务局矿工组织的交通修理工作队配合作战,汉阳兵工厂举行总罢工响应北伐军。所有这一切,为北伐战争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

且说北伐虽然誓师在7月9日。但早在两个月前,北伐战争就拉开了序幕。确切地说,北伐战争是从援助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唐生智开始的。原赵恒惕部第4师师长唐生智在湖南曾起兵驱赵,将当时任省长的赵恒惕赶下了台,唐进驻长沙,于1926年3月25日接任代省长职务。唐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扣留了赵恒惕的部将刘鏊、刘重威等5人。赵从吴佩孚那里搬来救兵,唐生智寡不敌众,被迫退守衡阳。于是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电报如雪片飞来,又派亲信刘文岛亲赴广州会蒋介石,请求援兵。当时援湘是北伐的关键,若唐生智在湖南失败,吴佩孚大军将直接威胁广东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游说广东要员支持援湘,为此,李济深派第4军两个师北上,其中首先派由叶挺任团长的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于5月1日从广东肇庆出发。到达广州后,周恩来同志在叶挺家里召开了独立团连以

上党员干部会议，亲自作政治动员。他首先分析国内外形势，北伐的有利条件，湖南、湖北工农运动、唐生智部的处境，接着号召独立团要勇猛参战，不怕牺牲，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最后他满怀豪情地激励大家说：“饮马长江，武汉再见。”

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的一支约两千名官兵的部队，由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团有中共党支部，连设党小组，党支部由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曹渊、许继慎任营长，卢德铭、董朗（董仲明）、袁炎烈、胡焕文、吴兆生（吴道南）、林彪等任连长、排长，它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南昌八一起义的主力，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火种，许多未来的共和国将军都是从独立团里培养出来的，是红色将领的摇篮。

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赴苏联留学，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处处长。北伐前作为一支中共军队，则成立独立团，由他任团长。他在北伐中屡建奇功，有“铁军”之誉，抗日战争中任新四军军长。他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后，坚贞不屈，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严正交涉下，于1946年出狱，4月8日由重庆去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难。叶挺在“皖南事变”中的遭遇在此暂且不提。

且说叶挺率独立团官兵于5月20日从广州出发，顺利挺进到湖南，配合唐生智军投入了保卫湘南的战斗。5月31日晚，独立团到达永兴县城后，接唐生智急电：“敌即日必行总攻击，安仁兵力单薄，贵团务速赴援。”叶挺率领所部冒大雨兼程急行军，于6月2日抵安仁，敌人谢文炳部进犯渌田、黄茅铺，企图占领安仁。当时第8军39团4个连败退，独立团增援组织反攻。经

过两天两夜的激战,饭也吃不上,饥寒交加,在困苦异常的情况下,终于击败了敌人。

独立团乘胜前进,于5日占攸县,敌向泗汾、醴陵方面败退。这一仗切断第8军与广东的联络线,粉碎了敌军攻占衡山,控制湘南的企图,巩固了北伐战争的前进阵地,实现了敌我双方的战略转换。泗汾一役,独立团3营9连连长、黄埔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胡焕文在泗汾桥口被敌视为官长,遂以排枪集中射击。胡焕文腿部连中二弹,鲜血淋漓,仍指挥抢桥,随即又有一弹穿其腹部,肠流满地,但他仍挥枪大吼,后又一弹击其喉,卒仆倒地。在临终时他壮言如山:“同志,努力杀贼!为民众谋解放,我虽死不憾!”这是北伐战争中第一个倒下的黄埔军官。拿下泗汾桥后,独立团1营2连连长、黄埔二期毕业生、共产党员吴兆生(吴道南)因突围壮烈殉国。临死时他仰天面卧,硝烟熏黑了脸上的斑斑血迹,犹怒气如生。在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时候,战士们抚尸放声嚎啕大哭,痛悼北伐军中又失一员猛将。

叶挺独立团首战告捷。第4军、7军、8军陆续北上,7月10日攻克湘潭、长沙,守敌叶开鑫部弃城逃跑。叶挺独立团攻占醴陵。贺龙部进驻常德,围攻鄂西,7月12日克湘阴、益阳、浏阳,俘敌数千人,并生擒敌旅长刘雪轩。北伐军第4军的一部分和叶挺独立团渡汨罗江,迂回包围敌自诩固若金汤的平江城,克岳阳,湖南全境战争基本结束。

叶挺独立团威名远扬的两次战役在湖北咸阳(今咸宁)境内的军事要隘汀泗桥和贺胜桥。在这两次战役中,叶挺独立团虽不是作为主力使用,但却胜过主力,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叶挺独立团1营营长曹渊和2营营长许继慎是这两役中的功臣。

汀泗桥是湖北南部门户,粤汉铁路上的天险,三面环水,仅一座铁路桥可以通过,东面是崇山峻岭,易守难攻。近日江水猛

涨,更是天堑难飞。吴佩孚纠集主力两万余人,由参谋长李济臣任总指挥,马济、刘志陆等干将死守汀泗桥。北伐军陈铭枢、张发奎率第4军两个师由崇阳、通山抄攻汀泗桥;李宗仁率第7军取蒲圻会攻;何健、刘兴率第8军两个师渡江下嘉鱼,抄汀泗桥后路;蒋介石率王柏龄的第1师作为预备队。由于叶挺独立团因连日充当先锋,损失较大,因而也编在预备队行列。北伐军8月26日总攻,冲锋10余次,遭敌顽抗。27日调叶挺独立团增援,阵地四易其手,桥下积尸累累。敌军守将陈家谟竟下令向双方肉搏战士开炮,桥上双方官兵无一身还。叶挺独立团翻山越岭绕到敌后,在友军和农民武装配合下,居高临下向敌军猛攻,各路军队也同时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血战,独立团许继慎营首先占领汀泗桥,俘敌军官157人,士兵2296人。北伐军官兵阵亡134人,伤256人。吴佩孚闻汀泗桥失守,一怒之下,将败将余荫森等9名旅、团、营长就地正法,并下令有敢后退者格杀勿论。同时又以大刀队在8个地点督战,但终抵不过北伐军旺盛的士气。北伐军三克汀泗桥,取得了最后胜利。

汀泗桥失守后,吴佩孚急红了眼,亲自来到贺胜桥布阵,调亲信13混成旅、陈嘉谟的25师、刘玉春的8师,共计兵力不下10万之众,决心与北伐军决一死战。吴佩孚设了桃林铺、印斗山、贺胜桥三道防线,以重兵压在前沿,与北伐军针锋相对。这次战役由叶挺独立团担任主攻,8月29日首战咸宁,30日拂晓总攻贺胜桥的战斗正式打响,对敌阵地采取中央突破的作战方针。许继慎率2营沿铁道右侧插进去,一直追到黄家窑,才发现孤军深入,与左右友军失去依托。吴佩孚手下骁将刘玉春平生少逢对手,见这支孤军如此横冲直闯,如人无人之境,一时怒气冲冠,立即率他的第8师将许部团团围住。许部苦战难支,命令全营死守阵地,接着许又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独立团与

增援友军立即发起冲锋,独立团1营长曹渊杀进敌阵,救出同乡许继慎,刘玉春见大势已去,不得已率兵后撤。守敌陈嘉谟不愿后退,竟滚在地上大哭,被卫兵强拉而退。吴佩孚亲自手刃数十名退却军官,悬其头于电线杆上,也挡不住如潮水般的溃军,贺胜桥终于为北伐军贺胜。这次战役,叶挺独立团重伤营长1人,排长4人,士兵百余人。

贺胜桥被攻下后,就打开了通向武昌的大门。骄横一世的吴大帅,一生对中国术和数学很有研究,行兵打仗,多用奇门遁甲,六丁六甲等术,这次在汀泗桥、贺胜桥栽了大跟头。据说是行云向北,犯兵家大忌,命该损兵折将。叶挺独立团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后,马不停蹄,于8月31日随第4军打到武昌城下,攻城部队由第7军军长李宗仁和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任正副司令。9月5日开始攻城,独立团的奋勇队在第1营营长曹渊率领下潜至城墙根,相继登云梯爬城,班长以上共产党员攻城前均写下遗书,誓为打倒军阀而战,虽死犹生。共产党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曹渊营长冒着敌人炮火拼命爬城,1营除派去团部送信的传令兵1人活着外,曹渊营长以下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当叶挺看到曹渊最后一份战报时,心中万分悲恸。曹渊在临牺牲前写的报告原文如下:“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10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当曹营长写下最后一个字时,忽然头部中弹。报告上的“渊”字的最后一笔弯弯曲曲地拉了很长。3连长高超是武昌人,他率部攻到城边,随先头班一起登城,刚爬到城墙上,就被敌人的炮火打中,而城下面,只有十几步远,便是高超的家。强攻未遂,第4军采取围攻,叶挺独立团仍担任湘门地段的围城任务。叶挺、周士第冒险摸到城边侦察地形,决定采用坑道战。于是在通湘门车站附近挖开一条坑道,穿透城墙,同时,把一列缴获的铁甲车用钢

板、沙包装备起来,开到通湘门附近,掩护作业。叶挺亲自率领官兵日夜轮流挖坑道,终于挖通。10月10日,北伐军再度对武昌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用炸药塞进坑道之下,把通湘门炸塌,首先率部冲进城里,武昌攻克。15年前的这一天,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想不到事情有么凑巧,10月10日,北伐又攻下武昌。

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于1961年重访武昌时,赋诗一首,缅怀北伐先烈的英雄事迹。此诗题曰《登阅江楼怀叶挺独立团诸同志》:“北伐从征忆昔年,党军独立一雄团。纵教汀贺传天险,终使吴刘受痛歼。革命前驱红十月,捐躯遗恨黑茶山。阅江楼上流风远,心绕延河烈士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几支部队,组成4军24师、25师及二方面军警卫团,先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成为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

国民革命军第4军号称“铁军”,最早是1926年9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的《第4军前方破敌志要》中提到:第4军“自克平江之后,即兼程追敌,奋不顾身,故汀泗桥与贺胜桥,独奏奇功,将吴贼精锐,全数扫灭,铁军之号,遂扬溢于湘鄂间。”1927年1月15日,武汉粤侨联欢社把在汉阳兵工厂特制的一面铁盾赠给第4军,这面铁盾正面铸有“铁军”二字,上款写着“国民革命军第4军全体同志伟鉴”,铁盾背面有一首四言题辞,全文曰:“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振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总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此题辞概括了铁军之名的来历和含义。过去一说铁军就认为是叶挺独立团,实际上铁军是指国民革命军第4军,当然叶挺独立团也是铁军的一部分。

再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于1926年7月27日从广州动

身,加伦将军、白崇禧、邓演达、郭沫若随行。有时乘车、有时骑马、有时坐轿,日行数十里不等,历时半月。8月11日抵长沙,第二天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14日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举行阅兵仪式,首先检阅李宗仁的第7军,李部穿戴破烂,也无军乐队助威。蒋骑着高头大马,时年40,春秋正富,加上身着元帅服,三军之前,更显得器宇轩昂,威仪万千。蒋按辔徐行,来到第8军时,排头乐队立时奏乐,军号齐鸣,声音尖厉刺耳,蒋骑的那匹马猛然受到惊吓,突然长鸣一声,前蹄腾空而起,接着狂奔起来,将蒋抛于马下。然而蒋的一支脚还挂在马蹬上,拖了两丈远,马靴才从脚下脱落下来,蒋免于性命之忧。第8军军长唐生智忙将其扶起,蒋一身戎装沾满泥土,帽脱靴落,好不狼狈,结果阅兵式勉强举行完毕。蒋介石阅兵坠马,使得他心中很是不快。唐生智却暗中欢喜,唐乃佛教信徒,出事之后,唐密问佛教密宗顾和尚,此事主何凶吉,顾和尚道:“大将出师,折旗坠马,皆为大凶之象。蒋氏此次北伐,凶多吉少,将来必为八军所克。”唐听了深信不疑。到了1927年宁汉分裂之际,唐与汪精卫“东征讨蒋”,终于发生了蒋唐之战,逼得蒋介石下野。正是:阅兵坠马大凶象,汪唐讨蒋应预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三打南昌 王柏龄缪斌失踪 攻克永定 郑洞国崭露头角

话说北伐军第一路攻克武昌期间，第二路第2军、3军、6军和第1军两个师在江西先后攻克赣州、萍乡、宜春、铜鼓、修水、高安等地。1926年9月19日，程潜率第6军所部在工人、学生和江西省署警备队的配合下，首次攻占南昌，守敌邓如琢的骑兵团被击溃。同时，56团张轸部爆破惠民门，进入市区，南昌敌警备司令刘焕臣、省长李定魁闻兵败越墙逃命，没有被俘。

南昌既克，程潜在凯歌声中跃马入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22日，第6军政治部的李世璋代表程潜、林伯渠在群众大会上向群众发表讲演，宣传北伐军的政策，对人民的支援表示感谢。当时万余群众兴高采烈庆祝北伐军的胜利，有人上台控诉军阀、官僚的罪行。时值中秋佳节前两天，市民杀猪宰羊，抬着月饼犒军。中秋之夜，政治部派出宣传队，挂起煤油灯在街头演出，南昌城出现空前未有的热烈局面。

继19师之后，指挥总预备队的王柏龄也率第1军1师部分人员进入南昌，同时向蒋介石报功。朱培德指挥的第2军、第3军本已离南昌不远，听说南昌已下，便勒兵不前，在原地休整，这样，第6军19师便成了深入敌巢的孤军。俗云：“孤军深入，乃兵家之大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王柏龄、缪斌统率的第1军1师迟滞不前，对程潜让他攻击牛行车站表示不乐意，仅派出

部分兵力应付,因而 19 师没有得到友军的配合。南昌失守,孙传芳急令卢香亭派郑俊彦率 10 师及杨赓的独立旅约两万人,由九江南下驰援,程潜感到孤城难守,下令撤离南昌。23 日晨,在万寿宫附近收容残部,在失去友军掩护的情况下,他只好疏散随员,剃须化装,靠了江西老表的领路,才得以摆脱敌人。事后,白崇禧讥笑程潜的这次遭遇为“曹孟德潼关遇马超”,败状很惨。此次战役,程潜的第 6 军 17 师、19 师,第 1 军 1 师损失了大部分兵力。

南昌之败,固然程潜战略指挥上有失误,但王柏龄的罪责也不可推诿。如果当时他能加强对牛行车站的出击,以第 1 师装备之精良,战斗人员之充足,坚守一段日子是不成问题的。可惜王柏龄太大意,留恋于青楼花丛,在黄埔寻花问柳的旧病复发,竟在战斗最激烈之时一头栽进妓院,而把军政大计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以致军中无主,将士丧志。再说,第 1 军因“中山舰事件”后即将共产党人排斥出去,战斗力丧失,士气不振。蒋介石用了一位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缪斌任军党代表,此人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来到黄埔军校任电讯教官,由于与王柏龄支持右派打击左派,才改任政治教官,是个只会当官的幕僚,哪里会做政治鼓动工作。1 师 1 团团长沙元良竟擅自撤退,党代表缪斌也临阵逃脱,与王柏龄一起“失踪”,因此,虽有 2 团倪弼部、3 团薛岳部奋力抵抗,终因大势已去,难以挽回败局。南昌之败,使第 1 军声威受损,蒋介石恼羞成怒。当他得知王柏龄、缪斌皆逃避未回的消息后,责备自己曰:“此皆余用人不当,计划多疏,平时不能专心训练,战时不能熟虑断行,以军队为应酬,以战阵为等闲,虽欲不败,焉得而不败。”事后,蒋介石在召集第 6 军及第 1 军 1 师官兵训话时,动过杀机,想枪毙孙元良,而且公开地说给大家听了。但一想到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学生,又是孙文

主义学会骨干，平时对自己忠心耿耿，所以觉得杀之未免可惜。可是已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偷偷地将孙元良送到日本去留学，终于使孙元良没有重蹈孙良的覆辙。看来蒋介石爱黄埔学生胜过爱自己的表弟。东征时蒋大义灭亲，他的表弟孙良脱逃，给他跪下求饶，终未获赦，死于他的刀下。王柏龄露面后，牛行惨败使他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看到他回来，真是“爱之心切，怒其不争”。他想起王柏龄率部北伐至湖南不久，除了骄娇二气越发严重外，一路上还随便占住民房，强买强卖，军纪败坏。在一气之下，他恨铁不成钢，立即将王柏龄的第1军副军长兼1师师长的职务撤销，并且以后再也没有让他掌握重要兵权。1927年11月，王改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省政府改组后，连厅长这职务也丢了。1937年后王柏龄赋闲在家，1939年写成《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一文，连载于当年出版的《黄埔季刊》，成了后人研究黄埔校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资料。王柏龄在江苏扬州，有“兰陵王”之称。1942年8月，王柏龄在成都病故。

缪斌的下场就比较惨了。蒋介石撤销了他的第1军党代表职务，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局局长。北伐成功后，他转到地方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但此人太过贪婪，终因贪污渎职罪而被撤职，不再录用。缪斌由怨生恨，于1935年东渡扶桑，广交日本军政界朋友，还结识了昭和天皇的堂兄，就是后来任首相的东久迩。1936年缪斌返国，转而投靠汪精卫做了汉奸，任汪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但他郁郁不得志，遂萌生与重庆挂钩的念头。正好当时戴笠想在南京汉奸上层物色一人开展活动，经蒋介石同意，决定给缪斌以戴罪立功的机会。此时日本急切要求和谈，缪斌将此动向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令他充当“和平使者”。缪知道老蒋不讲信义，明确表示，没有上司手谕，不愿冒此

风险。戴笠向老蒋请示,老蒋只好给戴一个手谕,让他派一个适当的人,代表自己去日本洽谈两国问题。1945年3月,缪斌化名佐藤,由上海秘密飞往东京,住进东久迩的私人别墅。当时日本内阁曾把缪斌的日本之行称为“佐藤事件”,记录在卷宗里。日本投降后,美驻日占领军在接收日本内阁档案文件时,发现了“佐藤事件”文本,其中记录缪斌在日本的全部活动。美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听了报告后,十分惊怒,立即向蒋介石质询。老蒋慌了手脚,坚决否认派缪斌去过日本,为了灭口,遂决定杀掉缪斌,故以汉奸罪逮捕了缪斌。

再说缪斌在日本投降后,当年在黄埔军校共过事的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均以汉奸罪名被捕入狱,惟独缪斌还自由出入于上海滩。一次,他荣获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委托戴笠赏赐的8万元现金,为此他在上海兴高采烈地举办过声势浩大的家宴。但仅仅7个月后,即1946年3月26日,也就是戴笠乘飞机失事以后的第10天,缪斌就突然被捕。缪斌当然不知其内幕。在铐子戴上双手时,他仍泰然自若,临行前,对妻子说:“我不比他人,我为老蒋办过事出过力,你放心,不久我就会回来的。”1946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首次对缪斌开庭公审。缪斌虽剃了平头,但毫不憔悴。他神态自若地踱步上了法庭。在发言申辩时,他竭力标榜自己是实行“软性抗战”,与汪精卫的“曲线救国”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他还拿出他和军统联络时往来的电报及老蒋给戴笠的手谕作为证据。正当他摇头晃脑地大讲蒋氏派他赴日和谈时,庭长马上喝令他停止。检察官严厉地对他说:“你见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连连失利,为掩饰自己的叛国行为,想找一条出路。你不是什么软性抗日,而是投机取巧。”尽管缪斌聘请了上海三位有名的大律师为他辩护,还偷偷地送给当年第1军军长何应钦一辆华贵的防弹保险轿车,但在4月8日,法庭

依然判了繆斌死刑。1946年5月21日,繆斌在苏州相门狮子口监狱里的临时刑场上被枪决。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是第一个被处决的汉奸,蒋介石枪毙繆斌是为了杀人灭口。繆斌为蒋牵线本是想留一条后路,哪想到终于被蒋所杀。

言归正传。且说南昌得而复失。虽说王柏龄、繆斌、孙元良这些当年黄埔建军时的嫡系不争气,使蒋脸上无光,但在黄埔学生中也有勇猛杀敌、以身许国的壮烈之举。如第1军2师2团2营李营长、6连长邓伯珏、9连长张迪锋均壮烈牺牲;1团8连连长曹润群在抢夺螺山高地机关枪阵地时,与敌白刃作战,被刺数刀而死。曹润群是黄埔三期毕业的高材生,这次为第1军争得了光荣。蒋介石自己也承认:“这一次我们第1师第2师的战斗,非常艰危,死伤的官长士兵最多,损失亦最大。但我们却没有得到一种相当的价值,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看不出什么效力来,这一点,本总司令对于各位同志们是非常抱歉的。”当时1师是孙元良、胡宗南任团长,他俩都是黄埔一期生;2师师长刘峙、团长陈继承是蒋介石在黄埔时的“八大金刚”,但打仗远不如李宗仁、程潜,殊为可叹!

1926年10月11日,北伐军第2、3两军和第1军2师强渡赣江,再攻南昌;12日蒋介石亲临南昌南门外指挥攻城。南昌城高而且坚固,北伐军面临坚壁,背后是赣江。蒋介石这样布置作战,实犯兵家之大忌。据参谋长白崇禧说,他当时不同意强攻南昌,但蒋求胜心切,重蹈武昌攻城40日不下之覆辙。蒋个性又倔强,不采纳别人意见,坚决主张爬城硬攻。正当北伐军作攻城准备之时,敌军敢死队突然从南昌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黑夜混战,喊杀声连天,北伐军秩序大乱,攻城的2师6团团长严尔文部几乎全团覆灭。蒋介石在黑夜中指挥困难,不得已仓皇后撤。蒋介石几次拉住白崇禧的手急问:“怎么办?怎么办?”好在

事先白崇禧命令工兵在赣江上搭了两座浮桥，北伐军才得以撤退过江，损失不算很大。

此次惨败后，蒋把部队撤退到高安县城设立司令部，休整待命，总结失败原因，认为：一是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如李宗仁在南昌以北虽连打了三次胜仗，但与程潜未联系上，不能相互配合扩大战果；程潜的第6军虽首次攻占南昌，但第7军又不知消息，程潜成了孤军深入，没有援军不能坚守，终于得而复失，损兵折将，令人痛惜。二是北伐军各军、师、团之间通讯联络没有无线电报话机，指挥传达命令靠有线电架线或传令兵传达，贻误时机。鉴于此，蒋介石于14日电请广州黄埔军校代理校长方鼎英设法火速从香港购买无线电报话机18部运来，装备各军、师和总司令部，以便及时取得联络。

11月初，北伐军再度攻打南昌。这一次，蒋介石听取加伦将军的建议，把李济深的第4军从湖北调来江西，加上已入赣的李宗仁、程潜的第7军、第6军和第1军一起，共同作战。所整合的部队分左、中、右三路，蒋介石亲任“肃清江西”总指挥，使攻打南昌的兵力大增。北伐军攻城开始后，蒋首先集中兵力向南浔路一带发动猛烈攻势。11月6日，贺耀组独2师占领九江，8日，朱培德率第3军占领南昌，9日白崇禧率第7军追击残敌，俘敌官兵3万余人。孙传芳狼狈不堪，改乘“决川”舰逃回南京，这是他头一次尝到了“南蛮子军”的厉害。由于主将败走，“五省联军”也落荒而逃，江西全境肃清。9日下午2时，蒋介石进驻南昌，建立了大本营。三打南昌，共歼敌6万人，国民革命军牺牲约两万余人，乃是继攻打武昌后又一次辉煌胜利。从此，吴佩孚、孙传芳一蹶不振，没有再耀武扬威之余力。

对于蒋介石北伐途中的武昌、南昌战役的错误指挥，周恩来曾于10年后的1936年7月9日，在陕西白家坪的窑洞里，与美

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作了精彩的评述。斯诺问周恩来:“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您对他有何评价?”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回答道:“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个拙劣的外行。……蒋介石采用了拿破仑的办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也总是搞得一团糟。他老是集中部队,企图依靠猛攻夺取阵地。1926年武汉战役,在其他部队失败后,蒋介石率领一个师攻城,投入全部力量强攻敌防御工事,结果全师覆没。……南昌,蒋介石又重蹈覆辙,他不等增援部队到达就用他的第1师向这个孙传芳占据的城市发起突击。孙传芳后撤,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攻,把蒋军逼入城墙和一条河之间的伏击地带,致使蒋军大败。”这是对蒋介石战略战术最恰当的评价。在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再一次证明了周恩来的论断,此是后话。

且说左、中路北伐军出征两湖及江西时,何应钦率第1军3师、14师等部防守广东潮汕、梅县。他一方面维持东江地区治安,防止陈炯明残部东山再起;另外一方面警戒福建之敌周荫人,防其乘机攻取粤东后方。这右路军的任务就是看好家门,许多人都认为蒋介石把嫡系主力留在右路是私心自用,避重就轻,保存实力。这种批评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就此小看何应钦肩上的重担。具有战略眼光的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就十分重视何应钦的重要性,他特地派切列潘诺夫协助何把守好家门,相应出击。

当北伐军在湖北、江西频频获胜时,何应钦才率第1军各师向福建进军。11月中旬,峰市、永定、松口一役,首战告捷,俘敌

4000余人,缴步枪4000余支,大炮10门。周荫人侥幸率数人爬城逃走,敌军纷纷向革命军输诚,接受改编,此后闽中无大战。黄埔一期毕业生郑洞国、李及兰、杜聿明等,当时在战役中表现勇猛机智果断,不愧为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的中级军官。攻永定时,郑洞国为第1军3师8团1营营长,他率部担任主攻,因指挥坚决、果断而受到上级嘉奖。随后,东路军乘胜追击窜至广东松口一带的敌军主力,并将其全歼。郑洞国就在这次战斗中俘获千余敌人,枪支也千余。同年11月,郑洞国因战功擢升为3师8团团长。郑洞国当年冒名顶替考入了黄埔军校,与同乡黄鳌、王尔琢、贺声洋成为至交,关系不同寻常。他们后来各自为了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黄鳌、王尔琢先后在黄埔军校加入了共产党。黄鳌1927年参加领导鄂西秋收暴动,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以后赴湘西当了贺龙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1928年9月在石门遭国民党军包围,率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6岁。王尔琢在国共分裂后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任工农红军4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1928年8月25日追赶袁崇全逃叛部队时,在江西崇义县思顺圩不幸中弹殉职,时年27岁。毛泽东撰文悼念曰:“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郑洞国闻讯挚友同窗老乡黄鳌、王尔琢的噩耗时,他正任2师5旅10团团长,追随蒋介石参加“二期北伐”结束不久。想当年他也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在黄埔军校加入了共产党,他在“清党”时为何退出共产党而选择了国民党的呢?这其中有一段缘由。当时远离广州,身任第1军3师8团1营营长的郑洞国,对蒋介石驱逐共产党离开第1军实在感到震惊与惋惜,思想矛盾重重,幸亏他在“中山舰事件”后就脱离了共产党,否则也有被驱赶的危险。当初郑洞国对蒋介石十分崇拜,1925年11月从老

家探亲回来,由周恩来委派他为潮州野战医院党代表,亲眼见到蒋介石来巡视医院时的认真负责、励精图治的工作作风。当蒋发现医院的条件与服务治疗态度不如人意时,当场撤换了院长,而对他这个刚上任的党代表却勉励有加,这使他大为感动,因此,他选择了跟着蒋介石走,并认为这一步是走对了。再说,进黄埔冒黄鹄之名的事,也是校长谅解,才免于勒令退学,他不能恩将仇报。郑洞国后来当上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吉林省主席,1948年10月在长春率部向解放军投诚。当时他在长春困守了7个多月,如果不是周恩来鸿雁传书,他也许活不到解放。曾任解放军兵团司令的肖劲光将军和政委肖华将军在长春郊区的四家子的司令部里曾设下丰盛的筵席款待郑洞国,他们谈了些什么,郑洞国如何弃暗投诚,那是后话,在此按下不表。

且说何应钦率领第1军次第克复汀州、漳州、泉州、福州,福建全省尽归革命军所有。1926年12月,北伐军重新调整部署,以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准备向江苏、浙江地区大举进攻。

1927年1月中旬,白崇禧率刘峙、严重、陈继承各师及26军周凤岐部集中在浙江衢州地区。1月27日,第2师攻占龙游,29日,26军占汤溪,同一天,第1师、2师经反复冲杀,攻占洋港、游埠,第6团团团长郭俊不幸阵亡。何应钦率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向浙江疾进,克兰溪、金华、诸暨,在富阳与孙传芳的大将孟昭月交火,激战5昼夜,于2月15日克复,17日第1师进驻杭州。何应钦挟屡胜之威,自广东出发,经闽、浙入苏,如入无人之境,一时声名鹊起,春风得意。蒋介石闻东路军顺利进军,心头大喜,他在日记中写道:“积郁中闻斯,差慰!”至此王柏龄、缪斌的耻辱,总算由何应钦挽回了一点面子。李宗仁后来回忆说:“何应钦的东路军人闽虽节节胜利,然浙闽地区固非敌人主力所在,福

建周荫人部原不堪一击。”此话乃属实。不过，黄埔军校学生组建的第1军尚有余勇，后来在二次北伐中的龙潭之役，打出了威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龙潭阵亡将士纪念祠”所题之碑联曰：“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团千年重此祠。”道出了此役之重大意义。孙传芳七渡长江终未得逞，战斗之激烈，可与棉湖、松口、汀泗桥、武昌、南昌诸役相埒，或且过之。此役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之后发生的，未能一展他用兵之才，风光尽数归诸他人，实为遗憾，此是后话。

综而述之，北伐中路作战之程潜第6军，由江西沿长江东下，驻皖之陈调元、王普部起义加入北伐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7军、第27军，不发一弹而定安庆。3月6日，第6军19师杨杰部克芜湖，23日再克南京。3月中旬，东路军攻占上海屏障——松江。3月20日，切断沪宁线交通，攻占常州，当时乘火车南下的10列车鲁军被包围缴械。严重的21师及刘明扬旅克苏州，驻沪海军加入革命军，北伐军对上海已形成包围情势。

为了迎接北伐军，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于1927年3月21日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22日，起义取得胜利，北伐军第1军何应钦、白崇禧进占上海。当天，经过工、商、学各界代表民主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25日，经武汉中共政治会议议决。早在3月3日，蒋介石从南昌给东路军何应钦发了一份密电，曰：“何总指挥勋鉴：我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淞之线为止，军队以不越此线为妥。闻某党有上海革命政府之组织，凡此类机关，应即勒令取缔可也。”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不愿看到周恩来借北伐军的军威，发展共产党的力量，更不愿看到在北伐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出现由周恩来领导的工人起义从而占领上海的局面，因此发出密电，嘱何应钦渐移杭嘉湖一带，按兵不动，他拒绝与上海工人运动发生任何

联系。周恩来利用他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影响,想方设法与远在效区的何应钦、白崇禧取得联系。他曾派上海市总工会的章旭庵,利用其兄任北伐军谍报处处长的关系直接向白崇禧报告上海工人罢工的意义及促他们速进兵的要求。周恩来还亲自写信给何应钦,把口令告诉他,劝他入城,并说明上海罢工迎接北伐军的情况;然而何、白因有密令在身,对周恩来的信件置之不理。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见周恩来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成功,3月23日,何、白东路军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了上海。26日,蒋介石由海军司令杨树庄陪同乘“楚谦”舰驶抵上海高昌庙码头,然后登岸驱车前往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一场秘谋的事件即将发生,究竟是什么事件呢?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北伐夭折上海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武汉建校 邓演达功不可没 翻云覆雨 周佛海卖身投靠

话说北伐的胜利进军，给北方的冯玉祥很大影响。1926年9月中旬，冯玉祥率所部国民军于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随即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北伐军自出师以来，不到10个月就消灭了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收复了湘、鄂、赣、闽、浙、苏、皖和河南的一部分，把国民革命从广东地区推进到长江流域，震撼了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使全国形势转为北伐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南北对峙的局面。

黄埔军校的师生由于参加北伐而使黄埔军校本身的校威、军威也达到顶峰。北伐战争期间，黄埔师生贡献突出，战绩辉煌。担任北伐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1至8军10万之众，其中黄埔本校及潮州、南宁、武汉、长沙等校师生参加北伐的就多达3万余人。其人数相当于两个军的实力，是北伐军中训练有素的军事、政治骨干。他们在北伐军中主要担任连、营、团、师长、党代表、参谋长等职务，叶挺、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阳翰笙、陈奇涵、金佛庄、李富春、李一氓、毛泽覃、周恩寿、许德珩、项英、叶剑英、徐向前、严重等这些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物，他们都作出过贡献；曹渊、金佛庄、张堂坤、蒋先云这些优秀中共党员干部为北伐英勇战斗而牺牲生命。据《黄埔军校史稿》统计，仅第

一至五期学生在大革命中伤亡数就高达 2600 余人,其中阵亡 1839 人,负伤 761 人。本书所列 108 位黄埔风云人物,参加北伐战争的达 95% 以上,只有一期的贺衷寒、邓文仪、张镇、陈赓、左权,二期的郑介民,三期的康泽等少数毕业生赴苏留学,没有机会参加北伐。

1926 年 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留在武汉负责筹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而后将把广州黄埔本校第五期政治科 500 余名学生迁至武汉,邓演达兼政治科主任。11 月 1 日武汉分校成立招考委员会,邓演达为主席,郭沫若、彭漪兰、王法勤、杨树森、王乐平、陈公博、李汉俊、董必武、刘芬、包惠僧、纪钱、郑强、李一氓(李民治)等 14 人为委员。12 月 8 日考试录取全国各地男生 986 名,女生 195 名,编入本校第六期入伍生总队,这是我国历史上军校第一次招收女生参加系统的军事政治训练。共和国未来的将军陈伯钧、程子华、郭天民、罗瑞卿、王诤(吴人鉴)都是武汉分校学生;赵一曼、黄杰、谭乐华、谢冰莹、张瑞华、危拱之、曾宪植、游曦、黄静汶、胡兰畦、胡筠等这批巾帼英雄,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曾创过辉煌的一页。国民党方面,黄埔第六期也有廖耀湘、唐纵、戴笠、盛文等风云人物,不过他们是在黄埔岛上毕业的,没有来到武汉受大革命的洗礼。12 月,黄埔本校第五期炮兵科、工兵科学生 1200 余人迁来武汉,台湾国防部部长彭孟緝和国民党兵团司令官陈克非也是当时五期的学生。

武汉分校由蒋介石兼校长,汪精卫兼党代表,邓演达代理校长职务,顾孟余代理党代表职务,张治中任教育长兼训练部主任、学生总队长,周佛海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当时师资最强,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代理政治总教官李达,政治教官高语罕、沈雁冰(茅盾)、吴文祺、陶希圣、樊仲云、许德珩等,还聘请周

恩来、李富春、郭沫若、李季、蔡畅、章伯钧、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项英、彭泽湘、陆沉、郭冠杰和苏联顾问铁罗尼等任政治教官，军事总教官为兰腾蛟。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开学典礼，出席典礼大会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吴玉章、于树德、徐谦、董必武、詹大悲等。4月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学兵团1300余人编入武汉分校入伍生总队，全校学生和入伍生达6000余人。武汉分校规模之大，教官人才之众多，不亚于黄埔本校，比潮州、长沙、南宁三个分校要大得多，实为中国腹地武装革命势力的大本营。武汉分校政治教官第3次会议规定，分校学生必须实际参加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每星期至少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国共产党领袖、文化界名流来校演讲一次。毛泽东1926年9月在广州黄埔军校向学生作过一次演讲，1927年1月在武汉分校向全体师生又作过一次演讲，主要内容是有关两湖的农民运动。他从1月4日至2月5日，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武汉分校演讲后，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需要立即实行。3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分校引起了强烈反响，后来被编入教材。应邀到校作过演讲的还有宋庆龄、谭平山、陈独秀、瞿秋白、吴玉章、董必武、彭述之、谭延闿、郭沫若、彭泽民、徐谦、于右任、甘乃光、孙科、向忠发等。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是国共合作最为密切、革命空气最为浓厚的一块圣洁之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党员在此学校任教，同时像邓演达、张治中这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都执教。安排的课程内容也很丰富，如政治方面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论》、《唯物主义哲学》、《建国大纲》、《政治经济学》等，女生队还专门开了《世界妇女运动史》等课。女生队队长郑奠邦就是一位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指导员钟复光是中共

党员,她的丈夫就是武汉分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施存统原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1923年8月因病辞去总书记到上海大学任教。这对革命伴侣结婚前还有一段有趣的轶事。钟曾发誓不打倒帝国主义不结婚,恋爱结婚岂不影响工作学习?施表示要“相互创造自己,协力裨益社会”。为了表达自己的一片深情,施存统特意刻了一颗《复光复亮》的图章,把遐迩皆知的名字施存统正式改为“施复亮”,还作了一首打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行,还怕哪桩?”1926年春他们结为终身伴侣。

施复亮和钟复光在大革命失败后虽然都脱离了党,但他俩始终深深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1945年施复亮在重庆与黄炎培、胡厥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建国后参加政协,曾任共和国劳动部副部长,1970年12月病逝。钟复光解放后任上海市女一中校长,全国妇联执委,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中共中央决定为钟复光恢复党籍。施存统的长子施光南是当代最著名的音乐家,他的歌家喻户晓。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武汉分校成立以来,师生除了积极学习政治、军事课程外,还走出校门,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蒋介石硬要迁都南昌,为了维护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武汉分校学生走上街头,向国民政府请愿,举行游行示威。汉口英国水兵枪杀和平民众事件发生后,军校学生愤怒声讨,通电全国,一致要求严惩凶手,收回英租界,这就是1927年“一·三”惨案。英租界接受后,武汉分校政治科宣传队特组织“一·三惨案化妆宣传会”,连续5天在汉口血花世界进行表演宣传,支持和鼓舞武汉人民进行反帝斗争。

1927年3月10日,武汉市总工会宣传会议在汉口血花世界举行。武汉分校中一小撮右派分子,闯入工友会场,围攻殴打工人,并拘拿4名工人,将其带到军校。事情发生后,学校总队的

党部和直属队的党小组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并经过讨论作出了几条决定:派代表慰问被打伤的工人,由校方到总工会道歉,声明这是少数反动分子所为,不能代表校方立场;全体学生列队,将被拘工友送回总工会,并进行赔礼道歉;严惩肇事凶犯。在政治总教官武汉分校校务委员恽代英的主持下,组织了审查委员会,揭发、检举、制裁反动分子,结果,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学籍,交中央严办者 20 名;开除党籍、学籍在逃通缉者 13 名;开除党籍、学籍者 24 名;开除党籍 1 至 3 个月并记大过 1 次至 2 次者 19 名;严重警告者 38 名。通过这次整顿,由于妥善处置了这一事件,革命群众同军校学生的关系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加亲密。处理这件事关系到革命军对工农群众的态度,可见当时武汉分校领导人邓演达、恽代英、顾孟余是有鲜明的反帝反军阀特点,学校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

且说武汉分校是在革命统一战线出现激烈政治分化的形势下,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主创办的。根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吴玉章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议,鉴于国民党中央已迁至武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应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本部,这个建议在会上得到了通过。1927 年 3 月 27 日,武汉军校改为委员制,从而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黄埔军校中心的转移及军校改制,是提高党权,防止军校学生蜕变为蒋介石私党私军的重要措施。军校在改委员制后,指定谭延闿、恽代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 5 人为委员,其中前 3 人为常务委员,恽代英兼政治总教官。邓演达随北伐军进入武汉后,被任命为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还兼汉阳兵工厂厂长、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校长,身兼数职,大权在握。这样他的左派立场使蒋介石开始有所警惕,但蒋毕竟没有将邓看作是共产党,还想拉拢邓,并劝他不要走得太远。在军权、党权问题上,邓

演达拥护国民党中央应限制蒋的权力；在对待农民土地革命问题上，邓演达在南昌与蒋介石彻夜长谈，蒋介石不重视邓的意见；在迁都问题上，两人意见也有分歧。从此，邓演达对蒋介石丧失信心，蒋介石也认为邓演达被共产党收买，无可救药，因而在北伐的关键时刻，两人开始决裂。邓演达看到形势已无可挽回，乃连夜由南昌赶回武汉，他想也许这是与蒋最后一次见面了，既然“道不同，不与为谋”，从此各走各的路吧！邓演达没有忘记在广州黄埔军校与王柏龄关系恶化，从而负气离校赴德国攻读经济、政治学的那段不愉快的经历。当时王柏龄诬称他和恽代英、张治中、高语罕为“黄埔四凶”。那个时候，蒋介石还高喊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口号，邓从德国回来，蒋介石不计个人恩怨，重新委派他为黄埔军校教育长。邓励精图治，主持校务，团结左派，把黄埔军校办得朝气蓬勃。

1926年，第三国际派往中国的一个参观团到了黄埔军校，由邓演达介绍经验。代表团团长参观以后，连声赞曰：“邓教育长了不起，是位人才，他对练兵有一套，对世界形势也非常清楚。”蒋介石利用当时中共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弱点，策划“中山舰事件”后，邓演达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起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的事件，便挺身而出，前往国民政府向众多军政要员阐明自己的见解。他说：“国民党的寿命有多久，要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进程和规划中推测，国民革命完成之时，就是国民党的寿终正寝之日。”他又说：“我们仿佛是一个清道夫，扫清道路让共产党去走。”接着，他气愤地赶到蒋介石的东山官邸，当面指责蒋介石破坏了孙中山既定的政策，破坏了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是办了件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大傻事，劝蒋要以大局为重，召回第1军和黄埔军校被迫离去的共产党师生。蒋介石当时羽毛未丰，作了个假检讨，把“中山舰事件”当作一场“误会”而

掩饰过去了,但蒋从此与共产党貌合神离,于是国共合作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邓演达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他一片忠心反而遭到蒋介石的猜忌。蒋派人暗中监视他,软禁他,把他调离黄埔军校,改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兼潮州分校教育长。他的兄长邓演存曾就此对廖尚果说过:“这是蒋介石对邓演达明升暗降的一种手段!”由于蒋介石不采纳张治中的建议,没有任命周恩来为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便只好再次起用邓演达,希望他在北伐军政治部主任这个重要岗位上,为他胜利进军作出成绩。没有料到北伐尚未成功,蒋介石就想再次掀起反共高潮。邓演达对蒋介石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想在武汉依靠宋庆龄、陈友仁、汪精卫这些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改变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共产党“在野党”的地位,让武汉政府成为国共联合的政权。

国民党中央决定1927年3月7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到达武汉,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委迟迟不来。到了开会的日子,谭延闿和陈公博等从南昌来到武汉,带来口信说,国民党中央主席张人杰(张静江)拒绝参加大会,到上海去了,蒋介石说要把会期改为3月12日他才能来开会。但多数中委反对会议延期,还是如期召开。不过,大会把3月7日的会议算作预备会,3月10日算正式会议,如果蒋介石真有诚意参加大会,3月12日来仍可赶上大会,可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到会。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等一系列限制蒋介石独揽党、政、军大权的决议,号召提高党权,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这些工作,主要是依靠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特别是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密切合作取得的。这次会议,使蒋

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计划没有得逞。在他遭到打击之后,决心不顾一切,冒天下之大不韪,利用手中的总司令权力,进一步投靠英、美、日等国及上海财团,积极部署清除共产党,一场预谋的反革命政变正在酝酿,国共交恶从此开始。

话说蒋介石为迁都问题,曾于1926年12月7日邀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及苏联顾问鲍罗廷一行10余人登上庐山,举行中央会议。会上他突然改变了自己提出迁都武汉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这些委员不仅不同意他的意见,反而质问蒋居心何在?弄得蒋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委员们第二天就下山径往武汉去了。1927年1月9日,蒋介石来到武汉,邓演达发动武汉各界近30万群众参加了国民政府的群众大会,欢迎蒋介石莅临。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大肆为自己表功。武汉群众反对迁都南昌,有人当场质问:“既然蒋总司令这样革命,为什么还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蒋介石一时语塞,不知所对。接着鲍罗廷讲话,他说:“革命要依靠群众,反对个人独裁,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蒋在武汉发现革命群众对迁都南昌极为不满,他当晚恼羞成怒,想查明邓演达在武汉究竟搞了些什么鬼。恰巧,有一位不速之客,要求登门求见。这位求见者并非别人,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秘书周佛海。

周佛海何许人也?此人历史说来话长。为了让读者对周佛海有一个初步了解,不得不在此多赘述几笔。周佛海,原名福海,1897年生于湖南沅陵,幼年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1917年东渡日本,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取得湖南官费留学生的资格;预料一年后升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3年;毕业后升入京都帝国大学,专攻经济,直到1924年毕业。留学期间,他

曾翻译过《社会问题概论》、《互助论》等进步书籍，少年得志，小有名气。

1920年6月，周佛海暑假回国省亲，到上海后，听说湖南督军张敬尧与湘军打仗而未返湘。这时他会见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并与陈独秀、沈玄庐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周佛海作为中国在日本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周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他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的邀请，任宣传部秘书；不久，又应广东大学校长邹鲁的邀请，兼任广东大学秘书。这时，周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打得火热，并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广东革命政府，公开背叛共产党的纲领。1924年9月，中国共产党将周佛海开除党籍，周旋又赴日留学。1926年3月，周佛海回国，应武昌商科大学校长郭泰祺的邀请，任教务长，旋持戴季陶的介绍信南下，投靠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任政治部中校秘书，并随军北伐。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成立国民革命军武汉行营，周佛海被任命为行营秘书，协助邓演达工作。周佛海目睹邓演达既与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陈友仁关系密切，又与中国共产党情投意合，早就怀恨在心，但没有找到机会向蒋介石密报。这次蒋介石为迁都来武汉，他认为机不可失，因而才有深夜求见之举。

周佛海向蒋介石汇报了邓演达如何与毛泽东、陈克文组织全国农民协会，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情况，又密告邓演达在武汉成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搞委员制，排斥蒋介石独揽大权的情况。他添油加醋，把邓演达描绘成一个公开反蒋的危险人物。蒋介石对邓演达早就存有戒心，他妒嫉邓演达的才干，怕他在武汉煽动党、政、军与之分庭抗礼，更怕邓在武汉分校把他的黄埔看家本钱一锅端走，于是，蒋介石指示周佛海，要他密切监视共

产党及邓演达的活动，并随即委派周佛海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与戴季陶、邹鲁、谢持这批“西山会议派”元老关系不同寻常，因为他由相信马列主义改为相信国民党右派，共产党的党籍也被开除，所以被西山会议派委任为“中央宣传部长”，只是他要赴日写毕业论文未到职视事而已。不久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一片谴责声中解体了。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周佛海受到警告处分。

周佛海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只因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得如今里外不是人。周佛海的信条是“谁上台就为谁抬轿子”，他惯用笔杆子打天下。在日本求学期间，他翻译了一两本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小册子，使他顺利地当上了中央“一大”代表，以为今后会出类拔萃，光宗耀祖。后来孙中山在广东组织革命政府，他又投靠广东，一头扎进了国民党的政治圈子里，但谁知又犯了错误。如今，北伐快成功，蒋介石大权在握，他又卖身投靠，想将来出人头地。周佛海十分想跟随蒋介石到南昌去听命，但蒋对这位由中共“一大”代表而转向的“智囊”存有戒心，便依然决定玩弄他的惯伎，已任命了一个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为武汉分校代理校长，再委派一个国民党右派的周佛海去当政治部主任，使其互为监督，他则可坐收渔人之利。蒋还要周佛海插手地方党政部门，委派他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候补监察委员，好扶植武汉方面拥蒋的努力。蒋介石向周佛海面授机宜之后，周佛海如获尚方宝剑，在武汉分校拉帮结派，与邓演达貌合神离，引起了当时在校任炮兵大队区队长郭化若、学生总队政治大队一队队长徐向前等共产党人的强烈不满。当时在武汉分校任中共党委书记的陈毅，其公开身份为政治部准尉文书，他与恽代英、施存统三人组成中共武汉军校党委。在周佛海眼皮子底下

活动的陈毅,却也没有引起周佛海的注意。如要把周佛海比作一个爱私下里告密的小人倒是恰如其分的。蒋介石正是看中周善于打小报告的特点,认为对己有一片忠心,才委以重任的。

武汉分校建校伊始,邓演达除了管湖北党政军大事外,还要具体为建校觅寻校址。先在武昌紫阳桥烈士祠边找着一所停办的中学,开始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牌挂了出来。邓演达跑来一看,说这里像一座城隍庙,哪里容得下5000多名学生?这里作为学校筹备处办公用还可以,作为一所堂堂的军事学府,那就太不像话了。包惠僧当即带了几个助手,在武昌、汉口、汉阳跑了两三天,终于选定两湖书院旧址,其址当时是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校舍。这次邓演达看过后认为可以,就在这里建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最有成效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后习惯叫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邓演达要包惠僧起草一个军校军事教育纲领,并要他同共产党方面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商量一下,多吸收一些进步人士的意见。包惠僧把邓演达的意见用书面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派张国焘同包惠僧谈话。张国焘对邓演达可说是老相识了,在广州黄埔军校时,邓演达任教育长,包惠僧任政治部主任,张国焘曾与邓打过交道,现在又聘请张国焘任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在张国焘的印象中,邓演达是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有武断的口吻。张国焘认为这教育纲领不必大做文章,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贯彻就行了,更不必另搞一套。包惠僧一直拖着未写,有一次在校本部召集会议,邓演达再一次提出教育纲领问题,后来包惠僧就把他讲话的纪录稿加以修正补充,并把这个教育纲领完卷交差。这一切没有逃过周佛海的眼睛,他将这教育纲领偷偷地呈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后来就将邓演达的这个教育纲领视为校第三党的理论根据,以致公开挞伐,欲置邓演达于死地。蒋介石如何陷害邓演达,那是后话,在此暂且不提。

且说周佛海在武汉还有一段见不得人的丢面子的事，那就是他刚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应聘来武昌大学任教，由于左派人士激烈反对西山会议派分子，他被迫灰溜溜地辞职回到上海赋闲。幸亏在西山会议上结识了戴季陶，才有今天如此辉煌腾达。区区一个武昌大学教授，哪能与现在的少将政治部主任相提并论，他想在武汉干出一番事业，好给蒋介石争口气。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反共清党，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时在武汉地区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周佛海的暗中支持下，蠢蠢欲动。4月18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23日，武汉各界40万人在阅马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武汉分校学生义愤填膺，周佛海在这种环境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谋外逃。5月13日，驻扎在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发表反共通电，率兵进攻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直逼武汉。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唐生智、张发奎部前往河南北伐，武汉内部空虚。在此危急形势之下，武汉国民政府派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师长叶挺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组成中央独立师前往镇压。当时作为留守部主任的周佛海未随大军前往平叛，他怕自己的右派身份暴露，连夜携妻杨淑慧、子周幼海化装商人乘船潜逃至南京，在轮船上他写下了《逃出了赤都武汉》一文，公开进行反共宣传。当他想带着这份厚礼到上海晋见蒋介石时，刚走出上海东站，却被上海清党委员会负责人陈群和上海警备司令杨虎逮捕，以赤色分子罪关进了上海市区西南的枫林桥畔的警备司令部，性命危在旦夕。在监狱里，他获悉中共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均被杀害于此（当时有“血溅枫林桥”之称）。幸亏其夫人杨淑慧通过张治中、吴稚晖、陈铭枢等人向蒋介石求情，蒋下手令将周佛海释放，并任命周佛海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

学校政治总教官。上海“四·一二”政变，群众有“虎狼成群”的讽刺，“虎”即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群”即上海清党委员会负责人陈群。周佛海在武汉潜逃脱险，想不到又在上海落入虎口，但是，周佛海此人一生善于察言观色，翻云覆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汪精卫密谋，叛国投敌，当了汉奸。周佛海如何投靠蒋介石扶摇直上，如何暗中通敌，叛蒋拥汪出逃，如何以汉奸罪独能免死之谜，那是后话，在此不提。正是：一仆哪能事二主，见风驶舵要翻船。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风云突变 蒋介石背叛革命 大开杀戒 上海滩血流成河

话说蒋介石在武汉碰了一鼻子灰，满怀着一肚子怨气和怒气，于1927年1月18日离开武汉回江西，中途上了庐山，张静江、陈果夫跟随左右。此时，侍从副官呈送一宗文件和报纸，其中有毛泽东考察湖南农运情况、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以及汉口、九江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支持下，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新闻。

这些新闻使蒋很不高兴，他电召武汉的邓演达和南昌的郭沫若火速上庐山面谈。庐山面谈双方产生分歧，在去鲍罗廷顾问职务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邓演达当即坚决反对；在对英、美、日等国在华利益不能随意侵犯问题上，郭沫若说这是孙中山早就要解决的大问题，群众反帝的正义举动我们应该支持。双方没有共同语言，最后不欢而散。从此蒋介石萌发了解散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念头。

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昌，于2月初秘密派他的拜把兄弟戴季陶化装成日本商人赴东京，与日本外务省次官、亚洲司长、条约局长等会谈，谋求互相“谅解”，“从事和平合作”。4日，美国也派代表到南昌，同蒋介石会谈，蒋公开表示一定保护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并要求英美给予援助。张群、黄郛、王正廷、虞洽卿代表不同主子的利益。纷纷聚集南昌，进行所谓的“政治南

伐”。如果取消“反帝”口号,英、美等国就同意增加关税二五附加税,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蒋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和帮助后,他的反对革命的胆量就更加大起来了。

3月6日,蒋介石唆使他的爪牙,惨杀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陈赞贤。10天后,蒋介石又命令其爪牙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解散江西省学联,封闭国民党左派办的《贯彻日报》社。当时 AB 团(AB 是 Anti - Bolshevik 的简称,即反布尔什维克,也称反共团)的成员公然举着“打倒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在南昌街头游行示威。在九江也出现“打倒赤化分子”、“蒋总司令万岁”的标语。一批青红帮流氓围攻和捣毁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市总工会,打死职员和工人 4 人,重伤多人。当工人纠察队准备解除暴徒武装时,蒋介石即派大批军警弹压,掩护暴徒撤走,并以“保护”社会秩序为名,调兵强占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同时当下就设戒严司令部,准备镇压工人的罢工反抗。3月20日,蒋介石到了安庆,又引起了工人与青红帮的械斗,省农协筹备处的办公处被抢劫一空,并打伤职员和省代表大会代表数十人,重伤多人。

当时郭沫若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随总司令部同住一处。他亲眼看到这些反共反工农群众的事件,都是蒋介石授意由其国民党右派党徒和当地帮会流氓制造的。郭沫若曾在—本书中写道:

“我们对于他(指蒋介石)虽然不免已有几分怀疑,但我们还以为他总不会是主使的人,主使的人一定是段锡明、周利生等背叛民众的党棍和走狗。及到‘三二三’的惨案发生,我们才知道这个阴贼险狠的大叛徒——这个万恶滔天的蒋介石!”

蒋介石到安庆后的第 3 天,就发生了安庆惨案,武汉的君子

只动口,南昌的屠夫就下手了。

蒋介石于1927年3月26日秘密进入上海,28日李宗仁也乘沪宁火车由南京抵达上海。白崇禧见蒋、李先后来沪,心里非常高兴。蒋当晚乘车由卫队长宓熙护送到公共租界西摩路访宋子文,两人研究了上海的局势。蒋还在宋公馆会晤了宋老太太、宋霭龄、宋美龄,这是蒋三年前在上海见面后的第一次重逢。当时宋美龄刚从美国留学回来。蒋介石与宋美龄有些情缘,即使刚抵上海,也已有人通风报信给陈洁如。深夜11点,蒋依依不舍地告别宋氏兄妹,带着宓熙与两名卫士径直驱车到迈尔西爱路陈洁如处下榻。蒋与陈再也没有当年如胶似漆的感情了。蒋垂青于宋氏三小姐,想今晚与陈洁如摊牌,了却这段姻缘,可两人谈谈吵吵,哭哭闹闹,弄到凌晨两点。蒋对陈说:“你还年轻,给你10万大洋,留美深造!”陈洁如见蒋如此薄情,只得眼眶噙着泪水,把苦水往肚里咽。

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高昌庙江南兵工厂里面的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钮永建、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静江、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等。汪精卫昨天才从国外回国,也应邀出席了会议。汪是在国内一片“迎汪回国复职”运动中,从欧洲经莫斯科返抵上海的。汪刚到上海,便被蒋介石集团中的党政军要员所包围。蒋介石会晤汪精卫时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说!”蒋首先希望汪留在上海以暴力清党,然后一同到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合法的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在秘密会议上,蒋介石严肃地说:“民国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

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接着，他装出一副谦逊的模样又说：“我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其实，早在昨天，蒋介石就连续召集留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委员暨驻沪军政负责人开会，商讨“清共”计划。4月2日举行的秘密会议，由吴稚晖、张静江等8人在会上抛出了所谓的“举发中国共产党谋叛呈文”，诬称共产党已决定了“铲除国民党之步骤”，“现中国国民政府，已被俄国鲍罗廷个人煽动、支配而有余”，要求将这一“十万急迫”之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讨论”，进行“非常之处置”。蒋介石命陈立夫当记录，确定了应首先看管者的名单共计199人。其中有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毛泽东、邓演达、董必武、邓颖超、周恩来、张国焘、高语罕、詹大悲、顾孟余、沈雁冰、李硕勋、郭沫若、孙炳文、包惠僧、顾顺章、王若飞、施复亮、肖楚女、熊雄、张太雷、李汉俊、杨闇公、张秋人、周逸群、刘伯承、季达方、邓希禹等人。上了黑名单的人均为“要犯”，在全国范围内通缉，命“就近检举揭发，由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逮捕监视，制止活动，免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周恩来首当其冲，蒋介石用悬赏8万银元的巨额奖金来缉拿周恩来，他要置周恩来于死地，以翦除这位当年共过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电召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来沪，是因为李济深的第4军、李宗仁的第7军比较可靠；而第2军、第6军的政治部主任分别是李富春、林伯渠，这两人均系中共党员，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较多，被视为左倾不稳的部队，所以只允许第6军留3团人卫戍南京治安，并派何应钦的第1军驻防沪宁线

一带,监视他认为靠不住的部队。就是何应钦的第1军,内部大多数都是广州的士兵,并和上海工人纠察队举行过联欢,其中黄埔军校出身的下级军官,更加不满蒋介石这一时期内反共和镇压工农群众的行为,他们成群结队到上海来向校长质询。他们质询的主要内容便是蒋校长当年在黄埔一再强调服从第三国际领导、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蒋介石“为此事终日舌敝唇焦地剖白、劝慰,责骂,无片刻宁暇,卒至声音啞哑,面色苍白”。蒋介石把他认为最亲信的第1军第1师、2师、21师中黄埔毕业的左倾军官也全部调离,而让北洋军阀周凤歧的26军来上海接防,以便实施他的清党反共计划。李宗仁献计“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胡汉民则说:“清党要清的干净。”李宗仁为什么要站在蒋介石一边为“清党”献策呢?据李宗仁说,是因为武汉国民党中央太过激了,使得原来反蒋氏独裁的民主思潮,一转而为反对武汉中央政府过激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潮了。当时北伐胜利如此之迅猛,各路军阀部队见机输诚,一变而成国民革命军,从北伐时仅有8个军,到1927年4月前,全国国民革命军已扩展为43个军,另外还有7个新编军。这些军队来自封建军阀,成份复杂,如周凤歧、叶开鑫、夏斗寅这些军长,本来就反共反苏,蒋介石高举反共大旗,他们就积极拥护,不用做思想工作。张静江、宋子文与上海财团关系密切,青红帮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又答应提供流氓打手,《民国日报》在舆论上大造谣言,加上刘峙、胡宗南、蒋鼎文、钱大钧、顾祝同、周凤歧这批黄埔与非黄埔实力派军队的支持,因而蒋介石终于壮了胆,拼老命要与武汉分庭抗礼,要与共产党彻底决裂。

汪精卫于4月1日返国,蒋介石希望这位国民党资深元老站在他这一方,好利用他的“左派”威望与武汉中央抗衡。谁知

汪吃过老蒋的亏,他没有忘记广州中山舰事件,因此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在4月2日的秘密会议上,吴稚晖以老卖老,辩论至高潮时,竟向汪氏双膝下跪,求其改变立场,并留沪领导。汪连声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边说边退往楼上,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4月5日,汪精卫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开头说:“近来外间有种种谣言挑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合作关系,企图破坏中国国民革命,故中国国民党领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乃发表联合宣言,以释革命同志之疑。”《宣言》又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纠察队”都是“谣言”,要求国共两党同志都要“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宣言》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公开暴露。陈独秀和汪精卫实际上为蒋介石掩盖了策划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应付突然的反革命事变的思想武装。4月11日,蒋介石密嘱上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请住在闸北区湖州会馆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杜公馆晚宴。当晚,汪寿华被害于杜公馆。

蒋介石则于前两天悄然离沪去了南京,临行前授权给白崇禧和周凤歧“相机处理一切”,而汪精卫则于4月5日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后,也悄然从上海乘船去了武汉。汪当时孑身一人,毫无凭借,他只得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免得重蹈覆辙。他要到武汉依靠鲍罗廷和武汉国民党中央,依靠共产党同蒋介石相抗衡。尽管后来汪精卫也走上反共的道路,但那是后来诸多矛盾发展的结果,其并非一踏入国门就想反共的。在武汉,革命群众仍把汪当作国民党的左派,并对他寄托了希望。

再说说周恩来。自从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主张以武力给予回击。周恩来在离开黄埔军校和第1军后，主办了高级政治训练班，积极参加北伐。1926年底，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担任中央军委书记。他告别怀了孕的妻子邓颖超，也顾不得去武汉探望负伤的恩寿小弟，只身从广州秘密乘船到上海，与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上海工人起义，解放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下的上海人民。这样，以工人群众的起义直接援助和配合北伐战争向东南的进军，并制止蒋介石的清党反共阴谋。

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第一次是1926年10月23日，由于准备不足而宣告失败。后来周恩来在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三周年纪念日讲到第一次起义。他说：“第一次暴动完全是儿戏，只是根据夏超独立来决定暴动的，没有计算上海工人斗争的条件，几支手枪的瞎冲，牺牲了几个同志。”

1927年2月21日至24日，上海举行了以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为领导的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与日俱增，由第一天的15万人激增到第四天的36万人。由于到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受蒋介石的指使按兵不动，受到孙传芳的上海守备司令李宝章的镇压，所以起义又一次失败。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组成了专门领导起义的中共中央特委和特军委，成员有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汪寿华、以及刚从苏联返国的彭述之。特军委成员有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尔梅。周恩来亲自参加训练几千名上海工人纠察队，还有黄埔军校一部分秘密派往上海做工人、军队地下工作的历届毕业生，他们在第三次起义中起了巨大作用。3月19日上海区委制定的行动纲领为：“北伐军快将来上海。此时上海民众的责任

是：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用民众的力量，最后根本的消灭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上海民众的直接政权。”

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孙传芳所部溃不成军，这时第1军1师薛岳率部来援，完全将溃兵俘虏，居民燃放鞭炮，至24日暴动完全成功。白崇禧不费一枪一弹进入上海市。3月23日，上海临时市政府成立办公，下午2时开常委会，到会委员有郑毓秀、罗亦农、侯绍裘、林钧、谢福生、丁晓光、李伯之、王景云、汪寿华、陆文韶、王汉良、杨杏佛、王晓籁等，杨杏佛为主席；24日，张静江、蔡元培、马叙伦由杭州来上海；26日，蒋介石也进入上海。

对于蒋介石的“清党反共”阴谋，周恩来在3月30日召开的中共特委会上早有预测。他说：

“老蒋有四个目标：G·P、工会、工人武装、左派。他的最秘密的还有个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李石曾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大将是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四大金刚。”“整个的情形，他们对付我们已有准备，但无所谓步骤，将来或许是借扰乱治安等名目来干，对党部将来是挑拨错处，我的推测是如此……将来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用流氓。在安徽已联合大资产阶级、流氓群众，召集大会，蒋有代表出席。”

周恩来算是最了解蒋介石的了。凭他前些天的经验，以为上海也如江西、安徽那样，蒋介石依然采取雇用流氓，对党部、工会采取打、砸、封的办法，但没想到他会突然来了个“四·一二”大屠杀。

4月11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杀害后，12日凌晨2时许，由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组织的一伙亡命之徒换上工

人服装,戴着印有“工”字的臂章,全副武装,准备上阵。张啸林狂妄地叫嚣说:“等我们迈出杜公馆大门一步,就要应生死有命这句老话,碰碰看谁的额骨头高。”杜月笙则假斯文尖着嗓子说:“今天的事,不管成功失败,我们惟有尽心尽力。”杜月笙是蒋介石在上海滩混迹时的师傅,以贩卖鸦片起家,后为上海法租界青帮头子之一。他广收门徒,横行霸道,因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有功,蒋介石封他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还委派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顾问。当年戴笠穷途潦倒时,正是杜月笙向蒋介石引荐,后来成为黄埔军校第6期学生,当了国民党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曾赠送给杜月笙一幅中堂对,由饶汉祥撰赠。联曰:“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由此可见杜月笙在上海滩是有一定名气的。戴笠这位黄埔学生的传奇经历,此处暂无暇涉及,以后再述。

言归正传。且说那些流氓打手换上工人服后,持枪开始行动。兵分两路,一路向三山会馆和华商电车公司;另一路向湖州会馆和商务俱乐部冲击。包围华商电车公司的流氓约250人,到4时30分还未能攻入,当时26军帮助进攻,机枪步枪响成一片,晨6时攻入电车公司,工人纠察队重伤3人,被缴去枪支300多支。同时三山会馆也被攻下,缴工人纠察队枪支345支,死伤300多人。上海总工会会所也被强占。13日,上海工人、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要求交还枪支,保护工会,又遭26军袭击,宝山路血流成河。

14日,白崇禧、刘峙、周凤歧的部队配合杨虎,陈群的爪牙联手展开“清党运动”,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查封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整个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据不完全统计,在事变后3个月,共杀害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拘捕“共党分子”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

人。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狴的刽子手。

蒋介石大开杀戒，共产党人首当其冲，就连一些优秀的黄埔军校学生，也倒在“校长”的屠刀之下，不少黄埔军校毕业生被派往上海协助开展工人运动。在“四·一二”政变中，一位姓何的同学气愤地质问他的黄埔同窗、当时正在革命军中任职的慕中岳说：

“慕同志：你总还记得我们政治科在广州中山大学集训的情况吧！你分配到军队工作，我是校长派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直鲁军、五省联军，最近在上海对工人特别残酷，我们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同这些军阀军队打了很多仗。如果不是工人纠察队在市内干起来，你们怎么会进占上海那么快呢？”

“总理革命四十年，最后把革命任务交给校长，万想不到他竟会对工人开枪！”

“我们同志同军阀在上海打，牺牲并不大，昨夜则我们黄埔同学就牺牲了好几个。原来同我们在黄埔军校常来往的第二队同学周异三，你们第一队同学李玉等都牺牲了。”

以上是黄埔期毕业生慕中岳写的《上海“四·一二”事变目击记》中的一段话，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类似这样的回忆文章比比皆是。蒋介石的罪恶铁证如山，他把周恩来列入通缉名单的首位，愿出8万大洋买周恩来的头颅。

26军2师在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前，师长斯烈特地派人送信给周恩来，邀请他来师部举行谈判。周恩来虽然感到形势紧张，但认为斯烈不会立即动手，便由工人纠察队队长顾顺章带着6名卫士，陪同来到宝山路2师师部。斯烈这时已接到蒋介石逮捕共产党领袖的密令，他缴了周恩来卫士的枪，并扣留了周恩来。周恩来双目怒视斯烈，义正词严地提出抗议：“你还是不

是总理的信徒？你们公然背叛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工人群众，你们这么做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认识周恩来，而且知道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斯烈的亲弟弟斯理（斯励），又叫啸平，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毕业的学生，与周恩来有师生关系，经常向斯烈提到周恩来的事。斯烈不敢正视周恩来那双炯炯如剑的目光，低着头说：“我也是奉命的！”恰好这时，26军党代表赵舒及时赶到，他和周恩来的公私关系都很好，是国民党左派，见斯烈竟然将周恩来逮捕起来，立刻把斯烈叫到隔壁房间训斥了一顿，并要他立刻释放周恩来。一会儿，赵舒与斯烈出来见周恩来，斯烈面有愧色，言道：“请周先生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在他们送周恩来出门时，一再表示歉意。

4月中旬的一天，为逃避敌人的追捕，周恩来秘密乘一叶小舟渡过黄浦江，潜入局势稍平稳的浦东贫民区，打算暂避风头，然后离开上海，不料，又被几名士兵抓住，押送到团部。这里驻扎着何应钦第1军某师鲍靖中团。当鲍靖中审问时，才发现是他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鲍靖中十分敬重老师的人品与才华，他一向不赞成反共，倾向进步。鲍靖中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已定下计策：他佯装单独审查被逮捕的人，支走了在旁边的士兵，然后悄悄地请周恩来换上军装，扮作自己的卫兵，一同骑马离开沪东。几经周折，他把老师安全地护送到真如火车站附近，让他脱险。

抗战时，鲍靖中任过汤恩伯部的副师长，后负伤辞去军职在南京定居。1950年夏，周恩来到南京视察工作，即委托当时的南京市长刘伯承、副市长张霖之代为打听鲍的下落。1956年，周恩来陪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到南京参观，才如愿以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给鲍靖中，致以问候，以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一

年后,周恩来因公又来南京,特地看望了鲍靖中,临别时特别向南京市领导指出,要妥善照顾鲍靖中一家人的生活。鲍靖中后来病逝于南京。鲍靖中舍命救老师的事令人感动,俗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周恩来念念不忘鲍靖中这位有救命之恩的弟子,并关照安排鲍的生活,也是非常讲良心讲义气的铮铮大丈夫。

尽管黄埔学生中不乏鲍靖中这样良心未泯之士,但虎狼鹰犬之辈也不在少数。据当时任“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的胡逸民在《纵横》杂志总 17 期载《不容青史尽成灰》一文中回忆说:“该组织除了他之外,其余均为清一色的黄埔军人,是专门为清洗、屠杀共产党人而设立的审判机构。如骨干分子刘伯龙,黄埔三期毕业,有‘地煞星’之称,嗜杀成性,即使同窗也毫不留情。”此人 1948 年底任国民党 89 军中将军长,驻军贵州,因与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矛盾尖锐,于 1949 年 11 月被谷正伦骗至晴隆县政府枪杀。正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时间一到,就见分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清党反共 黄埔岛腥风血雨 同室操戈 钱大钧追杀熊雄

话说蒋介石一手策划和发动的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得逞后，李济深由上海返抵广州，与当时任广州戒严司令钱大钧、留守广州的后方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人朱家骅、黄埔军校代理校长方鼎英等开会布置“清党”，这就是历史上称为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参加这次反革命大屠杀的领导人还有古应棻和李福林。政变前，他们散布共产党将于16日攻击广州沙面的谣言。4月15日凌晨，李济深出动了海军、陆军、保安队和警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的苏联顾问住宅，开始对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派进行大搜捕。

钱大钧是黄埔“八大金刚”之一，字慕尹，江苏昆山人。祖父钱伯熊是清朝贡生，曾显赫乡里，到了父辈家境破落，双亲早亡，随兄钱企文赴上海经商，后回苏州靠已出嫁的姐妹抚养。后来他上了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保定军校当炮兵队分队长。陈诚、罗卓英、周至柔是他的学生。此人精于文笔，写得一手好文章，有儒雅风度，受到蒋介石器重。但他心狠手毒，翻脸不认人，清党中不管是同乡，还是同学，他一概六亲不认，是蒋介石的忠实打手。他以戒严司令的身份，实际上负责广州地区的清党工作，指挥所属海陆军。当时由徐景唐师担任石围塘及花地、芳村一带警戒，公安局长邓彦华担任市区搜查、海

军方面担任珠江河面警戒,李福林的军队担任河南警戒,白色恐怖笼罩于整个广州地区,“中山舰事变”时的情景又重现于这个革命的大本营。方鼎英是属于“温和派”的将领,他对蒋介石的“清党”反共有不同看法。据他写的《我在军校的经历》一文回忆,屠杀共产党人的计划令人毛发悚然。现摘录一段如下:

午后三时许,我正在广州入伍生部,国民政府后方留守李济深自沪返穗,专人邀我到河南士敏土厂留守总部去谈话,时在座有代表张静江,负责后方中央党部责任的朱家骅与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等人。一见之下,李即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清党电令呈阅。我反复阅读,尚未作声,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军校。校长要我问你,军校的共产党有多少?谁是共产党?谁是主要负责人?你平日有没有调查过?清党时会不会出乱子?你有没有把握?你能不能负责?”我反问说:“据电令的指示,只是清党,并不是要杀共产党,是吗?”李答:“是的。”我当即表示:“我是教育长兼代校长职务,这个责任应归我负,不过我声明:去年决定北伐时,鉴于校内国共两党师生间暗潮日大,故曾坚求辞职,虽未获允许,但我已一再说明,我只一心办学。因此,我在学校对任何人皆一视同仁,对中共师生亦未曾有所调查。今即清党,我有三点要求:(一)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内,凡属学员、学生、入伍生所在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舰前来;(二)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三)请给我一笔款项,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三个月薪水作川资,有困难者可预支到五个月。至于熊

雄主任,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是否为学校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不得而知,但他是对学校有功绩的。我拟请他赴法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李但点头沉思,而朱、钱两人则对我瞠目而视。我料知他们内心是极不以为然的,因再表示我的意见说:“能这样,我保证不出问题,否则请另选高明。”李乃说:“就这样吧。”清党办法,就这样决定了。我立即返回入伍生部,以电话召集省城方面军校所属各单位负责人前来面商,并决定在当晚点名后,即将枪支的弹药、机子、刺刀等收藏起来。并在明晨起床点名时宣布清党命令;三日之内,或自动报告承认,或请假支薪离校,听个人自愿,其余照样上课出操,决不许有任何粗暴行动,然后我即回到校本部作同样的布置,时已深夜十二点了。

方鼎英于4月14日深夜,秘密找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熊雄谈话,并告知迅速离开黄埔。在临行前,他交给熊雄2500元港币,答应第二天用汽艇送他赴广州再转香港。熊雄对这突如其来的清党一时转不过弯子来,他脸上顿时变色,沉痛地说:

“教育长,你埋头办学,我是很敬佩的。这次清党,乃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蓄谋,他们是中山先生的叛徒,违反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背弃中山先生的遗嘱,竟敢置北伐大敌于不顾,作出如此自断手足的清党行动来对付异己,破坏国民革命。他们这种不顾大局自掘坟墓的勾当,将是白费心机,最为可耻。”

熊雄,原名祖福,号中和,字黧士、披素,江西宜丰人,1892年出生,瑞州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西新军学兵团,因讨袁起义失败流亡日本;1919年赴法求学,与赵世炎、李立三同组劳动学会;1922年3月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同年8月中共旅欧支部成立,他

是支部成员之一。为了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共旅欧支部选送熊雄、赵世炎、王若飞等 12 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 年 10 月,熊雄回国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工作,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他创办《黄埔日刊》,聘请肖楚女、恽代英、高语罕任政治教官。北伐后,熊雄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对黄埔军校开展政治教育有突出的贡献。方鼎英实在不忍下手清除像熊雄这样有才干的共产党人,但又迫于形势,只得劝熊雄出国。熊雄气愤地说:“钱大钧与我曾为了反对北洋军阀,一起亡命日本,靠卖报纸过苦生活。今他亦为虎作伥,我真认错人了。至于朱家骅乃党棍之流,更不足道,我实不忍见此浩浩荡荡的北伐局面,竟败在此辈革命投机分子手里。我宁愿将我满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一泄我与此辈不共戴天之恨。”熊雄表示:“我要光明磊落离开黄埔,行前与黄埔师生讲一次话。”言毕,犹愤恨难消。次日,熊雄向全校师生作了简短的讲话,要大家恪遵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然后意气洋洋登艇告别而去。汽艇驶至江心,因机件失灵停下检修,当时监视黄埔军校的中山舰舰长吴嵎发现了他,派人登艇将熊雄秘密逮捕,押送广州,投入公安局监狱。钱大钧获悉熊雄被捕,心想这是抓了一条“大鱼”,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有了本线,而把当年流亡东洋同甘共苦的友谊,却早忘得一干二净了。为了升官发财,他出卖朋友在所不惜是势之必然的,5 月初即将熊雄囚于南石头惩戒场。这个监狱囚禁了不少黄埔学生,见熊雄来了,他们纷纷询问遭此突变的始末,为此深感不安和恐惧。当时熊雄以师长的身份,十分悲壮地对难友说:“不要怕,要杀头,首先杀我这样的人。”5 月 17 日深夜,熊雄就被钱大钧的部下秘密杀害,时年 35 岁。

熊雄是蒋介石恨之人骨的人物,在北伐前夕,他写了一张纸

条,上书“禁绝小组织——小团体”,当面交给熊雄,以影射暗示。熊雄却在《黄埔日刊》撰文《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指出:“坚持孙中山‘主张容纳各派革命分子’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共产党‘既是代表工农的政党,自有其独立性’,对于破坏党的组织的人,就应认作我们的公敌,即拿起对付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精神,与之奋斗。”白纸黑字,刊登在《黄埔日刊》1926年8月13日那一期上。当那一期日刊送到蒋介石手中时,他在南昌战役中正在吃败仗。王柏龄不知下落,蒋见熊雄这篇檄文,正戳中他的痛处,于是恨得咬牙切齿。

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当时黄埔同学会负责人、黄埔一期毕业生、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曾扩情写了一份秘密报告交与黄埔三期毕业的同学陈超带往江西面呈校长。内容说“不少未毕业的共产党员学生时常揭发区队长、中队长虐待学生和贪污不法的事情,以及任第60团团长的黄埔一期同学李杲,驻在中山县压迫农民和工人的事等等,责备同学会坐视不理;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弄得我十分狼狈,左右支绌。这都是熊雄有计划的策动”。蒋接到此秘报,怒不可遏,他身在前线,心系黄埔,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起家的大本营先乱了阵脚。熊雄这样搞,岂不是要他的命?毛思诚1926年11月11日撰写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对他当时暴怒的情形曾作如下描述:

公接粤电,知后方学生为人利用,欲推倒校长,犹是故态,不胜愤激。因谓:“三年来受尽屈辱,忍痛至今者,纯为总理革命使命,一手所扶植学生也,而今受人愚弄,胡闹若此,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当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的蒋先云婉言劝校长息怒,说:“同学们如小孩子一样,吵吵闹闹,情所难免,请平心静气,不要因小失大。”接着蒋先云表示愿亲自回广州进行调解,蒋个石

这才算怒火暂熄。也许,他听了曾扩情的谗言,才有杀熊雄的念头。熊雄自忖今后日子难熬,早在1926年10月他就写下一首赠黄埔同学的诗:“人生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与笑声。”

在这次大清洗中,黄埔军校著名的政治教官、共产党重要人物肖楚女也是钱大钧追捕的重点。广州清党时,肖楚女因病住在广州东山医院,他人在床榻上,心却在讲台上。3月30日的《黄埔日刊》上登有他的一则启事,告知黄埔学生,他所撰写的《政治问答》条目还将按期连载,因病敬请诸学生原谅,他不能亲自到校作答。学生们见之无不感动。

肖楚女1925年与恽代英共同主编《中国青年》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千万个进步青年由于接触这份刊物而走上革命道路,并且有些较为痴情的青年还以为肖楚女是位开明的妙龄女郎,情书纷纷飞进杂志社,弄得他啼笑皆非。其实,肖楚女是个有一脸白麻子的烈性男子,湖北汉阳人,又名树烈,原名肖秋,曾在湖北办过《崇德报》,做过《湖广新报》编辑,当过教员,1926年先后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任教官。他从小愤世嫉俗,读屈原的《离骚》,其中有“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遂情起而泣,哀国人之不争,改名肖楚女以示己志。见过肖楚女的人,都知道他喜欢那嫉恶如仇、痛快淋漓的学生。他讲课时,对真理就要大声疾呼,对谬误就要大加鞭挞;听他的课,简直如同喝烈性烧酒,让你浑身沸腾,几乎想冲出教室向黑暗势力作一殊死决斗。肖楚女七尺男儿,剑眉、虎腰,皮肤黝黑,并非娉娉婷婷的婀娜女子。他的名字,曾倾倒过不少的少男少女。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教官,只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军警们如狼似虎地闯进东山医院,将躺在病床上的肖楚女拖了出来,棍棒交加,然后挂在汽车后活活被拖死,牺牲时,令人惨不忍睹!一代英杰就这样离开了人间,肖

牺牲时年仅 34 岁矣！

曾任黄埔军校主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的孙炳文，接到邓演达从武汉打来的电报，聘他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务厅厅长兼军事厅厅长。清党前，他打点行装携妻带女乘船离穗，谁知竟是灾星难脱，4 月 16 日船抵沪岸即被上海清党的军警扣押，3 天后的一个月黑风寒之夜，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其遗孤孙世维由共产党抚养成人，送去莫斯科学戏剧，“文革”中被江青暗害。除此而外，在黄埔执教的共产党员安体诚于 1927 年 5 月就义于上海龙华监狱；王懋廷于 1930 年底牺牲于云南昆明；鲁易于 1932 年 4 月在湖北仙桃被蒋军枪杀。据统计黄埔军校政治部在清党中其人员损失了 80%，清洗后仅剩二、三人。广州“四·一五”事变中，周恩来在广州时居住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也被搜查。住在那里的麻植、穆济世、朱凯三同志被捕后，1 人在第二天被杀，2 人死于狱中。邓颖超那时因难产后身体未恢复，住在医院里，她怀的男孩子没有活下来。陈铁军化妆后去见她，要她赶快离开。邓在医院护士掩护下，连夜被护送并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由护士送她登上了去上海的船。临行前，邓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要她赶快到上海，用化名登报找他。邓颖超由其母杨振德署名，登报寻找“伍豪”，见报后周恩来立即与邓颖超见了面。

说起“伍豪”这个化名，原来还有一段故事。那还是“五四”运动时期，为了废姓抓阄，周恩来抓到了五号，因此就叫“伍豪”。周恩来用此名写过不少文章，后来国民党也用“伍豪登报脱离共产党”来蒙骗群众，弄巧反拙，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狼子野心。

且说邓颖超先在一个医院内躲了两个星期，以后找了一所房子，两口子加上杨振德也算一户普通人家，没有引起军警注意。后来风声越来越紧，他们由陈赓陪同，化妆成商人，于 5 月下旬某

天夜晚,从虹口码头搭乘英国怡和公司的客轮秘密离沪赴武汉。

再说黄埔军校的清党定于4月18日,后来史学家通称广州黄埔“四·一八”惨案。其实,清党活动早在前三天就已开始行动。当时黄埔军校有第五期学生约3000人,第二期学生正在人伍生团训练,约4400人。4月14日,李济深将蒋介石的清党电令交给黄埔军校教育长、代理校长方鼎英,随后,李济深、张静江、朱家骅、钱大钧、方鼎英等共同商讨了黄埔军校的清党步骤。当天晚上,钱大钧就命令中山舰及西江舰驶至黄埔军校海面实行封锁,并派兵包围了沙河四标营军校第五、六期学生和人伍生,将600余人全部缴械。15日,军校公布了蒋介石的文告,并宣布清党命令。命令要求黄埔军校内的共产党员在三天之内或者报名自己承认,或者请假自行离校。18日清晨,一场抓捕共产党员的行动就开始了,据黄埔六期学生胡耿撰文回忆:“四月十八日那天清晨,突然有部队登岛,包围本校,声言‘清党’,情况紧张,如临大敌,当时听到蝴蝶岗分部那边有枪声,事后知道是军校警卫部队与登岛部队发生了冲突。据说这些部队是驻扎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教导团,而我们当时赤手空拳,情况混乱,同学纷纷逃命,很多同学搭船去广州躲避。未走的同学,四散在岛上各个角落。颜方、潘洵和我三人躲在校部左侧孙总理铜像纪念碑的小山岗上,呆了一个通宵。次日校部秩序恢复,清点学生,二个大队仅留下七百多人,因此二个大队缩编为步、炮、工、辎四个科,步科三个中队,炮、工、辎各一个中队,由各兵科负责教育。我被编入步科第二中队,队长欧阳疑,三期同学,湖南人,队附柯某,三期同学,江西人。六期学生原有三千多人,受了这次改变的冲击,有二千多同学离开广州后辗转去到南京,蒋校长便在南京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继续训练六期到南京的学生。留黄埔的六期学生复课后,经

过‘清党’，我省永康籍同学徐坚被抓去送往广州南石头岛惩戒场受反省教育，至1929年才释放回家，不久即病故。我们政治课程中有关共产主义的内容均被取消……”

黄埔五期学生郑庭笈回忆当年清党情况：

“五期生共3000人左右，1926年9月入学，在1927年4月18日的早晨，学生到大操场举行徒手体操。到大操场后，看到周围山头和十字路站满了武装哨兵，把手无寸铁的学生包围起来。当时学生非常紧张，又不准自由谈话，只好相互看着。各区队长发布命令：‘凡是共产党员者，一律站出来，其余的原地不动。’连续叫了几遍后，无人站出来。最后区队长说，如果不自动站出来，就点名；自动站出来就没什么，不用害怕。后来，共产党员赵范生（四川人）、吴玉瑶（广东人）首先站出来，接着有8名共产党员站出来。随即拘捕了他们。这些共产党员都是好人，关心同学，帮助同学，当时有的同学看到好人遭难，不禁落下眼泪。学生们回到寝室后，知道第一学生大队逮捕200人左右，第二学生大队逮捕150人左右。逮捕的学生均在夜晚被解往虎门和鱼珠炮台杀害。仅仅第五期的学生中就被害350名左右。”

据称仅黄埔五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连夜逃亡者246人，第六期入伍生逮捕的共产党员及嫌疑清党对象达千人左右，以致这一期纷纷并队，重新组织。蒋介石从4月15日起至5月底止，在黄埔军校以清党名义捕杀的共产党员学生达350多人，逃亡者近千人，有100多名师生抵达武汉进入武汉分校。

黄埔二期毕业生覃异之是二次东征后由傅维玉、陈奇涵、黄锦辉三人介绍加入共产党的。清党时任黄埔军校区队长，据他回忆说：

“1927年4月15日凌晨4时许，11中队长、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陈选普全副武装，神情紧张地来找我说：‘你还睡大觉，

事变已发生了,他们要抓共产党员,你要早作准备。’我立即告知连指导员、公开的中共党员赵克念,要他赶快离开。我匆匆骑上自行车独自跑向高第街,到了党总支所在地,叫开欧阳继修(即阳翰笙)家的门,把欧阳夫妇、苏怡、尹柏林等送往观音山脚的越秀街,藏在我的小同乡杨庆余家中的一间小阁楼里。后来听说我们刚走不久,高第街住址即被搜查。局势稍安定,即分批把他们送上轮船,逃往上海。”

覃异之掩护这些同志撤离后,一天,他到未婚妻敖天犀家吃饭,岳父敖正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与方鼎英同学,私交甚好)对覃说:“我在方部长(方鼎英曾任入伍生部部长)家中办公桌上看到一张名单,其中有你,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覃异之立即警惕起来,并向广州党组织汇报,很快得到黄锦辉指示,覃异之随张云逸前往海南,从事地下工作。登陆时,被当地驻军关押,幸亏在拘留所遇到一位同乡当排长,由此被释放。以后覃异之历经艰险,同叶挺一道搭乘轮船赴香港时又遭扣押,九死一生脱险。后来覃异之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而脱离了共产党,几经辗转,又跑到南京中央军校找到张治中。覃毕竟是黄埔出身的人,很快又得到重用。解放前夕,他官至国民党第8兵团副司令兼57军军长,最后任南京首都卫戍副司令,陆军中将军衔。1949年8月,他在香港和黄绍竑、贺耀组、李默庵、龙云、刘斐等44人,联名发表了题为《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政治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合作,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对此义举,时称“香港起义”。覃异之之长公子覃缙绪,1949年与笔者同在成都黄埔军校22期学习,他父亲赴香港前,曾急电催他离校,为此事他曾与我商量,后也不知何种缘由并未启程。1949年12月,覃缙绪在黄埔军校起义,也步其父之后尘。覃异之走完这一怪圈费时22年,庆幸其子只用了两年多就走向了光明。此话离题,暂且

不表。

且说覃异之掩护欧阳继修夫妇脱险后，欧阳辗转来到武汉，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任秘书，与廖乾吾共事。“八一”南昌起义时欧阳继修任起义军24师党代表、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等职。1928年后，他受中共指派进入文艺界工作，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文委书记，与鲁迅、田汉、周扬、冯雪峰等交往密切。从进入文艺界后，他一直以阳翰笙这个名字出现，是中共著名的电影戏剧理论家，一生写过《兵变》、《义勇军》、《天国春秋》等几十部作品，与沈浮编导的《三毛流浪记》影片，可说家喻户晓，话剧《三人行》，电影剧本《北国江南》也名扬中外。阳翰笙1902年生，四川高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参加过“五卅”运动，1926年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秘书。“四·一五”事变时，是黄埔军校入伍生部党支部书记。覃异之如果当天不通知阳翰笙转移，他也就难逃劫难，必死无疑了。建国后，阳翰笙与覃异之的生死之交，一直延续终生不泯。

再说李济深、钱大钧在广州清党之际，南京国民政府于4月18日正式成立，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史称“宁汉分裂”。蒋介石将此举交吴稚晖这批谋士们去张扬，4月15日，在南京的一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写了一封“促中央各常务委员速赴南京执行职务函”，信中道：

“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因南昌、武汉开始纷争，武汉共产党员及附逆党员擅开非法联席会议，及把持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包围忠实党员，通过非法议案，致汪精卫同志去沪亦愤慨其颠倒，赞成不受武汉非法命令。

“当此党务国务不能久旷之际，现在国民政府已定南京，第四

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定于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开会。是日虽未成立,然已经到会会(委)员在十四日推胡汉民同志主席,开过预备会一次。十五日俟开大会,不能全到,又推柏文蔚同志主席,改开谈话会一次。可喜国民政府地点及中央党部地点既已确定,……务望即日进行党务,勤劳其职责为要。未在南京者,尤望刻日遄赴。不胜迫切。谨候公绥。中央监察委员会谨启。十五日。”

吴稚晖为蒋介石想出的好主意就是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这样,定都南京就顺理成章。可是四中全会没开成,于是吴稚晖又以谈话会代替之。这也太牵强附会,既要搞反革命政变,大开杀戒追捕共产党,又何必再打出民主法制的招牌来装潢门面呢?什么“政府迁宁”、“建都南京”,只不过是文字上做手脚,把一手操办的南京国民政府装扮成“正统”罢了。全国各地疯狂屠杀共产党员之时,南京在省议会旧址举行了国民政府迁宁典礼。南京政府从成立的当天起,就定下它的首要活动是“清共”。4月18日南京开府后,19日通过下列决议:肃清共产分子,请中央驱逐鲍罗廷,通缉徐谦、邓演达、顾孟余。南京政府还在报界公开发表一个《宣言》,指责中共分子及附逆分子“甘心叛逆,阻挠北伐,谋为不轨,直接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间接即为军阀与帝国主义之工具,不唯自绝于党国,抑且自绝于世界,本党为自存计,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固当驱除此叛逆,为由国民革命以达世界革命之前途计,亦当扫除此败类”。这个宣言在报界公开发表,它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的名义出现的,所以它就成为南京政府公开反共的“合法”依据。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周恩来与陈赓、陈赓的未婚妻王根英都先后来到武汉。党组织把陈赓安排在国民革

命军第8军的特务营任营长,第8军军长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曾是陈赓连的学生,陈赓待他不薄。唐生明是黄埔四期的特殊学生,此时任唐生智军警卫团的团长。陈赓的特务营是独立的,4个步兵连,连长全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共产党员,这个营实际上承担着保卫由上海迁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的任务。周恩来主持了陈赓与王根英的突击结婚典礼,地址就在特务营的驻地汉口西园旁的大成里。婚后第二天,陈赓夫妇参加中共“五大”会议。虽然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批判,但未彻底扭转右倾路线带来的危害。蒋介石在全国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将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以及范鸿劼、伯俞、谭祖尧等20位革命者,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杀害。其手段竟用了残酷的绞刑。当时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的何雋回忆文章说:“李大钊等二十人在京师看守所内刑场绞决。被绞之前夕,余即至看守所接洽参观。见新式行刑之绞机矗立刑场之中央。晨九时,指挥行刑官莅场查阅判决书,命提李大钊及另一受刑人到场,旋由行刑人蜂拥至前。李大钊意气轩昂,胸襟爽朗,不知其为铁窗人也。指挥行刑官告知:‘此案经特刑庭判决,你等均处死刑,当已收到判决书?’答:‘收到,已准备上诉。’又云:‘此案系按特殊程序处理,并无上诉办法。现奉上官命令,今日执行。你等对于家属如何处分事件,可缮函代为转交。’李大钊云:‘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旋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面南而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绳结环,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毅然延颈就环。”一代英杰,死于军阀屠刀下,令人发指。接着,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袭击湖南省工会、省农会,屠杀革命群众万余人,史称“马日事变”。这一事变

成为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合流的信号。1927年国共交恶，共产党员死于蒋介石手下的何止千万。正是：革命成亡命，信徒成叛徒；乾坤皆颠倒，是非莫可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二次北伐 先云热血溅临颖 独善其身 严重辞官隐匡庐

话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形势急骤紧张。1927年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国民革命，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滔天罪行，并发布了《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委任冯玉祥接替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副总司令。命令指出：“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命令宣布，蒋介石所统辖的第一集团军之第1、第2、第3、第4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统归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胡汉民、柏文蔚、蒋作宾、蔡元培、邓泽如、李石曾、陈铭枢、甘乃光、陈果夫、叶楚傖等举行就职典礼，同时发表《定都南京宣言》。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大会。23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6000多名师生在武昌阅马厂举行了有40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到会的各群众团体及机关单位负责人40余位，大会主席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不久前离开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任蒋介石随从秘书的蒋先云。蒋先云在大会上报告了开会的理由，略谓：“蒋介石自去年3月20日以后，

叛逆日著，民众已经认得很清楚，我们以前是他认为很亲爱的学生，兄弟从前曾担任过他的秘书，所以他的罪状，我们都能切实的证明；他的手段，比张作霖、吴佩孚还厉害。他是封建势力的领袖，他的革命是假革命、反革命，所以发生了去年3月20日的事件。去年出师武汉，在李家桥前线时，因为民众有拥汪的呼声，他怖怕民众拥汪，亲身对我们讲，要我们阻止那种运动。他并说去年3月20日事件，并不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斗争，乃是他与汪精卫之斗争。3月20日以后，黄埔学生的人格被他污辱了，党权运动被他摧残了，把党和政府统同放在他的腋下。在赣州杀陈赞贤，在南昌封闭市党部，到九江到安庆到南京到上海，走一路打一路，摧残工农，捣毁党部，叛党叛国叛总理，真是罪大恶极了。黄埔学生是党的学生，不是蒋介石个人的学生，我们今天召集大会，为的是表白我们的态度，来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及其工具。”

蒋先云在安源煤矿和水口山铅锌矿从事过工人运动，是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然后又由党组织选拔进了黄埔军校。由于他参加第一期入学考试得了个头名状元，毕业考试，他又荣获第一名，因而被蒋介石称为“最品学兼优”的学生。他演讲鼓动性极大，话刚落音，台下几十万群众响起了雷鸣般地掌声，大呼：“打倒蒋介石！”

讨蒋大会上，还有中央党部代表、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发言，国民政府代表彭泽民演讲，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代表李鹤林发言，以及第8军兵士代表潘汉清、第4军兵士代表张治华、第11军兵士代表闵振武发言，最后宣布黄埔二期毕业生、孙文主义学会宣传委员、组织部部长杨引之的罪状。在中山舰事件中，杨维包围了苏俄顾问住宅，大打出手，毕业后又窜至四川，指使四川军阀刘湘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杀害了中共四川地

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杨闇公(杨尚昆的胞兄)等多名中共领导人。北伐以后,他潜来武汉秘密进行拥蒋反共活动,结果被武汉政府缉拿。会上还宣布黄埔败类陈绍平的罪状,他在汉口组织黄埔同学分会拥蒋,由蒋拨巨款收买学生参加,并秘密组织拥蒋捧唱团等等。大会上杨、陈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蒋先云没有囿于黄埔同窗之谊,也不心慈手软,而是以革命的“血腥”对付反革命的血腥,将杨引之、陈绍平处决。在处决杨引之之前,还有一名黄埔一期毕业的洪君器也被武汉政府逮捕后镇压。洪君器当时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连长,他的姐姐洪希厚既是张治中的表妹,也是张治中的夫人。张治中北伐打倒武昌后,改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革命军学兵团团长。恽代英、邓演达极力争取张治中反蒋,但张说:“我可以打电报劝蒋,但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蒋也竭力争取张,嘱张速将学兵团带到南京来。后来张治中果然去了南京,也许这是邓演达、叶挺、蒋先云要杀洪君器的前因吧。枪毙他时,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宣布洪的罪状是“通蒋”,洪当时确有拉队伍逃叛武汉之打算。这段历史,包括某些张治中的传记作者,都写成武汉先杀洪君器,导致张治中向右转,这是讹传,而史实却是张治中先离开武汉,才导致洪君器的被杀。

闲话少提。且说蒋介石也在积极拉拢黄埔学生,凡是投靠蒋的,他非但一律既往不咎,且委以重任,以示校长的宽宏大量。“四·一二”政变是赤白黄埔的分水岭,蒋先云就是第一个先退出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南昌蒋介石曾以“中将教育长”允诺之,但要蒋先云脱离共产党。蒋先云并未在高官厚禄面前动摇,而是离开了蒋介石,来到革命大本营的武汉。讨蒋大会时,蒋先云已接受党的新指派,担任了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

按照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办法,蒋先云培训纠察队领导骨

干,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分别建立各产业工人的纠察队,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因而这支拥有 5000 多人、3000 多支步枪的工人武装力量,很快成为英勇善战的坚强部队,并在以后的战斗中屡建奇功。蒋先云在黄埔军校时,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中央执委会常委,他和同期同学贺衷寒都是湖南同乡,但信仰不同,平常积冤很深。有一次两人发生争执,蒋先云一气之下,拔枪就扣扳机,尽管没有打中,也依然受到了党内处分。同时蒋还忍受某些共产党员同学的冷嘲热讽:说他是“红皮白心”萝卜,既然首先退出国民党,为什么还在蒋介石身边当侍从参谋。陈赓就曾怀疑过他。陈赓从苏联回来后在武汉与蒋先云相见,可是并没有机会交谈。蒋先云想,我要用实际行动扭转别人对自己的误解,以后机会总会有的。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出师北伐,向盘踞在河南的奉系军阀进攻。蒋先云调到国民革命军第 11 军 26 师 77 团任团长兼党代表。当时在北伐军中任团长以上军官的共产党员还有刘伯承、叶挺、朱德、周士第、卢德铭等人,蒋先云是其中之一,而且年纪最小,仅有 25 岁。蒋先云上任后,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启发官兵政治觉悟,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士兵,不到一个月,全团面貌焕然一新。

5 月中旬,蒋先云率领全团官兵,高唱着《北伐战歌》:“打倒列强!除军阀!”部队在雄壮歌声中离开武汉,开赴河南前线。

据当时任 11 军 26 师代理师长吴仲禧回忆:

“5 月 29 日拂晓,七十七团到达距辛庄六、七百米时,与敌前哨部队接火。接着,敌辛庄的步兵、炮兵一齐向我开火,七十七团受阻于一片平坦的麦田前。先云开始用疏散队形自己领先向敌迫近,但由于毫无地形地物的掩护,伤亡颇大,先云也足部受伤。我在师部得知先云受伤,即派通讯员令他下火线,由第一营营长代替他指挥全团,同时命沈九成的七十六团前往支援。

但蒋先云坚持不下火线,他对通讯员说:‘请师长放心,临颍城已经在望,我足部轻伤不要紧,跑不动还可以骑马,我不捉住张学良不下火线。’不久,辛庄敌人又陆续得到一些增援,如果时间拖长将更对我不利。蒋先云就果断地发起冲锋,他身先士卒,带伤骑上一匹白马,手举指挥刀,冒着密集的弹雨,冲入敌方阵地。在迫近辛庄时,突然一发炮弹打来,先云受重伤连人带马倒地,担架兵立即前往抢救,他口中仍在高呼‘冲锋! 冲锋!’随后壮烈牺牲。在先云牺牲精神的鼓舞下,全团官兵前仆后继,猛烈冲锋,一举突入辛庄,迫使敌炮兵仓促撤退,全线炮火声终于沉寂下来。”

蒋先云牺牲后,周恩来在武昌主持召开了追悼大会,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响导》周报刊登了悼词:“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能勇敢忠诚的为革命而牺牲,而且使一般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6月22日,郭沫若得知蒋先云牺牲后,写了《蒋先云的诗》一文,说道:“先云战死了,但他的精神是从此不死了。我本来很想做一篇文章来纪念他,但我觉得我们有时间性的文章,不足以纪念超时间性的烈士,足以纪念烈士的,只有他自己生前的行动,生前的誓言。”在家乡蒋先云有一位美丽的堂妹,作为未婚妻在日夜等着他,当初蒋先云也曾答应她:“打败了军阀就回老家新田结婚!”然而壮志未酬身先死,蒋先云没有实现夙愿就英年早逝矣,实乃人生憾事!

北伐军自5月13日下达第一次总攻击令开始,大军逐鹿中原,与奉鲁军展开激战,其中在河南有西平、上蔡、临颍三次战役最为激烈。在上蔡、临颍战役中,南方的“铁军”(张发奎的第4军)遇上了北方的“铁军”(镇威11军),战斗十分艰苦。第4军伤亡军官达130余人,蒋先云的77团伤亡最重,临颍之役歼灭了奉军在河南的主力,为占领郑州和开封铺平了道路。

再说正当蒋先云为国捐躯之际,黄埔军校原中校战术教官、现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21师师长的严重,正率领他的爱将陈诚(63团团长)等转战杭州、苏州一带。一天,严重由苏州到南京,在街头看见“打倒邓演达”、“拥护蒋总司令完成北伐”等大字标语,他气愤地对部下说:“现在谁拥护他(指蒋介石)就是革命的,谁反对他就成了反革命了!”一个月前发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严重目瞪口呆。接着他又看到军队内部颁发的密件、手令,报纸上“清党”之类的新闻,他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深知自己实在无力改变宁汉分裂这种局面,只能保持沉默。

严重,字立三,湖北麻城人,1892年生,1918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他与邓演达不仅是保定军官学校前后期同学,而且在粤军第1师工兵营时还是邓的助手。邓是营长,他是副营长。黄埔军校创办时,邓邀严重参加筹备工作,两人关系密切,志趣相投。“四·一二”前夕,邓演达打电话给严重,询问其对蒋介石的态度,严就明确表示不愿随蒋倒行逆施,而要北伐到底;不能兄弟阋墙,置大敌于不顾,而要反对内部残杀。他并且公开表明自己的主张,一吐胸中的闷气。他在复电中说: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北伐军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现在帝国主义军舰还停泊在下关江面,北洋军阀的军队还盘踞在江北,革命的任务尚待完成,孙先生的遗愿还未实现,因此革命军内部仍须与广东出发时那样,团结一致,继续去夺取胜利。”

严重将此电报公开之时,早就考虑过自己将来的退路。他最近听说蒋介石于4月10日电令解散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邓演达、郭沫若两位正、副主任也列入“通缉”名单。“四·一二”前夕,蒋介石对严重也不放心。4月初,曾派接替蒋先云任蒋介石随从秘书的黄埔一期毕业生曾扩情持自己的亲笔信去苏州见严重,要将其辖下21师的共产党员,一律押解到上海,听候发落。

曾扩情到苏州还未来得及交信,蒋介石又派其侍从副官宓熙乘专车赶到苏州,告知曾扩情:“信不可交,交了也得收回。”蒋介石原打算通过“清党”,考验严重的态度,但由于恐怕严重走漏风声,难收一网打尽之效,故又派人追回文件,改为亲自召见严重谈话,并询问他对邓演达的看法。严重是个正派耿直的军人,即使虚与委蛇他也不干,因此将邓演达所来电话电报之事以及他的答复据实以告。蒋介石听后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对严重说:“我这个人蛮欣赏有头脑的人。不过对邓演达这个人怎么看,你可不能凭个人的好恶轻易下判断。我比你了解的情况要多,你要听我的话。”接着蒋一脸阴沉,话中连打带拉,又说:“你在黄埔就很有威信,在北伐中立了大功,我多次表彰过你,我是很信任你,很器重你的。你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一片好意。我今天找你谈话,就是同你打个招呼,没有别的意思。你看怎么样?”

严重主意已定,不想在蒋介石面前说太多的话。俗云:“道不同,不相与谋。”他重述了他给邓演达复电的内容,只是强调要团结一致,继续北伐。临走前,严重才郑重其事地向蒋提出辞职解甲归田的意愿。蒋却故作姿态,说:“辞去这样有影响的高级军官职务,现在不是时候。”蒋介石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反而深表吃惊地予以挽留。在“中山舰事件”时,严重忍了一次,现在,他不能再受良心的谴责,去“清党”,去杀并肩作战的共产党员。蒋介石又说:“21师是模范师,你走了怎么成?如你身体不适,可以休养一个时期,师长的职务不能辞去。”

最后还是严重让了步,提出在他休养期间,可先任命一位代理师长,并推荐由63团团长陈诚升任。

几天后,蒋介石批准了严重的体养报告,严重体养期间,由陈诚代理师长。陈诚擢升师长,在当时从论资排辈的角度来说,比刘峙、王柏龄、顾祝同、蒋鼎文等师长的确显得“嫩”了些,因而

在部队中有些人嫉妒与攻击陈诚,说他是“童子军”。陈诚这一年刚满 29 岁,尚不到“而立”之年,确实是令人羡慕的。不过,陈诚是以军功取胜,桐庐一战,21 师消灭了孙传芳的孟昭月部 1 万余人,奠定了东路军胜利的基础。陈诚的 63 团战斗最得力、伤亡也最重:营长 1 人阵亡,两人负伤,连排长伤亡更多,1 个特务队,军官只剩下 1 人,班长也只剩下 1 人,可见战斗之激烈。陈诚从上尉连长升至少将师长,只经过短短的 3 年,一般情况需要经历 20 年。蒋介石对陈诚十分欣赏,早在东征时,陈诚任炮兵连长就崭露头角。这次委以重任,陈诚表示“坚决绝对服从总司令”,蒋大为赞赏。

严重回苏州,同陈诚谈了自己的想法,让陈诚掌握部队,与邓演达保持联系,条件成熟则可率部投奔武汉。过了几天,何应钦到苏州,宣布严重师长因病请假休养,以陈诚代理 21 师师长的命令。为了支持陈诚控制部队,严重当即要师参谋长罗卓英、军需处长赵志尧即日交出师部积余现金 10 万元,而后则搬到南京韭菜园他的保定同学某某家中居住。

北伐期间,21 师官兵在浙江境内战死数百人。尽管当时战事急促,严重仍坚持随时在战场掩埋阵亡官兵的遗体,并树立标记,写明死者的职务、官阶、姓名、籍贯的命令。局面稍安定后,他又指派专人到各战场搜集遗体火化,把骨灰运至杭州法相寺保存,同时计划在西湖南高峰半山建筑一座阵亡将士墓,树碑建塔,永祭英灵。严重在南京稍事休息后,便赶到杭州,住在西湖之滨的法相寺,为实现这一心愿而四方奔走。他凭借自己的威望向社会各界募捐,亲自主持设计施工,不到半年,国民革命军第 1 军 21 师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及烈士公墓就建成了。严重又通知烈士家属前来凭吊祭灵,并给予抚恤金,从各方面优待照顾烈士家属。严重的父亲严宜焕在江西、安徽做过县函、府事。

严重少小时受家庭“诗礼传家”的熏陶，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国学基础也较深厚。当时他如此体恤部属，深受官兵的敬重。黄埔一期毕业的宋希濂、黄维都在 21 师任过职，据汪东林撰文介绍，严重是“北伐时期的模范师长，后来被称为湖北‘三怪’之一，一生中虽未居高位，却是一位影响颇深的佼佼者。”

严重是一位正直的军人。半年后，即 1927 年 7 月，蒋介石派专人去看望严重，问他身体恢复如何，是否能重回部队效力。严重重申自己的决定，已心如古井，微波不兴，不愿再在蒋介石手下为官。蒋介石于 1927 年 8 月下野后，应何应钦的邀请，严重曾一度重新踏入军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12 月，因其父去世，携夫人杨佩秋回武昌奔丧，并担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后兼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蒋介石复职后，严重又辞职隐退。严重崇尚我国古代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不达则独善其身”的信条，走了一条洁身自好之路。他抛妻离子，孑身一人，独上匡庐，落脚于江西著名风景名胜的庐山山南太乙峰下的太乙村，并托朋友代筑几间陋室，效仿陶渊明作了隐士。1929 年 9 月，几间草屋落成，严重为其取名“劬园”。自此，严重在这里独居治学，饮食起居诸事皆躬躬任之，怡然自得，与世无争，其乐无穷！严重精心研究我国古代哲学，与他终生作伴的是一部《四书》及历代有关《四书》的著述。他潜心研究国学，著有《礼记大学篇考释》、《大学释义》、《大学辨宗》、《道学宣言》、《庄子天下篇绪论之杂谈》等。这些著作虽非于匡庐完稿，但他在匡庐所做学问，亦为而后的著作奠定了基础。

据汪东林介绍：

“严重断绝了同军界、政界人士的往来，甚至连他在武汉的夫人杨佩秋及其他眷属，他也再三去信，说明隐居是他个人的意愿，不连累旁人。希望他们各做各的事，自理生活。他一年也难

得与家人见上一面,但他与太乙村的普通农民交友,同他们一块小酌,请他们代购米、盐、油、布,向他们讨教种菜、砍柴之技,对他们弘扬中国文化之光。

“原 21 师 63 团的营长黄维,曾经数次去太乙村看望严重。一年夏天,刚刚升为师长的黄维在会议的间隙,到太乙村看望老上级。他推开了《锄园》未掩着的小门,只见严重正聚精会神地伏案读书。多么简陋的小屋!一张床,一张方桌,因未曾油漆,白坯都变黑了。屋内到处都堆满了线装书。黄维觉得,这里比两年前显得更陈旧,更阴暗。他正想开口,忽然发现在严重的床头,竟有一叠报纸。这可是上次来时所没有的稀物!他知道,严师长自隐居庐山以来,是一直不看报纸的。正想着,严重回头一望,黄维立即作了一个揖,大声说:‘老师长,学生来看您了!’‘不必客气了。’严重语气沉重地说:‘东北三省都送给日本人。蒋介石却把大军压在江西对付共产党。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现在的情况是外敌已经入侵,民族危亡在即,不先攘外又怎能安内,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黄维无言以对,只得转移话头,询问生活和健康情况。严重说:‘我还不至于饿死,身体也颇健旺,只是眼看着外敌入侵,中国自己却内战不休,我虽然身居深山,也坐不住啊!’临走时,黄维斟酌再三,随身取出并非是事先准备好的一点钱,力劝严重收下小补日用,但还是被严重拒绝了。黄维只得快快离去。”

陈诚知恩图报,由 21 师联合给其写信,并把严重任师长时节约下来的 2000 元军费送给他贴补生活,但也被严重所谢绝。严重深居简出,躬亲桑梓,潜心求学,关心国事,实乃黄埔军校诸多教官中惟一值得后人景仰的贤人!严重在太乙村隐居前后达 10 年之久。1938 年 7 月,湖北省政府改组,陈诚已是战区司令长官、武汉卫戍总司令,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湖北省政

府主席。陈身兼数职,无暇顾及湖北地方行政,执意请严重下山,任之以民政厅厅长代行省政府主席职务。严重任职期间,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拜访董必武,将自己多年写成的《〈礼记·大学篇〉考释》赠送董老,两人交谊甚笃。

有关严重再度出山在湖北从政3年的甘苦,多年后在台湾出版的陈诚的回忆录,其中《我与湖北》一章中,专门写了《严立三代主省政》一节文字,现摘录如下:

“立三先生主持这两年多的省政,正在大局极端动荡不安的时候。湖北位居全国腹心,各方震动的幅度,莫不牵系于此。此一地如应付有方,其影响于大局之深重,是可想而知的,而立三先生能处危若定,措置裕如,以故万千的生命得获保全,无数物资得免资敌,历年收藏的图书仪器得免散失;因为图书仪器的保存,使省府迁至鄂西崇山之中,教育文化事业仍持续于不坠,即此一事,立三先生对于民族的贡献,已足不朽矣。

“再则立三先生的廉洁与情操,可谓举世无双……他代行省主席职务逾两年,主席的特别办公费应当归他领用,是天公地道的事,但他不要。等我回省主政时,他全数移交给我,我既没有在省实际办公,自无领用此款之理,请他收回,他执意不肯。后来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即将此款存入银行,作奖助本省清寒学生之用,由他给这项存款立了个户头,叫‘惠廉有道’盖取孟子‘可以取,可以勿取’、‘可以予,可以勿予’之义。立三先生于取予之际,太大可以作如是观。所以立三先生的一生,不但谈不到余财余帛,简直过的是清苦不堪的生活。综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苦死的。”

在黄埔军校严重曾任过战术教官、学生总队长、训练部主任、教授部主任,黄埔军校1至4期学生对严重十分尊敬。他视教育如生命,以身作则,以严教人,以诚相感召,待学生如子女,

学生都背后叫他为“严婆婆”。据说当年在保定军官学校求学时,严重就十分崇拜蒋百里,从蒋百里处学来一套军事教育方法,并在黄埔军校加以发扬光大。他带兵打仗也有一套办法。出任 21 师中将师长时,向全师官兵宣布三项公约:“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陈诚、黄维、宋希濂、罗卓英带兵,都按严重的办法去做,结果部队的战斗力都很强。严重从政力倡“官皆将,民皆兵”、“官不离民,民不离土”、“不爱钱,不怕死”等准则。在主政湖北期间,他尽量延揽一些爱国有志之士,破格提拔一批青年人担任军事部门领导和行政长官。他曾推荐过黄埔一期学生韩浚、二期学生阮齐出任师长,他们在抗战中其均有建树。严重严厉制裁贪官污吏,他曾顶住来自各方的说情和阻力,将敲诈勒索 2000 元的沙市警察局长朱鼎钧处以死刑;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抽鸦片烟,案发后,严重毫不留情,将其判处死刑,以杀一儆百。

严重于 1940 年 10 月辞去代理省主席职务,移居宣恩县潭河晒坪垦荒,躬身耕种,偶尔也外出参加些其他活动。1942 年秋,他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会间曾面晤董必武。董必武邀请严重访问延安,严重欣然答应。但因为此事给严重引出了不少麻烦,所以他愤然返回鄂西,折薪种菜,研究学问,与世无争。其间有人接到严重的来信,他在信中颇有感触地写道:“深感数年来役苦于庶务之中,处于孤陋寡闻之地,以致眼界狭窄,意会消沉。殊不知神州大地另有天地在!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非,我之谓也。”明眼人一看便知,“神州大地另有天地在”是指革命圣地延安。可惜严重没有机会去造访,而在蒋介石的统治下郁郁不得志,几乎万念俱灰。

1944 年 3 月,严重因感冒病倒在床,继而并发肺炎、肋膜炎、肾炎。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勤务兵瞒着严重向上级报告,

当时驻恩施的湖北省立医院派了几位大夫来诊治。严重即催大夫返恩施为伤病员治疗,他说:“有多少伤病员需要你们治疗,岂能因我一人之病,迟误多数人治疗?你们不走,我无力气轰走,却可以拒绝服药!反正我老而无用,死了也不足惜!”当时医生没有办法,只得规劝他去恩施住院,严重摇头谢绝。但他身不由己,只得被人用担架抬上车去了恩施。由于病情恶化,1944年4月28日,严重夫人杨佩秋和兄长赶到医院探望。在亲人面前严重交代:“死后火葬,骨灰入土即可,不必通知亲友,丧事越简越好,因国家正在艰难时期,自己为国为民均无贡献,万万不可由政府治丧厚葬。”夫人听了他对身后之事的安排后泪如雨下,严重却绽露笑容,反而轻声询问抗战前线消息。4月30日晨,严重病逝,终年仅52矣!正是:“从今别却江南月,化作啼鹃带血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罗易泄秘 汪精卫携冯反共 金蝉脱壳 蒋介石被逼下野

说话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等控制下，表面上虽然坚持国共合作的政策，但实际上已开始由动摇逐步走向宁汉合流。就在黄埔军校内，师生的思想斗争也是异常激烈的，拥蒋和倒蒋两派针锋相对。实际上，这是当初在黄埔岛上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两个派别之争的继续。在东征、北伐战场上，一批仁人志士如蔡光举、文志文、郭俊、曹渊、蒋先云、郭树械、赵荣忠、金佛庄先后光荣牺牲了。不论他们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但都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献身的，其死重于泰山，皆为后人所景仰。在宁汉分裂后，蒋介石拿起屠刀，对北伐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大开杀戒，这就使许多人不可理解。在辛亥革命时，胡汉民和汪精卫是生死之交，而今却一个在南京当国民政府主席，一个在武汉当国民政府主席。为了争权，两人竟由生死之交变成了生死之斗，正如汪精卫赠胡汉民诗中所云：“难禁十年事，潮上寸心头。”这是颇为令人费解的。

1927年5月，正当武汉国民政府出兵中原二次北伐时，国民革命军中有些输诚的反对军官，极其仇视工农运动，也仇恨共产党。夏斗寅曾任军阀廖耀南部旅长，北伐战争时投靠国民革命军，后任国民革命军鄂军第1师师长，他是湖北麻城人，受唐

生智节制。夏斗寅辖3个团,驻防宜昌,改为独立第14师,扩编为4个团,另1营,总兵力13000人左右。在夏投靠革命后,其部中下级军官多为湖北籍的地主老财之子孙,他们反对农民协会斗地主、分田产。蒋介石在南京公开反共后,蒋曾通过幕僚蒋作宾策动夏斗寅反共,两湖地方豪绅地主也纷纷策动夏举事。夏斗寅乘武汉大部分部队开赴河南北伐之际,于5月17日率部叛变,并由宜昌东下切断长沙、武昌间的铁路联系,同时联合刘佐龙、杨森等部,乘虚直扑武昌,来势凶猛。19日,卫戍武汉的叶挺24师和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师生组建的中央独立师参加了平叛。汪精卫认为夏斗寅反共是小事;刚任第8军军长的李品仙担负武汉卫戍任务,当时非但不参加平叛,反而趁机要工人纠察队由他指挥,试图夺中共武装的权。在大敌当前之时,武汉国民政府惊慌失措,拿不出有效的办法。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全体学生编成中央独立师后,由武汉分校教育长侯连瀛任师长,杨树松任副师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复亮任政治部主任。女生队为政治连,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分别归属军医处和政治部领导。出征前,中央独立师在武昌南湖机场举行誓师,西征讨逆。毛泽东、陈独秀、吴玉章、宋庆龄等参加了大会。出发前,湖北妇女协会赵君陶等人亲自到火车站送行,并赠给女生队一面锦旗,上面写着“革命先锋”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当时已身怀有孕的女生队指导员钟复光不顾一切,与学生们一同奔赴战场。在与夏斗寅的战斗中,男女学生英勇杀敌,5月20日击溃夏斗寅叛军,武汉转危为安。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53团团长许克祥又在长沙叛变,解除工农武装,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枪杀了百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因21日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所以又称为“马日事变”。

许克祥乃湖南湘乡人,曾任贵州军阀袁祖铭部旅长,投靠唐

生智后归属何健的 35 军。何健、叶琪、李品仙、周斓、夏斗寅等在汉口秘密开会，商议发动清党反共军事计划，同时决定与南京遥相呼应，避开武汉国民政府，采取“秘密进行，斩而不奏”的策略。“马日事变”后，汪精卫等人千方百计地为许克祥辩护，他将事变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工农运动的“过火”。6 月 1 日，汪在国民党中央说：“本主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农产品被推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像这样逼得人无路可走，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造反。”他公开为“马日事变”辩解。孙科也说：湖南农民运动“打破了联合战线，闹出了很大乱子”，为多数人反对。许克祥叛变，地主老财、反动军阀、土豪劣绅公然举手高呼“许青天”。唐生智、谭延闿这时也附和着汪精卫的腔调，认为农民运动是“过火”行动，应予制止。接着，6 月 5 日，国民革命军第 3 军军长朱培德在江西公开叛变，以“礼送”的方式驱逐 142 名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出境，并捣毁工会、农会，屠杀工农领袖。

由于一些反动军官的相继叛变，进一步加深了武汉政府内部的危机，因而汪精卫加快了他叛变革命的步伐。

5 月下旬，周恩来秘密由沪抵汉，继续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周恩来与当年在黄埔的同事邓演达、恽代英见了面，对于开展农民运动，周、邓两人一致认为农民运动不是“过火”，而是要通知各军将所缴获的枪械拨出一部分给各省农协，组织与壮大农民自卫军。毛泽东后来在多次谈话中热情地赞扬邓演达，他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邓演达是农村出生的知识分子，对农民的疾苦有深刻的了解，十分重视农民运动的发动和组织。他明确提出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发动与组织农民运动方面，以支援北伐

胜利进军。就在这时，湖北黄冈县烟酒公卖分处处长罗承泽向烟酒公卖局诬告农民铲挖烟苗、妨碍国家税收。财政部向武汉政府转呈了烟酒公卖局的报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6次会议讨论此事时，汪精卫借机大肆攻击农民运动，他说：“他们简直要饿死靠烟酒吃饭的人。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6月2日，国民党中央发出训令：解散黄冈县党部、县农民协会，并逮捕负责人员，加以惩处。董必武派人去调查，结果纯属子虚乌有。汪精卫借题发挥，目的是打击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当时已被工农运动吓倒的汪精卫，正准备叛变革命，但苦于没有借口。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于6月1日收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五月指示”的电报。这份绝密电报的内容：（一）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实行土地革命；（二）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三）鉴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领导正在动摇妥协，应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四）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

罗易何许人也？他名叫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1887年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早年是激进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曾去墨西哥创立共产党，1920年代表墨共参加共产国际“二大”，任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1927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参加中共“五大”。此人为共产国际首席代表，在中共中央说话很有权威性。

罗易接到电报后，不向中共中央传达，竟首先给了汪精卫一

份副本。汪精卫得到这个电报，如获至宝，他对唐生智等人说：“斯大林的指示，随便执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又说：“这个电报是共产党要解散国民党，实行共产革命！”汪认为这个电报违反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孙越宣言》。6月5日，在武汉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把罗易送来的秘密指示副本传示左右。陈友仁看后面色大变，说：“这不是等于共产党向国民党开战吗？”汪精卫把国共合作比作大家坐一条船，一起由香港到上海，这段时间不会有问题。但到上海后，有人要去天津，而有的要去日本，产生了分歧，但只有一条船，这就必然发生尖锐的冲突。汪精卫等人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看作是船到上海的标志，也就是说，国共合作到了终点。会议决定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名下的全部职务，驱逐回国。至此，连罗易也包括在内的140余名苏联顾问及随行人员全部离开中国。

汪精卫曾被中共“五大”邀请列席会议，他知道中共一些领导人不敢违抗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陈独秀一再表明要维持国共合作，要缓和双方矛盾，但明白了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策略中，他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联合的对象，而不是像汪复职时讲的请他出来领导；也明白了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要力争领导权的。因而他得出了“共产党绝对不可依靠，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也绝不可靠，国共迟早要分家”的结论。于是，汪精卫的“分共”决心，从罗易泄秘开始，就基本确定了。

对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当时中共中央认为与实际情况不符，难于成功，所以并没有执行。它不但给中共带来极大的麻烦，而且尚成为汪精卫“分共”的一个绝好借口。可以说，罗易的泄密，是国共合作最后趋向完全破裂的导火线。

对于罗易的幼稚和荒唐的举动，周恩来则认为这是叛卖无产阶级的行为，是和十月革命前夕加米涅夫的行为一样的。共

产国际也认为罗易此举授人以柄,是幼稚且又错误的。罗易在武汉叱咤风云不到3个月就很不光彩地悄然离职回国了。10年后的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对斯诺说:“罗易在武汉的言行,表明他的确是一个蠢货。”

6月10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人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当时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冯玉祥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冯玉祥后来也是黄埔军校的校务委员。此人行伍出身,安徽巢县人,字焕章,曾任北洋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并电邀孙中山北上。11月5日,他取消清代废帝溥仪的皇帝称号,将其逐出皇宫。1926年9月,当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他在五原誓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5月在西安就任国民党第2集团军总司令,拥有精兵十几万人。汪精卫、蒋介石都极力争取冯玉祥,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郑州会议上,冯玉祥一面要与汪攻击共产党与工农运动,一面伸手要河南省地盘。汪为了笼络住冯,把唐生智、叶挺付出很大牺牲打下来的河南省全部让给冯,双方在反共问题上意见一致。

10天以后,蒋介石、冯玉祥、胡汉民又在徐州开会,蒋允诺每月拨款200万元作为冯的军费,并预封冯为军政部部长。蒋冯携手后,冯返郑州,曾一日数电敦促汪精卫实行宁汉合作,限鲍罗廷速离武汉回国,否则将予扣押。电报有如最后通牒,使汪精卫没有选择的余地。6月29日,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健发出反共训令;7月10日,汪精卫逼迫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警卫森严的情况下举行分共会议。会上,汪精卫作了以“分共”

为主旨的报告,即后来公布的《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汪首先宣读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并以此为借口,大肆煽动。这时汪精卫撕下了“左”派的假面具,正式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汪精卫的“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实行了血腥的屠杀。汪精卫4月到武汉时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7月他又咬牙切齿地说:“本人愿为杀共之刽子手焉。”在重要历史关头他见风转舵,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又投降日寇,堕落为汉奸。

汪精卫后来如何投靠日本,自当详细表述,在此暂且不提。且说黄埔军校在蒋汪分裂后,无论是广州、武汉、南京,都成为黄埔学生选择的去向,也泾渭分明地表明各自的党派立场。从此,由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完全丧失了国共合作的性质,后来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军校,已实为蒋介石的工具。从第8期起,南京正式招收学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也改编为第4军教导团,邓演达、恽代英、叶挺、周士第、聂荣臻、林彪、叶剑英、许光达、周逸群、郭沫若等大批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从面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建立了第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黄埔军校的学生从此彻底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昔日的同窗好友,而今成了相互拼杀的仇敌,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说话宁汉分裂后,他们在反共立场上是一致的,而谁是国民党的“正统”,则双方各不相让。况且上海的一批国民党老右派自恃资格老,反共早,犹自称是反共“先进的先进”,一直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因此,实际上形成了宁、汉、沪三个国民党中央。谁是国民党“正统”?三个中央素怀问鼎之志,你争我夺,文攻武

斗。于是中国社会在一片混乱之中，演出了一幕幕历史闹剧。

武汉国民政府在“七·一五”政变后，企图以反共为条件，同宁、沪两方合流，实现国民党内部统一，借此保住汪精卫的领袖地位，于是向南京发出呼吁：“结束战争，求得和平，实现统一。”但宁方对汪的“和平”呼吁置之不理，并指责汪“假反共”，是勾结共党的罪魁祸首，硬将一顶红帽子重重地扣在汪的头上。汪岂能咽下这口气，他奋起还击，决心“在夹攻中奋斗”，左打共产党，右打蒋介石，而且堂而皇之地将其称为“党权运动”，誓与宁方拼个你死我活。

7月17日，武汉大权在握的唐生智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高举“东征讨蒋”旗帜，自任东征军总司令，兵分三路，大举东进：一路由九江、湖口攻安庆；一路由赣东攻浙江；一路由鄂东进入皖北。汪精卫也赤膊上阵，为“东征将士”擂鼓助威，于23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告国民革命军将士书》，痛斥蒋介石“是党国惟一的敌人，是国民革命军惟一的敌人，是国民党惟一的敌人”，并提出目前“惟一的任务，是打倒这惟一的敌人蒋中正”。29日，汪亲赴九江，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具体布置东征讨蒋的军事行动。蒋介石丝毫不示弱，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将贺耀祖、叶开鑫的40军，新编5军调往长江中游一带设防，命李宗仁率第7军从徐州南下，令夏斗寅的新编第10军、王普的第27军防皖北，调李明扬的第31军及何应钦的第1军人浙，并向南昌方向逼近。双方在长江两岸厉兵秣马，严阵以待，一时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冯玉祥出面调停，给宁、汉双方发电，力言“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在开封举行“停止征调，民国和平”的会议。冯玉祥要求各方领袖在会议上解决争端，对于双方公认的应当负责之人，要自动下野。当然，宁、汉双方都不会买冯玉祥的账，他们各唱各的戏，各定各的调。

7月29日这一天,除了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等在庐山密谋反共讨蒋外;蒋介石也派何成浚为代表赴北京,与奉系军阀代表杨宇霆密商谋求与张作霖休战,以便集中兵力对付武汉。而由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刚刚于前天在南昌成立。周恩来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担任领导南昌武装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8月1日,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陈毅等人的领导下,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率北伐军3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当时参加起义部队的:朱德的第9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两个警察队;贺龙的第20军;叶挺的第24师等。起义军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至黎明战斗结束,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黄埔军校师生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有周恩来、恽代英、邓演达、聂荣臻、毛泽覃、陈赓等百余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帅。南昌起义是“东方破晓第一枪”,是“创世纪英雄史诗的开篇”,有关起义详情暂且不提。

且说蒋介石惊闻周恩来在南昌“武装暴动”,附和的黄埔师生为数不少,气得六神无主,这时他正在徐州也吃败仗。7月24日,徐州失守,他无端指责何应钦指挥无能,亲自到徐州前线督战,并扬言不打下徐州,便不返南京,结果失败得更惨。8月8日,慌忙逃回南京,张宗昌、孙传芳的大军直逼长江。前线总指挥、第10军军长王天培从前线到南京向蒋汇报战况,请示机宜。蒋把一肚子气全撒在王天培身上,不问青红皂白,把王关押起来。不经审判,也不宣布罪名,处决了王天培。徐州战败,完全出自蒋介石估计的错误,他这种诿过于人,功归于己的恶劣作风,引起各部将的极大恐慌和不满。尤其是何应钦,更有兔死狐悲之感,因为王天培是黔军将领,与何是同乡。李宗仁、白崇禧也深为震惊,都怕做王天培第二,于是,何、李、白三人串通一气,

加快了倒蒋的步伐。

俗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但武汉方面咄咄逼人，而且唐生智由于迷信顾和尚（顾伯叙）的占卜之术，也率大军顺江而下，直逼南京。

唐生智为何信奉占卜之术呢？原来唐生智信奉佛教，并下令其所属部队官兵都要信佛，故人呼其为“唐僧”、“佛帅”。唐生智在 1925 年冬驻防衡阳，他拜佛居士顾子同（即顾伯叙）为师，约顾在军中宣讲佛经，以之笼络官兵。1926 年 8 月 14 日蒋介石北伐至长沙阅兵坠马时，唐询问此事主何吉凶。顾和尚道：“大将出师，折旗坠马，皆为大凶之象。蒋氏此次北伐，凶多吉少，将来必定为八军所克。”唐生智此次“东征讨蒋”，也给蒋介石极大的压力。另外，李宗仁、白崇禧也与程潜取得联系，相约互不敌视，新桂系认为时机已至，便决心与蒋介石摊牌。当蒋介石要白崇禧部署军队与武汉唐生智、程潜作战时，白毫不客气地公开顶撞蒋介石，拒不执行命令。这时，桂系的军队已控制了南京的四周，随时都有可能“兵变”。自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所培养的黄埔学生纷纷质问校长，向他“发难”。共产党员黄埔学生都先后离他而去，一些忠于校长的国民党黄埔学生，如胡宗南、黄杰、李仙洲、杜聿明、桂永清、宋希濂、范汉杰等，他们在军中地位不高，最显赫者不过是师长而已，还不能左右军队。而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贺衷寒、杜从戎、刘咏尧、肖赞育、张镇等，都是只会写文章为之摇旗呐喊的人，真正能带兵打仗、冲锋陷阵的骁勇之将犹不为多。

在宁汉分裂后，黄埔学生杜聿明在武汉分校任学兵团 1 营 3 连连长，一天他的同学洪君器（张治中的内弟）被批斗，杜聿明既不举手，也不呼口号，当晚连里召开大会质问，他始终沉默不语，因此被处以禁闭，且待请示上级查办。杜当夜越狱逃往南

京,找到张治中两人一同去见蒋介石,并讲了潜逃经历。蒋听后很高兴,给了他一些钱,叫他到总司令部黄埔同学会去登记,接着分配工作。

黄埔学生邱清泉,时任武汉分校第5期入伍生大队工队队长,也是在“东征讨蒋”前逃离武汉,投奔蒋介石,不久被任命为总司令部训练处少校科员,后任侍从室副官。黄埔学生邓文仪随共产国际代表团到达广州,宁汉分裂后脱离代表团,奔赴南京,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郑介民、康泽、鄧悌这一批黄埔学生都先后投靠校长而飞黄腾达。但许多黄埔学生分配到各个军中,受到排挤,从而投蒋者也不乏其人。蒋专门叫鄧悌、康泽主持黄埔同学会的日常工作,不论政治态度如何,只要投靠校长的学生,一律加以重用。当时虽然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程潜这些握有实权的军长不听蒋介石的调遣,使蒋四面楚歌,但他想与其同他们闹翻,倒不如顺水推舟,于是蒋开始表示“要休息一下”的意愿。8月12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在阴沉的气氛中召开,吴稚晖等“长衫佬”力主蒋介石留任,而何应钦、白崇禧却一言不发。蒋介石对下野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这时仍不免有一种被“逼宫”的感觉。当蒋表示“我想休息一下”时,白崇禧马上说:“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接着何应钦、李烈钧频频点头,附和白崇禧。蒋万万没有料到何应钦居然也会随声附和,这事使他很伤心。何是他一手栽培的嫡系,黄埔学生分配到第1军的人数最多,何应钦为什么也站在白崇禧一边呢?因此他后来有意地提拔并重用陈诚,而导致国民党嫡系部队中产生何、陈两派的明争暗斗。何应钦被失宠就从此开始了。李宗仁则表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鉴于局面已难挽回,便决定下野。支持他的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也宣布辞职。当天,蒋向国民政府

递交了辞职呈文。这是由他的机要秘书、号称“文胆”的陈布雷事先拟好的。全文如下：

余自受命党国，出师北伐，已兹一年。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人民穷困，国民之大业，荏苒不见发展。推其原因，实共产党之阴谋所致。然武汉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于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毫不踟躇，即刻下野。

共产党与鲍罗廷危害国民党，妨害国民革命之阴谋行动，不遑枚举。故余一向即极力主张驱逐鲍罗廷及与共产党分离。此次余所主张，已在武汉实行。且此为国民党生存上之必须条件，已有明证，不胜欢喜。

闻武汉同志不克来京，系因余在南京之故。余既为吾党不惜生命，更何恋此区区地位。惟值此下野之际，为完成北伐与建国二使命起见，谨提下列三项要求，作为最后之希望。

（一）武汉同志速来南京，共筹党国大计。

（二）分驻湖南、湖北、江西各地之武装同志与津浦沿线军队互为呼应，继续北伐。

（三）在西湖及江西地方，彻底肃清共产党。

上列事项被实现时，共产党之捣乱，军阀之跋扈，帝国主义之横暴，均将绝迹，全国统一亦将易于实现。

8月13日，蒋介石在200名卫队的簇拥下，乘军舰秘密离开南京赴上海，同行的有白崇禧、杨虎。14日，蒋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同日，回到老家奉化溪口。邵力子、陈果夫、张群、刘文岛及黄埔侍从官一行多人随蒋在溪口继续在幕后遥控。8月15日，武汉报纸刊载了《蒋介石离宁的重大意义》一文，为汪精卫涂

脂抹粉,说这是“我们数月以来艰苦奋斗的党权运动的成绩”。在蒋下野后,武汉方面弹冠相庆,一片欢呼。但汪精卫笑得太早了,他不但没有看穿蒋下野的动机,而且也错误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低估了蒋的能量。试想,蒋介石在政治舞台上惨淡经营近20年,用尽纵横捭阖之手段,并已登上国民党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他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甘心下野,遁迹乡里呢?其实,蒋介石下野乃是玩的“金蝉脱壳”“以退为进”之计,他要隔岸观火,待各派系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蒋再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收拾残局,以坐收渔人之利。

后来的事实是: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与新桂系暂时“统一”起来。1927年9月,三方协商,成立了一个由32人组成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作为中央临时机构,行使中央职权。在这个机构中,汪精卫只当了一名委员,汪的“正统”被否定,此乃是桂系李宗仁与西山会议派联合行动对付汪的结果。汪返武汉后,宁、汉双方交战,唐生智兵败,汪失去依靠,跑到广州,与李济深、陈树人在穗成立国民政府。同时汪又与张发奎暗中秘密协商,发动兵变,把李济深赶出广州。1927年9月下旬,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各派互相厮杀、争吵不休的机会,决定赴日本一游。蒋去日本的目的,是去拜见宋美龄的母亲倪氏。他期望宋母同意他与宋美龄结为伉俪,因为她的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所以这桩婚事成功,无疑会使蒋成为孙中山的正式接班人。面对他政治生涯中的这项重大抉择,因而他要利用下野的空闲,全力以赴做好这桩政治联姻的买卖。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知何日燕归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南昌起义 东方破晓第一枪 浴血会昌 叶挺击败钱大钧

话说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一连串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几乎蒙受灭顶之灾。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屈服，他们含着泪掩埋好同伴的尸体，舔干了自己的伤口，扯去了国民党的旗号，堂堂正正地亮出了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工农革命军大旗，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道路。国共两党的合作从此彻底破裂，黄埔军校师生各奔前程，各自带领部队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反目为仇。

中国共产党从 1924 年参加创办黄埔军校起，就充分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后经过东征、北伐战争，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师生开始掌握一部分队伍，如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 4 军独立团，后扩编为第 11 军 24 师、卢德铭的国民革命军第 4 集团军第 2 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改编的国民革命军中央独立师，以及第 2 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充当排、连、营、团长者为数不少。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军官都是军事骨干力量，在建立工农红军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7 年 7 月 20 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最先提出武装暴动的建议。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发动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暴动，同时又决定联合第 2 方面军总指

挥张发奎，将党领导和受党影响的北伐军开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继续进行革命。

这天，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江西九江的同志召开碰头会。李立三等人认为张发奎态度已经右倾，原先准备依靠张发奎为领袖返回广东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因为此时的张发奎已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不满，训令“在第2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而当时第4军、第11军又正面临着被驻于南昌、临川、樟树的朱培德第3军、第9军及由萍乡向南昌移动的程潜第6军包围的危险。

为此，李立三第一个提出：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主张在军事上独立行动，把共产党所掌握的部队集中到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对李的提议，其他到会人员积极表示赞同。随后，他们立即将意见急电中共中央，得到了完全同意。随即委派中共中央常委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并决定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前敌委员会委员，负责领导起义。此外，中央还为起义筹措经费，增派干部，并邀请了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邓演达（实际未参加）赶赴南昌。根据中央指示，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郭亮、周逸群、方维夏、彭泽民、张曙时等，于7月下旬要抵达南昌，为起义进行紧张准备工作。

当时，年仅29岁的周恩来在陈赓的护送下，风尘仆仆，不顾疲劳和危险，从武汉出发，途经九江，于7月26日秘密到达南昌，住进朱德在花园角2号的寓所。27日，在南昌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起义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当时，国民党正忙于“东征讨蒋”，南昌兵力比较薄弱。朱培德又不是蒋的

嫡系,在激烈的时局变化中他举棋不定,持观望态度。朱培德的第3军主力在吉安,第9军主力在东乡、进贤一带,南昌市内和近郊,只有第5路军总指挥部及警备团,第3军、第9军为两个团,第6军1个团,再加南昌卫戍司令部和省政府的警卫部队,总计6个团的番号,约1万人。

然而共产党在南昌掌握的兵力却大大超过敌方。当时有贺龙的第20军、叶挺的第24师3个团、第25师两个团,蔡廷锴等10师3个团,各团都在1500人以上,另有24师教导队、朱德所率领的军官教育团1个营。共产党共掌握15个团两万余人。其中黄埔军校师生大约有60余人,黄埔军校官佐: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聂荣臻是11军党代表,刚从上海来到南昌;陈毅从泸州起义失败由川入汉,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准尉文书,秘密身份是中共武汉分校党委书记,在抚州赶上起义队伍;韩麟符,南昌革命委员会党务委员,是革命委员会宣誓典礼的授印人;恽代英任过黄埔军校主任教官,南昌起义时是前敌委员会委员;郭沫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委员、政治教官,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兼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李一氓(李民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委员,起义时任总政治部秘书主任;毛泽覃,毛泽东的胞弟,黄埔军校政治部科员,起义时任第11军25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陈奇涵,黄埔军校学生队队长,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参谋长;阳翰笙(欧阳继修),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秘书,起义后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第11军24师党代表;张国焘,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起义前代表中共中央阻止起义活动,遭到周恩来的反对;徐成章,黄埔军校特别官佐,起义前任财政部纠私工商保卫团团长,起义军抵达海陆丰地区时,组织农民自卫军配合攻打揭阳城;雷经天,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

科长,起义时任 24 师 64 团党代表;柯良材,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官佐,起义前任中共湖北军委秘书长;袁也烈,黄埔军校入伍生队指导员,起义时任 24 师营长。

在黄埔军校第 1 期毕业的学生参加起义的人数较多,他们都担任营、团长以上职务。如周士第,25 师 73 团团长;王尔琢,25 师 74 团参谋长;侯镜如,24 师 72 团副团长,教导团团长;董朗,24 师 70 团团长;陈赓,起义军 20 军营长;袁仲贤,20 军 3 师参谋处长;彭干臣,南昌卫戍司令兼公安局局长;傅维玉,20 军 2 师 6 团团长;蔡申熙,11 军 24 师参谋长;刘畴西,24 师参谋;廖运泽,24 师 72 团代理团长;彭明治,24 师排长。另外,还有徐石林、王之宇、冷相佑、郭德昭、苏文钦、游步仁、李奇中、孙德清等,均在起义时任营、团长或党代表。

在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的学生中,要数周逸群最为出类拔萃。周逸群原名周立凤,贵州铜仁县人,入黄埔军校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人文韬武略,满腹经纶,1919 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庆应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在黄埔求学时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毕业后他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队长,在贺龙加入国民革命军以后,邓演达派他到贺龙 20 军任党代表。在起义军南撤途中,他和谭平山在瑞金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恭,湖南醴陵人。他和周逸群一起被派到贺龙的 20 军,起义时任 20 军政治部秘书长、20 军 2 师党代表兼副师长。他于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从事革命工作。1928 年 3 月被敌逮捕后英勇就义。陈公培、张堂坤也参加了南昌起义。

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朱云卿,率广东江北农民自卫军参加了南昌起义大军,当时他任农民自卫军北上总指挥部参谋长;段焱华,起义时任 20 军 3 师参谋长;符节,当时在叶挺的部队任

职,起义后回到海南任琼崖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他们3人都是共产党员,均为革命光荣牺牲。朱云卿当过红一方面军参谋长,1931年5月因病在江西吉安红军后方医院住院,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段焱华于1930年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1932年12月在安徽金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牺牲。符节1928年5月在海南武装斗争中失利被俘,7月在澄迈就义。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的刘力劳、王刚、周采邦、蔡晴川、蒋作舟等均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学生参加南昌起义的那就更多了,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共和国的将帅。如林彪,刚从广东来到江西,在叶挺的25师73团任连长。当时他名不见经传,瘦小精悍,肤色苍白,那种天生一代名将的气质,给聂荣臻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唐天际,当时任20军特务连副连长。郭化若,4军炮兵连长。南昌起义后,他离开九江,经上海到广东潮汕,在那里赶上起义军,被任命为炮兵营长。后来,郭化若在延安任毛泽东的军事秘书,共和国中将。李鸣珂,24师72团2营营长,起义后任总指挥部警卫营营长;李逸民,11军24师教导队指导员;裘古怀,任叶挺部参谋;袁国平,4师党代表;文强,20军3师特务连连长;吴东、李大柱、向浒等也在起义军中任军官。

至于黄埔军校第五期、第六期毕业的学生,参加南昌起义较为著名的:杨至成,当时是20军3师6团连长;许光达,11军25师75团3营11连连长;廖运周,廖运泽的胞弟,11军25师75团参谋。陶铸,起义时任11军24师某团副官,后来又下连队当连长。起义失败后他转移到香港,从事兵运工作,而后被捕,在上海判无期徒刑,转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在狱中他把监狱视为大学,数年之后,这位仅上过私塾、小学的黄埔军校五期肄业生也居然满腹诗书,文笔风流倜傥,建国后编入中学语文教科

书的名作《松树的风格》，如今已是家喻户晓，广为流传之美文。他后任共和国副总理，1969年11月，死于安徽合肥。谁也未曾想到他会折于他的那位黄埔师兄林彪的手里。黄埔六期毕业的彭援华当时任武汉分校女生队班长，她在女生队指导员彭漪兰的率领下，与同学杨庆桂、杨庆兰亲姐妹、王鸣皋等30位女兵，参加了南昌起义。彭漪兰、胡毓秀和彭援华（彭文）分配在起义军参谋团，其余27名女兵分配在朱德的第9军、叶挺的第11军和贺龙的第20军做宣传或救护工作。到瑞金后，30位黄埔6期女学生都集中到革命委员会。从南昌到潮汕，千里征途，坚持到了最后，没有一个女逃兵。流沙失败后，她们转移到香港或上海。黄埔军校女生队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诸志元、曹泽芝、黄直纯、谭勤先、周铁忠、周开壁、陈觉吾、孙萃非、周月华、方晚成、黄厚吉、肖景子、肖凤文、苏同仁、罗凤仪等。如果有人追寻这30位女兵的足迹，也许能写成一部惊世之作。据说，她们在三伏盛夏南下行军中，最爱唱的一支歌是《少年先锋队队歌》：“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女兵唱歌，鼓舞士气，立刻一唱百和，男女齐唱。

在南昌起义中，黄埔军校师生有着重要作用，人虽不多，但均在起义军中任各级指挥员及官佐，这是武装起义的关键。

南昌起义是中共1927年7月13日发表对政局宣言后的具体行动。宣言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将继续不妥协地和新、旧军阀、帝国主义作斗争。7月13日的宣言，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结束。这一天是个界碑，从这一天开始，武装斗争的思想，成为党和人民的统一的意志，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路线，代替了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国共

产党坚信：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使中国革命的进程从此转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从九江坐火车赶到南昌，前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以共产国际的电报为由，主张应极力拉拢张发奎，暴动应得到张的同意，否则不可动。他的意见当即遭到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的一致反对。周恩来表示：张国焘的意见与中共中央派他来的意思完全不符；如果不准起义，他只有辞职不干。当时感情冲动的谭平山大骂张国焘是“混蛋”，要把张捆起来杀掉。对此，周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于是制止了事态发展。

31日晨，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此时，叶挺、贺龙未去庐山开会，张发奎来电说8月1日要到南昌来。据闻，同来的还有汪精卫和孙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立即起义的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余地。张国焘也深知自己已彻底孤立，形势无法逆转，因而不得不同意举行起义。最后，前委遂于当天中午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在起义前，由于20军1师1团3营副营长赵福生于7月31日晚叛变投敌，使起义发起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8月1日凌晨2点，三声清脆的枪声响彻长空，信号弹升起，全城内外，枪声大作，炮火轰鸣，杀声四起。章江路藩台衙门驻扎着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当时贺龙的20军1师师长贺锦斋率部奋不顾身爬墙登上鼓楼占领制高点，刘伯承在只距敌200米的地方与贺龙共同指挥，经过了3小时的战斗，终于迫使敌全团缴械投降。

担任攻击贡院的叶挺24师72团由团长孙树成率领，向敌23团发动猛烈攻击。24师教导队队长陈守礼在短兵相接的情形下中弹倒了下来，陈守礼是起义军壮烈牺牲的第一名军官。在共和国军队的历史上，先后曾有过成千上万的英烈，而在那黎

明的前夜牺牲的陈守礼,则名列于共和国军队的英烈榜首。

顺化门外,20军教导团团长、黄埔第一期毕业的共产党员侯镜如,在起义前一天下午带着中队以上干部借拜访友军之机,察看敌营地形。在敌团长的带领下他们参观了整个营房。晚上侯镜如根据敌情、地形向部队分配了战斗任务,并连夜在营房附近埋伏起来。当他们向敌发起猛攻时,敌人刚从梦中醒来便做了俘虏。侯镜如后来官至国民党中将,1949年4月任国民党17兵团司令官,辖96军、106军、92军。此人文武双全,河南永城人,河南大学毕业后进的黄埔。1925年由周恩来、郭俊介绍加入共产党,由于身份未暴露,在国民党军中继续任职。南昌起义失败后,因负伤而离开部队,后曾一度被国民党逮捕,坐了牢。出狱后与党失去联系,在穷途潦倒中,经黄埔同学会牵线,见到老长官——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刘峙,才被恢复军中职务。有关侯镜如与共产党的情缘并未了结,在此暂且不提,以后再述。

且说当天中午,驻守在南浔线上马回岭的第4军25师,乘一列火车由南昌开来。在此情况下,聂荣臻采取果断行动率领部队起义。参加起义的有: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73团团长周士第、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74团参谋长王尔琢、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75团1营长孙德清(孙一中)。他们舍弃辎重,以“打野外”为名,悄悄地带队出发,傍晚到达德安县城集会。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第25师师长李汉魂,气急败坏地率领卫队营,乘火车追来,遭到猛烈阻击。张发奎、李汉魂见大势已去,弃车而逃。满载卫队营的火车,被起义军团团围住,全部缴械。经过宣传教育,大部分士兵和一部分下级军官参加了起义军。25师师长李汉魂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成了一个“光杆司令”,部队竟被周士第、王尔琢、孙德清这几个黄埔生拉跑了。8月2日,这支部队到达南昌,受到周恩来的称赞。

第10师师长蔡廷锴是原第11军军长陈铭枢的亲信，对革命怀有二心由来已久。1927年春，陈铭枢脱离武汉投靠蒋介石时，蔡就游离于宁、汉之间，后来为保存实力，才不得不暂委身于张发奎门下。7月上旬，蔡廷锴部参加东征讨蒋，于南昌起义前夕抵达南昌近郊驻扎。迫于形势，蔡廷锴不得不表示拥护并参加了起义。在起义胜利之后，有人提议调整第10师的军官，对蔡廷锴采取断然措施。由于时间紧迫，参谋团没有即时行动，并命令其在南进中担任侧卫，与主力相距近百里，单独开进，这使蔡廷锴有了可乘之机。8月5日，蔡部抵进贤后，在其心腹干将的密谋下，决心投张发奎，脱离共产党的起义大军。上午8时，蔡命28团封锁各门卡，特务营布置师部警戒，而命30团团、共产党员范孟声率部架枪休息。在全团官长到师部训话时，从而解除了范孟声、28团参谋长、共产党员徐石麟的兵权，将全部共产党员“礼送离队”。之后，蔡率部转道向东进入余江县境。紧步蔡廷锴的后尘，贺龙20军参谋长陈浴新用欺骗手段，带着一些参谋人员和5团的700多名士兵叛逃归唐生智去了。陈浴新叛逃后，出卖了起义军军事计划，迫使起义军临时改变原定的南下行军路线。蔡廷锴、陈浴新的叛逃，拉走了起义军近四分之一的兵力，使起义军力量受到削弱。

南昌起义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下，经过5个多小时的战斗，在东方破晓、霞光万道之时，枪声才逐渐稀落。历史记载了这光辉的一天：“（8月1日）九点钟以后，商店还是照常开门营业。街上，人愈聚愈多，当人们经过总指挥部门前时，都举手欢呼，南昌人民送来了很多牛肉、西瓜，慰劳起义军。”这天早晨，《南昌民国日报》上，全文刊登了由中共前敌委员会起草的《中央委员宣言》，在共同署名的22位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有国民党左派人士7人。其他都是为国共合作及北伐战

争作出过贡献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中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未到。周恩来、林祖涵、郭沫若、恽代英、张国焘均是黄埔军校教官。这个《宣言》即后来史称的《八一宣言》。

起义胜利后,所有起义部队总称为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下辖第20军、第11军、第9军,共3个军。叶挺、贺龙、朱德为军长,聂荣臻、廖乾吾、朱克靖为党代表,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周士第、二期毕业生周逸群升为25师、3师师长。总兵力约3万余人。

在起义胜利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国民党迅即调动军队包围南昌,起义军没有与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8月5日,按原定计划退出南昌,南下向广东进发,经临川、广昌、瑞金、汀州(今长汀)等,沿途多次与敌作战。8月下旬,会昌之役,是南昌起义后一次激烈的战役。这次战役的对手也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现任国民革命军北路军总指挥钱大钧,辖第20师、第28师、新编第1师及补充团共10个团。钱大钧是第1军出身,该军黄埔学生比较多。这是国共分裂后黄埔同学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一次激战,双方均有伤亡,但最后还是以钱大钧失败而告终。

8月15日,起义军离开宜黄,继续南进,17日到达广昌,起义军在此休息一天,19日出发,兵分两路,向瑞金取分进合击之势。20日进石城,22日继续前进,就在这一天,起义军发现敌军就在眼前。从广昌出发时,11军为右纵队,20军为左纵队,约定在壬田会合后进入瑞金。当时,起义军与来自广东的劲敌钱大钧部相遇。钱大钧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八大金刚”之一,共有两师零两团,分驻瑞金、会昌一带,前锋已抵壬田市。

在这关键时刻,由于一直追随于起义军之后的张发奎部,忽然改变主意,由南雄入广东,因而起义军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能够集中全力对付钱大钧,以致打开南进的通道。张发奎突然

改变计划,原来其中有叶剑英的一份功劳。叶剑英当时身为第4军参谋长,在张发奎、黄琪翔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如何追击贺龙、叶挺时,叶剑英看透了张发奎急于回广东和李济深争夺地盘的心思,于是乘机进言道:“让共产党去占领东江,李济深就要去打,这时我们就可以乘虚而下广州。”这句话,张发奎正中下怀,因此便欣然放弃追击起义军,而挥戈广州。叶剑英的缓兵之计,为起义军减轻了后顾之忧,从而赢得了机动的时间。这时叶剑英加入共产党尚不到两个月,他是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第4军工作的。叶剑英这一妙计,帮了起义军的大忙。

8月25日,贺龙部在壬田与钱大钧的两个团接触。贺龙主动进攻,占领瑞金。钱大钧失败,退到会昌。起义军在瑞金缴获了敌人许多文件后,方知敌攻击我之计划,有优势兵力驻会昌,并以会昌为中心,构筑工事;桂军黄绍竑部以7个团的兵力集结于白鹅圩附近,与会昌成犄角之势,企图堵击起义军。

会昌战役于8月30日展开,打得十分激烈。周恩来、叶挺、刘伯承、聂荣臻、贺龙都在阵地前沿指挥战斗,经过拼杀,击溃钱大钧主力,敌军伤亡、被俘、逃散的达6000多人,只有3000人退走。起义军伤亡1000多人,连以下干部伤亡较大,陈赓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而终身成跛的。会昌战役后,起义军主力陆续返瑞金。在瑞金,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入党。郭沫若与贺龙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危难之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9月下旬,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同李济深、黄绍竑、范石生、钱大钧的4万余敌军鏖战中失败。10月3日,前敌委员会在普宁流沙天后庙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南昌起义的擎天柱周恩来病魔缠身,高烧40℃,由担架抬来主持会议。首先他就战事失利作了检讨并部署善后工作,武装人员尽可能收容整顿,向海陆丰

撤退,坚持长期斗争,非武装人员按中央指示,分别向海口撤退,然后赴香港、上海。南昌起义军失败后,周恩来坚定地说:“我的病不要紧,我不能离开部队,我准备到海陆丰去,拉起苏维埃的旗帜。”

在敌人追捕的艰难环境中,周恩来带着重病之躯转移到陆丰南塘黄厝寨。10月底,周恩来在中央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以及叶挺、聂荣臻等护送下,乘木船赴香港。朱德在饶平召集周士第、李硕勋(李鹏之父)、陈毅、王尔琢等指挥员开会。朱德说:“在三河坝激战时,部队还寄希望于前线,现在前方主力失利,希望变成了失望。在这种局面中,必须另寻出路。”朱德继续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种子保留下来。”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把部队转入赣南地区,在寻乌、安远、信丰一带艰苦跋涉。11月上旬,部队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县上堡一带,这才算站住了脚跟。朱德化名王楷,用国民革命军第5纵队的番号,在此进行整训后,共剩余兵9个连。随后,转战湘南。1928年4月,上了井冈山找到毛泽东,“朱毛井冈山会师”由此而名扬中外。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它在日益猖狂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为了挽救革命,毅然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决心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念。

8月1日,是中国人民革命武装诞生的日子。1933年7月1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作出决议,规定以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949年初,毛泽东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制作我军军旗时要有“八一”两字,周恩来亲自安排了这一工作。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

布命令,规定以“八一”字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在南昌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有8位50岁以上的老人,当时号称“八仙”。除了徐特立之外,还有满头白发的财政委员会主席林伯渠、秘书长吴玉章、主席谭平山、中央海外部部长彭泽民、江西省政府主席姜济寰、1师政治部主任方维夏、委员高语罕。“八仙”中除姜济寰是国民党员外,其余7人均为共产党员。徐特立在湖南执教30余年,以“教育救国”、“师德高尚”而著称。在“马日事变”后,他是经李维汉等介绍加入共产党的,随后,他辞别妻儿,秘密赴武汉工作。

7月27日抵南昌参加起义,朱德称他为“当今一圣人”。起义失败后,他与林伯渠、叶剑英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林伯渠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后又兼任财政部长。徐特立在1930年12月底,根据党的指示,也辗转到达瑞金,致力于苏区教育,主持教育部工作。1966年4月,徐特立重返南昌时,曾参观八一起义旧址,并兴致勃勃地写下了《题南昌纪念馆》一诗:正是“八一”之前老学生,学书学剑两无成;而今重话南昌事,我是当年一老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霹雳一声 湘赣边秋收起义 进军井冈 卢德铭中弹牺牲

话说1927年8月7日,也就是南昌起义的一个星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等多人。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在当时汪精卫公开反共的险恶环境下,会议只开了一天。会议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同时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号召全党同志到农村去,领导并参加农民暴动。

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认为,党中央所犯的错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指出,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从此,“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名言,成为共产党以后搞武装斗争的座右铭。“八七”会议为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指出了继续斗争的目标。会后,代表们满怀豪情地奔赴农村组织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因而踏上了一条新的征程。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其中共产党员学生除少数未暴露身份的仍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外,大部分均活动在各地,参加了武装起义。当时,他们迅速地成为军事斗争的重要骨干,为创建工农红军作

出了极大的贡献。

8月中旬,毛泽东从武汉回到长沙,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肩负着领导秋收起义的重任。他出席了8月18日在长沙近郊沈家大屋举行的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并制订了湘赣边区秋收起义的计划。

当时,我党所领导的湘赣工农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修水、铜鼓和安源三个地方。

驻修水的部队,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亦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这个团的团长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的共产党员卢德铭。警卫团是两个月前以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官兵为基础,后又招收了一批新兵组建而成的,其中不少是安源煤矿工人和湖南、湖北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在全团指战员中,很多是党团员。

八一南昌起义后,卢德铭于8月2日夜接到他的黄埔同期同学周逸群来的电报,要他率团速来南昌,十万火急。同时他又接到张发奎的电报,要他星夜赴九江待命。面对两份来电二者必居其一。于是卢德铭与团指导员辛焕文、团参谋长韩浚(黄埔一期)商量,其结果是响应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不回张发奎电,利用他调动部队的命令,率团公开赴南昌。8月9日,部队到达江西武宁,得知周恩来、周逸群的起义军南下,追赶不及,卢德铭便折向南昌西南的高安,暂作整休。部队经过武宁时,遇到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农军,近而一同奔赴修水。8月中旬,朱培德准许卢德铭的警卫团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的名义驻防修水。

平江农军与警卫团一起进驻修水后,警卫团的卢德铭、韩浚、辛焕文三位领导人,到武汉找党中央请示工作,而部队就交给1营营长、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的余洒度负责指挥。

卢德铭等人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到达白色恐怖笼罩下的

武汉,找到在党中央工作的向警予大姐。见面后向大姐向卢德铭传达了党中央最近召开的“八七”会议精神,并说中央已派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她要卢德铭去与毛泽东取得联系,告诉卢千万不能离开部队,并指出夏曦叫去闽粤交界处去追南昌起义军是错误的,可以拒绝执行。向警予说:“在目前混乱的情况下,部队战士更需要他们熟悉、信任的指挥员。你们在,部队就有力量;你们走,部队就会削弱,这个影响太大呀!”她还说:“我的意见,你们应该马上返回原部队,掌握好党的武装。要知道,没有武装,便没有发言权!”卢德铭点头称是,顿觉心明眼亮。向警予代表组织,派给卢德铭6名年轻的党员军事干部,发给3000块银元做活动经费,同时与他们详细研究了返回修水的路线和办法。

卢德铭等一行多人返回修水后,不久鄂南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也前来修水,经过协商,这支农军编为警卫团的特务连。

驻铜鼓的浏阳农军,是大革命时期我党建立的一支革命武装。这支队伍,经过大革命血与火的洗礼,没有垮掉,一直高举革命大旗,在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领导下顽强地斗争着。这年7月,他们奉命与平江农军一起,赴南昌参加起义,因没能赶上,又返回铜鼓待命。

安源是工农武装集聚的另一个中心,因为这里有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和附近几县的农民自卫军。纠察队是一支由我党直接培育起来的600多人的工人武装,还有当时我党掌握的矿警队。此外,还有各县的农民自卫队,如醴陵县的农民自卫军等。他们在“马日事变”后参加10万农军围攻长沙,后被迫撤回。在归途中约有200多人由县委书记罗学瓚率领,直接来到安源,并在矿工们的掩护下,重整旗鼓,以待时机。这些农军的干部大都参加过广州或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有的还是乡镇农会主席。如今他们破釜沉舟,背井离乡从而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有一定的觉悟。另外，衡山农军百余人以及萍乡、安源、莲花的农军数百人也相继来到安源。

这些驻修水、铜鼓、安源的工农武装，他们的革命斗志正旺，总计约有 5000 余人。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武器：2000 多支步枪、几挺机关枪，此外就是梭镖、鸟枪、马刀等，还有安源矿工自制的土炸弹。

9月初，毛泽东乘火车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潘心源、蔡以忱、宁迪卿、王兴亚、杨俊等部分起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向与会者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以及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详细介绍了湘东、赣西各地武装情况。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的编制，部署了起义进军的路线。

秋收起义部队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下辖 4 个团，计官兵 5000 余人。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为总指挥，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第 1 团团团长钟文璋驻修水，该团由国民政府警卫团、湖南平江农军和湖北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等组成。第 2 团团团长王兴亚驻安源，该团由安源工人武装和萍乡、醴陵、衡山、安福、莲花等地农军组成。第 3 团团团长苏先骏驻铜鼓，该团由浏阳农军、平江农军一部和警卫团 3 营营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伍中豪一个营组成。第 4 团团团长邱国轩驻修水，该团由黔军王天培（被蒋介石枪毙）的散兵游勇汇合的杂牌武装组成。起义一开始，邱国轩就率部叛变了。

9月9日，震撼中国大地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了，暴动的号角响彻云霄，工农兵齐奋起，杀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秋收起义的风暴，席卷湘赣边，惊动了正在溪口下野的蒋介石。起义的信号是破坏国民党的铁路交通，接着，卢德铭率第 1 团出

修水,向平江进军,攻打长寿街;第2团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和醴陵;第3团从铜鼓出发,攻打浏阳。然后三兵团共同向长沙进击。9月10日,第1团攻下朱溪厂,卢德铭率师部及1团1营于12日胜利地占领了龙门厂。当地群众看见高举镰刀斧头金色五角星军旗的部队。他们高兴得送茶送水,送粮送菜,送酒送肉,慰劳将士以表心意。师参谋处的何长工、杨立三为红星军旗的设计制作费了不少的心血。为统一制发各团、营、连的旗帜,卢德铭请来裁缝日夜赶制,在起义前发到各连队中。卢德铭即吩咐参谋处组织宣传队上街,向人民群众宣传秋收起义的重大意义,布告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队伍。不多时,街头巷尾,廊下店前,群众聚集倾听宣传队的战士演讲,一伙青年还学唱革命歌曲,小小的龙门厂充满革命气氛,一片欢欣。

但是,进攻长寿街的战斗遭遇挫折。一位撤下来的伤员向卢德铭报告说:昨晚,我们在距长寿街10里左右的地方,与邱国轩的第4团会合,宿营。今晨一同出发攻取长寿街。第4团为前队,在抵达金坪时,突然遭到邱团长的夹击,钟团长率2营从中路猛冲过去,被抢去了大批军需物资,被迫向浏阳方面转移。第2团从安源出发,攻萍乡未克,12日占萍乡以西之老关,13日打下醴陵,15日夺取浏阳县城,因未及时撤出,16日陷入敌人重围,2团突围后损失惨重。第3团于11日由毛泽东率领从铜鼓向浏阳进军,首战攻克白沙镇,次日又占领浏阳县东门市。由于右路1团失利,13日3团与敌激战后撤至上坪。工农革命军3团1营营长、共产党员汤采芝在东门市的羊牯脑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他多次率领全营发起冲锋,后来腹部中弹,小肠流出,仍继续指挥作战,终因伤势过重而壮烈牺牲。与此同时,湘东各县人民纷纷响应起义,但因主力受挫而遭镇压。鉴于3

个团进攻均受挫折,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当机立断,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命令各起义军向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3团全部、1团余部和2团零散人员陆续到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分析敌我形势,讨论进攻方向问题。会上他提出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要部队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之地。总指挥卢德铭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但余洒度却坚持“夺取浏阳,直攻长沙”。他说:“不打长沙没出路。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还叫什么革命!”毛泽东据理反驳:“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毛泽东生动而又深刻地总结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经验,说明到农村、到山区有出路。他接着说:“你们算一算,哪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卢德铭、苏先骏的支持,师长余洒度只好少数服从多数,而以以前敌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决定。

卢德铭对他的同窗余洒度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死抱住昨天的决定不放,主张到大城市去与强敌硬拼,搞中心城市暴动,势必要葬送我们这支起义部队,势必导致这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彻底失败!”会议是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后栋教室里召开的,到会的有毛泽东、卢德铭、苏先骏、余洒度、余贲民等,但缺2团团团长王兴亚。王兴亚农民出身,见识短,没有打过仗,在浏阳失败后,部队大部分散失,后经潘心源等同志努力,在南乡集合了100多人经大瑶抵文家市。当时,1团、3团尚未到达,王兴亚与团防局打了一仗,牺牲战士3人。王兴亚惊恐万分,当晚他开了小差,部队失掉指挥,失散者甚多。余洒度率1团在金坪失利后,他不顾形势变化,将部队屯扎于平江县龙门附近的大山中,派人调3团前去合力反攻长寿,进取平江。总指挥卢德铭制止,

余洒度不听，派往3团的通讯员带来前委命他率部到文家市集中的指示，他也拒不执行。直到毛泽东又去信严厉批评，他才勉强同意南下，向3团靠拢，并于19日中午前后到达文家市。余洒度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也激起了当时任第3团3营营长伍中豪的愤怒。伍中豪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他比余洒度晚两期，算是师弟。但伍中豪曾是北京大学优秀学生，见识广，头脑清醒，只不过脾气有点暴躁，爱喝点酒，打仗时水壶中不装水，而是装酒。伍中豪见余洒度坚持攻打长沙，急得用驳壳枪指着余洒度的脑袋，要他绝对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向罗霄山脉进发。

文家市退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也是我党革命斗争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关键，从而避免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秋收起义在文家市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攻”，还是“退”的决策上。毛泽东从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深切地感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要攻打大城市，等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毛泽东说：“这样做不是龙王与龙王比宝，而是叫化子与龙王比宝。”毛泽东力主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部队开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去，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存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9月20日，旭日东升，晴空万里，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1团、2团、3团的指战员共有1500多人，集合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整装待发。毛泽东身穿老蓝布农民衣服，一身农民打扮，脚穿草鞋，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操场，卢德铭总指挥、余洒度师长尾随，毛泽东招呼官兵席地而坐，然后开始讲话。他说：

“这次秋收起义，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

这次长沙没打下来,但是我们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这个事我们还要继续干下去。我们并不孤立。我们的事业受到湘、鄂、赣、粤4省广大工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得紧,继续勇敢地战斗,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讲到这里,他打了一个比喻说:

“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中国有句古话:‘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能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捱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

秋收起义的参加者何长工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工农群众不觉得深奥,知识分子不觉得浅薄。”

9月20日早餐后,工农革命军离开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开始了新的战略进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工农革命军沿着湘赣边界,爬山涉水,昼行夜宿,由江西的桐木、快阳、小枧,计划经萍乡向莲花县进发。到了栗市,工农革命军闻知萍乡驻有敌人重兵,因而决定绕道芦溪。9月23日,部队到达芦溪镇宿营,第2天清晨出发。毛泽东和卢德铭率领指挥部随1团在前,3团在后,在距芦溪镇15华里的山口岩,遭到江西国民党朱培德部特务营和江西第4保安团的伏击,而起义军仓促应战,损失很大。在此危急时刻,总指挥卢德铭挺身而出,率领10个连占领路旁高地,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毛泽东、谭政、何长工、余洒度等陆续撤离。这时,敌人一部占领附近一个山头,居高临下,向卢德铭所在连阵地射击,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大部队撤走后,当地群众将卢德铭及同时牺牲的40多位战士的尸体就地掩埋了。真是“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卢德铭牺牲时年仅22岁。他生于1905年6月,又名继雄,字邦鼎,号又新,家在四川省宜宾县双石铺乡狮子湾村,6岁人

私塾读书,14岁进宜宾县属白花镇高小,1921年考入成都公学(即中学),在校期间,接受“五四”运动革命思潮的影响,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他曾对同学们说:“要改变现状,就要有实力,要学军事。”1923年夏,卢德铭在成都公学毕业,听说广东黄埔军校招生,他向父亲提出报考军校的要求,但父亲不同意,他请来本乡老同盟会员说服了父亲。1924年2月,刚满18岁的卢德铭就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因路途遥远,6月份辗转抵达广州时,黄埔军校第一期已开学。他没有气馁,找到了在成都公学读书时的老师、老同盟会员李筱亭,持李的信函,见到了黄埔军校总理孙中山。孙中山听了卢德铭艰难出川的经过,大为赞许,并经他介绍,进入了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在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他担任学生军侦察队长,带领60多名学生参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25年6月,他毕业后,被周恩来留下来在黄埔军校政治部组织科任科员。廖仲恺遇刺时,他怒不可遏,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声讨国民党右派,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黄埔军校广大同学的好评。同年11月,我党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在广东肇庆成立,建制属国民革命军第4军,卢德铭调任独立团2营4连连长。根据党的指示,独立团在广东西江高要县一带,反击地主武装,帮助开展农民运动,北伐期间,在攻占湖南攸县和武昌城的战斗中,屡建战功。在独立团攻打武昌城时,1营营长、黄埔一期毕业的共产党员曹渊牺牲,叶挺调卢德铭接任1营营长。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团长叶挺升任24师师长,独立团改为24师73团,黄埔一期毕业的共产党员周士第任团长,卢德铭任参谋长。在攻打武昌的战斗中,叶挺独立团牺牲了官兵300多人,后来将烈士的尸体集中在洪山安葬,墓碑上刻写着“无产阶级的牺牲者”8个大字。这8个大字的定稿是经过一番斗争的。当时第3

营营长等一部分人,以国共合作为由反对写“无产阶级”几个字,卢德铭批驳了这种意见。卢德铭说:“我们独立团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写这4个大字,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反对革命。”经过这样的辩论,原来持反对意见的官兵也改变了立场,同意写这8个大字。卢德铭是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军事领导干部。秋收起义时,卢德铭的国民政府警卫团成了主力。卢德铭如果还健在,他在共和国十大元帅中肯定榜上有名。他22岁青春年华,就为红军建设英勇捐躯了,他为中国共产党及黄埔军校增添了光彩的。

且说卢德铭总指挥牺牲后,在工农革命军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已成定局,战斗减员迅猛,从起义誓师的5000之众,转眼就仅剩余1500人。在团、营建制空着的情况下,开小差的几乎每天都有。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抵抗的道路。1团1营的1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集体逃跑了,并且带走了全部武器。若干年后,共和国的将军、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在《毛委员在连队建党》一文中回忆说:“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部队中的逃亡现象清楚地说明了: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者手里;另一方面,还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这样才能巩固。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非常鲜明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恰恰是在这个最紧要关头,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研究了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从而察觉了问题的症结,采取了坚定的措施。”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经过攻克莲花县,转战到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共和国元帅、秋收起义时的连

党代表罗荣桓回忆说：“三湾改编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实际只有第1营、3营，每营3个连，加上原来特务连，共有7个连队。另外，多余的干部组成军官队。伤病员与战斗员分开，成立了卫生队。”何长工当时就是卫生队的党代表。

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团长为陈浩，党代表何挺颖，参谋长韩昌剑。第1营营长黄子吉、第3营营长张子清，军官队队长陈毅安、1连连长负一民。

3营长张子清曾任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政治教官兼区队长，以后在进军井冈山途中于遂川大汾遭敌空袭。在与上级失去联系后，张子清率全营官兵转战湘南两个月，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所部于1927年12月下旬归队后，他任第1团团团长，1929年3月升任第1师参谋长兼1团长，不久，率部于酃县打退敌人追兵，接应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

军官队队长陈毅安，又名陈斌，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24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2军教导师3团连党代表。在卢德铭的警卫团中他当过军需官，参加秋收起义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先后任红4军31团副团长、红5军副参谋长。1930年7月，任红3军团8军1纵队队长，（彭雪枫任政委，黄克诚任副纵队长）率部攻打长沙。8月7日，陈毅安率部掩护大部队撤退，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三湾改编后的1营1连连长负一民也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他老家在山西平陆，共产党员。1928年4月在湖南茶陵与国民党作战时英勇牺牲，时年26岁。

还有一位辎重队队长范树德，也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河北元极人，1925年在黄埔军校入党，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1军1师经理处处长，三湾改编时任辎重队队长，上井冈山

后,组建红4军,他当4军军需处长。1931年11月他当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总经理部部长。1934年长征后,他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先后任中央军区供给部部长、赣南军区参谋长,1935年,在湘赣边境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被俘。后叛变革命,充当国民党特务,解放后被关押改造,后被特赦。一段光辉革命历史,被自己亲手毁掉。范是1907年出生,要是活着,本书出版时已是92岁高龄了。

再说说三湾改编后,师长余洒度、苏先骏等人留恋过去的“三金”(金牙齿、金戒指、金边眼镜)“五皮”(皮鞭、皮武装带、皮挎包、皮靴、皮绑带)以及四菜一汤的特殊生活待遇,在军队中散布怀疑悲观情绪,诬蔑向农村进军是错误的,胡说“这条道路走不通”,“在山上吃什么”,反对党对军队的领导。在改编大会上,余洒度给战士大泼冷水,唉声叹气。在部队到酃县水口时,他和苏先骏借口找中央和省委汇报工作,离开了部队,后来被捕叛变了。

余洒度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湖南平江人,当年在黄埔时,曾任中共黄埔军校支部组织干事,也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成员。北伐时任卢德铭警卫团团附,秋收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1军1师师长。无论在黄埔或是在工农革命军,他都是红得发紫的头面人物。在黄埔军校时,余洒度是“血花剧社”的骨干,他多才多艺、办事认真,蒋介石曾对他很欣赏,并当面表扬,予以奖励。“中山舰事件”后,虽然余洒度是中共党员,青军会骨干,但蒋介石仍然竭力拉拢之,让他和蒋先云、曾扩情一道筹备成立黄埔同学会,还选他担任宣传科科长。北伐后,他和卢德铭既为同窗,又志同道合。国共分裂后,他俩率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他的师长之职被撤了,闹情绪,与苏先骏一道离开工农革命军。10月出走后,到上海,脱离中共组织。1929年在上海与谭平山等组织中华革命党,参加反蒋义举。

1930年追随邓演达而被捕，蒋介石网开一面，收容一批投靠他的黄埔学生，送到南京中央军校特训班受训。此后，余洒度为效力蒋介石惟恐不勤，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成为骨干之一。1932年7月，他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训研究班训育主任，后率毕业学员500余人组成华北宣传总队，积极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久因卖力而擢升为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在黄埔第二期学生中，也属官运亨通之列。1934年，余洒度利用职权在华北走私和贩卖吗啡，被当时任北平宪兵3团团团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师兄蒋孝先拎举告发。蒋介石此时对“剿共”非常棘手，联想到余洒度也曾为红军的师长，一怒之下，将他逮捕，押至南昌枪毙。蒋介石对变节分子总是不放心，而仅因走私枪毙一位黄埔出身的将领，在当时还比较罕见。

参加秋收起义的黄埔学生还有武汉分校的徐彦刚、王良、陈伯钧、张宗逊、张金泉、谭希林、陈奇、刘型、伍中豪等多人。像张宗逊、谭希林、陈伯钧这些命大之人，都成为共和国首批授军衔的将军。

话转回头。且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几经转战，于10月27日抵达井冈山的茨坪。在这之前又收编了袁文才和王佐这些绿林好汉，方才在茅坪安了一个革命的“家”。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2000多人，和湖南起义农军8000多人到达耒市。5月1日，朱德、毛泽东两位巨人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将部队改称工农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王尔琢任参谋长。井冈山会师，在我国革命史和建军史上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朱德写诗赞曰：“红军会师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广州起义 叶剑英首先发难 星火燎原 黄埔生揭竿而起

话说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在 1927 年年底，领导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在参加广州起义的成员中，黄埔军校的师生起了重要作用。

广州是北伐的大本营，又是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所在地，素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反动派查封中共两广区委会，解散青年团和广州工会，杀死两广区委工委书记刘尔崧、省港罢工委员会副委员长何耀全同志，逮捕 2000 多人。之后，广州工人在周文雍等人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多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总罢工。这些斗争，为广州起义准备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南昌起义部队攻取东江地区的军事计划失败，中共中央原定配合南昌起义所发动的广州起义，不得不暂时放弃。

11 月，广州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桂系新军阀李济深、黄绍竑所部集结在梧州，意欲夺取由汪精卫、张发奎控制的广州，支持蒋介石的粤系将领陈铭枢也在汕头向广州进发，企图取而代之。两面受敌的张发奎为巩固自己的地盘，被迫兵分两路，主力赴肇庆、梧州同黄绍竑作战，一部布防东江，以阻扼陈铭枢前进。两路分兵，使广州城内驻防十分薄弱，仅留有第 4 军教导团和新编成的

警卫团及一部分警察,总兵力约 6000 余人。而教导团和警卫团,实际上是共产党掌握的武装,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就是教导团团长。该团原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改编的,1927 年 7 月底,国民革命军第 2 方面军 4 军教导团奉命由武汉赶赴南昌参加起义,行至九江时引起第 2 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猜疑,被缴了械。当时第 4 军参谋长叶剑英自荐任教导团团长,以保存这一部分革命实力。叶剑英在国共两党中都很具传奇色彩。他 1922 年 6 月 16 日保护过孙中山在广州蒙难脱险,组建黄埔军校时,他抓教材编写、师资聘任、校址选择等多项工作,出力最多;东征、北伐时,他是国民革命军第 1 军参谋长兼新编 2 师师长,1927 年 7 月,正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向党组织再一次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当时刚从上海到武汉,立即同意叶剑英入党,圆了他多年来的宿愿。叶剑英率领 4 军教导团南下广州,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4 军教导团内黄埔军校师生很多,武汉分校女生队部分学员也加入了广州起义的行列。全国共有官兵 1300 余人,大部分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情、支持工人阶级和土地革命。其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的中级军官,如四期的叶镛、陆更夫、赵希杰、邱维达等,当时任教导团连长、营长,而且都是共产党员,武汉分校军事教官李云鹏,在起义时任教导团团长。另外,第 4 军警卫团一部参加了起义,黄埔军校五期肄业的陶铸任参谋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蔡申熙起义时负责总指挥部与警卫团的联络工作,后参加警卫团指挥作战。

由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按地区将工人编为 7 个联队参加起义,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刘楚杰任第 1 联队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徐向前任第 6 联队长。徐向前这位从山西黄土高坡上来的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在校时他很不起眼。蒋介石召见学生个别谈话时,也没有引

起蒋的特别重视。黄埔军校毕业后,1926年11月,他乘战乱之机,脱离国民革命军第2军回到山西五台,在家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去了北京。他面对军阀混战,无安身报效祖国的地方,于是又决定南下找革命队伍。徐向前先到上海,再乘船抵达武汉,后进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当了少校队长。1927年3月,经樊炳星、杨得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变,然后被派到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当参谋。7月张发奎在九江迫使共产党离开部队,徐向前从九江前往上海,在街上邂逅相遇武汉分校的李楚白。李也是中共党员,经李与党组织联系,“交通”上旅馆门前接头,徐向前才急忙赶来广州,担任工人赤卫队的联队长。他带兵打仗,自有一套办法,但关起门训练这批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赤卫队却碰到许多困难。当时既没有枪,也没有手榴弹,更没有练兵场,只能“纸上谈兵”。徐向前只好按照黄埔军校所学《兵器学》讲解怎么打枪、怎么扔手榴弹、怎么利用地形等,工人们倒也听得津津有味。然而就是这位当年“纸上谈兵”的队长,20年后,成了统兵百万的共和国元帅,蒋介石在这位不起眼的学生面前,也弄得丢了江山。常言道:“人真是不可貌相。”

在起义前夕,曾任4军教导团2营营长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共产党员吴展调到黄埔军校任特务营营长,教导团的连指导员、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王侃予,调校长办公室工作,他俩人也率特务营参加了广州起义。

另外,起义军组织秘密兵工厂,赶制手榴弹和标枪,在广州小北直街成立秘密转运站,门前挂着“大安酒米店”的招牌。12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接到关于共产党准备在广州暴动的密报,便急忙打电报给广州的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要他解除教导团的武装。几天之前,叶剑英为避免张发奎怀疑,主动辞去了教导团团长的职务,由杨澍松接任。后来杨被调到黄埔军校,张发

奎派反动爪牙朱勉芳来教导团充任参谋长并代理团长。但由于教导团各级骨干大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因而朱勉芳只是个“光杆司令”，而实权仍操在叶剑英手中。广州起义总共有正规部队及工人赤卫队 7000 多人，加入起义的如果连群众也计算在内已超过两万多人。

广州革命的气势震动了张发奎，12 月 10 他宣布戒严。就在这一天晚上，总指挥部领导人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周文雍、杨殷等在广州市潭新街 6 号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在会上当机立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 12 月 11 日凌晨，口令为“暴动”。散会后，教导团向全团的共产党员传达了起义命令。1 营 1 连连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共产党员叶镛负责逮捕了张发奎派来的代理团长朱勉芳。朱被一位战士用刀结束了他的性命，同时各营先后共逮捕了 15 名反动军官。凌晨 3 时 30 分，教导团官兵紧急集合，每人佩上早已准备好的红布领带，全副武装，集中在院子里的广场上，由叶剑英向大家讲话：

“同志们，我们教导团已经被缴了几次枪了！我们对革命忠心耿耿，所以敌人也绝对容不了我们，现在他们又要缴我们的枪了！”

叶剑英明确指出：“道路有两条，一条就是束手待擒，缴了枪，各自回家；一条就是拿起武器，跟他们干。国民党在广州没有什么兵，可是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赤卫队，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你们说，走哪一条道路好？”

广场官兵齐声吼道：“干！干！坚决干到底！我们坚决不缴枪！”

叶剑英最后说：“要是大家同意干，我们现在就来开个全体大会，请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我们。”接着，全体官兵开到大葵棚内集中举行誓师大会，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就坐于主席

台。会上广州起义军事总指挥叶挺布置了战斗任务。起义军事副总指挥叶剑英宣布了命令：任命李云鹏为工农红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分别为第1营、2营、3营营长。

随着3声炮响，夜空升起3颗红色信号弹。行动开始了，广州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由叶挺率教导团第1营部分连队和第3营炮兵连直奔沙河，袭击张发奎、黄琪翔驻广州的主力部队。教导团另外两路起义军，一路向南，攻打长堤一带的敌军；一路向北，攻占观音山（今越秀山），控制城北的制高点。第4军警卫团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也发动了起义，攻占了第4军军部及军械处，取得了胜利。黄埔军校特务营营长吴展、炮兵2团3营等部队也陆续参加了战斗。

工人赤卫队组成敢死队早就埋伏在第一公园附近，起义的枪声一响，周文雍、聂荣臻、杨殷、徐向前等就分头率领赤卫队员与教导团并肩战斗，对伪公安局实施了包围。在攻打伪公安局等据点时，敌保安总队长以装甲车横放在大门口，阻止起义军前进。几名敢死队员用炸药包冲向敌人的装甲车，一声巨响，装甲车成了名副其实的“棺材车”，扫除了障碍，工人赤卫队与教导团战士汇合成强大的武装力量，直捣敌阵。起义战士用人蹬人的办法，爬上公安局围墙，抛掷手榴弹。经过一场激战，起义队伍便潮涌般冲倒了大铁栅，进入公安局。周文雍决定将这里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于是他找了一块大红布，用毛笔写上“广州苏维埃政府”七个大字，然后挂在大门口。战斗中，敌保安总队总队长被打死，伪公安局局长朱晖日化妆逃脱。

起义军占领公安局后，立即打开监狱的大门，释放了一切“政治犯”，其中在“四·一五”“四·一八”反革命政变中所关押的黄埔军校100余名师生，立即参加起义队伍的行列，积极投入战斗。此外，当时在黄埔军校的崔庸健等几位朝鲜同志，以及黄埔

军校四期肄业的越南同志洪水也参加了广州起义。崔庸健在黄埔军校七期当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38年初,在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抗日联军第2路军副总指挥、共产党员赵尚志部队中他化名崔石泉任参谋长,共同坚持抗日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追随朝鲜劳动党领袖金日成回到朝鲜,曾任朝鲜人民军领导人。

洪水是越南人,原名武元博,学名阮山,早年留学法国,经胡志明推荐进入黄埔军校四期学习。他是越南劳动党最早就已入党的党员。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洪水转移到泰国从事越侨工作,1929年返回中国,任工农红军34师政治部主任,参加过长征,在陈赓的中央军委干部团任教员。1945年他回越南,任越南5战区司令员。1950年洪水第3次来到中国,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1955年9月,被毛泽东授予少将军衔,是获得中国将军军衔的惟一一位外国人。1956年洪水患癌症思念祖国,返回越南,后不久在河内病逝。

参加广州起义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还有一期的黄锦辉、赵自选;四期的何昆、倪志亮、季步高;六期的郭天民、程子华、张赤男、段玉林;高教班的黄公略等。这些黄埔军校学生后来都成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其中黄锦辉是广州起义时的广州市委军委书记。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于1928年1月组织北江暴动,途经清远县时他被反动派民团逮捕杀害。赵自选是广东省农民自卫军军事总教官,广州起义后任苏维埃政府代理土地委员,中共广东省委驻东江军事特派员;1928年5月率红4师攻打广东海丰县城时,不幸胸部中弹而壮烈牺牲。何昆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派到苏北领导筹建红14军工作,并任如(皋)泰(兴)地区红军游击队2支队支队长,1930年4月在苏北任红14军军长,4月16日,在如皋老虎庄指挥战斗时中弹牺牲。倪志亮是在广州起义

时从监狱中解放出来的,他是半年前“清共”时被关入监狱的。倪志亮总算命大,出狱后参加广州起义,后又转战南北,参加长征。抗日时任八路军 129 师参谋长,建国后当过驻朝鲜大使,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1965 年病逝。

季步高在黄埔军校加入共产党,快毕业时被调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当工人纠察队训育长。在广州起义时,他协助张太雷组织工人赤卫队,并率领赤卫队攻打广州市公安局。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任军事委员会军械处处长。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转入地下斗争,1928 年 1 月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重建广州中共组织,同年 7 月到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汇报工作,遭香港警方逮捕,引渡回广州,次年被枪杀。郭天民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转任海陆丰红 4 师连长,在东江革命根据地打游击,参加长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70 年在广州病逝。

程子华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原名程世杰,山西解县人。入黄埔前他就是中共党员,随 2 方面军教导团南下参加广州起义,兵败后赴河南从事兵运工作。他领导过著名的“大冶兵暴”,只身前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吴焕先、徐海东一起率红 25 军长征到陕北。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是 4 野 13 兵团司令员。建国后他当过商业部长、民政部长,受聂荣臻、徐向前委托筹建黄埔军校同学会,任副会长。程子华对黄埔同学会的工作积极而热情,个人经历也极富传奇色彩,暂不细表。

言归正传。且说起义军占领了广九、黄沙、广三车站后,又接着攻打广州市各党政机关,张发奎、陈公博抱头鼠窜,逃离市区。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战斗,银行、电话局、省政府、警察署相继被攻占。广州城宣告解放。

1927年12月11日,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广州起义领导人张太雷、叶挺、周文雍、杨殷、恽代英、陈郁等陆续来到总指挥部,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发布了《告全国工农兵群众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宣言》及各项政纲,在《红旗日报》社印25万份于早8时散发全市。

广州起义遭到了帝国主义的干涉。12日张发奎急忙抽调李福林的第15师和薛岳的新编第2师在英炮舰支援下,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广州市区,并以一部分兵力在东面截断起义军向东转移的道路。由于强敌压境,起义军虽浴血奋战,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被迫于13日撤离广州。起义当天下午2时,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州工农兵民主政府代主席、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和指挥者张太雷,不幸遭敌袭击,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他曾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赴桂林会见孙中山,促成了黄埔军校的建立,后又陪同蒋介石赴苏联考察军事,取得了苏联的援助,运来枪械武装了黄埔军校学生。张太雷虽未在黄埔军校任过职,但他曾任鲍罗廷的翻译,经常到黄埔军校去与周恩来等见面,他的牺牲,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损失。

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余部转战到海陆丰,与东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继续坚持新的战斗。另一部分起义军绕出韶关,进入湘南,与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会合,后来经过艰苦转战,上了井冈山。

反动派占领广州后,开始了野蛮的大屠杀,3天内残杀的共产党员、起义者和革命群众竟达5700多人。1954年广州人民修建烈士陵园时,从地下挖出500多副套在烈士尸骨上的锈烂的镣铐。

广州起义时的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在失败后潜伏下来做秘密工运工作。他和他的战友、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

军在广州建立党的地下联络机关,对外假充为夫妻。后被叛徒告密,不幸被捕。敌人于1928年2月8日将周文雍、陈铁军、曾国钧3人从监狱中拉出来,押上3辆人力车,到市东效红花岗刑场(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执行死刑。就义前,周文雍与陈铁军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陈铁军向围观的群众说:“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生命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做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同志们!永别了,望你们勇敢地战斗,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共同宣布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周文雍牺牲时年仅23岁。周文雍临刑前在牢里的墙壁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广州起义是失败了,但是广州起义也弘扬和发展了黄埔军校早期的光荣传统。

1928年初,广州起义之余部教导团、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和部分工人赤卫队来到花县进行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师。全师辖3个团,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袁国平),徐向前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王侃如,卫生处处长贺诚。除贺诚外,以上4师负责人均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在花县整编后,即1928年1月23日,农历正月初一,红4师正式进入海丰县城。彭湃代表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热烈欢迎了红4师的到来。彭湃说:

“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怕失败。失败了再干,跌倒了再爬起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彻底胜利的!”

听了这话,官兵报以一片欢呼声和掌声。

话说1927年秋至1929年底这段岁月,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中共“六大”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与推动下,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达200多次。各地武装起义保留下来的军事力量,在毛泽东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一般都转入偏僻落后的农村,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并逐步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相结合,从而创建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就是这样以超乎寻常的革命胆略和坚韧的毅力,在革命危急关头,在反革命气焰嚣张的处境中,不低头,不气馁,英勇顽强地斗争着。

在这些武装暴动中,黄埔军校师生曾积极参加创建各地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蒋介石从“中山舰事件”后,就对黄埔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人加以排挤打击。1927年“四·一八”惨案中,蒋介石公开撕下“革命”的假面具,屠杀黄埔师生中的共产党员。俗话说:“官逼民反”。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和这位“校长”争生存权,因为“校长”不让学生活,所以学生也只得“逼上梁山”矣!

从南海之滨到松花江畔,从江南水乡到黄土高原,他们高举红旗,重振雄风,真是百川汇流,星火燎原,短短的3年时间,相继爆发3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方式不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经过艰难曲折地探索,却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把武装斗争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黄埔军校师生利用他们所学专长在武装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要提提海陆丰起义。早在1927年5月1日,9月7日和10月30日,广东海丰、陆丰等地农民自卫军在共产党人彭湃

领导下,先后3次举行武装起义。第3次起义占领了海丰、陆丰县城及附近地区,开展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委员的誓词是:“我们决心要为工农兵的利益而奋斗。不怕死,不贪钱,不偏私……如有偷懒退缩,愿受代表大会之枪毙。”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余部1200余官兵,在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国民革命军11军24师师长董朗和党代表颜昌颐的率领下到达海陆丰地区的中峒,与当地革命力量会合,改编为红军第2师,也参加了第3次起义。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余部,辗转来到海陆丰,于1928年1月改编成红4师。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即袁国平)、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王侃如均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徐向前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叶镛黄埔四期毕业,与笔者先父同在黄埔上学,1928年6月因患疟疾在秘密地点治疗时被敌人搜出而遭杀害。他是四川乐至人,曾在武汉分校任女生大队长。袁裕,即袁国平,也是笔者先父的黄埔同期同学,还是湖南同乡。抗战时他任新4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在泾县突围时不幸牺牲,终年35岁。

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武装于1928年底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下,转移到大南山地区,在那里坚持革命斗争达数年之久。

海南岛起义由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王文明、冯平、冯白驹、符节(符学宗)等人领导,成立琼崖工农讨逆军,后来改编为琼崖纵队,坚持武装斗争,20年红旗始终不倒。讨逆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共产党员符节,就是海南文昌东郊人。因他地理环境熟悉,依靠当地群众掩护,最困难时上了五指山。在山上,他们以野菜、山果充饥,没有吃过大米和盐,穿的是“百叶衣”。如果大雨熄灭了赖以炊事用的火种,那么就想办法“钻石

取火”，近乎过着原始人的生活。冯白驹乐观诙谐地说：“敌人把我们关进了炼丹炉，我们就像孙大圣一样炼就火眼金睛，钢筋铁骨，待日后冲破炼丹炉，我们的神通就更大了。”

琼崖工农红军第3师东路总指挥徐成章也担任过黄埔军校特别官佐，他当过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南昌起义军抵广东潮汕时，他曾率财政部缉私工商保卫团参加起义，失败后来到琼崖。他是琼山人，1928年2月，率部在万宁县与国民党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6岁。红3师中路总指挥严凤仪，当过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副队长，范汉杰、胡宗南、冷欣、何绍周、蔡炳炎、宣铁吾、王敬久这些国民党的将军都是他的学生。1931年春，他任红11军参谋长时，在广州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不久英勇就义，时年35岁。

在湘鄂西地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黄鳌、第三期毕业的肖仁鹄、第四期毕业的段德昌、方之中，第六期毕业的段玉林等参与并领导了鄂中、鄂西起义。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的周逸群，毕业后派往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任党代表，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又跟随贺龙回到湖南桑植创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组建红4军。后任红2军团政委，在沔阳、监利、江陵、公安、汉川、天门、石首、鹤峰、华容一带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当时一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

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
有人想拿我，除非是神仙；
刀口对刀口，枪尖对枪尖，
有你就无我，你死我上天。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连几岁的孩子都知道。周恩来生前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洪湖水，浪打浪》就是歌颂英雄儿女

在洪湖一带打游击的事。任弼时、卢冬生、贺锦斋先后也在湘鄂边领导过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夏曦在湘鄂西边区搞肃反扩大化时，段德昌等遭到迫害，那是后话，暂且不表。

再有鄂豫皖边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潘忠汝，领导过黄麻起义，任工农革命军鄂东总指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吴光浩在木兰山、光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 11 军军长。1929 年 5 月，鄂东特委派吴光浩前往商南组织起义，途经罗田县滕家堡时，遭到反动武装突然袭击，吴光浩不幸中弹牺牲，时年 24 岁。他与共和国大将王树声曾是搭档，吴光浩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 2 路司令时，王树声是副司令。

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肖方、第六期毕业的周维炯、漆德玮等参加领导了商南起义。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刘志丹、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唐澍、王泰吉、阎揆要等参加了清涧、渭华起义，组建了红 26 军、红 27 军，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和宋任穷于 1936 年 2 月率红 28 军随毛泽东渡黄河东征，4 月 14 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指挥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为纪念刘志丹，党中央在他牺牲后不久，将他的原籍陕西保安县改为志丹县。1943 年 5 月，刘志丹遗骨从瓦窑堡迁入志丹县烈士陵园，毛泽东为刘志丹陵园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阎揆要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当过彭德怀一野参谋长，1955 年授予中将军衔。

在鄂豫皖边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许继慎和他的同窗好友徐向前创建了红 1 军，许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两人配合十分密切。后来，红 1 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边区也是战略地区之一。

黄公略、贺国中和黄统一他们都是黄埔军校高教班的毕业

生。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的邓萍跟随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湖南平江武装起义，并成立了红5军。当时邓萍任参谋长，贺国中就任7团党代表，而黄公略则任红5军副军长。黄是彭德怀最得力的助手，在井冈山时有毛泽东三骁将之一的称号。三骁将中的另两位也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即林彪和伍中豪。

另外，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雷经天，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冯达飞，他们在张云逸、邓小平领导下参加广西百色起义，建立红7军，创立右江革命根据地。雷经天任右江特委书记，他是厦门大学毕业生，文武双全，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子弹从不光顾这条硬汉子。解放后当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1959年8月病逝，享年55岁，英年而逝，令人实为叹息！冯达飞是在黄埔军校加入共产党的，1925年被派往莫斯科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后又转入德国炮科研究院将校学习组深造，返国后在张云逸的教导总队当教员。冯在百色起义后任红8军代军长，抗大学生大队长，新4军2支队副司令员。1942年2月在“皖南事变”中，他负伤被俘。昔日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的军事教官顾祝同，时任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对这位才学兼优的高材生他并未同情，亲自在处决名单上签字。同年6月冯达飞被杀害，时年43岁。

在东北，有黄埔军校教官杨林、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的赵尚志、武汉分校第六期毕业的赵一曼等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他们的英雄事迹已编入教科书，知者众多，从略不述。正是：碧血丹心放红花，血迹未干映彩霞，夺得政权声势众，中原革命走龙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龙潭大捷 陈诚有功反被贬 隔岸观火 鄂悌效忠受青睐

话说蒋介石下野后，于1927年8月14日率卫队及亲信200余人离开南京抵达上海，并发表了“辞职宣言”，当日返回老家奉化县溪口镇。随同蒋介石住在溪口的还有邵力子、陈果夫、张群、刘文岛一批文武官员。蒋介石心领神会，他若恋战不下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宁、汉双方合不合作，他最多只能有半个国民党领袖好当，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还轮不到他蒋某头上，趁此四面楚歌声中，悄然隐退，实乃上上之策。他要在此关键时刻，“急流勇退”，让李宗仁、汪精卫、李济深、唐生智、张发奎这些新军阀互相拆台，互相残杀，他坐山观虎斗，到了一定火候，他才会出山收拾“残局”，这叫“隔岸观火”，此乃“三十六”计中最毒辣之一计。蒋介石住在溪口的雪窦寺，寻访了该寺住持朗清和尚。他们谈了些什么，暂且不表。

且说孙传芳见蒋介石下野，宁汉闹分裂之时，趁机率5个师、3个混成旅，约6万余人，于1927年8月25日利用夜雾的掩护，在江苏南京附近的乌龙山、笆斗山、燕子矶等处偷渡长江。孙传芳乃北伐的劲敌，蒋介石北伐时，集中主力北上攻打吴佩孚，故未惊动孙，后北伐军连克两湖，威胁孙的地盘，他才急起迎战。孙传芳何许人也？此话说来话长。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县人，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毕业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

兵科，旋以直隶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1908年毕业。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返国后任北洋陆军近畿第2镇步兵教官。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他历任营、团、旅长，民国十年（1921年）8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兼第2师师长，因王占元在两湖战事失利，遂转附吴佩孚，次年5月通电拥护黎元洪复任总统，1923年3月任福建军务督理，次年9月与直系齐燮元部夹击浙江都督卢永祥，占据浙江，旋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办。同年10月，孙传芳与奉军军阀张宗昌大战，在安徽固镇以南战役中重创张部的白俄雇佣军，并俘获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山东帮办军务施从滨，将施处死。后来，孙传芳在天津做寓公时，被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刺死。这是后话。

施剑翘为父报仇一事，许多文人墨客编撰成小说传奇，搬上银幕舞台，着实轰动一时。孙传芳大败奉军后，在南京成立了浙、闽、苏、皖、赣5省联军，自封为总司令。趁宁汉分裂之机孙传芳发动反攻，直逼南京，并亲自过长江指挥，后将渡船全都撤回北岸，以示全军有进无退、背水一战的决心。孙传芳这时听了军师蒋百里的密报，言明唐生智也东征讨蒋，两下夹击，必可奏效。对此，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急忙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双方在龙潭展开了激战。白崇禧电令在沪杭线东段的蒋介石嫡系第1军卫立煌师就近向龙潭反攻，接着又电令在沪杭线上的第1军21师星夜驰援，还令海军司令杨树庄派舰队在长江炮击敌军，阻止敌军继续渡过长江。

陈诚奉何应钦之命协同李宗仁所属第7军夺取栖霞山。孙传芳破釜沉舟，官兵过江后知道没有退路，因而战斗得十分顽强。真是无巧不成书，陈诚这时正患胃病，全身无力，茶饭不进，又不好意思向军长告假，以免落个临阵脱逃的骂名，只得坐着轿子上前线督战。8月26日孙部进犯龙潭，随后龙潭东站和栖霞

山、乌龙山一带要地均为敌所占。陈诚在夺取栖霞山的战斗中，双方拉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官兵伤亡惨重。陈诚刚接替严重任师长，在全师尚未树立威信，虽然黄埔学生在全师排、连、营、团级军官中占一定比例，但新官上任还得在战场上见真功夫。陈诚见 62 团团团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李树森作战不力，当即将其撤职。李树森与酆悌都是湖南湘阴人，两人见面，大骂陈诚傲慢，那湘阴方言，当然浙江青田的陈诚是一句也听不懂的。为了扭转战局，陈诚当机立断，调 62 团刚刚伤愈的营长张忠颀升任之。张忠颀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他在黄埔时编在第 3 队，李树森编在第 1 队，两人一同分到第 1 军，关系十分密切。张忠颀升任 62 团团团长后，勇猛机智。8 月 30 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亲临前线督战。古语道：“兵随将领草随风。”陈诚的 21 师、顾祝同的 3 师以及王俊的 1 师等援军陆续抵达龙潭附近。第 7 军的 1 师、3 师和第 19 军的 1 师、2 师在夏威和胡宗铎的指挥下，自栖霞山向东进攻，直指龙潭镇。孙传芳的 6 万余兵力在悍将郑俊彦、马玉仁、刘士林的率领下，依据龙潭以西的黄龙山，以南的青龙山、虎头山，以东西走向的大石山、雷台山等险隘，顽强抵抗。陈诚率 21 师 62 团一马当先，直插敌阵。陈诚坐在轿上，边走边指挥，八月骄阳似火，热浪袭人，轿夫轮换，汗如雨滴。孙传芳也亲自坐镇龙潭指挥。两军反复拼夺，革命军寸土必争，北军寸土死守，但见龙潭周围数十里范围内，炮火蔽天遮日，血肉横飞，陈尸狼藉；那喊杀之声，震耳欲聋，双方死伤近万人。至下午 3 时，孙传芳不支，仓惶向江岸溃退，陈诚等部遂于午后 5 时克复龙潭。8 月 31 日，龙潭战役结束，国民革命军大获全胜。孙传芳的渡江部队基本上被歼灭，其中被击毙者 1 万余人，伤残者 1 万人，俘虏 4 万人，另外缴获枪械 3 万余支。孙传芳只得与几位部将登汽艇逃命，他所搜罗的这 6 万

多看家小卒，在龙潭输了个精光，因而南京转危为安。李宗仁遂利用孙传芳的俘虏与枪械急急将桂系扩编了两个军，进一步巩固了桂系的实力。

龙潭战役获胜之后，三军庆功，南京城内万民欢呼。在庆功宴上，从庐山刚接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谭延闿、孙科举杯向李宗仁、何应钦等表示赞誉。接着李宗仁说：“此次龙潭大胜，非是人意，乃是天助。”众闻之皆愕然。李宗仁又道：“宗仁说天助成功，理由有三：一是自九江乘‘决川’舰东返，如不在兔耳矶遇敌军百舟偷渡，我便不会想到孙传芳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不会将8个团预备队调往乌龙山集结；二是白崇禧若不因事去上海，则东线无兵增援，也无人指挥；白崇禧若筹款容易，按时回南京，也必遭孙传芳暗算，战局不可收拾；三是我心血来潮，往何应钦的指挥部去，敬公（何应钦字敬之）若带兵向杭州方向撤退，后果不堪设想。此三点巧合，虽云人事，岂非天意？”

虽说李宗仁把龙潭大捷归功于天意，但在陈诚看来，这一仗打得够苦，若比起两个月前随蒋介石在徐州那一仗来，他个人付出的代价就更大。他以一师之兵力，沉着应战，顶住孙传芳的反扑，直到第1军、第7军、第14军、第17军、第26军5个军撤到江南，第10军、第33军、第37军、第40军、第44军5个军撤到安徽合肥地区，进入防御位置，他始率部从徐州撤退，南京才得到确保。这一次陈诚完成掩护10个军安全后撤，再一次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许多传记作者描述陈诚发迹靠“三炮”，这也并非虚构。想当年随蒋介石东征，棉湖之战，陈诚“一炮”打响，那是1925年3月12日的事，那天，黄埔军校总理孙中山乘鹤仙去。“二炮”打响，是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在广州谋反，陈诚的炮连正在北较场出操，偶然望见白云山头旗帜飘动，急派兵侦察，方知有变。当时他当机立断，架炮先击倒敌阵军旗，滇军大吃一

惊。历来兵家忌讳帅旗倒下，杨希闵正不知所措，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乘势整队出战，将其残部一举歼灭，这事发生在3个月后的6月13日。“三炮”打响，乃是二次东征惠州之役，陈明仁等攻城不克，急如星火。陈诚此时把炮架在距城500米的茅舍中，于拂晓时一发试射，再发而中，城上机枪阵地被轰塌，步兵乘势一拥而上，城遂攻下。战后，陈诚以军功晋升为少校炮兵营长，这就是陈诚“三炮”起家的传说。当然，他的发迹，还有一段经历：陈诚刚进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不久，有一天他访友归营，天将黎明，便读起《三民主义》，无巧不成书，这时恰好蒋介石巡视经过，见室内一青年军官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恭读，蒋介石脸上露出笑容，见书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圈圈点点的提示引注，便停步问了几个问题，陈诚对答如流，蒋介石大加赞赏，并留下深刻印象。陈诚平步青云，那是后话。且说此刻在宴席上陈诚滴酒不沾，也没有把李宗仁“战龙潭感天意”的事当作一回事。宴毕归来不久，21师奉调苏州整训，此时陈诚的胃病反复发作，他带病坚持练兵，官兵佩服得五体投地。再加上他治军“三公开”，即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因此内部官兵团结，纪律严明。许多黄埔师生在他的栽培下得到升迁重用：如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黄埔军校教官）、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黄埔一期）、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霍揆彰（黄埔一期）、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黄埔一期）等，都是他的战将。俗云：人言可畏。有人故意将陈诚坐轿上前线的事告诉何应钦。何早就不满意陈诚，但找不到借口，此事正好成为何应钦向陈诚发难的导火线，于是他责怪陈诚作战不力，坐轿打仗，天下奇闻。陈诚感到委屈，自己抱病上阵，不但无功，反而受过。陈诚心想：你何应钦排挤了蒋介石之后，又拿我开刀，真是人心隔肚皮。他不愿在不清明的政治中混日子，想到邓演达的出国、严重的辞官归隐，他最

信任崇拜的长官落得如此下场,未免兔死狐悲,于是愤然辞掉21师师长职务,去苏州留园闲居。陈诚将结算全部所得500余元带在身上,飘然前往上海小住。其间他曾到吴淞劳动大学拜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为师,与李过从甚密。在认真研究蒲鲁东学说之后,他打算从此以治学为本,不再过问官场之事。

陈诚这时住上海闸北青云路信达利钱庄内,与世无争,日子倒也过得悠闲自在。10月,何应钦、白崇禧为了拉拢严重,就特意任命严重为“特别军委”军政厅长,请陈诚出任副厅长兼驻沪办事处主任。严重调往湖北任职后,陈诚就代理军政厅厅长。原来何应钦打算请陈诚到第3师任师长,以便整顿该师纪律松弛等弊端,陈诚无心带兵,坚辞不就职。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执兵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吸取被逼下野的教训,认识到没有军事实力为后盾,在关键时刻没有取得掌握黄埔系的第1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支持,几乎功亏一篑。因此,蒋的出山,给陈诚的官运亨通创造了机遇。蒋由于在下野时没有得到何应钦的挽留,怀恨在心,所以他一上台,没有与何应钦打招呼,就驰往徐州,撤销第1路军总指挥部,解除何应钦的兵权,后将何调总司令部任参谋长,由蒋亲自掌握第1集团军。陈诚因系黄埔教官,东征、北伐有功,加之蒋对陈印象良好,遂任命陈诚为总司令部警卫司令,辖3个警卫团:其中有桂永清的特务团、关麟征的伤兵团、冯圣法的补充团,另辖两个宪兵团,并由陈兼炮兵指挥官,指挥姚永安、杨德良的两个炮兵团。这个警卫司令实际上比一个军的实力还要强。蒋介石有意贬何应钦,擢升陈诚,为的是谨防大权旁落。以后的二次北伐、中原大战和5次“剿共”,陈诚确实出力不小。这就在军中逐步形成两个派系的斗争:何应钦一派,陈诚一派,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直延续到国民党在大陆垮台。

蒋介石重用陈诚的另一个原因是蒋宋为陈诚作媒。蒋曾受谭延闿之托为其三小姐谭祥择婿，谭祥曾与宋美龄在美国同学，又是蒋介石的干女儿，这桩婚事奠定了陈诚平步青云的基础。陈诚后来任 11 师师长，18 军军长。十一为“土”，十八为“木”，故后人称陈诚为“土木”系起家。黄埔军校毕业学生凡在 11 师、18 军任过职的，几乎都得到陈诚的提拔与重用，如黄维（黄埔一期毕业）、宋瑞珂（黄埔三期毕业）等皆是。

且说蒋介石回到溪口后，故乡一草一木，都使他欣慰留恋。溪口乃一山乡小镇，镇口有一武岭门，形如城门。据说蒋家先世由武岭迁来时特筑建此门以作纪念。蒋宅有楼房 10 余间，在这小镇之中，堪称一流住宅。宅院名曰“丰镐房”，丰镐之名，取自西周的两个帝王的都城。周文王迁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各取这两个都城的第 1 个字相合为“丰镐”而命之。蒋介石的元配夫人毛福梅住在正面三间朝南的楼房东头的一间楼上。在楼下三间厅堂的条案上，摆着几尊白玉观音佛像，像前摆着香炉、木鱼、青灯、祭品，此为毛氏念经的佛堂。蒋介石到了家中，当晚便宿在丰镐房内。翌日，蒋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礼帽，和兄长蒋锡候一起，到东岙去母亲王太夫人墓前祭扫。这个墓址是风水先生肖萱选定的，墓为壬丙向。如若站在墓前远眺，但见对面的山势由远而近，一层一层的紧扣着，宛如一条游龙奔腾而来，到墓前则拱成一股小山脉，墓穴就点在龙脉上。那剡江水像一条碧色飘带由南流来绕墓向东南流去，使墓成为山环水抱之势。肖萱选此墓地，实乃一块风水宝地。

据说蒋介石日后的发迹，就是与王太夫人墓地的龙脉有关。1923 年冬，蒋介石从苏联考察回来，急急忙忙返回溪口。在为其母做 60 冥寿时，又在离墓址约半里许的山墩间，筑新式洋房三间，称为“慈庵”，并亲笔题写了“慈阍”两个大字。说来也是巧

合,蒋介石从1921年其母王采玉经肖萱点葬后,官场上可谓平步青云,到1927年,便荣升为北伐军总司令,统率千军万马,各路军阀纷纷俯首称臣。至此中华民国的党政军大权,他全握掌中。此外,据传蒋介石在广州、长沙两次遇险逢凶而化吉之事,也是与其母葬地风水的灵验有关。因此,蒋对肖萱甚是感激。莫看此人浪迹过江湖,但他为老同盟会员。肖萱湖北人氏,字纫秋,其人佻佛,染有鸦片癖,精通堪舆学。北伐打下湖北,蒋遂任命肖萱为湖北省政府秘书长。后因肖萱烟瘾大,不胜任繁重的秘书长之职,旋将他调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这是个只拿俸禄不干事的闲差。同时蒋还不时地给肖萱以周济,肖萱乐得对蒋感恩戴德,于是凡遇风水之事,肖萱必尽力效劳。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蒋介石偕兄此次前来扫墓之后,便循着石板砌成的小路直往雪窦寺。这雪窦寺住持朗清和尚精于星相,预测凶吉多奇中,因而远近驰名。不过,这住持僧从不多说话,只在高兴时,才说几句,也是稍露即止,让人好费猜测。当下,朗清将蒋让到方丈之内,众卫士在门外,只带蒋锡候兄和两名侍从进了室。大家坐定,小和尚献茶,法师朗清遂合掌道:“无量佛,总司令出师北伐以来,所向披靡,天下指日可定了。”没等蒋开口,朗清法师又说:“吾曾云游天下,曾观历代帝王之墓穴,而令堂的陵寝,实非一般。《阴宅集要》中云:‘行龙多结于溪水之间,溪涧之水不可不察,其屈曲弯环绕聚深长悠缓为佳。令堂陵寝的明堂也非同寻常。明堂者,天子之明堂也。’经又云:‘斜巧知拙,难拷优差,有情于我,是为真穴。’而今令堂之陵寝,是一道天造地设的龙脉,主出大贵之人。”

蒋介石认真地洗耳恭听朗清法师之语,一扫连日来的阴晦之心情,脸上露出笑容。尔后又由其兄向朗清报了蒋介石的生辰八字,蒋锡候道:“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

朗清法师听了，合起双目，掐算了一番，而后睁开眼，一本正经地道：“恭喜总司令，从此逢凶化吉了。论总司令的八字，是天河水命，又运交西北，北方壬癸水。但今年运中又有火，水火不容，但无妨，交秋之后，金风一动，水压住火，灾难全消。”朗清又道：“总司令的八字，非同一般，主大贵，后福无量，老僧决无虚言。”

蒋介石听了朗清法师一席话，更是高兴非常，满脸愁云，一扫而光。蒋介石当夜住在雪窦寺内，听那暮鼓晨钟之声，准备明日再访太虚法师，并请他讲《心经》。太虚法师姓吕名淦森，字太虚，浙江桐乡人，曾研佛经，云游四海。1924年于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上，太虚发起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两年后，他与章炳麟发起组织全亚佛化教育社，1927年4月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5月，云游到奉化，即在雪窦寺讲经。太虚为人精明，极善察颜观色，巧于辞令，精通星象之术。当蒋介石向其问卜前程之后，太虚即从经架上取出一本书，翻开来查看，又端出一个圆木盘，盘中置许多小纸卷，叫蒋抽出一个交给他。蒋如法抽出一个纸卷，太虚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飞龙返渊，腾骧在望。”太虚掐算了一番，双手合十行了个稽首，郑重地说道：“总司令灾难已过，这卦上写得很明了，飞龙者，帝王也；腾骧表示飞跃，奔驰，直上青云。”蒋介石听罢，连声称谢，嘱卫士下山取来行李与谢仪，当晚住下。在睡之前，他提笔给上海的宋美龄写了一封书信，文云：

惟余平生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人野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举世所弃之

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蒋介石这时正向宋美龄求婚，毛福梅、姚怡诚、陈洁如已成过去，如今他一心想着宋美龄，以求日后政治上飞黄腾达。蒋给宋的信写毕，当夜就寝雪窦寺不提。

却说自蒋介石下野之后，邓文仪、鄧悌、胡宗南、肖赞育、康泽、俞济时、桂永清、贺衷寒、石祖德等，一批曾为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感到如丧考妣，纷纷写信或亲自跑到溪口去找校长，请求总司令出山和面援机宜。黄埔军校学生深深感到，蒋介石不在权位上，他们自己的日子就不好过，据说朱绍良在上海的寓宅一时成了黄埔嫡系学生聚集的场所，朱绍良也热心为他们服务。李济深则在广州削减黄埔同学会的经费，甚至使他们无法活动，因而康泽等叫苦不迭。蒋介石则认为他这次下野，对黄埔学生有益无害。黄埔系一直在他的庇护下成长，谁都知道第1军刘峙、顾祝同骄横十足，瞧不起杂牌军，这就遭桂系第7军、湘系第8军等的嫉妒。北伐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当数李宗仁、李济深、张发奎、程潜的地方军队。蒋介石这次下野，让他的“天子门生”们饱尝被外人的奚落与冷遇，使他们的头脑能够清醒一些：认识到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全力拥戴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认识到他们黄埔系的荣辱系于蒋总司令一身，今后必须服服贴贴听从校长的指挥。

9月20日，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的名义，发表了《告黄埔同学书》，言辞恳切，文中曰：“现在我们已不能再讳言失败了。我们更不能把失败的责任专归于他人而宽恕自己。我们同学们应当一致反省，何以一往无前的胜利中会造成不可挽救的失败呢？第一个重大的原因，当然是全体同学意志不能统一，精神不能团结，不顾团体的重要，只逞私人的意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这是我们最不幸的一点。……清党难，清心更难。”接着，他

告诫黄埔同学不要只想当官,还要甘心作基层的工作,不要依赖校长,还要靠自己去闯。

《告黄埔同学书》当然并非出自蒋介石的手笔,自然有一批幕僚文胆为他代劳。但书中所云,无不击中黄埔嫡系的要害,使他们在逆境中学会如何做人。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屠杀共产党人以来,短短的几个月的光景,蒋介石把事情弄得很糟。国民党反共之后,取消了军队的政治部,战斗力大为丧失,北伐中收罗的军阀旧部太多,军纪败坏,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新军阀,唐生智、程潜的湘军与武汉汪精卫派也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元老派的胡汉民、吴稚晖、邹鲁、张继等西山会议派对蒋也不满。当时黄埔嫡系学生就像一群没有长成大人的孩子,纵使他们串联在一起也扭转不了大局。总之一句话,鄧梯、胡宗南、邓文仪这批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还乳臭未干,成不了大气候。

鄧梯何许人也?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这批人后来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红人,是国民党军队中进行所谓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干部。鄧梯,1903年生于湖南湘阴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他早年丧父,小学毕业后在县城一家绸店当学徒,经他姑父介绍到广州某单位任录事;后来考入黄埔军校学习,与贺衷寒发起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专门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作对,受到蒋介石的青睐。鄧梯毕业后曾任第1军1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并和贺衷寒、曾扩情、邓文仪、袁守谦这批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派鄧梯接替曾扩情任黄埔同学会秘书,大肆捕杀黄埔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和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同学。有人形容湖南湘阴出了两个刽子手,一是绞杀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一是充当蒋介石打手的鄧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蒋介石一方面将广州黄埔军校改成预科,一方面在南京另行筹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他自己任校长,政治部

主任是周佛海，副主任是鄞梯。当时鄞梯的政治、组织宣传才能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尤其是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之后，鄞梯上串下跳，联络黄埔同学会一批忠蒋分子上书校长，力陈校长下野后同学被李济深等排挤之惨，请求早日出山。

的确，鄞梯上书所言一点不假，在蒋下野后，黄埔学生顿失倚恃，身价大跌。以广州为例，李济深不久就向黄埔同学会打招呼，请考虑裁减同学会在广东的会员和减少经费问题。接着就下令将同学会经费减至月拨 500 元，只能够几人的开支。即使蒋介石在离粤时留下的条子，嘱广东省国民党党部按月补助的 1000 元宣传费也被取消了。这样，黄埔同学会的工作几乎无法运行。更有甚者，已毕业的学生分配到部队后又被挤了出来，一时流落到广州一带的各期毕业生达 200 多人。他们向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求助，却遭白眼，被斥曰咎由自取。蒋见鄞梯上书后，内心甚为激动，心想自古“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诚”，只要有朝一日得势，鄞梯这批学生定当重用。一批在军队中已升任团长的黄埔军校学生如胡宗南、郑洞国、关麟征、孙元良、霍揆彰、李玉堂、丁炳权、黄杰、王仲廉、李延年、甘丽初、蒋伏生、黄维、范汉杰等一期毕业生，李宗仁下令要他们一律开往江北，所遗京沪一带防地均交桂系接管。当时黄埔同学会成员立即遵照蒋介石的指示，通知军中团长以上同学到朱绍良家中相聚，一致抗拒何应钦的命令。为了保密，他们不用电报电话，而是由黄埔同学会交通股股长宋希廉昼夜在沪杭、京沪两线上奔波，一个个通知到位。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仍能遥控军中一批黄埔系中级军官。蒋介石下野后，表面上不得不把所有军队和有关军事机构交给李宗仁、何应钦，但暗中他却紧紧地抓住黄埔同学会不放，以便东山再起。这期间，他下令将黄埔同学会由南京迁到杭州，以摆脱何应钦的控制。同时特请朱绍良为指导，任命曾扩情为秘书，共收容同学 1000 余人，编

成一个总队。该总队由贺衷寒任总队长，施以军事和政治训练。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了黄埔嫡系军队中的骨干。

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与新军阀桂系暂时“统一”起来，于1927年9月三方协商，成立了一个由32人组成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汪精卫本想逼蒋下野后独揽大权，结果却只当了一名委员。汪的正统地位被否定，这是李宗仁和西山会议派联合行动对付汪的结果。汪精卫十分气愤，他返回武汉，与握有军权的唐生智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南京方面下令武汉取消政治分会，服从统一，而武汉方面却置之不理，于是双方交兵。蒋介石看到火越烧越旺，自然乐在心头，但他感到“出山”还不是时候。为了说服宋美龄的母亲倪氏成全他的婚事，蒋介石于1927年9月23日由溪口来到上海，并宣称：“此次赴日与政治无关，惟在获宋氏家族对美龄女士婚事之同意。如获同意，则将在上海结婚，然后偕游海外。”9月28日，蒋介石在张群、陈群等人陪同下，由上海乘日轮“上海丸”前往日本。正是：急流勇退隔岸观火，忙里偷闲喜结良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政治联姻 蒋宋孔陈成一家 东山再起 坐收渔利揽大权

且说蒋介石一行于1927年9月29日抵达日本长崎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未来之计划。且余之友人居日者甚多,欲乘此机会重温旧好,并愿藉此与日本名流晋接。”

蒋介石访日有两个目的,一是拜见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请同意他与美龄的婚事;二是在他再次出山执政时,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

在此先讲一下宋氏三姊妹的家事,以便了解蒋介石求婚的动机。

宋美龄,广东文昌人,1898年生于上海。其父宋嘉树,字耀如,9岁被父母送给在美国波士顿开茶丝商店的舅父收养,在商店当学徒。3年学徒期满后,宋嘉树到一艘名叫考尔法克斯的货船上当服务员,改名为查理·琼斯·宋。14岁那年,琼斯船长把他交给一位卫理公会教堂牧师收养。当时美国的基督教会正在物色培养中国传教士,查理·宋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基督教徒,并进入万德毕尔特大学专读神学。1886年,查理·宋被派回中国,在上海当牧师。后来他为教会印刷《圣经》而经营起印刷生意,同时又兼做进口机械的代理商,因而成为中国上海的第一代

买办人物之一。20多年的经商,使他成为拥有60万两白银的富翁。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也是来自上海的富商倪氏家族,据称倪之父和明朝宰相徐光启有血缘关系。查理·宋于1918年5月病故,享年52岁。此时宋美龄刚从美国学成回国不到一年。

宋嘉树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是在美国读书长大的。长子宋子文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1927年已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是中国金融界的名流。大女儿宋霭龄嫁给了山西省太谷县大财东孔祥熙。孔祥熙就读于美国欧柏林大学,在美国他结识了孙中山。辛亥革命时,孔祥熙在山西组织“学生军”。二女儿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三女儿宋美龄11岁就同两位姐姐赴美国求学,毕业于威斯里大学。宋美龄在宋氏三姊妹中是才智最高的一位,风姿绰约,仪表出众,通晓6国语言,精于英国文学。

1922年,蒋介石在广州孙中山公馆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时,就曾令他神魂颠倒。同年12月初,风流倜傥的蒋介石在上海孙中山家中,参加了由宋庆龄、宋子文举办的一次社区基督教晚会,地点是莫礼哀路。那晚,宋美龄大出风头,成为晚会令人羡慕的交际花。蒋介石返回广州后,就要求孙中山把妻妹介绍给他。他告诉孙中山,他已经“休”掉那位在他15岁时由母亲包办所娶的溪口姑娘毛福梅。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说,他已经和姚怡诚断绝关系,但闭口不提他才结婚度蜜月的新欢陈洁如。蒋介石一再辩解,为的是证明他已经浪子回头,他要追随孙中山一心一意致力革命。蒋介石一再表白:“老师,我现在没有太太了,您认为可以说服宋小姐接受我吗?”孙中山坦率地说:“这不可能。”但表示愿意跟宋庆龄再商量商量。孙中山向夫人提起这件事时,宋庆龄大不以为然,她不屑地说:“她宁愿看到妹妹死去,也不愿意妹妹嫁给这么个人。”

其实,蒋介石一心一意想与宋家挂钩,已到了无所不为的地步。孙中山逝世后不久,蒋介石私下曾向宋庆龄求过婚,宋庆龄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就一口回绝了。蒋介石也知道当时的宋美龄并非自由之身,她已经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处处长刘纪文的未婚妻。据董显光说,蒋乃“军人本色,处事果断,应为即为,不稍踌躇。……及与宋女士相稔,知为理想之终身良伴,而向所求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其后五年间,蒋全力于革命事业,北伐军兴,此期间与宋女士函牍往还,仍时申前请”。1927年5月初,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西摩路宋宅再次相逢,英雄向美人“再申前请”,虽经宋霭龄一再撮合,宋子文、宋庆龄、宋母倪桂珍等人还是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于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宋大姐霭龄的安排下,双双同游镇江焦山。这次出游,大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宋老夫人无法对蒋介石产生好感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是基督徒,而且结过好几次婚。为此宋霭龄劝她母亲到日本度假,拜访长崎的朋友,并到宋耀如、倪桂珍结婚蜜月旅行过的镰仓去洗温泉澡,家人将在稍后到日本跟她会合。倪桂珍到日本后,就无法跟国内联络,鞭长莫及了。宋老夫人不知是计,乖乖地登船去了日本。

蒋介石被迫“下野”,然而却巧妙地赢得了宋美龄的芳心。就在蒋介石、宋美龄从镇江返回上海后不久,宋美龄便向朋友透露口风说,她将与蒋介石结婚。9月16日,负责全盘事宜的宋霭龄,在其丈夫孔祥熙的同意下,在家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她将蒋介石与宋美龄介绍给成群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随即宣布“蒋总司令即将与我的三妹美龄结婚”。于是大家一窝蜂似地拥到花园去,为这对“英雄美女”照相,很快全世界的报纸和杂志即刊出了这幅照片。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宋家大小姐竟是这桩婚姻的撮合人。9月17日,《纽约时报》刊出一则新

闻,宣布“蒋介石将与孙中山遗孀的妹妹宋美龄结婚”。《时报》驻上海记者密塞尔维兹在新闻中说:“一位英国裁缝正在替蒋介石赶制礼服。蒋介石在上海停留很久,直到他的新礼服做好,才启程赴日本。”

闲话少说。且说蒋介石会见倪桂珍的情景,根据上海《晨报》的报道是这样的:“蒋介石于10月3日来晤太夫人,事前蒋系先致电,得太夫人的允可。相晤时,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约圣经,盖太夫人系一极诚笃之基督教徒也。既见蒋,勉蒋为使徒保罗;蒋告太夫人,谓对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时太夫人以蒋对于联姻之手续,既一一办妥,毫无其他问题杂处其间,遂允其请,许以美龄妻之。”第二天,蒋介石给宋太夫人送去了美龄女士的订婚戒子。其实,这一段“赴日登堂拜丈母”的过程,只是蒋介石求婚的最后一道手续而已。但问题也不那么简单,此婚约是有条件的,宋太夫人向蒋介石提出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实行一夫一妻,原妻妾必须离婚;二是宋氏全家信奉基督教,女婿也必须皈依上帝。蒋介石一一答应,并持有与元配夫人毛福梅脱离婚约的证明,宋太夫人始无异议。依据部分野史的记载,宋美龄在与蒋介石谈论婚事时,也提出三个条件,为双方共守的准则:一是蒋介石必须信奉上帝,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二是宋美龄不生孩子,减少羁绊,保持身材之苗条;三是宋美龄不担任政府公职,只愿以蒋介石私人秘书的身份对外从事社交活动。蒋介石亦一一照办。但蒋介石也私下提出婚后宋美龄应与刘纪文断绝友谊之爱,宋美龄爽快地允诺。

蒋介石求婚成功后,即在日本开始了频繁的政治活动。10月13日,蒋介石一行到达东京,拜会了日本黑龙会首领、中国通——山头满。通过山头满,蒋介石与日本各界及各国使节进行了广泛地接触,还亲笔写下“亲如一家”的条幅赠给山头满。后

来山头满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蒋氏无论如何是和日本一致的。他对于共产党，不管在国内或者国外，一定要加以排斥的。当他在表示这样的决心的时候，我和他的意见是一样的。”接着，蒋介石在东京开始了“有近似强行军一般的访问节目”，先后拜谒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参谋次长南次郎，并进行密谈，出席了出渊外务次长、情报部长小村等举行的招待会。蒋介石在日本活动了44天，于11月10日，踌躇满志地返回上海。

在这一个多月里，国内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李宗仁和西山会议派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把程潜的第6军和朱培德的第3军拉到自己的一边，所以很快就打败了武汉唐生智的第8军。唐生智以休息为名下野后，于蒋介石回国的第二天就乘日本兵舰东渡日本去了。11月15日南京政府占领了武汉。汪精卫伙同陈公博拉拢张发奎、黄琪翔的第4军跑到广州，宣布“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宁、汉对立刚用武力解决，宁、粤对立局面又出现了。回到上海的蒋介石观察局势，认为妨碍他夺权的主要是南京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和桂系军事实力，所以他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当天，就电请汪精卫来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11月11日，汪精卫在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同蒋介石合作。当时汪精卫自感力不从心，因为广东是李济深的地盘，所以汪精卫、张发奎要想把李济深赶出广州，只好二人密谋待机行事。

南京政府方面怕蒋、汪联合对付他们，又传闻蒋此次赴日挟有日本帝国主义财团赐予的巨资回国，以图东山再起，便极想拉拢蒋介石。

南京、广州都频频向蒋招手，蒋介石又香起来了。11月16日，汪精卫拉着李济深到上海参加国民党2届4中全会。第二天，张发奎趁机发动政变，李济深在船上大呼上当。宁、沪两方

抓住广州政变,联合攻击汪精卫是联合共产党在广州策动武装叛乱,硬要把一顶“红帽子”给汪精卫扣上。其实,汪精卫是反共铁了心的,他决不会参与叶剑英等人的广州起义。

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会上有人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时枪声四起,死4人,伤20余人,而凶手则逃之夭夭。事后,各地发起反对“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这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会议派分子葛健时制造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并发起对西山会议派的“征讨”。11月22日的惨案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使陈果夫一手制造的。这样,西山会议派处于受审的地位,失去了一切发言权。

蒋介石在下野的时间里,武汉汪精卫派倒了,西山会议派倒了,只剩下桂系和蒋的黄埔嫡系。这时,国民革命军中的亲蒋将领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钱大钧以及黄埔一期毕业在军中有实权的“天子门生”胡宗南、霍揆彰、桂永清、邓文仪、酆悌、康泽、宋希濂、杜聿明等,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蒋出山支撑大局。蒋介石知道收拾“残局”的时候已到,但却稳坐钓鱼台,他不是忙于“出山”,而是在1927年11月26日在上海各大报刊登一则结婚启事。其中有这样一段妙文:

中正奔走革命,频年戎马驱驰,未遑家室之私。
……兹定十二月一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
婚礼费用,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欲为中正
与宋女士结婚留一纪念。

12月1日,蒋、宋的婚礼分两次举行,先举行基督教式的婚礼,后举行中国传统式的婚礼。基督教婚礼在上海塞莫耳路宋宅楼下会客厅中举行。原来是请景林堂牧师江长川主持,但江

牧师认为蒋介石不是自由再婚,予以婉拒,最后只好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而余并非牧师。下午3时婚礼开始,证婚人是余日章,介绍人是谭延闿、何香凝、王正廷、李德全,主婚人是蒋锡候夫妇、孔祥熙夫妇。婚礼按基督教仪式由媒相郭宝珠等人前导下步入礼堂,向上帝宣誓,互换结婚戒子。仪式过后,两人即乘车赴戈登路大华饭店出席中式婚礼。4时15分,乐队奏起了门德尔松的《结婚进行曲》,大华饭店跳舞厅挤满了1300多宾客,另外还有1000多人挤在外面的马路上。礼堂四周缀以鲜花,中间悬挂孙中山遗像,两旁是国旗党旗,台前陈列的花篮甚多。来宾凭请柬入场,签到时发给结婚纪念章一枚,挂在胸前,以资识别。出席证婚的有蔡元培、谭延闿、王正廷、余日章、何香凝、李德全六人。来宾有汪精卫、吴稚晖、邵力子、陈果夫、杨树庄、张定璠、褚民谊、周佩箴、陈德微、冷欣、缪斌、叶惠钧、王晓籁、沈田莘等;外宾有日本总领事矢田、正领事清水、美国总领事克银汉、比利时总领事汪和德、挪威总领事亚尔等。宾客都由陈希曾、陈立夫等殷勤招待。

蒋宋联姻,《大公报》创始人之一的胡霖有过这样的分析:“蒋介石的再婚,是一项有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藉此赢得孙逸仙夫人和宋子文的支持……。那时候,蒋介石也开始觉得有必要寻求西方的支持。娶美龄为妻之后,他就有了与西方人交涉的‘嘴巴和耳朵’。此外,他非常推崇宋子文是一个财政专家。为了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在那些情况下,娶一位新太太,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有人把蒋宋婚姻视为财势与权势的结合,宋子文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则是工商部长,而孙中山形象的重要性,则通过宋庆龄的关系,使蒋介石获得神秘的权威。但此时宋庆龄远在俄国的莫斯科忍受严冬的袭击,她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合而出访

国外。

蒋介石与宋美龄婚后新居设在上海拉都路311号。李宗仁回忆说：“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有人统计，蒋宋成婚，花费达数百万元。送礼金者，由黄浦路中央银行业务局代收，结婚前几天就开始收款，送礼者络绎不绝：张静江400元，叶逐堂、孙衡埔各200元，熊克武、章烈、周佩箴等各100元。蒋介石对这次结婚十分重视，当天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我们的今日》的文章。他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今日之日，诚足使余二人欣喜莫明，认为毕生最有价值之纪念日。”

新婚夫妇头一天在此度过，12月2日，这对新人一起去了杭州，说要到莫干山度蜜月，但蒋介石当天就从杭州返回了上海。12月3日，在蒋介石的新居召开了国民党中央2届4次全会预备会，不久，蒋介石就再次上台了。

蒋介石这年年届41岁，宋美龄年满30岁。那时蒋介石是总司令复出，全世界瞩目，被认为“世界上最年轻、最英俊的革命领袖”。英雄爱美人自古以来传为佳话。宋氏三姐妹有何魅力？其实，宋霭龄姿色平庸，宋庆龄端庄清秀，宋美龄俏丽活泼。她们并不具有西施、杨贵妃般的美姿，如果说她们有吸引力，也许是她们早接受西方教育，精通英语而已。而孙中山的威望、孔祥熙的财势、宋子文的金融界地位，才是蒋介石追求的目的。宋氏三姐妹原名为爱琳、庆琳、美琳。1904年春，宋爱琳陪父拜访97岁高龄的沈毓桂，这位老人曾任《万国公报》主笔，满腹经纶，学

富五车，见爱琳豆蔻年华，风韵正茂，便问她的名字。答曰：“爱琳”。沈捋捋胡须，微笑道：“爱琳是洋人的名字。我们中国人嘛，应该有中国式的名字。”宋耀如颇以为然，请老人另外取个名字。沈老说：“女性的名字应该文雅些。不若改‘爱’为‘霭’，改‘琳’为‘龄’，霭和蔼两字通用，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曰：‘望中庭之蔼蔼兮’；苏轼有诗曰：‘湖上萧萧疏雨过，山头霭霭暮云横’。”从此，爱琳改名霭龄。大姐名字一改，妹妹们的名字也相应改为庆龄和美龄了。据廖梦醒著《我的母亲何香凝》一书说：“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要结婚了，邀请母亲去做‘证婚人’。因为蒋介石不接受劝告，不肯放弃屠杀共产党的罪行，母亲拒绝了，没有参加蒋介石的婚礼。”但所有文献资料皆有何香凝出席证婚的说法，谁是谁非，只有由史学家去考证了。有人说蒋宋联姻是“中美联姻”。因取蒋中正之“中”字，宋美龄之“美”字，一语道破了蒋介石竭力追求宋美龄之真实意图。由于他想与美国搞好关系，因此，“中美联姻”纯粹是一桩“政治婚姻”。

话说蒋介石连蜜月也没有过，就急急忙忙返回上海，在寓所召开了国民党2届4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会上桂系的南京政府、汪精卫的广州政府、西山会议派三个方面中的中央执、监委30余人从12月3日起一直开了10天，吵吵嚷嚷，闹得不可开交。桂系指责汪精卫，而汪精卫为了保护自己，就首先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当务之急。”

李宗仁看到汪已抢先请蒋复职，他也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冯玉祥、阎锡山促蒋复职的电报也到了上海。于是在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2届4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就这样，蒋

介石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蒋介石上台后,重温广州故技,寻机驱汪排胡。正好此时广州起义,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在广州建立苏维埃政府。消息传到上海,李济深、李宗仁、吴稚晖等立即抓住这一事件,向汪精卫发起新攻势,说张发奎、黄琪翔都是共产党,他们在广州与共产党合演双簧。为了摆脱困境,表明心迹,汪精卫再次提高反共反苏的调门,声称力主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驱逐各地苏俄领事,并致电张发奎,盼其全面搜杀共产党人,禁止工农运动,以“戴罪立功”。反汪派则痛打落水狗,说汪嘱第4军杀共产党是定的“苦肉计”。在这种情形下,汪精卫有口难辩,气得直冒虚汗。蒋介石认为驱汪时机已到,便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请汪暂时离开上海。白崇禧放风说,要请青帮头子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秘密杀害汪精卫。为此,汪不得不称病躲进医院。1927年12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由李宗仁、白崇禧主谋下令缉办汪精卫、陈公博等人。17日,蒋介石赴医院好意相劝,汪精卫被迫离沪赴法亡命,这是继广州之后的第2次亡命法国。张发奎、陈公博也通电下野。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西山会议派认为无法与蒋合作,气愤地宣称不参加国民党2届4中全会。他们以出国考察为名,于1928年1月25日离开上海去欧洲等国远游去了。

1928年2月2日至7日,国民党2届4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戴季陶起草的4中全会《宣言》。《宣言》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独立运动之大敌”,历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暴乱”,并扬言要全力“围剿”。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由蒋介石一手操纵,“推举”自己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选蒋介石为中央组织部部长,3月7日又推举他为国民党中央

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5名常委之一,其余4人是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均为国民党元老,但没有掌握兵权。蒋介石施展“以退为进”的下野策略,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中,终于找到时机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坐收渔人之利,不仅把党政军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而且还赶走了汪精卫,气走了胡汉民。可以说他这一着棋真乃老谋深算,狠毒狡猾之至。

前已述及,蒋介石复出之后,头一件大事就是巩固他的最高统治地位。他要抓住军权,要重新整顿并组织国民革命军,要依靠黄埔军校学生这一强大的力量控制军队,以便驾驭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新军阀。

蒋介石听从蒋百里的“又打又拉”之计。1928年2月9日,刚开完国民党2届4中全会,蒋介石就悄然前往徐州前线,径直来到国民革命军第1路军的总指挥部。当时总指挥部设在一座天主教堂内,蒋介石走到何应钦总指挥的办公桌前,一屁股坐下,尖着嗓门问道:“你们的总指挥呢?”

何应钦手下的幕僚连声答道:“何总指挥在外打猎未归。”说完,他马上派人去请总指挥回来。蒋怒气冲冲地说道:“徐州乃前线要冲之地,何应钦身为总指挥,不坚守岗位,竟外出打猎,这是失职行为!”说罢,他站起来,面对侍从副官邓文仪说:“立即撤销何应钦第1路军总指挥的职务!”接着又补充道:“向南京发电,要王伯群、李仲公、何成浚、贺耀祖、陈调元速来徐州。”蒋言罢意犹未尽,又大声说:“电南京总司令部,撤销何应钦住宅的警卫部队。”

王伯群时为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是何应钦的大舅子,李仲公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书记,陈调元为国民政府秘书长,何成浚为军委会委员、国民革命军高级顾问,贺耀祖为京沪卫戍司令。

几位要员接到蒋介石的急电，立刻启程来到徐州。众人见蒋后，惟独不召何应钦前去。蒋板着面孔道：“知道我为何要找你们吗？”众人面面相觑，不知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蒋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向你们宣布，撤销何应钦第1路军总指挥的职务！”为何要撤他的职务呢？蒋说了一大堆理由，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因何应钦曾与白崇禧逼他下野，实属忘恩负义；二是何应钦迟迟不发拥戴蒋复职的电报，真是岂有此理；三是李宗仁、白崇禧一伙人在外面散布谣言，说蒋已经指挥不了黄埔系了，所以，蒋要来前方试试，看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系。

蒋介石知道，第1路军乃是当年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的班底。在东征、北伐后又扩充为教导师、第1军。主管部队的除王柏龄不争气被撤职外，刘峙、钱大钧、周至柔、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张治中、顾祝同这些黄埔军校当年的教官都委以师长、军长重任；范汉杰、关麟征、杜聿明、胡宗南、张镇、刘戡、郑洞国、黄杰、董钊、黄维、宋希濂、桂永清、余程万、孙元良、罗奇等这批忠蒋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大都是团长、副师长、师长。这样在军中形成一股黄埔嫡系，黄埔军校第二、三、四、五、六期学生尚在不断地充实基层军官队伍。在黄埔系的支持下，蒋介石便信心十足地指挥曾经由他这位“校长”亲自培养的这支部队了。

蒋介石又以军纪弛废为名，将第1路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自己兼任集团军总司令，下辖1纵、2纵、3纵队，分别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组为纵队总指挥。何应钦毕竟在北伐中有功，蒋介石离开徐州前，还是把何应钦找到面前道：“敬之，你我二人交情远非他人可比，你我情同手足，同舟共济呀！前一段，你受他人挑拨离间，逼我下野，我年长于你，看在先总理和英士先生的面上，中正不予计较，往后不要再受人挑拨了。”

蒋介石见何应钦面无表情，又道：“如今第1军军纪弛废，待

我把部队整顿好,仍然要你来统帅。”接着,蒋正式宣布调何应钦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以示对何留有余地。

何应钦此时又气又恼又惊又惧,再加上羞愤,当时敷衍了几句,便退了下来。当晚,何应钦轻装从简,竟不辞而别,抢在蒋介石离开徐州之前乘车直奔南京。途中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内称:“敬之因终日军务劳碌,身体欠佳,望允假两月。”

何应钦在南京稍事停留,即避居上海。蒋介石接到何应钦的电报后,对王伯群、李仲公道:“真是的,敬之还跟我耍小孩子脾气!”

当下,蒋介石离开徐州,径赴上海,对何应钦安抚了一番。何应钦这才觉得挽回一点面子,气也顺了。不久,何应钦悄悄地回南京就职。何应钦从此失宠。蒋介石对何并没有履行过去的诺言,而是在打下北京之后,只给予何应钦以“国军编遣筹委会委员”、“训练总监部总监”之类无实权的职务。蒋介石以杀鸡儆猴的办法,给反对过他的人敲了警钟。以后,南京成立黄埔军校后,以鄧悌、康泽为主,专门成立了一个特训班,搜罗一些曾反对他而有“悔改”表现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军校集训,毕业后一视同仁地分配到部队任职,以此来表示蒋校长的“宽宏大量”。

蒋介石在处理好第1集团军的人事任免后,又马不停蹄地于2月16日屈驾前往开封与冯玉祥相会。第二天冯玉祥陪同蒋介石到郑州检阅了他的西北军。18日,蒋介石用封建行帮的方式,与冯玉祥换兰谱,盟誓结拜。蒋介石写给冯玉祥的帖子是:“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冯玉祥回敬蒋介石的兰谱是:“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这年蒋42岁,冯47岁,蒋该称冯为大哥。蒋为何屈尊于冯玉祥并与之结拜把兄弟呢?原来冯玉祥是由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4月底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下辖25个军,兵力

将近 31 万。因为蒋要依靠冯玉祥去打张作霖。蒋看到冯部粮饷奇缺,士兵衣饰褴褛不堪,官兵出潼关前,连小米杂粮都吃不饱等情况,便开口馈赠 50 万银元犒军。这乐得冯玉祥连声称谢。

在稳住冯玉祥后,蒋再回转头委任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 3 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山西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希望阎锡山出兵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阎锡山是著名的“山西王”,老奸巨猾,凡事从不轻易表态。虽然受封,阎锡山并未立即就任,但后来看到蒋介石大权在握,也就顺应时势,走马上任了。对蒋介石来说,最难对付的是第 4 集团军,这个集团军拥有 16 个军和 3 个独立师,武汉政府曾任命唐生智为总司令。唐被李宗仁打败后,蒋任命李宗仁为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程潜对此项任命大为不满,致使李宗仁迟迟不敢就职。1928 年 5 月 21 日,程潜被李宗仁扣押,并致电南京,称:“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西征后更跋扈飞扬,把持湘政。本日特别会议决议将程潜暂行监视,请即明令免其本兼各职。”5 月 23 日,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免除了程潜本兼各职,着令听候查办”。蒋以牺牲程潜为条件,实现了他与李宗仁相互勾结的目的。蒋介石运用手中的权力和一打一拉的手段,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拉拢收买,使各派势力各得其所,听从其指挥,从而完成了向奉系军阀开刀的组织准备。正是:“为权势今日称兄道弟,争地盘明日反目为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北伐成功 蒋介石北平哭灵 论功行赏 嫡系部备受恩宠

书接上回。且说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他的头一个任务就是继续北伐。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改组了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国民政府，从而使蒋党、政、军权独揽于一身。蒋尽管赶走了汪精卫，气跑了胡汉民，政治上的劲敌已经消除，但在北伐中崛起的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这些新军阀，却各自占据地盘、拥有兵权。蒋为了继续利用他们，打着“继承中山遗志、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壮举”的旗号进行第二次北伐。这其实质不过是一场新旧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战争而已。

2月9日，蒋介石赴徐州视察后，将原国民革命军第1路军改编为第1集团军，撤销了何应钦的总指挥之职，亲自兼任总司令。这个集团军，下辖18个军，总兵力约29万余人，且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因而称为蒋介石的嫡系。2月19日，蒋任命原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2集团军总司令，辖25个军，计31万余人，同时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3集团军，任阎锡山为总司令，辖11个军，计15万人，然后又将两湖各军改编为第4集团军，任命李宗仁为总司令，辖16个军，计24万人，再加上海军总司令杨树庄所辖的若干舰队。二次北伐总共有兵力70个军，99万人，号称百万大军。

4月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命令第1集团军沿津浦路北

进,第2集团军沿京汉路北进,第3集团军出京绥路东进,第4集团军沿京汉路北上,四路大军,会师北京。

当时奉系的安国军亦号称百万,共有七个方面的军团,分别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为军团总司令,其作战部署为对京汉路、津浦路采取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

大战开始后,北伐军第1、2集团军迅速北进,大破鲁南的张宗昌。张部6万多官兵大多由土匪改编,战斗力极差,听到北伐军进攻,即作鸟兽散。张宗昌本人则专门从德国购买一辆铁甲车停在济南车站,随时准备败局逃跑。4月12日,张宗昌下令鲁军总撤退,蒋介石的军队几乎不战而占郟城。孙传芳部还有些战斗力,从左翼突破北伐军防线,而冯玉祥的孙良诚骑兵抄了孙的后路,解除了1集团军的危机。4月20日,北伐军先后攻克济宁、兖州,基本上消灭了孙传芳的部队。5月1日,第1集团军占领了济南。遂即蒋介石在山东督办署设立总司令部。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为干涉中国统一,挽救奉系军阀失败的命运,公然出兵济南干涉北伐。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杀害了南京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炮轰北伐军,打死打伤军民数千人。蒋介石的司令部也遭日机轰炸,被迫迁至郊外党家庄。

“济南惨案”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兖州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忍辱负重,撤离济南,绕道渡过黄河,向北京攻击前进。5月28日,参加北伐的各集团军开始全线进攻,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便于5月30日以安国军大元帅的名义下达了总退却令:要部队撤离京、津地区,向滦河退却。6月3日凌晨,张作霖一行30多人乘专列离开北京赴沈阳。4日晨,车行至沈阳皇姑屯车站时,张作霖被日本人埋的炸药炸死。6月6日,第3集团军商震部进驻北京,12日进占天津。

国民革命军攻占京、津后,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宣布“北伐”完成。

6月20日,张学良被推举为奉天督办,时年27岁。对日本人加害于先父张作霖有切齿之恨。对张作霖之死,他采取秘不发表的策略,使日本人一时摸不清真情。张学良“化装返沈”,情不外露,稳定了奉系的领导集团。在掌握了东北局势之后,他才于6月19日宣布张作霖伤重身亡的消息,并同时宣布自己继任奉天督办,致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这次事件武装占领东北的阴谋归于失败。7月4日,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6月20日,新疆总督杨增新宣布易帜,归属了南京国民政府。至此,除东北三省外,全国都挂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这样,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话说北伐成功后,阎锡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4次会议决议改北京为北平,与天津同为特别市。蒋介石在宣布北伐成功、中国统一后,又带头刮起了一阵辞职告请之风。6月9日,蒋介石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6月12日,他又宣布辞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职务。蒋介石宣布辞职,暗示了他的亲信们也辞职。果然,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委丁维汾申请辞职;海军司令杨树庄提出辞职;第1军军长刘峙电请蒋准他辞职赴欧留学。一时间,南京政府军政要员们纷纷申请辞职,大有“功成隐退”之中国传统道德的味道。

且看6月9日蒋介石通电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时,电文内称:

……伏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制定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一条，国民政府为图战时军令之统一，特任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是作战目的完成之时，即总司令职权当然解除之日。中正本年二月复职之电，亦经剴切陈明，一俟北伐完成，当即正式辞职，以谢去年弃职引退之罪。息壤在彼，尤蒙昭鉴。为此历陈缘由，恳予明令府准，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解除，并准辞去军事委员会主席。所有各军、悉令复员，此后军权统归钧府军事委员会办理，以一事权，而专责成。

蒋介石急于辞职的目的有三：一是按照国府条文规定，他出任总司令的期限将到，若恋恋不去，有人就会在背后说他的闲话了，不如主动要求下野；二是他并不想真放权，不但不想放，还要把全国的军权都统归己有，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裁军“削藩”，但他断定各实力派都不肯交出军权，便听从了军师蒋百里的“将欲取之必先弃之”之策；三是他想通过辞职来试探一下各方势力对自己的态度，进而识别真假拥护自己的人。

果然这一着棋很灵验，首先是把兄弟冯玉祥于6月12日致电挽留，见无回音，便又发了“真”电，内称：

弟此时言去，不啻置党国于危难。前在柳河站誓同患难于涂炭中，现不能坐视前功尽弃，惟有相继引去。若弟不打消辞意，本人不敢独留。

一时间，李济深、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纷纷发来挽留电。何应钦这次深怕落后，也急忙从南京发来挽留电。蒋介石这时偕夫人在奉化游山玩水，逍遥自在，看到挽留电如雪片飞来，

一个比一个恳切，心中好不得意。6月17日，蒋介石通电声言，他打消辞意，表示要对军事负责到底。这样，蒋介石由奉化返回南京。

接着，南北方又发生了一场有关迁都的争论。北方派的文人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南京为六朝粉都，地近上海，腐败萎靡之气太重，是亡国之都；而北京则是元、明、清以来传统的中国首都，凡在此建都的朝代，都很兴旺发达，建都北平，为千秋万代所考虑，理所应当。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党政客、文人当然不会同意。他们认为北平处于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等北方派的实力之下，如迁都北平，必被他们所控制，而且北方风沙大，天气冷，不适宜建都；而南京与上海相连，在蒋介石的地盘之内，又有江浙财阀的支持，于是，蒋介石指使御用文人以“南京为先总理孙中山先生指定的首都，总理遗训不能违背”为由，引经据典，大做文章，表示首都所在地绝不能改变。北方派见争不过南方派，只好作罢。

最后，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决定在北平举行由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四位集团军总司令为首的祭奠孙中山灵柩的盛典。

6月26日，蒋介石偕同吴稚晖、陈布雷、邵力子、陈立夫、周佛海等一批文武官员，从南京乘军舰，溯江而上，抵达武汉，受到李宗仁的热情招待。30日，蒋、李同行，乘火车抵达郑州拜访冯玉祥，邀请冯一同北上，冯推托有事，表示晚几日赴平。7月3日，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等到达北平。阎锡山、白崇禧等亲自到长辛店迎接。在出发前，蒋介石就电告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命其在西山碧云寺预备下榻之处，不在中南海居住，并嘱“革命尚未成功，总理灵柩尚未安葬，万不可筹备欢迎，以志国难”。何成浚接到电报，自然不敢怠慢，一面向舆论界大肆宣扬蒋总司令

如何坚持住在碧云寺,要为孙中山先生守灵,向社会公布蒋介石的祭灵声明;一面亲自勘查通往香山碧云寺的道路及住所,安排人修整了道路及行轺。蒋介石祭灵的消息不胫而走,国民政府军政要员齐聚北平,何成浚只好在碧云寺周围加派警卫。李宗仁住进了集灵圃,冯玉祥也于7月5日抵达北平。蒋氏夫妇于7月3日进住了香山碧云寺含青舍,做出孝子守灵之态。7月6日,祭灵大典在北平西郊香山碧云寺隆重举行。蒋介石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各路军阀、各界要员,在津、京、唐地区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团长、师长以及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总指挥都纷纷赶来参加盛典。一时北平各大宾馆、旅社住满达官显贵,着实热闹了一番。

这次祭灵,整个碧云寺布置得极其庄严肃穆,松枝上缀满了白花,党政军及民间各界、外国使节送来的花圈堆满在宝塔周围。门口牌楼上的横额书有“天下为公”四个大字。楹联为:“人群进化;世界大同。”二重门牌楼楹联为:“赤手创共和,生死不渝三主义;大名垂宇宙,英灵常耀两香山。”至第五重山门,有和尚释净挽句:“今世如来。”安置孙中山灵柩的石龛内悬有一幅未署上下款的长联,对中山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功高华盛顿,识迈马克思,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瘞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上午8时20分。蒋介石为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的盛大祭典正式开始。蒋介石身着军装,外罩玄色披风,戴着白色手套,神采奕奕。紧随蒋后的是冯玉祥,他仍是腰布带子旧军装,头顶草帽,脚穿布鞋,上面打着绑腿,一身土气;阎锡山身着黄呢新军装,上将三星耀目,脚蹬皮鞋,与冯玉祥成为鲜明的对比。只有李宗仁,一副青年将军气概。后面左右跟着的是白崇禧、方振武、贺耀祖、张荫梧、楚溪春等文臣武装。奏哀乐

后,主祭蒋介石敬献花圈,行三鞠躬礼,接着由第3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宣读祭文。

祭文开头称:“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定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由陈布雷草拟的这篇祭文,一是说明蒋介石为“北伐胜利”、“统一大业告成”的最高军事统帅,再则昭示天下,蒋介石受命于先总理,是当然的继承人。祭文除了为蒋介石“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辩解外,还明确指出了他的“削藩”之意图,显然是在告诉大家:我蒋某是借助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谁企图推翻我就是中山先生的叛徒,我是法定的继承人,任何人都得服从我蒋某的领导。蒋介石要借中山先生的亡灵,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读祭文至“今当建国伊始,而总理已长辞人世,不复能躬亲指导,千钧之责任,寄于后死之同志,惟有竭力同心,勉为绍继,以总理之精神,团结本党之精;以总理之思想,统一全国之思想。革命之基本既立,人民之解放可期。中正自许身党国,久已矢之死靡他之决心。初不意百战余生,尚能留此微躯……”时,冯玉祥的脸色变了,阎锡山、李宗仁也皱起了眉头,因为他们已听出蒋氏在祭文中对他们含沙射影。

商震读罢祭文,便打开中山先生的棺盖,让全体同志瞻仰中山先生的遗容。蒋介石第一个到了棺前,一见先生遗容,顿时放声大哭,泪如泉涌,其痛心之状,使周围的人欢之都要落泪。他扶棺痛哭步不前移,这使后边的文武百官都无法瞻仰了。冯玉祥见蒋介石哭得犹如孝子似的,觉得这种哭法有点离谱,就上前低声相劝,不料冯越劝蒋越哭,竟如妇人哭得捶胸顿足,他这么

一弄,后边的人只好都等下去了。这时,那些对蒋有气的,忍不住骂道:“看,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去吧!”接着,又有人附和:“叫他哭吧!我们走了。”这句话还挺灵,蒋介石果然立刻止涕。后面的人依次瞻仰了中山先生的遗容,盖棺散会。

蒋介石精心设计的这场祭灵哭棺,是为了把自己放到他是中山先生惟一继承人的位置上,加上宋美龄又是中山先生的姨妹子,亲上加亲,以此来慑服众人。但是蒋介石显然打错了主意,新军阀他们虽然在中山灵柩前都毕恭毕敬,可在相互间争夺起权力来时,却分毫不让。

祭灵之后,即7月8日,蒋介石便在北平行营的汤山召开了善后裁军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吴稚晖、李烈钧、戴季陶等。会议一开始,蒋介石便说:“北伐成功,军队要缩减。当今革命最要紧的问题厥惟裁兵,要服从命令……”局中人马上知道蒋氏话中之意:他要借缩减军队来削他人的势力,树自己的黄埔嫡系了。蒋介石还将宋子文在上海主持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内容透露给大家。会上提出了《克期裁兵从事建设案》。案言:全国此时共有84个军、18个独立旅、21个独立团,这些部队一年所需经费约54600万元,临时费9600万元,而全国每年收入只有4亿元,不实行裁军,就无法甦民生之困。

未等蒋介石说完,李济深插言道:“缩减军队,减少军费开支,减轻百姓负担,我很赞成,但是,这要有个前提。这个前提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反对的;若是以天下为私,就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的军队减掉,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办法就不公平。”

冯玉祥与蒋介石毕竟是把兄弟,便开门见山说道:“此次裁军,应当是枪支不全者裁,老弱不堪用者裁,纪律不佳者裁,训练

太缺者裁,归纳起来就是 32 个字:互相原谅,互相补助,大局安好,个人蒙福,切戒挑剔,切戒猜疑,不慌不忙,合而为一!”冯玉祥说到这儿,对蒋言道:“总司令老弟,你的兵天天大鱼大肉大米饭吃着,个个身体养得棒棒的,裁弱留强,当然得留你的兵了。但愿也给我们留几个窝窝头,一两块老咸菜啃啃吧,不然就要把我们饿坏了。”蒋介石听罢,对阎、李诸人哈哈大笑道:“焕章大哥真会开玩笑。”

蒋、冯、阎、李四位总司令东拉西扯,裁兵也没有个头绪,风凉话倒是不少。头一天散会后,蒋介石把文胆陈布雷叫到密室,对他说:“冯焕章这个老兵油子,挑头反对裁兵,分明是要保持他西北军的实力。布雷先生,诸侯、藩镇历来是祸患呀!”

陈布雷是蒋的侍从秘书,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浙江慈溪人,1890 年生,比蒋介石小 3 岁,曾任上海《天铎日报》、《商报》、《时事新报》主笔。1927 年他投靠蒋介石,为蒋起草文件,有“文胆”之称,连孔祥熙也怕他三分。他俭朴、肯干、有人缘,权重而谨慎,位高而检点,深受蒋的青睐,一向以“先生”称之。陈布雷曾劝蒋道:“总司令一定要借裁兵之机,消除新诸侯。”陈精通《四书》、《五经》,历史上“藩镇割据”而引来亡国之教训,他深有所知,因而力劝蒋“削藩”,以定天下。蒋介石见“文胆”支持他的主张,便心生一计,蹙着眉头道:“先生放心,我自有办法。”

会议开到第三天,蒋介石抛出了一个《军事整理案》。这提案一共有七条,归纳起来有三个内容:一是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各集团军、海军总司令职,由上述人员及参谋总长、次长组成全军编遣委员会;二是择各集团军精锐者,编为 50~60 个师;三是全国军队统一编制,打破原编制,轮番易教。各集团军的军官,分批调人黄埔军校训练,是为黄埔军校高教班之来由,另在全国设几个大练兵场,各师编成后,分期分批调集训练。

蒋介石提出的这个《军事整理案》，是想用整编、混编、调集训练等方法，削掉李、冯、阎的军权，把军权集中到中央手中。冯、阎、李也不是等闲之辈，自然不会轻易上套。会开了五天，没有结果。最后，冯玉祥提议道：“开罢五中全会后再谈裁军吧。”蒋见议而不决，也只好同意了。

冯玉祥为表示出大哥对他蒋小弟的支持，散会前又提出了各总司令集中到南京供职，蒋这才脸露笑容。

8月1日，阎锡山在石家庄给蒋发来电报，云其父患急病，暂不能去南京上班，只有李宗仁、冯玉祥来到南京，但一转眼又走了。根据《军事整理案》规定，10月10日新一届国民政府在南京宣誓就职，蒋介石以国府主席之名敦促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来南京分别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内务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三人均恐其有调虎离山之计，迟迟避而不上任。他们心中各怀鬼胎，深怕蒋介石再导演一幕历史上“杯酒释兵权”的老戏。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8月8日在南京召开，会上蒋介石“削藩”之计又未实现，建立军事独裁的统治政策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他与各地方实力派出现了僵持的政治局面。于是，蒋介石日夜寻求打破僵局的途径。

祭灵活动演成一场祭灵闹剧，时人对这次祭灵活动有诗评价曰：“大家携手去祭灵，各自心里念拳经；同床异梦建新政，各怀鬼胎搞裁军。”

且说蒋介石“削藩”受挫后，冷静下来又记起了他一手创办的黄埔军校。经过北伐的战争洗礼，国共交恶后的分道扬镳，赤、白黄埔已经泾渭分明，一批黄埔军校毕业生在战场上已崭露头角。

先说赤黄埔系。这名字的产生由来已久，早在 1924 年 11 月，就有人写文章分赤白黄埔。一篇题为《赤黄埔系的形成与没落》的文章中写道：

（中共）最初，在黄埔军校设有一个直接支部（其后改为特支），直属于广东区军委。其时广东区军委书记是周恩来，所以黄埔支部就直接归周恩来指挥。但一般说来，他在到广东以前，在共产党内实在没有什么地位，实在还只是一个地方干部而不是中央干部。但他是很聪明的，他看到了黄埔军校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所以以全力经营黄埔支部，以黄埔的共产分子来作他事业的基础，形成所谓“赤黄埔系”。

尽管该文作者不乏歪曲污蔑之词，但反映了一个事实：周恩来由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为中共力量在黄埔军校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共产党最初在黄埔军校的影响并不大，尽管人数不少，教职员中有：周恩来、张申府、聂荣臻、孙炳文、毛泽覃、恽代英、邵力子、熊雄、肖楚女、鲁易、罗髻渔、罗君强、李达、雷经天、金佛庄、黄松龄、胡公冕、郭俊、高语罕、成仿吾、王懋廷、徐坚、徐成章、袁也烈等；学生中有：蒋先云、陈赓、李之龙、王逸常、杨其纲、徐向前、蔡申熙、冯达飞、曹渊、陈启科、董朗、傅维钰、何章杰、黄锦辉、黄鳌、李汉藩、洪剑雄、王尔琢、王泰吉、左权、刘畴西、许继慎、孙德清、吴展、周士第、唐澍、阎揆要、彭干臣、彭明治、袁仲贤、宣侠父、赵自选、陈恭、古宜权、邝甦、李劳工、卢德铭、吴振民、王一飞、宛旦平、余洒度、周逸群、常乾坤、段焱华、符节、黄文杰、姜镜堂、林彪、伍中豪、吴光浩、熊受暄、肖人鹄、朱云卿、曹广化、段德昌、郭化若、洪水、季步高、李鸣珂、李天柱、李逸民、李运昌、刘志丹、陆更夫、倪志亮、唐赤英、唐天际

王世英、吴溉之、吴志喜、肖芳、肖韶、肖以佐、严子汉、叶镛、袁国平、员一民、曾希圣、曾士峨、曾中生、周为邦、邹琦、赵尚志、廖运周、莫文骅、潘忠汝、宋时轮、谭希林、陶铸、王鹤、许光达、杨至成、张平化、张宗逊、赵搏、赵一曼、陈伯钧、程子华、陈英、邓萍、段玉林、董益三、郭天民、何昆、胡兰畦、胡毓秀、胡筠、黄杰、黄静汶、刘型、罗瑞卿、彭镜秋、彭文、彭之玉、漆德玮、宋绮云、谭浩郁、陶恒馥、王良、王鸣皋、王诤、危拱之、肖大鹏、徐林侠、徐彦刚、游曦、张赤男、张开荆、张瑞华、张如屏、张锡龙、张友清、张元昌、曾宪植、钟蛟蟠、周维炯、周文在、周越华、贺国中、黄公略等近 140 人，这仅仅是黄埔军校第一至第六期学生。第七期以后，黄埔军校迁至南京，以后党陆续派了许多共产党员进入该校学习如张学思、黎原、高存信等，只是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就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争权夺利，掀起中原大血战之际，赤黄埔系的同学纷纷参加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首的各地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黄麻起义等数十次大小起义，都曾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壮大了红军，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继续向前迈进。

赤黄埔系的许多将领，在武装斗争中锻炼成长，他们成了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骨干力量，这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俗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蒋介石靠黄埔起家，但最终也是黄埔埋葬了他在大陆的“蒋家王朝”，历史就是这么无情。

再说蒋介石的白黄埔系，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学生共 499 人，白黄埔系逐步在国民党军队中形成了黄埔嫡系，经过蒋介石与各地新军阀的讨价还价，达成

编遣协议,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缩编后,黄埔系将领取得了正统地位。

1927年,黄埔一期的李之龙被授予中将军衔,任海军局代局长,成为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取得将级军衔的人。接着,黄埔一期的余程万、胡宗南、范汉杰三人也于该年晋升为少将。

1928年,黄埔一期的曾扩情被派往四川任国民党军事特派员。由于他拉拢了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杨森、田頌尧支持蒋介石有功,被晋升为中将。这一年,邓文仪、鄞悌、李默庵、贺衷寒、李延年、郑洞国、关麟征等黄埔一期毕业生因战功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黄埔二期毕业的李士珍捷足先登,超过许多一期学员而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兵站分监部少将参谋长。

黄埔四期毕业的特殊学生唐生明,1926年就被其胞兄、第4方面军总司令唐生智任命为第8军中将代理军长,时年只有20岁。

1931年,经过中原大战与“围剿”红军,白黄埔系人才辈出。黄埔一期毕业的学生,年龄大都在20至30岁。他们中的佼佼者如胡宗南、余程万、关麟征、杜聿明、郑洞国、宋希濂、黄维、肖乾、李及兰、李延年、李铁军、丁炳权、胡素、黄杰、陈明仁、罗奇、丁德隆、俞济时、彭善、刘咏尧、李玉堂、贺衷寒、邓文仪、鄞悌、范汉杰、董钊、刘戡、蒋伏生、霍揆彰、李树森、李仙洲、孙元良、桂永清、王仲廉、韩浚、何绍周、顾希平、甘丽初、邓文仪、邓含光、陈武、侯镜如、李默庵、蒋孝先、冷欣、刘嘉树、马励武、孙元良、王叔铭、王敬久、伍成仁、夏楚中、张镇、张耀明、曾扩情、钟彬等,均晋升为少将以上军衔,任旅长、师长以上职务。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他们都是蒋介石的重要军事将领。至于成刚、方天、邱清泉、廖昂、罗历戎、沈发藻、覃异之、钟松、戴安澜、方先觉、康泽、毛人凤、王耀武、高魁元、胡璉、李弥、林伟俦、彭士

量、覃道善、滕杰、文强、张灵甫、郭汝瑰、邱行湘、郑庭笈、戴笠、廖耀湘、盛文这批白黄埔系的骨干，只能称得上是后起之秀。白黄埔系的将领，有的在抗日战争中成为英雄，有的在解放战争中成为俘虏，其中酸甜苦辣滋味，坎坷曲折经历，只有他们才能体会最深。真是：山河百转似水流年，功过是非后人评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浴血奋战 井冈山朱毛会师 高举红旗 刘志丹渭华起义

话说国民党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合向张作霖北伐。当部队进入鲁西北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到来了，那就是家喻户晓的“朱毛”井冈山会师。1928年4月23日这一天，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和湘南农民军，在重创敌人后退至江西宁冈砬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会师。两军会师后，成立了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那就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全军分3个师9个团，总计官兵两万余人。

人们常听到红军时代的一首民谣：“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会师，标志着我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两位巨人在龙江书院的握手，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也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当天，毛泽东刚刚远征归来，听说朱德、陈毅等人已到了，住在龙江书院，就立即匆忙赶到龙江书院相会。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巨人早已相互倾慕、神交多年了，此时相会，更是心潮起伏，激动万分。

毛泽东快走到龙江书院状元桥时，朱德抢先几步迎接，毛泽

东也加快脚步,早把一双巨手伸了出来。只一刹那,两位巨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这年,毛泽东 35 岁,朱德 42 岁。

朱毛井冈山会师,它的牵线人有两位:一位是毛泽东派去找朱德的何长工,一位是朱德派去找毛泽东的毛泽覃。

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字润菊,比他哥哥小 12 岁。井冈山会师时,毛泽覃才 23 岁,看上去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毛泽覃于 1918 年随毛泽东到长沙读书,16 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8 岁入党,曾在湖南常宁水口山与长沙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1924 年他随大哥毛泽东到广州。毛泽东代表湖南参加国民党“一大”,毛泽覃就进入黄埔军校,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政治部当科员。由于毛泽覃工作干得挺出色,受到上级的表扬。一年前,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着广州又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毛泽覃不得不离开黄埔军校,参加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作。当时的政治风云非常险恶,他带着在广州怀孕九个月的妻子周文楠辗转来到武汉。这时,毛泽覃的二哥毛泽民也从上海搬来武汉,在董必武领导的《汉口民国日报》社负责出版发行工作。毛泽东早就从湖南来到武汉,三兄弟在武昌都府堤会面,彻夜分析时局并商量各人的出路。毛泽覃表示愿去军队打仗,毛泽东就通过关系把三弟介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毛泽覃的妻子周文楠快要临产,只得跟着大嫂杨开慧、二哥毛泽民先回长沙。这时杨开慧刚生下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毛泽东答应等开完中共中央 5 次代表大会后,立即返回湖南,上山下乡打游击。

毛泽覃随国民革命军第 4 军政治部开往九江,途中接到叶剑英的秘密指示,说张发奎马上要将 4 军中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才和政治部的几个同志赶紧化装逃离部队。听说周恩来要在南昌起义,毛泽覃就急忙赶往南昌,但没料到起义部队已南

下,而南昌城也被张发奎占领,只好日夜追赶部队,一直追到临川,才遇见了周恩来。周恩来认识毛泽覃,于是将他安排到叶挺指挥的第11军政治部工作。叶挺的部队在汤坑被黄绍竑的部队包围,全军覆没。毛泽覃跟随逃出来的起义军几百人,辗转来到饶平,在那里遇到了朱德的部队。当时,这支部队在三河坝与钱大钧部激战了三天三夜,突围后向闽西赣粤边转移,等转战到江西安远县天心坪整编时,朱德的这支部队只剩下七百多人了。

朱德将这些官兵召集到一起,大声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七百多官兵整编成一个团,朱德任团长,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11月上旬,部队抵达赣南崇义县境,正好遇到了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范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两人经过商谈,范同意将朱德的这支部队以第47师144团的名义暂时列入第16军序列,朱德以王楷的化名任第16军总参议、47师副师长兼144团团长。范石生供应了一批武器、弹药和棉衣,使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后,暂时摆脱困境而转向了坦途。

一天,朱德把毛泽覃叫去,指着一张刚缴来的报纸说:“瞧,你大哥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敌人拿他没办法,你立即动身,到毛泽东那里去联系一下两军会师的事。”

毛泽覃连忙到城里印了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部少尉副官,覃泽”。他穿上一身黄呢军装,带上手枪,一路上,威风凛凛,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地主武装一见名片,摆酒接风,设宴款待。毛泽覃一路顺风上了井冈山。毛泽覃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经过无数关卡,顺利来到茅坪。这天已近黄昏,毛泽东、袁文才、贺子珍三人刚跨过茅坪河上的小桥,就见贺怡向他们跑来。贺怡说:“毛委员,来人啦。说是你弟弟。”毛泽东一怔,有点不信:“弟弟,哪个?”贺怡不晓得毛泽东有几个弟弟,摇摇头,用

手指着八角楼的方向,大声说:“在那儿呐。”

毛泽东远远看见八角楼前站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青年军官。那青年军官好像认出了什么,立即推开众人,向毛泽东奔了过来。毛泽东老远就大声喊道:“润菊!”毛泽覃扑了上来,连叫了几声“大哥,大哥”。兄弟俩这意外的重逢,犹如喜从天降。毛泽东一把拉着毛泽覃的手,将他领到八角楼上自己那所房间。

兄弟俩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当谈完会师的事之后,毛泽覃换了一个话题:“哥,我嫂嫂和三个侄儿有消息吗?”

毛泽东突然沉下脸,难过地摇摇头,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扬起脸,说道:“润菊,汉朝有个大将军霍去病说过:‘匈奴不灭,何以为家?’你我都已投身革命,革命不成也实在难以回家呀!听说湘潭的土豪把我们家的房屋都烧了,田亩占了。湖南军阀何健悬赏几十万银元要我的脑袋。你嫂子带着孩子恐怕凶多吉少。我写过两次信,也不晓得她能不能收到……”

毛泽东有些说不下去了,顿了一会才说道:“革命者难以顾念我们个人的一家一户呀,你我也要随时准备为革命掉脑袋的。”

当晚,兄弟二人在八角楼里谈了整整一夜,其中有悲有喜,有革命豪情也有同胞亲情。

话分两头。再说毛泽东派何长工下山打听朱德、陈毅的消息。何长工从1927年10月5日出发,经过几个月的奔波,从长沙直下广州,又从广州风尘仆仆地返回韶关。他的身上脏得很,一下车就住进了旅馆,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16军,恰好有几位军官和何长工在一起洗澡,水汽濛濛的,谁也看不清谁。何长工听见他们谈王楷的队伍到了犁铺头。王楷就是朱德,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等等。何长工无意中听到了朱

德的消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工夫!”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原来就在这里。何长工连忙穿上西装,打扮成富家子弟模样,半夜三更摸黑朝犁铺头奔去。朱德、陈毅会见了何长工。以后,朱德又收到中共中央给他的两封信,要他加强与毛泽东的联系。何长工在朱德那里见到了一个一脸大胡子的年青人,还见到了多年前和他在洞庭湖一起做地下工作的蔡协民。经蔡介绍,何长工才认识那个年青人就是朱德的参谋长王尔琢。何长工开玩笑地说:“你这把胡子,简直像马克思。”蔡协民同志说:“王参谋长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

王尔琢何许人也?他字蕴璞,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郑洞国是同乡。由于他参加东征、北伐作战勇敢,得到过周恩来和苏联顾问的赞扬。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王尔琢受党委托,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74团参谋长,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后,25师改属第11军,王尔琢任74团团团长随部队南下广东。1927年9月下旬,起义部队主力到达潮洲汕头地区,25师留守大浦三河坝,归第9军副军长朱德指挥。10月上旬,部队进入饶平,与第20军第3师一部会合,他得知主力部队在潮、汕失利,遂退出广东,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于闽赣边境。为了生存,他才暂时投靠范石生门下,等待时机再把部队拉出去革命。王尔琢利用这个机会,将所部连、排长集中起来,组成教导队,集中训练,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当何长工传达毛泽东的会师意见时,王尔琢双手举起表示赞成。何长工会见朱德、陈毅、王尔琢后,即于1928年1月上旬返回井冈山复命。何长工刚走,朱德、陈毅率部就发动了著名的湘南起义,占领宜章,击溃国民党许克祥部2000余人。彬县、永兴、资兴、耒阳等10余县群众也纷纷起义,国民党大为恐慌,先后派出7个师进行围攻。3月底,湖南起义失败。朱德郑重

宣布：从今起，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共同领导。后来这支部队终于度过难关，于4月向罗霄山脉挺进。

在中国的赤黄埔系中，陈毅这位共和国的元帅，不能不占有一席之地。陈毅与王尔琢是同庚，都生于1901年。陈毅字仲弘，四川乐至人。1919年，18岁的陈毅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成为最早跨出国门的元帅之一，回国后入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192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京各界群众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三·一八”集会和请愿的组织领导工作，不久被党派回四川从事兵运工作，推动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川军响应北伐。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失败后，陈毅由川入汉。当时他不知军委机关所在地，找到了省委组织部，组织部的人不认识他，就说：“那好吧，你到叶挺部队去当兵吧！”陈毅心想：“当兵就当兵，只要革命就行。”陈毅有心找军委找不到，出了组织部大门却碰上了军委的人。他们赶紧把陈毅请去，正好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缺人，于是就分配陈毅到那里去工作。陈毅就从此与黄埔军校扯上了关系。

其实，陈毅与黄埔军校有很深的感情，陈毅的大哥陈修和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官至国民党陆军中将，是兵工专家。解放后陈修曾任政务院中央技术管理局副局长、国务院参事。陈毅的二哥陈孟熙黄埔军校五期毕业，1929年到川军任职，曾支持过陈毅的革命活动。陈孟熙当过国民党56军164师少将参谋长、川西师管区少将副司令等职。1938年他任西昌行辕禁烟（指鸦片）专员时，别人都羡慕他这个“肥差”。一次，陈孟熙查获一个3000斤的鸦片大案，案犯进行贿赂和请人说情，都被他顶了回去。由于秉公办事，得罪了上司及有关方面，他一气之下，挂冠而去。为迁徙安家，他离开西昌时还从朋友处借了3000元，由此，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八月专员三千债，两袖清风

一菩提”，横批是：“乐在其中”。后来，陈毅知道了这件事，十分赞赏哥哥的为人，在一封家书中赠联一副：“佛不收债鬼，民当敬清督”。陈孟熙 1949 年 12 月在乐至率部起义，解放后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86 年 4 月在重庆病逝。

且说陈毅在武汉进入黄埔军校后，他的公开身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准尉文书。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暗里他却是中共武汉分校党委书记，负责军校中党团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陈毅与肖劲光赶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向南转移，两人决意追赶，终于在江西抚州城赶上起义队伍。陈毅找到周恩来和刘伯承，周恩来分配陈毅任 25 师 73 团的党代表。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真诚而喜悦地答道：“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在会昌战役中，第一次上战场的陈毅，面对敌人的浓密炮火，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种考验，立刻奔上最前线。他和黄浩声团长站在一起指挥作战，因而赢得了士兵们的称赞。行伍出身的黄浩声开始对身边这位书生出身的指导员刮目相看。

1928 年 4 月 23 日，朱德和他的部队开进了沔渡。还没住下，朱德就对伍若兰说：“快帮我找林彪来。”少顷，一个身材虽然瘦弱，训练有素的青年军官来到朱德面前，他就是林彪。年仅 21 岁的林彪，在朱德率领南昌起义残部做艰苦辗转时，曾有过脱离部队的打算，但毕竟这是一念之差，后来他在陈毅的耐心开导下，终于留了下来。

林彪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原名林育容，字允勇，湖北黄冈人。他的两个哥哥，一个是曾任共产国际代表、八路军 129 师政委等要职的林育英，一个是曾经领导过“二七”大罢工、最终血染龙华的著名工运领袖林育南。这时林彪是 11 军 25 师 73 团

的一位连长。来自湖北黄冈白羊山下的林氏家族三兄弟，在中国现代史上声名赫赫，毛泽东曾在延安亲自为英年早逝的林育英抬棺送葬。林氏三兄弟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曾留下了许多颇富传奇色彩的故事，这里暂且不提。

且说林彪在跟随朱德的征途中，在湖南耒阳城的一次战斗中崭露头角。他以4处轻伤的代价消灭了敌人一个连，缴枪100多支，令朱德刮目相看。后来，林彪由连长升为营长。然而林彪这时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笔者先父与林彪在黄埔是同期同学。据先父回忆，当年林彪在黄埔确实在学习上出类拔萃，训练也能刻苦，难怪他后来成为显赫的元帅之一，这是后话。来阳战斗胜利后，朱德来找林彪，想问问陈毅的情况。林彪神机妙算，仿佛早已料到朱德会找他问此事似的。林彪向朱德详细作了汇报，把工农革命军2团接应陈毅的情况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并肯定地说：“陈毅的队伍今天下午会赶到沔渡。”

林彪所料不差，到了下午，王尔琢兴冲冲地向朱德报告：“工农革命军2团和陈毅的队伍抵达沔渡。”朱德大悦，跑到村口迎接工农革命军2团和陈毅。见过何长工、袁文才、王佐，朱德忍不住一拳擂在陈毅身上，抖着胡子笑道：“久违了，久违了！”陈毅指着何长工、袁文才和王佐对朱德说：“相见时难别亦难，多亏了你们前来接应，不然，你我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当晚，毛泽东也赶到沔渡，人们要他在砦市迎接朱德、陈毅所部。毛泽东说：“我与朱德本来就相见恨晚，这会儿岂能耽搁。”毛泽东的出现，使朱德喜出望外。朱德、毛泽东，两位改变中国命运的巨人在这里握手。几天后，毛泽东、朱德在龙江书院状元桥正式会师，就出现了本回开始描述的那个场面。5月4日，砦市召开了庆祝井冈山会师和成立红四军的大会。两军会师，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宁冈县委筹集了够两万人吃20天的粮食，砦市街清扫得干干净净

净。龙江岸边的沙洲上是庆祝大会会场,工农革命军和从四面八方拥来的群众、赤卫队员,扛着步枪、红缨枪,举着红旗,龙江岸边人山人海,鼓乐齐鸣。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主持大会,朱德、毛泽东都讲了话。朱德后来在重游井冈山后,写下一首题为《井冈山会师》的诗,诗曰:“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这首诗把我国人民对两军会师的认识及历史对两军会师的总结都浓缩进去了。井冈山会师,为中国革命竖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在井冈山这样一块红色根据地,产生了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彭德怀五位未来共和国的元帅,其中黄埔军校出身的就有两位。

就在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的时候,陕西清涧、渭南、华县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工农革命政权。

5月1日,渭南县东原1000多名农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纪念“五一”劳动节,在崇凝镇召开大会,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大家吃,大家干,大家的事情大家办!”的口号,同时宣布起义。会上还成立了陕西省第一个革命新政权——崇凝镇苏维埃。

声势浩大的革命风暴席卷整个陕西渭华地区。几天的时间,赤水、阳郭、三张、高原等50多个村镇的反动地主武装和反动政权统统被打垮,代之而起的是工农革命政权的建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渭华起义。

那么,领导清涧、渭华起义的是谁呢?

他们是刘志丹、唐澍和谢子长。为了纪念刘志丹和谢子长,后来陕西省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将瓦窑堡改为子长县,其目的就是让后人不要忘记这两位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当然,高岗在渭华起义中,也作出过重大贡献。渭华起义由潘自力、王泰吉、阎红彦、阎揆要、高克林等红军将领担任的领导工作。

刘志丹、唐澍、王泰吉、阎揆要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军事领导干部。

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刘志丹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孺妇皆知的。毛泽东称赞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是领导清涧、渭华起义的主要负责人,他是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

刘志丹是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人,乳名来生,学名刘景桂、字子丹,为表明自己愿为民族、为革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诚意,改为志丹。1922年,19岁的刘志丹考入陕北榆林中学,在该校共产党教师魏野畴、李子洲等人的教育下,积极投身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并选为该校学生会主席。1924年秋,刘志丹加入该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第二年春,又第一批转为中共党员。“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号召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于1925年秋,不远千里进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参加东路军誓师北伐。当时,冯玉祥在绥远三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军,要求中共派干部到他的部队工作。这年冬天,刘志丹奉命到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担任组织科长。上任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冯玉祥的少将特使,去进行收编马鸿逵的谈判。马鸿逵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一个军长,其总部设在固原,一听说冯玉祥要派特使来收编自己的部队,顿时火冒三丈,这时,刘志丹正踏上前往固原的路,正好碰见一位骑兵连长,就向这位连长打听马鸿逵的情况。凑巧,这连长正是奉命向吴佩孚派驻西安的镇守使刘镇华通报“敌情”的使者。刘志丹态度和藹地开导这位连长说:“广东革命政府已北伐,马上进逼武昌,吴佩孚的军队正节节败退。眼下虽有他的残部围困西安,冯帅已开始西进,西安之围指日可解。到那时你马司令得罪了冯帅,

恐怕连你这个连长也得掉脑袋！”刘志丹一席话说得连长点头称是。刘志丹又说：“你去给马鸿逵报个信，把我刚才讲的形势说给他听，告诉他，就说我看他存心不良，回陕西去了。”这位连长连忙挽留刘志丹，自己飞身上马，一路急鞭策马回固原去了。马鸿逵听了这位连长的汇报，知道冯玉祥不好惹，连忙打发连长去请刘志丹。刘志丹被马鸿逵任命为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帮助马鸿逵整顿军风军纪，废除打骂，把部队训练得既有战斗力又遵守纪律。从此，刘志丹在西北声名远播。在冯玉祥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后，1927年7月，他以“集训”为名，将刘志丹等32名中共党员监禁，随后装上闷罐车押往武汉，想借湖北反动派之手将他们杀害。当列车行至武胜关时，刘志丹等人趁夜间押解人员交接忙乱之际，跳车逃脱。

刘志丹脱险后，于1928年初到上海找到党中央，随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重返陕西开展武装斗争。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王泰吉等人，到我党控制的军阀李虎臣部许权中旅（许是中共党员）从事兵运工作。李虎臣与冯玉祥发生战争后，刘志丹等利用这一时机，举行了著名的渭华起义，将许权中旅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将部队开往渭华。在华县高塘镇，刘志丹主持召开了军事扩大会议，决定将这支红色军队编成4个大队。全军千余人，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在陕北开辟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

唐澍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河北徐水人，祖父唐湘云当过前清秀才。唐澍生长在诗书之家，上过师范，因闹学潮，被校方开除，1924年夏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与陈赓、徐向前、王尔琢、左权是同学。受他们的影响，唐澍在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派往冯玉祥部当军事教官。上课时他常引经据典，经常引用孔子的话：“吾道从一贯之”，要求学员坚定革命信念，被

学员戏称为“唐贯贯”。唐澍能歌善舞，当过红色剧团团长。冯玉祥“礼送”唐澍出境后，唐澍回到西安。当时，陕北有个小军阀井岳秀，其部石谦旅驻清涧，石谦同情革命。该旅营长李象九和连长谢子长都是共产党员，唐澍奉命到李象九营任军事教官，领导整个陕北的军运工作。1927年10月唐澍领导该旅在清涧宣布起义，组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1支队。唐澍任总指挥，率部转战延川、延长、宜川等地。唐澍后来与刘志丹会合，组成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由于渭华起义爆发于敌人心脏地区，又是豫陕交通要道，严重地威胁着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所以他立即调集3个师的兵力，在宋哲元的指挥下，向起义军发起围攻。起义军民英勇奋战，将敌击退。1928年6月19日，敌人又增派3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围来，终因力量对比悬殊，刘志丹、唐澍不得不撤离渭华地区，进入终南山。7月部队抵达商洛，又遭敌人袭击，起义军几乎全军覆没。战斗结束，清点余部官兵仅200余人，只得合并为民团，潜伏下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在这次战斗中，唐澍不幸中弹牺牲，时年25岁。

王泰吉是陕西临潼人与唐澍在黄埔军校是同期同学。王泰吉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派到国民军胡景翼办的学兵营当排长，1926年在陕军甄寿珊部任学兵营营长。他参加了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起义失败后王泰吉与党失去联系，后被捕并押解到南京关进监狱，1930年经杨虎臣保释出狱，在杨部任新兵训练处处长、骑兵团团长。1933年6月，王泰吉率骑兵团在陕西耀县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任总司令，杨声任党代表。1934年党组织派王泰吉前往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在前往途中，在淳化县通润镇被敌人逮捕，2月押往西安，3月被杀害。王泰吉遇难时才28岁。

刘志丹,他几次打入敌人内部搞兵运,想在西北找一块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此,他四处游击,艰苦转战在枪林弹雨中度日。1931年他又在南梁地区组织了一支近300人的队伍,这支队伍与陕北支队在合水灵经庙会合,组成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围剿”,刘志丹运用声东击西的奔袭战术,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刘志丹后来将部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经过努力,初步建成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25军从鄂豫皖转战来到陕北后,两军在永平镇胜利会师,9月17日将会师后的军队改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在劳山地区歼灭东北军1个师部两个团,打死敌师长和参谋长,俘敌3700多名,红15军团从此声威大振。

正当反“围剿”斗争胜利进行的紧要关头,党内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却在陕北恶性发展,在红26军、红27军内实行了肃反扩大化,一时营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敌人严刑逼供,并指名要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首领”。刘志丹被捕入狱,连同他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女儿也被扣押。刘志丹被错误地定为“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逼他交出所谓“反革命集团”。面对死亡的威胁,刘志丹始终坚贞不屈。他对狱中的同伴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

正在刘志丹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央红军来到了陕西保安。毛泽东得知刘志丹被错误关押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代表党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委员会,释放了刘志丹。刘志丹一见到周恩来,就亲切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周恩来又领着刘志丹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对刘志丹说:

“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不久，党中央任命刘志丹为红 28 军军长。

刚刚逃过“左”倾的枪口，1936 年 4 月 14 日东征时，刘志丹在晋西中阳三交镇不幸左胸中弹，当即昏迷过去。在红军战士的泣噎声中，刘志丹终于苏醒过来。他吃力地睁开眼睛，对身边的人一字一句地说：“让宋政委（宋任穷）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最后一句话，他停止了呼吸，时年 33 岁。

1943 年 4 月，志丹陵在边区党政军民各界捐赠赞助下落成。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保安县也改名志丹县。刘志丹后来被中国共产党定为 36 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家之一。

在渭华起义中，阎揆要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参谋长。他也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曾多次负伤。在解放战争中，他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协助彭德怀解放大西北。1955 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当过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曾任黄埔同学会理事、顾问等职，1994 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90 岁。

共和国元帅陈毅在中国的红色军事家中，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奇才。陈毅有两点给人印象最深：一是他最善于“死中求生，败中求胜”，是一个在困难和失败面前不低头，善于变不利为有利，智勇双全的战将；二是他文武兼备，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或是在错综复杂的十里洋场，都能表现出他的杰出才华。柳亚子在 1945 年就曾赋诗称赞陈毅“兼资文武此全才”。陈毅的传奇故事以后再慢慢道来，暂且不表。正是：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魔窟钓鱼 陈赓初闯上海滩 不幸被捕 校长暗施“连坐法”

话说 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中共党员陈赓，在刚刚参加北伐誓师大会后，忽然接到党的通知：调他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组织群众武装暴动的经验。这一消息使他兴奋得彻夜难眠。他在苏联短短的半年中，学会了驾驶汽车、摩托车，会双枪射击、劈刺、格斗、化装、照相、密码发电报等一整套秘密工作者所具备的技能。翌年 2 月，陈赓返回上海，接受党的任务，担任国民革命军第 2 方面军唐生智部唐生明的警卫团特务营营长。这个营实际上是共产党所组织和掌握的武装，担负着党中央的警卫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陈赓同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曾中生等人发起黄埔同学讨蒋委员会，并发表《讨蒋宣言》。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陈赓暗中负责警卫。并与前来参加“五大”和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太平洋劳动会议的上海纱厂女工王根英结为伉俪。7 月初，王根英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南昌起义时，陈赓与李立三负责起义总指挥部的安全警卫。起义军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时，陈赓被调任第 20 军 3 师第 6 团营长。会昌之战，他左腿三处中弹，不能行动，幸被卢冬生所救，在福建汀州的一家英国教会办的福音医院治疗。当时倾向革命的院长傅连璋为他施行了初步手术，总算保住了双腿。

1928年4月,陈赓在上海继续医治腿伤,痊愈后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负着保卫中共中央机关、搜集重要情报和进行反间谍斗争的特殊任务。陈赓任特科情报科长,化名王庸,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与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租界巡捕、黑社会的地痞、流氓周旋斗争。在复杂的环境中,25岁的陈赓勇敢机智、沉着干练,着实干了几件精彩的事。

他发展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非党员特工人员杨登瀛。这位特工奇人,自幼就在日本生活,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由于他精通日语,又是日本通,回国后很快被国民党中央要员陈立夫看中。陈立夫这时正在筹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后来与“军统”齐名的“中统”的前身,因而杨登瀛被陈立夫任命为上海特派员。杨登瀛虽然不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也不想入共产党,但他却有正义感,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官僚政客,经常与一位共产党的朋友陈养山在茶楼酒店喝酒发牢骚,反蒋心事不时有所暴露。陈养山将这一切向中央特科的陈赓作了汇报。陈赓通过陈养山,在上海霞飞路一家咖啡馆认识了杨,两人一见如故,谈话十分投机。杨登瀛表示同情共产党,愿略效绵力。陈赓指示他,除为陈立夫的调查科工作外,还要尽快地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中共派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特工人员连德生充当杨的贴身保镖,并定期提供活动经费,为杨购买私人轿车,并让中共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任其专职秘书。杨登瀛从“王先生”那里弄点共产党的情报来向陈立夫邀功,逐渐得到上司的信任,慢慢变成了国民党上海方面情报机构的能人,甚至受到蒋介石的嘉许。由于杨是破案的能手,蒋特别签发了一张委任状,上书:“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杨登瀛已进入国民党情报机构的核心领导层,许多涉嫌共产党的案子,他没有不插手的。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偕邓颖超赴苏联参加了中共“六大”,不久即来上海中央工作。1930年4月,共产党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黄第洪从莫斯科回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与黄联络。谁知黄第洪已叛变。黄秘密上书蒋介石,表示“迷途知返”,把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地点、时间以及联络号告诉了蒋介石,请速派人与他接头,企图以出卖周恩来来向蒋邀功。这件事被杨登瀛知道后,立即向陈赓作了汇报,黄第洪很快被中央特科抓获并予以处决。后来党中央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等被捕,也是通过杨登瀛的关系,被陈赓营救出来。陈立夫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一手操纵的上海特务机关,竟由陈赓等共产党人“操纵”着运转。要不是顾顺章叛变,陈赓安插在国民党特工机关的内线还会演出十分精彩的节目,让人大饱眼福。

还有一件事。那是1929年8月30日,党中央军委秘书白鑫逃叛,出卖了中共领导人彭湃、杨殷等同志,彭、杨被捕后壮烈牺牲。周恩来将严惩叛徒的任务交给了陈赓,陈赓的“红队”(又叫打狗队)撒下了天罗地网,把叛徒的一举一动掌握得一清二楚。11月11日夜,陈赓的打狗队预先埋伏在白鑫住处的里弄,严阵以待。当白鑫准备潜逃出境时,打狗队打死了保镖,枪杀了白鑫。尽管这件事反动派封锁了消息,然而,陈赓的打狗队却威震了上海滩。国民党曾以重金悬赏捉拿“王先生”,但这位“王先生”就在陈立夫的眼前,他能说会道,生性活跃,幽默机智。

1929年底,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要在上海扩建反共特务组织,他要利用共产党的叛徒,潜伏到共产党内部当他们的奸细。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找来陈赓商量,想法派中共中央特科成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入敌人特务组织的领导层去。陈赓经过精心安排,通过种种关系,终于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情报网:钱壮飞打入了国民党特务的最高领导机关,当上了徐恩

曾的机要秘书；李克农已能把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情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胡底则在南京、天津两地，以主持通讯社为名，能与陈赓及时取得联系。就这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些重要活动情报，都能及时地汇集到陈赓这里。后来，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第二次“围剿”时，很多绝密军事情报，都是经李克农送交陈赓，再由陈赓转给中共中央的。

1931年4月24日，中共地下党驻沪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随即叛变投敌，供出党中央的所有秘密，并要亲自见蒋介石，把南京、上海共产党秘密组织、共产党员名单呈献之以“赎罪”。由于打入敌特心脏的钱壮飞及时报信，中央和上海党组织才及时转移。28日，陈赓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找到杨登瀛，告诉他顾顺章已叛变，要杨尽快去外地躲一躲。杨激动地握着陈赓的手说：“王庸，你真够朋友，危难之时没有忘记我。”但杨自恃有张道藩这顶“大红伞”，能够对付顾顺章。两天后，杨被顾出卖而入狱。国民党对他恩威兼施，杨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还痛斥顾顺章诬陷好人。由于国民党未抓到任何把柄，再加上已爬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高位的张道藩的疏通，半年后，杨登瀛被保释出狱。1934年杨担任了国民党南京反省院的副院长。

地下党员宋再生（即宋启荣），经陈赓介绍，通过杨登瀛打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任第4号政治密查员。一次，有个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贪图5万元赏金，企图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此案正好撞在宋再生手上，宋一面稳住顾某，一面通知中央特科陈赓。这个叛徒还在做发财梦时，就被陈赓的打狗队镇压了。

陈赓这位传奇式的未来共和国大将，虽然学会了一些做秘密工作的本领，但有一次却被他的老师、时任国民党32军军长

的钱大钧认出,差点砸了锅。钱大钧当过黄埔军校兵器教官。东征时,他当教导2团团团长时,陈赓曾当连长,两人很熟悉。南昌起义军南下时,钱大钧曾在壬田、会昌、瑞金一线阻击叶挺、贺龙的部队,陈赓腿部负伤,差点送了命,和这位老师有密切关系。一次,陈赓奉命去天津办事,从南京下关渡江到浦口,在车站上看到列车挂了一节“花车”(即大官乘坐的公务专车),几个国民党高级军官正在上“花车”。当时陈赓虽然化装成做买卖的商人,但还是怕被认出来,于是急步跨进了车厢。开车不久,一个勤务兵走来对陈赓说:“陈先生,钱军长请你去!”陈赓答道:“我是做生意的,他认错人了。”勤务兵走后不久,又返回来:“钱军长说没认错人,还是请先生去一趟。”待勤务兵走后,陈赓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是凶还是吉,看来对勤务兵坚持说不认识怕是抗不过去了,正想将礼帽沿往下一压,凭窗往外眺望。忽然有人将陈的帽沿往上一翻,笑道:“你看我是谁?没认错人吧!”陈赓看钱教官亲自来了,只好跟着钱去了他的车厢。一进“花车”,钱大钧就指着陈赓对几个黄埔军校的同学说:“你们看,我抓了个活共产党来了。”陈赓说:“我早就不干了,现在做点小生意。”钱说:“怎么?你改邪归正了?”陈答:“谈不上改邪归正,共产党嫌我落后,不要我了。我到徐州转车,去找胡先生胡宗南。”钱大钧知道东征时陈赓冒死救过蒋介石,也不敢过分追问他的行踪。大家七嘴八舌讲了一些黄埔军校的往事,车过符离集,钱大钧还买了烧鸡请陈赓吃。车到徐州后,陈赓想摆脱钱大钧的纠缠,就告辞下了车。一想到任务紧急时,不容迟延,他又返回来,在离“花车”很远的车厢上了车。火车鸣叫驶出车站,陈赓发现那个勤务兵又跟上了他。勤务兵毕恭毕敬地说:“陈先生,我们军长再请你去一趟。”陈赓二进“花车”。钱大钧笑道:“你在我们面前捣鬼,你说不干了,谁相信?你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谁都知道整

理党务时,你在军校当队长,和蒋先云首先声明你是共产党员,要退出国民党的呀!”陈赓推脱不掉,干脆撒谎说:“现在也搞点宣传工作,没被重用,像我这样的人,若被重用,早就去带兵打仗了。”

车过济南站,陈赓打算下车,再转车去天津。钱大钧说:“别下车了,你的目的地,不是天津就是北平。”于是,陈赓与钱同车到了天津。分手时,钱大钧说:“我们不会为难你的,你是校长的救命恩人,谁敢碰呀?不过,校长很注意你的行踪,你的活动要小心些,如果让校长发现了你还在反对他,那就不好了!”果然不久,陈赓获悉钱大钧调上海任淞沪警备司令。真是“不是冤家不碰头”,陈赓派人打入钱大钧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他为搜集情报找到了一顶“保护伞”。

陈赓负责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保卫工作。那时候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云南路生黎医院二楼。当年,中共早期党员熊瑾玠、朱端绶两同志(后结为夫妻)他们以开设“福兴”字号,以经营土布生意为掩护,从事联络工作。瞿秋白、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立三等经常来这里开会办公。为掩护机关安全,开展活动,陈赓指示:“熊老板”夫妇派人另外开了几家商号、酒店和印刷厂。国民党中统对陈赓等查缉严密,一再用重金悬赏缉拿“王先生”。钱大钧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处也多方找听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所在地。由于陈赓与之攻心斗智,巧妙周旋,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前,党中央机关历时3年之久安然无恙。与此相反,中共江苏省委则连遭破坏、省委书记陈延年、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及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等数千人被捕遇害。

最使陈赓痛心的,是许多共产党员被反动派逮捕而无法营救。1931年7月在上海有恒路(今东余杭路)住所,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及工作人员杨匏安等16人被捕。一天清晨,

叛徒、特工总署驻沪特派员黄凯，偕同公共租界总巡捕房西操长罗斯，冲入杨匏安所住小阁楼，强行拘捕。杨此时患肺结核已卧床数月，骨瘦如柴，家中老母妻儿，人人面有饥色，无力与之抗争。杨被架上囚车后，小女儿拦路牵衣，泣不成声。杨被关入警备部茅山看守所，当地人称之为“鬼门关”。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熊式辉、上海市长吴铁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多次来劝降，杨匏安始终态度坚决地回答：“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又说：“杀了我一个，杀不尽千万个杨匏安。”尔后叛徒黄凯赶赴南京向陈果夫汇报，陈示意将杨暂时软禁。

为什么陈果夫心慈手软呢？原来，国共合作时期，杨匏安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秘书，陈果夫曾在杨手下工作，姑念他是上级，所以刀下留情。此事被蒋介石知道了，他认为杨匏安是中共老党员，罗绮园是中共喉舌，非但不能赦免，而且于8月下令处决。临刑前，杨匏安口吟就义诗曰：“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余生无可悲，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者番戏永别，相视莫潸然。”杨匏安的壮烈殉难，使陈赓多次向党中央申请赴苏区拿起枪来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他再不愿目睹战友的牺牲而爱莫能助。陈赓更为怒不可遏的是那些叛徒，他们“有奶便是娘”，为发财贪生而不惜牺牲别人的性命。陈赓指使“红队”严厉惩办叛徒，如企图谋杀丁玲的国民党中统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本名史济美），就是被中共中央特科的“红队”成员击毙的。陈赓在中共中央特科所做出的出色的成绩，比起他在战场上的功勋，那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这在以后还要介绍，暂且不提。

且说陈赓深入虎穴，大闹上海滩，使一批叛徒胆颤心惊，国民党也对他没有办法，只是千方百计责令大小特务严密监视缉查，总想早日将这位“王先生”缉拿归案，以稳住那些叛徒的心

罢了。

1933年3月,党中央决定满足陈赓的请求,派他赴江西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领导工作。在要离开的前一天,即3月24日,他到上海贵州路北京大戏院去看电影,不巧正跟一个原在我党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连生(此时化名张阿林,人称小白脸)坐在一起。陈赓知道他已秘密叛党,就立即从电影院出来,想甩开这个“盯梢的”。叛徒紧跟不放,陈赓转身猛地一拳把叛徒打翻在地。叛徒躺在地上吹起了哨子,四周的巡捕闻声赶来,围住陈赓,当场把他逮捕。

陈赓被关在巡捕房的西牢里,敌人用严刑逼供,用钢鞭毒打,用电刑叫他招供,但始终没有从他嘴里挤出任何有关共产党的材料。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别区法院开庭对陈赓和先后被捕的罗登贤、廖承志等人进行“审判”。宋庆龄、蔡元培邀请律师屠坤范、倪刚为陈赓辩护。在法庭上,陈赓说他从山东回来不久,正在找职业。叛徒陈连生被传到庭前作证,他说1926年曾与陈赓在共产党内共事,并说陈赓当过江西苏区红军的军长,是中共的高级干部。由于陈连生信口雌黄,拿不出半点证据,法庭判决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将陈赓等5人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4月1日,陈赓一行被囚车送到南京。由于陈赓是“要犯”,审判需要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时正大叫“先安内再攘外”,坐镇南昌指挥“围剿”中央苏区。他想亲自劝诱陈赓自首,并想通过他来影响在红军中的黄埔学生,遂命令南京当局用船押解陈赓经九江来南昌。陈赓到南昌后,被安排住在江西大旅社,既没有脚镣手铐,也没有五花大绑,而是按贵宾进住豪华的旅馆。到南昌的第5天下午,陈赓被警卫人员“护送”至南昌行营,即当时的南昌百花洲科学仪器馆见蒋介石。一见面,蒋介石说:“你是陈赓,你是陈赓,你是校长的好学生,虽然在政治上犯

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嘛!”陈赓冷冷地答道:“我根本不需要你原谅。”蒋介石在屋里走来走去,好像在思考如何调教这位不争气的调皮学生。沉默了一会儿,他对陈赓说:“你不要那样想不开,只要你过这边来,愿意带兵,可以让你随便挑选一个师。”蒋介石当然没有忘记他的救命之恩,杀了他,会落个忘恩负义的罪名;但如果不杀他,又怕他为朱毛“卖命”。想来想去,只好规劝利诱。再说,陈赓也是一个将才,蒋总是爱惜人才。陈赓冷笑着答道:“今天我落在你们手里,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对我不要抱任何幻想!”

蒋介石继续装模作样地说道:“现在国家弄得这样糟,剿匪当中死亡30多万,中国不能这样牺牲……”陈赓立即答道:“国家弄得这样糟,都应当由你自己负责。是你背叛了革命,发动了反革命内战,我们共产党人根本不负这个责任。”陈赓理直气壮,声色俱厉,简直没有把蒋当作“校长”。蒋介石听了陈赓的话,气得脸色铁青,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态度,这个态度。你应该悔过,你应该悔过!”蒋介石尊严受到侮辱,他感到十分难堪。沉默许久,正好于学忠进来,蒋介石忙对身边的侍从副官邓文仪说:“你好好劝劝他,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蒋介石临走时对陈赓说:“以后由邓文仪代表我同你谈,你先回去。”蒋介石上楼去了。

其实,早在陈赓抵达南昌的第二天,他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又是同乡的邓文仪就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带着大批贵重礼物来到陈赓住处充当说客了。蒋介石对邓文仪寄予很大希望。邓文仪也信心十足,在去会见陈赓之前,他请同窗好友贺衷寒、肖赞育几个人闲聊。贺衷寒眼睛一亮,兴奋地说:“陈赓不是也留过俄吗?叫他参加留俄同学会怎么样?这样咱们黄埔军校一期的湖南老乡又多了一员干将。”邓文仪邀请贺衷寒、肖赞育一起去劝降。因为贺衷寒当年在黄埔时就与陈赓针锋相对,意见

相左,所以他说:“你先去做第一步工作吧!先叫他回到校长身边,第二步再……”贺不想去碰钉子,推托有事不能奉陪,倒是肖赞育另有想法,他说:“看在老同学份上,咱们几个人联名向校长写信,保释他出来算啦!”贺、邓不赞成,怕校长牵怒于己,将来不好混。

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伺从副官,又兼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他决定亲自去劝陈赓,于是带了一本由他执笔写的《青年战争革命》的小册子,上门造访去了。

一见面,陈赓笑嘻嘻地说:“嗨,你还在舞文弄墨呀!”

邓文仪自称是“第一个受俄国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他于1925年10月被派往苏联留学,回国后积极反共,受到蒋介石的重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在黄埔军校当上了代理政治部主任,追杀中共党员同学不遗余力。平常他喜欢写点鼓吹法西斯的小册子,这次来南昌还编印了一本《“剿匪”文献》,受到蒋介石的青睐。邓文仪非常注意衣着整洁,他穿一身笔挺的黄呢军服,头发梳得油亮,嘴角挂着微笑说:“现在要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蒋校长如此器重你,你何不重整旗鼓,再展宏图呢?”陈赓往床上一躺,蹬掉鞋子,不耐烦地答道:“邓文仪,老话说捆绑不成夫妻,你干吗要把我往你们这边拉?我是共产党的人,死了也不进你们蒋家牌位。你走吧,我要睡了。”

邓文仪碰了一鼻子灰,不好再劝,灰溜溜退了出来。第二天他又来了,并带来一套绸缎衬衣、哗叽长衫、黑呢礼帽之类的物品。讪讪地说:“校长要见你,我领你去吧。你先洗洗澡,刮刮胡子,换上干净衣服,总得讲点礼貌吧!”

陈赓没好气地答道:“礼貌?你们把我整成这个样子,还有脸说礼貌?告诉你,我身上还有36只老白虱,走到哪里我带到

哪里。”

陈赓没有穿那身“行头”，依然坚持穿着囚衣去见蒋介石。邓文仪有“中国的戈培尔”之称，面对这位软硬不吃的同窗同乡，只好自认倒霉。邓文仪有辱使命，但他还是不适时机地打圆场，答应代表校长继续开导。

尽管招降未果，但蒋介石并没有杀陈赓的念头。这不仅因为影响太大了，就连宋庆龄那里也没法交代。陈赓被捕的第二天，宋庆龄就发表谈话向全国呼吁：“昨天被捕和引渡给国民党的五个人（其中之一为陈赓），正如所有与他们遭受同样命运的同志们一样，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因此，我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

邓文仪送陈赓回旅社后，拍拍陈赓的肩膀，说：“你还是老脾气，在校长面前不应该这样。好吧，放你回去，告诉红军中的黄埔同学，只要他们回头，校长是不会杀他们的，好不好？”陈赓说：“不行。我不明不白地回去，跟投降有何两样？”邓文仪两手一摊，洩气地说：“那我就爱莫能助了。”不久，陈赓又押回南京。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宋庆龄两次到中央军校官邸会见蒋介石，并据理力争：“陈赓在东征时是你的得意门生，当过你的侍从副官，是背着你穿过火线救你性命的人，难道你忘了吗？你不能这样忘恩负义！”蒋一脸晦气，闷着不吭声，问急了就解释道：“阿姐，不是我不放他，是他太顽固，连台阶都不给我下！”

宋庆龄又要求释放廖承志，她说：“廖仲恺是党国忠烈，就这么一根独苗，你忍心杀他，你对得起廖先生吗？”蒋也低头不语，神情十分沮丧。

陈赓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宋希濂、邓文仪、贺衷寒、宣铁吾、项传远、肖赞育等十名同学联名写了一封信，请求蒋介石释放陈

赓，并签名具保。十位同学一同到南京看望陈赓，不无担心地说：“老同学，校长看我们的面子，让你可以自由活动，但千万不能开小差！”陈赓哈哈大笑，说：“我逃走，不是害了老同学吗？”

陈赓虽然可以自由活动，也允许上街，但总有几个“卫兵”跟随他。蒋介石挨了宋庆龄一顿骂之后，虽然不敢公开杀陈赓，但又不愿意“放虎归山”，只得先软禁起来，叫他天天读书反省，悔过自新。陈赓见情况比以前宽松，伙食也不差，还不时有老同学登门拜访，便考虑同党组织联系，设法从这里逃走，不管他们那什么“联名具保”。他想，也许这是蒋介石的一个“连坐法”，叫我陈赓硬是不敢逃跑，否则，宋希濂等十位同学要吃官司。

一天，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来了一位法官，持有证明，要单独审讯陈赓。这位法官表情严肃，一阵沉默之后，法官突然竖起手掌，在掌心写了一个“麻”字。他俩的目光相通了。陈赓心里泛起一股潮涌，眼睛一亮，心想，这不是他与地下党接头的暗号吗？他疑惑地注视着法官，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

法官一本正经地对陈赓说：“麻老广派我来的。家里人要我通知你，正在给你准备吃的。你要暂时改变一下态度，不要肝火太旺……”

陈赓回到寝室，心里翻腾开了，这究竟是不是陷阱？难道有叛徒招供了暗号？法官说的麻老广，他确实认识，暗号也对。这位法官他却从不相识。

过了几天，法官又来提审陈赓。一番话之后，法官走近他身旁，低声说道：“一切就绪，三天后的晚上，你注意你脚下。”

陈赓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从一来到这里，就对周围的环境、对窗前屋后都作过一番仔细观察，对越狱的可能性，也作过认真考虑。窗外面钉着粗大的铁栅，窗口离地面足有三米多高，根本逃不出去，脚下是坚固的木纹地板，外面还日夜有人“警

卫”，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锦囊妙计，这里是插翅难飞呀！再说，我陈赓远走高飞，那十位同学怎么交代？他陷入了沉思，疑惑之中、忧愁纠缠着他，使他一连两晚夜不成眠。第三天深夜两点，陈赓实在瞌睡难熬，正想打个盹，突然床下有两声轻微的“嘎吱”声，有两块地板条脱落。陈赓警觉地翻身起床，在黑暗中，他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床下。不久，床下地板条被掀了好几块。露出井口般的一个大洞。从洞里还伸出两个竹竿头。此时陈赓不管是凶是吉，一把抓住竹竿往下滑。落地一看，他又是一惊，有两个全副武装头戴钢盔持枪的宪兵站在面前。陈赓吓懵了，那两个宪兵不容分说便把他抬起来，装进了一个大木箱，盖上盖子，用铁丝捆上，贴上了封条。木箱被抬上马达轰鸣的汽车，开出了住所。

不一会，汽车停了，陈赓感觉箱子往楼上抬，随后被重重地放在地上。有人用钳子嘎吱嘎吱地剪断铁丝，盖子一开，灯光呼地照了进来，照得陈赓眼睁不开。一个宪兵笑吟吟地把他扶了出来。原来，这一切都是由地下党安排的，于是陈赓就在这名地下党员家里住了下来。第三天晚上，地下党员给陈赓拿来一套崭新的宪兵服装请他换上，并让他戴上墨镜，从容地登上了去上海的夜车。在上海，陈赓找到党组织，很快便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

隔了一年，即1934年4月，蒋介石听说陈赓跑了，气得呼呼地传令肖赞育到办公室来。肖也是陈赓的同学同乡，他一脚跨进房门，蒋介石就指着他大声斥责，骂了一通。肖才知道是为陈赓的事。蒋厉声说：“你把那九个人找来，还有你自己，快去！”肖赞育知道闯了祸，连忙乘汽车去把邓文仪、宋希濂、宣铁吾、贺衷寒、项传远等找了来。十人立正站在蒋介石面前，一声不吭。蒋背着手，在办公室来回走着，回到座位，敲着桌子，大骂起来：“你

们有心让陈赓逃走,说得过去吗?简直混账!我信任你们,你们都联合起来给我寻开心。”蒋骂够了,十个人灰溜溜地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1936年西安事变时,宋希濂任国民党36师师长,陈赓任红1师师长,两人再次在西安重逢。宋在鸿宾楼宴请陈赓,谈及陈赓南京不辞而别的事,证明他确实是由地下党营救坐箱出狱,而宋希濂等关照南京宪兵司令部张镇放松对陈赓的监管,也起了一定作用。宋希濂与陈赓同是湖南湘乡人,一同考入黄埔,同在第一期。为救陈赓一命,挨了蒋介石一顿骂,宋也表示没有吃亏,主谋肖赞育却从此一蹶不振,蒋介石没有说他“通共”就便宜了他。肖赞育后来从政,当国民党办的《扫荡报》总社长去了,1993年死于台北。

陈赓再次到南昌。那是1949年6月6日,他以二野4兵团司令员的身份,来到百花洲37师的司令部。他意味深长地说:“回忆我三次入南昌,或为亡命客,或为阶下囚,使我无立足之地。而这些都反映了我党我军之艰苦奋斗和革命道路之曲折,崎岖,没有前三次,也就不会有今日人民之胜利吗!”陈赓挥师回南昌以后还要提到,暂且不表。正是:出生入死党国忠臣,叱咤风云一代名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中原血战 蒋冯阎桂争霸主 分化瓦解 八大金刚显神通

话说蒋介石自北平祭灵回京时，在蚌埠稍事休息，便召集津浦沿线第1集团军黄埔军校毕业、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蒋派员发给每人一张纸条，然后蒋说：“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若认为打倒的，即在纸条上写‘打倒了’三个字；若认为尚未打倒的，可在纸上写‘未打倒’三个字。”听后，这些黄埔军官一时摸不清校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有的军官写打倒了，有的写未打倒。蒋介石看后继续训话道：“旧的军阀固然打倒了，然而新的军阀又产生了。要完成国民革命，非把新军阀打倒不可，打倒了新军阀，你们才有出路！”

“你说蒋介石讲的这新军阀是指谁呢？”一些黄埔军官叽叽喳喳地悄声谈论着。蒋介石对在坐的何应钦、刘峙、陈诚、顾祝同等心腹将领们说：“当今中国，仍不平静，虽然北伐成功了，然而各地方势力派的心还未统一。东北张汉卿（张学良）、山西阎百川（阎锡山）、河南冯焕章（冯玉祥）、武汉李德邻（李宗仁）、四川刘自乾（刘文辉）、广东李任潮（李济深）等势力人物，他们拥兵自重，不听中央编遣，各位黄埔同学仍须努力，我们要用武力或其他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打倒新军阀，统一全中国。”

蒋介石对黄埔军官吐出了肺腑之言。他希望追随他的同乡、同学、同事、同族、同门众志成城，共同对付新军阀的挑战；尤

其对利用师生关系建立起来的黄埔军人嫡系，他更加寄予厚望。在与新军阀的斗争中，他珍惜黄埔嫡系这起家的本钱，他不会轻易让黄埔嫡系部队上前线拼命，他想利用各派势力互相残杀，或挑拨离间，或用“银弹”或用“肉弹”征服对方，然后派黄埔嫡系去接收地盘，巩固自己的势力。

老奸巨滑的阎老西阎锡山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阴谋，迟迟不肯到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内务部长，仅保荐赵戴文代行职权，冯玉祥则托辞由鹿钟麟代行军政部长职务，李宗仁则返回武汉，李济深也避而不就参谋总长之职，由此致使蒋介石想利用组织国民政府的机会实现他的“削藩策”再次落空。各实力派的首领都不肯到南京就职，主要是怕蒋介石用“调虎离山计”来个“杯酒释兵权”。1929年元旦，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国民党中央执委等60余人参加会议，全体与会者先对中山遗像作忠诚宣誓。誓词曰：

敬以至诚，宣誓于总理灵前：委员等遵奉总理遗教，实行裁兵救国。对于本党之一切决议，竭诚奉行，不敢私丝毫偏私、假借、欺饰、中辍之弊。如有违犯，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谨誓。

会议开了20多天，最后制定了一个《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各部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级军官仍照旧工作，静候委任；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就这样，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被剥夺了。而蒋是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全国分为南京、武汉、开封、太原、沈阳五个编遣区，每个编遣区将军队缩编为11个师，另外成立一个中央

编遣区,也编 11 个师。从表面上看似乎各派之间一律平等,实际上蒋系部队多一个编遣区,可编为 22 个师,超过其他编遣区一倍,另外还有海空军和宪兵。这样,阎、冯、桂系就明显地吃亏了。蒋介石还掌握了最后一张王牌,即用重金收买张学良,且拜把兄弟,以使用武力压迫阎、冯、桂系新军阀就范。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以蒋、桂之间的战争拉开序幕的。1929 年 3 月,蒋介石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向白崇禧、李宗仁开刀。1927 年年末,蒋被桂系“逼宫”下野,他自然怨恨非浅。在给何应钦的一封信中,他愤愤不平地写道:“桂系野心甚炽,不惜破坏党国团结,在各派系间进行挑拨离间,妄图收渔人之利。‘庆父不去,鲁难未已’革命必难成功。”蒋迫不及待地实施消灭桂系的计划,他看准了率部驻守于平津一带白崇禧部的弱点,决定先打白的主意。

白崇禧所指挥的第 12 路军李品仙部,全是 1927 年西征唐生智时收编来的湘军。在改编时,白崇禧基本上没有触动唐生智的老部下,绝大部分军官继续担任原职,这就给蒋介石“立唐倒白”提供了机会。于是蒋派人找到唐生智旧日将领、曾任第 36 军军长的刘兴(字铁夫),蒋开门见山地对刘说:“我要你到北方去,把白崇禧指挥的军队夺过来。”蒋还补充道:“如果能抓到白崇禧,就把他杀了。”刘兴自然领命而去。同时,蒋又抬出唐生智。唐被李宗仁赶下台亡命日本,对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切齿之恨,如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在眼前,唐氏岂能错过。他与刘兴密谋,策动 51 师、53 师郝梦龄、乔明礼等六个旅长将白崇禧绑送南京邀功。“小诸葛”到底不愧为“小诸葛”,白崇禧,他闻讯部下有哗变之风,连夜出走北平,逃至唐山廖磊住的开平寓所。唐生智一到天津,他的旧部立即贴出“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打倒桂系白崇禧”的标语,蒋不费一枪一弹,就赶走了平津桂系

主将白崇禧。蒋扶唐倒白，等于砍去了桂系的一只手臂。

再说武汉桂系李宗仁，为了打通两湖至两广的通道，1929年2月22日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18师师长职务，同时派叶琪的第9师、夏威的第7军向长沙进兵，试图与广东的李济深结成联盟。李济深当过黄埔军校副校长兼教授部主任，与蒋在黄埔时就貌合神离。而如今万一李济深与李宗仁密切配合，则蒋要消灭桂系是难以成功的。于是，蒋没有急于公开声明讨伐李宗仁，而是首先派了四位国民党元老把李济深骗到南京软禁起来。李济深被囚于汤山俱乐部，蒋又派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两人到广东活动，说服粤将领服从中央，并以银元开路。实行这种策略，从而把桂系孤立了起来。

1928年3月29日，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到九江指挥作战，讨伐桂系。何应钦任总参谋长，共出动3个军：刘峙的第1军、朱绍良的第2军和朱培德的第3军，并有14艘军舰配合西进，目标直指武汉。

李宗仁从上海返回广西，白崇禧从塘沽逃亡广西途中，黄绍竑坐镇广西，致使武汉军中无主帅，武汉前线总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1师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蒋介石侦悉桂系内部将领闹不和，便以重金恭请隐居在香港的俞作柏赴武汉向李明瑞策反。俞作柏是李明瑞的表哥，广西北流人，曾为李宗仁部旅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不肯与李、白合流，乃去香港当了寓公。俞作柏领命前往武汉与李明瑞密晤，并且赏以重金，两人作出了阵前倒戈的决定。因此，当3月30日晚蒋介石在九江下达总攻击令时，只不过张扬声势罢了，前线并无接触，而桂系内部的裂变就已悄然揭开了序幕。另一方面蒋介石手令“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4军军长，拨发该部给养70万元”，应允事成之后，“湘省一切要请芸樵（何键字）负责”。何键立即发电表示“竭诚拥护中

央”。就这样,蒋、桂未经交战,李宗仁、白崇禧及败下阵来的胡宗泽、陶钧、夏威带领残部退至鄂西,想去联络四川军阀杨森。蒋介石岂容他们在鄂西立足,于是派兵追击,同时发出招抚桂系的《告桂系军队书》,书称:“官兵如带兵归来,各赏洋五元;官兵如为徒手来归的一律收容;如能杀了你叛逆长官来归的,必得重赏官级。杀了你连排长,赏银百元升官一级;杀了团营长赏银五百元,升二级;杀了师长总指挥来归的,赏银五千元,升三级。”胡、陶、夏三人在蒋介石的赏官级与金钱双管齐下的诱惑面前,同时宣布下野,部队听候改编,至此,桂系的第4集团军全部瓦解。6月,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由广西边陲的龙州败逃越南,蒋桂战争以蒋胜李败而告结束。

打败桂系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阎锡山、冯玉祥感到惊恐。蒋介石倒桂得手后,他极力拉拢阎锡山,加紧攻击冯玉祥,采用的仍是各个击破的策略。

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三方合作,联合反蒋。由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以刘骥为总参谋长,下设8个方面军,分别以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石友三、张学良、刘文辉、何键、樊钟秀为总司令。张学良采取观望态度,并未就职。四川的刘文辉仅是内定,并没有出兵。吴稚晖从南京发电报,劝冯摒弃干戈,以艰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成功必不在禹下。冯玉祥立即亲拟复电:“顷接先生元电,回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

这个电报虽以游戏笔墨出之,却表明了冯玉祥与他这位拜

把老弟蒋介石的彻底决裂、以及毫不妥协的态度。吴稚晖将冯电文呈送蒋介石后,气得蒋介石七窍生烟。蒋决心与冯拼个你死我活。蒋一方面使用黄埔嫡系将领刘峙、顾祝同、陈继承、蒋鼎文、陈诚、张治中、钱大钧、何应钦这些当年在黄埔的“八大金刚”,另一方面,又调用熊式辉、王均、杨胜治、卫立煌、叶开鑫、秦庆霖、张砺生、冯铁裴等北伐中归附的精锐部队。双方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以陇海、平汉、津浦三条铁路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的混战。由于主战场是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等省,史称“中原大战”。

冯玉祥的二方面军倾 30 万大军分六路从陕西进军河南,主要沿陇海路作战。阎锡山的三方面军总兵力 20 万,分别投入津浦与陇海战场齐头并进。石友三率 10 万之众攻打山东。在南方的桂系与张发奎部共兵力 3 万,主攻湖南。反蒋联合阵线总共集中了 70 万大军,作战目标皆指向南京。

蒋介石投入兵力约为 60 万,其中黄埔嫡系与投靠他的杂牌军各半。反蒋派在兵力上占优势,但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只是兵力。蒋介石派何应钦率广东的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的何键部,以较为优势的兵力与南方的桂系、张发奎部作战,想迅速地解决南方之敌,然后再集中兵力对付冯、阎。战争初期,双方打得难解难分,处于胶着状态,其间虽互有胜负,但蒋军却显被动,南方的桂系倒一度攻下岳阳,蒋军只得全部撤退到贺胜桥以北,导致武汉吃紧。冯玉祥将西北军过早地东移,停止继续南下武汉,从而贻误了战机。陈济棠的粤军从南面断了桂、张军的归路,占领衡阳,迫使桂军南撤,从此桂军一蹶不振。

蒋介石取得了对桂、张作战胜利之后,集中兵力与冯玉祥、阎锡山作战。这时蒋看出阎、冯之间的矛盾已明显地暴露出来:冯军奋力苦战,晋军却总想保存实力。由于双方配合不好,互不

团结,加上阎锡山的部队官兵都抽鸦片烟,部队的战斗力很弱。冯玉祥西北军的将领虽然强悍骁勇,但在冯的封建家长制之压迫下,官兵经常处于痛苦不堪之中。中原大战不久,先是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自由行动,不听冯调遣;接着西北军嫡系吉鸿昌、梁冠英、葛运隆、孙连仲等部又相继投蒋;最后,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等由张学良改编。在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西北军,土崩瓦解。1930年9月18日,被蒋介石用“糖衣炮弹”打中的张学良突然通电拥蒋,19日奉军人关,以调停为名占领平津。11月,阎锡山、冯玉祥在众叛亲离的处境中,不得不联名发出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闻讯后,蒋介石则逼阎、冯必须出洋,并发布了阎、冯的通缉令。因而阎被迫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住;冯则由大同北上,秘密转入晋西,到他的老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隐居;李宗仁退回广西。一场历时7个月之久,双方动用兵力总共100多万,死伤30余万的中原大战,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李宗仁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此次我们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倒蒋失败的重大关键,在于张学良被利诱人关。先是,当蒋、冯、阎三军在中原剑拔弩张之时,三方面都派人向张学良游说。阎、冯方面仅给予张氏以‘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虚衔,劝其袖手旁观。蒋先生方面据说,除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头衔外,还有河北、山西等省地盘,及现金六百万元的实际利益。张接受了,遂率兵入关勤王。”

蒋和阎、冯本来势均力敌,张学良入关,自然举足轻重。东北军既占领平津,阎、冯两军斗志顿失,遂一败涂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蒋介石之所以能独霸天下,除了他的黄埔嫡系能攻善守外,张学良入关实居首功。蒋介石的胜利,实际上是他“伐交”、“伐谋”的胜利,是“银洋”的胜利。

且说中原大战中,蒋介石的黄埔“八大金刚”为他出力不小。

何应钦如何投靠蒋介石,如何在黄埔任总教官起家之事前已提及,不再表叙。单说 1930 年 5 月,中原大战爆发,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参谋长兼武汉行营主任,竭力替蒋介石镇慑后方。他指挥湘、鄂、赣、粤各省讨逆军对桂系军队作战,在劳神苦思之后,终于想出了“空城计”的办法,近而效法诸葛孔明,冒险御敌。他在李宗仁、白崇禧的军队猛扑湘境,占领长沙,直逼武汉的紧急关头,很快写信一封,派参谋长贺国光飞抵湖南,令何键部不退武汉,反向湘西常德方向移动。此着之妙:第一,使桂军不能尾随溃败的湘军,乘胜长追,免遭引刃自杀之险,因为此时武汉兵力空虚,而溃军兵败如山倒,非优势兵力难以挽回败局;第二,迷惑了敌人,争取到时时间调遣军队,湘军不退武汉而走湘西,这样就使对方怀疑两湖交界之处必有重兵布阵,而不敢轻易深入;第三,在于湘军一经移至侧面,避免桂军攻击,在稍加整顿后,便可乘机收复长沙,由失败逃窜一变而为伺机进取,从而使李宗仁、白崇禧不敢冒然追击,并处于进退维谷之境地。何应钦用此“空城计”骗了“小诸葛”白崇禧,接着他又调蒋光鼐、蔡廷锴两师攻占耒阳,命李蕴珩掩蔽于衡阳一线,以引诱敌之来袭。桂军决计回师耒阳,在衡阳中蒋埋伏,桂军惨败,不可收拾。在衡阳战役击溃桂军后,何应钦率师增援津浦线作战,占济南、取德州,一鼓作气,乘胜而进。1930 年 10 月,中原大战已近尾声,何应钦被调往郑州任行营主任,主持前方军事和西北善后事宜。蒋介石见何应钦战功卓著,当年“逼宫”之恨渐渐消除,毕竟何是黄埔出身,他们相互配合,以求更大的发展。

再说陈诚。中原大战爆发时,由他组建的 11 师已扩编成 3 个旅、9 个团为建制的甲种师,从排长到旅长,几乎是由清一色的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担任。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霍揆彰、黄维、肖乾、李树森、夏楚中、彭善几乎都是 11 师的骨干。1930 年

5月,陈诚奉命率11师经徐州沿陇海路西进,在马牧集击溃敌一个师,随即进抵商丘。当时蒋介石乘坐装甲列车停在商丘坐镇指挥,陈诚有警卫总司令的任务,责任重大。阎锡山派杨效欧部攻商丘,陈诚迎战,杨节节败退,11师进逼宁陵。宁陵守将刘茂恩与陈诚同在保定军官学校上过学,有同窗之谊。陈致书叙旧,劝其早识时务,刘遂开城门投蒋。11师继续向杞县、兰封推进,与战斗力较强的冯玉祥部开展了逐村逐巷的争夺战。时冯军顽强攻击,弹如雨倾,伴以大刀冲锋,杀喊之声不绝于耳。面对冯军,蒋军其他部队大都闻风丧胆,抱头鼠窜,惟独陈诚的11师尚能与之对垒。陈诚持枪在阵地上严督部下死战,不准放弃一寸阵地。61团团团长刘天铎是他的顶头上司刘峙的侄儿,因丢失归德阵地无力夺回,陈诚不顾丢乌纱帽的危险,也不听手下将领、亲信的苦苦哀求,令军法处按律正法。部下见陈诚铁面无私,不讲情面,在作战时都不敢玩忽职守,而是拼死向前。7月,阎锡山从津浦路南下,占领济南、泰安,围攻曲阜,徐州危在旦夕,南京受到威胁。蒋介石连夜从陇海线调出11师,驰援曲阜。陈诚下令官兵不准设营就宿,日夜兼程前进。为鼓舞士气,陈诚亦随军步行。全师以每天120华里的速度赶到兖州,即与19路军联合向曲阜破围,晋军经不住蒋军内处夹攻,全线溃退。蒋介石闻曲阜大捷,喜得眉飞色舞,称赞11师勇敢神速,出奇制胜。因而陈诚一举成名,成为风云一时的名将。8月,调陈诚的11师前往平汉线攻打郑州,蒋宣布谁先入城赏大洋30万元。陈诚率部突进郑州,抢了头功。事先他已拟好报捷电报,并派卫士随先遣部队前进,以便占领郑州后从速回报,立刻拍电报捷。10月6日,所部61团在二里岗击溃冯军后跑步入城,陈诚闻报即以十万火急电报向蒋告捷,蒋赏洋30万兑现。事实上,上官云相的74师已先于11师占领了郑州火车站,却忙于抢劫财物辎

重,忘了报功。所以陈诚在领了赏洋后,表示 11 师首先占领郑州是友军协助之功,不敢独吞,又将赏洋一半分给了 74 师。中原大战中陈诚立下赫赫战功,蒋介石赞誉 11 师为“马牧集开战守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由此陈诚擢升为 18 军军长,与顾祝同、蒋鼎文等平起平坐,成为后起的少壮派军人领袖。陈诚这年 32 岁,少年得志,统率大军。由于他靠 11 师与 18 军起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土木系”军事集团。后来,18 军成为国民党军队中五大王牌主力之一,是蒋介石政权的柱石。

1931 年 2 月,陈诚带领 18 军进入江西准备“剿共”。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拉拢陈诚,让宋美龄出面,介绍其干女儿谭祥与陈诚成婚。谭祥是湖南辛亥革命元老谭延闿的三女儿,比宋美龄小 6 岁,是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天生丽质,明眸皓齿,肤白胜雪,再加上名门出身,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宠爱。陈诚与谭祥成婚,真乃“英雄配美人”,天生一对。陈诚与原配夫人吴舜莲以“生不能同衾,死必须同穴”为条件离婚离婚后吴乃住浙江青田陈诚老家,服侍公婆。1931 年底,陈诚由蒋介石、宋美龄主婚,在上海与谭祥成亲。从此,陈诚与蒋介石又多了一层翁婿关系,“女婿是半子”,谭祥与陈诚的婚姻,更为陈诚的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有人说,陈诚娶到一架“升官梯”,买了一顶“保护伞”,自然比同乡关系,黄埔关系更加密切。从此陈诚仕途坦荡,平步青云,一登龙门,身价十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陈诚的官场沉浮暂且不提,以后当作交代。

再说“八大金刚”之一的“福将”刘峙。刘峙字经扶,小名蠢子,别号天岳,1892 年 6 月 30 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一个农民家庭,22 岁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工期步科,毕业后分配到开平巡防营。护国运动后,他南下广东,参加了护国军,历任连、营长。1921 年初,刘峙被调到粤军总司令部任少校副官,从此结识了当时任粤

军第2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黄埔军校创办后,蒋介石聘请刘峙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刘峙在中原大战中任蒋介石讨逆军第2军团总指挥,担任陇海线作战主力,陈诚亦归刘峙指挥。刘峙的对手是阎锡山、冯玉祥联军的孙殿英、万选才,这两部人马都熟悉地形、善打游击战。孙、万二人利用豫东有利地形,避开刘峙锐势,侧击其两翼。经过激战,刘峙部伤亡逾万,只得请示后撤。待查明敌情后,刘峙率部在飞机轰炸和炮火支援下,发起攻击,先后克归德等重地。6月,刘峙从杞县、太康间进军,相继克陈留、通许,威胁河南省会开封。冯玉祥识破蒋介石的战略意图,便在刘峙前面摆了一个口袋,诱他上钩。正当刘峙庆幸用兵顺利时,突然被冯军孙良诚、吉鸿昌、庞炳勋、孙连仲、张自忠等部包围。多亏上官云相和张治中等拼死相救,刘峙才突围逃命,免受灭顶之灾。7月,战线东移至津浦线,刘峙又以津浦线总指挥的身份出现在鲁南。他命夏斗寅、蒋光鼐北进攻下济南。津浦路战事稍息,陇海路线火又起,冯玉祥配合阎锡山于8月分7路向徐州扑来,蒋以重兵死守,冯阎啃咬不动,两军遂成对峙状态。此时,蒋密谋攻下郑州、巩县、洛阳等地,以切断冯的后路,动摇其军心,最后歼灭之。于是便令刘峙率部星夜兼程转赴平汉线担任主攻。刘峙信心十足,很快攻克新郑、郑州,直指潼关。刘峙猛打快攻,机动灵活,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战后即任命他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开封行营主任。这年他才38岁,不仅荣获“悍将”的美名,也是“八大金刚”中最早成为封疆大吏的一员。

刘峙对蒋唯命是从,忠诚不二。在中原大战中虽然也曾有过辉煌的战绩,但身上却不见有多少虎气。论才干,他平庸无奇,论魄力,他迟疑逡巡,只是靠着忠心效蒋,才得以平步青云,跻身于“八大金刚”之列。人们称刘峙在北伐战争中是“福将”,中原大战中是“悍将”,抗日战争中是“逃将”,解放战争中是“败

将”。至于刘峙为何称“逃将”“败将”，在此不表，以后当专门提及。

再说一说顾祝同。他的出身前已提过，不再赘述。此人在中原大战中任第2师师长，担任讨伐阎、冯的主攻。他突然发起猛烈攻势，一举占领归德，迫使守军万殿尊、石振青两个师投降，并乘胜急进，攻下兰封。但在中原大战中，他做了一件亏心事，至今犹被人唾骂。

他的第2师在固守商丘时，因战场工事被大雨冲毁，部队只好撤出阵地。商丘、民权乃蒋介石指挥中心，他坐在装甲列车上调兵遣将，全靠周围部队保卫。蒋介石听说顾祝同的部队撤出阵地，气得两眼冒金星。蒋当面问顾祝同：“谁先撤出阵地的？”顾祝同回答说：“第8团团长赵强华最先撤离的。”蒋说：“立即枪毙！”顾祝同明知全师都撤离了阵地，竟把责任推到赵强华一人身上。这实乃帅才之耻辱。既然不敢为部下承担责任，又有什么资格去领导别人为他拼命！赵强华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字东屏，广东儋县（今海南省）人，作战勇敢，为人正派。大雨滂沱，前线战壕进水，他为了爱护官兵身体，随友军同时暂撤，不想竟成了死罪。顾祝同不敢辱命，又不敢面见赵强华，只得命师部副官处办了一桌酒席，请赵团长赴宴。赵问：“为啥这样客气？准备这样好的酒席为什么？”副官处长说：“咱们是老同事，应该。”这时赵强华才感到情况有些不对头：师长为何不来？副官处为何准备酒席？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于是，赵强华又问副官处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该处长不好告知真实情况，最后才慢吞吞地说：“你给家中写封信吧！”赵强华这才意识到随友军撤出阵地竟会招来的杀头之罪。然而这冤何处去伸？于是他强忍愤怒，马上说：“我革命成功啦！”立即给家人写了一封绝命书。为了推诿责任，顾祝同就这样不惜嫁祸于人，让赵强华当了替罪

羊。后来黄埔同学知道真相后,都不愿在他麾下供职,知道顾某乃小人矣!顾祝同后来擢升为第1军军长,但刘峙当上了河南省主席。他自诩高刘一头,得此安排,事出意料,心中老大不快。蒋发觉顾有情绪,调他当警卫军军长,成为蒋的御前统领,但顾认为仅属平调,不屑一顾。后来蒋为了一碗水端平,委任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他这才逐开笑颜。

在中原大战中,只有张治中讨了个没趣。他本是南京黄埔军校教育长,在南京教好学生,责任就算尽到了,但他还兼任教导2师师长,为了与教导1师冯轶裴争功,几次打电话给商丘车站总司令部,请求调该师到前方参加战斗。蒋允其请后,张治中便率教导2师兼程前来民权县参加作战。恰巧遇到冯玉祥亲临前线指挥,冯军攻势猛烈,张治中教导2师首当其冲,刚上阵就全部被击溃。张治中来到专车上向总司令报告作战情况,当时邵力子和几位黄埔四期搞策反的同学在座。蒋当面质问张治中:“你还有多少官兵?伤亡多少官兵?还剩下多少官兵?”张治中一时答不出来,当时在座的黄埔同学真替张治中捏了一把汗。蒋面斥张说:“不叫你师来前方,你打电报非要来前方不可,到现在你连收容部队都不会,你赶快回南京去。”张治中没有顾祝同那两下子,他不会倭罪于人,只好乖乖地打道回府。在事后,他深悔不该来河南参战。这以后,张治中悉心办黄埔,不愿打仗,便落了个“和平将军”的美名。

黄埔军校“八大金刚”之一的蒋鼎文,字铭三,1895年生于浙江诸暨,浙江陆学讲学堂毕业,在黄埔军校时担任过区队长和教官。东征在棉湖之役中,蒋鼎文的勤务兵从乱尸堆里找到他。当时以为他已阵亡,但一摸,却发现鼻息尚存。蒋介石犒赏5000元给他养伤,并在治伤期间升他为第1军1师1团中校副团长。蒋鼎文嗜赌如命,而且赌技高超,赌场中赢多输少,一般

官兵难以与其为伍，够得上与他同桌赌钱的，只有他手下的几个高级幕僚。中原大战结束之际，诸将领兴高采烈，他设下牌桌，与顾祝同等将领大赌了一场。但战场上的这位“飞将军”在赌场上并没有带来运气。一夜赌下来，蒋鼎文将全师官兵3个月的薪饷输得精光。第二天，军需处长汪奇柏向蒋鼎文报告需要发薪饷，但款项无着落。最后，蒋鼎文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坦白承认输光了全师薪饷。蒋介石二话不说，命他向顾祝同等讨回输掉的钱。在大骂蒋鼎文一顿后，蒋给了他一张5万元的支票，发给官兵薪饷，这件事才算了结。蒋鼎文任第9师师长期间，奔波于平汉、津浦、陇海各线，作战时出没无常，迅速敏捷，被人誉为“飞将军”。蒋鼎文在中原大战中南征北战，哪里战局紧张，就出现在哪里，为蒋介石获胜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蒋介石称他为“陇海线上一奇兵”，蒋鼎文效忠蒋介石，而蒋介石则对部下的吃喝嫖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追究。蒋鼎文后来成为“剿共”干将，血染瑞金，西安事变，舍命救主，那是后话。

钱大钧在中原大战时奉命赴日本参观，陈继承随刘峙转战中原。这两位“金刚”没有特殊表现，在此从略不提。

阎、冯、桂、蒋中原混战终以蒋胜而告终。后人有一诗曰：“当年诸葛烧‘上方’，司马雨中得安详；今日天公重抖擞，缘为蒋氏当称王。”阎、冯仰天叹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从1929年1月至1930年10月，他依靠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八大金刚”为统帅，接连战胜对手，实现了武力统一。自认为“此次讨逆战事后，深信本党统一中国之局势已经形成，叛党乱国之徒，今后决无能再起”。但是，蒋介石的预测并未实现，全国大大小小的15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就像15把尖刀刺在他的心脏之上。正是：仰天叹问世间事，争权夺势几时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龙岗伏击 红军活捉张辉瓒 利用亲情 康泽诱降黄公略

话说蒋介石扫清各路新军阀后，实现了武力统一全中国。他此时踌躇满志，自认为“此次讨逆战事后，深信本党统一中国之局势已经形成，叛党乱国之徒，今后决无能再起”。他当务之急，主要实行两项政治措施：一是“肃清共党”，要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盘踞的中央苏区实行“全面清剿”；二是召开国民会议，尽快足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众所周知，工农武装之所以能在我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在短短的三年中，全国建立了大小 15 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 13 个军，兵力超过了 10 万人。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近在咫尺，随时都在威胁着他的统治。因此，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他立即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的时光。

1930 年 10 月 10 日，蒋介石为纪念双十节发表了《告父老文》，提出了“肃清匪共”等五项措施。10 月 23 日，他将黄埔嫡系将领何应钦、陈诚、顾祝同、蒋鼎文、胡宗南等召集到南京，秘密部署了“第一次围剿”的计划。尔后他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偕夫人宋美龄赴上海、奉化访友省亲，祭祖消遣，俨然已是主宰九

洲的“中华天子”了。

10月28日,鲁涤平^①被任命为第9路军总指挥。11月2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7个师又1个旅编成3路纵队,限五天内推进到袁水流域。然后他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1方面军决战。

12月7日,蒋介石抵达南昌,督率“剿共”。在“剿共会议”上,特悬赏5万元缉拿红军统帅“朱、毛、彭、黄”,同时又颁布《剿匪赏罚令》。蒋介石纠集了10万大军,命张辉瓒^②为前敌总指挥,进攻中央苏区。在经如此一番布置之后,他便带着吴稚晖、周佛海、邵力子、陈布雷等去游庐山,于12月26日才返回南京。

当时中央苏区红军约4万人,集中在宁都县的黄坡、小布、龙岗一带,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面对强敌人侵,毛泽东领导下的总前委采取了“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歼敌于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这场战斗,毛泽东在黄坡会议上讲了《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12月25日,又在小布召开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
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
中歼敌人。

① 鲁涤平(1886~1935)湖南宁乡人,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第9路军总指挥,湖南、江西省主席。

② 张辉瓒(1884~1931),湖南长沙人。留学日本、德国,曾任国民党18师师长、代军长。

两天后,红1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小布地区设伏,等待敌谭道源的第50师进入伏击圈。由于谭怕孤军深入而未入瓮,因而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等待时机。夜里,毛泽东、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

12月28日,鲁涤平命令所属部队向龙冈挺进。张辉瓒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德国考察过军事,能说会道,是湘军中的一位悍将。他骄横不可一世,毫不把红军放在眼里,哪晓得他的对手大部分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战将。红3军军长黄公略是黄埔军校高教班毕业生,原名汉魂,湖南湘乡人,与陈赓、宋希濂是老乡。真是冤家路窄,彭德怀、黄公略发动平江起义时,就是这个张辉瓒带领他的18师,镇压了起义,逼得黄公略上了井冈山。

张辉瓒率领全师13000多人,浩浩荡荡开进了龙冈伏击地区。12月30日凌晨,当时龙冈的崇山峻岭淹没在细雨濛濛的大雾中,红3军军长黄公略等了一夜。穿过晨雾,他隐隐约约看到敌军52旅的尖兵连进入了表湖以东的大拱桥,而这里正是伏击圈内。突然枪声炮声铺天盖地响彻云霄,红3军7师首先开火。在敌52旅的尖兵连倒下一大片的情况下,52旅旅长戴岳急忙向张辉瓒报告敌情。张辉瓒说:“黄公略,搞什么名堂,雕虫小技,能敌过我堂堂铁军师?”他命令戴岳的大部队继续前进,向红军阵地发起进攻。

黄公略沉着应战,参谋长周子昆命令7师、8师、9师师长陈伯钧、刘畴西、徐彦刚按既定方针布好阵势,三面围攻。

陈伯钧、刘畴西、徐彦刚三名战将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除刘畴西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大师兄外,陈伯钧、徐彦刚都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小师弟。他们南征北战,既懂军事理论,又有

实战经验，面对这位日本士官生张辉瓒，心里非常镇静，认为张除了枪炮精良一点外，别的都不在话下，更何况整个军事部署，有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总指挥朱德、参谋长朱云卿负责呢！另外又有红4军军长林彪、参谋长陈奇活、10师师长王良、11师政委罗瑞卿、红12军军长罗炳辉积极配合，仗是一定能打胜的。在井冈山上，林彪、黄公略、伍中豪被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可惜伍中豪在两个月前，当途经安福县时，在亮家山突围中牺牲。朱云卿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林彪是黄埔四期毕业生，他23岁就升任红4军军长，是毛泽东眼中的“娃娃”。陈奇涵曾任黄埔军校少校中队长，当年退出国民党，蒋介石一直没有忘记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蒋特地从南京写信给陈奇涵，邀他担任侍从室主任。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引诱，陈奇涵却以身体有病为由而拒绝。王良、罗瑞卿都是黄埔军校六期的学生，他们几乎都参加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是红军中赤黄埔系的干将。面对这样一批赤黄埔学生，张辉瓒还蒙在鼓里，他以为朱、毛红军都是些泥脚杆子赤卫队，没想到在这深山老林里还有藏龙卧虎。俗话说“骄兵必败”。他命令部队强行通过，百余挺机关枪、迫击炮向四面的红军阵地拼命射击，企图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前攻击。

红3军在黄公略军长的率领下，顽强地坚守着阵地，以8师和9师向敌侧翼攻击，给敌人以反击。50旅旅长戴岳见自己的部队前进受阻，急向张辉瓒请求增援，张辉瓒此时才如梦初醒，顿觉事态的严重性，急忙派一个团的兵力去增援，但被红军打了回去，死伤过半。张辉瓒见势不妙，命令王俊捷的第53旅抢占龙冈西南的万功山，企图掩护师部向东固方向退却。可是已经晚了，红12军罗炳辉已从表湖赶到了万功山的背后，抢先占领了山头。下午3时，红3军和红4军的大部分兵力，分别从龙冈

西北、东北两个方向以排山倒海之势包抄过来，将敌人四面合围，张辉瓒已完全被锁在“口袋”里。红军的包围圈在不断地紧缩，敌军阵地上乱作一团。张辉瓒在慌忙中命令留守在东固的朱耀华旅增援，又电告鲁涤平，督促公秉藩从右侧向龙冈回援。但是，他们相距太远，一切解救的办法都无济于事了。下午4时，红军总部发出了全歼敌人的总攻信号。刹那间，几百支冲锋号一起吹响，嘹亮的军号声震撼着山谷，使敌人闻声丧胆。万功山从一方面挡住了敌人的去路，但另一方面也让敌人有了逃命藏身的地方。但由于黄公略、林彪、罗炳辉三军紧缩包围圈，敌人无处藏身，因此只好缴枪投降。战斗至黄昏，张辉瓒师两个旅9000多官兵，有一分战死，二分带伤，七分被俘。只有张辉瓒一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红军总部急派部队搜山，在丛林中只搜出一件狐皮大衣，十分华贵。在大衣反面，有一面小牌，上书“张辉瓒”三字。料张氏定在附近，于是又仔细再搜，终于在一狭谷的洞中搜出了张辉瓒。张肥头大耳，裹一套士兵服，开始他不承认，后来只好承认自己就是张辉瓒。梁兴初派战士把张辉瓒押往红军总部。

“捉住了张辉瓒！”消息传遍了红三军。

警卫员报告时，毛泽东正在睡觉。警卫员又大声说：“毛委员，仗打完了，黄军长活捉了张辉瓒。”毛泽东翻身起床，说：“快！带我去看看！”

黄公略随毛泽东一起来到俘虏营。张辉瓒见毛后，马上立正敬礼，恭恭敬敬地说：“润芝兄、汉魂兄（黄公略字），您俩好。请给我一条贱命，要什么条件都可以。”

黄公略讥讽地说：“怎么今天变得这么客气？斯文儒雅，宛如一大学者。”原来他们都是湖南同乡，当年曾打过交道。毛泽东笑着问了一番张辉瓒军败后的感想，然后又问道：“闻说将军

阁下扬言一月之内消灭江西红军，捉朱、毛剃头过年，可有此说？”张辉瓒低头喃喃道：“败军之将，惭愧惭愧！”

红军这一仗，缴获敌人大批武器装备，补充了自己。这里还要插一言，在龙冈战役取胜后，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净、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王净原名吴人鉴，江苏武进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曾是先父吴起舞的部下。北伐时在先父任无线电台台长时，王净任报务员。王净原配属于国民党18师任电台报务员，与吴如生、刘盛炳、刘寅等被俘后加入红军，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无线电队，王净成为我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之一。王净后来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第三局（通讯联络局）局长，解放后当过共和国邮电部副所长，1955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话转回头。且说毛泽东、朱德本想把张辉瓒留在部队当军事教员。此时，蒋介石来电，愿以支付20万银元并释放一名共产党的领导人为条件，要求释放张辉瓒。但是，众怒难犯，红军和当地江西老俵恨透了张辉瓒。在这种情况下，朱、毛挽救不了张师长的命运。农民在杀了他以后，又把他的头割下来，放在一个竹笼子里，架在竹排上，从赣江上游放下去，让张辉瓒的脑袋顺江而下。

毛泽东、朱德多次为此事感到后悔，他说：当时没有执行党的不杀俘虏政策，没有制止住群众的自发行为。

龙冈一役，真是汤浇蚁穴，火燎蜂房。张辉瓒望着四散逃溃的部队，再也想不到这里竟是他葬身之所。

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阙是：“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50师。1931年1月3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50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敌3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国民党一个半师15000余人，缴枪12000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役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蒋介石听说张辉瓒的首级顺赣江向东流去，不胜哀叹，并挥笔写下：

“呜呼石侯^①，魂兮归来！”

蒋介石见鲁涤平的报告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便立刻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接着，蒋介石又当着何应钦的面，批评第一次“围剿”是“轻敌躁进”，没有按他“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一面加强部队及电闸防堵，以图布置严密；一面断绝物资输入苏区，而使红军坐困。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按各路划定作战地区，推进时，分进合击，互相策应”之战略方针执行，把责任推到鲁涤平头上。第一次“围剿”，蒋介石没有动用他的黄埔嫡系部队，而以杂牌国民党军为讨伐“共匪”的主力。他也有“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打算，别看他三哭石侯，抹眼泪也是让人看的。

再说龙冈一役，歼敌之后，红军在追击中乘胜转入进攻，先后恢复扩大了永丰、乐安、南丰、广昌、宁都等县的地方武装并建立了红色政权。这不仅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而且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

① 张辉瓒别号石侯。

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地震动。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

第一次“围剿”的失败,也使蒋介石感到震惊。2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4月初,他调集18个师另3个旅共20万人,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形成一条800里长的战线,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国民党在各地贴出告示,报纸上刊登启事,悬重赏缉捕朱、毛、彭、黄。这回赏金增加4倍,抓住其中任何一个,可领赏金20万银元。

黄公略看到这一告示说:“我的头好值钱!20万银元。”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黄埔生,气死你的校长。你不为校长出力,为校长争气,跑到这山沟沟里来当‘朱毛共匪’。”黄公略接着表态:“我就是不知道甚么是享福,当‘共匪’占山为王,何乐而不为呢!”毛泽东望着黄公略,笑嘻嘻地说:“这次蒋校长又要来活捉你这个学生,你有何打算?”黄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有来犯者,坚决反击。”接着黄又道:“上次抓了个师长,这次我们要抓个军长,抓个黄埔的老师或同学,那才过瘾!”毛泽东拍拍这位爱将的肩,说:“好!有志气!”半年前,也就是1930年7月,毛泽东诗兴大发,也填了一首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上半阕是:“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

角,编师借重黄公略。”

那时候,毛泽东对黄公略就表达了真挚的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两次填词称赞一位部将,这是少有的。1930年1月,工农红军第6军在赣南成立,黄公略调任该军军长,当时,政委陈毅、政治部主任毛泽覃,但他们都因故没有到职,黄公略既抓军事,又抓政治,他把一个由赣南几支地方武装组建而成的军队训练成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随后,黄公略在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很快造成赣西南清一色的红军地盘,难怪毛泽东盛赞他“赣水那边红一角”。

再说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后,仍不甘心,除了积极发动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外,他还想以校长的身份,笼络红军中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试图破坏红军内部团结,瓦解红军将领的斗志。黄公略便是他妄图“策反”的对象之一。

蒋介石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在南昌行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大队大队长康泽。康泽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四川安岳人,字兆民,出身屠夫之家,父亲康历全以杀猪为业。他1904年生,取名代宾,又叫海娃子。他七岁时父亲病故,依靠大姑读到初中毕业。1924年他投考黄埔军校第三期,改名康泽,毕业后留学苏联,1927年回国后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在中原大战时,这位黄埔的高材生他沿陇海路线进行战地宣传,由于成效显著,深得蒋介石的赞赏。在中原大战结束后,康泽率宣传大队参加了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这个宣传大队后来扩编为别动总队,康任总队长,是仿效德国的党卫军组织,专搞情报活动,是军队中的特务。第二次向中央苏区的“围剿”,国民党兵分四路向苏区大举进攻。1931年4月至5月,红军由西向东,从富田到建宁,转战700里,打垮敌军13个师,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蒋介石吃了败仗,毛泽东却

一脸的兴奋。毛泽东又按捺不住诗兴翻涌，笔卷豪情，语含讥讽，写道：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里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所赞“飞将军”乃黄公略，非国民党的“飞将军”蒋鼎文。

蒋介石找来康泽，面嘱机宜。他说：“两次剿匪不力，败在攻心，不在武力。我在黄埔时反复强调攻心术。孙武说：‘三军可争气，将军可夺心。’诸葛孔明是攻心大师，他是怎么说的呢？”康泽立正回答：“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蒋介石说：“对了，我们要攻心。共匪里有不少黄埔学生，要斩草除根。黄埔师生是最大的祸害。”康泽献计：“黄公略与我是同学，可以先从黄身上下手。”蒋答：“同学之间，互相了解，正好可以对症下药！”

康泽领命，几天后，湖南、江西等地的报纸上登了一则新闻：

“共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即将母与妻接来长沙，足见黄军长悔过情殷，投诚心切。”

报纸上登消息，康泽派别动队员们赶到湖南湘乡县兴让乡，何健也配合康泽行动，将黄公略的母亲和妻子押送长沙软禁。康泽又大造谣言：“黄公略不忍共匪的肃反运动，即将率部归顺蒋校长。”

另外，康泽又献计，由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兄长黄梅庄为湘鄂赣督察署少将参议，用1500元为诱饵，劝其当说客。黄梅庄与黄公略是同父异母兄弟，比黄公略大20多岁。黄公略的母亲

是丫环被纳为妾的，黄公略与他母亲一直受到黄梅庄的虐待。平江起义后，他母亲被黄家逐出家门，另立门户过日子。此次蒋介石黔驴技穷，封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为中将宣抚使，让他俩招抚黄公略。蒋写了一封亲笔信交康泽转黄梅庄，信上说：

汉魂兄：

本校长不才，使尔等误入歧途，如能迷途知返，定能重用，继续发扬我黄埔精神，完成总理所遗大业。

中正

黄梅庄揣着此信，带着随从，携带银元，一进入苏区，就大雨滂沱，风声大作，连伞也掀了盖。随从说：“伞掀盖，不吉利，掀盖即去头！我们此去怕是凶多吉少。”黄梅庄故作镇静地说：“百无禁忌，万事如意，自古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你怕什么！”

黄梅庄及随从被哨兵送到遂川彭德怀的司令部。不巧黄公略到南丰、宜黄一带扩军去了，只见了彭德怀。彭德怀认识黄梅庄，也十分清楚他与黄公略的关系，知道来者不善。于是，彭德怀装得十分亲热，吩咐弄酒炒菜，陪黄军长的老兄多喝几盅。

黄梅庄是个酒鬼，几杯下肚，舌头也有点不听使唤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彭德怀说：“大哥，快喝，多喝几盅，为你洗尘！”酒过三巡，黄梅庄酒后吐真言了。他对彭德怀说：“彭将军，您有胆有识，与公略弟一起打天下，队伍发展快，威镇赣南闽西，还惊动了蒋总司令！”黄梅庄继续道：“我记得公略原是周磐手下的一个营长，你是……”彭德怀接话说：“我是团长，周磐压制我们，我们受不了，就把兄弟们拉出来，自己干。”彭德怀顺着黄梅庄的梯子爬，想套出黄梅庄来苏区的真实意图。

黄梅庄说：“你们在山沟里转来转出，何日才是出头之日？”彭德怀顺水推舟地答道：“等我们占领了湖南、湖北就好了，现

在,我们连红米饭都吃不上,部队也缺医少药。”黄梅庄说:“要占领两湖很容易。”他见里外没人,又悄声说:“我堂叔黄汉湘你是认得的,他现在管三个省,是湘鄂赣督察署中将宣抚使,只要与他联络上,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彭德怀边说边劝酒,举杯说:“好!汉湘将军高升,公略与我同贺。大哥冒暑前来,必有贵干,请问有何事相商,不妨先讲给我听听。”黄梅庄见时机成熟,连忙说:“不敢不敢,汉湘叔还在南京,蒋总司令正在召见他。彭将军如有心归正,我可以从中斡旋。”彭德怀见鱼已上钩,进一步试探:“我们总共才5万人,能编个什么呢?”黄梅庄心花怒放,拍着胸打保票:“彭将军当然是总司令,公略仍可当军长。”说着,把皮箱底层剖开,取出黄汉湘给黄公略的信和蒋介石的亲笔信,一齐递给彭德怀。黄梅庄还将银元送上,算是见面礼。彭德怀又劝酒又夹菜。黄梅庄真的醉了,向彭德怀和盘托出他的来意。

席散,黄梅庄与随从睡在红军指挥部的客厅内,不省人事。

晚饭后,彭德怀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红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请示处理办法。毛泽东答复道:“这个问题由黄公略同志自己处理。”总部写信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黄公略。

黄公略收到鸡毛信后,没有过分激动,他是个有勇有谋的人,他想:蒋介石、康泽,一个是校长,一个是同学,搞这种丧尽天理的鬼把戏来骗我,真乃心如蛇蝎。于是,黄公略不顾母亲、妻子尚在敌手,便笑道:“忠孝不能两全,成大业者要抛开七情六欲。”

决心已下,黄公略要给总部写信,坐在他身边的参谋长陈奇涵看到军长极度痛苦,诚恳地要求由他代笔,军长签名就行。黄公略坚不同意代笔,说:“这事非同小可,岂能让你代笔。”黄公略沉思片刻,拿起笔,向总部发出以下电文:

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失败,采取了分裂红军的可耻阴谋。我黄公略坚信革命必定

成功,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我义无反顾,与黄梅庄一刀两断,并请求将黄梅庄处以死刑,将黄梅庄的口供印发各军,借以教育部队提高革命警惕。

毛泽东等同意黄公略的意见,处决了黄梅庄,并将黄的头装在一个木箱中,带来的银元收下,让他的随从提着木箱离开苏区。几天后,在吉安青塘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高度赞扬了黄公略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的坚定革命立场,号召大家向黄军长学习。

再说康泽接过“人头木箱”后,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同学黄公略变得这么快。蒋介石听了这个消息气得目瞪口呆,半天他也说不出话来。

1931年7月,蒋介石又集中30万兵力,亲任总司令,随后带着德、日等国军事顾问,坐镇南昌,亲自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这次“围剿”的主力为蒋介石的黄埔嫡系部队,有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其中陈诚、蒋鼎文为黄埔“八大金刚”,是他精心栽培和扶植的亲信势力。他要以白黄埔对赤黄埔,看看究竟谁厉害。在战术上,他采用了兵分三路,“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从南丰、南昌、吉安三面向中央苏区大举进犯,企图于赣江之侧把红军消灭之。当时,红军主力尚在福建建宁,第二次反“围剿”苦战之后尚未整休和补充,兵力仍为3万左右,是国民党兵力的十分之一。针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提出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作战方针,用“磨盘战术”,大胆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牵着敌人的鼻子在革命根据地转圈子,然后相机歼灭疲惫虚弱之敌。按照这一方针,红军主力于7月10日从闽西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集中。8月7日,红军自兴国向东突进,绕至敌后,巧歼上官云相师,接着乘胜东进,在8日消灭郝梦

龄师；随后又急行至黄陂，于 11 日歼毛炳文师两个团。五天之内三战三捷，歼敌两师又两团，缴枪逾万。第三次“围剿”，陈诚、蒋鼎文等黄埔宠将，决意捉拿黄公略，以解心头之恨。这次战役，从 7 月打到 9 月，黄公略、林彪牵着陈诚、蒋鼎文的鼻子在苏区兜圈子。主力有时在陈诚身边滑过，但他却寻不着决战的机会，处处扑空。一支精锐之师就这样被拖得饥疲沮丧，使战斗力大减。在国民党有“飞将军”之称的蒋鼎文却险些被他的学生黄公略折断了翅膀。8 月 4 日，蒋鼎文占领了兴国，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深入苏区的第一人。但没几天，奉命向泰和集中时，在老盘营一带受到另一位“飞将军”黄公略的伏击。9 月 8 日，蒋鼎文率第 9 师行军至老盘营，先头 4 个营已过独木桥，该桥突然折断，余部立刻惊恐万状，正准备绕道而行，却听四面枪声大作，红军战士飞驰而来，打得蒋鼎文抱头鼠窜，要不是蔡廷锴的援兵赶到，蒋鼎文将成为张辉瓒的朋友。第三次“围剿”因“九·一八”事件突然爆发而中止，但中央苏区却胜券在握，共歼敌 3 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拥有 21 个县的完整革命根据地。

9 月 15 日，蒋介石得知黄公略的部队在东固附近的六渡墩时，他命令飞机进行地毯式轰炸，黄公略不幸被敌机炸死。噩耗传开，军民悲恸，陈奇涵握着黄公略的双手，跪在地上，望着他的双眼慢慢闭上。33 岁的军长，走得太早。

在追悼黄公略的大会上，毛泽东手书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
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
后世继君来。

苏区为纪念黄公略的功绩,特地命名了公略县、公略步兵学校、公略亭。正是:能谋善战建奇功,高风亮节照人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弹尽援绝 伍中豪安福遇难 肃反左倾 姜镜堂蒙冤光山

行文至此,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说当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被毛泽东称为井冈山“三骁将”的伍中豪、黄公略和林彪。由于黄公略上回已提及,不再赘述。林彪是一个曾被尊为中国第二号神又被列为第一个鬼的人,他的事说来话长。他与伍中豪同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与先文也是同期同学,而且都分在步兵第2团。林彪的传奇经历也暂且不提,以后将专门介绍。

且说伍中豪何以是毛泽东的得力爱将呢?在“三骁将”中,黄公略是随彭德怀参与平江起义的组织者,林彪是随朱德从未阳上的井冈山,惟独伍中豪则自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官起,一直追随在毛泽东身边。他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以及攻打长汀和三打龙岩战役等,是早期红军部队中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井冈山时期他担任过红12军政委。1955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的谭震林同志经常在一些场合讲:“红12军伍中豪军长如果不牺牲,他绝对是我们军队中和林彪平起平坐的元帅。”

伍中豪,名昭蓂,湖南耒阳市城区伍家村人,生于1905年2月17日,17岁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秋被转为中共党员。由于他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受到警方通缉,他越墙逃跑后回到家乡,与贺恕、刘太等人建立了中共

耒阳第一个支部。在耒阳县委建立后,他任执委,其妻段凤翔任妇女委员。1925年5月,伍中豪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他的同期同学有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野9兵团政治委员的郭化若、国民党王牌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台湾陆军总司令罗列以及先文——黄埔军校大陆最后一任政治部主任吴起舜。林彪也是伍中豪的同学。这一期显赫的战将,共产党方面的还有李运昌、唐天际、曹广化、李逸民、刘志丹、李鸣珂、李天柱、唐赤英、袁国平、曾中生、曾希圣等;国民党方面的有曹天戈、高魁元、胡璉、李弥、文强、林伟俦、彭士量、覃道善、唐生明、谢晋元、滕杰、严明、郑庭烽、周伟龙等。他们均称得上是黄埔风云人物。

闲话少说。伍中豪在黄埔军校毕业后,中共广东区委派他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官。在那里,他结识了毛泽东。蒋介石背叛革命,伍中豪返回老家组织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在“马日事变”后,伍中豪赴武汉,在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新兵训练处任连长,后来新兵训练处编入2方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他任12连连长。警卫团团长沙德铭就是他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卢在第二期,伍在第四期,两人关系很好,既是同学,又都是共产党员。1927年7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警卫团赶赴江西南昌,准备参加武装起义。伍中豪和警卫团全体官兵从武汉乘坐一艘船顺流而下,他心情无比激动,船至九江受阻不能上岸,只好在黄石登陆,然后步行。当他得知起义部队已撤离南昌,向赣南转移,而敌重兵把守赣江,警卫团不能与起义部队会合时,他便率警卫团返回江西修水整休。

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当时伍中豪任3团3营营长。起义部队在捣毁

几十个反动团防局、攻打平江县城后，于9月19日来到浏阳文家市集结。在这里，毛泽东召集营以上干部，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以远大的眼光，分析形势，主张向敌人防守薄弱、交通偏僻的罗霄山脉进军。但他的正确主张却遭到师长余洒度的极力反对。余师长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观点。余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比伍中豪早两期，是第二期的优秀生，自认为打仗有一套，没有把伍中豪看在眼里，双方为去向争执不休，伍中豪这时拍案而起，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把部队开往井冈山去，并用驳壳枪指着余洒度的脑袋，要他服从毛泽东的指挥。担任起义部队军事总指挥的卢德铭，亦赞成向罗霄山脉进发。后来，余洒度投敌变节，卢德铭则英勇牺牲。

在卢德铭牺牲后，起义部队又接连打了几个败仗，部队官兵情绪低落。江西军阀朱培德则乘机派出特务团，围攻堵截起义部队，弄得部队四处奔波，十分狼狈。毛泽东亲自率领张子清的第1营和伍中豪的第3营，冒雨攻克莲花县城，补给了一些生活用品和枪支弹药。随后，他们继续出发，于9月29日抵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张子清曾任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区队长。

部队到达三湾的当晚，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在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时，已不足千人，但仍是起义前的师、团、营编制，官多兵少，枪多人少，这样的组织当然不利于作战。这时一些官兵思想动摇，情绪悲观，对前途无望，部队面临着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大刀阔斧，首先将师缩为团的编制，并在连以上单位建立党支部，设立党代表。整编后，毛泽东任命伍中豪为1营营长，原来的2团团团长负一民任副营长。负一民也是黄埔四期学生。但他虚荣心大，为降职而发牢骚；伍中豪却以大局为重，主动找毛泽东，要求自己降为副职。毛泽东听从了他的意见，任伍中豪为3

营副营长。负一民为1营营长。后来,张子清在战斗中阵亡,伍中豪接任3营营长一职。不久,负一民负伤不知去向,团长陈浩、副团长韩庆剑先后投敌。部队到达井冈山时,伍中豪成了毛泽东手下的第一“大将”。据说,三湾改编后,跟随毛泽东的只有72人,被人称作毛泽东72弟子。这72人中以伍中豪为最坚决。而后72人大部分在战斗中牺牲,幸存的只有两人:一位是当时的连党代表罗荣桓,成为共和国元帅;另一位是当时的勤务兵韩伟,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中将军衔。

1927年11月,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秋收起义部队攻克茶陵,建立工农政权,谭震林被选为主席,县长谭梓生由部队派的。新政权刚建立,国民党吴尚师就将县城包围。当时团长陈浩、副团长皆有变节之心,他们派人去与吴尚联系,企图阵前倒戈。伍中豪幸亏警惕性高,他截获了陈浩投降敌人的密件,及时将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则当机立断,处决了叛徒,秘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潜入到井冈山北面山麓的茅坪。据谭震林回忆,在部队跳出茶陵包围圈后,毛泽东握住伍中豪的手,亲切地称他:“豪子,你救下了我们革命的火种呀!”

伍中豪善于打仗。1928年2月正值农历春节,他率3营官兵下井冈山攻打遂川县。他运用围城打伏击的战术,攻克宁冈县城,歼敌一个团。4月,朱、毛会师成立红4军,伍中豪任31团团长,是全军6千人中最有战斗力的主力。10月,蒋介石调集6个旅围攻井冈山。红4军前敌委员会在宁冈白露召开会议,会上突围后向何处去成为争论的焦点,陈毅主张回湘南,林彪主张向赣东,伍中豪深刻分析了井冈山周围的形势,提出主力应向赣南发展。他的主张被毛泽东采纳。1929年3月,红4军重新整编,下设三个纵队:林彪担任第1纵队司令,刘安恭任第2纵队司令,伍中豪任第3纵队司令。

1930年春,毛泽东在赣南楼梯岭召开会议,他说:“红军在赣南有今日之发展,伍中豪应记第一功,他是力主到赣南来的。”

伍中豪率部转战赣闽边境,先后攻打闽西的龙岩、永平、武平、上杭等县。3月中旬,参加了攻打长汀的战斗,经过两天两夜苦战,冲破了敌人的坚固工事,歼灭了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两个团,击毙敌旅长郭凤鸣。攻克长汀,为红军在闽西地区打开了局面。1930年春,红4军第3纵队和闽西红12军第2、3纵队扩编组成红1军团第12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

1930年5月,伍中豪身患急性肺炎,被送进闽西长汀福音医院治疗。毛泽东对伍中豪的病情十分关怀,多次去医院看望。在傅连璋院长的精心治疗护理下,伍中豪的病情有了好转。1930年9月,工农红军第1军、3军团久攻长沙不下,红1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从长沙撤围,转战赣南,不久攻克吉安。伍中豪听说毛泽东已回师井冈山,对毛泽东说:“是呀,我们只有向敌人薄弱地区发展才是上上策!”10月,根据红1军团的命令,伍中豪不顾病情,带领一个排的警卫,从吉水出发,去横江渡这个地方调集赣西南各县独立团,准备向福建漳州进军。途经安福县城时,突然遭到安福县靖卫团的袭击,伍中豪仓促应战,战士死伤过半。在突围至城郊亮家山时,弹尽援绝,伍中豪被反动武装头子、靖卫团团团长罗汉苟杀害。伍中豪牺牲时年仅25岁。

得知伍中豪牺牲的消息,红12军6千多名官兵失声痛哭。毛泽东咬住一条毛巾,在房里几天不肯出来。性子暴躁的红3军团长彭德怀,派出5000多名官兵,将福安县靖卫团铁桶般的围住,并活捉了杀害伍中豪的凶手罗汉苟。彭德怀亲自监斩,红12军政委谭震林亲自抄刀,以杀害伍中豪凶手的污血祭洒骁将伍中豪。

伍中豪是井冈山上“三骁将”之一,又是毛泽东的爱将。据

肖克介绍,伍中豪在艰难的岁月里,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他有“三精”:一精于开玩笑,二精于下象棋,三精于喝酒。据说,在井冈山初期,红军部队没有一个人下象棋能赢伍中豪。传说福建长汀县的长角圩有一位叫刘天良的老人,精通棋艺。当时红军部队还没有占领长角圩,伍中豪得知这一消息后,竟带领手枪排,夜间摸进这位老人家里,和老人家连续下了五盘棋,谁知竟是两赢三输。伍中豪愤怒地掷掉棋子,他说:过了三个月再来战。为了此事,伍中豪受到朱德的严厉批评。在喝酒方面,所有见过伍中豪的老红军都讲,他身上除了挎一支手枪,带一个望远镜外,就是一个装满白酒的军用水壶。他打仗喝酒,闲下来也喝酒,从不要菜,酒后就开起玩笑来,而且妙趣横生。伍中豪是唯一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战将,又是一位诙谐有趣、文武双全的帅才。在黄埔军校的名册里,伍中豪算得上一名智勇双全的将军,但可惜英年早逝,实为红军一大损失。

且说国民党反动派拿起屠刀,向共产党猛砍过来时,一批国共合作时的赤黄埔系师生,如蒋先云、曹渊、卢德铭、伍中豪、金佛庄、熊雄、肖楚女、杨匏安、张秋人、孙炳文等,在战场上或刑场上先后光荣牺牲。这也许就是当初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时灌输给师生的一种精神,那就是黄埔精神。后来把“发扬黄埔精神”这个口号具体化为“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行为准则,而且用“亲爱精诚”作为黄埔军校的校训。概括起来说,黄埔精神就是“爱国,革命,亲爱精诚”。一批批黄埔同学倒在血泊中,这是黄埔的骄傲。但是,还有一批黄埔军校师生,如姜镜堂、许继慎、曾中生、周逸群、唐赤英、肖方、吴展、周维炯、段玉林、熊受暄、段德昌、孙德清、肖韶、陈奇、胡陈杰、肖大鹏、彭之玉、毛正初、王鹤等,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成了“左”倾错误路

线的牺牲品。当时在张国焘、王明、夏曦等中共领导人“左倾”路线的误导下,全国各根据地搞肃反扩大化,造成冤假错案数以万计,有无数红军与苏区创建人惨遭自己人的屠戮。当时滥杀滥捕近似于疯狂的程度,乃至有的军团中几乎没有了党政领导干部。

张国焘、夏曦两人也算黄埔军校的老师。张国焘当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夏曦则是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的政治部主任,货真价实的黄埔军校教师爷。要想全面地描叙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风鸣雨啸,确非笔者所能胜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曾叫陈立夫草拟了一份197名共产党人员的通缉令。在记录中写着:“照知蒋中正、胡汉民、谭延闿等人为非常紧急之处理,将首要诸人及经党部举发者就近命令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逮捕监视,制止活动,免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应先看管者的名单: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徐谦、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毛泽东、张国焘、夏曦等。”

在黑名单中,张国焘、夏曦榜上有名,而王明因在苏联学习,侥幸逃过这一关。无独有偶,1983年5月26日《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的处理意见》中,规定“对确无反革命行为而被错杀者应予平反昭雪”。经查受到平反昭雪的有204名,其中黄埔军校毕业的赤黄埔系同学有25名,他们是在“左”祸中丧生的冤魂。“天戴其苍,地履其黄”,历史已成过去,但半个世纪以前的悲剧,如今让我们重新再翻出来,其目的是让后来者千万不要忘记他们的悲壮经历。

长话短说。首先推出的是姜镜堂,他是红4军12师政委,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皖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他是安徽英山(今划归湖北)人,1903年生,又名诚炯,号稚丹,曾化名张民、张经望。他小学毕业后当过烧窑工,教过私塾,21

岁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3军连、营长;北伐进入武汉后派往汉阳兵工厂任上校科长。

1927年春,姜镜堂被派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参加了由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政变后,党组织派他回家乡湖北英山县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他以小学教员作为掩护,在杨家坊地区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开租抗债、减租减息斗争,使英山县农运工作很快地发展起来。他与肖伯唐、金仁光等党员组建中共英山县委,肖伯唐任书记。在肖调上海党中央工作后,姜镜堂继任县委书记。1929年春,姜镜堂被派往皖西六安工作。11月,参加领导著名的“六(安)霍(山)暴动”,与舒传贤、周狷之于1930年1月将参加暴动的六安三区、六区游击队和霍山西镇游击队合并,集中于流波碓,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师。该师下辖106、107、108三个团,归红11军领导,徐百川任师长,姜镜堂任政治部主任,开辟了皖西革命根据地。

1930年2月,为了统一鄂豫边、鄂东南和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鄂豫皖特委,并指定郭述申任书记,姜镜堂、许继慎、徐向前、王树声等为特委委员。3月,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三块根据地的红31师、红32师、红33师,根据中央指示统一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该军下辖1、2、3师。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原红33师改编成红1军第3师,周继炯任师长,姜镜堂任师政委。许继慎、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周维炯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和姜镜堂是先后期同学。他们关系比较融洽,打仗配合默契,先后参加了攻占霍山、英山、罗田、光山等县城的战斗。1931年1月,红1军和红15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师合编为红4军后,姜镜堂调皖西工作,任中共皖西分区临时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就

在他调任红 4 军 12 师政委的 4 月初,他的钩命人张国焘由上海动身前来鄂豫皖苏区,同张前来的还有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他们一行 3 人是由当时主持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将其护送到汉口,后由姜镜堂派来的交通接走的。此后数天,以魔术师为掩护的顾顺章即被国民党特务徐恩曾逮捕而叛变。

张国焘,这位当年曾在武汉黄埔军校讲授政治的教官,字楷荫,又名特立,1897 年出生在江西省萍乡县上栗市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祖父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有“功名”的,其父为清末最后一届省试录取的拔贡,民初毕业于浙江法政学校,当过浙江省象山县知事。

1918 年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学习,参加过“五四”运动,任北大学联总干事。由于他口才好,还兼学联讲演部部长。1920 年夏他参加陈独秀、李大钊等关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21 年 7 月,他以北京共产党小组的身份,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共中央局组织主任,会后他即留在党中央工作。以后几年,他当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25 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委。1926 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他曾代表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前往广州处理事变后共产党留在黄埔军校及第 1 军的事情,并与周恩来意见相左。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借共产国际的指令,到南昌阻止暴动,遭到周恩来的抵制。周恩来在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拍桌子发火,就是与张国焘争辩而引起来的。事后,张太雷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对张国焘严肃处理。11 月 9 日至 10 日,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开除张国焘中共中央委员之职。1928 年 6 月他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他追随王明(陈绍禹),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 年春回国,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

局书记兼鄂豫皖军委主席。

张国焘等是怀抱着王明的“上方宝剑”而来的，他们到了鄂豫皖苏区后，便横挑鼻子竖挑眼，之后，对党和红军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改组。5月11日，张国焘开会传达王明的“左”倾中央的指令，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另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上任不到两个月，就提出“加紧肃清改组派”的意见，明确地把肃反列为鄂豫皖苏区“目前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7月，在苏维埃二代会上，专门通过了《肃反决议案》，成立政治保卫总局，人员增加到300多，其任务是对付改组派、AB团和第三党。

说到这里，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改组派”、“AB团”和“第三党”。

所谓改组派，就是汪精卫于1927年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合流。汪精卫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等被蒋介石排斥后，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标榜“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并在各省市发展组织，和国民党其他派系争权夺利，被称为“改组派”。

所谓“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的一个反共组织，其全称是“AB反赤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在北伐军占领南昌后，为了破坏江西的工农革命运动，夺取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蒋介石通过其党羽段锡朋、郑异来、洪轨、周利生等到江西，以“庐陵同乡”、“北大同学”的关系，网罗党羽，于1927年1月秘密组织专门反共的团体。它的宗旨是“反对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义”。但其建立不到三个月，即遭到江西革命群众的反对，AB团从此彻底地解体。

“第三党”是指1930年8月由邓演达等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它是由谭平山、章伯钧等于1928年春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的。“临时行动委员会”以邓演达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郑太朴、章伯钧、黄琪翔、李进璋等分任组织、宣传、军事、青年委员会主任，下设中央、上海、北平、香港四个直属的区干部会和江苏、浙江、河北省地方干部会，出版《革命行动》等刊物。临时行动委员会既反蒋，但又不赞成中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其企图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成为能够独占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故人称之为“第三党”。

张国焘的帮凶、红4军政委陈昌浩，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在鄂豫皖苏区疯狂地进行肃反，并一再向中共中央表白自己的肃反功绩。为了把肃反进一步引向深入，陈昌浩在彭杨军政学校向学员们作了一次肃反经过的报告，陈昌浩说：

“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红军中的发展，同志们都知道了它们来此已有很久的历史。因此就大肆发展其组织，在去年和今年就组织了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九人：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廖业琪、肖方、吴荆赤、熊受暄、潘皈佛、姜镜堂；主席许继慎，是他们九人的领袖。再在下面各级团、营、连发展组织。但如果下面破坏了，很难找到上面关系。我们再举个例子你们看，周维炯是个‘英雄’，他完全是拿共产党的招牌，来替他们打天下，他曾经杀了两个党代表，同时赶走了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刘英两个大半都是这样。这证明蒋介石、汪精卫进攻赤区和红军的企图和反革命组织的庞大。这证明过去红4军简直实际上是改组派领导，而红军中主要负责人曾中生竟置若罔闻，还向分局报告说红军健全。这次共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这一千改组派、

AB团、第三党分子中,计算起来大半是地主、富农、流氓、地痞、青红帮、国民党侦探、黄埔学生、哗变俘虏士兵及开除的C·P、C·Y分子。在这些分子内部,工农分子不到一百人,并且还是一些富农、司务长。这一千反革命分子里面,有七百余共产党员,同时,可以看出是乡土观念、地方观念、感情观念的大结合,如商城六霍乡、黄麻这边的士兵较少。”

陈昌浩的讲话,也反映了党内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已威胁到党的生存。20多年后,即1958年11月27日,在谈到红4军的肃反时,徐向前元帅很激动地说:“这个问题我看完全是扩大,这完全是王明搬来的,哪里有这些东西(指AB团、改组派、第三党——引者注)?我看没有一个真的,我熟悉的一些人,不过是成分不太好,有文化,有的是作风上不大好,最多是这样一些毛病。现在这些帽子都要去掉。都承认是烈士,许继慎、周维炯这些人哪里是什么反革命?”

1931年10月,当红4军移师商城余子店时,陈昌浩即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肖方等红军将领逮捕,当天即动用酷刑。将这些人押走之后,张国焘传令解职的曾中生也前往新集,说要他参与许、姜等人的审理,并要曾中生对自己的错误有个交待。徐向前当时任红4军军长、曾中生任红4军政委,张国焘、陈昌浩对这两位领导人不敢逮捕,但先撤了曾中生的职,以便各个击破。徐向前见红4军指挥员大部分被抓,只好率领部队撤到了河南光山县白雀园整训。这时候,由于张国焘的舆论宣传,说红4军中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人物,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内“肃反”的浪潮一下就掀起来,很快就泛滥到各个角落。

徐向前和倪志亮都经历过鄂豫皖苏区红4军遭受的那场浩劫。徐向前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倪志亮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倪当时是红4军10师师长,他俩有幸躲过了“肃反”的淫威。解放后

徐成为共和国的元帅，倪于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他俩人合写了《豫鄂皖苏区红军历史》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部分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熊受暄、陈奇……等团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

肖方，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红 4 军 12 师副师长，湖北罗田人，1925 年入党；

周维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红 4 军 11 师师长，安徽金寨人，1924 年入党；

姜镜堂，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红 4 军 12 师政委，湖北英山人，1925 年入党；

熊受暄，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红 4 军 12 师政治部主任，湖北英山人，1925 年入党；

陈奇，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红 4 军 10 师政委，籍贯不详。

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他的死惨不忍睹，而且极富传奇色彩，留在下回详述。

以上烈士，均于 1931 年 10 月被张国焘以改组派罪名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正是：张国焘党同伐异，姜镜堂含冤九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陷害师弟 曾扩情施反间计 仇快亲痛 许继慎死不瞑目

书接上回。却说姜镜堂被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杀后，张的魔爪伸向红 4 军更高一层领导许继慎。

许继慎何许人也？此人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红 1 军军长。张国焘来苏区后，将许继慎调整到红 4 军任 12 师师长。许继慎在红军中是一员声名赫赫的战将，但却遭到张国焘的猜忌，被降级使用。许为了顾全大局，对此事也从不计较，还是全心全意地带兵打仗。

许继慎是安徽六安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在黄埔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东征、北伐，1926 年 5 月，任叶挺独立团 2 营营长，随北伐军参加了平江战役、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是叶挺的两位战将之一。1929 年冬，他与李荣桂、陶秉哲、孙德清、许光达等 100 多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上海举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革命游击战争理论，研究苏区情况。毕业后，许继慎、郭述申、曹大骏、熊受暄等奉中央军委之命来到鄂豫皖边区，许继慎任红 1 军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由于许继慎、徐向前、熊受暄都是黄埔同学，所以作战配合默契，对提高部队战斗力有很大帮助。在红 1 军创建后，许继慎就抓住蒋、冯、阎军阀混战，根据地周围敌人守备减弱的有利时机，指挥部队大举出击，挥师驰骋于淮河上游、皖西、京汉铁路南段等地，取得一

个又一个胜利。他亲自率领红 1 军 2 师、3 师东进,向皖西六安、霍山西部地区发动进攻,接连取得流波碛、麻埠、霍山、英山等战役的胜利,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许继慎在全军首先提出了“飘忽战术”这一口号。“飘忽”者,轻快、迅疾,“如风之疾也”,神出而鬼没也。许继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神出鬼没,机动灵活,使敌人闻风丧胆。许继慎在李家集车站击毙敌新编 12 师 1 旅旅长侯镇华,在孝感双桥镇俘虏敌 34 师师长岳维峻,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1931 年 4 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来到鄂豫皖边区。5 月 12 日,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成立,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和分局军委主席。5 月 16 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了第 1 号通告:

“在这一苏区未与江西中央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

张国焘极力推行“左”倾路线的“新政策”,自然遭到了徐向前、曾中生、刘士奇、许继慎等同志的抵制。对党忠诚老实、襟怀坦荡的许继慎在与张国焘的交谈中,坦率地批评分局领导人“动辄给人戴帽子,打击早已在鄂豫皖边区工作的老干部”等宗派主义行为,批评红军中的“左”倾教条主义,而主张红 4 军主力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向外进攻,消灭敌人,反对张国焘所谓“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徐向前、许继慎、曾中生等将领,原都曾认为张国焘乃中共党内的老资格,有修养,有可能会采纳他们的建议与批评。但万万没有料到,张国焘却是个小肚鸡肠、气量狭小的人,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张国焘深知,自己要想成为鄂豫皖苏区的“太上皇”,必须将许继慎、曾中生等人压下去,但许、曾等将领,无不战功卓著,深孚众望,若搞不好,会把自己搞臭。正在这时,一个天赐良机使张国焘喜不自禁。一封信从远方飞到张国

煮手中。什么信,说来话要长些。

前文述过,红4军于双桥镇活捉了国民党34师师长岳维峻。徐向前、曾中生等决定利用他做杨虎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并要其家属送物资给红军,以赎其人。岳维峻的家属亦按时按约将医药等物资送到。由于张国焘等人的到来,岳维峻未被释放。起初岳关在檀树岗,后移到潭畷河。时岳部被俘受伤官兵在箭场河红军后方总医院养伤。潭畷河距箭场河20多里,红军对岳维峻监管也很严,根本与他的部下无法接触。8月中旬,张国焘指使政治保卫局的人在这个后方医院炮制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所谓AB团组织,并将这个组织的成员逮捕。这些成员多是34师的官兵,是岳维峻的旧部。张国焘下令连夜突击审讯,经过一番刑讯逼供,这些成员屈打成招,胡说什么准备在9月15日暴动,炸毁医院,劫持岳维峻。张国焘见了这些口供,如获至宝,当即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内称:

“……八月初,我们破获一个岳维峻组织的反革命团体,名AB团,自成一系统,约120人,决大多数是岳的旧部……岳经常给这一反革命团体之计划和经费,建立苏区内外之交通网及其侦探网,联络赤区一切反革命分子及组织,计划于九月十五日暴动,炸毁医院药房,抢岳维峻出去。……民团、侦探、蒋介石及赤区周围各军队派来之侦探、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许多实际行动中已充分证明联成一片。”

正当张国焘日夜盘算如何向许继慎、曾中生等问罪之时,又出了这样一件事。蒋介石的特务头子、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派遣特务任廉洁和钟梅桥(钟蜀武)携带他的亲笔信,到英山找许继慎。曾扩情在信中写道:

继慎吾兄无恙:

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钦佩无极。比

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匍匐来归之子,父母惟有涕泪加怜,或竟自伤其顾之不周耳,宁忍加责难于其子哉?苍苍者天,于孝行役,分无再见,乃复来归,虽犹千里,心实欢喜。只所须名义防地,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照给。校座返京,百务待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耳,愿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宠命,并颂戎安。

弟曾扩情再拜

钟梅桥一到 12 师后,即被政治部逮捕。许继慎得知此情后,即令人将钟及人、信一并送交红 4 军军部。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看罢曾扩情给许继慎的信后,立即对钟梅桥、任廉洁隔离审讯。从敌特漏洞百出的供词中,可以看出这是在红军胜利南下的情况下,曾扩情利用师兄师弟的同窗之情,施展的反间计。三国时期,赤壁大战前夕,周瑜巧用反间计杀了精通水战的叛将蔡瑁、张允,就是个有名的例子。

徐向前、曾中生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和在处理敌特信件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光明磊落的态度以及敌特的供词,明确指示:许继慎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封信完全是敌人阴谋离间我军的一个险恶手段。随即就把这两个特务连同信件和军部的意见一并送到中央分局处理。同时,徐向前和曾中生还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说明了这一情况,内称:“……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钟等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

这里,我们更有严密党的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本是一桩很明显的公案,而张国焘却在曾扩情的那封信上大做文章,并决计从此下手,杀害忠良。其实,张国焘对许继慎没有恶感,他早就认识许,说他“是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爱谈政治”、“对鄂豫皖边区军事上有过很大贡献”。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就听说在军事政治问题上,原特委书记曾中生和红4军负责人都很尊重许继慎的意见,在根据地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张原本想拉许,使许成为自己的左右臂。哪知许不仅不买他的账,反而与张国焘的许多主张相悖,因此,张国焘对许顿生恨意,便在许多场合下对许进行指责,说许在许多方面持有军阀土匪的习气,说红4军反对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是许挑拨起来的,还说许有好几个姘头,在言语中对许暗含杀机。偏偏许继慎为人耿直,不把张国焘这“武大郎”当神仙,所以张见到曾扩情称“继慎吾兄无恙”这句套话,歪曲解释为“亲爱的继慎哥哥”。的确,在黄埔军校,他俩仅仅认识,曾扩情在1队,许继慎在2队,而且曾扩情是有名的“扩大哥”,他在北京朝阳大学读了三年书才进的黄埔,时年31岁。而许继慎是1901年生,比曾扩情小7岁,怎么能称许为“吾兄”呢?明眼人一看这就是客套话,张国焘却就此大做文章,实则可笑。

行文至此,对曾扩情其人,也要作个交代。

曾扩情,四川威远人,1893年生,当过小学教师,后考上成都四川茶务学堂,曾被派往苏抗一带考察茶务,但后来逐渐厌弃茶务工作。28岁他考入北京朝阳大学中文系,在学校就加入了国民党,经李大钊、谭鸿熙等人推荐,与孙元良等八人一起南下,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发榜时,共产党员蒋先云考了个第一名,曾扩情考第二。金榜题名,又中状元,这着实引起不少人的羡慕。曾扩情先加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后来又转舵向右

靠,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主张国共分道扬镳。他毕业后当过国民革命军1军教导师3团党代表,20师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黄埔同学会秘书,主持黄埔同学会的会务,拉拢黄埔同学为蒋介石效命。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曾扩情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在南京成立了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他亲自任招待所主任,并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军校同学,无论参加过任何反蒋组织的活动,只要悔罪归来,决不追究既往,也不迫使作任何交代,而且待遇从优。”在他的网罗下,大约半年时间,就接纳了120人左右,并且给他们分配工作。在此期间,蒋介石分批接见他们,每次召见都由曾扩情陪同。

1931年春,红军在鄂豫皖接连粉碎蒋介石的“围剿”,使他坐卧不安。这时,善解蒋意的曾扩情献计说:“原红1军军长许继慎是黄埔一期同学,因社会关系复杂,一直被中共某些领导人看不惯,不久前又从军长降为师长,心中肯定不满,可乘机对其策反。”蒋介石同意曾扩情去试一试,于是就有了反间计的亲笔函之事。

曾扩情后来官至国民党陆军中将,复兴社的发起人之一,号称“十三太保”,并一度指挥部队政工人员对鄂豫皖边区的“政治围剿”与策反,解放前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12月他被俘,在功德林关押改造,1959年底被特赦后,任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因病在辽宁本溪去世。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说张国焘以分局的名义,于8月派陈昌浩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逮捕,押往新集中央分局所在地,当天即动用酷刑,许、周挺胸横眉,矢口否认陈的指控。陈昌浩无奈,即将许、周绑缚在担架上,用白布蒙盖。徐向前后来回忆说:

“有一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

坡上看着队伍行进,陈昌浩也在,队伍里抬着两副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我就问他:‘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他看了我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力,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都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

当许继慎、周维炯被押走之后,张国焘传令被解职的曾中生也前往新集,说要参与许案的审理,并对自己的错误作个交代。在陈昌浩先行一步之后,徐向前即率领着红4军,撤到河南光山县白雀园。

红4军抵达光山县白雀园后,张国焘亲自坐镇,主持红4军的肃反。张亲自组织了临时法庭,亲自提审许继慎。许继慎站在张面前,怒目而视,挺胸直立,质问张国焘:“根据什么把我逮捕?你要把红4军引到何处去?”张国焘恼羞成怒,下令对许严刑拷打,对许灌辣椒水,灌凉水。当时许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在这种严刑逼供下,他仍词严义正,严厉驳斥张加于他的罪名。

张国焘见严刑不能撬开许的口供,又遂对钟梅桥、任廉洁施以严刑。钟、任因受刑难忍,只好按张之暗示画了押,承认是来联络的,拉走部队。张国焘依钟、任之招供,炮制了一个红4军中存有一个反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许继慎任主席,委员有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廖业琪、肖芳、吴精赤、熊受暄、潘皈佛、姜镜堂。在九个委员中,有五个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将领。张国焘宣称,许继慎、周维炯策划了一个9月

15日在武穴暴动的计划,暴动后即率部投奔国民党。

提审许继慎后,张国焘命政治保卫局人员先后在几天之内,逮捕了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12师政治委员吴荆赤、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10师副师长程绍山、12师副政委庞永俊、10师参谋主任范陀等。至此,红4军的骨干几乎一网打尽矣。对于张国焘的淫威,官兵敢怒不敢言,人人自危,度日如年。

张国焘利用肃反达到排除异己之目的,于9月下旬又在河南光山县白雀园镇火星庙主持召开所谓“公审”大会,企图以此迫使许继慎“认罪”。许继慎被押上会场时,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因其不能行走,被用担架抬了上来。张国焘喝令其从实招供。许继慎强忍伤痛,怒道:“张国焘,你狼子野心,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许继慎,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创建了红1军,扩大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一切,哪个不知?谁人不晓?这都足以证明我许继慎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是黑是白,群众自有公论,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作出公正结论的。”

许继慎慷慨陈词,官兵在下面面面相觑,有人在哭泣,有人在悲痛不已。许继慎最后当众揭露说:“你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

张国焘不容许继慎再说下去,喝令将许捆起来鞭打。立时上来几名彪形大汉,将许从担架上拖起来,拉到庙外。许继慎被捆在庙前一棵树上,一阵鞭打之后,张国焘见许还不招,拍着桌子连声喝道:“将他绑在马上,拖!拖!拖死他!”

这时立刻有人将许从树上放下来,将许绑在马的两条后腿上。在一声鞭响之后,战马飞奔,只跑出十多丈远,许便奄奄一息了!张国焘令人将许抬过来,问许招还是不招。这时许已昏

死。张见状，令人将许抬下。接着又提审周维炯。

周维炯也是由担架抬上来的，头缠绷带，浑身是伤痕，青一块，紫一块，令人心痛。张国焘喝令周维炯从实招来，免得挨揍。周怒目视张道：“你要我口供，老子告诉你，廿年后还要革命！”张国焘又喝令对周动严刑。

公审大会后，张国焘本想将许、周立即处死，但因这两位红军师长在群众中威望很高，怕引起骚动，就没敢动手，只得暂且收监。

第二天，张国焘令陈昌浩组织一帮政治保卫局的人，大造许的舆论，画漫画：许手拿大刀，拎着人头。漫画把许勾勒成杀人魔王，到处张贴。同时又编了一首歌曲，叫《许继慎自叹》，在群众中教唱。苏区城乡处处都贴满了打倒许继慎的标语。

张国焘将许继慎、周维炯收监之后，继续在新集对他俩进行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并派人日夜动员许继慎的爱人王望春检举揭发其丈夫的“通敌罪行”。王望春说：“我丈夫出生入死为根据地打仗，他怎么会是‘改组派’呢？”张国焘一计不成，又威胁她，要她与丈夫划清界线，甚至迫使她与许离婚，否则就要以包庇之罪而论处，弄得王望春日夜啼哭，茶饭不进。

不久，中央交通员陶秉哲由上海来到新集。陶秉哲深知许继慎的为人，到狱中与许相见。他劝许不要悲观失望，坚持真理，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重见青天的。许自知不久将离开人世，但在老朋友的面前，他并没有眼泪，而是抑制住悲伤，坦然一笑之。

陶秉哲来新集，带来了中央11月3日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内称：“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4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中央分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

读者会问，中央怎么这样糊涂？也不调查了解一下真实情

况,就轻信张国焘的意见。这话说来就长了,只好长话短说。

中共中央于1930年9月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在瞿秋白、周恩来等的主持下,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李立三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1931年1月7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改组了中央,强行通过王明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控制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同时会议通过了四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等。从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对党的统治就开始了。

王明何许人也?此人原中陈绍禹,字露清,笔名王明,俄文译名波波维奇。王明1904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今金寨县)。祖父陈毓亭乃私塾先生,其父陈嘉谓在金寨开“陈龙昌”行栈,经营竹木生意。其母喻淑莲思想进步,三个女儿均为共产党员。王明天资聪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28日,与沈泽民、张琴秋、伍修权、蔡和森、孙冶方、王稼祥、乌兰夫、张闻天、李培元等60余人,从上海乘轮经海参崴,于11月28日到达莫斯科并进中山大学学习。中山大学的副校长是巴维尔·米夫,学校的党组织称为“支部局”。米夫24岁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只比王明小3岁。由于王明学习用功,博得了米夫的欢心与青睐,王明当上了“学生公社”的主席。1927年元月,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中国访问,挑选了王明当贴身翻译,从此王明就形影不离米夫左右。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王明担任了“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1929年3月,王明被安排回国,时年25岁。米夫于1930年12月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来指导党的工作。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顺利地爬上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宝座”。有关王明的经历暂且不提,言归正传。

且说张国焘在中央有王明的支持,又有王明好友沈泽民的

赞同,犹如得了中共中央这柄“上方宝剑”,遂于1931年11月中旬,便下了手令,将许继慎勒死在河南新集政治保卫局机关的一间房内。许时年30岁。许的爱人王望春,亦被杀害于英山县城关上河摆。在许继慎被害的同时,被肃杀的还有周维炯、王培吾、熊受暄、姜镜堂、陈翰香、吴荆赤、范陀、肖芳、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李荣桂等一批红4军中的优秀指挥员。

张国焘强加给周维炯的罪名,除了改组派、AB团之外,还将发生在商城的几个问题也罗织在周的头上。周维炯打入丁家埠和杨晋阶民团,策动民团武装起义之事,张国焘却硬说周是“脚踏两只船”,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周维炯在丁家埠民团当军事教练,在民团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1929年5月,与徐其虚领导商南农民和民团士兵举行了“立夏节”起义、成立工农红军11军32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这是在敌人内部的策反,怎么谈得上是“脚踏两只船”呢?周维炯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小师弟,也陪着师兄许继慎一同含冤九泉之下。

对于许继慎、周维炯等屈死的冤魂,徐向前元帅回忆道: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曾找到鄂豫皖时期在保卫局看押犯人的一个同志,问他:‘张国焘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他们有什么口供?’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现得多么坚决!’那个同志还说:‘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没有办法证实许继慎、周维炯他们是反革命。’后来,还是一个叫冷欣的国民党特务说了真话。1942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

许继慎原名许绍局,他父亲临终前,将继慎、希孟二子托付

给六安开明绅士鲍昂千。鲍昂千对好友的这位才华出众的儿子非常器重,但是在那风雨如磐的动荡年代,又生怕继慎因敏捷的才思和出众的口才招致不测。因而在继慎临离六安前,他郑重地将许绍周改为许继慎,号谨生,取继业慎重,一生谨勤之意。由此可知,这位鲍先生可谓用心良苦。许继慎招杀身之祸,原非他不谨慎,只因遇见了张国焘这个“克星”,才含冤九泉。

徐向前和冷欣都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冷欣是国民党清党委员,官至国民党陆军中将。他对陈毅一番肺腑之言,当无虚构成分,许继慎之死,乃曾扩情用的离间计。张国焘利欲熏心,为打倒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将领,落井下石,所以才造成了这一桩世纪冤案!

1945年党召开“七大”时,才给许继慎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并追认为革命烈士。许继慎的后代,当可告慰英灵。俗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张国焘后来叛党投敌,成为千古罪人。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再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代名将曾中生,他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与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同在政治科大队学习,在校名为曾钟圣,字化生,湖南资兴人。1930年11月,曾中生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并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后来徐向前任红4军军长时,曾中生任红4军政委。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后,给曾中生扣上“用局部进攻的名词代替了国际所指示的进攻方针”、“助长了党内家长制下面的党内和平倾向”等大帽子,并于1931年5月12日在新集召开会议,宣布撤销特委,成立分局。实际上就是把曾中生排斥在分局领导之外。曾中生指挥红军多次参加反“围剿”的战斗,对张国焘的瞎指挥抗命不从。对此,张国焘恼羞成怒,并将曾中生调离红4军

考察。曾中生身处逆境,写了大量军事著作。张国焘也承认《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甚有价值,让红军干部人手一册学习。由于张国焘指挥错误,红4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四川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8月,曾中生被张国焘诬陷为“托陈取消派”、“右派首领”,宣布撤销一切职务,曾中生不服。张国焘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用绳索将曾中生活活勒死。一代黄埔名将就这样被张国焘杀害了。1945年延安“七大”为曾中生平反昭雪。正是:张国焘淫威白雀园,曾中生魂飘重宵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天下奇闻 校长谋杀教育长 来迟一步 庆龄愤怒掀茶几

话说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个多事之秋，国内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内扰外患，层出不穷。蒋桂战争刚结束，又爆发蒋阎冯桂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息了混战，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对苏区实行五次“围剿”。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侵略军袭击沈阳，开始向东北大举进攻。东北军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不予抵抗。几天之内日军占领东北全境，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巨头互相拆台。12 月 15 日，在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中，在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孙科的要挟下，蒋介石不得不采用以退为进的手段，宣布第 2 次下野。临行前他会见陈公博，并且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函曰：“全会即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回，还我自由。弟此去须人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

次日，蒋偕夫人宋美龄恭谒国父孙中山之陵墓，尔后乘飞机到宁波，随即驱车到奉化溪口，登上溪口妙高台，到雪窦寺，拜会朗清及太虚法师。每遇动荡年代，绝望之际，蒋介石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寄希望于神灵保佑。

蒋介石每次下野，都要杀人，一为泄愤，二为儆猴。第一次

下野前，枪毙了第 10 军军长王天培；这次下野，又密令把他创办黄埔军校时的最得力助手、教育长邓演达枪杀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在蒋介石一生中，杀了不少黄埔同学，其中级别最高的当推教育长邓演达，邓的罪名是第三党领袖，但其中的奥妙一言难尽。

邓演达是广东惠阳人，简历前面几回陆续交代过，不再重复。邓演达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曾任粤军团长，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战役。黄埔军校成立后，他任该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邓演达敏锐地指出了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因而一度遭到蒋的拘禁。邓演达与张治中、恽代英、高语罕被黄埔军校右派集团喊作“黄埔四凶”。北伐时，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比蒋介石小 8 岁，青年有为，才华横溢。孙中山对其赞叹不已，常说“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两达”就是邓演达和张民达。张民达任粤军 2 师师长，以打仗机智勇猛而著称。孙中山这番夸奖足令心胸狭窄的蒋介石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当时蒋任粤军许崇智部参谋长，与邓演达、张民达共过事。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虽不一定说高于蒋介石，至少是足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不在蒋介石之下。《恽逸群文集》中称：“黄埔出身的学生，是‘蒋家天下’的奠基石，如果这一基石发生动摇，‘蒋家天下’就随时有倒塌可能。民国十七年以后，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领袖相斗争，其惟一优势就是黄埔军人在他掌握之中，为其他国民党领袖所不及。能和蒋介石争夺黄埔军人领导权的只有一个邓择生（邓演达），因此，邓择生是蒋介石的劲敌。”邓演达对学生训话，常历 3~4 个小时，台上台下始终立正。他有一个观点：不能耐数小时立正的人，只配当土匪，哪里能做革命军！邓演达最大的特点就是才气逼人及具有坚定刻苦的精

神。他驭下极严,但处处以身作则,学生与教职员无不敬惮之。陈诚、严重对邓演达最为佩服,认为邓演达是中国革命青年军官的楷模。

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受王柏龄一帮人的排挤,愤而离职赴国外留学。1925年冬邓演达被选为国民党“二大”候补中央执委,1926年2月重回黄埔军校任教育长。邓演达与周恩来配合默契。邓在黄埔任职的岁月正是黄埔军校最兴旺的时期。北伐军攻下武汉后,邓演达忠实地遵循孙中山的遗训,认真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蒋介石在南昌派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宣传科长余洒度到武昌佯称希望邓演达与蒋介石合作,欢迎他赴南昌就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但邓演达明确表示:“对校长个人并无他意,只有贯彻执行三大政策,与一切昏庸老朽的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阵营,才能取得胜利。如他接纳我的主张,我接受他的领导,当不当参谋长无足轻重。”言词铿锵,光明磊落。曾扩情这位说客碰了一鼻子灰,临行前他要求邓演达回封信说明上述意见,被邓演达拒绝了。宁、汉分裂时,邓演达、宋庆龄组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讨蒋,而蒋介石就撤销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两人因政见不合,针锋相对。大革命失败后,汪精卫举起屠刀向革命者猛扑过来。在此危急时刻,邓演达化装成查电线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沿着平汉线先行到郑州,西去潼关转西安,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回国的汽车队,经榆林、包头、穿沙漠,越西伯利亚,于1927年8月15日到达莫斯科,11月在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公开表示讨蒋,继承中山遗志,联俄、联共、扶助工农。1930年5月,邓演达从欧洲秘密回到上海,8月主持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反蒋斗争。到1931年上半年,邓领导的革命运动就

具有一定规模,在社会上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邓演达吸收一部分黄埔同学加入组织,如余洒度、陈烈、黄雍、徐会之、曹霄青、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等,他们都积极参与活动。这些活动均遭到蒋介石的忌恨,认为这是邓与他争夺黄埔同学。余洒度是黄埔二期毕业生,共产党员。秋收起义时他任工农革命军1师师长,后临阵脱逃至上海,参加了邓演达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该会他任黄埔革命同学会召集人,一时各省市均秘密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招募黄埔同学。为起兵反蒋集结了力量。邓演达在上海的活动,深为国民党当局所恐惧,蒋介石派王柏龄到上海,与淞沪警备司令部合谋,侦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并用30万元重金悬赏缉捕邓演达。当时情况十分险恶,很多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当年在黄埔军校任训练部主任的严重曾力劝邓赴香港或日本暂避风头。邓说:“要革命就要反帝,焉能违背民意寄帝国主义篱下?何况帝国主义者同蒋介石一样,到那里以后,他们对我即使不明捕,也会暗杀的。”陈友仁在香港托章克转告邓速来香港,邓复曰:“指挥这么大的一件事,不在国内不行。我们领导革命,不能只顾自己安全,让人家牺牲呀!”邓演达总是以“工作上需要坚持,行动上力求审慎”两句话来宽慰大家,并且一直没有离开上海。

1931年8月17日午后3时,邓演达参加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任道援私宅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典礼时,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特务和静安寺租界巡捕房的中西探一拥而至,将住宅严密包围,当场逮捕了邓演达,总务委员会负责人罗任一。被捕的学员有邓维亚、周竞西(女)、刘奎、王宾荪(女)、金福光、黄锦耀、王素清、方矩、张昌、任树宣、朱丰庆11人。接着他们又在威海卫路741号总务委员会机关抄走银洋600余元和一本7000元的存折,并抓走厨师的客

人许寿祥。同时在愚园路 612 号大同印刷所逮捕了职工刘斌等 9 人；在爱麦虞限路 159 号“中央机关”逮捕了沈维岳，抄走了装有邓演达的文稿、信件及日记等 4 只藤箱；在麦根路 32 号组织委员会逮捕了郑太朴；在拉斐德路桃园新村 8 号黄埔革命同学会，抓走了负责人余洒度、俞墉、韩濬等 20 余人。当时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人称“第三党”，其上海成员被一网打尽。

蒋介石于 8 月中旬由南昌到上海，坐镇指挥，见邓已被捕，遂于 20 日返南京。邓演达等 13 人寄押在静安寺捕房的临时监狱里。8 月 18 日，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求引提邓等人，由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会同公共租界代表开庭审问。邓演达的辩护律师张志让、蔡六乘等做出抗议，但无效。邓即被引渡，于 19 日晨押送白云观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当夜有侦察队一位班长用广东话悄悄地对邓演达说：“从侦察队到法租界距离只有两里，我愿带你同逃，钥匙我能拿到手！”邓答：“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一次脱险的机会，就这样被邓婉言谢绝了。邓错误地坚信蒋不会杀他；如果逃跑，那就给蒋找到了杀他的借口。

8 月 21 日，邓被单独押解到南京，关在羊皮巷军法司“优待室”。9 月 15 日，被捕的其他人也一齐解来南京，关在军法司的临时监狱。在这里，邓通过看守传递了 4 封信给罗任一，亲切地询问大家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勉励大家要趁此机会多读书，锻炼身体。

邓演达被押到南京后，陈立夫就遵照蒋介石之意，先后派齐世英、王柏龄劝降，并许以高官厚禄，均被邓严词拒绝。邓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11 月中旬，邓演达被移至富贵台炮台囚禁。临行前给罗任一写了最后一封信，内称：“我已被

移往紫金山的荒屋上，以后通讯将不可能。”

蒋介石去见邓演达三次，每次去时，只许任看守连的连长、黄埔军校某期毕业生吴良玉一人站在门口守卫，而不许其他任何人接近。他们谈话，蒋的声音总是很低，邓多是大声斥责。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蒋对邓说：“择生，别人反对我，还有可说，你我是多年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讲清楚？你应该同我合作呀！”邓演达答复得很干脆：“只要你听取我的意见，不违背总理的意志行事，我当然可以同你合作，并且能合作得很好。”两人争论一阵，就再也谈不下去了。蒋匆匆走了出来，脸色阴沉而铁青。蒋介石走了以后，吴良玉进去对邓演达说：“我从各方面听到的消息，恐怕对教育长很不利，因为有人在校长面前说你的丑话。这里是我率领的部队守卫，没有别人。由富贵山向北走不到10里，就是长江边上的燕子矶，那里我去准备好一条小船，趁夜黑陪教育长从小路逃走，只需一小时就可到达江边，乘船一夜可驶到上海。”邓演达笑笑道：“你的心意很好。这种做法，不是一个革命者所应干的。我相信蒋介石要沽名钓誉，不敢对我怎样。”这第二次脱险的机会，又被天真的邓演达挡回去了。最后，蒋介石又命陈立夫派李熙元见邓，只要求在蒋介石下野以后，邓不写文章骂他，邓即可释放。邓断然拒绝，他说：“我写什么文章，不是我邓某要写的，是中国人民要我写的。”就在蒋千方百计诱降时，何应钦、何键、何成濬等害怕了，他们联名给蒋去电，说：“邓演达在武汉时期，为共产党张目，现在又叛党叛国，此人不杀，不足以安天下、慰党国。”戴季陶作为蒋介石的“文胆”，趁机向蒋献计曰：“今日之敌，非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蒋介石在办公室来回踱步，难下决策。按惯例，凡黄埔军校师生，如果是叛蒋的，抓捕以后，一般不轻易处决，这有别于其他政治犯。若要枪毙的话，非经蒋亲自

同意不可。中原大战时顾祝同杀黄埔第二期毕业生赵强华团长，蒋获悉后大骂顾越权。黄埔二期同学联名告顾祝同，使他这位黄埔教官也有辱“天子门生”之罪，很长一段时期他抬不起头来。蒋想“挽救”他的学生，在陈赓被捕一事上，也是经过一番口舌的，但此招并不灵验。对于邓演达蒋认为“杀之可惜，纵之可畏”，一大堆黄埔师生要求释放教育长的信就放在他桌边，他陷入了一种极度矛盾的状况之中。尤其是他敬畏如神的宋庆龄以及他当月老为干女儿谭祥撮合成婚的陈诚等等，均有请校长释放教育长的呼吁，因而他真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话分两头。且说邓演达到愚园路讲课，行动极为保密，是谁走漏了风声？这不能不引起邓演达及各省市行动委员会的注意，因为他们要寻找告密者，给予纪律制裁。

首先有人怀疑是蒋介石的新红人陈诚，据《中国各民主党派》中说：“陈诚与邓演达，既有同窗之谊，又有僚属之亲，他俩关系密切。但陈诚为了向蒋邀功，有可能出卖朋友。又传说邓演达一回国，陈诚就执弟子礼前往看望，并表示支持邓的政治主张，愿从18年公积金项下，向邓提供活动经费。陈诚部下的一些干部也参加了第三党的活动，甚至有的材料称，陈诚本人参加了这一组织。”

邓演达的被捕，有人认为陈诚难脱干系，名记者恽逸群就有怀疑，他曾这样写道：

“邓被捕时的住址相当秘密，事前曾有一位隶籍的第三党某军官去访问过他，不久以后邓即被捕，所以有人认为是某军官出卖的。某军官也因此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地位扶摇直上；他又一面拉拢第三党人物，以厚植其势力。”

这位告密的军官显然是指陈诚。不仅仅是恽逸群，而且当

时许多人都这样猜测。

在真相大白后,才知道陈诚是受了冤枉的。陈诚对于邓演达的死,极为悲愤,他曾向蒋介石要求辞职,表示忠义两难全。这让蒋介石大为感动,认为陈诚忠义可嘉,为人老实。

那么,究竟是谁出卖了邓演达呢?此人既不是军官,后来也未扶摇直上。据了解,祸患生于肺腑,原来是第三党中一位受过处分的党徒。此人叫陈敬斋,江西都昌人,绰号“窑公子”,父亲开窑为业,家道破落,生活无着,便投机革命,于1928年春到上海加入了由谭平山等倡建的第三党前身“中华革命党”。在派往南昌工作期间他就有泄密之嫌。1931年4月,他在上海见了邓演达,被安排在上海市干部会地下机关担任文书工作。他到职以后,经常叫喊家庭生活困难,闹着要补贴。邓演达亲笔批给他260元但他还喊缺钱花。6月组织上不得不停止他的工作,当时因是地下组织,轻易不处分干部,经再三考虑,决定调他去福建工作。起初他拒不从命,经多次动员,毫无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来了个大转弯,表示愿去福建,临走前要见邓演达一面,听听指示。原来,这时陈敬斋已被敌中统特务收买,且又包藏了祸心。

8月3日,陈敬斋化名钟春岑,给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内曰:“我是第三党党员,邓演达已经回国,现在上海活动,组织异党。如有需要于我者,请速派人前来联系,唯愿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掩护,并希能资助出洋。”他还写道:“接信后请用登报寻人方式,定下接头地点。”陈敬斋为了探得邓演达的住址,又给邓演达一信,请求在去福建前能够接见他。陈给蒋的信在发出去后,他天天看报,希望找到“寻人启事”。果然,上海《时事新报》从8月9日起,连续四天登出了“钟国昌启事”:
“岑弟如晤,弟寄家中之信已收到,一切均可照办。父亲特着兄

来沪寻弟，望于见报后即来西藏路一品香旅社7号房与林品石君一晤为盼。兄昌白。”启事见报后，陈敬斋十分开心，他按地址寻去，见有五个人在房内。他一进门，其中一个人问：“你姓钟吗？”陈答：“是。”陈接着问：“你尊姓大名？”那人答：“我们是南昌总司令部派来的，邓演达在什么地方？”陈答：“我不知道，他很忙，听说不久要找我谈话，到时候就可以找到。”那人又问：“你怎么知道要找你谈话？”陈答：“王枕心，我的人党介绍人告诉我的。”他们研究了具体引捕办法，陈最后提出要5万块钱，好出国留学。来人说：“只要事情办成了，留学，要钱，都可以办到。”一笔肮脏的交易谈妥了。陈敬斋受宠若惊，黄金美梦就要实现了。从此，他的一举一动也被中统特务暗中盯往，特务们又约他到惠中旅社、远东饭店秘谋两次。8月15日，特务预先拿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签发的逮捕邓演达、季方、罗任一等的“拘捕证”，并将第三党中央及各分支机构地下机关一一侦察清楚，只等在抓邓时便同时破坏。

邓演达接到陈敬斋的信后，向罗任一、王枕心表示可以约他谈话，但时间地点没有说定。

8月17日下午，罗任一奉邓演达之命，将陈敬斋带到静安寺，让他先到愚园路20号去听课，然后接见。陈敬斋进入课堂，一见邓演达昂首挺胸，威武严肃，一身正气，他就禁不住胆颤心慌，同时两耳嗡嗡作响，至于邓演达讲的什么，他一句也未听进去。会开到一半，陈敬斋假装腹疼难忍，要外出买点药，邓才准他离席。他刚走出大门不远，就发现盯梢而来并预伏在周围的几个特务。他们急促地向前低声问陈敬斋：“邓演达在里面吗？”陈只答应一声“在。”接着特务们就制止他说话，很快有一辆汽车开来，把陈推上车，随即送到闸北一家饭店里，当夜乘车去了南京。而后特务们按照事前的方案兵分两路，一部分在愚园路20

号外围守护,一部分进室内抓人。邓演达就这样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了。

再说当外面传说邓演达被捕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就紧急行动起来,准备竭尽全力营救邓演达。

一条线是联络宋庆龄女士,由宋直接找蒋介石要人。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她与邓演达在武汉、莫斯科、德国几次见面,发表声明,公开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邓演达明确表示:“孙中山亲手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完全符合革命的需要,任何个人、任何阶级违反这一原则,都是离开革命阵线,成为革命对象。”宋庆龄为救邓演达“奔走最力”,“仆仆于宁沪之间”。1931年12月14日,宋再度由沪赴宁责斥蒋,并坚持要见邓。然而事已晚矣!原来邓演达已于1931年11月29日夜,被蒋介石所派他的卫队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由囚禁他的茅屋中,移居到汤山。其实这是一种骗局而已。汽车开到南京城东的麒麟门外沙子岗,诡称汽车抛锚,要邓演达下车。邓演达刚走出车门,身后便有枪声响起。一代英杰邓演达,就这样惨死在凶手们的枪下,时年36岁!在宋庆龄再三追问下,蒋才不得不说:“你见不着他了。”宋庆龄惊奇疑惑不解地问:“你把他杀了?!”蒋无言以对。这时,宋庆龄满腔怒火,双颊微微地颤抖,她直起腰,随手把面前的茶几掀翻,杯盏乒乓落了一地。蒋介石见状惊惶失措,急急跑上楼去了。

宋庆龄返回上海,义愤填膺,于12月19日用英文草拟了一份宣言,由临时行动委员会的谢树英翻译后送《申报》发表,此即著名的《宋庆龄宣言》。《宣言》愤而痛斥蒋介石的残忍无耻。

另一条线是通过邓演达的胞兄邓演存。邓演存以家属的身份活动于南京有关方面的上层人物之中。他找到时任京沪卫戍

司令长官陈铭枢打听下落。陈以“蒋介石快被迫下野了,他还敢冒此大不韪吗?只要蒋下台,孙科掌握了政权,释放邓演达还不容易吗”为由,一再劝慰邓演存“放心”。邓演达的妻子郑立真一生没有生育过,曾从乡亲那里过继了一个襁褓中的男孩来抚养,取名邓思干,还从哥哥邓演存那里过继了一个女儿邓京育。邓演达蒙难时女儿才8岁,她一直秉承父志,勤奋读书,解放后在广州从医。

再一条线就是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及黄埔军校学生。由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许沅浦(在校名为许式桢)等计划武装劫狱,具体计划都已拟订。南京教导总队的黄埔军校同学邓克敏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武装营救队进行营救。但不幸事败,许沅浦、邓克敏遭到通缉。另外参加营救的还有朱蕴山、戴鹏天、毛啸岑等多位义士。

邓演达遇害后,陈铭枢深悔莫及,他太相信自己了,觉得对不起邓演存,于是由他具棺殓殓,在小营岗重葬立碑,碑文“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为陈铭枢亲题。解放后,邓演达被共和国追认为革命烈士。

12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发出《中央通告》,号召全党“要在悲愤、惨痛中接受邓同志的遗教,坚实我们的团结,巩固我们的组织,整齐我们的步伐,一致携手踏着先烈光荣血迹前进,剿灭我们的敌人,完成我们的神圣事业”。

12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南京市干部会负责人谢树英号召全市党员:三人为一组,在全市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发放传单,揭露蒋介石的罪恶,控诉蒋介石滥杀无辜,坚决为邓演达报仇!

邓演达被害后,各方面都为之痛惜。1931年12月底至1932年1月上旬,有胡汉民、孙科、冯玉祥、李济深、李烈钧、居

正、程潜、唐生智、黄绍竑、张发奎等 94 人；有中华劳动大同盟、中国革命学生总会、中华青年军人联合会、中华妇女促进会、中国知识劳动大同盟、黄埔革命同学会等 25 个团体，分别在上海《申报》连续刊登了《筹备邓择生先生追悼会启事》。当时各社会团体纷纷举行追悼会，而躲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在闻讯后却气得不断大骂他们是党国败类。

再说叛徒陈敬斋于邓演达被捕后的第二天早晨回到南京，被带进中统特务机关，在问明他的姓名、年龄、籍贯后，又被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秀峰接见了。叶对陈说：“事情办完了，你可以在我们这里工作。”陈说：“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这里不安全。”双方讨价还价，最后叶答应付给陈 1 万元奖金。到 8 月 19 日只给了 500 元，又过了几天，给了 1500 元。9 月 1 日，侦察队长邓警铭拿了 6000 元交给陈敬斋，并说：“你的奖金都在这儿，我用了 2000 元。”说罢就催陈赶快走。

陈敬斋尽管又气又急，可他心里明白自己干的什么事，而今敲他的竹杠的又是什么人。他也只好自认倒霉，像一条癞皮狗，夹着尾巴回到江西景德镇。陈敬斋回去后，在家藏了三个月，才敢出头露面，重操旧业，与人合伙开了一个瓷窑，自产自销，以为便从此平安无事了，哪晓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1938 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抗日救亡，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 年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该党党员何序东多方打听陈敬斋的下落，终于通过向法宜找到了陈的住址。这时，国民党的败亡已初见端倪，何序东当时是农工民主党江西省负责人，他问向法宜：“陈敬斋的事，什么时候动手？”向法宜深明其意，说：“什么时候要处置陈敬斋，我可以效劳。”1949 年，共产党已打过长江，人民胜利在望。4 月，景德镇解放了，向法宜于 6 月从都昌去景德镇，特地到青风岭 19 号利兴富瓷铺前去“看望”

陈敬斋。“老朋友”相见，说话投机，陈敬斋的一切情况都摸清楚了，但只字不提邓演达的事，恐怕打草惊蛇。

1949年11月，农工民主党第5次全国干部会议上提出了“逮捕叛徒陈敬斋归案法办”的提案。在周恩来、董必武、罗瑞卿等的支持和帮助下，1950年3月初，农工民主党中央派陈其勋带着公函到南昌，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具体逮捕方案。于3月8日上午，由向法宜领路，浮梁地区公安局两名便衣民警前往陈敬斋的瓷铺。他们以谈生意为名，引陈敬斋出洞。当陈敬斋来到景德镇公安局门口时，民警对他说：“进去吧！”这个叛徒就是这样进了监牢。不久，陈敬斋被解押往南昌，然后再送到北京，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1951年3月22日向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提起公诉。经过三次审讯，到4月23日下午，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农工民主党中央负责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副官季方，委员严信民、成员王一帆、杨逸棠、王人旋、陈卓凡、欧阳平、叶粤秀，还有1931年为邓演达当辩护律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张志让同志应邀参加旁听。2时许，叛徒陈敬斋和凶手、原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邓警铭，双双穿着灰色棉囚服，带着镣铐，锒铛进入法庭。在审讯中，陈敬斋对他叛党投敌、谋害邓演达等罪行供认不讳，审判员最后问他：“陈敬斋，对你这个案子，你自己还有什么意见？”陈敬斋答：“我罪大恶极，听候政府处理。”4月25日，军事法庭最后开庭，宣读了“军字第245号判决书”：“陈敬斋，江西都昌人，53岁。该犯变节投敌，应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财产没收。”陈敬斋被押出法庭，执行枪决。叛徒陈敬斋作恶后长达20年之久，但终于逃不脱人民的法网，落得个如此可耻的下场。

另外，与邓演达一同被捕的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共产党员、秋收起义工农红军1军1师师长余洒度，在叛逃后任黄埔革

命同学会的临时召集人。他得知设有“自新同学招待所”，便想去，可是又怕被蒋拒绝之，于是便写信问黄埔一期师兄曾扩情。曾扩情写信回答：“来与不来，我不能代作决定，只要能相信我决不会有别的坏意，就请早点来。”余洒度读罢信，一边回信，一边向招待所求准。信到时人也到了。曾扩情陪他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因他曾任过黄埔同学会宣传科长，颇为器重，宽恕他能“迷途知返”，后来发展他为复兴社的成员。刘健群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时，派余洒度任冯占海部 61 军的政治部主任，驻河北高邑。1934 年，北平宪兵 3 团团团长、黄埔军校一期师兄蒋孝先检举他有贩卖毒品的事，被逮捕到南昌，由蒋介石下令枪毙了。曾参加过黄埔革命同学会的黄埔一期学生黄雍，被捕后关了三个多月，被武汉行辕主任何成浚放走。在流离颠沛中他到了南京，见到黄埔一期同学鄯悌，受到他的优厚待遇。当时黄雍问鄯悌：“校长为什么一定要杀邓教育长呢？”鄯悌说：“校长认为对邓演达处置要严，对学生处置则应从宽。”所以黄雍、陈烈、徐会之皆恢复自由，并保证人身安全和给予工作。正是：从宽从严有分寸，真正对手不放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告别上海 周恩来巧进苏区 叛徒告密 挥代英血洒金陵

话说1927年10月28日深夜,也就是南昌起义后的89天,正值潮汕失败后的危急时刻,当时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亲自带领一部分起义军官兵,护送周恩来、叶挺和聂荣臻脱险,保存了中共一批领导干部。杨石魂功不可没。杨是1924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在广东他与彭湃同志齐名。

1928年底,杨石魂在上海接受李立三、杨殷、邓小平的委派,去武汉重建中共湖北省委,并任常委兼秘书长,但不幸被敌人逮捕,光荣牺牲。杨石魂最小的妹妹杨敏多年来对长兄杨石魂烈士的革命事迹做了广泛的搜集工作。她介绍周恩来在潮汕脱险的详细情况时说:

“南昌八一起义的枪声响起后,时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的杨石魂奉命率东江革命军策应,9月23日迎接南昌起义军并在汕头建立革命政权,七天后受强敌包围,又被迫撤退。10月3日,周恩来在普宁流沙主持了军事会议。起义军从流沙向海丰撤退时,由于遭到地主与军阀武装的袭击,队伍被冲散了。杨石魂紧紧护随在周恩来、叶挺、聂荣臻身边。当时周恩来患疟疾,有时因高烧而神智不清,必须迅速转移到香港就医。杨石魂通过陆丰县委和基本群众,把周恩来隐蔽在陆丰甲子、金厢等地。10月28日,风势稍小,杨石魂等立即护送周恩来等登船起航。杨

石魂与叶挺、聂荣臻等人在舱面上两天一夜忍着海浪的冲击,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险情。抵岸时,杨石魂又背着高烧中的周恩来涉水登坡。后来他又找到省委,安排好了周恩来的养病事宜。经过几天的急救,周恩来终于清醒过来,病情稍有好转,又参加了研究广州起义的重要会议。周恩来病愈,要去上海,杨石魂和一直护理他的一位同志送他上船离港。”

周恩来抵达上海后,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一直忙得团团转。1928年上半年,他尽管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同新的领导人的关系也明显缓和,但和邓颖超并没有过上什么安宁的家庭生活。1925年8月8日,周恩来邓颖超这一对在学生运动中相识,在革命风浪中相爱了六年的恋人,在广州一个很简朴的小房间里结婚了。从此,他俩生死相依,携手奋进。

东征时期,婚后不久的邓颖超曾与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蒋介石的夫人陈洁如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到东江前线慰问黄埔军校师生。1927年3月21日,周恩来在上海指挥工人起义的这一天,远在广州的邓颖超却经受了一场终生悔恨的磨难,即他俩爱情的结晶,第一个孩子因难产窒息而不幸夭折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周恩来两次遇险,被他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斯理、胡靖中悄悄地放走,此时,邓颖超则在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中,因产后住在医院里,情况非常紧急。在医护人员的掩护下,邓颖超化装逃出了广州,直到5月,她与周恩来才在上海重逢。夫妻相见,席未暇暖,周恩来奉命赴武汉开展革命工作。邓颖超也于6月到达武汉,参加了陈赓与王根英的婚礼,并见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新婚妻子,也就是恽的亡妻沈葆秀的四妹沈葆英。恽代英与沈葆秀十年前成婚,不久沈葆秀病故,他就决心不再娶,因此黄埔军校的同事尊称恽代英为“圣人”。在武汉,周恩来见到了毛泽东、李立三、张太雷、董必武等许多中

共领导人,革命形势大好,然而不料,汪精卫叛变,革命又危在旦夕。7月下旬,周恩来经九江赴南昌准备武装起义,与邓颖超又在惊涛恶浪中分别了:一个转战在南昌起义后的漫长的南征途中,一个坚持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进行工作。两人都是蒋介石要捉拿的“要犯”,直到这年冬天,他俩人才在上海再次重逢。

周恩来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28年5月初,他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会议。当时组织上决定邓颖超陪同周恩来前往,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经青岛、大连,再转赴吉林。组织上安排周坐头等舱,结果被敌人盯梢。在船到大连时,日本水上警察厅来了几个人,对周恩来进行盘问。一名警察问:“你是做什么的?”周恩来稳住神答道:“我是做古玩生意的。”警察又说:“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邓颖超接着回答:“船上没事,可以看看。”警察盘问: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周恩来说:去东北吉林看舅舅。当时警察似信非信,不许再做辩解,就带着周恩来去了水上警察厅。邓想也想去,周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他告诉警察让他们帮邓找旅馆,先将邓安排住下。随即周恩来就被警察带走了。当时,邓颖超心急如焚,由于人事凶吉难卜,因而总是放心不下。两小时后,周恩来安全回到旅馆,然后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马上烧掉。”邓马上找出证件,来到卫生间里,撕碎后投入马桶里。他俩沉着、镇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有说有笑地去楼下餐厅用餐。

对这件事,邓颖超回忆说:

恩来同志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同他聊天。

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要做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我们了。住进旅馆，恩来同志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为什么未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我们怕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扰了伯父。我们仍然没有脱离侵华日本军人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另一方面，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占领南京后，继续经山东夺取东北，咄咄逼近，使在华北、东北一带奉军和日军认为共产党失败了，主要对付国民党，对我们有所放松，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痹。所以，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这是我第一次当了周家的媳妇啊。

从上海出发到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的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后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

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是继续去车站，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才同哈尔滨的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周恩来于1928年10月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所领导下的中央军委，训练和派遣了大批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事干部，如徐向前、陈赓、许光达、周逸群、林彪等，支援各地红军以及从事国民党部队中的兵运工作，总结交流各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经验，指导红军根据地的建设，并筹划和建立各根据地的红军与中央的交通网。周恩来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主要任务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做好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的安全工作。当时先后有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寿昌、陈养山、刘鼎、柯麟、贺诚等同志参与策划和执行隐密任务。1931年2月7日，共产党员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同志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事后周恩来就命令中央特科严厉制裁告密的叛徒。3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从上海赴武汉。不料，4月24日顾顺章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由于他是个软骨头，胆小鬼，所以被捕后即变节投降，并很快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致使10多位同志被捕牺牲。顾顺章尚嫌邀功不够，又提出要面见蒋介石，欲向蒋提供更为机密的情报。这样，武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如获至宝，连续六次密电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因这天正好是星期六，徐到上海度假去了，于是，密电落到了机要秘书、潜伏在中统内部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手里。钱将电文译出后，连夜派人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了中央特

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周恩来在得知消息后,下令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地址全部转移。4月27日,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亲自接见了。顾除出卖了已经被关押于监狱里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外,还把中共中央机关及其重要负责人在上海的地址和盘托出告诉了敌人。由于周恩来立即通知转移,使顾顺章带领特务在上海一网打尽中共领导人的大搜捕扑了个空。周恩来指挥“打狗队”将顾顺章的家属执行了组织措施,惩处了内奸,消除了隐患。同时将陈赓、胡底、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迅速转移。新的中央特科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组成,由陈云总负责。

1931年夏,在潘汉年接替陈赓主管情报科不久,就对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大特务王斌进行了镇压。他还镇压了国民党中统“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反共老手马绍武。有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黄警魂,当初在黄埔时加入中共,突然他要投奔国民党,开始,周恩来想劝阻他,最后,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只好定他为叛徒,并下令处死他。周恩来认为黄证据确凿、事情紧迫,他只好迅速作出决定“先斩后奏”。这对周恩来说,乃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制裁黄埔学生,他认为黄警魂的行为已威胁党的生存。

1931年12月,周恩来奉命赴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他满脸胡须,头戴鸭舌帽,身穿藏青色哗叽对胸上装和深灰色洋布新裤,脚蹬一双厚底木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10岁左右,像40岁的工人。邓颖超送他到十六铺码头,握手告别。周恩来在交通员“小广东”的护送下,登上了停泊在江边的英国小火轮。两年前的秋天,周恩来为沟通中央和苏区的联系,指示中央交通局开辟了一条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到达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如今,周恩来沿着这条蜿蜒曲折、长达数千

里的秘密通道,战胜恶水猛兽,冲破道道险阻,进入了自己的中央苏区。12月22日,周恩来抵达福建长汀,23日来到江西瑞金,受到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在给上海临时中央的电报中他写道:“伍豪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就在周恩来到达长汀的那一天,被迫二次下野的蒋介石正偕夫人宋美龄从南京返回奉化溪口老家。

顺便说一句,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及《申报》等各大报纸,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启事原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笔名,这是中共党内许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公开秘密。1932年2月16至21日,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伍豪启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国民党特务污蔑造谣、蛊惑人心的惯用伎俩。为了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诡计,让真相大白于天下,2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刊物《斗争》杂志,发表了一则对于《伍豪启事》的辟谣短文。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伍豪启事》,实际上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1932年3月4日,上海《申报》以醒目的大字为标题,刊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全文如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有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笔者注)41号6楼5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个笔名。这则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字而用周少山的名字,又说伍豪是周少山的别名,这是十分巧妙的。一方面,它戳穿了前一个《伍豪启事》伪造的真相;另一方面,又必然地引起了敌人的惊慌失措。国民党特务尚不知周恩来此时已不在上海,见此启事后,就派人找巴和律师,问伍豪在哪里。当时巴和诙谐地回答:“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伍豪仅仅是他的别名,你们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听了这番话,国民党特务碰了一个软钉子,便快快退去。

据说此启事为潘汉年所作,而国民党的《伍豪启事》则是国民党中央部调查股总干事张冲的“杰作”。这场笔墨官司,周恩来知道后哈哈大笑不止。潘汉年的机智斗顽敌,使“伍豪启事”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张冲后来致力于国共第二次合作,对中共提出友善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41年8月11日他病逝于重庆,周恩来曾著文悼念,此是后话。

且说中共主要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党。他向蒋介石供出了恽代英，总算使蒋抓了个中共头面人物，顾想以此乞求活命。

恽代英，又名遽轩，字子毅，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早年在武汉中华大学读书，“五四”运动时，参加并领导罢课、示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与湖南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遥相呼应，团结教育青年，传播革命思想，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安徽、四川等地从事教育事业，开展革命活动，1923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及《中国青年》杂志主编、兼上海大学教授，1924年国共合作后，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1926年他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黄埔中共党团书记，从此他与蒋介石打上了交道。恽代英讲授《政治学概论》和《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两门课，深受学生爱戴。当时在黄埔军校中他是最具才华的“笔杆子”。他反对戴季陶等“西山会议派”的所谓“理论”。当戴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后，恽代英立即在《中国青年》第87期上发表《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戴季陶所鼓吹的“仁爱性能说”，只是企图实行“愚民政策”，“反对工农阶级势力的扩大与他们阶级性的发展”。恽代英作为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理论家，在与右派集团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和痛恨。因此恽代英被称之为“黄埔四凶”之一，而其他三人是：张治中、邓演达、高语罕。

1927年1月，在大革命的高潮中，恽代英回到了武汉，江城已是一派革命景象。2月份，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两湖书院开学，恽代英担任学校常务委员兼总政治教官。蒋介石“四·一二”背叛革命后，4月23日恽代英在武汉阅马场举行了有武汉各界

群众 30 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出版《讨蒋特刊》,发表了“讨蒋通电”,拟写了“告各期全体同学书”、“讨蒋宣传大纲”,号召“本校各期学生武装为讨蒋前驱”、“密拿蒋介石交人民裁判”。蒋介石在南昌获悉后,对这位文弱书生的“笔杆子”恨得咬牙切齿。在黄埔军校数以千计的教职员中,他最恨的有三位大员,一是邓演达,二是周恩来,三是恽代英。

在武汉,恽代英反蒋最力,他口诛笔伐,把黄埔军校师生的反蒋情绪整个儿调动起来了。恽这位对手不可轻视,于是蒋介石就下令全国通缉恽代英。蒋认为,邓演达和恽代英就是属于非杀不可这一类的劲敌,放了恽代英,等于放了百万大军。所以他一直注意恽代英的动向,四处缉捕,但一无所获。陈延年、向忠发、何孟雄、熊雄、肖楚女、李求实、林育南、邓恩铭、李硕勋、蔡和森等共产党“头目”都杀了,唯独恽代英没有音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当蒋在紫金山为中山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谒陵时,顾顺章为之供出了恽代英。蒋介石礼毕,步出灵堂,朝西一望,只见明孝陵苍松翠柏,枝繁叶茂,大有王者之气,突然萌发了为自己选墓地的念头。他下令要肖萱即日来宁,为他在紫金山找块墓地。不提。

在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听了顾顺章的招供后,起初还以为顾顺章故意造谣。4月28日,王震南大驾光临中央军人监狱,来到“星”字监房,从口袋里他掏出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戴眼镜的照片,并得意洋洋地说:“认识他吗?”恽代英看到自己的照片,心里明白国民党已知他的真实身份,王作林的化名被揭开了。他马上轻蔑而又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王震南说:“恽老师,你受惊了,我们不知道是你,委屈你了,我马上报告蒋校长。”说罢,他转身就走了。听口气,这位王震南好像也是黄埔军校学生,但笔者查遍了黄埔军校同学录,也找不着他的大名。王

震南上气没下气地跑到蒋介石面前报告：“他虽没有戴眼镜，但他一见了我就承认了。”蒋介石连声说：“那好！那好！”蒋吩咐改善恽代英的待遇，先不要急，慢慢来开导。

从此，恽代英转到“智”字监，单人房，待遇好些。

恽代英是怎么被捕的呢？这话说来太长，只好长话短说了。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到上海沪东去开工人活动分子会。会议结束，在洋泾途中，突然碰到便衣特务搜查行人，他回避不及，不幸被捕了。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不管国民党反动派怎样严刑拷打，他始终坚定的回答：“我是一个失业工人！”由于被捕时，他机智地抓破了自己的面容，敌人认不出他就是恽代英，面按一般政治犯判处5年徒刑，把他关在漕河泾监狱，犯人名字叫王作林。在狱中，他说自己是武昌电话局的失业工人。在上海关押了5个月，又转至苏州，1931年又押解至南京江东门外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这监狱名义上是关押犯法军人，实际上大都监禁的是政治犯。恽代英虽说自己是“工人”，但国民党狱吏见他气宇不凡，文质彬彬，在犯人名册上对“王作林”打个大问号。后来，国民党中央特务领着顾顺章来监狱辨认真伪，恽代英被顾一眼认出，于是就有了王震南拿着照片核对事实真相的那一幕。

蒋介石派了不少国民党大员前来劝降恽代英，好言抚慰：“你是本党中央委员，中国青年的领袖，黄埔军校的总政治教官，后来又是军校的实际负责人，为党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现在的军政官员中，大都是你的学生，你回本党工作，蒋校长绝不会亏待你，你的同事和学生会尊敬你，何乐而不为？”

恽代英只回答了一句话：“我生就了是苦命，享不了清福！”

在黄埔军校任过职的教官、恽代英当年的同事一个个来说客，他们都碰了钉子。恽代英稳如泰山，坚如磐石，他不会拿

信仰作交易。他从秘密渠道得到消息，周恩来曾派人通风报信，要他在4月底做好出狱的准备，党会派人来救他脱离虎口。然而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一切都化成了泡影。恽代英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出狱无望，与其苟且偷生，不如视死如归，保全名节。所以，不管是谁来劝降，他多半一口回绝，有时干脆闭口不说一句话，使劝降者大失所望，只好悻悻然离去。

蒋介石从叛徒顾顺章的“自白书”中了解，1928年共产党“六大”以后，恽代英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和宣传部秘书长，一直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搞地下工作。在“六大”前，恽代英从武汉跑到江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当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代理宣传委员会主任。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又参加广州起义，是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转移到香港，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由于他反对党内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反对李立三的错误盲动观点，被扣上“调和主义”、“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受到排斥打击。1930年春，恽代英被赶出中共中央机关，下放在上海沪东当区委书记。恽代英是国民党悬赏30万大洋搜捕的对象之一，他既不熟悉沪东情况，眼睛又深度近视，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是，他不怕任何艰难险阻，顶住压力，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他穿上工人服装，化名王作林，乔装为武汉来沪的失业工人，住进沪东贫民窟，深入到工人中去，不怕累，不怕苦，不在困难面前徘徊却步。恽代英是位能上能下的坚定的共产党员。

蒋介石是在黄埔军校认识恽代英的。在他的印象中，恽代英一副知识分子派头，难怪当过大学教授。在黄埔教官中，数邓演达最严厉可惧，而恽代英则最可佩可爱。恽代英天生让人有一种亲切感，他觉得恽代英的长相很像国民党一位已逝去的重要人物朱执信。蒋介石之所以对朱执信印象深，是因为孙中山

曾将他与之比较过一番,夸奖他不仅意志坚定如朱执信,而且军事才能还犹有过之,这种比较实在是太抬举恽代英了。爱屋及乌,蒋介石对朱执信那份好感也就推及到恽代英身上。其实,朱、恽两人虽然长相文弱,一副秀才模样,但气质还是有区别的。朱执信宽厚有长者风度,恽代英则坚毅有英雄气概。恽代英善于做青年思想工作,黄埔莘莘学子对恽代英崇拜得五体投地,都说他的文章改变了人生的价值观。有的在《中国青年》上见过恽代英的论文,仰慕大名已久。因此,恽代英踏上黄埔岛后,就成为学生们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恽代英讲课的方式不拘一格,他不喜欢在教室里照本宣科,而是常常把学生带到操场上,中间放一张桌子,由他即兴而谈,学生随便发问。恽代英理论修养高,人又善辩,加之言谈诙谐,且又幽默,这怎么能不让学生爱听他的课呢?蒋介石想到这里,吩咐侍卫官说:“你去请恽代英来,我便饭招待,与他好好谈一谈。”蒋介石还在做梦,企图把恽代英软化过来,为他效劳。

恽代英被引进蒋的办公室。侍卫官请恽坐下。随后,蒋从侧门走出来。

“子毅兄,记得在广州黄埔岛吗?那时我们多有趣!”蒋介石不停地说话,怕冷了场面。恽代英回忆道:“我记得,当时在黄埔吃饭,就有明显的等级制。我初到黄埔,承蒙关照,让我享受与校长同等待遇。”蒋介石说:“可是,你后来不领情,还写文章批评我,说这是封建等级,铺张浪费,在革命年代,师生应同甘共苦,不能分尊卑贵贱,高语罕与你一样,指责我搞特殊。”

两人从黄埔创校谈到北伐,蒋介石不由得气愤填膺,说:“在武汉,你天天写文章骂我,还发动那些无耻之徒骂我,事情都过去了,我不计较。只要你回心转意,党内、军内任何职务由你挑,绝对满足你的要求。”

恽代英说：“我是苦命，当不了官，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一餐饭吃得十分不痛快，送走恽代英。这时杀与不杀的两难情绪又袭上蒋的心头。“杀之可惜，纵之遗患”，经过几天慎重考虑，蒋介石在办公室写下手令，就地枪决恽代英。

1931年4月29日中午12时，牢门打开了，恽代英唱着《国际歌》走出监狱。在刑场上，他毫无惧色，气宇轩昂地演说：“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于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果！”敌人急忙执刑，第一个执刑者两手颤抖，许久扳不动枪机，执刑官连忙又换一个人，又与前者一样，最后换了个姓朱的老手，让他开枪。恽代英在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之后，随着一声枪响，就倒在血泊中了。时年36岁。

恽代英临刑前，在牢壁上写了一首诗：-

浪迹江湖忆归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拚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说也奇巧，两年后，当陈赓被叛徒指认出来，关进恽代英原来住过的监狱里，他触景生情，想起恽代英的那首诀别诗，于是也在牢壁上套用原韵，和了一首：

沙场驰骋南北游，横枪跃马几春秋；
为扫人间忧患事，小作南牢试作囚。

英雄所见略同，正是：热血壮中华，英名标青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中敌埋伏 周逸群洞庭献身 火线肃反 贺军长痛失德昌

话说戎马倥偬、骁勇善战的共和国元帅贺龙，他与朱德、刘伯承一样，是从讨袁护法从军人道的。与朱、刘不同的是，贺龙是靠两把菜刀起家的，早期的军旅生涯带有浓厚的梁山好汉味儿。对于贺龙的这段战斗经历，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贺龙坐在牢房里写检查时，曾这样写道：“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队长。”毛泽东1926年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改编时曾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两把菜刀闹革命这段经历，对于贺龙早期辗转起落的军事生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么，对贺龙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又是谁呢？这人就是周逸群。

周逸群何许人也？此人乃贵州铜仁人氏，字立风，曾用黔铁、易穹、左应龙等化名。他祖籍湖北蒲圻，1896年6月25日生于贵州铜仁，书香门第出身。1919年他去日本东京庆应大学读书，1923年回国，1924年8月，他从上海到广州，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二期学习。入学时，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废书学剑走羊城，只为黎元苦匪兵，斩伐相争廿四史，岂无白刃可忘秦？”诗中表明了他的爱国志向。入校后不久，他经鲁易、陈公培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黄埔军校第二期中共支部的宣传委员。毕业后留校编辑《青年军人》刊物,从事宣传工作。1926年7月北伐时,周逸群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队长。部队进入湖南,正好这时贺龙率部从贵州出发,沿途激战,攻下常德,司令部设在一栋砖楼上。贺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1师师长。一天早晨,副官报告说:“师长,您常念叨的那个周逸群来了。”贺龙一面说“请”,一面迎了出来。

贺龙初次会晤周逸群,见他身着灰色北伐军军官制服,显得特别精神。贺龙把他待为上宾,其地位不亚于参谋长陈图南、秘书长向劲秋。刚坐下两人就热情地交谈起来。

周逸群又是怎么来到贺龙部队的呢?原来,四年前,贺龙任熊克武讨袁联军混成旅旅长,驻扎贵州铜仁时,司令部正好设在周逸群家中,贺龙从他家中见到不少宣传共产党和俄国革命的书,他就叫部将贺锦斋经常念给他听,并打听到房东的儿子周逸群在广州黄埔军校念书,听说是个共产党员。贺龙叫贺锦斋以他的名义给周逸群写信。周逸群回信并寄来一些“红脑壳”的书。从这时起,贺龙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学说。

1926年9月10日,周逸群带着由五十三名青年学生组成的北伐军左翼宣传队成员,从长沙来到常德,踏进了贺龙的司令部。贺龙见了周逸群,笑道:“逸群,我的兵可把你家的粮食吃了不少!”周逸群答道:“只怕你吃得不多!”贺龙说:“逸群,我想党、盼党,你来得正及时!”周逸群将周恩来临行时的嘱托,共产党的宗旨,国内外的形势,一一向贺龙讲了,并解答了贺龙提出的各种问题。两人直谈到金鸡报晓,只恨相见太晚。

不几天,贺龙就向周逸群提出入党要求。周逸群说:“贺师长,共产党的大门向你敞开着,只要你的条件够了,我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在南昌起义军率部从会昌到瑞金时,在瑞金

城边一所小学校里,贺龙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了贺龙的入党宣誓仪式,他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他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此是后话,不提。

话转回头。贺龙任命周逸群为1师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带来的五十三名宣传队员,也分到各团、营中,担任指导员职务。

周逸群来到贺龙部队,使1师的面貌焕然一新,他帮助贺龙改造和扩充部队,培养干部。他们从部队中挑选了一批青年军官,又招收了两千多名进步青年,在桃源县办了一个讲习所,向学员灌输马列主义,进行军事技术训练。在周逸群的帮助下,贺龙的部队的军政素质明显地提高了。北伐军在打到河南临颖进行决战中,贺龙与周逸群率部全歼奉军,生擒张作霖的一个军长,获得重大战果。后来,回师武汉,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部主任。周逸群根据党的指示,以黄埔军校和农讲所的学生为骨干,组成20军3师,周逸群兼任师长,徐特立任党代表。

1927年10月,贺龙率20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周逸群由潮汕乘船赴上海找党组织,船上又巧遇在会昌战斗中负伤的陈赓,两人结伴到了上海。而后他们又遇到了取道香港来上海的贺龙,战友重逢,分外兴奋。当时,党中央准备派贺龙去苏联学习,贺龙却想回湘鄂西老家开展武装斗争。他将此心情告诉了周逸群,周逸群表示支持,并向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作了汇报。中央经反复研究,决定组织以周逸群为书记,贺龙、柳克明、徐特立等为委员的湘西特委,领导湘鄂边区的武装斗争。

1928年1月,周逸群、贺龙等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和两支手枪,抵达湖北监利,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们组织武装,在

荆江两岸发动年关暴动，队伍很快发展到一千余人，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5军，贺龙任总指挥，贺锦斋任军长，周逸群任党代表。该军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是黄埔军校三期肄业生肖仁鹄，第二大队大队长滕树云，第三大队大队长刘绍南。年三十这天他们杀了三个大恶霸：石首的张烟庆、监利的郭老七、华容的岳老八。老百姓奔走相告，说贺龙到了洪湖，活龙得水，要乘云上天。

2月中旬第5军攻打监利失利，部队撤回到焦山河，贺龙在此召集各游击队、县委负责同志开了联席会议。中共中央给贺龙、周逸群的任务是去湘西拉队伍，他们不能在洪湖久留，因而便决定带贺锦斋、李良耀、卢冬生、黄鳌去湘西发展队伍，洪湖由李兆龙指挥。肖仁鹄是黄埔出身，瞧不起打野雁出身的李兆龙，肖把队伍拉走了。后来，肖仁鹄的部队改编成工农革命军，肖任军长，1928年7月他被调河南省任军委书记，曾领导了杞县的劫狱斗争，11月被国民党逮捕，1932年2月被敌人杀害。

顺便说一句，黄鳌也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家在临澧，在黄埔加入共产党，1928年赴湘西，任贺龙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同年9月，在石门遭国民党包围，率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

贺龙回到老家湘西桑植县拉队伍，周逸群赴湖北洪湖一带领导鄂西地区斗争，从小到大地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红4军，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并开辟了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为了实现把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和江汉平原红色区域联成一片的设想，1930年上半年，贺龙三次率红4军东进，7月初，与周逸群为首的红6军在公安胜利会师。会师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组成红2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由红4军改编而

成),周逸群任政委。红2军、红6军两大革命武装的会合,使湘鄂西革命武装斗争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从1928年到1931年,贺龙、周逸群三进洪湖。由于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贺龙、周逸群受令东进,执行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要求不停顿地强攻硬打,说什么必要时要打“叫化子与龙王比宝”的消耗战。中央先后派邓中夏、柳直荀(即柳克明)、夏曦来洪湖地区,他们把“左”倾当右倾批,认为“右倾仍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这就迫使红3军在5月份的张家场战斗中同敌人进行持续八昼夜的激烈战斗,以致元气大伤。6月初,敌川军趁红3军远在襄北之机,进攻洪湖根据地。苏区内部顿时紧张起来,幸亏贺龙、周逸群率红2军团赶来,在新沟嘴用诱敌进入预设阵地和迂回到侧后使其两面受敌的战斗,击败川军,才转危为安。但王明路线给整个洪湖苏区依然带来极大损失,洪湖革命尚处于低潮之中。

1931年5月,两广爆发反蒋事件,国民党新军阀间的矛盾又趋向尖锐。由于“围剿”洪湖苏区的国民党徐源泉等部相继撤出,因此红军打了几个胜仗,在打败郭勋部后,监利、沔阳、潜江三县县城外的农村全部占领。

就在这个时候,夏曦突然以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取消湘鄂西特委。这样一来,周逸群就没有了职务,夏曦便给他安了一个巡视员的位子,要他去长江以南检查工作。夏曦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撤了周逸群的党内外职务,夏曦为什么这样做?一是他看到周逸群在苏区党政军民中威信太高,无形中使得自己威望降低,妒嫉之心使得夏曦视周逸群为眼中钉、肉中刺。周被撤职的消息一传开,段德昌、董朗、段玉林、彭国材等军队负责人当即去找夏曦,问个究竟。段德昌、董朗、段玉林三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对于周逸群同学的撤职,他们非常不满。但夏曦以中央指

示压他们,段德昌愤愤地说:“逸群,我要去中央,当面问问王明,他和夏曦为什么要这样做?”周逸群一听,立即摆手说:“德昌,不可,中央自有中央的部署,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决定。”夏曦曾是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的政治部主任,在党内虽比他们资格老,但他却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以后还害了不少忠良。夏曦其人,以后专门交代,暂且不提。

且说周逸群遵照夏曦指示,当天半夜便悄悄地动身。这天夜里,西风大作,洪湖内波浪滔天,周逸群乘一叶小舟,悄悄离开了瞿家湾,过长江,直奔江南。他先后在踢西湖找来江右军副总指挥蔡玉昆,并和他商量如何集兵偷袭石首县城,夺回抢走的粮食,以解群众无粮之难的问题。正在这时,华容鲇鱼须有三名党员干部被土豪指使一部分中农反水杀害。在这三名干部被杀害后,一下激起梅山湖各村群众的愤怒,他们要求血洗鲇鱼须,为死者报仇。周逸群一听连忙制止,说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不能派兵去镇压。调解了这场纠纷后,周逸群就召开石首、华容、南县三县联席会议,商讨开辟洞庭特区之事。忽然夏曦来信要周速回分局汇报工作。蔡玉昆为周安排了三条“双飞燕”的渔船,并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周逸群回江北。周上了船,掌舵的战士扯起风帆,小船箭一般在洞庭湖上飞行。行走了约三个时辰,但见湖面之上,渔帆点点、越来越近。当发现一条大船的前面架着机枪时,战士向国良说了声:“有情况!”接着便挥手向战士示意:紧急集合应战。可是,为时已晚,敌船上的枪响了,一排子弹射了过来。战士只好立即还击,终因寡不敌众,周逸群和一个班的战士,都负伤被捕。周逸群当晚牺牲在岳阳贾家凉亭下,时间是1931年5月,享年35岁。后人有诗叹曰:

废书学剑走羊城,昂首高歌唱大风;
只为一身铮铮骨,致使热血洒洞庭。

周逸群的牺牲，震动了洪湖苏区和洞庭特区，男女老少无不掩面痛哭。贺龙、段德昌听说周逸群牺牲在洞庭湖中，大骂夏曦和江奇是祸首。江奇何许人也？原来，此人是夏曦带到洪湖苏区的，也没有什么职务，只在夏曦身边做些文墨差事。要周回江北，就是他捎来的信。而他因事没有随周一同返苏区。周临行前一天，江奇在酒馆内喝酒时，无意之中将周逸群即日返江北的消息露了出来，那酒店的掌柜是敌军的一个暗探，这样，周逸群惨遭敌人毒手也就不难费解。

6月18日，夏曦向党中央起草了一份电报，写道：“逸群因往洞庭巡视工作，在贾家凉亭附近被白军惨害，现将洪湖军政学校改为逸群军政学校以纪念他。巧电。”

洪湖革命根据地将苏区首府瞿家湾的红色书店、红色小学，均命名为“逸群书店”、“逸群小学”。

周逸群是被王明“左”倾路线害死的。周恩来闻讯周逸群牺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是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解放后，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周恩来最爱听，除了歌词的韵律优美、极富水乡气息之外，也有一份缅怀先烈英灵的思绪之情，这也许鲜为人知吧。

上面提到夏曦进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其手段之残酷，比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有过之而无不及。夏曦其人，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地紧跟王明走呢？此事说来话长。

夏曦，字蔓伯，化名劳侠，湖南桃江人，1901年8月17日生。其父晚年得子，他从小娇惯任性，但读书聪明好学，16岁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了由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组织的新民学会，“五四”运动时组织“救国十人团”，维护国货，发动了

驱除张敬尧的群众运动，与柳直荀在长沙组织通讯团。柳直荀14岁在长沙广益中学读书，住在杨开慧之父杨怀中家中，柳父与杨怀中为世交，因此，与毛泽东关系密切。1921年夏曦加入共产党，早年参加崇新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1924年，夏曦任中共湖南省区委员会委员，1926年与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二大”，被选为后补中央执委。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夏曦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任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政治部主任，也算与黄埔沾了边。南昌起义时，夏曦参加了起义。起义失败后，夏曦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夏曦参加了中共“六大”。他开始入学时，是反对米夫和王明的，后来见米夫、王明势大，遂投到了米夫、王明的怀抱。成了“二十八宿”之一。“二十八宿”是指中山大学中所谓的二十八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即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28位留学生，其中亦有夏曦。对于“二十八宿”，亦有“二十八个半”之说，谓当时真正支持米夫的，计有二十八个半，还有一个年纪最小，个子最矮，观点又很动摇的共青团员，只算半个，故称之为“二十八个半”。对于夏曦的这段历史，杨尚昆在中共“七大”上称：“夏曦开始还和王明等作斗争的，但后来王明一伙攻他，把他压服了。”

夏曦在苏联与同学谭国南结婚，一同于1930年回国。夏被中共中央派往江苏省委任宣传部长，因他效忠米夫和王明，次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年3月，夏曦被派往湘鄂西苏区，成立了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临时省委。夏曦与妻子一道动身来到洪湖苏区，也就是湘鄂西苏区。

夏曦赴洪湖，下车伊始，就先罢了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邓中夏的官，又派唐赤英充当红2军团政委。在肃反中他又将唐赤英打成“改组派”，用刺刀挑死了唐赤英。唐赤英是黄埔军校四

期毕业生,在校名唐泽英,四川大足人,分在政治大队2队学习。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临刑前任红3军参谋长。夏曦从来到湘鄂西苏区后,先后搞了四次肃反。由于江西苏区开展了大规模肃反活动,以及发生的“富田事变”,这更使夏曦觉得苏区内草木皆兵,到处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托派”等敌人。与此同时,张国焘在鄂豫皖搞肃反扩大化的经验传到湘鄂西苏区后,夏曦就奉若至宝,全盘接受,在贯彻执行中他惟恐落后。1932年4月,夏曦以湘鄂西军委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其中写道:

“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红四军肃反的教训,很严重地教训了我们。各种反劳动保护的派别,如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罗章龙派,他们总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因此,就不能说红三军中没有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中的捣乱。”

夏曦组成肃反委员会,用他的同乡江奇当省保卫局局长。江奇是夏曦的一个远房亲戚,夏曦的表姥姥是江奇的姑奶奶。在打土豪分田地时,江奇充当农会主席,夏曦来洪湖苏区就带他在身边当差。江奇不学无术,开始并未引人注目。一次敌特张锡侯装扮成商人,来苏区密会同学、天门县军事部长杨国茂,杨将张送交红3军军部。从此案入手,江奇将杨国茂、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红7师参谋长赵奇、参谋处长朱元成、红9师参谋长张应南、参谋处长童士秀、红8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9师政治部主任刘鸣先、红7师19团政委刘革冰,先后逮捕之。被捕的原因是这些人系改组派。后来又逮捕27团团团长杨嘉瑞、25团团团长张杰、20团团团长刘庶植、21团团团长蔡祝封、27团参谋长李考候,他们均被诬为改组派。这下子红3军的军心可乱了。红9师师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共产党员段德昌急了,他找到

红3军军长贺龙问道：“胡子，怎么回事？”贺龙紧皱双眉说：“听向应讲，所抓的人，都是夏曦写来的条子，说这些人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要他抓起来。”段德昌瞪着眼说：“哪里有这么多改组派？别人不知，刘革冰、戴君实这些人我还不清楚？为了洪湖苏区，出生入死，怎么会是改组派？那刘鸣先，是叶挺身边的副官，你是清楚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带兵的人都抓走了，敌人来了，怎么打仗？”贺龙说：“德昌，你也别急，我就去找夏曦。”

当下贺龙飞马来到了省委和分局所在地瞿家湾，贺龙见了夏曦，两人为此事大动了干火。贺龙坚持要口供，要证据，不能滥捕，夏曦则反问一句：“这些人都身居要职，若没口供，我能轻易地将他们抓起来吗？”贺龙说：“让我亲自审审胡慎己。”夏曦站起来怒道：“贺文常，难道你还不信我这中央分局书记吗？”在贺龙眼里，夏曦只不过是吃了几天洋面包的娃娃而已，但因为他有尚方宝剑在手，作为仅有5年党龄的自己，哪能斗得过他呢？所以当夏曦把《关于改造红3军的训令》拿过来时，他一声不吭，起身出门，飞马直奔新沟嘴，找分局副书记关向应。贺龙对关向应说：“向应，怎么这么多干部都成了反革命了？”关向应眼望着贺龙，说：“文常，你不要焦急，事出总会有因的。”

胡慎己等人真的交代了许多改组派吗？不是，胡慎己乃至其他许多被抓起来的干部，全是江奇酷刑下逼出的，有的是按江奇之意写下来的，有的是胡乱招供的。至于胡慎己的口供，是江奇写好后，在胡慎己被打昏的情况下，江奇抓着胡的手，按上了胡的指印。

且说夏曦成立肃反委员会时，其中有一名委员名鲁易。此人乃湖南常德人氏，早年留学日本，后到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入党。回国后，他进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政治部副主任，在中山舰事件后，被解职。鲁易在去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的关系

不错。1928年底，鲁易回国，在中共中央军委任秘书，1931年跟随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夏曦派鲁易为红3军政治部主任。鲁罗既怕得罪夏曦，又与万涛、潘家辰、段德昌拉不下脸来，所以夏曦把鲁易拉进了肃反委员会。

夏曦在尉士均、关向应来了之后，没几天就逮捕了湘鄂西省委宣传部长万涛、红3军政委柳直荀（即柳克明）、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潘家辰的爱人以及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庄东晓。庄东晓因与夏曦爱人谭国南是同学，求情后才免于死。还有黄埔军校六期肄业的红8师师长段玉林，也没有逃过夏曦的魔掌。万涛、潘家辰、柳直荀、彭国材、段玉林、唐赤英、孙德清（孙一中）等英雄之死，真正是千古奇冤，着实令人伤感不已。1957年，毛泽东写信给柳直荀的爱人李淑一，对英烈忠魂，予以无限感慨与怀念。在信中毛泽东写《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

我失娇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再说夏曦主持第三次肃反，杀了一位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段德昌。段德昌，字裕厚，号魂，1904年8月19日出生于湖南南县九都山。因其父段心铨早年曾留学日本，所以段德昌童年时代接受过比较正规的文化教育。1925年段德昌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秋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曾任北伐军8军1师政治部秘书长。第1师划归第35军后,段德昌结识了时任第1师营长的彭德怀。彭德怀回忆道:“围攻武昌时,段德昌送来不少宣传品。我说:‘以后请常来。’他答应了,且未失约。当时出版的进步刊物,他总是尽早派人送来。”

攻克武昌后,彭德怀率部由当阳追击吴佩孚残部,段德昌获准同往。途中,两人作了一次长谈。当时彭德怀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段德昌对彭德怀的思想情况更加了解,彭德怀则对这次交谈也深感不忘。1928年春,段德昌回到了南县华容从事革命活动,介绍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段德昌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转战洪湖,在水网中拉起了一支革命武装。1929年他任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在对敌斗争中,他总结出的“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战术原则,与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提出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段德昌熟悉洪湖周围环境,在战斗打响前有周密的敌情侦察和部署,加上与当地群众又有水乳交融的关系,所以每次战斗均取得胜利。他亲自编了一首《红军纪律歌》,让战士学唱,自觉地遵守纪律。1930年后,段德昌历任红6军副军长兼1纵队司令、第17师师长、红3军9师师长。在作战中,他采用围点打援,奔袭包围和诱敌深入等战术,连续取得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1932年上半年,湘鄂西苏区得以巩固。7月,国民党10万余人向洪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贺龙、段德昌认为,大敌当前,在内线击破敌人的进攻是不可能的,而主张红军主力坚决转到外线,威胁国民党的后方,迫敌后撤,然后寻机歼敌。但夏曦拒绝这一建议,坚持“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平分兵力,单纯防御。战至10月份,洪湖革命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段德昌率红9师于12月下旬

到达湘鄂西边区。1933年农历春节,大年初一,夏曦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夏曦、贺龙、关向应、江奇、宋盘铭、叶光吉、盛联均、卢冬生。会议检查洪湖苏区和湘鄂西根据地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夏曦在会上非但不检查自己应负的责任,反而错误地认为“肃反”不彻底,反而把一切罪过推到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三个人的头上,并宣布将这三个人以“改组派”罪名已逮捕的消息。夏说他们的“罪恶”是分裂红军队伍,攻击中央分局领导,特别是段德昌,打着什么“山上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爬”的口号,煽动下级官兵,破坏中央分局的路线,有意在红军中制造分裂。

逮捕段德昌等后,江奇连夜突击审讯。在不招的情况下,江奇下令用刑,于是王炳南作为红3军9师参谋长,一条腿被打断了,段德昌昏死数次,陈协平十指折断,但他们依然不招。夏曦骑虎难下,便不经大家同意,宣布在鄖阳关召开公审大会,处决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贺龙说:“我要见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夏曦说:“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你见他们做甚?”贺龙气极了,怒道:“我一定要见!”夏曦慑于贺龙的威仪,只好陪他一同去见段德昌。贺龙只见段手铐脚镣,遍体鳞伤,面容憔悴,仅半月不见,已不是人样了。英雄一阵辛酸,热泪在眼眶里打转,纵有千言万语,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夏曦对段说:“你死在眼前,还有什么话就快说。”段怒目相视,转脸对贺龙说:“胡子,我段德昌一生磊落光明,今遭小人暗算,死而无怨,只求你不要忘了洪湖群众。”

贺龙虽是军长,但救不了自己的师长,这比打仗还难,他有深深的难言之苦,因为肃反当时归保卫局管,他无权过问。

中午时分,也就是1933“五一”劳动节,公判大会召开,到会的各连代表有一千多人,夏曦下令将段德昌等200多名“改组派”分子押到主席台。由夏曦宣布“罪状”之后,便开始行刑,第

一个被拉出来的，便是段德昌。段德昌昂首挺胸，面无惧色，他高声喊道：“同志们，永别了，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夏曦见状，连声喊：“快快行刑！”

几名持枪战士推着段德昌前赴刑场。这时，只听见一个人高声喊：“慢！”大家一看，见是贺龙，只见他手端一碗粉蒸肉，走到段前，含泪说道：“德昌，吃些吧！”并喝令先松绑。段德昌接过粉蒸肉，吃了一口，而后又深情地望了贺龙一眼，把筷子交给贺龙，挺胸走向刑场。须臾，段德昌就被大刀砍死。原来，吃粉蒸肉、节省一粒子弹、用刀行刑，都是段德昌向贺龙最后提出的两个要求。段德昌牺牲时，才 29 岁。

1945 年，党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对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作了详细介绍，听者无不为之动容。1952 年，毛泽东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 1 号“烈士证”；1981 年，胡耀邦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60 周年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段德昌的历史功绩，称他是“我党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段德昌人称“火龙将军”。在共和国史中有三十六位军事家，段德昌名列其中。

洪湖苏区人民忘不了段德昌，他们盖了座小庙，供上“火龙将军”的牌位，牌位两旁的木柱上，写了一幅抱柱联，联文是：

生为民死为民为民而死虽死犹生；
爱洪湖战洪湖因湖负屈英魂常在。

正是：平生正直坦荡荡，而今却遭小人难。夏曦长征时在贵州毕节过河失足落水而死，真是死有余辜。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陈毅不归 肖菊英投井自尽 见死难救 徐向前爱人被杀

行文至此，原打算对苏区肃反的事，就此搁笔。但刚刚说完贺龙、彭德怀两位元帅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段德昌屈死九泉，魂归重霄时，又想起了陈毅、徐向前两位元帅的爱妻也莫名其妙地被王明极“左”路线害死。在事隔半个世纪之后，重新翻出来讲一讲，也许对后人会有一些的教益。

话说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共产党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蒋介石集中大军对苏区实行“围剿”。1930 年 1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批判“立三”路线为名，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从此开始了在党中央的统治。鄂豫皖苏区有张国焘、陈昌浩一批忠于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他们利用肃反，滥杀无辜。由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所培养出来的许多红军将领如许继慎（红 1 军军长）、周维炯（红 1 军 3 师师长）、肖芳（红 3 师副师长）、姜镜堂（红 3 师政委）、曾中生（红 4 方面军参谋长）、陈奇（红 10 师政委）、漆德玮（红 1 军 2 师师长）、李荣桂（红 10 师政委）、熊受暄（红 1 军政治部主任）等，均在肃反中被杀害。在湘鄂西苏区，以夏曦、江奇为首的几个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利用手中的肃反大权，先后杀害了黄埔军校出身的红军将领：段德昌（红 6 军军长）、周逸群（红 2

军团政委)、唐赤英(红3军参谋长)、彭之玉(红7师政委)、段玉林(红8师师长)、王鹤(红3军8师政委)、胡陈杰(红3军9师参谋长)等,致使红军元气大伤。谢觉哉时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1932年9月20日,他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突围时于洪湖被俘,后辗转逃出敌人魔掌。1945年3月,他曾就夏曦在湘鄂西肃反写过一首诗: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字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闲话少说。且说在赣西南肃“AB团”的过程中,中央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的陈毅,当时任红1方面军主要负责人,他就力主正义,坚持肃反要调查研究,因而被当时赣西南特委负责肃反的大员李韶九怀疑,险遭杀害。

陈毅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教职员,实际上负责中共武汉分校党委的工作。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和朱德转战湘南、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虽然一度在红4军召开党的“七大”上他批评过毛泽东,但他在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后,很快请回了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两人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建立起深厚的私人情谊。

然而,1930年秋,在中央“左”倾思想指导下,全国各苏区从

地方到红军,肃反扩大化在大规模地蔓延,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冤枉,白白地被杀害了。如黄埔军校六期肄业的红 20 军军长肖大鹏、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中共闽北特委组织部部长肖韶等,先后以 AB 团的罪名被处决。1930 年 12 月 7 日红 1 方面军总前委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江西的吉安、永丰、兴国三县交界的富田,将江西省行委内所谓的一个 AB 团总部人员段良弼、李白芳两人捆绑。同时原 4 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亦遭被捕;任心达、谢汉昌、金万邦、马铭、周勉亦拘禁;又将红 20 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当作“AB 团要犯”关押起来。红 20 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胡乱招出红 20 军 174 团政委刘敌是 AB 团,于是刘敌被捕。不过后来刘敌以同乡关系被李韶九又放回 1 营营部。事后刘敌认为,李韶九是借抓 AB 团之名在大搞阴谋诡计,于是在 12 日晨他立即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貽紧急商议,决定扣留李韶九,抓起红 20 军军长刘铁超,要他们讲出为什么硬给好人扣上“AB 团”的帽子,并且关押之。他们发动 1 营士兵几百人包围军部,捆起刘铁超,释放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所谓“AB 团”案犯。李韶九在闻风后逃走。为救出省行委那些被诬为“AB 团”的同志,刘敌又同谢汉昌率部于当晚由东固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缴了红 20 军一排人的枪。当时,虽然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但却释放了 12 月 7 日至 12 日被捕的近百名同志。古柏、曾山闻枪声后逃走。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 1 方面军总前委认为“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将其定性为“AB 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 1931 年 12 月 16 日,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932 年 2 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代表团全权处理富田事变。4 月中旬,代表团到达,认为“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是敌我矛

盾”，因而红 20 军前任军长曾炳春、后任军长肖大鹏也未能幸免先后被杀。红 20 军战士编入红 7 军。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经过与结局。

陈毅当时任红 22 军军长，对“富田事变”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的。但是由于乱抓乱杀现象越来越严重，所以向来神情开朗、喜笑怒骂皆形于外的陈毅也只好沉默寡言，对从中央贯彻下来的肃反扩大化忧心忡忡。在那个年代，外要御敌，内要肃反，处处草木皆兵，弄得人人自危。陈毅也常有今去上级开会就会永远回不来的预感。他的这种情绪，自然要被他年轻的妻子肖菊英所察觉的，妻子日夜为陈毅担惊受怕。

陈毅这年刚满 30 岁，是“而立”之年。以前，由于战乱，他无暇考虑婚姻大事。进入赣南苏区后，一次，他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 4 军“七大”以来的情况，住在他的挚友处，当友人问及陈毅近年来行踪时说：“你这样跑来跑去不觉得辛苦吗？”陈毅诙谐地回答道：“一点不觉得辛苦，辛苦就是没有老婆！”返回苏区后，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苏区一位年轻姑娘，两人简简单单办完婚事，这姑娘就是陈毅的元配夫人肖菊英。肖菊英贤慧聪明，多愁善感，夫妻两人和睦相处，相敬如宾。有一次陈毅去远方开会，临行又似诀别，依依不舍。陈毅对肖菊英说：我于某日一定回来，如果到时候没回来，就可能发生了意外的事。陈毅的确如期踏上归途，不料中途遇到国民党地方武装的袭击，马被打死，陈毅与警卫员只得绕道步行回兴国。他回到家时，一进门见屋内空无一人，陈毅便喊道：“肖菊英！”没有回声，其初还以为肖外出买东西去了，结果一等再等不见人影，后来才发现肖菊英已死在房门外的一口水井中。陈毅非常了解肖菊英：由于她长期处于恐惧之中，这是认定丈夫食言不归，准是被肃反委员会抓去杀头了。肖菊英感到前途无望，孤单一人，必然受牵连，绝望与悲伤

袭上心头,只好纵身跳井自缢。当时,李韶九就扬言陈毅是 AB 团的团长,要把陈毅抓起来。陈毅矢口否认,并写信报告了毛泽东。两天后得到毛泽东的回信。由于毛泽东的干预,陈毅将一批被打成“AB 团”分子而遭关押的同志予以释放。陈毅后来回忆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救了他,他差点就被枪毙了。”

陈毅亡妻肖菊英之死,许多书都持以上看法。最近,肖菊英的亲表妹陈干群写的一篇《关于“陈毅亡妻肖菊英之死”的作者答疑》,也是很好的佐证。全文如下:

转来的汪世杨同志对我写的《陈毅赋诗悼亡妻肖菊英》一文中有关情况简答如下。肖菊英烈士是我的亲表姐,她聪慧秀丽,生性好强,深得家人及其姑父、即我的父亲的钟爱。有关肖菊英的生平轶事,我主要是根据母亲、舅母、表哥和钱益民(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菊英的同学和战友)等革命老同志提供的片断情况整理的。

肖菊英牺牲时的背景是:1931年7月至9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与此同时,赣南苏区的红军队伍里,“左”倾路线盛行,“肃反”抓“AB 团”不断扩大化。1926年年仅15岁参加革命的肖菊英,经历多年革命斗争磨炼,她相信陈毅,始终坚定地与陈毅战斗在一起。不幸的是,第三次反“围剿”将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恰在一次陈毅外出开会未归,驻地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她与战友们奋勇抵抗,寡不敌众,她身上多处负伤,毅然跳井殉节。不久,陈毅化装到信丰岳父母家报告菊英壮烈牺牲的噩耗。

过去曾有几书刊说到革命前辈的婚恋时,写了陈毅与肖菊英。对肖菊英牺牲的情节有多种说法,其

中主要一种,是根据陈毅悼念亡妻肖菊英的诗词内容的领悟而发挥的,侧重刻画陈、肖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和肖菊英的才貌及柔弱多情。

陈干群的说法比较可信。

陈毅失妻以后,中央苏区开始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中央苏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的陈毅临危受命,与项英一起留在苏区进行游击战争。陈毅转战于赣粤边区的梅山、油山等崇山峻岭之中,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历尽艰险,个人的婚事无从谈起。在梅岭被敌人围困20多天,旧伤复发,走起路来非常困难。后来他躲进梅山一个山洞里,苦虑不得脱身,于是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在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派人下山打听,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变”。

国共第二次合作,1939年陈毅担任新四军一支队支队长。在苏南溧阳县茅山根据地的云岭军部驻扎时,一天晚上他去陈家祠堂看战地服务团的演出节目《一年间》,认识了扮演新娘子的十七岁少女张茜。陈毅非常喜欢这位活泼聪明而又美丽的女演员,但考虑到自己已快40岁的人了,不敢作非分想法。不料他的这种心思,被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大姐发觉了,朱决心为

陈毅当“红娘”。她把张茜派到一支队演出,要张茜既当“台柱子”又兼管服装保管。当时要演出的剧中人中有一个首长,这位首长的衣服向谁去借呢?领队同志受朱克靖团长的嘱托,指名要张茜去向陈毅司令员借。张茜见了陈毅,陈毅满以为这是朱克靖做的工作起了作用,不料张茜劈头就说:“首长,我们今晚要演出,想向你借一套衣服,好吗?”陈毅爽朗地答道:“借衣服,那还不容易!”陈毅问明情况后,把自己身上穿的一套军装借给了她。张茜二话没说,喊了一声“首长,谢谢!”就扬长而去。陈毅顿时感到张茜冷冰冰的,显然只是借衣服,别无他意。正悔自己“剃头挑子一头热”之际,忽然想起他那件上衣口袋里还有一个“秘密”,于是变得焦急万分,嘴里不停地自语道:“糟了!糟了!”警卫员以为首长丢失了重要东西,忙问:“首长,什么事?”陈毅也答不上来,只是干着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陈毅见战地服务团来一支队演出,又勾起了在陈家祠堂那晚看戏时所日夜思念的张茜,于是,一时诗兴大作,写了一首《赞春兰》。其诗曰:

小箭含胎初出冈,似是欲绽蕊露黄;
娇颜高雅世难觅,万紫千红妒幽香。

春兰是张茜的小名,张茜乃大户人家,书香门第出身。出于一种爱国热忱她由武汉来到云岭参加新四军,平常就听说陈毅文武双全,是新四军中有名的“儒将”。当她见了这首《赞春兰》的诗,原本不动情的他也把这首诗当作“定情”之物了。1940年1月,陈毅与张茜在苏南结婚。20多年后,林彪、江青把陈毅元帅打成“二月逆流”的干将,张茜也受株连。“九大”后不到半年,陈毅被遣送到石家庄。在逆境中,元帅的待遇被取消了,张茜亲

自动手煮饭洗衣。在生活上她悉心照料陈毅。由于忧愤难平，陈毅患了肠癌。1972年1月6日，陈毅因病与世长辞。如果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陈毅在命送九泉后，张茜也难免会当“肖菊英第二”。据称毛泽东在陈毅的悼词中将“有功有过”4个字划掉后才签发付印，他本人也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张茜晚年致力于整理陈毅毕生写下的300多首诗词，于病重时依旧不辍编辑一部《陈毅诗词选集》，且写下了评价中肯的序言，吟成了字字注血的题后诗两首。其中一首是：

同病堪悲为自勉，理君遗作见生平。
持枪跃马经殊死，秉笔勤书记战程。
波漾流溪冬月影，风回碣石夏潮声。
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编成慰我情。

陈毅、张茜共生了三个孩子，他们个个成才，不提。

话转回头，再说另一位元帅徐向前。徐向前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他毕业后至1927年的经历，前面已说过，不再赘述。他是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当队长时加入的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徐向前参加了广州起义，后随起义部队转入海陆丰，在那里坚持山地游击战争。海陆丰苏区被扼杀以后，徐向前离开海陆丰，经九龙到上海。1929年6月，他在上海接受中央军委书记杨殷交给他的任务：“你到鄂东去吧，那里有一块根据地，基础不错。具体工作到那边再说，你准备一下，早点动身。”徐向前就这样进入了鄂东北根据地。当时根据地红军的番号是31师，师长吴光浩，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原名吴光皓，湖北黄陂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打到鄂北后，吴光浩留在地方从事农民武装斗争，是鄂南起义、黄(安)麻(城)起义的领导人。组建红11军

后,吴光浩任军长兼 31 师师长。1929 年 5 月,吴光浩往商南准备组织起义,经罗田县时被反动民团袭击,在突围时中弹牺牲。徐向前来到 31 师后任副师长,实际上负责全师军事指挥工作。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侯,都是黄安人。

开始徐向前工作上很不习惯,一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他那一口山西话人家又听不懂,全靠戴克敏“翻译”,后来他才慢慢站稳了脚跟。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徐向前刚到职却遇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国民党连续向红 31 师发动了罗霖、李克邦会剿、鄂豫会剿、徐源泉、夏斗寅会剿。面对强大的敌人,徐向前采取“避强击弱”,在运动中相机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他带领队伍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不仅没有被敌人吃掉,而且不断地壮大队伍,取得了双桥镇和东西香火岭等战斗的胜利。

徐向前在战场上和他的黄埔军校老师刘峙对阵,双方打得如火如荼。刘峙的师长赵冠英被活捉。在苏家埠战役中,还活捉了皖西剿共总司令厉式鼎,因而大别山的红军威名大震。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张国焘、陈昌浩被中共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他们成了苏区的最高领导。他俩一到黄安,就搞肃反,先后把一些有威望的党政军领导人逮捕并杀害。著名的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许继慎、陈定侯、周维炯、曹大骏等。有关黄埔军校毕业的许继慎、周维炯被杀前已叙及不提。且说徐向前对此极为痛心,他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这时徐向前已升任红 4 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尽力保护了一批干部,周希汉就是在即将被杀头之时,由徐向前出而干预,才拣回了一条命。解放后,周希汉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次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在近

3个月的肃反中,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约有十分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许多红军战士被斩首于河南光山白雀园附近的小湖边,身首分离,暴尸于沙滩,引来四方野狗和乌鸦。当时狗吃人肉吃红了眼,见活人也发疯地追。当时一个传令兵,在执行任务路过这一带时,被成群的野狗追撵,他边哭边同狗搏斗,这是一幅多么残忍且又凄惨的画面啊!据史料统计,红4军的肃反,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有倪志亮和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掉。在肃反过程中,仅30团就换了三次团长,政治委员和主任也换了三次,有的团换了四次、五次之多。大批被撤换的干部的罪名都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他们被逮捕后,有的就在前方枪毙,有的送到后方保卫局。仅30团在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的干部,估计起来有五百人之多;其他各团,被杀者也不小于这个数。

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也被诬为反革命而遭杀害。直到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他说:“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这一语道破了历史的真相。

还是请徐帅自己说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重演。附带说一下我爱人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这段叙述,也是我对她的悼念。我和程训宣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檀树冈程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埠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回去补一补,好行军作

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告诉我：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

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

她家里兄妹五个，全都参加了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我们的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在我们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在红二十五军，也被肃掉了。她被抓走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没什么口供，相当坚强。

徐向前的夫人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民家中，没读过书。1928年吴光浩率红31师抵黄麻地区时，程训宣投身革命，从事妇女工作，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曹学楷和倪志亮介绍，于1929年底同徐向前结婚。倪志亮是北京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1931年任红4军10师师长，抗战时当过八路军129师参谋长，解放后授予中将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65年病逝。程训宣有姐弟5人，除姐姐幼年夭折外，余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参加了黄麻暴动，二哥程启宗，在黄麻暴动中牺牲，弟弟程启波也参加了红军。程训宣为人正派，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事都走在前面。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对其严刑拷打，逼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要她招供，供出同伙，程至死不说，直到被打死。

这些情况，由当时任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局长周纯全介绍的。周纯全乃黄安（今红安）人，八里中和雷家田人，1927年参加过

黄麻起义，曾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省苏维埃保卫局长兼鄂豫皖苏区游击总司令，后任红4方面军10师政委。抗日战争时他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南行署主任、中共辽南省委副书记，解放后任志愿军后勤部政委、总后第一部部长兼副政委、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5年7月28日在北京病故。周纯全仅是张国焘、陈昌浩指使的“工具”，之所以还能一帆风顺地升迁，这和他带头揭露张国焘的罪行有关。反戈一击，也算立了大功。

徐向前写的《回忆录》于1984年出版，这样算起来，周纯全病故之前，徐帅完全可以在写悼念程训宣的文字时，让周纯全再提供一些关于程训宣的情况。然而，徐向前没有进一步追叙这一段悲伤的历史，不知何故。也许徐向前认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揭伤疤总是要痛的。

徐向前与程训宣这段姻缘实在太短。据《红安县志》记载：“1929年冬，与徐向前在程伍德村结婚。1931年‘肃反’时，程被关押于王锡九村，双手被捆绑吊于梁上，并遭毒打，逼她供认徐向前是改组派、AB团，未果。1932年秋，在王锡九村附近的黑洼杀害。”

徐向前与程训宣共同生活了两年多，除去打仗，几乎不到一年的夫妻共同生活。程训宣被害时年仅21岁，徐向前比程训宣大10岁。徐向前的原配夫人朱香蝉，一字不识，而徐当时正在国民师范上学，他俩的婚姻完全是父母包办。后来徐当了川至中学的老师，夫妻和睦，还生了一个女儿名叫松枝。徐向前考入黄埔军校后，朱香蝉得了不治之症，日夜思念丈夫回来。但黄埔军校纪律严格，徐向前不敢请假，只得写信劝妻子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家去。可怜朱香蝉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没有等到徐向前回来，善良而柔弱的香蝉怀着一腔幽思，撒下女儿与

公婆，命丧黄泉矣！在临终前，她还哀求公婆一定要写信叫徐向前回家。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呢！徐向前没能满足可怜香蝉在诀别前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应尽的起码的责任，所以每当念及痴心的香蝉时，徐向前总是怀有一丝愧疚。

程训宣的被杀，徐向前到延安后才得到确信。当时，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作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而感到痛心疾首。徐向前当时任红4军军长，按照肃反委员会的规矩：逮捕人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委，军长是无权过问的。

徐向前从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起，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身上多处负伤，身体很虚弱。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因积劳成疾，身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徐向前躺在病床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危险关头，终于苍天有眼，没有让这位44岁还孤单一人的骁将去见马克思。他的病一天天好起来了，直到1945年冬天，徐向前才勉强出院，但身体仍很虚弱。

就在这时，徐向前遇见他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当队长时的女生队学生黄杰。黄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曾用名黄曙连，湖北江陵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六期学生。她早年加入共产党，历任中共湖北松滋县委书记，组织过九岭岗暴动。大革命失败后，她被党派往上海任中共闸北区、沪东区妇女工作部部长，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女生队队长，陕甘宁边区妇联组织部部长。1946年5月，她任延安第2保育院院长。

当时徐向前和黄杰都已进入不惑之年，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队长、教官如今却是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一股怜惜之情

涌上心头。而徐向前望着眼前这位细眉细眼、干净利落、风韵犹存的南方妇女黄杰,也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处境之窘迫,于是心中产生了“想要有个家”的强烈愿望。

1946年“五四”青年节,经过互相了解,双方登记结婚。婚礼简单,平平常常邀了两个朋友,在一起打扑克,婚礼就算完成了。都已不是初婚的徐向前和黄杰都不愿意声张,但两心相许,白头偕老的心愿两人皆有。

徐向前与黄杰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女儿,名叫徐鲁溪,解放后上了大学。徐鲁溪还有一个妹妹徐小涛,弟弟徐小岩。文化大革命中,他姐弟三人均遭厄运。徐鲁溪在中国科学院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徐小涛、徐小岩上山下乡,当兵团农垦战士。黄杰被打成叛徒,徐帅则下放河南开封,天各一方。黄杰差点又成了“程训宣第二”。粉碎“四人帮”后,徐向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被人誉为“德高望重的国防部长”、“资深勤政的军委副主席”,黄杰任纺织工业部人事司司长、顾问。黄杰至今仍健在,任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徐向前于1984年6月,83岁高龄时当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并且致力于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1990年5月10日,临终前4个月,他还会见了台湾黄埔一期校友邓文仪等重要客人,寄希望于“两岸黄埔师生携起手来,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

徐向前原配夫人所生女儿徐松枝,由聂荣臻在抗战时带到延安,解放后在北京工作。关于她的情况,从略不提。

再回过头来说说程训宣的母亲千里迢迢晋京寻女的传奇故事。

1955年春,在北京工作的程训宣的大哥程启光,把母亲从湖北红安接到北京。徐向前知道后,连忙坐车去程家。车轮在翻滚,徐帅的心里也在翻滚。徐向前心情处于极度矛盾之中。

一方面他急于想见阔别 26 年的丈母娘,另一方面又怕见到丈母娘。程训宣早已不在人世,但这噩耗始终没敢告诉老人,他和程启光都对老人保密。原因是程训宣在五兄妹中是惟一的一个女孩,也是妈妈的掌上明珠。在五个兄妹中,二哥、三哥、程训宣、小弟都牺牲了。如果再将程训宣的噩耗告诉老人,她老人家心里承受得了这个突然打击吗?于是,徐帅决定把这件事隐瞒到底,不能再伤老人的心了。这么多年都瞒过去了,今日的“戏”还要演下去。

徐向前见了久别重逢的老人,心头十分高兴,他亲切地叫了一声:“娘!你老人家身体可好!”老人颤巍巍地站起来,用混浊的眼光朝他看了很久,惊喜地说:“你,向前啊?!……来来来!”老人拉着徐帅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她一边吩咐程启光给徐帅倒酒,一边有些嗔怪地说:“向前,训宣哪里去了?我好想这孩子啊!”

徐帅与程启光两人早就对隐瞒真情的事商量好了,假戏真演,天衣无缝,连程启光的妻子、儿女一概交代清楚,不许乱说。

徐帅说训宣忙得很,最近到陕西学习去了,一时回不来、劝娘别怪她。

老人劝徐帅喝她从红安带来的老米酒,还帮程训宣代喝一杯。徐帅望着老母亲满头的银发和她那一双乞艾艾的眼神,心里好像在淌血,喉咙里又像堵了一块什么。多少年了,老人还被蒙在鼓里,她会想些什么呢?是女儿的不孝,还是她预感到了什么?他真想把一切都告诉老人家,但他不能说,他实在是说出口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老帅,在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上就这么折磨自己,这真比打仗还要难啊!

老人在儿子家住了一段时间就回红安老家去了,北京的高楼大厦她住不习惯,再说,她还经常惦记她喂的鸡、鸭等。徐帅

决心把戏演到底,每逢老人生日,他总要用他和训宣的名义写封信祝寿。其情也真,意也切!有时为了摆脱老人对女儿的追踪,徐帅不得不给她“调动”工作:先是从陕西“调”到青海,再是从青海“调”到新疆,最后一直“调”到苏联。徐帅的“假戏真做”一直持续了若干年,直到老人 94 岁高龄仙逝时而剧终落幕。徐向前是个性格温训、谦和的书生,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军人。人们常用“教书先生”、“小学校长”这样的名头来背后称呼他。徐向前是一个复杂的书生,也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做事严肃认真,以致严厉逼人,令人生畏,却又十分幽默风趣、含蓄、和蔼、平易近人。有关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传奇故事在此不提,以后还要专门写到。正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帅演戏虽假犹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蒋氏三骂 贺衷寒创复兴社 天子门生 十三太保闹中华

话说 1932 年 1 月 21 日,在帝国主义的撮合下,蒋介石和汪精卫经过杭州密谈后,又回到南京,与汪共同掌握了大权。哪知刚主政不到一个星期,28 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等领导的国民党第 19 路军,在上海人民爱国精神的影响下,对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史称“一·二八”事变。

时局的内扰外患,使蒋介石焦头烂额。共产党在鄂豫皖、湘鄂西、赣南、闽西处处建立苏区,也使蒋介石坐卧不安。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平、津大学生南下请愿,游行示威,蒋介石穷于应付。在这进退维谷之中,怎样才可以更加严密地加强其统治机构的灵敏性,情报系统的准确性,就成为他日夜思考的焦点。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每当碰到某些难于解决的问题时,往往他不是直接命令他的部属照他的意思去办,而是用冷酷的骂人方式,迫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理,然后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因此,在群众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一次以骂人始亦以骂人终的集会就在南京黄埔军校官邸举行了。

蒋介石约了黄埔军校毕业的一些学生来到官邸。其中有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肖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鄧悌、梁干乔、潘佑强、曾扩情、戴笠、杜心如、葛武槩等。邓文仪那时是侍从室侍从副官,蒋开会时,由他作记录。

会议开始,首先由蒋介石训话。他装出很难过的样子,沉痛地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群众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都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

蒋介石讲完这番话之后,又习惯地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白开水,似乎动了感情。接着他就提高嗓门,眉毛高翘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蒋叹中有骂,骂中有叹。在座的学生沉默不语,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一心想听个明白。

蒋介石讲完了,并没有叫大家发言。会上被骂的人也默然相对,不知说什么好。蒋的独角戏唱完,最后吼道:“算了,我不讲了,散会。”

听训的学生心里都明白,校长这样把学生一骂,就等于出了一道作文题目,叫大家去做。

贺衷寒是“黄埔三杰”之一,好以领袖自居。第二天他就把这批“不中用的学生”约到家里去商谈。在人到齐了后,贺衷寒首先说:“老头子(指蒋介石)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康泽答道:“还不是老头子对时局感到困难,要我们想办法。”大家七嘴八舌,说来谈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大家要体谅老头子的处境,要帮助他出出主意,采取一些行动。但说来道去,一时也弄不出什么具体的意见来。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召集这些人开会。蒋介石把上次讲过的话重复一遍。他照样叹息,照样骂人。但这次会议只有会而无议,他一个人说完,就宣布散会。

会后,贺衷寒又将这批“不中用的学生”召集起来,这次总算谈出了一点头绪。所谓头绪,就是大家要组织起来。但怎么个

组织法,还是没有具体意见的。

三天以后,蒋介石第三次召集这些学生去谈话,还是老一套。他神情沮丧,唉声叹气。

贺衷寒这时再也不能沉默了,他呼地一下站起来,泪流满面地哭诉道:“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蒋介石听罢,发觉那些“不中用”的学生已经有一点用了,就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往下逼:“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他接着又补充道:“最好能有个组织,越严密越好。”

康泽站起来代表大家说:“就我所知,苏联有个情报组织,叫格鲁乌,我们今天的力量已壮大,没有问题。”蒋答:“你们去研究研究吧!”

这次开会以后,贺衷寒又多次找这些同学一起商量:成立什么样的组织,拟定什么名称,如何制定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章程条例,由哪些人参加等等。这些商谈的题目,一直谈到1931年的12月初,还没有具体确定出来。而蒋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第二次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办了两桌宴席,邀请了那些挨骂的学生。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谈具体组织问题。正谈着,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就是胡宗南。胡刚从西北来,路过南京,准备到奉化去汇报东北军的事。他是闻讯后而赶来参加的。胡宗南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迫,老是这样谈,时间已迫不及待,应赶快推举几个负责的人来筹备。”众人同意了他的意见,胡就立即推举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等人负责筹备。胡说完话,立即告辞了。其实,许多人不知道胡宗南与复兴社的关系。他是蒋介石指定的参加者,胡自己也以“老大哥”自居。戴笠也是由胡特别推荐的。戴笠以后爬上“军统”

第一把交椅,虽横行霸道,但对胡宗南则称兄道弟。戴笠在军统的胡作非为,另当介绍,在此不提。

那些吃过曾扩情宴请的黄埔同学,第二天就召开了会议,将这个组织定名为“复兴社”,全称是“中华民族复兴社”,取古书“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即张,国乃复兴”之意。在复兴社筹备会上,大家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这期间,又陆续增加了黄埔同学彭孟缉、赵范生、娄绍恺、甘国勋等人。

蒋介石于1932年2月初复职以后,迫不及待地召集那批“不中用”的学生,听取他们汇报。贺衷寒报告了筹组复兴社的经过,并把起草的章程、纪律条例呈上去。蒋一一看罢,未作表态。贺衷寒认为叫“力行社”好,酆悌另外起草了一份材料,定名为“救亡社”,康泽则主张用“复兴社”。照中华复兴社的社章,乃“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最初,凡入社者都须经社长批准,后来组织扩大了,才改为分社也可以批准。入社的“誓词”中,有这样几句:“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守本社秘密,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纪律条例”,其中有许多“不得”:如“不得违抗命令”、“不得有小组织”、“不得泄露秘密”、“不得倾陷同志”等等,违犯者最重可以处以极刑。在诸事就绪后,蒋介石又召开了一次预备会。开会时,蒋介石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四句话:

“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这十六字真言,后来定为复兴社的行动纲领。那么,“蓝衣社”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蓝衣社”就是“复兴社”,因为复兴社社员的制服为蓝衣黄裤,故一般局外人称之为“蓝衣社”。

1932年3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的人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除上文已列名单外,

又增加了骆德荣、张元良、任觉五、叶维、侯志明、田载龙、李秉中等人，总共约 40 余人。蒋介石自己是当然的主席，不在话下。当会议快开始时，黄埔一期毕业生冷欣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冒冒失失闯进来。刚一进门，他被蒋看见了。蒋边推边道：“这个地方没有你，这个地方没有你。”然后紧闭大门，回到主席台，宣布“复兴社”正式成立，并进行选举。

蒋介石是社长，自然毋须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鄞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九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三人为候补中央干事；田载龙、肖赞育、李秉中三人为中央监事；甘国勋为候补中央监事。

复兴社社长的权力是“天赋”的、无限的、绝对的。蒋指定贺衷寒、鄞悌、滕杰为常务干事，滕杰为书记，田载龙为常务监察。复兴社下设四个处：组织处，处长周复；宣传处，处长康泽；训练处，处长桂永清；特务处，处长暂缺。直到 3 月下旬，蒋在南京陵园别墅再召集当初的十多人开会时，才对那些人宣布：“特务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家意见如何？”社长、领袖提名，谁敢不同意，于是大家一致表示同意。这里蒋介石做了个“手脚”，他怕黄埔六期的后起之秀戴笠选不上，但他心目中“舍此无他”，为怕戴笠提名落选，所以干脆名额暂缺，事后这样一说，自然也就如愿以偿了。可是，郑介民是黄埔二期的，他心中一直不服，但又不敢向蒋表示。蒋为何对戴笠如此“厚爱”呢？说来话长。一是戴笠是浙江江山人；二是戴笠当年受到上海黑社会头目黄金荣的栽培；三是此人什么事也不干，专门向蒋介石呈送“机密文件”，使蒋对他特别青睐。后来，“军统”成立，便定以 4 月 1 日为“家庆”，因为复兴社的特务处是在 1932 年 4 月 1 日成立的，于是这就成了戴笠“飞黄腾达”的吉祥日子。

4 月初，蒋介石再召集复兴社干事开会，他又拿出一张纸

条,众人一看,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这12个字,才是他组织复兴社的真正目的。会后,他吩咐康泽按12字真言拟出宣传大纲,潘佑强主张加进“对日宣战”,结果被蒋拿红笔划去。由此可见蒋的所谓“驱除倭寇”乃是挂羊头卖狗肉。

不久,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学生杨周熙写了一本名为《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的书,呈蒋审阅。蒋将“法西斯化”四个字圈掉,改成“复兴运动”四字,书立即付梓,大加宣扬。杨周熙因而也批准参加了复兴社。后来派他赴德国考察党卫军,学道求师。一位非黄埔军校同学刘健群主张复兴社成员穿蓝上衣黄裤,刘当时任何应钦的机要秘书,他向蒋献计献策,经考察由蒋特批,准其加入复兴社。刘健群建议举办军委会政训班,招收大学毕业或具同等学历的学生500人,经半年特殊训练,然后分配到各军师团任政训干部。刘健群的学生一律穿蓝色中山装,又风传是蒋的法西斯组织,这蓝衣社先从华北宣传大队传开,刘健群也乐意这个叫法,后来传遍全国,复兴社也就与蓝衣社等同了。

复兴社以后发展组织,入社条件放宽,凡年龄16岁以上,经社员两人介绍,小组通过,社长批准,举行入社宣誓后,可即为社员。纪律条例后三条还有“不得贪脏纳贿”、“不得狂嫖滥赌”、“不得娶妾”。违反这三条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后来,戴笠头一个违反纪律,但谁也不敢制裁他。

复兴社系仿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组织的一个特殊治情机构。抗战前后其组织遍及各省市,在党、政、军、团中皆有复兴社成员。在吸收社员时,蒋介石指示:“吸收黄埔军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些,但加入组织之后,执行纪律要严一些,吸收普通学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宽一些。”

贺衷寒、邓文仪、康泽、鄧悌等各有分工,他们主要从以下几

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在造舆论，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理论，鼓吹只有效忠蒋介石才是“救国之道”。在其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学会”的领导下，控制各地报刊，除了有《中国日报》作为机关报之外，还有《我们的路》、《青年旬刊》。这两个刊物后来又合并，改名为《中国革命》周刊，它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的机关刊物。该周刊宣传法西斯思想，如《民族主义的复兴与独裁政治》、《论统制经济》、《德国国社党组织之概况》、《武士道之史的研究》等文章，只要一看题目，谁都会明白宣扬的什么货色。

二是控制军事系统的政训部门。以军委会政训处为总机关，由复兴社向各集团军、各兵种军事学校派驻政工人员，团以上政训处长基本上是复兴社成员。他们的任务是监督各部队长的思想行为。蒋介石原则上不许掌握实权的部队长参加复兴社，只有胡宗南、黄杰、桂永清少数人例外。其目的是想通过复兴社对部队长起监视作用，互为牵制，以利于他的驾驭。

三是举办各种名目的训练班，招收黄埔军校失业军官及大专院校学生，实施强化思想训练，择优吸收加入复兴社，特邀一批国民党右派要员、社会名流来灌输法西斯思想。如在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处，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该班1932年3月开学，学员270多人，成员有黄埔军校学生。毕业后他们被分到各级部队任政训处干部。戴笠还成立了一个特务训练班，地址在南京三道高井军校学生调查处内，它是后来军统的人才基地。另外，由孙常钧还主办了一个宪警训练班，地址设在南京朝天宫，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省的宪兵团或警察局任政训干部。刘健群为主任的军委会政训班，也大量招收黄埔学生或大学生，使复兴社社员遍及军、警、宪、特、青年等各个部门。其工作特色则是：在组织上是军事性质的，在手段上是特务性质的，亦即军事

情报部门。反谍、策反、整肃异己分子是复兴社的主要任务，充分显示了它的法西斯本质。抗战时，复兴社还有别动队、忠义救国会、童子军、三青团、复兴运动、新生活运动等，五花八门。总之是以复兴社控制党政军一切部门，他们拉帮结派，行动诡密，就是师长、军长、总司令也怕之三分。后来戴笠从特务处分出去，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那是后话。

且说所谓“十三太保”，不过是指最初酝酿组织复兴社时的一群骨干分子。相传唐末李克用义子十三人，都封太保，历史上有“十三太保”之称。太保乃官名，西周设置，为辅弼国君的官。春秋后废，汉复置，次于太傅。历代沿置，多为大官加衔，并无实职。据说北洋军阀时期，保定军官学校有“十三太保”。复兴社的“十三太保”，既非蒋介石亲封，也不是自己承认，而是在野之人戏称而已。实际上，他们不止十三个人，也不能肯定的指出就是哪十三个人。因此，提起这个不祥之数来，有人认为是指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肖赞育、梁干乔、杜心如、胡宗南、葛武桀、康泽、滕杰、郑介民、刘健群；有人又认为曾扩情、鄞梯、周复也在内，但这仅是猜测而已。如果说有“十三太保”，不如说就是这一群人的总称。以上这些人除刘健群外，其余全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葛武桀、郑介民是黄埔二期毕业，周复、康泽是黄埔三期毕业，只有滕杰是小老弟，黄埔四期毕业，其余全是黄埔一期老大哥，而黄埔六期肄业的戴笠，虽然他后来居上，但还未能挤进“十三太保”之列。

国民党军队的政特系统，“十三太保”算骨干分子，人称蒋介石的十三只鹰犬。他们的确效忠于蒋介石，为蒋家王朝摇旗呐喊，然而他们还称不上蒋介石的智囊团。只有戴季陶政学系首领；曾任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国民

党中央宣传部长杨永泰这些“党国元老”才够资格。“十三太保”的作用也不能低估,昔日“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在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他相继被送往苏联、日本深造。1932年秉承蒋介石意旨,组织复兴社,曾官至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国民党军队党务处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他的军衔为中将,并成为国民党军队政训系统之第一人。此人才华毕露,领袖欲强,宣传“反共、攘外必先安内”,都能从理论上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在黄埔学生中有此“能耐”者绝无仅有。正因为他早年参加过C·Y(共青团),又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所以,蒋既重用他,也提防他。此人锋芒毕露,志在取军,一心想带兵,但蒋偏不让他带兵,只许在军队政工系统中打转。在黄埔军校一期同学中曾流传“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建立复兴社时,胡宗南已是中将师长,这对贺衷寒来说,是梦寐以求的。“西安事变”时,贺衷寒一时兴奋,与何应钦勾结,发动黄埔系将领联名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赞成其轰炸西安之所为,因而他被蒋介石认为居心叵测而遭冷落。后来,贺衷寒与他的黄埔湖南同乡肖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潘佑强、杜心如暗中结成“湖南派”小集团,以贺为首,想在复兴社坐第一把交椅。贺衷寒利用他主办的《前途》月刊大肆进行法西斯宣传,蒋以他狂妄自大,外调为鄂豫皖三省“剿总”任政训处长。贺衷寒离开南京,心也冷了。一次他醉后吐真言,说:“蒋先生对任何人都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一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会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贺衷寒与何应钦高喊“炸平西安”之事，就把贺衷寒找来。蒋骂道：“我还没有死，就把我出卖了，混蛋家伙！”贺受委屈，号啕大哭。蒋怒骂道：“要哭到外面去哭去，不要影响我办公！”不久，贺被蒋撤销一切职务，让他到欧美各国考察政治和经济。回国后，贺担任一年多的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长兼一厅厅长，以后便被蒋闲置起来。1942年4月，贺被重新启用，任命为行政院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9月又任社会部劳动局局长，后来兼任《扫荡报》社社长，主持抗日反共宣传工作。时人对他的工作盛传一副对联：“动而无功，动辄得咎”，横批为“如何了局”。对此，他苦笑道：“这算是笑我没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务艰难。总之，评论由人评论，但我只得努力为之。”

1949年贺随蒋去了台湾，当过交通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晚年迷恋于印度瑜珈术一道，著作有《一得集》、《学与干》。一生为官尚算廉洁。贺早年与原籍湖南岳阳李氏结婚，李氏后病逝于重庆，留有一子；后又与原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之女方考英结婚，方生二子。1970年，贺衷寒退休，1972年5月10日，在台北病逝，终年72岁，何应钦特送挽联，曰：

谈兵早识英才，昔建戎功，今为邦辅。
闻赴来营丧奠，感怀世难，悼失勋耆。

在“黄埔三杰”中，数贺衷寒仙逝最晚，蒋先云战死沙场，陈赓病逝上海。不提。

“十三太保”中，能与贺衷寒并称为“理论家”者，当数湖南醴陵人邓文仪。此人一生崇拜的偶像，除蒋介石外，就是纳粹德国希特勒政权的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了。他以中国的戈培尔自居。邓文仪对于拥蒋与反共，都是很狂热的，这也是他初

期颇得蒋欢心的原因。在黄埔一期毕业后,1925年10月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邓回国投靠蒋介石,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在“清党”中,他是主谋者和执行者之一,连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肖楚女他也不放过,声言逮捕后格杀勿论。其后他任蒋的侍从副官,唯命是从,任蒋责骂,以绝对服从为职志,前后达七年之久。他是非浙江籍黄埔学生中当侍从最久的一个,属于“近臣”。但在“西安事变”中邓却站错了队,在贺衷寒的鼓动下,他主张讨张伐杨。宋美龄教训了他一番后还不明白,便又亲自跑到上海活动,指责和平解决事变的人是拖延时间,不忠于领袖。从此,邓文仪被蒋认为有二心之嫌,不被重用。抗战后,回成都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直到抗战胜利,改任国防部新闻局局长,晋升为中将,这在黄埔一期同学中,已居中下流之列了。

邓文仪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充当蒋介石的使臣,飞来飞去,为他的黄埔同学打气。济南战役中的王耀武、淮海战役中的黄维、李延年、湖南和平起义前的陈明仁,虽都聆听过他的说教,但也未见成效。晚年他在台北积极筹建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主张和平统一中国,反对“台独”势力。1963年以后,邓文仪退出政界,皈依道教,影息山林,并担任台湾道教总会理事长。1991年4月5日,邓文仪与黄埔一期同学刘璠组团前来陕西祭扫黄帝陵。如今年老迈高的邓文仪,看去已是一副清静无为的风仪了,昔日的暴戾之气早已顿消,而代之以祥和与淡泊。邓文仪访问大陆时,邓小平、江泽民先后接见过他。邓小平与邓文仪还回忆了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口诛笔伐,互不相让的政党之争。在黄埔一期的500名同学中,截至笔者写此文之时,仍健在者寥若晨星,到1998年,算邓文仪已是93岁高龄的老翁了。邓

文仪祭黄帝陵一事，暂且不提，以后自有交代。

再说康泽，笔者在三十一回“康泽诱降黄公略”中已略有介绍。此人一生从事特务工作，复兴社、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都有他的业绩。“三青团”也是他首先提议受到蒋介石赞同而成立的。曾一度传说，蒋经国留苏后写信给父亲蒋介石，声明脱离父子关系。后来12年音讯全无。蒋介石伤心失望，故想从黄埔学生中选择培养一名自己的接班人，此人就是康泽。外间谣传某人是蒋介石的义子、婚外子，康泽即是这传说中的“义子”。在复兴社创建时，康泽在特工方面的成绩比戴笠大得多，地位也在戴笠之上，深受蒋介石的宠信。

1937年3月，蒋经国突然从苏联回国，且在赣南地区任专员期间，施展了他的才能。在重庆时期，他就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的活动，并担任三青团组织训练处处长，把持了三青团的领导权。同时又插手参与复兴社的活动，这样，蒋经国与康泽的矛盾就开始尖锐起来。蒋经国野心勃勃，又是太子，有父亲为靠山。蒋介石看到当年送去苏联留学的儿子非但不亲共，而且竭力反共，非常兴奋。于是蒋经国即以其特殊的地位很快就扶摇直上，升任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从巩固以蒋氏为首的国民党统治着眼，凡是有碍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权欲发展的一些功臣、宿将都将一一扫除，康泽为首当其冲。康泽不甘退让已获得的阵地，处处排挤蒋经国势力的渗人。蒋介石见他如此不懂事，干脆将其放出洋去，直到1947年才回国。后来蒋介石把康泽放到兵危战凶之地，任以襄樊为中心的15绥靖区中将司令，并拨65师、202师和川军3个旅交他指挥。康泽推荐刘湘的一员干将郭勋祺做他的副司令。1948年7月1日，是康泽44岁生日。在襄阳城郊一个名胜古迹处，他大摆酒席，请名角唱堂戏助兴。当康泽正得意之时，解放军已攻下老河口。康泽急忙

调兵遣将，可为时已晚。7月16日下午6时，康泽被解放军活捉。康泽被俘后，一时尚下落不明。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我所知道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像张灵甫那样壮烈成仁。”

康泽被俘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1963年4月9日获释。1964年7月，在国民党“九大”会议上，蒋介石在讲话中说：

“记得在前年（民国五十一年）党务工作会议里面，我曾经提到康泽同志在大陆上被俘，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同志遭受共匪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弱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到他，其时正是大陆隆冬天气，可是他却还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他对他的儿子表示：无论共匪鼎镬刀锯，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他革命意志。当他儿子将要与他告别的时候，他曾经向其儿子很低声地叮咛说：‘你回去要告诉在台湾的同志，国民党只要能团结，就有希望，就必成功……’康同志这种宁死不改性向，其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大家知道，康同志，原为在大陆时代青年团领导干部之一，他曾经参加每一次的革命斗争工作，对党团以往种种内外工作关系，和本党在大陆失败原因，当然他最为了解。现在于其身罹百苦之余，说出了我们党的失败之由，和复兴之道，这不是他后悔莫及之言，而乃是的的确献出了他自肺腑的血诚……”

蒋介石讲得有声有色，但了解他的人一听就明白，这是他在沽名钓誉，以此收买人心罢了。在蒋介石怀念康泽的同时，康泽却正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名义埋头写《回忆录》，披露蒋介石的种种罪恶内幕。康泽于1967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3岁。

“十三太保”中，曾扩情施反间计，通过张国焘的手，杀害了

黄埔一期毕业的红1军军长许继慎，前文已有交代不提。此人在西安事变中站错队，被蒋介石一度关进军统的看守所，并大骂他“无耻”。蒋介石脱险后摄影留念时，他赶走了曾扩情，认为此人不配站在“蒙难”志士之列。1949年曾扩情在四川被俘，1959年底被特赦，先后任辽宁省政协秘书处专员，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于辽宁省本溪市，享年90岁。

除去上述人外，“十三太保”如戴笠、郑介民、酆悌以后还要提到，暂且打住。正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黄袍加身为虎作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拉拢同窗 胡宗南重金劝降 翻脸成仇 蔡申熙血染黄安

话说“十三太保”中有一位人称“太保的太保”，此人名胡字宗南，人称太保中的老大，又名寿山，号琴斋。1896年4月4日他出生在浙江镇海陈家埔朱家塘楼的旧宅内。在他生下时，父亲胡镜清受族兄俊清的邀请，到孝丰鹤鹿溪定居，先经营药材生意，后在县衙内清丈田亩，办理田产买卖，以教书为业。胡宗南七岁时，胡镜清在孝丰续娶吴氏夫人为妻，把胡宗南带到孝丰县长住，因此胡宗南的履历表上总是填孝丰人。蒋介石当年在孝丰生活过，胡宗南进黄埔军校时，以其不够高而几遭落榜。后来廖仲恺见他求学心切，才与蒋介石商量破格录取。后来胡宗南飞黄腾达，靠的就是浙江籍和黄埔出身。

胡宗南入黄埔军校后不久，蒋介石召见胡宗南谈话。蒋问：“你是什么地方人？”胡答：“孝丰。”蒋听后笑道：“孝丰？这么说你和我是同乡啰！不过，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我们宁波方向的嘛！”胡连忙解释道：“不假，不假！校长听力真好。我童年是在宁波镇海度过的，七岁才随家父到孝丰。”蒋满意地说：“就是嘛，我是奉化人。想你也知道，镇海、奉化几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算是真正的同乡了。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后要好好学习。”胡听后受宠若惊：“今后全靠校长栽培。”蒋答：“当然要照顾。你家母还健在吗？”胡答：“亲生母亲已不在人世了。”蒋

同情地安慰道：“看来，你很可怜。母爱，这是人世间最崇高、最慈祥、最温暖的爱。想我每次离开奉化时，家母就哭得像泪人似的，我心里也不好受。放心吧！小同乡，我对你们也是慈母的感情……”

从此，胡宗南成了蒋介石家里的常客，他为师母陈洁如干些体力活儿，常博得师母的夸奖。蒋介石也确实把胡宗南当作“小同乡”，每次提拔，总优先考虑他。

1925年春天，胡宗南黄埔一期毕业，被分配到教导团3营8连任少尉见习官，后调任机枪连排长，东征时晋升为上尉副连长。讨伐杨希闵、刘震寰时，他因战功升任教导1团2营营长。北伐时，靠共产党员胡公冕的推荐，胡任教导2团团长。胡常说：“公冕先生是有恩于我的。”在此期间，戴笠从黄埔六期肄业，来到胡宗南部任中尉副官。胡宗南再三向蒋介石推荐戴笠，戴笠才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提拔，所以戴笠也常说：“琴斋是有恩于我的。”在北伐军攻打南昌外的重要军事据点牛行时，胡宗南以一个团的兵力打败了孙传芳一个精锐师，俘虏了军长李彦春和他手下的8000余名官兵，深得蒋介石的赞赏。1927年3月20日，东路军克复上海，24日克南京，5月，蒋介石为表彰胡宗南的功绩，晋升他为第1师少将副师长，成为黄埔系学生中仅次于李之龙而跨人将军行列的人。蒋介石复职后第二次北伐、中原大战，胡宗南以猛打快冲而使敌人丧胆。冯玉祥的悍将孙良诚接连在陇海铁路两侧，忽隐忽现，忽南忽北地向蒋介石的部队反击，加上孙得到晋军杨效欧的援助，使用的是汤姆枪，使得蒋军伤透了脑筋。当时，胡宗南一心想让第1师威震天下，他指挥三个旅拼命厮杀，并且咬住敌人穷追猛打，以致冯玉祥的部下一听说是胡宗南的第1师，就撤退，而不与照面。后来卫立煌的第10师一边打一边大喊：“孙良诚的部队听着，我们是胡宗南的

第1师!”国民党其他师团碰到孙良诚的部队,也大声喊叫:“我们是胡宗南的第1师!”孙良诚常感到奇怪,抱怨说:“他胡宗南有多少部队,怎么打着打着,都是他老胡的部队?”

真假第1师的故事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蒋高兴地说:“还是我的第1师能打仗。”1930年11月战争结束,胡宗南以作战有功正式任第1师中将师长。在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中,胡宗南、范汉杰两人最先升为中将,前后不到5年。

再说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另一位同学名蔡叫申熙(也写成升熙),字旭初,1906年2月12日生于湖南醴陵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参加革命后,他因做党的地下工作,先后曾改名为申熙、申西、升喜、中西、正西、刘辑明等。八岁他进私塾发蒙,十三岁家穷无力升学,父母让他学道士谋生。十五岁那年因得蔡姓长辈的器重和蔡家祠堂的资助,考取醴陵县立中学。后听说广东开办陆军讲武堂,便与左权、张际春等七名同学考入程潜办的军政部讲武学堂。1924年5月,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他被编入第一期6队,很快与王尔琢、陈赓、许继慎、蒋先云等进步同学交往,思想觉悟高,在校经常听周恩来、恽代英的课。1924年秋,他在黄埔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11月底,蔡申熙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先留在学校教导团当下级军官,并参加东征、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蔡申熙奉党组织派遣,返回湖南,到农村从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他秘密带着3支短枪来到衡阳,正着手武装农民时,不料长沙又发生了“马日事变”,全省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他刚组建的农民武装,在衡阳、岳阳之间的一次自卫战中被打散。这时,党组织调他去武汉,到贺龙的第20军2师当团长,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蔡申熙被调到叶挺的11军24师当参谋长。9月中旬,这个师向揭阳进发途中,在汤坑地区遇

到敌重兵围攻,他率少数几个人杀出重围。经辗转来到广州后,蔡由叶剑英安排到新编的警团工作,参加了张太雷、周文雍等领导的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蔡申熙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长。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潜人汕头一带,因人地生疏,无法开展活动,于是潜回广州去见薛岳。薛岳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4军副军长,他以私人感情劝说蔡申熙放弃革命信仰,并资助他赴日留学。但蔡申熙在拿到几百块大洋做路费后,当晚就离开广州,北上武汉。此时党中央已迁往上海,蔡申熙找到党中央机关,被分配在周恩来主持的军委工作。他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与陈赓等做军委特科工作,搜集敌人情报,严惩叛徒、内奸,天天与特务包探打交道,甚至每天要几次化装,一会儿西装革履,一会儿破衫槛褛,上至国民党将军,下至瘪三乞丐,他都要装得逼真,毫无破绽。在那样的环境下工作,必须胆大心细,随机应变,蔡申熙表现出惊人的智慧。一次,他和几位同志正在上海一家饭店楼上谈工作,突然闯进来几个国民党政府的稽查人员,要把他们当可疑分子带走。他想起国民党上海驻军中有位熟人,于是急中生智,便借用这位熟人的身份操着官腔大声呵斥道:“你们要干什么?我是驻沪党军参谋长,在这里商量要事,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稽查人员打电话一问,确有其人,便连声说:“误会”而退了出去。当稽查人员带着军警再返回来时,他和人家早已人去楼空了。

1928年春天的一个夜晚,蔡申熙与胡宗南在上海南京路上一家著名大旅社的楼梯上,两人撞了个满怀。

国共两党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不期而遇,相互间对视良久,接着大吃一惊。在黄埔上学时,胡宗南在4队,蔡申熙在6队,两人虽然不在一个队里,却都是一期的高材生,活跃分子,深为蒋介石所喜爱。

蔡申熙见躲不过去了，就先发制人。他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抢先开口：“寿山老学兄，您好啊？多时不见，好威武英俊啦！”胡宗南此时身任第1军22师少将师长，一身“三皮”（即皮腰带、皮靴、皮包）“两金”（即金板板的领章、金戒指戴在手上），着实威风潇洒。胡宗南见蔡申熙身穿长袍，戴一顶礼帽，像个生意场上混的人，连声说：“啊！旭初老弟，是您呀！这地方你也来，发大财了，还是正在谈生意？”蔡申熙顺水推舟地答道：“寿山兄，都不是，我发不了财，孤身一人，流落在上海，想找碗饭吃呀！”胡宗南身居高位，权势显赫，财大气粗，觉得帮帮落难同学，也是应该的，于是连忙说：“好办，好办！同学一场，又是好朋友，这点忙不帮，能对得起校长的栽培吗？”

他俩从楼梯上再转回去，来到三楼咖啡厅双双坐下。侍应生见来客是一位挂金领章的少将，连忙打招呼，对胡宗南特别有礼貌。

胡宗南、蔡申熙两人心里各打各的算盘，边说话边施计。胡宗南投靠国民党，倚仗蒋介石，南征北战，已混出个模样儿来，在蔡申熙面前自然趾高气扬。他知道蔡申熙在黄埔加入了共产党，而且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思想激进，而且经常与王尔琢、陈赓在一起。从私人感情来说，他对蔡印象很好，觉得蔡是误入歧途，只要好好开导规劝，是个可用之才。胡宗南恭敬地抬手示意：“来来来，喝杯咖啡。”他边喝边回忆道：“黄埔时代，我们多么幸运！平定商团叛乱，东征打淡水、攻平山，棉湖大战，血浴梅县，老弟是战功卓著，令人敬佩。北伐我俩分手后，听说老弟率部所向披靡，在汀泗桥打吴佩孚，真是孤胆英雄，铁军先锋！”胡宗南追忆往事，但闭口不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的倒行逆施。

聪明的蔡申熙虚与委蛇，无心和他交谈。他要按计划去完

成周恩来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与地下交通员接头，生怕误了见面时间，就找个岔口说：“寿山兄，我是流落他乡的穷光蛋，正在为混碗饭吃找工作，我住在某某旅馆里，有机会再联系。”蔡申熙瞎编了一个旅馆名字，在这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他哪里去找也是找不到的。

为了笼络黄埔军校“失足”学生，蒋介石在南京黄埔军校叫康泽、曾扩情、鄧悌分别办了“自新同学招待所”、特种训练班，专门招收改组派、共产党的黄埔同学并予以训练；只要悔过自新，蒋介石一律给他们分配工作，给条出路。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传弟子，他也是竭力推行这一招降纳叛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胡宗南认为蔡申熙能打硬仗，对军事上的战略战术非常熟悉，当年在黄埔就是出了名的高材生，如果能把蔡申熙弄到手，他的22师将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只要蔡申熙幡然悔改，当个团长、师参谋长不成问题。胡宗南见蔡申熙心猿意马，急于想走，当即从皮包里拿出银元，双手送给蔡申熙，关切地说：“旭初老弟，这点小意思，请笑纳！”蔡申熙接过银元，笑道：“盛情难却，谢谢寿山兄的美意，我没有什么回敬的啦，真惭愧！”胡宗南说：“同学、朋友，还说这个，见外了。”

蔡申熙接受了胡宗南的馈赠，心里十分高兴。这么多钱，算是我为党又筹集了一笔活动经费。他煞有介事地问胡宗南的住址。胡宗南的秘书随即递上了一张名片。

胡宗南真心实意地说：“赶快搬到我这儿来，一切都会为你准备的，工作的事，见了面再商量。”接着又补充道：“你先回去收拾一下，我派车接你。”蔡申熙连忙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不劳你大驾！”蔡又补一句：“我住的小胡同里弄车不好进。我还有点别的事要办，准在明后天一定来。”

双方握手告别，胡宗南上了轿车，一溜烟远去。他坐在车

上，一股高兴劲儿无法形容。他以为自己又做了件大事，能把蔡申熙拉到师部来，委以重任，这既帮了同学的忙，又为蒋介石挽救了一个失足者。

胡宗南的美梦做得太早了。蔡申熙离开大旅社后，迅速左拐右拐，甩掉暗探，绕道回到法租界云南中路中共中央所在地。他向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了巧遇胡宗南的经过，把几封银元全部上交给组织。机警的周恩来怕胡宗南追查蔡申熙的下落，决定让蔡赶快离开上海，赴江西中央苏区任省军委书记。三天后，蔡申熙乘船离开了上海滩。胡宗南派人打听蔡申熙所住的旅馆，杳无音讯，知道被老同学“耍”了，一气之下，厉声说：“蔡申熙，咱们战场见！”

1928年，蔡申熙来到江西，为发展革命武装力量，配合湘鄂赣边的武装斗争，他在南昌努力发展地下组织，进行卓有成效的兵运工作，以扩大红军。1929年7月，他又通过赵醒吾与赣西南重镇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的联系，多次潜赴吉安做罗炳辉的工作，并与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一起介绍罗炳辉入党。10月，罗炳辉率靖卫团1000余官兵起义，加入了工农红军，组成江西红军独立第5团，有力地配合了红4军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解放后，电影《从奴隶到将军》的原型，就是被誉为中共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的罗炳辉将军。在反“围剿”斗争中，罗炳辉率部“牵牛鼻子”，获得“神行太保”的美誉。

随着江西革命形势的发展，蔡申熙的活动已引起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的关注，在南昌四处张贴悬赏缉拿蔡申熙的通缉令，并从醴陵抓来他的父亲，对其进行威胁。这时，党组织调蔡申熙去东固革命根据地，担任游击队第1路总指挥。1930年，蔡申熙又调往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军委书记，领导红15军转战鄂东大

地。1931年1月,蔡申熙的红15军与徐向前的红1军会师,组成红4军。在鄂豫皖苏区的红4军成立后,军长邝继勋,参谋长徐向前,下辖两个师。蔡申熙被任命为红10师师长,许继慎为红11师师长。他们三位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又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这次合作共事,心心相印,配合默契。临时特委决定,要以主力寻机包围根据地外围敌人的薄弱部分,调动增援之敌于运动中消灭它,另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拔除敌人设在根据地内部的孤立据点,以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蔡申熙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以全师兵力围攻麻城磨角楼据点,歼敌夏斗寅部一个营,缴枪数百支,从而迫使敌人用13师4个团的兵力前来救援。许继慎的红11师予以迎头痛击,敌死伤惨重,狼狈逃窜。蔡申熙又率领红10师围攻光山县南部敌之重要据点新集,用坑道作业,爆破攻城。1931年2月10日炸开围墙,指战员乘着弥漫的硝烟冲入寨内,全歼守敌千余名。新集攻克后,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不久,新集便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2月间,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正式成立,蔡申熙任特委委员、军委副主席。

1932年6月,国民党拉开了第四次围剿鄂豫皖红军的战幕。这次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与以前迥然不同的战略战术,在战术上,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策略;遇到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改变以往长驱直入的方式。在战略上,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法,以政治手段瓦解红军和群众,组织还乡团接收占领地政权,指挥、计划、行动、步调四统一。蒋介石在汉口设“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坐镇指挥,协调一致。副总司令部设在安徽的蚌埠,由黄埔军校原副校长李济深任副总司令。蒋介石调动黄埔嫡系部队30万大军,其中有胡宗南的1师、黄杰的2师、李默庵的

10师、蒋伏生的83师和俞济时的88师，他们都是清一色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另外派汤恩伯、蒋鼎文、徐庭瑤分路指挥。胡宗南、黄杰、李默庵是蒋介石的“黄埔骄子”。李默庵虽然当初是共产党，但他在“清党”时首先站出来退出共产党，这使蒋介石特别喜欢，立即放手让他带兵打仗，并与其他黄埔同学一视同仁。俞济时和蒋伏生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官，跟随左右，忠实顺从，这次也让他们带兵打仗，以培养其实践能力。

鄂豫皖苏区这一战在大别山地区展开，黄埔军校一期的赤黄埔蔡申熙、徐向前、陈赓、许继慎4员大将上阵；赤黄埔系中，还有黄埔三期的吴光浩、四期的倪志亮、曾中生、肖芳以及五期的潘忠汝也纷纷披甲上阵。

两军对阵，真枪实弹，赤、白黄埔大拼杀、大搏斗在1932年8月至10月展开了。这不再是当年在黄埔军校红、蓝两军的战术演习，用的木头子弹，也不是沙盘教练，纸上谈兵。这次实战，胡宗南决心要报蔡申熙戏弄之仇。他率领的第1师经桐城、舒城，攻下六安、霍山两县，给鄂豫皖红4军来了个“下马威”。主战场红安（当时称黄安），8月份打得最激烈。徐向前作为总指挥，站在七里坪高地，手拿望远镜观察战况，随时调集红军向国民党进攻。8月15日拂晓，黄杰率2师担任主攻，向红军猛烈开炮。李默庵是文武全才，他面对陈赓，毫不留情地重炮轰击。红军的枪炮火力不如国民党，迫近交战，只好硬打死拼，强攻直取。陈赓虽然作战勇敢，指挥有方，但终敌不过李默庵师兄的火力，在七里坪战斗中负伤，他不下火线，被徐向前勒令撤出指挥所，回后方养伤。此时陈赓任红4军12师师长。

七里坪一战，蒋介石进行的是立体战争，天上有飞机，来回侦察，战斗开始前，还用飞机狂轰烂炸，专拣人多的地方丢炸弹。在打得差不多时，国民党的军队逼近红军，又用大炮作掩护，配

合步兵往前冲杀,其攻势之凌厉是前所未见的,实在令人大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与蔡申熙商议后,便命红军主力部队集中起来,一齐出击,力图打乱胡宗南、李默庵的阵线,歼灭他们,扭转败局。交战双方都是黄埔的师兄师弟,所受军事教育、指挥艺术大致差不多,因而徐向前、蔡申熙的战术,立即被胡宗南他们侦察而知。双方之间,你知我晓,只好“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黄杰、蒋伏生、俞济时的阵地战术学到了家,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于是,共产党黄埔一期生在哪儿进攻,国民党黄埔一期生就在哪儿防守,寸土必争,寸土不让,双方拼杀,直至展开肉搏战,有时拼刺刀,徒手对打,如此反复争夺竟达十余次。其战斗之激烈,在军史上堪为少见。黄杰、李默庵吃亏最大。李默庵的10师副师长、黄埔一期生王劲修负伤,第2师和10师被红军击溃,伤亡5000多人。

俗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红军伤亡约2000人,损失也够惨重。黄埔四期生、红军独1师师长曾中生(在校名为曾钟圣)重伤,一颗子弹把脚后跟骨打碎了。9月9日,国民党部队占领鄂豫皖苏区中央新集,至此,红军向皖西转移。面对被动挨打的局面,蔡申熙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红军在内线作战,已无回旋余地,只有冲出包围圈,打到外线去,向平汉路以西的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活动,将胡宗南引向白区。在寻机歼灭之后,再返苏区。这一主张得到徐向前的赞同。蔡申熙率红25军殿后,掩护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撤退。10月8日,蔡申熙的红25军与胡宗南的第1师、俞济时的88师相遇,在黄安河口镇地区打得难解难分。两个黄埔一期生打一个黄埔一期生,一场恶战,红军个个像猛虎下山,舍命保卫苏区领导。敌军在死伤2000人后才退至河口固守待援。敌2师从东面配合夹击,战斗又激烈展开。蔡申熙将指挥所设在仙人洞,与敌激战了

两昼夜，打退胡宗南部多次冲锋。黄杰在激战中，拿起电话找胡宗南：“胡兄，尝到老蔡的厉害了吧？吃了旭初一棍子，舒服吗？”胡答道：“别说了，我们都彼此彼此。”黄杰说：“我还是想请胡兄给旭初送点银元去，不要再打了。”黄杰揭了胡宗南的疮疤，胡毫不示弱地夸下海口：“达云兄，旭初这小子不识抬举，这回我叫他插翅难飞，乖乖地投降。”黄杰说：“对，我们三面包围，围成个大铁桶，看旭初怎么逃！”俞济时也在电话中鼓气。

“三比一，再打不过，我无颜见校长，就死在这大别山！”胡宗南发誓，这一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胡宗南、黄杰、俞济时采用疲劳战术，连续打，轮番攻，日以继夜，你下我上，目标只是一个仙人洞。蔡申熙气得咬牙切齿。10日上午，红25军战士已两天滴水不沾，粒米未进，饥饿、疲劳一齐袭来。胡宗南部的枪声暂息，红25军几个战士一起拉着军长进了防御工事内，让他喝点水，吃口饭。当警卫员把饭刚送到蔡申熙面前，枪声又响起来，蔡申熙扔下饭碗就往指挥岗位上跑，命令主力向新阵地转移，自己则率领警卫排阻击敌人。警卫员见敌人快冲上来，几次要求军长退下火线。蔡申熙坚定地说：“队伍还没有全部撤到安全地带，我不能走！”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他的小肚子，他咬着牙，捂住伤口，仍然坚持指挥战斗，最后终因流血过多，昏倒在地。在蔡申熙不省人事时，警卫员才把他抬上担架，鲜血流淌一地。当他苏醒后，仍不忘指挥战斗。

蔡申熙的爱人曾广澜获讯赶快来到他身边。他对广澜说：“别难过，你要永远跟党走！”一阵剧痛，他昏迷过去。不久，徐向前、曾中生、王树声来了。蔡申熙已经痛得不能再说话，只能用深情而坚定的目光望着面前这几位从黄埔就在一起的战友，然后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蔡申熙牺牲时，年仅27岁。噩耗传到阵地，全军官兵痛哭

不已,战士们高呼:“为军长报仇!为军长报仇!”

蔡申熙在鄂豫皖苏区担任过彭杨军政学校校长,共产党不少将军是他的学生。1931年3月,他打仗时身中两弹,一弹打伤右臂,一弹打中左腿,后右臂残废。胡宗南翻脸不认人,把同学当敌人,虽然报了仇,但他终于未能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他败走麦城的事。以后再述。

解放后,徐向前回忆在鄂豫皖苏区的失败,一个主要原因是张国焘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张国焘不但不许徐向前在政治上插手,而且在军事上也处处牵制他,致使红军处于被动地位。徐向前回忆,有一次为了一个战术问题,他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讲了五、六个小时,硬是讲不通,最后,张国焘不耐烦地喝道:“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办,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只好按张国焘的指示办,结果贻误战机,劳而无功。蔡申熙的失败,也是张国焘决策的失误,如果按蔡的办法,红军西出平汉路外线作战,寻机歼敌后再返苏区,则可避免挨打的局面。因此这次胡宗南侥幸取胜,并非其有本事,不过完全是巧合而已。

蔡申熙在1929年11月间带领队伍渡赣江,出其不意地打开了峡江县城,从而红军得以补充大批物资。从1930年9月26日起的20天内,蔡申熙指挥部队打宿县、攻六村、战广济、下漕河、取英山,连战告捷,一时威震鄂东南。蔡申熙是我军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为了缅怀蔡申熙烈士的光辉业绩,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他修建了墓碑。1963年4月15日,烈士的遗骨迁葬到湖北省红安县烈士陵园。

国民党方面,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胡宗南在鄂豫皖苏区打败红4军后,蒋介石对胡宗南大加表扬,称赞胡宗南的第1师“能攻会战”,是国民党军中的“王牌师”。徐向前掩埋了蔡申熙

的尸体,被迫率红4军向西北突围。胡宗南同肖之楚、黄杰、俞济时和卫立煌的几十万大军尾随、拦截、围歼,企图将红4军歼灭在北上途中。

一路上战斗频繁,特别是陕、鄂交界处的漫川关战役,由于杨虎城挥军南下阻击,而胡宗南、肖之楚又占着有利地形,这样便将红4军压缩在一条山沟里。胡宗南扬言:“漫川关,就是红4方面军的坟墓。”

但红4方面军在徐向前亲自领导下,许世友率尖刀团猛攻山垭口,撕开突破口,突出重围,然后翻越秦岭,经汉中盆地进入四川省的大巴山区。胡宗南一直尾追红4方面军到陕南,想跟随红军入川,但遭到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等的拒绝,只得呆在陕南。但陕南又是西北军杨虎城的地盘,胡宗南不得不绕道,率领他的第1师进入甘肃南部,师部驻天水,3个旅在陇东南的徽县、成县、碧口一线成环形布防。后因红4方面军在川北连打胜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邓锡侯、刘湘出于无奈才让胡宗南派兵入川。因而胡即派黄埔一期同学丁德隆开进四川广元、昭化。丁旅刚一伸头,就被红4方面军一口吃掉两个整团。胡宗南再也不敢冒险入川了。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胡宗南升任国民党第1军军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关中坐大,西北为王,不打日本,专门“安内”,监视、骚扰红军陕北根据地。此是后话,不提。正是:今日尚称兄道弟,明日便反目为仇。同校同窗不同志,各为其主献忠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杀人魔王 戴笠靠军统起家 阴风腥雨 特务间明争暗斗

话说 1931 年 11 月蒋介石一连三次召集贺衷寒、桂永清等“十三太保”开会，每次会议蒋介石只骂一通，这些“太保”从骂中好不容易才领略出个八九不离十来。后经“黄埔太子”胡宗南点石成金，行动起来，开始成立“复兴社”。1932 年 4 月 1 日，复兴社特务处正式成立了，基本上由戴笠、张炎元、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黄雍、郑介民、唐纵、刘培初十人组成，当时号称“十人团”。在组成时，戴笠任特务处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唐纵成了书记室的书记长，他们有军统“三巨头”之称。原军事委员会密查组与特务处合并，下辖 4 科：情报科、行动科、总务科、司法科；4 科又分内勤、外勤。内勤管人事、督察、会计、译电、总务等事宜；外勤则在各省市设区、站或组，并有公开与秘密组织。只有纵的领导，没有横的关系。特务处规定：不属于自己本身范围的工作，绝对不准看、不准听、不准讲。同时对本身的工作是绝对保密的，即使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亦不许泄露。泄密就是违反组织纪律，轻则禁闭关押，重则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各区、站、组都设有情报、行动、交通三种组织，配有秘密电台，建立情报网、交通线。凡进特务处工作的人员，都是终身职业，不准退出。特务处采取军事编制，处长军阶不得超过少将。特务处开始在南京市鸡鹅巷 53 号办公，后扩充到鼓楼四条巷洪公

祠。1936年迁到曹都巷。1937年南京沦陷前夜,特务处从南京迁到湖南长沙市梓园。特务处的工作叫做特种工作。它是一种绝对秘密的谍报工作,如搜集情报、策反敌人、绑架暗杀、侦察监视、破坏敌人组织、保卫重要部门等等,都属特务处的职权范围。他们行动神秘、技艺高超,驾车、射击、化装、窃听、暗杀门门内行。有时还要男扮女装,女扮男装,打入对方上层社会长期潜伏,伺机偷窃情报。有人把他们称为间谍,也有人叫特工;而我国则叫国家安全保卫工作者。

1938年4月,蒋介石在人民的压力下,下令停止复兴社的活动。8月,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第1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编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C.C);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2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局长名义上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实际上由原第2处处长戴笠升任为副局长掌管实权。抗战后,由长沙迁往四川重庆,住中二路的罗家湾。特务分秘密、武装、公开三种。秘密特务有情报员、联络员、报务员、行动员等。武装特务有忠义救国军、别动大队、反共救国军、交警总队等。公开特务有各省市县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绥靖公署驻外国使馆武官、稽查处以及军事系统的第2处、科等。它们互相配合,密切合作,各司其职,目标一致。

特务处的工作人员互称“同志”。当时吸收一个人当特务,一看他有无狭隘的爱国思想,二看他恨不恨共产党,三看有无一技之长。如果发现合格,那就向你宣讲蒋介石的“德政”,如你表示同意,就进一步联络、欺骗、拉拢、收买、最后拉你参加特务组织。在参加时首先填写祖宗三代的详细履历表,经上级批准后,由介绍人向所属单位正式申请。申请人被批准后,由人事部门派人会同介绍人领着被吸收的新成员,到一个挂着蒋介石肖像

的房间,面对肖像肃立,举手宣誓忠于党国,接着人事干部向新成员握手祝贺,集体宣誓极少,多为个别吸收。特务处不准会客,不准泄露办公地址,通讯要用“鸡鹅巷 53 号”或“程阁老巷 33 号”转交,电话也保密,不准随便向外泄露机密。

特务处成员,就其出身成份说,黄埔军校学生不少,杭州警校、留俄学生、中共变节分子、浙江江山人以及向大专院校、失业学生招收者不在少数。蒋介石要求特务处的工作策略是收买叛徒,打击共产党,消灭一切反蒋势力。在抗战后又增加了对日伪集团的收买,潜伏策反以及暗杀日伪首脑人物等新任务。在特务处扩编为军统局后,机构庞大,局本部有 11 个处:即情报一处、二处、行动处、电讯处、司法处、训练处、警务处、人事处、布置处、总务处、会计处。另外,与处平级的单位有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由中共叛徒、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张国焘任主任;专门研究杀人放火与破坏及制造毒药麻醉药的特种技术研究室;经济研究室和一个主管文娱活动的中山室。处之外,还有 5 个委员会,即设计委员会、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策反委员会和抗战胜利后成立的财产清理委员会。后来,译电科变成了机要组、文书科升为文书组,武装特务大队变成了武装特务总队,后又改成武装特务团,汽车队也扩充为汽车大队。仅局本部就有 2500 余人,下属各区、站、组如果算在一起,军统局最兴旺的 1945 年 5 月,其人数在 2 万左右。

军统局先后办了名目各异的特务训练班 40 多个,如在江西的星子班、在湖南的临澧训练班、在贵州的息烽训练班等等。每个班都招收学员千名以上,规模之大,实属罕见。抗日战争开始后,戴笠立即命令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中共叛徒余乐醒和谢公力,前往湖南军统站找站长李人士,准备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 4 号融园筹办特训班。由

于日机轰炸,这个班迁往临澧县立中学院内。该班就有中共叛徒谢公力、王崇五、陆燧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当教官,教出来的学生当然就更加懂得如何反共了。临训班学员主要来源是军统郑州办事处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招收的失学失业学生。郑州办事处主任是个反共异常猖獗的托派分子,经他选上的学员,就有一千多人。而到临澧时,只有八百多人了。这里有夫妻、母女同学的怪现象,如廖仲文和张志坤、李甲孚与陈泽容都是夫妻。而陈月华和马友雯则是母女,至于兄弟姊妹同学的人就更不胜枚举了。军统局有“局歌”、有“四一大会”,余乐醒任副主任,他拍戴笠的马屁其功夫更是妙不可言。他在礼堂背后修建了一道以戴笠的别名命名的“雨衣堤”,让学员休息时也不要忘记他们的老板戴笠。临训班聘请的教官如吴舜华、赵世英、彭家萃等,都是军统著名的老牌特务。胡宗南的老婆叶霞翟就是临训班的“校花”,被戴笠当作情妇玩腻了送给胡宗南的。众所周知,胡宗南当初由陈立夫作媒,想把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介绍给他,后来戴笠侦知孔二小姐生活浪漫、品行不端,戴秘告胡不可娶。胡写信给陈立夫:“国难当头,正我辈军人抗敌御侮,效命疆场之时,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这样婉言谢绝了。

戴笠何许人也?其人其事,让笔者说清楚,怕得长篇巨著,这里只好长话短说,简略介绍之。

戴笠,字雨衣,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硤口镇。戴笠原名春风,又名征兰。这人从小就是一个刁蛮讨人嫌的顽童。成年后,他在乡间地主武装民团当团丁时,更是驽悍、桀骜不驯的一名凶狠打手。1909年,他投身浙江军阀周凤岐的模范团当军士。两年后,戴笠离开部队,只身跑到上海租界,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杜月笙等人。戴季陶看他是同乡,有时让他在证券交易所做些跑跑腿、送茶递水的差使,因此戴笠喊戴季陶

为叔叔。在戴笠与杜月笙相识后,戴称杜为三哥,从此,他们有了长达 25 年的交往。1922 年,戴笠回到家乡,经人推荐任仙霞乡学务委员,不感兴趣。1924 年春天听说浙江督军卢永祥的部下王亚樵在湖州招兵买马,他赶到湖州投奔王亚樵。在此他结识了在王亚樵部下任分队长的胡宗南,两人结为金兰之交。1926 年春,戴笠在江山与小学同学毛人凤邂逅相遇,此时毛人凤已是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的学生。经毛劝导,戴笠被戴季陶引荐,进入黄埔军校五期入伍。他受不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坚决要求留在蒋介石身边当差,不久,又被蒋介石安排到黄埔军校六期骑兵科学习。其间他受蒋介石指使,秘密收集同学中的思想情况,向校长告密。同学们都知道他“通天”,来头大,不敢惹他。未毕业,他就随东路军北伐,在胡宗南手下当一名副官。戴笠在部队中经常向蒋介石反映情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还属于“跑单帮”。1931 年 11 月,蒋介石授意贺衷寒等人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考虑要戴笠任特务处处长,但他资历浅,怕选不上,没有立即任命。蒋下野复出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复兴社,不久,任命戴笠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1932 年 4 月 1 日,戴笠的特务处正式成立,从此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1938 年 3 月,复兴社特务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以副局长的身份掌管实权,简称“军统局”。全盛时期军统有员工 25600 人,实际人数还要多。在军统内部,人们都叫他戴老板,蒋介石则仍叫他为戴科长,因为戴笠曾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老百姓则叫他为杀人魔王。

戴笠管辖下的军统,主要活动是反共和为蒋介石排除异己。他利用一些叛徒如梁干乔、王新衡、谢力公、余乐醒、叶道信、陆海防、吴景中、张国焘、叶青(任卓宣)等,替他进行反共活动和训练特务学生。而最为蒋介石所欣赏的,是他那一套暗杀和绑票

伎俩,吉鸿昌被刺于天津国民饭店,张敬尧被打死在北平六国饭店,都是由军统华北区行动组白世维、黄泗钦干的。特别是他在上海方面的活动,更为蒋介石所欣赏。宋庆龄当时虽然被国民党尊为国母,但实际上蒋却对她联俄联共抱敌视态度;特别是她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恰恰是针对蒋介石那种蔑视人权、任意捕杀爱国人士的最有进步性的组织。蒋介石虽然多次想对宋庆龄下毒手,由于恐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加上宋美龄的关系,所以他迟迟不敢行动,只是令戴笠派人监视,有时让特务写恐吓信。蒋介石决定叫戴笠派上海行动组长赵理君(化名陶士能)于1933年6月18日晨将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铨(杨杏佛)打死在离宋庆龄住宅不远的亚尔培路,就是企图以此来威胁宋庆龄的。戴笠还派特务于1934年11月14日在沪杭公路上,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及其长子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及司机三人打死,史咏赓幸免于难。目的是用以威吓上海方面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人士。戴笠的军统上海行动组还经常在上海逮捕绑架中共人士,破坏中共地下组织。中共江苏省委王克全和不少中共党员先后被捕。第三国际远东区负责人华尔敦(不明国籍,当时报纸上称之为怪西人案,因他被捕后一句话也不说)和他的秘书陆海防(后叛变自首),以及有关人员程其英、陆独步、袁殊、王莹等被捕后,均由戴笠亲自审讯,并以种种威胁利诱方法逼供。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阮兆辉,通过法租界巡捕房华探目范广珍,用500元的活动费打人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以便军统在租界内任意绑票引渡。当时军统在上海绑架到的中共人士和进步人士,一般都是立刻解送到南京军统的秘密监狱去审讯或囚禁,这个监狱的负责人就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苏子鹤(化名顾人道)。这是当时一所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监狱,专门囚禁共产党和政治犯。恽代英、邓演达、陈赓、陈延

年、赵世炎都在这所监狱里住过。黄埔学生囚禁黄埔教官、黄埔同学杀害黄埔同学，这在世界上真是罕见至极。

1938年12月，汪精卫由重庆溜到越南河内，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卫文磨调整中日关系三原则。作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这一行动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真相，使总裁蒋介石十分恼火。于是，蒋决定派戴笠去行刺汪。戴笠立即从特务总队挑选了武术、枪法最好的唐英杰等6人，由余乐醒率领，前往河内行刺，但未得手。1939年3月20日，余乐醒等趁夜黑人静，越墙而入，刺杀汪精卫，恰巧这晚汪把床让给了青年党人曾仲鸣夫妇，特务借手电筒的光，从门洞里射击，曾仲鸣夫妇便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戴笠于1940年春天，亲自指挥特务，在成都逮捕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10余名中共党员。除将罗、车两人带回重庆审讯外，其余的共产党员均就地活埋。

同年春，军统局电讯处从一次电讯事故的处理中，发现重庆电讯总台报务员张蔚林有中共嫌疑，当即向戴笠报告。当时戴老板大吃一惊：共产党竟打入了军统心脏电讯总台，这还了得？戴迅即扣押张蔚林，并亲自审讯和清查深挖其活动，先后逮捕了冯传庆、杨洮、安文远、余力耕等电讯人员，连平时与张蔚林接触较多的张露萍也被逮捕，一并囚禁在重庆稽查处看守所内。

原来，这确实是一起中共地下组织案件。核心人物张蔚林是江苏无锡人，从特务处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举办的特工电训班毕业后参加复兴社特务处江西省站瑞金组。在这段时期，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发生了联系，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后，张蔚林被调往重庆，先后任军统局电讯处科员、重庆稽查处电讯监察科报务员、电讯处重庆总台报务员等工作。在重庆电讯总台，张蔚林先后发展了报务主任、扬州人冯传庆；报务员、辽

宁人杨洮,报务员余力耕,南通人王某等5人加入中共地下组织,成立了党小组,并与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由女共产党员余慧琳从中联络。余慧琳是四川崇庆人,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人极聪明、漂亮,而又机灵。1939年到重庆后化名张露萍,对外称是张蔚林的妹妹,与张蔚林进行秘密接触。在张蔚林被捕后,戴笠十分重视此案,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张蔚林利用案件尚未明朗的机会,以50元法币买通看守所所长毛烈,请其为“家里”送信,地址是重庆市中山二路四德里14号。这样才使中共地下组织得以及时转移,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损失。事后,戴笠得知毛烈送信放跑了中共“要犯”,他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扣押毛烈。毛烈本是戴笠的浙江江山小同乡,又是军统局党政处处长何芝园的小舅子,他一向横行霸道,敲诈勒索,不想此次栽了跟头。虽经何芝园的老婆毛同文亲自向戴笠求情,亦未能救毛烈一命。第二天,戴笠下令将毛烈枪毙。多年以后,戴笠每提起此事,还恨恨不休。戴笠从此严格规定,所有政治犯一律不准囚禁在公开的特务机关,必须送到军统局望龙门看守所。此案发生后不久,戴笠下令将张蔚林、张露萍、杨洮、余力耕、冯传庆等六人送贵州息烽集中营关押。1945年8月,戴笠指示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将这六人杀害于快活岭。张蔚林案件的发现,与1931年“中统”发现的钱壮飞案,这是被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两大耻辱。为此,戴笠被蒋介石狠狠地臭骂了一顿,其在蒋介石面前很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

戴笠虽是黄埔军校六期学生,但未毕业,所以人们只承认他是黄埔六期肄业生。但他的发迹,他的事业,绝不像一般黄埔学生那样,靠功劳和战绩取胜。戴笠从小跑江湖,他结识了不少朋友。上海洪帮中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西北国民党最高军政

长官的胡宗南,在大上海与黄金荣齐名的黑社会大头目杜月笙,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唐生智的小兄弟、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抗战时住在上海的风流特使唐生明,做过大汉奸、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佛海等,都曾对戴笠这一辈子的发迹产生过重要影响。

戴笠认识“暗杀大王”王亚樵是在上海滩。落魄的戴笠由赌徒阿三引荐,认识了这位江淮大侠。戴当时还向王修了一幅“门生贴”。在王门外跑腿领饷后,他因不愿参加帮会,而被退回江山老家。当时王亚樵极重义气,即使这样,仍与刚相识一样,热情欢送并给路费。后戴因办保卫团,欠债累累,重新投靠王亚樵,王拿钱给戴让其还债,并让戴在自己的浙江警备司令部当了一个小队长。其后他又与胡抱一、胡宗南、王亚樵三人结成把兄弟。王亚樵在30年代,是上海滩拥有数千门徒的斧头帮头领。早年,他出身贫寒,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同情下层社会的劳苦大众,常以革命者自居,以改造社会为己任。遗憾的是他满脑子的个人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江湖义气。为寻求出路,为朋友义气,常不惜用暴力手段去对抗社会、对抗权贵。王亚樵曾组织其党羽,先后策划行刺、暗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张秋白、日本侵华驻沪总指挥白川,以及赫赫有名的国联调查团李顿伯爵、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戴笠的主子蒋介石、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物。然而由于他暗杀宋子文和蒋介石,致使戴笠与王亚樵两人再也无法和平共处了。当时戴写信警告王亚樵:“不管我们关系如何,如你有危害领袖之举,我必杀你。”在蒋介石授意之下,戴笠终于将王亚樵杀死。

早年张学良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时,戴笠就通过吴纪权的认识了张。两人一个义气、一个豪爽,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张从欧洲考察回国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戴对张的安全、生活都很关心，连张身边的保姆、佣人的情况，戴也了如指掌。张身边秘书黎天才是共产党员，戴笠并不像对待其他人一样，抓起来再说。他先跑到张那儿，讲清楚黎的情况，再争取张的合作，好让张下台。张让戴把黎囚禁于武汉大学东湖中正亭中，并不准派人监视，黎天才不久潜赴延安。但戴笠不因张学良放走黎天才而与他为难。在“西安事变”时，戴笠随宋美龄赴西安，张学良将戴保护起来，以防意外。

戴笠与唐生明关系也很好，成为莫逆之交。戴常常通过唐生明了解汪精卫、周佛海、李士群的内幕情况。抗日战争结束前，戴笠通过唐生明牵线，策反周佛海，并拯救了一批被李士群76号魔窟扣留的军统特务。

戴笠17岁时，就和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姑娘毛秀丛结婚，生下了一个儿子戴藏宜。毛秀丛患子宫癌逝世时，戴笠因公务忙，无暇回去奔丧。第二个与戴笠接触的女人便是余淑恒。余从一所大学外语系毕业之后，便在唐生明夫妇身边工作，被戴笠看中了，硬从唐生明手中要来，做自己的私人秘书，并送她到军统局外事训练班学习。戴笠非常宠爱余淑恒，因而成为戴的情妇；戴笠曾化名“余龙”向余淑恒求爱，被唐生明的女秘书张素贞讥笑为“余家的乘龙快婿”。

自从毛秀丛病逝后，就有好几个长得漂亮的女特务想当“老板娘”，如有个叫周志英的女特务，与戴同床后，便以为戴看中了自己，常来纠缠，甚至在门口堵截，又哭又闹，弄得戴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不得不将周送进贵州息烽看守所长期关押。余淑恒非特务出身，更不想做戴笠的夫人，只是想通过戴帮她弄个出国护照留学而已。余对戴永远一副若即若离的样子，这反而使戴更想抓住这个猎物：他不但帮余办好出国护照，还委托军统驻美

国站负责人肖勃照顾好余的生活，希望将来自己娶一位如师母宋美龄一样懂政治、懂经济、会外语，在生活上照顾他，在事业上帮助他的如意夫人，因此他总是等着余回国和他结婚。岂知不到一年，照顾余淑恒的军统分子肖勃就打电报告诉戴笠，余到美国后又另有新欢。一向精明过人的戴笠就这样被一个黄毛丫头“耍”了。然而，戴居然把这件事看得非常平淡，甚至继续照顾这位湖南妹子的生活。

为何戴笠如此宽宏大量呢？当时他只要一个指令，就可以要余的小命。然而，他没有如此下狠心，他是要当个“大善人”，做好事做到底，好让余将来感恩戴德。戴笠这时心也已有他属，战争之神和爱神为戴作了一个神秘的交合。这天一位因演过《火烧红莲寺》、《啼笑姻缘》、《姊妹花》、《空谷幽兰》而名噪亚洲影坛的一代影后胡蝶突然来到了戴笠的身边。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上海沦陷后，胡蝶携丈夫潘有声和女儿莉莉逃到香港。日本人听说胡蝶在香港，就多次强迫她和日本合作拍片。胡不肯合作，便托人帮忙运 30 多箱金银细软回国。不料财产却在广东东江江心全部被抢，她投诉无门，急火攻心，大病一场。几十年心血积攒的财富全部失去，胡蝶怎能不愁？不得已，胡在病愈后找到在上海认识的杨虎稽查此案，杨又求助于当时兼任水陆交通稽查处的处长戴笠。如今戴见自己倾心已久的胡蝶落难，正是所谓“英雄救美人”的大好时机呀！于是戴诚邀胡一家来重庆住，并为他们订好飞机票，又空出重庆中四路 151 号公馆让胡蝶一家人进住。此时戴笠正红得发紫，而胡蝶则正处落难之时；戴的一番好意胡是心领神会的。但戴的身份、地位、权势又使我不敢强占面前他所仰慕已久的这位大电影明星，因而戴笠只是想以心换心，放长线慢慢来钓这条大鱼。

1943 年除夕，戴在军统局本部吃过年饭之后，请了胡一家

人到戴公馆吃团圆饭。为了让胡认识到他并非一个“杀人放火的团体的头头”，戴又费尽心机，请了在法国的黄天迈、美国的肖勃作陪，且神侃国内外，大摆一幅上层社会名流的风度。同时戴还与胡的小女儿玩扑克牌，故意输牌后学猫叫狗吠，讨胡蝶一家人之欢心。

新年一过，戴笠推荐胡的丈夫潘有声去昆明担任某部专员，一面加紧破案，一面托肖勃按胡蝶的失物单买一些胡蝶所喜欢的东西，亲自送到胡蝶面前，致使胡蝶感动得抓住戴的双手流泪。然而戴乃用“欲擒故纵”之计，拍一拍胡蝶的手，再讲几句安慰的话，举止极为文明。

戴笠因去兰州布置军统反共工作，劳累过度，回重庆后便咯血、发烧。正在此时，广东军统站派人在东江一家寄卖店发现胡蝶丢失的一颗价值 5000 元的宝石戒指，戴电令买来托人送还给胡蝶，并佯称是破案，没有花钱。在胡蝶戴上失而复得的戒指之后，对戴更是敬佩不已。戴笠心想，此举大概又赢了三分。戴病了一个多星期，胡蝶几乎每天必来探视，并为戴做些小事，洗洗内衣、削削苹果之类。戴笠深为胡蝶那种体贴入微的温柔所倾倒，在胡面前他一再表白发妻死后孤单一人，形影相吊，希望得到家庭温暖。在胡蝶面前，他尚婉言夸她一家多么幸福美满，说如果能娶胡蝶这样一位娴慧温柔、名气颇重的仙女，他会死而无憾矣！至此戴胡关系越来越密切，几乎达到难舍难分的程度。然而胡蝶毕竟是有夫之妇，戴笠向她倾吐了“追”他的周志英一事，胡蝶就立即劝戴释放这位痴心女。戴一时理解了爱的烈火为啥会这般煎熬人，便把因爱自己而被关进息烽监狱的周志英放了出来。岂知这一放，差点坏了戴的好事。

戴笠与胡蝶双双进进去去，军统内部、社会小报大加宣扬。周志英闻风而动，专门去跟踪盯梢，使出特务的浑身解数。一

天,见戴笠与胡蝶去乳花洞游泳,周志英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跑到戴笠面前,大声喊:“戴先生!”戴笠虽然在胡蝶面前装善良而释放了周志英,但并不想和她再见面。这时戴笠怕胡蝶知道,就让胡蝶先下了车,再跑出来责骂又来缠他的周志英;而周志英不管戴笠是打是骂,表示打死也要跟他,发誓生是他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戴笠无可奈何,怕周志英坏了他的好事,只好秘密通知息烽把周志英再关起来,直到周志英死。

经历了这场风波后,戴笠再也不敢带胡蝶在公开场合露面,只好等抗战结束,把潘有声“处理”了,他再同胡蝶办婚事。此时,戴笠在重庆郊外的杨家山半山腰为胡蝶建了一栋豪华别墅,演绎起“金屋藏娇”的典故来。1945年8月底,戴笠将胡蝶带到朋友唐生明家,希望忙完接收敌伪财产工作和肃奸工作后,就与胡蝶结婚。并商定请唐生明主婚。

且说戴笠去北平为蒋介石出巡做安全准备工作,这一忙就是半年过去了。1946年3月16日,戴笠从青岛乘DC47-222号专机去上海向何应钦汇报工作,飞机从沧口起飞时即遇大雾,飞不多久,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说是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飞机到达江淮地区上空,正值滂沱大雨,云层厚积,能见度极差,飞机偏离航向。约在下午1时零6分,飞机才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当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飞机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200米高的戴山的半山腰上。由于机上油料充足,飞机坠毁后,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10箱书画古玩,均被燃烧殆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无一幸免,有戴笠、陆军中将、军统局局长;龚仙舫,陆军少将,军统局秘书兼人事处处长;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杜月笙的徒弟,江苏人;徐焱,副官;马佩衡,英文秘书,香

港大学文学士；黄顺伯，戴笠保释的汉奸；曹纪华，卫士；何启义，卫士；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熊冲，少尉飞行员；李齐，通讯员；李开慈，机关长，共为 13 人。13 这个数字是戴笠一生中极为忌讳的数，他出事前竟连串地凑在一起：13 时、13 分、13 人，于浓雾大雨中葬身于戴山。13 竟然与他戴笠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实属传奇。戴笠出事，自然想由唐生明主持的那场婚事也自然告吹了。戴笠带着想立即去见上胡蝶一面的愿望离开人间。一代“枭雄”，杀人魔王，黄埔军校的败类临终时年 50 岁。

戴笠缘何不得善终？除了他小时候相命先生说他命中缺水外，还有一个历史之谜，那就是有人怀疑军统北平站马汉三因截留“龙泉宝剑”一案怕戴老板回去后惩办他，故意造成机毁人亡。马汉三当年被日本大特务川岛芳子（金璧辉）逮捕时，将此剑送给日本人以求赎命。戴笠北平之行在监狱提审过川岛芳子，见川岛芳子上交的“九龙宝剑”与他交给马汉三的“龙泉宝剑”，从剑体外观、长度、剑身的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比较判断，断定就是孙殿英盗慈禧墓出土的“九龙宝剑”。此无价之宝是由孙殿英赠送给他的，由他马汉三保管，可怎么又跑到川岛芳子手中去了呢？多年来萦绕在戴笠心头的一桩疑案直到这次他的北平之行，才终于有了答案：马汉三不是通敌也是被捕招供。戴笠表面装成若无其事，准备回重庆再找马汉三算账。马汉三怕“龙泉宝剑”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遂与心腹、军统华北督导员刘玉珠买通机场人员。两人利用其特殊身份在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计算好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前 3 分钟引爆，借以飞机着陆失事为掩盖，逃脱戴笠的追究。扑朔迷离的“三·一六”空难事件，至今还是个谜。只叹一生工于心计、精于暗算的杀人魔王戴笠，最后却输给一个毫不起眼的对手手中，实在令人费解。戴

笠一生坏事做了不少,但抗日战争中对日寇进行间谍战,打击汪伪特工人员还是立了功的,但此事不足挂齿。正是:投靠蒋介石,三斗王业樵,大杀共产党,中国希姆莱。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冤家路窄 林彪善用迷魂阵 三打苏区 陈诚兵败草台冈

话说中国有句俗语：“不是冤家不聚头”。国民党嫡系部队陈诚的 18 军在第三次“围剿”后的一年多里，与中央苏区红军主力林彪的红 1 军团接连交火，正好应验了这句俗语。

一个是黄埔军校的教官陈诚，一个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林彪，师生情谊已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两支劲旅在“围剿”与“反围剿”之间进行生死搏斗。谁胜谁负，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两军几十万官兵的死活，关系到中央苏区几百万群众的家庭安危。

当时的情形是十分严峻的。1932 年 12 月上旬，日军集结了大部兵力，意欲大举进攻热河，同时向山海关发动攻击。当时蒋介石面对日军之侵略于不顾，仍抱“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决定向共产党的中央苏区、闽赣两省进行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剿赤”军总司令，分左、中、右三路军：以驻福建的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指挥其 19 路军的 6 个师又 1 个旅，向闽西苏区进攻；以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指挥在粤北、赣南的粤军 6 个多师由南部向中央根据地进攻；以陈诚为总指挥，指挥其 12 个师为中路军。加上散在闽赣四周的 13 个师，共计 50 余万人。蒋介石要其各部仍然以“进剿”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之经验，把中路军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形成强大的突击兵团，另外

加上第3、第4航空部队亦参加战斗,以泰山压顶之势,杀向红军。其目标是首先肃清金溪附近的红军,巩固临川,继而以主力南下,向城南增援。

时中央苏区为红1方面军,下辖3个军团又4个军,共约7万人。这次“围剿”与反“围剿”,实际上也是黄埔军校师生在中华这块大沙盘上的一次实弹演习,只不过要用鲜血作代价,胜负是非同儿戏的。

国民党方面,陈诚是挂帅的人物,何应钦也不可小看,黄埔一期毕业的参战者有萧乾、黄维、宋希濂、李树森、霍揆彰、陈沛、彭善、夏楚中等,这些人均已升任师长,军衔都是陆军少将,参加过东征、北伐、中原大战和前三次“围剿”。他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宋瑞珂、方靖等此时才任团长。

共产党方面,周恩来是挂帅的人物,黄埔军校教官出身的有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陈奇涵等,黄埔军校的学生有林彪、徐彦刚、罗瑞卿、袁国平、左权、陈伯钧、王诤、郭天民、程子华、刘畴西、张际春等,他们都是师长以上的指挥员。

国、共两党黄埔军校毕业的团、营、连长参加“围剿”与反“围剿”的就不计其数了,这在世界军史上,同一所学校学生对阵沙场,实属罕见。

强敌压境,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决定,在敌人尚未完成对中央根据地合围之前,红军先发制人,集中力量消灭抚河流域的敌人主力,进而争取江西全省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中央先后调闽浙赣的红10军和闽西的红12军、赣南的红21军分别南下和北上,统归红1方面军朱德总司令指挥。

面对来势汹汹、急于报复的国民党18军,红1方面军司令员朱德、政委毛泽东(1932年8月任命,10月底被调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工作)、参谋长刘伯承和红1军团、3军团、5军团的军

团长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等人经过仔细分析研究，识破了陈诚逼迫红军主力在广昌与之决战的企图。他们决定将计就计，让红 11 军加上几个独立师，还有部分地方赤卫队，冒充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在广昌地区活动。而红 1 军团、3 军团、5 军团和红 12 军团、21 军团、22 军组成的红军主力，则悄悄集结于洛口、小布、东韶地区，准备侧击国民党 18 军后纵队的右翼。此时，红军犹如一只灵活矫健、蓄势待发的山豹，静静地、耐心地等待着猎物靠近。

红 11 军和地方部队在广昌的频繁活动，终于吸引了陈诚的注意力。他认为红军主力就在广昌附近，因此他下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的第 5 师也调出来配属给前纵队指挥。1933 年 3 月 20 日，以 18 军主力为骨干的前纵队推进到了甘竹、罗坊、洽村一带。而由 11 师、59 师残部和第 9 师组成的后纵队，则被甩在了草台冈、徐庄一线。前后纵队之间拉开了约 100 华里的距离。红军乘虚而入，以红 5 军团、第 12 军为右翼，插入国民党 18 军前、后纵队之间，由东向西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岷等地。红 1 军团、3 军团、第 21 军和独 5 师则为左翼，由西向东攻击草台冈、徐庄等地。红 22 军为总预备队。陈诚的 18 军后纵队完全落入了红军两支强大的攻击部队的有如铁钳似的夹击之中。3 月 20 日黄昏，国民党 18 军的王牌主力师、陈诚的起家血本第 11 师，在师长、黄埔一期毕业生萧乾率领下，开到了徐庄、草台冈一线。萧乾望着云遮雾锁、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看着士兵扛着沉重的武器和行装，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冒着大雨，一步一喘地艰难爬行，他心中不禁添了几分愁绪。这位黄埔的高材生，为人性情刚烈、争强好胜，在第三次“围剿”、赣州战役、金资战役中他曾与红军多次交手，从未有过败绩。因此他并不把红军放在眼里，他坚信他统领的 11 师是 18 军的精华，是王

中之王，是天下无敌的。他看着夜幕即将降临，就下令部队在草台冈、霹雳山、雷公嶧、陈庄一带就地露宿过夜，等待天亮后再继续行军。18军副军长罗卓英在此时也率领59师残部进驻东陂以北的五里牌。罗卓英虽不是黄埔军校出身，可在保定军校，他与军长陈诚、周至柔都是莫逆之交，他长期从事参谋工作，养成了勤于思考、谨慎小心的性格。他将这几天的战场情况反复考虑、分析，突然心中升起一股不祥之兆，18军后纵队这几天的进展一帆风顺，尖兵搜索前进，苏区连一小股地方游击队的骚扰也没有，四周地势如此险恶，又如此平静得出奇，其中必然有诈。想到这里，罗卓英立即下令发电报给萧乾，命令他的11师不要再继续前进，应连夜撤退至五里牌。

接到罗卓英的电报，萧乾不以为然，认为罗卓英谨小慎微，优柔寡断。这里哪有什么红军主力？萧乾按照陈诚的作战计划，正要寻找红军1军团的同学林彪较量呢！在黄埔军校时，萧乾当了黄埔四期步1团7连长，而林彪还是四期的学生。如果是比资历，林彪自然不是他的对手。萧乾眼看士兵爬山越岭跑了一天，已经疲惫不堪，应该让士兵好好休息，岂能又在这大雨滂沱之夜行军退回去？于是他回电罗卓英，曰：“官兵十分疲劳，不能返回。”为了以防万一，他又下令全师就地转入防御状态，以32旅占领霹雳山、龙嘴寨、黄柏山阵地，以31旅的2团占领龙嘴寨以北及黄柏山、草台冈南北一线。师部和预备队1个团驻守徐庄。在布置完毕后，萧乾才放心地躺在行军床上，安然入睡。

21日拂晓，晨雾迷蒙，细雨纷飞，万籁俱寂。忽然，从霹雳山方向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紧接着，以徐庄、草台冈为中心，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到处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其中还夹杂着沉闷的迫击炮、山炮的轰鸣声。红军向11师发动了全线进攻。

在 11 师左翼,红 3 军团第 1 师猛攻霹雳山阵地;红 7 军、红 2 师强攻黄柏山;红 1 军团林彪率红 10 师、11 师进攻草台冈;红 21 军进攻大公田、西岭,截断了驻东陂的国民党 9 师与 11 师的联系。在萧乾的右翼,红 5 军团左权的 15 军强袭龙嘴寨。左权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与萧乾是同期同窗,此时他两人也成仇人。红 13 军 39 师猛攻雷公岬;红 12 军截断了东陂至侯坊的道路,把 9 师与 11 师拦腰斩断,互不通气。

在萧乾的师部里,师长完全失去了他以往那种骄傲自信、镇定自若的神态。他非常清楚,由于陈诚的判断失误、指挥失灵和他自己的盲目乐观、疏忽大意,已经使他的 11 师完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之中。俗云:“骄兵必败。”现在红军有 6 万人,而他的 11 师才 1 万多人,对比之下,相差悬殊甚多。红军地形熟,装备轻,而他的 11 师如瞎子摸象,完全对地形生疏,而且官兵负载重,行动不便。前纵队离此有百余里,鞭长莫及。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在红军一边,看来前途凶多吉少。想到这里,萧乾决定各团就地坚守阵地,等待援军。他拼命呼叫陈诚、罗卓英和前纵总指挥吴奇伟,请求解围。

双方激战,红军从左、右翼向 11 师发起猛攻,打得难解难分,32 旅旅长黄维指挥部下在霹雳山、龙嘴寨、黄柏山一带倚仗险要地形,拼命抗击。子弹、炮弹、手榴弹雨点般地向红军飞去。黄维也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一向以作战勇敢而著称,加上他的 32 旅全部是英、德式武器装备,配有冲锋枪、捷克式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还有山炮、迫击炮的火力支援,因此,红军进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伤亡也很大。但红军对陈诚的 18 军这个冤家对头早已恨之人骨,此时正是全歼第 11 师、重创 18 军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岂肯错过,因而红军利用火力掩护,分成多路轮番攻击,远的用枪射击,近身则以手榴弹炸、大刀肉搏拼。在林彪的

勇猛攻击下,萧乾的 11 师渐渐支撑不住,伤亡越来越重,整班、整排、整连地打光,团、营、连三级指挥官伤亡殆尽。陈诚的同乡、亲信、64 团团长沙嘉傅阵亡,只有 63 团团长沙、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宋瑞珂率领部分残兵败将侥幸脱逃。11 师师长萧乾身负重伤,11 师预备队 1 个团全部被消灭,师警卫连慌忙抬着师长落荒而逃。在 11 师师部被端掉后,书生气十足的 32 旅旅长黄维表现得勇猛顽强,他死守阵地,炮弹在他身边爆炸,气浪击倒了他,弄得满脸灰土,草鞋被尖利的树杈扎穿,但他仍坐在战壕掩体内沉着地进行指挥,一直打到黄昏,只是他而后见大势已去,方才下令突围。而他自己则因脚被扎破已经不能走动,只好临时躲在山沟里,几天之后才由部下雇当地人把他抬出山来。由于他表现突出,陈诚对他十分厚爱,战斗结束后立即提升他担任了 11 师副师长。11 师是陈诚的看家之本和心头肉。当 11 师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抚州总指挥部时,犹如一声晴天霹雳,陈诚被惊得目瞪口呆,几乎晕眩过去。当他清醒过来后,立即下令第 9 师、第 14 师和前纵队的所有部队都直奔草台冈,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11 师。18 军副军长罗卓英离 11 师最近,他严令督促 18 军 59 师仅仅剩下的残部温良旅和第 9 师 1 个团火速赶往草台冈营救 11 师。然而,这支援军在雷公岷、大排附近遭到红 12 军、红 21 军和红 39 师的毁灭性打击,死伤惨重,前进不得,几乎由救援者变成了呼救者。

一个月前,红军一支部队东渡抚河,引起 18 军误解,遂命令中路军 3 个纵队分别由金溪、乐安、南城出发向黎川、建宁地区集结。其右翼所属第 52 师、59 师行至宜黄以南的黄陂、大龙坪一带,便陷入红军 1 军团林彪主力的包围圈。2 月 27 日,红军在黄陂发起总攻,激战两天,全歼第 52 师、59 师;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如今又落入红军之手,别说援救友军,连他自己还想友

军援助呢！

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周至柔，是 18 军 14 师的老师长，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林彪听过他上的战术课。他任 33 旅旅长时就以治军严谨而受到同学陈诚的器重，在擢升 14 师师长后拥有很高的威望。当他接到 11 师的告急电报和陈诚下达援救 11 师的命令后，他立即与刚提拔起来的新师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霍揆彰一道率 14 师，日夜兼程，火速赶往草台冈增援。由于 14 师和 9 师的积极增援，红军放弃了对 11 师的追击，未能全歼 11 师。周至柔因此受到国民政府明令嘉奖，不久就被提升为国民党 18 军副军长。

草台冈之战，陈诚中了林彪调虎离山、佯攻打援之计，被林彪的迷魂阵“迷”了心窍。18 军败走麦城，教师爷被师徒打了个落花流水，11 师损失最为惨重。前后几天功夫，被红军歼灭了 5 个团，占全师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师长萧乾被击伤，旅长黄维也受了伤，阵亡了 3 个团长，营、连、排长几乎伤亡殆尽。战后，11 师清点官兵人数，仅剩下 3000 人左右；重武器全部损失，枪也被红军缴获数千支。师长萧乾羞愧难当，主动引咎辞职。陈诚只好任命罗卓英兼任 11 师代理师长，黄维晋升为 11 师副师长，11 师残部回后方整训补充。

且说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围剿”时，接连损兵折将，52 师师长李明、59 师师长陈时骥被俘。在南昌督战的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气急败坏，即用飞机到抚州上空向前线总指挥陈诚空投手谕，大骂陈诚：“如果不击退赣匪，就不要回来见总司令的面。”他并且命令陈诚马上改变进攻战术，由“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陈诚接到蒋介石的手谕，垂头丧气地叹道：“诚虽不敏，独生为羞。”为挽救其颓势，他又采取了一些攻势，终

因 11 师大败草台冈,因而引发了各路蒋军也纷纷撤退。在周恩来的英明指挥下,红军历时 50 天,终于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3 月底,天气晴朗,风和日暖,周恩来、朱德、林彪率领红军从前线浩浩荡荡地返回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一路上,群众挥舞花束彩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迎胜利归来的子弟兵。周恩来看到这感人至深的情景,激动地对身旁的朱德说:“听说古时送行到十里长亭,算是深情厚谊了。可跟眼前比,那又算得什么,现在何止 10 里、20 里。真是凯旋百里迎亲人,情更深谊更长啊!”

蒋介石的空前惨败,使他在无奈之中凄然长叹:“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为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而后在国民政府内部引起轩然大波,遂命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弹劾陈诚、要求撤职查办。与陈诚势不两立的何应钦则大骂陈诚是“饭桶”,要改编 18 军。顾祝同、杨永泰等人也趁机一拥而上,落井下石,指责陈诚无能。为息众怒,蒋介石被迫宣布给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陈诚深感威信扫地,因而无脸见人。在沮丧之余,他索性电告蒋介石,引咎辞去一切职务,撤销中路军总指挥部。不等蒋介石回电,他就从抚州回到南昌私宅中,闭门不出,成天与新婚妻子谭祥对坐长叹。陈诚在家闷闷不乐,善解人意的妻子谭祥看在眼里,于是百般劝慰夫君。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知道蒋介石对陈诚的宠爱和信任决不会因为这次惨败而动摇,但目前陈诚畏于空投手谕,不敢见蒋介石,蒋介石又不便召见陈诚。君臣这样僵持下去,对双方、对“剿共”均有不利。贺国光秘会陈诚夫人谭祥,终于为安排蒋陈见而定下了一条妙计。

这条妙计是什么呢?原来谭祥是蒋介石的干女儿,陈诚与谭祥的婚事,由宋美龄从中撮合,所以蒋、陈关系非同一般。陈诚在家烦闷羞愧,忧郁痛苦,六神无主,经不住谭祥的软磨硬缠,

陈诚终于答应陪爱妻外出散步,观赏春光,并顺便到宋美龄官邸,看望一下干娘。一天晚饭后,陈诚与谭祥双双来到宋美龄的住宅中,宋美龄热情地款待了他俩。相互寒暄后,蒋介石突然从房中走出,陈诚这才明白上了谭祥的“当”了。蒋介石笑容可掬地上前握住陈诚的手,亲切地说:“这个,此次围剿失利,责任在我,你就不必多介意了。”陈诚一听,心中感动不已。他惭愧地说:“校长,我没能为您争光。”这时,蒋介石拿出熊式辉弹劾陈诚,请求改编 18 军的电文给陈诚过目,陈诚看后,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愤愤不平地对蒋介石说道:“校长,18 军到底还要不要?如果不需要 18 军,请干脆撤销这个番号,何必改编成 3 师 8 团呢?否则,悉听尊便。”看着陈诚羞怒交加的样子,蒋介石急忙好言抚慰:“辞修,你放心,18 军是我的血本,是东征、北伐由教导团扩编而成,谁也不要想改编,要改就改编为两个军 8 个师。”

陈诚从蒋介石那里领回“圣旨”后,将 18 军扩编为 8 个师,辖 11 师、14 师、43 师、67 师、94 师、97 师、98 师、99 师,因而又成为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实力最雄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中的惨败是空前的。他的 3 个精锐师几乎全部被红军消灭,大量新式武器也被红军缴获。中央苏区地跨湘鄂闽粤 4 省,且与闽浙赣苏区联成一片,共有 10 万平方公里,300 多万人口;中央红军达 10 多万人,全国红军则有 30 多万人,全国共有共产党员 30 万人。在这次“围剿”结束后,蒋介石黯然地承认,“周恩来确实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当初如果在黄埔军校不搞“清党”,也许周恩来会为自己所用,如今却被共产党抢去了一个帅才,实在是可惜。

再说红 1 方面军 1 军团团长林彪,这位年仅 23 岁的军团长,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三骁将”之一。黄公略、伍中豪不幸牺

牲了,这使党中央和毛泽东像失去了左右臂一样地难受。如今这位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青年指挥员,统帅上万名官兵与他的老师何应钦、陈诚较量,与他在黄埔一期毕业的老大哥一比高低,确实令人捏一把汗。但林彪怎么擢升起来的呢?这要从头说起。

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黄冈人,1907年生。早年受他的两个堂兄林育南、林育英(张浩)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上,“林氏三兄弟”曾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日。林育南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兼秘书长,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等职,1931年2月7日夜间,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林育英(张浩),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总工会常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八路军129师政委,中共中央工委书记等职,1942年在延安病逝。林彪在两位堂兄帮助下,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从黄埔军校毕业,12月来到武汉,由中共武汉军委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第3连任见习排长。

1927年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2次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5月,北伐军决定与奉系军阀在河南展开激战。在一次争夺战中,林彪所在的第25军3连击溃奉军追至渭河边,溃军如潮水般窜过桥梁退至北岸,连长命令停止追击。林彪气呼呼地问:“为什么吹停止前进号?”连长如实相告:“上级交代不可穷追,以免孤军深入,受敌夹击,要等友邻部队到齐后,再行追击。”林彪说:“战机瞬息万变,指挥员应该独断而行。如果奉军炸毁桥梁,或者在北岸设防,再追就来不及了。”连长正犹豫不决,林彪大声喊道:“冲啊!冲过桥去!”于是就率领他指挥的一个排冲向北岸,继而其他各排也尾随其后;正在北岸布防的奉军

由于立脚未稳,立刻溃散,纷纷缴械投降。这一仗,3连共俘虏800余人。林彪以机智、果断、善于因势制变,而受到嘉奖,被提升为第25师73团1营7连连长。林彪参加了南昌起义,并随朱德、陈毅转战湘南,参加湘南起义。后来与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林彪又升任28团1营营长。

在井冈山的反“围剿”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作战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使毛泽东开始对这位年仅21岁的营长刮目相看。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当时任红4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1928年夏,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八月失败”,王尔琢在追劝叛军中牺牲。当时王尔琢的声望仅次于毛泽东、朱德、陈毅,是红军中第4号人物。他的牺牲,为另一颗新星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毛泽东、朱德考虑再三,决定由在井冈山斗争中、在军事指挥上崭露头角的林彪接任了28团团长的职务。

1930年6月,在毛泽东提携下,23岁的林彪出任红4军军长,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这年8月,在红1、3军团合编为红1方面军时,林彪当选为方面军总前委委员。1932年3月,红1方面军整编,林彪就任红1军团军团长。红1军团也是赤黄埔系掌握兵权。政委聂荣臻当过林彪的教官,参谋长陈奇涵当年在黄埔军校当过学生队队长。在陈奇涵调走后,左权、徐彦刚先后任参谋长。左权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徐彦刚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他们都是林彪的左、右手。当时红1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红4军军长王良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在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中,于1932年6月30日率红4军返回赣南之途中,在武宁县太和圩遭敌拦击面光荣殉职,年仅27岁。在这次反“围剿”中,林彪机智灵活,善布疑阵。在与陈诚交锋中,他出奇制胜,牵着陈诚的

鼻子走,使敌军肥的拖瘦,瘦的拖垮。这让骄横不可一世的国民党18军怎么也想不到会在黄陂、草台冈战役中,被林彪与彭德怀两员名将打得一败涂地。

国民党向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调集50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压过来。当时毛泽东已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排除在红军领导之外,前线指挥由朱德、周恩来担任。他们根据战场情况变化,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围城打援,将主力撤到东韶、洛口待机;待查清敌行军路线之后,再采用大规模伏击战术消灭敌人。陈诚在黄埔军校教的战术,林彪这次运用上了,真是徒弟打败了师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按照林彪的部署,红军部队兵分左、右两翼。左翼为红1军团、红3军团、21军,进至黄陂一线设伏,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翼为红5军团和红22军,由董振堂、罗炳辉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红军左翼。在红军隐蔽以后,林彪对位于谷口的红11师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了红11师的阵地,要求他们加强西面火力。在指挥战斗过程中,林彪表现得异常沉着冷静。当敌52师两个旅4个团毫无戒备地从红军指挥所前走过时,参谋请示林彪:“打不打?”林彪冷静地说:“等等辎重部队。”他判断,敌人大部队行动,一定有辎重部队跟进,以保证粮秣子弹的供应。果然,不一会,敌人辎重部队过来了,骡马车辆,挤满了道路,这时老天又不作美,倾盆大雨,道路泥泞,寸步难行。参谋又请示:“打吧!”林彪仍然冷静地说:“等护卫团。”这样,敌人全部进入了伏击圈。林彪这时才立即发出总攻信号,从而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抱头鼠窜,人仰马翻,惊慌逃命。经过3小时的激战,将52师全部歼灭,生俘师长李明。

黄陂大捷后,林彪、聂荣臻又率红1军团和红21军、红22军及独立红5师,进攻草台冈,又消灭了陈诚18军的王牌军11

师，萧乾负伤，侥幸逃命。如何打草台冈前已叙及不提。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满意地说：“1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听到这话十分高兴，他把整个战役的成果全部记入了他的“功劳簿”。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赶编了一出《庐山雪》，描写红军打南昌，杀上庐山，活捉蒋介石的故事。罗瑞卿把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戏台。罗瑞卿自告奋勇扮演蒋介石，年纪小、个子也小的童小鹏扮演宋美龄。平时性情古怪的林彪，——这个未来的元帅和罪人，他表现得异常热情而且投入，他就扮演红1军团长，自己演自己。一开始，大伙儿还担心他过于拘谨、呆板；谁知他一上台，演技却十分高超，不断地抖了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戏演到最后一幕，达到高潮。台上的军团司令部，林彪正在接电话。电话里有人报告：“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报告军团长如何处理？”林彪当即答复：“用船装来。”“山上怎么走船？”台下战士一阵哈哈大笑，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笑成一团。林彪情急生智，说：“这个问题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研究一下。”然后大声喊：“罗主任！”

此时罗荣桓正患痢疾，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取暖。也许是有些怯场，罗荣桓仍然没有上场，只是坐在那里笑。林彪喊了几声不见罗荣桓上台，急中生智，就给通讯员下命令：“通讯员，去把罗主任请来。”于是，几个战士不由分说，便把罗荣桓推上了舞台。台下又是一阵哄笑，气氛非常热烈。戏，终于演下去了。最后，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被押上台来，接受林彪审问。林彪问：“你是蒋介石？”罗瑞卿答道：“是！”这些都是台词。往下，林彪即兴编对话，随意发挥，问：“你怎么长得那么瘦？”罗瑞卿答：“我整天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所以胖不起来。”林

彪又问：“怎么不吃补药？”罗瑞卿灵机一动，临场编排道：“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肝坏了，肚肠坏了，不可救药。”一个乱编，一个巧补，自然浑成，天衣无缝。在战士们中反响极好。林彪大出风头，几十年后，他提起这段往事，还炫耀自己的表演才能。共和国的三位元帅同在一个军团工作过，同演过一台戏，一时传为佳话。“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真的导演了一场迫害罗瑞卿的“戏”，那是后话。

1985年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克诚就林彪的评价问题发表谈话说：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他后来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正是：一代名将龙吟虎啸，千秋功罪自有评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铁桶围剿 莫雄暗献绝密图 战略转移 红军踏上长征路

话说蒋介石坐镇南昌,督促“剿共”连遭失败,国民党官员要对“剿共”干将陈诚的失败兴师问罪。这时,军事专家柳维垣与戴岳向蒋介石献计:老一套的作战方法,无法战胜擅长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共党,必须改弦更张。蒋介石采纳了两位“军师”的建议,实行“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就是所谓“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战略,并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1933年7月18日,蒋介石在江西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召集蒋系军官轮训,前后举办了三期,轮训了7500多名连长以上的军官。风光秀丽的庐山此时却黑云密布,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蒋介石聘请了德国军事家赛克特为首席顾问,重点研究堡垒战术、山地战术和搜索战术等新的战法,蒋介石尽量抽出时间为学员上课,他说:“国家大患不在日寇而在江西的共党。剿共不成亡于俄,抗日不成亡于倭,亡于倭尚可图恢复,亡于俄则永世不得翻身。”并继续灌输“攘外必先安内”的指导思想。凡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军官,每人可得到蒋介石所赠“军人魂”短佩剑一把,上刻“不成功就成仁”六个金字。团以上军官,每人与蒋介石合影一张,以示“钦赐”。

9月,蒋介石纠集了一百万大军,200架飞机,又有德、意、美

三国军事顾问随行,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也就是庐山军官训练团编印的绝密文件:《铁桶围剿计划》的具体实施。10月19日,蒋介石由南昌行营出发,到达临川亲自督战。陈诚的18军被编入了北路军中的第3路军第5纵队,作为向苏区进攻的“箭头”和“刀尖”。国民党为了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首先占领了两区之间的黎川。真是冤家路窄,陈诚又与他的学生林彪遭遇了。18军的11师、14师、94师、9师与红1军团的1师、2师及江西军区的4个独立团鏖战不休。红军中“左”倾错误领导者震惊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强令林彪夺回失地,结果,由于国民党采取“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的新战略,红军在硝石一战不胜,资溪桥再战又不胜。此后,红军又辗转寻战于强敌与堡垒之间,则完全陷于被动。

11月,被国民党调至福建“围剿”红军的19路军,在中共关于合作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官兵厌恶内战,联合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于20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蒋光鼐等又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在这种时局下,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派陈诚的11师向福建进攻。当时由于中共中央采取关门主义的政策,没有给予应有的援助,内部不团结的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失败,史称为“福建事变”。蒋介石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后,回头集中兵力围攻中央根据地,红军又面临着严重危机。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6届5中全会,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4月初,蒋介石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占领中央苏区腹地,集中主力正面进攻苏区的北大门广昌,而共产国际派驻苏区的代表李德调集9个师的红军兵力保卫广昌,提出“不让敌入侵占寸土”

的口号,企图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同国民党打阵地战,拼消耗。从4月10日至27日,红军采取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虽然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但也使自己遭受重大伤亡。广昌战役,红军伤亡达5500余人。4月27日晚,红军被迫撤离广昌。国民党的18军伤亡更大,因伤亡惨重,精疲力尽,只得整休。黄维的11师、夏楚中的98师、李树森的94师先后攻占了甘竹、姜源和罗家寨。

广昌战役后,国民党叫嚷:“门户一开,堂奥难保。”蒋介石兵分6路向中央苏区腹地全面进攻。李德却继续实行防御中的堡垒主义,6路分兵,全线防御,“短促出击”,大打阵地战,使红军中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林彪、陈伯钧、罗瑞卿、郭化若、曾希圣、左权、徐彦刚、袁国平、郭天民、刘畴西以及他们的老师叶剑英、聂荣臻、陈奇涵、陈毅等无权根据形势避其锋芒,保存实力。而白黄埔系的陈诚、黄维、宋希濂、霍揆彰、李树森、夏楚中、阙汉騫等骄横不可一世,专门寻找红军主力,欲决一雌雄,以报四次“围剿”惨败之仇。

敌人步步逼近,红军节节退守,战火已向中央苏区的心脏地区蔓延。内线作战已极少有胜利的可能,情况十分危急。这时,中共中央成立由博古(秦邦宪)、李德(德国人)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处理军事问题。博古乃一介书生,此时身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年纪还不到28岁,什么仗也没有打过,只会办报耍笔杆子,当军事首领他确实不太“称职”。李德何许人也?此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黑人,德共党员。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1932年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国情,只是把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因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

他相当尊重,因此他就大权独揽,发号施令起来。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在中央军委所在地云石山梅坑,在“三人团”之间发生了一场关系到中央红军命运的秘密谈话。30多岁的周恩来这时已留起有几寸长的黑胡须,他闪着一双精明的眼睛严肃地说:“该是决定突围的时候啦!”然后从身上取出一份文件,让李德、博古过目。这是一份什么文件呢?原来,这是莫雄通过潜伏在国民党江西省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内的我地下党员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三同志传送给中央苏区的一份《铁桶围剿》计划。莫雄当时任这个区的保安司令兼行政督察专员,早年在粤军陈炯明手下任师长,东征时被黄埔校军打败,在香港当寓公。由于莫雄曾与蒋介石同在粤军中工作过,通过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牵线搭桥,莫雄当上了专员。但他同情共产党,手下的几个秘书、科长几乎都是中共党员。莫雄上庐山开“剿共”军事会议,每人发一份《铁桶围剿》计划书、图表、指示文件,上面都打上了蓝色的“极密”字样。周恩来手中的是一份复制件,莫雄暗献绝密图,也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的。虽然未被发觉,但却因为莫雄与华克之是至交,从华克之的身上搜到莫雄的亲笔信,蒋介石以莫雄“通共”兼“暗杀”嫌疑被关进了南京军法处监狱,后由杨永泰、陈诚、张发奎保释出狱。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说博古、李德见了这份《铁桶围剿》计划后,并未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还想与敌人拼死命地打,争取以战役的胜利来改变战局,保住中央苏区。李德在房间里踱步不止,他一边凝视地图,一边说:“国际6月来信讲明,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考虑退出中央苏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吗?放弃中央苏区可不是小事,必须请示国际。”周恩

来紧盯着博古讲道：“同国际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怎么请示？何况已经几个月，情况又有了变化嘛！我们应该独立决定，博古，你负总责，要拿主意。”

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在“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失掉了兵权，博古优柔寡断，朱德听命于李德，而李德还在大搞“反江西罗明路线”；刚反了“四大”（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又反“四小”（即肖劲光、李井泉、陈正人、余泽鸿）。1934年1月4日上午，瑞金召开公审大会，追究丢失黎川的肖劲光的责任，要判肖劲光的徒刑。

大敌当前，内部还在斗，周恩来忍无可忍，正颜厉色道：“博古同志，我们可不要抱侥幸心理，现在几个军团各守一方，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大量歼灭敌人，而只会被敌人所消耗。陈济棠最近有与我秘密谈判停战的迹象，因此，目前南线还有一段口子可以利用，等局面更不利的时候，再转移损失就大了。”在周恩来的强争力辩下，博古终于作出了一个有时间限制的计划来：“如两个星期内再收不到国际指示，我们就自行决定。我负责各机关拟出随行干部的名单，你们负责军事上的安排。”

少数人关于秘而不宣的长征准备工作在仓促地进行着。当时战争还在继续打，连很多高级领导人也蒙在鼓里，但蒋介石却已知道了中央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

广昌失守后，第一位被李德撤职的，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红14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的唐天际同志。此人乃湖南安仁人，参加过东征、北伐、南昌起义。1928年3月他随朱德上井冈山。唐天际能打硬仗，仅仅因他把防御工事修在河边，而没有修在山上，李德就大动肝火：“谁让你把工事修在河边？你都留了一条后路，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结果广昌丢失，应验了李德的话，唐天际自认倒霉。建国后唐天际被授予中将军衔，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广昌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兵分四路，加紧向根据地逼近，北、东、西三面大军按计划全面向瑞金挺进，惟独南面陈济棠迟迟按兵不动。蒋介石问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南路进展如何？”熊式辉答道：“自从占领了筠门岭后，陈济棠的部队有几个月不进攻了。”蒋介石吩咐道：“给陈济棠发电，要他抓紧进攻，打下会昌把会昌划给广东军防区，打下瑞金也一样。”蒋介石嘴上虽这么讲，心里却在盘算：“该死的陈济棠，占领个小山头就不思进取，还一个劲要经费要军火，不知安的什么心？”

粤系将领陈济棠，为维护和巩固他的“南天王”的地位，一直和蒋介石勾心斗角。第四次“围剿”前，蒋介石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奉命，把粤军主力调往赣南粤北，封锁赣粤边境。他一面采取阳奉阴违、虚张声势、避实就虚、谎报战果的做法，有意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同红军保持秘密联系，想借助红军的力量同蒋介石抗衡。他曾找到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在广州的内弟作为联络媒介。周恩来、朱德在看到这一情报后，周恩来立即同意陈济棠的代表到瑞金来。

1934年9月下旬的一个傍晚，陈济棠的高级参谋某人专程来瑞金面见周恩来。

一见面，周恩来就觉得来人有些面熟。这时，陈济棠的使者快步上前同周恩来握手，大声叫道：“周主任！”接着撩起长衫，从内衣袋里掏出一封密函，双手呈给周恩来。

“周主任”是黄埔军校学生对周恩来的尊称惯称。周恩来断定来人一定是他的学生，但哪一期，叫什么名字，他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周恩来态度开朗，雍容大度。他双手接过信函后，先请客人入座，然后开始阅读。信是陈济棠写的。信使动身前，陈

济棠非常慎重,单独召见。陈济棠当面交代任务,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面交周恩来先生,速去速回。”

信中说:“我决定派参谋长杨幼敏、师长黄旭初、黄质文三人为谈判代表,建议贵方最好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现派徐参谋前来商定谈判时间、地点及其他有关事项。”

周恩来看完信后,徐参谋开始陈述了一番自己对“周主任”的敬慕之情,一再称自己是学生,看来此人必是黄埔军校毕业是无疑了。朱德这时正巧进来,双方握手寒暄,然后就谈判中的具体问题、主要内容等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和反蒋办法。朱德还亲自致函陈济棠,交信使徐参谋转呈复命。

这位神秘的使者到底是谁呢?由于当时的会晤、交谈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现今已很难查证。近50年后,人们从《朱德选集》中只发现他姓李,至今他的真实姓名、军衔官阶仍然是个“谜”,当然他决不是“徐参谋”,陈济棠也会为他保密。又据有些史料证实,此人即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陈公培,哪一期也遍查不着。

10月初,周恩来派何长工、潘汉年赴筠门岭,然后由陈济棠派一个连前来迎候。当时陈专门备了4人抬的花轿,每遇岗哨盘问,连长就高声说:“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因此一路畅通无阻。何长工临行前,时任军委副参谋长的叶剑英一再关照他俩:“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潘汉年当然也未亮出真实姓名,只称潘健行而已。

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终于达成以下五项协议:1. 就地停

战,取消敌对局面;2. 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3. 解除封锁;4. 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 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你,陈部撤离四十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正谈判中,潘汉年突然接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这是暗示他们立即返回,红军转移。陈济棠的代表很敏感,问:“你们是否要远走高飞了?”潘汉年毕竟在白区做过地下工作多年,他平静地说:“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了天!”谈判结束后,何长工、潘汉年立即离开寻乌,返回会昌,接着又按周恩来的意见径直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的经过及协议内容。当然,这事李德不太同意,周恩来兴冲冲地向李德汇报时,李德正在教夫人肖月华烤制德式面包,他笑道:“和陈济棠谈判?和军阀合作?”李德不太理解中国复杂的政治关系,他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太不可思议了。博古听了也毫无反应,从心里说,他对陈济棠不抱什么希望。

晚秋风寒,山岭一片枯黄。中央苏区群众满怀愁情,中央红军马上就要离开这块经过多年流血奋斗换来的自由土地。10月10日,在浓重的离别情绪气氛中,中央红军8万多人踏上了万里征途。他们选择了向赣粤边境突围的方向,选择了蒋介石自认的“不利之路”,这是他事先连做梦都未想到的。

博古和李德缺乏主力部队大规模战略转移的经验,一心想到湘西去和红2军团、6军团会合,并且在放下行李后,再举行反攻,夺回中央苏区。于是,他们部署了一次大搬家式的长征,后方机关有1万人和1千多副担架,极为庞大。各军团机构臃肿,携带了大量辎重,包括需要十几个人抬的笨重的印刷钞票和宣传品的机器、野战医院的X光机、大批《红星报》的存档报纸。总之,坛坛罐罐,一样也舍不得丢。几个主力兵团分别在前、后、

左、右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作甬道式的开进。为隐蔽红军意图，避免敌机轰炸，中央红军采取爬大山和夜行军的办法。每当夜幕降临，8万多人的队伍就出现在五岭山脉那羊肠小道上。队伍拥挤不堪，走走停停，每天行军不到50华里，有时一夜才翻过一座大山。这样的军事部署和行军速度，面对着现代化武器和快速交通运输的国民党追兵，前途确实堪忧。蒋介石获知中央红军突围行动后，便着手部署堵截红军的军事行动。10月下旬，蒋介石命令陈济棠在江西南部的赣州、南康、信丰、安远、筠门岭、会昌一线构筑一道突不破的“钢铁封锁线”。

周恩来根据与粤军达成的“相互借道”的协议，派人通知陈济棠。陈济棠遵守诺言，即在红军行动方向上，让出了一条40里的通道。10月25日，红军胜利渡过信丰河，顺利地通过了陈济棠的“封锁线”。

陈济棠，广东防城人，字伯南，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在粤军中任连、营、团、旅长，1928年任粤军第4军军长。长期追随蒋介石，1950年逃往台湾。陈济棠的10公子陈树柏与笔者曾同在成都黄埔军校22期学习。1949年他从海南转往台湾，然后赴美国求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州圣地，卡勒拉大学任电机工程与电子计算机学系主任、教授。陈树柏没有忘记他父亲与共产党的那段交往，1982年回大陆讲学，受到邓小平和邓颖超的接见，表示愿在深圳办一所大学，为中国培养电子人才，以继承父亲遗志。陈济棠于1954年在台湾突患脑血栓去世。

言归正传。且说红军继续西进，蒋介石急令何健和陈济棠在湘南的桂东、汝城和粤北的仁化城口一带布置了第二封锁线。11月初，由于陈济棠执行秘密协议，没有派重兵阻截，只图自保，湘敌受到红军多次打击，胆颤心惊，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远在湘赣边，鞭长莫及，所以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又被红军突破。红

军进入广东境内后,认真执行谈判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湘、赣边西进,于11月8日和15日未遇粤军阻截,三道防线又顺利突破。蒋介石的堵截计划一次次落空,终于他发现陈济棠企图保存实力,大为恼怒,急令手下发电曰:“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接电后,惟恐日后难以向蒋“交账”,迅速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所有文件,乃令叶肇、李汉魂、李振球等师,分头沿广东乐昌唐村、坪石尾追红军人湘。此时,红军西去已远矣。

红军在万里长征中,赤黄埔系的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程子华、郭天民、张宗逊、莫文骅、徐向前、林彪、王诤、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宋时轮、周士第、郭化若、胡立教、黄杰、张瑞华、左权等,都表现出惊人的勇敢与智慧。他们在长征中身负领导责任,在红军面临危亡的紧急关头,他们和周恩来一样,积极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在艰苦备至的征途中,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

周恩来始终是捍卫正确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虽然受到博古、李德的指责,他仍然拥护毛泽东的主张,避免了红军的损失。红军在短时间内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要不是与陈济棠达成协议,红军突围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以及携带的东西太多,行军速度太慢,致使渡湘江这第四道封锁线时,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军人员减至3万多。这时敌人在通往湘鄂西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如继续与2军团、6军团会合,等于往敌人口袋里钻,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这时力主放弃原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担任部队实际指挥的周恩

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周恩来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因此随后,红军向贵州进军,一举攻克黎平。

在黎平,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周恩来再次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贵州进军。从此,红军进军路线改向贵州遵义方向,把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

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解放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在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周恩来的态度,对推动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实施,起了重要作用。此后,红军进入云南,又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的计划,取得了在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曾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四川江津人,曾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初加入共产党,进过莫斯科东方大学,在黄埔军校负责党团领导小组工作。长征时任红1军团政委。红军过湘江封锁线的惨重损失,使博古、李德灰心丧气,部队怀疑、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领导层也主张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团中央书记的凯丰(何克全)多次找聂荣臻谈话,要他支持博古、李德,聂荣臻没有同意。他对博古、李德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实行“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等战法极为不满,并多次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均遭拒绝。“遵义会议”上,聂荣臻发言,完全赞同对博古、李德的批判,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表现出他刚正不阿的性格和耿直坦荡的胸怀。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前夕,即1934年9月,党派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程子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离开中央苏区前,周恩

来对他说：“目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占绝对优势，他们用封锁、‘驻剿’、‘追剿’等办法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又很难补充，这样发展下去，红军就会被消灭。中央派你去鄂豫皖建立新根据地，并任命你为红 25 军军长，立即动身。”1934 年 11 月，红 25 军在程子华的带领下，从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转移。他们首先进入桐柏山区，发现不易立足，便打算进入伏牛山。他们在沿途战胜敌人重重阻击，进入洛南县，决定在鄂豫陕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1935 年 1 月，敌对新根据地发动“围剿”，红 25 军以“各个击破”的战术，粉碎了“围剿”，于是这支红军在陕南 5 个多月间，便发展到 4000 多人，从而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同年 7 月，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向陕北转移。9 月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程子华原名程世杰，山西解县人，抗战时参加过百团大战，建国后当过山西省省长，民政部长，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91 年 3 月病逝。

1935 年 3 月，红 9 军团奉命牵制敌人 6 个师，确保红军主力渡过乌江。时任红 9 军团参谋长的郭天民，他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湖北红安人，他接到军委发来的急电，说红军主力将要渡过乌江，命红 9 军团星夜兼程，务于第二天 8 时前赶到沙土镇渡口，尾随主力过江。由于部队冒雨行军，路滑难走，到达指定地点时，已晚了整整 6 个小时，前面的守桥部队已把浮桥拆除。这时黔军尾追而至，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分析了当时的处境，决定先吃掉尾随之敌。郭天民立即进行战斗部署。首先他用一支小部队设置疑阵迷惑敌人，而主力则连夜开到老木孔地区埋伏起来，待机歼敌，第二天，敌摸不清红军虚实，绕道老木孔。红军一举端掉敌军的指挥部，创造了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例。中央军委命令他们迅速南下，相机渡过盘江，进入云南。红 9 军团拟渡乌江，但由于渡口已被敌人重兵把守，铁

索桥也被敌人控制,因而他们找到一位姓王的老人,郭天民给他讲红军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道理,使老人高兴地指给他们一条渡江的路线,并亲自为红军带路,部队顺利渡江。5月,红9军团与中央红军主力重新会合。

左权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老大哥,湖南醴陵人,1925年入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到中央苏区,任红1军团参谋长。红军强渡大渡河时,中央军委决定由左权率领红2师5团一部和红1军团侦察连,向四川汉源县大树堡前进,担任佯攻,钳制和吸引大树堡对岸之敌,以保证红军主力强渡安顺场。左权率领部队,长途奔袭,连续作战,一天行军150华里,赶到小相岭,消灭扼守隘口的全部守敌。接着又以一天140华里的速度赶到海棠,追歼逃敌两个连。尔后翻过晒经关,袭击并占领大树堡,吸引了对岸之敌,策应刘伯承、聂荣臻率红1师在安顺场顺利渡过大渡河。当时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军继续长征,来到白雪皑皑的夹金山下,这一地区气候恶劣,道路险峻。在过雪山时,红军总部后面,有一支特别连队,队里有身强力壮、全副武装的士兵,也有年轻的妇女和戴眼镜的斯文人,还有拄着拐杖的白须老头。这是中央机关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的干部特别连,也叫卫生部休养连。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红4师师长张宗逊,陕西渭南人,在二打遵义战斗中腿部负伤,组织上便把他安排到干部特别连当连长。当时谢觉哉、董

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都是年过半百的老者，徐特立已58岁，人称“长征五老”，董必武任连党支部书记。在这个连队中还有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朱德的夫人康克清等，老弱病残较多。张宗逊感叹地说：“当这个连长比当师长还难啦！条件很差，还要对全连同志的安全负责，保证能吃上饭，不能行走的要用担架抬，生活上要做到万无一失，我都成了保姆了。”

每到一地，张宗逊就安排排长打前站、找向导、寻挑夫、筹粮草，安排宿营地。在翻越夹金山这座大雪山之前，张宗逊给大家传达先头部队过雪山的经验，还根据情况对年老同志和重伤病员作妥善照顾。当时谢觉哉不善缝补，正想找人帮忙，红4方面军文工团第3团的宣传员王定国主动帮助谢觉哉缝了件羊毛衣，谁知这件毛衣竟使他俩结成了革命伴侣。张宗逊没有让全连一个同志掉队，那时在山上掉队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6月，张宗逊的腿伤已不用上药了，他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另行分配工作。8月上旬，军委命令他任红4军参谋长。共和国成立后，张宗逊被授予上将军衔，看他长征照顾老弱残病人有经验，要他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长征到了毛儿盖地区，继续北上必须经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为了找到过草地的捷径，减少损失，毛泽东决定由叶剑英率两个团做过草地的开路先锋，这位当年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的中年将领，时任军委副总参谋长，还抱病在身，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士兵们在烂草淤积的沼泽地里的草茺上前进。一天晚上，部队在年朵坝宿营，只见满天乌云翻滚，顿时倾盆大雨直灌下来。没有栖身之处，大家或蹲或坐，紧靠在一起，忍着饥寒，苦撑到雨停。叶剑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全身都湿透了，冻得直打哆嗦。经过几天行军，部队到了大草地北端的班

佑,叶剑英一面组织部队击退敌骑兵的骚扰,一面找当地藏民调查去甘南的路线。待中央领导陆续抵达班佑后,他向毛泽东报告了先遣部队的一路情况和下一步部队主力行动的意见。他建议说:“按照原计划去拉卜楞,还要走4天的草地,一路上会遇到许多敌人的骑兵,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这里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了。”毛泽东翻阅地图,又征求周恩来的意见,然后说:“剑英的意见很好,我们就从这里转弯。”此后,右路军即从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进。叶剑英成功地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黄埔军校五期毕业、长征时任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后任上级干部队政委的莫文骅,他和曾任过黄埔军校兵器处处长、中央苏区教育委员、长征时在干部团当政治教员成仿吾一路同行。到云南时,莫文骅设法给成仿吾配备了一匹马,这才让他走完了万里长征路。一次,军委1局张云逸局长患病,军委有关领导希望能给病员弄些肉或油,给他们补补身体,可一连几天也没有弄到手,莫文骅将供给处分给他的4两腊肉送给了张云逸。解放后,莫文骅在北京见到张老时,张老向他提到送腊肉的事,说那4两腊肉,比现在请他吃烤鸭还好啊!

原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当过宣传科科长,长征时在上干队当学员,在将走出草地时,他不小心跌进水沟,幸有人将他拉起,但由于衣服湿透,嘴唇发白,脸色铁青,全身发抖,他无法继续行军。莫文骅经过此地,问其究竟,遂将身上带的几片干姜给雷经天口含和擦身,并从袋子里拿出一套旧单衣给他换上,不一会儿,雷经天嘴唇变红,也不发抖了,休息后便能拄着拐杖继续行军了。解放后雷经天当过上海社科院院长,于1959年病逝。莫文骅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委,1993年11月,增选为黄埔军

校同学会副会长,到笔者写此书快付梓时,莫老已是 90 岁高龄的长者,并且经常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2000 年 5 月 31 日,莫老这颗将星骤然陨落,实在令人悲痛。

在长征中,湘鄂西苏区王明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夏曦,1935 年随红 2 军团、6 军团长征,1936 年 2 月,部队行至贵州毕节时,过河不慎落水牺牲。

没有随红军主力长征的同志很多。如陈毅、瞿秋白、刘伯坚、何叔衡、张鼎臣、毛泽覃、赖作昌、宋清泉、徐彦刚、谭余保等。徐彦刚曾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长征前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 16 师师长,他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1934 年 7 月负伤,9 月在江西永修养伤时被敌人发现杀害,年仅 28 岁。正是: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逼蒋抗日 张学良西安兵谏 讨伐张杨 何应钦戏中有戏

书接上回。且说红军长征，历尽千辛万苦，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线，渡湘江，进贵州，强渡乌江，二打遵义，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于1935年10月胜利抵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同红15军团会师。红2、6军团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于1936年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第4方面军会合；10月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1方面军会师。至此，两万五千里长征结束。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

红军抵达陕北后，蒋介石即召集张学良、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到四川开会，进行集中主力作战，彻底消灭红军的部署。1935年10月1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蒋介石自兼总司令，调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张学良的东北军共辖5个军20余个师，约30万人，已陆续到达陕甘宁边区，与当时陕甘宁的红军比较是十与一之比，蒋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另外，还有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列入了“剿共”的序列。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甘肃、陕西打红军的阴谋；使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和决心抗日的红军都受到牺牲和损失，达到其削弱乃至消灭异己的目的，并指出东北军只

有抗日反蒋才是惟一出路,同时建议互派代表,协商关于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

1936年2月,蒋介石又电召张学良到南京开会,对围攻陕北红军作新的部署。蒋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国防要地重兵33万人,以陈诚为总指挥,开赴山西,协同阎锡山的军队阻截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又命张学良火速从南京回西安,张学良乘专机飞抵西安后,即到洛川设指挥部,他只得被迫进剿红军。

其实,红军对不久前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三个战役中被俘的数千名东北军官兵不但以礼相待,而且晓以抗日之大义,揭露“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本质。经过短期教育,红军允许东北军被俘人员去留自选,并交还枪支和马匹。在榆林战役中被俘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从瓦窑堡回到洛川东北军驻地,在面见军长王以哲后,又要求亲自见张学良以面陈机密。张学良接到王以哲密电后,亲驾飞机到洛川。张见高后,拍着桌子大骂道:“高福源,你好大胆,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高福源没想到张学良如此对待他,也就把心一横,慷慨陈词:“张副司令,枪毙我,还不是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但是,难道你忘了,先大帅被日本军阀炸死,东北大好河山被日本鬼子所强占,3000万东北父老乡亲成了亡国奴,现在人家共产党诚心诚意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更有何理由骂人家是匪?”高福源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们东北军再打内战就快要完蛋了,还有什么理由去打人家?”

张学良听了,马上拉着高福源的手,说:“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与真情。坐下来咱们好好谈谈吧!”在倾心深谈后,张学良要高福源立即返回瓦窑堡,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商谈。这以

后,中共先后派了李克农、汪锋、叶剑英、潘汉年与张学良接触,双方共同达成协议: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在西安建立交通站等。接着,中共中央派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改造军队,准备抗日,当然,这些都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以防蒋介石的特务发觉。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从南京乘专机来到西安,进驻西安东郊的临潼华清池。华清池是个风光旖旎之所在,它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恋爱故事而闻名于世。

初到西安,蒋介石假装出一副颇为悠闲的样子,让张学良、杨虎城陪着,游览了秦陵、黄陵、华山、终南山。他要先观察张、杨的动向。两个月前,复兴社领导干部、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扩情到广州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派兵围抄陕西省党部,目无法纪,背叛中央;而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秘密联合,酝酿抗日,更是逆迹显著。”在游山玩景的消闲气氛中,蒋介石询问张学良:“汉卿,你近来看了些什么书?”张学良答:“一本《辩证唯物论》,一本《政治经济学》。”蒋介石心想,这还了得,怪不得他们在西北搞什么联合抗日,不愿意跟我去“剿共”。他一本正经地数落张学良:“这些都是苏俄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蒋接着介绍了《大学》、《曾文正公全集》给张,张听了只好不以为然地笑了一笑。几天后,蒋介石说出了来西安的目的,向张学良、杨虎城宣布他的“剿共”计划,要求张、杨立即做好一切准备,向陕北红军进攻。张学良非但不同意他继续“剿共”,而且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甚至建议与中共谈判,以拯救中华民族的前途。蒋听后一脸不高兴,大声表明:“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情。”说毕,蒋返洛阳去度他50岁生日。

12月3日,张学良到洛阳见蒋介石,再次劝蒋停止“剿共”,

和中共合作抗日,并要求蒋释放“爱国七君子”。蒋听罢,严厉训斥张学良,说他决不能停止“剿共”。而对释放“爱国七君子”之事,蒋训斥道:“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想的。”这使张学良十分难堪。至此两次“苦谏”均不成功。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到临潼华清池去见刚刚从洛阳再次返回的蒋介石,痛切地向蒋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乃中华民族之第一要事,部队抗日的情绪是不可限制的。他苦谏道:“日寇侵略我国,进逼日益猖獗,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名存实亡,最近,绥远又复告紧,国家民族的存亡,已到了最后关头。”张学良血气方刚,认为苦谏总会能打动蒋介石的,又继续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一致,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非出路!”张学良再三“苦谏”之后,又继之以“哭谏”,他声泪俱下,言辞恳切,同蒋介石争辩长达3个多小时。最后,蒋介石竟拍案大吼:“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在“哭谏”失败后,张学良于12月8日和杨虎城在西安九府街芷园秘密磋商,权衡国家民族存亡之利弊,最后决定: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2月9日,是北平“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这天,朔风呼啸,天寒地冻。上午,蒋介石召集参谋人员开会,定于12月12日正式发布总攻红军的命令,若张学良、杨虎城不服,即命胡宗南解除张、杨武装。这天,西安学生热血沸腾,怒火燃烧。下午,蒋介石在华清池听到有一万余名学生高举“抗日救国”的标语牌,列队向临潼推进的消息,于是他立即电令张学良派兵镇压,“格杀勿论”;同时还命令宪兵团在十里铺布防,架设机枪,准备血腥屠杀。接到电令后张学良急忙乘车追至十里铺,劝慰学生返回,并表示,三天之内,他将用事实来满足学生的爱国心愿。

学生请愿加剧了蒋和张之间的矛盾。蒋疑心这是张、杨二人为贯彻他们的主张故意让学生去示威，因而遂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在大举“剿共”的同时，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在送走学生的当晚，就把学生的抗日要求转达给蒋介石。蒋不但不接受，反而恼怒地斥责张学良。张苦谏、哭谏毫无结果，至深夜，便愤慨而归。12月10日，张学良再次到临潼请求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并痛切陈词，要求蒋介石采纳。蒋介石不仅严词拒绝，还强令屠杀西安抗日青年，镇压人民抗日运动。蒋介石到西安后的横暴无理态度，使一直效忠蒋介石的张学良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他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了。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冒生命危险，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12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矣。

12月10日，蒋介石下令各大员云集西安，准备召开“剿共”会议，除何应钦、刘峙、顾祝同等人外，余如陈诚、蒋鼎文、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朱绍良、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卫立煌、邵元冲等，先后均已到达西安。时蒋氏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这次“黄埔八大金刚”来了一半，黄埔军校毕业的战将胡宗南、董钊、刘戡、霍揆彰、蒋伏生等，率领大军虎视眈眈已对陕北实行包围。

11日晚，蒋介石在行辕中召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将领会餐，并商讨“进剿”红军之事。张、杨均未到，蒋询之，知张、杨将晚宴中央各大员。蒋见张这两天“形色匆遽，精神恍惚，心中甚异”。蒋虽有某种预感，然终因其骄横过甚，没能料到张、杨会

搞“兵谏”。

11日晚,张、杨在西安新城大楼欢宴中央军高级将领,灯红酒绿、猜拳行令,一切都风平浪静。在酒足饭饱之后,他们一夜酣睡。

12日黎明时分,临潼华清池,万籁俱寂。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展开了联合行动:张负责前往临潼扣蒋,杨负责在城内扣押蒋的军政大员。

张任命105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分内外两线:外线在华清池四周警戒,防止蒋的卫队武装突围;内线则是张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乃张的心腹,向来参与机要,完全信得过。只是觉得孙缺乏实战经验,又加派了骑6师师长白凤翔和该师18团团长刘桂五。白、刘皆出身绿林,枪法极好,百发百中。其虽非嫡系,但白、刘抗日心切,所以选中了他俩参与此次绝密行动。内线由105师2旅旅长唐君尧指挥。

一切布置停当,张学良、杨虎城在金家巷5号“张公馆”内客厅静候“佳音”。张学良记得,当他成为军人的那一天,父亲张作霖便对他说:“你要做军人吗?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在下达扣蒋命令之际,张就有这种“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感觉。这晚,张、杨通宵达旦未曾合眼。

为了以防万一,便于行动。这晚,全城电灯熄灭。张学良想起应将这一消息告诉秘书刘鼎,刘鼎乃中共党员。为了想将这一重大新闻密电发至陕北红都保安,又派人连夜上街去买电池。12日凌晨零点,密电由报务员彭绍昆发出。

是晚,东北军的士兵皆不知行动的真相,长官们只好对士兵们诈称:“副司令被扣在华清池,赶快前去营救!要活捉蒋介石。”

在事先已摸清了蒋介石卫队兵力:院内约30人左右。院

外,禹王庙附近,有宪兵 70 人左右。卫队 1 营营长王玉瓚负责解决禹王庙的宪兵。卫队 2 营营长孙铭九带着连长王协一率 50 人乘大卡车首先出现在华清池大门前。门卫拦车,王协一的卡车仍朝里进。至此门卫开枪了,打破了黑夜的宁静。双方对射,于混战中孙铭九率部冲进大门。由于二道门火力甚猛,孙铭九、王协一便匍匐摸进了五间厅。当他们闯进蒋介石的卧室,大吃一惊:人去房空。环顾四周,见桌上放着蒋的军帽、皮包和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孙用手一摸被窝,还是温暖的,这表明蒋介石刚出走,在床边有一扇窗子开着,说明蒋可能由此越窗而逃。

东北军刘多荃师长命令搜山。孙铭九属下的 8 连班长陈思孝抓住一个蒋的侍卫,后来才知道是蒋的贴身侍卫、侄儿蒋孝镇。孙铭九用手枪对着蒋孝镇的脑袋,逼问蒋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虽不肯讲,但无意朝山上斜乜了一眼。孙铭九向前方搜索,没多久,陈思孝在前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

此时天色微明,蒋介石光着脚,光着头,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裤,颤巍巍地立在朔风之中。事后才知道是蒋孝镇背着他上山的,避于山洞之中。孙铭九请蒋介石下山,蒋说:“我腰痛不能走。”孙铭九便叫士兵架着蒋下了山,然后送上小汽车,径直朝西安城进发,遂将蒋扣押在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与此同时,蒋作宾、陈诚、卫立煌等也先后被扣押在西安招待所。

在战斗中,国民党中常委邵元冲死于流弹,蒋介石的副侍卫长蒋孝先被东北军打死。蒋孝先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是蒋介石的远房侄儿,当过北平宪兵副司令。此外死亡的还有蒋介石的速记秘书肖乃华、宪兵 2 团团团长杨镇业、宪兵 3 团团团长杨国珍等。

日上三竿。蒋介石及其在西安的势力,基本上被一网打尽,只有黄埔一期毕业的“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没有惊动他,因为张学良需要他从中传递信息,并帮助东北军说话。新城大楼里的张学良得知蒋介石已被扣押,如同石头落地,他的那颗心顿时松弛下来,但紧接着疲劳又袭上全身,于是他一下子瘫在沙发上。张学良对杨虎城说:“咱俩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国家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现在得想想下一步该怎么收场。”杨虎城说:“咱们对全中国人民负责,立即发电给保安的中共中央,说明事变情况,邀请中共要人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和捉蒋善后事宜。”

最早得悉西安异常动向的是毛泽东,刘鼎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即将发动兵谏的消息是12日凌晨30分,买回电池发报已是凌晨5点,可说蒋被扣时,毛泽东就知道了。晨6点,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均在窑洞得讯。毛泽东给张学良复电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并派周恩来赴西安,和张、杨共商大计。另外,发电给共产国际,请示办法。位于西安城东北的七贤庄1号,原本是德国牙医博士海伯特牙科医院,如今换成了中国抗日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因为这里原是党的秘密联络站。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杜理卿等九人来西安调停。周、叶、罗皆黄埔军校师生,陈赓后来也赶来了,并在西安与老同学宋希濂见了面。

12月12日凌晨5时,张、杨即联名致电毛泽东,内称: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胡宗南)北进。

是审他、罢他、放他、杀他呢？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里，焦急地等待着西安的消息。

12月17日，红军一枪未发，占领了肤施，从此改称延安。延安从此成了中国的红都。

在扣蒋的当天，张、杨联合通电全国，提出自己的主张。由于12日报纸已无法刊出，改用号外第一号、第二号，阐明张、杨的八项主张：全文抄录如下：

号外第二号

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救国主张：

- (一) 改组现在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共同负责救国；
- (二) 停止一切内战；
- (三) 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 (四)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 (五)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 (六)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 (七)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 (八)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随着号外、通电的发出，古城西安沸腾了。12月12日上午，“捉蒋”成了西安30万市民最激动、最热门的话题。

行文走笔至此，让我们看看南京的动态。

1936年12月12日下午3时50分，何应钦从潼关国民党46师师长樊崧甫转来的电报中得知蒋介石在西安“失踪”。一个半小时后，才收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正式证实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震惊之后，何立即以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的名义,下令断绝南京通往西北的交通和电讯,严禁扩散张、杨对时局的宣言,禁止西北方面的报纸流入南京。南京的军警也处于临战状态。然后,电话通知戴季陶、吴稚晖、熊斌等人来到他家中商讨对策,没有结果。后来又召集中央党部会议。会上何应钦主战,冯玉祥、李烈钧主和。两派从深夜直争论到凌晨3点,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見。由于何应钦操纵了会议,最后初步决议:张学良撤职查办,军队归何应钦调遣。宋美龄在上海得知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后,当时就几乎昏了过去。等她平静下来,便自言自语地说:“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12月13日清晨7时,在宋美龄、孔祥熙和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抵达南京后,才得知中央昨夜已开会,初步决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指挥军队“讨伐”张、杨。宋听后骂道:“何应钦不是东西,全不顾及委员长的安全。”尔后她想起了黄埔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可以向何应钦进言,于是急忙驱车至黄埔军校,找到了张治中,急切地说:“文白,你要设法阻止何应钦蛮干,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委员长的安全。”

12月12日午夜,驻在河南信阳的国民党第10师师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李默庵就接到何应钦的电话,限令于13日晨从信阳乘车在潼关集结待命;国民党83师师长、黄埔一期毕业生刘戡也奉命集结于雒南待命。

14日,何应钦利用中央党部纪念周的机会,鼓动黄埔系的将领们,要像当年蒋介石上永丰舰救孙中山那样,不必等谁的命令,马上进军西安,营救蒋委员长。何应钦等主战派坚决主张以武力拯救蒋介石,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教导总队桂永清、国民党第2师师长郑洞国、36师师长宋希濂等均纷纷请缨“讨逆”。南京要“讨逆”,保安要“审蒋”,双方剑拔弩张。何应钦称张、杨是“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必须“马上讨伐”。

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通过《讨伐张学良叛逆》；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何应钦任讨逆总司令，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并通知各部队立即行动，向潼关集结待命。

这一天，中共中央代表团一行九人抵达西安。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罗瑞卿等进住“张公馆”。

再说宋美龄怕何应钦蛮干，又听说何应钦准备用飞机轰炸西安，因而她指着何应钦，大吵大闹地说：“不许你轰炸西安，你何应钦要下命令轰炸西安，我就和你拼了！”又道：“西安情势不明，委员长生死未卜，你若讨伐，是逼张杨对委员长下手！”宋美龄又召集黄埔系将领，陈说其利害，谓此次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是“在尸体上开宴会”，此举会使内战扩大。由于宋坚决反对武力讨伐，终使何应钦胆怯心虚了，而不得不从长计议。14日，孔祥熙遵从宋美龄之意，在孔公馆召集一次最高级会议。会上，多数人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和平营救无望，再诉诸武力。

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说将派端纳飞往西安。宋美龄何以此时派端纳去周旋？因以端纳为使前去西安是太合适不过的了。

端纳，澳洲人，能讲一口流利华语，曾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又担任过上海《字林西报》记者。端纳作过张作霖的顾问，1933年张学良下野出国考察，端纳作陪。回国后，端纳任蒋介石顾问，张学良对端纳十分尊敬。因此，宋美龄亲自分别给张学良、蒋介石两封书信，嘱端纳同黄仁霖一起飞西安面交。

当日下午，端纳和黄飞抵西安。时黄系被宋派往西安探蒋的。他一见张学良的面，即提出看蒋氏。张表示蒋氏很好，但不同意黄马上去看，缘由是蒋态度很硬，拒不接受张、杨提出的条

件。张希望端纳劝蒋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端纳欣然答应并愿往。于是，端纳与张学良同往新城大楼见蒋介石，端纳把宋美龄信给蒋，蒋急忙展开来看。其信文云：

夫君爱鉴：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只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目下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为国珍重。临言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健康！

妻 宋美龄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蒋介石见了爱妻亲笔，放声大哭，经端纳相劝，蒋始知张对自己并无加害之意，遂同意于14日夜迁往高桂滋师长之公馆。

端纳于15日又晤蒋介石，劝蒋“接受张、杨抗日条件，今后乃世界伟人，若拒绝接受，势必成为渺小之人，国家和个人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

毕竟端纳是西洋人，又当过蒋的顾问，以客观立场讲这番话，蒋介石容易听得进，态度有所转变。

蒋介石致宋美龄的信，近似于“遗嘱”，他总怕时局有变、生死难卜。

12月15日，黄仁霖由西安机场进城晋谒蒋介石，蒋氏当即写一函复宋美龄：

美龄吾妻：余决心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对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

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蒋介石书毕，要黄朗读再三，默记心中，以防张学良扣留此信。黄默记住，回京后亦能口述于宋美龄。

同日，端纳由西安飞抵洛阳，与宋美龄通了电话，着重说明了张、杨的善意和蒋介石的安全。时南京何应钦急欲行动，宋虽加以制止，然终被人讥笑为妇人之见，仅知营救丈夫而已。宋美龄要端纳再返西安，请蒋介石下令给何应钦，制止其军事行动。16日，端纳又飞抵西安，向张、杨言明宋意。

张学良见蒋介石火气很大，又一次来到蒋百里房间，请他出面劝蒋。蒋百里见蒋后，坦诚地劝蒋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万不可同张、杨弄僵；如果弄僵了于己于国都不利。一向蒋介石是很器重蒋百里的，北伐成功后，“削藩”之计就出自这位号称中国三个半军事家之一的口。今天的劝导，他很赞成地点头。之后，蒋介石要蒋百里去一趟南京，蒋百里推荐蒋鼎文最合适。后蒋百里找张学良谈及此事，张也同意让蒋鼎文去南京。临上飞机时，蒋百里才将蒋介石的手谕交给蒋鼎文，内云：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前，万不可冲突，并立即停止轰炸为要。

中正于启

十二月十七日

宋美龄持丈夫手谕见何应钦，何不得不暂停轰炸。宋美龄不放心蒋的安全，要哥哥宋子文前往西安，以朋友的交情，说服

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要宋子文透露何应钦主战“戏中有戏”。原本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写了这四个字，后来被剪掉了。蒋当然知道这“戏中有戏”的含义。在端纳二度见蒋时，他也告知南京何应钦“戏中有戏”的一些情况，并转达在洛阳与宋美龄、宋子文通长途电话的内容。宋美龄的一句话，使蒋介石为之一震：“宁抗日勿死敌手。”宋子文与端纳于20日上午再飞西安，张学良带领宋子文、端纳见蒋介石。宋握手劳问，蒋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时宋将美龄函与蒋介石，内称：“若子文三日不回京，则美龄必来与君共生死。”蒋氏看罢，不禁凄然泪下。21日，宋子文返回南京。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又飞抵西安，随员有端纳、戴笠、蒋鼎文。当宋美龄决心去西安之际，南京有人劝其慎重考虑，不要再自投罗网，但宋美龄救夫心切，仍坚决前往。宋美龄原来不同意戴笠随行，认为他去了反会坏事。宋子文坚持要戴笠去，认为戴笠与张学良私交好。另外，张学良的左右有不少是复兴社特务处的人。宋美龄在经宋子文说服后，才点头同意戴笠随行。

当蒋介石见到宋美龄时，不由大惊失色，道：“你真来啦！同人虎穴了！”戴笠见蒋后，立即跪在蒋氏面前，抱住蒋之脚放声痛哭，臭骂自己失职，致使领袖遇惊，蒋遂以好言相慰。后来，蒋平安回到南京，戴笠这一宝押中了，他谓自己西安之行是“冒死而去，呈祥而归”。戴谓之“呈祥”二字，拟比《三国演义》龙凤呈祥戏，赵子龙保刘备东吴之行，他是赵子龙。特别是宋美龄在《西安半月记》一书中，以蒋介石的口气，夸奖了戴几句，戴更是受宠若惊。只要有人问起这事，戴笠总是大言不惭地把他的西安之行同蒋介石当年登永丰舰护卫蒙难孙中山之事相比。

当宋氏兄妹来西安之际，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来电：认为张学良发动的事变，只能破坏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团

结和在客观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并公开指责张、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之举是适应日本的要求的。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转来的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态度的电文后，十分为难地向张学良表示了苏联不会援助西安的意向。张学良听罢，极为愤慨，甚至他激动不已，大有被人出卖之感。

此时，杨虎城命 42 师冯钦哉部抢占潼关。冯部于中途倒戈，派副师长赴潼关与中央军 46 师师长樊崧甫密会，声明反张拥护中央。张学良部黄永安旅长也相继倒戈，万福麟按兵不动，阎锡山两面三刀，新疆盛世才反复无常，苏联的指责和英、美、法的谩骂，日本的造谣，加上何应钦的封锁和大军压境，使张学良感到彷徨束手，问策无人。在这样的时局之下，端纳和宋氏兄妹的到来，使张稍觉宽心。

西安、南京处于热门话题的扣蒋事件，当然在保安那孔石窑洞里也必然引起热烈地争辩。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围坐在一起，召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报告，会议气氛与六天前比截然不同。那次会议，议论纷纷，意见分歧，杀蒋派占上风；这次会议，众说一致，作出了明确的“和平解决”的方针，“放蒋”成了众人异口同声之词。这其中的原因，正如张闻天所言：“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露得更充分。”周恩来告诉王炳南：“我们有一星期没睡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毛泽东喜欢从哲学的角度分析问题，他认为西安事变有“两重性”：光明的一面，“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黑暗的一面，因为捉蒋，会使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之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大爆发和延长的危险。

毛泽东以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即胜利的前途和失败的

前途。为了争取胜利的前途，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二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最后毛泽东提出“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的方针。这样，毛泽东对蒋介石，由审、罢、除转到“逼蒋抗日”，转到答应条件可以“放蒋”了。

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方针，在西安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楼会议室，与张、杨初步交换了意见。23日上午，“三位一体”与“二宋”开始秘密谈判。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西北军、周恩来代表中共，这原本是国共对立的，这一回张、杨却坐到中共一边来了。

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蒋本人不便出面。周恩来成了主角，谈判一开始，就由周恩来代表中共及红军提出六项主张：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周恩来后来才参与“斡旋”，然而此时此刻，诚如张学良所言，周恩来地地道道地成了“西安之谋主”。

双方经过两日磋商，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完全接受了中共方面的六项条件。会谈期间，周恩来再三表示“兵谏”中共没有参与，事先毫无所知，只要蒋氏同意抗日，中共竭诚拥护蒋氏为

领袖。

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到高公馆会见蒋介石。当周恩来出现在蒋氏的面前时,蒋氏见到他这位当年在广州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后,面色不由转白,因为他要用8万大洋悬赏捉拿这位“共匪”首领,10年不见了,仇人相见,应该眼红,但眼下作为成了“阶下囚”的蒋,他却自惭形秽。本来他不愿见周,《西安半月记》一书中,蒋一字未提此事。在过去的文献中,一直是说宋氏兄妹陪同周恩来见蒋介石。然而,1990年6月8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有了新的说法。记者问张:“蒋介石与周恩来见面,当时张先生应该在场的,是吗?”张学良答道:“这是个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在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张学良却依然认为“这是个尖锐的问题”。看来其中必有奥妙,据称蒋称病不见周。后来张学良将周带到蒋的床前,蒋才支起身子,请周坐到床头面谈。周很宽容,见面仍称“校长”,这样才使蒋面色有所转暖,室内空气也随之缓和。他们谈了一些有关抗日的事,当时蒋自认为在被张、杨扣后,他十分害怕中共插手,如果中共插手,其必死无疑;而万万没有料到中共会主张放他。蒋氏对周说:“你曾是我的部下,应听我的话。”周恩来说:“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恩来可听先生的话,红军也可听先生的指挥。”周又道:“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蒋先生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蒋氏默然无语,宋美龄插言道:“这次多亏周先生来斡旋,实在感谢得很,以后不剿共了。”蒋介石表示今后要联合红军抗战,并说在他回南京后,邀周去南京直接同他谈联合抗日的具体问题。

24日,蒋鼎文自西安飞抵洛阳,电告何应钦:张学良已向部队下达护送委员长返京的命令。接电后何应钦方才下令中央军

后撤。

25日下午5点15分,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的飞机从西安机场起飞,抵达洛阳机场。几分钟后,何应钦就得知“委员长已安抵洛阳”的消息。蒋介石命令张、杨释放被扣押的所有官员。

26日中午,何应钦与南京军政要员倾巢出动,到南京明故宫机场欢迎蒋介石归来。

张学良躬身送蒋氏,中共代表周恩来均不知晓。待知后周急追至机场,飞机已腾空而去。周仰天叹道:“汉卿此举为窦尔墩摆队送天霸呀,吾来迟一步。”蒋介石食言,张学良被扣,遭到终身监禁,此是后话。正是:蒋介石文过饰非,张学良遗恨终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五次谈判 国共两党再合作 共同御敌 赤白黄埔又携手

书接上回。且说张学良躬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却落得个“自投罗网”的结局。12月27日，张学良驱车抵蒋氏官邸求见，蒋以身体不适拒绝会面，张遂留书一封，云：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故朕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敬叩钧安，学良谨肃。

二十六日

此信乃事先拟就，怕万一见不着，就留下它。然而事情果真使他吃了“闭门羹”。

12月29日，军事法庭由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三人组成，李为审判长，朱、鹿副之。李其军阶为二级上将，与张学良同级；为了主审张氏，夤夜由国府颁令，晋李为一级上将。事后人问李烈钧审判经过，李道：“没有什么，只是我因此升了官而已！”

12月31日开庭审张学良，以张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1937年元月4日,国民政府决议准予特赦,当晚发表特赦令:

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杨虎城革职赴欧考察,6月29日,杨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秘书亢心裁、樊雨农,登“胡佛总统号”轮船赴美。尔后杨虎城回国则被逮捕关押,1949年蒋介石逃台前将杨虎城杀害。

张学良为何遭终身软禁,此“谜”据张学良智囊团中亲信人士、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透露:在“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复电张学良不准抵抗,继续后撤。直至张被舆论界扣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又迫于民愤之压迫,而不得不辞职下野出洋考察为止,张共收到蒋及军委会这样不抵抗的电令、函件共10余份之多。王卓然建议张学良将这些电令原件妥为保存起来。后来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女士将这些函电让张学良在去西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事发后不料这些文件竟救了张学良的性命。蒋不敢杀张,又不敢放张,只好长期幽禁,以免那些函件被公诸于世。张学良、杨虎城被周恩来誉为“千古功臣”,其原因就在于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停止了“剿共”。此是后话不提。

且说自1937年元旦起,形势陡然紧张起来,何应钦下令:中央军分5路朝西安挺进。黄埔一期毕业的宋希濂、胡宗南、董钊、刘戡、李默庵均奉命行动。那时他们均身为师长、军长,指挥的全是嫡系部队。

蒋介石临离开西安前,见周恩来时曾说过:“我回南京之后,你可来南京直接谈判。”这里蒋介石所说的谈判,是指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主张,如何具体落实。

蒋介石希望周恩来赴南京，毛泽东主张周恩来留在西安。毛泽东致电尚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毛泽东对蒋的背信弃义不得不提高警惕。1937年1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博古，称“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毛所说的张君，乃国民党秘使张冲也。张冲是国民党“中统”分子，当年曾在上海炮制《伍豪启事》，离间中共高层领导，混淆视听，说周恩来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公开声明退党。这谣言终被揭露，弄得张冲非常狼狈。

经过幕后的斡旋，杨虎城迫于无奈，与南京政府达成协议：一、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开出潼关至苏皖边境整编；二、杨虎城出国，所部西北军撤至三原整编。

2月8日，中央军进驻西安，顾祝同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这时，周恩来尚在西安，于是，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首次谈判。谈判的双方当事人是周恩来、顾祝同，其幕后决策者，依然是毛泽东和蒋介石。

顾祝同乃“黄埔八大金刚”之一，深得蒋的信任，由黄埔军校中校战术教官逐步提升营、团、师、军长。在西安事变前，任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他是个唯命是从的庸才，后来成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顾祝同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也就对他不断委以重任。

蒋介石在杭州给顾祝同发来密电，内云：

对恩来及共党代表态度，凡实际问题，如经费地区等皆令其仍由杨间接负责处置，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表示，但可多与之说感情话，最好派代表与之接洽。墨兄（顾祝同字墨三）本人不必多与见面，即使第一次允其见面时，亦须用秘密方式，切勿公开，以免其多来

求见也……

蒋怕泄露天机,所以指明“此电立即付丙”。付丙者,亦即烧掉也。

2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从延安给周恩来发来电报:

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12个师,4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正彭副……

电报中:林,林彪;贺,贺龙;刘,刘伯承;徐,徐向前;朱,朱德;彭,彭德怀。

周恩来、博古(秦邦宪)与顾祝同、张冲、贺衷寒秘密谈判,中共代表还有叶剑英。这次谈判,黄埔军校师生就占了多数,可以说是老朋友了。只是由于各事其主,因而双方争论不休。为红军人数问题讨价还价,周恩来几次坐双座战斗机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

193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入延安。三天后,毛泽东来到延安住进窑洞。

顾祝同与周恩来的秘密谈判达成三项协议:一、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二、红军改编为3个师;三、从三月开始国民党给红军军饷接济。

谈判的焦点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人数的确定多少。毛泽东坚持5万人,蒋介石只肯保留1.5万人,最后双方谈为红军保留2.25万人。

蒋介石给顾祝同的电报中说“有关政治问题,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

既然蒋同意周去京另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同意周恩来前

往杭州与蒋谈判。在临行之前,事先拟好了关于谈判的15条意见,让周先见宋美龄,把中共中央的15条意见交给她。

1937年3月下旬,杭州西子湖畔的一座别墅里,两党领袖人物开始了高层的直接谈判。

一个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一个是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当年两人是同事,而今两人对等,各代表一个政党。这一回,蒋介石见到周恩来,显得颇为高兴,一扫三个月前在西安那般的尴尬。周恩来果断、机智、干练地处理西安事变,给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关于这次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的内容,中共中央书记处于4月5日,有过一份近5千字的报告给共产国际书记处,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周恩来向蒋介石重申了中共的立场和诚意,希望国民党实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他郑重指出:中共系站在民族解放、自由民主、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目标上,拥护蒋委员长统一和抗日的,而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诬蔑。具体要求国民党做到如下六点: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必须达到4万人;3个师以上必须设立总部;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红军防地必须增加。

蒋介石表示愿意重新合作,口头允诺周恩来提出的有关红军、苏区的各项意见,并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即使他死,也要不生分裂”。蒋介石要周恩来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来,周恩来说:“必须有一个作为双方行动准则的共同纲领。”蒋介石没有表示异议,希望周恩来赶快草拟一个共同纲领。

4月初,周恩来返回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伯渠、肖劲光在黄土机场迎接。周恩来穿着一身飞行服走下飞机,周恩来的手,才和蒋介石握别,又和毛泽东握会。中共中央费了七天时间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国共合作的消息在延安传开,许多人想不通,有人说:“我们斗来斗去,斗得红帽子换成了国民党帽子!”还有谣传说,毛泽东当甘肃省政府主席,让毛泽东出洋考察,等等。当时确实引起了一些思想混乱。4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大会上讲演,论述了“换帽子”问题。他说:

“有些同志以为我们的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三民主义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这个思想在过去是很对的,因为那时三民主义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换上了新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变为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受南京国民政府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

“过去因为国民党背叛革命,所以共产党不得不负起革命的责任。现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精神,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大家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

5月23日,周恩来携共同纲领到洛阳会见了蒋介石,随行的还有林伯渠。蒋介石说:“这里谈话不方便,国民党不久将在庐山召集一次全国各界人士的救国谈话会,我们也到庐山去谈判吧!”周表示同意。

在那些日子里,延安的大门也打开了。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团长涂思宗的率领下,来到延安,中共中央派了叶剑英、陈赓陪同考察。在该团中,有许多成员毕业于黄埔军校,当然师生、同学见而,谈话要亲切得多。再说,叶剑英是老师,陈赓是黄埔

一期老大哥，他们也不能不刮目相看。

6月上旬，周恩来从上海抵庐山，在“美庐”与蒋介石会面。周拿出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共52条，向“老校长”交底，蒋介石就像庐山的云雾一样变化莫测，他竟然说“这一回不讨论纲领”。蒋一句话，把毛泽东煞费苦心主持起草的52条扔进了废纸篓。蒋却要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6月18日，周恩来返延安，中共中央又起草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刚有了个眉目，蒋介石于6月26日又给周恩来发来电报，邀他再上庐山，于是，周带着新的文件和博古、林伯渠一道于7月4日到达西安，7日抵达上海。

这一天，1937年7月7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天，所谓“八年抗战”就是从这一天算起的。

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由于遭到当地驻军的拒绝，因此日军即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我29军37师吉星文团率部奋起抵抗，史称“七七事变”，亦称“芦沟桥事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

如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就在这一天，国共双方又开始再一次谈判，双方为红军改编问题讨价还价。蒋坚持要在3个师中设政训处，除由国民党派政训处主任外，还要派3个师的参谋长；周恩来在红军统帅、机构、名称上作了让步，但坚持“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的原则，拒绝蒋派人参与红军军事指挥。这样，谈判又陷入僵局。

7月20日，署名“洛、毛”的电报，从延安发给在庐山上的周恩来：

周转林：

(甲) 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

(乙) 我们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丙) 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此处的林，指林伯渠。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随即下山，飞往上海。周等在上海会晤了宋庆龄，向她通报了国共谈判的情况。就在周下山的这一天，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召集全国军政要员到南京研究抗日对策。

7月27日，周恩来等飞抵西安。

蒋介石这人脾气古怪，毛泽东派周恩来上庐山诚心诚意地谈合作，他却要摆“校长”的架子，当毛电令周拂袖而去时，蒋又忽地电邀毛泽东本人前来南京。毛泽东捉摸不透蒋的用意，当然，作为中共领袖，非到关键时刻，是不会去南京跟蒋见面的。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就收到蒋介石托张冲发来的紧急电报，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周恩来于8月2日给张冲发了电报，告知毛泽东的意见：如开国防会议，则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8月4日，张冲复电周恩来，说此次赴宁开国防会议。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往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

借开国防会议之机，国共又开始了南京谈判。就在双方谈判的时候，一桩新的突发事件，使国共谈判的进程，一下子加快了步伐。

8月13日，日本借口虹桥机场中国军队击毙日官兵两人，发动30万大军在统帅永野修身及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指挥下，大举向上海攻击，熊熊战火已快烧到首府南京，蒋介石

再也无法“委曲求全”了，终于他痛下抗战决心。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坚决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抗日战争从此全面展开。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大敌当前之际，兄弟携手，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10项条件。当天，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22日，这一任命正式发表，意味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昭示天下。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由康泽、博古在南京最后完成的。博古带去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双方反复磋商，康泽与博古作为国共双方的代表，在宣言上签了字。

9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孔祥熙寓所，与康泽、张冲、博古、叶剑英作了谈话，同意发表宣言。23日，由陈布雷捉刀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24日，宋庆龄在香港发表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1937年10月，中共在赣、闽、粤、湘、鄂、豫、浙、皖8省的游击队分别集中，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原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伯渠任主席。

顺便提一句，在8月22日洛川会议举行的时候，江青途经西安前往延安。在洛川经过。她是山东诸城人，艺名蓝苹，原名李云鹤，此人后来竟成了毛泽东的夫人。

周恩来论及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说：“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周恩来无疑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具体设计和操作者，但在参与这项工作的国共双方代表中，有许多人均与黄埔有着渊源。中共方面除周恩来以外，叶剑英也参与其间。国民党方面，先后出场的黄埔人物有陈立夫、邓文仪、顾祝同、贺衷寒、康泽等。在黄埔师生之间所生发出来的那种恩恩怨怨，真让人感到欲语还休，尽管相互之间都有一份往昔的师生情谊，但在原则问题上，却谁也不会念及私情的。黄埔军校培育了两党精英，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所学校。

国共再次合作后，周恩来、叶剑英、陈赓、林彪、左权、许光达、罗瑞卿一大批黄埔军校师生，他们又重新戴上了青天白日帽徽，不过，他们属于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大敌当前之际，终于握手言和。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算起，到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国共之间整整打了10年内战。从此，蒋介石称毛泽东为先生，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毛泽东这时论及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民国十七年国共分裂的时候，原是违反着共产党的志愿的。共产党一向不愿意和国民党分裂。过去十年来国共双方及全国人民都经历了艰苦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增强今后的团结。”毛泽东把国共第二次合作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若形象一点说，要“山雀满天飞”，就是趁国共合作之际，把中共党员如山雀一样撒出去，满天飞，飞向全中国。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根据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赤黄埔系师生任职名单如下：

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

原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

委委员。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徐向前任中央军委委员、129 师副师长。

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林彪任中央军委委员、115 师师长。

原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聂荣臻任 115 师副师长。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周士第任 120 师参谋长。

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张宗逊任 120 师 358 旅副旅长。

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张平化任 120 师 358 旅政训处主任。

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宋时轮任 120 师 358 旅 716 团团长。

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陈伯钧任 120 师 359 旅旅长。

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倪志亮任 129 师参谋长。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陈赓任 129 师 386 旅旅长。

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莫文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王世英任八路军驻第 2 战区联络处主任。

原黄埔军校学生队队长陈奇涵任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后任中央军委总参 4 局局长。

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程子华任八路军 3 纵队政委。

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李运昌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八路军 13 支队司令员。

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唐天际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后任晋冀豫军区 2 支队队长。

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罗瑞卿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后任八路军 5 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郭化若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 1 局局长。

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王铮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 3 局局长。

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曾希圣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 2 局局长。

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

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中共武汉分校党委书记陈毅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后任代理军长。

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五期肄业生陶铸任新四军豫鄂游击支队代政委，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谭希林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吴溉之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军法处处长。

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许光达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

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郭天民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及第二军分区司令部司令员。

黄埔军校六期肄业生周文在任新四军苏中军区 3 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李逸民任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政治部主任、陕北公学副校长。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阎揆要任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杨至成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

以上 33 人职务均在师级干部以上。1941 年 10 月 4 日，延安黄埔军校同学会正式成立，徐向前、许光达、宋时轮、郭化若、李逸民等百余人到会。朱德和叶剑英等莅临讲话。该会选出徐向前、肖克、林彪、左权、陈赓、罗瑞卿、陈宏谟、郭化若、陶铸、许

光达、陈伯钧、宋时轮、吕文远、曾希圣、吴奚如等 15 人为理事，候补理事 5 人。这对推动革命，促进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根据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协商，国共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分工，说得明明白白：“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根据分工的规定，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辟敌后战场，聂荣臻、程子华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周士第、张宗逊、宋时轮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徐向前、陈赓、倪志亮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项英、陈毅、袁国平在大江南北打游击；罗瑞卿、许光达、杨至成、郭天民、郭化若、陈奇涵、陶铸先后在敌后战场驰骋；“七·七事变”前赵尚志、崔庸健（朝鲜人，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在校名叫崔石泉）、赵一曼（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生）等坚持战斗在东北密林深处，对打击日寇、牵制日军南下起了重要战略作用。

再说一说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黄埔军校学生已崭露头角。1937 年统计仅黄埔一期学生，就已战将如云：

俞济时 国民党 74 军中将军长。
李延年 国民党 2 军中将军长。
王敬久 国民党 71 军中将军长。
孙元良 国民党 72 军中将军长。
宋希濂 国民党 78 军中将军长。
黄 维 国民党 18 军中将军长。
陈明仁 国民党 80 师少将师长。
关麟征 国民党 52 军中将军长。
桂永清 国民党 28 军中将军长。
范汉杰 国民党 27 军中将军长。
杜聿明 国民党新 5 军中将军长。

- 董 钊 国民党 16 军中将军长。
刘 戡 国民党 93 军中将军长。
夏楚中 国民党 79 军中将军长。
贺衷寒 国民党军委政治部中将厅长。
胡宗南 国民党 1 战区上将司令长官。
李默庵 国民党 14 军中将军长。
侯镜如 国民党 92 军少将师长。
李仙洲 国民党 92 军中将军长。
邓文仪 国民党 3 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
鄞 悌 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少将司令。
霍揆彰 国民党 54 军中将军长。
张 镇 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少将副司令。
张耀明 国民党 52 军少将副军长。
曾扩情 国民党 8 战区中将政治部主任。
郑洞国 国民党 8 军中将军长。

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的邱清泉、廖昂、覃异之、郑介民，三期毕业的王耀武、戴安澜、康泽、毛人凤、熊绶春，四期毕业的曹天戈、方靖、胡璉、李弥、张灵甫、林伟俦、彭士量、滕杰、谢晋元、吴起舞、周伟龙，五期毕业的郭汝瑰、廖运周、邱行湘、郑庭笈，六期毕业的戴笠、廖耀湘、孙明瑾、唐纵等，也开始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旅、师长以上职务，他们的军衔都在少将以上。这些黄埔军校的骄子，蒋介石的“天子门生”，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担负着正面战场上的正规战，他们有先进的装备、凶悍的战斗力和骄人的战功。在“黄埔八大金刚”的军麾之下，先后经历了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昆仑关会战、滇缅之战、湘西雪峰山会战；后在八路军、新四军的配合下，迅速地扭转败局，发起了战略反攻，终于取得了 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日战争的伟

大胜利。

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使黄埔同学得以携手共挽狂澜。贵州省黄埔同学黄继潮有五言律诗一首,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七七起狼烟,日寇侵中原。
铁蹄践踏下,同胞受熬煎。
奸掳与烧杀,其惨绝人寰。
吾辈奔战场,与敌相周旋。
国共双携手,合力挽狂澜。
八年浴血战,白骨遍中原。
军民齐奋斗,捷报频繁传。
倭寇请投降,收复旧河山。
抗日血泪史,中华永流传。

正是:联合抗日发宣言,黄埔健儿整戎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淞沪抗战 张治中请缨杀敌 寸土必争 谢晋元死守四行

话说蒋介石抗日,有过一段曲折的过程。先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早已蓄谋吞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此时蒋介石忙于反共打内战,对日本侵略则采取了“绝对不得抵抗”的妥协观望政策,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向后撤退,集结山海关待命,张学良哀痛至极,几不欲生。日军在几个月内,占领了东北全境,三千多万同胞从此陷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又向上海进攻。国民党第 19 路军在全国人民反日运动的影响下,违反蒋介石的意志,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这年 2 月初,国府迁都洛阳,蒋介石由洛阳回南京,到达浦口。时任南京黄埔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往迎。在寒暄后,张治中说:“现在看,形势不大好。”蒋问:“你的看法呢?”张说:“19 路军孤军抗日,难以持久,外间传说纷纷,说政府有意坐视,甚至说借敌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我认为,应该迅速增援,事不宜迟!”蒋沉吟了一会儿说:“是的,你的看法有理,但是谁去担当此责?”张答:“如无别的人选,我愿担此重任。”蒋表示同意了。回到南京,蒋下令把散在京沪、京杭一带的精锐嫡系中央军 87 师、88 师、36 师、黄埔军校教导总队、独立炮兵团等,编成第 5 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兼 87 师师长,黄埔军校一期毕

业的俞济时为 88 师师长、黄埔一期的李延年为 88 师副师长、黄埔一期的王敬久为 87 师副师长,另外,黄埔一期的宋希濂任 87 师 261 旅旅长、黄埔一期的伍诚仁为 87 师参谋长兼独立旅旅长、黄埔一期的宣铁吾为 88 师参谋长。连、营、团、旅长几乎清一色都是黄埔出身。在张治中的率领下,他们迅速投入了战斗。这是黄埔军校师生共同抗日的开始。淞沪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使日军受到沉重的打击。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对蒋介石的消极抵抗采取了激将法,效法诸葛孔明激司马懿之法将一件女儿裳转至黄埔军人手中,并附小诗一首,令人血脉贲张。诗曰: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凝还手书“国破山河在,光荣血永留!”及“以血和泪换取我民族生存!”两幅大字并把它制成荣誉旗赠给 88 师、87 师全体御敌抗日黄埔诸同学以作纪念。正当黄埔师生浴血奋战之际,蒋介石却在 3 月 3 日下令 19 路军和第 5 军从上海全线撤退。5 月 5 日,南京政府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议”,使“一·二八”淞沪抗战至此结束。

上海滩战火甫熄,长城关口狼烟又起。从 1932 年 1 月发生的榆关之战开始,到 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止,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时任 17 军 25 师师长的关麟征,和黄埔一期同学、25 师副师长杜聿明在长城古北口迎战日寇。1933 年 3 月 11 日,关麟征被炸伤 5 处,浑身是血,但仍坚持指挥。黄埔三期毕业的 17 军 25 师 149 团团长王润波于 3 月 12 日在古北口与日军激战时不幸牺牲。长城之战,黄埔一期毕业的 17 军 2 师师长黄杰仰攻南天门左侧的八道楼子,反复肉搏 10 余次,争夺至为惨烈。

1933年黄埔军校师生为支援抗战捐款8万元购买了一架飞机，命名为“黄埔号”，飞上蓝天对日作战。“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长城之战，黄埔同学平时操练的拼刺刀肉搏战，这时也派上了用场。黄埔七期毕业生王政的一番话就很有代表性：

国难日亟，非热血无以救亡，虽物质远逊敌人，负此大好头颅，终能抵抗也。

易水悲风，哀军必勇，将士用命，居然以羸陋之器在长城南天门一线阻挡了日寇整整八天。

长城抗战最终也失败了，这是继“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黄埔嫡系的第2次亮相。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蒋介石电令29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日寇向平津增调兵力，7月28日，向两市大举进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牺牲，132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中以身殉国。30日，平津失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

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协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毛泽东也曾评价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军队“抗战是比较努力的”。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蒋介石竭尽了全力，黄埔精锐悉数登场，来了个集体大亮相。

淞沪抗战,自1937年8月13日晨,日军以日租界和黄浦江上的军舰为基地,向闸北一带进行炮击,我军奋起还击开始,至11月12日我军西撤结束,历时三个多月。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先后投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14个半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动用军舰近40艘,飞机400多架,战车400辆,并狂妄地宣称在一个月内在占领上海。我国政府划京沪杭及浙江全省为第三战区,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地部队和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以及部分省市保安团队,总计兵力约70个师,相当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其中黄埔军校师生陈诚、顾祝同、张治中、宋希濂、黄维、霍揆彰、李延年、孙元良、俞济时、桂永清、王敬久、王耀武、廖耀湘、李树森、谢晋元、李仙洲等几乎都各自率领一支部队与顽敌拼搏。他们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前仆后继,奋力抗争,伤亡日军4万多人,迫使其从国内及华北、青岛、台湾抽调兵力,四次增援。在此情况下我军终于守上海达三个月之久,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吞并中国的迷梦。这是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张治中原在青岛养病,芦沟桥的炮声动摇了他养病的打算。他拒绝医生再三的劝告,第二天便急急赶回南京,接受了蒋介石委任他为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他深知万一战争打响,他作为处在第一线的京沪警备司令官,义不容辞地要处于重要地位。张治中一到任,就抓紧战备,尽力为输入兵力和通信设备等方面做好准备。张治中在回忆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日的情景时说:根据最近敌情判断,形成了一个基本概念:这次淞沪抗战,一定要先发制人。当时他对时任36师师长、黄埔一期毕业的宋希濂说:“中国对付日寇,我分析,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九·一八’东北之役,敌人打我,我不还手;第二个时期,‘一·二八’战役和长城战役,敌人打我,我才还手。这两个时期我们

都吃了大亏。东北之役,丢了东三省,日本军阀炮制了一个伪满洲国;‘一·二八’战役,订了个《中日上海停战协定》;长城战役以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形成华北特别区。这两次我们都吃了大亏,教训惨痛,实应记取。”

就在张治中加紧备战的同时,驻沪日军不断地向我挑衅。为此张治中两次向南京统帅部请示,要求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但都被蒋介石拒绝之。而日军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开始制造进攻上海的借口。8月9日下午5时,日本海军军曹大山勇夫率士兵1人,武装驾车硬闯中国军队驻守的沪西虹桥机场。当时机场守卫哨兵坚决拒绝,日军大山勇夫竟开枪打死哨兵。在忍无可忍之时,我军奋起反击,将两名日军击毙。8月13日,日本即以此为借口,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战争一开始,我军采取进攻态势,猛烈攻击日军在沪据点,压迫敌军滞于黄浦江左岸狭隘地区,且予以重创。8月下旬,日军大批援军在吴淞口、川沙登陆,我军在宝山、月浦、罗店、浏河等地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其中罗店之战最为激烈。

罗店是通往嘉定的要道,罗店一失,嘉定不保,侧翼敌包围之势既成,上海必陷无疑,所以罗店是敌我必争之地。敌以陆海空诸兵种协同作战,疯狂进攻。我军士气旺盛,英勇冲杀,敌我各自不断地增援,互相包围,层层包围,短兵相接,近战肉搏。我军前仆后继、英勇奋战的精神,使敌人心惊胆寒,不敢冒进。这是一场主力对主力、精锐对精锐的决战,日军第11师团对中国军队中的王牌18军。18军是陈诚的血本,黄埔一期毕业的彭善任18军11师师长、彭善同窗李树森任18军67师师长;后起之秀、黄埔五期毕业的郭汝瑰任18军14师参谋长兼42旅代理旅长。郭汝瑰这年才29岁,是最年轻的少将之一。42旅8000名官兵,打得只剩下2000余人,而且其中许多还是伤员和炊事员,全旅36挺重机枪打

得只剩下4挺。42旅84团团长周煜南再也顶不住了，他带着哭声向郭汝瑰请求撤退；郭汝瑰用锐利的目光盯了他一眼，然后一声不吭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递给周煜南。这是郭汝瑰写给师长、黄埔一期毕业生霍揆彰的一份遗嘱：

我8千健儿已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身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草。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支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各一支，手表一只，留给妻子方学兰以作纪念。

看完血书，周团长返身又冲上了前线。经过7天7夜苦战，郭汝瑰才奉命将阵地交给第4军接防。

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蔡炳炎，安徽合肥人，时任18军67师201旅少将旅长，1937年8月26日，在罗店与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终年36岁。蔡炳炎于8月22日上午给妻子赵志学留下了他的最后一封绝笔信。他在信中说：“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保，家焉能存！”当晚他就率领部队开赴罗店前线。蔡炳炎牺牲后，他的妻子赵志学于9月间冒着炮火赶到淞沪前线，将他的遗体运回到安徽合肥老家安葬。国民党于1947年5月10日明令褒奖，并追赠其为陆军中将。解放后，安徽省人民政府追认蔡炳炎为革命烈士，安葬于合肥烈士陵园。

敌军在罗店受阻，侧翼包围终未得逞，但其仍企图将长江沿岸阵地连成一片，构成坚固阵地，依靠炮、空优势，向前进攻。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18军98师292旅538团第3营中校营长姚子青，身材矮小，皮肤微黑，是个地地道道的广东仔。8月24日，他奉命率3营的500名将士进驻上海宝山城，与日寇争夺宝山，死守

7天7夜,最后全营500将士无一生还。姚子青临牺牲前,叫来报务员发出最后一份电报:“职营官兵抱与敌偕亡之决心,一息尚存,奋斗到底。”292旅副旅长龚传文见这份电报后,姚子青全营已全部牺牲,连报务员也在内。宝山之战,在18军战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而又极为光彩的一页。姚子青在8月12日从汉口开赴上海前夕,曾给爱妻留下了遗嘱:

此去倘能生还,固属万幸,如有不测,亦勿悲戚,但好好抚养儿女,孝奉翁姑。

英雄有泪不轻弹,姚子青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在国与家两者不可兼得之际,他从容选择了毁家纾难、拯救祖国的道路。国民政府称宝山之战为“民族人格之表现”,并曾一度将宝山县改名为子青县。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称赞姚子青等烈士是国人“崇高伟大的模范”。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广东平远县城镇中学更名为“梅青中学”,以纪念黄梅兴、姚子青两位烈士。

黄梅兴也是广东平远县人,1904年生,黄埔军校一期毕业,88师264旅少将旅长,1937年8月14日,在上海八字桥与日军作战中牺牲,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的丘之纪,曾任过张治中的随从副官,“八·一三”淞沪抗战时任税警总团2支队第5团上校团长,11月2日在刘家宅战斗中壮烈牺牲。

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的吴继光,安徽盱眙人(现属江苏省),时任58师174旅少将旅长。1937年8月参加淞沪抗战,在罗口保卫战中,与敌激战两个多月,11月5日在白鹤港以身殉国,时年34岁。

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杨杰,河北容城人,时任第1军1师1旅少将副旅长。在淞沪会战中,率部守卫西卫塘,11月11日在

蕴藻浜以南与日军激战中,以身殉国,时年 42 岁。

淞沪抗战,旨在吸引日寇主力南下,不让日寇从华北沿平汉铁路长驱直入武汉,以持久战粉碎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这个目的虽然达到了,但我军也伤亡近 30 万人,其中死亡 10 万人,牺牲之巨,战斗之壮烈,鲜有前例。

“八·一三”淞沪抗战,其最辉煌的一页,当数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勇守四行之举。

谢晋元,字中民,1905 年 4 月 26 日生于广东省蕉岭县同福乡尖坑村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预科学习。在广州革命形势影响下,他决心弃文从武,大学未毕业,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先入步兵科,后转政治科。1930 年他与凌维城在汉口结婚,生有二男二女。1936 年他将妻子送回老家广东。离家时,他对妻子说:“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遗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之素志也,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并说:“我不是好儿子,好丈夫,但为国家存亡,奉养年老父母,抚育年幼子女负担,要由你承担。此场战争将非常激烈,我们会有很大牺牲,也会有局部失利,但我国一定能胜利。当最后胜利到来时,我将亲自迎接你们母子返沪。”

谢晋元的希望没有实现,1934 年 9 月,从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后,被调到国民党第 5 军 88 师 262 旅 524 团任团附。淞沪抗战爆发,谢晋元和团长韩宪元一起由无锡开往上海,坚守闸北火车站,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固守四行仓库,全团伤亡极重。四行仓库系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堆栈,后为 88 师司令部所在地,储有很多的弹药和粮食。这座钢筋水泥的六层大楼,墙厚楼高,易守难攻,它位于苏州河畔,其西面和北面已被

日寇占领,东面是公共租界,南临苏州河,河对岸也是公共租界。四行仓库在谢晋元坚守两个多月后,实际上已成为一座“孤岛”。8月27日,团长韩宪元率两个营的兵力,在途中被俘牺牲。该团由副团长谢晋元升充,继续坚守四行仓库。由于营长杨瑞符受伤,全团指挥实际上由谢晋元及4位连长负责。全团号称“八百壮士”,真实人数只有官兵420人左右。谢晋元要求官兵抱必死决心,与仓库共存亡,并下令抢修防御工事。

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防线,闸北、江湾守军奉命撤退。524团担任断后掩护任务,当时谢晋元已越过日军警戒线,没有接到这个命令。谢晋元率仅有的1营于晚12时据守四行仓库。在察看了地形之后,他命令官兵用仓库储存的物资和麻袋把底层门窗全部堵死,二层以上窗口堵塞一半,以防敌枪弹,并便于射击杀敌。同时切断电源,利于隐蔽,防敌纵火。在楼顶架设机枪。仓库的东南角,有一座商店楼,官兵们从仓库里挖洞与之相连。小楼内外也构筑了工事,只在楼上留一窗口——这个窗口是四行仓库对外联络的惟一出口。谢晋元决心在四行仓库死守待援,并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亲自指挥,以防万一。待一切布置就绪,天已微明。一位外国记者向小楼窗口递进一纸团,问有多少军队,谢晋元回答有800人。据幸存者回忆:当时仅420人左右,说800人,一是壮声势,二是不让敌人摸清底细。另外,由于谢晋元崇尚宋代名将岳飞率800子弟兵,大破金兵,故遂以800壮士自诩。后来,即以“八百壮士”称颂谢晋元和他的战友。在苦守四行仓库时,谢晋元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篇:

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27日晨,日寇包围四行仓库,他们虽有坦克,但大楼坚固,

坦克冲不垮；虽有飞机大炮，但却不敢轰炸，怕流弹飞到租界，引起国际争端。因此，日寇只能使用轻武器，但气焰十分嚣张。下午2时，日寇叫喊着冲向四行仓库，谢晋元待敌接近时才下令开火，所以日寇数次进攻均未得逞。后来，日寇用坦克掩护步兵冲向仓库，企图爆破，放火烧毁。在这紧急关头，敢死队员陈树生在自己的身上捆绑手榴弹，从六楼窗口纵身而下，跃入敌群，拉下导火索，与10余名日寇同归于尽。谢晋元要全体官兵每人写一份遗嘱，以示与阵地共存亡。谢晋元在遗嘱中写道：

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决不片刻偷生
之计。

30日，屡遭失败的日寇恼羞成怒，不断以3寸口径平射炮向仓库猛攻，并向仓库发射燃烧弹，使其四周成为一片火海，还丧心病狂地发射毒瓦斯弹，并扬言：“将不顾一切后果，采取极端手段，对付中国守军。”

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日寇不分昼夜出动大炮、战车进行波浪式地攻击。

八百壮士均抱必死之决心，三天后，88师师长、黄埔一期毕业生孙元良收到了谢晋元于重围中发出的信件：

元良师长钧鉴：

窃职以牺牲之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完全达成任务前，决不轻率息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工事经三日夜加强，业经达到预定程度。任敌来攻，定不得逞。二十七日敌军再次来攻，结果，据瞭望哨兵报告，毙敌在80人以上。昨（二十八）晨六时许，职亲手阻击，毙敌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掌欢呼。现

职决心待任务完成,作壮烈牺牲!一切祈释钧念。

职谢晋元上

二十九日午前十时于四行仓库

这是黄埔革命精神的最好诠释。

租界里的英军目睹谢晋元率孤军困守四行仓库,恐危及租界安全,从27日凌晨开始就曾多次派人劝谢晋元,表示只要中国军队肯解除武装,他们愿意让“八百壮士”退入租界,并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谢晋元坚决表示:“我们的魂,可以离开我们的身,枪不能离开我们的手。没有命令,死也不退。”30日下午5时,英国驻军又派人告诉谢晋元,愿意帮助守军退入租界,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谢晋元再次表示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在那生死攸关的日子里,上海人民看见青天白日国旗在四行仓库六层楼顶随风飘扬,人人均感到自豪,同时使日寇望之而丧胆。日寇用炮火打掉了上空的国旗,立即激怒了全上海各界人士。28日晚,一名年仅14岁的女童子军杨惠敏,受群众委托,冒着生命危险,游过苏州河,穿过枪林弹雨的封锁,将一面长达4米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送到谢晋元手中。第二天凌晨,中国的国旗又飘扬在四行仓库屋顶上。此时的闸北,已遍挂“膏药旗”。这一面国旗,给观战的群众带来希望,他们欢声雷动;在租界的外籍人士纷纷拍照,也深为动容。在苏州河南岸,人民群众日夜观看战斗的进展情况,谢晋元的英雄事迹,鼓舞着成千上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时这孤岛上的-面国旗,不啻是对日寇一个最大的讽刺。这位送旗的少女是民族之魂,后来国民政府将她当作抗日女英雄来培养。抗战发生后,她帮助政府组织人员向大后方撤退,其中就有当时上海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谁知杨惠敏吃力不讨好,在撤退途中,胡蝶随身细软悉数丢失,迁怒于她。胡蝶到重庆后,被戴笠看中,戴笠向胡蝶大献殷勤,立即设罪名将杨惠

敏无故关押数年，硬逼杨惠敏承认参与了盗窃胡蝶财产的罪名。由于杨坚持自身清白无辜，才被戴笠以无罪开释；但杨惠敏的身心却受到巨大打击。对这一段经历，杨惠敏终生难忘，多年后还著书撰文，指责胡蝶，希望她凭良心说句公道话。

闲话少说。且说谢晋元在四行的坚守仅四天，击毙敌人200余人，而所部仅死10人，伤27人。谢晋元于31日接到撤退命令，只得遵命。88师师长孙元良的命令说：

“我等困守闸北四行仓库凡四日夜，击退敌人六次进攻。弹药的消耗不及十分之一，至于给养，虽坚守三年亦无绝粮之虞。”

谢晋元于31日凌晨放弃四行仓库，率部渡过苏州河，进入公共租界。

对这段史实，蒋介石在1937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为自己辩解说：

为主帅者，爱惜所部与牺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谢晋元死守闸北一隅，任务与目的已达，故令其为荣誉之撤退，不必再作无谓之牺牲矣。

蒋介石给孙元良手令：“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他这一纸命令，真的将谢晋元及“八百壮士”送入了绝境。公共租界怯于日军的反对，将他们羁留长达4年又1个月零27天。租界驻军违背诺言，收缴了守军的武器，并把他们软禁在“孤军营”中。该部屡遭侵扰，工部局的白俄士兵枪杀我众多将士。此种身处逆境的长期奋斗，实较之前线官兵在火线浴血奋战更为艰难。谢晋元等在租界内不能引渡回来，他只好怀着满腔抗日爱国之志，带领官兵在孤军营里坚持出操上课，并举行精神升旗典礼，三年如一日。日伪多方威逼利诱谢晋元，均未得逞。随着上海形势的恶化，谢晋元立下遗嘱寄给在广东的父亲，遗嘱写道：

敌人劫夺男之企图，据最近消息势在必得。敌曾向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未果。但野心仍不死。且有“不惜任何代价，必将谢团长劫到虹口敌军根据地，只要谢团长答应合作，任何位置均可给予”云云。……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

1941年4月24日晨，上操时，郝鼎诚等4名被敌人收买的“孤军营”内的叛兵，借故迟到。当谢晋元把他们叫到一边询问时，这4人突然拿起铁镐和其他凶器，猛击谢晋元，谢当即倒地，因伤势过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年36岁。官兵们当即抓住了4名凶手，送工部局收监。谢晋元遇害身亡的噩耗传开，上海及全国万民悲愤填膺，尤其是上海人民更为悲愤，纷纷前往孤军营吊唁，据统计，吊唁者达30万之众。

国民政府下令追赠谢晋元为陆军少将。蒋介石也感到内疚，于1941年4月28日发出通电：

谢晋元同志之成仁，为我中华民国军人垂一极悲壮之史迹，回溯该团长率领八百孤军，坚守闸北，誓死尽职，守护我国旗与最后阵地而绝不撤退，其忠勇无畏之精神，已获举世之称颂。而其留孤军营中，为时三载以上；历受艰难，尚能坚毅不移，始终一致，保持我国民革命军人独立自强之人格。……谢团长不幸殒命，然其精神实永留人间不朽。谢团长不仅表现我军人坚贞壮烈之气概，亦为我民族不屈不挠正气之代表。除已优予抚恤外，甚望我全体官兵视为模范，共同景仰。以期无负先烈之英灵，而发扬我民族正气之光辉也。

谢晋元牺牲后,大众激动地齐声唱道: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奋守东战场。四面八方都是炮火,四面八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空中飘扬、飘扬!

这首歌曲,响彻云霄,鼓舞着千百万抗日将士上前线奋勇杀敌。

谢晋元部官兵,苦熬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悉数被俘,日军用枪押往各地充作苦役。在战争结束后,平安返还者不过百余人。著名剧作家田汉、陈白尘创作舞台剧《八百壮士》公演;音乐家夏之秋创作《八百壮士》歌,广为流传。据称,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所有参加四行仓库守卫战的官佐、士兵一律晋升一级,以示嘉许。

抗战胜利后,为了永远纪念谢晋元的英雄事迹,上海四行仓库附近的一条马路改为晋元路。

谢晋元也名列抗日四大名团之一,其余三个是夺战芦沟桥的吉星文团、猛打猛冲的罗芳珪团、夜袭阳明堡奏捷的陈锡联团。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黄埔同学郑平有诗一首,曰:

八百壮士英雄团,四行鏖战史无前,铮铮铁骨英雄胆,不屈不挠谢晋元。

淞沪战役,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同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西撤为止,历时三个月。这次战役,国民党官兵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他们在寸土必争,肉搏拼杀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

神,真是撼天地,泣鬼神!

淞沪会战挫败了日军中央突破、速战速胜的战略意图,粉碎了他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它是我国从局部抗战转向全面抗战的历史转折点。这次战役,日军伤亡6万多人,死亡两万多人,被我击毁、击伤飞机200多架,舰船20余艘。中国军队的牺牲精神和战斗能力,赢得了各国军事观察家的高度评价。但是,由于我军以落后的武器死守被日军优势火力控制的战线,加上指挥失当,因而其伤亡亦十分重大,约有10万多将士献出了宝贵生命。淞沪会战,可谓一寸山河一寸血!

李宗仁事后评论说:“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是我国抗战8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我军参战的约50余师,战斗兵员总数在70万左右。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情的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令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陈诚后来在《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一文中总结道:

1、政略影响战略:战略原是达到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保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

2、政治影响军事:军事与政治原是不可分离的东

西。但是,这次在作战前以及作战期中,我政治上的缺点实在太多……。敌军由狮子林方面登陆之后,附近各县我方负责者,事先不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事后不知动员抵抗,这也是我们作战中极大的缺点。

3、一般准备不足:芦沟桥事件以后,接着沪战爆发,当时兄弟(陈自称)由庐山奉命赴沪,沿途所见,极少动员、紧张的气象,如通信、交通、运输、军用器材及民众组织等等,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及至战事发动以后,仓皇应付,通信、交通、运输各项阻滞迭生……。

4、初期攻势不能成功的原因:当沪战爆发以后,我军以5师之众,对数千人的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功,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譬如,不能彻底集中兵力,形成重点,及步炮没有协同作战,都是比较明显的事实。等到迫近汇山码头,因为不待主力到达,以致兵力薄弱,不能扩张战果。倘使当时依照原定的计划,待98师到达后,使用于重点方面,那末,一定可以获得期望的战果。

5、退却时机与行动失当:我军作战的整个方针既为持久战,那末,于持久的目的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就应该顾虑自己军队的实力,以免遭受无谓的损失,保存决战时的充分力量。但是此次淞沪作战,当敌主力已被我诱至该方面,同时,我军亦损失极大,增援已穷,已至反攻无效的关头,就应该转移阵地,再图歼灭,这种勉力支持,待部队溃乱战线动摇时,才实行被迫撤退,因此,不能为整齐而有计划的退却,是很失策……

沪战失败原因,陈诚分析较全面。正是:蒋介石总算开始抗日,张治中交点学费算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威镇敌胆 林彪大战平型关 腹背受敌 京城军民陷魔掌

话说 1937 年 9 月下旬,正当中国军队在黄浦江畔和日寇拼死作战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沿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线长驱直入,企图围歼华北中国军队。国民党军的各条防线不断地被突破。日军以第 3 路西进是主攻方向,又分为左右两翼:右翼以一个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占领大同后,准备出山阳进犯雁门关;左翼师团集结怀来、宣化,分两路西进,一路经蔚县、广灵前进,一路经怀安、阳原向涞源进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大同之敌会师雁门关。这两路日军总的目标是,由晋北打开通路,攻占山西省会太原,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的军队后撤,达到不战而吞并华北五省的目的。

日军左翼由第 5 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率领,企图夺取平型关,突破内长城防线。板垣征四郎,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称为日军的“三大中国通”。在平型关与林彪、聂荣臻交手时,他们已在中国呆了 20 年。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林彪为八路军 115 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全师 14000 余人,于 1937 年 8 月 25 日奉命从陕西的三原县桥底镇出发,分两个梯队,经富平、蒲城、合阳到达韩城的芝川镇渡过黄河,向平型关东南的上寨、下关地区集结待机。

林彪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教官。聂荣臻当年是林彪的老师。他俩都参加过南昌起义开辟井冈山苏区、两万五千里长征。1932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恢复红军1军团建制时,林彪任1军团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这是林、聂合作的开始。林比聂小8岁,他俩一起搭档了4年,这4年是红军生死存亡关键的几年。林、聂合作,打了许多硬仗,如漳州战役、水口战役、东安宣黄战役和浒湾战役、突破乌江天险战役、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两人配合默契,师生携手,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林彪在红军里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对于他的出名,聂荣臻是有一份功劳的。

八路军115师东征抗日,平型关是抗日第一仗,当时林彪想打一个漂亮仗,以显示八路军的实力。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是日本陆军少壮派的中坚,他也想在军事上露几手。他在出发前向天皇宣誓:“无论陷人何种困难,也必须完成山西作战。只有攻克太原,才是完成本师团的使命。如不如期复命,愿切腹向天皇谢罪。”一心想速战速决的板垣,拿下平型关似乎他是志在必得,指日可待的。

林彪和板垣这两个对手,终于在平型关碰上了。两个人都是“常胜将军”,两个人都是志在必得,然而鹿死谁手,很快就要见分晓了。

9月22日,日军第5师团一部,进占平型关以北东跑池地区。八路军115师决心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利用公路两侧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伏击日军。

25日晨,日军第5师团21旅团一部分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开进。7时许,全部进入115师设伏地区,日军毫无戒备,115师立即发起攻击,打了它一个措手不及。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短兵肉搏。

首先从山上冲下汽车路的是 685 团 5 连连长曾贤生，他在隐蔽地就命令全连战士上好刺刀。在上刺刀时，他鼓动战士们说：“我们要用手榴弹和刺刀消灭敌人，不让跑掉一个，即使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消灭。”

随着 5 连下山，其他各营战士也纷纷从掩体中跃出，冲向敌阵。一时杀声四起，火光冲天，烟雾迷漫，爆炸声、刀枪撞击声，搅成一团。

115 师 686 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率部下山控制了公路，在北侧甬道中的敌人已全部陷入我军的南北夹击之中。这时林彪用最简练的语言下达命令：“把敌人分成几段，吃掉！”

被困在甬道中的敌人，在两侧火力夹击下，即刻被分割成数段，其在中国军队的团团包围中，拼死抵抗。彼此白刃相交，刀枪相撞，打得敌人昏头转向。

这时天空出现了敌人的飞机，沿着 10 里长沟，来回盘旋，但并不敢扔炸弹，只得悻悻而去。

战斗打至下午 3 时，终将围困在夹沟中的敌人全部消灭。

杨得志当时是 685 团的副团长，他回忆这场战斗的情景时写道：

鏖战整整一天，把什么情况都忘记了。现在，只有到了取得胜利的现在，大家才感到干渴得厉害，嗓子全都嘶哑了。我站在山坡上，用力吸了一口空气，顿时觉得嗓子轻松了一些。在我站立的山坡下面，有几个腰挎洋刀的鬼子军官仰面朝天躺着，一面写着“武运长久”字样的膏药旗带着讽刺意味地扔在一边。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同蒲路各个车站上欢送我们的人民群众，当然也想起了看不起我们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兵痞。这对信任我们的人民群众是安慰，是鼓舞，而对少数缺乏

民族自信的顽固分子,又是一个多么有力的驳斥啊!

八路军 115 师此次作战,歼灭日军 1000 余人,击毁汽车 100 余辆,大车 200 余辆,缴获战马 50 多匹、步枪 1000 余支、机关枪 20 余挺、火炮 1 门、掷弹筒 20 余个,以及大量军用物资。

115 师独立团杨成武团长在乎型关战斗中负责驿马岭战场的打援任务,阻击敌人增援。686 团正面突击在切割被围敌人时,先期占领东跑池的日军一部,向老爷庙以东被围之敌增援,被我 685 团挡住了出路。当日军板垣师团长得知其 21 旅团一部陷入重围时,急令在蔚县的 21 旅团 42 联队主力火速前往增援,并令已进至涞源以西的第 9 旅团的一个联队先期到达平型关,以解 21 旅团之围。当日军 9 旅团援兵进至灵丘以东的交通要道驿马岭、腰站时,遭到在该地制高点已恭候多时的 115 师杨成武独立团的迎头痛击。当时日军疯狂地向独立团阵地发起轮番进攻,但结果又是在山坡上撂下几百具尸体而未能攻取。115 师的骑兵营利用能跑的优势,在离平型关有一段距离的涞源以南的走马驿牵制该地的日军,使敌人不能倾巢出援平型关。

26 日,灵丘 6000 名日军乘汽车向东跑池一带驰援。此时,我军平型关作战计划已经完成,又有日增援重兵压境,继续作战,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见好就收。林彪、聂荣臻果断地下达命令:“留一部分兵力牵制敌人,主力部队迅速撤离阵地!”

部队迅速撤离,日军气势汹汹想找 115 师主力拼命,但四处觅寻,毫无踪影。

这次战斗,八路军 115 师抓住日军骄横狂妄和麻痹大意的弱点,正确地运用伏击战术,发扬勇猛顽强的精神,发挥山地战和近战特长,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 5 师团 21 旅团一部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一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

的声威,也为后来在这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八路军出山后第一仗怎么打?能打得如何?身居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尽管无法像以往那样直接部署和指挥,但他以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极力主张:游击战是对付日本人的不二法门,因此只能打游击战,不打运动战,只能打小仗,不能打大仗,更要避免在战争初期阶段进行大决战。林彪不愧为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三骁将”之一,他学过军事理论,有实战经验。他认为在这种“被动的姿势”下打仗显然很不习惯。这位年轻气盛的“常胜将军”曾在出师前的洛川会议上,主张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毛泽东与之深谈,他表面上接受了游击战的战略思想,但仍然有所保留。平型关一仗,他打赢了,毛泽东心里很高兴。从此,一提起林彪,人们就先想起他和平型关的关系,林彪也因此而大出风头。这年林彪才29岁。

平型关大捷后的第二天,即1937年9月26日,八路军参谋处叶剑英、左权按照毛泽东、朱德的意旨,向南京蒋介石发出了捷报:

南京: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

捷报。9月25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奋勇无比。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之辛庄、关沙、东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夺取。敌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并缴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正在清查中。现残敌退至小娄村,被四面包围。

八路军参谋处

9月26日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9月28日,武汉行营来电祝贺,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也发电祝捷。蒋介石看到平型关大捷的详细报道后,颇有感触,嗣后,他又发来了嘉奖电文:

朱总司令玉阶兄:电悉,接诵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

中正

平型关一战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回声,一直回荡在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浴血奋斗中。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结束后,日军继续西犯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彻底摧毁我军的战斗实力,迫使国民党以最屈辱的条件讲和,早日解决“支那战争问题”。守卫南京的国民党军队,面对强敌,展开了一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民族自卫战,史称南京保卫战。

11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第8号敕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同日又下达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令,由日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10军组成,松井石根为方面军司令官。日军总兵力约10万人左右,另外还配备坦克车、飞机、军舰参战。

11月8日,日军分三路直逼南京,形势严峻,南京是保是撤,必须迅速作出决策。11月17日至18日两天内,蒋介石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紧急研究守卫南京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刘斐、王俊、谷正伦等人。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刘斐认为日军占领上海后,依仗其优势

装备及海、空军协同作战，进逼南京；我军处于被敌立体包围之下，加之淞沪会战我军长途退却，战斗力大损，守南京弊大于利，与强敌对阵，不应以一城一地之得失争胜负，而要保存实力，从战略上考虑，同日寇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集中优势兵力，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来争取时间。南京乃我国首都，不做任何抵抗而放弃，当然不可，但顶多只用两个师 18 个团的兵力做象征性的防守，适当抵抗后即主动撤退。

白崇禧同意刘斐的意见，何应钦、徐永昌则模棱两可。蒋介石也说刘斐的看法很对，只是国府所在地，守是应该守一下的。第二天开会时，唐生智独持异议，他说：“首都是国父孙中山陵寝所在地，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会后，蒋介石召陈诚来南京，征询南京如何守法。陈说：“是否叫我守？”蒋说：“不！”陈说：“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蒋问李宗仁：“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李宗仁也主张南京不宜死守，他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之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将我军撤至长江以西，一面可以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以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蒋介石在 18 日晚开会，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这时蒋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当时无一人作声，最后唐生智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听罢唐言，大喜过望，接着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对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11 月 20 日，宣布迁都四川重庆，表示要长期抗战。国民党

中央机关、南京黄埔军校纷纷迁往武汉，蒋介石、汪精卫仍留南京。为避免敌机轰炸，蒋搬到中山陵山下树林荫蔽的“四方城”一幢极小的两间房子里，他吃饭、会客、办公、睡觉都在这里。他明知南京不会死守，又为何不早点离开这危险之地呢？原来他们在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谈判。陶德曼作为中日双方的秘密联络使者，希望中国早日与日本停战言和。日本开出的停战条件是十分苛求的，如承认伪满、内蒙独立、上海国际共管、扩大“淞沪协定”，设非武装区域，根绝反日运动……蒋只接受“恢复战前状态”，即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况。11月28日，陶德曼又衔日寇使命要求再次和蒋会面，条件更加苛刻。蒋介石表示：“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这时他开始明白了：“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

12月4日晚，蒋介石召集守卫南京的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开会，作临别讲话。12月5日，蒋偕夫人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武汉。

再说唐生智于11月20日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任命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策划南京保卫战，确定其战斗序列为：

78军宋希濂的36师（宋兼师长）、71军王敬久的87师（师长沈发藻）、72军孙元良的88师（孙兼师长）、第2军团徐源泉（41师师长丁治磐、48师师长徐继武）、黄埔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103师师长何知重、112师师长霍守义、江宁要塞司令邵百昌、宪兵部队两个团、其余炮兵、通讯兵部队等单位；另外，还有从上海撤退下来的74军51师王耀武部、58师冯圣法部、83军邓龙光部、66军叶肇部等均参加保卫南京的战役。这次中国军队投入总兵力共10万余人。

11月30日，广德失守，日军逆向南京右侧背迂回，形成对

南京东南至西南的包围。12月1日,江阴要塞失守。4日,日寇完成了对南京东面的包围。这样,南京的第一道防线,即江宁、牛首山、淳化、汤山、龙潭之线已暴露在敌人面前。

在南京第一线阵地开战后,日军不断地增加兵力向我猛扑,数以万计的炮弹、炸弹袭我阵地;我军将士殊死抵抗,给敌人以重创。

本来,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国民党于1935年、1936年,动用了4个师和3个工兵团近5万人,构筑了常熟、苏州、嘉兴之吴福防线和江阴、无锡、嘉善之锡澄防线。这两条国防线均用钢筋水泥构筑,纵横交错,坚固耐用,虽不如法国马奇诺防线之规模,但阻止敌人前进是完全有把握的。这些国防工事既没有留守部队和响导人员,也没有工事位置的地形图。王耀武、冯圣法师从上海退却时,原打算进入这两道国防线抵抗日军,但工事的铁门紧锁,找不到开门的钥匙,以致无法利用,这样就加速了敌人的追击。有这样坚固的防线却不能使用,可见当时部队从上海撤退时是多么混乱。在南京的防守还没有来得及布置之际,日军就已分三路长驱直入南京外围了。

30日,21军145师师长饶国华率部死守南京外围的界牌一线,所属左翼佟毅旅一部不支,纷纷向翼侧溃退,右翼军心亦随之动摇。当时孟浩然旅也随同撤退,饶师长立即喊道:“浩然,此刻是本师存亡之关头,决不能再退,应拼命抵抗,我即到祠山岗,令佟毅旅扼守,以待救援,万万不可仓皇溃退,导致全军覆没。”孟旅长当即指挥手下的两位团长拼命地扼守,但无奈于敌势凶猛,有如泰山压顶冲来,未几便被压迫到大道南面一带地区。敌主力乃直循通广方向攻击前进。奉命退守祠山岗要隘之戴传薪团,其部署尚未就绪,敌步兵、炮兵在飞机掩护下,就如潮水般分路铺天盖地涌来,于是戴团长即率该团向侧面山地转移。饶国

华师长赶到,见此情景,连声嗟叹,他立即乘卫士的自行车回广德城附近的后方师部,写下了致家属和唐式遵总司令、以及刘湘司令长官的诀别信。他带着一个卫兵连向飞机场走去,命士兵向飞机场各仓库内的汽油桶发射,各库陆续起火焚毁。然后回到广德城东门外,嘱卫士铺好卧毯,饶国华师长盘脚坐于卧毯中间,面对日军方向大呼:“德国国王威廉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将来亦必灭亡!”言罢,饶向敌人方向怒目而视,拔出所佩手枪自戕成仁。左右见之,无不落泪。

国民党王牌军之一的74军,刚从上海撤退回南京,这个军上自军长、下至排长,几乎清一色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军长俞济时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所辖51师师长王耀武是黄埔三期毕业生,58师师长由俞济时兼,副师长冯圣法是黄埔一期毕业生,51师153旅305团团团长张灵甫是黄埔四期毕业生,51师153旅旅长李天霞是黄埔三期毕业生,51师151旅旅长周志道是黄埔四期毕业生,151旅306团团团长邱维达是黄埔四期毕业生。至于团、营、连、排长,由黄埔学生充当者不计其数。

74军奉命保卫南京,王耀武的51师占领淳化镇、方山;俞济时的58师占领牛首山,74军军部设在通济门外的一个村庄里。

日军于12月5日开始向淳化镇、湖熟镇、方山等地发起了猛烈地进攻。日军114师团以10门重炮、10多架飞机对51师阵地进行狂轰滥炸,2000多名日军在坦克掩护下反复冲锋。与此同时,驻守牛首山的58师也与日军第6师团展开了激战。

74军用步枪、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和刺刀等简陋的步兵武器,同拥有飞机、重炮、坦克的日军展开了顽强地拼杀。日军以两个师团4万余人的优势兵力,连攻三天,仍不能突破74军的主阵地。

日军第 114 师团的师团长末松茂治中将和第 6 师团的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对 74 军这块“硬骨头”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没料到向来被他们蔑视的“支那军”居然有这么顽强,有这么难打。

12 月 8 日,51 师伤亡已达 900 余人,一个一个的碉堡、一座一座的工事、一栋一栋的房屋,被日军平射炮相继炸飞,官兵伤亡严重。305 团团团长张灵甫身先士卒,奋勇作战,一发 37 毫米平射炮弹在他身边炸开,弹片炸穿了他的左臂,钻进了他的肋骨,他一头栽倒在地,口里仍不停地喊着:“打呀!打他狗日的!”卫士们将他扶起,包扎好伤口,劝他渡江就医,张灵甫坚决不肯,他说:“昔日项王兵败势蹙,犹不愿渡乌江,我怎能忍辱偷生,渡江求医?当与敌决生死以践誓言。”他带伤奋战,坚持不下火线。张灵甫其人其事,颇多传奇,在解放战争时他已升任整编 74 师中将师长,在山东孟良崮被解放军击毙,此是后话不提。

打到 12 月 8 日晚,74 军再也支撑不住了。在请示唐生智后,全军撤至南京城内,在水西门依托城墙构筑纵深工事固守。51 师守备,58 师作预备队。王耀武深知形势严峻。他迅速召集周志道、李天霞、邱维达、程智等几个团长开会,部署防守水西门的事项。在会议结束前,王耀武紧锁双眉,用他那特有的浓重的山东泰安口音,神情严肃地对大家说:“诸位同学,俺们师目前伤亡已超过三分之一,部队战士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水西门之战,必定凶多吉少。俺们要像当年吴国的伍子胥一样,不惜血洒京城,头悬国门,以死报国!俺相信俺们 51 师绝没有孬种!”

周志道、李天霞、程智、邱维达、张灵甫等几位旅长、团长,都是一群血气方刚的黄埔青年将校,听师长这么一说,个个热血沸腾,纷纷表态:“跟鬼子拼了,死了也值得!”

12 月 12 日早晨 7 时,天刚蒙蒙亮,日军向南京城发起总攻。中华门、中山门、雨花台、水西门、光华门到处都响起了激烈的枪

炮声和喊杀声,并且四处起火,浓烟弥漫。当时逃难的男女老少,惊恐中四处乱窜,不少衣物箱包丢在大街小巷,无人问津。在战斗中,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 302 团团团长程智被一颗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当即毙命。306 团团团长邱维达见日军突击队用绳梯爬墙,就命令 3 营营长胡豪挑选 100 名精壮战士组成敢死队,限一小时内肃清爬上城墙的日军。胡豪亲自带领敢死队员勇敢地向突破口冲杀过去,在一阵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之后,敢死队终于全歼了爬上城墙的日军士兵。然而,英雄的 3 营营长胡豪和少校团附刘历滋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74 军军长俞济时有“先见之明”。在南京下达撤退命令之后,他们下关码头早已准备好的船只,将 5000 名官兵陆续运送到长江北岸。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南京全城,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 万中国军民惨遭杀害,以致美丽繁华的六朝古都,顿时成了一座血城,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在南京保卫战中,黄埔军校毕业的将领光荣殉难的有:

高致嵩,广西岑溪人,1899 年生,黄埔军校三期毕业,72 军 88 师 264 旅少将旅长,1937 年 12 月 12 日,在雨花台阵地壮烈牺牲,时年 38 岁,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朱赤,江西修水人,1900 年生,黄埔军校三期毕业,72 军 88 师 262 旅少将旅长,1937 年 12 月 12 日,在雨花台与日军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 37 岁,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姚中英,广东平远人,1898 年生,黄埔军校二期毕业,83 军 156 师少将参谋长,1937 年 12 月 12 日,在指挥部队撤退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 39 岁。

易安华,江西宜春人,1900 年生,黄埔军校三期毕业,87 师 259 旅少将旅长,1937 年 12 月 12 日,在坚守雨花台右翼阵地的激战中,易的头、臂、腰部多处负伤,仍浴血奋战直到壮烈牺牲。

黄埔一期毕业的桂永清，率领黄埔军校教导总队参加南京保卫战。该总队第2旅中校参谋主任、黄埔六期毕业的廖耀湘，装扮成难民于南京失守前逃离虎口。1938年1月，他根据南京保卫战的经验教训，向蒋介石呈上一份他亲自撰写的《国民政府今后建军应有之改进》，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破格擢升为陆军少将，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陆军第200师参谋主任，该师为国民党第一支装甲兵部队，师长为黄埔一期毕业的杜聿明。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黄埔同学王耀武、张灵甫、周振强、桂永清、李天霞、周志道等，在解放战争中他们大名鼎鼎，传奇故事层出不穷。至于杜聿明、廖耀湘，更是林彪、陈赓这些赤黄埔的死对头，好戏连台，那是后话。

1937年12月13日，历史上应当永远记住这一天。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紧接着，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长达一个半月的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史称“南京大屠杀”。

日本侵华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在率领谷寿夫等4个师团向南京进犯时就狂叫：“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好发挥它的神威。”日军一进入南京城，就分窜到各地区开始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屠杀中国军民，焚烧房屋建筑，掠夺民家财产，强奸中国妇女。他们扬言要“扫荡俘虏”，“给南京以沉重地打击”。日军所到之处，其凶残野蛮之程度，令人发指，无以复加。他们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据战后远东国际法庭最慎重、最保守的估计，日军在占领南京的六周之内，烧死及投入长江灭迹者约19万人，总计整个屠杀在30万人以上。例如，日军侵入南京时，在燕子矶江边有万余难民等待渡江，被日军用机枪扫射，被集体枪杀，无一幸免。12月15日，我军已放下武器的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押送汉中门外用重机枪密集扫射，均饮弹殒命，其负伤未

死者与尸体一同遭焚化。12月16日,逃到华侨招待所的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下关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而死,然后弃尸江中,使之葬身鱼腹。12月18日夜,日军将囚于幕府山几个村庄的无辜百姓和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官兵57000余人,用铅丝捆扎,排成四路纵队,驱赶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然后对未死者用刺刀戳死,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尸,其残余遗骸悉投长江。12月间,在挹江门外宝塔、鱼雷营一带,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30000人以上,被集体枪杀。此外,零星被屠杀者也在15万人以上。日军将中国人当活靶子来劈刺,还有两名少尉军官以杀人比赛取乐,最多的一名竟一次杀死我居民167人。日报纸刊登照片,炫耀其“辉煌业绩”。这些丧心病狂的所谓武士道军人,竟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苍天有眼,血债要用血来还。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杀之要犯、最先侵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长谷寿夫,被枪决于南京雨花台。

1947年12月28日,是侵华日军在草鞋峡集体屠杀南京军民5万多人10周年的忌日。曾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并且被日本报纸誉为“勇士”的野山岩、向井敏明以及手持军刀斩杀了300名中国平民的田中军吉均被判死刑。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被判为甲级战犯,于1948年11月12日处以绞刑。正是:恶盈满贯自有报,血债要用血来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黄陵祭祖 张国焘叛党求荣 巾幗英雄 赵一曼慷慨就义

说话“西安事变”的发生，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局面，首先由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周恩来在武汉打开。在南京失守后，大批文化名流西迁武汉，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进展极其顺利。正当长江局组织武汉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战运动时，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中共巨头逃叛事件。

1938年清明节，中共右倾机会主义者张国焘，利用祭黄帝之陵的机会，从延安到黄陵，在国民党特务的安排下来到西安，又迅即转至武汉。周恩来在清明节后的一天，忽然接到中共中央电报，他看完电报，两道浓眉蹙紧成一条线，坐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办公室里，好半天没有说话。电文中说：张国焘私自从延安经西安逃到武汉，要周恩来千方百计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周恩来整理了一下文件，然后找来他的助手童小鹏、邱南章，且严肃地说：“张国焘从延安逃跑出来到了武汉，你们赶快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去等候，如找到他，说我请他来办事处住。如果他不肯来，你们就派人紧紧跟着他，听候党中央对他的处理。”

张国焘其人其事，本书以前陆续提到过他。张国焘，江西萍乡人，是我党“一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央委员，原红军高级将领。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他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政治教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他推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蒋介石在广州黄埔军校制造“中山舰事件”时，他代表中共中央前往黄埔会见蒋介石，采取妥协忍让态度，当时就引起周恩来的不满，周表示忍让只会断送国共合作的大好前途。1927年南昌起义时，张国焘赶往南昌力劝停止暴动，周恩来对此气得拍了桌子。1931年4月，张国焘被王明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苏区军委主席、分局书记。其间他犯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错误，捕杀了黄埔军校毕业的红军将领许继慎、唐赤英、姜镜堂、曾中生、熊受暄、周维炯等数人。为了抓徐向前的小辫子，他还肃杀了徐的妻子程训宣。张国焘先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又是左倾冒险主义，最后转为退却逃跑。1935年6月中旬，长征途中的红1方面军和红4方面军，经过艰难跋涉后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22日，党中央开会作出红军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张国焘却主张西渡黄河，向川康边境退却，从而走向分裂红军的道路。9月9日，他竟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让他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10月，他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并自任主席，彻底与党分裂。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且批判他的错误，撤销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担任政治局委员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然而张国焘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表面上服从，背后又在捣鬼，最后准备叛党。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达成一项协议，即每年清明节，由国民党政府从西安派代表与陕甘宁边区所派代表一同致祭黄帝陵，这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一个象征。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其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黄埔军校教官出身的“八大金刚”之一的蒋鼎文一起来到黄陵县，向黄帝祭祀。

祭祀后,张国焘没有回延安,他让跟随人员先回去,自己带着警卫员钻进国民党早就准备好的汽车,直驶西安。在西安,他跑到当时号称“西北王”、黄埔一期毕业的胡宗南部,多次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密谈,在胡宗南的安排下,他准备乘火车去武汉。他于4月7日临上火车前,才电话告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林老进行劝阻,他不但不听,反而造谣污蔑,破坏党内团结。林伯渠立即电告党中央和武汉长江局。党中央得知后,马上给周恩来等人发电报,要他们在武汉把张国焘截住。

毛泽东听到张国焘叛逃的消息后,也十分震惊,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而已。消息在延安传开,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却在“演戏”。此事发生后的一天傍晚,延安医院医生朱仲丽(后与王稼祥结婚)正在她姐夫肖劲光家作客时,杨子烈一头闯入,她哭丧着脸对肖劲光说:“你们想也想不到,我也做梦都没有梦过的事情,竟发生在我家里!”杨子烈是湖南人,一口湖南地方腔,与肖劲光是同乡。她继续说:“恺英(国焘字)前天一早去祭黄帝陵,至今还没有回来。我真不知道他干了什么!我已经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意,拼着这条老命去找他,把这个死没良心的人追回延安来。毛主席对他多宽大呀!呜呜……”杨子烈似哭似骂地诉说着。

朱仲丽仔细看她的表情,脸上并没有一滴眼泪,当时室内的几个人都不再说话。其实,张国焘借故逃叛的丑事,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一天之内,这消息就不胫而走,在全体高级干部中传开来了,大家都在愤怒谴责张的叛党行为。

杨子烈见大家对此事冷若冰霜,哭丧着脸说:“你们只管放心,我绝不辜负党的恩情,如果他活着,我就捉活的回;他要是死了,我也要把尸首抬回来,他欺负我够了!”杨自觉没趣,便匆匆地走了。毛泽东考虑了几天,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后,

决定不派人追缉,也不叫西安办事处拘留,只打电报请武汉周恩来劝回。

杨子烈见党中央毫无动静,又没有人去看望她,便等不及了,她向毛泽东表示要与张国焘彻底划清界线,亲自去西安把他找回来。毛泽东经过三思,终于同意让杨子烈去西安。有人不同意。毛泽东说:“让她走好了,还可以带他们的儿子一块走。如果回来,我们照样欢迎,给工作做,就看他们自己的人生观了。”

杨子烈哭哭啼啼打点行装,到西安去千里寻夫去了。

武汉办事处的童小鹏、李克农、邱南章、吴志坚一连三天在火车站等候,终未见到人影。大家非常着急,不免要进行种种猜测,曾当过周恩来的副官的袁超俊老人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听说张国焘偷偷跑到西安,又由西安往武汉跑,我们很气愤;又见童小鹏、李克农他们去火车站接,也没有把他接来,我们又很着急。大概是第二天,我见周副主席紧闭双唇,两道眉峰蹙在一起。他与叶剑英参谋长商量,再抽出几位同志,到胡宗南部队设在武汉的办事处去找,一定要把张国焘找到。”

4月11日,李克农终于在从西安经郑州至武汉的火车最后一节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张见了李克农,吓得魂不附体,脸色都变白了。随同张来的还有国民党两个便衣特务。李克农对张说:“张主席,你好,长江局的领导派我们前来接你。”张见李和颜悦色,不像来抓他,稳了稳神,又摆出那副主席架子。李克农请张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住,张坚持不肯,后来找到一家名叫大华饭店的旅馆住下,邱南章、吴志坚两人跟随张,负责保卫张的安全。

当日夜晚,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李克农等来到大华饭店同张国焘谈话,劝他回头是岸。张揉着太阳穴争辩着说:“人

各有志。合则留，不合则去，我跳出中共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导，张就是不回头。深夜两点了，张被逼得无奈，便起草了一份电文，曰：

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国焘

12日，党中央致电王明、周恩来等，为表示仁至义尽，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代转，电文曰：

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急，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毛泽东 洛甫 康生 陈云 刘少奇

周恩来将中央电报交给张国焘，张仍执迷不悟，并对周的劝说置若罔闻，说什么也不回办事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日本租界大石洋行89号，周趁张上街的当口儿，吩咐警卫员将张的行李搬到办事处去了。张回来后，不见行李，只好到办事处去住。

晚上，张国焘来到楼上周恩来住室，又提出：“蒋介石既然是抗战之领袖，我应该去和他见一次面。”周不同意，说：“以你这样的身份去见不妥，等一等吧！”张坚持说：“不必等，我可视他的态度决定去向。”周答：“你要去，等我与他联系后，由我陪你去。”

16日上午,蒋介石同意见张。一见蒋,张卑躬屈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啊!”蒋说:“于归则好,于归则喜。一个人对一个党派的领导者如在政策上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当然可以挂冠而去,拂袖而去,或飘然而去……你不是任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吗?我欢迎你与我合作。”

周恩来坐在一旁,一言不发,目光冷冷地在蒋、张之间来回地扫着。回到办事处后,周严肃地批评了张的奴颜态度。下午,张借口要外出修牙,李克农派吴志坚紧随其后。张上了轮渡,过江到武昌,吴志坚寸步不离。晚上,张住进太平洋饭店,未回办事处。

周恩来见张已决心投靠国民党,挽回的希望已经渺茫,就决定让他自己活动一天,以观动静,明晚再谈。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起过江来到武昌太平洋饭店,与张谈判,向他提出三条意见,任其选择:第一条,改正错误,回党工作;第二条,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第三条,公开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当即表示不愿回党工作,并胡说国共两党都很糟,中国很少有希望,愿回江西老家做老百姓,家里饭还是有吃的。

周恩来离去后,张国焘马上给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黄埔六期毕业的戴笠打电话,把他约来,且表示公开投靠国民党。接着,他又打电话把胡宗南(黄埔一期毕业)驻汉口办事处处长某某叫来,研究下一步行动。最后,他给周恩来留下一张字条:“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晚上,国民党特务机关派车来到太平洋饭店,两个特务强行按住负责“警卫”的邱南章,由另一人把张国焘送上汽车。

4月18日晨,周恩来把张国焘叛党情况电告党中央。同一天,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公开

宣布。

一天，戴笠晋见蒋介石。蒋问：“张国焘安排得怎么样了？”戴笠答道：“遵照校长吩咐，已将张国焘安排在武昌一座小洋楼里，并委托他的同乡、武昌警察局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蒋问：“他愿意干什么？”戴答：“他想由他出面创办一种定期民办刊物，从思想上理论上揭发共产主义的谬误，唤醒一般青年人的幻觉，迷途知返……惟缺乏资金，须由政府接济。”

“不妥，”蒋介石语调平淡地说，“我们很快就要从武汉撤退，到重庆之后，可让他出面，办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一批人，起到我们的同志起不到的作用。”

戴笠马上应和：“我可以从各训练班挑选最优秀分子送去给他训练，只要他肯卖一点力气，一定可以把共产党搞垮。”蒋介石提醒道：“要人可以给人，要钱可以给钱。但你要记住，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

戴笠道：“这个学生懂。我已给部下提出使用共产党叛徒的八字方针：尊而不敬，用而又防。”蒋介石十分欣赏他这个后起之秀的黄埔学生，觉得把张国焘交给他使用，能做到万无一失。

武汉失守，张国焘随戴笠军统局撤退到重庆。戴笠决定宴请张国焘。赴宴前，戴笠得意地对朋友们介绍说：“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重庆烈日似火，张国焘早早到来，他坐在正席上。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戴笠的同期同窗好友、军统局书记长、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谋唐纵早就听说这位共产党要人，但不过今天却是初次见面。他仔细观察着张国焘，中等个子，稍胖，阔嘴方脸，肌肤白净，眉细而长，眼小而有神，一副斯文模样。张国焘起身和客人一一握手，故意要打破不自然的气氛，说了句笑话：“那边的人都叫我唐僧，你们看像吗？”

唐纵把张国焘说的“唐僧”听成“唐纵”，吓了一跳，继而讥讽地道：“我看你倒像个如来佛。”

张国焘对“投降”、“来归”等词儿十分敏感，脸上显出一副苦涩的笑。他这个北大学生，吃过洋面包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当年在鄂豫皖苏区，对黄埔一期的徐向前、陈赓、蔡申照这些人都指手划脚过，眼下你戴笠、唐纵他哪里看在眼里。可如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也只好屈尊了。唐纵乃国民党军统“三巨头”之一，权大势众，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

张国焘过去为共产党的首领，以为共产分子阴谋策略斗争精神很强，及见面谈话讨论问题时，观其容貌，察其言辞，似亦为一普通之做官人，并不如吾人所想象之斗争家。

戴笠在军统局成立了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想通过张国焘的关系与地位，对中共内部进行策反活动。最初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卖点力，便可以大有收获。于是让张办了两期特工训练班，可只办了两期就停止了。毕业的学生也无法按计划派遣出去，只好改派其他工作。在陕甘宁边区设立的“延安站”、“延安直属组”，人员打不进去，即使打进去的但又回不来，甚至有的自首，根本没有起到作用。黄埔一期毕业的27军军长范汉杰当时驻军太行山，张国焘曾派人持戴笠的信去请范帮忙进入八路军防区活动，结果不但毫无成绩，连人也没有回来。在汉中成立的特别侦察站、在榆林成立的陕北站、策反站，因毫无成绩，慢慢都撤销了。

张国焘由“最受欢迎的贵宾”不到两年又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半年、几个月见不到戴笠一面，即令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地训斥一番。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事，戴

笠对张暴跳如雷地拍桌大骂。在张走出来时，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沈醉进去问戴，“什么事又生气？”戴笠余怒未息：“这家伙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过了一会儿，戴又拍桌骂道：“校长对他的投靠，以为对延安是致命地打击。交我使用，几年来的实践，使我对校长难以交差。”从那以后，张很怕见戴，局里对张的一切优待，也慢慢改变了，过去给张的一辆专用汽车也取消了。戴派往研究室监视张的黄逸公告诉沈醉：“戴老板骂张国焘不肯为军统卖力，实在有点冤枉。他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打不进去。”

1949年，张国焘逃往香港，1968年定居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逝世于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官办免费的老人病院，享年82岁。一个叛徒走完了他“辉煌而又可悲”的传奇一生。

写完了张国焘的一生，让我们再看看巾帼英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六期毕业的革命烈士赵一曼是怎样度过她短暂的一生的。

黄埔军校是否能招女生的问题，早在广州建校之初就有过争论。恽代英为此专门撰文，答复那些要求入军校的女知识青年，尽管列举了各种理由阐明招女学员的困难，但仍引起女青年的强烈不满。在北伐胜利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始招收女生。全国各地励志报国的女青年纷纷前来报名，共招收200名。1926年10月考试，1927年2月入学。她们编了一个大队，国共两党的党员都有。入学的条件要求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18岁至22岁之间，身体健康，思想进步，有志革命者均可报考。在几千名女青年中，择优录取了200名女学生，她们都是巾帼英雄，女中豪杰。比较知名的如赵一曼，她是宁死不屈的抗

日女英雄；胡兰畦，1931年在德国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抗战时任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团长、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胡毓秀，参加过南昌起义，解放后任上海光华中学校长；胡筠，任过红军赣北独立团团团长；黄杰，徐向前元帅的夫人，当过陕甘宁边区妇联组织部部长；张瑞华，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当过中组部处长；曾宪植，当过全国妇联副主席；危拱之，中共“七大”代表；谢冰莹，著名作家；王亦侠，中共中央农工部党委办副主任；陶桓馥，当过国务院知青办主任；彭文，当过上海教育学院副院长；黄静汶，当过卫生部妇幼司副司长。她们都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的学生，许多人参加了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她们是新中国妇女中的佼佼者。

书归正传。且说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参加革命后名一超，在东北从事抗日斗争时化名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她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杨嘴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她8岁入私塾发蒙。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她的大姐夫郑佑之是中共党员，他把当时的新思想带进了白杨嘴这个小山村。他经常向赵一曼讲述革命道理，启发她的觉悟，并买了许多进步书刊给她学习，从此，赵一曼接受了新思想，眼界扩大了，渴望了解更多的革命道理。她想离家进城读书，遭到她兄嫂的反对。赵一曼忍受不了封建家庭中旧礼教的束缚，在郑佑之的帮助下，于是她把自己受压迫的痛苦经历写成一篇文章，题为《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用赵一超的笔名，发表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上。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发表后，得到许多革命青年的声援和支持，当地青年团组织也同她建立了联系。赵一曼在团组织和郑佑之的热情关怀与教导下，思想进步很快，经郑佑之和何珽的介绍，成都地方团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入团

后,在家乡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建立了团的组织和妇女解放同盟会。她的革命活动引起当地封建卫道者的仇视,在兄嫂的阻碍下,自学开展工作都很困难。1926年2月,赵一曼冲破家庭牢笼,来到宜宾女子中学读书。在校期间,她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学生会交际干事。5月,宜宾学联改组,她任学联常委,负责宣传工作。宜宾妇联成立时,她又当选为妇联主席。宜宾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她由团员转成中共党员。这时,北伐军已经打到武汉,革命形势大好。在宜宾,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成立,赵一曼当选为县党部妇女部代理部长,这时,她才21岁。后来,由于她不满兄嫂的包办婚姻,只身来到重庆,在一家医馆当护士。

1927年初,赵一曼在街上认识了一个刚满18岁的青年,此人衣服褴褛,流浪街头,已整整两天没有吃饭,因为盘缠用尽,身无分文。他在一家“老虎灶”前讨口水喝,赵一曼见此人好生面熟,就定睛打量起他来。此人好生纳闷,心想:“这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看我?”小青年饿得两眼金星四溅,站立不稳,竟晕了过去。由于栽倒时手被滚烫的开水灼伤,因而赵一曼领他到医馆敷药,包扎,并代垫了全部医药费。当时赵一曼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答:“姓罗名瑞卿。”他是南充中学高中学生,校长张澜(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文教员周鸣柯都参加了革命党。在他们的教育启发下,罗瑞卿思想觉悟很快提高,曾领头反对当地封建军阀“何大刀”,反对“佃当捐”,并被《新蜀报》记者抢拍了镜头,照片登在头版上。赵一曼因见过这张照片,所以似曾相识。

罗瑞卿街头流浪巧遇热心少女赵一曼,使他俩很快成了朋友。他俩听说武汉黄埔军校招男女新生,为了前途,终于大胆跨进了重庆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经过赵一曼与吴玉章、杨闇公(杨尚昆之兄长)联系,又有周鸣柯的介绍,罗瑞卿、赵一曼双双

拿到了省党部的推荐信和路费,不久,他俩从朝天门码头乘上“希望”号客轮,东下武汉,结果俩人都考上了,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

赵一曼编入女生大队,她在军校的紧张生活中锻炼得更坚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赵一曼参加了军校学生编成的独立师,开赴前线迎击夏斗寅叛军。在平叛后,赵一曼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脱下军装,转移到上海。9月,党组织又派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返国。“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派赵一曼到沈阳从事抗日工作,先后当过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哈尔滨总工会代书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1师2团政委等职。1935年11月15日,赵一曼和团长王惠同带领50名战士在铁北左撇子沟附近被日军包围。时虽经英勇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30多人,但自己也受到很大损失。部队在突围时被打散,团长受伤被俘,赵一曼左手腕也受伤。她和铁北区委宣传部长等5人,潜入小西北沟一间空房子里养伤,后被特务探知。22日,日军包围了他们的住地。在战斗中,赵一曼左大腿骨被打断,昏倒被俘。敌人用牛车将她押往县城。在车进城后,赵一曼抬起头,对街上的群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敌人将她关押在县公署警务科里,对她百般折磨和威逼利诱,要她供出同党和地下机关的地址,她始终不答一句话,坚贞不屈。后来,她被押往哈尔滨,关押在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看守所里。此时,赵一曼的腿部伤口已经溃烂化脓,生命垂危。敌人为了得到重要口供,于12月13日深夜,将赵一曼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监管治疗。由于大夫同情这位坚强的革命女战士,经过精心护理,伤势开始好转,并恢复了一点食欲。日本侵略军川本命令部下:为从赵一曼那里获得黄埔军校五期毕业、时任东北抗联第3军军长赵尚志的部队下落

及其秘密联络信号,派警佐登乐松偕翻译周贤彬来到医院对赵一曼进行审问。登厉声问:“王女士,今天要你答复我的提问,否则你更要吃苦头。”赵一曼经过多次拷打审问,始终不讲真实姓名,只承认姓王,所以敌人还不知道赵一曼的真正身份。登乐松把赵一曼从病床上拖下来,抓住她的头发又打又推,赵一曼一声不吭,只是用仇恨的目光盯住这些汉奸败类。登乐松用铅笔放在赵一曼的指尖上用力压,赵咬住双唇,两眼闪着愤怒的光芒。这位在日本人眼里享有“白马上美女”之称的抗联团政委,经受了严刑拷打,始终不讲一句真话。登乐松只得嚎叫着:“我还要来,顽固不化的女人!”

赵一曼受尽折磨,坚强不屈的精神,感动了警卫黄宪勋及护士韩勇义。黄宪勋将赵一曼的英雄事迹告诉了他的父亲黄广正,他们决定救赵一曼脱离虎口。经过秘密地策划和准备,6月28日夜,他们把赵一曼背出医院后门,坐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向宾县方向逃走。第二天,敌人四处搜捕,6月30日晨,赵一曼终于再次落入魔网。这次将赵关进哈尔滨市警察厅刑事科拘留所,敌人对赵一曼施以苛刑,用铁条刺她腿上的伤口,往她嘴里灌汽油和辣椒水。赵一曼宁死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共产党的任何机密。经过一个月的审讯,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连她的姓名也逼供不招,遂用电刑,用皮鞭抽打。因受到重大的创伤和肉体精神的折磨,赵一曼奄奄一息,几乎失去知觉。

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心情极为平静。她对押送的人说:“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只是希望给她儿子写一封遗书。”押送的人给她纸和笔,赵一曼用颤抖着的手,写道: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斗争,今天

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车到珠河，敌人把赵一曼放到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妄图以此来恐吓抗日的群众。赵一曼挣扎着挺直了身躯，放声高呼革命口号，并激昂地唱起《红旗歌》，以此鼓舞人民。街道两旁，人群沸腾，见着囚车上的“死刑犯”竟是一位既美丽又年轻的女子，人人不禁掩面叹息和流下同情的眼泪。许多群众认识赵一曼，悄声说：“那就是骑一匹白马，在森林里打鬼子的赵政委。”

在珠河小北门外的刑场上，人民的好女儿、黄埔军校优秀女同学、杰出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同志壮烈地牺牲了，时年31岁。

东北人民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民族的巾帼英雄，专门修建了纪念馆。朱德、宋庆龄、董必武、何香凝、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参观后留下了赠言，为赵一曼题过词。如今这里已成为教育下一代更多地了解革命先烈事迹的展览基地。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当代诗人郭沫若也为纪念和歌颂赵一曼题写了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赵一曼的名字，与秋瑾同存，永世闪耀着熠人的光辉。在纪念馆里，留下了赵一曼写的一首题为《誓志》的遗诗：“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有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诗如其人，令人敬佩。

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赵尚志，辽宁省朝阳县喇嘛沟人，17岁加入共产党。他考入黄埔军校后，正赶上蒋介石“清党”便毅然退出学校，按照党的指示回到东北老家打游击。他任过东北

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是赵一曼的上级领导,他们战斗在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中。李兆麟、杨靖宇、周保中领导的抗联总兵力达到5万多人。赵尚志于1940年1月由于中共北满省委常委的错误决定,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但赵忍辱负重,仍率部在东北从事抗日斗争。1942年2月,小分队内打入日本特务,赵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被俘,不久即英勇牺牲,临终时年34岁。1982年,中共黑龙江省委为赵尚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正是:心香一瓣祭一曼,留取荒坟葬女郎;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丧尽天良 蒋鼎文出卖学生 轻信老师 宣侠父尸弃枯井

话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蒋介石曾电令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配合中央嫡系胡宗南的 10 万大军全力“剿共”，企图将红军一举歼灭于陕北地区，根治“匪患”。未想到张学良、杨虎城暗中与周恩来联合，结成统一战线，于 1936 年“双十二”实行兵谏，逼蒋抗日。经过五次会谈，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本来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却对共产党恨之人骨，表面上虽握手言和，但骨子里对共产党还是严加防范，不让共产党渡黄河抗日，怕八路军抢占地盘。

日寇占领南京以后，兵分三路渡过长江，沿津浦路北上，与华北南下的日军夹攻徐州，目的在于打通津浦全线，把南北两个战场联结起来。但土皇帝、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擅离津浦线，放弃山东。1938 年 1 月 7 日，蒋介石亲自到开封召开五战区军事会议，将韩复榘逮捕，24 日晚由军统特务将韩杀害于武昌平阅路 30 号的楼梯上。

蒋介石杀韩复榘的目的是杀鸡吓猴，防止军队将领不战而退。当时，战局前途很不乐观，除林彪、聂荣臻在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李宗仁、关麟征在台儿庄打了个漂亮仗之外，其他战场节节败退，日军西进威逼太原，武汉也受到威胁。蒋正在气头

上,忽然接到军统西北区特务头子张毅夫(张严佛)呈送一份由西安行营主任、黄埔“八大金刚”蒋鼎文签字的密件,状告八路军高级参谋宣侠父的种种活动,其内容如下:

一、宣侠父在西安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以及赵寿山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老共产党杨晓初等,来往勾结,唆唆他们反蒋,反对中央。

二、宣侠父与西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流亡青年到延安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被宣侠父搞成了左倾人物、青年学生聚集的中心,引起西安各学校学生思想混乱,学生不安心求学,学风败坏。

三、宣侠父在西安以黄埔军校同学关系拉拢部队的一些军官,散播共产主义毒素,影响所及,势必引起军官思想动摇,部队叛变。

四、宣侠父在西安‘公开指责中央,诽谤委员长’。说委员长限制出版自由,不准人民说话,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歧视共产党,不补充八路军武器军用品,散布不利于中央和破坏抗战的言论。

五、宣侠父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蒋介石接到这份秘密报告后,气得连声骂宣侠父不是东西。最使他生气的,是宣侠父竟在西安以黄埔同学的身份,想在他的军队中制造兵变,长此以往,不是把他十几年苦心经营的军队搞垮吗?前不久,他亲自批准暗杀了不听话的吉鸿昌,而今蒋介石早已忘记了这位被他开除了学籍的黄埔一期学生。前几天胡宗南俱报有关宣侠父的情况,他认为宣侠父丝毫没有“悔改”表现,

于是当即批示：“秘密制裁”四个字，电告西安的蒋鼎文具体执行。

宣侠父，又名尧火，号剑魂，本来他有与蒋介石搞好关系的有利条件：首先他与蒋是浙江同乡，宣侠父是诸暨长澜乡人；其次，宣曾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读过书，文武兼资；第三，宣是黄埔一期学生中的佼佼者，只要他像胡宗南那样听话，不愁不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但是，宣侠父却有他自己的坚定信仰，在进黄埔军校前，他就在浙江水产学校加入了共产党，进黄埔后，就被推举主持学生会方面的工作，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24年7月，黄埔军校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蒋介石被选为执、监委员，接着，他便以校长和特别党部执委名义，指定党小组长，并命令每周直接向他汇报工作。对于这种做法，宣侠父认为校长的作法违背了民主原则，上书要求改正。蒋看后非常恼火，找宣谈话，宣当仁不让，坚持原则。于是蒋更加恼羞成怒，严责宣并责令他三天内写出悔过书。宣说：“真理不可屈！”蒋无奈，撤销了宣的党小组长职务，限令悔过，否则开除。宣三天后愤然离校，给同学留言曰：

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从此，宣侠父与蒋介石结下了深仇。宣侠父接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北京，并以国民党左派的公开身份，先后在冯玉祥、吉鸿昌部从事政治工作，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中将主任、25路军总参议、41军秘书长、19路军61师参谋长。1934年8月，宣侠父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1935年任中共华南工委书记，1937年初，被周恩来调到西安任八路军高级参谋，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蒋鼎文、胡宗南、杨虎城、张学良之间做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蒋介石曾以高官许愿多次拉拢

宣侠父“归顺”中央,均被严词拒绝,从此招来杀身之祸。

杀害宣侠父的凶手,虽然是军统特务丁敏之、李翰廷,但真正的幕后策划者,竟是宣侠父的浙江诸暨小同乡,他在黄埔军校上学时的老师蒋鼎文。

蒋鼎文于1937年7月被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兼第10战区司令长官。10战区的基本部队是蒋介石得意门生胡宗南的队伍。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在一期同学中,他是第一个当上师长、军长、军团长的人。而且超过了他的许多老师,这与蒋介石的有意扶持是分不开的。胡宗南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太保,是与桂永清惟一掌握军权的黄埔学生。胡宗南又与戴笠关系密切,戴笠当年在胡部当过中尉副官,戴笠的发迹,与胡宗南的推荐很有关系。所以,胡具有通天的本领,只听命于蒋介石。尽管胡对蒋鼎文表面上客客气气,“老师长,老师短”地叫得很勤,但在内心深处却阳奉阴违,经常不买蒋鼎文的账。一次,蒋鼎文对刘峙说:“不要说让胡宗南服从我们,就是我们想服从他,也摸不清他鬼头鬼脑的意图,真伤脑筋。”这位当年在黄埔军校被俄国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夸奖说“此人可重用”的学生队中尉区队长,从1925年至1929年,蒋鼎文由少校营长连升数级,一直升到中将军长。在中原军阀混战时,蒋鼎文率部奔走于陇海、津浦两线及其中间地带,行动迅捷,飘忽不定,被称为“飞将军”,颇受蒋介石的赞赏,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抗战之后,蒋介石要他到西安负责监视延安活动,任命他为西安行营主任。这时,宣侠父也于1937年2月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的电示,从广西南宁李济深处赶来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不久,宣侠父就出现在西安后宰门七贤庄1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周围。此时,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国民党师长、军长如关麟征、宋

希濂、董钊、刘戡等也都在西安，宣侠父常以同学的身份，与他们联系；尤其是蒋鼎文，他更是表现得关系特殊。蒋鼎文深知宣侠父的历史：1934年5月，宣侠父、吉鸿昌、南汉宸在天津组织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其主要任务是联络全国各地抗日反蒋军队，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军统发觉后，将吉鸿昌杀害于天津国民饭店45号房间。同时军统也准备对宣侠父动手，只是宣跑到上海去了，逃脱了死神的光临。如今，宣侠父在西安国民党上层活动，在军统西北站所有的监视对象之中是最重要的对象。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张毅夫亲自整理特务送来有关宣侠父的材料，但由于宣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士，又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总派特务在他后面盯梢，不但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不好，而且还容易被宣侠父发觉。为此，张毅夫大伤脑筋，所以他去找蒋鼎文进一步商量对策。

1937年11月的一天，张毅夫到新城大楼去见蒋鼎文，刚进房门，就瞥见一个高大壮实、有着古铜色脸庞的中年男子，正坐在沙发上与蒋鼎文谈话。张毅夫只好退了出来，在外面等候，不久，那中年男子便告辞出来走了。

蒋鼎文见张毅夫进来，赶紧解释，说来的那位客人就是宣侠父，是中共西安最高负责人。蒋鼎文生怕张毅夫对自己有怀疑，便连忙解释，因为他知道，眼前这位军统西北区区长，虽然其官阶只有少将，却是老头子的耳目，不仅监视共产党的活动，而且也会秘密打自己的小报告。蒋鼎文很看不起军统局的这些特务们，尤其是军统局头子戴笠，他不过才是黄埔六期学生罢了，而且还没有毕业，但却在老头子面前混得比自己还红，对其蒋鼎文异常轻蔑之。可是，他也知道军统局的厉害，这帮特务要是有一个报告送到老头子那里，说几句自己的坏话，那自己这个行营主任就非丢不可。更为使他感到恼火的，是自己与宣侠父既是师生，

又是同乡，共产党正是看到了这层关系，才派宣侠父与他打交道的。

当然，蒋鼎文是不会认这种同乡和师生关系的，他要利用这层关系作为筹码，进而好向蒋介石邀功。于是蒋鼎文故作愤慨地对张毅夫说：“宣侠父这个家伙，想依仗和我同乡这层关系，又扯上当年在黄埔的师生之谊，经常上我这儿来，要求我补给八路军武器弹药、粮饷军服，还要现款，要这要那，纠缠不休。委员长已指示我们，对八路军什么都不能给，但口头上又不能说不给，实在难对付他。我非常讨厌他，头都被他闹昏了。但他却很狡猾，跟你讲话，不吵不闹，就是磨你，还跟你套近乎。气得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他。”

张毅夫知道蒋鼎文利禄熏心，是个官迷，是不会帮助共党分子宣侠父的，便把自己的来意讲了。蒋鼎文说：“对宣侠父这个人，委员长嘱我曾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回到国民党这边来，都被他严词拒绝，既然拉不过来，就只好严密监视他，不让他四处活动；如果一旦发现他有危害党国的不轨行为，那么便把他赶走。”

蒋鼎文又说：“在监视方面，我可以帮你们的忙，宣侠父自从来到西安，就上窜下跳，他总想依仗他那些老关系为他的工作打开局面。他的老关系也不过是同学、校友、同乡而已。我的秘书俞锤、西安行营处长朱品之、机要科长寿家酸等都是诸暨人；我可以指示他们利用同乡关系去监视宣侠父。另外，西安市警察局局长杭毅也当过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区队长，是宣侠父的老师，16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也是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可以动员他们与宣侠父接近，进行观察之。这样，我们就可以弄清楚宣侠父在西安的活动情况。”

张毅夫连连表示感谢，说：“各战区长官要都像蒋主任这样

支持我们的工作，那共产党在中国必定无藏身之地，我要向戴局长汇报你的成绩。”

1938年春，蒋鼎文与当时任军统西安站站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马志超、军统西北区区长张毅夫共同商量加强对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严密监视。为了更有效地执行监视任务，张毅夫在西安新城大楼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即西北区）召集西北区情报股长徐一觉、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等研究监视的具体办法。他们认为八路军办事处前面为一片辽阔的广场，派人监视太费事，不容易隐蔽身份，而办事处后门为另一条马路，更难做到严密监视。经张毅夫、李翰廷到后宰门围绕八路军办事处实地考察后，借口加强警察岗哨，维持治安，决定在后宰门广场正对着八路军办事处的前门200公尺处，由警察局一分局加设一个派出所，并在办事处前后门各加两个固定岗哨，派人长期昼夜进行监视：如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伍云甫、宣侠父等的行踪，进出办事处的人员、车辆、逗留时间等，每日填一张报表。1938年4月，张毅夫接到派出所电话，说从办事处里面抬出步枪十几捆、大木箱十几口，很沉重，像是弹药和电讯器材，正在装车待发。张迅即通知16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黄埔一期生董钊、宪兵团长胡毓英，要他们在西安城门口、咸阳、三原等几个地方的检查哨，对八路军汽车进行检查。关于这个问题，从1938年起，西安特种会报作出决定：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开往延安的汽车，在办事处装车启运之前，由西安行营办公厅四科（即军统西北区）负责监视，凡没有行营护照，或与护照所写数量不符者，一律扣留。按此规定，前后有两次遭到扣车。

蒋鼎文为了彻底清除宣侠父的活动，就找张毅夫商量对策。因为除掉宣侠父这样的共产党人士，事关重大，须请示蒋介石，于是，张毅夫按照蒋鼎文的意思，炮制了一份宣侠父在西安活动

的黑材料,秘密电告委员长侍从室,请示处理办法。

不久,蒋鼎文接到蒋介石“秘密制裁”的电报,非常高兴。而后他找到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徐一觉,让他负责执行制裁宣侠父的任务。这时,军统西北区区长张毅夫已经调到武昌军统局担任代理主任秘书。临行前,他还为此事向徐一觉作过周密地安排。

1938年7月31日的夜晚,西安后宰门七贤庄1号八路军办事处。院内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宣侠父忙碌了一天,身体感动很疲乏,正想上床休息。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他觉得奇怪,这么晚谁还来电话?

宣侠父起身拿起话筒:“喂!你找谁?我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宣侠父。”

话筒里传来声音:“是宣将军吗?我是西安行营蒋鼎文。怎么还没睡呀?都快半夜了。”

宣侠父一听是蒋鼎文,口气尽量显得亲切,问道:“蒋主任不也没有体息吗?有什么事呀?”

蒋鼎文在电话里吹捧了委员长抗日救亡的功劳,又说了国共合作打败日寇大有希望,然后言归正传,他说:“宣将军,今年春天被我们在三原扣留的那批军火,你上次说是在市场上采购的。经我们调查,证明是苏联给你们的,你们在没有办护照的情况下便私自往延安运,这是违法的。但考虑到你是我的学生,又是小同乡,我就通融你一回,可把那批军火的三分之一运往延安,你能来一下吗?我们商量商量。”

宣侠父从袋里掏出怀表,时针已指向11点了。他用抱歉的口吻说:“谢谢老师的好意,不过,现在已到了深夜,我们明天再谈吧!今天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蒋鼎文忙说：“抗战工作这么紧，我还休息什么，侠父，是不是你一个人走路害怕呀？用不用我派车接你？”

宣侠父见蒋鼎文奚落他胆小，便要强地说：“老师，我马上去。”

宣侠父放下电话，收拾停当，刚要出门，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同志进来了。他问宣侠父这么晚了到哪儿去？宣侠父说：“蒋鼎文来了电话，让我去西安行营处理春天被扣的那批军火。”伍云甫担心地说：“这么晚，我给你派个警卫吧。”宣侠父一听，笑道：“我是军人，以保家卫国为己任，哪能再叫人再来保卫我。”

宣侠父说完就走了。伍云甫和其他几位同志目送宣侠父消失在茫茫夜幕之中。

第二天早晨，伍云甫到宣侠父房间找他汇报工作，见室内床上的被褥还整整齐齐地叠放着，看来宣侠父一夜未归。伍云甫去找门卫，门卫说：“宣侠父昨天晚上没有回来。”

到了8月1日中午，伍云甫感到事态严重，便打电话给西安行营，接电话的是蒋鼎文的秘书，他说宣侠父昨天晚上从行营就走了，没有在这里过夜。下午，伍云甫又打电话给蒋鼎文，问宣侠父上哪儿去了，蒋鼎文说宣侠父昨晚回你们办事处去了。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出动，到所有跟办事处及宣侠父个人有联系的单位或个人去查找，都说没有见到宣侠父。

宣侠父失踪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让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并要西安办事处向国民党西安行营追问宣的下落，叫蒋鼎文负责把宣侠父交出来。

一时间，国共两党关系闹得很紧张。共产党认为，宣侠父肯定是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了，国民党必须交出尸体，并向中共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国民党当局迟迟不表态，

装聋作哑。

再说蒋鼎文自接到蒋介石电令后，他亲自向徐一觉下达了手令：“派办公厅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将宣侠父秘密制裁具报。”

徐一觉把西北区行动股股长丁敏之、直属组组长李翰廷找来研究执行办法。徐一觉一再强调宣侠父是共产党的高干，制裁他必须绝对保密，而且要在深夜进行。

李翰廷是西安警察局一分局局长，在“西安事变”时，他镇压过群众反蒋抗日活动。他说：“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又叫虾蟆陵）一带荒地，那里有一口五、六丈深的枯井，附近没有老百姓居住，暗杀后，就可以把尸体投入枯井，再用黄土掩埋。”丁敏之也建议：“我们分头行动，我在下马陵枯井边守候，挖些土放在那里，但是，怎样才能把宣侠父骗到这儿来呢？”

徐一觉说：“这有办法，我让蒋鼎文主任把宣侠父骗到他的公馆，说是有要事相商，然后等到下半夜，让他回去，半路上我们下手。”

当宣侠父被骗到蒋鼎文的公馆时，蒋鼎文虚情假意地与宣侠父谈到零点，还是纠缠着军火问题，双方都不让步。宣侠父说这批军火是爱国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不能扣留，两人又争论到凌晨1点。然后，蒋鼎文把宣侠父送出公馆。

宣侠父刚走出公馆，便被两个特务盯了梢，走到半路，徐一觉、李翰廷等特务一拥而上。宣侠父没有料到特务会这么卑鄙，深更半夜地害人，正要反抗，但自己的双手已被特务死死地抓住，嘴里已塞上了棉花。徐一觉、李翰廷赶紧将宣侠父架上汽车，两人同时下手，抓住宣侠父的喉咙，套上绳索，两边拉紧。宣侠父同志，就这样被军统特务活活勒死。徐一觉马上命令汽车开到下马陵枯井边，早在那里等候的丁敏之等人一拥而上，将宣

侠父的尸体从汽车上抬下来，扔进枯井。临扔之前，特务还从宣侠父的上衣袋里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黄金表链。他们卖了后饱吃了一餐，余钱瓜分。

丁敏之让几个特务匆匆忙忙地从井口倒下几筐黄土，然后乘车离去。

第2天上午，徐一觉当面报告了处置宣侠父的经过，蒋鼎文发给奖金2000元。徐一觉自己独吞了1000元，剩下的分给执行任务的十几个人。他们虽都不满意徐一觉独占一半，但徐是科长，谁也不敢讲话。

事后，中共方面曾展开质问、追查，非叫蒋介石答复不可。无可奈何之下，蒋介石只好承认：“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把他杀掉的。”这就是蒋介石的心态，他把黄埔学生视为己有，用之，杀之，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

在宣侠父牺牲后，宣侠父的爱人带着不满5岁的女儿宣平在延安生活。1952年，宣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赴苏留学生。当时学航空专业的只有宣平一个女孩子，宣平不让须眉，几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从事国防工业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国庆阅兵行列里，推出了中国制造的各种导弹，里面就有宣平他们获国家科技成果一等奖的某型导弹。巨大的银灰色的流线体导弹，直指苍穹，宣平像欣赏自己的孩子那样深情地注视着它，因为其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的爱。这年她的父亲逝世已整整41年，而宣平正是人到中年，担任航天航空工业部科技委秘书长。这年，她的父亲要是健在的话，应该是80岁，而实际上，宣侠父39岁就牺牲了，令人委实痛惜！

再来谈谈蒋鼎文。三个月前，也就是参与谋杀宣侠父之前的1938年清明节，他代表国民党西安行营出席黄帝陵祭祀。当

时是他用自己的小轿车送张国焘去西安,帮助叛徒一路顺风抵达武汉。蒋鼎文打日本人不行,但反共方面却是内行。此人与蒋介石既同姓又同乡,是浙江诸暨人。浙江讲武学堂毕业,27岁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上校参谋。在黄埔军校成立后,他放弃了上校参谋不当,投奔蒋介石不惜屈居于区区中尉区队长一职。这一着棋他走对了,后来被蒋介石看中,他也着实卖力,东征棉湖一战,他左肺中弹,仍指挥作战,是勤务兵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回来的。在“中山舰事件”中,蒋鼎文率第5团先当打手,解除共产党领导的铁甲车队武装,包围东山苏联顾问住所,都是蒋鼎文之所为。“围剿”红军,几乎战战不落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蒋鼎文继续在福建“围剿”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1935年2月,中共著名领袖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蒋部第36师逮捕。蒋鼎文奉蒋介石的旨意,令36师师长宋希濂于6月18日将瞿秋白杀害。在西安事变中,因蒋鼎文与张学良有私交,所以1936年12月17日,张学良让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给宋美龄和何应钦的信函,从西安飞往南京,向南京国民政府传递信息,并陪同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谈判。当蒋鼎文即将离开南京时,其夫人蔡文媛在机场哭哭啼啼,不愿其夫再入“虎穴”自投罗网。宋美龄对蔡说:“你是一个国家要员的夫人,一切事情应以国家为重,不能凭夫妻感情来阻止丈夫为国效忠。”当飞机抵西安时,张学良亲往机场迎接。当时张学良拍着蒋鼎文的肩膀说:“铭山兄,你是好汉,果然不怕死,又回来了。”蒋鼎文答道:“副司令是大好汉,我是小好汉。”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途中在洛阳停留。刚下飞机,蒋介石立即要求张学良放回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调元四位大将。27日,蒋鼎文安全地回到南京。蒋鼎文在西安事变中为蒋介石奔走于西安、南京之间,赴汤蹈火,在

所不辞,被人称为“拼命三郎”。为此蒋鼎文也居功自傲,到处宣扬,出尽了风头。

蒋鼎文主政西北期间,滥用职权大发国难财。他深知蒋介石对部下“只准腐化,不准恶化”的政策,即吃喝嫖赌可以不闻不问,图谋反蒋,犯上作难则要追查到底,毫不手软。老百姓都叫他为“腐化将军”,他贪污成性,狂嫖滥赌,聚敛私财,数额巨大。据蒋鼎文的私人账房先生陆怡霖说:“西北最大的资本家毛虞琴、古风翔的财产,只不过是蒋鼎文的零头数。”

蒋鼎文的小老婆蔡文媛也是他用欺骗的手段弄到的。1929年春,蒋以“巡访”名义,前往普陀寺,正巧遇到上海中西女塾学生蔡文媛随母乘船到普陀寺进香。蒋时任浙东警备司令兼宁波公安局长,权势极大。当时蒋见蔡衣饰入时,体态袅娜,年纪又轻,就以赠送玩具、糖果给蔡的侄儿为手段,主动地与蔡接近。后来又通过副官朱平之从中穿针引线拉关系,朱告诉蔡母:“司令新丧太太,尚未续弦,且无子息,老太太肯将小姐联姻,将来前程远大。”蔡母正缺一做官的女婿,但又怕女儿吃亏,于是便说:“女儿订婚,要慎重,须在佛前发誓,确系前妻已故,作为正室结婚方可。”蒋一切照办,并送了丰厚的聘礼。就这样,蒋蔡结为夫妇。蔡母哪知道,此时的蒋鼎文家中已有两个老婆,一个姘妇,自己的女儿只做了他的第三房太太。既然木已成舟,蔡文媛也只好嫁鸡随鸡了。

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溃败。10月,日军偷渡黄河,向郑州进犯,河防吃紧。12月,蒋介石任命蒋鼎文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驻防洛阳。这时,汤恩伯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以河南叶县为巢穴,目空一切做起“中原王”的美梦。蒋鼎文的到来,使他感到大权旁落,心中甚是不快。蒋鼎文自恃是蒋介石的“钦差大

臣”，又是何应钦手下的“四大金刚”（另3人是顾祝同、钱大钧、刘峙）。蒋鼎文下车伊始，就以老资格的派头指手划脚，汤恩伯却不甘示弱，根本不把蒋鼎文放在眼里，蒋鼎文常用蒋介石、何应钦的大帽子来压汤，汤也不吃那一套，反而弄得蒋鼎文令不出户，自讨没趣。对此，蒋鼎文十分恼火，决定网罗党羽亲信，采取孤立汤恩伯的手段。他首先在洛阳抓住一批北方和四川杂牌军的首脑，如庞炳勋、刘茂恩等，然后大量委派游杂部队，番号多达60多个，又在洛阳西工开办了一个党政训练团，培训党政军骨干，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蒋汤两人矛盾愈演愈烈，而对抗日防务松懈。1944年春，日本为了打通华北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争，首先进攻中原。大敌当前，蒋汤二人仍在勾心斗角，争夺权力，互相拆台。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异常。所以，中原战役，日军总兵力不足15万，以之来和蒋、汤在河南的40万大军交火。4月18日，日军在从豫东渡过黄河黄泛区数天后，继而又占领了郑州。接着，日军又兵分两路，一路由郑州沿平汉线南下，相继侵占新郑、许昌；另一路沿陇海线西进，进攻洛阳。至此蒋鼎文这才慌了手脚，将洛阳迤南洛河上的林森桥炸毁，又将战区司令部移驻新安。但终因指挥失当，洛阳于5月26日被日军占领，蒋鼎文只得再仓惶后撤，进入伏牛山区。

在日军占领洛阳后，撒放大批漫画传单，其中一张画着蒋鼎文一手牵着小老婆，一手抱着钞票逃命。另一张画着汤恩伯横眉怒目，指着蒋鼎文大骂：“铭三要负战败之责，老汤要去告状！”日军对蒋汤之间的勾心斗角摸得一清二楚，据说是由于派了一名叫佐藤的特务潜入洛阳，其以卖豆腐作掩护，长达5年之久。佐藤将蒋汤摩擦情况传报回去，所以日军窥此良机，大举进攻中原。中原惨败，是蒋鼎文治军从政40年来的最大挫折。兵败失

宠,安置闲职,被蒋介石委任他为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参议,基本上脱离了军界。抗战胜利后,蒋鼎文携全家住在上海,弃官经商,他开办南京宏业砖瓦厂,在上海开办轮船公司。蒋家王朝灭亡前夕,他派蔡文媛赴美国经营橡胶园,又派胞弟蒋鼎五在香港开办振华公司。1949年3月,蒋鼎文逃往台湾,挂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息隐家园,度过晚年,于1974年1月2日病逝于台湾,享年79岁。正是:中原惨败失“荆州”,腰缠万贯陶朱公。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兰封战役 桂永清二次免死 保卫武汉 周恩来临危不惧

话说 1937 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后，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桂永清，在 10 月间从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回国，仍然回南京黄埔军校当他的教导总队总队长。

教导总队的建立，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桂永清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学生，江西贵溪县鹰潭镇（现改为鹰潭市）楼底桂家村人，父亲桂京山靠卖菜为生，后经商发家。桂永清上中学时成绩平平，还爱打瞌睡，人称“睡虎”。进入黄埔军校后，他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当时，他和杜聿明、胡宗南、关麟征号称“黄埔一期四杰”，也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桂永清 30 岁晋升国民党 31 旅少将旅长，开始了将星闪耀的辉煌时期。上任后，他推荐邱清泉为副旅长，蒋介石未准，而派李默庵为副旅长。李来见桂时，他正在与部下打牌，对李爱搭不理地说：“我已经向校长另荐了副旅长。”而后自顾自地打起牌来。李默庵也是黄埔一期生，且文武全才，哪能吃他这一套，回去后向蒋介石告了一状，桂永清倒霉，旅长被撤了。没想桂永清因祸得福，何应钦推荐他去德国柏林步兵专科学校深造，还领了 3 万元学费，1933 年桂永清回国，建立“中央模范师”。桂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央模范师不如成立“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切仿效德国军队的做法，蒋于是委任桂永清当了黄埔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这

个总队扩编为9个步兵团、合3个旅,另外还有骑、炮、工、辎、通各一个营,人数超过一个正规军。教导总队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训练方法。他首先要求所有官兵做到“五不”,即不抽烟、不赌博、不宿娼、不饮茶、不用热水。并宣布:凡违反“五不”的,“学问再好,本事再大,我也不用”。同时还要求官兵每天写日记,官兵结婚,总队给予一笔安家费,以示关怀。

教导总队全副德国武器装备,军官清一色由黄埔军校毕业生担任,战士算学兵,要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这个教导总队仿希特勒的党卫军,是蒋介石的铁血卫队。本来,何应钦打算将教导总队调往四川,扩编为30个团,作为抗日预备队,但桂永清坚决要求参加淞沪会战。1937年冬,桂永清率教导总队赴上海参战,接替胡宗南第1军的防线。桂永清亲自督战,阻止日军强渡苏州河,战斗空前激烈。这从一份当时的战地汇报,可见一斑:

委员长蒋钧鉴:

(一)、数日来敌倾全力争我屈家桥、八字桥阵地,密集炮火集中射击,守军伤亡过重,敌屡突入,我屡逆袭,彼此均以八字桥为争夺焦点。我马团李团两团,均使用加入战斗,李团长及欧阳营长负伤,马团王营长受伤,陈营长阵亡,下级军官以下伤亡,约在三千以上。

(二)、总队抱定与阵地共存亡决心,刻乃固守屈家桥、八字桥之线,与敌激战中。

(三)、虞日黄昏战斗最烈,几濒于危。旋奉张总司令电话,飭五十八师何旅归职指挥。经职转知该旅于陆家宅、倪巷上之线,占领预备阵地,而何旅长未奉书面命令,藉词推诿,未能如期达到指定线。不得已,职率本部必要人员及特务连亲赴前线杨家宅督战。

(四)、庚辰何旅进入第二线阵地,以其一营加入八字桥西端施家巷之线,刻屈家桥、八字桥仍由总队誓死固守。

职桂永清 庚巳参叩 代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十五时

桂永清焦急地等着回电,回电却是寥寥数语,只是叫他率部速回南京待命,并无褒奖之词。

桂永清在回南京后,告诉他的手下几位战将参谋长邱清泉、副总队长周振强等,说:“大家都不愿守南京,我向校长自告奋勇,得了10万元犒赏费。”

当时大家没有什么反应,主要是怕拿了钱会送命,划不来。岂知这桂永清旧病复发,见钱眼红,他叫军需处领了全总队35000人12月份的军饷和10万元犒赏费,除了过渡长江北岸的4000人补发薪饷外,其余部分他全部装进自己的腰包。

桂永清参加了南京保卫战,虽然打了几仗,但终于敌不过日军的飞机大炮。后来他奉命撤到北岸,在过江时差点送了小命:一脚踏空,掉进长江,幸亏一名卫士跳水相救,才保住了性命。这时,他奉命率教导总队赴河南休整,在开封,他招兵买马,组成28军,归一战区指挥。由于河南战局失利,桂永清所部缩编成78师,他任中将师长。

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经上海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两仗一打,损兵折将。正当他百无聊赖时,蒋介石召见了,要他组建27军,辖36师、46师、106师和另一个炮兵师,立即开赴河南兰封、考城之间部署防线,以阻日军西进。桂永清有点信神,他觉得三个师都带“六”字,六六大顺,也许从此会重振旗鼓,东山再起。

正巧他的部队往前开进时,日寇因兵力不足,收缩防线,自动放弃了一些城镇。当桂永清带着邱清泉来到兰封时,便神气

活现起来。当友军 71 军军长、黄埔一期同学宋希濂向他俩介绍前方敌情时,还没等宋说完,桂永清就满不在乎地说:“这点敌人算得了什么,看我们来打它个落花流水。”

桂永清、邱清泉都是黄埔军校毕业后留学德国的军事专家,在宋希濂眼里,他两个人的性格、作风如一对孪生兄弟: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趾高气扬,走路腰杆笔直,十足的“纳粹”军官风度。他俩除了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尚可指挥外,其他人根本指挥不动。所以,宋希濂就嘲讽地说:“很好,你们两位德国将军来了,这次一定可以打个大胜仗。”

5 月中旬,桂永清派 46 师的一部分步兵由兰封向东搜索前进,邱清泉也派了几辆装甲车、战车同行。他们推进到距兰封不到 10 华里的地方,正好遇着日军步、骑兵 100 多人,这股敌军没想到中国军队还有战车、装甲车,吓了一跳,掉头就往后撤。桂永清立即指示邱清泉:“向郑州、向武汉、向周围所有友军发报,我军首战兰封告捷。”

桂永清的电报刚发出去,敌军已在后退几里的阵地布防,还调来了战车防御炮几门,向桂永清的阵地开火,桂永清便不敢再前进了。这时,蒋介石来电,限定该军在两天之内攻克兰封,否则军法从事。第二天上午,桂永清指挥全军向敌发动猛烈攻击,想一鼓作气拿下兰封,好向蒋请功,但却遭到敌人顽强阻击。蒋介石急了,亲临郑州指挥,他给桂永清打电话,限 24 小时内攻克兰封,逾期不克,唯军长是问。军令如山,桂永清不敢呆在军部,亲自到第一线督战。蒋介石一连数次电话询问战况,但此时敌军调集了主要兵力,配合战车、大炮向桂永清阵地发起猛攻。当时炮声隆隆,战车开路,大有排山倒海之势,桂永清虽是留学德国的将军,但他的士兵都是没有经过整训的新兵,一听见大炮声,就吓得魂不附体,拼命往后跑。仅仅 3 个小时,桂永清的 27

军便全线崩溃了。溃退队伍似潮水般向西逃窜，邱清泉坐上装甲车逃得更快，他一口气就逃到罗王砦车站以西的地区。6月23日，兰封失守。桂永清知道“兵败如山倒”，他怎么努力也控制不了部队的溃逃。兰封的丢失，他的责任重大。为了推卸责任，他匆匆忙忙写了一个纸条给88师师长龙慕韩，命令他率部固守兰封。龙慕韩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与桂永清同期同学。龙慕韩对敌军的攻势也招架不住，又无法向任何人请示，便自行决定退出兰封城，率部转到西南方向去了。

前敌总指挥薛岳一再向桂永清提示，要确保兰封。兰封失守，使开封、郑州面临日军的直接威胁，也使得国民党军事当局制定的兰封会战计划大大受损。国民党精锐部队约15万人，未能歼灭被围困的日本土肥原的14师团近3万人，薛岳的肺都气炸了。桂永清弃城一走，全部计划泡了汤，他向军委会控告桂永清，说他贪生怕死，贻误战机，请求严惩。蒋介石严词质问时，桂永清说：“此次攻战，旅长一死二伤，团长伤亡各2人，营长阵亡9人，连以下官兵伤亡5000多人，已竭尽全力。我在第一线督战，仍未能完成歼敌攻城之任务，有负校长的使命，请予处分。”

桂永清在到达洛阳白马寺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27军攻击兰封不力，军长桂永清撤职。36师师长龙慕韩玩忽职守，攻城不力，而且放走敌人，着即押送武汉处决。46师师长李良荣革职留任，戴罪图功。106师师长沈克追击不力，改任副军长。”

桂永清找了个替罪羊，可怜的龙慕韩，他是安徽怀宁县城关火神庙人，黄埔一期毕业，如今却被他的同期同学桂永清一张纸条就送了命。

这是桂永清第二次免死。第一回是在东征时，桂永清在战场上将缴获的钱财物品用邮包寄回江西老家，被人发觉，蒋介石下令立即枪毙。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念其初犯，亲自写信给广东

兴宁县罗师扬县长：“押在贵县监狱中之黄埔军校前连长桂永清，望于其饮食居处较予优待，惟看管则仍须严紧毋懈，至盼至要。”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以孙中山总理刚在北京病逝，怕影响上气为由，一再恳请蒋介石不要枪毙桂永清。蒋碍于廖的面子，最后只给桂永清以撤职处分，免他一死。

桂永清觉得龙慕韩死得也冤枉，便去武汉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又火了，骂道：“你也是有罪之人，还有脸替他求情，不能允许。你把 27 军交给胡宗南指挥，你回去反省，听候处理。”蒋介石这一年心情不好，日寇长驱直入，连连丢城失地，桂永清如果不是写那一张叫龙慕韩固守兰封的纸条，那他这次就死定了。

睡虎桂永清，说他幸运，可他总是遭撤职处分；说他不幸，可他却随撤随升。这也许就叫“有贵人相助”吧！

由于桂永清对陈诚忠贞不二，不久，桂被陈任命为战干团教育长，战干团由武汉迁湖南，再迁四川。当时在四川，有几百名青年要求民主，要求团结一致抗日，却遭到战干团的镇压，制造了有名的“綦江事件”。这一事件引起国内各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为此，重庆国民政府被迫改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桂永清又被撤职。1941 年，桂永清出任中国驻德大使馆武官，从此便开始了他“二战”中的军事外交生涯。抗战胜利后，由于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与陈诚不和，桂永清当上了国民党海军总司令。1952 年他调任台湾总统府参军长，1954 年 6 月由二级上将参军长升任一级上将参谋总长，达到了国民党政权军人生涯的顶峰，这一年，他 54 岁。按理他还可以享受好长一段人生的辉煌，然而，他命短无“福”，上任不到两个月，即于 1954 年 8 月 12 日，因病死于台北。在历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中，桂永清是任期最短、寿命也最短的一位。同时，他还是毛泽东宣布的国民党 43 名战犯

中最主要的 15 名战犯之一。

且说 1938 年 3 月 25 日,日军三路围攻徐州,台儿庄国民党军在李宗仁等指挥下,与日军展开大战。大战中于 4 月 6 日杀伤日军数千人。黄埔一期毕业的 52 军军长关麟征再显长城古北口作战之雄风,擢升为 33 军团中将军团长,大出风头。但日寇入侵上海、南京之后,挥戈西进,直指中原,若郑州不保,则直接威胁武汉。因此,保卫大武汉就成了国民党抗战的中心议题。

蒋介石在武汉发表宣言,表示要长期抗战,他说:“国军退出南京,绝不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1937 年 12 月中旬,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抵达武汉。21 日晚,代表团同蒋介石直接会晤。在会晤期间,周恩来对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蒋介石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不能不对中共和抗日各党派在态度上有所转变。蒋介石在听完周恩来的建议后,连忙点头称道:“恩来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我所想的亦不过如此。”

这天晚上,国共双方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共方面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参加;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参加。

1938 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委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并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同时也邀请了刚从日本回国抗日的著名文学家郭沫若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在北伐时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并曾当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郭沫若在南昌起义南下时,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身

份一直隐蔽。由于他在1927年3月31日写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被蒋列入193名被通缉的黑名单。如今蒋介石虽“既往不究”，但郭沫若不信任蒋介石，也不想卖这个“狗皮膏药”。周恩来晚上开会开导郭沫若，说：“不要看轻宣传工作，应把宣传工作重点放到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上。”郭说：“我耳聋，在国民党里做官，青年们是不会原谅我的，帮反动派卖狗皮膏药，帮助欺骗群众，我不干。”王明也在一旁劝道：“目前的局面是靠争取得来的，虽然还不能满意，但我们还得努力争取，决不能退让。能够在两方面都通得过的人，目前正感需要，不是人多，而是太少。”王明抽烟一根接一根，他换上一支烟，继续说：“我们不是想做官，而是要抢工作做，我们要争取工作，争取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共产党首先便能谅解，青年们谅解是不成问题的。”

周恩来说：“老实话，有你做三厅厅长，我才考虑接受做他们的副部长。”另一位朋友也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政权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还开得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让我们一道去挤吧！”

郭沫若一介书生，思想清高，只想做学问，不愿从政。在周恩来好说歹说之后，他总算茅塞顿开，于是4月1日走马上任。三厅成立后便招贤纳士，田汉、阳翰笙、胡愈之、洪深、冼星海、冯乃超、董维建等一大批知名人士纷纷来到三厅，可谓群贤荟萃。三厅被称为“名流内阁”。经长江局批准，三厅又秘密成立了特别党支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国统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

郭沫若刚应下差事，又一件事把他惹火了。政治部的人选是样的：一厅厅长贺衷寒，二厅厅长康泽，三厅副厅长刘健群。三人都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成员，其中两名是黄埔学生，由于刘健群是非黄埔生，故安排在郭沫若名下当副厅长。郭找到

陈诚说：“刘健群是一位干才，就让他做厅长好了，何必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呢？”陈诚那时是武汉卫戍司令、9战区司令长官，红得发紫，他口气冲得很：“你的大名是连借用一下都不允许的吗？”可是过后，陈诚却软了下来，请诸位厅长到公馆吃饭。正巧此时刘健群因桃色事件离开了武汉，副厅长人选出现了转机。郭沫若上任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举行“抗战宣传周”，接着又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时组织献金活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

不久，黄埔一期的贺衷寒升为政治部秘书长，去部里办事。郭沫若见了贺衷寒只好称他“秘书长”，可郭自尊心强，一个堂堂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他，自然咽不下这口气，因而三天没有上班。加上他前些日子召集一次武汉三镇的民众大游行，康泽假鸣警报，命令到会群众迅速撤离，致使他和阳翰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泡了汤。他又找到周恩来，在一肚子冤气无处发泄的情况下，提出辞职。周恩来说：“三厅的工作仍然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抵消反动派一部分的颠倒黑白和阴谋投降，使反动派看出群众力量的伟大而有所忌惮。因此，三厅这个岗位，依然是值得重视的。”谈到内部的人事变动，郭沫若摘下眼镜说：“三厅的工作我自己的贡献很少，取下我这顶帽子，三厅的同志们依然可以干下去，再要在贺衷寒、康泽那里受气，实在有点吃不消。”

周恩来火了，质问道：“那怎么办？”

郭沫若第一次见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但周恩来很快又口气变得柔和起来，补充说：“为了革命的利益，一切都须得忍受！我们受的委屈，比这大得多呢！”郭沫若重新戴上眼镜，振作起来，表示一定忍辱负重，干好工作。后来郭沫若回忆道：“这是我受周公责备的惟一的一次。”郭沫若搞的一次献金活动，从1938

年7月6日开始,一连五天,共有55万人献金,总金额超过100万元。蒋介石因为被推崇为“抗战领袖”而破例给郭沫若特批1.5万元的经费;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组成献金团,据资料记载:党中央献出1000元党费,周恩来献出一个月工资240元,董必武、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六位参政员各献金350元,李克农、叶剑英代表八路军办事处,献上伙食节余1000元,钱之光、边章武、童小鹏等均献出了一个月的工资。武汉献金活动,把抗日宣传工作推向了高潮。

1938年5月,徐州失守,日军调集南北两个战场的兵力,虎视眈眈地沿陇海路西进,准备进攻中原和武汉。蒋介石吸取上海、南京失败教训,在保卫大武汉时,不再是以守城硬拼为策略,而是采取了加强长江南北外围战线的抵抗力量,节节阻止敌人之进攻。他以时间换取空间,实行消耗战与持久战,亦即不以一城一地的失守为胜负,而以持久抵抗,消耗敌人作为战略目标,从而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英雄所见略同”。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上海大戏院召开,毛泽东是中共七名参政员中之一。这次他来不来武汉参加会议呢?这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张学良兵谏的事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人劝“毛不必去”,于是毛在致参政会的电报中称“因齿病及琐务羁身”。然后阐述他刚在延安窑洞里写完的那篇有名的《论持久战》内容要旨:“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日本首相近卫手下有个智囊团,即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1938年6月,这个研究所向首相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

此报告名曰《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报告内有这样的文字：“残败的国民政府现在还在叫喊坚决抗日，毫无投降之意……对国民政府，必须以击溃为根本方针，明确除此以外别无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份报告也强调必须摧毁国共合作：“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

这份报告表明，连日本人也意识到国共合作的威力。

在武汉会战前夕，为阐明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思想，鼓动蒋介石抗日，于武汉 1938 年 1 月创刊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周恩来发表了《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他强调：“在动员上，要用最大的决心发动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保卫武汉必须实行内线外线结合夹击敌人的作战方针；保卫武汉的目的主要在于给敌人以极大损伤；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当时陈诚、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这些国民党军事统帅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抗日战略思想的转移极为称赞。蒋介石亲任“保卫大武汉”战役的总指挥，部署了第 5、第 9 战区部队以及海军、空军，总计兵力有 130 个师的庞大队伍进行参战。陈诚的 9 战区辖薛岳兵团、李汉魂兵团，其依托幕阜山、九宫山、庐山等山脉构筑阵地，在江南防守；李宗仁的 5 战区辖孙连仲兵团、李品仙兵团，其依托大别山、富金山等山脉构筑阵地，在江北防守，并在马当、湖口、武穴、田家镇等江防要塞设防。黄埔一期的战将关麟征奉命率 32 军团在瑞昌、阳新一线阻敌月余。敌用“飞机炸、大炮轰、战车冲、步兵攻，继之以人海跟进”的攻击战术，但仍屡攻不下。32 军团为保卫大武汉贡献了力量。当时敌广播说：“我皇军在瑞昌附近遭受最强劲之敌。”黄埔三期的 74 军 51 师师长王耀武在万家岭歼敌 4 个联队，使敌人丧胆。

1939年蒋介石召见王耀武，夸奖他作战有功，旋即提他为74军军长。黄埔一期毕业的宋希濂时任71军军长，1938年9月在大别山地区的富金山、沙窝两战役中，与日军激战45天，共击毙日军两万多人，给敌以重创，战功卓著。黄埔一期毕业的冯圣法、俞济时等也参加了武汉保卫战。陈诚、胡宗南、李延年、李仙洲、霍揆彰、郑洞国、甘丽初、张灵甫、钟彬等一大批黄埔高级将领，率其所部，浴血拼杀，阻击了敌人的进攻。总之其英勇事例，不胜枚举。但是，由于单纯防御，逐次使用兵力，防线一再被突破，国民党军也在节节败退。

6月5日，日军攻占开封，然后分兵进攻中牟，迂回新郑，准备攻取郑州，将平汉、津浦、陇海三线沟通，造成进攻武汉的有利条件。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进攻，竟不顾人民死活，命令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炸毁黄河铁桥和掘开郑州北面花园段黄河大堤，致使豫、皖、苏三省40余县1700万亩平原耕地被淹，90万人死亡，610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实际上，黄河之水并没有挡住日寇的进攻。在三个月之后，日寇把它在豫东的军队南调，然后又沿长江西上进攻武汉。蒋介石为阻挡日寇沿长江进攻，将轮船装满石头，在马当附近沉入长江，堵塞了长江航道。但仍然未起作用。6月15日，日寇占领安庆，26日，又出动大批飞机舰艇占领了长江要塞马当，7月5日，攻占了控制长江和鄱阳湖水路的重镇湖口，7月25日攻陷九江。8月初，日寇在长江北岸又攻占了宿松和黄梅。随后，日寇在长江南北兵分五路向武汉三镇逼进。

在武汉临危前，周恩来如中流砥柱，他带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战斗到最后才撤退。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没有开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从延安急返武汉。4日，会晤了蒋介石，当面向他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信的全文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凡在国人，无不崇拜。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将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

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写此信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处于最佳时期。

周恩来辞别蒋介石，回办事处指示李克农和潘梓年负责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转移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指示办事处把爱国进步人士和进步文艺团体转移到大后方。

10月上旬，武汉已闻到火药味，战况迫近，人心惶惶。10月21日，日寇占领广州，武汉形势急转直下。10月20日，武汉大小报刊停刊，只有《新华日报》坚持到10月24日沦陷前一天。周恩来送走了郭沫若、胡愈之。风尘仆仆地来到《新华日报》办公地，口述了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周恩来撤离武汉只几个小时，武汉就沦陷了。

周恩来一行乘汽车经过宜昌进入湖南常德再转长沙。郭沫若坐的汽车在中途还救了白崇禧一命，因白的车子抛了锚，他挤进郭沫若的汽车，才抵达长沙。周恩来的汽车在路过常德时，国民党哨卡阻拦，周让人去叫哨卡的负责人来，来人一见是周主任，连忙让车放行，此人就是当时任常德警备司令的黄埔四期毕业生唐生明。唐生明乃是唐生智的胞弟，花花公子，后来赴上海与日伪周旋，此是后话，不提。

周恩来一行于10月27日在大雨滂沱中抵达长沙，住进寿星街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与先期到达的叶剑英参谋长见了面。他们准备和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见面，并研究在南岳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事。叶剑英后来在这个班任副主任，后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李默庵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负责对国民党军官进行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政治工作教育。昔日国共两党在广州第一次合作的黄埔师生，而今为了共同抵御日寇的侵略，又重新携起手来。正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再合作，血护华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长沙大火 鄧悌当了替罪羊 心怀鬼胎 汪某做了卖国贼

话说蒋介石在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中，动用了几乎所有可调动的国民党部队进行抵抗，其中包括他的黄埔嫡系，胡宗南、关麟征、俞济时、冯圣法、李仙洲、李延年、王耀武、霍揆彰等战将都披挂上阵，但亦终未能保住武汉。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蒋介石在10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10月24日晚，蒋介石偕宋美龄乘飞机撤退去湖南省衡阳市北面的南岳，但因飞机在大雨中迷失方向又返回汉口。第二天凌晨4时蒋介石的专机再次起飞时，日寇已迫近汉口城郊仅有30华里的路程了。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决定改变其前一阶段的侵华方针，把军事力量用来对付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及其人民武装，而把过去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次”的方针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

蒋介石代表国民党与苏联签订援华协议后，原来在黄埔军校当过军事顾问的切列潘诺夫将军再次来华，任中国抗日军队

军事总顾问。此人年轻时在沙俄军队第14西北利亚师服役，1918年加入苏联红军，当过28旅旅长，有实战经验。据何成濬说：“在撤出武汉前，蒋介石曾‘交下火烧武汉计划书一大部，用十行纸写的，约200页’。”该计划书由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转蒋介石，内容包括理论和详细计划两个部分，原起草人系俄国顾问某。他以1812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时，俄国人火烧莫斯科而转败为胜为理论根据，认为在武汉亦应实行“焦土政策”。

蒋介石从上海、南京、徐州失守时，就想搞“焦土抗战”，总是由于撤退仓促，坚壁清野来不及搞，所以“焦土抗战”始终只是一个设想。

就在武汉沦陷的第二天，蒋介石突然从南岳衡山坐飞机赶到长沙。10月27日晚，他在市郊原何健的公馆里，召集张治中、薛岳、程潜等首脑人物出席的军政会议，冯玉祥、李宗仁也出席了这次高峰会议。据冯玉祥回忆，这次会议，自始至终都是蒋介石一个人说话。蒋对交通部门的人说：“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就把铁路占满了，那怎么办？”负责交通的人还没有回答，蒋介石接着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就是啦，倒上煤油，所有的车就都烧掉完啦！”蒋又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还没有回答，蒋即说：“还有什么可考虑的，都用火烧掉，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这次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蒋介石在会上不断地谈到“怎么放火，怎么放火。”这样一座没有外国租界的长沙市，在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思想指导下，就被选定来重演莫斯科大火的“样板”了。

11月12日，日寇侵占岳阳，并继续向新墙河进攻。上午9时许，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给张治中打电话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旋又接到蒋介石的紧急电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张治中接到这个电话后,当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十三太保”之一的酆悌、省保安处处长徐权等开会,传达精神,囑立即拟订焚城计划,并指定由长沙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由省保安处协助。张治中自从由淞沪前线抽调来湖南省任省主席后,蒋介石曾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治湘应变,作为大后方来巩固。对于火烧长沙像这样大的非同儿嬉之事,张的确有些忧虑:当天中午,他在同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一起午餐时,曾低声慎重地问陈:“这次长沙用焦土政策,你的意见怎样?”陈说:“当然要做的。”下午4时,酆悌、徐权一同驱车来到张治中寓所,拿出一份“焚城准备纲要”让张过目。酆悌的意见,要长沙市社训队副队长王伟能为正指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许权为副指挥。当时张治中认为王伟能是军训教官,恐不方便,最后决定由警备司令部第2团团长徐崑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张治中一再指示:“这个计划最好备而不用,在我军从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而且,须事先放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开市区后再火烧长沙。”

据时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的潘公展后来回忆:“当天还秘密分配火油、破布等等燃烧物,分了地段,交托警备部队及警察局等各负其责,静候上级命令指示,再实行放火。”那时的长沙城,已似一座即将张口的火山,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即将被它吞没,而蒋介石则在这天夜里乘车离开长沙向南岳驶去,一场震惊中外的大火,就在当晚午时点燃。

且说1938年11月13日凌晨,古城长沙陡然起火,先是南门外的伤兵医院见到浓烟升天,接着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当时沉睡的居民以为是失火,并没有在意。接着,全城东、南、西、北、中处处见到火光冲天,火势乘风在迅速地蔓延着,于是全城陷入

汪洋大火之中。顷刻间,房屋倒塌声、燃烧物的噼啪声、喊声、哭声、骂声、喇叭鸣叫之声不绝于耳,让人心碎胆惊。这时,身为一省之长的父母官张治中,从沉睡中惊醒,他连忙披上衣服,迅即摇电话找长沙警备司令部,摇不通,他又摇警察局,也无人接电话。面对这突如其来大火,他心痛欲裂,焦急万分,却又无计可施。无情的大火,把千年古城毁于一旦,长沙整整烧了两天两夜。据当时的《新华日报》统计:此大火共烧毁大米近 190 万石,房屋无数,有 3 万多人丧生。

据当时目击者说:“许多老百姓从睡梦中惊醒,连衣服鞋袜都没有穿,就被大火吞噬,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几天刮西北风,火借风势,风助火虐,跳进水缸的竟被沸腾的水烫死,伤兵葬身于烈火之中者不计其数,30 万人无家可归,5 万栋民房变成瓦砾堆。”

就在大火燃烧的前一天,即 11 月 12 日,周恩来听说长沙城人心惶惶,谣言纷纷,许多商店已关门,逃难者络绎不绝。为弄清真实敌情,他叫邱南章给国民党当局打电话,打听洞庭湖战况。国民党当局有关人士在电话中说,日军尚在岳阳的洞庭湖一带,离长沙还有两百多华里,一切平安。13 日,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所在地寿星街也被烧,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不得不离开办事处,转移到湘潭。蒋泽民为运送物资,往返长沙湘潭好几趟。

火灾突发,到底是谁下令放火的呢?真相至今还不尽为人们了解。海外学者,对长沙大火认识也不一致,因而该事成为千古之谜。

长沙突然被大火付之一炬,最可靠而且令人信服的一种说法是前线战报将地名听错了。岳阳有一个地名叫新墙河,新墙河距汨罗 35 公里,汨罗距长沙 80 公里。按照张治中的命令,敌人到汨罗以后,听命令坚壁清野。由于战局吃紧,人心惶惶,警

备司令部的人在电话中听说日军已到了新河；就于13日凌晨两点开始行动。据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李惟果说：“放火始终无人下令，惟火烧计划早已拟就。放火分百队，每队三人，由徐昆指挥。”

也有人认为是张治中“命令纵火”。据郭沫若回忆：“戒严着的，连人影都没有的街头，渐渐有些异样了。有些穿蓝布制服的警备队三五成群地出现。奇妙的是有的人提着洋油桶，有的人又提着小火炉，身上都挂着步枪。”1点钟后，见市内有两三处起火，电话失掉了作用。三五成群的警备队每隔十家光景便是一队……撞门的撞门，开桶的开桶，都在准备放火。并且他们还说“是奉命放火”。放火的警备队员胸前还佩带证章，后来也证实，湖南人民自卫团第2团是放火的主力，当夜分24队，散布全市各区，各带火油汽油若干桶，先从省政府及警察局着火，各地一起响应，同时动作。这样看来显然又是极有计划，极有步骤，几乎是大规模纵火之阴谋而无异了。这样，火烧长沙，由准备突变为行动，首先应负责的是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这位文局长乃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字雨楼，湖南安乡人氏。本来他在军队任职，思想守旧，回湘当了长沙省会警察局长，其主要原因是想离家近些，比在前方打仗危险性小些。12月12日下午7时，“街上无一岗位，有人看着警察已整队开出去”，将到午夜12点，已到处找不着文局长，这时，外面人都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文重孚不听张治中的警告，最后竟然弃职潜逃。

又一种说法是据时任湖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的尹任先称：“在省府开会时，有人提及火烧长沙的事，文白（即张治中）即言，此事非湖南省政府所能决定，不必讨论。”最高当局一意孤行，地方政府无法制止，而广大群众又蒙在鼓里，这样长沙30多万人民也就在劫难逃了。

张治中从12日下午7点半到13日凌晨1时许,连续不断地忙于广播讲演、接见等,将近两点才就寝。刚入睡,副官就叩门报告说:“城内有很多响声,已经起火。”约3时许,火势更大,到处电话都打不通了。4时,酆梯向张治中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

据尹任先称:“实即下令放火者,为警备第2团团团长徐崑,而徐崑又并未接到任何人之命令。”

在长沙变成一片废墟后,蒋介石接到陈诚的急电:“长沙大火,并非军事失利,由于地方长官误信谣言,铸成大错,事关民心,恳请委座亲临处理。”

蒋介石乘汽车连夜从南岳赶来长沙视察火灾情况。当他登上全市最高的天心阁观望时,发现昔日全市繁华的街道片瓦无存,老百姓有的还在残火堆里寻找遗物,中正街的交通银行也付之一炬,只剩颓垣残壁。蒋介石浑身一惊,脸色由白转青,太阳穴上青筋暴起,气得眉毛胡子都抖动起来。这时日寇离长沙还有300多公里,并无继续进攻的迹象。蒋立即命令张治中,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梯、长沙警备二团团团长徐崑、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看管起来,又命令第9战区军法分监部组成军事法庭,审理此案。临走时丢下一句话:“要严峻迅速,依法论罪,限两天结案。”蒋介石为平息民愤,只好借用酆梯、文重孚、徐崑三人的头颅了。

预审由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任审判长,黄埔一期毕业的俞济时参与审判。酆梯是俞的同期同学,文重孚虽然是黄埔三期,也多少有些同窗之谊。他们认为蒋介石在火头上,只要缓一个时期,而酆梯、文重孚的小命是不会丢的。法庭上,徐、文二人声称是遵从警备司令部的命令,把责任推给酆梯。酆梯

站在被告席上,并不抵赖,一口承诺这次大火是他不能赦免的过失。他心里有底:此事是因当晚庆祝孙中山诞辰 72 周年举行火炬游行,曾在几处引起小火,有些放火的士兵以为是放火信号而开始放火的,再说,张治中已对他私下许诺,一定向蒋介石求情,顶多判上几年,以后再保释。担任审判官的蒋锄欧是鄧悌的湖南湘阴小同乡。在会审时,一再诱导他:“还有没有第二、第三个主谋者?”鄧悌当然不能说张治中和蒋介石,他环顾左右,看看张治中,低声说道:“没有。”

担任审判长的钱大钧拟了个“鄧悌、文重孚无期徒刑,徐崑死刑”的判决上报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判决公文,目光停在“鄧悌”的名字上,他想起此人是黄埔一期较有才能的学生之一,对他也有好感。1932 年,蒋派第一批黄埔学生赴德、意两国考察军事,带队的就是鄧悌。但此人个性怪癖,每以“独立特行”自负,与黄埔生中其他同学都不太亲近,有些人也忌惮他。在复兴社“十三太保”中,曾受到排挤,不能起太大的作用。但他毕竟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想杀又有些可惜,不杀却又深感舆论压力太大,众怒难犯。当时蒋介石头痛得厉害,也晕得厉害,好像大锤打在自己的头顶上。经过再三考虑,他只有借他的头了。于是便抄起红笔,在判决书上批道“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几个字。

张治中两次向蒋介石求情,要求免去对鄧悌使用极刑,未果。蒋介石返回衡阳时,一再叮嘱钱大钧,将全部案卷派人送重庆妥为保存。新上任的长沙警备司令俞济时是蒋介石奉化同乡,又是鄧悌在黄埔一期的同学。蒋介石再三告诫俞济时:“看押他们三人时不要透露半点判决结果,只说粤汉铁路修复后即提解到衡阳继续审讯。”俞济时两边都不敢得罪,只得宽慰鄧悌。

十分安静的鄧悌,到了执行枪决的前一天,发觉情况有些异样。因而他突然激动起来,哭嚎道:“我是忠于校长的呀!张主

席太对不起我啦！”天微明，他即起，让狱吏拿来纸笔。鄧悌一连给宋美龄等人写了30封信求救。有一封信写道：“我非常惭愧，没有脸面再见湖南的父老兄弟，我生长在湖南，怎能忍心烧毁自己的家乡，真是万死难抵挡这次大火损失的亿万分之一。不过，我敢大胆地说，我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委员长培养出来的干部，不敢为所欲为……”信刚送走，俞济时就进来了。他吩咐狱吏摆了一桌酒席。两个人杯对杯地喝了几盅。快到中午时，俞济时把判决书拿给鄧悌看。鄧悌咧开嘴笑，笑得很惨。他把脸扭到一边，抹掉眼泪，说：“我们同学归同学，你执行命令吧！”

1938年11月18日中午，鄧悌等三人被押赴刑场。鄧悌目光中含有受辱受骗的神情，凝望着远方；文重孚哭喊着：“张主席，冤枉啊！”徐崑垂头丧气，一声不吭，面如土色。

鄧悌被枪毙时，年35岁。他死后，俞济时得到密报，说在刑场上的卫士把鄧悌的一只金怀表和一支派克金笔私吞了。俞核实确有其事，把那个卫士叫来，用手枪对着他的胸脯开了一枪。事后人们说：“鄧悌这个冤死的鬼，还带走了一个卫士。”张治中是鄧悌的老师，有一天他来到鄧悌的墓地，摘下军帽，低头站了许久。

轰动一时的长沙大火案，就这么借人头收了场。

当时各方面的人士不明真相，纷纷责难张治中，有人还写了一副对联讥讽他，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①。”横批是“张皇失措”。这副对联巧妙地把张治中三个字嵌了进去，实为巧句。

却说长沙大火的事件刚刚平息，重庆又发生了一件令全国

^① 长沙大火后，蒋介石拨付10万元抚恤费救济灾民。

人民震惊的大事。

1938年12月18日,亲日派头子、原黄埔军校党代表汪精卫,以赴成都黄埔军校讲演为借口,带着老婆陈璧君、女婿何文杰、秘书曾仲鸣,乘飞机离开重庆飞到昆明。当时汪精卫任国民党副总裁、政治会议主席、国防会议副主席,是仅次于蒋介石的全国第二号人物。临行前,他命令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化名代购的飞机票,而且极其保密。

19日下午3时15分,汪精卫、周佛海、陈璧君、曾仲鸣等一行10余人,经云南省龙云的帮助,从昆明机场起飞,抵达越南河内。汪精卫在河内发表了响应日本近卫首相声明的“艳电”(即29日)。在“艳电”中汪精卫公然颠倒黑白,为日寇侵华罪行辩解,从而公开叛国投敌,他当上了可耻的汉奸。在汪精卫集团中的其他成员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林柏生、高宗武等,也相继叛国投敌。陈公博曾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讲师;周佛海还当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少将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后逃到南京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

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早在1937年12月,就成立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总干事。该会宗旨是网罗文化界人士,进行反共降日宣传,为国民党政府对日可战可和制造舆论。在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周佛海就纠集一伙人,组成“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论调,并参与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秘密“和谈”活动。1938年10月,汪精卫、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就密商对日投降的条件和办法;汪、周还派高宗武、梅思平前往上海,与日本代表进行秘密谈判。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总参谋长”。

12月20日,蒋介石还蒙在鼓里,他乘飞机到陕西的武功主持军事会议。21日接到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电报,才知道汪

精卫叛逃河内。12月24日下午4时,蒋介石飞回重庆,住黄山官邸。

蒋刚到官邸,军统局戴笠也跟着到了,汇报了汪精卫离渝赴昆情况,蒋介石说:“立刻派人监视汪的行动。”

汪精卫于12月29日公开发出“艳电”,31日香港《华南日报》上发表了这份电报全文,其投降日本的面目暴露于天下。

由于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汪的突然出走河内,已为中外瞩目。当时蒋怕引起舆论误以为是受他之托密命去日媾和,于是立即让顾问端纳转告英、美驻华大使,声明:“汪兆铭无权 and 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意思和日本和谈,而且现在正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

12月27日,蒋介石给河内的汪精卫发去电报,劝其从速返回重庆。汪精卫非但不理睬蒋的电报,而且一心迷于与日本事前商定好的秘密出走计划,按《日华协议纪录》和《谅解事项》进行他的所谓的“转圜”。汪多次说:“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他认为这次出走,就是“转圜”的第一步。汪于28日致电重庆国民党中央及国防最高会议,电文中披露:“蒋总裁在陶德曼工作之际,曾允以日方条件为和平谈判之基础。”汪的电文揭露出蒋氏也曾想与日本“和谈”过之真相,但汪则以此洗清自己的罪责。

1939年元旦,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了汪精卫的“艳电”,最后一致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

2月17日夜,越南河内高朗街27号汪精卫住宅内灯火通明,汪精卫身着藏青色西服,两眼布满血丝,脸上略带倦意。他坐在会客室正中沙发上,当时在侧坐沙发上有一位神秘的重庆使者,此人身穿蓝长衫,他就是有名的贵州谷氏三兄弟之一的谷

正鼎。谷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原来参加过改组派。这次蒋介石派他携带汪精卫护照、一笔巨款，专程劝说汪精卫赴欧洲各国旅游、考察。此时的汪精卫已与日本订下成立“统一政府”的具体方案，哪里还听得进什么劝告。

谷正鼎苦口婆心地再陈利害，说：“政府同仁和蒋先生都希望先生三思。”汪精卫一听“蒋先生”这三个字，呼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说：“过去，他用各种办法排挤我、危害我、暗杀我，下流到绑我和陈璧君的票。这些我哪能忘记！我几次被迫流亡法国，他还要引渡我回国，那时何曾给过我护照和经费，一切都白费心思，他抗日抗到重庆，再抗就没有去处了，还不转圜！”

谷正鼎见汪叛国投敌已铁了心，只好打道回府向蒋介石交差。

话分两头。

再说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开始筹划跟踪汪精卫的行动。他想起手下一员大将、军统天津站站站长陈恭澍。陈恭澍精明强干，遇事沉着，是军统中的骨干。1933年在天津六国饭店击毙原湖南督军张敬尧，粉碎其叛国投敌的阴谋，就是他的杰作。戴笠从军统系统中挑选了陈恭澍、余乐醒、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步云、王鲁翘、魏春生等人，由他亲自带队，经香港到河内，进行了部署，然后指定陈恭澍为组长，总负其责，自己先行回国。

陈恭澍对汪精卫的人员和住处一一进行了了解，得知：虽汪数度迁移，但最后还是定居在高朗街27号原朱培德的寓所。周佛海、陶希圣住成都饭店，曾仲鸣住大陆饭店。

高朗街离闹市不远，环境幽雅，属河内高级住宅区。27号是一西式洋楼，上下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门前有一草坪，介于人行道与车行道之间。马路两旁植有一排棕榈

树。27号一边,有一小巷与高朗街交叉,走入小巷,是27号的后院与后门,再往前走,左拐右弯,就到了另一条街道。

河内工作指挥部虽以陈恭澍为主,但国民党驻河内领事曹师昂及其法国夫人也为他们提供各种秘密武器:如特制钢锯、匕首、钢斧、斯维斯近射程暗杀手枪等。他们设计了多种跟踪方案,在高朗街27号对面租下一间民房作临视,连汪精卫每天行踪、来往客人、佣人情况均作了监控。1939年3月19日凌晨2点,陈恭澍接到重庆军统戴笠发来的“制裁令”。

3月20日夜,高朗街27号汪精卫住宅二楼餐厅内,灯火辉煌,欢声笑语,这里正在开一个宴会,为曾仲鸣的夫人方君慧从香港来河内接风洗尘。汪精卫、曾仲鸣、陈璧君、方君慧等围坐在桌旁。桌上是丰盛的西餐,紫红色的法国红葡萄酒散发出诱人的阵阵芳香。他们正在举杯同饮,祝贺“中日携善”事业快要成功,汪精卫将到南京就职。曾仲鸣早年追随汪精卫,是汪的得力助手,自去年来河内后,里里外外全靠曾仲鸣应酬。今天面对方君慧的来到,曾仲鸣非常兴奋。汪精卫本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当年考过秀才,周佛海说他是“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衍敷衍,糊里糊涂”;日本人说汪精卫的性格“像猫一样的娇嫩”,是一个“女性化的男子”。果不其然,汪精卫为方君慧的光临感到高兴,他一会儿敬酒,一会儿给方君慧夹菜,百般献殷勤,简直与身份有点不相称。尽管陈璧君不停地用眼瞪他,他还是满不在乎。觥筹交错,到酒醉饭饱之时,已是晚11点了。宴会结束,曾仲鸣与方君慧离开坐位,准备回大陆饭店。汪精卫一看表觉得时间太晚,就劝他夫妻俩在他的住处安歇。汪精卫说:“上楼,上楼!”他边说边拉着曾仲鸣登上了三楼,把曾仲鸣夫妇让进自己的卧室。

3月21日凌晨2时30分左右,陈恭澍、唐英杰、王鲁翘、郑

邦国、张逢义、余鉴声六人偷偷摸摸地来到高朗街 27 号门前，他们转入后院翻身越墙跳进院内。这张逢义乃黄埔军校七期毕业生，在校练就一身武艺，单杠双杠、劈刺跳木马，样样全能。当时他一马当先，与枪法最准的王鲁翹飞步登上三楼，而余鉴声、唐英杰紧随其后，由郑邦国留在楼下担任掩护，以保证行刺后有退路。王突然发现有人推开房门探头观望，于是他“砰、砰”两声枪响，划破了长空。

静候在马路边汽车内的陈恭澍不由浑身一震，再侧耳细听，又是死一般寂静。等陈恭澍还没有回过神来，27 号院内楼上又连响了三声枪声。陈恭澍一听枪声就知那是左轮。

原来，这正是王鲁翹的左轮枪响。他一个箭步飞上三楼，见唐英杰在二楼，便发疯似地扑向汪精卫的卧室。当时，房门紧闭，扭把手扭也扭不开，于是他抡起钢斧，“咔嚓”一声把门劈开了一个洞。此时，余鉴声也来到门前，又在门上猛劈几下，门板上出现了见尺大的洞口。在昏暗的灯光下，见一个人趴在床下，前半身被床掩盖着，腰背及双腿露在床外，是个男人的样子。王鲁翹立刻判断此人就是汪精卫，因而在一刹那间，他扣动了扳机，一连三枪，枪枪命中。这就是刚才陈恭澍听到的第二次枪响。

刺客迅速撤离 27 号公寓，上了汽车。陈恭澍急踩马达，拉着王鲁翹一伙迅速地撤离了现场，等到法国警察赶来时，一个凶手也未抓到。

曾仲鸣做了替死鬼。那天，汪精卫正好不在他的卧室，而是让曾仲鸣夫妇睡在自己的床上。“河内行动”失败了。

4 月 25 日，日本派影佐祯昭等人用一艘“白光丸”货船秘密地护送汪精卫等一行离开河内，5 月 6 日到上海。5 月 31 日汪精卫亲赴日本东京，同日本政府会谈，拜会新首相平沼骐一郎和

重要阁员,乞求援助建立伪中央政府。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才得以正式成立。他以后卖国残民,为虎作伥的事那是后话,不提。正是:当年慷慨歌燕市,如今甘愿作汉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湘北大捷 关麟征气冲牛斗 昆仑之战 杜聿明打出威风

话说 1939 年 9 月，日军畑后六大将指挥陆海空三军 10 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我湘北大举进攻，企图占领长沙。第 9 战区代理司令官薛岳指挥 20 万兵力参战，利用赣北、鄂南、湘北的有利地形节节阻击，并以有力的部队侧击、各个击破的战术，从而挫败了敌人的进攻。至 10 月上旬，日军损失惨重，向北败退。这就是当时有名的湘北大捷，也叫第一次长沙会战。

当时坐镇湘北汨罗、平江一带的中国守军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关麟征将军，时任 15 集团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他成为黄埔军校学生中较早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学生之一，并被记一等功，时年 34 岁。15 集团军辖 3 个军，即张耀明的 52 军、夏楚中的 79 军、陈沛的 37 军。张、夏、陈三个军长都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学生，与关麟征同期，他们关系密切。在这三个军长中，张耀明是一直跟着总司令升迁的，可以说是师兄师弟，患难与共。

湘北日军集中了 6 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及海军陆战队一部于 9 月 18 日凌晨，集中炮火，向关麟征的第 15 集团军之 52 军发起猛烈攻击；同时，通城方面日军第 33 师团向南猛攻，妄图突破幕阜山余脉第 15 集团军之第 79 军阵地。

18 日、19 日两天，双方在下燕安、大桥岭等阵地反复争夺，

中国守军顽强作战；在失去阵地后，经过多次肉搏冲击，终于夺回。在草鞋岭阵地，史恩华营长率领 52 军 195 师 1311 团 3 营日夜坚守。20 日，日军集中一个旅团的炮火和兵力轮番猛烈地进攻，到 22 日黄昏，全营伤亡过半。在第二天太阳落山的时候，第 3 营全体官兵 500 余人全部牺牲。日军支队长奈良昂首走上山头，目睹中国官兵尸横遍野，忠魂袭人，他毕恭毕敬地向这些死难者脱帽躬身致敬。22 日，中国军队丢失草鞋岭、马家院等重要阵地，日军继续向南挺进，直逼新墙河南岸。

关麟征所属夏楚中的 79 军驻汨罗阵地遭到敌军的猛攻；另一路敌军在海空军掩护下，从营田附近登陆，猛攻陈沛 37 军防地。陈部之黄埔一期毕业的罗奇师长坚决抵抗，与敌肉搏，终于守住阵地。敌我双方自 9 月 18 日至 26 日在长沙以北的新墙河、汨罗江两岸血战 9 天，使敌人没有实现一举歼灭关麟征主力的企图。

关麟征把挥戈沙场的最后一页留在了湘北大地上。正当激战方酣之际，忽奉 9 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转中央电令，要关麟征率部向株州作战略转移，并将彭位仁的 73 军、李觉的 70 军、欧震的 4 军划归其指挥。关麟征为了使 6 个军 8 万余人顺利转进，他命令各军军部必须做好最后撤退的准备工作，师、团、营部仿此办理，致使转进途中部队井然有序。在转进途中，又接薛岳电令：“立即停止前进，回师北上以阻击来犯之敌。”他接到命令后，立即向 6 个军部发电报，另派专人持书面命令驰往各军部传达上级意图。当即命 37 军由汨罗渡河向铁路正面之敌反击；79 军向湘鄂公路方面敌人侧背攻击；52 军进入平江附近向敌人反击；其他各军和地方部队配合全面反攻。敌军遭受关麟征的“超越追击”，全线溃退，并向南江桥、新墙河方向逃窜。中国军乘胜追击，于 10 月 13 日，将来犯之敌全部击溃。当日，关麟征至蒋

介石电云：

特急。

重庆委员长蒋：膺密。据报：（一）、进犯长沙之敌于溃退时，接到其空军投下通讯袋，内云：孤军深入，处处受伏。敌军遂风声鹤唳，顿时哗然，溃退益形混乱。（二）、敌军此次所到之处，残暴逾常，奸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虽猪牛皆不免其残杀，在新市、金井一带，见人皆杀，妇女即奸，并在金井曾将一孕妇奸后复剖腹取子，惨不忍睹。

· 谨闻

职关麟征叩

10月14日，湘北、赣北、鄂南恢复战前态势，双方仍然夹岸于新墙河而对峙。

湘北大捷，前后仅一个月，共歼敌4万余官兵，日军6师团联队长山村治雄被击毙。黄埔军校武岗二分校一位学生的家长，从战场我军军官尸体上收集的二分校毕业证章达数百枚之多，可见我军在这次湘北大捷中亦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完成了薛岳制定的《在长沙以北地区诱敌歼灭战之指导方案》中的各项任务。9月30日，日本侵华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乘飞机在长沙上空盘旋，他茫然感到寻找薛岳9战区主力予以歼灭的计划的不可实施性；到10月1日，他下令全线退却。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追述道：“我军的主力既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冈村宁次制定的原定计划《湘赣作战》方针是：“为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奔袭攻击，以期在最短

时间内,捕捉敌军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然而冈村宁次不但没有能够消灭我军的主力,反而损兵折将,大败而逃。

湘北大捷,再一次显示了关麟征的军事指挥才能。而关麟征则是黄埔军校将领中第一个抗日英雄。1933年2月,关麟征已升任为25师师长,随所在的17军开赴长城古北口抗日。3月9日在到达密云以北的石匣镇时,就收到何应钦的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待命。”他审时度势,毅然“抗命”,因为古北口是军事要塞,万一失守,则南天门防线就将不保,又将危及友军,威胁平津,所以他立即率部到古北口前线接防。为了夺取潮河支流对岸高地的有利制高点,他亲率149团猛烈地反击日军,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惨烈。敌人的枪榴弹把关麟征炸伤5处,浑身是血。关身边有10余个士兵壮烈牺牲,他仍力战不退,从容指挥全师官兵英勇杀敌,终于歼敌2000余人,占领了高地。国民政府鉴于关麟征战功卓著,奖给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亲自撰写社论《爱国男儿,血洒疆场》,文章大大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同他并肩作战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他的同学、第2师师长黄杰赶来接防,让25师开往北平郊区休整,关麟征住院养伤。当时黄杰与关麟征在古北口战地合影留念,并赋诗一首为赠。诗曰:

长城殄虏去,并轡入雄图。
血肉飞天堑,烽烟混太虚。
关东方失险,古北又成墟。
都说君无敌,投艰我不如。

从此,日寇遇到关麟征,畏之如虎;而关麟征血战古北口的事迹,广为群众称赞。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关麟征已升任52军军长。他率领全军在平汉线北段从事抗战，并转战山东、河南抗日战场，打得日寇从邯郸、武安等地败退。同时他还组织梁伟智一营夜袭日寇机场，烧毁敌方飞机十多架，炸毁汽油库。关善用夜战，对敌强攻硬打，放火、炮轰，打得日寇昼夜不安、狼狈地向枣庄、峰县逃窜。

在台儿庄大捷后，关麟征又升任32军团军团长。曾和他激战过的日寇将领板垣征四郎说：“关麟征的一个军相当于中国普通军队的十个军。”蒋介石在武汉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会议上说：“中国军队如果都像52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国内军事评论家也赞誉关麟征是“关铁拳”。在台儿庄大捷后，关率部参加了邳北防御战，伏击日军，大获全胜。谢冰心、郁达夫等进步文化人士上前线慰问。郁达夫即席赋词祝捷：

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庄外夕阳悬。
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邳。

曾在黄埔军校五期学习过的现代诗人臧克家也赋新诗祝关麟征有勇有谋，不愧为大将风度。

说也奇怪，关麟征东征、北伐、抗日，打仗猛如虎，而且每战必胜。但每当他与红军作战，奉命“剿共”时，他却连吃败仗。在江西中央苏区“剿共”时，他被他的师弟、红一方面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林彪打得丢盔卸甲，只好甘拜下风。

1945年10月，蒋介石将关麟征派往云南担任警备司令之职。12月1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冲进昆明西南联大，镇压要求和平、反内战、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师生，制造了“一二·一”昆明惨案，其间有四名教师与学生遇害。当时，群情激愤，要求惩办凶手。蒋介石便将云南省代主席李宗

黄和关麟征抛出，作为替罪羊。当时他给关的处分是“停职议处”；如果说李宗黄一手策划，大权在握，难辞其咎，但关麟征才上任1个月就被撤职，实在太冤枉。

关麟征于1946年7月，被调至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即成都黄埔军校）任中将教育长，从此他就失去了兵权。笔者于1947年7月考入黄埔军校22期入伍时，关麟征升为校长。黄埔军校学生当黄埔军校校长的，关麟征是第一位。先父吴起舞时任黄埔军校教育处少将副处长，与关共事多年。关在校期间，推行一系列开明措施，大大扭转了校风，如废除体罚，尊重人格；赏由下起，罚自上先；改革教学，学练结合；人事公平，经济公开等，深受师生的好评。关麟征每逢总理纪念周，他总是提前到达，成都市区内各营地师生近6000余人要在同一时间集合完毕，难度确实很大。有一次，总值日官、教育处处长李永中少将迟两分钟未调度好队伍，当即罚在“中正堂”前立正3个小时，这时偏巧又下大雨，他浑身湿透。这位黄埔三期毕业、德国陆军学校21期毕业的陆军少将，生平第一次受到黄埔师兄的惩罚。然而他不但没有怨气，而且还庆幸这是在学校，如果是在战场，也许他连小命也要搭上。

关麟征没有参加过内战。在抗战胜利后，原拟调关到东北任九省保安司令长官，由于陈诚设置障碍，使关未能赴任。1948年8月，在江河日下的形势下，蒋介石对刘峙、顾祝同两位“八大金刚”之成员想用又不顶用，这时他想起关麟征，并请关出任陆军总司令，以挽回败局。报纸上已公布，关麟征也拜会了顾祝同，商讨交接事宜，但国防部以“溪口电话手令遗失”为借口，使关麟征无法就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李宗仁登上总统宝座后，关麟征见时局日蹙，国民党气数已定，便宣布辞职，退出军界，随后将一家老小送至香港定居。1948年11月，他在其夫

人张某(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等人的陪同下,由成都乘飞机去台湾。途中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时,他告诉同机朋友,借要去探望在港羈病的父亲,随后去台之故,因而便与夫人同下飞机。就这样他躲过了特务的监视,从此在香港当了寓公。

在香港期间,关麟征深居简出,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不会见新闻记者,不发表任何言论,也不参加“第三势力”组织,更不会见军界故旧和参加黄埔师生聚会,过着“隐士”生活。

关麟征是陕西户县人,简历前已介绍,不再赘述。在他到成都黄埔军校后,悉心研究怀素和尚的书法和于右任的《千字文》书帖。他平素就爱草书。他的书法挥洒自如,刚毅坚韧之气跃然纸上,成都各界人士慕名索求他的书法字帖者络绎不绝。那时,名画家周千秋(现在美国开设中加美术馆)任关的秘书。周作画,关题跋,将这些画和他自己写的单条、对联等一齐裱装出来,作为黄埔军校历次校阅、考试中优秀单位或个人的奖品,为学校节省了一笔开支。笔者祖父60寿诞,先父曾请关麟征题词写成寿联,可惜在解放后失散,实为遗憾。笔者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接过关亲自授予的“勤学”奖章。关麟征不喝酒、不吸烟、不打牌,而对我国古书《春秋》、《易经》、《战国策》、《孙子兵法》却有所偏爱。当年在成都黄埔军校曾由关主讲《孙子兵法》,听讲者达数千人之多。

关虽隐居香港,但很关心祖国建设,思念故乡亲人。1979年5月,其妹关梧枝去港探亲,他异常高兴,很爱听他妹妹叙说大陆解放后的变化。当他得知其妹当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时,他给大陆故旧写信:“梧枝妹谬获拔擢,尚望兄多多指教,使无负于政府和人民之托,是为至盼。”他一再对关梧枝说:“我是炎黄子孙,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啊!”

1980年8月1日,关麟征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病逝于

香港伊丽莎白医院,享年75岁。医生护士在抢救中发现他胸前伤痕累累,关夫人向医生说:“这些伤痕全是他抗日浴血奋战所留。”

黄埔一期毕业的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得知关麟征去世,立即给其家属发了唁电:“噩耗传来,至为悲痛,黄埔同窗,怀念不已,特此致哀,诸斋节哀。”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都登载了关麟征逝世的消息和简历。举殡之日,黄埔军校各期留港同学及亲友数百人参加执紼,新华社香港分社、全国政协、徐向前元帅等单位和个人送了花圈。黄埔军校出身的一代抗日名将关麟征没有反共,这是他能够得到人民谅解的主要原因。他曾在诗中写道:“解甲还初服,常怀楚客忧;愤挥董狐笔,正义凛千秋。”

在关麟征血战长城古北口时,他的搭档、25师副师长,也是陕西人,此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即大名鼎鼎的杜聿明。杜聿明字光亭,1904年生于陕西米脂县。古北口战役一结束,他就进入南京黄埔军校高教班学习。学习期间,经同乡、黄埔一期同学马志超的介绍,他正式加入了复兴社,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复兴社分子之一。由于杜聿明通晓军事,故未具体参加过复兴社的活动。

杜聿明从黄埔军校高教班毕业后,经徐庭瑶的推荐,遂到陆军机械化学校任少将队长;不久,被蒋介石委任为陆军装甲兵团第一任团长。在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杜聿明率装甲团撤到湖南湘潭整训,后来,该团扩编为第200师,成为当时中国惟一的一个装甲师。该师配备了苏联9吨半战车80辆、德国造朋斯柴油车百余辆、美国大道奇卡车400余辆、美国哈雷2轮、3轮摩托车40余辆,一律用卡宾冲锋枪。200师副师长由黄埔军校二期毕

业的邱清泉担任。邱浙江永嘉人,1935年曾赴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是一位有名的军事家。参谋长由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廖耀湘担任,他乃湖南邵阳人,于1930年赴法国陆军大学学习机械化骑兵专业,实为黄埔军校的后起之秀。

陆军200师的编制相当一个普通军的编制。师司令部下设参谋、副官、军需、机械等八个处,师直辖两个战车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战车防御炮团;另有直属特务营、通讯营、搜索营、工兵营及修理厂、军医院等,全师总兵力约两万余人。

1938年12月,第200师扩编为新编11军,后改编为第5军,杜聿明任军长,此时,他年仅34岁。第5军下辖3个师:200师师长、黄埔三期毕业的戴安澜;荣誉第1师师长、黄埔一期毕业的郑洞国;新编第22师师长、黄埔二期毕业的邱清泉。中国第一个由黄埔军校少壮派将领组成的惟一的1个机械化军,就这样诞生了。杜聿明将部队移驻广西全州及湖南零陵、东安一带整训。在整训中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等口号,并要求全军官兵人人做到“五除”(除骄、除惰、除伪、除欲、除恶)、“三习”(习精、习诚、习勤)。其兵员多本来自招收的初中学生。他除了要求全军官兵能熟练操作机械车辆驾驶、修理技术外,还将训练重点转移到步兵师的战术训练上。他认为战场上的胜负,阵地上的攻防,完全要靠步兵来完成,所以,他非常重视士兵的体格、射击、刺杀、投弹、夜战、近战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每次到各团、营、连观看士兵训练时,他均同士兵用步枪、轻机枪射击进行比赛,提出谁打了满分,当场发奖金。当发现在练兵方面有发明创造或先进典型时,他就召开师、团、营长会议传达、推广、学习,因而杜聿明成为当时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1939年3月,重庆军委会派白崇禧检阅第5军后,将他的军事训练考评列为全国第一,所以,第5军在国民党军界中

又赢得了“天之骄子”、“铁甲雄师”的美称。

从1939年夏天开始,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南海地区调动频繁,并且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11月中旬,日军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和佐世保海军陆战队,乘坐70余艘舰船,顶着狂风暴雨和滔天巨浪,在广西钦州湾强行登陆。17日攻占防城、钦县;21日开始进攻南宁,并与国民党31军、46军展开了激战。

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50公里,峰峦重叠,山坡陡峭,为北宋大将狄青元宵夜智袭侬智高的古战场,是南宁的屏障,乃敌我必争的军事要冲。如果昆仑关失守,那么日军就可打通西南,截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从而使我军大批军用物资无法进口。

南宁告急。重庆统帅部获悉后,焦虑万分,蒋介石接受白崇禧的建议,决定将杜聿明的第5军投入昆仑关战斗,以戴安澜的200师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开动。白崇禧通过电话令柳州一线居民每家门口预备一桌丰盛的饭菜,候200师一到,立刻就可下车吃饭。

11月23日,桂南日军过郁江,24日南宁失守,第5军200师600团也于23日抵二塘附近。24日该团即与敌人在头塘、二塘之间遭遇,激战两天两夜,团长邵--之不幸牺牲,副团长文模负重伤,团附吴其升又中弹殉国,当600团冲出重围后,已伤亡过半。正在危急时刻,200师主力及时赶到了现场。598团团团长高吉人在八塘附近阵地上,与北犯的日军第5师团大战七天七夜,击毙大批日军。

12月2日晨,夏威指挥的16集团军3个师在200师4辆坦克的掩护下,向日军发起进攻,日军被迫后撤。

白崇禧向报界宣称:“敌登陆海口,进犯桂南,企图切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路,我军对此早有准备,将诱敌深入,给予重大打击。”

12月4日,日军攻占了战略要地昆仑关。日军第5师团长今村均中将说:“200师是铁军,昆仑关是天险,也不过如此,支那军队岂是我大日本皇军的对手?”在骄傲自满的思想支配下,今村师团长留下第21旅团42联队松本总三郎的一个大队驻守昆仑关,主力撤回南宁布防。

而此时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将反攻昆仑关的兵力部署如下:

杜聿明的第5军(第9军之1师归该军)属北路军,攻击昆仑关正面之敌;以夏威的第16集团军为西路军,攻击高峰隘之敌;以蔡廷锴的131师、138两师,以灵山陆屋为根据地,破坏邕钦路,阻击敌增援部队。

12月16日中午,白崇禧、陈诚来到杜聿明的指挥所视察军情。晤面后,白崇禧比较客气,很谦虚,仅就作战应注意事项略加指示。陈辞修则态度严厉,他当着杜聿明的面,限令各部队必须按照预定计划,如期攻克昆仑关,直下南宁。杜聿明连声称是,胸有成竹。

12月18日,总攻开始。正面主攻部队由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率领,在战车、大炮火力掩护下,对昆仑关敌阵地进行猛烈地攻击。其间多处两军接触,进行激烈的白刃战,刺刀见红,手榴弹响成一片。郑洞国的这个师全是由抗战初期负伤归队的官兵组成,故称荣誉第1师。这个师的官兵对日军恨之人骨,他们带着复仇的怒火上阵,个个英勇无比,在阵地上杀声震天,像潮水般扑向日军阵地。炮群怒吼,地动山摇,经过激战,郑洞国师终于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各团又乘势进行夜袭,战斗彻夜未停,相继攻克了老毛岭、万福村等要地。

荣誉1师与日军21旅团激战的同时,担任预备队的200师,也同日本海军航空兵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之战。日飞机对200师疯狂地轰炸,企图以猛烈的空中攻击来阻击200师投入昆

仑关战斗。

戴安澜奉杜聿明的命令，对日机用高射炮高射机枪对空还击。日飞机被打得凌空开花，有的拖着浓烟烈火一头栽进了山谷。在击落了几架敌机后，200师连夜快速推进，终于抵达昆仑关前。598团团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高吉人率领全团一马当先，立即冲入敌阵。重炮、坦克炮、机枪一路狂吼着，他们用钢铁和火焰开辟出一条“死亡长廊”，杀出一条血路，夺取了653、600两个高地，打开了通往昆仑关的大门。在激战中，他们击毁了日军坦克2辆、火炮4门，毙伤日军百余名。戴安澜下令599团团长、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柳树人率部迅速投入战斗，不能给日军以喘息之机。599团利用598团打开的突破口，在坦克的掩护下，沿公路一鼓作气，长驱直入，于18日深夜克复了昆仑关。

此时，新编22师师长邱清泉率装甲部队，已从昆仑关以北的思垅一带，越过丛山峻岭，经太平村，向昆仑关南面的五塘、六塘地区穿插前进。当邱清泉的装甲师突然出现在昆仑关侧后的五塘、六塘地区时，日军惊慌失措，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笨重的坦克竟然会从险峻崎岖的大山和茂密的丛林中突然冒出来。日军在坦克隆隆声中，丢弃碉堡工事，四散逃命。

200师副师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彭壁生指挥第5军补充1、2团也穿插在昆仑山的侧后方，向驻守九塘的日军展开了猛烈地攻击。

杜聿明率军指挥所人员亲临前线督战，随行的一位日本反战同盟人士鹿地亘先生，夜间用日语向敌人广播，瓦解其军心。

日军5师团号称“钢军”，曾在日俄战争中风云一时，侵华战争中它也多次充当急先锋，每次战役都有5师团出现。而现在，中村均师团长才明白自己遇上了真正强劲的对手了，他急忙派出21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指挥步兵第21联队主力于18日

下午从南宁乘汽车出发,火速增援昆仑关。三木大佐率领的 21 联队开到五塘、六塘地区时,遭到了邱清泉的阻击,敌军汽车被我坦克撞翻,伤亡惨重。

19 日午后,日军在大批飞机掩护下,进行反攻,昆仑关又被日军夺去。此后,双方反复争夺昆仑关,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双方伤亡皆甚重。

敌我两军就昆仑关要隘反复争夺,杜聿明运用灵活战术,机动作战,随时调整作战部署。他派郑洞国荣誉 1 师一部袭击敌侧,深入八塘。22 日,该部一度突入敌阵,彭壁生支队进入敌阵后,邕宾公路上的敌军已被截成数段,但其仍然殊死战斗,固守阵地,并有不断增援。荣 1 师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至此敌军开始呈现动摇之态。这时,杜聿明抓紧战机,转移兵力于昆仑关以南之罗塘、同兴堡、界首堡及 653 高地,彻底打击昆仑关残敌。

昆仑关残敌被我军四面包围,成为瓮中之鳖,但他们仍然凭着“钢军”武士道精神和所据优势地形,在山头山腹构筑堡垒,互相侧防,组成严密火网,顽强抵抗。敌机每天在昆仑关上空用降落伞补给粮弹,有时空降几个士兵维持战斗。

杜聿明采取稳步推进的“要塞攻击法”打击被包围的敌人,敌人只能坐着等死,束手无策,睁着眼地看着 5 军一个一个据点地收拾他们。在罗塘高地拿下之后,日军 21 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前往驰援,在九塘东北地区被我荣 1 师 3 团部队击中腹部而负重伤。此时在九塘与昆仑关被围之敌,有 3 个步兵联队、1 个骑兵联队,已统一交由第 42 联队长板田原一大佐指挥。24 日傍晚,我 5 军再次向守敌猛烈炮击。当时 21 旅团的军医正在一间民房为中村正雄进行腹部大手术,一颗炮弹炸中中村手术室的房顶,屋内处处是硝烟与尘土,敌军用身体护住切开的中村腹

部,手术至20时30分才做完,但第二天早上5时18分,中村即死于九塘。

12月29日夜,30日凌晨和31日拂晓,邱清泉的新22师邓林军团以凌厉的攻势,三度突入昆仑关口。31日午前11时20分,终于完全攻克了昆仑关。随后,新22师又与荣1师配合攻占了441高地,从而彻底肃清了残余的日军。

第5军在杜聿明军长的指挥下终于用辉煌的胜利,迎来了1940年的元旦。

昆仑关战役,日军损失空前巨大。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日军5师团12旅团长中村正雄、42联队长坂田原一和21联队长三木吉之助、1大队、2大队、3大队的长官均被我军击毙。该旅团班长以上的士官死亡85%,士兵死亡4000余人,被俘100余人,同时缴获战马79匹、山炮10门、野炮12门、战防炮10门、轻机枪102挺、重机枪80挺、步枪2000余支。此役中国军队伤亡14000多人,敌方伤亡8100余人。日军第5师团长今村均中将,在战后他在向统帅部的报告中说:蒋军“值得我军敬意”。第5军在昆仑关大战中也付出沉重的代价,仅荣1师就伤亡军官131名,士兵3272名。

敌12旅团长中村正雄临死前在其日记中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12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军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更强的军队。”

昆仑关战役捷报传出,民心振奋,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前来5军采访。当时的重庆《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

“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自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

行列。”

第5军经过休整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第5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亲笔写了400多个字的悼念碑文和一幅挽联：“血花悦舞，苦战兼旬，攻克昆仑寒敌胆；华表巍峨，扬威万里，待清倭寇慰忠魂。”他还对记者说：

“这次抗战胜利，各位在战场上都亲眼看到了，请如实宣传，用不着格外夸大，但有一点是需要着重宣传的，那就是要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

战后的昆仑关，余烟袅袅，满目疮痍，一片狼藉。第5军200师师长戴安澜满怀胜利的喜悦巡视战场后，不禁心血来潮，诗兴大发，遂赋七绝一首：

仙女山头树将旗，南来顽寇尽披靡。
等闲试向云端望，倩影翩翩舞彩衣。

自抗战以来，国民党曾在台儿庄、湘北以攻势防御战略击败敌人。昆仑关之战是第5军建军后的第一仗。初出茅庐的第5军在这一仗中锋芒毕露，大显身手，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充分显示了机械化军的强大威力。这一仗奠定了第5军在国民党军中作为王牌主力的地位，杜聿明这位黄埔少壮派将领的名声从此也扬播中外，成为抗日名将之一。当然，昆仑关不久以后又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将领、黄埔一期毕业的2军9师中将师长郑作民，在1940年2月防守昆仑关时被日军包围，在率部突围时，郑不幸中弹牺牲。正是：“将军神武战昆仑，十月朔风夜点兵。喜见铁骑驱弩马，笑看众志成城。聚歼倭寇荒郊哭，格毙酋首神鬼惊。漫道荣民伤累累，论功胜过亚夫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曲线救国 唐生明神秘莫测 沉湎一气 蒋汪日联手反共

话说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爱国捐躯的何止千万！甚至连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寺造大将都认为：“只要消灭了以黄埔少壮派为首的中央军，蒋介石就会投降。”

其实，自从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以来，蒋介石就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打算，只是日本人开价太高，且条件苛刻，蒋介石才不得不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决心抗战。从1938年起，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中国在人力、物力上消耗严重，而蒋介石这时的悲观失败主义情绪亦十分严重，虽然他反对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公开投敌，但他还是没有忘记寻找机会和日本接触，以求取得在必要时的妥协让步。

在黄埔学生中，有一位学生就是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推荐，蒋介石亲自批准前往敌占区上海从事所谓“特殊使命”的天子门生。这个人是谁呢？这人就是当时名噪一时的风流特使、黄埔四期毕业的唐生明。

唐生明号季澧，1906年出生于湖南省东安县白木町。他的祖父曾任满清政府广西提督，其长兄唐生智是民国初年湖南最大的实力派。唐生明从小读私塾，性格开放不羁，经常导演恶作剧，戏弄塾师，后来进入长沙明德学堂，修业小学，还在湖南第一

师范附小上学,毛泽东曾任过他的老师。唐生明小学毕业后,进入长沙兴中会中学,1924年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在湘军第3师任上尉参谋。1926年3月,唐生明作为唐生智的私人代表派驻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他受革命影响,未经考试,由其兄唐生智介绍,插班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当时陈赓就是他的那个1团7连连长。由于有蒋介石的吩咐,陈赓把唐生明当作一个特殊学生,处处给予照顾。同学们见唐生明长兄是唐生智,当大官,家财万贯,又因为唐生明摆阔气,花钱如流水,所以他被人称为“花花公子”。

唐生明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到四川广汉在其兄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任学兵总队副总队长,后任第8军警卫团团长。真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唐生明后来还当了第8军副军长、代理军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唐生明和陈赓等黄埔学生在武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1927年秋,毛泽东准备在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但起义军只有梭标大刀,缺少枪支。陈赓、罗瑞卿、陶铸等通过黄埔同学的关系,求助于唐生明。唐生明非常讲义气,他亲率部队由汉口坐火车南下,到湖南浏阳文家市将步枪300支、子弹近万发送给了起义部队。他长兄唐生智讨蒋战败,他的部队也被李宗仁改编,任35军独立团团团长,后升副师长。1932年初,唐生智与蒋同归于好。其被任命为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唐生明则在其兄手下任中将参议,时年才26岁。

在抗战爆发后,唐生明调长沙任警备司令,1938年初改任常桃警备司令,与酆悌对调。11月12日“长沙大火”事件后,酆悌被蒋介石枪毙。唐生明知道此事后,嘲讽自己是“福将”。唐生明在常德、桃源任警备司令历时两年,感到在这湘西偏僻之地不利于实现自己的理想,又不能满足生活上的享受,因而很想换

个地方。唐生明的好友、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知道后,几次从重庆来电催他赴渝,其电文曰:“闻兄有倦勤之意,希望先将家务安顿妥当后,即行来渝,因有要事当面商议……。”原来,重庆早已通知9战区薛岳下达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却未对唐生明的职务作出安排,唐生明赶往长沙会见薛岳。薛岳也说:“这我也不清楚,委员长已来电,要你去重庆。”

唐生明把刚生贵子的妻子、上海电影明星徐来送回东安老家,适逢老父唐承绪病逝,唐在家办完丧事后,便启程赴重庆。唐到重庆后,戴笠郑重地对唐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同我讲过好几次了,只有你能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一个适当的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适宜。”对派他去敌后工作,唐生明犹豫不决,但在戴笠的一再说服和承担安全保证后,勉强接受了任务。这次去上海,戴笠决定先派唐生明夫人徐来的秘书张素贞打头阵,让张素贞去找上海的大企业家、唐生明的挚友潘三省,对其说:唐生明受不了大后方的苦,想到上海定居。再让潘三省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为唐生明去上海做好舆论准备。

张素贞说:“这么说,戴先生是想让四哥(唐在家排行第4,故称四哥)全家都在上海定居喽!”戴笠答道:“当然,如果季澧一个人去,他们肯定会怀疑。”唐生明一听,急了,连连摆手说:“怎么连我老婆孩子都要押上?不行,不行。”

戴笠说:“季澧兄,你我交往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有负于你?如果没有十分把握,我能把你往火坑里推?我如果明知有危险,还让你带上嫂夫人和孩子,那我还算个人吗?”

唐生明再三声明:“我去只是以朋友的身份去帮忙,让我做你的部下,我可不干。”

戴笠满口答应,因为他知道唐生明是原来上海有名的公子哥儿,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交情很深,他去当“寓公”,而且携家带口,绝不会引起汪伪政府的怀疑。

第二天,戴笠带唐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室求见。蒋见唐还有顾虑,就进一步说服他:“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临行前,蒋介石把他和宋美龄的合影带给唐母惠存,并拨给唐1万元特别费。

戴笠告诉唐生明:“你去上海先不带什么任务,只是先跟汪精卫等公开来往,等取得他们信任后,再逐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戴又说:“利用你过去的人事关系,公开和汉奸们往来,慢慢取得他们的信任,进而转达蒋校长的宽大政策和对他们的关心,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也知道某些军统特工是迫不得已才投敌的;有些人没有来得及撤退就陷入了泥坑,是可以谅解的。”最后,戴笠分析了江南一带的情况后说:“这个地区敌后活动的力量除我们的忠义救国军外,大部分地方都被新四军占领。你去了之后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新四军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

事后戴笠在上海拨了一部专用电台给唐生明使用。由于戴笠的情妇余佩恒是由唐生明介绍的,关系非同寻常,因此,戴笠化名为余龙,唐生明化名为余化龙,两人随即商定了联络的办法和密码。

经过两三个月的准备,唐生明带着夫人徐来及一对儿女,于1940年中秋之际,登上了去上海的“虎脱总统”号轮船。

潘三省前往码头接风。此人既好玩乐,又善于钻营。在抗战前夕,他曾任亚利洋行买办和上海集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沦为孤岛后,他又瞅准时机组织了上海轮船公

司,随后又在华界及公共租界开设亚洲总会、华人总会、兆丰俱乐部等好几个规模宏大、设备豪华的大赌场、夜总会。他与周佛海、汪伪特工总部李士群、吴四宝都是朋友。潘将唐一家人安排在自己开纳路的一幢豪华花园洋楼里。当天晚上,潘三省举办鸡尾酒会为唐生明夫妇接风洗尘。上海新老朋友都见了面,其中有原在上海的老朋友张善琨,此人为上海中华影业联合制片厂厂长,他带来几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她们称唐夫人徐来为“大阿姐”、称唐为“大姐夫”。另外,还有汪伪政府特工总部部长李士群、李士群夫人叶吉卿;特工总部警卫大队长吴四宝及其夫人余爱珍等。

李士群何许人也?此人出生贫寒,早年在上海求学时曾秘密参加过中共地下党,与叶吉卿一道为中共地下交通员。当地,叶吉卿家境较为富裕,在上海念大学时,几乎完全负担李士群的生活费用。1927年李士群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不久,被陈立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 C.C.)逮捕。李士群贪生怕死,叛党投敌,当上了中统上海区直属情报员,而他的公开身份则是上海《社会新闻报》编辑。他为了索取中共地下党的情报,玩起了反革命两面手法,谎称自己参加“C.C.”是为了打人敌人内部,更好地为党工作。中共中央特科为了考验他,让他处决与他一同在《社会新闻报》工作的中共叛徒丁默邨。李士群却把中共交给他的任务全盘告诉了丁默邨。为了继续欺骗党组织,他与丁默邨商量,让“C.C.”上海区长马绍武当了替死鬼。事后,“C.C.”认为李士群、丁默邨嫌疑最大,遂将其关押审讯。李士群被押往南京监狱,尝遍了一切严刑。叶吉卿为救李士群,不但花了大量钱财,而且还委身于“C.C.”调查科长徐恩曾,这样李士群才获得自由。抗战开始后,李士群从南京逃往汉口,被分配在株萍铁路调查室工作,后升为主任。因他结识了一

位日本女间谍,便逃往香港,由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介绍给日本驻上海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及大特务土肥原。李士群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组织了一支汉奸队伍,由日本人供应武器。当时,李士群便找来了沪西的流氓头子吴四宝,拉拢许多地痞流氓成立了汉奸特务行动队,来配合日本宪兵工作。1940年3月30日,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自任代理主席,主席一职预留给蒋介石,人称“国府还都”。在汪伪政权建立后,组建了“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任周佛海为主任委员,丁默邨、李士群为副主任委员;同时设立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将原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在沪西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别墅作为特工总部办公地址,故有“76号魔窟”之称。李士群的主要任务是在日本宪兵的控制下,对重庆方面派来的中统、军统分子进行捕杀、诱降,企图称霸一方。李士群其人阴险狡诈,对来自重庆的国民党中将唐生明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今天会面,李士群就是想摸摸底,所以,他尽量与唐生明套近乎。初次见面,尽管双方都有所警觉,但李没有探出唐生明全家迁沪的真实意图。

第二天,李士群在兆丰俱乐部设宴为唐生明夫妇接风,劝唐生明参加“和平运动”,为国家民族着想。唐生明早有思想准备,对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盘问、审查,他都能巧妙地成功地应付过去。汪精卫、周佛海在得知唐生明携家带口投奔上海后,也邀请唐生明专程来南京晤面。

汪精卫曾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周佛海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总教官,他俩分别邀请唐生明夫妇见面并宴会。汪精卫一见唐生明,就兴奋地拉着唐的手笑道:“季澧先生,你来得好啊!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埔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就可以建立军队啦!”宴席间,汪、唐频频举杯,互诉衷肠。汪说:“蒋介石把我逼得跑到这里,反过来说我卖国投敌,我卖什么

国？我现在是把他丢掉不管的国土捡回来，让沦陷区的人民少受些罪嘛！我们搞和平运动也是为了救国而和平，实现和平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嘛。他标榜抗战到底，实际上是想利用抗战来实现个人独裁。这几年他总是用地方军队打头阵，把自己的黄埔嫡系留在后方补充训练。他这样下去，中国非亡在他手中不可。”

汪精卫越说越激动：“我发艳电，这也是一个救国方法嘛！我早就说过，战事延长，中国愈穷，财富愈尽，共产党人愈会趁火打劫，扩张势力。我搞和平运动，就是要联合日本反共救国，所以，我在党旗上加上‘和平、反共、救国’六个大字。”

宴会上，汪邀请唐在军委会任职，唐以种种借口推诿之。双方的斗争与交锋，这才刚刚开始。

1940年10月1日上海《申报》、《平报》的头版头条，以最醒目的标题登出一条震惊中外的新闻：

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被任军事委员会委员要职。

重庆方面也来个假戏真做，连续10天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等大报刊登唐生智启事：

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

这个“启事”由戴笠的情妇、机要秘书余佩恒捉刀。此事当

然事前也经过唐生智过目首肯，不过，唐生智这位有名的抗日英雄却因此而背“黑锅”，因为有了这么个汉奸弟弟，他是有口难言，甚至连在母亲面前，也不敢吐露真情。

唐生明自南京就职返沪后，便从潘三省家搬进了上海金神父路叶蓬送给他的住宅。这幢二层楼房最早是唐生智的私产，上海沦陷后，房子一直空着，所以叶蓬便来做个顺水人情，美其名曰“送”也。

唐生明被拉下水，上了汪精卫的贼船后，虽然取得了日本人及汪伪政权人士的信任，但公众不明真相，他这个“汉奸”帽子是想摘也摘不掉了。他心里明白，军统是不会对他下毒手的，但最近接连发生的事又不能不使他心中多了一层顾虑。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在家中被仆人朱升用菜刀砍死了，这说明当汉奸人人痛恨。如果有人象行刺傅筱庵一样行刺他话，岂不是冤枉？

张素贞担任唐生明夫人徐来的私人秘书，是由戴笠推荐的，张素贞不仅精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楚，分析问题往往比唐氏夫妇还高出一筹。唐生明家里的事妻子照料得井井有条，而在外面的事，张素贞又替他家想得十分周到。更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外面的人常戏称张素贞是唐生明身份不明的小妾，但妻子徐来从不吃她的醋，俩人相处情同姐妹。当然，张素贞是军统，这一点连唐生明也蒙在鼓里。

唐生明不久又被李士群推荐为伪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这个委员会不仅要消灭江南一带的新四军，而且还要消灭由军统领导组织的忠义救国军。汪精卫之所以如此安排唐生明，是为了让唐既得罪共产党，又得罪蒋介石，并以此可让唐死心塌地跟自己走。

1941年7月，唐生明随李士群坐镇苏州，指挥“清乡”。唐借帮助汪精卫整训伪军之机，将忠义救国军分子安插在伪军中，

平时，把军统特务得到的有关新四军及游击队活动的情报转交日本人和李士群，让他们去“清剿”，同时，通知忠义救国军，使其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但令唐生明奇怪的是，他送去的情报，新四军也能知道内容，往往造成日伪军扑空。

为何新四军能及早获悉日伪“清乡”信息呢？原来新四军也派人打入李士群的“76号”魔窟，此人就是由潘汉年、廖承志从中牵线打入伪特工总部的关露。关露又名胡寿楣，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毕业，“左联”成员，地下党员。她在李士群手下担任联络工作，所以，日伪的重要情报，她及时秘密转告给新四军，从而避免了敌人一次次的“清剿”。

1941年9月，汪精卫陪同日本顾问影佐祯昭少将来视察苏州清乡试验区，并要检阅伪和平军，大检阅总指挥官由唐生明担任。唐生明是老牌的陆军中将，却要在大检阅时，当着几千伪军、保安队士兵和众多记者、摄影师的而，向军衔比自己低的日本顾问敬礼，实在太丢面子，为此，他冥思苦想了好几天，也没有想出好办法。幸亏夫人徐来一句话提醒了他。徐来嗔笑着说：“看你那副憨样！这事也值得你犯难？你现在干什么不都是在演戏？难道你就不能在检阅时换个道具？把中将领章换成上将领章？”

唐生明一听茅塞顿开，检阅那天，他弄来一副上将领章，这样才没有“丢脸”。

1942年冬，唐生明夫妇大难临头，差点儿成了日伪的猎捕对象被关起来。原来，军统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区组织被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破获，区长、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陈恭澍被捕。此人就是戴笠派到河内刺汪的行动组组长。当时李士群与唐生明正在苏州搞清乡工作。李得到报告，立即赶回上海处理，结果在清查特区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密电稿，内容是向重庆建议：“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日军军官，因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

如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日军立即把这个地区封锁起来,逐户搜捕可疑人员,成千入受牵累,几十人被杀,使居民产生极大反感,因而对重庆政府产生不满,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零零星星去搞这类工作,以免失去沦陷区民心。”

日伪对这份电报稿极为重视,因为当时军统上海特区正热衷于搞这些活动。这类活动,干起来困难不大,功劳不小,甚得重庆方面的嘉许。李士群认真分析电稿内容,绝不是军统所干,查笔迹似与唐生明差不多,李便肯定此稿是由唐生明拍发的。他与日本人既对此电稿表示满意,但李又不满意唐背着他与重庆发生关系,觉得唐不够朋友。在唐被发觉后他还矢口否认,李便对唐不客气了:他先把张素贞逮捕,严刑逼供;然后带着陈恭澍与唐当面对质。陈恭澍坚决否认与唐有往来,唐也大声嚷道:“你杀了我,我也只承认与戴笠是朋友。”李很重视这句话,因从那份电稿的语气上也可看出,不是部下向上级写报告,而是朋友相劝的口吻。李士群将陈恭澍押回牢房,然后对唐生明说:“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汪先生有电话来,送你们去南京见他,你当面去向他谈谈吧!”当晚,唐生明、徐来、张素贞三人便一同送往南京。第二天到车站接他们的有几个日本军官。

日本军官将唐生明单独带上车,一直开到日本在华的最高指挥机关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车后唐见到了他过去认识的都甲大佐、延原中佐和从上海赶来的13军参谋市川中佐。这三人一见唐就非常客气而又热情地与他握手,他们先安慰唐一番,叫他不用害怕,还连连称赞他那份电报提出的建议很好,最后才由都甲大佐正式向他提出:“我们很久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阁下有关系的人来商谈;今天总算找到了阁下,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阁下到这里来谈谈。”稍定一下,他便接着谈到唐能够到南京来工作,日方很欢迎,可惜没有早点让他们知道。他们要尽力支

持,表示希望唐把与重庆联系的电台保留下来,并由他们来负责保护。还说南京政府决不敢为难唐,一切由日方做主;要是没有专用电台,日方愿提供一切设备,快点沟通南京和重庆的联络与对话。

日方三员代表还邀请唐生明去会见日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河边告诉唐生明:“我们因为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才请汪先生出来,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个任务。”河边越谈越高兴,态度也极其谦逊,还对蒋介石大大恭维了一番,并反复说了几遍:“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我们应当很好地合作起来一同反共。”最后,河边正三谈到已决定要经常派人与唐保持密切联系,并负责保护唐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工作能顺利进行。同时对唐建议重庆不要再去暗杀日本人,说这种建议是很有见识的,他们不但重视,也十分赞赏。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唐生明既害怕又高兴。他慎重考虑,应如何对付日本人,因为与日本人打交道很难,他们是只讲利害而不讲交情,稍不合意马上反脸无情,随时可以被杀头。当时的心情,唐生明回忆起来,感到很矛盾,特别是一下子由极度紧张变得十分轻松,身份既已明朗化,他再也不用担心了。河边正三、畑后六招待唐吃了一顿午餐,便让唐回到李士群家中去。李士群见唐安全地回来,就再也不敢对这位重庆来客有什么怀疑了,因而他对唐恢复了像过去一样地亲热,并且建议他去拜会汪精卫,向他汇报这一情况。

第二天,唐生明去见汪精卫时,心情完全不同了,因为日本人这么重视他,他对这位黄埔老师也满不在乎了。汪知道了昨天发生的事,见到他的学生时,现出一脸尴尬相。他知道日本人有了他汪精卫还不满足,还在设法要与蒋介石去联系,这无形中

说明了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分量是有限的。当然，他不在这方面表态，只埋怨唐生明为什么一直瞒住他，暗中与重庆保持联系，太不够交情。但唐认为有日本人撑腰，汪也把他莫奈何矣。

唐生明把陈恭澍案和日军负责人与他进行联络，希望能达成合作等向重庆报告后，戴笠真是大喜过望，马上复他一电，叫唐先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多与之周旋，但对日方提出的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应随时向重庆报告。特别要注意，不要先承认自己是代表什么人，然而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持这一关系，不能中断。这是唐到沦陷区后第一次收到这么长的电报。他很明白，这是蒋一贯玩弄的手法，明明是他亲自派唐去，却又不让唐用代表名义与日方往来。蒋的如意算盘是：将来一旦事情弄好，自然没有问题；如果万一出了问题，影响到他本身利益时，他就可以把一切责任推到唐的身上，到那时他就说这是唐个人行动，他可以不负责，而且可以振振有词表示公开惩办。从那以后，唐的身份也慢慢地公开化了，尽管蒋介石不要他以蒋的名义对外活动，但谁都知道他是重庆派来的。对于这一点别人问他时，他也不便否认。

日本上海驻军司令部派一个松井大尉住在唐生明家当联络官，戴笠便要唐生明把设在郊外的那部电台搬到他家中三楼，公开和重庆通报，日军也承认这是合法的，是公开的秘密。说来也真够滑稽，当重庆方面正在大叫大嚷“坚决抗战到底”的时候，却又派有这样一位代表，在日军保护下，长期住在日寇占领区进行公开地活动。

1944年冬，日军攻陷湖南，企图打通到越南的通道，准备和印度支那半岛及南洋日军连成一片。同时日军想派唐生明赴湖南就任省长，蒋介石对此表示赞成，汪精卫也想借此顺水推舟；而唐生明怕家乡老百姓骂他是汉奸傀儡，于是借故推辞了。

唐生明通过种种关系,把不少汉奸拉过来为重庆方面卖力。当时加上英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轴心国每况愈下,时局动荡,胜负难分。一批汉奸为了留条后路,都暗中与唐生明往来:如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原南京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汪伪陆军部长、后任湖北省伪省长叶蓬等,都暗中为重庆效劳。原黄埔军校军事教官缪斌,时任汪伪政权考试院副院长,他死心塌地地为日本人卖命。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令最早枪毙的第一个大汉奸就是缪斌。李士群本是唐生明争取弃暗投明的对象,但他甘心附逆,不肯与重庆合作,于是,唐生明借日本人之手,将其铲除。唐生明还通过松井的关系,办过不少对国民党有利的事。如上海军统大特务毛森,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小老婆,军统分子陈华,军统分子张亚明,国民党要员蒋伯诚,中统骨干分子、国民党中央委员吴开先等,在他们被日伪特务逮捕后,唐让松井出面都保释出来。还有几架美国飞机在袭击沦陷地区日军时被击伤,飞行员跳伞下来被日军活捉,重庆也指示唐设法去营救,让松井去告诉日军司令部,不要虐待或杀害他们,并把他们被捕后的情况告诉重庆方面,转告美军。在胜利后,美军派人到上海接收这些被俘美军飞行员时,美军负责人曾专程去拜谢唐生明。

1943年,唐生明通过日本海军省官员古川,得知日本海军正把所有能战斗的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乘美军不备,给予突然袭击,重演珍珠港事件。这一情报很快转给美国海军方面。这时,美国海军正为搜索不到日本舰队主力的下落而着急。经过查实之后,美国海军空军先发制人,给日本海军以毁灭性打击。为此,美国海军部致函戴笠,表示谢意。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海军少将专程到上海向唐生明表示感谢,并说这是中美合作过程中最突出的一项成绩。1946年2

月，蒋介石到上海，召见唐生明，称赞他“特殊任务”完成得很好，并奖给他 200 万元特别费。

松井大尉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才和唐生明挥泪告别的。唐生明问松井：“你还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松井说：“希望能帮助我早日回到长崎！”松井一家人在美军用原子弹轰炸长崎时死光了，回去只能凭吊一下，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唐生明因为松井为他干过不少有益的事，所以他也尽心尽力地保护过他。抗战胜利后，第一批被遣送回日本的日军中，就有松井大尉。这是唐生明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军统大特务、上海港口司令谢灏龄而把事办妥的。动身那天，松井专门到唐宅，依依不舍地向唐生明及他全家告别，之后就带着懊丧的神情走了。

1946 年，唐生明被任命为国防部中将部员，干一份拿薪不干事的闲差。1948 年他任总统府参军。唐生明在戴笠死后，坚持要求蒋介石为自己在上海的这一段“特殊任务”澄清历史真相，取消当年对他发出的“通缉令”，洗清在自己头上戴“汉奸”的帽子。在唐生明的多方奔走，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刊登的那则《唐生智启事》给予澄清。文曰：

抗战期间，唐生明被派往沦陷区进行敌后抗日活动时，为掩饰敌人耳目起见，曾由唐生智先生呈请通缉在案。现对日战争已取得最后胜利，任务业已完成，前项假通缉应予以取消。

这道命令公布之后，唐生明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但是他的工作，蒋介石却迟迟不予安排，直到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才给他一个保密局设计委员这样一个虚职。1949 年，蒋介石江山不保，才调唐生明任国民党 1 兵团副司令。1949 年 4 月，唐生明积极参加了策动湖南和平起义活动，并成为湖南和

平起义协议上的签字人之一。随即他和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陈明仁率领国民党 1 兵团起义。在起义后,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21 兵团副司令员,同年赴香港经商,并对“两航”起义做了许多促进工作。

1956 年,唐生明举家迁回北京,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及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唐生明是一位一生“福祿寿考”样样齐全的人,他从军当官,但实际上是个花钱如流水的花花公子。然而,“文革”一开始,他也在劫难逃。

1966 年 11 月,唐生明夫妇被江青打成“汉奸”、“特务”而被关进监狱。唐夫人徐来病死狱中。唐虽被关押七年之久,但他并未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唐生明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不顾年迈体弱,奔走于港澳和大陆之间,为改革开放,促进对外贸易而贡献力量。

1987 年 4 月 24 日,唐生明病逝于北京,终年 82 岁。唐生明患的是肺癌,从发现到死亡,前后仅 3 个月。

唐生明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隆重。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万里、习仲勋、王任重都参加了告别式并献了花圈。《人民日报》发表了《唐生明生平》,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对唐生明评价很高。正是:惊险神秘的战斗生涯,风流潇洒的人生经历。黄埔同学的风流公子,国共汪日的贵客佳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百团大战 陈赓敌后反扫荡 深入虎穴 聂帅大闹五台山

话说 1940 年 8 月,华北敌后战场的八路军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先后集中了 105 个团,总兵力约为 40 多万人,在彭德怀副总司令,副参谋长、黄埔一期毕业生左权等人的领导下,对日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

8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为战役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对华北日军的主要交通线进行总破坏和袭击,重点目标是正太铁路全线、同蒲、津浦、平汉、平绥等铁路的一部分,以及深入我华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公路。

9 月 20 日至 10 月 10 日,为战役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作战任务主要是乘胜扩大战果,除继续破坏与袭击交通线外,重点是拔除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敌据点。

日军华北方面军在遭到我连续两个阶段的沉重打击后,深感威胁严重,遂调集数万兵力,从 10 月上旬起,对我八路军、新四军实施报复性“扫荡”,八路军此后即转入反“扫荡”斗争。

百团大战历时 3 个半月,共进行大小战斗 1800 余次,毙伤日军 2 万余人、伪军 5000 余人,俘虏日军 281 人、伪军 18407 人,破坏铁路 474 公里、公路 1500 余公里,拔除敌据点 2993 个,并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八路军伤亡 1.7 万人。百团大战的胜利,

进一步增强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显示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的伟大力量。

百团大战的发动,是八路军总部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对华北的敌我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后而确定下来的。1940年7月20日,从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参谋长左权三同志所签署的战斗预备命令中,就可以充分体现出来。这个预备命令下发给129师、120师和晋察冀军区(不包括山东方面的八路军)命令中说: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8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因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积极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敌寇依据各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又据各方情报敌寇有于8月进攻西安企图。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击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地发展,决定乘日前青纱帐和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袭正太路。……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恢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时期地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日军所谓的“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企图困死根据地军民。针对这种企图,八路军总部决定用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重点

破击正太铁路,对其他铁路、公路也予以破击。8月8日,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八路军参战部队从20个团,迅速增加到105个团。

8月20日晚8时,战役开始了。第一阶段是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交通破击战。晋察冀军区由八路军115师师长、黄埔四期毕业的林彪,副师长、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聂荣臻率19个团、5个游击支队和两个独立营,进攻正太铁路东段日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大部和独立混成第4旅团一部。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徐向前,386旅旅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陈赓,129师参谋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倪志亮等率8个团、8个独立营攻打正太铁路西段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大部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一部。另有两个团破坏平辽、榆辽公路。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参谋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周士第,358旅旅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张宗逊,358旅716团团长、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宋时轮等共20个团破坏同蒲铁路北段和以西公路。在八路军的猛烈攻击下,日军占领的华北各铁路交通顿时中断,从而使日、伪军陷入一片混乱。黄埔军校师生在百团大战中显示出较好的军事指挥才能。徐向前、陈赓所在的八路军129师从抗战开始就东渡黄河,他们以太行山区为中心,开创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徐向前、陈赓参与指挥了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早在1938年4月,徐、陈就配合八路军115师林彪所部进入河北南部,提出了在平原地区依靠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扩大巩固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民主政权,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晋冀豫军区第2支队支队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唐天际,后任晋豫边区游击司令。129师新编1旅政委,其率部活跃在晋豫地区,并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八路军在稍事休息后,于1940年9月22日至10月中旬,又展开了第二阶段作战。此次作战主要消灭交通线两侧日、伪军据点。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原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聂荣臻,三分区司令员、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郭天民等率8个团、3个游击队、两个独立营进攻涞源及灵丘地区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和第26师团守备部队。129师386旅之陈赓、决死队第1纵队两个团和385旅之陈锡联率部进攻守备榆辽公路的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120师林彪再次破击同蒲铁路北段,并将其切断。八路军占领了一批日军据点,打击了汪伪政权组织,平毁了大部分封锁沟、封锁墙,重新连接了被日军所分割的地区。

在百团大战中,聂荣臻、林彪、陈赓、陈伯钧、倪志亮、郭天民、程子华、许光达等黄埔军校师生,他们率部攻克了天险娘子关,使八路军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被日军已盘踞三年的天险娘子关。

在百团大战中,作为经济战的重大收获是炸毁了华北最大的井陘煤矿,同时东王舍新矿也被我八路军破坏很大。据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1940年9月14日公布之《百团大战战绩初步总结》收获如下:

“井陘煤矿、东王舍新矿,被我破坏极巨,计自21日起至25日止,整整5昼夜之破坏,该矿所有机器均被我破坏无遗。如就被破坏的这些机器估价来说,即使以战前的价格为标准,亦值金2500万元,如再加上其他各项,则敌寇之损失实有3000万元之巨。”

在井陘煤矿战斗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中救出两个日本小女孩,大的5岁,名叫美穗子,小的还在襁褓之中。他们的父亲是日本井陘火车站的副站长,其因受重伤而殒命。她们的母亲也在炮火中死亡。当部队从战火中救起她们的时候,发现那个

不满周岁的女孩伤势已很重,经过我们的医务人员抢救和治疗,她脱离了危险。聂荣臻司令员指示由专人照顾,然后将其送还井陘城日军据点,并附信一件。信中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号召日本士兵和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军阀发动的不义战争。这封信的原文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独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单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只因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

固将更增艰苦,而君单将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8月22日

1980年《解放军报》发表了《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文章后,5月29日这篇文章又被转载在日本的一些报纸上。《读卖新闻》记者查到了当初在战火中被八路军抢救出来的大女孩美穗子。7月10日,美穗子一家接受中日友协的邀请访华。她来到中国后,拜见了曾指挥过百团大战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共和国元帅聂荣臻,并到正太路上的井陘车站进行访问。这段中日友好的佳话,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日本法西斯强盗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中国人民进行残无人道地屠杀。聂荣臻将军的信对其揭露无遗。该信在日军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后来,被俘日军士兵愿意留下来的越来越多,并且组成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他们一直同中国人民一齐参加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其人数多达223名。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不杀俘虏”、“优待俘虏”、“释放愿回家或归队的俘虏”的方针,深深感动了大批日俘,他们积极要求上前线作战地喊话或广播,用日语规劝日军觉醒,不要再为日阀卖命,其中许多人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8月20日至23日,三天的时间,晋察冀的武装部队就破坏了

正太路东段的铁路,连续攻克娘子关、井陘、韦泽关、贾元、头泉等车站和据点,击毙敌军独立第4、第8混成旅团1000余人,缴获枪支1000余支。冀中参战的民工、群众多达35万人,仅一夜之间就破坏了全部公路。在冀东则动员了8万多民众,他们把七、八个县境内敌人的公路电线,竟然破坏得干干净净,致使敌人的电话不灵、信息切断,到处挨打,这充分地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三进山城》、《地雷战》这些家喻户晓的影片,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当年八路军在华北5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抗击日寇的情况。

陈赓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在上海他就跟随周恩来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在百团大战前,他率领129师386旅驻在太岳根据地,开始组建情报网络。在日伪疯狂的大扫荡中,太岳根据地的情报工作始终搞得非常活跃,敌军屡屡遭挫。陈赓指示各地武工队,严密监视敌情,组织少年儿童团站岗放哨,一旦遇有敌情就用“鸡毛信”传递信息,由于“鸡毛信”传递极快,敌人还未进村,群众都已疏散,往往让敌人扑个空。陈赓曾经指示武工队,前去绑架国民党山西驻军司令部机要处副科长董宝才,迫使其改邪归正。他还曾经布置共产党员刘奉生,利用其父的小老婆是日籍女子的关系,使她混到日伪军内部去获取情报,其中得到了一份驻苏堡镇日军的军事晓示图和作战预案。有一次,陈赓派出高庆魁策反了在长治市日军司令部掌握军事机密的大佐纪群。陈赓写诗赠给纪群,诗曰:“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它。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诗句浅显明白,而寓意深长。不久,在日军秋季大扫荡时,纪群便及时地给八路军送来了情报。

最有讽刺意义的是,共产党员陈涛竟当上了日军驻临汾69师团所属的一支有600人的“大汉义军”的司令官。当时,曾有人向陈赓建议,让陈涛率部反正、造成政治影响。陈赓不同意这

样做,他说:“陈涛留在那里能搜集日军上层军事情报,从长远观点看,它的好处远远大于过来几百人,带来几杆枪。”后来,根据形势的变化,陈赓又决定,陈涛不要再当那个“司令”了,去当日军师团部的情报班长。当时有些人对陈赓这种做法不理解,他们说:“情报班就管十来个人,司令官权力多大啊!”可是,事实胜于雄辩,陈涛从新任的职务中得到的情报,对八路军的反“扫荡”却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在百团大战按方案胜利地完成正太路战役计划后,八路军便开始从铁路线上转移。当时,日军已大约摸到我主力之所在,便想乘我军胶着在正太路的时候,迂回到背后袭击我主力部队。敌人集中了七、八千人,分五路向晋中区进攻,怎知我军早已有了准备转过身来。9月1日,敌军两个大队由榆次、太谷向东猛扑,与我军在卷峪沟遭遇。我129师386旅旅长陈赓、参谋长周希汉指挥该旅16团,突然从侧背扑向敌军,与敌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把处于优势的敌人击溃。9月3日和4日,385旅旅长陈锡联发现从卷峪沟撤退下来的一大队敌人,乃在沙峪布署了大伏击战。疲劳的敌人在山沟里被我军打得东奔西逃,伤亡200多人,他们扔下装备,逃到辽县。9月5日,敌军36师团的永野支队走进了我386旅陈赓旅长布下的伏击圈,于是在双峰一带我军展开了歼灭战。敌永野支队伤亡过半,支队长永野中佐被击毙。在经过9昼夜的机动作战后,八路军终于粉碎了敌军的合击阴谋。陈赓坚决地贯彻刘伯承师长的“集中力量粉碎敌人所推行之‘囚笼政策’”的方针,用自己的拳头英勇地打击了敌人,永野支队的覆灭就是一个例证。刘伯承把日寇的这种反动政策画了一个“田”字图形,四周的直线表示铁路、公路,里面的“十”字表示我根据地。刘伯承说:“为了粉碎敌人总力战的格子阴谋,我们必须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开展针锋相对的斗

争。”为此，他要求各部队迅速地建立自己的“拳头”，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机会狠狠地打击敌人，将敌人限制在据点之内。他还以“按跳蚤”和“啃核桃”作比喻，反复说明建立“拳头”的必要性。他说：“因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我们如果没有‘拳头’，就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正如我们按跳蚤一样，用五个指头同时按五个跳蚤，结果一个也按不住，如果看准一个，集中力量去按一个，就会按住一个，消灭一个。核桃很硬，一口是咬不动的，只有集中力量，狠击一下，将它打碎，才能一块块吃掉。”刘伯承对这种战略思想的形象化的比喻，很快就在 129 师深入人心，并成为进行百团大战之军事行动的指南。

东团堡的歼灭战，使日涞源警备司令小柴俊男不寒而栗，痛心疾首。后来日本侵略军又重占东团堡，败军之将小柴俊男还厚颜无耻地立了一块大石碑，并在两面分别用中文和日文镌下了一首《长恨歌》。这首歌充满了法西斯的臭味，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百团大战中我八路军的神威，现抄录如下：

东团堡警备队长长恨歌

行军西征涞源县，路越一岭叫摩天。
围绕长城数万里，西方遥连五台山。
南到白石山更大，东与易州道开连。
千山万水别天地，有座雄岩紫荆关。
察南边境一沃野，小柴部队此处观。
窥测八路军贼寇，中秋月血照山川。
丰穰高粮秋风战，敌军踏破长城南。
精锐倾尽杨成武，势如破竹敌军完。
盘袭路沟如恶鬼，我含笑中反攻然。
惨复天地炮声震，团堡一战太凄惨。
此处谁守井田队，彼处谁攻老三团。

敌赖众攻新手替，我仅百余敌三千。
突击不分昼和夜，决战五日星斗寒。
穷尽实弹以空弹，遥望援兵云貌端。
万事休惟一自决，烧尽武器化灰烟。
烧书烧粮烧自己，遥向东天拜宫城。
高齐唱君代国歌，决然投死盘火里。
英魂远飞靖国庭，壁书句句今犹明。

《长恨歌》下还附录这样一句话：

一死遗憾不能歼灭八路军，
呜呼团堡士壮烈肃然千古传。

百团大战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作战，给敌人以沉重地打击，使华北日军陷入了大混乱的局面之中，伪军、伪组织也为之动摇，而沦陷区的人心却大为振奋。敌人由此痛感：中共军之攻势，以破坏交通、通讯设备为目标，而在心理方面所受之损害尤为严重。为了扭转局势，其急忙地拼凑调遣兵力。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就集结了十几万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日军以坦克开路，于10月初开始向我晋东南、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扫荡”。在此举中企图消灭我八路军的主力，破坏我领导机关，摧毁我抗日根据地，进而恢复其交通线。因此，以反击日军报复之“扫荡”为中心，即构成了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的进程。

敌人的“扫荡”首先从太行区开始，后来扩展到太岳、平西、晋西北、北岳等地区。敌人实施其“治安肃正”的计划，对我百团大战进行报复性进攻。为此，八路军立即以游击战进行反击，129师于武乡、黎城地区歼灭、击退了日军。晋察冀军区陈赓所部和游击队相互配合，在平西、北岳地区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

晋西北地区军民,实行空室清野,在敌后方进行游击活动,迫使敌人全部撤离。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在三个半月的战斗中,华北敌后战场有数十万军民,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当年参加百团大战的黄埔军校师生起了骨干作用,他们中大多都身为八路军的军政领导干部。现简述如下:

聂荣臻,八路军 115 师政委,在进驻山西五台山后,他充分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地发展抗日武装,并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到 1938 年底,根据地即发展到 72 个县之多,被党中央誉为模范抗日根据地。1939 年冬,聂荣臻指挥了雁宿崖、黄土岭的战斗,共歼灭日军达 1500 余人,击毙了日军称之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1940 年 8 月在百团大战中,聂荣臻组织并指挥了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线的破击战,从而取得了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完全胜利。

罗瑞卿,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在百团大战前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兼教育长。1939 年他率抗大师生数千人东渡黄河,在华北敌后坚持办学,1940 年出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于太行山区,坚持敌后斗争,成绩十分卓著。当时随同罗瑞卿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还有抗大训练部部长、黄埔五期毕业生许光达;抗大校务部部长、黄埔五期毕业生陈伯钧。

阎揆要,陕西佳县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在百团大战时,其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

郭天民,湖北黄安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在百团大战时,其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及第 2 军分区司令员。

徐向前,八路军 129 师副师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37 年 11 月他以太行山区为中心,开创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他先后

参加了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在百团大战时，在山东八路军1纵队他任司令员，并配合行动，不久返回延安参加了“七大”，同时特意给在延安的党中央带来50万元法币；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了。

程子华，原名程世杰，山西解县人，黄埔军校六期肄业。1939年任冀中军区政委。他与吕正操共同将当地抗日武装整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同时总结和推广了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指挥冀中军民参加百团大战，从而挫败了日军多次围攻和扫荡。他著有《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书中集中地总结了在敌后组织民兵进行游击战的经验。1943年秋，聂荣臻回延安，程子华任晋察冀军区代理司令员兼政委。

李运昌，原名李芳岐，河北乐亭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1938年任中共冀热边区特委书记。在百团大战中，他在冀东地区组织领导人民武装抗击日军的进攻并且摧毁日伪政权，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曾任八路军13支队司令员，冀东军分区司令员。

周士第，又名周士悌，海南琼海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40年2月任八路军120师参谋长，在晋西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在百团大战中他担任晋绥军区参谋长，粉碎了日军大大小小的“扫荡”达30余次。

张宗逊，陕西渭南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抗日战争时期，他率120师358旅在五台县滑石片地区歼灭日军一个大队，同时配合晋察冀军民粉碎了敌人对五台山根据地的进攻。在百团大战中，在冀中他又参与指挥部队战胜日军多次扫荡，后任晋西北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毛泽东在延安说，《水浒》中有一个花和尚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这个“鲁智深”就是指聂荣臻。当年他和张宗逊一起大闹五台山，打得日寇在五台山丢盔弃甲，损兵折将。

陈赓，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他任 129 师 386 旅旅长，参加了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指挥；继而又转战于平汉线中段、晋西北和冀南平原。1940 年他任太岳军区司令员，1941 年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在百团大战中，陈赓血战娘子关，在马山村、罗鼓寨一带打伏击。他创造的“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分散，有时集合；要游要击，或者不游不击”等游击战理论，在百团大战中发挥了极为有效的作用。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卡尔逊由中国作家、《暴风骤雨》作者周立波陪同，对陈赓的 386 旅进行了访问。卡尔逊说：“386 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作家周立波在日记中，对这次访问也作了具体的记述：

至龙旺时，会见了陈赓同志。他像一个儒雅的书生。他是湖南湘乡一个地主的儿子。马日事变之后，他家人的财产、土地，全被没收了。现在该发还了吧？但是这和他没有关系，他不关心家里的财产。他的财产，是革命的经验……

为了纪念我们的会见，陈赓同志送我一支从日军缴来的自来水笔。他还送了一把锋利的日本短刀给卡尔逊。

“这把刀杀了六个人。”陈赓同志说。在正太路旁的一次白刃战中，我们一位战士，从日本士兵手里夺了这把刀。刀的主人被杀了，而这同一把刀，又接连地在他的旧主人的另外五个同伴的躯体上，接触了五次。最后，它和它的受了几次伤的新主人，一同倒在地上的血泊里。但是这时日寇败退了，使用这刀的勇士被救了回来。

我看着这把浸过这样多敌人血的短刀，觉得它好

像是古代侠客的匕首。刀身很短,却非常锋利。鞘和柄都是木做的。刀身插进鞘里的时候,柄和鞘就衔接起来,像是一把短棍。短棍上镶嵌着几个银色的星点。这是一把精致的小刀。

“我拿了这把刀,会永远地记着你们这一旅。”卡尔逊说。

吃饭的时候,陈赓同志拿了一罐日本牛肉给我们,也是战利品。这次在昔阳七亘村战斗中,他们缴获了许多食物,里面有几百罐牛肉,一千多包“压缩口粮”。军中正缺粮,用这些缴获物,维持了半个来月。

周立波对陈赓有关事宜的记述,大体上反映出抗日战争中的残酷斗争和其独有的生活情趣。陈赓人称“乐天将军”,他不拘小节,是一位极富幽默感的人。他性格豪放,无拘无束,既富智慧,又心地善良,所以造就了他的极富幽默的性格。

有一次,陈赓和他的政委王新亭开玩笑,走着走着,陈赓突然喊道:“瞎子当心,下坡了。”王新亭是高度近视,戴着一付高度近视镜;平时看书,他要凑到眼边才能看清楚。这会儿听见喊声,便急忙蹲下来,伸手摸陈赓,引得大家咯咯地大笑起来。王政委也止不住地笑了起来,并且说:“唉,你这瘸子……”但王新亭也不示弱,看清是平路后,立即连连催促:“快走!快走!”陈赓腿上负过三次伤,有点拐,只好认输之。

过了河,陈赓停住脚步,伸出手杖说:“来吧!让我这瘸子来牵你这瞎子。”然后他就小心翼翼地把王新亭扶过河。

还有一件事。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在为渡江战役作准备的陈赓从前线返回西柏坡,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正在主席台上用他那铿锵有力的湖南腔讲话,却见

坐在会场后边的陈赓突然站起来，向主席台走去。毛泽东十分诧异，但并未停下来讲话。会场上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陈赓来到主席台前，不好意思地冲主席笑了笑，然后端起毛泽东放在讲台上的一杯水，一饮而尽，喝完后说：“太渴了！太渴了！”连同毛泽东在内，全场一片笑声。看着自己的这位爱将大摇大摆地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毛泽东笑道：“这个陈赓哪！”

据说陈赓原配夫人王根英是不幸于1939年3月8日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的。1942年陈赓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看上了傅涯，在一次大会上听课时，他用一张纸条写上：“我爱你！”写完后他就抛给坐在左前方的傅涯同志，并且一连写了好几次。他就是如此干脆而执着地表达他心中的爱情的。后来在陈云同志的介绍下，他真的与傅涯成了亲。后来陈赓之子陈知非这样回忆他父亲说：

“那是1959年的春节，我和钱如琴定了婚，带她来认家门见公爹。那天，父亲很高兴，很有礼貌地到大门口来迎接，热情地打招呼，往院里望，往屋里请。

“当时，父亲穿一身旧衣服和乡下人穿的牛鼻子棉鞋，戴一顶瓜皮小帽，举止随便，全无一点儿架子。如琴误会了，心想，瞧人家这管家，真热情。就礼貌地向他点头致意。待到屋中落座，交谈起来，如琴心里琢磨：这位管家，怎么这么健谈呢？她四下观望，等公爹出来。

“‘老管家’坐在一旁。直到问起如琴的家庭情况、学习情况、工作情况，她才恍然大悟：原来对面坐的就是她今天想要拜见的公爹——叱咤风云的将军陈赓！”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百团大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40年9月20日，延安各界举行纪念“九·一八”九周年、庆祝八路军百团大战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朱德、洛甫、王稼祥、陈云、任弼

时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致八路军贺电》。美国名记者史沫特莱对百团大战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从晋西高山到东海海岸，从黄河畔到长城边，都形成了战场。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在给朱德、彭德怀打来的电报中说：“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日寇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阎锡山在给朱德总司令的电报中也说：“查敌寇陆续增兵，企图‘扫荡’华北，截断我西北国际交通，兄等抽调劲旅，给以当头痛击，粉碎其阴谋毒计，至深佩慰！”蒋介石于1940年9月11日给八路军总部也发过电报，他说：“朱彭总副司令，迭电均悉。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饰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饰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其交通为要。”如今回忆起百团大战的胜利，正如129师新编1旅政委唐天际所作诗曰：“王屋山前作战场，莫嫌军中旧刀枪。顺风推动黄河水，好像愚公移山岗。抗日救国保家乡，不顾流血与断肠。今日刀枪满天下，来朝红旗遮太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皖南事变 顾祝同执行密令 千古奇冤 叶挺项英遭劫难

话说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平原与日伪作殊死拼搏,以牵制日军攻击国民党正面战场时,国共两党之关系由抗战“蜜月”开始走向冷落和分裂。其转折点是1939年1月21日至31日在雾都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这次会议召开时,蒋介石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根据这种“与中共作积极之斗争”的精神,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八字方针;同时会议还秘密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决定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并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

在会后,蒋介石又颁布了五花八门的反共文件,大肆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际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宣传赤化”、“实行暴动”、“阴谋推翻政府”。他把浴血抗战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说成是“内在的隐忧”、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作一次大扫除”。

1939年6月12日,继国民党一手制造了“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后,又相继制造了一起破坏国共团结的事件。国民党第27集团军杨森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湘南平江嘉义的留守处,惨杀了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这

就是有名的“平江惨案”。此事国民党封锁了消息，直至7月1日才被新四军获悉。8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了追悼大会。会上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质问国民党当局：

“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了没有呢？没有。

“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

会后，延安各界人士举行集会，并通电全国，进行强烈抗议。同时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取消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此，蒋介石不予答复。这是因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本身是个“绝密”文件，他矢口否认有这么个文件，怎么叫他答复呢？后来，蒋介石觉得“异党”一词欠妥，于是又下令把“异党”一词改成“某党”。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委秘书处发出“特字第486号密令”：“查‘异党’一词易滋误会，兹经中央决定，嗣后原称‘异党’者一律改为‘某党’。”

周恩来为“平江惨案”牺牲的烈士所拟挽联高悬于延安追悼会场：

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

同胞须猛醒，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阴谋。

20天前，周恩来由杨家岭骑马前往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而刚刚当上“第一夫人”的江青为了大出风头，她不听毛泽东的

劝告，骑上马，便跟着周恩来一块走。在作完报告后，两人又一起骑马返回杨家岭。路上，因劳累而疲倦的周恩来只好缓慢而行，但江青由于跟得不耐烦，却想飞马速回，所以到了延河边，她就突然扬鞭，向前奔去。当时周恩来的马因受惊而猛地跳跃，前蹄腾空。在冷不防的情况下，周被摔倒，其右肘关节不幸骨折。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赴苏联医治，到1940年3月底，他夫妇俩才返回延安。所以，周恩来在以后的公开场合露面，他的右肘则一直是侧抬着的。人们只要细心地观察，就可以看见他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姿式。

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于1940年6月赴重庆跟蒋介石谈判。在临行之前，毛泽东说：“要有理、有利、有节作为我们反磨擦的方针，不要超出这个范围，但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

周恩来自从在广州黄埔军校起就和蒋介石打交道。在“西安事变”时，周恩来更是运筹帷幄，并精于谈判艺术。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还总结了跟蒋介石谈判的若干“技术”：

“有利的应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无利的应该严正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让步的应该自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的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总之，一句话，对蒋不要过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

1940年秋天，由于国际形势的演变，蒋介石“三喜临门”。周恩来深谙蒋介石的心理，在1940年11月1日给延安毛泽东的电报中，曾这样分析了蒋介石的“三喜临门”：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

国际大环境对蒋介石有利，因此，他就趾高气扬，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这一回，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重庆重开谈判，中心

问题便是关于国共磨擦。蒋介石一开始态度就很硬：“对于抗战、团结，我看国共两党都是有决心的，任何困难决不畏惧，国共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

对此周恩来马上来了个针锋相对，他说：“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服从，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来胁迫。”

蒋介石搪塞道：“这是过去的事了。”

为解决国共磨擦问题，蒋介石让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跟周恩来具体谈判，但谈来谈去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国民党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归第2战区，因此两军的防区在黄河以北。八路军原本在黄河以北，而新四军则必须从皖南北进，渡过黄河。由于蒋介石对新四军在江南的发展壮大心存恐惧，处心积虑地要加以消灭而后快之，因此，他又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19日，正当八路军在华北进行著名的百团大战时，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出“皓电”，致第18集团军办事处叶参谋长剑英即转朱总司令玉阶、彭副总司令德怀、新四军军长叶希夷（即叶挺）。“皓电”颇长，一开头，先是表扬了几句：“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在抗战之初期，均能恪遵命令，团结精诚，用克御侮宣勤，不乏勋绩……”紧接着就批评起来：“孰意寇氛未靖，齟齬丛生，纠纷之事渐闻，磨擦之端时起……”“皓电”历数种种磨擦事端，然后作出如下结论：“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18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

“皓电”最后命令：“关于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

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

当时蒋介石强令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放弃原有阵地,撤至黄河以北。对此,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于11月9日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发一长电给何、白。由于9日的电报代日韵日为佳,史称“佳电”。

“佳电”逐一驳斥了“皓电”对中共的指控,并且要求“彻底查明是非曲直,期于永杜纠纷,以利抗战”。毛泽东在11月21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中,有一段话,透露了“佳电”的背景,明确称“佳电”是由他所起草,并说明新四军退出皖南的内情:

我除了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在偏要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我们现在已准备了一个铁锤,只要政治条件成熟即须给他重重的一棒……

再说蒋介石发出“皓电”之前,早就着手于军事行动了。1940年秋,蒋介石、顾祝同为了防范、监视,进而阴谋消灭坚持皖南敌后抗日的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其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将上官云相的第32集团军总部从赣东迁至皖南徽州。当时新四军军部设在泾县云岭,自1938年起即归属第三战区指挥,属于第32集团军序列。10月,第32集团军又移驻宁国,与唐式遵的第23集团军连接。蒋介石、顾祝同等原打算强令新四军就地北撤,在荻港附近渡长江,并企图假日伪军之手消灭新四军。后经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毕业生袁国平等迭次交涉,才被迫允其从苏南渡江。1940年12月9日,蒋介石批准北撤期限宽展到12月31日。

同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上官云相奉顾祝同密召,匆忙从宁国总部赶到江西上饶三战区长官驻地,顾祝同时任三战区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山东商河人,原在孙传芳手下当师长。北伐时投奔蒋介石,与顾祝同在保定军校六期是同学。说来也巧,新四军军长叶挺也是保定军校六期毕业。在“皖南事变”时,师兄师弟交手,这真是“各事其主”而为之啊!

且说上官云相来到上饶,他一反常态,改变历次来上饶,均下榻于长官部副官处处长茅迺功家的习惯(这里有丰盛的宴席、而且可以满足他吸鸦片烟的嗜好),而这次却破例地住宿在老同学顾祝同家中。顾面授机宜,紧急磋商消灭新四军的计划。原来,12月10日,顾祝同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第二天一早,上官云相立即返回徽州。12月底,顾祝同在战区司令长官部会议上内定上官云相为这次军事行动的指挥官。此前已限期赶修完成上饶至重庆间长途载波电话线路,以保证蒋介石与顾祝同能直接通话。同时,开始紧锣密鼓地在暗中调兵遣将,确定动用7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约8万余人,对新四军在江南云岭的9千人进行包围,并完成作战编组。紧接着在徽州,由上官云相主持召开所有有关的军、师长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部署将围歼计划付诸实施。其间上官云相对第40师师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方日英、第79师师长段茂霖等进行了单独谈话,面授机宜。会后,上官云相交代幕僚要绝对保密,以免给予新四军有突围之机会。参加围歼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有第40师,师长方日英;第144师,师长唐明昭;第145师,师长孟浩然;第62师,师长冷欣;第79师,师长段茂霖;第108师,师长戎纪五;52师,师长刘秉哲。他们在新四军必经之隘口设伏,妄图守株待兔,志在必得。方日英、冷欣、刘秉哲均为黄埔生。

严峻的形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蒋介石对他的“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顾祝同十分放心。此人打日本人实属外行，屡战屡败；而搞磨擦、监视新四军却为内行，是有名的“磨擦专家”。早在1939年底，他就在三战区所属各部中，每营抽调三名战士，集中到江西上饶附近编成“奋勇队”；每队50人，由军统特务负责专门训练。其主要任务是对苏南、皖南的新四军各支队作斗争。1940年春，顾祝同又与军统头子戴笠编组忠义救国军3个纵队，专门供战区用于监视新四军。

再来说说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于1937年10月开始将江西、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福建8省的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这是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下辖4个支队，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4个支队司令员分别是陈毅、陈鼎丞、谭震林、高敬亭，以后又增加了5支队和6支队，司令员是罗炳辉、彭雪枫。新四军分为江南、江北指挥部，下辖挺进纵队、江北游击纵队、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由开始组建到抗战胜利，人员从两万多人发展到近30万，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武装力量。

新四军军长叶挺，1896年生，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保定军校六期毕业，1924年加入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处长和独立团团团长，北伐时屡建奇功，成为北伐名将。叶挺虽然不是黄埔系，但与黄埔军校师生关系非常密切，顾祝同、陈诚都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叶挺在中共党内曾两次受到处分，最后导致他脱离中共。头一回受留党察看半年处分，原因是北伐攻武昌城损失

惨重。当时叶挺在一气之下，离开了部队，到上海接家属去了。第二次受处分则是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之时，叶挺受到李立三的责难，说他指挥消极，再度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这次他又一气之下，去了莫斯科。就这样，叶挺脱离中共，流亡欧洲，直到1935年秋，叶挺在澳门才再次与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取得联系。

蒋介石看重叶挺的才干和声望，曾希望叶挺在国民党部队任高官，然而却被叶挺再三谢绝矣。

在国共再次合作后，江南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周恩来私下与叶挺谈及其出任新四军军长一职之事。1937年10月8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致电毛泽东：

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及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拨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这表明，最初建议叶挺筹建新四军的是周恩来，而后来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倒是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他知道叶挺是非中共党员。

毛泽东对叶挺脱党后的情况不太了解，因而不敢贸然行事，将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叶挺；如果要是让叶挺当军长，那么博古、叶剑英要“提出保证”。毛泽东邀请叶挺于1937年11月初访问延安，经过彻夜长谈后，毛才知道了叶受党内处分的经过，疑虑消失，于是决定开隆重的欢迎大会。毛在会上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随后叶挺致答词：

“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叶挺走马上任，成为国共两党双方任命的新四军军长。

在新四军中，黄埔军校师生是人有人在的。副军长项英，原名项德隆，湖北武昌人，1922年加入共产党。他长期从事工运工作，1926年当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在红军长征后，项英留在中央苏区，与陈毅、邓子恢等领导南方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多年。在新四军成立后，他虽为副军长，但却是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在项英的眼中其对叶挺并不重视，就是毛泽东他也没看在眼里。这跟他在江西苏区时和毛泽东那一段的恩恩怨怨有关。项英与叶不和，又跟毛泽东对抗，致使新四军失去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而给蒋介石却留有可乘之机，这是皖南事变的又一人际方面的原因。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字醉涵，原名袁裕，湖南宝庆人，1906年生；1925年加入中共，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东征、北伐、长征、抗日他全参加了。在新四军成立后，他积极协助叶挺、项英领导新四军挺进敌后，并开展游击战争。

李一氓，又叫李民治、李德谟，四川成都人，北伐时任总政部秘书，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生委员会委员，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

至于陈毅，他是新四军继叶挺之后的代军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不过这仅是在名义上的职务，而实际上任中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他是一位长征时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的红军指挥员，在新四军中威望很高。

1941年1月4日至14日,人称“黑色的十天”。其时蒋介石一再精心策划的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阴谋实现了。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8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就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移动方向致电叶挺、项英,明确指示:“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到三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

当时项英对中共中央指示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持有异议。据李一氓回忆:“项英既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又是中共中央东南局的书记。作为新四军政委,他的作战区域是大江南北;作为东南局书记,管辖范围则是长江以南的东南数省,而长江以北则属中原局。”项英再三拖延北移,而且致电毛泽东解释北移有种种困难,以致贻误了时机,给蒋介石造成借口。战火已迫在眉睫,项英仍然希望从顾祝同那里在拿到“开拔费”之后再开拔。12月13日项英致电毛泽东:“我们的态度不发饷弹即不开动。”如此电报往返,一再延宕。在蒋介石规定的限期到来的前5天,亦即毛泽东的47岁生日,毛以强硬的口气命令项英率部北移,电文末尾说:“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项英在接到毛泽东这一命令后,他才在军部召开会议,决定马上北移。

根据《皖南事变要报》记载,新四军北移,当时考虑有三个方案。

第一方案:经国民党三战区指定的路线经苏南北渡。

第二方案:由皖南铜陵、繁昌间北渡,即由驻地往北开。这

是军部与江北指挥部经常往来的路线，也是国民党三战区同意的。

第三方案：绕道天目山脚到达溧阳，待机北渡，即由驻地往南开拔。

会议通过分析比较，最后确定第三方案。

李一氓 1941 年 3 月 20 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说：当时会议认为：第一，三战区原来指定到苏南的路线，我军必须通过国民党 52 师和 108 师的防地，那时候两师的兵力及苏南国民党 62 师冷欣部已分别集中，在我军经过的地区已筑好工事；第二，稍偏点走国民党 52 师及 108 师背后，但仍须打两个师；第三，向南走胥县、宁国以南，旌德以北，脱离 52 师及 108 师，但与 40 师有遭遇的可能，我们只打 40 师估计力量有余，故决定走这条路线。

事实上，以项英为首的军分会，其这一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正好陷进了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所布置的陷阱之中。

1941 年 1 月 4 日，新四军皖南部队 9000 余官兵，在叶挺、项英率领之下，分三个纵队踏上了北移征途。军部有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医处、总务处；东南分局有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敌工部、《抗敌报》编辑部、文工团；还有老弱病残的家属。一下子决定要行动，人们大有熟土难离之感。军部通知，每人随身物品不得超过 10 公斤，坛坛罐罐全部扔掉。

这天，在夜色苍茫、连绵大雨中，部队踏上了征程。连日来因雨而道路泥泞，行军颇为艰难。就在这时，青弋江上已搭好的浮桥也被洪水冲垮了，从云岭到茂林，总共不过 40 华里，却走了整整一天。5 日下午 3 时才到达指定地点，部队因人困马乏，只得被迫在原地休息。

6日晨7时许,突然响起了枪声。那是新四军的一个便衣侦察班在进入了下村时,而负责“掩护”的国民党第40师方日英部一个连射来的子弹。下午,军部在潘村召开纵队首长会议,会上决定分左中右三路继续前进,会攻星潭。7日,由于遭到国民党主力部队的攻击,我军会合星潭的计划因而受挫。当时军部在百户坑召开会议,讨论部队行进问题,然而却久拖不决。叶挺主张坚决攻下星潭,冲出顽军之包围。项英则认为这太冒险,硬拼伤亡太大,伤员不好处理,最后决定退回廉岭,向高岭前进。此时国民党6个师已从四面封锁,经过几天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新四军无奈而陷于弹尽粮绝的境地。8日,顾祝同限上官云相在12小时内全歼新四军:“匪军经我各部围剿穷蹙一点,消灭在即,为期能于短时间彻底肃清,毋使漏网起见,希即督励所部,协同友军切取联系,努力进剿,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并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勿使逃窜为要!”此电报原稿现尚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早在一个月前,上官云相便让派驻于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窃取了新四军兵力部署图,此时,他决心要大干一场了。8日晚,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曾一度离开部队。叶挺、饶漱石当即电告中央和中原局刘少奇。9日,叶挺亲临前线将顽军144师击退。叶挺决定突围,黄昏开始行动,但沿途遭顽军不断地袭击,混战一夜仅行20余里。这样部队被困于横直五六里的石井坑中,原定计划又遭挫之。10日,顽军40师先后攻占廉岭、丕岭,然后其分两路向石井坑进攻。顽军52师、108师两个团也赶至大康王一带。在此形势下,叶挺只好决定暂时固守石井坑,待机突围,随时准备击退顽军之局部进攻。10日下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到达石井坑,在回到军部后,他们当即向党中央报告离队经过,检讨错误: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蠡山

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道而出。至九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同日,项英、叶挺在被围中给毛泽东、朱德的报告中说:“我全军被围于泾县、茂林以南,准备固守,可支持一星期。请以党中央及周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一周后,如无转机,则将全部覆没。盼立示。”

12日,中央致电叶挺、饶漱石:“一、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二、中央此次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

13日晨,周恩来与三战区参谋长用无线电电话交涉,顽方攻击新四军“北移不遵照指定路线”,故“不能负责”。下午,顽军发起总攻击,军部决定分两路突围:叶挺、饶漱石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一路,其余各部,根据实际情况,向四面八方突围,总的目标是经铜陵、繁昌渡江到皖中或到苏南,或到皖南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14日,叶挺率教导队四个队突围至大康王的西坑。大康王是坑口的出处,已为顽军108师堵击,以火力封锁我之出路。下午4时,顽军开始总攻,我军伤亡惨重。傍晚,顽军派一个排上山,说:“不要误会,不要打枪,我们是奉命来接叶军长的。”在顽军108师副官处长说明来意后,为了全军的命运,叶挺不顾个人安危,随与来人下山,去见他的保定同学上官云相。但叶挺这次一去即遭扣留。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昨天负伤阵亡。经过7天7夜苦战，新四军9000多人，惟有第1纵队一千多官兵在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率领下杀出重围，少部分被俘，大部战死。

项英、周子昆与军部副官刘厚总（又写为刘候忠，后改名刘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则隐蔽在树林里，他们巧妙地躲过了搜山的顽军，乘空隙来到东山、西山两个大山沟里。在一个多月之后，又转移到丕岭下，他们在内覃仓附近的深山老林里隐蔽到3月11日。当时军部教导队工兵连副连长刘奎在老百姓的引路下，会见了项英、周子昆。尔后刘奎将项英、周子昆等转移到莲坑，在地下党员姜其贵家里，他们吃了一餐苞米饭，休息到拂晓前，即转移到田坑里沟尾子上。这里的山腰有上、下两个洞，相距70多米，小洞叫蜜蜂洞，在上面，地势极为险峻，洞口小，进去头都抬不起来，只能容纳三、四个人。项英、周子昆、刘厚总、警卫员黄诚四个人住在蜜蜂洞中。

3月13日夜，雷雨交加，一片漆黑。14日凌晨，刘厚总叛变，他枪杀了项英、周子昆，打伤了黄诚，并且抢走法币两万多元、黄金8两5钱，然后逃之夭夭。刘厚总到皖南行署报功请赏，却被送到重庆，关进白公馆，以后死于兵荒马乱中。

叶挺下山被扣押，送上饶关入李村监狱。他在狱中墙壁上写了两行大字：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叶挺于1941年冬被送往重庆，关在望龙门2号。在被押解到重庆近郊途中，叶挺佯称要入厕，趁看守不注意，他把一纸条及5元钱用小石头压在地上。纸条子上写着：我吃了官司，纯属冤枉，哪位仁人君子见了此条，代为寄信，家中就知道我的下落

了。果真天下有此仁人君子,后来,他的信寄了出去。

不几天,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秘书阳翰笙忽然收到一封信,信中并没有留下寄信人的地址,信末只署一个“夷”字。阳见信中说,他已经被押解到重庆,并提到阳翰笙的老朋友、音乐家任光在皖南事变中阵亡。当时阳翰笙断定这是叶挺的亲笔信,于是他马上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一见信,欣慰地说:“失踪了的希夷有了下落了,我们可以向蒋介石要人了。”

叶挺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四个春秋。他在重庆红炉厂蒋家院子的囚室里,把所写的《囚歌》赠给郭沫若。《囚歌》也因此不胫而走: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望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严正交涉下,叶挺出狱,恢复自由。叶挺出狱后的第一天,就向中共中央申请重新入党。3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叶挺为中共正式党员。4月8日,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而从重庆乘飞

机回延安。当时叶挺、邓发等也随机同行。飞机飞至山西兴县黑茶山时出事坠毁，遇难者之中的叶挺享年 50 岁。正是：英雄宁肯沉冤而死，决不高官厚禄而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远征缅甸 戴安澜马革裹尸 西辽突围 左将军为国捐躯

话说1941年12月8日,日本派飞机偷袭美国珍珠港,并正式对英、美宣战。日本像一条疯狗,见人就咬,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日本军在占领香港后,随即横扫东南亚,兵锋直逼缅甸。从12月20日开始,以泰国曼谷为基地的日军第10飞行团,连续3天出动100余架飞机,对缅甸首都仰光和毛淡棉、土瓦等地狂轰滥炸。驻泰缅边境的日军第55、第33师团也越过边界,向仰光挺进。缅甸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岂肯白白地让这只金孔雀被日本人夺走呢!滇缅公路是中国的输血管和生命线,中国自然也不能坐视日军切断这条大动脉。

日本成了中英两国共同的敌人。1941年12月10日,英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丹尼思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请求,请中国派兵入缅布防,保卫缅甸。为了我国西南交通线的畅通,蒋介石当即答应了英国的请求,于11日向我国五大王牌军主力的第5军、第6军发布了入缅作战动员令。第5军军长、黄埔一期毕业的杜聿明下令第200师师长、黄埔三期毕业的戴安澜,新22师师长、黄埔二期毕业的邱清泉,荣誉第1师师长、黄埔一期毕业的郑洞国,率部开赴云南保山集结,待命入缅作战。

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学名炳阳,1904年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仁泉乡风和村。父亲戴礼明以务农为业,母亲汪氏生下六

个子女,戴安澜排行第三。1924年3月;他在叔祖父戴端甫的影响下,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参加东征、北伐,1933年任关麟征25师145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古北口战役,苦战三昼夜。他在战场上负伤,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云麾勋章。1939年1月,在湖南湘潭,戴安澜接替杜聿明,升任第5军200师少将师长。在宣誓就职时他表示:“尽竭尽全力,练成劲旅,为国驰驱,歼灭倭寇。”不久,200师移防广西全州,进行整训。他把夫人王荷馨及子女接来全州,为自己提出了四条行为准则:“毁誉不闻,宠辱不惊,安危不动,得失不患。”并订下座右铭:“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恃;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恃不求不惧,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

戴安澜率200师在参加昆仑关大战时,他发出豪言壮语:“中国古时有状元三鼓夺昆仑之佳话,吾拟元旦夺取昆仑关。”在战斗打响后,他亲临前沿指挥,经过一个月的苦战,昆仑关三失三得,歼敌6000多名。上级命令200师等待换防,在此之际,戴安澜巡视阵地,不料敌之一发炮弹爆炸,弹片直穿他的左背。在身负重伤后,他被送往医院治疗。在战后,获四等宝鼎勋章,并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戴安澜于1942年3月奉命作为先头部队进入缅甸。出国前夕,他作战前动员,以岳飞、文天祥为榜样,激励官兵的爱国热情,并亲自谱写战歌《战场行》。官兵们高唱战歌,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缅甸。作为第5军先锋的第200师,当时其出发的场面,尤为威武而壮观:在空中有英国空军和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保驾;地面上铁流滚滚,马达雷鸣。其上千辆坦克、炮车、弹药车、装甲车、救护车、通讯车、辎重车、给养车、油车、指挥车犹如钢铁巨龙,沿滇缅公路向南,出保山,渡怒江,过龙陵,越芒

市,直奔国门哧叮而去。在大路两旁,有各族民众夹道相送,为中国的远征军壮行。只要军车一停,各民族男女老少就一拥而上,献米酒,做山茶,递云烟,送食品,犒劳官兵。

200师远征缅甸之举,宣告了当时被人们称为“ABC联盟”的美、英、中三国联手抗日的格局业已完全形成。这是一个强大的联盟,当时中国远征军是全副美式装备,官兵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高唱着远征军战歌踏上了缅甸的国土。在远征途中,戴安澜豪情满怀,即兴赋七绝两首:

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
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
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
澄清宇宙安黎庶,力挽长弓射夕阳。

全师日夜兼程,3月7日到达仰光北部重镇同古(又名东瓜),此时已远离后续部队达5000公里。同古是仰光至曼德勒铁路线上的第一大城,3月8日,日军占领仰光,企图在雨季到来之前,会师曼德勒。远征军决定,200师在同古及其以南地区阻止日军北进,掩护我军主力于平满纳一带集结。在英军协助下,我军与日军进行会战,先求击破当先之敌,再求收复南缅甸。戴安澜接替了英军的防务,并掩护英军撤退。3月19日,日军摩托车队北进,在经过皮尤河大桥时,遭到200师的伏击,震惊中外的同古保卫战拉开序幕。200师在没有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与4倍于己的兵力作战,极其艰苦。戴安澜抱着牺牲的决心,召集营以上的军官会议,并带头宣布在其阵亡后的代替人,各级干部也均表示与同古共存亡的决心。戴安澜在留给其夫人王荷馨的遗书中曰:“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战,决心全部牺

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同时,他还给负责军需工作的徐志模、志川、王尔奎写信,对身后的事作了安排,例如遗属的生活,请他们予以关照。在信上说:“我们或为姻戚,或为同僚,相处多年,肝胆相照,而生活费用,均由诸君经手。余如战死之后,妻子精神生活,已极痛苦,物质生活,更断来源。望兄等为我善筹善后;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想诸兄必不负我也。”

在敌之正面攻击遭到顽强抵抗后,其便改为迂回侧击。3月25日,敌军占领同古以北的飞机场,切断了远征军的交通线,并从南北西三面包围同古。29日拂晓,200师奉命转移,给日军留下了一座空城。同古保卫战,不仅掩护了英军撤退,还取得歼敌5000余人的胜利。在战斗刚一结束,蒋介石就驰电嘉许戴安澜:“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本军队的武士道精神。”戴安澜坚守同古12天,给日军以沉重之打击。

在同古阻击战胜利后,戴安澜奉命转移至叶新。喘息未定,他又奉命驰援在西路乔克巴唐被围的英军;刚解围,他又奉命收复失守的棠吉。4月29日,腊戍沦陷,日军切断了远征军的退路,缅甸战局日趋恶化。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命杜聿明的第5军3个师向伊洛瓦底江西岸退却,并进而往北,向八莫、密支那撤退。从此,中国远征军陷入了惨败的境地。戴安澜率200师1万余官兵不得不忍辱负重,艰难举步,向北方热带丛林中撤退。

200师北进的线路,不仅山势崎岖,森林密布,缺乏给养,而且途中敌人又设置了一道道封锁线。全师官兵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同困难进行斗争。每通过一道封锁线,均需与敌人展开血战;每渡过一条大河,都要架浮桥,或编木筏横渡;没有绳索,就用战士的绑腿,其艰难之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以后每通过一道河川、公路,他们都要派侦察兵化装成缅甸人,先到指定地点作好准备,夜间行动。

戴安澜率 200 师官兵在缅北山区辗转前进。5 月 18 日夜
间,在郎科地区通过细包到摩谷的公路时,与埋伏在公路西侧的
日军 56 师团两个大队遭遇。200 师在前卫部队通过后,敌人开
始猛烈地射击。当时戴安澜因为回国作战心切,就离开了师长
的位置,亲赴前线进行指挥。在林密夜深的情况下,双方发生混
战,全师官兵激战一夜,才摆脱了埋伏的敌人。在这场夜战中,
200 师损失惨重,599 团团长、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柳树人;副团
长、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刘杰先后阵亡。在战斗结束后,未找到
戴安澜师长的踪迹,参谋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周之再冒着其
生命危险,多方搜索寻找,最后才在路旁草丛中发现戴师长身负
重伤,血流不止。戴师长胸部、腹部各中一机枪子弹,伤势十分
严重。师部立即召开各团团长和直属营长会议,通报戴师长受
伤情况。戴师长自知伤势严重,当众留言:“如我殉国,由步兵指
挥官、598 团团长郑庭笈带领部队,回到祖国。”郑庭笈,字竹斋,
黄埔军校五期毕业,海南琼州人。他的兄长郑挺锋是黄埔军校
三期毕业,与戴安澜是同窗。

戴安澜负伤后,由士兵用担架抬着,他想回到祖国的怀抱。
5 月 26 日这一天,日近黄昏,他们终于来到了茅邦地界只有三
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戴师长听说已经到了离中国不远的茅邦
地界,激动得几乎忘了伤口疼痛,一下子从担架上直起身子,叫
参谋长拿来地图,他用手指着说:“部队应在这儿渡河,沿西岸前
进……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到我国国境了,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说到这里,他的伤口一阵剧烈地疼痛,他差点儿昏迷过去。

戴安澜的伤口,由于没有药物,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已经严
重发炎溃烂,常常疼痛难忍。但在表面上他却装作若无其事的
样子。是的,他要坚持,要用自己坚定胜利的情绪影响他的部
属,鼓励他们树立信心,战胜困难。他吩咐卫士帮他整理好衣

冠,扶起他向北瞭望,他断断续续地说:“反攻,反攻,祖国万岁!”下午5时40分,一代名将戴安澜壮烈殉国,时年仅38岁。茅邦距离云南边境线刚好也是38公里,就差半天的路程了,然而他没有活着回到祖国的怀抱。

6月17日,第200师官兵抬着师长的灵柩回到了祖国云南。当灵柩经过昆明、贵阳、桂林,运抵第5军的发祥地广西全州时,沿途祭奠的人群络绎不绝,夹道致哀,家家素烛白花,人人挥泪执紼。

戴安澜的副官刘镜平,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戴师长殉国后,由工兵营赶制棺材将遗体入殓,由8个士兵抬着行军。但山高路险,行进困难,一天只能行30华里,加之天气炎热、遗体腐烂发臭,实难再抬,所以高吉人代师长(黄埔四期毕业生)开会决定,于5月29日用火焚化,尸骨再焚后,装入骨灰盒,由特务连连长背着回国。6月17日,部队到达云南腾冲县境,6月25日,到达保山,终于完成了戴师长的遗愿——将全师带回祖国。由于作战伤亡、沿途病死,全师仅剩4千余人。

在重庆的蒋介石闻知戴安澜殉国后,悲痛不已,亲作挽联祭奠这位爱将:

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

马革裹尸酬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为戴安澜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领导人也纷纷撰写挽词、挽诗、挽联,遥祭忠魂。

毛泽东的挽诗是: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黑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竞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的挽词是:

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

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伤,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1942年10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追晋戴安澜为陆军中将,批准他的英名人首都忠烈祠。

为表彰戴安澜在缅甸战场的卓越功勋,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2年10月29日追授戴安澜懋绩勋章,戴安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1956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

中国远征军于1942年深入缅甸与日军作战失利后,由于有一部分军队撤到印度境内,所以后来又陆续空运补充一部分中国军队到印度,并接受美国的训练。同时,从缅甸撤到滇西的中国远征军,经过整顿、训练后,于1943年4月在云南楚雄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由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陈诚任司令长官,10月由卫立煌将军接任。6月,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成立,由美国陆军将军史迪威任总指挥,我国罗卓英任副总指挥。两军准备从印度和我国云南西部同时向侵占缅甸和我滇西的日

军进行反攻，并打通中印公路。

中国远征军由罗卓英、杜聿明带领第5军、第6军、第66军三个军共10万余人驰赴缅甸。黄埔将领杜聿明、郑洞国、宋希濂、霍揆彰、黄杰、陈明仁、甘丽初、邱清泉、戴安澜、刘伯龙、李弥、高吉人、阙汉騫、潘裕昆、郑庭笈、廖耀湘、黄翔等人，多为第一至第七期学生，其他中下级军官，大都是黄埔军校本校及各分校的八至十八期毕业生。在各部队中，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占绝大多数。即使前身是东北军的53军也是如此，其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约占总数的70%。据云南腾冲国殉公墓对第20集团军腾冲抗日阵亡将士统计：阵亡官佐493人；占阵亡总人数的5.7%；阵亡士兵8178人，占94.3%。以此推算，在中国远征军中参战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约万余人，其中伤亡的约5700余人。在远征军中的高级军官阵亡的师级干部除戴安澜外，还有第5军96师副师长、黄埔三期毕业的胡义宾，新38师副师长齐学启、黄福臣、洪行，团长、黄埔五期毕业的柳树人、李颐、刘杰、凌则鸣、黄景升、覃子斌等多人。

黄埔十一期毕业的新38师少校营长张琦为掩护英军突围，于1942年4月在缅甸仁安羌光荣牺牲。英皇为感谢中国军队解救英军，特颁给时任新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一座金星勋章，颁给张琦营长一枚银星勋章。由于当时战事频仍，这枚银星勋章未能及时颁发给张琦烈士遗属，而一直由孙立人将军保藏，由此而成为孙立人的一桩心事。孙立人在赴台后，被蒋介石以“兵变”罪而遭半生软禁。这位陆军二级上将、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陆军总司令在“平反”后，于1989年4月亲自为张琦烈士撰写碑文，并专派蒋元先生借回大陆探亲之际，将该枚银星勋章交给张琦烈士的女儿张锦兰，以了却他一生中的宿愿。张琦烈士家住湖南祁阳，后由中共祁阳县委统战部部长谭国文、副县长刘新普

代表县人民政府把 47 年前英皇颁给张琦烈士的银星勋章,转颁给张琦烈士的女儿张锦兰;同时蒋元(黄埔十八期毕业)先生代表台湾孙立人将军,送给张锦兰女士慰问金 1 千美元,一时传为佳话。

戴安澜的金星勋章至今仍由其子女保存。

中国远征军(包括驻印军)先后出动 31 万多人。第一次入缅失利,伤亡、失踪 6.1 万人,反攻缅甸时,滇西远征军伤亡 6.7 万人,缅北远征军伤亡 1.7 万人,共计伤亡 14.5 万人。据日本厚生省救援局 1952 年的调查,在缅北和滇西战场上,日军先后投入兵力 30 万人,战死 18.5 万人,敌 18 师团、56 师团、2 师团、53 师团、49 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日方《大本营陆军部》摘译资料竟称之为“全员玉碎”。

1943 年 10 月,揭开了缅北滇西反攻的序幕。其时,日军的缅甸方面军有 11 个师团,近 30 万人马。中国驻印军从印度的列多以南地区出发,向侵缅日军攻击。我官兵经一年多作战,先后赢得了胡康河谷战斗、孟拱河谷战斗及密支那等战役的巨大胜利。在中国远征军的配合下,遂又攻克八莫、南坎等地,并乘胜向滇西畹町推进。

1944 年 5 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天险,从滇西开始反攻。将士们坚持血战 8 个月,连克日军重兵防守的腾冲、松山、龙陵、芒市等重要城市。1945 年 1 月下旬,盟军终于和中国驻印军在畹町胜利会师。

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以数万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反攻缅甸作战的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打通了中印公路,解除了日军对中国战场西侧的威胁,打破了日军对美国援华物资的封锁,同时减轻了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并在国际上博得了崇高的荣誉。

1992年4月,追随戴安澜将军赴缅抗日的原200师步兵指挥官、黄埔五期毕业的郑庭笈为悼念戴安澜师长,曾写诗一首,曰:

英雄伟业壮山河,五十春秋一瞬过。
俎豆千秋滇缅血,中华万代鲁阳戈。
昆仑关上倭军泣,抗战碑前汉将歌。
国爱豪情争献酒,炎黄昌盛慰公多。

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的方慕韩之女、中国诗词学会顾问方淑慎曾撰五绝一首,题名《戴安澜将军滇缅战场殉国》:

异域南征远,丛林雾暑天。
饥餐茶叶苦,露宿雨汀寒。
浴血茅邦渡,捐躯腊戍湾。
三军归国日,恸哭大江边。

郑庭笈、方淑慎的诗,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抗日将领戴安澜的缅怀与追思。当时的30万中国远征军健儿,如今大部分已作古,他们为祖国牺牲的精神,值得后人们承传,历史将永远铭记着这一页。

再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其英勇杀敌,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活动,牵制在华日军无法一举吞并中国的英雄事迹也是有目共睹的。共产党方面的黄埔军人为捍卫社稷作出了贡献,付出了鲜血。周恩来运筹帷幄,殚尽竭虑,台儿庄大捷,基本上就是采取他所提供的战略方案。在太原会战中,林彪、聂荣臻指挥的八路军115师,则协同政府军参加右翼战斗序列,是共产党军队最初参加对日本军队的战争。平型关大捷,取得了中国军队抗战

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徐向前在山西,左推右挡日军的“6路进攻”、“9路进攻”,致使日军宣告失败。大江南北,有陈毅领导的新四军驰骋其间,同样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从东北到华南,游击队神出鬼没,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最高将领、副总参谋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左权,他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左权,湖南醴陵人,原名左纪权,字叔仁,1905年3月15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2月,他由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亲自为其主持了入党仪式。进入黄埔军校后他参加了以周恩来为领导的学生组织火星社,后来组成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他为该会之负责人之一。在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参加了东征。1925年11月,左权因学习、战斗表现突出,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深造,后又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刘伯承曾称赞他:“始终是一个最进步、最诚朴、最本色的同学。”左权因学习成绩优秀,为他以后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6月,他奉调回国到达上海,随即由党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中工作。在离沪之前,他给家里写信:“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9月,左权进入苏区龙岩,正值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闽西分校创办,即被任命为该校教育长。1930年11月,红12军成立,22岁的左权任军长,战功赫赫。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陕北高原,左权指挥作战,初露军事才华。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出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当他走马上任时,即1938年党的六届八中全会上,王明还质问彭德怀:“怎么能让左权这样有托派嫌疑的人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提起此事就气不打一处来,闷闷不乐。他说:“只要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

左权这顶“托派”嫌疑人的帽子又是如何戴上去的呢？这话还得从他在莫斯科留学时说起。左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曾与邓小平、杨尚昆、蒋经国、邓文仪等同学。王明当时与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声气相投，借“肃托”运动之机，他大挖托派分子。一些平时不买他账的人，也被王明戴上这顶可怕的帽子。那时候一些江浙同学放假在一起吃顿饭，就说他们是搞小集团，所谓“江浙同乡会”一案，就是王明一手制造的。左权虽不是江苏、浙江人，但因与江浙同学俞秀松、孙冶方、陈启科等人经常在一起，所以也就被王明册封为“江浙同乡会”的卫士。左权有口难辩，只好不断申诉。1928年秋，上级经过审查，确定不存在此小组织，但给左权的结论留了个尾巴，说只是部分同学有感情的结合，“这种结合发展下去是对党不利的”，左权“行为不检”，给了个“党内劝告处分”。

左权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上阵的。在江西参加反“围剿”战斗时，他在红一军团任参谋长。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都是黄埔出身，同学师长之间配合默契，这使他感到格外的愉快。后来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左权就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1936年11月下旬发生的山城堡之战，左权与他的黄埔一期同窗、国民党“天下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第1军78师师长丁德隆，第1军95师师长李铁军大战一场，胡宗南折戟于老同学手下。此战结束后，“西安事变”爆发，因而山城堡一战，也就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战。

抗战爆发后，左权于1937年8月率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初，八路军总部到达山西武乡县。4月，日军集结3万余人，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进攻，企图一举歼灭八路军总部，消灭其主力部队，彻底摧毁共产党在太行山的抗日根据地。左权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

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作战,并与参谋长叶剑英配合密切。当时叶剑英经常陪周恩来赴国统区参加谈判,因而八路军参谋长一职,几乎由左权代行。他率警卫团直接参加战斗,连战近1个月,歼敌4000余人。这不仅粉碎了日本“9路围攻”,同时还收复了辽县等18座县城,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这一仗,使上百万人民群众从日寇占领下解放出来。左权采用“拦头、堵尾、冲腰”的战术,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利用夜间对敌分割、围歼,并乘胜追击溃逃之敌,充分显示了左权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左权参加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和“黄崖洞保卫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1年11月,日军开始了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对我太行山地区发动了以捕歼我首脑机关、摧毁我兵工厂为目标的所谓“捕捉奔袭”。日军36师团和419混成旅团共7000余人,从山西黎城疯狂地向黄崖洞袭击,企图一举摧毁八路军兵工厂。黄崖洞位于黎城县城西北45公里的山区,下有直径30米、深50米的天然石洞。兵工厂设在洞南的水窑山下,四面群山环抱。左权直接指挥总部特务团抗击敌人。在战前,他指示:部队的具体战法叫做“咬牛筋”,要掌握一个稳字,以守为攻,以静制动,先在山口处顶两天,杀杀敌人势头;在第二道防线再顶两天,然后再上高山,待增援部队赶到再来个反包围。左权规定全团坚守的时间以5天为限。

在敌人可能进攻的地段和道路上,左权军构筑了以地堡为主的坚固明暗火力点、简易投弹所和堑壕,组成了多层综合而密集的火网,并利用踏雷、滚雷、吊雷、绊雷,设置大量地雷群、地雷组和地雷网。为了保证战斗力的持续性,左权要求在各工事内,屯积7至10天的干粮、水和足够的武器弹药,并组织兵工厂工人自卫队,分成地雷班、突击班、侦察班、留守班和收容班。

按照左权的周密部署,从11月10日傍晚起,经过8昼夜激战,我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兄弟部队、工人、民兵的支援和配合下,以1500余人的团队,抗击了7000多敌人的进攻。我军仅以伤亡166人的代价,赢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创造了抗日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中共中央军委在《1941年战役综合研究》中指出:“黄崖洞保卫战为我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以“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荣誉称号。当时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同志说:“如果没有左参谋长的精心策划与指挥,这场战役是打不赢的。”

1942年2月,日军发动了以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为目标的“二月大扫荡”。总部决定暂时转移出麻田。左权在先护送走彭德怀和罗瑞卿之后,又折回来指挥战斗。此时,他所指挥的仅有一个警卫连,却与上千的敌人交火达两个多小时,在给敌人以重创后,才从容地离开了麻田。

日军在“二月大扫荡”被击破后,经过两个多月的苦心拼凑,其在晋东南周围又集结约3万多兵力,并采取远距离奔袭和“铁壁合围”战术,发动了又一次“大扫荡”。此时,八路军总部、北方向、总部党校进行集中学习整风的几千名干部,都在日军合击的范围内。而当时的守备部队却只有两个团。随着日军的包围圈逐渐缩小,情况愈来愈紧急。彭德怀、左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机关分头突围,由两个团在东西两个方向阻击掩护,突围战斗由左权指挥。5月24日,总部机关乘夜转移突围,在一个晚上冲过日军三道封锁线,到达十字岭。这时,日军以数倍于我的兵力,两翼包抄袭击,同时日机也在不停地漫山轰炸。左权看到情况危急,一边命令部队坚决阻击,一边派人护送彭德怀到安全地区。当时有的同志苦苦地请求他赶快离开,而左权却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自己先走。6月2日,就在队伍冲向日军最后一道封

锁线时，一颗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左权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7岁。

在突围之前，左权给远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写了最后一封家书，他表示：“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力求进步，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青山在颤抖，江湖在呜咽，大地也在向左权致哀。左权的高尚人格，还表现在于逆境中，从不迷失方面，对党、对革命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1931年，王明在党中央诬陷左权是“托派”，左权从红15军军长兼政委降为红军学校教官。他于1941年12月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我没有犯过有损于党的过失，也没有在任何斗争情况下动摇过，也没有在艰难困苦面前低过头。……我没有灰心与气馁，总以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中、工作中去表白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来安慰自己。”

彭德怀1942年为左权撰写了《碑志》：

左权同志，湖南醴陵人，幼聪敏，性沉静。稍长读书，即务实，向往真理尤切。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始学于黄埔军校，继攻于苏联陆军。业成归国，戮力军事，埋头苦干，虚怀若谷，虽临百险，乐然不疲。以孱弱领军长征，倍见积极果决之精神。中国红军之艰难缔造，实与有力焉。迨乎七七事变，倭寇侵袭，我军奋起抗敌。作战几遍中原。同志膺我军副参谋长之重责，五年一日，建树实多。不幸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五日清漳河战役，率偏师与十倍之倭贼斗，遽以英勇殉国。闻得年仅三十有六。壮志未成，遗恨太行。露冷风凄，恸失全民优秀之指挥，隆冢丰碑，永昭坚贞不拔之毅魄。德怀相与也深，相知更切，用书

梗概，勒石以铭。是为志。

朱德撰文称赞左权是“八路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并赋诗赠烈士遗孀：“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周恩来指出：“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尤其是对于十八集团军和敌后人民，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山西辽县改为左权县，并在涉县石门村西北太行山麓修筑了左权将军的陵墓和纪念塔。1950年10月，中央又将左权的灵柩移葬于河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1984年，胡耀邦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指示有关部门查清了左权的所谓“托派”问题，撤销了对左权的处分。左权之子左太北于同年8月专程赴太行山左权殉难的麻田村十字岭，为父亲祭奠，告慰英灵。正是：“身瘁军务劳，死显灵魂美；将星悲殒落，楷模千古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湘西会战 王耀武耀武扬威 日寇投降 黄埔英烈垂青史

话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发动了三次长沙会战，均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第一次是1939年9月中旬，日军以10万兵力，并在舰艇、飞机的支援下，从赣北、鄂南、湘北向长沙进攻。第9战区薛岳指挥20万军队参战，尽管最后挫败了敌人的攻势，但国民党也伤亡惨重。长沙大火，酆悌、文重孚、徐崑三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死得不明不白，直至张治中受到撤职留用的处分，一场风波才告平息。1941年9月，日军集结12万兵力，分两路直逼长沙。其左翼由平江至株州一线包抄我军第9战区的主力部队；另一路沿粤汉铁路正面南下攻打长沙。当时薛岳指挥13个军约17万人利用有利的地形，在正面逐次抵抗，后将日军主力诱往长沙东北和东面之山地前，反击而歼灭之；同时又以7个军的重兵集团威胁左翼日军的侧翼和后方，日军被迫向北狼狈逃窜。此外，我第5、第6两战区的部队向汉口以西一线的宜昌、荆门也发动了反攻。会战结果，日军伤亡两万余人，其不得不于10月中旬撤回出发地。1941年12月，日军又疯狂地发动第三次进攻长沙的战役，调集兵力12万多人。我第9战区投入兵力有13个军，约17万人。12月24日，日军强渡新墙河向南进犯，在渡捞刀河后，于1942年元旦向长沙猛攻。我长沙守军连续地打退了日军3天的猛

攻,战斗空前激烈。日军死伤惨重,且弹粮补给不上。当时,我长沙外围的部队,向长沙合围。日军无可奈何下令分路突围。我军乘胜堵击、侧击和尾追敌人,取得了长沙会战之大捷。

长沙三次大战,黄埔军校毕业的将领云集,关麟征、李天霞、王耀武、李默庵、张灵甫、覃异之、夏楚中、陈沛、李玉堂、廖龄奇、宋瑞珂、方靖、梁汉明等几乎都担任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当然,非黄埔出身的薛岳、王陵基、杨森、罗卓英等也是统帅中的一级将领。长沙会战结束,黄埔四期毕业的74军58师少将师长廖龄奇,因临阵脱逃,而被蒋介石枪毙,这是继酆悌、文重孚、徐崑之后又一个被判死刑的黄埔将领。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10军190师少将副师长、黄埔四期毕业的赖传湘壮烈殉国,事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1943年10月,日军驻华侵略军横三勇的13军,分别由沙市、岳阳渡过长江及湘江,大举向鄂西南和湘北的常德地区进犯,其主力指向湘北的津市、澧县、石门、临澧、桃源和常德。另以39师团向鄂西南的松滋、洋溪、枝城等县进攻。这股日军的攻击目标是渔洋和湘北的所市,以此掩护向常德进攻的日军第13军主力在侧背的安全。

国民党参加常德会战的有罗广文的18军,王甲本的79军,方靖的66军和川军44军、10军以及桂军46军等。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乃是黄埔三期毕业的国民党五大主力的王牌军74军军长王耀武。他率领511师、57师和58师迎战敌人。51师师长李天霞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老大哥,57师师长余程万也是黄埔一期的师兄,58师师长张灵甫是黄埔四期毕业的,算是师弟。王耀武,山东泰安人,字佐民。论资历,他远赶不上手下的两位师长;论出身,早年曾在上海一家饼干公司当店员非名人之后;论派系,他既非浙江派,又非湖南派。然而他却是荣登“五虎将”

宝座的山东大汉。在山东籍的黄埔学生中有这样一句流传较广的说法,即“三李不如一王”。“三李”指毕业于黄埔一期的山东人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一王”当然就是指的王耀武。在常德会战时,74军的番号称为“辉煌部队”。在国民党黄埔高级将领中,王耀武是凭一刀一枪搏杀出来的,他带兵得法,战功显赫。他23岁走出黄埔军校大门,在东征时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1师3团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引起师长何应钦、团长钱大钧的注意,因而很快就被提拔为上尉连长。

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以少将旅长的身份,将方志敏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重兵围住,红10军团副军团长兼红19师师长、著名将领寻淮洲就在谭家桥战役中牺牲。

淞沪之战,王耀武率74军51师坚守青浦,血战竟日,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撤退。王耀武率部击毙日军联队长竹田和炮兵联队长英森,受到上级通报表扬。事后《申报》、《大公报》均报导了第51师的战绩,还刊登了王耀武的照片。

在淞沪会战后,51师与58师合编而成为74军,军长由黄埔一期毕业的俞济时担任,王耀武由少将升为中将副军长兼51师师长,并成为74军的主将之一。

蒋介石要调俞济时去任新5军军长,74军由王耀武升任军长。俞在走时,想把自己的基本队伍58师带走,这引起王耀武的不满。他知道,自己资历浅,不便告状,于是托病在重庆迟迟不上任。白崇禧和前新5军军长徐庭瑤,同俞济时宿有芥蒂,于是两人便在蒋介石面前参了一本,说俞济时非机械化人才,恐难胜任斯职。蒋介石闻奏后,批示“可考虑另选”,就此杜聿明升任新5军军长。俞济时乃浙江奉化人,与蒋介石是同乡,其遂被调任为侍从室侍卫长。王耀武把有战斗力的部队视同生命,因而他不惜任何代价与黄埔一期的老上司反目。蒋介石为此专门在

重庆林园官邸召见王耀武,对他大加赞许。后来王耀武在回忆文章中谈到了他当时的心情:

那时我非常感激校长对我的爱护,伯乐识马,蒋公识人,我下决心把74军整训好,使之成为纪律好、能作战、不怕死、听指挥的部队。

74军所辖51师、57师、58师,师长分别是李天霞、余程万、廖龄奇。在廖被枪毙后,58师由张灵甫接任。第一次长沙会战,王耀武率部拦截日军,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这为夺取整个会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1941年春,他参加了著名的江西上高会战,这次会战使74军赢得了“抗日铁军”的光荣称号。在上高会战中,王耀武率51师师长、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李天霞堵击日军,仅激战一天,就消灭日军1600多人。李天霞也是一员虎将。解放后电影《南征北战》中的那位“李军长”就是以他为原型写成的。在上高会战中,实际上,李天霞完全不是其电影中那副贪生怕死、猥琐狼狈的模样。他指挥的51师在猪头山、教鼓岭与日军激战,场面极其壮观。日军大贺师团长亲自督战,出动飞机百多架,反复地轰炸74军阵地,仅投下的炸弹就有1700多枚。王耀武、李天霞七次发起反冲击,在肉搏中击毙敌兵20余人。在历时25天的战斗中,其歼灭敌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演田以下15000余人,被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在这场战斗中74军荣获国民党军中最高奖品飞虎旗,57师被命名为“虎贲”师。王耀武、施中诚、余程万、张灵甫、李天霞等黄埔战将曾先后被授勋;张灵甫在1941年冬被提升为74军58师少将师长。

1943年8月,王耀武被升任为第5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爆发,日军以3个师团5万余人围

攻74军57师驻守的常德城达16个昼夜,最后只占领常德8天,就被王耀武所指挥的部队从外围反击夺回来了。

74军57师师长、黄埔一期毕业的余程万,号石坚,广东台山入,荣获过“虎贲”师的光荣称号。早在1943年5月鄂西会战时,57师就进驻过常德。当时,日军已攻陷华容、石首等地,并在湘北集结重兵,大有南下之势。常德城因此一度陷人恐慌之中,居民逃避一空。在57师入城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他们将街道、楼宇、店铺收拾得井井有条,打扫得干干净净。部队一律不许擅入民宅,也不准动用民众的任何物品。鄂西会战结束,57师立即开出城外,移防城郊河湫山。当时,军纪严明的57师,使常德市民大为惊喜,他们交口称赞57师是“王者之师”,是常德的守护神。眼下,“虎贲”部队再次开进常德城,必然会受到全城的居民更为热烈地欢迎。

常德会战,74军57师以8300余人的兵力,孤军奋战,坚守孤城。部队同火力、兵力占绝对优势的5万日军苦战16昼夜,最后全师只剩下321人。他们顶住了日军的空军轰炸、大炮攻击、毒气弹的射杀以及火烧全城的威胁,击毙日军109联队长布上照一大佐及6联队长中烟护一大佐等共1万余人,创造了抗战史上的一大奇迹。常德会战被誉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此战中57师169团团长、黄埔五期毕业的柴意新少将壮烈殉国。日军从12月3日占领常德起,前后仅3天,中国军队即从外线开始反攻;12月11日,余程万率领57师80余人便引导鲁道源的58军收复了常德城。日军仓皇撤退,58军、72军、44军跟踪追击,一直把日寇赶到百里之外的澧县,隔河对峙。

但是,在常德会战后,余程万不仅没有得到鲜花和荣誉,反而差点招来杀身之祸。原来,这是蒋介石中了日本人的离间计

所导致的。在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开罗会议结束前，日本人故意在报上发表了几张中国士兵在常德城上举白旗投降的假照片，使蒋介石在会上大丢脸面。蒋介石一怒之下，下令逮捕余程万，并准备枪毙他。幸亏俞济时、王耀武一大批黄埔师兄师弟竭力为余程万申辩求情，他才幸免一死。在真相大白后，余程万于1945年被释放，并恢复了军职、军衔，再次受到重用。1950年余程万赴台湾，后定居香港，1955年被杀害。在常德烈士陵园里虽然没有余程万的任何记载，而在常德人民的心中，余程万竟成了一位传奇人物。

王耀武在常德会战后，因战功卓著而被擢升为第24集团军中将军总司令，辖4个军11个师，所部12万余官兵，已成为坐镇一方的统帅。

在常德会战时，国民党73军暂编5师师长、黄埔四期毕业的彭士量，湖南浏阳人，1905年生。1943年11月2日，他率部镇守石门，激战数日，始终拒敌于门外，至14日，石门一带炮火连天，笔架山、大尖山、孙家大山，山山如火在熊熊燃烧，长枪大炮，白刃相接，暂编5师终于寡不敌众。为保全有生力量，彭士量率部突围。正当杀开血路之际，彭士量不幸中弹殉国。在装敛烈士遗体时，发现他写的一份遗嘱：

余献身革命，念兹于军，早具牺牲决心，以报党国。兹奉令守备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歼彼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憾。惟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任务。

在这遗言中无一字提及个人家事，军人的职业道德在字里行间体现得最为典型。彭士量文武全才，在考入黄埔前，曾是湖

北明德大学学生。彭士量殉国后,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中将。

在常德会战中,另一名阵亡的黄埔将领是黄埔六期毕业的第10军预10师少将师长孙明瑾。在长沙会战时,他是预10师的参谋长,与黄埔三期毕业的师长方先觉均是治军能手。孙明瑾是陆军大学14期及陆大研究院毕业,以该师28团为例,会战中阵地四次失而复得,连伙夫、马夫都披挂上阵,一仗打下来,全团仅幸存58人,而其尚依然坚守阵地直至反攻,从此,预10师被人刮目相看。方先觉在任10军军长后,孙明瑾晋升为师长,参加常德会战。孙明瑾率部从衡山驰援常德,解救被包围的74军57师。孙部与日军数度相遇而战,但目标始终直指常德的德山方向不变。1943年12月1日,部队因历经战阵,伤亡惨重。在常德外围赵家桥一带指挥战斗时,孙师长临危不乱,沉着应战,不幸负重伤而牺牲。殉国后,他的遗体没有葬于安徽宿迁原籍,而是葬于他预10师建军的衡山山麓,烈士的身躯恰如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一样伟岸高大,令人景仰。

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的最后一战,是1945年4月在湘西的雪峰山战役。此战役就在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故乡沅陵、安江、芷江、武冈一带的湘西山区。

日军为了摧毁设在湘西芷江的中美空军基地,打开湘黔门户以威胁重庆,其调集了5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1个独立警备队和1个飞行团共8万余人的兵力,分为三路向湘西雪峰山地区发动大规模地进攻。

中路由日军116师团担任主攻,企图在洞口、江口地区围歼我军主力,然后长驱直入,深入雪峰山区,攻占安江、芷江。

南路由68师团、34师团担任助攻,经武冈、武阳、瓦屋塘、洪江等地从左翼向安江、芷江包抄攻击。

北路的47师团则经新化、辰溪、溆浦一线从右翼向安江、芷江包抄攻击。64师团佯攻宁乡、益阳，牵制湘北的中国军队，使之无法南下增援。

针对日军的这一极其狠毒的战略部署，国民党调集了73、74、100、新6、18等6个美械装备军，2个重炮团和中美混合航空团，共约17万兵力，沿雪峰山东麓布防。

王耀武为雪峰山会战总指挥官，也就是第4方面军司令官。他的74军已交给黄埔军校毕业的原副军长施中诚接任。74军为报常德会战57师8000名兄弟牺牲的仇恨，师长李琰、参谋长马增基十分坚定地说：“这次决不能放过116师团，一定要为常德会战死难将士报仇！”

王耀武与第3方面军密切配合，利用地形、构筑工事，在战争初期有力地遏止住敌人的进攻。由于制空权已由美军掌握，因而日军采取以联队为作战单位的灵活战术，轮番强攻，冒险西犯。王耀武所部17万人以逸待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初战即获胜利，打死打伤日军5000多人。初战告捷后，我军士气大振。战役历时长达两个多月，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后来，王耀武指挥部队从防御转入反攻，日军已狼奔豕突，溃不成军。

5月5日，日本在中国派遣军新任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停止作战；6月3日，湘西雪峰山战役落下帷幕。雪峰山之战，计伤毙敌28174人，俘敌军官17人，士兵230人，战马347匹，火炮24门，机枪100挺，步枪1300多支，其他战利品20吨。此是抗日战争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最后一仗，获得空前大捷。在整个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极少像这样威风凛凛，扬眉吐气。

当时芷江的中国陆军总部和美军作战司令部里，均热闹非凡，喜气洋洋。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将军和参谋长巴特鲁将军由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4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74军军长施

中诚等亲自陪同,来到74军57师171团2营驻守的青岩阵地视察,随行的中外记者有20余人。由2营营长李光亮、5连连长周北辰带着这一大群中外将军、记者到各阵地据点视察。这时,阵地上硝烟未散,弹痕累累,一片狼藉。李营长介绍说:

“青岩扼江口要津,敌人1个联队的兵力,反复冲锋8次之多,最后周北辰连长身先士卒,与突入之敌肉搏,才将敌人击退。”

这里的漫山遍野都是日军尸体,其中还有一位是大佐联队长。战后,李光亮被授予美国金星勋章。据战后统计,此战仅74军共3个师28000余官兵参战,歼敌12500人,自身伤亡5200余人,战果可谓辉煌。国民党军委会授予74军57师武功状两轴,荣誉旗1面,以表彰其龙潭之战的胜利。

此时世界战局正在急骤变化。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7日,德国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胜利结束。至此日本已完全处于孤立无援、最后挣扎的境地。日军为应付苏军在远东的军事行动,不得不收缩华南防线,冈村宁次命令日军撤退湘桂铁路沿线兵力,转运到华北,准备对苏作战。

国民党军在湘西反攻胜利后,接着收复南宁、柳州、桂林。5月18日,日军从福州撤退,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东北。8月13日,盟军收到了东京关于在保存天皇制度的前提下愿意无条件投降的建议。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天皇裕仁公布《终战诏书》,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一天,东京上空,一架美式B-29轰炸机撒下了10万份《告日本人民书》的传单:

……日本政府已提出投降,每个日本人都有权知道条件内容以及美国政府代表美、英、中和俄国对它所

作的答复。

传单还摘引了日本人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条件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的答复。

8月15日12时正,日本裕仁天皇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紧接着,南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司令官冈村宁次正式接到大陆令第138号“8月16日19时7分即停止战斗行动”的电报。同时,冈村宁次还收到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发给他的电报,命其通令所属停止军事行动,并称“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冈村宁次向所属日军官兵发出了即时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并复电蒋介石:“他准备从南京城撤到郊外,留部分骨干军维护城里和平秩序,以等待中国军队来接收。”

根据蒋介石的要求,为进一步商洽投降事宜,8月21日,冈村宁次派他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飞往湖南芷江洽谈投降之事宜。

中国方面要求,日洽降代表不得超过5人。

8月21日的湘西小城芷江,妆扮得像个新娘。城内搭起了一座座松柏牌楼,上悬“胜利之门”的大字横幅。芷江机场跑道和外侧草坪上排列着成百辆吉普车和各种型号的军车来自四面八方的记者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可知到了预定时间中午12点,仍不见日本飞机的踪影。11分钟后,伫立机场苦候的人们终于看到这架两翼下各缀一面日本国旗、两翼尾端分别拖着4公尺长的红布条的墨绿色飞机。在飞机着陆后,今井武夫头戴硬壳帽,小鼻子上架着黑框大眼镜,臂挎黑包,腰挂短剑,他神情木讷地走下机舱。这时我新6军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走过来,他

命令日军投降代表下机列队,由宪兵搜查全身,没收了所有的武器及违禁品,接着领日本人至插白旗的吉普车旁让记者照相。

洽降会场原为空军第五、第六队俱乐部。通往它的左右两个路口各搭起一座牌楼,上面缀有V字,扎着“和平女神”,左边还缀有“公理”二字;右边则缀以“正义”二字。在会场前的空地上高竖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

下午4点,今井带领三名随员(参谋2人,翻译1人)穿过侧廊,走进会议厅。

厅正中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它的对面墙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旗中间嵌着一个金字大“V”。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早已正襟危坐在受降席上。他的前面是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条桌,右边坐着副参谋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冷欣中将;左边坐着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译员王武上校。

从各地赶来列席会议的有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及文职人员也在座,从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背景阵容。中美记者100多人从狭小的会场一直挤到外面的走廊里。

9月9日9时,中国的政治家们根据星相家的感受,选定这个“三九良辰”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设在南京黄埔路黄埔军校礼堂。礼堂内在受降席的两侧和二楼的观礼席上,400余名中外官员和记者均已经到位。在礼堂顶部的水银灯忽地全部打开,整个大厅光芒四射。这时陆军总司令、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一级上将何应钦率4名受降官步入大厅,全场来宾肃然致意。他的右边是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左边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翻译王武上校则立于何应钦身后。

8点58分,在中国陆军中将王俊的引导下,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领着今井武夫陆军少将等9名投降代表进入会场。按照既定的程序,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在盖章时他的一枚水晶图章给目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太阳旗从天而落,120万“大日本皇军”举行焚旗仪式。

9月11日,即“密苏里”号投降签字仪式后的第9天,南京受降后的第2天,在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呼吁下,麦克阿瑟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日本39名战犯,其中日本前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名列榜首。9月19日,盟军总部又追加逮捕了原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等11名战犯。

从1946年初至1949年1月,全国各地受理侵华日军案件2200余起,处死刑者145起,处有期或无期徒刑者400余起,其余战犯全部释放回国。美国占领区及巢鸭军事法庭对日战犯判刑2678人,其中死刑501人。英国占领区军事法庭判处日本战犯818人,执行死刑者240人。菲律宾军事法庭判日本战犯197人,死刑80人。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判处日本战犯533人,死刑120人。苏联判处了12名日本细菌战犯有期徒刑,另有千余名日本战犯后来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

1948年12月22日午夜23时30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坂垣征四郎、武藤章等7名甲级战犯在日本东京巢鸭监狱的一间方形屋子里上了绞刑架,东条英机在临死前赋诗一首,诗文曰:“此一去,尘世高山从头越,弥勒佛边唯去处,何其乐。明日始,无人畏惧无人愁,弥勒佛去唯寝处,何其悠。”他上绞刑架,走到第13级台阶,还无耻地提议道:“请松井君带领大家三呼天皇万岁!”于是松井石根便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天皇陛下万岁!”另有三人应和:“万岁!万岁!万万岁!”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站在绞刑台上,他们的头上被蒙

上黑布罩，绞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商震将军及美、英的代表到场监刑。总行刑官向临刑官报告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随之发布了执行命令。死囚脚下的活门猛地弹开，死囚倏地掉了下去，吊索唰地绷直了，吊索剧烈地抽打着，遂即从陷坑里传出痛苦的呻吟声。过了几分钟，一位美国法医和一位苏联法医带着听诊器走到刑台的后面。零时 11 分，他们走了出来，同一位美军上校低语了几句，那位上校转过身来，面向监刑官报告：“罪犯业已毙命！”此时美军士兵抬着单架走到刑台下面，约翰·伍德从腰间的刀鞘里拔出了伞兵刀，以他那刚劲的动作割断了绳索。尸体被抬了出去，但它们的脖子上仍然勒着黑色的索扣。接着坂原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作为第二批又引上了绞架。7 名甲级战犯的尸体当即被秘密运往横滨市区的久保山火葬场焚化。为了不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留下可作悼念的遗物，其骨灰被美军军舰载于 100 海里以外的洋面弃之于海中。

在东京审判的 25 名甲级战犯中，除 7 人被判处绞刑外，还有 15 人判处无期徒刑，他们是：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贺屋兴宜、田敏太郎、白岛敏夫、大岛浩、荒木贞夫、星野直树、小昭国矶、俊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铃木贞一、佐藤贤了、桥本欣五郎、冈敬纯。东乡茂德被处以 20 年徒刑，重光葵处 7 年徒刑。

在东京审判甲级日本战犯的同时，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侵华的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共办案 52 件，均处死刑。其中有屠杀南京 30 万居民的杀人魔王谷寿夫，还有矶谷兼介、酒井隆、高桥坦三名高级将领；有疯狂屠杀中国民众的田中军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松本浩、三岛光义等凶手；日本宪兵大佐队长膳英熊及大尉中队长古性与三郎在徐州处决。田中久一、近藤新入两个中将师团长在广州处决。

八年抗战,中国平民百姓共死亡 1800 万人,军队伤亡 800 万人。1945 年据中共“七大”召开前的统计:抗战中,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其死难烈士 75 万人,其中共产党员 32 万人;日本军队死亡 41 万人,伤 97 万人。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黄埔军校的师生奔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并肩作战,前仆后继,英勇杀敌,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师级以上的高级将领就达 50 多位,他们是:

左 权:黄埔一期,八路军副参谋长。

郑作民:黄埔一期,国民党 2 军中将军长兼 9 师师长。

蔡丙炎:黄埔一期,国民党 18 军 67 师 201 旅少将旅长。

黄梅兴:黄埔一期,国民党 88 师 264 旅少将旅长。

姚中英:黄埔二期,国民党 156 师少将参谋长。

胡义宾:黄埔三期,国民党 5 军 96 师少将副师长。

吴继光:黄埔二期,国民党 58 师 174 旅少将旅长。

戴安澜:黄埔三期,国民党 5 军 200 师少将师长。

王 竣:黄埔三期,国民党新编 27 师少将师长。

朱 赤:黄埔三期,国民党 88 师 262 旅少将旅长。

高致嵩:黄埔三期,国民党 88 师 264 旅少将旅长。

易安华:黄埔三期,国民党 87 师 259 旅少将旅长。

赵尚志:黄埔五期,共产党抗日联军 2 路军副总指挥。

彭士量:黄埔四期,国民党 73 军暂编 5 师少将师长。

赖传湘:黄埔四期,国民党 190 师少将副师长。

杨 杰:黄埔四期,国民党 1 军 1 师 1 旅少将副旅长。

谢晋元:黄埔四期,国民党 88 师 524 团少将团长。

罗芳珪:黄埔四期,国民党 13 军 529 团少将团长。

梁希贤:黄埔五期,国民党 80 军新编 27 师少将副师长。

王剑岳:黄埔五期,国民党 57 军 8 师少将副师长。

陈文杞：黄埔五期，国民党 80 军新编 27 师少将参谋长。

孙明瑾：黄埔六期，国民党预 10 师少将师长。

官惠民：黄埔四期，国民党 270 旅少将旅长。

黄启东：黄埔五期，国民党 23 师少将参谋长。

燕鼎九：黄埔四期，国民党游击 22 纵队少将副司令。

赵一曼：黄埔六期，共产党东北人民革命军 3 军 1 师 2 团政委。

王润波：黄埔三期，国民党 25 师 149 团少将团长。

张本禹：黄埔三期，国民党 12 旅少将副旅长。张治中将军的胞弟。

周复：黄埔三期，国民党鲁苏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

蒋志荣：黄埔一期，国民党浙江台州守备司令部少将司令。

张雅韵：黄埔一期，国民党新编 15 师 44 团少将团长。

杨家骝：黄埔五期，国民党 360 团少将团长。

刘世焱：黄埔二期，国民党暂编 8 师少将团长。

陈忠柱：黄埔六期，国民党鲁苏皖边区少将游击司令。

吕旗蒙：黄埔五期，国民党 31 军少将参谋长。

张友清：黄埔六期，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刘眉生：黄埔五期，国民党 85 师 510 团少将团长。

以上仅列举黄埔一至六期毕业、职务在团长以上、军衔在少将以上的抗日阵亡将领。至于团长以下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其死于抗日战场上的那就数以万计，不胜枚举了。

在抗战中，也有因作战不力而被军法制裁处以死刑的黄埔学生。如黄埔一期的长沙警备司令部少将司令酆悌、黄埔一期的龙慕韩少将、薛蔚英少将；黄埔四期的廖龄奇少将等。然而，在抗战中，投降日军的黄埔将领却是极少的。如黄埔三期毕业的国民党 10 军军长方先觉，在孤军守衡阳时，由于弹尽援绝，被

迫投降,日军封他为“先和军”司令。但不久他即逃离日占区,回到重庆,被蒋介石称为“中国军人的典范”,并继续受到重用。正是:八年抗日敌投降,血肉拼回久陷疆;顽寇低头齐缴械,义民拍手庆还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重庆谈判 两宿敌初次握手 为了和平 张治中三飞延安

话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他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向毛发邀请电的主意，是吴鼎昌在8月13日向蒋提出的。吴鼎昌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是蒋的近臣。蒋采纳了吴的建议，并嘱他起草了以蒋介石的名义致毛泽东的第一份电报。蒋为什么会同意吴鼎昌的这个建议呢？他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打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毛泽东果真要来，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仍然可以按既定方针消灭已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目的是，蒋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吴鼎昌献给蒋介石的是一着“妙棋”，而对毛泽东来说，则是一着“刁棋”。

第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

悬盼之至。

蒋中正 未寒

那时，电报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未”即8月，“寒”即14日。

电报于8月16日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蒋介石有意将此事公开，他是想，不论毛泽东来与不来，都要让群众知道。

8月16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朱德在8月1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批驳了蒋介石8月11日命令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不许受降错误决定，同时提出了中共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

在收悉蒋介石第二次电报后，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口号。毛泽东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8月25日，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七位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26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同日，还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电，要

求美军派专机,并请美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同往延安。中共这一要求是必要的,如果蒋介石派出的飞机在途中“失事”,那蒋介石是可推卸责任的。

1945年8月28日上午8时30分,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延安枣园中央驻地走出来。周恩来停下脚步,并上下打量着毛泽东。毛说:“怎么?嫌我穿得太洋气?”为赴重庆谈判,叶剑英特地为毛买了一双皮鞋,又在北京订做了一套蓝灰色中山装。周恩来说:“主席戴的帽子好像有点小。”毛的礼帽是江青昨天到苏联医生阿拉夫那里借的。周恩来摘下自己的盔式帽子,递给毛。毛戴上,不大不小正合适。

这天,延安飞机场万人空巷,大家表情沉默,都为毛泽东此行担忧。上飞机前,一行人排成一行横队拍照留念:毛泽东的两侧,站着昨天飞来接毛的张治中和赫尔利,然后依次是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陈龙。胡是秘书,陈为警卫员。

28日下午3时37分,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的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毛泽东的到来,并没有给予高规格的迎宾仪式,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没有政治首脑人物。毛泽东一下飞机,作了如下简短谈话:

“本人此次来重庆,是应国民政府主席蒋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

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毛泽东、周恩来、赫尔利、张治中四人上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派出的 2819 号防弹轿车,直奔中山四路 18 号张治中的住所“桂园”。蒋介石派的 2823 号专车紧随其后。

当时张治中正准备安排午餐,其实已是晚饭之际,他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说晚上 8 点半要在山洞林园官邸宴请毛泽东。

毛泽东刚从延安的枣园,来到张治中的桂园,又要到蒋介石的林园去了。去林园之前,他由周恩来陪同,先匆匆前往重庆红岩嘴 13 号,会晤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编辑部的部分同志。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起乘车于当晚抵达坐落在重庆西郊歌乐山区的山洞林园官邸,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早已在一号楼前恭候了。昔时原本隔着“汉河楚界”厮杀的国共两党首脑和“棋手”,今日终于笑脸相迎,初次握手言欢。蒋介石称毛泽东为“润之”,毛泽东则称蒋介石为“蒋先生”。

蒋、毛在十九年前的广州国民党“一大”会议上见过面,那时候并没有单独谈过话,也没有握过手。蒋氏夫妇引导毛泽东、周恩来等步入客厅,一一介绍作陪的客人:赫尔利、魏德曼、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蒋经国。

在这些客人中,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时,周恩来、邵力子都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当时是人伍生总队总队长,周至柔是黄埔军校教官,毛泽东曾作为名人到黄埔军校向全校师生作过讲演,陈诚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黄埔军校教练部副官。如今他们又在林园相聚,共同的话题当然是十九年前黄埔军校的那段美好回忆了。

蒋介石滴酒不沾,毛泽东的酒量也不大,但此刻在盛宴上他们也几度举杯,互祝身体健康。蒋介石知道毛泽东嗜辣,特地吩

附在毛面前放了一碟红色尖椒。毛泽东知道蒋忌烟味，烟瘾甚重的他也只好在席间不抽一根烟。

晚宴盛况用《新华日报》8月29日报道的话来说，是“空气甚为愉快”。

那天夜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蒋介石写及的“正午会谈”，是指那天中午他召集各核心人物会议，应急讨论国共和谈事宜。

是夜，毛泽东宿于林园官邸2号楼底层东屋，王若飞住底层西屋，周恩来则住在林园3号楼。毛泽东的贴身警卫龙飞虎、陈龙这一龙一虎和衣躺在毛泽东卧室前的客厅沙发上，以防不测。

8月29日晨5点多，毛泽东下床轻轻走出卧室，离开2号楼，沿着林间小道慢慢踱步，不想正面遇着习惯早起的蒋介石，两人寒暄之后，坐在一对鼓形石凳上谈起林园，谈起这林园的原来主人林森，双方都在寻找共同的话题，谈得很融洽。

当天上午，举国瞩目的国共重庆谈判在林园3号楼举行。双方就有关程序作了初步会谈，下午国共会谈正式开始。国民党代表有外交部长王世杰，四川省主席张群以及张治中、邵力子。共产党代表有周恩来、王若飞。随后，双方进行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就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蒋介石不是没有准备，而是想后发制人，使自己在谈判中处于主动地位。

毛泽东则说：“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

不料，蒋介石插话道：“中国没有内战。”

毛泽东立即予以反驳道：“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的磨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

新来乍到的友好气氛戛然而止，双方在谈判桌上开始了唇枪舌战。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其事前并没有任何谈判方案。不过，处于形势所迫，蒋介石在 28 日只得向国民党代表宣布谈判的三原则：

- 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
- 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 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当然毛泽东也自有他的谈判原则，那就是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适当让步是有一定限度的。毛泽东在延安就说过：“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蒋要“统一政令军令”，毛要“地盘、军队得到承认”，双方开价、还价差距甚大，由此谈判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对重庆谈判形象地打了个比方：“老头子和青年

人难成婚姻！”毛泽东笑答：“不行的话，可以刮胡子嘛！”蒋介石不愿“刮胡子”，重庆谈判的进展维艰！

毛泽东一行于8月30日迁往市区曾家岩50号红岩，当地人称之为中共驻重庆“大使馆”。然而这幢房子太小，且远离市中心，上山石级又多，来访者多不方便。因此最后，毛泽东就歇脚张治中的“桂园”，白天他在此会客，晚上再回红岩过夜。

经过几天的初步交谈，中共方面于9月3日提出了方案，共11条，要点如下：

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的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惩办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9月4日，中共方案提交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看了，在当天日记中写着读后感：“脑筋深受刺激。”

蒋介石亲自拟订了另一方案，即《对中共谈判要点》，这“要点”一开头便道：“中共代表们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第二条尚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即不应提出。”于是，蒋接着抛出了

“要点”共四条：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员参加。

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亦可予以考虑。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双方谈判的核心是军队，毛泽东此时已拥有 100 多万军队，至少也要编 16 个军 48 个师，蒋只准编 12 个师。那时，蒋的军队为 263 个师，即使中共编 48 个师，国民党部队仍为中共的六倍。

谈判地点从林园改到桂园，又从桂园改到曾家岩安德里蒋介石的侍从室尧庐。

9 月 12 日中午，蒋介石邀毛泽东午餐。在午餐后，双方就军队问题作进一步会谈。9 月 17 日，毛泽东赴林园与蒋介石再次会谈，赫尔利在场。

在谈判桌上，双方僵持。谈判桌外，蒋介石与毛泽东频频交往，相敬如宾。

重庆谈判历经 43 天，毛泽东先后会见了陈立夫、戴季陶、白崇禧、翁文灏、王云五、熊式辉等这批国民党要人。同时，毛泽东还广泛地接触社会各界名流，如宋庆龄、张澜、章伯钧、罗隆基、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郭沫若、柳亚子等。

在 9 月 2 日清晨，柳亚子应毛泽东之邀，前往红岩见面。柳

亚子本名柳慰高，江苏吴县人氏，出自书香门第，曾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作为书生气十足的柳亚子，实在不习惯于官场。1926年5月，柳亚子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与毛泽东初识，两人一起品茶论诗，很谈得来。十九年后，他们在重庆重逢，柳亚子写下了《赠毛润之老友》一诗：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这首诗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10月7日，毛泽东作了一首《沁园春·雪》给柳亚子。后来，柳亚子和画家尹瘦石在重庆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大厅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展出了柳亚子和毛泽东的诗词，一时山城和诗之风大盛。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引起参观者莫大兴趣，传抄者甚众。此是一则插曲。

且说重庆谈判进行了一个多月，10月8日晚，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在林森路的军委会礼堂邀请了党国要人、社会名流600多人，出席在那里举行的鸡尾酒会，为即将离渝的毛泽东盛宴饯行。在鸡尾酒会毕，毛泽东和张治中兴致勃勃地观看京剧，周恩来、童小鹏也在座。忽见一人神色紧张前来找周恩来。此人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当即离席，在外面与来人谈了一阵子。回席时他脸色凝重，但未去惊动兴致正浓的毛泽东和张治中。周恩来把正在看戏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张镇请出会场谈话，然后，两人一同离开礼堂。

事情是这样的。中共党员、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时任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10月8日下午，坐办事处黑色轿车，送柳亚子由曾家岩50号周恩来公馆回沙坪坝住所。过去，

李少石被国民党逮捕押往南京时，柳亚子曾出面营救，与李少石有着不平常的友情。在送柳亚子回家后，已是下午5点多了，李少石仍坐原车、沿原路返回城里。车子经过红岩嘴下上湾时，突然响起枪声，子弹从车后的工具箱射入，从李少石左侧肩胛进入肺部，李少石顿时血流如注。司机熊国华见状，驱车直奔城内金汤街市民医院抢救。7时45分，李少石因流血过多而去世。

周恩来与张镇赶到医院时，已是8时50分，晚了一步。周见李少石遗体，泪如雨下——他不由得想起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遭刺杀的情景。廖仲恺当时是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传说曾由蒋介石作媒，介绍给黄埔一期的陈明仁，陈因表白家有爱妻遂作罢。廖梦醒后来与李少石结婚。

李少石，广东新会人，19岁考入岭南大学，20岁加入中共，他在岭南大学与廖梦醒相识，一起发动工人罢工。后来，李被校方开除，便转往上海、香港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李和廖梦醒结婚。李少石曾被叛徒出卖，遭国民党逮捕，1937年经中共再三交谈，李终于被释，1943年夏调重庆工作。

李少石的遇害，使周恩来马上想及的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他随即对张镇说：“请你协助办两件事。第一，详细调查李少石遇难的原因，迅速查明真相；第二，晚会结束后，用你的车，由你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村，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张镇一口答应照办。之后周又和张匆匆地赶回军委会礼堂，且晚会仍在进行，毛泽东和张治中仍在全神贯注地看戏。

事后查明，原来是驻璧山炮兵团派到重庆请领冬服的一排人，因未领到衣，仍原车回璧山。在回来的路上，遇有一辆黑色轿车把一个士兵撞倒，在旁的另一个士兵喝令停车，轿车却扬长而去。于是那个士兵在一气之下，就朝车后开了一枪。而那个受伤士兵已送到小龙坎传染病医院抢救，开枪的士兵也已查获。

被撞伤的士兵叫吴应堂,开枪的是下士班长田开福。

周恩来排除了“政治性谋杀”的怀疑。黄埔一期毕业的宪兵司令张镇在“李少石事件”中,认真负责,迅速破案,功不可没。

10月10日午后,在张治中家的客厅里,国共两党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通篇可用“求同存异”四个字来概括。在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苦。”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期望在《双十协定》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11日清早,毛泽东向蒋介石辞行,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

11日上午8时,蒋介石委派陈诚作为他的代表,和毛泽东一起去九龙坡机场,为毛泽东送行。9时1刻,3辆小轿车从林园官邸到九龙坡机场,到机场送行的有陈诚、郭沫若及夫人、张澜、邵力子及夫人、陶行知、章伯钧、茅盾等,另外还有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

毛泽东在机场对记者发表了谈话时说:“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

9点45分,毛泽东、张治中、王若飞同行,登上一架绿色C-47型飞机直飞延安。下午1时30分,飞机安全在延安机场着陆,两万多群众载歌载舞欢迎毛泽东胜利归来。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以《关于重庆谈判》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在重庆谈判中,张治中是一位真心希望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历史,笔者在本书前几回里已作过介绍。他在黄埔军校任过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总队长,是第四期第三团团团长,参加过北伐。黄埔军校迁南京后,他于1929年5月升任为教育长,一直到抗战开始,他均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他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37年他主动请缨参加淞沪抗战。调任湖南省主席后,张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的指示,发生长沙大火,蒋推卸责任,给张革职留任处分。1939年调任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在任职期间,他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协助蒋介石工作。他给自己制订了“自律三端”的准则,即“严守机密、一切须站在领袖的立场、寡言少语”,从而更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1940年,张治中调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教育和三青团工作。

在蒋介石的文臣武将中,敢于对他犯颜直谏的人为数不多,张治中算是其中的一个。在和蒋相处的25年中,他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净臣。张治中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三次长达万言。其中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呈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之失,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次重庆谈判,也是张治中向蒋建议,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张治中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张亲自接送,并把自己的住所“桂园”腾出来,自己一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的旧平房里暂住。毛泽东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后,为张治中举行了欢迎会;张治中第二天离开延安,毛泽东亲自送他到机场,在车上他对张治中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

1946年2月28日至3月6日,为了检查《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曾到北平、张家口、济南、徐州、太原视察,于3月4日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当晚举行了欢迎晚会。会上,张治中风趣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全场热烈鼓掌,一时传为佳话。

1946年初,张治中被国民党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即将赴任之前,一天上午,周恩来与邓颖超前来为其送行,张治中与夫人洪希厚接待之。当年,周恩来在广州与邓颖超结婚时,张治中曾参加了他们的结婚喜宴;1940年6月6日,张治中的大女儿张素我和周嘉彬结婚时,张治中在重庆嘉陵宾馆为他们举行婚礼;邓颖超代表周恩来也曾赶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所以,周恩来与张治中的私交很深,虽然在谈判桌上,各不相让,争论不休,但私人关系还是很亲密的。这次周恩来夫妇前来,一来是钱行,再是有一件重要的事相托。周恩来对张治中说:“盛世才是个杀人魔王,在新疆的暴行,文白兄是知道的。这是一起特大的冤案,请你们到新疆后,首先查明主要中共负责人陈潭秋、徐杰、林基路、毛泽民是否还活在人间,还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她是文白兄在上海大学的同学,请你到新疆后,认真调查这一批被盛世才关押的中共党员,他们的处境很悲惨,生活十分艰苦,请先给予救助,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些钱,最后请你们用尽一切方法,把他们释放出来。”

张治中慨然答道:“释放政治犯是《双十协定》规定了的,当然要执行。我到新疆后一定快办,请你们放心。至于带钱去改善生活,这用不着,这点小事我还办得了。”

周恩来考虑得很细,于是又叮嘱说:“考虑到由新疆到延安路途遥远,情况复杂,如这一百多人释放后,让这些人自己回延

安,恐怕不行,还得请你们在释放后派人和车护送到延安才行。”

张治中爽快地答应:“好,我们一定照办。”

张治中平生是个极重允诺的人,他到新疆后,就派屈武去监狱探望杨之华。在了解情况后,张治中命机要秘书余湛邦将中共 131 名被临禁人员的案卷移交于西北行营驻迪化办公厅第二组的党必刚,由他具体承办以后释放和护送的事宜。张治中把这一任务交给倾向于民主进步的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陶又把任务交给该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承办。于是这一批中共人员被释放后于 1946 年 7 月 8 日到达陕甘宁边区的鸡加村,中共中央、边区政府、西北局都派人来接。朱总司令亲笔写了给张治中的道谢信,并附赠狐皮筒子一件,由刘亚哲带回新疆复命。毛泽民是毛泽东的胞弟,他和陈潭秋等中共领导人却被盛世才杀害了。这年 6 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我中原军区发起进攻,挑起全面内战,幸好另一批中共人员早日回到延安,不然,后果也不堪设想。

1949 年 4 月 1 日,以张治中为首,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组成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进行和平谈判。这次和谈,双方成员中在黄埔军校工作过或学习过的又占了一大半,即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共六人。由此可见,黄埔军校集中了国共两党的精英,他们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天下午 6 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六人来到六国饭店看望南京和谈代表,并设便宴款待代表团全体人员。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毅然决然地留在北平,并公开声明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在解放军进军大西北时,张治中亲自致电新疆的国民党领导人陶峙岳、包尔汉。他们后来于 1949 年 9 月

25日、26日先后率部通电起义,使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进入新疆。张治中由于三飞延安,几次代表国民党与中共和谈,因此赢得了—个“和平将军”的称号。

张治中、周恩来两人在长达20多年的交往中,以道义相砥砺,在关键时刻进忠言,充分表现了两人的诤友关系。建国以后,周恩来、张治中两家人都住在北京,往来接触更加频繁。周恩来、邓颖超对张治中—家非常关心,体贴照顾。张治中的大女婿周嘉彬、女儿张素我1949年在甘肃会同新疆部队起义后飞往香港。解放后,张治中十分惦念。周恩来托在广州的叶剑英帮助办理回国手续,使他们—家人很快得以团圆。张治中的三女儿张素初原留学美国,也得到照顾,提早返回北京,与父母团聚。

张素我在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将她介绍给外交部长王炳南。不久,张素我被分配到外语学院担任教师,周嘉彬被安排到华北革大学习。

60年代末,我国政府释放了—批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周恩来授意张治中宴请在北京的原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周振强等及其家属,张素我和周嘉彬也被邀请。张素我在外语学院教书、下课后坐公共汽车赶来,还是迟到了。—到场,张治中就严厉地批评了张素我。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旁替张素我解释:“她有课,有工作嘛!”—句话,给张素我解了围。

最使张治中—家感动的,是周恩来、邓颖超对他患腿神经痛十分关心。周恩来每次出国,都给张治中带来—些珍贵药物,仅1961年经邓颖超送给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亲收的就有虎骨胶两盒、燕窝两斤、香蕉—篓。

余湛邦手中还保存着邓颖超1961年10月12日给张治中的亲笔信:

文白兄：

恩来告我，你需要虎骨胶治病，现将尚存的两盒送上，以供应用。这种药品是去年他访问柬埔寨时华侨所送的。另送你燕窝一斤，请哂收。

嫂夫人前问好。

即祝健康！

邓颖超

1961.10.12

“文革”当中，张治中受到严重冲击，周恩来处境也很困难。但周恩来得知张治中受到冲击后，马上派人把张治中保护起来，并且在红卫兵集会上解释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接送毛主席，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后来，康生、江青等开列的人大、政协的黑名单中，“张治中”三个字赫然纸上，康生造谣说：“马明方等叛徒同张治中勾结，隐瞒了叛变历史，回延安潜伏下来，是一批定时炸弹。”

周恩来针锋相对，批驳康生的谣言，他说：“张治中释放和护送被盛世才监押的中共人员回延安是应我党的请托，对这批同志中央早就做了结论，没有问题。张治中是做了一件好事。”

张治中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正如周恩来所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回忆说：“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前，曾经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大家提出许多方案，多数人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张将军和一些人认为：‘共和’本来就具有民主的涵义，何必重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行了。最后大家一致通过。”

余湛邦还回忆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上有一篇讲话刊在红卫兵小报上。毛谈到：‘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民主党派还是要，政协还是要……’‘右派’两字使张耿耿于怀，‘朋友’使张多少有点慰藉，称‘朋友’绝不会是‘敌人’吧。从此，张将军寡言少语，时露抑郁之色。1967年国庆节，张将军以久病之身，由警卫员推着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又见到了毛泽东。张对毛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了吧！’在当时的情况下，敢于在毛泽东面前提这样问题的人是没有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这也是张将军敢言直言的最后一次表现。”

张治中一生光明磊落，敢于犯颜直谏。他曾经在国共分裂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可以劝蒋，但不能反蒋，我是坚决主张联共，反对两党分裂的，我既不能站在国民党立场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这正好是张治中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心里话。正是：一生忠心赤胆利国为民，千古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抄斩群奸 军统头大摆“鸿门” 罪有应得 周佛海痰死虎狱

话说 1945 年的中秋之夜,上海杜美路 70 号门前车水马龙。原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伪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原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官的缪斌,伪浙江省长丁默邨等数百名汪精卫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将领,手执军统局特务头子、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戴笠的请柬,前来出席中秋赏月晚宴。花园洋楼里灯火辉煌,鼓乐齐鸣,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大小汉奸战战兢兢地步入宴席大厅,他们的心里七上八下地在打鼓。这顿丰盛的佳肴,也许就是他们的“最后的晚餐”。

50 余桌宴席甚为丰盛,高脚酒杯在灯光下熠熠闪烁,霓虹灯交织辉映,照得大厅一派富丽堂皇,真是花好月圆,灯红酒绿。酒过三巡,黑黝马脸的戴笠站了起来,用鼻音很重的浙江江山官话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

戴笠的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这座中美合作所与军统局的联合办事处一时竟云集了这么多的妖魔鬼怪!席间一派乌烟瘴气,没有美女的歌声,更没有欢笑,只有死一般地沉寂。

这次晚宴是戴笠的稳兵之计。说它是“鸿门宴”也无不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5日,国民党陆军总部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何应钦任主委。同时,各省市也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战区司令长官主持。军统局的戴笠在日本投降前夕,即和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赶到浙江淳安,成立“中美合作所前进指挥部”,亲自指挥“中美所”王乐坡部队、忠义救国军毛森第5支队和陈昂林的清白行动队,以及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阮清源所属的特务武装部队,由浙西首先进入杭州、上海。随即国民党第3方面军汤恩伯部也进入上海。

为稳定社会秩序,戴笠以军事委员会名义派汪伪浙江省政府主席丁默邨为浙江军事专员,又派大汉奸周佛海为军事专员兼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还派任援道为江苏省行动总队总指挥。

当时周佛海试图“邀功”,与任援道密谋,想把大汉奸陈公博等一网打尽。由于事机不密,被陈公博获悉,陈即于1945年8月25日率汪伪安徽省长林柏生、汪伪中央军校教育长何炳贤、伪经济部长陈君慧、汪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岑德广、汪伪侍从室主任周隆庠、陈公博的妻子李丽壮、立法委员莫国康等人,由日本军事顾问雄川中尉陪同,由南京飞往日本。

陈公博是汪伪政府第二号汉奸头目,广东乳源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1年3月与陈独秀等在广州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不接受党中央领导等原因,被开除出党,同年赴美留学。1925年4月,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后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兼黄埔军校政治讲师。陈公博既是中共叛徒,又是追随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的大汉奸。汪精卫在1935年11月在南京中央党部遇刺,其肋下子弹发炎,兼又患严重的糖尿病,于1944年3月赴日本就医。11月10日下午在汪死于日本名古屋后,陈公博

代理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1945年10月初,经重庆国民政府照会日本,将以上潜逃的一批大汉奸从福冈被押解回国。

中秋聚宴后的第三天晚上,戴笠手下的100多个行动小组,把印制精美的请柬又送到各个汉奸的家中。大小汉奸咽着唾液按约来到愚园路公馆。岂料这次是真的“鸿门宴”,公馆的门坎内侧像一个陷阱,汉奸一进门脸色就大变,进来一个变一个。他们在荷枪实弹的军警面前只好乖乖地缩着身子站成一溜。一天之内,持请柬自动送上门的大小汉奸共有一百多人。戴笠对他们说:“根据国民政府制订的惩治汉奸条例,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到检举。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到监狱去。”

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同时也采取诱捕的方法,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委员王揖唐、王荫泰、齐燮元、汪时璟、殷汝耕、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伪广东省长褚民谊,伪内政部长梅思平,伪司法部长李圣吾,经理总监岑德广,伪山东省长马良、杨毓珣,伪山西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琅等也分别被捕。

在1945年秋冬的肃奸行动中,军统局代表国民政府前后在各地捕捉汉奸4692人,其中移交各地高等法院审理者4291人,移送军法机关审理者334人,移送航空委员会讯办者24人,在押病死者43人,同时查封逆产1456户。

1945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946年底为告发汉奸截止日期。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于1948年1月5日宣布:据各省市已报汉奸案件经检查办结内,起诉的为30828人,免于起诉的为20718人,其中判处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大汉奸陈

公博、繆斌、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傅式说等 50 余人均判处死刑；陈璧君、陈则民、钱谦、周贯虹近百人判无期徒刑；周佛海先判处死刑，而后因被蒋介石赦免，改判无期徒刑；丁默邨被处死，罗君强也被判无期徒刑。

现在，单把曾在黄埔军校当过党代表的汪精卫、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黄埔军校政治讲师陈公博、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繆斌这四个黄埔军校败类列出来说一说，看看汉奸的下场。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是南京伪国民政府的“三巨头”。

汪精卫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按其一生的演变过程，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 1905 年至 1927 年，他追随孙中山积极从事反对清朝封建专制，拥护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在中国政坛上成为左派领袖。当年因舍身谋刺清廷摄政王载沣而名噪中外，那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义无反顾的豪情壮志，令孙中山刮目相看。1927 年“七一五”分共之后，他从反蒋到投蒋，“假左派真右派”的观点被暴露无遗，即 1927 年到 1938 年，汪既投蒋又反共。自 1938 年至 1944 年 3 月汪精卫死于日本，这是最后一个阶段。他公开叛国投敌，破坏抗战，卖国残民，还厚颜无耻地自称“曲线救国”。这时，他已是彻头彻尾的大汉奸、卖国贼。他组织伪政府，上演了一幕幕政治闹剧，为世人所不耻。

汪精卫由一个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革命青年，堕落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就是他的人生轨迹。战局演变令他深感前途黯淡，不免有日暮途穷之叹，他曾在一首送别诗里写道：

把酒长亭杯已空，行人车马各西东。

枫林不共斜阳去，自向荒郊寂寞红。

汪精卫一生有5个女人和他关系密切。他对爱情的畸形追求,只不过是一段历史笑料而已。第一个闯进他生活的,是父母包办婚姻的发妻刘文贞,因汪反满清政府,被女方家长视为大逆不道,宣布解除婚姻关系。刘文贞后来发愤学医,与汪断绝了往来。第二个闯进汪精卫怀抱的,当然要数南洋富商之女陈璧君。他俩一见钟情,1912年4月在广州正式举行婚礼,由李晓声作介绍人,何香凝为女宾相。胡汉民称汪、陈是“患难夫妻”。汪刺摄政王未果坐牢,陈璧君往视探监,并不惜重金买通狱卒,为汪创造一个较好的囚室环境。危难见真情,铁窗之下,汪表示愿结百年之好。写诗曰“落叶空庭夜籁微,故人梦里两依依”、“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长携手。一腔血,为君剖”等,其诗一时传遍大江南北,洛阳纸贵。不过,陈璧君既丑且胖,气骄志狂,面凶心狠,汪精卫只得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夫妻俩30余年,日子过得并不轻松。1946年陈璧君以卖国罪判处无期徒刑,1959年3月死于狱中。方君瑛是汪精卫的姘妇,方不堪陈璧君的雌威,深感与汪的爱情难以为继,便留下遗书曰:“无形之精神之爱,亦不能维持,与其寂寞于他年,何如死亡于此日。”然后悬梁自尽。汪精卫赋诗叙怀:“谁识秦庭不死时,归还转却负娥眉;重逢已许他生约,再拜灵前一祷之。”第四个闯进汪精卫生活圈子的就是施旦,后来汪封她为秘书,两人形影不离。步入老年的陈璧君只得甘拜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俩鬼混。后来汪批准陈璧君作为政治指导员南下广州辅佐胞弟陈耀祖当广东省长,施旦更是毫无顾忌地和汪精卫生活在一起了。最后一个是一位大连的女厨师。这位大连女厨师心中早就崇拜汪精卫,但苦于缺乏缘分。1940年1月24日汪精卫带着周佛海、梅思平赴青岛开会,住青岛迎宾馆。这女厨师也来青岛迎宾馆掌勺,分外卖力,将美味佳肴,山珍海味,供汪品尝。岂料汪乘坐“奉天号”轮船从

上海来青岛,胃口不佳。女厨师疑心对她不中意,失望之余,饮酒解愁,放声大哭。不过,汪并不知晓女厨师的“单相思”。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汪精卫于1944年3月赴日本就医,想取出8年前在南京遇刺射进体内的那颗未曾取出的子弹,但因病情急剧恶化,于1944年11月12日死于日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享年62岁,死后尸体运回南京,葬于梅花山。1946年1月21日,按蒋介石的授意,由国民党74军57师副师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邱维达少将率工兵营用150公斤烈性炸药炸毁了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汪坟。棺内,汪尸身着文官礼服,藏青色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上面覆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汪略显褐色的面部呈现出一些黑斑点,尸体未腐。马超俊对棺内进行全面检查,发现汪的马褂口袋内有一张长约3寸的白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陈璧君。汪的尸体与棺木一并被秘密拉到清凉山火葬场火化,灰土未存。

为了扫除汪坟遗迹,后来由园林部门在汪原坟址上盖了一座观梅轩,成了中山陵的一个景点。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在1945年10月底被幽禁于广州,11月初押往南京。1946年3月28日,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官以汉奸罪起诉陈璧君:“……被告陈璧君,系已故汪逆兆铭之妻,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民国27年秋间,汪逆勾结日酋近卫文麿秘密言和,被告参与谋议。是年12月,被告与汪逆潜离重庆……至29年1月间,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公然反抗中央,其中汪逆任主席,被告任伪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及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终汪逆之身,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媚敌寇之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即至汪逆已死,被告以一未亡人之身,尤复往来京、沪、粤、汉等地,谬倡全面和平之说,以欺骗民众,献媚敌人。更密布特工机构,残害地下工作同志,卖国求荣,

至死不悟，其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实无可宥恕……”

在法庭上，陈璧君时而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一些所作所为，时而讥嘲法官，甚至大闹法庭。陈璧君骂起蒋介石来，旁听席上竟发出一片笑声，响起一阵掌声。

1946年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告判决结果。判决书说：“……陈璧君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夺公权终身……”

上海解放后，陈璧君被押上海提篮桥监狱。陈璧君入提篮桥监狱后，身体很虚弱，心脏病严重，高血压、头痛、头晕、腰痛、失眠等症加剧。监狱及时对她进行医治。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抢救无效，不治身死，时年77岁。她尸体火化后，骨灰送抵广州，1960年，由其在香港的子女派人到广州认领。

汪伪政府中，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就是陈公博。陈出逃日本后不几天，日本同盟通讯社突然发出一则消息，说陈公博已经服毒自杀身亡。后经国民党情报部门判断，陈公博没有死。1945年8月28日，中国向日本提出质询，9月20日又重新提出，要求将陈引渡回国接受审判。日本不得已，将陈交出，由中国派员赴日将其押解回中国。陈被送往南京宁海路25号军统局临时看守所。他回到南京时，还心中想了几句诗：

猎猎西风冷北门，钟山东望又黄昏。
只期国土酬知己，万劫归来不顾身。

身陷囹圄的陈公博整天伏案疾书不止，他要为汪精卫辩护，更要为自己辩护。他为汪伪政权辩护道：“南京政府五年半中，可以说无日不和日本斗争。除了和日本力争和平条件之外，在政治上，争行政的自由和统一；在军事上，争军事的独立和脱离

日本的束缚；在经济上，争取物资的保存和国家人民的元气的保存。”

为了求得蒋介石的宽恕，陈公博写道：“我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后，于11月20日发布声明，宣言‘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更强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我这个声明是表示我数年来的思想，并且回应我离四川后呈蒋先生那封信。当时，南京仍在日军扶持之下，我不惮直率地表示党不可分的理论。我并不是今日要叙述我的勇气和决心，只是八年来的一贯主张，到了我可以发言的时机，应该披肝沥胆与人以共见。”“我对于汪先生的心事还了，责任已完。现在此间，正候蒋先生的指示办法。至于防共，我已尽我的力量，大致东南不会有什么问题。将来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割据，我绝对服从蒋先生，我极盼望党能团结而国家复归于统一。”

陈公博一再献丑表功，寄希望于蒋介石大发慈悲，救他一命。谁知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却不愿高抬贵手，他不希望抗战胜利带给他的名誉和地位丧失在一群已丝毫没有利用价值的汉奸身上，他所设想的是怎样用惩处这批汉奸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

1946年初春，陈公博由南京押解到苏州，被关进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狮子口监狱。到了苏州后，陈公博发现，在南京，监房的门是开着的，各人可以自由交谈、走动、看书、写文章，而这里却是戒备森严。他听说这样一件事：汪精卫的两个女儿从南京坐夜车到苏州探望她们的母亲陈璧君，但是，看守却以任何人都不得探望为理由加以拒绝，两位小姐苦苦哀求，仍然没有结果。这件事使陈公博中断了在狱中给蒋介石写信的念头。凭着他多年沉浮宦海的经验，他知道不久就要大难临头了。当他明白了自己的结局后，反而镇静起来，每天在30分钟的“放风”时

间里,慢吞吞地在院子里踱着方步,有时碰上熟人还会主动打个招呼,一点也不垂头丧气,反而神态自如;有时就旁若无人的样子吟诗作对。但他有鸦片烟瘾,在羁押之中自然无鸦片烟吸食。每当烟瘾发作,他便坐立不安,颜面黑瘦,精神不振。

在法庭上,陈公博坐在被告席上,两眼滞呆,不时左右环顾。几十天的审讯,他除了读他的辩词《八年来的回忆》外,并没有更多的申辩。

1946年4月5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公审陈公博。起诉书中列举了陈公博在任伪职期间的十大罪状: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最后,法官以卖国通敌罪宣判陈公博死刑,立即执行,剥夺公民权利终生。

6月3日,陈公博临刑前,走到陈璧君的囚房旁,对陈深深地鞠了一躬,双手奉上一把小茶壶说:“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我此去,可以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夫人做纪念吧!”说完便从容离去。陈璧君接过壶后,放声大哭。

刑场就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内,晨6时30分,陈公博行抵刑场前,对执刑的法警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他刚走至刑场一半,法警就在他背后开了一枪,陈公博立时俯倒在地,几分钟后,气绝身亡,终年54岁。

陈公博,这个1921年参加过中共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光绪三十三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讲师的风云人物,就这样结束了他不光彩的生命。

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原名周福海，湖南沅陵人，曾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宁汉分裂时，他连夜逃离武汉，赴南京投奔蒋介石。蒋见他忠于自己，任命他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后升为政治部主任。1921年7月，周佛海曾作为日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1924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他回国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并兼任广东大学秘书。由于参加国民党右派活动，不听周恩来多次劝告，被中共开除党籍。1926年他任武昌商科大学教务长。1929年以后，他任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国民党中央执委、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抗战爆发后，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二处副主任，为蒋介石的近臣。在重庆，他与汪精卫、高宗武等亲日派组成“低调俱乐部”，散布“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论调，并参与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和谈活动。1938年12月，他与陶希圣随汪精卫逃亡越南河内，公开叛国投敌，被国民党永远开除党籍。此后，南京成立汪伪政权，周佛海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伪上海市市长，成为汪伪政权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的第三号大汉奸。

周佛海接应汪精卫出逃重庆，拼凑汉奸班底，在南京组织“十人团”，和汪精卫的老婆“女狂人”陈璧君明争暗斗，又借日本人之手毒杀“76”号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他是汪伪政权的股肱，确曾风光过一阵子。自1942年向重庆输诚之后，周佛海犹如被日、蒋、汪三根绳索牵引的猴子。虽然他善于随机应变，左右逢源，但仍是心力交瘁，惶惶不可终日。

周佛海当了日伪第三号大汉奸后，财权在握，已成暴富。但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周感到末日将临，就暗中与重庆军统戴笠恢复联络，重和蒋介石发生联系，以保留一条后路。1942年10月，他派遣军统潜伏特务、伪边

疆委员会藏事处长程克祥和伪侨务委员彭寿，密赴重庆去见戴笠，“请求自首，以便自赎”。此时，蒋介石急于恢复被李士群 76 号特工总部破坏的上海军统组织，并了解汪日动态，进而瓦解汪伪集团，正苦于没有牵线人，周佛海正是担当此任的理想人选。蒋随即在戴笠致周佛海的信上批了一个“可”字，托陈、彭带回南京，并约定了联系的密码。戴笠又将周佛海的老母、岳父由湖南接到贵州息烽“软禁”起来，作为人质。还通过其岳父，写信给周，转达其母的话，要周不必做孝子，而要做忠臣，效命重庆。

自此以后，周佛海通过秘密电台与各种途径为重庆方面提供了不少情报。周佛海还安插重庆军统特工人员，掩护和保释被捕的军统潜伏特工。如蒋伯诚、吴开先等，都是由周佛海出面说服日方而被释放的。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的被毒死，也是周佛海指使罗君强、熊剑东等人策划进行的。另外，汪伪掌握的军队如孙良诚、吴化文部，是由周佛海用大量黄金策反而归顺蒋介石的。1944 年之后，周佛海与重庆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自然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日本方面曾暗中防范周的阴谋，曾两次派人刺周。由于周戒备森严，出门坐防弹汽车，随身带有大批卫士，因而未招来杀身之祸。周佛海自向重庆秘密输诚后，终日战兢兢，如履薄冰。

汪精卫病死日本后，南京大小汉奸如丧考妣。此时周佛海知道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江河日下，时局不会好转，便叹息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有大浪卷去而沉入海底之可能”。

1945 年 8 月 12 日，戴笠给周佛海一封电报，内载：“委座派你任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8 月 15 日，又亲笔写信给周佛海：

佛海吾兄赐鉴：

敌已向同盟国提出答复，愿立即停战，并解除武

装。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请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请兄予此紧急艰巨之时期，对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志，鼎力以支持之也。今后一切，当由弟负责，亦请将此意转达君强、剑东两兄为幸。兹因上海社会之情形，陆京士、曹沛滋同志甚为熟悉，特请其先行，前来协助一切。

弟戴笠手上

于是，日本投降之日，周佛海即摇身一变，从汉奸变成“抗日人士”，使上海人为之咋舌。因他当时任日伪上海市市长。周利用手中之伪税警团、上海市保安队、伪 12 军等军事力量，在京、沪、杭一带布防，维持社会治安。周佛海任命罗君强、熊剑东为副总指挥，程克祥、彭寿分任正、副秘书长，成立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同一天，周佛海又特别致电蒋介石，表示要将所掌握的税警团、保安队及警察等万余人交给中央，决不让上海落入共产党新四军之手，声称“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之前”，向重庆大献殷勤。

后来，历史证明，戴笠对周佛海纯属一时利用。1945 年 9 月，戴笠及其忠义救国军到上海，郑洞国的第三方面军紧随其后，周佛海的作用就消失了。9 月 27 日中秋之夜，军统开始逮捕汉奸，周佛海虽没有被捉，名义上仍是总指挥，实际上名存实亡。这段时间，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将汪伪“储币银行”向重庆来的中央银行办移交。周后来在供词中说，共交出黄金 50231 条（每条 10 两）、美金 550 万元、白银 763 万两、银元 33 万枚、白金 900 万两。他交完，就终日呆在湖南路的家里，不敢外出。戴笠经常开车上周佛海家去谈天，大拍胸脯，保证周佛海的安全和一切。

为了调虎离山，戴笠假惺惺地对周佛海说：“外面的人都在

反对你们,现在,为了你们的安全,上海不能住,蒋委员长要召见你,你马上到重庆去。”其实,当时蒋正在重庆和毛泽东谈判,哪里会召见周佛海。周满腹狐疑,但他了解戴笠的性格,不去是不行的。大汉奸罗君强、丁默邨想离开上海这块是非之地,要求同行,戴笠点头同意。9月30日晨,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杨惺华、马骥良等,由戴笠亲自陪同,从上海引翔港机场起飞,直奔重庆。一到山城,周佛海等人就被送到杨家山戴笠公馆住下,待遇从优,但不得对外通电话,不准外出。这时周佛海知道自己已被软禁。据周后来回忆,戴笠告以“蒋先生对余事至相当时期必有办法”。为此,周佛海此时心绪坦然,自认对重庆是有功之臣,因而无生死之忧。他曾幻想“苟能恢复自由,誓必于余生中竭尽心力……扬一扬眉也。”其间,周佛海面对门前一株桃树,赋诗赞曰:

春来无酒也微酣,绿树苍烟映碧岚。
忽见桃花羞欲笑,心随流水到江南。

哪知周佛海刚到重庆,就胃病发作,被送进军统办的“四一医院”。

戴笠飞回上海,想对周佛海的逆产开刀。10月3日晚,戴笠到周佛海家,说周重病住院,叫其妻杨淑慧速去照料,并要其子周幼海同行。周幼海随其母于10月4日飞重庆,等戴笠瓜分了周家财产后,才放杨淑慧返回上海。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飞机失事身亡,周佛海的“桃花梦”顿时化为泡影。他不禁发出了“惊心旧友成新鬼,彻耳呼声变哀声”的惊叹。他说:“雨衣死,我也完了!”周在日记中写道:“雨衣坠机身亡,为之忧虑不置。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可忧也。”当时接任军统局的毛人凤,乃黄埔

军校三期毕业生，与戴笠是小同乡，皆浙江江山县人。他是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经其弟毛万里介绍于1935年3月进入复兴社特务处工作的，他对周佛海仍优礼招待，但周佛海已知凶多吉少，终日愁眉苦脸，忧心忡忡。

1946年初夏，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纷纷提出“严惩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周鲠生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周佛海为什么还不明正典刑以肃国纪！”迫于舆论的压力，蒋介石只好无可奈何地指示军统局毛人凤将周佛海、丁默邨等汉奸送交法院审理。

1946年9月16日，国民党用专机将周佛海、丁默邨、罗君强、杨愷华等由重庆押至南京，送进宁海路军统局看守所。23日，转移到老虎桥监狱。

从9月20日起，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佛海进行侦讯，前后达6次之多。周佛海对自己策划投敌的阴谋矢口否认，对其卖国求荣的罪行轻描淡写，但对如何“自首”的经过，则一事不漏，件件详细。10月7日，在夫子庙大殿的开庭审判中，他“理直气壮”地对起诉书指称他“通谋敌国，谋图反抗本国”的罪行大加驳斥，百般辩解。11月7日，首都最高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后由陈立夫、陈布雷代为向蒋介石说情，周才得以减判无期徒刑。为周申诉，其妻杨淑慧曾求助于毛人凤之妻。毛夫人拍胸脯担保，勒索了150根金条，为赎周命，杨如数交齐。据说，杨淑慧为免夫一死，最后求救于陈布雷疏通，恳求谒见蒋介石。杨由毛人凤引导见了蒋后，跪地抽泣，一句话也没说。蒋皱眉思索许久，以低缓的语调说：“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杨淑慧满面泪痕，再磕三个响头，感激而归。

周佛海闻讯免死后，当即在狱中赋诗一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怀仍故吾；
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周佛海入狱服刑后，一直生病，常发高烧，心搏极快，胸肋疼痛。医生说是神经痛，其实是心绞痛，再加上胃病，牙痛等，年龄才50岁，已是满身病疾。据其子周幼海（又名周之友）说：“杨淑慧就想把周保外就医。她到上海去看章士钊，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章说：‘保外就医是监狱长所不能做主的，你只有去找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才行，我给你写封介绍信吧，也许他肯给我个面子。’于是杨淑慧带了介绍信和一份很厚的礼物去看谢冠生。谢问明来意，看过章士钊的信，眉头一皱断然拒绝说：‘我这个司法行政部长，是有权批准犯人保外就医，但周佛海情况特殊，我没有这个胆子批准他保外就医。蒋主席不久前刚刚明令把他减为无期徒刑，现在我这个司法行政部长又批准他保外就医，实际上是分两步走让他自由了。万一舆论界知道了，攻击起我来，我是担当不起的。’”

1947年端午节，杨淑慧带了儿子周幼海和女儿周慧海，到南京狱中，探监团聚，监狱同意送进酒菜。周一向幽默，说这不是“探监”，而是“探奸”。这是周佛海一生中最后一次家庭团聚，他为此写了一首诗：

劫后饥驱各一方，端阳小聚叙家常。
覆巢幸喜得全卵，话到沧桑莫断肠。

1948年春节后，周佛海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终日半躺在床上，痛得不断呻吟叫喊。杨淑慧请去的医生和何应钦派

去的军医,面面相觑,也束手无策。周惨叫了一个多月,总算熬到过了阴历年,延到2月28日(阴历元月初五)晚上,终于一命呜呼,瘐死虎狱,终年51岁。

走笔至此,本该止住。但还有两个大汉奸缪斌、罗君强也曾在黄埔军校任过职,他俩的结局,稍带说一下。

缪斌,江苏无锡人,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一军党代表。1935年他东渡扶桑,广交日本军政界朋友,还结识了昭和天皇的堂兄,后来任日本首相的东久迩。1936年缪斌返国,1940年在汪伪政府任考试院副院长,郁郁不得志,遂萌生与重庆挂钩的念头。正好戴笠想在南京汉奸上层物色人物开展活动,经蒋介石同意,给缪斌以要求戴罪立功的暗示。此时日本急切要求和谈,缪斌将此动向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令他充当“和平使者”。缪斌知道老蒋不讲信义,明确表示,没有凭据不愿冒此风险。蒋只好给戴一个手谕,让他派一个人代表自己去日本洽谈两国问题。1945年3月,缪斌化名佐藤,由上海秘密飞抵东京,住进了东久迩的私人别墅。当时日本内阁曾把缪斌的日本之行称为“佐藤事件”,记录在卷宗里。

日本投降后,美驻日占领军在接收日本内阁的档案文件,发现“佐藤事件”。麦克阿瑟知道后,十分惊怒,立即向蒋介石质询。蒋介石慌了手脚,坚决否认缪斌去过日本,为了灭口,遂决定以汉奸罪逮捕缪斌。缪斌当然不明就里,被捕时仍然泰然自若。他对妻子说:“我不比他人,我为蒋办过事出过力。”1946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理,缪斌大谈老蒋派他去日和谈时,庭长马上喝令他停止。检察官说:“你见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连连失利,为掩饰自己的叛国行为,想找一条出路。你不是什么软性抗日,而是投机取巧。”尽管他聘请了三个律师为他

辩护,还送了何应钦一辆华贵的保险防弹轿车,希望他在蒋面前说情,但在4月8日,法院依然终判他为死刑。1946年5月21日,缪斌在苏州相门狮子口监狱里的临时刑场被处决,终年47岁。缪斌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被处决的汉奸。缪斌临刑前,检察官李曙东问:“你有无遗书要写?”缪斌说:“请拿一纸笔来。”他写了四句诗作遗书:

浩气归太真,丹心照万民;
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

缪斌原以为蒋介石会宽大他,没想到蒋为掩饰让他赴日谈和一事,只得将他先送上断头台。

大汉奸罗君强,别号屠生、健生,湖南湘乡人,1922年加入共产党,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1925年脱党,1926年赴武汉投国民革命军,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科员,后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7年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1939年2月,赴上海追随汪精卫,当伪安徽省长、伪税警总团总团长。日本投降后,被判无期徒刑。1970年2月,罗君强病死于上海监狱,终年68岁。

正是:卖国求荣一枕黄粱,汉奸恶名遗臭万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撕毁和约 蒋介石挑起内战 以退为进 毛泽东胸有韬略

话说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抱着很大的希望，毛泽东由重庆返回延安的当天，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对《双十协定》作了如下评价：

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

《双十协定》的发表，引起国内外一片欢呼之声。

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0月12日社论，表明了国民党的观点：“假如中国真的发生内战，那就会发生悲剧……蒋主席为了阻止这悲剧的发生，特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再三坚邀中共毛泽东氏来渝，商谈促进统一团结的步骤，决本宽大容忍的一贯方针，觅取中共问题合理合法的解决。”

但蒋介石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正当毛泽东和他握手言欢之时，他却背后授意张治中致胡宗南密电，和盘托出他的本意。此电文当即被重庆中共秘密之途经所获，马上电告毛泽东和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此电文是：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

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所说的那句话:“我对共产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真正道出了他的内心奥秘。后来,他将早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编写的《剿匪手本》,又以《剿匪手册》的名义重新翻印,发放国民党各党政军部门。这个“绝密”文件是从一架迷航的飞机上截获的,1945年10月8日下午6时,一架国民党运输飞机迷航,在河南太行山麓的焦作附近被迫降落,正好落入中共控制区内。中共军队检查了飞机,查出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二组给山西“阎司令长官密启”字样的编号为3251的代电一封,电文如下:

吉县第二战区阎长官(锡山)勋鉴:

兹附发《剿匪手册》两册,请查收。

中正

该《剿匪手册》的序言中写道:

国家兴亡,军人之责,盗匪不灭,军人之耻。我革命军人自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时逾三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及四人之多。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惟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獗有加无已者,何哉?主义不明,而心志不坚之所致也。

……

古云：破山中之盗易，破心中之贼难；吾人如果欲破此江西山中之贼，必须先破吾人怕匪怕死之心贼。苟吾人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则士卒必能以勿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18年前在江西“剿匪”未竟之业，今天抗日胜利之后，蒋介石又念念不忘，重新提到议事日程。就在《双十协定》公布的翌日，即10月13日，蒋介石又下达密令：

奸匪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弃，且必遭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

遵照……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建功于国家者必膺懋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绳。

内战其实在重庆谈判期间就已经在山西上党打响了。据《刘伯承、邓小平关于上党战役总结向军委的报告》称：“刘、邓部队31500人，阎锡山部队38000人，从8月下旬打到10月8日，打了40天。结果阎锡山部队被歼26000多人，中共部队伤亡约4000人。”10月31日，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被歼，国民党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被迫投降，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在河北邯郸前线起义。

毛泽东在延安见到刘伯承、邓小平的报告，就在《关于重庆谈判》的讲话里，毫不客气地挖苦蒋介石了：

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

舒服。

1946年6月,蒋介石完成了各项战争准备,便撕毁《双十协定》及刚刚签订不到5个月的国共军事调停小组签订的《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挑起了内战。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国民党军队总兵力达430万人,其中正规军200万人,有美国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和大量财政援助;共产党军队总兵力为120余万人,其中野战军60余万人,装备是“小米加步枪”和少量的大炮。力量对比十分悬殊。

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充当内战的将领,仅在30个集团军(后改为绥靖区)任总司令或绥靖区司令官的黄埔一期毕业生就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李仙洲、王仲廉、李文、丁德隆、董钊、李默庵、王敬久、李铁军、陈大庆、李玉堂;任军长的有张耀明、黄维、袁朴、贺光谦、刘嘉树、梁汉明、牟庭芳、陈明仁、韩浚、廖运泽、侯镜如、李天霞、刘戡;黄埔二期毕业生任军长的有:罗历戎、古章简、沈发藻、邱清泉、余锦源、廖昂;黄埔三期毕业生任军长的有宋瑞珂、方靖、石觉、王耀武这时是四方面军司令官,与总司令平级;黄埔四期毕业生任军长的有顾锡九、罗列、胡璉、李弥、阙汉騫、张灵甫、潘裕昆;黄埔六期毕业生任军长的有廖耀湘等。黄埔一期毕业的范汉杰任陆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副总司令、张镇任宪兵总司令,关麟征任黄埔军校校长。以上阵容可以说,战将如云,均是嫡系。如果再加上“黄埔八大金刚”陈诚、顾祝同、刘峙、何应钦、汤恩伯、陈继承、张治中,则更显其实力雄厚了。“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蒋鼎文抗战后已弃军经商;张治中致力于和平,也未参与打内战,这两位“金刚”应算例外。还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卫立煌、薛岳等非嫡系部队,真可以说雄师百万。正是因为有了黄埔将领的支撑,蒋介石才敢口出狂言:“要在三

个月之内从军事上解决共产党。”

在蒋介石内战政策的支配下，多少黄埔名将在解放战争中被一一挑落下马，成为败兵之将。与此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方面的黄埔将领却一改十年内战期间被迫、被堵、被围、被截、被剿的挨打姿态，进退自如，气吞万里，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经过五次“反围剿”和8年抗战的锻炼，黄埔军校中共产党学生也逐步成长壮大起来了。在120万共产党军队中，黄埔学生为数不多。仅就军中之将帅，中共“七大”后，即1945年8月23日组成的中共中央军委的12个委员中，黄埔军校师生就占一半，他们是周恩来、陈毅、聂荣臻、徐向前、林彪、叶剑英。其中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是副总参谋长。另外，黄埔六期毕业的程子华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到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黄埔军校毕业任军长、兵团司令、野战军司令的就有张宗逊、阎揆要、许光达、曾希圣、陈赓、郭天民、陈毅、袁仲贤、宋时轮、郭化若、谭希林、林彪、陶铸、陈伯钧、唐天际、程子华、彭明治、莫文骅、雷经天、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高存信、李运昌、黎原、袁也烈、陈奇涵、张平化、王诤、周文在、王世英、潘朔端、倪志亮、李逸民、曹广化、吴溉之、常乾坤、洪水（越南人）等40多人。除高存信、黎原两人外，其余人部分是黄埔一至六期毕业生，而陈奇涵、雷经天、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周恩来均为黄埔军校教职员。

不管是赤黄埔系还是白黄埔系，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主义信仰，在刚刚平息的战场上又开始了相互残杀，兵戎相见；兄弟成仇，师生忘情；分党交恶，同窗反目。群雄逐鹿，鼎归何处？

随着蒋介石全面内战步伐的加紧，1946年3月以后，国内的军事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国共两党不

约而同地把军队迅速调往东北,抢摘“桃子”。

毛泽东一向十分重视东北。早在中共“七大”期间,他曾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共中央并没有更多地派遣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机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备进入东北。后来,中共中央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急进,进入东北。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简称“东总”,由黄埔四期毕业的林彪任总司令员,彭真任政委,黄埔四期毕业的李运昌任副总司令员,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吴溉之任吉林军区所辖通化军区政委,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倪志亮任嫩南军区司令员,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陶铸任辽吉军区政委,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莫文骅任辽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学良的胞弟、黄埔十期毕业的张学思进入东北,任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主要成员有:中共代表叶剑英,参谋长、黄埔六期毕业的罗瑞卿,黄埔五期毕业的宋时轮任军调处执行部处长;驻各地“军调”小组代表有:驻山西太原第3小组代表陈赓(黄埔一期毕业,少将),驻朝阳第26小组代表李逸民(黄埔四期毕业,上校),驻本溪第29小组代表许光达(黄埔五期毕业,少将)。1948年底,“东总”统一建制改称第4野战军,林彪

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部副主任。12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陈伯钧,13兵团司令员、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程子华,13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彭明治,14兵团政委、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莫文骅,两广纵队(划归4野)政委、原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雷经天,22兵团政委、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唐天际等,均在林彪麾下,与国民党军队拼死战斗,争夺东北这块宝地。

蒋介石于1946年5月5日将国民党政府迁往南京,他关注的焦点也在东北。早在1945年10月12日,也就是毛泽东离开重庆回延安的第二天,蒋介石就派出“风向大吏”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熊式辉初到东北,便召开第一次行营高级会议,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的困难起于东北,我们的胜利也必须止于东北,贯彻于东北。”原来,蒋介石本打算由熊式辉主管东北政治,张治中主管东北军事。熊式辉得悉后,急忙前往云南,对昆明警备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杜聿明说:“我同张治中是无法合作的。如果光亭兄(杜聿明字)愿意的话,我可以去向老头子(指蒋介石)建议由你去东北管军事。”并且说:“在东北只要同苏联打好交道,一切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杜聿明表示同意后,熊式辉即晋见蒋介石,提出让杜去东北,蒋乃改派黄埔一期毕业的关麟征去云南昆明接替杜聿明,调杜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要以军事力量来“接收”东北。在美国支持下,他调动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空运力量,将黄埔一期毕业的52军军长郑洞国、黄埔六期毕业的新6军军长廖耀湘所部以及黄埔一期毕业的71军军长陈明仁所部,先从大西南的滇、贵、川空运到平津,然后再海运至秦皇岛,转而向东北挺进。这还不算,蒋介石还派遣大批特务潜入东北,让他们与敌伪军警勾结,

收编伪军和惯匪，组织所谓“地下军”，以充当其与共军争夺东北的先头部队。蒋介石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还对他的嫡系将领说：“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三十年来的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的革命已经快得到归宿了。希望各位在这最后成功的时候，格外奋起，格外努力，完此一篲，以竟全功。”

1945年10月18日，蒋介石发布了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命令。杜聿明上任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对他说，要与苏联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在三个月内将离开东北回国。后来苏军一再拖延撤军日期。直到1946年5月3日，苏军才撤出东北。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5月5日，蒋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5月6日，斯大林通过苏驻华使馆武官罗申，请蒋经国转达其父，邀请蒋介石访苏，蒋这时候一心投靠美国，闻此讯后说：“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

从1946年5月份起，蒋介石春风得意，不可一世。这时美国已帮助蒋介石将其正规军的80%，约160万人调集到内战前线，其分布如下：

以25个旅，约21万多兵力，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刘峙与李先念成了对手。

以58个旅，约46万多兵力，向华东解放区进攻；顾祝同与陈毅成了对手。

以28个旅，约24万多兵力，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阎锡山与徐向前成了对手。

以18个旅，约16万多兵力，向晋察冀解放区进攻；孙连仲与聂荣臻、罗瑞卿成了对手。

以 20 个旅,约 19 万多兵力,向晋绥解放区进攻;廖昂与许光达成了对手。

以 16 个旅,约 16 万多兵力,向东北解放区进攻;杜聿明与林彪成了战场上的对手。

以 19 个旅,约 15 万多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进攻;胡宗南与张宗逊、周士第成了对手。

以 9 个旅,约 7 万多兵力,向广东各游击区和海南岛解放区进攻。

1945 年 11 月 1 日,蒋介石派国民党 13 军、52 军攻进东北大门,16 日攻占山海关,继而沿北宁路猛进,连陷绥中、兴城、锦西等地,26 日又占领锦州。蒋介石在南京席不暇暖,便飞往东北督战去了。内战之火,在东北猛烈地燃烧。

1946 年 5 月 19 日,国民党部队攻占四平;21 日攻占公主岭;23 日攻占长春。蒋介石在东北的胜利,使他益发坚定了剿共的决心和信心。这样,从 1946 年 5 月份起,他终于全面发动了中国的内战。攻下长春的这一天,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到沈阳巡视,亲自对东北解放区作进攻部署,并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等高级将领的陪同下,游览了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墓。蒋介石踌躇满志地说:“自 1914 年奉孙总理之命前往东北调查革命情势,实则已经是相距 32 年之后旧地重游。”

6 月 3 日,蒋介石又亲赴长春,在飞机场大厅中召集长春市地方豪绅巨富进行慰问,后又召集新 6 军中将军长、黄埔六期毕业的后起之秀廖耀湘等指示机宜,命令必须尽快抢占战略要地,然后于 6 月 4 日返回南京。

而对一连串的胜利,蒋介石有点陶醉了。10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京秘密军事会议上,对形势作出乐观的估计:“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部队。”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自信呢？原来，他得到前方送来的捷报。就在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了重要城市张家口，达到了它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顶点。蒋介石被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于11月15日至12月20日，悍然在南京召开了由他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蒋介石急着召开这个国民大会，目的是想假借民意，通过一部宪法，使其独裁统治和他所挑起的内战合法化，因此，这次会议称作“制宪国大”。

“抗战前十年内战，抗战中八年磨擦，胜利后一年纠纷。”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在国共谈判面临彻底破裂，不得不离开南京、飞回延安时，接受记者采访，他用这句话，概括地总结了国共两党关系史。

来中国调停中共与国民党关系的马歇尔大使说了一句貌似公允的话：“和平障碍国共两党均有责任。”他给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以显示他这位调解人的公正。之后，他回美国去当国务卿去了。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回延安，宣布国共谈判完全破裂。这实际上，表明国共关系接近冰点，国民党向中共发出了最后通牒。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于3月11日上午刚刚撤走，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原黄埔军校教官周至柔就命令空军轰炸机于当日下午飞抵延安上空，进行狂轰滥炸。

国共之间的战争从此就全面展开了。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为国共双方的主帅，下着国共决战之棋。当时，蒋介石自认这着棋稳操胜券，心里乐吱吱的；而毛泽东则认为鹿死谁手，很难预料，但他坚信这着棋未必就会输，因为广大人民反对打内战，解放区的人民不愿将胜利果实拱手交给咄咄逼人的蒋介石。就在蒋介石的飞机轰炸延安的日子里，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一排14孔的

窑洞前,接受一位名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美国女记者的采访。毛泽东谈起蒋介石,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称蒋介石也是“纸老虎”。他又说:“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面对强大的敌人,他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进行运动战。战斗进行了8个月,毛泽东放弃了105座城市,却消灭了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71万人。上党战役,共歼敌35000人,击毙国民党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俘国民党19军军长史泽波。邯郸战役,歼国民党40军一部,并争取了国民党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万余人在战场起义,俘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以下23000多人。后来,国共双方交涉,以共产党释放马法五、换回国民党释放叶挺和廖承志为条件,各自领回了自己的爱将。苏中战役,陈毅率新四军七战七捷,仅一个半月,歼国民党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万余人。以后,定陶战役、临江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蒋介石损兵折将,消耗了实力。

其实,毛泽东所用的战略,他早在1936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已说得明明白白: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敌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在 10 年前写的这段文字,仿佛为 10 年后国共之战画像。蒋介石就是那气势汹汹的洪教头,毛泽东采用了林冲的办法对付他。

毛泽东在 1946 年 10 月 1 日所写的《三个月总结》中,对国共之战初期的形势作了如下判断:

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国共之战,果然按照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打下去。到了 1947 年 3 月,蒋介石因“战线太广”而“兵力不足”,不得不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于是国共之战进入第二阶段,即蒋介石由“全面出击”改为“重点进攻”。蒋介石为此事,还和他的心腹陈诚、白崇禧开展过一次唇枪舌战。

那是 1946 年 1 月 16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决定在三年内分三期整军,第一期将陆军现有 89 个军缩编为 89 个师;第二期缩编为 75 个师;第三期缩编为 60 个师。至 1946 年 3 月止,军队整编和军事机关调整后,总人数由 590 万减少至 490 万,计减去 100 万人;伪军 60 万,仅保留 23.8 万,裁撤 36 万余人。这次整军,是在美军军事顾问团指导下,由

参谋总长陈诚负责主持的。陈诚为人严厉,做事雷厉风行,且以挑除异己、整杂牌军而著称。白崇禧是国防部长,他对陈诚的整军大为不满。当陈诚下令将各军炮兵部队集中使用时,白崇禧怒不可遏,当面质问蒋介石:“还要不要戡乱?”迫使蒋介石下令取消这一计划。在南京召开的整军会议上,白崇禧公开唱反调。他在会上发言说:“从古打仗的历史,战时扩大,并鼓励各级干部敢于牺牲,敢打。现在打‘共匪’,不能裁,一起去打,鼓励人去打,要裁只有在‘剿匪’之后,承平之后放马南山才没问题,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亦在承平之时。”白崇禧后来将国民党的失败,归咎于陈诚的整军。他认为:“因整编与取消杂牌部队,致军队减少,仅能控制点与线,无控制面的力量,士气低落,人人怨上畏匪……”

难怪人称白崇禧是“小诸葛”。在抗战胜利后,白崇禧曾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就整个战略势态作出判断。白崇禧指出:长江、珠江流域,国民党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问题尚不十分严重。惟黄河以北,国民党党政军力量均属微弱,东北问题尤为严重。白崇禧也早就看出内战的关键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而蒋介石为了排除杂牌军队,扩充黄埔嫡系部队,在整军中引起非嫡系将领的不满,结果,促使许多杂牌军将领在战场上高举义旗,如高树勋、郝鹏举、吴化文等皆是。

蒋介石从1946年6月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至1947年2月,对解放区发动的是全面进攻。在这8个月的全面进攻中,从中共手中夺取了105座城市,但蒋介石的兵力却被歼灭了71万人,平均每占一座城市,即付出7000人的代价。同时,由于战线延长,占领地盘扩大,兵力严重不足,他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的方针,变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

蒋介石“重点进攻”的战略目的,首先是将中共中央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部驱逐出西北，并配合其山东战场，打通津浦路、平绥路，然后，以在西北的国民党军队与在山东的国民党军夹攻华北人民解放军之势，使其南北战场的军队会师张家口和山海关，这样就把东北和华北的人民解放军分割开来，随之便可以实行各个击破。

蒋介石集中 94 个旅、共 70 万兵力，分别由胡宗南和王耀武率领，向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而其他战场，则采取守势。对此，毛泽东则继续实施战略防御作战，在陕北和山东两地，诱敌深入，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国民党主力；而在其他战场上，则进行反攻，配合两地作战。

在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军，怎样打才能取得胜利呢？毛泽东从战争初期的实践中获得最重要的认识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回顾过去三个月歼敌 25 个旅时所采取的作战方法，就是运用这个战法。毛泽东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都要采取“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4 个月来，国民党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 8 万人为代价，攻占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 150 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势，并对联结苏鲁的临沂构成直接威胁。山东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国民党军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放弃一些城市。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国民党的军队，而不是攻占一城一地。陈毅于 1947 年 1 月 2 日发起鲁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 26

师、第1快速纵队及整编第51师,计两个师部、5个旅部共5万多人,俘虏国民党整编26师中将师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马励武,以及周毓英以下36000多人,缴获105毫米榴弹炮48门,山炮、野炮41门,坦克24辆,汽车474辆,使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完满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任务,取得在鲁南打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鲁南战役结束后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月1日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睡觉。这些日子,军委电讯总局局长、黄埔六期毕业的王净最为忙碌,他要及时将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代电准确无误地拍发到各个大军区,并且要随时收听各地发来的简报、捷报、请示报告,及时送到代理总参谋长周恩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徐向前手中,然后呈交毛泽东。因此,延安窑洞里日夜灯火通明,一片忙碌。

蒋介石自从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后,开始大规模调兵遣将,依靠他的五大主力军,即新1军、新6军、18军、74军、5军这些“王牌军”,配备美式装备。任用的军长潘裕昆、廖耀湘、胡璉、张灵甫、邱清泉,都是清一色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地扑向“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结果并未达到预想的胜利。1947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狂妄地说:“要作战到底!”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要胡宗南亲自指挥7个师约15万人的兵力,向陕北解放区大举进犯。3月19日,胡宗南进占延安城。蒋介石当天就接到胡宗南的报捷电报,电文是:

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十九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3月20日晨,蒋介石回电嘉奖: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

南京与西安等地的商店和居民接到命令:3月19日的当天晚上一律要悬挂国旗,燃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美、蒋报刊,大肆宣传,中外记者纷纷要求赴延安战场采访。这一消息传到胡宗南耳里,他却如同一声霹雳,被打得六神无主。胡宗南一举占领延安,光复中共赤都,本应兴高采烈,为何又六神无主,心急如焚呢?正是:牛皮吹得太离谱,清点“俘虏”显原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进攻延安 胡宗南吹牛破产 虎口拔牙 张灵甫命丧孟良

书续上回。且说蒋介石接到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报捷电报后，心中大喜，接着回电嘉奖，以黄埔军校校长的九鼎之尊，降格屈驾称胡宗南这位黄埔一期毕业的学生为“宗南老弟”，说出“雪我十余年来积愤”之肺腑之言。1947年3月21日，蒋介石又致电胡宗南，把“雪我十余年来积愤”，延伸为“雪二十一年之耻辱”，把账算到1926年。蒋介石的电报称：

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无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十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胡宗南接到电报，知道上海、南京之中外记者将组织参观访

闻团来延安采访,并参观“战绩”,一直坐立不安。南京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则求之不得,立即通知胡宗南要周密部署,热烈迎接贵宾。这下可急坏了胡宗南,他立即召集“绥署”处长以上军官,举行紧急会议,手忙脚乱地准备,以应付中外记者的参观与提问。大家一致认为让中外记者到延安现场参观为宜,不必深入前方,以免情报不实,露出马脚。

胡宗南当即指定“绥署”第2处处长刘庆增和新闻处处长、黄埔四期毕业的王超凡两人,负责日夜筹备,成立一个“战绩陈列室”。王超凡即使怎样“超凡”,也感到十分棘手。因为延安是中共中央主动撤出的,“经七昼夜激战”之说,纯属“天方夜谭”。胡宗南的大军攻占延安本是一座空城,哪里去找“五万共军的俘虏”?彭德怀、张宗逊的陕北野战部队总共才两万多人,即使全部被俘,还差一半。王超凡急中生智,想出了这样一着妙法:在延安周围20华里内,设立“战俘管理处”10座,以“青训队”500多人作基干,另在城防部队王应尊的27师中挑选伶俐的士兵1500人,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要他们一律穿上杂色服装,伪装俘虏,加以训练,并强令他们一定要按照事前编好的一套“对答”,应付就要前来参观的人。在参观期间,每人每天加发伙食津贴1元,以示恩惠。十座战俘管理处,总共只有2000名“战俘”,与捷报所说的“俘虏5万余”未免相差太大了,为此,只好用车轮战办法,临时互相抽调来充数。用这个办法,胡宗南倒是有经验的,他们吃空缺,碰到上级点验的时候,就常用“冒名顶替”这一绝招。

至于捷报称“缴获武器弹药无数”这话,即由驻在甘泉的17师师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何文鼎负责,将全师的“三八式”和“汉阳造”这两种老家伙拿过来,一同送进“战绩陈列室”,然后贴上标签,写上缴获时间、地点,总算道具齐备,于是只等这台戏开

演了。当记者来到西安时,胡宗南的参谋长、黄埔六期毕业的盛文一面热情接待,一面借口延安方面的气候不宜飞行,以延滞他们的行程。这样,一直等到安排就绪,才把他们送去。参观的时候,宾主尽欢,不在话下,毋须细表。但世间大凡弄虚作假的事,任你做得天衣无缝,也难免会露出一些马脚来的。是故,有些头脑清醒的记者不免提问:“这些新式轻机枪、中正式步枪,共军究竟从哪些地方弄到的?”“我不是昨天在某某战俘管理处见过你吗?”被问的人,都知道应急措施:“当你无法回答时,要挺起胸脯,规规矩矩的立正,一言不发。”这场战地参观,居然也应付过去,胡宗南的“延安大捷”,固然是一幕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但千万不可小看这位黄埔一期毕业的“天子门生”。胡宗南多年以来的惟一任务,就是封锁边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人称胡宗南为“西北王”。

胡宗南企图攻占赤都延安已非一日,早在1943年5月26日,蒋介石就密电胡宗南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开军事会议,预定的进攻日期为7月9日,而这一天正是周恩来、邓颖超、林彪一行由重庆返回延安,路过西安。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十五期毕业的熊向晖一见情况万分紧急,就把这一情报通过地下工作者王石坚的秘密电台迅报延安。7月4日,朱德给胡宗南去电文,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要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日团结之大业。”

首先收到这份电报的是熊向晖,他拆开一看,便知是自己送情报的结果。心头一惊,胡宗南看后怎么办?但又非送他看不可。胡宗南把朱德来电一连看了两遍,纳闷说:“朱德!共产党

这一手真厉害,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熊向晖对这一事态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不失常态地与胡宗南商谈起来:“胡先生应该查明是怎么泄密的。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规模过大,弹粮不绝运输,有所暴露。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胡宗南慎思片刻,要熊向晖把特务头子刘大年找来查办泄密之事。

胡宗南当然不知道身旁的这颗“定时炸弹”,只好电报蒋介石,建议改变进攻计划。7月7日,蒋复电同意罢兵。

熊向晖是清华大学学生,1936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37年暑假时,根据清华大学党组织的指示,他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1军胡宗南部“服务”。19岁的熊向晖由于才华出众,深得胡宗南的赏识。经过几番考察,便调熊向晖任身边的机要秘书,还送他进入西安王曲黄埔军校七分校学习,按黄埔军校序列,他是十五期学生。

周恩来、蒋南翔、董必武三人知道熊向晖的真实身份。周恩来要熊向晖特别注意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你是我党放在胡宗南身边的一个闲棋冷子,负有特殊任务;第二,隐蔽党员身份,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第三,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同流而不合污。有事会派人与你联系。

胡宗南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身边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次胡宗南进攻延,兵马未动,3月3日夜,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却正在细细研读着胡宗南的进攻延安的绝密计划。胡宗南生怕泄露机密,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连他手下的师长、军长都不知道。他只告知他手下的亨哈二将:第1军中将军长、黄埔一期毕业的董钊;第29军中将军长、黄埔一期毕业的刘戡。他只说队伍是集结而已。3月2日夜,乘胡宗南外出,熊向晖把胡宗南的作战计划背熟。翌日夜,熊向晖秘密来到西安

新华巷1号,把绝密情报告诉中共地下党员王石坚,由王石坚的无线电台把胡宗南的作战计划发往延安,到了毛泽东手中。周恩来的这一步闲棋下得不错。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闲置”了多年,终于在这关键的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于3月6日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电报,通报了胡宗南的作战计划,并指出:

“此次胡军攻延带着慌张神情,山西仅留四个旅,西兰公路及陇海线均甚空虚,集中全力孤注一掷,判断系因山东及冀鲁豫两区失败,薛岳去职,顾祝同调徐、胡宗南实际上主持郑州军事,急欲抽兵进攻豫北,故先给延安一个打击。”

3月7日,熊向晖又密告王石坚,胡宗南的总攻延安时间推迟3天,为的是等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撤离。这时,王石坚告诉熊向晖,上次去电延安之后,延安已复电,说已把胡宗南的作战计划呈报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称赞“很及时,很得用”。

果真,胡宗南部队在3月13日晚,进入预定位置,14日拂晓发起总攻击。紧接着,熊向晖又密告延安,此时胡宗南的作战方式是:

“采取‘蛇蜕皮’、‘方阵式’进军方法,派前卫占领阵地,依次掩护本队前进,前尾相顾,左右相联,走山不走川,遇小股敌人即行歼灭,遇大部敌人可先绕道,吸引于延安附近歼灭。”

如此这般,毛泽东对胡宗南的动向,可谓一清二楚。

就在“国军解放延安”的一片欢呼声中,南京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在3月20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余曾有言,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但过去是因和谈关系,国军多是挨打。”陈诚还说:“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

据熊向晖回忆,胡宗南进入延安,他陪同参观。在延安枣园,胡宗南步入毛泽东住过的窑洞,看得很仔细。他居然拉开毛

泽东的书桌抽屉,细细检视。他发觉,抽屉里有一纸条,拿起一看,上面写着:

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胡宗南看后哈哈大笑,他在“势成骑虎”这个词组上琢磨了半天,认为此真的道出了自己的心病。的确,胡宗南攻占延安以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毛泽东与周恩来并没有离开陕北,正指挥解放军以“蘑菇战术”在陕北一个旅一个旅的消灭着胡宗南的精锐之师。毛泽东在陕北跟胡宗南“蘑菇”,把胡宗南的30万大军磨得又累又饿。胡宗南生怕毛泽东有诈,每次进攻,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三四十里的方阵,只走山顶,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露营,每日前进二三十里。真是如履薄冰,处处小心。

胡宗南19日进延安,毛泽东18日才离开延安。他的车队经过飞机场、桥儿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在随后的几天中,又经过子长县的徐家沟、高家岭、任家山,25日到达子长县的王家坪,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这里,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3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枣林沟开了一个会议,决定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4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为政委,化名郑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直属司令部以“九支队”为代号。

为什么毛泽东要主动放弃延安？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阻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胡宗南攻占延安后，蒋介石授予他一枚二等云麾勋章，并将胡宗南晋升为陆军上将，使其成为黄埔学生中最早、也是惟一的在去台湾前就获得上将军衔的人。这时胡宗南受了奖、晋了级，乐滋滋地说要来个“三喜临门”。于是他派人去南京金陵大学，

把由戴笠介绍的军统女特务叶霞翟接到西安兴隆岭官邸,并举行了婚礼。他和叶的婚事很奇特,用叶霞翟的说法,她和琴斋(胡宗南字)的婚恋,既是马拉松式,又是闪电式。马拉松,光恋爱就谈了10年;闪电式,她头天在南京接到电报,第二天就飞抵西安结婚。在婚后第三天,胡宗南又把她送回南京。

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在陕北,始终侦察不出解放军主力的动向。其实,当时在陕北指挥解放军的除彭德怀外,还有两个人均是胡宗南的师弟:一位是黄埔五期的张宗逊,时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另一位也是黄埔五期的许光达(在校名许德华),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而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几乎是清一色黄埔军校毕业生。黄埔一期毕业的有第1军军长董钊,29军军长刘戡,17师师长何文鼎,90师师长陈武;黄埔二期毕业的有36师师长钟松,76师师长廖昂;黄埔三期毕业的有31旅旅长李纪云,61旅旅长邓钟梅,48旅旅长康庄;黄埔四期毕业的有135旅旅长麦宗禹,12旅旅长陈子干,24旅旅长张新汉;黄埔五期毕业的有27师师长王应尊,王与张宗逊、许光达还是同期同窗。

胡宗南这位新婚燕尔的新郎官婚后第三天便飞延安坐镇,命令他的部队要尽快找到共军主力,“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血本”,与共军决战。

当时解放军的部署是:少量部队在安塞诱敌,而将主力隐蔽集结于青化砭地区,捕捉战机,消灭敌人。胡宗南接到情报:西北共军主力正向延安西北的安塞撤退。于是胡命董钊急行军由延安向安塞追来;借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巧妙引敌到真武沿地区。另外第31旅沿咸榆公路,经拐岭镇向青化砭地区前进,担任侧翼掩护。

3月24日,胡宗南的31旅在旅长、黄埔三期毕业生李纪云

的率领下,将部队3千多人钻了解放军设下的口袋。25日,解放军迅速出击,经过1小时47分钟的激烈战斗,全歼李纪云旅,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被俘。这是撤离延安后获得的首次胜利,史称青化砭战役。

4月14日,胡宗南的135旅由瓦窑堡向蟠龙南进中,4700余人被歼于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少将代旅长、广东中山籍、黄埔四期毕业的麦宗禹又被俘。

蟠龙是胡宗南部在陕北战场的主要军需供应基地。5月4日,西北野战军猛攻蟠龙,歼灭胡宗南167旅6700多人,生俘旅长李昆岗(黄埔六期),缴获敌骡马千余匹、军服4万多套、面粉1.2万袋、枪支弹药无数,统统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

三次战役,胡宗南以众临寡,却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在陕北来回游行,到处挨打,到处扑空。

当时,新华社负责人、著名记者范长江曾写了一首诗,形象而生动地描述了胡宗南的失败和窘境:

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
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趟空!
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当狗熊;
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内,西北解放军以不足3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10倍的胡宗南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国民党14000多人。这段历史,美国政府在1949年发表的《白皮书》中曾经这样描述:“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台湾1959年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

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

就在胡宗南“骑虎难下”之际,蒋介石重点进攻的另一翼也吃了败仗,那就是山东战场。在莱芜战役中,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山东“三李”之一的李仙洲,于1947年2月23日下午3时在莱芜县城以北的口镇负伤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73军中将军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韩浚,77师师长田君健被击毙,46师师长韩炼成在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杨斯德、刘贯一这两个共产党员的劝导下,弃职隐蔽起来,弄得李仙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李仙洲被俘后,便送进了解放军的野战医院治腿伤。他的黄埔一期同学陈赓发来电报,对他晓以大义,劝其回到与人民合作的道路上来。解放军不仅没有杀他之意,反而好言劝抚,让他安心养伤,李仙洲大受感动。就在李被俘的当天,蒋介石由南京飞往济南。他一见到王耀武就大发雷霆:“李仙洲无能,在莱芜送了两个军零一个师,损失了这么多轻武器,实在太不像话。就是让共产党捉鸭子也得捉几天嘛!”

是役共歼国民党军56000余人,收复城市13座,使鲁中、渤海、胶东三个解放区重新连成一片。打李仙洲的是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他们把李仙洲取名代号“鲤鱼”。李仙洲被俘,陈毅说:“好,鲤鱼入网。”

1947年5月上旬,我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东南孟良崮地

区,歼灭国民党所谓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74师中将师长、黄埔四期毕业的张灵甫之死,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张灵甫之死,引起国共双方极大的震动。蒋介石、毛泽东都异乎寻常地表示了态。

张灵甫,原名钟灵,字灵甫,后以字行,陕西长安县大东乡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其父亲张鸿恩,憨厚朴实,母亲靖秀英,料理家务。张灵甫师范毕业后,由于右任介绍与刘志丹一同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胡宗南的第1军,从排长、连长、营长一直升到团长。张灵甫发妻叫邢琼英,由父母做主嫁给张。张当大官后,邢就成了“秦香莲”。张灵甫的部队驻防广元时,张又与四川姑娘吴海兰成婚。吴长相漂亮,经常在社交场合出风头。张灵甫乃冷酷寡情之人,其醋劲在同事中出了名。听说妻子“不贞”,气得他连话也说不出,一连几天闷闷不乐,脾气变得越来越粗暴,见谁骂谁。后来,他请了假,带着手枪回家,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对吴海兰说:“我有好长时间没吃过饺子了,你为我包一顿饺子吧!”妻子听后便爽快地到菜园子里割韭菜。张灵甫便尾随其后。待妻子刚蹲下去时,张即拔出枪朝吴海兰后脑开了一枪,妻子一头栽倒在地。杀妻后,他也不掩埋尸体就返回部队。

张灵甫无辜杀妻,引起西安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怒。吴海兰娘家把状子告到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转给南京的宋美龄,蒋介石立即电令胡宗南将张灵甫解往南京监禁法办。

胡宗南视张灵甫为心腹干将,既没有将张五花大绑,也不派人押送,而是让他独自到南京投案。张灵甫因带盘缠少,靠一路卖字来到南京,蒋介石拒绝见张灵甫,张只好自己走进“模范监狱”。后来张被判刑10年,他给友人的信中称自己“为杀妻室当楚囚”。

抗战后,王耀武向蒋介石求情,张灵甫被保释,留在51师师长王耀武手下当差,改名灵甫。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张灵甫协助王耀武过五关斩六将,打了不少硬仗,张灵甫被提升为74军58师副师长;1944年他参加长衡会战后,升任74军副军长,下半年被选拔进入陆军大学甲级班深造。毕业后,他回74军任军长。抗战胜利后74军整编成74师,张灵甫任中将师长。不久,经人介绍,他与女大学生王玉琳在南京结婚。

1946年6月,张灵甫出任74军军长,并兼任南京首都警备司令。74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实力雄厚,官兵5万多人,一色美式装备。该军驻南京孝陵卫,卫戍京畿,被称为“御林军”。

蒋介石挑起内战后,张灵甫归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李延年指挥。张率部向苏北新四军进攻,连占宿迁、泗阳、淮阴、淮安等城,倍受蒋介石嘉奖,获三等云麾勋章。李延年则吹嘘说:“有10个74师,就可以统一全中国。”1946年年底,张灵甫在涟水与陈毅拼杀,由于陈毅寡不敌众,蒙受损失。张灵甫骄气十足,不可一世,以为新四军不堪一击。他向蒋介石夸下海口:“委座,把新四军交给我张灵甫吧,有我们74师,就无新四军葬身之地。”

1947年4月初,国民党集中华东第一线的13个整编师,34个旅,25万人马,组成3个机动兵团,由“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顾祝同坐镇徐州指挥,沿临沂至泰安一线,齐头北进,企图一举摧毁华东野战军主力于沂蒙山区。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在临沂指挥7个整编师分三路纵队北进。张灵甫率74师居中,担任主攻任务。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的李天霞率83师居右,黄伯韬的25师居左,向坦埠进攻,拟从侧面围击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兵力配备上,采取了“硬核桃”配“烂葡萄”的部署,认为这是绝对保险的“万全之策”。陈诚说:“共军啃不动‘硬核桃’,只有去吃‘烂葡

萄’。等他吃‘烂葡萄’败了胃口时,我们的‘硬核桃’一定会噎死他们。”

这时,华东野战军在山东共有10个纵队,东临大海,北靠黄河,西隔津浦铁路和运河。面临敌之大军压境,陈毅根据毛泽东的三点指示:“一要有极大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要不过早惊动敌人后方。”果断地提出“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并指示部队准备啃“硬核桃”。

针对国民党准备充分、密集推进、行动谨慎、不肯分兵的特点,陈毅、粟裕决定采取“耍龙灯”的机动战术,率主力忽南忽北,忽东忽西,不停地机动,在运动中吸引、调动、疲惫、迷惑敌人,以创造战机。

张灵甫自恃74师兵强马壮,为抢头功,率部甩开两翼掩护友军,孤军深入。陈毅判断:敌军企图以74师为骨干,在两翼强大兵团掩护下实施中央突破,矛头直指华东野战军团。陈毅采取正面突击,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四面包围和阻击南北各部援敌的办法,迎张灵甫的74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将其从敌人重兵集团中割裂开来,予以围歼。陈毅认为“擒贼擒王。”摧毁了敌人的主力,攻夺它的首领,就可使敌人不战自乱。俗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今天就要专门啃张灵甫这个“硬核桃”。

张灵甫以为坦埠附近集结有陈毅的重兵,便立即部署向南面的孟良崮、垛庄方面撤退。一路上,又受到解放军的追击和侧面袭击,伤亡很大。当撤至孟良崮地区时,他看地形复杂,便想在此固守。74师参谋长魏振钺不同意,建议说:“此乃孤山,为兵家之大忌,不易固守。”副参谋长李运良建议说:“此虽孤山,但地形险要,我们要置死地而后生,临险境而逢生。”一向过于自信的张灵甫接受了李运良的建议,立即命部队在四周层峦叠嶂

的孟良崮安营固守待援。

5月13日,解放军向孟良崮敌人发起全面攻击,陈毅认为张灵甫在我5个纵队团团围困,已成“瓮中之鳖”,插翅难逃。另以4个纵队和鲁南地方武装分别阻击增援的李天霞部和黄伯韬部,使张灵甫孤立无援,然后再啃这“硬核桃”。

这时正值初夏,水源被解放军切断,张的兵马又饥又渴,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张灵甫急电南京求援,但飞机从南京、徐州运来的馒头、米饭、弹药和水大多落在解放军阵地上。外援部队受到解放军的强大阻力,寸步难行。面对这种情况,张灵甫率师指挥所躲进一个山洞里,用话机频频呼救,对李天霞、黄伯韬叫喊:“你们快快向我靠拢!”李虽与张近在咫尺,因他俩素来有隙,只派出一个突击连作了一次象征性的增援;黄虽竭力支援,但在解放军的强大阻击面前已无能为力。

5月15日夜,解放军发起总攻,以强大的炮火向孟良崮群山轰击。74师虽只剩下几个山头,仍在负隅顽抗。5月16日下午2时,全线崩溃,师、旅、团、营联络中断。张灵甫面临最后的抉择:要么降,要么死。他选择了“杀身成仁”。张灵甫写下绝命书,其中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妻子王玉玲。这两封绝命书,交给了勤务兵。勤务兵穿上解放军服装,混出孟良崮,带到了南京。张灵甫给妻子王玉玲的绝命书全文如下: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及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亲来看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生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灵甫绝笔

五月十六日

孟良崮

王玉玲现居美国,她将此绝笔书交其子张道宇带回大陆,交给他的同父异母兄长张居礼。张居礼毕业于陕西师大,在中学教物理,后调民革西安市委任秘书长。

张灵甫写罢绝命书后,自杀身亡,他的74师32000多官兵全军覆没。华东野战军6纵队司令员皮定钧命政治部派人购棺木予以安葬。收尸者乃作家吴强。吴强后来写《红日》一书,曾畅销不衰,1962年被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

另据称,张灵甫在临危时曾命副师蔡仁杰、58旅长卢醒等集体自杀,命令一下,个个抱头痛哭。副参谋长李运良向洞口跑去,在洞口向腮帮子上擦着皮打了一枪,弄得满脸血污,横在洞口装死。张灵甫见此,大声吼道:“既不自杀,那就与敌人拼了算了。”张说完拿起枪冲向洞口。这时解放军6纵特务团一战士向洞内猛射,一颗子弹击中张灵甫后脑,张立时栽倒在血泊中。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副旅长明灿、团长周安义均被当场击毙。

又有书说张灵甫成了俘虏后,6纵特务团副团长何风山率5名战士将张灵甫拖回洞内,举起枪对准张的后脑勺连开两枪,张当即毙命。何风山知道杀俘虏犯纪律,于是,一口咬定张灵甫是自杀。5月30日,陈毅向中央军委报告,张灵甫系何风山所击毙。

最新消息说,张灵甫在洞内死于一炮弹爆炸。华东野战军8纵23师69团1营通讯班长邵世和在50年后撰文披露他审问被俘电话兵付东如时,付东如如是说。付东如当年18岁,江苏泗阳县付家洼村人。邵世和负责埋张灵甫尸体,并插上标记,地点在孟良崮附近的高家村。

张灵甫在台湾“军人魂”祠堂中,被列为“烈士”第一人。张死后,蒋介石严厉追究责任。83师师长李天霞因玩忽职守、救援不力而被撤职,送交军法审判,从此在军界消失。25师师长

黄伯韬差点被蒋介石枪毙,最后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出面说情,才改成了撤职留任的处分。负有直接责任的1兵团司令汤恩伯也被撤职,连参谋总长陈诚也因“指挥不力”而受到了停职察看的处分。在国民党军史上,因为一个师的覆灭而惩办如此众多的高级将领,这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张灵甫的死,蒋介石还迁怒于毛泽东。在1947年6月28日,蒋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名义,对毛泽东下了“通缉令”,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

转战在陕北的毛泽东获悉张灵甫命丧孟良崮后,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平时极少沾酒的毛泽东,竟然找炊事员要酒喝,炊事员大惑不解。毛泽东激动地对炊事员说:“你知道74师吗?它被我们消灭啦!”1947年5月30日,正在陕北靖边县王家湾的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写了《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中》一文,说:“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要想逃脱,已很困难。”毛泽东从这天起,称蒋介石为“卖国集团”。10月,毛泽东起草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正是:黄埔师生讲情份,战场拼杀不认人;死后买棺运南京,陈毅义对张钟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撒豆挡兵 陈明仁死保四平 廖昂被围 许光达飞函晓义

话说1947年春,东北国民党保安司令长官、黄埔一期毕业的杜聿明,放弃了原订“南攻北守”的计划,采取新的“防御待援”的战略方针,一部沿松花江布防,一部控制北宁路和热河,主力在中心地区,机动伺机作战。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黄埔四期毕业的小师弟不怕杜聿明、陈明仁、范汉杰、郑洞国这些黄埔一期毕业的大师兄,为改变东北战局,针对他们分散守点的特点,分头发起夏季攻势,其中以主力向长春、四平、吉林之间实施主要突击。

林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把夏季攻势分成两个阶段:5月13日至6月上旬为第一阶段,主要在中长路两侧,沈(阳)吉(林)线、拉(法)吉(林)线及热河、冀东、南满展开攻击,经过20多天激战,先后攻克怀德、乌拉街等地;6月11日至7月1日为第二阶段,集中力量攻击长春、沈阳之间的战略要地四平。

四平街,是当时辽北省政府所在要地,位于中长、四洮、四梅铁路的交点,为东北交通、工业及军事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杜聿明把死守四平的任務交给了他的黄埔一期的同学、时任国民党71军中将军长陈明仁。

陈明仁,字子良,1903年生于湖南醴陵,与程潜是同乡,黄埔一期毕业生,素以敢于打硬仗而又多谋常胜出名。与陈赓、左

权、宋希濂、李默庵、邓文仪是同从军政部讲武学校转入黄埔军校的。陈明仁爱兵如子，带兵打仗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东征时，他第一个把国旗插在惠州城上，受到蒋介石的嘉许。宋美龄看他一表人才，想当月老作媒，介绍他当廖仲恺的女婿。陈明仁说：“家有糟糠之妻，13岁就结婚了。”宋美龄惊讶不已。

陈明仁性格倔强，敢于顶撞上级，在军中是出了名的。1941年冬，蒋介石在昆明开完军事会议，应龙云的邀请，偕宋美龄去西山游览，由卢汉、杜聿明、宋希濂作陪。行至壁鸡关，蒋介石见公路旁修工事的士兵衣衫褴褛，军容不整，与乞丐一般，不禁大为恼怒，问道：“这是谁的部队？”随行人员告诉他，是陈明仁的部队。蒋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撤销陈明仁预2师师长职务，改调71军副军长。陈明仁知道这是明升暗降，不服气，找蒋介石评理，说：“衣服是你发给我们的，质量不好，只穿几天就破了，还发了六成旧军服。”蒋说：“没有这回事！我看了那么多部队，还没有像你这个部队的。”陈明仁怒不可遏，当着蒋介石的面，把中将领章撕下来往地下一掷，气呼呼地说：“我这个中将师长是多年流血流汗拼出来的，现在我不当这个官了。”蒋介石见陈明仁如此无理，说他目无领袖，吩咐副官把他押下去。蒋介石本想这样吓唬陈明仁一下，谁知陈也是条烈性汉子，偏偏不走，和蒋介石讲理。龙云此时进来，一场顶撞上司的纠纷才被调解。龙云说陈明仁与士兵同甘苦，不扰民；关麟征也前来为陈明仁说情，蒋才怒气顿释，说：“真是一员虎将，吃饭后，叫他回部队去好了。”1944年夏，陈明仁指挥71军打龙陵，他对部下说：“打不下回龙山，统统提头来见我！”三天后，果然攻下了回龙山主峰。由于随军记者对这次战役作过长篇通讯报道，因而陈明仁的威名从此传扬海外。

陈明仁这次退守四平，他效法日本人的经验，在四平构筑许

多堡垒式环形工事,形成一个个独立坚固的支撑点和堡垒群,火力交叉形成严密火网,且炮兵布置于堡垒群的后方,不时以炮火支援各支撑点的战斗,并且各据点以交通沟壕和核心工事相连。陈明仁阵前立下遗嘱:“我誓与共军拼命,与四平街共存亡!”

四平这一战,是国共在东北第一次攻坚与反攻坚的硬仗,双方投入兵力共15万。林彪的“东总”部署1纵、6纵、7纵全部,3纵、4纵之一部,辽热军区保安1旅、2旅,合江、松江军区独立1旅、2旅、3旅等共17个师、4个炮兵团,总兵力10多万人,由西南北三面向四平包围,并以2纵、4纵的主力埋伏开原之东北,随时准备增援。

陈明仁的71军辖87师、88师、54师以及军部直属部队,另外有辽北两个保安团及各地方武装,总共守军有34000余人,划分成五个守备区。

6月10日,解放军炮击飞机场,13日向四平发动攻坚战,首先集中攻击西南角。时至黄昏,市区西、北、南三面普遍展开争夺战。入夜,战斗尤为激烈。一夜间,解放军发动4次猛攻。同时,调来炮兵助战,向市郊发射炮弹千余发,顿时炮声震天,地动山摇。陈明仁于14日晨致电杜聿明,表示坚守四平之决心。电文中云:“十三日夜,共军集结主力,猛扑四平,自晨至晚,炮弹未停,职已激励士气,以成功成仁之精神,保卫四平,不负军座之厚望。”

林彪的战将1纵司令员李天佑及政委万毅率部英勇顽强,猛冲猛打,攻占了市区2.5公里以外10公里以内所有村庄。16日,林彪投入了第2梯队,6纵17师如猛虎下山,所向无敌,摧毁了铁路以西陈明仁71军军部的核心工事,活捉了陈明仁的胞弟、71军特务团团长陈明信。71军溃不成军,陈明仁只好率军直属部队龟缩到铁路以东地区负隅顽抗。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

翰东逃往尼姑庵内,换上老百姓便装向飞机场逃跑。

陈明仁命市区内各交通要道及军部大楼前的攻击地带撒大豆,以阻滞林彪的锐利攻势。这一招学自19路军的淞沪会战,蔡廷锴当时也用此法,日军一踩上黄豆,站立不稳即被手挥大刀的19路军战士砍倒。陈明仁向他的部队印发了蒋介石的急电:“子良弟:你坚守四平,苦战甚坚,官兵奋勇杀敌,壮烈牺牲,实可嘉奖。望贤弟激励三军,坚守阵地,配合外围兵团,聚歼来犯之敌。我在此祷告上帝,同时有总理在九泉之灵保佑,贤弟定能以寡敌众,获取全胜。”

蒋介石同时限令杜聿明须于6月30日之前解四平之围。

解放军已攻占了四平五分之三的地区,陈明仁的军警卫团死亡五分之四,10个连长仅剩4人。陈明仁在铁西化工大楼地下室设军战时指挥所,他向杜聿明又发一电:“如四平解围不成,我以身殉国,死而无憾,请抚育好子女。”他见师弟林彪手下不留情,怕生还希望渺茫,已做好杀身成仁的准备。这次保四平,他的胞弟被俘;88师师长、杜聿明的妻侄女婿韩增栋阵亡;87师参谋长牺牲。他的警卫员被打死,司机负伤;陈明仁命大,司机带伤开车,逃了出来。林彪在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这次夏季攻势,使陈明仁后来回忆道:“我当了二十年丘八,从来也没有打过这么硬的仗。”

四平攻坚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守城攻城开展了巷战、肉搏战。20多天的昼夜不停地战斗,使陈明仁疲惫不堪。6月底,在他死守难支的关键时刻,国民党53军、93军、新6军按蒋介石的命令,一齐向四平包围前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林彪命各纵队主动后撤。6月30日,解放军全部撤退,陈明仁死里逃生,没有被他的黄埔师弟林彪活捉,算是大幸。四平街之围随之而解,陈明仁成为闻名中外的一员虎将。据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

回忆,如果林彪于5月19日,在怀德歼灭陈明仁的87师之后,乘胜向四平街攻击,当时国民党在混乱的情况下,不仅四平街守不住,就是71军也有全部被歼灭的可能。但由于林彪按先打外围之敌的老规矩,命令分兵攻击东丰、西丰、昌图、开源等地,因而使四平的陈明仁得到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陈明仁抓紧整顿训练部队,训练官兵,安定人心,加强防御工事,构筑了数千个永久性的卫星碉堡,挖掘和设置了大量的交通壕,而且装备精良,陆空配合,要强攻四平,以血肉之躯硬拼,其代价是惨重的。再则,林彪猛攻四平,既然突破铁西,已到铁东,如果进展再迅速些,并另在其他方面再来个突破口,使陈明仁腹背受敌,其扼守五分之一的地方恐怕早就解放了。正如陈明仁事后所说:“解放军其战术始终是从突破点出发,不去多突破些地方,而不知我们以少数兵力应付一个突破点。虽则以后再有些地方被突破,可是始终只有两个突破点,仍然不曾影响我的全局。那时解放军方面的炮火也很猛烈,但炮火射击也较分散,而不是集中使用在突破点上,危害也不大。”由于林彪失掉了两个胜利的机会,迟至1948年春才将四平彻底攻占。

四平之围被解,国民党军的损失很大。正如1947年7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宣布夏季攻势结束所说的,共歼灭在东北战场的蒋军8万余人,攻克县城43座,使东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

陈明仁因守四平有功,一时博得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并升任第7兵团司令官。宣传机器大肆鼓吹“四平大捷”。7月2日,《国民日报》以“四平一片焦土,共军伤亡五万以上,熊式辉、王叔铭亲往慰问军民”为题,发表新闻。国民党大吹大擂一阵之后,不久参谋总长陈诚组织参观团到四平视察。参观团的美国军事顾问看到阵地上的工事不少是用美援的面粉、大米包垒成的,当场向陈诚提出抗议。同时,在四平被

围时准备化装逃跑的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因被陈明仁斥责而生怀恨之心，此时也向陈诚告发 71 军士兵有抢粮行为。陈诚素来与陈明仁有不和之宿怨，于是，他抓住陈明仁的“把柄”，回南京后，就向蒋介石告状，他说，陈明仁“纵兵抢粮，祸国殃民，罪责难逃”。由于蒋介石偏听偏信，竟然又在颁发勋章、大力宣传“陈明仁防线”的同时，下令将陈明仁撤职查办。其时，陈明仁正佩青天白日勋章，衣锦还乡，在湖南醴陵老家祭祖拜坟，走亲访友。一纸撤职令使陈明仁从飘飘然一下子堕入九重深渊，弄得他啼笑皆非。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不免心寒，认为立下的功劳再大，也是白搭。陈明仁为蒋介石卖命，不可谓不忠，然而结局如此，这使他的同学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陈明仁被撤职后，改任总统府中将参军闲职。

1948 年 10 月，蒋介石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前方将士不用命、倒戈、起义、投诚者日益增多，他这才想起赋闲的虎将陈明仁。被赋闲的陈明仁心灰意懒，早有解甲归田的打算。在程潜、李明灏、章士钊等进步元老的启发下，他开始与蒋介石产生离心倾向，但一想到在四平与林彪的那场血战，他又犹豫不决。为了重握实权，他答应重新出山，就任华中“剿共”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到武汉就职后，他表面上高喊“要坚决保卫武汉，战至最后一人”，但暗中却秘密释放进步学生和在被押政治犯，并积极与主张和平的湖南省主席程潜进行联系，欲在湖南组建部队。1949 年 2 月 18 日，陈明仁率部在长沙任国民党 1 兵团司令兼长沙警备司令，辖 29 军和 71 军，共有兵力两万余人。陈明仁入湘后，经常与程潜来往，表示对党国前途不抱信心，愿意追随程潜走和平道路，为湖南 3 千万父老乡亲做点有益的事。陈明仁惟一的顾虑就是怕共产党报四平之仇，他是人民的罪人，怕得不到共产党的原谅。此时，中共湖南省工委也通过陈明仁的亲信积

极做他的思想工作。毛泽东专门通过章士钊给陈明仁传话说：“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章士钊、李君九等人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陈明仁打消了最后的顾虑。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在长沙通电起义，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对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义举极为赞誉，致电嘉勉称之为“大义昭著，薄海欢迎”。

8月30日，毛泽东电邀程潜、陈明仁北上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陈明仁途经汉口时，受到四野司令员林彪、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邓子恢和在汉口的党政军领导谭政、陶铸、赵尔陆的热烈欢迎。陈明仁因四平之战一直担心师弟林彪会“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林彪并未记四平之仇，反而以黄埔同学名义来设宴为他洗尘，陶铸这位黄埔五期小师弟也作陪，并频频举杯敬酒，这使陈明仁大为感动。9月10日，陈明仁到达北平。他的老师、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北平市市长聂荣臻亲往车站迎接。两天后，朱德设宴招待陈明仁将军，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等解放军高级将领出席作陪。9月19日，毛泽东在百忙中邀请程潜、陈明仁同游天坛公园。走进祈年殿前，毛泽东停步说：“陈将军，你今后有什么打算？”陈明仁答：“我是一个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毛泽东说：“那好，你还是去带兵吧。我们已决定将你的第1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还由你来当司令员。”

接着，毛泽东风趣地说：“陈将军，我们俩来单独照个相。”陈明仁恭恭敬敬地和毛泽东照了张双人半身相片。照完后，毛泽

东对陈明仁说：“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又说杜聿明被共产党五马分尸了，王耀武被剥皮凌迟了。开完会，你可到济南看看他们，将实际情况向外宣传解释一番。”陈明仁道：“好，我一定去宣传。”毛泽东又补充道：“你还可以把我们合影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同学。只要能送到的统统送一张，让他们看看。后天21日，我们新政治协商会议就开幕了，各方面代表人物都有了；惟独还缺少蒋介石黄埔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就都全了！”陈明仁听到这里，非常感动。政协会议一结束，陈明仁前往济南看望了被俘的黄埔同学杜聿明、王耀武、李仙洲等人，并把他和毛泽东合影的照片分赠给他们，勉励他们好好地改造，重新做人。

1949年11月1日，陈明仁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1兵团司令员，整编后为两个军6个师，官兵7万人。12月中旬，陈明仁进驻广西担任剿匪任务，经过5个月战斗，歼灭残匪3万余人，胜利完成任务。1952年10月，陈明仁任55军军长，在广东湛江守卫祖国南大门。

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行政5级，并荣获一级解放勋章。陈明仁是国民党起义将领中三位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者之一，另两位是陶峙岳和董其武。陈明仁的夫人谢芳如患癌症于1951年去逝。后经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介绍，陈明仁与湖南医学院妇科大夫肖毅重新结为伉俪。由于陈明仁心直口快，曾给共产党提过许多意见，1957年反右高潮时，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非要把陈明仁打成右派分子不可，55军政委王振乾不同意，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立即电示：要团结这样的高级爱国将领。右派的帽子，因周恩来伸出巨手挡住，没有戴到陈明仁的头上。但“文革”之火也烧到这位黄埔起义将领的家里，还是周恩来出面，命令55军党委绝对保证陈明仁的人身安全，这

样,他才逃过一场厄运。1972年陈明仁患癌症,1974年5月21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1年。他的老师、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主持追悼会,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许德珩、肖劲光参加了追悼会,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这是党和军队给予这位黄埔一期毕业的起义将领的崇高荣誉。周恩来四救陈明仁,成为黄埔师生情谊的一段佳话。

话说东北野战军刚刚结束1947年的夏季攻势,接着在陕北又发动了几次大的战役。1947年8月,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经过了三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两个多月的新式整军,开始转入内线反攻。以歼灭胡宗南集团的整编36师为目标的沙家店战役是从8月20日开始的。8月23日,我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直逼潼关,威胁西安,迫使胡宗南由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御。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我军即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戡、钟松两部,吸引该敌,以陈谢行动。”胡宗南果然被陈赓行动所迷惑,误认我军是“仓惶逃窜”、“弹尽粮绝”,被迫渡河东去。因此,他严令各军“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胡宗南企图以刘戡的29军和整编36师实行南北夹击,“迫敌于两河(两河、无定河)之间决战”,在榆林、米脂、佳县三角地带歼灭西北野战军。

国共两党的黄埔精英在陕北进行角逐。共产党方面有黄埔一期的陈赓,黄埔五期的张宗逊、许光达;国民党方面有黄埔一期的“西北王”胡宗南、刘戡和黄埔二期的钟松。钟松的整编36师,是胡宗南集团所谓“三大主力”之一,自吹:“共军可以吃掉别的军队,就是吃不掉36师。”钟松手下也有两员大将,一是123旅少将旅长、黄埔二期毕业的刘子奇;另一是165旅少将旅长、黄埔六期毕业的李日基。李日基自恃援榆有功,异常骄傲,声言

要“一战结束陕北问题”。钟松8月13日进入榆林城,14日即马不停蹄地率两个旅南下,16日到达镇川堡,他孤军冒进,远离主力。8月20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沙家店一举歼灭钟松的36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多人,俘旅长刘子奇。胡宗南从此开始交上了厄运,就一个旅一个旅的被他的黄埔师兄师弟吃掉了。

1947年9月,黄埔五期毕业的许光达(在校名为许德华)带着他的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西渡黄河。他的部队归西北野战军建制才两个月,就遇到了当年黄埔军校的师兄、二期毕业的29军76师中将师长廖昂,地点是陕北清涧城。此刻,许光达指挥3纵攻城,廖昂指挥76师守城,真是同学反目为仇,都想打垮对方,互不相让。

许光达,湖南长沙人,1925年9月加入共产党,1926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毕业后参加南昌起义部队25师75团当排长、代理连长,1929年10月被中央军委派到鄂西洪湖苏区,在贺龙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他曾任工农红军团长、师长、军参谋长,1932年因作战负伤被转移到上海,后被派往苏联治疗及学习。抗战爆发后回国,他在延安任抗大教育长、抗大三分校校长。此时他是晋绥野战军代理参谋长兼第3纵队司令员。

这次西北野战军准备利用延川、延长、清涧、子长、绥德胡宗南防守兵力薄弱,且彼此之间距离较远,孤立无援之机,撤围榆林,举行延(延川、延长)清(涧)战役。在野司召开的战前准备会上,彭德怀对许光达说:“守清涧的廖昂是你在黄埔军校的同学,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情况,让大家先见识见识这个人。”许光达说:“廖昂是四川人,表面看起来,给人以儒雅的感觉,好读书,颇有韬略。在校学习成绩好,大家都很佩服他。”彭总说:“你能不能给他写封信,叫他放下武器?”许光达说:“这廖师兄很难说服,不过,我可以写封信,先探探虚实。”

廖昂带着他的师部直属部队和一个不满员的旅(欠一个团)进驻清涧城,突然面临共产党军队的围攻,刚开始他还镇静沉着,其原因是:清涧城位于延安、绥德间的九里山以南,扼咸榆公路之要冲,四山环抱;特别是城西南的笔架山,状似笔架,周围都是悬崖峭壁,难以攀登,与清涧城只隔一条不宽的清涧河,是守护清涧的屏障。其与城东北九里山支脉的制高点遥遥相望,易守难攻。廖想,凭许光达、周士第、张宗逊这些跑到共产党去的黄埔同学的装备与力量,攻坚还是有困难的。所以廖昂十分自信,亲书“固若金汤”四个大字,贴在师部门口,安抚部下。他扬言:“清涧要成为共军前进道上的一个坟墓。”

廖昂得知攻城的共军主力部队是许光达后,他轻蔑地一笑:“许德华,你来了,咱们走着瞧!”

廖昂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战斗打响后,清涧城的外围据点接连被解放军拔掉。彭德怀、许光达亲临前线视察,并指示攻城部队:必须做好充分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兵器突破一点,割裂敌阵,各兵团协同动作,先打弱敌,后啃骨头。廖昂不得不向胡宗南发电报,请求增援。胡宗南见廖昂一封接一封的求援电报,知道大事不好了,连忙命 29 军军长、黄埔一期毕业生刘戡率 5 个半旅赴清涧增援,命廖昂固守待援。

许光达所部在攻下笔架山后,已是兵临城下,指日可得。这时,他认为写信劝降是到了火候了,于是,他修书一封,10月8日夜,交由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工兵营长带进城内。廖昂打开信一看,只见信中写道:

廖昂兄:别来无恙!

你我由黄埔军校毕业,分手已二十年矣!不期在清涧相遇,真乃有缘!可惜,炮火连天,工事阻挡,你我只能隔城相望,不能握手言欢,实乃憾事!

站在清涧城郊，不由得使我回想起与廖兄黄埔同窗时的生活。那时，你我都是热血青年，秉承总理遗愿，致力军事救国，渴望建功立业……岁月流逝，几经沧桑，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尤以在黄埔填写《学员政治面貌登记表》时的情景铭心刻骨，终生难忘。当时，廖兄执意留在国民党内，并劝我脱离共产党，人各有志，我们分道扬镳。你说：‘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二十年过去了，而今，我仍引廖兄的话问：‘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明眼人不难看出，国民党因倒行逆施，违背了总理遗愿，已是众叛亲离，日暮途穷。虽然尚有军队数百万，但由于师出无名，士无斗志，人命危浅。因而必败无疑。而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乃是顺乎潮流，代表了民众的意志，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实践证明，跟着国民党走是没有前途的。积二十年之经验，廖兄还不能幡然悔悟吗？

眼下，我军已将清涧城团团围住，援军被我阻击，也是自身难保。清涧是朝不保夕，破城在即。我念及与你同窗情谊，不忍亲睹城破之日你身陷囹圄，故陈说厉害，劝兄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我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立功有赏。你若能率部起义，使生灵免遭涂炭，乃我民众之大幸，望兄三思而行。切！切！

同学许德华

1947年10月8日

廖昂阅罢许光达的这封信，心里真不是滋味。想当年两人在广州黄埔岛上，一腔热血，报效祖国，共同聆听周恩来的讲话，誓师北伐，打倒军阀，同唱《杀贼歌》，同上课堂学军事，如今怎么

竟成了兄弟手足相互残杀？作为一个军人，投降是可耻的，何况对手是自己的小师弟，他更加觉得不能投降，日夜盼援军赶到，以救自己于燃眉之急。

正在这时，廖昂接到胡宗南的回电，告诉他，刘戡的部队正日夜兼程向清涧前进，令他一定要守住清涧，待刘戡到达后内外夹击，消灭共军。胡宗南的电报壮了廖昂的胆，他决定不给许光达回信。

10月11日晨，解放军第1和第3纵队向清涧发起猛烈攻击，许光达命令要活捉廖昂。城门被大炮轰开，解放军一涌而进入清涧城内。廖昂化装成士兵，夹在俘虏中，但终于被清查出来。同时被俘的还有24旅少将旅长、黄埔四期毕业的张新（张新汉）。许光达策马入城，听说廖昂被俘，便令人带他到指挥所来。廖昂进了指挥所，见许光达忙着给办事人员交代什么，只好低下头，一脸的沮丧。做了老同学的俘虏，还有什么好说的，他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许光达比廖昂小5岁，在黄埔算小师弟，他一眼就认出了廖昂，心里想：廖师兄昔日的那股傲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走过来，在廖昂面前站住，指着旁边的一个凳子，对廖昂说：“坐吧！”

廖昂极不自然地坐了下来。一时间，两人都没有说话。虽然是黄埔同学，但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是败军之将。还是许光达打破了沉默，说：“看到我的信了吗？”

廖昂点点头。许光达说：“那你为什么不放下武器？”廖昂沮丧着脸答道：“我以为能守得住。如果胡宗南派出的援兵早到一天，就不会是这个结局。”

许光达见他仍执迷不悟，就开导地说：“你认为胡宗南会救得了你吗？他派来的5个半旅由刘戡率领，距清涧还不到30华里，只有一天的路程，可刘戡就是过不来。为什么？”

廖昂说：“都只想保存实力，见死不救。”

许光达说：“这是国民党军队本质所决定的，当然注定要失败。”

“事情都过去了，也不要过多地去考虑了，还是多想想今后的事吧！我们有好多年不见了吧？”许光达见廖昂垂头丧气，一脸愁云，还面带惧色，于是，把话题扯到黄埔，气氛才缓和下来。他们谈了20年未见面的各自情形，最后，许光达说：“你也不要太悲观。我们党的政策你知道，只要认真反省自己的罪恶，痛改前非，是会获得宽大处理的。过几天，你就可以见到黄埔的同学李纪云、麦宗禹、李昆岗、刘子奇他们了。他们被俘过来都生活得很好，愿意接受改造。黄正诚带着胡宗南的整编第1旅进攻陈赓老大哥，被老大哥捉住，不愿留下，陈赓把他放回去了，这你也知道。可回去了呢，蒋校长没放过他，把他毙了。你喜欢读书，将来可以到我们办的军事学校去当教官，把你学的那些知识贡献给人民嘛！”

廖昂刚来时还担心自己的命运，一听许光达这一席话，似乎感觉好多了，至少，共军不会杀他。许光达与廖昂谈了一阵子过去及将来的事，就让人领廖昂下去休息去了。廖昂临别时侷促地伸出了手，旋即举起手，向许光达敬了一个军礼。

许光达刚见廖昂时，廖昂还不相信自己会被俘，一再说：“本来是想……可是胡宗南说刘戡援军马上就到。”许光达曾严肃地说：“看来你还不服输啰！那么我放你走，你跟胡宗南再领一个师来，我们再较量较量如何？”廖昂慌了神，连说：“不敢！不敢！”

许光达没有亏待俘虏，胡宗南手下的几员大将，在陕北蟠龙战役、沙家店战役、清涧战役后，先后有刘子奇、李日基、张新汉、麦宗禹、陈子干、黄正诚、廖昂、李纪云等八个整编旅旅长当了俘虏。以上这八人，都毕业于黄埔军校，他们败在他们的同学张宗

逊、周士第、许光达、陈赓手下。真是反目为仇，战场不是操场，刀枪都是真的，谁也不会手下留情啊！

许光达 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1969 年 6 月 3 日被林彪迫害致死，终年 61 岁。正是：“百战沙场驱虎豹，万苦千辛胆未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此诗是从许光达死后遗物中所发现的，令人肃然起敬。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袁鹤领头 中训团将官哭陵 陈赓强攻 邱行湘兵败洛阳

话说 1947 年国共两党关系完全破裂，蒋介石这年正好进入花甲之年，但他看到的不是太平盛世，而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景象。2 月 28 日，台湾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件事刚用武力镇压下去，山东战场又传来李仙洲被俘，军事上接连失利的消息。蒋介石只好改组政府，由张群代替宋子文任行政院长。5 月 2 日，杭州、无锡、合肥、成都、上海、南京等十余城市，相继发生群众抢米风潮，社会秩序大乱，法币贬值。5 月 4 日，上海各学校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并迅速扩大波及南京、杭州、北平、沈阳、青岛、开封等大中城市。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爱国民主运动一次比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斗争也更为坚决勇敢。去年 7 月 11 日和 15 日，昆明民主同盟负责人李公朴和闻一多教授煽动学生闹事，蒋介石指使特务先后将其暗杀，以为杀一儆百，会压下群众的愤怒。岂知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一浪，使政府焦头烂额，令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

5 月 5 日，南京却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 400 名国民党将官集体在紫金山中山陵孙总理灵前哭陵的事件。学生闹事，还可说他们年幼无知，受人唆使；而这些国民党将领集体哭陵，却用什么理由也无法为自己辩护，只能说时势已到了危急关头，跟随

蒋介石的一批将领也要起来“造反”了。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了整编会议，陈诚提出在 1946 年内用集体转业、个别转业和遣散三种方式，裁减部队官员 180 万人，国民党当时的处境是，庞大的军费开销，国家的财政支付不起。但国民党的军事将领，都是除了带兵打仗之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在军队未建立起良好的退役制度时，他们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中央裁去他们，就等于砸掉他们的饭碗，而这次被遣散裁减的大都是非嫡系杂牌军，这就更加引起被裁军官的不满。

这些编余军官处境艰难，生活无着。有个重伤致残的编余军官，把自己负伤的说明写成文字拴在身上，沿街讨饭。当局觉得这太丢党国的脸，不准他这样做。不久，人们在秦淮河发现了这位军官的尸体，轰动了整个南京城。后来，国民党当局碍于舆论压力，下令编余军官除自愿遣散的以外，集中起来成立中央训练团，下属若干军官总队，并声称受训之后，安置到其他部门工作。

1947 年 3 月，编余军官张清泉在警官学校受训结业，却没有给安置工作，生活无来源，最后，只得将年轻的妻子卖给小商贩，这些夫妻分手时，抱头痛哭，情况十分凄惨。国民党中将军官奚泽，远从南洋献身革命，变卖家财支援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他曾在广州大总统府工作，以后转战南北，参加北伐和抗日，官至某集团军中将参谋长。成了编余人员后，他一贫如洗，妻子于 1947 年 4 月的一天到燕子矶投江自尽。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陆军少将军官陈天民，原为国民党 190 师副师长，抗战时参加长沙大会战立有战功。他一家 7 口，5 个孩子，大的只有 10 岁，小的不满周岁，无法维持生活，靠借贷度日。陈天民身患肺结

核,无钱治病,一时想不开,于5月1日趁夫人不在家时,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陈天民死后,家中无以为殓,尸体放在家里已好几天。后来由中训团将官班、警政班的同学每人捐金圆券3000元,才薄棺草草掩埋。编余军官目睹陈天民一家的悲剧,个个气忿难平,众怒一触即发。

在军官大队,失业军官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此路走不道,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黄埔二期毕业的李士珍,浙江宁海人,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他接纳了一批编余军官改学警察,成立警政班,其学员刘海亭写了两首打油诗,藉以抒发自己对现状不满的思想感情,其一曰:“军官转业学警察,剩闲教育好肉麻;所学非驴又非马,满嘴胡说骗阿爸。”其二曰:“军官转业半年多,剩闲教育又如何?毕业仍是无工作,逼得学员卖老婆。”这“剩闲”何解?原来李士珍开了一门“精神讲话”课,专门讲《大学》、《中庸》,借用《易经》中的一句话,牵强附会,大肆吹捧蒋介石,说什么“自古以来,中国每五百年出一个圣人”,“当前的圣人,就是我们的领袖蒋委员长”。李士珍说:“所以我们的‘精神讲话’课,也就是一种‘圣贤教育’,编余军官刘海亭把“圣贤”戏谑为“剩闲”。

5月5日上午10时,中训团将官班400多名将官陆续在中山陵集中,他们身着将校呢制服,佩戴将军领章,胸挂勋章。在人陆续到齐后,公推黄埔一期毕业的陆军中将黄鹤为总指挥。黄鹤,乃湖南湘阴人氏,参加过东征、北伐、抗战,曾任国民党19军军长。抗日胜利后,因不满蒋介石独裁,被排挤编遣进入了中训团将官班受训。黄鹤带领众将官来到中山陵“博爱坊”排成队伍,默然肃立。

哭陵仪式开始,黄鹤慷慨激昂地发表简短演说,他说:

“今天我们这些编余的将官来到中山陵,不是谒陵,而是哭

陵。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也为了我们的全家老小，我们要大哭，二哭，乃至三哭。我们追随总理，东征北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政府却把我们一脚踢开，大家被抛弃失业，断绝了我们的生路。我们没有别的奢望，活着只求有碗饭吃，死后有口棺木落葬。我们也是人，我们要生活，要生存下去！”

黄鹤言毕，带领大家到中山灵堂，向孙中山雕像献花。灵堂不大，里里外外被哭陵将官挤得水泄不通；很多游客也围拢来看热闹，深表同情。中山陵卫队见众多将官来哭陵，也大吃一惊，又不敢上前询问和阻挡，弄得不知所措。

这天，陈天民副师长的遗孀带着五个孩子，还来不及向孙中山雕像鞠躬，就倒地大哭。黄鹤将陈天民自杀情况向大家介绍后，将官们见此惨状不禁心酸，想到自己处境，个个悲愤难抑，不由得嚎啕大哭。宁静的中山陵祭堂，顿时哭声震天，游客中的妇女也纷纷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接着，黄鹤宣读《檄文》，大意是：我们这些军官，过去曾经追随总理参加东征北伐，终于取得了国民革命的胜利。现在国家有了宪法，国民党也应还政于民。但国民的民主权利，我们却没有见到。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般贪官污吏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喘息未定，横生节枝，鸟尽弓藏，其心何忍。甚至排除异己，分划亲疏，致使爱国之士，流落街头，妻子号寒，无人过问……读到这里，黄鹤已泣不成声，奚泽中将想到妻子投长江而自尽，哭得当场晕倒在地，不少哭陵将官当场振臂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卖国贼！”

第二天，南京《救国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哭陵事件。接着，《中央日报》也作了报道。大小报纸相继发表文章，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妇孺皆知。

12年前的一个冬天,国民党陆军第1军中将军总参议续范亭坐车来到中山陵前,独自登上台阶,走向祭堂。面对庄严巍峨的中山陵,想到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想到东北三省国土沦陷,同胞们沦为亡国奴的痛苦,感慨万千。在傍晚时分,游人散尽后,他轻轻地吟了一首诗:

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
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
颡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他吟罢诗,忽然抽出一把短剑刺向自己的腹部,鲜血流淌在孙中山安息之地,幸亏守卫陵园卫士及时发现,将其送往南京中央医院抢救,才幸免于难。当时,续范亭身上还留有一首《绝命诗》: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
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

蒋介石对日军侵犯东北采取“不抵抗主义”,爱国将领续范亭以身剖腹明志,这事曾在当时引起轰动。今天黄鹤哭陵,消息传到蒋介石官邸,侍从秘书陈布雷声泪俱下,劝蒋介石要重视此事件,不可儿戏。蒋听罢后大发雷霆:“这些混蛋,在我大伤脑筋的时候,还要增加我的麻烦,气死我了!”蒋介石不仅不反省,还大发脾气,使追随他多年的“文胆”陈布雷不能不寒心。蒋介石原本要以“戡乱”罪严惩黄鹤这一批将官,后来听从了党内元老们的劝告:以温顺手段教育改正,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激起众怒。5月6日,陈诚受命到中央训练团将官班作“精神训

话”。他气呼呼地走上讲台，劈头就批评指责，众将官立刻紧张起来。陈诚开口说：“哭什么陵？这是犯上作乱！这是反对中央，反对总裁！是对党国的大逆不道！你们这样做，只会对共产党有利，你们太愚蠢了，使亲者痛仇者快啊！”全场鸦雀无声，气氛十分紧张。然后，陈诚又慰勉一番，答应帮助大家解决失业、生活等方面的困难。陈诚当然是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于1949年8月，黄鹤参加湖南和平解放活动，冒着生命危险，积极为和平奔走。1996年10月8日，是身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的黄鹤百岁寿诞。湖南省委统战部、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和湖南省黄埔同学会以及岳阳市有关部门60多人为黄鹤举办了百岁寿诞庆贺。黄鹤对50年前的“南京中山陵将官哭陵”的事记忆犹新。他在庆贺会上作了半个小时的即席答谢讲话。最后他说：“我这一辈子离奇曲折的生活经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黄鹤是蒋介石的学生，也是在南京以哭陵使蒋介石大丢面子的“天子门生”。历史经验证明，大凡一个朝代气数已尽，则会怪事层出不穷。黄鹤哭陵，就是蒋家王朝覆灭的一个“先兆”。

黄鹤哭陵后的第10天，传来山东战场国民党整编74师中将师长、黄埔四期毕业生张灵甫阵亡的消息，这又给蒋介石一个沉重的打击。

5月20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学生，分别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许多教授也参加了斗争。国民党政府同时在南京、天津野蛮镇压游行示威的学生，殴伤和逮捕学生百余人，造成“五·二〇血案”。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广大的人民支持下仍继续发展，并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编遣失业军官要生存等各界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汇合一体，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

城市；至此，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

似乎败兵之将的火气总是很大的。1947年6月28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名义，对毛泽东下了“通缉令”。蒋介石给毛泽东加的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蒋介石光是“通缉”还不解恨，他在7月4日召开的国民政府第6次国务会议上，提出《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并得以通过。他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从速戡平叛乱”。

于是，蒋介石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颁发了一系列法令及条例。诸如《中国国民党戡乱建国总动员方案》、《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戡乱时期国家紧急治罪办法》等等。

蒋介石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在国民党内外交困之际，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毛泽东、周恩来开始称蒋介石为“内战祸首”，国共双方终于撕破脸皮，而黄埔军校同学这时也反目为仇，在战场上各为其主，拼个鱼死网破。

话说延安新华社广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宣言》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传遍大江南北。蒋介石于1947年11月30日在他的日记上写了一篇“反省录”，全文如下：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

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十二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蒋介石于1948年春准备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这年蒋介石刚好61岁,他要圆多年的总统梦,但战局极其不利,他在“反省录”中提到的“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一节,最使他坐卧不安。这时候,他一心想打几个胜仗,为自己“冲”一下“喜”。岂料在陕北等地接连吃败仗,被弄得非常恼火。在前几天,他吩咐侍从室通知驻守洛阳的青年军206师少将师长、黄埔五期毕业的邱行湘来南京,准备向他面授机宜。当邱行湘奉命来到南京,一踏入黄埔路官邸时,立刻就有一个侍从副官出来打招呼说:“邱师长,这两天老头子因为战事和沙面事件(指陈立夫、陈果夫的中统特务焚烧广州沙面英领事馆事件)的关系,脾气不好,你要注意点。”

果然,邱行湘被引入蒋的办公室时,只见蒋板着脸,一脸紧张忧虑之色。蒋对邱说:“洛阳是秦、晋、豫三省的要冲,也是中原与西北联系的要点,一定要作长期固守的打算。”蒋又要邱行湘以洛阳为中心,组训民众,加强保甲工作,扩大地方武装力量。谈到洛阳的形势时,蒋又说:“洛阳地形很好,易守难攻。洛阳的邙山、龙门、西工都非常重要,必须加强工事,研究防守,教育部队。飞机场也很重要,必须确实控制。”蒋介石学过军事,人们常说:“得中原者得天下也。”他把守住洛阳、郑州、开封当作战

略要地来抓,丝毫不敢懈怠。蒋考虑片刻后又问:“洛阳有无警备司令?”邱答:“没有。”蒋马上写了张条子,加封他这个兼职。蒋又问邱:“你有什么长处?”邱说:“没有什么长处,练兵打仗还有点经验。”蒋听后连连点头说:“军事的成败,关系到党国的安危,如果不打败共产党,我们将无葬身之地。”邱行湘见蒋之后,蒋经国又在碑亭巷“曲园”酒家请他吃饭。在吃饭时,蒋经国给邱行湘打气,要他回洛阳后加强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在军队兵员补充方面有失学青年招待站不断补充;在军事装备方面可以做到逐步充实调整。最后,蒋经国推荐原任四川万县青年中学校长赖钟声到邱行湘的 206 师任新闻处长。此外,政工系统的人员,还另有电报密本和专用电台,与蒋经国直接联系。

邱行湘,江苏溧阳人,1908 年生,这年刚好进入不惑之年。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后,他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由于打仗勇敢,人们都称他为“邱老虎”,1932 年夏,他任陈诚的随从参谋,参加过“围剿”红军,抗战爆发后,他任 67 师 201 旅副旅长兼 402 团团团长,参加过淞沪抗战和保卫南京的外围作战,1943 年 3 月调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副官处处长;5 月,日军大举进犯鄂西,他被陈诚调回第 5 师,仍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和黄埔军校七期毕业的师长刘云瀚一起指挥第 5 师参加鄂西会战;在保卫石牌要塞战斗中,他与日军浴血奋战七昼夜,全师以伤亡 800 余人的代价,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47 年 11 月他升任青年军 206 师(相当于军)少将师长。邱行湘本来是被任命为青年军 205 师师长,准备到台湾赴任,后因驻防洛阳的青年军 206 师师长肖劲,胆小如鼠,战功平平,蒋介石才决定改派邱行湘接替肖劲任青年军 206 师师长,防守洛阳。

邱行湘跟随陈诚 19 年,深得陈诚的信任。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时,邱行湘任 94 军 5 师师长。在国民党军队连连败北的时

候，邱行湘果然身手不凡，在华北与解放军交手时，胜多负少，这在当时殊为难得。不过，那都是在别人的指挥下打仗，邱行湘渴望独当一面。蒋介石让他去洛阳，正合他的心意，他要打几个漂亮仗，给老长官陈诚争个面子。

怀着这样的心情，邱行湘走马上任了。

邱行湘回到洛阳后，立即加强固守工事，加紧从事备战活动，积极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又连夜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调整人事，提拔既忠于蒋介石又能打仗的人作为骨干。邱行湘在《保卫洛阳告将士书》中说：“洛阳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迫令他的官兵“不是成功即是成仁。”他在洛阳构筑的防御工事，得到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具有现代化半永久性质。其防御体系由三道阵地组成：第一道在四关及城郊选择有守备能力的数个支撑点构成外围阵地；第二道，以城门两侧地段（含瓮城）为重点，依托城墙和护城壕，构成城垣主阵地；第三道，利用原洛阳中学为基点，修一个土围子，并与城西北角地面和地下工事相结合，构成城内的核心阵地。此外，城内外还挖了许多交通壕或地道串通，再辅之以巷战工事，以期处处扎根，步步为营，进行持久顽抗，真乃所谓“固若金汤”。

邱行湘为确保万无一失，阻止解放军突击部队接近，他强迫洛阳附近十几个县的农民大修城防工事，为扫清射界，仅拆城关民房即达1500间以上，东门、东北门、西工发电厂等处数条街道的民房所剩无几，致使美丽的九朝古都被挖得百孔千疮，大批居民和商人流浪街头，饥寒交迫，无以为生。戴季陶派有专人看管的西门周公庙文物古迹和城北的三国时期司马懿墓，也被拆挖得面目全非。为了大量储粮备战，邱行湘又令兵站人员下乡征购粮食，弄得农民鸡犬不宁。

邱行湘除下令洛阳全部人员和物资不准外撤外，还从郑州

把武器弹药及军官家属一起搬到洛阳来，又令铁道部门不许将车辆外调。总之，邱行湘不顾一切，准备顽强死守洛阳。蒋介石认为洛阳固守一个月没有问题，邱行湘亦自我吹嘘，说固守不成问题。

在兵力上，洛阳有5个步兵团，另有骑兵搜索营、迫击炮营、工兵营、辎重兵营及榴弹炮兵连、战防炮连、野战炮连、重迫击炮连、宪兵连和军士队、人民服务队、豫西师管区步兵连、保安1团、武警大队，总共有官兵两万多人。连洛阳附近的封建迷信组织“妙道会”也动员起来。人民服务队类似康泽的别动队，是洛阳地方的反动武装力量。206师还有校级军官200多人编成10个督战队，分配于各个据点，以加强对部队的控制。

3月7日，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掩护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主力休整，华野的第3、第8纵队，陈赓、谢富治兵团的第4、第9纵队，以及当地人民武装，由华野西集团统一指挥，发起了洛阳战役。

具体部署是：以华野的3纵从东、北两面包围洛阳，并由东关、北关攻城；以陈谢兵团的4纵从西、南两面包围洛阳，并由西关、南关攻城；以华野的8纵抢占黑石关，截断洛阳守敌与郑州的联系，并阻击可能由东南两面增援之敌；以陈谢兵团的9纵和太岳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在攻占新安、渑池后，准备阻击西、南两面增援之敌，并为战役总预备队。

3月8日至10日，担任阻援任务的华野8纵和陈谢兵团的9纵，以出敌不意的惊人速度，切断了陇海铁路，迅猛攻占了洛阳以东的黑石关、白马寺，洛阳以西的新安、渑池，洛阳西南的宜阳等据点，将洛阳四周百余里以内的守敌全部肃清。

邱行湘的对头是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陈赓在一年前率领陈谢兵团刚渡黄河，他的黄埔一期老同学李铁军已严阵以待。

陈赓要起“游击战”，把老同学这口“肥牛”硬是拖成了“瘦牛”，最后在伏牛山降伏了这头“牛”。

太岳兵团成立以来，陈赓挺进中原，所向无敌，李铁军的5兵团吃过他的亏。这次，是攻坚，是第一次攻打大中城市，而打半永久性设防之敌，大家都没有经验。3月9日黄昏，扫清洛阳城围的战斗打响了，解放军各路突击队按照既定计划，开始攻击洛阳东西车站、东西北三关及西工地区。当夜，解放军攻占车站；10日拂晓，继克西工地区，并将东关、北关之敌大部肃清；下午转攻南关和西关；11日下午1时，攻占西关重要据点周公庙，打开洛阳城西的通道。至此，解放军已将四关之敌大部肃清，为攻克洛阳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月12日，陈赓给4纵10旅旅长周希汉指出了两条进城的道路：一是按照原定攻城计划，由10旅坚决打开西门，然后向城西北角核心阵地突进；二是把4纵10旅调到东门，跟着兄弟部队进城去。结果，周希汉旅坚决按原计划攻西门，在指战员们的拼搏下，终于在12日下午4时，将西门打开了。陈赓司令员下达命令：“邱行湘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解放军4纵10旅红军团和29团突进到洛阳中学南面不到200米的居民区，华野兄弟部队也从东面接近邱行湘的核心阵地。13日，顾祝同转来蒋介石给邱行湘的电报，要他们“坚守到底，与洛阳共存亡”。同时，邱行湘的黄埔老大哥孙元良、胡璉两兵团的援军亦由南面和东面分别赶到登封和偃师，在洛阳已可听到敌援兵与解放军打援部队激战的隆隆炮声。于是，邱行湘又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面孔，给官兵打气说：“要死守，援兵马上就到了，胜利是我们的！”他幻想依托核心阵地打出“第二个四平街”来。为了对空联络，他还下令将青天白日旗挂在洛阳中学大楼的屋顶上。

战斗延续了6天，3月14日午夜，解放军进入了核心阵地。

在战斗中，邱行湘曾电报蒋介石，自我吹嘘：“我军士气旺盛，迭挫凶锋，斩获甚众。”蒋介石、蒋经国回电说：“以寡敌众，聚歼来犯之敌，殊堪嘉奖！希激励三军，坚守阵地，配合外围兵团，全歼劲敌。”邱行湘接到“嘉奖令”后，即在全军中传达，以鼓舞“士气”。但当雪片一样的“嘉奖令”飞遍洛阳城内时，邱行湘已以俘虏的身份，被带到陈赓面前。而南京方面，则忙于向邱行湘的家属索取照片，准备举行追悼会，“表彰忠烈”。

洛阳攻坚战，是解放军进入中原后，对敌坚固设防的战略城市的第一次攻坚战。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使中原国民党军闻风丧胆，而且使驻守各大、中城市的国民党军惊恐万状。连邱行湘这样构筑的半永久性工事都被攻破，其他城市设防就可想而知了。

邱行湘在被俘前，手提冲锋枪，亲自督战，盛怒之下，一连枪毙了几个后退和躲藏的官兵，但仍无济于事。他驱赶东边的残兵，西边的退了下來；驱赶北面的余卒，南面的又窜了回来。无奈，邱行湘只得率残兵败将从一条地下暗道里钻出来，沿着西北城墙角外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逃生，但他没想到刚跑出不远，就被解放军机动部队发觉了。战斗英雄卫小堂带领的一个班首先冲出去，后面几个班的战士也跟着冲上去，使这批残兵败将乖乖地投降。邱行湘终于没有逃出去，当了俘虏。

在战斗快要结束时，解放军集合了俘虏，查问谁是邱行湘。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出俘虏群招认：“我是副参谋长符绍基，不是师长。”然后，一个中等个子、歪戴军帽、满脸血污、穿着士兵服装的壮年军人从一旁地道里爬出来，拼命地朝东跑去，解放军战士齐声喊：“抓住他！抓住他！”12连战士王五彬跑上去将其拦腰抱住，指导员刘杰带领几个战士赶上前去，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怒目相视，仍想挣脱。恰巧这时有个战士送来一张邱行湘的

照片,刘杰打着电筒一看,原来他正是蒋介石的“宠将”、被青年军士兵称为“邱老虎”的邱行湘。战士们高兴地叫喊起来:“我们捉住了邱行湘!”

战士们把邱行湘和他的副参谋长符绍基一起送到10旅红军团指挥所。符绍基态度较好,承认罪过,请求宽恕。而邱行湘却心怀仇恨,目泛凶光,恶狠狠地说:“你们有你们的主义,我们有我们的主义,现在我战败了,被俘了,成了你们的阶下囚,要杀头或枪毙,随你们的便。”红军团团长赵华清没有理会邱行湘那派胡言,反而热情地对他说:“我们陈赓司令员请你去见见面,他说你们是黄埔同学。”

邱行湘没有想到,这回他栽在了老同学陈赓手里。

此后,邱行湘作为战犯,被关进北京战犯管理所改造思想,1959年12月,被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已经改造好的战犯首批特赦。与邱行湘同时被特赦的,有黄埔军校同学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周振强、杨伯涛等多人。邱行湘在获释后,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

邱行湘在“功德林”及秦城监狱劳动改造的情况,在当代作家、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写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书中作了详尽描述。据黄济人介绍,邱行湘与黄济人的父亲既是近亲又同是黄埔军校五期同学,在邱行湘特赦后专程赴四川重庆,想见见阔别多年的至亲加同学。

黄济人说:

“……我把目光投在这位年逾古稀的长辈身上。他和父亲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同科同队同学,从十八九岁结识开始,在国民党军队中度过了二三十年戎马生涯,亦可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家父起义前夕,他在洛阳战役中被俘,随后作为国民党战争

罪犯,被关进北京战犯管理所。

“家父在南京军事学院地形教授会担任教员的时候,我在南京念小学。我的记事是从家父收到的一封寄自‘北京功德林一号’的信札开始的。如果我没有记错,邱行湘的信是这样结尾的:‘此生别无他求,只求在生尚能复得一见。’

“舅舅是在1959年12月首批获赦回南京的,而家父已于1958年春天转业回四川老家去了。整整三十年以后,邱行湘专程来四川实现他的诺言来了。可是,他们,一个在黄土之上,一个却在九泉之下……

“我了解这段过程,所以,我以为我能理解邱行湘在这种情景下的心境,他的泪水不会是不苦涩的。我走到他的身旁,轻言细语地说:‘四舅舅,吃点东西吧。人死如泥,往事如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那你为什么没完没了地胡说八道!’邱行湘一巴掌拍在饭桌上,那发绿的逼人的眼睛,杀气腾腾的面孔,就叫我蓦地想起了他当年的洛阳警备司令的身份。‘老实给你说,你以为我在哭你的父亲么?不是的!自从离开你父亲的坟头,我就不想他了。我要说的话,我都跪在那里说给他听了。心意了却了,我还想他干什么?我现在哭的是你,是你这个不懂事的毛孩子!真是的,你懂什么?你什么也不懂。你不懂国民党,所以你不懂共产党;你不懂蒋介石,所以你不懂毛主席。不懂可以问呀?可以看呀,我邱行湘能够有今天,你父亲能够有今天,你们几个姊妹能够有今天,这都是事实呀!

“我的意外瞬即变成我的反感:‘四舅舅,这里没有外人,你不必装腔作势。不晓得的人听了你的宏论,还以为你是共产党高级官员呢,可是你不就是一个国民党战犯嘛!’

“邱行湘被我激怒了,他颤抖着嘴唇,久久才憋出话来:‘放

肆！……我警告你，你说话要负点责任，不为别人负责，也要为自己负责啊！’

“……………

“舅舅第二天启程的时候，我没有送他。

“可是事隔不久，我却动身找他去了。”

邱行湘下半辈子是在共产党的天下生活过来的，难怪他对外甥发那么大的火。正是：想当年，赤胆忠心为蒋介石卖命；到如今，改造思想为国为民尽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惨败宜川 刘戡以手榴弹自戕 攻克济南 王耀武束手就擒

话说“西北王”胡宗南坐镇西安，专门对付共产党。他手下的“哼哈二将”董钊和刘戡都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在解放战争中，董钊、刘戡分任左右翼兵团司令官。刘戡和邱清泉、张灵甫三人被蒋介石视为“效忠党国”的“黄埔楷模”。

就在1948年春，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在两年多的战斗中，先是一个旅一个旅地被解放军吃掉，后来变成了一个师一个师地被消灭，尤其是在共产党的陈赓、谢富治兵团渡过黄河后，分兵向东西两路发展，东西威胁豫西，牵制了河南方面的蒋军，支援了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下；西面直逼潼关，又威胁胡宗南的老巢西安。结果，胡宗南恐慌起来了，又十万火急地命令刘戡立即率军南下，以解救宜川之围。

本来，刘戡的部队，在沙家店战役期间，他的36师全部被歼；师长、黄埔二期毕业的钟松只身逃脱；123旅旅长、黄埔二期毕业生刘子奇被俘；165旅旅长、黄埔六期毕业的李日基，乘夜换了便服，侥幸逃脱；刘戡的29军76师师长、黄埔二期毕业的廖昂也早已在清涧战役中当了俘虏。胡宗南不得不将整编第1军董钊军长调任陕西省主席，他所辖27师师长、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王应尊及90师师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陈武，划归刘戡指挥。

陕北战场,胡宗南经过一败再败,他那进占延安时的“英雄气概”一扫而光;未及半年,胡宗南损兵折将,已是江河日下了。

1948年2月,刘戡回西安过春节,一年的不顺,被节日的喜庆气氛冲淡不少。妻子曾玉洁也千里迢迢从湖南桃源赶来西安和他团聚。刘戡想起20多年的戎马生涯,自己和妻子离多聚少,平时只能靠鸿雁传书互诉情肠。刘戡不禁感慨万千,尤其想到平日妻子持家教子的艰辛,更升起一股感激之情。24年前,刘戡17岁从老家湖南桃源朝阳乡南下广州,考入程潜为校长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第二年冬,即1924年,该校并入黄埔军校,刘戡被编入第一期学生6队学习,毕业后,请假回家与曾玉洁成婚,蜜月未滿,就赶回部队,参加北伐,不久在江西负伤。1927年12月,他升任黄埔军校教导二团中校团附。当时,刘戡只有20岁。1928年以后,他参加了蒋介石集团的多次重要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逐渐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因而得以年年晋升,扶摇直上,23岁当上校团长,24岁晋升为少将旅长,25岁晋升为中将师长,这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也是不多见的。

刘戡与笔者是小同乡,对他的事迹也略知一二。他家境一贫如洗,但他的祖父、父亲却十分爱好诗文。刘戡从小受到长辈的熏陶,知书达理,勤奋好学。刘戡12岁进桃源县小学,15岁在姑母的资助下进了湖南省立第二中学,后转入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17岁进黄埔军校。刘戡字天禄,号麟书,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他从不带家属外出;妻子曾玉洁在老家孝敬公婆,抚育儿女。刘戡还在桃源办了一所天禄中学,为乡里办了一件好事,受到群众称赞。

且说刘戡在西安刚过完春节,便接到了他的部下、24旅少将旅长、黄埔四期毕业的张汉初的告急电报。张汉初原来奉命镇守宜川,被解放军突然包围,吓得手足无措,只好连电告急。

刘戡大惊,不得不离开刚刚见面的妻子,连军前会议都来不及召开,便命令整编 27 师师长、黄埔五期毕业的王应尊和整编 90 师师长、黄埔四期毕业的严明集合全部人马,于 1948 年 2 月 27 日之前,赶到宜川解围。刘戡自己也连忙率 29 军军部直属部队赶上主力,在两师之间行进。于是,王应尊在前面开路,严明在后面跟进,两万九千多人马沿着洛宜公路,浩浩荡荡地向宜川逼近。

一路上,刘戡心绪烦乱,凭直觉,他认为这是一次冒险的进军,搞不好就会钻进共产党布下的口袋,遭受灭顶之灾。但他又不能见死不救,招人苛责。

这时,陕北战场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如下:

整编 17 师何文鼎部,守备延安;整编 76 师 24 旅张汉初部,守备宜川;刘戡的 29 军军部,驻在洛川;整编 27 师王应尊部,除一部分兵力用于维护洛川至延安的交通外,主力也驻在洛川附近;整编 90 师严明部全部集中在黄陵附近整训。

刘戡所面临的解放军对手还是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麾下的两员大将:一是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黄埔五期毕业的张宗逊;一是西北野战军 3 军(原晋绥军区第 3 纵队)军长、黄埔五期毕业的许光达。

对许光达、张宗逊这两位黄埔小师弟,刘戡一年前,并未把他俩放在眼里。1947 年 3 月攻占延安时,刘戡率部在陕北高原遍寻共军主力作战,但就是找不着;经过青化砭、羊马河两次伏击战,以及一年前的蟠龙战役,才领教了许光达这位小师弟的厉害。据前线来的情报,就在 2 月 22 日下午,许光达带着参谋长李文清和旅长等一行,登上万灵山观察宜川地形,以部署围攻宜川守敌张汉初。下山时,敌人突然打来一发炮弹,许光达当即被震倒在地。警卫员蓝德明急忙把他扶起,检查他是否负了伤。

许光达笑了笑说：“没事，别紧张。”回到驻地后，许光达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分配作战任务。晚上，许光达一进家门，就让妻子邹靖华帮他把身上的衬衣擦起来，原来是有一块炮弹片，还一直扎在他的背上。邹靖华不禁“啊”了一声。“别叫，快拔下来。”许光达说。“不行，要流血的。”妻子关心地说。“别啰嗦——蓝德明！”警卫员听到许光达叫他，马上进来了，见状吃了一惊。蓝说：“我去请军医。”许光达厉声道：“你敢？我处分你！”结果，还是由邹靖华、蓝德明给许光达施行了“手术”，硬是把那块炮弹片拔了出来。

刘戡尝过许光达的苦头，他的心腹战将廖昂（76师中将师长）、135旅少将旅长麦宗禹被他俘获，丢盔弃甲，十分狼狈。刘这位被许光达拖着南奔北走的苦命人，又上路了。

第一天，其整编27师，由洛川以东的地区出发，下午到达永乡附过宿营，立刻接到情报，说在永乡东北约50里之观亭附近，发现有解放军的部队。该师师长王应尊，因为自己是先头部队，有责任弄清情况，报告刘戡，随即乘夜派出一个轻装营，前往进行威力搜索。其时，观亭地方确实有解放军，那就是在沙家店打过刘戡部29军36师钟松的西北野战军贺炳炎的第1纵队的部队。他们以逸待劳，来者不拒，一经遭遇，王应尊所派的轻装营就陷入重围。经过一番战斗，轻装营损失过半，其残余逃回永乡。事后，王应尊即将情况报告刘戡，并向他提出建议，应该先集中力量打观亭之敌，然后由观亭前往解宜川之围。他的理由是：解放军既包围了宜川，就不会集中较多兵力于观亭，这显然是设伏打援，如果不去掉这侧翼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无法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也会遭到袭击。刘戡同意王应尊意见，但又不敢作主，将部队在原地停止待命，在请示西安胡宗南后再作安排。胡宗南复电说宜川情势紧急，时间上

不容许先打观亭之敌，须按原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

2月27日，刘戡继续东行。在行军中，27师师长王应尊问副师长李奇亨和参谋长敖明权：“照你们看，这次解围有无把握？”李奇亨毫不踌躇地说：“这次行动不但解宜川之围没有把握，而且我们解围部队本身，也有危险。”李奇亨在胡宗南眼里素称悍将，此时突发此言，更影响了王应尊的信心。这一天，除两侧山中偶有零星枪声外，双方部队没有大的接触。近晚，他们来到瓦子街以西的小村宿营。夜间，他们据报：在瓦子街以东，有解放军警戒部队出现，并有解放军大部队在瓦子街东10里凭险固守，正在加紧构筑工事。这个情报，使王应尊感到这就是毛泽东的“口袋战术”的口袋底子之所在，大战已迫在眉睫了。当天晚上，刘戡又把90师参谋长曾文思找去，与29军参谋长刘振世、参谋处长吴正德等共同商量，决定第二天（2月28日）电告西安，要求多派飞机掩护，大部队仍沿公路向宜川前进，限28日赶到宜川。

于是，28日拂晓前，刘戡率27师、90师开始前进。晨8时许，刘戡所部开过瓦子街，即与解放军警戒部队发生接触，解放军且战且走，把刘戡部队引向东去。中午时分，刘戡主力已进至解放军既设阵地。

张宗逊、许光达见刘戡已按预定方案进入伏击圈内，于是，宜川战役正式打响了。宜川战役史称瓦子街战役，这是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后，以主力5个纵队转入外线作战。2月23日，解放军以一部兵力突然包围宜川城，主力则隐藏在宜川西南地区，准备歼灭增援之敌。26日，刘戡果然由洛宜公路一线向宜川驰援。28日，当敌进入宜川西南瓦子街地区时，西北野战军从四面突然发起猛攻，激战至3月1日，刘戡想突围，但不敢负责。他授意军参谋长刘振世与90师参谋长曾文思、27

师师长王应尊等悉心商量：不突围只有全军覆没；突围则有更大的危险。东进宜川已绝望，想活命只有向西逃。经过几天战斗，刘戡所部损失三分之二，他向胡宗南急电求援，胡则电复一方面是原地固守，一方面已令大批空军出动助战，鲁崇义的整编30师限期即到，张耀明的整编38师已向西安空运等。图安刘戡之心，远水救不了近火。刘戡等如呆着不走，摆在面前的就是全军覆没。

在激战中，31旅旅长周由之、47旅旅长、黄埔六期毕业生李达、53旅副旅长韩指针先后阵亡。

从2月28日拂晓起，全线开始战斗。公路南侧大梁上的90师61旅和小梁上的90师53旅的正面，公路北面的158团，31旅和47旅的正面，都遭到解放军猛烈地进攻。

打到上午8点多钟，90师参谋长曾文思为了便于掌握全盘情况，向师长严明建议把师指挥所搬到乙高地去。9点钟，战斗愈演愈烈，严明哭丧着脸，见了旁边的53旅旅长邓宏仪、参谋长宫润章、61旅副旅长李秀岭等人，都一言不发，脸色阴沉，预感到大难临头，末日将到。邓宏仪将一份电报稿交给曾文思，是严明准备拍给胡宗南的。大意是说：“部队已损失三分之二，战局极为严重，我等团长以上军官，决心成仁，以报校长及钧座培育之恩德。”曾文思看完电稿，对严明说：“现在全线稳定，情况并不很危险，为什么如此悲观？”严明说：“现在谁肯为我卖命，赶快把电报内容传达到各团，一律要坚决自杀。”这个消息，迅速传到53旅各团，61旅旅长杨德修、参谋长张辑熙也作了准备完蛋的打算。

3月1日上午10时左右，刘振世和王应尊传达了刘戡的意见，并与严明、曾文思研究了突围的办法。一致认为，抛弃行李辎重，集中可以集中的兵力，以27师在来援途中的一个团向瓦

子街北侧高地进攻为策应,尽力向西突围。这时候,解放军一纵队之一部,由公路向乙高地北侧冲击,使刘戡的防守部队一度发生动摇。解放军攻势愈来愈猛,锐不可当。158团团长何怡新被打死,181团团长吴汝熙宣告失踪。在公路北面,31旅官兵渐渐从半山坡上垮下来,47旅的阵地也动摇了。

在全线溃退的同时,刘戡则接连不断地传达团以上军官在必要时“成仁”的命令。同时也传达胡宗南指示战机的电报:“已令鲁兵团(鲁崇义)星夜驰援,望兄弟激励将上,苦力撑持,以建不世勋猷。”打到下午1点多钟,公路北侧的阵地全被解放军占领。90师师长严明深知战局已无法挽回,不断地要参谋长曾文思和他一起自杀。曾文思对自杀成仁兴趣不大,一再借口观察战况,与严明保持着10多米的距离,他手里还拿着枪,以防万一。同时,他又叮嘱严明的儿子严守礼(时任通讯营长)说:“你应该特别注意,防止师长自杀!”于是严守礼也就紧傍严明,寸步不离。

严明在山西河津以东因翻车腿伤,行动不便,所以军中为他准备了一乘滑杆(轿子),严明被人抬着,随大军向西涌去。不久,解放军即攻上乙庄寨,攻破了刘戡的军部指挥所。刘戡见大势已去,乃下令各部队焚烧机密文件和电码秘本,并将电台毁坏。27师师长王应尊、副师长李奇亨、参谋长敖明权等,也带着警卫营想要突围,但其时瓦子街以东,丁家湾以西均已在解放军包围之中,哪里突得出去!

刘戡见大势已去,他后悔没有听王应尊的话,如果先打观亭之敌,就不会落入解放军的“口袋”,如今一切都晚了。严瘸子这个混帐王八蛋,把整个部队都给拖垮了。这时,军参谋长刘振世来报告:“军座,严明师长阵亡。我们怎么办?”

刘戡此时倒镇静下来,在山顶的上围子上徘徊,看着漫天大

雪,不由涌起一个不祥的念头:“这满山积雪,难道是给我们服丧的孝服吗?松柏枝头的积雪,多像一幅幅挽幛!”刘戡见局势已无法挽回,便想“杀身成仁”,为校长“尽忠”。他几次要举枪自杀,都被跟在后面的参谋长刘振世夺下手枪。后来,在逃跑途中,刘戡趁刘振世不备,拾起一颗手榴弹来,引爆毙命。

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几位主将彭德怀、张宗逊、许光达、周士弟听说刘戡身亡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念其抗日有功,又是黄埔同学,所以特别指示,要用较好的棺木收殓,要埋入土里,还要在坟墓上写明死者姓名。

3月7日,宜川战役结束后,新华社受西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的委托,广播一则通告:“国民党29军军长刘戡、90师师长严明已在3月1日宜川西南地区战斗中,为蒋胡卖国内战作无谓牺牲,遗体已由本军埋葬于宜川城西羊道村三里之山地中,如果你们来运尸体,解放区军民必予方便。”

胡宗南听到这则广播后,寝食难安,要是不去接运吧,又怕引起官兵和伤亡家属的不满;去接运吧,又实在不光彩。经过多番商讨,最后只好乖乖地遵命而行,派人去把刘戡与严明的尸体运回西安。寓居西安的刘戡之妻曾玉洁、严明之妻孙淑贞见棺木运回,大悲大恸,没想到1948年春节相聚,竟成了永诀。胡宗南羞愧万分地在西安开了追悼会,并呈请蒋介石追赠刘戡和严明为陆军上将,重金抚恤家属。

刘戡为蒋介石尽愚忠,死得不值。抗战开始,在古北口与日军激战时,他曾企图自戕未成,如果那次自戕身亡,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宜川战役,刘戡兵团29000多人,在战斗中伤亡了5000多人,18000人被俘,另有6000余人下落不明。在高级将领中毙命的有29军军长刘戡、90师师长严明、47旅旅长李达、53旅副旅

长韩指针、158团团长何怡新等。被俘的有29军参谋长刘振世、参谋处长吴正德、27师副师长李奇亨、团长邢志东、90师参谋长曾文思、159团团长安梗南、61旅参谋长张辑熙、副旅长李秀岭、158团团长刘侗夫等。在部队被俘后，混在士兵中的，乘夜逃脱的有27师师长王应尊、参谋长敖明权、53旅旅长邓宏仪、参谋长宫润章、157团团长王公堂、61旅旅长杨德修、181团团长吴汝熙等。

3月3日，许光达率3纵又一举攻下宜川，俘24旅旅长张汉初等以下官兵5000多人。

4月份，胡宗南为刘戡、严明等人开了一个追悼会，以慰英灵。时人把刘戡、严明和另一个被击毙的国民党师长徐保的名字嵌在一副对联里，给追悼会送去。对联曰：

刘戡戡内乱内乱未平身先死；
徐保保宝鸡宝鸡不保一命亡。

横批是：纪律严明

无疑，这是对为蒋介石忠心耿耿、“取义成仁”、卖命打内战的刘戡等人的一大讽刺。

再说说山东战场。国民党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以后，在华东战场上也屡遭惨败。先是丢城失地，一座一座中小城市被解放，山东战场上，共产党的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山东兵团，在莱阳等地区胜利完成胶东保卫战任务后，当即甩开烟台、青岛之敌，挥戈西向。1948年3月18日至5月中旬，解放了张店、周村、淄川、博山、潍县、坊子等地。接着，部队向莱芜、济宁挺进。在小麦扬花季节，一举解放了兖州等重要城市，威逼济南。外线兵团（即西线兵团），也在配合刘邓大军的战略进攻中，先后在鲁

西南、豫皖苏边区和中原地区,取得了沙土集、洛阳、开封、睢杞等战役的胜利。山东解放区已同运河以西的冀鲁豫解放区衔接了起来。华东解放区与中原解放区也打通了。在睢杞、兖州战役后,山东兵团(又称内线兵团、东线兵团)又胜利会师,军队更集中了,力量也更强大了。国民党在华东战场上节节败走麦城,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线上,由徐州“剿总”刘峙、杜聿明指挥的三个兵团 17 万军队,皆处于猬集守备状态,不敢向外进攻。王耀武率 10 万人据守的济南,同徐州的联系已被切断,犹如大海中一座孤岛,四面楚歌、孤立无援。

王耀武在抗战胜利后,友人曾劝他,既然是功成名就,不如急流勇退,不图流芳百世,却也可同家人团聚。王耀武听从了友人的善意规劝,在蒋介石对他新任命之前就称病请假,迅速住进了武昌的一家医院。蒋介石闻讯后,发电催他来重庆就医,并派专机将王接来山城。蒋说:“休息休息,胃病不久会好的。日军虽然赶出去了,可还有内患,共产党和咱们能合作吗?内战还是要打的,时局能让你休息吗?你知道济南很重要,派别人去难以胜任,你是山东人,我认为你去最为相宜。”王耀武在蒋介石的恩威兼施之下,哪还敢再推却,只得接受命令。

王耀武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总揽山东党政军大权,地地道道的“山东王”。

1948 年 5 月,王耀武飞往南京,这位黄埔三期毕业的“山东王”此刻心急如焚。他晋见蒋介石时,说:“济南已成孤立之势,势单力薄,不利死守,若同徐州杜聿明主力靠拢,大可加固我军防守之力。”岂料此言一出,蒋介石大为恼火,他训斥道:“你总是不从大处着眼。济南一旦失守,徐州能保得住吗?南京呢?国际上又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济南是整个华东乃至华北的战略要地,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济南绝对不能放弃!”接着,蒋对这

位爱将又缓和了口气：“济南如果被围，以我们绝对的空中优势，随时可以增派援兵，保证有足够的力量给你解围。为确保济南，你一定要坚定意志，鼓足士气，加强防守，千万不可气馁。”

王耀武领旨后，飞回济南。不久，他将家属送往南京，只有破釜沉舟、决一死战这条路可走了。

守卫济南的兵力计有整编第2师，辖211旅、213旅；73师，辖15旅、77旅；84师，辖155旅、161旅，以及19旅、57旅、96军独立旅等9个正规旅。另有四个保安旅、一个特务旅、一个青年教导总队，再加上特种兵部队，总兵力约11余万人。防御部署分为外围防御地带和基本防御地带。外围防御地带由警戒阵地和主阵地两线组成；基本防御地带由商埠阵地外城阵地、内城核心阵地三线组成。整个守备区东自韩仓、西抵长清、南起仲宫、张夏，北迤洛口、齐河，又沿城北黄河洛口至城南八里洼之线分为东西两个防区。王耀武对洛口、飞机场、东西白马山、四里山、千佛山、砚池山、茂岭山等重要据点均修筑半永久性工事，修有碉堡、挖出外壕，架上铁丝网，又以护城河、地堡、交通壕、夹壁墙连贯结合。王耀武吹嘘说：“如此固若金汤的济南城，光外围的第一道防线，就足够共军啃三个月了！”他对固守济南抱有信心。

王耀武的对手是陈毅。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担任攻打济南的部队计有32万人，是敌军的三倍。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攻城集团又分为东、西两个兵团，主攻方向置于西面。以9纵聂凤智为主，先肃清济南东郊各据点之敌，创造攻城条件，尔后协同西兵团攻城。以3纵和10纵及鲁中南纵队组成西兵团，由10纵司令员、黄埔五期毕业的宋时轮指挥，先占飞机场断敌空援，并夺取商埠，尔后与东兵团协同攻城，并指挥两广纵队及野司警

卫团围攻长清之敌。冀鲁豫军区6军分区和9军分区部队歼灭齐河之敌。以13纵为预备队,置于济南东南之上港、西营之间地区,积极做攻城准备。在战役发起后,即以一部向青龙山、兴隆山等地逼进;配属的炮兵及各纵队炮兵团,组成两个炮兵群,分别隶属东、西两个兵团,配合攻城作战。以总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阻援打援集团,由华野副司令员粟裕指挥,对可能来援的邱清泉兵团、黄百韬兵团、李弥兵团加以防范。以4纵、8纵及冀鲁豫军区独立1旅、3旅,位于金乡、城武、巨野、嘉祥地区,构筑防御工事,阻击可能由商丘、砀山地区来的北援之敌。以鲁中南纵队4个团及7纵一部于官桥至滕县地区,阻击可能由徐州来的北援之敌。以1纵队、6纵队、7纵队、中原野战军11纵队、苏北兵团之2纵队、12纵队,配属特纵炮2团、3团,分别隐蔽集结于济宁、兖州、滕县以东地区,待机歼灭北援之敌;以苏北兵团11纵及苏北、江淮、豫皖苏、冀鲁豫、鲁中南等军区武装,分别袭击徐州机场,破坏津浦、陇海铁路,骚扰徐州之敌,阻止北援。

中央军委同时决定,从1948年9月16日晚开始,正式向济南外围发起全线攻击。这天正是中秋佳节,一轮明月静静地悬在济南市的上空。子时整,硝烟无情地遮住了月光,震耳欲聋的枪炮声献上了中秋佳节的第一份祭礼。解放军东、西两个兵团同时发动攻击,济南周边的各个大小据点一一攻克,进展十分顺利。

王耀武为了方便指挥,将济南划分东、西两上守备区:东守备区以黄台山、茂岭山、砚池山、四里山一带为主阵地,由整编73师师长、黄埔四期毕业的曹振铎统一指挥;西守备区,以腊山、周官屯、白马山、李龙山一带为主阵地,由整编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吴化文统一指挥。总预备队由整编2师师长晏子风

统一指挥,随时准备支援东、西两个守备区。在济南战役打响前夕,即9月14日,王耀武再次飞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把他的老部下、国民党王牌军74师师长、黄埔四期毕业的邱维达部空运济南;再抽出两个师的兵力,南北夹击敌人,定获大胜。蒋介石又为王耀武打气,确实派空军副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叔铭去济南上空侦察,以便空投援兵。王耀武在返回济南后,全力指挥作战,一心扑在守城上。

解放军攻城部队对济南外围实行了四面包围。西线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首先扫清了据守长清的敌人。由于解放军攻势凌厉、进展迅速,王耀武即估计解放军主攻方向在西面,随即将总预备队2师19旅西调,来增强飞机场以西的防线。17日晨,解放军东线部队以破竹之势,又一举攻占王耀武自恃是“东面屏障”,至少可以守半个月的茂岭山、砚池山等据点,威慑敌胆。王耀武见此情景,又命参谋长将总预备队由西调东。这样一来,守西区的吴化文部便直接暴露在解放军攻击之下。吴化文自知如顽抗到底,必将全军覆没,遂于9月19日夜率96军举行战场起义。解放军当即占领商埠以西外围阵地。

王耀武对吴化文早有戒心。吴化文拉走了三个旅约两万兵力;在这个节骨眼上,吴化文的起义,无疑是在王耀武的伤口上撒下一把盐。8月底时,王耀武的黄埔大师兄杜聿明曾来济南视察时,提醒过他:“吴化文反复无常,表面服从而内心诡诈,此人靠不住,要时时谨慎,提防着一点。”如今,他悔恨没有认真听杜聿明的劝告,反面把济南西城防线交给吴化文指挥,结果出了如此重大失误。早在攻城前的9月12日,吴化文就通过他的爱妾三姨太林世英的姨表弟、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李昌言向陈毅司令员发了电报:“一切事项大致就绪,眷属因交通关系尚须时日,请上级稍待,家眷安置妥当后即行联系。”15日,战火纷飞的前

夜，吴化文将爱妾林世英等安全转移出城，吴化文一直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吴化文起义后，即 20 日下午 4 时半，蒋介石亲切地来了一份训电：“俊才（王耀武字）弟鉴：吴逆有变，事出非常，知之甚痛心。东北赖以保全；济南之对于华北亦犹四平之对于东北。济南失则华北危，弟尽力固守，万万不可弃之而去。今已令经扶（刘峙字，笔者著）、光亭（杜聿明字，笔者著）督率三路援军兼程赶往济南。中正。”

解放军在攻占外围阵地后，为了不给王耀武以喘息机会，旋即于 20 日下午 6 时对商埠之敌展开猛攻，经过两天两夜浴血奋战，至 22 日占领了商埠，直逼城垣。当时，王耀武判断解放军至少要经过三天整体准备，才有能力攻击城垣。出乎他的意料，解放军于当日下午就对外城发起了全线攻击。不到一天时间，就全线突入外城，结束了外城的战斗。至此，王耀武完全陷于孤立被围的绝境，他只得收缩防区，紧急调整部署，将总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加修核心工事，妄图作垂死挣扎。

解放军于 23 日下午 6 时又发起对内城的猛烈攻击。攻城的突破口东面、南面各选一个，并在西面、北面进行佯攻，积极配合，以大量牵制敌人的兵力、火力。

9 月 24 日拂晓，解放军山东兵团 9 纵 25 师 73 团在东南角黑虎泉附近率先杀上城头，将红旗插上气象台，13 纵 37 师 109 团也在西南角撕开了突破口。接着就是巷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参谋长黄埔八期毕业的小师弟罗幸理举手投降。24 日黄昏，济南完全解放。8 天 8 夜的济南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济南战役，全歼守敌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整编 73 师、整编 2 师两个整师、整编 23 师 19 旅、整编 32 师 57 旅、整编 74 师 58 旅 172 团以及地方保安团队 4 个旅、两个总队、5 个整团，共计 11

万余人。在打扫战场时,没有发现王耀武。据王耀武的参谋长罗幸理供认:“9月24日上午11时,王耀武见败局已定,就换上便衣,偷钻出城,向青岛方向潜逃。”在王耀武的指挥所里,发现一只手枪,上面刻着“王耀武将军阁下,美军中将麦克鲁赠”的中英文两种字样。

在济南战役中,解放军37师政委徐海珊、8师师长王吉文牺牲。指战员为了给王吉文、徐海珊报仇,响亮地提出“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王耀武虽然跑了,但终于未能逃脱。9月28日上午8点,在寿光县被解放军公安战士王洪涛擒获。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牟中珩、国民党中央执委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化装潜逃,被我军民先后活捉。

王耀武被俘后不久就进了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4日,王耀武被首批特赦。特赦后,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四届政协委员,聘任为文史资料专员。1968年7月3日,王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

济南的解放,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为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揭开了胜利的序幕,为华北野战军挥师南下会同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大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党中央、毛泽东在给华东人民解放军的贺电中所说的:“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就在济南战役打响前一个月,即1948年7月27日至8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大礼堂,召开了各地区“剿匪”总司令、各兵团司令、国防部厅、署长等主要负责人以及几个重要军长共120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蒋介石还特地叫他的次子蒋纬国参加会议并做记录。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发言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

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于葬身之地。”

蒋介石的话不幸言中，一个月后，即1948年9月24日，济南被解放军占领，蒋介石为之震惊，这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攻打大城市的力量，彻底动摇了蒋介石依赖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120万增加到280万，用缴获“国军”的大量武器改善了装备，而“国军”由于连吃败仗，军队数量已减至360万人，其中能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只有170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济南的解放，意味着省城以上城市将有能力攻占。毛泽东此时正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西柏坡九月会议。毛泽东依据“第一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七个旅(师)，第二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四四个旅(师)”的歼敌速度，提出了这样的战略计划：今后每年歼敌一百个旅(师)，则再花三年时间，歼敌三百个旅，就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又同时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发展到五百万人。毛泽东这一计划，人称“三五计划”：即以五年时间(包括前两年)，消灭国民党五百个旅(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扩大到五百万。

与毛泽东的“三五计划”相对应，蒋介石制定了“苦撑三北，确保二华”的计划。“三北”即东北、西北、华北；“二华”即华中、华南。

究竟鹿死谁手？广大群众都在拭目以待。

王耀武被擒后，他的对手陈毅诗兴大发，写下了如下一首豪情满怀的诗：

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
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
古今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济南解放后，吴化文率 84 师的 155 旅、161 旅及 96 军独立旅约两万多人，全部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月整休后，奉命开赴徐州以西地区，去参加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战斗，将士们个个生龙活虎，笑逐颜开。

吴化文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一身戎装，格外威风。三个旅改编为三个师，杨友柏、赵广兴、何克斌三位师长随行。吴化文此刻想起了王耀武给他写的信中那些抱怨话：“君为坐上客，弟为阶下囚。你起义向我说一下，我也起义不好吗？”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死到临头悔已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林彪围城 范汉杰锦州被俘 兵不血刃 曾泽生长春起义

话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方对东北那大片黑土地垂涎欲滴。共产党因在北满有抗日联军长期活动的影响和基础，而南满与冀热辽根据地接壤，我八路军主力已抢先进入南满，因此我党我军对东北已经构成先人为主的势态。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命令吕正操、万毅、李运昌、许光达、陶铸、程子华从各根据地兼程北上出关。接着，成立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为政委，同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是彭真，高岗则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经过三年多的苦心经营，除了沈阳、长春、锦州几个大城市由国民党控制外，东北广大农村基本上已全部解放。东北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强，到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正式打响前，林彪的东野已发展为12个纵队，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17个独立师，共53个师，70多万人，加上地方军区部队，总兵力为105万人。

国民党方面，先后派杜聿明、熊式辉、陈诚、卫立煌、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侯镜如这批主将开赴东北，与共产党争夺天下。林彪与陈明仁血战四平街，双方牺牲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辽沈战役前，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共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总计56万人，分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其兵力

分布如下：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率两个兵团、8个军、24个师又3个旅，约30万人，防守沈阳及卫星城市铁岭、抚顺、本溪、辽阳和新民；“剿总”副司令兼1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领两个军、6个师又3个旅，约10万人，防守长春；另一“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率领1个兵团、4个军、14个师约15万人，防守锦州，并维持锦州、山海关间时断时通的铁路交通。

东北战场已明显地形成了对解放军有利的决战局面。根据国共双方力量对比，不论兵员数量、质量和其他作战条件，人民解放军都占明显优势。

1948年9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及山东军区部队一举攻下了山东省会济南后，毛泽东稳坐在长满古柏的平山西柏坡，昼夜不停地给各野战军发电报，指挥战斗。10月10日，毛泽东给东北林彪发出电报：

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林彪这位黄埔四期的小师弟，来到东北，虽然有李运昌、许光达、陶铸、张平化、程子华、莫文骅这些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事将领为他撑腰，但面对杜聿明、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陈明仁这些黄埔的大师兄，他也心里打鼓，怕交手后吃亏。国共双方的首脑蒋介石、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早在1948年2月7日，东北冬季攻势尚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曾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这样，则要考虑南线作

战,首先控制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以及山海关、滦县段。此方案既关闭了东北大门,切断了东北敌人与关内的联系,在战略上又是中间突破,使两翼的卫立煌与傅作义均相互孤立。

然而,林彪对攻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却有顾虑: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再像1947年攻打四平未下一样,定将影响战局。所以,林彪再三提议先打长春,强调打长春的条件有利,南线作战有诸多困难,并电报军委,准备集中9个纵队打长春,7个纵队攻城,2个纵队在四平以南打援,其他3个纵队置锦州、沈阳、四平之间,钳制国民党军,并说“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也曾加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当”。而毛泽东多次指出,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战略门户,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陆路要冲,咽喉之地。然而林彪对南下作战还是未下决心,认为锦州敌众,工事强,不是急切可下的。他提议先打北宁路上锦州、山海关间几个小点之后,再去打已经划归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国民党13军,而且出动时间,不宜东北军先出动,而宜华北野战军派兵围攻大同,把傅作义的主力调去西线;东北野战军出动时间,须视华北野战军出动时间才能确定。为打锦州之事,毛泽东与林彪电报往返达六七十次。毛泽东坚持打锦州,并且一再用电报敦促。

俗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林彪这位儒将,看上去弱不禁风,但他有过非凡的战斗经历:20岁就当上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平型关一战,打出了威风,并在苏联学过军事,又是黄埔的高材生。这年林彪刚满41岁,他有他的打算,城府很深,直到9月初,他才在来回踱步中下定决心按毛泽东的建议南下北宁路作战。

9月7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你们应当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打锦

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也较为有利。”

10月1日,解放军攻克义县。这时东北野战军获悉国民党将以62军和独95师,由山海关和天津海运葫芦岛,增援东北。林彪提出:“准备的是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10月2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考虑放弃北宁路作战,仍回师打长春。电报刚发出,即收到毛泽东10月3日的批评回电。林彪无退路,立即下定了首先攻取锦州的决心,并且在兵力上进一步作了调整:以6个纵队和炮纵主力攻打锦州,2个纵队在锦西方向塔山一线打援,3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守军,1个纵队作为战役总预备队,另有1个纵队加9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毛泽东立刻回电,表示“甚好,甚慰”。

话分两头。再说说蒋介石。1946年下半年,他调动其数百万军队向解放区发起了疯狂进攻。谁知形势逆转,经过半年时间,反而丢掉一百多万军队。蒋介石不得不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东北战场国民党高层将领熊式辉、杜聿明、卫立煌、范汉杰又不听从蒋介石的旨意,在保存实力与保住城市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以致贻误战机,致使国民党一败再败,虽频频撤换主帅,也挽救不了败局。

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中将主任、黄埔一期毕业的范汉杰,是蒋介石最器重的学生之一。他没有人黄埔军校前,已任桂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但他向往革命,甘心情愿再当学生,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赴德国继续深造。他在黄埔学生出身的名将中,保持着两项纪录:一是入学时年龄最大,已近而立之年;二是毕业后最早当师长,从黄埔毕业,到当上师长仅用两年半时间。来锦州任职前,范汉杰任陆军副总司令。

毛泽东指示林彪要在东北“关门打狗”,这条“狗”是谁呢?

就是指这位足智多谋的范汉杰。

范汉杰是1948年1月15日走马上任的。上任之前，他先回了一趟广东大埔老家，又将散居于潮安、汕头的子女带到青岛，然后转往台湾上学。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于1月31日赴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罗卓英等人会商华北与东北的联防部署。2月1日，范汉杰、罗卓英飞返沈阳复命。然后，他到冀热辽边区司令部视事，驻扎秦皇岛。3月1日，范汉杰大张旗鼓扩军，努力充实兵力，尽力欲振东北锦州一带的国民党军士气，以求作出“振兴党国之榜样”。这时候，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有10个师、3个交警总队。5月，范汉杰司令部移居锦州。

8月2日，范汉杰赴南京参加整军会议闭幕式，与蒋介石共进午餐。范汉杰一直想辞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职务，主要原因是他与卫立煌、廖耀湘关系不太融洽，不愿从中受憋。但蒋介石坚决不允，对范说：“汉杰，此时乃党国存亡之秋，正应秉承总理遗志，精诚团结，可不能在此用人之际思退！”范汉杰无奈，只好俯首从命。

锦州，自古以来为兵家关注。其地形复杂，山川交错，纵横环抱，是河北、热河、辽宁三省之要冲。在明末清初的几十年间，历经近百次的战火洗劫，都因为它是入关出关的关键。毛泽东、蒋介石都深知此理。

范汉杰在德国学过测绘技术，他对锦州城防围困地形地貌了如指掌，对锦州的防御作了周密而细致地部署：

新编第8军沈向奎部集中锦州，驻锦州东面紫荆山到松山一带，占领既设工事，担任守备。

第93军附60军184师，担任锦州北面和西南面以及包括飞机场地区的守备。

新编第5军刘云瀚部，迅速分水陆两路向锦州集中，为指挥

所的总预备队。

第54军阙汉骞部集中锦西,任锦西、葫芦岛地区的守备。

炮兵部队归黄永安指挥,协同各军作战。

通讯兵团迅速构成指挥所、兵团部,各军部、炮兵指挥所、兵站总监部之间的有线通讯网。

第10兵站总监部准备各军师的粮秣弹药补给事宜。

范汉杰在安排妥当后,就等着师弟林彪的到来。9月12日,震惊世界的辽沈大战的枪炮声响成一片,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围锦打援,林彪向着师兄范汉杰猛刺过来,不仅数倍于师兄的兵力,而且大炮齐放,来势不善,让范汉杰有点招架不住。

林彪的东野11纵攻克昌黎、北戴河;独立4师、6师、8师攻克沙后所、绥中;4纵、9纵插向锦州和义县之间,包围义县;3纵、2纵又乘机接替任务,让4纵南下攻克兴城;7纵攻占高桥、西海口、塔山,切断锦西与锦州之联系;8纵、9纵主力,占领锦州外围紫荆山等地。

林彪在这一阵势摆好后,分割了国民党的部队,切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系。紧接着,林彪命令各纵队向锦州城逼近,围它个铁桶一般。10月1日,3纵和2纵攻占义县。义县是锦州的门户,是炮兵、坦克部队、后勤供应部队的必经之地。取得了义县,就等于取得了锦州城。

范汉杰守着锦州这座孤城,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援。

锦州吃紧,蒋介石迫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并派参谋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是有名的“支那虎将”,他被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赞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是蒋介石军事集团中“嫡系中的杂牌”。卫立煌非黄埔出身,安徽合肥人,但曾进过陆军

大学特别班深造,对军事有很深的造诣。卫立煌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赌咒发誓地说:“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押!”顾祝同与卫立煌多次争吵,卫为保全实力,免于被解放军吃掉,只好极力忍耐,卫打算将主力撤至营口从海上逃走,让蒋从关内派兵去救锦州之围。顾祝同回南京向蒋报告:“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企图避免作战。”蒋在听顾汇报后,非常愤怒,于9月30日亲飞北平,命傅作义派两个军救援锦州。10月2日,蒋介石又飞临沈阳,当天下午在沈阳东北“剿总”对师长以上军官训话。他说:“我这次亲自到沈阳来,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都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牺牲精神,和关内国军协同作战,一定可以成功的。……万一你们打不出去,那么来生再见。”到会的人听到蒋介石最后一句话很不满意,认为是“不祥之兆”,但也表明蒋介石要同他的学生林彪在东北决战,连他自己都已经是没有把握的了。

10月2日至18日,蒋介石三飞沈阳,两次莅临锦西,直接指挥廖耀湘、侯镜如两兵团,东西对进,施援锦州。10月10日至15日,侯镜如“东进兵团”受阻于锦州西南的塔山,多次猛攻,均被林彪击退;廖耀湘西进兵团攻占彰武,进抵新立屯,但离锦州尚远,并未影响解放军对锦州的攻击。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在总攻前,即10月9日,毛泽东指示林彪:“关键是在一星期内攻克锦州。”林彪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组成两个攻锦突击集团:2纵、3纵、6纵、17师、炮纵主力、坦克团组成北突击集团,担任主要方向的突击;7纵、9纵和炮纵一部,组成南突击集团;8纵和1纵炮团;由东向西,进行辅助攻击。林彪同时下达命令:“只准打胜,不准失

‘败。完不成任务者，杀头。要准备倾家荡家，打烂缸缸罐罐，伙仗马仗一齐上。’

总攻锦州的红色信号弹在天空升起后，解放军的 900 门大炮一齐发射，尘烟冲天而起，雾罩城市上空，久久不散；火光四处散射，弹片满天飞舞，杀声震天。在半个多小时后，8 纵全线突破。30 个小时后，锦州城攻下了。

具有大将风度的范汉杰，在 14 日下午，本还想抵挡一阵，无奈何解放军围死了他，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贴身警卫不知去向，6 兵团司令卢浚泉派人把范汉杰接回兵团指挥所。14 日黄昏，范汉杰、卢浚泉和锦州指挥所参谋长李汝和等，带特务团一部，从 6 兵团司令部北面坑道向锦州城东门移动。但刚一离司令部就被突入南市区的解放军所发觉，受到火力阻击，以致随逃后续部队未能跟上。出城后不久，范汉杰即与卢浚泉、李汝和等走散。15 日拂晓前，惊魂未定的范汉杰在松山东面的一间小窝棚喘息，打算昼伏夜行。当天锦州解放。下午 4 时许，范汉杰沿松山向塔山陈家屯之间的山地小路仓惶逃命。当走过西海口去锦州的公路时，被解放军潜伏哨兵截获，当即被押解至班吉塔。15 日中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再度飞临沈阳，亲自督战指挥，“以期救护我范汉杰、卢浚泉等忠勇将士”。蒋介石当天还派飞机给锦州的范汉杰空投一封“手谕”，叫范“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出锦西”。可惜这“手谕”再也难传到范汉杰手中，因为他已经作了解放军的俘虏。这是林彪俘获的第一位黄埔一期的大师兄。当然，在 1948 年 1 月，林彪还俘虏了他在黄埔同期的新 5 军军长、毛泽东的小同乡陈林达。

1948 年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写的战地通讯《范汉杰就擒记》，说他“身着黑色服装，头戴烂毡帽，肩上披一条破麻袋，装扮成沈阳一家钟表店的记账先生”。范如此装扮也没

有逃过解放军的眼睛,他终于承认自己是范汉杰。他自报家门后,要求速死。锦州战役,国民党冀热辽边区副司令官兼辽西行署主任贺奎、6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副司令官杨宏光、93军军长盛家兴、师长景阳、李长雄、黄文徽等高级将领均被生俘。

范汉杰在被俘后,作为战犯被关押改造,历时12年。在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战犯特赦时,原本有他,但由于国民党19路军中一批高级将领的共同反对,只好改在1960年11月28日作为第二批战犯予以特赦。范汉杰曾于1932年任19路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19路军主要将领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处境艰难时,曾派范汉杰前往厦门找蒋鼎文洽谈和平改编事宜,以保存这支有过抗日光荣历史的部队。当范汉杰离开19路军后,该军很快被蒋介石派兵消灭,蔡廷锴等人怀疑范汉杰有出卖19路军的嫌疑,旧仇新怨,故不主张让范汉杰作为首批特赦战犯来处理。范汉杰被特赦后,于1962年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12月被特邀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任常务委员。1976年1月16日,范汉杰病逝于北京,终年80岁。

话说锦州解放的第二天,即1948的10月17日,国民党军60军中将军长、原曾任黄埔军校第二期区队长的曾泽生,率军部和182师、暂编21师、暂编52师官兵3万余人,在长春宣布起义。教科书上把这一历史事件命名为“长春起义”。在东北战场上,60军起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迫使国民党新7军和东北“剿总”第1兵团部于10月19日先后投诚,长春市兵不血刃而和平解放。瓦解国民党军斗志,为夺取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创造了条件,意义重大:曾泽生在被围长达5个月,陷入死亡绝境中的长春市军民在向地狱之门迅跑的最后关头拉了煞车闸,让一座死亡之城重新回到人间;卫立煌、杜聿明失败从此开始,蒋

介石的营垒其中坚力量动摇由此产生。

曾泽生何许人也？他是云南永善人，1902年生，1923年考入云南唐继尧办的军士队，1925年考入云南讲武堂。毕业后，他来到广州任黄埔军校第二期区队长，卢德铭、周逸群、覃异之、郑介民、邱清泉、罗历戎、廖昂都曾是他的学生。1926年底，曾泽生考入黄埔军校高教班学习，1928年3月毕业。1929年至1937年，他在云南龙云的部队中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任滇军60军团、师、军长。他既有“唯蒋是国”的正统思想，又有较浓厚的地方观念；既对蒋政权不满，又把进步的军官视为不可靠分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旧军人，由于两年多内战的痛苦煎熬，受到启迪，终于认清了蒋家王朝的必然灭亡的命运，毅然投向了光明。曾泽生从蒋介石营垒中走出来的事实，不能不说是蒋介石倒行逆施自取灭亡的一个旁证。

长春被围困已整整5个月了。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围而不打”，又提出“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长春本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日本侵占中国后，扶植溥仪组成的满洲国首都就设在长春，当时叫“新京”。

1948年5月至10月，长春变成“死城”、白骨城，尸横遍野，饿殍载道，白骨累累，冤魂不绝。长春究竟死了多少人？有人说12万，也有人说13万。1948年10月2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有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的文章，其统计“男女老少的尸骨不下15万具”。有一点是肯定的，长春在1948年以前，居民总数是50万，长春解放时，只剩下10万多人了。

1948年初，蒋介石派黄埔一期毕业的郑洞国为国民党1兵团司令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头衔也挂在他身上。3月份，郑洞国走马上任，他的兵力有新编第7军和60军两个正规军，加上兵团直属部队及杂牌军、地方保安部队，

总计兵力约 10 万多人。

东北解放军以 1 纵、6 纵和 3 个独立师将长春团团围住，兵不血刃，围而不打。以长春东北伊通河和长春西南的孟家屯车站为分界线，东西两个地区各派重兵把守。独立 6 师、8 师、9 师为东区部队；6 纵之 18 师为机动部队，归围城指挥所直接指挥；独立 7 师、10 师为西区部队、12 纵的两个师为机动部队、由 12 纵司令员钟伟指挥。

围城之初，尚有小股部队出城袭扰、抢粮、试探性突围。经过两个月的大小 30 多次战斗，毙伤俘敌近 3000 多人。从此，长春格外宁静，飞机因对空炮火太强不能降落，郑洞国守军也不再企图突围。外部联系中断，长春成了一座名符其实的死城。

解放军围城设卡，严禁粮食、蔬菜、燃料和牛、马及其他一切生活资料入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是实行粮食封锁。

10 万守敌要吃饭，就是一座金山也吃光了。蒋介石每天派 20 架飞机空降粮食，有时因天气不好，飞机就不能起飞。为数不多的空降粮食优先供应新 7 军，60 军是嫡系中的杂牌军，士兵多半是云南人，离开大米还能活吗？为争粮食，新 7 军与 60 军战士往往火拼，大动干戈。

城内粮食奇缺，粮价 3 个月内暴涨了 700 多倍。市内无粮可买，有价无市，一捆钞票买一捆青菜，一个金镏子换一个馒头。正规军每人每日定量，高粱大豆各半；7 月份减少 4%，8 月份除新 7 军新 38 师每周还吃一餐大米饭外，60 军 182 师则只能用高粱掺大豆当饭，还有一个师只能发代薪粮，买到什么吃什么，买不到就挨饿。饿疯了的士兵只好伏在马棚里捕耗子吃。解放军这一手成了绝招，再强大的军队也经不起饥饿的折腾啊！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解放军印发《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欢迎蒋军官兵投诚。林彪还让原 60 军

184 师少将师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云南籍同学、1946 年 5 月在海城起义的潘朔端将军，马逸飞、郑祖志、张冲等滇军老同事修书给曾泽生将军和暂 21 师师长陇耀，促其弃暗投明，反蒋起义。特别是 60 军从吉林仓惶撤离时留下的家属小孩 30 多人，全都被东北野战军收容起来，给吃管住，学习、教育、喊话，有人还从难民中找到了 60 军暂 52 师师长李嵩的弟弟李泰然家属和失踪小孩，派人遣送长春。总之，什么都送，就是不送粮食。60 军被俘团长张秉昌、副团长李峥先、何寿、营长张士勋等人，以释俘形式进城开展策反工作。

在强大的政治攻心战开展后，解放军共接收国民党长春守城部队投诚官兵 13500 余人，可谓上攻伐谋，不战屈人之兵，果实累累。曾泽生终于悔悟了，他与所部 182 师白肇学师长、暂 21 师陇耀师长磋商 60 军的前途问题，这近 3 万云南官兵的前途去路与生死存亡，都使曾泽生寝食难安，终于，60 军主要领导达成共识。据曾泽生将军日记记载，从 1948 年 9 月 22 日到 10 月 12 日，60 军宣布反蒋起义的 26 天中，他们三人先后进行了 7 次密商，做了大量起义前的组织准备工作。9 月 22 日晚，长春中长理事会大楼一间办公室里，曾泽生军长紧急召见白肇学师长和陇耀师长。平时很少晚上开会，所以二人感到十分恐慌与惊异。三人坐定之后，曾泽生不知该从何谈起。“反蒋起义”这几个字恐怕是从来不愿去想的，现在不得不开始想了，白肇学也是黄埔学校的官佐，他虽是云南人，但不是滇军出身。他少年从戎，就立志为国为民，御侮安邦，立功立世，在抗战中为 60 军立下汗马功劳。然而，自进入东北以来，他心中积怨越来越大：60 军不被重视，自己这个黄埔嫡系也受到歧视，云南兄弟受新 7 军不公正的凌辱，更令他十分痛心。

曾泽生、白肇学、陇耀促膝谈心直到深夜，就 60 军前途问

题,经过反复讨论,认为:突围、坚守这两条路都是死定了,只有“反蒋起义”才是惟一出路。曾泽生、白肇学都表示:当务之急,是把兄弟们救出来,至于个人前途在所不计,即使将来解甲归田也值得。

10月13日晚10时,曾泽生与白、陇师长在铁路宾馆作最后一次聚议。当时的情况是:182师和暂21师广大官兵反蒋起义热情很高;暂52师师长李嵩有点阳奉阴违,新7军估计不会制造麻烦,郑洞国兵团情况不明,但其力量不大。据此,三人一致认为全军起义已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10月16日开始行动。并作出如下决定:

第一,14日晨派张秉昌、李峥先为代表,送信与解放军联络,陇师长安排两人从暂21师防区出城。

第二,张、李联络妥后,计划于16日夜行动,除另有命令外,两师应积极向新7军布防。

第三,布防毕,致信向新7军、师、团长告诫,向士兵喊话,使勿犯我。

第四,先行扣押暂52师师长李嵩(黄埔二期毕业)和所属各团团长,然后由182师和暂21师各以一个营兵力予以监视,并强制其副师长、副团长服从命令,与全军一致行动。

第五,派出纠察队维持市区治安,并派专人宣传安抚,使市民镇静勿惊。

第六,妥善安置伤病员及后方人员撤离。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了总攻。李峥先、张秉昌二人顺利出城,把信交给穷岗子东北军区政治部前方办事联络处。由兵团司令部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唐天际将60军起义准备情况电告司令部。

解放军1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握着电话,当即就吼:“曾泽生

会起义？见鬼，该不是替郑洞国派来诈降吧！其中必定有诈。”

张秉昌、李峥先登时吓傻了。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哪儿跟哪儿！”原来，就在张、李两人送信的当天，肖劲光得到情报，长春守敌准备突围。肖劲光判断这一定是郑洞国和曾泽生以诈降计企图夺路而逃。为了判明真伪，他马上找来了一兵团副参谋长潘朔端，经辨认确定是曾泽生的亲笔信，才开始相信曾泽生也许有起义的可能。肖劲光当即表态：欢迎60军反蒋起义，如果是假起义，真突围，我军就坚决消灭之；60军应马上解除对我军的警戒，并沿中山路对新7军和郑洞国兵团布防；张秉昌、李峥先是我军释俘，不能代表60军，应派60军182师副师长李佐、暂21师副师长任孝宗为正式代表，与我军商议具体起义事宜。张、李二人带着肖劲光的信回到长春，曾泽生很喜欢，总算找到了一条生路。

当此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发来电报，认为可以争取曾泽生起义，囑兵团应不失时机地与60军加紧密谈。肖劲光立即派兵团参谋长解方和刘浩同志与曾泽生联系。10月17日上午，解放军代表刘浩同60军代表李佐、任孝宗一起到长春，与守军各团地下党员赵国璋、赵雄及党组织发展对象朱光云等团长取得联系，计划全力支持曾泽生将军率部反蒋起义。曾泽生亲自同刘浩一起出长春到解放军1兵团向唐天际汇报商谈情况，并打开地图指定了交接防地点、单位、时间、口令，决定当晚8时开始交接。

60军起义前，曾泽生让政工处长姜弼武致信于郑洞国，原文如下：

桂庭司令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凭资本借权势壑

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介石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潭。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春军民不作无畏牺牲,长春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戎绥!

曾泽生敬启

郑洞国对60军的行动早有察觉,何况60军参谋长徐树民早将曾泽生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给郑洞国。当时郑洞国刚接到蒋介石从沈阳发来一份措辞严厉的手令,于1948年10月16日派专机给长春被困的诸将领,令其突围。电文如下:

长春郑副总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灰(10月10日)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刻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即令守军全成饿殍等,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本(正)删日(15日子时)已来沈阳指挥,希知照。

中正手启

10月15日巳时

郑洞国立即召集曾泽生、李鸿,传达蒋介石手令。曾泽生放

下电话,决定提前行动,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10月18日夜,60军开始撤出长春,向九台县开进。刘浩同志深入驻地,与曾泽生同驻军部,交换意见,对整编工作作了细致安排。刘浩要求所有军代表要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对起义官兵不歧视、不侮辱、不虐待、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适当优待,着眼于团结教育改造。并阐明爱国不分先后,革命不分早晚,对各级军官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对老弱残官兵,想回家的发给路费,愿留部队的全部分配工作,以体现人民军队的温暖。

曾泽生出城后,会见了1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他们回忆当年在广州黄埔军校的生活,一致认为起义才是真正的孙中山信徒。

10月18日凌晨,60军正走在光明的大道上,蒋介石就派飞机来轰炸。由于有所防备,部队既无惊慌混乱,也没有遭到什么损失。进入解放区后,老百姓和解放军早烧好了开水,做好了早饭,热情欢迎60军兄弟起义归来。

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肖劲光司令员、肖华政委、唐天际主任在李家屯招待60军全体起义将领,并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特派后勤部长送去奖金人民券4亿元,同时聚餐犒劳起义官兵。原滇军爱国将领、松江省副省长张冲从哈尔滨赶来慰问60军官兵,与曾泽生见了面。

1949年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把60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任命曾泽生为军长,徐文烈为政委,叶长庚为副军长,刘振乾为政治部主任。其所辖3个师,白肇学为148师师长,陇耀为149师师长,李佐为150师师长。整编过后,为教育部队,迅速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充实了骨干力量,建立各项政治思想教育制度,并通过诉苦运动、民主运动、阶级自觉运动,从思想上脱胎换骨,使一支封建军阀长期控制的旧

军队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在解放战争后期,全军南下,参加了鄂西战役,进军大西南,随后回师湖北参加生产。1950年1月,全军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汉江南岸阻击战时,与美帝坦克、飞机、大炮立体进攻硬顶,他们用的是手榴弹、步枪等简陋武器,竟然立下了赫赫战功。在高阳战斗中,全歼英国皇家坦克营,夜袭水原,威震敌胆。曾泽生说:“滇军靠什么取胜?靠勇敢!”这支起义队伍屡建战功,多次受到表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泽生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他在《自传》中写道:

经过党的教育,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感召,我决心坚决献身革命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愿意将仅有的精力以至一滴一滴的血,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1973年曾泽生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1年。

曾泽生起义后回忆,他身边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给他影响很大。事后他才知道,他的副官长兼特务营营长杨滨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长春指挥所所在的那个团的副团长赵国璋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从1938年起,中共在60军内,就建立了地下组织。

蒋介石在北平闻讯曾泽生“叛逃”,气得口吐鲜血。锦州、长春失守后,只剩下沈阳最后一个据点“孤悬关外”了。蒋介石明知东北“战局业已绝望”,却仍梦想夺回锦州,重新构建关内关外联系。从10月19日至10月30日,蒋介石一直亲自坐镇北平指挥东北战场之战事,做着名副其实的垂死挣扎。正是:林彪智取关东军,校长失算败下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面分解。

第六十五回 鸿雁传书 郑洞国弃暗投明 辽西被围 廖耀湘兵败黑山

书接上回。且说曾泽生投向光明之前，没有忘记关照黄埔一期毕业的老校友郑洞国。郑洞国身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1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原率部驻沈阳，后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要他坚守长春。作为职业军人，心里虽有难言之苦，但还是服从命令，于1948年春硬着头皮回到长春，开始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

郑洞国之所以不愿去长春，主要是想脱离东北这片苦海。本来在3月初，他已向卫立煌请准了假，要到北平去治病，他打算乘此机会就不再回去了。他的许多好友、幕僚也劝他不要从命，但由于蒋介石多年“教育”的影响，作为黄埔学生，嫡系将领，向来他唯蒋命是从，况且，“党国”处于危难之时，临危受命，理当“义不容辞”。由于这些思想在郑洞国头脑中已根深蒂固，因而他最终还是带着病到长春赴任去了。

东北解放军司令员林彪几次电请中共中央，想先打长春，啃啃郑洞国这块硬骨头，毛泽东见林彪、罗荣桓提出的先打长春的有利条件，于1948年4月22日复电同意先打长春，但又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

从当时的情况看，东北的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国民党的据

点,好比是一条长蛇阵,锦州是头,沈阳是腰,长春是尾。如果依林彪的打法,先打长春,等于揪住了蛇的尾巴。这样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沈阳的国民党军去增援,如蛇反扑,这样可以歼敌于运动之中;另一是沈阳的国民党军不去增援,或撤至锦州,甚至会同锦州之敌撤入关内,如蛇挣断尾巴跑掉一样,这样我军难以实现把东北国民党军就地歼灭的总体计划,而极有可能,在我军攻克长春后,加快沈阳、锦州之敌向关内撤退。如果东北国民党军撤入关内,则华东敌军兵力增加,在平津作战就更不利于我军。因此,毛泽东虽然勉强同意林彪先攻下长春,但按照他的战略意图,还是先打锦州,这样就可以扼住国民党军的咽喉,是致敌于死命的一招。

《孙子兵法》中说:“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打长春、沈阳、锦州这样的长蛇阵,除用主力猛攻锦州外,还要以重兵防敌之增援。如果我军猛打锦州不下,敌人援兵又至,那就面临失败的可能。我军若打下锦州,沈阳之敌来不及增援,则长春、沈阳之敌被关在东北,敌人心理崩溃了,仗就更好打了,这叫“关门打狗”。

战局发展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林彪从北满南下,以6个纵队布置在锦州西南的塔山、高桥地区,目的是阻击华北“剿总”增援锦州;又以3个纵队布置于黑山、大虎山、彰武地区,阻击援锦之敌。10月10日,蒋介石派华北“剿总”5个师和山东两个师同锦西两个师,共计11个师猛攻我军塔山阵地。由于解放军顽强抵抗,国民党军始终未能突破防御阵地,因而我军取得了全歼锦州之敌的胜利。

长春郑洞国被围困已整整7个多月。郑洞国乘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曾出动两个师作试探性突围,但很快就

被围城的解放军顶了回去。此后,蒋介石又几次电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长春守军已被围困时间太长,士兵长期饥饿,斗志锐减,其他将领对突围也不抱信心,认为即使勉强突围,也必然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不如坚持下去,还有可能多支撑些日子。郑洞国和各军长联名电复蒋介石,说明不突围的理由。

10月16日上午,蒋介石再次电令郑洞国突围,并警告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于是,郑洞国又召集军长和军参谋长开会,决心执行蒋介石的突围命令,并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晚上,60军曾泽生军长率部近3万人起义。此时,郑洞国对突围也彻底绝望。他立刻通知新7军:“突围行动停止。”蒋介石又派飞机送给郑洞国一封亲笔信,告诉这位大弟子,想法突围,倘再迟延,将不能等候。郑洞国回电蒋介石:“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长春的老百姓受损失,我看还是停止罢。”

10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亲自写信给郑洞国,分析形势,晓以大义,劝他顾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举行反蒋起义,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信件全文如下: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倾之际,兄宜

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肖劲光、肖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10月18日

这封充满黄埔师生情谊的信件是用电报转达到前线的。19日上午，解放军在进驻长春时，此信交给了国民党新7军副军长、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史说给郑洞国。可惜因当时郑洞国的司令部附近枪声四起，市内秩序混乱，史说派去的人未能把信件及时送到，直到郑洞国投诚时也没有亲眼见到周恩来的鸿雁传书。

19日，新7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军长、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李鸿哀叹：“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如果一出去就散了！”新7军所辖38师、暂52师、暂61师早在曾泽生起义时，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了。新7军副军长史说这时也叹息不已。时天津《民国日报》驻长春特派记者杨治兴急于促和，专程拜访史副军长，问：“桂公（指郑洞国）如何打算？”史说无可奈何地答道：“老先生是尊铁佛爷，香火不吃？”杨便怂恿史，佯称桂公已同意去号令新7军。此时因李鸿军长卧病不起，史说副军长毕竟人轻言微，怕没法号令。史说咬了咬牙说：“也只好这样了，等到木已成舟，再劝桂公也许就容易了。只要桂公同意，

一切就好办了。”18日晨，史说与新7军参谋长、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龙国钧与解放军联系。史说又与新7军政工处长杨天廷说，与炮兵指挥官王及人说，与姚凤翔说，都是说的一个意思，找共军谈判。郑洞国也懒得去听他们说了。尤其是新7军38师，大家一致认为只有投诚，投诚才有活路。郑洞国去访新7军军长李鸿。此时李鸿卧病不起，一切都交给副军长史说及参谋长龙国钧，他本人已对时局不抱任何幻想。李鸿说：“史、龙都是你的老部下，他们会听你的安排的。”李鸿劝郑洞国当晚留在军部过夜，但郑还是回到他的兵团司令部去了。

夜间，郑洞国突然接到曾泽生打来的电话，他还想劝曾回来，但曾只说：“有人和你讲话。”然后另一个人的声音传了过来，那人自称姓刘，然后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是否可以不必作无益的牺牲。”郑洞国拒绝了电话劝告。第二天一早，新7军参谋长龙国钧去见郑，对郑说：“新7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起行动。”郑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龙见郑坚决如此，随即退去。

19日晨，龙国钧忙完了谈判的事，最后一次驱车去郑洞国的兵团指挥所。整个伪满中央银行大楼都用沙袋堵上了窗口，全城的戒备都解除了，郑洞国的城堡反而加强了防御工事。

1兵团参谋长杨友梅开门迎接龙国钧，只见郑洞国还蒙在被窝里。杨友梅附耳轻声说：“龙参谋长见您。”过了好一会儿，郑也不吱声。郑洞国非常生气，觉得60军、新7军都背叛了他。龙国钧是想请郑洞国出面主持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会议，对前途表个态，是投诚还是死守。应是最后摊牌的时候了。郑洞国真

是骑虎难下，他一生戎马生涯，从来没有扮演过这样的“角色”。没等龙国钧说完，郑猛地撑起身子，指着龙国钧厉声责问：“龙国钧，你和史说跟我多年，我待你们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龙国钧见郑执迷不悟，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走了。

1948年10月19日，长春人民迎来了解放。“天下第一军”的美式装备新7军放下了武器，新编38师还办了交接手续。除了郑洞国本人及其特务团之外，全部起义投诚了。长春劫后逢生，市面又生发出了欢呼等各种活跃气氛来。鸽子打着哨子成群地飞回了故居。

只有郑洞国一个人被蒙在鼓里，蒙在自己的被窝里。他很想休息。3个多月来，他从没有休息好，浑身像棉花一样没有一点力气。

蒋介石没有忘记郑洞国，打电报询问中央银行大楼楼顶能否降落直升飞机？是否可以派飞机来接郑洞国？郑只好如实复电：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

19日晚8时，解放军独9师1团负责包围郑洞国指挥所的师参谋长解沛然实在是不想再等了，于是派了一位代表进大楼去谈判，并对郑洞国出尔反尔的条件一一允诺，耐心等待郑洞国插上白旗。

解放军代表答应在郑洞国先放下武器后，保证大楼所有官兵的生命安全。郑洞国要求不要在报纸上和广播电台上发表谈话，在对外宣传时，就说郑洞国伤后被俘，不说自动投诚。

郑洞国在大楼里足足躺了三天，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团也等了三天。

在这三天中,解沛然又答应了郑洞国提出的新要求:保证其安全方便;官佐随本人行动;带汽车一辆,卫兵两人,不下枪;交枪后立即送吉林。

10月20日夜11时,郑洞国给蒋介石发了最后一封诀别的电报,实在值得一读:

10月19日下午7时亲电计呈,职率本部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府秘书崔垂言共约千余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300余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今晨及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力,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祇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部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己。职与凜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封命。惟国事多艰,吾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

职郑洞国

10月21日夜11时亲印

郑洞国的诀别电传到蒋介石手上时,蒋介石眼泪汪汪,连声说:“桂庭司令真不愧是党国英雄,黄埔精英。黄埔学生如果都像桂庭那样,党国的江山就有救了。”

但郑洞国没有杀身成仁。21日凌晨,解放军独9师1团按时到达郑所在大楼外面,令郑交出武器。在此情况下郑要求对

空鸣枪1小时：原来，这是他手下的参谋长的“杰作”。参谋长想投诚又不敢对郑洞国直说，只好瞒着他一人，鸣空枪以表示抵抗，遮人耳目。

5时许，解放军代表朱军、师镜直进大楼三楼会议室，问：“哪位是郑司令官？”坐在中间沙发上的一位军人说：“我就是。”

这时，伪满中央银行大楼顶层树起了一面白旗，它标志着长春国民党守军经过7个月的围困后，终于投诚输降。

郑洞国从愚忠茧壳中脱出身来，他没有顽抗，也没有像刘戡那样引爆自戕。林彪闻讯后，见到自己的大师兄举了白旗，心里喜滋滋的。

郑洞国在投诚后，受到解放军长春前线司令部肖劲光司令员、肖华政委的热情接见，并给予优厚待遇；这完全出乎郑洞国之所料，使他很受感动。21日，共产党的《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郑洞国率部投降，长春完全解放》。24日，南京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明眼人一看，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共产党对郑洞国晓以大义，生活上给予优待，希望他为人民做点好事。郑洞国却表示坚决要解甲归田，当一个老百姓。他一不愿广播讲话，二不愿公开参加宴会。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聂荣臻会见郑洞国，设宴款待，尽师生之情谊。周恩来没有同意郑洞国回湖南石门老家去种地，安排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参加民革任常委、副主席，并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担任水利部参事。郑洞国所撰写的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是了解黄埔军校历史的一部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晚年，郑洞国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了积极的贡献。1991年1月，郑洞国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说话锦州、长春解放后，东北仅剩下一座孤城沈阳，尽管它已是岌岌可危，朝不保夕。

蒋介石这些日子脾气特别暴躁，见人就骂，和他手下的几位将领吵个不停。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摆出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架式，东北的黄埔军人也在一旁敲着边鼓，这是让蒋介石最为恼火的事。他们争吵的中心，就是东北战场怎么个打法？蒋介石显然与东北守将在战略上有分歧。他骂杜聿明：“哼，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弱畏敌，这样子我们要亡国亡种的。”他骂54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阙汉骞：“你是黄埔生？是蝗虫！蝗虫！”他骂国民党第9兵团司令官、黄埔六期毕业的廖耀湘：“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你也不听我的命令？”“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你负责，如有贻误，也唯你一个人是问。”

蒋介石与卫立煌在辽沈战役前对东北战场的战略规划各有韬略。不然，为什么蒋介石和毛泽东想到了一块？为什么林彪会有犹豫？为什么那些满腹韬略、久经沙场考验的黄埔将领也一致肯定卫立煌的计划有可取之处？

蒋介石想退守锦州，本来也是一着赢棋。放弃东北，确保华北，守住锦州，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万一大军压境，国民党军还可以从葫芦岛、营口从海上撤退，这是1948年7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时定的战略方针。但蒋介石忽然又要确保东北，死守长春、沈阳、锦州三个据点。卫立煌认为：主力部队出辽西，他固守沈阳的计划就会告吹。不守则撤，要撤也得走营口一线，否则就有被解放军利用地势地形，节节割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他气得和前来督战的顾祝同大发其火，扬言部队一出辽西就将被共军吞掉。杜聿明、廖耀湘也持同样意见，却遭到蒋介石的迎头痛骂。

蒋介石此举又是出于所谓政治角度的考虑,当廖耀湘向他强调,若想全军撤退,只有走营口一条线,并保证“出营口连一副行军锅灶都不会丢掉”时,蒋介石却一改以前保存实力的计划,指示廖耀湘说:“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在撤退之前与东北共产党进行一次决战,给他一个大的打击。”望着目瞪口呆的廖耀湘,蒋介石教训说:“当大将,一定要顾全大局。”他认为,如果弃守东北之前,不与共产党大打一场,在政治上影响甚大,关内的军心也将呈现动摇和不振。至此,廖耀湘勉强听从了蒋介石的意见,组成辽西兵团援助锦州。

廖耀湘终于明白了蒋介石是要在锦州与毛泽东、林彪决一死战。他想:葫芦岛与锦州相距才 50 公里,侯镜如的东进兵团又有强大的海空军掩护,粮食、油料、弹药补充都很方便,迅速打到锦州,解范汉杰之围,应该不成问题。如果东进兵团能与锦州范汉杰部会师,再与西进兵团东西对进,两面夹击,围歼解放军主力也不是不可能的。想到这里,廖耀湘觉得此举风险不太大,于是他干脆利落地向蒋介石表态:“我决心执行总统的命令,立即行动!”

蒋介石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终于撇开了老奸巨猾的、不听指挥的卫立煌,说服了他的黄埔后起之秀廖耀湘将包括新 1 军、新 6 军两大王牌主力在内的第 9 兵团 10 万大军拉出了沈阳,送上了辽西战场。

为什么东进兵团迟迟不能东进呢?东进兵团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侯镜如有他的打算。东进兵团共有 17 个师,司令部设在唐山,兵团参谋长、黄埔七期毕业的张伯权是侯镜如的妹夫,也是他的心腹。下辖 92 军、62 军、独立 95 师、39 军、54 军、暂编 62 师。师长、军长黄翔、林伟俦、阙汉騫等都是清一色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打仗当然内行。侯镜如早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加入

了共产党；后来，由于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重新投入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时期，他通过他的外甥、中共地下党员李介人的穿线，与共产党安子文搭上了关系。李介人还捎来了安子文的亲笔信，大意是说：“周恩来、贺龙二公关怀你，让我给你写信，如果能回来，表示欢迎，过去的事是可以原谅的。”侯镜如想起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南昌起义与周恩来共同战斗的岁月，如今周恩来又伸出了援救之手，他于是决心伺机率部起义，回到人民怀抱。因此，这次东进援锦，他故意拖延时间，使解放军顺利地攻占了锦州。这个中缘由，想必西辽兵团的廖耀湘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如果侯镜如按蒋介石的意图，击退解放军在塔山的阻击，解锦州之围，那东北战场又将是另一个局面。难怪蒋介石大骂 54 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阙汉骞，说要枪毙他。总统府战地督察组组长、黄埔一期毕业的罗奇小心翼翼地向蒋介石报告攻击塔山受阻的情况，为阙说情，于是阙才免于一死。当然蒋介石也没有料到侯镜如会心怀“鬼胎”，以致贻误战机，落得个全盘皆输的结局。

辽西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字建楚，湖南邵阳人，1906 年生，这年才 42 岁，已是 9 兵团司令官，军衔中将，可说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黄埔六期毕业后，他于 1930 年公费到法国圣希尔军校留学，又转入法国陆军大学学习机械化骑兵专业，1936 年回国。抗战期间，廖耀湘参加南京保卫战、桂南昆仑关战役、湘西战役并远征缅甸对日作战，因战功卓著被中、英、美政府分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自由勋章及十字勋章。曾先后任新编 22 师副师长、师长、新 6 军军长、东北第 4 绥靖区司令官、9 兵团司令。如今任辽西兵团（西进兵团）司令官，下辖新编第 3 军军长、黄埔高教班毕业的龙天武所部，新编第 6 军军长、黄埔六期毕业的李涛所部，新编第 1 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潘裕昆所部，49 军军

长、黄埔五期毕业的郑庭笈所部,71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向凤武所部,以及骑兵旅、炮兵团、装甲车等部队共计11万余人;部队浩浩荡荡,于1948年10月5日向新民、彰武攻击前进。

大军出征、八面威风。天上飞机呼啸,地面马达轰鸣。汽车、炮车、坦克、装甲车、骑兵、步兵,恰似一条黄褐色的长龙,在金秋的辽西平原上缓缓游动。旌旗蔽日,刀枪如林,连高远的蓝天和明丽的阳光都被搅得黯然失色。廖耀湘坐在颠簸不停的美式吉普车中,双眉紧锁,表情凝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10月8日,部队在新民地区集结完毕。11日上午,他在新民火车站的前进指挥所,集合团长以上军官讲话:强调东北解放军围攻锦州,旨在打从沈阳援锦的新1军和新6军。指出要打下彰武、新立屯,首先切断解放军的交通线,然后再向北宁路前进。同时传达蒋介石的命令,沿北宁路向锦州方向急进,违者以军法论罪。当廖耀湘攻占彰武、切断了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后,本可以向阜新长驱直入,但此时东进兵团在塔山碰得头破血流,打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东北野战军4纵的黄埔军校五期小师弟、广西南宁人莫文骅政委。他和司令员吴克华顶住了号称为“赵子龙师”的蒋军独立95师发起的猛烈攻击,阻击了国民党11个师向塔山进攻,歼敌万余,史称“塔山阻击战”。这就保障了主力取得全歼锦州敌军的重大胜利。廖耀湘在获悉这一战况后判断锦州难保,于是也丧失了援救范汉杰的信心。因此,他命令部队在彰武、新民一带原地待命,徘徊观望战局的演变。蒋介石急得跳脚,连连来电催促廖兵团速进,廖则一味敷衍,百般推托,就是迟迟不前。廖的参谋长杨焜恍然大悟,原来廖耀湘也多了个心眼,此时以保存实力最为要紧,新1军、新6军决不能去为范汉杰陪葬、送死。

毛泽东坐在平山西柏坡,早已看透了廖耀湘的心思。他给

东北野战军发电报指出：“只要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人进占彰武并非不利。目前数日，你们可以不受沈阳援敌威胁，待锦州打得激烈时，彰武方面之敌回头援锦，他已失去时间。”战局果然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发展。蒋介石见锦州危在旦夕，一面派他的随从参军、黄埔六期毕业的罗泽闓赶到廖耀湘兵团部督战，一面发电报、打电话再三催逼廖耀湘火速增援锦州，并再次威胁说：“如再延误将以军法从事。”

廖耀湘此时才不得不下定决心，渡过新开河，全力向阜新、义县推进。他一面前进，一面还在发牢骚：“你校长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送掉兵团主力，那我也不能再负责任，就由你们去罢！”

10月15日，新1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攻占了新立屯。但救援锦州为时已晚，就在这一天，锦州消息阻断，范汉杰被俘，9万国民党军悉数向解放军缴械投降。

廖耀湘证实锦州失守后大惊失色。他立即向蒋介石、卫立煌要求，西进兵团走营口撤退，这也是他早就想好了的万全方案和路线。然而，此时已由不得廖耀湘了。卫立煌仍然坚持要廖退回沈阳，以不变应万变；蒋介石则固执地坚持要廖耀湘、侯镜如两兵团东西对进、两面夹击，收复锦州。为督促廖耀湘执行命令，蒋介石还专门派杜聿明来做“思想工作”。最高统帅朝前拽，顶头上司往后拖，廖耀湘两头受夹板气，想去营口也走不成。

杜聿明本来是要监督廖耀湘执行反攻锦州的命令的，但他与廖耀湘在研究一番后，竟然也认定大兵团走营口撤退是上策，他反而帮廖耀湘说话，劝蒋介石改变主意。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最担心的是也这条路线。他一再急电林彪将打锦州的主力尽快攻占营口，封死第9兵团的退路。

昏头昏脑的蒋介石鬼迷心窍，他偏偏看不到这一点，一味固

执己见，坚持要反攻锦州。

18日晨，蒋介石电召卫立煌、杜聿明一起飞北平开会。在东城圆恩寺蒋介石行邸的会上，卫立煌坚持集中兵力防守沈阳，而蒋介石则主张非收复锦州不可。会议开了5个多小时，两种对立意见仍然无法统一。蒋问傅作义：“宜生兄的意见如何？”傅说：“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蒋见没有人附和他的意见，急得两眼发红，从沙发上跳起来把卫立煌大骂一顿，接着又举着拳头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国军到锦州后不再向东北前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散会后，蒋派随从参军罗泽闾于子夜到杜聿明下榻的宾馆传达蒋的命令。罗泽闾说：“老头子要你到东北去接卫主任的事，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杜聿明坚辞，但拗不过主子，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第二天，蒋在圆恩寺再次召集傅、卫、杜开会，宣布杜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傅、卫也不愿多说话，几个人面面相觑。

10月20日下午，杜与卫同机飞赴沈阳，21日召集廖耀湘、刘玉章、赵家驷开会，传达蒋的命令。这样一来二去，宝贵的时间白白耽搁了五天。林彪的10大主力纵队，几十万大军正在向廖耀湘的西辽兵团包围过来，一张天罗地网正在张开。这几天，廖耀湘度日如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蒋介石没有同意，他不敢往营口撤兵，10万大军的命运，就这样因延误战机而送上了死路。

10月20日晚，蒋介石在锦州、长春相继失守后，终于“开恩”，批准第9兵团向营口方向撤退，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就在这一天，东北野战军总部决定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住中间，分割包围的战术，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

廖耀湘要撤退到营口,必须先攻下黑山。廖部进攻黑山的部署是这样的:

以新6军207师许万寿旅(相当于师),在兵团直属重炮掩护下,从胡家窝棚(黑山以东通沈阳公路上的一个村庄)由东向西,从正面攻黑山;以71军的两个师为攻击黑山的主力,由北向南,从黑山以北侧击并包围黑山。

黑山在大虎山的西北,北临高达千余米的医巫闾山脉,南接连绵90余公里的沼泽地区。北宁和大郑两大铁路,穿过20公里宽的狭长丘陵地带,直穿关内。就在这宽仅20公里的狭长地带,正是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走廊,也是廖耀湘西进兵团行动的必经之地。因此,黑山与大虎山两点,也正如两扇坚实的铁门,开则南北畅通无阻,闭则人车堵塞。就在这个军事要地,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将要展开一场空前激烈的争夺战。

在廖兵团做好准备进攻之时,解放军10纵亦正由新立屯以东转移到北镇、沟帮子一线。

10月21日,10纵接到上级急电说:“长春敌10万起义投诚,锦州敌10万被歼,沈阳敌陷于孤立,有企图向锦州突围,与锦西北上之敌会合,妄想夺回关内。令你们立即返回黑山、大虎山。选择阵地,构筑工事,顽强死守,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到达后,聚歼前进之敌。”这短短的百字电报,给了他们一个紧急而艰巨的任务,他们只有一个纵队,而面对的却是廖耀湘的一个兵团。10纵司令员梁兴初是铁匠出身,绰号“梁大牙”,他虽然没有名牌的学历和高贵的出身,却有显赫的战绩和非凡的胆量。他9次负伤,9次晋级,一个弹洞一个军阶,他是从战争中硬闯出来的一员虎将。梁兴初一上黑山,就下了一道死命令:“死守黑山,抗击敌人,誓与阵地共存亡。”他亲自到据守101高地的28师师部里,坐镇指挥。

廖耀湘命令 71 军连攻黑山两天,毫无进展。

23 日,廖又以新 1 军、新 6 军和 207 师第 3 旅参加战斗。在坦克、重炮支援下,实行连续猛烈地强攻;然而到 25 日仍不能突破黑山阵地。此时,他得知解放军 5 纵、6 纵已由阜新、彰武地区南下,向其后方插进。解放军的 7 纵、8 纵、9 纵亦由右翼迫近。1 纵、3 纵、10 纵正准备从正面出击。在眼看已陷入重围的情况下,黑山还没攻下。于是,廖耀湘当晚命令主力部队向营口撤退。但其先头部队 49 军刚进入台安,即遭解放军独 2 师的阻击。廖耀湘认为通向营口的退路已被解放军切断,在请示卫立煌后,又命令部队调头向东,企图退回沈阳。这时,解放军主力已展开全线出击,兵力数倍于廖兵团。

26 日,历家窝棚被解放军 6 纵攻占,从而使廖兵团退向沈阳的大门被关闭。接着,廖兵团指挥部、新 1 军、新 6 军同时遭到解放军 3 纵的攻击,陷于一片混乱。廖急令各军、师设法掌握部队,逐渐靠拢,就地抵抗。林彪这时住在牡牛屯金寡妇的家里,指挥着百万大军作战。他身材瘦削,面容苍白,低着头,背着手,默默无语地在房里来回不停地踱步。每一次重大战役前,他都有这种踱步的习惯。眼下,他这位黄埔四期的大师兄,正在地图上为黄埔六期的小师弟廖耀湘寻找一块墓地。他用红笔一圈,墓地东起黑山、大虎山,西至绕阳河,南到无梁殿,北抵魏家窝棚,不大不小,正好是 120 平方公里的区域。

这天,林彪的 10 大主力纵队全线出击,他下达了“以乱对乱,大胆猛突”的命令。27 日拂晓,廖耀湘重新调整部署,在新民以南至老达房之间地段渡辽河,沿公路向沈阳突围。突围行动一开始,即遭到解放军四面八方的攻击,部队被打乱,无法指挥。廖耀湘在包围圈中转来转去,总是冲不出去。

27 日傍晚,廖耀湘与新 22 师副师长、黄埔七期毕业的周璞

在黑山镇中安村被解放军抓获。解放军以为周璞是个普通勤务兵,就把他释放了。廖耀湘被俘时头戴一顶半旧毡帽,身穿一件破棉袍,赶着一头小毛驴,毛驴上还驮着两袋花生。当解放军询问他姓名时,他用一口湖南腔报了个假名:胡庆祥。这当然没有逃过解放军战士的眼睛,廖耀湘终于承认自己是兵团司令官。

10月28日,辽西平原的枪声渐渐平息下来,廖耀湘的10万大军,前后不到10天就全军覆没。

廖耀湘和新6军军长李涛、9兵团参谋长杨焜、新1军副军长兼30师师长文小山、新6军参谋长黄有旭、新1军代参谋长兼50师副师长陈时杰、新1军50师师长杨温、新30师副师长谭道善、师参谋长唐山、新6军22师师长罗英、新6军169师师长张羽仙等王牌将星、清一色黄埔毕业生,全部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只有新1军军长潘裕昆和新3军军长龙天武侥幸逃脱。正是:尝闻汉飞将,可奇单于垒;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一门三将 大难临头各自飞 刘峙无能 固淮守江成泡影

话说1948年10月27日拂晓，东北战场上国民党9兵团廖耀湘的10万大军被解放军重重包围，向营口撤退的路被堵死，回沈阳的惟一通道也被堵住。廖耀湘本是手握雄兵10万的一个兵团司令，但数日之间，他确实能掌握的只有4个人：即新6军军长、黄埔六期毕业的李涛，新22师副师长、黄埔七期毕业的周璞，新6军军部的一位高参和廖耀湘的一个随从副官。如果连他自己在内，这“五虎将”是不会有作为了。不久，他们先后逃散，最后成为解放军手下的俘虏。

再说9兵团主力49军郑庭笈率部于27日晨开始撤退后，四处都发生情况。在解放军炮火交叉射程之下，郑庭笈向营口撤退的梦想破灭。参谋跑到指挥部向郑庭笈报告：“前卫团被共军包围，情况危急。”郑庭笈命令：“全军马上投入战斗。”郑在下达战斗命令后，问身旁的参谋长周声复：“与兵团司令部和友军联络上了吗？”周声复摇摇头说：“军座，司令官至今下落不明，只与第3军的14师联络上了，但他们和军部也中断了联络。”

郑庭笈说：“给卫老总发电报：廖耀湘、李涛在胡家窝棚遭共军夜袭，与我军失去联络，至今下落不明；新编14师也与军部失去联络，共军已将辽西兵团包围在黑山、大虎山东北地区。战况紧急，如何处置，请急电复。”周声复当机立断，马上给沈阳卫立

煌发电报。

郑庭笈在战斗打响后,很快便丧失了指挥权和控制力,军部与师、团之间的联络中断。解放军的炮火从东面打来,他们便往西面跑;解放军的炮火从西面打来,他们又向东面逃。互碰互撞、人马混乱。不堪郑庭笈本人所率领的军指挥所人员和该军195师师长、黄埔七期毕业的罗莘莱,一同逃到195师的一个团里,在李家窝棚为解放军所包围。在天明后,又激战了一天,他们几次想冲出去,但都无法如愿。到了夜间12时左右,四围枪炮声沉寂,郑庭笈和罗莘莱又率领特务连突围,盲目地向着辽河方向前进。但走了20多华里左右,在10月28日拂晓时分,却被解放军7纵队俘获。

10月30日,郑庭笈、罗莘莱被送到北镇战俘虏收容所。在那里,他见到新1军副军长兼30师师长文晓山、50师师长杨温、副师长陈时杰、新3军参谋长李定陆、14师师长许颖、54师师长宋邦纬、暂59师师长梁铁豹、新6军22师师长罗英、169师师长张仙羽、49军105师师长许玉楨、71军87师师长黄炎等人。这些人清一色黄埔军校毕业生,郑庭笈没有想到,廖耀湘的部下,全都集中在北镇战俘收容所里了。

几天学习下来,郑庭笈开始反省:为什么装备差的共产党军队倒屡打胜仗,而国民党的全副美式装备的军队,却连吃败仗?这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在收容所,他成了战俘收容所的学习积极分子。

郑庭笈、郑庭烽、郑庭炳是三兄弟,郑庭炳是老大、郑庭烽是老三、郑庭笈算老四。他们郑氏四兄弟,老家在海南岛的文昌县。这里地瘠民贫,失去父亲的大哥郑庭炳,不堪忍受地主的欺凌,和胞弟庭炜、庭烽、堂弟庭笈挥泪告别,远走南洋,去给人家

做苦工。那一年,他才 15 岁。他在南洋的日子混不下去了,就回到祖国,17 岁入广东省立琼崖中学,秘密参加了孙中山新组织的琼崖民军陈继虞部,任书记,后被军阀察觉,缉捕甚急,于是他改名郑介民,再度逃亡马来西亚,在那里经营小商店维持生计,同时兼任吉隆坡《益群日报》编辑,著文表示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救国主张。

1924 年,郑介民间知黄埔军校创办,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结果黄考上,郑落榜。郑介民暂居同乡邢森洲家,后来他积极准备功课,终于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与康泽、李崇义等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7 年回国。许多人以为郑介民与郑作民是两兄弟,其实不然,郑作民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家在湖南新田。郑作民于 1940 年 2 月 2 日牺牲于抗日战争中的昆仑关战役;他是国民党陆军中将、第 2 军副军长兼 9 师师长。而郑介民则是黄埔二期毕业,长期从事军统工作,是仅次于戴笠的“军统三巨头”之一。

由于大哥郑介民的影响,他的两个弟弟郑庭烽、郑庭笈先后也进了黄埔军校。郑庭烽字耀台,黄埔三期毕业。郑庭笈字重生,黄埔五期毕业。

郑庭笈在东北战场被俘时,年仅 43 岁,已是国民党陆军中将,任 49 军军长。他的同年生的堂兄郑庭烽,这年正好在傅作义的华北“剿总”任国民党陆军中将、94 军军长。而大哥郑介民虽是陆军中将,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远远高出两个当军长的弟弟。他是国民党的军事情报专家。在黄埔军校毕业后,他虽然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但却在另一条道路上进行了反共活动。

1948 年 10 月 23 日上午,也就是郑庭笈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虏前一星期,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在北平中南海的司令部

秘密召见郑庭烽,同去的还有他 94 军的三个师长及军参谋长。

“庭烽,总统面谕,准备成立一个指挥部,由你担任总指挥。”傅作义对郑军长说。郑庭烽问:“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傅作义说:“具体讲,你们要去收复石家庄。这样,可以吸引围攻太原的共军东进,缓和山西局势;可在沿途破坏共军的军事设施,可以在共占区大量抢购物资,运到保定,增加我们的储备。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打下石家庄,偷袭河北平山西柏坡,端掉共产党的老巢。”

郑庭烽问:“那我们何时行动?”

傅作义说:“今天准备,明天开始行动。对外只说是援晋兵团,在保定集结。”

郑庭烽领命后才明白:绕了这么多圈子,真实目的原来是想要攻打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怪不得这么神秘,而且还搞出这么多花样来。回到保定,郑庭烽闷闷不乐。他喊来他的私人秘书郭天灏,想听听郭对时局的看法。

郑庭烽对郭天灏交代了任务,要试探一下郭对偷袭西柏坡的反应。郭似乎看穿了郑军长的心思,诚恳地说道:“军座,为老头子(指蒋介石)做无谓的牺牲,实在不值得。脱离这场内战,才是真正的识时务之举。”

10月27日下午,郑庭烽令各部在保定集结待命。当晚,他召集各师师长开会,布置任务,兵分四路,攻占石家庄。郑庭烽刚刚布置完任务,当晚,其进攻的详细计划被地下党通过电波传送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手里。等到援晋兵团西进的时候,中共中央和华北野战军早已作好了战斗的准备,急调部队兼程赶往石家庄。同时,聂荣臻还命令各地方武装,用尽一切办法,拖延敌人发动的进攻。

郑庭烽的 94 军在西进途中,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

中。一到解放区，等待他们的是地雷和冷枪。想找粮食，粮食没有一粒；想破坏工厂，工厂里没有机器；想找老百姓问路，却连个老百姓的影子都找不到。

郑庭烽对这次出击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在实行坚壁清野的解放区，他真领教了共产党动员群众的本领之厉害。在行军途中，郑庭烽最担心的，是东北的战局，最忧虑的还是堂弟郑庭笈的安危。一台美国进口的超短波收音机，成了他随身至宝；共产党的新华社广播，成了他每天必听的节目。

这天，部队在行进途中，郑庭烽在吉普车中收听到一则新闻：“新华社辽西前线 10 月 28 日 8 时急电，被包围于黑山、大虎山地区的廖耀湘兵团 5 个军 12 个师，已于今晨全部解决，已查出被俘军、师长 6 名……”

郑庭烽关心的是他的堂弟郑庭笈，他不知道被俘的 6 名军、师长中，究竟有没有他的堂弟。郑庭烽的援晋任务没有完成，在攻打石家庄的战斗中，牺牲了 1 千多名官兵；败下阵来后，只好收兵回朝，向傅作义复命。这时傅作义正为战或和弄得焦头烂额，他不仅没有追查郑庭烽的责任，反而晋升郑为 4 兵团副司令兼 94 军军长。郑庭烽在接到委任状时，哭笑不得，他没有把这放在心上。

1948 年 11 月初，郑庭烽终于从新华社 12 日电讯中知道了他的堂弟郑庭笈投诚。他像一块石头落地，多日来郁积于心头的一块阴云终于散去。他不住地叨念着：“只要人活着，就一切均好。”

一个多月后，即 12 月 16 日夜，郑庭烽从收音机中忽然听到了堂弟那熟悉的声音，堂弟在读解放军官团的一封信：

烽哥：

10 月 28 日我在辽西大虎山被解放军俘虏。11 月 11 日到达哈尔滨解放军官团高级队学习，一切胜于

前,请放心。弟来哈后,回顾前事,感触万端。犹忆 20 年前,我们都因受大家族和地主的压迫,辍学而走广州,入黄埔参加革命工作。当时的革命军实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能使少数革命军部队战胜北洋军阀集团。但以后国共合作不幸为蒋介石所破坏。蒋介石已变为袁世凯第二,使国民党变为反动派把持、包办的反共集团,陷国家民族于半殖民地地位。

我现在最痛心的,是 20 多年来,我们竟跟着蒋介石走,做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坏事,完全和我们初入黄埔时的志愿相违背……一到解放区,觉得处处光明愉快而有朝气,与大革命时代的黄埔相比,确有过之而无不及……被解放的军官,在军官团中那种勤学情形实为弟生平罕见,亦为吾哥所决难想象。凡此种种,均使弟对过去愧悔交集,对将来充满希望。

弟今既亲历一切,不能不念手足之情,向吾哥沥诚倾吐,以冀吾哥勿重蹈弟等在辽西之覆辙。

……国民党现在在全国大势已去,平津迟早要解放,多守几天少守几天又有什么差别?……平津必然变为沈阳、锦州第二。傅作义必然变为范汉杰或卫立煌第二。大批军队投诚的投诚,被歼的被歼。到了那种地步,再回头已晚了。

蒋介石的失败已注定了,任何挣扎,均属徒劳。语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蒋介石既然违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逆天而行,必致灭亡。解放军忠实劳动人民利益,一举一动均以国利民福为依归,顺天而行,必然胜利。孙中山先生说:“凡事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

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断无不成！”时势如此，望吾哥明辨大局，早日率部投诚，以免牺牲多人生命，我兄弟亦可早日团聚。弟现在确已大彻大悟，吾哥勿谓弟自丧立场，为共产党说话……现平津大战，爆发在即，时机迫切，望断然行之。为祷，为祝。

此颂时绥

庭笈弟手启于哈尔滨

解放军官团

12月16日

郑庭烽听完堂弟的广播讲话，陷入沉思。想起几年前，他和胞兄郑介民的一次谈话。那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郑介民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代表团团长，与共产党代表叶剑英谈判。郑氏三兄弟、一门三将军都在北平。那天，郑庭笈忽然问大哥：“你看能实现和平吗？”

“不能。”郑介民斩钉截铁地说。

郑庭笈又问：“如果打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谁能取胜呢？”

郑介民答道：“共产党必胜。国民党搞不过共产党。”

郑庭笈、郑庭烽不解大哥为何作出此种判断，他俩都十分惊讶，郑介民可是蒋介石的死党呀！

郑介民说：“国民党老朽了。高级官员们只知道贪污发财，官场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拉帮结派。一个党弄到这种地步，哪能不亡呢？共产党却是一派朝气，生机勃勃，将来必会取代国民党而成为中国的统治者。”

“那我们怎么办？”两个弟弟焦急地问。

“怎么办？”郑介民忽地凶相毕露，恶狠狠地说：“反共到底，战至最后，为党国杀身成仁。”

郑介民投身蒋门,长期从事特工工作。在黄埔军校毕业后,他秉承蒋介石的指令,在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之间进行分化瓦解,挑拨离间,终于使10万桂军土崩瓦解。1933年1月6日,日军进攻山海关,湖南督军张敬尧潜入北平东交民巷企图从事叛敌活动。当时郑介民作为“军统”负责人,他带领手下的特工、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陈恭澍、黄埔七期毕业的白世雄,在六国饭店成功地暗杀了这位督军,受到蒋介石的嘉奖。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代表后,与共产党叶剑英、聂荣臻、罗瑞卿经常打交道,他还把军统局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执行部当顾问。在与共产党谈判中,他一面在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诽谤中共的文章,一面指使特务跟踪中共人员,捣毁军调处办公室,派遣大批特务制造混乱,嫁祸于中共谈判代表。郑介民是个死心塌地的军统特务,他当然不会让两个弟弟对打内战袖手旁观。他希望他郑氏三将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为蒋效命至死才是对的。

郑庭烽想到这里,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

就在郑庭烽苦闷之极的时候,郑介民奉命来到北平,逼迫傅作义死守平津。

兄弟相对时,郑庭烽向大哥郑介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哥,我想辞职南归,侍奉母亲。现在她老人家卧病在床,需要人照料。再说,我也不愿意再打下去了。”

郑介民是有名的军事情报专家,在二次大战时,他从欧洲考察军事后回国,就曾向蒋介石预言,希特勒必败。抗战中期,他又预言日本军队在战略上必然要南进,要考虑南方的防御。几次预言都被他言中,因此,深得蒋介石及盟军的信任。郑介民这时也害怕弟弟重蹈堂弟的覆辙,于是亲自向傅作义说情:“傅司

令,家母生病,身边乏人照料,我本人兼职太多,抽不开身,希望能让庭烽回海南去照料一下。”当时傅作义正感身边缺人,本不想放庭烽走,但郑介民是“钦差大臣”,又亲自老起脸皮来向自己求情,只好给他个面子,傅说:“好吧,就给庭烽几天假,令堂康复后,速速归队。”

郑庭烽获悉请准了假,惊喜万分,如释重负,他就匆匆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本来只准他一个短假,他却来了个“黄鹤一去不复返”。郑庭烽于1949年在福建任21兵团副司令,然后撤退到台湾,任澎湖防卫司令、一兵团副司令,台湾预备部队训练司令部副司令等职。1960年因患脑溢血在台北病逝,终年55岁。

郑介民于1949年春应美国邀请赴美列席美国联合参谋长会议,报告中国大陆形势,为美国提供军事情报;1949年11月返回香港,然后到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兼任“大陆工作处”处长,嗣升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1954年任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晋升为二级陆军上将。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从日月潭返回台北后,心脏病复发卒于家中,终年62岁。蒋介石亲临殡仪馆吊祭,并追晋郑为一级陆军上将。

就在郑介民死前一个星期,郑庭笈作为第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郑庭笈特赦后的情况暂且不提,以后还要专门详述。

据说就在郑庭笈被特赦后一周,郑介民被蒋介石打电话邀去谈心。谈话时,蒋介石递给郑介民一块西瓜,郑介民吃了一半,偷偷把另一半丢进日月潭,然后告辞回家。当晚,这个搞了一辈子特工的情报专家,便暴死在自己的卧室中。不过,郑介民的死因众说纷纭,至今仍是一个谜。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且说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后,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于1948年10月29日从沈阳东塔机场乘

飞机逃走。11月1日拂晓,解放军对沈阳发起总攻,仅一天时间,13万守敌,包括“剿总”第8兵团、两个军部、11个整师、技术兵种以及所有的流亡司令部、省政府在内,一扫而光,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11月2日,9纵开始向营口进攻,7纵、8纵和南满独立师也赶到营口以北,国民党52军从营口乘船南逃,营口解放。

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历时52天,共歼国民党军47万人,从而使中国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共产党部队在数量上由长期劣势变为优势。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战略决战的第二幕——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就开始了。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到商邱,北抵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发动了一次巨大的战役,史称“淮海战役”,蒋介石称“徐蚌会战”。蒋介石在这个地区集结了80万兵力,人民解放军参加的兵力为60万。这样大规模的决战,在世界各国内战史上,不是“绝无仅有”,也是非常罕见的。

其实,东北尚在酣战之际,毛泽东早在1948年10月11日就给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发出了一份重要电报,即《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报指出:

“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沐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

对于这次战役以后的发展,毛泽东也作了估计。他设想战役第二阶段在沿海一带作战,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第三阶段在两淮(淮阴、淮安)方面作战。作战的方法仍然是强调“围城打援”的原则,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三个阶段

共需1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打好淮海战役，毛泽东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粟裕5人组成，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

蒋介石原不愿在徐州附近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因为蒋介石一生多迷信。楚霸王被围垓下四面楚歌的历史故事，就发生在徐州附近的灵璧县以南的沱河北岸，这就更使蒋介石有所避忌。因此，蒋介石决定不守徐州，退守淮河来确保南京外围，并决定在1948年11月上旬转移完毕。“固淮守江”的计划确定后，遭到军内部分人的非难，认为放弃徐州，南京难保。由于蒋介石怕影响军心，兼又得到“共军南下较缓”的情报，决定守徐州。临战改变作战计划，贻误了战机。

在统帅问题上，派系作祟，矛盾重重。1948年5月，顾祝同调任参谋总长。关于徐州“剿总”司令人选，蒋介石先想让蒋鼎文接任，而蒋鼎文坚决谦辞，不愿去收拾顾祝同留下的那副烂摊子。蒋介石又想到新近贬为“顾问”的“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刘峙，并征询刘峙的意见。刘峙虽然感到时局险峻，“除出现奇迹，很难挽狂澜于既倒”，但在蒋介石的鼓励下，却信心百倍。他说：“要我做官，不敢奉命，要我拼命，义不容辞。”蒋介石即任命刘峙为徐州“剿总”司令，将南京的北部门户交给了这位昏庸糊涂的“福将”了。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对此颇多议论，有人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头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国防部三厅厅长、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郭汝瑰听了这个笑话后，即告诉顾祝同。顾说：“徐州剿总的人选，我们考虑过两个人：刘经扶（刘峙）和蒋铭三（蒋鼎文）。蒋铭三日夜嫖赌，不理事；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6月14日，刘峙率参谋长李树正乘坐参谋总长专机由南京飞往徐

州,正式就任徐州“剿总”司令。他向国防部同僚辞行时说:“见危授命,我跳火坑,个人生死事小,国事为重。”刘峙建议国防部挑选一名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兵团司令以上的资深将领以副总司令名义兼任前进指挥所主任。国防部长何应钦选了杜聿明、宋希濂两人,送呈蒋介石核定,蒋介石选定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任副总司令,以杜之长来辅刘峙之不足。

关于淮海战役统帅人选问题,还有一个插曲。国防部长何应钦于10月22日召集顾祝同、肖毅肃、刘斐、郭汝瑰等人开会,讨论中原战场作战计划。会议估计中原会战将在徐州方面举行,并且判断解放军中原野战军有协同华东野战军打大仗的可能,而国军分属徐州、华中两个“剿总”指挥,且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又是一名“既无办法又无决心”的福将,不堪担此重任,因而主张由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统一指挥徐州、华中两个集团,并要求黄维兵团东开阜阳、太和、上蔡地区,以配合徐州方向的作战。国防部连夜拟出方案,由郭汝瑰带到北平向蒋介石请示。郭汝瑰是国防部第三厅管作战的厅长,从全局看,由白崇禧任统帅,仗可以打得漂亮些。23日,郭到北平圆恩寺见到蒋介石,呈出计划。蒋表示同意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总部部队,叫他马上到任。10月30日,蒋由北平返南京,电召白崇禧即日从汉口飞南京。白抵京后,下午5时赴国防部参加由何应钦主持的会议。会上,白崇禧满口答应统一指挥,并对华中“剿总”所属部队作了一些更动部署的建议。在会议结束后,白崇禧前往傅厚岗看望李宗仁,就时局交换意见,时李宗仁已任中华民国副总统。31日上午,国防部继续开会,不料白崇禧却幡然变计,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并且说:“你们要我统一指挥,无非是为了调动第12兵团嘛!你们把第12兵团调去就是。”白一夜之间改变主张,当时颇令人费解。事后才知道,白见李宗仁后,李向

白透露了美国有意支持他逼蒋下台。10月23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卿提出了中国“换帅”的建议,即“劝告蒋总统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更有效地进行反共战争”。由于李向白透露了美国“弃蒋扶李”的计划,因此,李、白打定主意要坐山观虎斗,使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早日被歼灭,以便李宗仁早日上台。国民党政权内部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依然在勾心斗角。难怪当时群众流传许多政治测字趣闻,预感到蒋家王朝气数已尽,亡国只是时间的早晚了。

在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对徐州已完成包围阵势,有识之士纷纷料定:这一战将会使蒋介石政权寿终正寝。11月26日,国民党翁文灏内阁垮台,孙科继任行政院长,称为“和平内阁”。当时,《益世报》一编辑便在该报副刊上写了一篇杂文:《为孙内阁算命》。此文将“科”字拆为“禾”“斗”,断曰:孙内阁的八字为“欲和无口,欲斗无门”(斗字的繁体外围与“门”形近)。盖和无诚意,有口难开;士无斗志,即欲斗无门。而且翁孙是一家,翁文灏组阁,不久下台,称为“短命内阁”;而有其“翁”,必有其“孙”,也逃不出“短命内阁”之命运。此文刊出后,《益世报》主笔段念慈称为奇文共赏。那八个字天然巧合,而事后竟然言中。

闲话少叙。且说杜聿明从东北“剿总”卸任以后,马不停蹄地又赶到徐州上任。刘峙当然高兴,一切大事可以推给杜聿明去办,他好乐个清闲自在。

徐州“剿总”副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来到陈官庄地区的指挥部。一天,他坐在指挥部的院子里理发。那院子四围都是房屋,只正中间孤零零地长着一株树。他一边理发,一边却听到16兵团的监察官尹晶天在说话。尹说那株树非常不吉利。杜在听尹说此话后,心中也是一怔,急问尹何所依据。尹晶天

说：“老总您看，在四面框框之中，长着这么一株树，口里加个木，不正好是个‘困’字吗？”杜聿明听后成了一块心病，他平时不信迷信，但大战前夕，总要图个吉利，于是命尹晶天亲自用斧将这株树砍倒。砍树之后，尹晶天找来相命先生一算，又占过卦，说从此大吉大利了。哪知尹晶天的话前灵后不灵，他冤“斩”了院中那棵树，始终未逃出一个“困”字。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 80 万大军也给“困”死了。你道这预言灵也不灵？

淮海战役的兵力部署如下：

解放军方面，共有 60 余万人，包括：

陈毅、粟裕所率领的“三野”所属 16 个纵队（相当于军）；

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领的“二野”所属 7 个纵队；

华东、中原、冀鲁豫三个军区的地方武装。

黄埔军校师生有陈毅、陈赓、袁也烈、周文在、郭化若、谭希林、宋时轮、袁仲贤、郭天民等。他们都是统帅大军的指挥员或政委。

国民党军方面，共有 80 万人，包括：

第 2 兵团司令、黄埔二期毕业的邱清泉所属 5 军、70 军、74 军、12 军之一师，米文和师，共 3 个半军；

第 7 兵团司令黄伯韬所属之 25 军、63 军、64 军、100 军，共 4 个军；

第 13 兵团司令、黄埔四期毕业的李弥所属之 8 军、9 军，共两个军；

第 16 兵团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孙元良所属之 41 军、47 军、99 军 3 个军；

第 12 兵团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黄维所属之 10 军、14 军、18 军、85 军，共 4 个军；其时在河南牵制解放军“二野”；

直属部队：黄埔二期毕业的余锦源所属 72 军、孙良诚所属

107 军、司元恺所属 115 军。

另外有交警总队、炮兵、工兵、通信兵、辎重兵、装甲兵等部队。

杜聿明认为,就双方兵力估计,解放军显然少于蒋军,装备也劣于蒋军;特别是炮少,飞机坦克没有,故国民党军在兵力及装备上均占绝对优势。照杜聿明的计划,在“二野”东来之前,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击溃“三野”或其一部,是有把握的。杜聿明的作战方针:简言之,是以徐州为固守中心,而设法分割解放军“二野”于津浦路以西、“三野”于津浦路以东,次第分别加以击破。如能阻止“二野”东进,则徐蚌会战可以消灭共军主力,扭转败局,反攻济南。但对守徐州的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杜有些不放心,所以最后决定由黄埔嫡系李弥的 13 兵团守徐州,而调出冯治安部队去参加攻击,以防后患。杜聿明不愧为是军中主帅,不出他的所料,果然冯治安部的张克侠、何基沣率 59 军 180 师、38 师、77 军 132 师共 3 个半师 23000 余人,在江苏贾汪和山东台儿庄起义。解放军山东兵团即穿过该部防地,直插徐州东侧,打了个措手不及,顿使徐州陷于空虚无防的窘境。

杜聿明以为用他那套锦囊妙计,便可以击溃解放军。但在解放军眼中,以“剿总”所在地徐州为中心,津浦路和陇海路在这里交叉,就像一个十字架一样。其四边布置的 80 万大军,已被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早在 1948 年 10 月上旬,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步骤,就已在西柏坡计划就绪了。张克侠、何基沣在淮海战役刚启幕帷时,就让开了东起台儿庄、西止临城(今薛城)的 200 里运河防地。实际上,这就是敞开徐州的东北大门,放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 3 个纵队顺利穿越防线、直插徐州东侧,切断陇海路,拦截黄伯韬兵团西逃,从而为解放军全歼该兵团赢得时间,为实现淮海战役首战大捷,奠定了基础。毛泽东于 1948 年

11月18日电令中说：“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

张克侠、何基沣率部起义，解放军3个纵队迅速过了运河，迫使掩护黄伯韬兵团西撤的李弥兵团回防徐州，又让开了不老河防线，华东野战军7纵、20师、21师主力迈着整齐轻快的步伐顺利南下，把黄伯韬兵团死死围住，成了瓮中之鳖。

黄伯韬兵团数万人马要通过运河铁桥西撤，谈何容易！除非有船，否则就只有走这道铁桥。黄伯韬手下5个军，数万人马要同走一道铁桥，要走多少天才能走完呢？时间不允许。而解放军南北两面的主力，就像两把犀利无比的尖刀，向正在西撤的黄伯韬兵团拦腰插进去。

有道是：大难临头各自飞。首先，第100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周志道坚决要求架桥纵列要归他指挥，并要先在炮车（地名）以西小河上架桥，以便于该部撤退，否则该军不愿占领炮车，担任掩护。其次是63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陈章自请另走一路，由窑湾渡河，理由是免于同走一铁桥，拥挤过甚。64军军长、黄埔五期毕业的刘镇湘则主张过河后在大许家留下来与共军打一仗。25军军长、黄埔高教班毕业的陈士章则说：“西走一里好一里，豫东之役，25军与72军阵地只隔20里，炮火相接，但始终冲不开解放军的隔绝。现在留在此地，万一被围，梦想邱清泉兵团远道来援，恐不可恃。”黄伯韬也说：“相隔5里，他也不会救我们的。”

正在他们争论不下时，忽然接到南京国防部的电令，说黄伯韬的7兵团未过运河，已损失了两个军，而且这样紊乱，恐怕继续西进，被解放军尾追，即可能全军溃败，故授权黄伯韬可以独断自主，如有必要，在碾庄略加整顿，打退敌人之后再走亦可。由此可见，其时，南京国防部也被打得六神无主、心乱如麻了。

看到国防部这道命令后，64军军长刘镇湘更振振有词地

说：“既有命令，为什么还要走？打垮了敌人之后再走不好吗？反正是要打的，为什么一定要到大许家之后再打呢？”

在众议纷纭的情况下，黄伯韬见 63 军已无望，25 军及 100 军两军都已残破，44 军战斗力又差，现在只有依靠 64 军这一个完整的军。该军军长刘镇湘坚持不走，乃决计在碾庄固守待援，并安慰部下说：“不要紧的，邱清泉不来救我们，杜聿明是会支持我的，还有孙元良、李弥两个兵团，都和我们互相支援过，只要我们守得住。”

当黄伯韬兵团的 5 个军尚在运河徘徊时，11 月 14 日，毛泽东看到战役形势正在顺利发展，攻黄阻援计划正在顺利实现，就设想下一步将攻黄阻援变为围黄打援。他指示总前委：当黄伯韬兵团将近全歼时，放邱清泉兵团向东深入大许家一线，然后以苏北兵团切断其后路，完成对邱的包围；并且诱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深入，要首歼碾庄地区西、南、北三面的敌 3 个军，暂时留下黄伯韬的兵团部与碾庄东北的 1 个军。解放军遵照毛泽东这一指示，于 16 日向东撤了一些。可是，邱清泉像被打怕了的狗，仍然趴在原地，不敢轻举妄动。碾庄圩在徐州以东陇海线上，只有一个有土墙护着两百多户人家的普通村庄。20 日以后，解放军逐渐紧缩了碾庄地区的包围圈，将黄伯韬兵团压缩于东西不到 10 华里、南北不及 6 华里的狭长地带。

蒋介石派出的援军纷纷被阻，无法靠近黄伯韬兵团。战斗打到 22 日下午，解放军将 64 军阵地全部摧毁时，黄伯韬已无处可逃，乃叫卫士离开，自己用手枪自杀。关于黄伯韬兵败之事，后来还出现了另一种说法。据从碾庄化装成难民逃出的 25 军副军长、黄埔五期毕业杨廷宴说：“当时黄伯韬、陈士章（25 军军长）、刘镇湘（64 军军长）等人见情势危急，决心各带一部分人向西突围。黄突出去后走到一茅棚附近，只剩下我们两人，见四面

皆有解放军包围,无法再走,黄即举枪自戕,但并未断气,我又补了一枪。黄死后我正在哭,解放军来盘问我,我说:‘我是伙夫,死的是我哥哥。’解放军再未追究,我将黄伯韬掩埋后,钻空子跑了出来。”杨又说:“陈士章不知下落,刘镇湘佩上满身勋章,向敌人冲锋时被打死了。”说得活灵活现。结果真实情况查明,黄伯韬确为自戕而死,刘镇湘被俘。陈章是63军军长,他也是在窑湾渡河时受伤被俘。至此,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1948年12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忙于办丧事。蒋介石的贴身首席秘书、号称“文胆”的陈布雷于11月13日服安眠药过量自杀身亡。半生随陈布雷共患难的陶永标副官在回忆《“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中说:

“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陈布雷死后,他的几封遗书不准公开发表。1948年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却瞒天过海,说“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4天后,该报做了大转弯,承认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了:“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陈布雷以死报国。”

这年12月上旬,黄伯韬的棺材运回南京,蒋介石举行“公祭”,并追赠为陆军上将,接着又忙于“公祭”陈章,蒋亲临现场,表示哀悼。正是:黄伯韬碾庄自戕,蒋介石流涕致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敌营廿年 廖运周孤雁归队 陷入重围 双堆集黄维被俘

话说正当南京为陈布雷、黄伯韬、陈章(实为被俘未死。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任海生《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有陈章之名。笔者注)举行“公祭”之时,淮海战役已进入歼灭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关键时刻。战役正如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原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所说:“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住敌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

黄伯韬兵团被歼后,淮海战场上形成了三个集中点: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包围了黄维的 12 兵团;永城东北陈官庄一带包围了杜聿明集团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 3 个兵团;蚌埠以西阻击了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当时,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兵力对比为一比一,从装备、粮食等条件上来衡量,解放军还处于劣势。如果这样坚持下去,力量分散,战局就会变成相持状态而延迟消灭敌人的时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分析了这种形势,为了加速战役的进程,决心采取集中兵力围歼黄维兵团,困住杜聿明集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方针。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风趣地说:“这就是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的方针。”

解放军决定使用战役总预备队华野 7 纵、13 纵及特纵部分

炮兵,增加总攻力量。

黄维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江西贵溪人,1904年生,原号悟我,蒋介石为其改号培我。是陈诚的老部下,当过11师师长、18军军长,是陈诚“土木系”的骨干之一。此人书生气十足,在黄埔军校毕业后,由于在陆军大学深造,又到德国军事院校留过学,因而与行伍出身的军人格格不入。黄维组建12兵团,原归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建制,因黄伯韬兵团被围,蒋介石才将驻扎在河南驻马店一带的12兵团东调参加淮海战役。这支武装到牙齿的钢铁大军由第10军、14军、18军、85军四个军组成,其中18军是陈诚的“命根子”和起家血本。12兵团共12万人马。他们奉命从河南千里迢迢,赴援徐州,本已犯兵家大忌,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强令12兵团火速前进,不得以任何借口延误。黄维领旨,率12万人马,向安徽蒙城方向迅速前进。

就在黄维兵团向蒙城急速前进的同时,中原野战军第1、第2、第6纵队在杨勇、陈再道、王近山的指挥下,也头顶着风雪,在泥泞的路上急行军。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苦战。中原野战军1纵、2纵、6纵队总共不足6万人,却要对付黄维全副美式装备的12万精锐之师,谈何容易!但共产党有办法,在围歼黄维兵团时,启动了一支仁义之师。这仁义之师是由潜伏敌营长达20多年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黄维兵团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所率领的。当时其部下5500多名官兵在战场起义,进而使得黄维兵团一败涂地。

廖运周,又名冠洲,1903年生,安徽凤台人,曾进过河南中州大学学习,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编入武汉分校,是第五期毕业生。廖运周的叔伯辈中,是“淮上革命军”的骨干。廖少斋、廖海粟、廖磐箴、廖朴纯、廖润斋、廖瑞然、廖子宾、廖梓英在安徽凤台史称“廖氏八兄弟”,也是安徽反清团体“岳王会”的中坚。后来他

们又加入同盟会,既是安庆起义的谋划与参与者,也是淮上革命军的组织和领导者。生长在这样一个革命家族中的廖运周,和同族长兄廖运泽、堂弟廖运升三人,都先后在黄埔军校毕业。廖运泽是黄埔一期毕业,字汇川,1926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脱党,历任暂编14师师长、骑兵2军军长、96军军长、20集团军副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廖运泽不愿卷入内战,以辞职等办法回避与人民解放军作战。1949年他在筹备起义时,被国民党发觉,遭到通缉;此后潜居香港,1952年回大陆定居。

廖运周从黄埔五期毕业后,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和兄长廖运泽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失败后,他和黄埔一期毕业的国民革命军4军25师75团副团长、共产党员张堂坤被钱大钧的部队俘获,张堂坤被秘密杀害。当时廖运周机智地顶替了本团一个离队文书的名字,隐瞒团部参谋的真实身份,因而才侥幸逃过敌人的屠刀。提起廖运周入党,他的介绍人就是75团团长、共产党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孙德清。孙德清原名孙以惊,又名孙一中,同是安徽凤台人(当时凤台、寿县未分)。北伐时他在叶挺的4军独立团一营任营长。在攻打武昌城时,他与副营长、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的曹渊率先爬上城头,曹渊不幸中弹牺牲,他则在战斗中负伤。以后,孙德清与廖运周一同率75团参加南昌起义,共同南下,转战江西、广东等地。孙德清在三河坝的江边截击强行渡江的敌人,他与营长蔡晴川、许光达(许德华)同时身负重伤,后转赴上海养伤。

1927年冬,根据党的指示,孙德清打入国民革命军第33军柏文蔚部从事兵运工作。1928年初,经柏文蔚同意,孙德清在安徽寿县创办33军学兵团,任学兵团团长兼党的特别支部书记,廖运泽任教育长,廖运周与许光达任教育副官,秘密从事兵运工作。

1928年夏,因遭安徽寿县国民党当局通缉,廖运周离开33军学兵团。此后,他曾担任国民党军96师参谋、45师267团连长、参谋、副官长等职。1933年6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境内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廖运周任第2师9团团长。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廖运周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党独46旅,廖任738团团长,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廖运周像一只孤雁离了群,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党组织的希望。廖运周利用黄埔军校毕业这块金字招牌,参加国民党军南征北战,因战功逐步由团长升为旅长、副师长,到1942年,调到吴绍周的85军任110师少将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廖运周还率部参加了鄂北、豫南、中原、豫西等重要会战,并多次负伤。

在解放战争初期,廖运周与中共取得了联系,并恢复了组织关系。1946年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派中共党员李俊成、徐仁、刘浩三同志到廖运周的85军110师,加强该师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夏,在廖运周的掩护下,正式成立了中共地下师党委,他们在部队积极发展地下党员,并根据邓小平派人传达的指示,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何时启动这条“内线”,是淮海战役第2阶段围歼黄维兵团是否成功的关键。廖运周把一批地下党员安排在师部副官处等要害部门,积极开展活动。他们对110师代理参谋长刘协侯作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发展他为中共预备党员,廖运周还将刘协侯提拔为110师329团团长,让他掌握兵权。329团副团长金汉章是穷苦农民出身,作战勇敢,有正义感,师地下党委就启发他的政治觉悟,廖运周提拔他为330团团长,并吸收他加入了地下党。只有原329团团长唐奎甫、330团团长陈振威两人是国民党死硬分子,不易转变思想。廖运周利用关系,把唐奎甫推

荐到 82 师任副师长,将陈振威提拔为 82 师参谋长,这样,他俩人升了官,极为高兴,还特地感谢廖师长,认为廖师长是好人,推荐他俩升了官。廖运周更为高兴,认为这是踢开了绊脚石,搬掉了拦路虎,为起义铺平了道路。

何时起义?师党委派李俊成向中共中原局汇报,请求指示。邓小平下了一道命令:第一,要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的作用;第二,要大胆发展组织,不要依赖上级派人;第三,对军纪不要要求太严,不要用解放军管理部队的办法去管理国民党的队伍。这道指示下达后,110 师加速了起义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而且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部队放松了军纪的严格执行,官兵们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甚至发生抢大户和富商的财物,被财主富商状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大骂吴绍周军长,吴又骂廖运周是“纵兵殃民”。蒋介石下令派“人民服务队”到 110 师,以整顿军纪为名,监督 110 师的一切活动。邓小平发觉后,再次指示:上级党组织没有忘记你们,只是目前还不到时机,不能起义。起义要在军事、政治上起最大的作用,不光是要万把人、几千条枪的问题;要考虑全局,不应计较局部得失。军纪问题,共产党天天宣传国民党坏,你们却要把军纪搞好,那不是为国民党争光,而打了共产党的嘴巴吗?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时间一天天过去,等到 1948 年 11 月上旬,85 军要参加 12 兵团增援徐州,110 师全体官兵兴奋异常,认为时机到了,是起义的黄金时间了。师党委紧急召开了地下党员会议,说明这次增援徐州,是邓小平的指示实现的大好时机,一定要听从安排,把 110 师安全地带到解放区去,交给党和人民。

黄维率领 12 兵团 4 个军,12 万人马浩浩荡荡从河南驻马店出发,日夜兼程向安徽蒙城疾进。黄维的一举一动,包括兵力部署、战略意图、武器装备等,廖运周都了如指掌,并及时通过秘密

电台向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汇报,让“总前委”得到准确情报,好下决心全歼黄维兵团。

黄维对廖运周信任有加,他通知 85 军军长吴绍周,要把 110 师拨给他直接指挥,作为前方部队搜索共军情报。

解放军为了布下“口袋阵”,他们用自己的铁脚板,同黄维的汽车轮子和坦克履带赛跑,并且要赶在黄维兵团的前面,利用颍河、涡河、北淝河、浍河等天然屏障,挡住黄维兵团,以争取时间,等待华东野战军在全歼黄伯韬兵团后,再同中原野战军主力共同“会餐”,吃掉黄维兵团。黄维兵团于 1948 年 11 月 8 日由驻马店出发,一路上遇到解放军层层阻击,黄维兵团以战车开路,铁流如滚,最少一天行军也能走个百八十里路。但由于有解放军的阻击,黄维兵团越走越困难。黄维顾虑甩不开纠缠,乃脱离正面接触,由浍河北岸转道南岸,向东转移。

黄维兵团来势汹汹,接连突破了由解放军地方部队和第 1 纵队 20 旅组成的洪河、沙河、颍河防线,直逼蒙城。

1948 年 11 月 18 日,黄维命令 18 军军长、黄埔七期毕业的杨伯涛率领 18 军强渡涡河,进攻蒙城。杨伯涛把突击任务交给了 18 军最精锐的 11 师。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18 军 11 师向中原野战军 1 纵、2 纵驻守的黄家阵地发动了疯狂地进攻。

中原野战军 1 纵、2 纵在司令员杨勇、陈再道和政委苏振华、王维纲的指挥下,从第一线阵地到第二线阵地,与 11 师反复争夺。第 4 团、第 8 团的营、连干部全体上阵拼刺刀。有的连队干部牺牲了,由卫生员、通讯员指挥活着的战士继续作战。打到后来,连第 4 团团团长晋士林、政委郑鲁也亲自上阵,并英勇地战死在阻击阵地上。黄维的 18 军两天后,终于突破解放军 1 纵、2 纵的防线,攻克了黄家和蒙城,接着又向板桥集发起猛攻。解放军在经过顽强抗击后,主动撤离阵地。黄维兴高采烈地挥师急

进,11月23日,其部渡过了北淝河,逼向淝河南岸的南坪集。

此时黄维,还不知道黄伯韬的7兵团已于昨日在碾庄地区被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全歼。现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华中野战军7个主力纵队,即杨勇的1纵、陈再道的2纵、陈锡联的3纵、陈赓的4纵、王近山的6纵、秦基伟的9纵和王秉璋的11纵已全部集结完毕,正在这一带张开一个巨大的“口袋”,就只等黄维兵团往里钻了。华东野战军的主力也正在日夜兼程地赶住宿县。

驻守南坪集的是解放军名将、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统帅的华中野战军4纵部队。对于这位曾救过蒋介石性命、富有传奇色彩的黄埔一期同学,黄维丝毫不敢轻视,因此他以18军118师担任主攻任务,并把快速纵队全部的坦克和军直榴弹炮营,统统调到第一线,配属给118师使用。

11月23日早晨8时,18军118师开始向南坪集发起进攻。飞机、重炮将淝河炸起高达三、四丈的密集水注,河对岸的南坪集在烈焰中已化为一片焦土。118师师长尹钟岳在快速纵队2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亲自率领352团、353团、354团强渡淝河。用火焰喷射器、机枪、冲锋枪向解放军猛烈射击,企图杀出一条通往宿县的血路;18军军长杨伯涛也亲临前线阵地监督。

陈赓的4纵顽强据守阵地,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战斗十分激烈。从晨8时一直打到日落黄昏,18军在解放军主动撤走后,才踩着同伴们的尸体和鲜血踏上了这片仍在燃烧的土地。这一仗打得黄维胆颤心惊,直到这时,他才发觉情况不妙,竟被老同学陈赓“耍”了。他的四周都有解放军部队在活动,前面的宿县和背后的蒙城都已被解放军占领,左翼的涡阳一带也有解放军主力集结,解放军的总兵力已增加到7个纵队,一个巨大的“口袋阵”已经初步形成了。黄维在看清形势后,在战场上拾得

了解放军的宣传品,其中有“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活捉黄维”、“看你黄维哪里逃?”等口号。18军军长杨伯涛拿这些传单给黄维看,黄看后只是付诸轻蔑的一笑。岂料后来的事实证明黄维笑得太早了,解放军替他算命,果然一字不误。

陈赓4纵11旅副旅长徐其孝风趣地说:“黄维这人很狡猾,他老是5条牛(指黄维的4个军及1个快速纵队)在一起,我们不好下口,必须先拉出一条牛来,分散它,打伤它。因此,这既是阻击战,又是拉牛战,先阻后拉,阻中有拉;通过阻,先给敌人一个下马威,打它个头破血流,脚瘸胳膊拐,然后再趁势拉它一条牛出来。当它的力量分散了的时候,我们各路大军就向敌开刀,分割围歼。这个仗放在哪里打呢?南坪集。”

黄维完全按照解放军的计划,将兵团司令部进驻南坪集。14军军长、黄埔三期毕业的熊绶春率全军集结于南坪集以南地区。吴绍周(黄埔高教班毕业)率领的85军及18军所属何竹本(黄埔六期毕业)的49师,也已由蒙城跟进,越过了淝河,到达浍河南岸的赵家集,距南坪集30多里,只有半日之程了。

欲擒之,故纵之;或者是欲擒之,先拒之。真好像打太极拳一样。黄维硬着头皮撞过来的时候,陈赓有意给他挡了一掌,然后潜运内力,把掌一收,终于把对方吸过来了。南坪集本是解放军捕捉黄维的一个口袋,他们有意在袋口摆一块石头,现在黄维兵团拼命一冲,便“自行人网”了。

11月24日,解放军已完全包围了黄维兵团。此时,黄维打算将兵团主力转移南逃,以免被消灭。黄维如何南逃暂且不表。

且说11月23日,蒋介石电召刘峙与杜聿明速飞南京,参加官邸军事会报。出席会议的除刘峙、杜聿明外,还有何应钦、顾祝同、国际部厅长刘斐、郭汝瑰等10多人。

在会上,先由国际部3厅厅长郭汝瑰报告作战计划:

“我军以打通津浦路徐蚌段为目的，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6兵团、12兵团向宿县逼进，南北夹击，一举击破共军，以打通徐州至蚌埠之间的交通。”

杜聿明在会上表示：“徐州各兵团沿铁路正面进攻，进展甚微。且解放军已完成了几道预备阵地，如继续正面进攻，徒然增多伤亡，恐怕还是不能达到与黄维会师的目的。”

有人提出以左翼或右翼包围，杜认为怕还是攻不动。蒋介石问杜怎么办？杜说最好以主力由双沟经泗阳直趋五河，然后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北进，再与黄维会师。此一意见，即是把徐州兵力由津浦路以东南下，名为进攻，实为撤退，其目的，与他在徐州对刘峙所讲的“中策”相同，即想把兵力安全撤回两淮。结果蒋介石还是采取了南北夹击这一方案，并命令杜聿明马上回徐州部署攻击。杜聿明只好说：“这一决策我同意，但是兵力不足，必须再增加5个军，否则，万一打不通，黄维兵团又有陷入重围的危险。”

其实，这时候黄维兵团已经陷入重围，但蒋介石消息不灵通，上上下下都还蒙在鼓里。

杜聿明乘飞机返徐州，飞机沿铁路线北飞。经过宿县以南双堆集上空时，杜聿明从飞机上看下去，见浍河东岸炮火连天，于是乃在飞机上与黄维通话，探问情况。黄维说：“当面的敌人非常顽强，应赶快想办法。”杜聿明告诉他：“今天老头子已定下大计，马上会下命令的，请你照令实行好了。”黄维虽感到四面楚歌，但他自持有强大的兵力，还是一心想打到宿县去。而对中原解放军的行动，他依旧懵然未觉。

形势发展对黄维越来越不利，此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中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诱敌深入”之计。11月24日黎明，他心急火燎地召集各军高级将领开会，商量对策。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

长吴绍周、兵团副参谋长韦镇福、18军军长杨伯涛、14军军长熊绶春、10军军长覃道善全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终于，杨伯涛忍不住了，他站起来大声说：“刘伯承布下的陷阱，无疑在宿县方向，如果我们继续执行老头子的命令，打向宿县，那就是自投罗网。眼下东南方向尚未发现共军主力，不如星夜向固镇方向突围转移。南坪集离固镇不过80多里，强行军一口气即可赶到。待我们与李延年会合后，再沿津浦路往北打，依然可以完成老头子交给的任务。”杨伯涛的建议，众将领皆点头称是，认为这是一条万全之计。黄维此时心乱如麻，进退两难：听杨伯涛的话，又怕违背蒋介石的命令。黄维一时下不了决心，他还没有请示国防部，而刘、邓大军请示歼灭黄维兵团的中央军委复电乙下达：“（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24日，解放军纵队以上干部在淮北小李家总前委作战室里，召开战前动员会。刘伯承风趣地说：“个别同志信心不足，担心咬不烂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简直是乱弹琴！是啊，我们从大别山出来，真是马瘦毛长啊！可是，瘦驴拉硬屎，就看有没有勇气！‘勇’字就是男字头上戴着一顶光荣的花冠。没有勇气算不上男子汉！这回同志们要向广大指挥战员讲清楚，我们决不放过12兵团这个老冤家，狭路相逢勇者胜！用一句四川的俗话来说，大家都摸摸裤裆，看看自己是不是男子汉，有没有卵子……”

刘伯承一席话引起一阵欢快的笑声。陈赓的4纵能打硬仗，他表态：“我们破釜沉舟，不惜一切牺牲，承担最艰苦的任务。即使打得只剩下一个班，我陈赓也甘心当班长，一定坚持到最后胜利！”

黄维遇到了师兄陈赓的挑战，虽然他俩同在黄埔一期学习，

没想到今天竟反目为仇，战场上杀个你死我活。这天下午，黄维终于下定决心突围转移。他命令：“第10军掩护18军，第14军掩护兵团部，第85军掩护10军，依次撤退，到双堆集附近集结。”黄维的12兵团立即开始行动，但为时已晚。解放军7个纵队已开始从四面八方发起总攻，国民党14军、85军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损失过半，惟有18军还有战斗力，掩护兵团狼狈逃到了双堆集。一场混战直打到天明。11月25日，解放军7个纵队将黄维的4个军12万人马合围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

11月26日，黄维终于等到了蒋介石的复电：“应不顾一切即以主力向东攻击，击破当面之敌，与李延年兵团会师。”

11月27日，黄维下令4个师齐头并进“滚着走”，在空军、炮兵和坦克掩护下，向解放军6纵和陕南12旅的阵地发起了凶猛地冲击。

但是，黄维做梦也没有想到，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竟是中共党员，廖运周早已将黄维的突围计划秘密报告了解放军，并与解放军约定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率110师实行火线起义，临阵倒戈。解放军6纵司令员王近山按事先约好的方案放廖运周通过防线后，随即封闭了缺口，后续突围的3个师被打得头破血流，再也突不出去。

廖运周率全师5500余名官兵火线起义，不仅打乱了黄维的突围计划，而且也严重挫伤了12兵团的士气。蒋介石得知黄维突围失败后，立即派顾祝同飞到双堆集上空，命令黄维不要轻举妄动，要死守待援。

廖运周在阵前起义后，毛泽东、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纷纷来电祝贺，赞扬廖运周的大智大勇。

黄维对廖运周恨之入骨，巴不得挖了他家的祖坟，在关键时刻捅了他一刀，使之军心涣散，导致后来一系列失败。黄维对熊

绶春军长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一古训我忘了。所以败得这么惨！”黄维对老头子的命令也有一肚子气，他认为“死守待援”，就是死守转为“守死”罢了。

黄维兵团的命运指日可待了。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气候寒冷，双堆集一带又是贫瘠的空旷地带，村舍零落，人烟稀少。12兵团10多万人马只能露天宿营，12万人天天要吃粮食，4000多头骡马天天要吃粮草，500多辆机动车每天也要消耗汽油，一百多门山野炮、一千多门小口径炮、几万支步枪每天所吞吐的弹药，总计每天的消耗量约在200吨以上，就是用大卡车装，也要装一百多辆。当初，各军辎重部队、汽车、坦克部队携带的粮食、弹药、燃料也够用5至7个月，但因作战方针不明，战争开始时，没有注意到节省粮弹，所以到被围一星期后，则感到粮弹供应紧张。后来要求空投，开始还能每天空投部分粮弹，由兵站参谋长陈志轩向各军平均分配，到后来因天气不好，飞机无法起飞，粮食紧缺成了一个大问题，官兵忍饥挨饿，天寒地冻，士气极为低落，军心混乱，抢粮伤人之事屡见不鲜，大批士兵偷偷弃枪逃跑，投诚解放军，真是空前未见。

黄维被困之际，12兵团副司令、黄埔四期毕业的胡璉因养病未随部队行动，留在南京。蒋介石召见胡璉，问他有什么办法扭转战局，胡璉当然是回天无力，但他尚有一股子“效忠”的勇气，愿意到前线去协助黄维鼓舞士气。这样，胡璉乘小飞机来到双堆集，并带来大批签有“蒋中正”三个大字的“总统嘉奖令”。黄维见他的老部下胡璉带病上前线，也大为感动，劝胡璉再返南京催运空投物资补给，于是胡再度返宁。黄维也是一条好汉子，对胡璉如此“仗义”患难与共，本想劝胡留在南京料理善后，不想胡璉又飞回双堆集，要与黄维共存亡。黄维心想“千兵易得，一

将难求”，有胡璉这样的将领，国民党统治的大厦是不会垮的。

解放军在包围黄维兵团后，一面加紧对敌人“紧缩饿困”，一面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手段，歼灭敌人，并对黄维兵团进行猛烈的、有效的政治攻势。12月12日，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联名发出《敦促黄维投降书》，但黄维将劝降书撕得粉碎，下决心顽抗到底。新华社广播的《敦促黄维投降书》中说：“……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的牺牲。”黄维虽然不听，但这广播却在广大士兵心中产生了共鸣，趁黑夜爬过来的敌军士兵越来越多，有时是成班、成排地集体投诚。

12月12日，解放军终于攻到了黄维兵团司令部的后门口尖谷堆。在血腥惨烈的战场上，生死相搏的仇敌，却也偶尔有一丝浓浓的人情味。就在昨天，即12月11日，黄维兵团的85军被歼后，接着熊绶春的14军也遭到灭顶之灾。该军所剩残余部队摆在双堆集东北4公里杨围子附近几个村庄，在解放军“层层剥皮”的战术下，阵地日缩，最后只剩下一个村庄，熊绶春本人就住在那里。熊绶春是江西人，黄埔三期毕业生，与黄维是同乡。熊绶春向黄维求援，黄维自顾不暇，也无法帮助。熊绶春的参谋长、陆军大学毕业的梁岱早在11月24日被俘，他冒称是军部书记官，解放军把他放了，但给了他一封劝降书，叫他交与熊绶春。梁回到军部后，将信交熊，熊心存顾虑，因此没有接受劝降。后来，解放军冲进他所在的村庄，到达熊的掩蔽部附近，熊绶春张惶失措，要想逃走。参谋长梁岱便向他说：“外面枪炮打得很乱，出去很危险。”劝他小心，但熊十分恐慌，夺门而逃，岂料只跑了十多公尺，就被乱枪打死，而梁于阵地瓦解后则再次被俘。

梁岱在被押往后方的途中，却见一位戴着眼镜的解放军指挥员骑马而来，问明梁岱的身份后，急忙打听熊绶春的下落，当

得知熊绶春已经阵亡时,就立即吩咐将熊绶春的卫士从俘虏队伍中找出来。

熊绶春的尸体在找回后,埋在南坪集附近一个土堆上,墓碑上写着:“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之墓”。

一个是解放军的人道主义精神,感动了所有被俘官兵。据说那位戴眼镜的解放军指挥员,就是中原野战军4纵司令员、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陈赓对这位没有见过面的黄埔三期小师弟,也算尽了同窗之谊。

12月15日,黄维采取“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方针,作困兽犹斗之状。

85军与14军先后被解放军歼灭后,只剩下了杨伯涛的18军和覃道善的10军残部,他们仍在作无希望的抵抗。在这生死关头,胡璉把杨伯涛叫到兵团司令部去对他说:“南京有一个极端秘密的计划,决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毒气弹,大规模地歼灭共军。前两天,空军已空投了一批毒瓦斯弹,你们快到兵站参谋长陈志轩那里去领来用。”

这毒瓦斯弹,每颗都装有放射器,其外形和构造,很像日本的掷弹筒,弹箱内有使用说明书,说明这种毒气弹要取45度高低角拉火发射,最大射程是300公尺左右,后来,杨伯涛将这批毒气弹发给了王元直的11师及尹钟岳的118师使用。王元直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尹钟岳是黄埔军校七期毕业生。在解放战争中,他俩是惟一使用国际公约上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的战犯,后来得到罪有应得的处分,双双进了战犯管理所。

毒气弹也未能阻止解放军的猛烈进攻。一团团白烟在尖谷堆西南冉冉升起,那情景犹如希腊神话中的魔王出世。尖谷堆顿时沉寂下来,战场上人潮消失了。但没有多久,解放军再次发动了进攻。他们用尿湿的毛巾做成了简易的防毒面具,掩住口

鼻,继续爬出战壕冲锋。这一次,18军杨伯涛的“绝招”也失灵了,18年118师354团终于被解放军全歼了,团长廖汉廷被俘,12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尖谷堆被华东野战军7纵61团、62团合力攻下。7纵司令员成钧亲自上前沿阵地坐镇指挥。据说为了守住12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尖谷堆,几天之内,18军118师主力团——354团的团长居然连换了3次。前两任团长都是因为丢失了阵地不敢去见军长杨伯涛而自杀身亡的;杨伯涛对最后一任团长廖汉廷说:“丢了尖谷堆,你就别来见我!”果然,廖汉廷终于未再见杨伯涛,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解放军占领尖谷堆后,整个双堆集均在其鸟瞰之下,18军军部受到威胁,快速纵队的汽车、油车、弹药车、修理车、救护车及炮兵散列车、牵引车都在尖谷堆西北半华里处,不但难于活动,而且成了“包袱”:炮弹打光了,油也烧尽了,成了废钢铁一堆,毫无用处。杨伯涛下令将它们推在路边,并命令炮兵部队官兵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参加步兵战斗。黄维为了维持18军的战斗力,命令逃出的14军副军长、黄埔军校高教班毕业生谷炳奎收容该军所余1千余零散士兵,拨给18军使用。兵团直属的特务营也编入18军118师建制。可以说,凡是能拿枪的人,都使用上了,企图守住制高点,固守待援。

至于10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覃道善所部,比18军更加残破。其所属的114师54团,原属18师,是黄维命名的“威武团”,经解放军打击后,也伤亡惨重,怎么也“威武”不起来了。胡璉乃命其将所守村庄放弃,调到双堆集东侧开阔地建立野堡阵地,以掩护北面的兵团司令部。114师师长黄埔七期毕业的夏建勳则仍守在兵团东侧的一个村庄中。10军75师师长、黄埔七期毕业的王靖则守在双堆集东北3公里处,企图保卫兵团司令部,防止被袭击。

解放军在稳占了制高点尖谷堆之后,又将3纵、13纵交三野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军训班毕业)统一指挥。于12月14日上午,向双堆集附近蒋军核心阵地发起总攻。南线百多门大炮和数以千计的土制炸药,齐向双堆集东侧的黄维兵团阵地轰击。黄维的“火海战术”由于无“火”而自行消声匿迹,而解放军的“土壕战术”却一步一步逼近黄维的兵团司令部。黄维、胡璉均瑟缩在兵团司令部的掩体内,一筹莫展。他们听着枪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炮弹在附近爆炸,危险重重,死在旦夕。

12月15日黄昏,黄维、胡璉决计冒死突围。

黄维与胡璉临突围之前,各向军医要了大包安眠药,准备不能脱身时即仰药“成仁”,并相约谁突围出去,谁就负责照顾对方的家属。

15日下午4点,黄维就命令11师战车提前行动,却未通知杨伯涛和覃道善。黄维、胡璉各乘一辆战车往外冲,无奈解放军的包围阵地如铜墙铁壁,碰来碰去,不是陷进壕沟,就是受到迎头痛击。

18军军长杨伯涛渡小河时,就绝望地跳入水中,意图自杀。但小河水浅,彻骨的冷水把他冻僵了,无奈又勉强爬上了岸,但走出不到百米,就被解放军俘虏。两名解放军战士扶着杨伯涛走了10多里,送到指挥部,给他烧火烤衣。杨伯涛自知无法隐瞒身份,自报家门,第二天即送到后方,在那里碰见来视察的13纵政委廖海光。廖告诉他解放军宽待俘虏,叫他不要恐惧。

18军11师师长王元直逃出重围10余里,见四处都有解放军和民兵活动,遂感到绝望,至一小河边掬水吞安眠药数十片,晕倒在地。醒来后始知系解放军抢救,结果成了俘虏。18军118师师长尹钟岳侧身于乱兵之中,逃了一阵,也被华东野战军捉住。10军军长覃道善、114师师长夏建勳均在突围时为解放

军所俘。10军75师师长王靖负重伤,被解放军用担架送进了医院。胡璉背部受伤,单车杀出一条血路,突围而去。黄维乘坐的一辆战车突围中发生故障,下车后杂在溃兵中逃跑,结果被解放军俘虏。只有85军军长吴绍周奇特,他没有坐着分配给他的战车突围,让司机自行逃生,而他则坐以待俘。18师师长黄埔七期毕业生尹俊率领残部数百人,从东北角逃了出去,侥幸漏网,后来去了台湾。

一支辉煌了19年的王牌军,一位赫赫威名的战将黄维,就这样不光彩地走到了它的尽头。

黄维、王元直、吴绍周等将领被俘后,都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一天,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前往看望他们,还主动提出与他们下棋。于是,黄维在吴绍周的帮助下,“重振旗鼓”,在棋盘上与陈毅厮杀起来。双方你来我往鏖战正酣。关键时刻,站在一旁的邓小平为陈毅想出一个高招,局面顿时改观。黄维只得将棋子推平认输。他站起来,向邓、陈深深一揖,笑盈盈地说:“在下不光在战场上是你们手下的败将,在棋盘上也不是你们的对手。”从此,“邓小平一招服黄维”的故事,便广泛流传开来。

关于12兵团的覆灭,国民党总结了很多原因,什么战术错误、轻敌冒进、情报不灵、友军救援不力、黄维指挥失误等等,不一而足。但黄维只说了一句话:“国民党的气数尽了。”他从不承认自己有错。当时负责管理12兵团俘虏的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部长、黄埔四期毕业的杨松青动员黄维向杜聿明写劝降书,黄维就是不签名,杨问他为什么?黄维答道:“我的最大错误就是打了败仗!”正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拒绝劝降 杜聿明陈庄落网 困兽犹斗 邱清泉突围阵亡

话说正当解放军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时，1948年11月30日，鉴于徐州已陷入孤立无援之绝境，经与蒋介石磋商后，杜聿明慌忙放弃徐州，率领前进指挥部和他的三位黄埔大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其分别所率2兵团、13兵团和16兵团），共计30万人，向西南的永城方向撤退。毛泽东在11月28日已要求总前委注意“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武汉逃跑的可能”。12月2日，毛又致电华东野战军：“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解放军遵命围堵杜聿明，采取“南昌阻击，东西北三面攻击”的方针，逐步缩小包围圈。

12月4日，杜聿明按照“逐次攻进”的战法，令2兵团司令、黄埔二期毕业的邱清泉率部向南攻击前进，13兵团司令、黄埔四期毕业的李弥，6兵团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孙元良坚守阵地，掩护主力进攻。杜聿明企图南撤之际，忽然接蒋介石电令，要他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聿明非常生气，认为蒋介石的决策出尔反尔，如将3个兵团留下来解黄维之围，怕是不但解不了围，还会被解放军包围，导致全军覆没。但杜又不敢抗命，如是把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员大将召来，共同商议。邱清泉看过电报后大骂道：“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弹粮，几十万大军

怎么打仗？”但他还是主张执行老头子的命令。孙元良不表示意见，李弥也满腹牢骚，无处发泄。因为他们已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杜聿明无奈，只得决定服从命令。当晚，杜又接蒋电，严令进攻。杜百感交集：“进攻，无异于送死。唉，反正江山是他蒋某人的，我杜某只有一条命，大不了为他效忠到底罢了。”杜再电蒋力陈利害，蒋才答应“6日始空投粮弹”，这时，解放军已完全了解杜聿明的企图，加紧了对杜聿明的包围。经过几天激战，2兵团虽然进展到青龙集、陈官庄，可西北方面担任掩护的16兵团阵地赵破楼、朱大楼先后被解放军突破，形势岌岌可危。12月6日，杜聿明仍继续向濉溪口方向攻击，但进展缓慢。这一天，解放军以牙还牙，以攻击对攻击，向对方发出攻击。初冬的淮北平原上，硝烟弥漫，天昏地暗。

就在这天夜里，孙元良兵团单独突围，结果在薛家湖一带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几万兵马或死或伤或被俘。41军军长胡临聪、47军军长汪匣锋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兵团司令、杜聿明在黄埔一期的同窗孙元良躲在老乡的床底下才得以幸免，最后化装后逃回南京，而第16兵团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12月7日，邱清泉决定孤注一掷，向南硬攻。2兵团所辖70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高吉人，74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邱维达也同时拍着胸脯“包打胜仗”。在大炮、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敌向华东野战军2纵、3纵、8纵、10纵、11纵的阵地发起了疯狂攻击。然而，在鲁楼这个只有72户人家的极普通的小村庄，邱清泉终于碰上了硬“钉子”。坚守鲁楼的是华野10纵29师。该师师长肖锋给陈毅打电话：“人在阵地在，我们决不后退一步。”

一连数日，敌兵团突围不成，战车部队埋怨步兵部队，兵团与兵团之间也互相埋怨起来。12月10日以后，各兵团预备队

都使用完了,无力再继续进攻,只好原地加强工事,准备固守待援。12月16日,杜聿明接到刘峙的电报说:“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那时,杜聿明虽未知道黄维的所谓“突围”,实际是完全被歼,但他从另一方面考虑,也顿时心凉了半截。

“为什么不令双方同时突围呢?”这是杜聿明接到刘峙来电后的第一个反应。他认为如果南北两个包围圈的部队同时突围,还会有突出去的希望,现在蒋介石只顾黄维,而不顾他手下的两个兵团。黄维被歼后,解放军主力就会移到永城方面来,他们受到的压力就更大,逃出去的希望就更微。

一向骄妄自恃的邱清泉听说黄维兵团被歼,神经紧张起来,只见他两眼发赤,逢人便骂,连他的亲信幕僚也不敢见他。邱在电话中大骂李弥:“作战不力,统驭无方,简直不配背上黄埔学生的招牌!”李弥则反唇相讥:“杜老总尚没有申斥过我,你有什么资格敢来大打官腔?”两人始则在电话中相骂,继则发展到互不见面,犹如仇人。

黄维兵团被歼,邱、李两兵团已被解放军包围了半个月。粮也吃光了,弹药奇缺,真是屋漏锅破,日子难过。加上这年冬天雨雪交加,飞机空投粮弹,每天最多出动120架次,但困在陈官庄方圆20华里的30万官兵,一日之内,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勉强充饥,其余的人只得杀骡马、拾野菜填肚子。而随军西撤的党、政、军人员及盲目随军而行的男男女女,无人照管,自讨苦吃,怨天尤人,但追悔已晚。部分女人只得在空投场的空地里挖一个洞穴,用降落伞张盖,就地卖淫换点吃的食物;蒋军中官兵用手表、戒指、手枪、银元、衣物来交换食物。自古以来的战场,恐怕没有发生过这种怪现象。

在杜聿明被围后,解放军从12月16日起,停止了对蒋军的攻

击。原因有二：一是平津战役已打响，解放军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国民党军南下，故有意要刘、陈大军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对杜聿明在半个月內只围而不打；二是给杜聿明最后一条生路，希望他幡然悔悟，放下武器，以免落入更悲惨的命运。

12月17日，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一个广播稿。这篇广播稿，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此文颇有“现场感”，原文如下：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
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

作无畏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伯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二十七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惟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12月20日,天降大雪,士兵们冻饿而死的极多。伤病员猛增,成班成排士兵摸黑投到解放军一方去。国民党军上下狐疑,惶恐不安。

这时,杜聿明坐在指挥部听说邱清泉拿了一封陈毅写来的信来,便问邱:“内容讲些什么?”邱就用他一向目中无人的态度答道:“共匪还不是那一套,劝降嘛!”邱也不将信给杜看,顺手就扔进了炉子烧了。有一天晚上,杜聿明又接到李弥的电话说:

“陈毅派人带着一封信,从第一线摸进来,是一个被俘去的 13 兵团军官。”杜问:“他说些什么?”李说:“他有点吓晕了,说不出什么来。”杜说:“你看着处理好了。”李又说:“我看有些道理,送来你问问,他也许会说的。”第二天,李弥便把那个军官送到杜聿明的指挥部,杜即交与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黄埔四期毕业的文强讯问。但文强询问过后,也对杜说:“这个人吓晕了,说不出什么道理。”后来从他身上查出了一封信,那就是毛泽东代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杜聿明此时思想矛盾重重。作为一个指挥官,征战 20 多年来,无论是东征、北伐,或是昆仑关抗日、赴滇缅与日军血战,从来没有想到要投降这回事;如今处于这种困境,完全是蒋介石指挥不当造成的。要撤就不能打,要打就不能撤,国防部命令一日数变,弄得他啼笑皆非,这个仗打得真憋气。记得上个月从葫芦岛撤退返北平后,傅作义就劝他去美国治病,他考虑到淮海战场已领命,不能临危退却,于是又赶来徐州参加徐蚌会战,连 11 月 18 日 44 岁生日都忘了过,如今落到这步天地,真叫他进退维谷,只有以死报国了。

杜聿明也没有仔细看那劝降书,他怕部下军心动摇,勉强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把劝降书随便扔到垃圾箱里去了。

1949 年元旦,陈毅又给杜聿明捎信,劝其投降。杜想,如能保住两个兵团的官兵生命安全,也可以同意投降,个人荣辱可以不去计较。他拿着劝降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时,邱夺过信一把撕得粉碎,杜看邱态度如此坚决,也未敢暴露自己的想法。

1949 年 1 月 6 日中午,解放军发动声势浩大地攻击,炮声隆隆,枪声不断。前两天刚刚转晴,蒋介石又恢复了空投,而空投下来的不是粮食弹药,而是近百万份“黄伯韬烈士纪念册”和刊登中共权威人士宣布把蒋介石、何应钦等 43 名列战犯的消息的南京救国日报。杜聿明榜上有名。蒋介石这种做法的目的,

一是想借此激励部属以黄伯韬为榜样,替他而死;另一是警告杜聿明等人,中共已将你列为战犯,非死战到底,别无出路。

这百万份纪念册和报纸在官兵中引起不同反响。杜聿明看了之后,便想:我既被认为“国人皆曰可杀”,除了为蒋而死,还有什么生路呢?这正好堕入蒋介石的彀中。而广大士兵则一顿臭骂:“老子要吃饭,投这些废物有鸟用!”

过了一天,蒋介石来电假惺惺地说:“闻吾弟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疗。”杜聿明苦笑着说:“抛下数十万将士于不顾,我只身远走,何以忍心?”并立即复电给蒋:“生虽残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请钧座决定上策,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

从12月16日起,至今被围已达20多天,将士忍饥挨饿,士无斗志,一击即溃,东西两面许多阵地被解放军突破。杜聿明急电空军轰炸支援。1月6日,70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高吉人负重伤,由副军长邓军林升任军长。7日晚,李弥所在司令部驻地青龙集被突破。9日,杜急电蒋介石派飞机轰炸。10日投“甲种弹”(即毒气弹)掩护突围,向陈庄、刘集地区运动,被解放军发现,于是东、南、北三方炮火更加猛烈,13兵团阵地已大部崩溃,2兵团南北阵地各部队亦纷纷告急。

9日黄昏时分,杜聿明与邱清泉到陈庄第5军司令部,命令指挥部直属部队及战车部队在陈庄以西集结,归文强指挥,幻想在10日等待空军来掩护突围。一到陈庄,解放军的炮弹也跟踪追来,他们赶快躲到掩体内。李弥及第5军军长、黄埔六期毕业的熊笑三等都来了。他们都要求在今晚就突围,其意甚决。杜聿明无法,便说:“如果你们要走的话,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在这里守到底,以免耽误了大家!”一直争吵到晚上10点左右,熊笑三愤愤不平地负气出去了。熊笑三出去后,命令部队朝天放枪,

以威胁杜聿明当晚行动。杜知悉后气极了,反而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逃、突、降”三件事在杜的脑海中反复琢磨,就是拿不定主意。他畏惧、胆怯、懦弱,又顾虑重重,不肯向人民投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杜只好说:“既然都是这样主张,只有分头突围好了。”但李、邱、熊三人都要同杜一道走。杜说:“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赶快通知他们自找出路。”

杜聿明最后向蒋介石发出一电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今晚分头突围。”然后将话报机砸碎,文件烧毁,接着电话线也断了。邱清泉拉着杜聿明冲出掩体,率领特务营官兵就走。李一直向北跑,杜又跟不上,心想要逃也不能跟着大部队走,只有在夜间钻空子跑出包围圈再说。于是,杜带着副官卫士 10 多人,先向西走出村庄,再转向东北,沿途见大批部队整队向陈庄前进,一问原来是 72 军军长、黄埔二期毕业生余锦源的残部。这时四面沉寂,无一枪声,杜走到夏砦附近,此时华东野战军 4 纵 11 师大部队向西运动,杜即躲在战壕内隐蔽起来。副官尹东生给杜剃了胡子,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解放军大部队过去后,杜化装穿上士兵服装,由卫士扶着一直往东北跑。到黎明时分,已走了 20 多里,被一老乡发现,立即报告附近的华东野战军 4 纵 11 师卫生处。协理员胡正林请示处长王英后,派通讯员樊振国、卫生员小崔连忙赶去抓俘虏;杜聿明等冒充解放军,说是送俘虏的,但哪里逃得过樊振国的眼睛,他终于真的成了俘虏。此时,杜聿明企图用枪自杀,被尹副官从旁将手枪夺了过去交给了解放军。

卫生处忙于救伤员,无暇看管这批俘虏,打电话请示师政治部陈茂辉主任,陈主任通知将这批俘虏送到师部。尹东生、杜聿明、张印国 3 人不像普通士兵。陈茂辉单独审问,杜聿明谎称自

已是 13 兵团军需官高文明；陈问他 13 兵团 8 大处处长是谁，杜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从杜聿明身上搜出“骆驼牌”香烟及一支派克钢笔，还有一双象牙筷子，上面刻着“远征军司令杜聿明 40 大寿，龙云赠”，证明“高文明”确系杜聿明无误。杜发觉身份暴露，也只好承认自己就是杜聿明。在被俘后，杜还企图自杀，用石头砸得头破血流，一时昏过去不省人事，后经解放军医院包扎治伤，总算抢救了过来。后来，杜聿明在回忆这段情景时，写道：

……解放军监视很严。这时，战犯这个罪恶名称一直缠绕着我。张印国见我心神不安，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行动艰难，逃出去走不动会死，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见警卫人员离开屋，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

杜聿明被俘后，作为战犯被关押改造，历时 10 年。由于杜聿明在狱中的表现较好，1959 年 12 月 4 日，他被首批特赦释放。1961 年 3 月，杜聿明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晚年他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3 年 6 月，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女士从美国转道日内瓦、莫斯科，飞往北京，与阔别了 15 年的杜聿明相聚，两人在北京一同度过了幸福的 18 年。1981 年 5 月 7 日，杜聿明因病在京逝世，终年 77 岁。5 月 25 日，杜聿明的追悼会在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和邓颖超、乌兰夫等参加了追悼会。杜聿明的长女杜致礼和女婿、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专程从美国赶来向杜聿明遗体告别。杜聿明在台湾的 4

个儿女却因台湾当局的阻挠未能赶回北京为其父送终。

话分两头。再说邱清泉领着特务营,甩开了2兵团参谋长、黄埔六期毕业的李汉萍,一直向北跑去,其他一些兵团司令部的军官也各奔东西,作鸟兽散。

2兵团所辖第5军,军长是黄埔六期毕业的熊笑三。这个军是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军之一,号称“铁甲雄师”,始建于1939年1月,其前身为1937年5月成立于南京的陆军装甲兵团和1938年1月成立于湖南湘潭的陆军第200师,它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支,也是惟一的一支现代化装甲部队。对于这根“独苗”,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当局总是百般宠爱,将其视为命根子和制胜法宝,不到关键时刻绝不动用。

1939年底,初出茅庐的第5军首战昆仑关,便一鸣惊人,重创了号称“钢军”的日本第5师团,因而轰动中外。此后,第5军又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转战千里,迭挫强敌,后因盟国内部矛盾影响及指挥失误而失败,被迫分头撤到滇西及印度,随后经过整编改装,参加反攻滇西之战,其锐不可当,势如破竹,赢得了赫赫战果。

在抗战胜利后,第5军充当内战先锋,疯狂进犯淮南、淮北、苏中、苏北、鲁南、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并在定陶战役、巨野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等历次战役中,多次与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恶战。由于第5军火力强大,机动作战能力强,作风凶悍,擅长于远程奔袭和野战,因而成为中原战场上解放军的一大劲敌。第5军首任军长就是杜聿明,所辖200师师长、黄埔三期毕业的戴安澜、新22师师长、黄埔二期的邱清泉、荣誉1师师长、黄埔一期毕业的郑洞国,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廖耀湘、余韶、刘观龙、黄翔、高吉人、胡长青等黄埔学生都先后在第5军当

过师长；熊笑三是最后一任军长，在这位黄埔六期毕业的小师弟手里断送了第5军的前途，竟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邱清泉在升任2兵团司令官后，才将第5军交给熊笑三掌管。

邱清泉，字雨庵，浙江永嘉人，1902年生，20岁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24年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二期学习，1934年被蒋介石选送到德国工兵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又进入柏林陆军大学研究战术，是一位对希特勒不乏崇敬的黄埔嫡系将领。在军中他以骄横著称，没有多少人愿当他的顶头上司，只有杜聿明才敢用他，但邱清泉也时常顶撞他，不过，邱作战勇敢，因此在军中被人称为“邱疯子”。

1948年6月，蒋介石为对付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成立了2兵团，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兼兵团司令，邱清泉任兵团副司令。10月，杜聿明调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后，邱清泉又升任2兵团中将司令官。除了有第5军外，还有一个王牌军74军。74军当年是王耀武的基本部队，1947年5月在山东孟良崮全军覆灭后，又重新整编组建，由黄埔四期毕业的邱维达任军长，号称“御林军”。另外还有70军，由黄埔四期毕业的高吉人任军长。12军，由黄埔高教班毕业的舒荣任军长。骑兵第1旅、新44师，总兵力达12万人。邱清泉兵团与廖耀湘兵团、黄维兵团号称国民党中嫡系之嫡系，精锐中之精锐。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后，邱清泉兵团从河南商丘向徐州方面开拨时，邱清泉心中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尽管他曾是上海大学和黄埔军校的高材生，素有儒将之称，但他却很迷信，由于他觉得商丘这个地名与他的姓氏相克，是“伤邱”的谐音，因此屡屡请示南京国防部，要求换防，但又不好明言。如今

他已离开商丘这个不祥之地，又来到陈庄，还是没有逃出全军覆没的命运。邱清泉与杜聿明同时出走后，邱已经神经失常，边跑边大声喊叫：“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了！”他刚跑到陈庄西北张庙堂西南400米处，正想喘口气的时候，被解放军设在陈庄外围的阻击阵地的一阵机枪子弹扫中，身中六弹，当即倒地毙命。之后，国民党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这年他刚好47岁。

1949年1月10日上午，淮海战役基本结束。此一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历时65天，解放军先后歼灭了蒋介石精锐部队22个军、56个师（其中4个半师起义），共55万多人。至此，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解放了。

淮海战役，除杜聿明、邱清泉一俘一死外，13兵团司令官李弥化了装混在士兵中，终于逃了出去，于1949年1月底到了青岛；13兵团所属第8军军长周开成、9军军长黄淑、72军军长余锦源，于1月8日在陈官庄投降后被释，他们又回到国民党的营垒中；邱清泉的2兵团所属5军军长熊笑三（黄埔六期）、70军军长高吉人（黄埔四期）、副军长唐化南，经化装成伤兵逃了出去；“剿总”直属12军军长舒荣最初下落不明，后来也侥幸漏网；徐州“剿总”副参谋长文强（黄埔四期）、74军军长邱维达（黄埔四期）、64军军长刘镇湘（黄埔五期）、85军军长吴绍周、10军军长覃道善（黄埔四期）、41军军长胡临聪、47军军长汪匣锋都先后被俘，51师师长王梦庚于突围时被解放军击毙；而师长以下军官被俘者不计其数。这些当年在黄埔军校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军中骄子、天子门生，居然被没有进过军事学府的“土八路”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其中原因何在呢？

谁都知道，政治影响着人心，而人心之向背又是战争胜负的主要条件之一。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人所共知，就是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杜聿明被围之时，蒋介石曾召见他的

特派战场视察官、黄埔高教班、陆军大学毕业的李以勳，要他汇报视察徐州战场情形。李以勳如实提到解放区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情形，又说老百姓为解放军运粮弹、抬单架，络绎于途，人人乐于其事。而国民党政府不知组织群众、动员群众，老百姓见了官就恨，见了兵就跑，部队行军时甚至连带路的人都找不到。蒋介石听了后，叹气地说：“敌人政治是比我们强，组织宣传、开批评小组会、嫉恶如仇，都是优点。我们的政治工作太差，缺乏得力的干部。我已令雪冰（邓文仪、黄埔一期毕业生，时任国防部政工局局长）好好研究，取敌人长处，补自己不足。你也应随时收集各方意见，才能以组织对组织，订出良好方案来。”蒋介石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全国政治腐败，经济萧条，物价飞涨，贪污成风，官场勾心斗角，部队派系林立，战场上互不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再多订出一些自以为是“良好”的方案，又有何用呢？

蒋介石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即全面调整部署，将未歼灭的沿淮军队，步步南调，以图保其南京外围。对于已被歼灭的单位和部队，除兵团、绥区一级撤销之外，三分之二以上的军和师，均决定重建，以图重振旗鼓，与共军作最后垂死挣扎。

对于淮海战役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刘峙，当初就有人给他算了命。“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守不住。”刘峙是有名的“福将”，每次打仗，都能逢凶化吉，这次在淮海战场上却输了个精光；蒋介石恨刘峙无德无能，贻误大局，遂解除其职务。刘峙在下台后，带着他的三姨太，先后逃到上海、南昌、吉安、广州、九龙，在九龙被当地黑社会头目洗劫一空，竟穷到无以为生的地步。1953年1月，经何应钦说情，蒋介石批准刘峙回台湾。1954年1月，委任他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实际上既不顾也不问,只好在家里写了一本《我的回忆》。1971年1月15日,刘峙病逝于台北,终年79岁。

杜聿明手下的13兵团司令官、黄埔四期毕业的李弥,云南腾冲人,字炳仁,号文卿。李弥曾是朱德的部下,1927年初私自离队逃跑,混迹于四川,加入22军任营长,后任59师350团上校团长,1932年驻防湖南永丰时,突遭陈诚袭击,以作吞并之举。李弥率部突围后,被蒋介石编入周浑元的第5师,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4次和第5次“围剿”;1936年任江西瑞昌县县长,保安10团团长;在抗战后期,他官运亨通,已升任至第8军中将军长。李弥打仗很骁勇,长沙会战、昆仑关之战、枣宜之战,其表现均不俗。后来他又开赴滇西,纳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参加在滇西反击日军的战斗。松山一战,全歼凭强固工事顽抗的日军,他表现了一个军人的奇勇与大智,为此很让当局赞叹了一番。

这次为解救黄伯韬兵团,李弥也很卖力。前线部队打到离碾庄圩只有30里的地方,实在打不动了,这确实不能怪李弥无能。此后国民党高级将领都很纳闷,为什么集中两个兵团之兵力都不能解碾庄圩之围?黄埔四期毕业的文强在读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华东野战军使用了一半以上的兵力用来打援,其兵力数倍于敌军,共产党从不打无把握之仗。因而认识到国民党指挥决策部门估计对共产党部队过于轻妄。

在淮海战役结束前夕,即1949年1月9日晚,李弥起家的41师,在四面楚歌声中,放下了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了,这使李弥大失所望。部队所在地的青龙集已被攻破,致使他和杜聿明、邱清泉三人分头逃命。在13兵团残部最后向解放军接洽投降之际,李弥化装成伤兵逃出包围圈,后辗转经济南、潍坊来到青

岛,从海路逃到南京,再到浙江奉化。他应蒋介石之召,对蒋面陈淮海战场失败之惨状。李弥以败军之将无颜面对主子,深感内疚,但蒋非但不加罪于他,反而慰勉有嘉。原来,大厦将倾,国都不保,怎能怪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呢?再说李弥是云南人,西南是大后方,蒋介石需要他担当重任,要李弥任第13编练司令部中将司令官,并兼任重建的第8军军长。1949年6月,李弥经广州到达昆明,云南省政府不表示欢迎,只得将司令部移住重庆。蒋介石曾对李弥有密嘱:“云南政局不稳,卢汉不可靠。西南是反攻的最后根据地。云南地位很重要,要保住通往缅甸的交通路线。你到云南,把第8军带往昆明,时机成熟就改组云南省政府,扣押卢汉,由你当云南省主席。”

李弥有这把“尚方宝剑”,他作了不少逃往滇西的准备,并公然宣称和共产党水火不相容:“就是打到野人山,也要与共产党周旋到底。”

1949年12月9日,卢汉以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军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9时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第8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李弥,第26军军长、黄埔一期毕业的余程万,师长石补天,空5军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黄埔四期毕业的李楚藩,军统云南站站站长沈醉等人。在人到齐后,警卫营长龙云青将李弥扣押。晚10时,卢汉在五华山宣布“云南起义,昆明戒严”的命令。次日,省民政厅长杨文清把被扣军政要员一一请上三楼,拿出事先拟好的起义通电,让他们一一签名。李弥签字后回到四楼,在见到沈醉后,他便热泪横流地说:“你看,闹成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对得起人?不如死了算了。”说完,要从四楼窗口跳下去。沈醉一把抱住他,经再三劝慰,他才慢慢平静下来,但仍然气愤地说:“他妈的,要起义,老子自己不会起?要等别人牵着鼻子干!”

起义通电发出第三天,8军、26军不但没有按起义通电要求服从卢汉指挥,反而开始对昆明发动进攻,当时形势岌岌可危。卢汉让云南保安旅旅长、黄埔八期毕业的龙泽汇陪李弥的妻子龙慧嫫来见李弥,希望李弥通知部下不要打,听候改编。李弥按龙泽汇要求写信;但他又趁人不备,忙在龙慧嫫的旗袍上写下与刚才信上内容完全相反的意见。龙慧嫫返回第8军通风报信,8军少将参谋长、黄埔六期毕业的杨也可会同师长带部队进逼昆明,要求卢汉放人,否则焚城。卢汉被逼,只好放虎归山。李弥回去后,卢汉急电刘伯承、邓小平,请求速派大军增援。杨勇率5兵团借用起义部队的军车,星夜奔赴昆明;李弥见大军压境,不敢恋战,于1949年12月22日逃窜到滇西蒙白一带。

1950年1月,李弥的第8军在元江被解放军歼灭,他率残部800多官兵逃到缅甸、老挝和泰国交界处的金三角地带,同行的有8军237师709团少将团长李国辉。他们在经历种种苦难后,于4月2日才走出莽莽原始森林,在那里巧遇26军93师278团残部600余人,带头的是副团长谭忠。两支残军会合后,扯起了“反共”大旗,在金三角安营扎寨,招兵买马。蒋介石在台湾召见李弥,封他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李曾两次袭击云南边境,均被解放军击退。李弥的妻子龙慧嫫在畹町被释放后,与8军副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柳元麟、第6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傅克军、师长李彬甫等偷越国境,与李弥会合,在金三角苟延残喘。1953年2月,缅甸在照会李弥残军时,要其撤出孟布,李弥不作理会,于是缅军发动萨尔温战役,向李弥残军总部发起大举进攻,但未取胜。缅甸无奈,遂向联合国控诉蒋军残部及其幕后指挥者。在各国舆论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迫使蒋军残部全部撤往台湾。

李弥不愿撤走,一再叮嘱部下“坚决反对撤往台湾”,但是,

无可奈何花落去,尽管李弥反对撤台,但在1953年11月18日开始他也只得用美国陈纳德的民航运输公司的飞机来运送手下残军撤往台湾。先后撤退的有李弥的总部、“反共抗俄大学”、26军军部、93师、193师、10纵队、4纵队、18纵队、21纵队,共计官兵5473人;另有家属1030人,整个撤退工作一直延续到1954年3月。

蒋介石在李弥残军撤台后,将其残部改为“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任命柳元麟为总指挥,彭程等为副总指挥。1957年初,经柳元麟搜罗残军4500余人,李弥则潜居泰国,对其遥控指挥,继续与人民为敌,后改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总部”。

李国辉的部分残部留在金三角地带种植鸦片,用武装来保卫,并大规模生产、加工、制造海洛因,向世界各地倾销。在黑社会头目的支持下,金三角的鸦片走私活动十分猖獗,因此李国辉等残余蒋军在缅甸成了巨富。他们在曼谷、仰光、纽约等地均设有地下贩运机构,成为世界上头号毒枭。目前李国辉的后代已进入第三代,仍然在金三角经营毒品。

李弥虽有“忠蒋”之心,但蒋介石却以李弥是吴奇伟的连襟而不复重用。他只能闲居台湾,做“国大代表”、“中央评议委员”、“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等闲职。1973年10月李病逝于台湾,终年71岁。正是:反共救国已无望,经营毒品来称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桂系逼宫 蒋介石三次下野 平津战役 聂荣臻兵临城下

话说淮海战役自 1948 年 11 月初开始，刘峙统率的国民党嫡系部队节节战败，到 12 月底，杜聿明集团最后被消灭的命运，已经明显地看得出来了。经过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蒋介石的精锐兵力已经消耗将尽。蒋急电华中坐镇的白崇禧，想调宋希濂的 14 兵团前往徐州增援；蒋亲自打电话，与白在电话里吵了半个多小时，蒋气得满面通红，将电话摔在桌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白崇禧系桂系军阀出身，他与桂系首领李宗仁情同手足。李、白还是黄埔军校的校务委员；李还兼任过南宁分校的总负责人，与黄埔师生有一定的渊源。1948 年春，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由北平来到南京上任。蒋为把李、白分开，专在华中设一“剿总”，免去了白的国防部长之职，遗缺由他的亲信、“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何应钦充任。白去武汉就一肚子不高兴，而如今又要抽他的部队支援徐州，白当然不惜采取同蒋决裂的态度，力阻 14 兵团东调。其目的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被消灭，这样，他就可迫蒋去职，由李宗仁取而代之。

12 月 24 日，白崇禧自武汉给蒋介石发出“亥敬”电，内容是：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

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竟会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重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蕘: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白崇禧的通电话语气尚和缓,但驱蒋的态势,咄咄逼人。紧跟着,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直率地提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蒋介石目下处境,真可谓四面楚歌,内外交困。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宣布了包括43人在内的头等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勱等,均榜上有名。另外黄维因在淮海战役中施放毒气,也补列进去,共计43名。这名单由新华社发出,蒋介石于当天就从收音机中听到,他称之为“哀的美敦书”,意即“最后通牒”。蒋介石别无选择,只有下野了。蒋介石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在痛苦中度过圣诞节。“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能在夜晚入睡,他服用了多年的烈性安眠药,可也不灵了,于是他开始酗

酒,每天夜晚都要喝一杯半的威士忌酒。

一个极不愉快的圣诞节过后,从美国又传来宋美龄访美一败涂地的消息。杜鲁门夫妇约见会晤仅半个小时,杜鲁门总统说:“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40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宋美龄愤愤地离开华盛顿,再次到纽约弗代尔的孔祥熙家别墅隐居起来。从此,她再未踏上回国之路。

12月30日,白崇禧又对蒋介石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电云:

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桂系步步紧逼,蒋介石当然知道,白崇禧有美国人的鼓励,否则,李宗仁、白崇禧也不会如此大胆。美国弃蒋而扶李,很使蒋介石冒火,也使他想起了流氓手段,决定在必要时将李宗仁除掉,迫使美国人死了这条心。于是,一个暗杀李宗仁的秘密计划,交给了国防部保密局局长、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的毛人凤去执行。

毛人凤乃浙江江山人,字齐五,1898年生,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5年3月,他经其弟毛万里介绍,进入复兴社特务处。因是戴笠同乡,受戴笠宠信和重用,此后一直在军统局、保密局任职。在戴笠死后,毛人凤已成为蒋介石的特务情报机关头子,因监禁、屠杀、暗害共产党人、民主人士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毛人凤立即电召云南省站站长沈醉来南京;沈醉抵达后,由保密

局总务处处长成希超把沈拉上汽车，一同驶往傅厚岗那条马路上的“诚庐”，毛人凤就在这里传达了秘密指示，并与沈醉同去晋见蒋介石。蒋介石接见沈醉时，态度极为和蔼，先询问云南省站工作，又询问沈醉家庭情况，最后才讲到本题，蒋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能打胜仗。我们却有两三个敌人，几方面要对付，困难就大得多。”最后又叮咛沈醉说：“这项工作关系到党国安危，绝对不能泄密。”毛人凤为此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组”，专门抽调了几名“神枪手”以摆书摊为掩护，长期住在李宗仁居住的宅院附近，待命行动，后因将李宗仁推上前台，这一暗杀计划才没有实施。

圣诞节以后的几天，是蒋介石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他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得不作“引退”的打算。“引退”后的一套幕后控制计划，由军事部署到人事安排，都得在走之前加紧完成。前不久，蒋介石正式公布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这是蒋准备下台的重要人事安排。吴忠信真乃名副其实。对蒋可称得上既忠且信，在李宗仁身边安上耳目，李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蒋的眼睛。12月28日，平津战役爆发，蒋电召阎锡山、胡宗南、卢汉来京有所指示。29日，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以便留条后路。一系列人事安排正在加紧酝酿，总之，蒋介石在“引退”前，要把党、政、军大权仍然牢靠地握在手中，不让李宗仁夺走权力。1948年12月30日，他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他的长子蒋经国小心翼翼地日夜守护在忧心忡忡的父亲身旁，惟恐引起不测。

一篇元旦文告，虽再也不能由“文胆”陈布雷捉刀，但几经“核心人物”一再修改，最后总算定了稿。12月31日，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氛。蒋介石在这里举行除夕晚宴。到会的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

冠贤、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常委张群、陈立夫、谷正纲、张治中、邵力子、张道藩、蒋经国、王宠惠、贺衷寒、吴铁城等40多人。这时蒋介石出来,招呼人们就座吃饭。辉煌耀眼的彩灯,映出一个个忧郁的阴沉面孔,无人谈笑,惟闻杯盘盏碟相碰之声。饭后,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蒋讲话时板着面孔,张群读毕,全场鸦雀无声。

这篇文告,出自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之手。自陈布雷“杀身殉蒋”后,蒋要发表什么文章,只能依靠这位由杨永泰一手提拔的“江西才子”了。洋洋数千言的文告,虽有求和之意,但发自蒋之口,其内容就与时势大相径庭了。蒋在元旦文告中强调: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无人说话,蒋只好点将。他扭头对坐在右手的李宗仁说:“德公,你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答道:“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这时,CC派的骨干分子谷正纲、张道藩等人语带悲声,反对发表这个总统有下野表示的文告。曾向蒋建议过和谈的张治中似乎有点坐不住了,忙站起来辩道:“现在仗都打到这地步了,党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实一点吧,继续打下去,只能是让将士

们去送死,后果将不堪设想,死无葬身之地。抓住这次机会,与毛泽东和谈,我们起码能保存半壁江山,我同意马上发表这个和谈文告。”肖同兹、范予遂随声附和,并公开要求蒋下野。谷正纲等则嚷着:“我等诸人,跟随总统多年,誓死也要捍卫总统,想和谈的人快滚开!”会场顿时乱了。蒋介石在他们争论不休时,忙出来打圆场:“我下野好了,让你们去和谈,我这个总统也当够了!今天我们是就文告发表看法,下野之事,待后再议。”当争论蒋介石应不应公开表示下野时,蒋介石火冒三丈,破口大骂道:“我并不是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职,我之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他又对张群说,有关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言毕,蒋即愤然离开了宴会厅。后来人们把这次宴会取名为“最后的晚餐”。

就在南京政府内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1949年1月5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一篇文章,揭露蒋介石是企图利用和谈来保存反革命实力。蒋经国后来回忆说:父亲叫他读毛的这篇文章,当读到“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其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时,父亲长叹一声,摆了摆手说:“算了吧!别念了!”

1月9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会战结束,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被击毙,13兵团司令官李弥逃脱,蒋介石的55万精锐被歼。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杜聿明今晨似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出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1月10日,蒋派长子经国持他的亲笔信去上海找中央银行

总裁俞鸿钧，令俞立即将去年8月19日依靠发行金圆券强向人民兑换得来的黄金、白银和外汇，价值3亿7千多万美元移存台湾，留20万两黄金给汤恩伯，以供军事开支。

1月12日，蒋介石派蒋经国率领总统府军务局局长、黄埔一期毕业的俞济时，警卫组主任、黄埔一期毕业的石祖德等秘密到奉化溪口，布置警卫；在武岭临溪南端的小洋房屋顶架设天线，布设通讯网，为蒋退居幕后预做准备。

1月14日，中共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蒋介石视这八项条件为要他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蒋介石知道，用尽一切花招都无法再兜售假货了。紧接着，解放军于15日解放天津，陈长捷、林伟俦等13万余国民党军被歼；17日解放塘沽，蒋军5万余人由海路逃脱。

1月18日，蒋介石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命令“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汤恩伯专任总司令。这表示蒋要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东地区的军事指挥权，积极布置由湖口至上海间的长江防务，从而透过亲信且死硬的汤恩伯，把江南军力紧握在自己手中。蒋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台湾警备司令，薛岳继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这些人全都是蒋认为可靠的角色。蒋的人事棋局全部摆好，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公”位，准备让李宗仁坐进去。

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午后4时10分，乘坐“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他吩咐驾驶员依恩复绕空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前两次下野，他都抱有东山再起的信心，而今他心中清楚，再难有还都“登极”之日矣！待李宗仁带领一班文武大员赶到机场送行时，蒋介石已悄然飞去了。当天下午5时25分，蒋的专机降落

在杭州笕桥机场。晚9时,中央社将文告重新播发。经过修改,蒋介石的下野文告略谓:“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并勸勉“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

蒋介石虽然将“下野”改称“引退”,但时刻也未放弃与共产党决一雌雄的信念。就在21日离开南京之前,他在严密的戒备之下,驱车到了中山陵拜谒。他面孔严肃地站在中山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表。距抗战胜利还都,3年不到,江山易手,他怎能不悲愤懊丧呢?蒋介石在从灵堂出来后,和首都卫戍总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张耀明、副总司令、黄埔二期毕业的覃异之以及首都卫戍副总司令兼45军军长、黄埔一期毕业的陈沛等人一同照了相。然后又对他们说:“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奋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及西南广大地区,比在黄埔革命时的基础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扬黄埔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一定可以转败为胜。”

蒋介石最爱把“黄埔”这块招牌挂在嘴上,特别是对军人讲话,几乎每次必提黄埔。他确实也靠黄埔起家,但黄埔师生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陈赓、周士第等在挖他的祖坟,掀他的台基。这时聂荣臻、林彪又攻下天津,陈毅又占领合肥,解放军打到了长江边上,京畿首都危在旦夕。这说明黄埔师生不是铁板一块,几家欢乐几家愁,心情迥然不同。覃异之后来赴香港起义,当时他送走了蒋介石,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隔江烽火逼京都,立马中原负霸图;
惆怅秦淮拼一醉,自来难得是糊涂!

因为蒋介石的客厅挂有于右任写的对联：“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故覃诗有此第二句。从覃异之这首诗看，也反映出当时南京的一种灰暗没落的气氛。

蒋介石到达杭州后，浙江省主席陈仪尽地主之谊，假西子湖畔的“楼外楼”设宴接风。陪宴的除陈仪外，还有蒋经国、俞济时、陈诚、汤恩伯等高级将领。蒋介石面对摆在他面前的、平时很爱吃的西湖醋鱼，却不伸筷子。陈仪见蒋介石食不下咽，便劝说道：“要拿得起放得下。”这句话挫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蒋的欲望是权力要永远由他“拿起”，如今下野也并非真是“放下”。蒋一怒之下，饭不吃了，并且决定不到他经常下榻的西湖“澄庐”去住，当晚即宿在笕桥的空军军官学校俱乐部里。他说是明日乘飞机去奉化方便，实际上他已对陈仪产生怀疑。1948年12月，当淮海战役蒋军败局已定时，陈仪曾上书蒋介石说：“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矣！”蒋当时就对陈仪不满。蒋在回到奉化溪口后，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密，说陈仪曾策动他起义投共，蒋遂即命令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将陈仪秘密逮捕，并押送台湾。1950年6月，陈仪被蒋介石枪毙。其实，在西湖“楼外楼”，陈仪口不择言，蒋介石就已对陈埋下杀机。汤恩伯原是陈仪的部下，两人都是浙江武义同乡，私人恩惠甚厚。陈仪凭借这些关系，想策动汤率部和他一同起义，结果反而被这位同乡断送了性命。

蒋介石于1月23日飞抵奉化栎社机场，这是他第三次、也是在大陆最后一次“下野”了。他又住进了其母王夫人的墓庐“慈庵”。表面上，蒋介石为一介平民，闲云野鹤，寄情于山林泉石之间，其实，他隐而未退，通过溪口小洋房上的天线，对半壁江山继续发号施令。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张治中、黄埔一期毕业执掌军事大权的宋希濂、胡宗南、关麟征等都曾来过溪口聆听

“训示”。

且说正当蒋介石、李宗仁争夺名位，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军委几位负责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正把目光投向华北。在北平、天津、张家口这三角地带，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有4个兵团、13个军，连同地方保安团，总共有兵力60多万人，是一块“大肥肉”。傅作义的军队东起塘沽西至张家口，沿着长城摆下了东西一千多里的一字长蛇阵。辽沈战役的巨大胜利，淮海战役的顺利发展，使傅作义集团更加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他们已预感到东北野战军向华北解放军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将落在自己头上，因而惊慌异常。此刻内部矛盾重重，嫡系与非嫡系军队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使傅作义在指挥上举棋不定。蒋介石想将傅作义集团的兵力全部由海上南撤，以保存实力，巩固江南防线。而美国惟恐丧失它在天津的利益，主张支援傅作义坚守天津，牵制东北与华北两大解放军。傅作义对南撤也有顾虑：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的部队又多是绥远人，海运宁沪时间不允许；陆上撤走，几十万军队连同物资，要经过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通过黄河天险，而且又有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堵截，也很难实现。因此，傅作义想西撤绥远以保存实力，或固守天津，万一天津不保，部队还可从塘沽乘船逃跑。

1948年11月上旬，傅作义专程赴南京与蒋介石专门就平津地区防务问题作了研究，初步确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傅作义回北平后，并未完全按蒋介石的意图办事，他把蒋的黄埔嫡系24个师部署在平、津、唐三角地带，保障从海上南撤的通道和抵抗东北野战军的攻势，而把自己的20个师部署在北平与张家口之间，以保障西撤绥远的通道。

根据这个部署,傅作义的部队配置在三个防区。一是张家口防区:由孙兰峰的11兵团负责,下辖105军及35军,共8个师。105军军长袁庆荣及35军军长郭景云都是傅作义的基本队伍。第二是北平防区:由4兵团司令官、黄埔一期毕业的李文兼北平防守司令,下辖16军,军长是黄埔一期毕业的袁朴、94军(军长是黄埔三期的郑庭烽)、92军(军长是黄埔五期毕业的黄翔)。9兵团,兵团司令官是黄埔三期毕业的石觉,下辖13军、31军,共5个师,系台湾所练新军。第三是津沽地区:由17兵团负责,兵团司令官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侯镜如,他还兼任津沽防守司令。天津防守司令由陈长捷负责,下辖62军(军长林伟俦是黄埔四期毕业生)、86军(军长刘云瀚是黄埔七期毕业的小师弟),另有94军及交警10总队等部队。

而解放军方面,中央军委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组成平津前委和平津前线司令部,统一指挥东北、华北解放军。华北解放军的19兵团、20兵团共7个纵队,以及地方骑兵、步兵部队,统计约20余万人,即迅速从平绥线上展开。而东北解放军12个野战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共计80余万人,亦乘胜倾师入关。这两支解放大军合起来成为百万雄师。林彪的4野入关,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路为山海关,中路为冷口,西路为喜峰口。辽沈战役一结束,4纵及11纵便组成先遣兵团入关,他们夜行晓宿,早就到了冀东地区,隐蔽待命。其余2纵、7纵、8纵、9纵、12纵及炮兵纵队则从冷口入关,一部分仍由山海关入关。林彪的4野80万大军、10万匹战马、成千门大炮以及从日本关东军、蒋介石的国民党军方面缴获的大量武器和装备,与傅作义的军队相比,不但军队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政治素质、武器装备上也占优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林彪任前委书记兼4野司令员,黄埔五期毕业的陶铸任4野政治部副主任,黄埔六期毕业的陈伯钧

任 12 兵团副司令员,黄埔四期毕业的唐天际任兵团政治部主任,黄埔六期毕业的程子华任 13 兵团司令员,黄埔一期毕业的彭明治任参谋长,黄埔五期毕业的莫文骅任 14 兵团政委;而聂荣臻则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平津战役的负责人之一。

平津战役采用的战略,既不同于辽沈战役的“关门打狗”,也不同于淮海战役的“中间突破”,平津战役的打法是采用“声西击东”法。毛泽东的“声西击东”战略,是佯装攻西南的北平,而真正的目的是取东面的天津。也可以称之为先斩头去尾,然后再吃中间,目的是使华北的蒋军,既不能西逃,也不能南撤,即先予以扣留,再加以解决。辽沈战役是先南后北,而平津战役则是先西后东。

1948 年 12 月 11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要我军在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县),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再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在整个部署完成后,“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并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在这期间,军委决定利用傅作义企图派人与我谈判拖延时间的机会,将计就计,准备同他谈判,以稳住敌人,不使其下决心逃走。

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东北野战军 2 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经过 9 天的急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北平以东的石门、马伸桥、赵各庄地区休整待命;1948 年 11 月 29 日,华北军区 3 兵团对张家口守敌进行围攻,占领了周围地区,打响了平津战役第一枪。傅作义果然上当,急调 35 军连夜乘汽车从丰

台、怀柔西驰增援,再调 107、16 两军分驻怀来和南口,以加强戒备。华北军区 2 兵团罗瑞卿于 12 月 2 日由易县向涿鹿、下花园急进。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等部从蓟县向怀来、南口等地进击,切断了平张铁路,并将沿线敌军分割包围起来。此时,东北野战军主力行将入关,先遣兵团程子华攻占密云,罗瑞卿在涿鹿以南、北平以西活动,引起傅作义的忧虑,于是他从津塘地区调回 3 个军,加强北平防务,又令 35 军立即回撤,至新保安时被罗瑞卿的 2 兵团包围。中央军委指示平津前线部队,在两星期内对张家口、新保安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等地隔而不围,以此来动摇傅作义决策先逃的决心。东北野战军林彪主力从喜峰口、冷口、山海关入关,向南急进。12 月 20 日,东北野战军 4 个纵队和华北军区 1 个纵队,攻占北平周围地区及南苑机场,将北平包围。6 个纵队占领天津周围地区,切断平津与津塘间联系,构成对天津、塘沽的包围;另以 3 个纵队陆续赶来参加作战。这样,林彪、聂荣臻、程子华、莫文骅这几位黄埔出身的解放军将领,完成了对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包围任务,接着,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办法,依次歼灭了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等地的蒋军,因而北平陷入了孤立。12 月 22 日和 24 日,解放军先后攻占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将傅作义的 35 军基本消灭。

为进一步孤立北平,解放军决定先打天津。1949 年 1 月 6 日,林彪、罗荣桓给天津守敌写了一封劝降信: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

“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林伟俦看信后,找到刘云瀚。刘一目十行地看完信。两位军长都不讲话。接着两人一同去看陈长捷。陈看信后,叫副司令秋宗鼎打电话找天津市长杜建时。杜也曾在黄埔军校长沙分校任过主任,河北杨村人,美国加州大学法学博士、东北讲武堂毕业,有博士将军之称。5个人碰头之后,你看我,我看你,沉默了许久。由于送信人还在外面等着回音,陈长捷说:“复信,给他们写封信,礼尚往来嘛?”这5人中,只有陈长捷是非黄埔出身,但他也像黄伯韬一样,要在战场做出一个军人的“典范”来给这些黄埔学生看看,于是命秋宗鼎拿起笔。由他口述写道:“林彪、罗荣桓二将军: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然而未出三日,陈长捷沉不住气了,见大军兵临城下,凶多吉少,只得派代表出城与解放军商谈。

1月9日,刘亚楼参谋长接见了出城的代表毕鸣岐等4人,重申天津守敌必须在11日8时前放下武器。次日,敌部代表第二次出城,要求宽延期限。解放军以大局为重,准其推迟到12日18时前放下武器。以后敌部代表一再要求推迟,说陈长捷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林伟俦、刘云瀚两位军长有些犹豫,要求携带轻武器回南方去。

解放军认为陈长捷无诚意投降,决定于1月14日攻城。经过了一昼夜的巷战,天津守敌阵地已多处被攻下,到15日早上,最坚强的敌军支撑点海光寺亦被解放军占领了。解放军4野1纵的右翼主力师已打到陈长捷的司令部。蒋军据守院内的窗口、墙角,凭借着沙袋叠成的掩体,继续顽抗。于是在司令部内,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杀战。解放军从院内打到屋内,从楼下打到楼上,逐屋争夺,逐步推进,蒋军或死或伤,次第被歼。

陈长捷等人的指挥中心,不在楼上,而在地下室里。傅作义

在广播中听到解放军已突入天津的消息,主动打电话来询问战况。正当陈长捷汇报战况时,解放军已进入地下室,战七一声猛喝:“缴枪不杀!”在微弱的灯光下,7名蒋军军官颤抖地举起手来,其中有4人是将官。其时只听一人道:“我们缴枪。请你们的一位长官来,我好交代一下,即刻通知部队不打了。”此人就是天津警备司令兼天津城防司令官陈长捷。

天津本是蒋军经过长期设防的大城市,在战事发生之前,蒋军将领自恃为坚城强垒,可以固守,至少可以守两三个月,绝无问题。可是,解放军自1月14日上午10时发起总攻后,只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便攻克了。天津市长杜建时、62军军长林伟俦被俘。解放军全歼天津守敌13万多人。17日,塘沽守敌5万余人乘船南撤,人民解放军于当天解放塘沽。

就在解放天津的前一天,即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作为同南京和其他国民党地方政府以及军事集团进行和谈的基础,同时指示解放军,对于敢于顽抗的蒋军,予以坚决地消灭。这就是平津战役创造的两种解决办法:和平解决的办法和军事解决的办法,二者须择其一,此外别无他途。后来史书上称为“北平方式”和“天津方式”。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创造了一种“绥远方式”。蒋介石的800万军队,都是通过这三种方式加以解决的,当然,从海上逃到台湾的蒋军,另当别论。

当解放军攻克天津之时,北平孤城已足足被围了一个月,不但郊区早已由解放军占领,连水电都为解放军所控制,实已守且不能,遑论再战?

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早在1948年春就在中共中央和聂荣臻的领导下着手进行了,这是毛泽东下的一步“暗棋”。这一步“暗棋”是极端秘密的,直到若干年后才渐渐透露真相。

影响与策反傅作义的有三个人物,一是傅作义的结拜兄弟、保定军官学校同学曾廷毅,再一个就是傅作义的同乡杜任之,第三个是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傅冬菊原本在天津《大公报》工作,在那里秘密加入了中共,后来党组织调她到北平工作,以争取她父亲投降。所以,毛泽东坐在西柏坡的土屋炕上,就能了解傅作义的一举一动。傅冬菊第一次试探父亲的态度时,说是有个共产党同学愿与他商谈和谈之事。傅作义当即反问:“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当傅冬菊再三说明她的同学是真共产党后,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初次的试探,傅冬菊发觉父亲是有与共产党合作之意,因为如果他无此意的话,就会一口回绝。

天津解放,北平震惊。傅作义有受降的意向。他在众人的策动下,终于派出了他的副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秘密出城与林彪进行谈判。林彪则派出参谋处长苏静作为联络代表,又随邓宝珊秘密进入北平。傅作义的长女在这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9年1月22日下午6时,傅作义的代表阎又文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会上宣布傅作义总司令的文告,公布中共和他和平解决北平之双方协议。于是,秘密谈判也公之于众。从这天开始傅作义将20万军队撤离北平市区,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改编。

在公告发布之前,即1月21日,傅作义召集“剿总”军以上人员宣布决定接受和平改编办法。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将领李文、石觉、袁朴等人觉末日已临,都当场痛苦流涕。事后,李文立即召集石觉等人开会,决定抽调师长以上军官,并由每师抽出轻机枪50挺,分乘4架飞机南逃。但92军军长黄翔和该军各师

师长张伯权、周中砥、王凤歧(均黄埔生)已决定不再随蒋,所以留平不走。李文、石觉、袁朴、冯龙、陈鞠旅、周世寅、郑庭烽(也都是黄埔生)等高级军官离开北平南飞。傅作义也表示:“去留自愿,决不强迫。”

傅作义在宣布了接受和平改编办法后,其所属部队自1月22日起开始移驻城外,至31日移动完毕,至此,平津战役即宣告结束。

1949年1月31日,4野41军政委、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莫文骅带领121师的干部战士,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与原在城内执勤的傅作义部队交接防务。从此,臂带“平警”臂章的解放军战士在北平城门站岗,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在天安门城楼上飘扬。

2月3日,北平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原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原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平津卫戍司令部司令员聂荣臻;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北平警备司令兼政委程子华;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4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以及黄埔出身的彭明治、莫文骅等人都参加了这一盛大而隆重的人城仪式。北平,这座古都在一片和平的气氛中,获得了新生。

4野41军政委、黄埔五期毕业生莫文骅当天信手写诗一首:

乘胜高歌入长城,横扫平绥数万兵。
严冬军势如风卷,传檄和平接古京。
为遵群纪啃冰馍,忍寒甘卧水门汀。
秋毫无犯人歌颂,红旗高举向南征。

正是:三大战役奏凯歌,古都飘扬胜利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和谈破裂 雄师百万过大江 风卷残云 陈毅穷追汤恩伯

话说历时 64 天的平津战役结束了。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共歼灭、改编国民党军 52 万余人，解放军伤亡近 4 万人。解放军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广大地区。

国共主力进行决战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历时 142 天，蒋介石部队被歼灭的总数为 154 万多人。蒋介石的“五大主力王牌军”基本被消灭。由他一手培养起来的黄埔嫡系将领如范汉杰、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王耀武、李仙洲、邱清泉、林伟俦等死的死、降的降、被俘的被俘；不到半年时光，国民党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以致溃不成军，无力再战。

1949 年春，南京《益世报》主笔段念慈透露这样一则政治测字趣闻：该报采访主任罗祖光特地找他报社一位编辑为蒋介石测个字：问蒋什么时候下台，而且就以“蒋中正”三字进行测算。编辑默然一想，便把“蒋”字的“艹”头和“正”字“一”头，拆为“艹将中一止”五字，然后理顺为“艹一将中止”，而其中“正”字可暗应“元月”。因此，这位编辑断言说：“一月廿一日将下台。”接着，这位编辑还分析其中巧合与哲理，说明此字必验。果然言中，蒋介石于 1949 年 1 月 21 日宣布“引退”。此权作笑谈资料而已。

且说蒋介石在返回奉化溪口后，适逢农历除夕，他全家在“丰镐房极本堂”团聚度岁，吃辞年饭，这是蒋介石 36 年来第一

次在家度岁。专程赶到溪口躬逢其盛的，有张群、陈立夫、郑彦棻等党国要人。大年初一，蒋介石在溪口召见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先行迁至广州。溪口小镇，取代了六朝故都南京，成为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蒋也成为世界上最忙的闲人。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蒋把李宗仁推上前台后，他一心在幕后操纵政治军事大事，妄图利用李宗仁和中央敷衍和谈以赢得时间。蒋在溪口调兵遣将，重新编练二百万军队，以备反攻之用。他在溪口召见“黄埔八大金刚”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兵力约25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兵力约45万人。

李宗仁上台之后，行政院长孙科就跟他唱起反调来，孙科在1月19日以行政院长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说行政院要迁往广州，要各国大使随迁。果然，孙科于1月29日起，把行政院迁到了广州。这样，国民政府也就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这样，就连李宗仁也不得不称此为“一国三公”。“府院分家”，政令不统一，李宗仁处此困境，但他倒并不气馁。1949年1月24日，他于南京正式上任，举行了“代理总统”的就职仪式，继承了蒋留下的半壁破碎江山。李上台伊始，即以“早启和谈”为第一要务。视事当日即对外正式宣布愿与中共就“和谈”问题开始商洽，并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人之为之斡旋。23日，李宗仁又派邵力子等先后赴沪，分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民主人士、社会名流，请他们为促成和谈有所赞助。24日，李宗仁为进一步表示“和平”诚意，特饬行政院办理下列各事：1、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2、取消全国戒严令；3、裁撤戡乱建国总队；4、释放政治犯；5、解除报章杂志

禁令；6、撤销特种刑事法庭；7、通令禁止特务活动。李并以“代电”和亲笔信指示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又于27日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愿意以“贵方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迅速商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

共产党所提“八项条件”即：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周恩来对李宗仁的求和自然看得一清二楚，但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托人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们配合解决蒋系，才能站在人民方面。”

蒋介石在溪口，忙于接见党政军要员，密电通过7根天线满天飞，指示四处发，让李宗仁去跑他的龙套，他则执意当导演。2月11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戴传贤（季陶）在广州自杀身亡，这是继陈布雷自戕后又一位“党国元老”殉国。不知内情者以为戴系步陈之后尘。后据戴的小舅子赵文田撰文批露：“家姊赵文淑为戴季陶之后妻，戴死后一个月，由穗回沪养病，我前往探视。据谈：戴季陶逃到广州后，等候飞机转往台湾。适孙科亦来广州，意欲占用戴的寓所，先是出于情商，但不待答复，即将戴家的行装搬走，迁到另一住处。戴季陶一看房屋简陋，大为不快，自言自语说：‘孙科是什么东西，偏有一般趋势小人捧他，太看不起我了！’这件事他梗在心头，认为是奇耻大辱。想立刻启程，而飞机不至。又是闷，又是气，腰酸骨

痛的老毛病益发加重了。戴早年即有阿芙蓉癖，做了院长后，改服烟丸。当时，他只顾一把把地吞服。原来又患失眠症，床头案角，都放着一瓶瓶的安眠药片，每夜要吞服数次，方才能入睡片刻。他死的这天清早2点多钟还到妻子的内室，说他已经吃了很多的安眠药，精神亢奋状态尚不能抑制，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及至赵文淑醒来，医生护士满屋，说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赵文淑对我说：‘季陶决不是自杀的，他和蒋介石亲如一体，当他知道陈布雷自杀的时候，还认为陈太对不起蒋介石了。’”

国民党报纸为戴季陶之死大唱颂歌，蒋介石也为他这位上海滩的结盟兄弟之死滴了几滴眼泪。

2月14日，李宗仁悉心筹组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启程北上，成员有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黄启汉等。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了上海的使者，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两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颜惠庆等于2月底载意南旋，带回了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信，并转告李：“如果李、白有反蒋、反美、接受中共方面八项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其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毛泽东所列的8名要逮捕的人中，有6名是黄埔出身的嫡系将领，可见在蒋介石集团中，他的黄埔嫡系是最后支撑他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给李宗仁写完信，送走了颜惠庆等人之后，接着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在3月23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在出发前，

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他们共乘了 11 辆小汽车和 10 辆大卡车，毛泽东坐在第二辆中吉普上。3 月 25 日清晨，他们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余人见了面，其中有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夜，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到 9 月 21 日方移居北平城内的中南海菊香书屋。

毛泽东到北平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3 月 26 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 4 月 1 日；谈判地点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 1 月 14 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中共和谈代表有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秘书长为齐燕铭。中共代表 7 人中，有 4 人是黄埔军校的师生。

3 月 24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组成“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张治中，代表有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顾问有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容等。国民党代表中，黄埔军校出身的有 4 人。历史就是如此安排，一所军校造就了国共两党的精英，他们昔日同在黄埔生活，今天重新面对面地唇枪舌剑。

4 月 1 日，南京代表团全部代表及顾问、秘书、随员等共 19 人，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专机离京，当天下午 3 时抵达北

平。下飞机后,看到迎接的人不仅寥寥可数,而且连一个中共代表都没到场。经过介绍,才知道来接的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张治中等人都觉得很纳闷,原来设想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会来的,现在连一个代表都没有,心中实在有点狐疑。同时,随身携带的简单行李还要检查,因而大家更加感到不快。代表和工作人员一起被接到六国饭店,又看到“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这几件事凑在一起,张治中等人心中的疑团就更大了。

晚上6时,中共代表等6人来到六国饭店看望南京和谈代表,并设便宴款待代表团全体人员。饭后双方即开始商谈。商谈采取分头、个别对话的方式。周恩来、林伯渠和张治中、邵力子对谈。这4个代表全是在黄埔任过职的,可说是老朋友了;尤其是周恩来和张治中,他俩从黄埔相识,一直是很融洽的,特别是在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对周恩来尤为关心,这点周恩来心里有数。可是,今晚的交谈,周恩来一开始就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离南京前到奉化的溪口去见蒋介石?”这样突如其来的质问,使张治中感到蓦然一惊,他正想加以解释,周恩来接着又说:“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的所谓下野是假的,他还有幕后操纵控制。”

张治中急忙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要去的。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手上,我们虽然接受八条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6个代表中除行老(章士钊字行严,笔者注)外,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我是首席代表,只好我去……”

张的反复解释没有能使周恩来满意。周最后说：“不管你说怎样说，只能说明蒋介石还在发号施令，说明你们不是要和平，这种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双方为此事争执不休，张治中在解放后回忆起此事时还说：“中共对我去溪口反应如此激烈，实非始料所及。”

张治中受命为首席代表，深知和谈方案，未得蒋介石点头是万万不行的。这样，他先是在3月3日去溪口，和蒋介石谈了5天。蒋介石、张治中的谈话，是由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记录的。据余湛邦回忆，蒋介石对毛泽东提出的八条，意见如下：

一、关于惩办战犯问题，蒋介石认为无法接受毛泽东的条件，不加谈论。

二、关于改编军队问题，蒋介石还念念不忘他所谓“军队国家化”，主张双方军队保持一定的比例。

三、关于政治体制问题，蒋介石根本回避了毛泽东提出的“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只表示同意实现民主化和多党的民主政治。

四、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蒋介石回避了毛泽东提出的“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只表示同意三三制或六六制，使国共双方在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权。

另外，南京方面希望隔江而治，原本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中共方面陈兵江左的是百万雄师，并正告国民党当局，誓将革命进行到底，非解放全中国不可。双方差距太大，和谈步履维艰。

北平谈判从4月2日到12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13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中南海举行正式谈判。周恩来将经过与各方磋商拟订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正式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周恩来就

此阐明了中共的立场和态度：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战，国民党就要完蛋；和，国民党还可以有出路，当然不是什么“南北朝”，而是改造。他宣布：南京政府必须在4月20日前表示态度。

4月16日，黄绍竑携带《国内和平协定》飞返南京，请求政府批准。

李宗仁于4月16日见到了《国内和平协定》，他发现里面既没有他梦想的“划江而治”，也没有他所希望的“新旧合治”，而是一篇直言不讳的和平整编方案。他怒不可遏，避而不见昔日的老朋友黄绍竑，而是把刚上任不久的行政院长何应钦召来商议对策。老谋深算的何应钦告诉李宗仁：“此事重大，应请蒋先生定夺。”李宗仁同意了。

4月17日，何应钦带着协定飞抵溪口，蒋介石看罢大骂：“文白（张治中字）无能，丧权辱国！”他立即命令何应钦：“马上回去把文白的家属监控起来，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蒋介石一锤定音，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国共和谈，也就告吹。

是晚深夜，李宗仁、何应钦给代表团去电，表示协定不能接受，请建议中共签订暂时停战协定。深夜12点，张治中又接南京来电：

兄等此行劳苦，事虽不成，俯仰无愧。迎返代表团专机何时飞平请电告。

22日，张治中命人草拟电稿：

请于23日派机来平，预定24日回去。

电报发出后,随即通知了中共代表团。

究竟是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成为张治中南京代表团近两天一直商议的话题,大家都基本上愿意留在北平,只有张治中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的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中共代表团得到情况后,由周恩来、李立三、林伯渠一起来劝驾,表示恳切挽留。到了23日,南京方面果然派了一架专机飞平,以接回其和谈代表。然而走下飞机的竟然是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和他的儿女,一家7口。原来,周恩来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趁机将其家属秘密送上了国民党的专机,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张治中于万分感动之中,再也不好说回去复命的话了。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2野、3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于是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那天下午,毛泽东看完报纸,就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又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的兴致特别高,居然亲自执笔,为新华社写了新闻稿,题为:《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30万人……

解放军在渡江中，也遇到一些麻烦。入侵中国长江内河的英国“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向解放军开炮，打死打伤我军战士252人。当时特纵炮团予以还击，击沉击伤敌舰18艘，“紫石英”号英舰负伤被迫停于镇江江面，其余英舰向长江口外逃逸。

4月23日晨，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率大小舰艇25艘在长江上游笆斗山江南起义。在2舰队起义后，国民党海军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桂永清通知空军副总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叔铭派飞机连续轰炸，惠安、永绥、楚同、吉安、太原等舰被炸沉。

渡江之战虽说是从4月20日子夜开始的，但早在渡江之前，即3月25日，在南京我地下党员、《大公报》记者陆平等策反之下，首都警卫师少将师长、黄埔六期毕业的王宴清率部倒戈，为攻打南京开了一个缺口。此事震惊了蒋介石，因为首都警卫师乃是“御林军”，这是蒋始料不及的。

南京的解放，全世界人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为之欢腾。各民主党派联名电贺，赞誉解放军“英勇救民，所向无前”，并说：“投鞭断流，天堑何有？未及三朝，伪都即破，征诸自古，无此丰功。”

指挥渡江战役的解放军3野司令员、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当过政治部文书的陈毅，兴致所至，呼出《在大军南下》诗一首：

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
且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金陵这座古城，从旧王朝的统治下获得了新生。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家王朝已经崩溃。“秦淮迎客波碧缘，钟山含笑树青葱”。南京从此沐浴在春风春雨中。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且说蒋介石于4月22日带病从溪口急忙飞抵杭州，召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汤恩伯、张群、吴忠信等人在笕桥空军官校开会，讨论如何应付危局。蒋介石问李宗仁：“德邻，你呢？”李答道：“我？我当然去广州焜。”蒋又问：“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李又答：“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蒋说：“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准备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余地了。”李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蒋答：“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当时，李既没有想到去北平，也不想留在南京坐等解放，而是选择了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这一条死路。蒋介石拨给白崇禧银洋400万元，让白回汉口去了。李宗仁于当天返回南京“坐镇”。这时南京城内已闻共军枪声。李在南京的这最后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李乘车抵机场时，专机已响起了马达声；上飞机后，李叫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周，然后径直飞往桂林，他没有去广州。

蒋介石于4月24日返溪口，对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25日上午，蒋氏父子到蒋母墓前辞别，然后两人又走上飞凤山顶，对故乡山水“作最后一次的眺望”。蒋介石父子二人从飞凤山下来，“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当天傍晚，乘轿子来到团暝村、欲乘军舰“泰康”号

赴沪。由于正值退潮，蒋氏父子不得不登上竹排，换乘汽艇，在象山港上了军舰。蒋此时心情正如唐崔涤《望韩公堆》一诗所写：“孤客一身千里外，未知归日是何年？”蒋介石途中在镇海屿头停留，26日中午1时，“泰康”号驶抵上海，先在复兴岛住了几天，然后隐居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励志社。4月30日，蒋介石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黄埔三期毕业的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他们对淞沪防务作了周密部署。

5月1日上午，蒋介石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召集在淞沪的黄埔军校毕业学生开谈话会。会上成立了由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蒋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是想以他黄埔老校长的名义，将已呈四分五裂状态的黄埔系出身的将领重新集合起来，达到收拢嫡系部队的目的。但是，好多人并未到会，如黄埔二期毕业、时任南京卫戍副总司令的覃异之就在接到通知后的当天下午，从上海出走回老家广西宜山去了。后来，覃异之赴香港，参加了国民党44名将领的起义。又如黄埔二期毕业的国民党陆军中将、军界耆宿张权，被中共上海地下党任命为上海武装起义的总指挥，他正在酝酿着一次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并活捉蒋介石的秘密行动。张权由于叛徒张贤出卖，5月21日被蒋介石枪杀于上海大新公司（现第一百货商店）门口，同时英勇就义的还有国民党51军132师师长李锡佑。

蒋介石在会上训话，表示自己将留在上海不走，“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等。蒋介石于5月7日乘“江静”号军舰离开上海，他的诺言只是骗人而已。5月12日，3野陈毅司令员命令解放军向上海发起进攻。14日，解放军3野9兵团司令员、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宋时轮和兵团政委、黄埔军校四期毕业

的郭化若率领4个军严密包围了上海,矛头对准汤恩伯。淞沪地区的国民党军共有22万多人,一隅之地,兵力可谓雄厚。先后退至上海的国民党部队计有刘玉章的52军、吉星文的125军、罗泽闾的37军、阙汉騫的54军、李天霞的73军;这些军长都是清一色的黄埔毕业生,而且是陈大庆、石觉这两位黄埔大师兄坐镇指挥。汤恩伯这位曾任黄埔军校六期的学生大队长、后升为黄埔军校教育处长负责淞沪战役的总指挥。虽说是“骁勇之将”云集,但也未能逃脱败北的命运。只用了半个月,上海就被陈毅的3野攻克。负隅顽抗的22万余国民党部队,能侥幸逃脱的不足7万人,余皆当了俘虏。当年,汤恩伯在河南号称“中原王”,抗战时盘踞在豫鲁苏皖四省,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特别是1943年,河南发生了水灾、旱灾、蝗灾,农民颗粒无收,赤地千里,百姓以草根树皮充饥,饿死者不计其数,难民纷纷弃家逃荒,有些地区数百里荒无人烟。当时汤恩伯作为河南实际上的最高军政长官,非但不组织救灾,反而以“军事第一”为借口,大兴土木,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水、旱、蝗、汤”被中原老百姓称为河南“四大害”。

汤恩伯任淞沪杭警备总司令,指挥湖口以东长江防线的45万人马,他认为凭借坚固工事、有利地形和美式武器装备,采取海陆空联合作战,固守上海半年是不成问题的。但解放军渡江之后,汤恩伯的部队如惊弓之鸟,分路南逃,其狼狈之状,真是无法用笔墨形容。

分路南逃的各部蒋军,在陈毅3野的跟踪追击下,狼奔豕突,完全丧失了抵抗力。其中,54军约半数及51军一部分,侥幸绕太湖逃往上海;第8兵团所属之55军、96军、68军,一部分在浮梁以南之石镇街被歼,一部分则分散逃往浙赣路沿线各地;其他由南京东西地段逃向杭州的各部队,绝大部分均被歼灭。

在被歼灭的各军中,最可笑的是 28 军一部分和首都警察总队,在败逃时因抢夺卡车而发生冲突,正在“内战”中,解放军已经追到,只好一同放下武器,大家当俘虏。

20 军、88 军及 99 军两个师的大部分,在 4 月 20 日,先后逃到芜湖以南的湾沚和屯溪之间时,即被歼灭。20 军军长杨干才被击毙,99 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胡长青负重伤。4 军、28 军、45 军、66 军之大部分及 54 军之小部分,在几天之中先后在溧阳、郎溪、广德、长兴间被歼灭。66 军军长罗贤达、28 军军长刘秉哲均被俘。廖运周的堂兄廖运升,黄埔四期毕业生,时任 110 师少将师长,部队退到浙江义乌时起义。106 军一个师在撤退途中也向解放军投降。第 7 绥靖区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张世希,带着少数幕僚人员逃到徽州后,由于所携银元太多,怕路上行动不安全,被迫分给 17 兵团一部分。第 9 编练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张雷中,只身乘吉普车逃命,连特务营也嫌累赘,索性扔给了 17 兵团。由南京侥幸逃到杭州的部队,大都混乱不堪,如由首都卫戍司令部改称的第 7 兵团,到杭州时,收容到的部队不到两个团;又如 4 军军长王作华、45 军军长、黄埔一期毕业的陈沛,都成了“光杆”军长,他俩向军需部门领到全军经费后,随即化装逃亡了。南京卫戍总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张耀明,带着残部逃到杭州后,与浙江警备司令周晷于 5 月 2 日一同经宁波逃往定海。

陈毅穷追汤恩伯的故事层出不穷,如:用一粒子弹就解放一座县城;解放军一个班就可以押送 1 千多名俘虏;解放军急行军一天走 130 华里,而国民党溃逃的军队,乘坐汽车一天走不到 50 华里,往往是解放军跑在国民党军的前面,拦腰一击,国民党军就乖乖缴枪投降……

上海战役开始后的第 5 天,即 5 月 17 日,蒋介石率领空军

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又急忙乘“江静”号军舰赶回上海，将军舰停至吴淞口，蒋介石仍在军舰上指挥作战。5月17日以后，战况最为激烈。至5月20日，高桥等一带主阵地相继丢失。21日，上海对外航空联络中断。战至25日，终将12军、75军大部分消灭。至此，浦东方面的国民党军完全解决。紧接着，解放军乘夜从徐家汇方面冲入市区，与蒋军巷战。陈毅指示用“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不作逐房逐楼、一街一巷的争夺。汤恩伯觉得处处有敌人、线线被突破，摸不清解放军究竟到了哪里，弄得晕头转向。25日下午，汤恩伯即对其残部发出总撤退令。撤退时，秩序大乱，情形十分狼狈。由于船少人多，许多官兵只好被抛弃在大陆了。52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刘玉章去见陈诚，陈诚第一句话就说52军损失太大，已经有名无实，因为这个军首任军长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关麟征，陈与关私人关系不好，就借故削弱52军，不待整休就下令调马公岛驻防。关麟征留在香港，不愿赴台，也与这种历史恩怨有关。

上海撤退时，因未接到命令而被丢弃的37军军长、黄埔六期毕业的罗泽闾，于上海解放后不久，化装乘外国轮船，辗转经香港逃到了台湾。罗是湖南常德人，曾当过胡宗南的参谋长，1948年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是一个得意而骄且相当有活动能力的黄埔后起之秀；他在蒋介石面前，跟杜聿明、廖耀湘等人都顶撞过。这次他对汤恩伯不通知他撤退，感到愤愤不平，所以一到台湾，就对汤恩伯进行攻击和控告。汤的亲信石觉、陈大庆亦不肯示弱，双方闹得不可开交，迫使蒋介石在台北开上海作战检讨会，以求解决。参加这次检讨会的成员，都是师长以上指挥官。罗泽闾在会上说：“汤恩伯身为统帅，在上海撤退时，带头逃跑，将部队遗弃不顾。像这样的行为，将何以对部下？更何以对党国？应该自杀以谢国人。”

汤恩伯则反唇相讥：“你罗泽闾能说会道，在会上说话如猛虎一般；但是同共军作战，却连绵羊也不如。你的部队，在浦东不战而溃，使得整个战局逆转，以致指挥部无转圜的余地。你还说我该自杀，你就早该自杀！”

汤与罗在会上相互争吵，别人无法插嘴。陈诚坐在主席位上，也只是摇头叹息，一言不发。后来双方闹到要求军事法庭解决，但以后也就不了了之。经过了京沪杭的惨败之后，蒋军中许多人都异口同声地骂汤恩伯指挥能力低劣，有人曾用八个字来形容汤恩伯，说他每次打仗都是“战前紧张，枪响忙乱”；说他易于感情冲动，每每为局部战况所眩惑，一再改变计划，终于打乱整个部署。

1949年7月，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厦门绥靖总司令。9月底，厦门解放，汤率残部撤往金门等岛屿。10月29日，蒋介石召见陈诚，命其将败将汤恩伯带回台湾，陈诚问：“委他何职？”蒋摇头不语。陈诚立刻会意，当即以东南行政长官身份飞抵金门，向汤传达蒋介石的旨意。汤被迫返台，被蒋介石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从此退出军界。1954年5月，汤恩伯胃病复发，东渡日本就医，在东京某大医院手术治疗，终因医治无效，于6月29日死于日本，终年55岁。

再说陈毅于5月27日进入上海后，随即组织了一个政治工作组，跟随部队前进。因为在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指使毛人凤、毛森等特务在上海地区大举拘捕爱国民主进步人士，所以陈毅进城后，首先寻找他们的下落。同时立即接管所有国民党的监狱和特务机关。宋庆龄、张澜等先后给予保护。不少被捆绑而准备处死的人，由于解放军进展神速，终于临危遇救，虎口脱险。虽然如此，但据毛森逃抵台湾后，在毛人凤家里的一次宴会上向人表示：在上海撤退前，被他们所杀害的，已达

1300 多人。

上海战役,是陈毅生平所遇的一次最特殊的战役。20 多万守敌,有蒋介石亲临督阵,要拼死固守半年以待美军援助。市区内外遍布有 3000 多座坚固碉堡、4000 多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1 万多个野战卫星工事、两万多颗地雷,汤恩伯称此阵地“比斯大林格勒还坚固 33%”。在此情况下要攻占上海,同时又要严格保存市区建筑、工厂、电力、交通等设施的完好,这就绝非易事了。陈毅认真地研究了毛泽东的指示,他在部署解放上海这场大战的时候,用形象的语言对大家说:

“为了实现军政全胜的要求,既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完整的解放上海,又要歼灭敌人;既要不能用赶鸭子的办法,让敌人毁城跑掉,又要防止敌人久踞上海烧杀掳掠,人民遭殃。大家要把解放上海市区的战斗,比喻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打到老鼠,又不要损坏店内的珍贵瓷器,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陈毅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攻,而且要政治进攻”,在进入上海市区后,严令部队用炮火和炸药。因而大部队被敌人阻于苏州河南岸。敌人凭据北岸的高楼大厦,以居高临下的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和沿岸的街道、建筑物,敌人在北岸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并有坦克流动巡守,因此我军多次强攻桥头都受到挫折,特别是在四川路外滩一带,伤亡较大。战士们血洒苏州河畔,个个都被猖狂的敌人激怒了。有的说:“陈老总早就要我们加强城堡攻坚训练,可是今天英雄无用武之地,真憋人哪!”有一个榴弹炮营把大炮拉了上来,瞄准了“百老汇”大厦,请求批准开炮,可是陈毅没有同意。打这样不开炮的仗,陈毅还是第一次。正是:霜重色愈浓,斗争见英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驰骋江南 陈赓挥师回南昌 开国奠基 毛泽东进中南海

说话当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后，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情怀和政治家、战略家所具有的高瞻远瞩，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告诫：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七律诗中，沿引用了一些典故。“宜将剩勇追穷寇”一句引于《后汉书·皇甫嵩传》：“兵法：穷寇勿追。”在这里，毛泽东反其意而用之；“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句的来历是：秦末之时，西楚霸王为了义气之名，放刘邦入关中，结果，不出几年，刘邦养精蓄锐，卷土重来。陷项羽于十面埋伏，项羽兵败，临江自杀。

1949年5月下旬，渡江战役接近尾声，中共中央军委做出了向全国进军的部署，于5月23日向各野战军发出指示，要猛追穷寇，准备迎接全国解放的高潮。指示规定：

第1野战军向西北进军，尽可能在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占领新疆，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5省；一路由贺龙率领，协同第2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3省。

第2野战军在协同第3野战军占领宁、沪、杭等地后，主力集结于浙赣铁路沿线，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待

此种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在第1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解放并经营川、黔、康3省。

第3野战军以主力一部向闽、浙进军,并准备提早入闽,争取6、7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相机夺取厦门,解放并经营鲁、苏、皖、浙、闽5省。

第4野战军向中南进军,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6省。

各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浩浩荡荡,以摧枯拉朽之势,排山倒海之力,迅速展开了聚歼、围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向全国大进军。徐向前、张宗逊、周士第、许光达这几位黄埔军校毕业的野战军将领,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进军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在此暂且不表。

单说黄埔一期毕业的2野4兵团司令员陈赓,他本人身兼兵团政委;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郭天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赓当然在黄埔的资格比郭天民老,郭天民进黄埔时,陈赓已是营长。在这对搭档中,他俩配合默契,所向无敌。4兵团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刘志坚,兵团辖周希汉的13军、李成芳的14军、秦基伟的15军。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廖运周,潜伏敌营20年,在淮海战役中他率国民党85军110师起义后,也编入陈赓的兵团,现任14军42师师长。这个兵团共有3个军9个师,加上兵团直属部队,总兵力为11万人。陈赓有着传奇的一生,有着赫赫的战功,更为吸引人的是他有着风趣幽默的性格,常常开点出人意料的玩笑。他与战士们同抽一袋烟,同吃一个碗里的肉,常常给人以亲切随和的印象。陈赓还能赋诗作词,堪称一员儒将。在渡江战役前后,陈赓从1949年3月开始就写日记,一直写到渡江后横扫江南的6月,留下了一员战将宝贵的征战历程记录。

在渡江战役后,陈赓率领 2 野 4 兵团十几万大军在进军江南。并在横扫歼敌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4 月 23 日拂晓,陈赓乘船渡江。当时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诗句:“晨光熹微,鱼贯入船;微风南送,疾驶如飞。”同时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不一时,船登彼岸,踏上了江南大地,当时满怀兴奋,不可言喻。”

大雨倾盆中,陈赓率部仍以军人的英姿,向南疾进。他在日记中写道:“沿途所见,人尽泥饰,走路如扭秧歌,嬉笑声、歌唱声、跌跤声,混成一片,情绪甚为高涨,雨亦不足以扫其兴。”

陈赓兵团过江后的任务是向浙赣路进军。具体说是沿杨勇的 5 兵团右翼,直出上饶、弋阳,切断浙赣路,迂回汤恩伯集团侧背,隔断汤恩伯与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5 月 1 日克江西景德镇;22 日拂晓解放南昌、当时中央军委电示由陈正人担任南昌军管会主任。陈赓高兴地说:“陈正人是个老同志,也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我俩是同窗。”陈正人 6 月 5 日到南昌,作为交代工作的主管,陈赓当即到南昌去见他。进了南昌城,陈赓首先想到了 13 军 37 师的指战员。6 月 6 日,陈赓带着兵团前线指挥所人员,带着一幅锦旗,冒雨来到 37 师驻地。他一见到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就兴奋地说:

“今天是我第四次来到这里。第一次是 1927 年春天,蒋介石策划了南昌叛乱,我险遭不测,逃入武汉;同年 8 月,南昌起义,从起义到退出南昌,我担任肃反工作,那是第二次;1931 年,我作战中负伤,去上海医治,不幸被捕,被国民党押解到南京,后又转来南昌,那是第三次;今日为第四次。这一次,我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跨进南昌的。回首往事,前三次入城,或为亡命客,或者站不住,或为阶下囚,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没有前三次,则没有今日人民之光荣。”

6月8日,陈赓在日记中写道:“……过百花洲,入南昌图书馆,此处 在 1931 年为科学仪器馆,蒋介石曾在此亲自指挥对我中央苏区之第四次‘围剿’。我在沪被捕解南昌后,蒋曾在此对我亲自审讯,迫我投降,我曾以严词厉色拒之,几至使蒋无法下台。回忆昔年在此室中,我为阶下囚,今日我则为此室主人矣!”

在渡江战役前,陈赓曾眺望江南,吟诵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949年6月底,陈赓兵团划归4野由林彪指挥。其迅速向中南进军,先后解放赣西北、赣西南广大地区。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第1兵团司令官、黄埔一期毕业的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湘潭等地和平解放。接着,4野一部分部队日夜兼程南下,在广东阳江、阳春地区追歼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部4万余人。随后,迂回广西,将白崇禧所部17万余人最后歼灭在容县、博白、廉江和钦州等地。在向中南地区的进军中,2野4兵团配合4野共歼敌40余万人,解放了鄂、湘、赣、粤、桂5省。陈赓兵团一鼓作气,参加两广作战后,奉命进军云南,直抄国民党在大西南的退路,防止敌人从缅甸方向逃窜。

且说1949年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发出了起义通电。陈明仁在起义前,蒋介石派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黄埔一期毕业的邓文仪前来湖南见陈明仁,陪同前来的有国防部次长、黄埔一期毕业的黄杰。三人都是黄埔一期同学。相见时难,他们本应该格外亲热,但因南辕北辙,各走一途,陈明仁与他俩根本说不到一起去。黄杰见气氛不对,便将话题扯到蒋、陈的师生之谊方面。他说:“仁兄为蒋总统的得意门生,过去校长待兄不薄。如今校长这般艰难,我等黄埔学生,不能投井下石,自陷不义啊!”陈明仁沉吟,黄杰以为他已在动摇,赶忙递上蒋介石的亲笔信札。陈

明仁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弟一生革命史,自当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即来四川为尔后盾,余由雪冰(邓文仪)面告。”陈明仁仍不为所动。黄、邓二人开异了半天,陈明仁只说:“仗已打到这份上了,够了,你我都是湖南人,个人前途固然无足轻重,但长沙人民生命财产不能毁坏,以陷长沙父老于水火,换取高官厚禄,明仁不为也!”由于是黄埔老同学,陈明仁要尽地主之谊,因而陪同黄杰、邓文仪共进午餐,三人边吃边谈。黄、邓二人不肯死心,餐后硬缠着陈明仁不放,想将其拉回蒋介石阵营而后快。到下午3点多钟,忽有侦察军官来报:“报告陈司令官,共军先头部队已推进到黄花市以西,游击队出没在市郊和飞机场附近,似有对我机场进行破坏之企图。”

黄杰、邓文仪闻听此言,吃了一惊,彼此相视会意,邓文仪说:“既然机场附近出现混乱,那我们还是先走吧!”

三人起身,陈明仁安排汽车去飞机场。临别前,陈明仁只说了声:“二位仁兄,好自为之。”说完,陈明仁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邓文仪、黄杰后来去了台湾。陈明仁则率部在湖南起义。

陈明仁起义后,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黄埔一期毕业的李默庵则去了香港。在香港他与黄绍竑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发表和平通电。此后40多年李旅居阿根廷和美国,到1991年才从美国回大陆定居。李默庵在抗日战争时与八路军将领共同指挥过著名的忻口会战,并在晋东南中条山区与日军展开一年多的游击战。李默庵还与叶剑英同在湖南南岳举办过游击干部训练班,两人私交甚笃。李回大陆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现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中仅健在的两人之一,另一位是百岁老人黄鹤。李默庵1904年生,到笔者写此书时,已95岁高龄。

陈明仁起义的当天,14军军长、黄埔二期毕业的成刚率10师、62师和63师一个团叛逃,其后去了台湾。第2天,71军军长、黄埔六期毕业的彭锷在湘潭率87师、88师叛逃。8月5日,毛泽东电告程潜、陈明仁:“对先生所提设立先生领导的、暂名‘国民党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均属必要,即可施行。”同天,古城长沙焕然一新,饱受战乱折磨的人民脸上露出了笑容。人们奔走相告:“解放军就要进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4野46军138师首先开进了长沙。接着,4野12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陈伯钧会见了陈明仁、傅正模两位黄埔一期的大师兄。当时傅正模任国民党1兵团副司令官。4野12兵团副政委、黄埔四期毕业的唐天际和副参谋长、黄埔四期毕业的潘朔端也与两位和平起义的黄埔将领见了面。在国共两党相争中,国民党1兵团的三位副司令官傅正模、刘进、张际鹏,都是黄埔一期的学长,陈伯钧、唐天际、潘朔端只好执师弟之礼与他们相见了,虽然陈、唐、潘是从鸭绿江一直打过长江的。

4兵团司令员陈赓、林彪的4野政治部副主任、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陶铸,13兵团司令员、黄埔六期毕业的程子华,14兵团政委、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莫文骅等挥戈南下两广,执行毛泽东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决策。他们日夜兼程,迅速歼灭溃逃之敌,占领主要交通要道及城市,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这种大刀阔斧的远后方、远距离的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和在陕南拖住胡宗南部以利全歼的方针,表现了指挥者的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它是毛泽东歼灭战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的重要发展。

蒋介石在程潜、陈明仁投靠共产党后,立刻煞有介事地撤销程潜、陈明仁本兼各职,并在全国下达通缉的命令,他所能为力的,也只剩下这种例行公事了。长沙和平起义,体现了解放军渡

江令中所宣布的两条路径：凡主张真和平者，可以北平为范例；如果一定要照蒋介石的办法行事，那也只好“奉陪到底”，以武装对付武装，以军事解决军事，在战场上·一见高下了。

在1949年8、9两个月中，江西、湖南、广东三省，解放军追击白崇禧的40万大军，到9月中旬已进展到粤北。在福建，继8月中旬攻克福州后，到9月底，解放军已包围厦门。西北的形势也发展迅速。为尽快解放全国的每一寸土地，中央军委于1949年5月23日发出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确定1野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之敌，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要求在1949年年底前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解放并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入川，配合2野解放川、黔、康诸省。华北军区的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黄埔一期毕业的周士第，下辖60军、61军、62军三个军，以及杨得志的19兵团拨归1野建制，先后由山西入陕，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攻打山西太原的华北军区副司令员、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因患病无法坚持指挥，故中央军委临时决定由彭德怀接替指挥。

1野在1949年上半年先后解放了太原、西安、榆林及陕中广大地区，打乱了胡宗南集团的撤退计划，拖住了敌军，共歼敌4.6万余人。从1949年7月起，西北转入战略进攻阶段，1野的兵力由15万增至34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已达40万之众。在西北战场上，解放军1野副司令员、黄埔五期毕业的张宗逊，1野参谋长、黄埔一期毕业的阎揆要，1野2兵团司令员、黄埔五期毕业的许光达等，先后率部参加了兰州战役，8月26日，兰州解放，张宗逊留下任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然后1野各兵团继续西进，集中力量追歼宁、青“二马”（国民党西北将领马鸿逵、马步芳）的残部。9月5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9月24日，

国民党西北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246师师长沈芝生、137师师长李炳南、91军参谋长郑壮怀等率部两万余人在酒泉起义。国民党整编78师师长叶成、整编骑1师师长马呈祥、整编79旅旅长罗恕人等离开新疆迪化，经南疆逃往巴基斯坦。解放军1野191师进驻银川，占领飞机场，立即平息溃散的国民党宁夏兵团残余武装。

9月25日，在起义将领张治中的劝说下，国民党新疆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赵锡光等率整编42师、78师、骑1师及所属9个步、骑旅在新疆迪化通电起义；9月26日，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兼新疆省保安司令包尔汉通电起义。至此宣布新疆和平解放。

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国民党9兵团司令官孙兰峰、111军军长刘万春等率部8万余人宣布起义，归绥和平解放。傅作义、邓宝珊对绥远起义起了很大作用。蒋介石派原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叔铭由广州飞来陕坝，制造矛盾，恩威并施，劝董其武飞重庆，董其武不为所动。当董其武于9月18日主持驻绥远部队旅长以上干部和原绥远省政府高级官员、地方各族、各界人士代表举行通电起义仪式后，傅作义打发邓宝珊去找徐永昌也签字，徐永昌领会了这是下逐客令，就气愤地说：“我明天就走，不妨碍你们的事情。”徐永昌见大势已去，悻悻然领着张恩庆等大小特务于19日下午2时登飞机去了。

9月20日晚，傅作义让董其武留守绥远，他与邓宝珊、孙兰峰等乘车返回北平。22日上午，汽车驶抵西直门站，受到聂荣臻、薄一波等人的迎接。董其武的和平改编，史书上称作“绥远方式”，与“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并称为解决国民党军的三种

方式

9月22日,蒋介石从重庆返台途中,顺便去昆明,再给云南省主席卢汉打气。中午在卢汉家中午餐。蒋介石在卢宅停留了4个小时,约见了“滇省重要将领,会商保护西南大局”。会议刚完,蒋经国说:“刚才接到广州的消息,那边天气可能发生变化,请父亲立即启程。”当天晚上,蒋介石飞抵广州,即闻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的事。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至为痛心”。自上海解放后,蒋介石为了保住大陆上的最后一点地盘,他席不暇暖,在台湾、广州、重庆、厦门之间奔波,且疲于奔命。譬如在9月22日这一天,他早上在重庆用早点,中午在昆明午餐,晚饭却是飞回广州后吃的。由此可见其用心良苦,这年他62岁,人们都说他苍老得很快,鬓发斑白,走路背也有点驼了。

话分两头。再说自从毛泽东进京“赶考”,于1949年3月25日进入北平后,他即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一住就是半年,到9月21日才移居北平城内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56岁的毛泽东时隔31年后又一次踏上了北平这块土地。记得那是1918年8月19日,他和肖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岳麓才子”为赴法勤工俭学而来到北京。开始毛泽东等人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的家里,后同蔡和森等8人住到距北京大学不远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现名吉安所左巷)7号租的两间狭小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在清苦的生活中,开始了他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而今想不到毛泽东的二次进京,都已成为一国之主。这种反差确实太大了,难怪毛泽东从西柏坡启程的那天夜晚,彻夜难眠,辗转反侧。毛泽东进城的第一天,他没有住进中南海,在颐和园小憩;下午两点,乘车去西郊飞机场,由叶剑英陪同检阅了部队。

在检阅部队后,他和 100 多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见了面,他们当中有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等。是夜,毛泽东宿颐和园,尔后,搬到香山脚下的双清别墅。

周恩来担负着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便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率先进驻中南海。

中南海是北京著名“三海”(中海、南海、北海)的一部分,是历代统治者居住的地方。中海开辟于金元时,南海形成于明初,清代与北海统称为西海子,列为禁苑。园内留下有着美丽传统的宝月楼,就像一座美丽小岛中的瀛台;另外还有别致奇特的静谷、四方平台的紫光阁、缤纷满御园的芭蕉园、太液秋风水云榭、引入驻足的金鳌玉蝾桥。这些亭台楼榭与美丽的湖面错落有致,湖光山色,美不胜收。袁世凯、张作霖、李宗仁、傅作义都在中南海住过。

毛泽东对香山双清别墅情有独钟,执意不住中南海。

后来舒云在《开国纪事》中,曾这样披露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居住的经过:

国庆大典以前,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劳动,中南海里里外外已经焕然一新,于是,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迁入中南海。

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叶剑英专门跑到香山上的双清别墅催他的报告。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毛泽东等叶剑英走了,很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恩来含笑而言。他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但又不好直接说。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是原则,这个地方连围墙

也没有。”

“不谈不谈。”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头。

“不谈就不谈。”周恩来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它是慈禧太后独揽国家大权的地方，也是光绪皇帝因变法维新被囚禁的地方。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占据这里为大总统府，并在这里策划复辟称帝阴谋。

进城之前，毛泽东特意号召全党看一看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讲了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如何失败的。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

周恩来希望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主要考虑安全，四周的红泥高墙是天然的屏障。

“毛泽东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周恩来对坐在一边的朱德总司令说。

朱德表示赞同。

党中央终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意见搬进了中南海。

毛泽东拗不过大家，只好住进了中南海菊香书屋，这一住，就是28年。

菊香书屋是中南海丰泽园里的一个四合院，康熙题联为：“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院内十分清幽典雅。

北平解放后，住进菊香书屋的是林伯渠和周恩来。毛泽东在入主“紫云轩”后，周恩来一家搬进了西花厅，周恩来在这里一住就是25年，直到他离世。

毛泽东这个富裕农民的儿子，对环境别有一番情趣和审美感。他宁愿将庭院种上青菜变成菜园，而不要花园，他曾经将他别墅周围的花盆搬走而种上蔬菜。

自毛泽东住进菊香书屋，就将那些色彩斑斓的盆花拆去，只

是在院内十字路口处摆了一对常绿的棕树和一对无花果木，走廊上摆的也是两盆绿草。如果清洁工人来打扫庭院中的杂草，毛泽东见了，就匆忙制止，他说：“莫拔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

进城后的周恩来，是一位大忙人，他一般是早上五六点睡觉、十一点起床，其余全是工作时间，有时忙到通宵达旦。他抓政协筹备会的工作，还把自己关中南海勤政殿三天三夜，起草了日后被誉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此外，他还要抓外交、新闻、华侨等工作，还要去毛泽东的住处研究军事问题，还要参加与国民党和平代表团的谈判。当年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共两党黄埔军校师生都非常尊敬他。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后，他就主管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当时一大批黄埔师生，如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程子华、陈赓、周士第、许光达、阎揆要、罗瑞卿、徐向前、杨至成、郭化若、唐天际、陈奇涵等，跟随他上井冈山、长征、到陕北，然后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他们之间有着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进入北京后，周恩来与国民党起义将领、民主党派人士接触频繁。原黄埔军校师生，如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沈雁冰、陈明仁、季方、王昆仑、覃异之、施复亮、阳翰笙、许德珩等也先后来到北京，周恩来也须要去接见，去做统战工作。至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诸如宋庆龄、谭平山、黄炎培、朱学范、章伯钧、李书城、梁希、史良、何香凝、李德全、马叙伦、黄琪翔等，先后被邀从香港、上海等地来到北京，周恩来也得去考虑他们的工作安排、住宿等大大小小的事情。

周恩来的博闻强记和有条有理在政协会议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政协一届筹备会于1949年8月下旬已经基本就绪，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建议把新政协的名称改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获得一致通过。

1949年的政协会议共有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代表五大类45个单位,662名代表。

对于这几十个单位、几百名代表中的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周恩来都十分熟悉。他一个一个地和大家商议,敲定参加大会的民主人士代表,一个一个地排名次。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和知名人士差不多全安排进来了。仅以政务院的人事安排统计,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所占的比例就非常之大;4个副总理中占2个名额,21个政务委员中占10个名额。而政务院下属的30个机构,在93名负责人中,民主人士竟多达51名,其中15名是正职。当时许多民主人士非常感动,称赞道:“周恩来总理真是不愧为‘周’总理啊!”意指考虑问题周到、周详、周全。

如果当初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信任周恩来这样的干才,听从张治中的建议,由周恩来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听取周恩来对时局的建议,那他也不会落到这般狼狈的地步。大概这是历史命运的安排吧!毛泽东则不然,正是由于他慧眼识真才,通过周恩来,团结一大批赤黄埔系的师生,又争取了一大批白黄埔系的师生,结果使共产党夺了天下,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毛泽东、周恩来在北平忙得不可开交。

毛泽东在政协会议期间,每逢休息,他就提议去天坛散步;而且每次去,他总要叫上一个或几个民主人士。有一次,毛泽东往祈年殿走,向导介绍这座已经有500年历史的镏金宝顶三层屋檐的圆形建筑,说那么大的大殿仅仅靠28根木头柱子顶着。然而毛泽东和“28”有说不尽的缘份:他第一次发表文章《体育运动之研究》,用的笔名是“二十八画生”,这因为他的名字笔画加起来正好是28画。他出席中共“一大”时,正好是28岁。从

1921年到1949年；是毛泽东打江山的28年，从建国到1976年也是28年。所有这些，难道是巧合吗？

在政协一届会议上，毛泽东说：“这一次礼炮要放28响。”由于国外庆典礼炮要发射21响，是最高礼节，因此有代表对28响提出质疑。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在庭院里散步，迎面碰上了在大会筹委会工作的华北军区作战训练处处长唐永健。毛泽东要他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过去唐永健当过语文教员，文笔很好，很快，唐永健就简明扼要的将一份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报告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于是这份材料就转发了，当时提意见的政协代表明白了28响的道理，可惜这份珍贵资料无从查找，实为遗憾。

怀仁堂是政协开会的会址，但怀仁堂的音响成了个大问题。1949年6月份，新政协筹备会在怀仁堂召开的时候，音响效果就不好，不过，那次会议人数少，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但这次要正式开会，如果声音传不出去，或是听不清。这可是个大问题。中南海布置科主任钟灵是延安“鲁艺”美术系的高材生，他负责布置政协会场，就音响效果，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感到这事非同小可，便放下手头工作，要通了总参通讯兵部王诤部长的红色电话专用线。周恩来为此事大动肝火：因声音不清而砸锅，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王诤放下电话，怔怔地坐在那里。这位在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在国民党张辉瓒师部当无线电报务员。在江西反“围剿”战争中被俘后他参加了红军，是共产党最早的通讯兵技术人员。长征中他一直担任“空中交通员”，始终在毛泽东身边搞无线电联络。延安时期任中央军委3局（通讯联络）局长兼通讯学校政委，还负责筹建过新华广播电台。他和周恩来是师生关系，当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名叫吴人鉴。1929年3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党军

交通兵第1团无线电分队工作,与笔者先父吴起舞是先后期黄埔同学,而且共过事。周恩来对王诤非常了解,知道他干工作从不讲价钱。而且,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周恩来还保过他。但今天王诤有点想不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发那么大的火。

王诤在那里足足沉默了一刻钟,终于找到总参通讯兵部技术处处长傅英豪:“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反正你也知道。搞不好怀仁堂的声音问题,总理要杀我的脑袋,我可要先杀你的!”

傅英豪和他的夫人唐旦自从被周恩来派到延安安装新华广播电台后,便一直在王诤的领导下工作,凡是沾电的问题,王诤就找傅英豪。傅英豪通晓中、日、英三种语言,是无线电专家,夫妻俩都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专业的高材生。中南海怀仁堂过去安装的扩音喇叭回音太大,反射的回音相互干扰,使人听不清声音。傅英豪翻遍了各种资料,始终没有找到可供参考的文献。后来他从“化整为零”上得到启发,联想到数学上的渐进的原理和无穷大无穷小的极限原理,把声源切割到最小,回声就自然消失了。傅英豪在怀仁堂安装了9个喇叭,使从高处传下来的声音只能激起很弱的回音,效果极为理想,后来人们就叫这种喇叭为“九头鸟”。王诤向周恩来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周恩来为表扬他们的功劳,特奖给怀仁堂声音试制小组一尊银杯,上面镌刻着傅英豪、唐旦的名字。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会议开幕之际,与礼炮轰鸣的同时,北平曾一度雷电交加,但旋即雨过天晴,繁星满天。这被人们喻为新旧中国历史交替的象征:黑云压城、山雨满楼的动荡岁月过去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已被荡涤一清,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北平之名从此消失。

9月30日,政协选举56岁的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人为副主席。

1949年10月1日,北京披上节日的盛装。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就职典礼。51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在56名政府委员中,黄埔军校师生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张治中、郭沫若、蔡畅、陈毅、沈雁冰、林彪、徐向前10人均榜上有名。

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30万人出席。在礼炮声中,在《义勇军进行曲》声中,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放28响,如报春惊雷回荡于天地间。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地声音响彻云霄,震动了全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朱德则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命令》:“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接着是阅兵仪式,阅兵方案是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呈报党中央后执行的。暮色低垂,举着五星灯笼的群众游行队伍已近尾声。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宣布大典的最后一项议程是施放礼花,200名军乐队员在总指挥罗浪的指挥下,吹奏起威武雄壮的乐曲,天安门广场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欢声雷动,呼声如潮,人们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10月1日这天,远在广州的蒋介石是在军舰“华联”号上度过的,陪同他的只有蒋经国及其几个幕僚人员。

10月2日,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断绝与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关系,并自广州召回苏联驻中国的外交大使。

蒋介石闻知,以气愤之情,写下日记:

俄帝之承认匪伪政权,实乃既定事实,且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盖以我在联大控俄案通过,彼乃不能不出此一招,以作报复之行为耳。今后俄帝必与共匪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

10月6日这天正是中秋佳节,蒋介石在军舰上召集各地师以上将领训话,要求部下“不怕失败、流血,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此为他们打气。

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17日,厦门插上五星红旗。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迪化。10月25日,人民解放军以3个师的兵力向金门进攻,终因风大浪高,坚持战斗两昼夜后,又退回大陆。

广州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迁往四川重庆。正是:秋风扫落叶,残阳红如血;鹤唳风声起,何处是归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垂死挣扎 毛人凤血洗重庆 白皮红心 郭汝瑰宜宾义举

话说蒋介石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惨败后，就只有把挽救败局的希望寄托在西南的云南、四川、西康三省。像当年抗日战争一样，为了再圆建陪都于重庆之梦，他提出了保卫大西南的口号。他曾向美国总统杜鲁门说：“国民党在大陆只要有一个插旗杆的地方，就一定能光复失地，别说还有大西南这么一块天赐宝地。”蒋介石信心百倍，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召集西南军政首长张群、顾祝同、王陵基、胡宗南、宋希濂、陈克非、刘宗宽等开会，制订《国民党国防部西南作战计划》。蒋介石是在广州失守的11月14日，仆仆风尘自台北飞抵重庆。蒋介石到重庆的当天，得到的前方战况是：由白崇禧、李宗仁经营的部队在广西桂林开始撤退，贵阳解放，解放军前锋已接近彭水，宋希濂的14兵团已撤到乌江西岸。在川陕的胡宗南几十万国军南逃的道路被截断。蒋介石“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保卫战，如今已变成了解放军以四川为中心的包围战。

蒋介石开场说道：“各位将领能在时局艰困危难之际，仍忠心耿耿，使我十分高兴。我希望各位坚信，国际危机尚存，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局势尚不能预测，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以待国际时局转化，定能反败为胜。因此，我军各将领必须坚守西南。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就是研究一下西南如何固守，

共军主力将由何方攻击西南,以及我军如何配备兵力。”

会上制定的绝密计划,5天后,即转到解放军手中,此情报是谁送出的呢?此人便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刘宗宽。刘宗宽是黄埔三期毕业生,陕西蒲城人。曾当过杨虎城将军的随从副官,后在胡宗南的部队任暂编15师师长,因与胡发生矛盾,胡秘告刘通共,被蒋介石关押,几乎被判死刑,后被冯玉祥等出面营救,才得以释放。刘宗宽被释放后,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当教员,与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关系密切。1943年底,刘宗宽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后又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影响下,秘密为共产党担任了高级情报员。武汉解放后,中共中南局社会部派房向离(显志)带交通员黄克孝秘密入川,专门与刘宗宽建立了情报联络,蒋介石的绝密计划,就是由刘宗宽交给房向离再通过秘密渠道送到2野刘伯承、邓小平手中的。

在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交给军统局特务头子、黄埔三期毕业的毛人凤的一项破坏计划正紧锣密鼓地实施。

毛人凤被称为“军统三巨头”之一,另外两人就是黄埔二期毕业的郑介民和黄埔六期毕业的唐纵(唐是戴笠死后进入“三巨头”之列的)。郑介民是军事情报专家,唐纵是国民党警察总署署长,而毛人凤则是继承戴笠的衣钵,专门从事特务活动,有“破坏大王”之称。

毛人凤在任军统局局长后,他指使特务破坏了中央北平地下电台、逮捕了报务员李政宣等人;又在胡宗南身边发现了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熊向辉;还查出久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机要秘书工作的陈布雷有个女儿陈璉也是共产党员。毛的这些工作,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北乎和平解放前夕,毛人凤指使特务段云鹏于1949年1月18日凌晨3点在北平市锡拉胡同11号引爆两枚定时炸弹,将爱国民主人士、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一家6口

炸成1死5伤,次女何鲁美是女一中学生,当场死亡,何思源的妻子何宜人(原籍法国)受重伤,何思源受伤,送协和医院抢救。

蒋介石一再责令毛人凤:“务必竭尽一切力量,彻底清查打入各军政部门的中共地下党员,宁肯错抓错杀,也不能放走一个。”毛人凤领旨后指使手下的军统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查封了重庆市中共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继而又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并使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近百名地下工作者遇害。当时,毛人凤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他们是为的什么?”

毛人凤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后,在重庆磁器口原来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旧址,设有三个集中营,即:白公馆看守所、杨家山特务队和渣滓洞看守所。杨家山特务队又称为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第一特务队是看守张学良的)。渣滓洞看守所,名义上隶属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实际上由保密局领导。此外,在重庆市内原新世界饭店设有一个看守所,名义上隶属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实际上也是由保密局领导。

1949年10月,蒋介石两次由台湾到重庆,先后指示毛人凤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及将白公馆、渣滓洞和新世界等集中营所关押的中共党员和民主爱国人士,连国民党军统特务中的叛逆者也不放过。在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实施的几次血腥大屠杀,听来令人发指。

在西安事变中,同张学良一同被扣押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原来被军统局囚禁于贵州息烽县多年。1946年秋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后,将其移押于重庆磁器口原军统办事处后面的杨家山平房内,此即戴笠生前在重庆乡下所住过的房子。1949年元旦李宗仁代总统时,宣布释放政治犯,首先宣布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但李的命令等于一纸空文,张学良早就押往台湾,没有

陈诚的手令,谁敢放这位中国第一号政治犯?李宗仁命重庆市市长杨森释放杨虎城时,杨森推说找不到毛人凤,不知道杨虎城囚禁在哪里。其实,杨森不但知道毛人凤是住在上海市蒲石路118号,而且还专程为此事飞上海与毛商量此事。毛将蒋介石的指示告诉杨后,杨即返重庆答复李宗仁。蒋介石在上海解放前夕,严厉地指责毛人凤:“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太少,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当毛人凤请示如何处置杨虎城时,蒋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下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并叮嘱毛人凤,要把杨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当毛问及中美合作所内白公馆和渣滓洞里囚禁的共党分子如何处置时,蒋指示毛人凤道:“我们过去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一齐杀掉!”

毛人凤在奉命后,即派周养浩去贵阳黔灵山麒麟洞押解杨虎城。行前,他和军统西南区区长徐远举、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以及周养浩等仔细研究办法;决定用刀杀害,以免发生惊忧。执行地点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僻静的松林坡“戴公祠”内。陆景清推荐了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2处行动组组长熊强等人来行刑。第2天,毛人凤还看了杨进兴、熊强两人准备的锋利匕首。杨虎城被押到重庆的前一天,毛下令派交警总队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1949年9月6日晚,杨虎城父子及其秘书、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中共党员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都被秘密杀害,就连杨虎城的幼女杨拯桂、宋绮云的幼子、狱中都叫“小萝卜头”的宋振中也未能幸免。当时做贼心虚的特务,为了掩盖他们的暴行,把事先准备好的镪水倒在杨虎城父子的脸上,毁坏了他们的面容,偷

偷地把他们埋在“戴公祠”的花坛里，妄图毁尸灭迹。事后，毛人凤同特务们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1950年1月16日，嘉陵江畔磨儿石码头显得分外庄严肃穆。杨虎城烈士的忠骸移进“庆华”号客轮，离开重庆，前往西安南郊韦曲少陵墓地安葬。解放后，小说《红岩》着重描写了白公馆、渣滓洞烈士殉难的经过。

杨虎城牺牲后，他的两名副官在重庆解放前3天也秘密被杀害。

1949年10月间，毛人凤又奉命把在西南地区逮捕的40多名共产党员杀害于中美合作所原军统岚垭电讯总台附近，其中就有著名的华蓥山游击队政委江竹筠。解放后话剧《江姐》就是以江竹筠烈士的事迹编写的。时任重庆市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本已被杨森保出来了，后来由警察局刑警处长张明选带着特务又将其逮捕，秘密杀害于歌乐山一个碉堡内。

1949年11月25日，大屠杀从重庆白公馆开始。为了避免引起附近渣滓洞看守所“人犯”的惊慌，决定使用刀和手枪。当天下午，毛人凤指使特务首先将张学良的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女共产党员黎洁霜夫妇、进步人士周均等杀害。特务们将黄显声将军骗到离白公馆半里路的步云桥附近一个山坳中枪毙了。黎洁霜在狱中生了一个女婴名幼华，当时不满周岁，她请求给孩子留条活命，结果也被特务将孩子夺去摔在地上；黎洁霜扑向凶手拼命时，被另一个凶手拦腰一刀，砍倒在地，当即毙命，幼华的哥哥小华也惨遭杀害。周均是同济大学校长，因不满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曾在校内公开说蒋是倒行逆施。蒋获悉后，于1944年春令军统局将周均秘密逮捕，囚禁于重庆看守所。朱家

骅因和周均在德国同学，曾向蒋保周开释，未获批准，这次也惨遭杀害。朱家骅同周均都是蒋的得力人才，朱还当过行政院副院长，他的说情都不管用，可见蒋介石对反对他的人，是一个也不饶恕的。这天，70多人就这样被一个个骗去杀害了。其悲惨情状连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也感到害怕，他曾找毛人凤，吵着要立即飞往台湾，他说：“我们这样杀人，将来被共产党抓到后，还能活着出来？”

11月26日，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近200人被杀害。这些人都是当年被捕的，大多数是“嫌疑犯”，毛人凤通知特务，骗他们说换一个地方进行看守，这些人带着行李去了，但他们一到缙丝厂刑场，看到新挖好的大坑，都知道已无生路。其中不少人高呼：“共产党万岁！”在一阵乱枪声中，他们结束了生命。有的没有击中要害，也被抛入坑内活埋。

11月27日，渣滓洞进行第二次集体屠杀，连同10月底的那次屠杀，共计杀害革命志士140多人。第一次屠杀的有《挺进报》负责人、地下党员陈然，共产党学运、工运负责人许晓轩、濮华辅、邓兴邦、刘国志、王濮等42人；第二次屠杀的约百余人；个别共产党员也有释放的，如《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因其兄罗广文是国民党15兵团司令官，曾在广州黄埔军校当过兵器教官和炮兵队长，由于其与杨森等人关系较好，因而才得以取保开释。在屠杀的前两天，军统西南特区会计科长李宪章到保密局重庆办事处领款购买了汽油10大桶，准备屠杀后用汽油焚烧，以焚尸灭迹。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所属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及看守长徐贵林等具体执行。先将“人犯”集中在一间大房子里，将铁门锁上，用机关枪扫射屠杀后，再用汽油将那所房子焚烧。当机枪扫射时，被屠杀的烈士们高呼“共产党万岁”。重庆渣滓洞大屠杀，史称“重庆惨案”。

毛人凤曾奉命暗杀云南省主席龙云，暗杀未遂后，接着他又在香港暗杀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育长、爱国将领杨杰。1949年上半年，杨杰将军在重庆领导民革工作，策动川、康、滇的国民党军队将领起义，久为毛人凤的保密局西南特区所注意，但没有获得确实的证据。1949年8月1日，云南省主席卢汉邀请杨杰在昆明报界联谊会作讲演，题目是《国内外时事分析》。杨杰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曾考察过欧洲各国军事制度。他的讲演生动，分析透彻，其中对时局的分析，曾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国民党统治区好比一条大蟒，黄河流域是蟒的尾巴，长江流域是蟒的身子和脖颈，现在尾巴、蟒身和脖颈都被人民解放军拿住，只剩下两只眼睛，一只是四川，一只是广东。解放军现在正向着这两只眼睛刺去。目前这两只眼睛如何呢？四川这只眼睛第一没有统帅。在四川现有的将领中，王陵基无实在军权，大巴山防线左右两翼守军潘文华和孙元良都曾做过共军手下落荒而逃的败将，不是共军的对手。水晶猴子邓锡候又是不愿吃眼前亏的。胡宗南虽是蒋介石的嫡系死党，但他的军队在陕西被共军歼灭和俘虏很多，其退守四川的军队不会发生很大作用，至于那位不军不政不官不民的张群，更不会披甲上阵。除此之外，四川就没有什么军力了。广东这只眼睛也很空虚，虽有败兵之将亡国大夫阎锡山坐镇，但民心尽失，军心涣散，等到大军压境，这帮家伙非溜不可。”

在那次讲演后，杨杰成为卢汉的坐上宾，昆明自从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教授后，各界人士很快掀起了一股反蒋怒潮，无论是地方实力派，还是平民百姓，都十分痛恨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凡是反蒋的言论和行为都会受到舆论的普遍欢迎。

杨杰的演讲稿第二天便在云南各报头版头条刊登出来。消息传到蒋介石耳里，他大发雷霆，并立即召见毛人凤，气急败坏

地说：“逆贼杨杰，公然站在共匪一边，诽谤党国，应该严办！”毛人凤不知蒋的“严办”究竟是绑架、暗杀，或是扣押、警告。然而他深知蒋的为人一向是阴险狡诈，蒋让手下的特务暗杀了那么多人，如邓演达、宣侠父等，但从来不亲口指名道姓，蒋这样做的是一旦事情败露，好嫁祸于人，自己推得一干二净。有时候，蒋杀了人，还佯装“正义”，装模作样的通缉凶手一番，以掩人耳目。蒋见毛人凤还愣在那里，把手一挥：“越快越好，我听消息。”

毛人凤打电话给云南保密局站长沈醉，让他尽快暗杀杨杰。卢汉怕出事，通知杨杰去香港，一来躲躲风头，二来可应邀参加北平中共召开的政协。杨杰赴港后，毛人凤派叶翔之秘密去香港。叶一下飞机，便根据毛人凤提供的杨杰住址，直奔轩尼诗道303号A4楼，香港巨商伍集成的公寓。

1949年9月19日，杨杰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饭，便到客厅拿起一本英文版军事著作，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这天他特别高兴，因为昨天收到香港中共地下组织的通知，告诉他已买好到北平的飞机票，让他准备一下。他是中共邀请参加政协的委员之一，他到北平能见到周恩来，使他十分高兴。

正当杨杰沉思之际，女佣走进客厅，打断了杨杰的思绪，说：“杨先生，外面有两位先生找你。”杨杰警惕地问：“什么人？找我干什么？”女佣答道：“说是李宗理先生的人，让他们亲自转交给你一封信。”杨杰一听是自己人，就不加思索地说：“那就让他们上楼吧！”

两位先生很快上了楼。杨杰问过他们的姓名后，热情地把他们迎进客厅。杨杰正聚精会神地看所谓李宗理的来信时，一个特务抽出手枪对准杨杰的脑袋就是两枪。凶手仓惶而逃，奔回台湾领赏去了。杨杰这位反蒋反内战的民主义者却倒在血泊

中,凶手是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组的成员韩世昌,同行作案的还有毛钟新、盛昌富。蒋介石闻知杨杰已死,特奖给叶翔之等银元两万元,顾祝同又加发1万元。以后听说蒋介石在由重庆回到台湾后,召见了叶翔之,对叶当面嘉奖,并发给叶“忠勤勋章”一枚。叶翔之早年加入共产党,叛党后任军统局中共科科长,是叛徒中最凶恶的一个。

毛人凤这个杀人魔王,在解放前夕逃到台湾,通过浙江省江山县的同乡、参谋总长周至柔牵线,搭上了宋美龄的关系,成为宋美龄的亲信人物。1951年,毛人凤按照宋美龄的指示,搜集了有关蒋经国的情报,宋美龄以此向蒋介石告了蒋经国一状。“太子”由于被老头子骂了一顿,便对毛人凤怀恨在心,于是他多方搜集毛人凤的情报,准备把这个敢在“太岁”头上动武的特务头子整下台。正在这时,保密局特种技术总队总队长杜长城将买爆破器材和克扣队员薪饷而得的黄金,分给毛人凤一半。蒋经国领导的“总统府资料室”搜集到这个分赃情报,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下令将杜长城等处决,毛人凤吓得慌忙向宋美龄求救,经宋美龄向蒋介石求情,毛人凤才免于死。

1955年4月,周恩来赴万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毛人凤在得到美国和蒋介石的指示后,派保密局的特务赵斌丞到香港侦察周恩来的行踪。赵斌丞查出中国代表团在香港定下印度民航公司的“喀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专机,出席万隆会议。于是保密局做了一架飞机模型,精心研究,采用了将塑料炸药按在飞机上的办法进行谋害。后来,周恩来因故未乘这架飞机改道飞往万隆,幸免于难。而“喀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在空中爆炸,中国代表团成员郑振铎等多人遇难。毛人凤在台湾又一次为蒋家王朝立了“大功”,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1956年10月14日,毛人凤因患癌症病死,经宋美龄要求,

蒋介石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再说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的秘密情报,由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黄埔三期毕业的刘宗宽,迅速传到毛泽东的手中,因而毛泽东对西南战局已成竹在胸。毛泽东指出:“对西南敌人作战,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在作战部署上确定:以2野之4兵团划归4野指挥,于10月配合4野部队攻占广州,继而迂回歼灭白崇禧部于广西境内,后西出昆明。在广州解放后,2野主力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动作,从东南面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华北野战军18兵团及1野一个军,在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率领下,积极吸引和扣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2野断敌退路时,再迅速南下,由北面越过秦岭,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2野主力聚歼西南国民党主力于川西盆地。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西南战役的打法,着重在一个“拦”字,即要迅速占领云南边境,防止敌人跨越国境逃窜,断其退路,歼其主力,实为上策。

1949年冬,在西南战役打响后,国民党川黔防线频频告急。蒋介石于恍惚中方才察觉到人民解放军由鄂西、湘西北进川、黔迂回重庆和成都的意图。11月14日他慌忙由台湾再次飞来重庆,亲自指挥防守川东和重庆的战事,但为时晚矣!解放军已从川东、贵州、川北三面向重庆、成都进军。蒋介石进住山洞林园官邸时,解放大军已离重庆不远了。而在11月23日,国民党行政院通过了蒋介石、阎锡山拟定的在四川推行所谓总体战方案。方案实行军政一元化战时体制领导,划四川为四个作战区:胡宗南负责川北区,孙震负责川东区,杨森负责川中区,王陵基负责川西区。这种纸上谈兵的方案,还未来得及实施,就被解放军神

速地进军碾得粉碎。

11月24日,蒋介石还特别电令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时任国民党15兵团司令官的罗广文,要“严责所部有进无退,死中求生”,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为了防守重庆,蒋介石急令胡宗南的第1军、杨森的20军、内警2总队、宪兵24团在白市驿机场、江津石门场布防,以重庆卫戍司令部的3个师布防于重庆南岸,沿大兴场经黄角埡至九龙坡一线占领防御阵地,堵击解放军进城。

国民党的桂、滇、康等省的军队,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能指望能“安危相依,同舟共济”。能抵抗解放军入川者,仅胡宗南、宋希濂两黄埔一期毕业的门生所率领的30万兵马。11月15日,蒋经国携蒋介石给宋希濂的亲笔信,经过两天的跋山涉水,于17日来到乌江边与宋希濂会晤。蒋介石信中要求宋希濂:“励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定可计日以待。”宋希濂纵有“杀身成仁”的决心,即使阻解放军于乌江,岂能挽救全国之败局。宋希濂只能率部且战且退,速度颇快,11月23日,就退到离重庆仅几十公里的南川。

11月28日,刘、邓大军的陈锡联兵团所辖12军,在军长王近山的率领下,33师、34师、35师三个师先后占领江北各据点;47军则于巴县木洞、栋青场胜利渡江;11军也抵达距重庆区仅10多公里的南温泉,重庆已被包围。蒋介石带领蒋经国巡视重庆市区,见“情况开始大乱”,不无心痛之感。

11月29日中午,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官邸召集军政要员开会,布置撤退及对重庆进行大破坏。晚10点,林园官邸后面已枪声大作,蒋经国催促蒋介石早日离此险境。当时,笔者由黄埔军校22期毕业,分配至重庆国防部警卫团2营任少尉见习排

长,奉命在林园官邸担任外围警戒。

枪声和破坏兵工厂的爆炸声在不远处轰隆隆地响起来,侍卫长、黄埔一期毕业的奉化同乡俞济时见势不妙,他不顾一切,与蒋经国一起将蒋介石推上汽车,并于晚 10 时许向白市驿机场开去。由国防部警卫团团团长、浙江奉化籍的黄埔八期毕业生董兆钧和黄埔十六期毕业的 2 营营长林觉民带领蒋之“子弟兵”在前面开道。无可奈何花落去。至此蒋介石默认大势已去矣,逃命要紧。记得当时公路上车辆拥挤不堪,蒋介石几次下车徒步而行。这天,蒋经国在记述其父子逃离重庆的日记中如此写道:“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队已被共军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 3 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

11 月 30 日拂晓,“中美号”起飞之际,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 10 公里了。这一天,重庆解放,川东南大门至此彻底打开。

国防部警卫团在送走蒋介石后,只好乘卡车随国民党溃逃之军经绵阳抵达成都。蒋介石在逃离大陆后,国防部警卫团扩编为国民党 16 兵团 124 军 60 师,划归孙震指挥。12 月中旬,敌军在行至中江县后,被解放军 4 野 50 军 149 师包围缴械,董兆钧阵前逃走。当时笔者与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学朱斯达等,化装后离开部队,继而参加黄埔军校起义行列,然后调 1 野 18 兵团随营学校学习,直至复员转入地方工作。

闲话少说。且说当国民党在西南大溃逃之际,古城四川宜宾国民党 72 军军长、黄埔五期毕业的郭汝瑰正酝酿率部起义。

郭汝瑰的起义，直接封锁了从川南向云南逃窜的国民党军，因此，这次义举，给胡宗南、宋希濂两位黄埔大师兄增添了不少麻烦。

郭汝瑰，四川铜梁人，1907年出生，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后，赴四川任国民革命军20军政治部科员、独立旅军士队区队长、连长、营长。1929年，郭汝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他愤然回国，于1931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毕业后又进陆军大学研究院深造，后任陆军大学教官，是位军事理论家，一直深受顾祝同的器重。抗战时期，郭汝瑰还冒着生命危险，去看望董必武。由于种种原因，他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是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白皮红心”将军。解放战争期间，他曾任国防部三厅（作战）厅长，他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曾多次向党组织提供了许多军事秘密情报。郭汝瑰的单线联系人是中共中央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任廉儒，其公开的身份是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1948年岁末的一天，郭汝瑰化装后来南京《益世报》报馆，会见联系人任廉儒，他俩已是多年的老朋友了。相见后，任廉儒关切地问：“汝瑰同志，那边有人注意你吗？”郭汝瑰答道：“邓文仪（黄埔一期毕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笔者注）前段时间到处张扬，说我是共产党的内奸，被我大闹一通，他现在再也不敢乱说了。”

郭汝瑰为什么有恃而无恐呢？原因有二：一是他加入共产党后，全是单线联系，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别人抓不到什么把柄；二是他有个哥哥叫郭汝栋，即郭松云，国民党陆军上将，先后担任过川鄂边防军司令、20军军长、43军军长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事等职。由于郭汝栋当时是川军中比较能接受革命思想的人，中共四川省委的吴玉章对他抱有很大希望，郭又与杨闇公（杨尚昆之胞兄）、李筱亭、尹肇周等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关

系很融洽，所以，他有郭汝栋这样一位长兄撑腰，胆子也就大了。

任廉儒说道：“汝瑰同志，我已把你的愿望向上级领导请示了。”郭汝瑰急切地问：“领导同志批准了吗？”任廉儒解释说：“你的愿望，我们非常同意，但是党组织认为你现在去解放区，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与其去解放区，还不如想办法利用你的特殊身份，再为党做一件事。”郭汝瑰问：“党组织让我去做什么呢？”

任廉儒说：“从目前的形势看，解放军渡江和解放江南都不会遭受很强的抵抗。只是西南地势险要，又与越南、缅甸交界，蒋介石必然要在西南做最后的挣扎。西南的一场恶战是不可避免的，你现在如果能争取到西南去，到那时再想法率部队起义，从内部瓦解敌军，影响蒋介石的作战进程，这样发挥的作用不是更大吗？”

任廉儒传达上级指示，要郭汝瑰在川南埋下一着“暗棋”，到了关键时刻，才可启用这着“棋子”。任廉儒关怀地继续道：“不过这样做的危险很大，一旦暴露，蒋介石是不会饶过你的。汝瑰同志，你仔细地考虑一下，党组织一定尊重你的意见。”

郭汝瑰在国防部专管作战方案，部队战斗力再强，如果有人“里应外合”，那就会全盘皆输，这样的例子他最熟悉不过了。曾泽生在长春起义，郑洞国就只好输诚；吴化文在济南起义，王耀武只好化装外逃；廖运周在淮海战场上起义，黄维的12兵团全军覆没。如果郭汝瑰在西南率部起义，就会要宋希濂、胡宗南的小命。郭汝瑰想到能为党立功，于是就信心百倍地表示愿意接受任务。1949年2月4日，经郭汝瑰反复争取，蒋介石任命他为国民党72军军长，暂率部驻扎重庆。

郭汝瑰到重庆后，即着手扩充军队，同时调整人员，为起义作准备。他先将许亚殷调来任军参谋长，因为许是他的旧部，同时许对72军比较熟悉情况，可以帮助他做起义的准备工作的。

1949年5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令72军驻守内江、泸州、宜宾一带,郭汝瑰认为宜宾地处四川西南角上,便于诱导起义。为能在宜宾扎下根,郭汝瑰通过罗广文的保荐,被委任为叙泸警备司令,但泸州专员兼分区保安司令、黄埔二期毕业的罗国熙是军统特务,他非常仇视共产党,要应付这位顽固的大师兄,必须慎重行事,免得出差错。不久,陈诚派国防部预算局局长赵志尧来到宜宾,劝郭汝瑰先将家属送往台湾。此举名为照顾,实为扣押人质。郭汝瑰以“夫人娘家是开药铺的,不是共产对象”而拒不送夫人赴台,赵志尧只好快快地走了。

1949年10月,蒋介石在重庆召见郭汝瑰,同时被召见的还有14军军长、黄埔五期毕业的陈春霖。蒋要他们“精诚团结,克尽职守,为党国效忠”,并提升郭汝瑰为22兵团司令官。

郭汝瑰在回宜宾后,西南战局急转直下,11月30日,重庆解放。郭汝瑰认为起义的时机已到,他就抓紧做手下两位师长的思想工作:一位是233师师长赵树德,一位是104师师长傅秉勋。他们都同意起义。12月9日,郭汝瑰在宜宾率部15000余官兵正式通电起义。远在北京的傅作义的参谋长郭宗汾看到通电后,激动地说道:“快了,快了,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起义了。”后来,郭汝瑰所属104师师长、黄埔五期毕业的傅秉勋叛逃,率残部成立川康青边区反共突击军,自任司令,1953年在四川松潘被人民解放军击败,傅秉勋阵亡。解放后,郭汝瑰任川南行署委员兼四川省交通厅厅长、《中国军事史》主编、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并致力于和平统一中国的事业;1980年4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1月28日,郭汝瑰应邀由重庆来到武汉市金口镇参加“中山舰”整体打捞出水仪式。90高龄的他不顾旅途劳累,兴奋地说:“看到中山舰出水,我太高兴了。”1997年9月26日,郭汝瑰参加了黄埔军校同学会

会长办公会议。10月17日在北京遭遇车祸,23日晨与世长辞。

郭汝瑰逝世后,他的好友耿达赠诗一首,曰:

半生戎马寻真理,一片丹心为黎民。
矢志革命求一统,独钓龙潭建奇勋。
耄耋秉笔修战史,主政蜀埔率群伦。
台岛未归留遗憾,亮节高风永长存。

高云敬悼郭汝瑰同志逝世,填《水龙吟》词一首,最能概括郭老的一生:

忽传噩耗惊心,新知归雨惜国土。北伐抗日,功追黄埔,继孙(孙中山,笔者注)有志。救国福民,和谈弭战,宗周(周恩来,笔者注)同气。重团结民主,竭忠尽智,心向党、无私虑。

响应刘邓大义,据宜泸、川南举事。辞官兴教,献身军史,利名罔计。参政离休,心存邗治,畅抒宏议。促统一,尽瘁毕生论定,事国堪忆!

正是: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追歼残敌 解放军逼近成都 众叛亲离 蒋介石逃离大陆

话说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这时候,刘伯承、邓小平的2野分由贵阳、重庆地区迅速抢占乐山、邛崃、大邑等地,完全截断了胡宗南、宋希濂等残敌向西南逃跑的道路;同时,原华北野战军18兵团划归1野指挥,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由陕西翻越秦岭直取四川广元、剑阁,沿川陕公路直逼绵阳、广汉,协同2野完成了对成都敌人的包围。

12月1日,2野3兵团12军解放璧山,俘虏重庆逃敌1000余人。3日,4野14兵团42军124师解放川东门户奉节县。4野13兵团47军主力一部轻装奔袭悦来场,俘虏敌副师长以下千余人;另一部于2日解放长寿。不久,47军船运湘西归还建制。4野15兵团50军军长曾泽生自11月下旬分别由利川、巫山进入四川作战,于丰都、涪陵渡江后分路北进,先后解放垫江、邻水、大竹、渠县、营山、蓬安等县城,全歼国民党川陕鄂绥署辎重营、重庆卫戍总部反共警备中队、湖北保安独立营等部。而后至遂宁、射洪一线待命。42军在解放奉节后,于12月8日解放川东重镇万县,9日解放开江。此时,2野指挥机关进驻重庆市,陈锡联、曹荻秋分任重庆市正副市长。至此,川东大门、川北剑阁天险均被突破。国民党主力胡宗南、宋希濂、陈克非部退至川西,而陈赓的4兵团则日夜兼程从广东、广西向云南追歼白崇禧

的残部。陈赓回忆,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他的4兵团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西南追歼逃敌,15日22时,攻占三水市,国民党103师起义。当陈赓知道103师师长陈一匡等是黄埔校友时,风趣地说:“师兄打赢了师弟,师弟跟着师兄走!”陈赓兵团17日占佛山。在重庆临近解放时,广东、广西战役早已宣告结束,陈赓的大部队已进入云南边境,设卡堵击溃逃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防止他们越境外逃。

解放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了成都,解放军总兵力约50万。而国民党军这时溃逃至川西平原的嫡系部队只有40多万人,主力为胡宗南的5兵团(黄埔一期毕业的李文)、裴昌会的7兵团及李振的18兵团,共12个军。由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挥的有钟彬(黄埔一期)的14兵团、陈克非(黄埔五期)的20兵团,共6个军零4个师。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接指挥的罗广文(黄埔教官)的15兵团,辖两个军。归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指挥的有孙元良(黄埔一期)的16兵团,辖两个军。

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仓惶乘飞机逃往成都。蒋介石一反他平日行踪保密的习惯,成都各报在12月1日都以头版头条刊登了蒋介石来蓉的消息:

中央社:蒋总裁今日晨九时许,乘“中美”号专机由两架驱逐机护卫,自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来蓉,降落新津机场。黄少谷、俞济时、谷正纲、陶希圣、蒋经国、沈昌焕、周宏涛、曹圣芬、夏幼权等随行。成都方面,陆校张耀明校长、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徐焕升,均赴机场恭迎;省垣各要员,均未及前往。总裁驻节军校官邸,十一时许,阎院长、王主席等,赴军校晋谒。

又讯:蒋总裁十时许到达北较场,约阎锡山院长晤

谈,张群、王陵基、严啸虎于十一时前往军校晋谒。

蒋介石进住成都北较场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的黄埔楼内,席未暇暖,就召见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都市警备司令严啸虎等人,面授机宜,指挥一切。

但是,川东崩溃得太快,他的“保卫大西南”计划在现实面前已告破产。这时候,他又决定采取数月前曾反对过的胡宗南、宋希濂的计划,准备把胡宗南的部队撤往西昌。

读者会问,胡宗南、宋希濂几月前向蒋介石直谏的计划究竟是什么?这里不得不补充交代一下。

原来,在1949年8月初,蒋介石已把注意力转到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他希望凭借天府之富,作其最后挣扎,是故宋希濂的部队由湘鄂西移,准备退保川东。在陕南、甘南的胡宗南部队,也准备退入川北。于是,这年8月中旬,这两个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黄埔一期的大将碰头了。

8月初,宋希濂把他的司令部由巴东移到湖北恩施后,于9日飞往重庆。他当晚去拜会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10日又拜访了“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然后与胡宗南通了电话,约定11日在陕西汉中相见。11日下午3时,宋希濂乘军用飞机抵达汉中,胡宗南亲到机场迎接。胡宗南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编在第4队,而宋希濂则编在第1队,两人在校关系就不错;如今各自掌握重兵,成了蒋家王朝最后两张“王牌”。他俩深感时局艰困,责无旁贷地要挑起这副重担。当天夜里,俩人就开始长谈,一直谈到深夜两点,足足谈了6个小时。他们的话题先从国民党这20多年的统治开始,认为:政治上贪污成风,腐败无能,弄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经济上弄得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党务一团糟,虽有几百万国民党员,但毫无组织力量,一盘散沙;在军队中也矛盾重重,派系林立,指挥不统

一，士气消沉。这三年来一败再败，大有江河日下，无可挽回的势态。两人在唉声叹气之余，又提出下列几个问题来谈：一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在短期内爆发？二是中共党内有没有分裂的可能？三是就目前的形势分析，能否保住西南、华南和台湾？四是如果共军向西南进攻，能不能与之决战？如果不能决战，又该怎么办？

胡宗南、宋希濂谈到最后一个问题时，两人认为前途不可乐观。照他们当时估计，解放军正规部队已发展到400多万，而蒋介石的部队，经过三大战役，精锐已损失殆尽，剩下来的100多万军队，除了他两人掌握的40万军队外，余皆残兵败将，没有什么战斗力，与共军决战，取胜希望渺小。在谈话中，两人不免流露出对校长的抱怨情绪，认为老头子死要面子，斤斤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不知保存有生力量；在战略上也有错误；而且老头子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部队中又分嫡系和非嫡系，闹得兄弟友军不团结，不能互相支援。

胡、宋两人最后得出结论：为了保存实力，静待时机，必须设法避免部队被共军包围消灭。在共军尚未向大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应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俟共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应立即将主力转移至滇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移至滇南之车里、佛海（即西双版纳）一带。如将来再受共军压迫时，则以主力退入缅甸，以一部退至滇、缅、泰边境。又顾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及敌对行动，所以必须具有击破缅军之决心和力量。在转移时，必须尽最大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重炮及山炮等。根据这一决策，商定由胡宗南设法抽调约一个军的兵力，开驻川南的乐山、峨眉、新津等县，准备进入云南及西康；由宋希濂抽调一部分兵

力,并驻泸州、宜宾,为将来主力由盐津、昭通、会泽等地开往滇西做好准备。

为使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应先解决卢汉、刘文辉的地方部队,以控制云南、西康,并以西昌作为第一个根据地。对于这个方案,等蒋介石到重庆时,向他当面陈述;如不答应,就犯颜直谏,不顾及师生情面,以党国利益为重。

8月24日,蒋介石由台湾经广州飞到重庆,胡宗南、宋希濂乃相约前往重庆山洞林园官邸见蒋,面陈他们在汉中商定的方案。

当胡、宋将方案面陈后,蒋介石认为:一、展望未来,两广势难保持,在华南放弃之后,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够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二、如果把大陆完全放弃,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三、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其是四川,人力物力很充足,必须保持这一地区。四、刘文辉、卢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只要他们不在后方捣乱,应设法加以拉拢。结论是:不同意主动退到滇缅去。

胡宗南、宋希濂在老头子面前只好把“满腹经纶”暂时搁下,也没敢犯颜直谏,一切只好听天由命了。

且说从胡、宋提出计划到12月1日,仅仅只有三个多月。这三个月的宝贵时间,坐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周恩来却于10月13日致电1野彭德怀,指示:“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18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刘金轩部及7军配合作战。……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2野进至叙、泸、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12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2野主力两个兵团现到常德、湘潭之线,大约12月可到川南。……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兵力为2野全军及

18兵团,共约60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见发起西南战役的“火候”已到,便向刘邓发出命令,命令指出:刘邓明后日经汉赴湘指挥2野向四川进军,3兵团、5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待命。……西南重心是四川,我2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叙、泸、渝一带;贺率18兵团则于1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白崇禧是否退滇,我3、5兵团只准备一个军(18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5个军、两个兵团部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12月到达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否则,150万人的财经问题将陷于极大困境。这里所说的150万人,一是指我军60万(2野50,贺10),二是张群所属国民党4省人员据说有90万,主要在四川。

毛泽东不仅安排了精确的战争时间表,而且还把国民党在西南起义投城被俘的官兵吃饭问题都考虑进去了。毛泽东意欲端蒋介石的老窝,由东大门入川,声北击东,迂回云南,截断蒋军逃缅退路。

蒋介石却错误的估计了形势,仍认为“毛泽东惯用声东击西战术,共军入川的真实主攻方向在川北,而不在川东。其主力由川北直趋成都,上湘黔路再趋昆明,切断川桂联系,以囊括西南”。这样,蒋介石制定的西南作战计划以防川北共军为主,而对陈赓从广西入云南则未予以足够重视。蒋认为利用三峡天险阻敌于川东不在话下。

结果,战局急转直下,2野从川东、黔北打进了四川,并迅速占领泸州、宜宾、乐山,使宋希濂就是脚上抹油,也逃不出解放军

布下的大口袋。就在蒋介石来到成都后,其多次与宋希濂联系都联系不上,一时宋希濂的 10 万大军消声匿迹,无影无踪。究竟宋希濂逃到何处去了呢?暂且不提,以后自会揭晓。

且说蒋介石正想将胡宗南的部队撤往西昌。他的方案分三方面:一、对亲信如胡宗南者,要他们即作撤退的准备;二、让一些地方势力及非嫡系部队与解放军纠缠,以掩护亲信部队撤退;三、对刘文辉、邓锡候等异己势力,尽量设法羁縻利用,不能羁縻则加以消灭。为了不使非嫡系部队发生动摇和不让嫡系部队明白他的意图,在表面上则仍渲染所谓“川西决战”,借以稳住阵脚。

12月4日上午,蒋传见 20 兵团司令官、黄埔五期毕业的陈克非,对他退却丢失川东只字未提,反而对他的家属关怀备至,问:“你的太太走了没有?”陈答:“我家眷没有走,现在都到了成都。家里有 81 岁的老母,5 个女儿,两个侄儿,15 军军长刘平的家属也没有走。”蒋转向俞济时吩咐道:“你要空军派一架专机,把陈司令官的老太太同他的家属送到台湾去,其他各军长的家属也要陆续运走,就照这样子办。”

蒋介石在抵达成都后,还有一桩心事未了,那就是今年 2 月 11 日服安眠药自杀的结拜把兄弟戴季陶的新坟还未去祭吊。“戴公墓”刚修好,9 月份在成都黄埔军校东面的文殊院举行过公祭,蒋介石带着儿子经国去戴公墓默哀了几分钟,总算尽了一份心意。

12月4日,蒋介石在北较场“黄埔楼”接待了美联社记者慕沙,发表了谈话,他说:“余此次应李代总统之邀入川,正值共军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亟愿李代总统急返中枢,共挽危局,而李代总统却决意出国。余为国民一分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唯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大陆军民共

同奋斗。”

蒋介石也有自知之明，俗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他乃“引退”之人，当然处处不能以“总统”自居。李宗仁于1949年11月20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广西南宁飞往香港，再转赴美国就医。实际上，李宗仁此时对收拾桂、黔、滇残局已毫无信心，深知“西南弃守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不如一走了之。而蒋此时还未复职，只好表示希望李代总统再返大陆视事。蒋介石对慕沙还论及了中国大陆的反共战斗形势。他说：

“重庆沦陷，西南局势更步入艰苦之境，但世界民主各国人士，应知中国大陆反共战斗，不仅并未停止，反而不顾任何代价，一切牺牲，亦且益趋扩大，刻在各地结集军队，使西南反共战斗持久。……中国共党在莫斯科指挥之下，企图以暴力吞并中国国家，奴役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然中国人民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为独立自由而战，绝非暴力所能屈服。”

12月7日，蒋介石眼看形势越来越不妙，终于召集顾祝同、张群、胡宗南等做了这样的决定：

命令政府迁往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作战。此令。

蒋中正

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蒋经国则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对于中央政府驻地问题，曾经数度研究。起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俟机反攻，收复失土。到此乃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矣。因于晚间作重要决定，中央政府迁往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司令部。

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广州，再迁重庆，迁成都，如今不得不迁台北。这是蒋介石节节败退的轨迹。

为了游说卢汉，蒋介石派张群飞昆明，企图作最后的争取。

这天，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秉承最高当局密令，急忙将各特务机关在西南各地逮捕囚禁的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革命青年和其他爱国反蒋志士许寿真、毛英才、晏子良、王伯高、谷时逊、王于青、余天觉、黎一上、杨伯恺、王建昌、曹立中、张大成、于渊、姜乾良、黄子万、田宗美、刘俊达、王侠夫、陈天钰、杨辅宸、廖兢寒、方智炯等，用汽车押往成都新西门外十二桥一块菜地里秘密杀害，并就地挖坑掩埋。其中，黎一上是黄埔军校教官，他从北较场黄埔军校中智取军用地图供地下党使用，被发觉后逮捕，这天残遭杀害。特务们用手枪、刺刀把受害者一个个残杀在防空壕中，行刑时 10 多辆汽车马达轰鸣，以掩盖枪声和惨叫声。王于青第一个挣脱口中的棉花团，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接着，勇士们和着一腔热血喷出口中棉团，高呼：“我们的死期就是你们的末日！”他们倒在了曙光在望的黎明前，是成都临解放前牺牲的最后一批烈士。

12月8日下午3时，蒋介石在侍从室主任俞济时、蒋经国陪同下，带了1名卫士，乘一辆黑色小轿车，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保密情况下，驶出黄埔军校东大门；在市区巡视了一周后，于晚6时许返回北较场。此时黄埔楼前，张群带着云南黄埔嫡系将领余程万、李弥、龙泽汇三人急忙面见蒋介石。张群是刚从昆明坐专机来蓉的，他一见蒋就开口大骂云南省主席卢汉这几天正在戒鸦片，情绪反常，公私情义皆所不顾，托口要钱，实有投共之意。三位军长在一旁也分别汇报了各自所掌握的情况。侍卫长俞济时提示已经晚8点多了，是否吃了晚饭再谈，蒋点头指着所有的人说：“好好，大家一同吃饭，边吃边谈。”

这时,空军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叔铭急匆匆地跑上楼,向蒋报告说,由于原来预定运到成都的 8000 吨汽油还没有运到,以后飞机班次只好缩短航程,分段运送,因而直飞台北的飞机只能先飞海南岛,再转飞台北。这天,行政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政务委员陈立夫、万鸿图、教育部长杭立武、财政部长关吉玉、总统府秘书长邱吕渭、参军长刘士毅等人已于中午乘“美龄”号专机离开成都赴台北。

这天晚上,黄埔军校送来一份报告,说校本部人事科科长文钰在办公室内手握总理遗教服碘化钠自杀。文钰字锦心,湖南益阳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与先父同期,来军校工作 10 余年,仍然是陆军上校,国事家事、个人前途均感绝望,才寻短见。蒋介石欲哭无泪,然后在一份《成都自 12 月 9 日起开始疏散》的报告上签了字。蒋介石固守川西的念头开始动摇。张群等奉命明日再飞昆明,对卢汉作最后争取,余程万、李弥、龙泽汇随机返昆明布防。

12 月 9 日,黄埔六期毕业、刚被任命为成都防卫司令的胡宗南部第 3 军军长的盛文乘车来到北较场黄埔楼会见蒋介石,请示成都防卫问题。蒋介石的话很简单,连声说了几个“杀”字,又咬牙切齿地叮嘱:“乱世要用重刑。”

盛文会意,告辞出来,回到西较场防卫司令部,与市警察局长何龙庆、宪兵团长郭大任(黄埔六期毕业)、民众自卫总队副队长乔曾希,以及严啸虎、余锦源协商,定出“违反治安禁令”,被成都市民称之为“盛文十二条杀令”,禁令规定:有聚众暴动者杀、泄漏机密者杀、纵兵殃民者杀、造谣惑众者杀、行车不听指挥者杀、纵火者杀、聚众抢劫者杀、破坏交通者杀、无故鸣枪者杀、强拉民夫者杀、强奸者杀、擅取民物者杀。成都市一片杀气腾

腾,春照路农民银行前、孙中山铜像背后被杀者陈尸街头,市民躲在家里,视上街为畏途。

下午2时,蒋介石在电话中得知张群等人已顺利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同机去昆明的还有刚任命的西南军政副长官孙渡。冬日天短,蒋介石这天有三处来电,向他报告了令他“痛心不已”的消息:

宜宾来电:国民党22兵团司令官兼72军中将军长、黄埔五期毕业的郭汝瑰率3个师投向中共。

晚10时许,昆明来电: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张群、李弥、余程万等被扣押。

彭县来电: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候、潘文华宣布起义,所属24军、95军在郫县、彭县、大邑、灌县一带集结待命。

整个下午,黄埔楼内一片混乱,蒋介石闭目坐在沙发上沉思,他已没有力气站起来,也没有力气说话。戎马生涯几十年,从黄埔建军,东征北伐,抗日战争,胜利的光彩似乎就在昨日。但作为国民党的统帅,他从来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然而,从抗战胜利到今天,仅仅三年多,国民党军就败得一塌糊涂,输得精光,江山风雨飘摇,众叛亲离,他带着这样的命运去写历史,是何其痛苦和难堪啊!他吩咐副官党春明通知胡宗南速来黄埔楼,一连催了三次。胡宗南、王陵基终于来了。前两天,蒋介石说要开紧急会议,通知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前来,可是,这三人始终没有进黄埔楼,于是蒋心中就产生疑虑,但没有想到会变得这么快,难怪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在这几天总是避而不见。蒋介石前两天十分恼火,不得已派了刘文辉的好友王缙绪去找刘,刘仍不肯出来见蒋。最后,蒋介石只好对王缙绪说:“你去告诉刘文辉,人与人是要讲感情的,他做了我多年的部属,就算我今

天死了,他也是应该来送葬的。”可是,王从刘那里回来后,只是摇头叹息,向蒋介石报告说:“刘文辉已经靠不住了,他家里尽是一些古里古怪的陌生人。”

当蒋介石终于明白了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已投共后,他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从张群在昆明被卢汉扣押,忽然想起13年前他在西安被张学良扣押的惨痛教训。12月12日这个难忘的日子,他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于是,对着儿子蒋经国异常平静地说:“经国,准备一下,咱们明天也该走了。”蒋介石不想在这里久留,尤其怕过12月12日这一天。

说来也怪,蒋还没有动身,12月8日成都的晚报刊出一则消息:

蒋总统已于今晨乘中美号专机离蓉,因事前未通知,故王陵基主席等均未赶上送行。

读了这则新闻,国民党95军副军长杨嗣轩、联勤总部44补给区参谋长王樵生,他们秘密在成都华兴正街95军军部旧址组织的“捉蒋敢死队”大失所望,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一由中共地下党员吕振修等同志提出的周密计划。

话分两头。先表一表卢汉起义。

卢汉,云南昭通人,彝族,国民党陆军上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经常受到排挤和打击。他亲手带的国民党60军,先后调离云南去东北参加打内战,使他极为不满。卢汉早就有起义的念头,只是找不到与中共联络的渠道。

1949年8月15日,黄绍竑、龙云、覃异之等44名国民党将领在香港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龙云与卢汉虽是姑表亲,都是彝族,年轻时两人一同投奔滇军,但二人关系复杂,矛盾由来已久。

老主席龙云起义，一定是与共产党有联系，龙云还派夫人顾映秋和儿子龙绳勋潜回昆明劝卢汉早日起义。龙云经常批评卢汉：“永衡（指卢汉，笔者注）不懂政治，大好机会白白放过了。”卢汉受到龙云的影响，积极想办法向共产党表示有起义的诚意，但一时找不到联系渠道。这时，周恩来、朱德也正通过各种关系，向卢汉传递信息，争取卢汉在关键时刻义举，切断国民党残部溃逃缅泰边境的通道。

1949年11月6日，广州市东山解放军2野4兵团司令部，陈赓司令员向范子明、吕永祯两人交代秘密使命：“西南战场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这次派二位回云南做卢汉的策反工作，就是给卢汉一条出路，这样做，可以加快全国解放的时间……”

范子明是黄埔三期毕业的学生，与周恩来相识，大革命时期他加入了共产党，与陈赓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1927年蒋介石叛变，范子明吓不过，投靠了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范被俘。后来他写信给周恩来，要求给予立功赎罪的机会。吕永祯是范的同乡和部下，是周恩来批准他俩做瓦解国民党的工作。范、吕两人潜入昆明，先后策反过李弥及余程万，终因李、余顽固，没有达到目的。后来，周恩来又派北平和平起义的傅作义将军的亲信、北平警备总司令周体仁潜回昆明，通过93军军长、黄埔八期毕业的龙泽汇了解卢汉的思想动态，并捎去叶剑英、朱德的口信，相机起义，与卢汉相约，时机一旦成熟，立刻与中共联系，争取一致行动。

卢汉手下的93军龙泽汇军长与在滇桂黔边区人民武装游击队司令朱家璧曾在黄埔八期同学，毕业后一同回滇军任职。朱家璧于1938年脱离滇军，前往延安加入了共产党，并在“抗大”学习，毕业后，派到中共南方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当时周恩来与朱家璧在卧室内促膝长谈，最后周说：“你回云南，最

好以进步面貌出现，不要装落后。你去过延安，进过抗大，人家都知道。所以装落后人家也不相信。”

1941年初，朱家璧回到云南。5月，他去昆明找龙泽汇，毫不隐晦地对他说：“我是从延安回来探亲的。”龙泽汇带他去见旅长卢浚泉，卢一见朱是个人才，就留朱在手下当营长。以后他拉队伍打游击，正式打出人民游击队的招牌。卢浚泉是卢汉的叔父，后来他的93军在1948年辽沈战役中被歼，卢浚泉被俘。周体仁会见卢汉之后，也谈到卢浚泉在解放区学习的情况，说如果卢汉一定要见叔叔的话，他可以向中共领导人传达这个意思，让卢浚泉回昆明。

卢汉还通过宋一痕赴香港秘密与中共华南局联系，宋一痕于1949年6月赴北平，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当时周对云南起义做了三条指示：第一条，欢迎；第二条，既往不咎；第三条，等待时机成熟起义。

宋一痕从北平返香港，让妻子席淑英留港当联络员，他本人潜回昆明，向卢汉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卢汉听了很受鼓舞，并高兴地说：“看来我走起义这条路确实走对了。”以后，卢汉每天派车将宋一痕从青龙巷接上五华山进行秘密的起义筹划工作，并将宋一痕化名为“白云”，接送的人都称他为“白参议”。

卢汉又同朱家璧、周体仁取得了联系。这样，1949年12月9日，当张群、余程万、李弥、龙泽汇由成都飞来昆明后，卢汉认为时机已到，千载难逢，当即作出起义的果断决策。为迷惑蒋介石在昆明的军政人员和特务耳目，当晚设宴，并借张群之名，将蒋介石在昆明的军政首脑一网打尽。张群、余程万、李弥、沈醉、李楚藩、沈延世、石补天、童鹤莲都吃了“鸿门宴”，被软禁在五华山光复楼内。张群急忙向蒋挂长途电话，但电话早已撤了线。远在成都的蒋介石，是从保密局特务系统的加密加急情报中获

悉卢汉投共这一消息的。在张群被扣后,一再向卢汉表示:“他没有军权,留他无用,望念及昔日旧交,放他离昆,则感恩不尽,他保证今后到国外去当寓公,决不再搞政治活动了。”龙泽汇遵照卢汉的意见,带张群于11日上午来到飞机场,特许张群搭乘英国环球航空公司一架班机飞香港。当时龙泽汇对张群说:“张长官要走,我们不强留。云南起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望去后多为国家着想,善自保重。”

卢汉在云南起义后,于12月10日给四川的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发来电报,请刘会同四川将领,将蒋介石扣留,说这可成为“人民政府第一大功臣”。

再说说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在四川省彭县起义经过。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文辉与蒋介石共事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为了争夺地方权势,他多次反蒋遭到失败,认为在蒋的掌中求生存,迟早有一天会被挤垮,所以时常盘算着后路。

刘文辉,字自乾,四川大邑人,保定军校毕业。在川军中他由连、营、团、师、军长直升至四川省主席,后任西康省主席;拥地方武力10万,号称“西康王”。

中共历来重视统战工作,周恩来把“使军阀的军队渐渐觉悟”作为政治任务之一。当年,中共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就担任了刘文辉的秘密政治顾问,共产党员李静轩担任了刘的秘书长。他们对刘文辉及其部属张清平(即张志和)、李铁夫、吴景伯等都开展了工作。后来张志和由共产党员洪沛然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而李铁夫则成为刘文辉和共产党进行接触的联系入。1937年8月,张志和随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李一氓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以后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先后在重庆和成都与刘文辉见过面,对刘思想影响很大。1942年6月,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王少春被周恩来派往雅安任电

台台长,秘密与中共联系,王少春成为刘文辉的顾问。刘文辉的参谋长杨家桢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脱党,经过我党多方教育,杨做了不少有利于革命的好事。民主同盟的张澜也对刘文辉进行过开导。1949年9月,刘文辉拟了一份电文,请王少春发给周恩来。电文称:

多年来,自乾受蒋压迫,积怨难言,处境困难,只好暗作准备。今已与邓晋康(邓锡候)等部约好,决定起义投向人民。今后行动请予指示:

周恩来的回电很快就来了。电文是:

大军行将西指,望兄积极准备,相机行动,时间不宜过早,以免遭受不必要损失。

刘文辉接到周恩来的回电后,立刻加紧准备,同时联络潘文华,准备一致行动。

9月上旬,中共川东临工委成都地区负责人熊扬与刘文辉的代表杨家桢具体商定起义时机,准备以及起义后配合解放军的具体部署。

11月30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成都后,下午即召集刘文辉、邓锡候、王陵基、熊克武、王缙绪开会,强调大敌当前,一定要精诚合作,并部署“川西决战”,要刘文辉、邓锡候表态。从12月1日起至9日上午止,蒋派张群、胡宗南、王缙绪多次上门逼刘就范,都被刘虚与委蛇,搪塞过去;且家属不去台湾,也不愿与胡宗南合署办公。12月7日,邓锡候到刘文辉家,同刘商量出走的办法,刚坐一会儿,王缙绪也跟踪而来。9时许,蒋介石从黄埔楼打电话约刘、邓赴北较场开会,时间是下午4点。刘、邓二

人惟恐突生事端、忙把王缙绪支走，立即研究出走办法，并通知潘文华，望其马上行动。

邓锡侯、刘文辉乘车开往彭县的崇义桥，刘文辉即电西康军政负责人，按既定计划准备行动，同时指挥 24 军、95 军进入战斗准备。

12 月 8 日，中共川西地下党、川康地下党、川东地下党、2 野先遣人员及各民主党派人士先后来到彭县的龙兴寺。当时刘、邓、潘都赶到，参加起义工作，一时间，龙兴寺成了川康起义的中心。

12 月 9 日，刘文辉命驻在雅安的杨家桢拟好起义通电稿，正式交给设在那里的中共秘密电台发出：宣布刘、邓、潘所部全体官兵正式起义，川康高级将领黄隐、刘元瑄、伍培英、刘元琮等亦发出通电拥护起义。

1949 年 12 月 10 日，成都秩序大乱，时有枪声大作，人心惶惶不安。这时，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众叛亲离。侍卫人员反映，军校附近出现可疑人物，认为是刘文辉的便衣队，建议蒋介石从军校后门去飞机场。蒋介石则说：“我从哪个门进来，也从哪个门出去！”下午 2 时，蒋介石偕蒋经国、俞济时、谷正纲、沈昌焕、曹圣芬从黄埔楼乘坐两辆轿车，从北较场军校大门风驰电掣驶向成都北郊凤凰机场，在“中美”号专机发动后，他们次第登上了飞机。

就在此时，胡宗南、王陵基乘车赶来，蒋介石与他俩一一握手，最后说：“拜托了，胡长官、王主席！”然后转身，大踏步走上舷梯，站在舱门口摇摇手，进了飞机舱内。

舷梯撤去，“中美”号专机开始在跑道上滑动，加速，突然拉起机头，呼啸着腾空而去，飞机很快消失在成都上空。

蒋经国在 12 月 10 日日记中记载：“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

辉、邓锡候公开通电附共之时。”

王陵基 1965 年回忆，蒋介石离开成都是在 10 日。那天清晨，他正准备躺下去睡一会儿。得知蒋介石要走，便急急赶往凤凰山机场送行。

12 月 11 日成都《新新闻》头版刊登这样一则消息：“蒋总统昨离蓉赴台。”

不过，近年来也有人认为蒋介石是 12 月 13 日离开成都的。后来，蒋经国在《蒋经国自述》一书中，回忆父亲蒋介石在中国那段充满风险的最后日子时，是这样写的：

此次(父亲)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

12 月 10 日下午 6 时 20 分，飞机在台北机场降落，用蒋介石的话说：“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此不再回大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穷途末路 宋希濂峨边被俘 沧海桑田 黄埔校喜获新生

话说重庆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迁往成都。蒋介石曾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西南一隅。为此，他令两个最得意的黄埔一期将领胡宗南和宋希濂，一个守护入川的北大门，一个守护入川的东大门，从而妄图阻断解放军入川的通道。

1949年11月1日，解放军2野3兵团、5兵团发起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负责川东防守的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挥的部队有国民党14兵团、兵团司令官为黄埔一期毕业的钟彬，20兵团，兵团司令官为黄埔五期毕业的陈克非。两个兵团辖6个军零4个师，计有刘平（黄埔四期）的15军，方靖（黄埔四期）的79军，丁树中（在校名丁昌，黄埔四期）的122军，陈克非兼2军军长，顾葆裕（黄埔四期）的124军。还有陈希平的118军及由湘西地方武装改编的新11师，师长田载龙；新2师，师长周燮卿；新3师，师长陈子贤；新4师，师长罗文才。总兵力约13万多人。

宋希濂是国民党军中有名的鹰犬将军，字荫国，湖南湘乡县溪口人，生于1907年。其“先世多为文人”，曾祖父随左宗棠镇守西北边关，在甘肃任过知府。宋希濂与陈赓、李默庵一同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加入了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东征，

不久,经陈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宋便和中共脱离了组织关系。他和李默庵是最早退出共产党的黄埔学生。“四·一二”政变后,正在苏州医院养伤的宋希濂感到彷徨无路,曾写信给蒋介石,蒋复信要其伤愈后到南京。1927年11月,他被蒋介石派到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深造,并被推选为有40多人的黄埔军校留日学生小组组长。

1930年5月,宋希濂学成回国,1933年春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学生冷兰琴结婚,婚后有2子3女。宋26岁升任36师中将师长。1935年2月,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上杭水口镇被福建省保安14团俘获,并解到驻防长汀的宋希濂36师师部。6月18日,宋奉蒋介石命令,将瞿秋白杀害于长汀中山公园。解放后,宋在谈及此事时追悔莫及:“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文学家瞿秋白先生,竟死于我之手中,将我碎尸万段,亦不足以蔽吾之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也许正是由于有这一内疚,宋希濂在解放战争中不愿赴徐州就任“剿总”副总司令,由他的同期师兄杜聿明当了“替罪羊”。1949年秋,解放军进攻川东,宋希濂虽握有重兵,但他不敢恋战。蒋介石于11月14日由台湾飞抵重庆后,立即派蒋经国赴川东江口与宋希濂会晤,并携带黄金与蒋介石的亲笔信,表示“慰问”。然而,蒋介石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回报,太子前边刚走,宋希濂便撕掉了“圣谕”,带上金条,渡乌江西逃而去。仅仅两个小时后,刘伯承、邓小平的2野部队就进驻了宋希濂的指挥部。

可是,宋希濂日夜兼程西逃,他并未向蒋介石汇报,一时间,国防部在作战地图上找不着宋希濂两个兵团的确切位置。十几万人就这样无影无踪的消失了。即使无线电台的报名员日夜呼叫,也毫无音信。而刘伯承也在寻找宋希濂,他寻找着,思考着。

刘伯承开心地宽慰部下说：“没事呢，有鱼总会烂在锅里。”12月11日，宜宾国民党郭汝瑰率72军起义。而宋希濂继续跋山涉水西窜，马不停蹄，昼夜兼程。

刘伯承、邓小平相视而笑。邓小平说：“本来是要敲宋希濂的脑壳哟！晚了三天，连腰也抱不上了。”刘伯承还是那句老话：“鱼在锅里就跑不掉。”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川南把宋希濂装进了口袋。

宋希濂有点绝望，他忘不了今年8月在汉中与胡宗南的会面，仍然认为当前只有向缅甸方向逃跑，才是唯一生路。他自四川綦江出发，时是11月21日，那天他率其司令部离开江口，车过武隆时，就传闻武隆下游20多华里的羊角碛附近，发现对岸有人叫喊：“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快把船放过来！”从这时起，他就有了西逃的打算，他的行军路线是：四川綦江——李市坝——白沙——朱家沱——万定场——石洞镇——怀德镇——赵化镇——观音镇——高场店。目标是：第一步：西昌；第二步：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这条路线完全避免走县城以上大市镇，借以缩小目标。他选择一些偏僻的羊肠小道，在绕到峨眉以西地区后，再沿乐山至西昌的公路前进。

当时宋希濂指示部队：“不管一切，不顾一切，走，快点走，走到较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

宋希濂部队在逃跑途中，损失很大，陈克非、刘平、钟彬的部队在白马场就被歼灭了不少。宋希濂最后只带自己可以控制的部队西逃：司令部直属部队，包括警卫团、通讯营、工兵营约2000余人；122军丁树中残部约3000多人；124军顾葆裕残部约1800多人；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总队、教导总队约3000多人，总共1万余人。他们兵分三个纵队，由宋希濂、丁树中、顾葆裕各带一个纵队，每日行军60华里左右。在部队到达

指定位置后,每晚用无线电向宋希濂报告,同时规定不再向国防部发报。

12月8日经过宜宾时,郭汝瑰不让进城,宋希濂绕道避开,以免节外生枝。当时他还不知道郭汝瑰正酝酿起义,以为是奉国防部命令来解决他的部队的。不管怎么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宋希濂不等天明就率部离开了牛喜场,冒着滂沱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高一脚,低一脚,向西行进。部队足足走了8个钟头,才走完40华里。

宋部到了高家场,顾葆裕、丁树中已先一天到了这里。当晚他们商定了第二次行军路线:高家场——清水溪——黄丹——兹竹坪——沙坪——金江河——富林——冕宁——西昌。

宋希濂不走大城镇,专走羊肠小道。因川南多山,且值寒冬季节,经常下雨,道路不好走,行军速度很慢。他选择的这条路是西进大渡河。

大渡河,这里曾是无数历史传奇人物立马横刀厮杀的神秘大舞台,这里是历史学家称为“历史怪圈”的地方。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英雄悲歌一曲,而朱、毛工农红军靠13根铁索,抢渡大渡河,走上了长征辉煌之路。今天,历史又来了个轮回,国共两党的军队再次被大渡河吸引了过来。解放军2野杨勇兵团的17军、18军、19军三个军数倍于宋希濂的兵力,正从四面八方向他包围过来,尤其是尾随于宋希濂之后的,只有解放军18军52师155团的800名战士。团长阴法唐号召大家:“活捉宋希濂,向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献礼!”经过长途跋涉急行军作战,155团掉队减员十分严重,每个营参加追歼的只有100多人,充其量只能编11个班;可就是这100余人,追得宋希濂屁滚尿流。他们沿大渡河比赛行军速度,宋希濂部在形势紧迫时,每天急行军160华里,真是脚板底下抹油,跑得飞快。阴法唐团

长则要求全团不顾一切地追击,咬住敌人,就是胜利!宋希濂真是插翅难逃了。

12月14日下午2时,宋希濂率残部来到四川犍为县的清水溪。这是岷江上游的一个相当繁华的市镇。宋希濂派人向当地商会商量以黄金换银元,对方答应想办法,但说只能换30两,每两兑银洋40元。在兑换尚未办妥之时,原来驻在当地的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刘成树营突然仓惶地离开清水溪,向着沐川而走。这样一来,商户纷纷关门,询问之后,始知解放军如天兵一样,已进抵离清水溪只有几里的地方了。宋希濂连饭也未吃完,就率部继续逃命。对方来得快,追得紧,宋也只得赶紧跑。大约跑了20多里,到了一个小村庄,已经天黑。大家都逃得疲累难堪,所以主张在此宿营。宋希濂说:“绝对不行!如果今晚不走,不到明天早晨,便会被共军所俘虏。”即令各单位立刻做饭吃,吃了以后,在晚9时许,开始夜行军。

此刻,在清水溪镇,解放军18军52师155团的一张铁网正在重新编织。

12月15日早晨,阴法唐率部翻过一个山头,只见山下马边河畔密密麻麻挤满了国民党军,有的人在挖灶做饭,有的人躺在地上休息。

阴法唐居高临下,他命1营出击敌人。解放军如猛虎下山,冲进敌群,双方混战在一起。宋希濂连忙指挥部队抢占山头,但很快被解放军夺回;山下成堆敌人聚集在一起,纷纷缴械投降。宋希濂乘一匹白马,趁混乱之机,在贴身警卫的前呼后拥下,穿过山头扬长而去。

吊耳坝战斗,历时不足两小时,解放军歼敌警卫团和通讯营、工兵营以及全部后勤辎重部队共计2100余人,俘敌少将2人,拦截绥靖公署机关眷近千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至此,

宋希濂残部断绝了后勤供应。

宋希濂自綦江出发时有部队两个兵团,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和行军,其到12月16日晨抵达大渡河边的,兵力只剩下5千余人了。丁树中所率2000多人,被另一路解放军追上包围歼灭了,丁树中下落不明。除顾葆裕部已先行外,在宋希濂身边还稍有战斗力的,只有高超部和教导总队;他们沿着大渡河南岸西行,命这两支部队轮流作后卫。12月16日上午,解放军又追上了他们。由于受地形的限制,一边是大山,一边是大河,解放军追击部队无法超越他们,只能与敌后卫部队接触。宋希濂部昼夜不停地走,解放军昼夜不停地追,追得敌人无喘息的余地。每天都有几次小的战斗,宋希濂的部队连行李也丢光了。在吊耳坝战斗中,不少家眷被当地铁矿工人以管吃饭为条件做了“新娘”,还有不少俘虏把枪丢弃后便穿上老百姓衣服逃走。

12月18日中午,解放军追得更紧了。宋希濂后卫部队边走边抵抗,当枪炮声响彻大渡河河谷时,宋部警卫排的一名叫万朝生的兵,忽然在行列中自言自语地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此兵有高小文化程度,不知是否触景生情,忽然说出这几句戏词。宋希濂听了,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他想此时此际的处境,已认为是很难逃脱覆没的命运了。

经过连续三天三夜的极度紧张的且战且退,于12月18日深夜之时,宋希濂逃抵川康边界峨边县的沙坪,已感到心力交瘁,身不由己了。

顾葆裕于6小时之前,已先宋而到达此地。原属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补给司令罗文山,及其所属的1000多人,还有几十辆卡车,在路过成都时,由顾祝同委以第8纵队司令名义,于12月17日到了峨边县南面的龙池、新场一带。通过无线电联

系,宋告诉他说可于18日抵达沙坪,所以罗文山派了他的上校团长宋湘陵到沙坪候接。此时,意外地添了这1千多人,还有汽车,使宋希濂在绝望中又产生了一线希望。

这时,2野18军52师已抵达峨边县,他们的任务,本来是防止胡宗南部向西昌逃窜,但忽闻龙池、新场一带有反动武装,还有车辆,可谓适逢其时,乃立即派出一个团前往追击。这个团在12月19日拂晓到了新场。罗文山迫于形势,乃率敌投诚,而身在沙坪的宋希濂,却还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12月19日天甫微明,顾葆裕便率其残部沿大渡河南岸西行,继续向金口河去了。宋希濂由于过分疲乏,7点钟才起床,吃过早饭之后,便命令司令部人员及军政干校人员一律渡河,然后沿着乐山至西昌的公路前进。到10点左右,已渡过了一千多人,宋本人也渡到了北岸山脚下,停在一个小庙里,等待部队渡完河再走。突然间,山上枪声大作,机枪的火力则对淮南岸待渡的宋部扫射。那边的队伍立刻纷纷逃散,拼命向南面一带山地里躲藏。这时已经渡到了北岸的部队,也急忙向西逃窜。原来,这是北岸解放军16军47师139团赶来参加沙坪战斗,而南岸的解放军18军52师155团以为是敌人开枪,于是急忙迎战,双方一场误会,却把宋希濂吓坏了。他率卫队向西刚走了几百步,便被解放军16军139团堵住。宋希濂见形势不对,迅速向东逃去,没有走出一里地,也给堵住了。他们已落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之中。山上的解放军分几路冲下来,上下合围,宋部立刻被解除了武装。

解放军18军52师155团自宜宾挥戈西进,8天征程500余华里,打了6次仗,歼敌约3000多人,其中俘虏2800多人,在几支兄弟部队配合下,追歼宋希濂部的战斗至此结束。

宋希濂被俘后,化名周北瑞,企图趁混乱之际逃跑,结果被

查出,送进了峨边俘虏营。

解放军 16 军 139 团徐仲禹团长与解放军 18 军 155 团阴法唐团长见面后,在一家农舍会见了宋希濂。宋以为来人是军长,可阴法唐说他是团长,追你的就是他这个团,确切地说,只有 800 多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营。宋希濂一听解放军只有 800 人,便“唉”地长叹一声,懊悔地喃喃自语道:“我总以为在后面追击我的有几个军,有情报说是 9 个军,早知如此,就是有 3 个团、5 个团,我也有力量……”

后来,宋希濂见了杨勇与陈赓两位司令员。陈赓是他在黄埔的同学,又是同乡,他只字不提沙坪被俘的事,也不愿说话。

1949 年这一年,宋希濂是“大难临头”,先是丧父,后是丧妻,又打了个彻底的败仗。他追随蒋介石这 20 多年,到头来只换得个头发零落,两鬓斑白,虽然这年他才 42 岁。

关于宋希濂如何被查出的,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开始,解放军要国民党俘虏认指宋希濂,没有一个人吭声。当解放军问到宋时,宋答:“我叫周伯瑞,是司令部的军需。”就这样,19 日晚在大渡河北岸的民房里,大家默默地坐在地上过了一夜。20 日晨 7 时,解放军命令俘虏们在沙滩上集合,准备把这一千多人押送到峨边县城去。宋此时有逃跑企图,便暗暗叫几个亲信靠着他一道走;不料,正在这个重要关头,突然王尚述过河来了。王尚述是苏北人。据他说,他原是解放军,是个相当于营指导员地位的干部,1948 年冬在湖南衡阳打入宋希濂所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在校进行秘密活动。1949 年 8 月他在恩施被发觉,通过审讯后,供认了打入军政干校的目的及活动内容,司令部负责管情报的官员主张将王尚述枪毙,宋希濂没有同意,并亲自找他谈了一次话,随即派他在司令部办公室工作。宋希濂西撤时,他一直随军行动。12 月 19 日他未过河来,20 日早晨,他过河来后,看

见宋希濂坐在被俘行列里，立即走向解放军指导员所在的屋里，而后许教导员与王尚述找宋希濂去谈话。宋希濂懂得了这是为什么，当许教导员开口问宋姓名时，宋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宋希濂。”

1950年的一天早上，被押在重庆白公馆的宋希濂、曾扩情、钟彬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周兴陪同，乘车进重庆市会见陈赓。陈赓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军区司令员，因开会来到重庆，听说老同学宋希濂在这里，便专门抽时间见见面。他们4位黄埔一期的同学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下午4点，中午还共进午餐，陈赓的召见，对宋希濂思想影响很大。1959年12月，宋希濂、杜聿明等被特赦。1964年宋被邀为全国政协委员，曾与当年追他的阴法唐中将在政协礼堂重逢，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其共同的话题是和平解放台湾，统一祖国。

1980年宋希濂赴美探亲，后在纽约定居。

宋希濂晚年积极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奔走。1982年8月，“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纽约成立，他被选为首席顾问。1984年，他与黄埔同学蔡文治、李默庵、侯镜如发起成立黄埔同学会，并发表《宣言》。《宣言》中说：“国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设至上，切盼我全体黄埔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对此，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指责“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但宋希濂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并将他在祖国大陆出版的自传，定名为《鹰犬将军·宋希濂的自述》。

宋希濂1961年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不久与易吟先女士结婚。宋的发妻冷兰琴于1949年6月患脑溢血去世。宋希濂还任过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93年2月，宋希濂在美国纽约因病逝世，终年86岁。

宋希濂是最早进黄埔军校学习的学员。他有一个兄长宋宜

山本已任国民党营长,见黄埔这块金字招牌吃香,甘愿屈尊进黄埔上学。毕业后他从少尉排长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毕竟黄埔论资排辈风气很浓,宋宜山始终赶不过他的小弟弟。解放后宋宜山留在香港,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章士钊、唐生明等到车站迎接。第二天,周恩来在北京东兴楼与他进行了亲切地谈话。随后,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出面,就第二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与宋宜山协商。宋宜山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他的胞弟宋希濂。5月,宋宜山回香港后,写了一篇长达15000字的报告,提出和谈的具体设想。由于宋宜山在报告中对新中国颂扬过多,蒋介石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因此,他命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转告宋宜山,不必回台湾见他了。就这样,国共两党谈判因蒋介石缺乏诚意而搁浅了。宋希濂还有一个堂侄宋展翔,黄埔十五期毕业,任宋希濂的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警卫团副团长,1949年12月19日一同在峨边被俘,以后回湖南湘乡老家。宋希濂也同郑介民、郑庭烽、郑庭笈一样,一门三个黄埔生。出自黄埔的一门“三将”还有:廖运周、廖运泽、廖运升、陈毅、陈修和、陈孟熙,不过,他们各人的命运与归宿迥异,在此闲话不提。

且说黄埔军校从1924年5月在黄埔岛创办至1930年9月停办,为黄埔时期。七年间共办七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第一期至第五期,共有毕业生7390名。1927年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继续办第六期,毕业生为718名,第七期毕业生666名,计在黄埔时期共毕业8774名。笔者所涉及的黄埔风云人物,基本上是指这一时期的。

从1928年3月在南京建校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为南京时期。十年间黄埔军校共办了八期,从第六期至第十三期。此时,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作为黄埔军校的继续。南京本校筹备委员会于1927年5月24日成立,陈铭枢任筹委会主任,刘光、葛思敬、张襄任委员,鄧悌、曾扩情、杨洪翔任干事,1927年7月委任戴季陶、张治中任军校政治部正、副主任。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下野,南京本校筹备工作陷于停顿,校政治部解散。同年10月军委会任命刘士毅任迁校筹备主任,11月改校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国民政府于1928年3月6日举行开学典礼,3月24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李济深为副校长、何应钦为教育长、周佛海、鄧悌为校政治部正、副主任。同年10月军校实行校务委员制,校务委员为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李济深、朱培德、张学良。蒋介石、阎锡山、何应钦为常务委员,张治中任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在南京办学从第八期至十三期,共毕业学生7381名,另外还增设军官教育总队、高等教育班、特别训练班、航空班等。南京时期设有南宁、广州、南昌、武汉、洛阳、成都、昆明七所分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从1937年8月迁校四川成都至1949年12月为成都时期,其间共办十期,从第十四期至二十三期;二十四期招生入伍,但未及训练全国解放了。

1937年7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西迁成都,以北较场成都分校为校址,成都分校并入本校。1937年8月师生从南京出发,经九江、武汉、常德、铜梁,于1938年11月到达成都。迁校期间,因战争需要,第十一、十二、十三期先后提前于途中毕业。第十四、十五、十六期在沿途各地招生,到达成都时,各期仍留有一个总队,共三个总队。成都时期,校务委员增加了程潜、白崇禧、陈诚、邓锡候、刘湘。从第十四期至二十三期共毕业学生

31500 余名。第二十二期有朝鲜、越南保送来华受训学生 100 名,毕业后各返本国服务。成都时期还委托骑兵、炮兵、工兵、通讯、辎重、装甲等各兵科学校及有关机构代训学员 15118 名。成都时期继续设立高等教育班、军官教育总队,又增设战术研究班、典范令研究班、校尉官研究班等。1946 年 1 月校名改为“陆军军官学校”。陈继承、万耀煌、关麟征先后任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1947 年 7 月,任黄埔军校校长 23 年的蒋介石不再兼任校长,由黄埔一期毕业的关麟征升任校长。1949 年 8 月关麟征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9 月 12 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由重庆乘“中美”号专机飞抵成都,进驻北较场黄埔楼。

蒋介石在北较场陆军军官学校共住了 5 天,在这短短的几天中,他整日忙于接见和训话,到成都的当天下午 4 时,即去城西郊戴季陶墓前献花圈,以示凭吊。

蒋介石到军校后,对军校领导人做了较大的调整:原校长关麟征调任陆军总司令,由黄埔一期毕业的原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继任校长;原军校训导处处长、黄埔一期毕业的陆军中将王锡钧,调任陆军第七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遗缺由军校教育处副处长兼军官教育队队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吴起舞继任。军校训导处的前身即军校政治部,是一个重要部门,主管思想政治工作。军校教育长仍由吴允周担任,军校教育处处长仍由黄埔三期毕业的李永中担任,并在蒋介石这次来蓉返渝离校前一个小时进行交接完毕。蒋介石这次匆匆忙忙地对军校人事进行大调整,其目的是加强军校的领导。他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在危难之际,当然忘不了要依靠这些黄埔师生为他效命。9 月 13 日上午 10 时,蒋介石在军校新生社,首先召集军校大队长及训导处、教育处科长以上官佐训话。他说:“军校是一个专门讲究吃苦的学校,今天是国家财政困难的时候,军校格外要吃苦,

养成一个良好吃苦的风气。”蒋还希望军校各主管官员要好好地教育学生。训话在进行了 20 分钟后,即由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陪同,乘车赴城南,祭奠原四川省主席刘湘陵墓。

蒋介石这次在成都住了 5 天,接见了军校部分官佐,调整了人事,并于 9 月 14 日对军校官生训话并阅兵,6000 多名师生在北较场“中正堂”前洗耳聆听蒋介石的训话。他说:“我们正处于危难时期,你们是我的学生,不出几个月,国军就会实施全面的反攻,今后的党国就是属于你们的了。……如今,区区共匪,何足论道,要消灭它,也不过如秋风扫落叶。”他的这番“秋风扫落叶”之说,引起台下一阵喧哗。蒋介石扫视了一下面前列队肃立的师生,也许感到用词不当,于是连忙又说道:“我很伤心,我的许多学生背叛了我……希望你们这一期学生要忠于党国……”蒋介石说着说着,已是老泪纵横,喉咙哽咽,再也说不下去了。原来,他口中的假牙突然掉落在地。张耀明校长急得不知所措,还是蒋经国沉着,他走上前去弯腰拾起了假牙,低声向张耀明交代了几句话,接着张耀明就吩咐阅兵总指挥官调整队形,进行阅兵分列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台炮车通过检阅台时,突然戛然而停了下来,这使蒋介石大吃一惊,阅兵中的行刺事件屡见不鲜,侍卫人员如临大敌。阅兵指挥官急忙跑来,原来是炮兵 1 中队少校中队长马品三的牵引车发动机突然熄了火,一时又修不好,只得命令将这辆炮车推出场外。在中正堂前,蒋介石连皱眉头,显出一付很伤感的样子。忙碌了整整一天的阅兵式,40 分钟就结束了。蒋介石默默走下中正堂,认为这不是好兆头。

第二天,蒋介石乘车赴华西珙牙医院检查口腔,由华西医院总院长林则、院长周少吾共同对蒋细密检查,结论是假牙已松动,必须重新换新假牙。

这次蒋介石来蓉,接见川康地方党政军首脑,研究保卫大西南,实行川西决战的计划;但接连发生的事,又使他心头蒙上阴影,真是“天意高难问,人情老亦悲”。

9月17日上午11时半,蒋介石一行乘“311号”军用飞机从成都北郊凤凰山机场起飞离蓉返渝。

73天后,即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从重庆逃往成都,仍进驻军校黄埔楼。重庆的解放使他惊魂未定,保卫大西南,实行“川西决战”的计划亦已成泡影。为了加强警戒,黄埔楼周围换上了军校二十三期二总队的一部分学生,由总队长、黄埔四期毕业的李邦藩少将负责。

12月3日,蒋介石已到校三天,主动向军校校长张耀明提出要检阅军校全体师生,要为黄埔学生再次鼓劲。

当军校全体师生集合完毕,举行升旗仪式时,旗杆顶上的滑轮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旗升到半空,呼呼啦啦竟然从半空中直掉下来,升旗绳从中间断了,旗与绳子一同落地。升旗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重新挂上绳子,总算升起了这面已被泥水打湿了的旗子。蒋介石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旗杆,一言未发。事后有人背地里议论:“看来国民党的气数将尽了。”又有人谣传是军校地下党人做了手脚,但并未引起追查。

黄埔军校此时有师生13500多人,其中校本部机关有训导处、教育处、副官处、经理处、军医处5个处;11个科:训导1科、2科、3科、步、骑、炮、工、辎重、通讯、人事、军械科;2室:教育处办公室、校长办公室;1社:《黄埔日报》社。另有勤务团、教导团(学兵团)、印刷所、外文室、实习工厂、图书馆、兽医所、马匹管教所、军乐队、血花剧社、黄埔中学等直属机关30多个,共计教职员3600多人。在校学生有第二十三期3个步兵总队、1个特科总队,1总队有学生1504人,工总队有学生1128人,3总队有

学生 820 人,特科总队学生在入伍训练期满后由 3 个总队中遴选组成。二十三期总共有学生 3452 人。

第二十四期学生刚刚招生入伍,编一个总队,有学生 1100 人。总队长徐幼常。

另外,还有军官教育队、军官训练班、游街班及临时组成的 6 个教导团,总计官兵达 1 万多人。

关麟征在 9 月 20 日办完交接仪式后,张耀明接任校长,人事关系的变化使军校动荡不安。1949 年元旦,关麟征为军校问题,曾派教育处副处长吴起舞赴广州我国国防部研究。当时有一个迁校方案,地址即设在台湾凤山军官训练班,将成都本校师生陆续迁台。后因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关麟征要调任陆军总司令,迁校事宜就搁下了。蒋介石 1949 年 9 月 12 日来成都后,重又提起迁校之事,当时计划由空军司令部调 36 架运输机抢运师生,以免因战争影响教学。后来由于空军飞机不能按要求调配,就只好先将军校少将以上官佐家属先运台北,非战斗人员就地遣散,师生则计划行军至云南腾冲一带,必要时可退往缅甸转飞台湾。张耀明也自认为军校的寿命不长了,他曾对人说:“我的运气不好,专唱收场戏,当首都卫戍总司令,把南京送掉了,这次又免不了要给军校送终。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在我手里送终,难免不被后人唾骂。”因此,他把军校看成是一个包袱,急欲甩脱。

军校迁移,经费迟迟拨不下来,不走的人要安家费,走的人要路费,另外还有车辆、后勤物资供应。张耀明初来乍到,麻烦事成堆,所以他被弄得六神无主。军校迁云南消息一传出,一些学生害怕打仗,连夜开了小差,校方也无法追究过问,不了了之。

蒋介石 11 月 30 日来成都后,12 月 4 日同意张耀明立即将师生迁往云南,但这时已是纸上谈兵了。解放军 2 野 16 军、18

军已占领乐山、宜宾、犍为，通往云南、西康的道路已被截断。陈赓兵团更是从广西、贵州直插云南，大迂回、大包围圈正在形成。

在兵荒马乱、山穷水尽的关键时刻，军校一些负责人如张耀明校长、吴允周教育长、原训导处处长王锡钧、二十二期三总队总队长桂乃馨、副官处处长吴丽川等，先后乘飞机逃往台湾，军校教育长由教育处处长、黄埔三期毕业的李永中担任，另有军校训导处处长、黄埔四期毕业的吴起舞、二十三期特科总队总队长（即一总队）、黄埔六期毕业的肖平波、二十四期学生总队总队长、黄埔五期毕业的徐幼常以及军校部分领导成员临危受受，由他们支撑起这1万多师生的“烂摊子”。

时局动荡，军校越发混乱，谁也无法挽回这个江河日下的局面。蒋介石12月10日离蓉赴台后，中共四川省临工委负责人罗馨渔、胡春浦、易野源等与中共川西边临工委、中共地下党留蓉工作部的负责人王逸平、吕振修等深入军校，开展策反工作。他们首先以中共特别党员、原国民党23集团军副总司令兼50军军长、15绥靖公署副主任郭勋祺，中共党员、抗大毕业生、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参谋唐新民，原国民党38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姚国俊，原军校北平军官训练班主任、黄埔五期毕业的徐幼常等为骨干，然后组织军校内地下工作者刘格非、鲁克智、廖烈夫等教官，利用私交等各种关系，对张耀明、李永中、吴起舞、肖平波、赵我华、姚济时等军校领导人进行策反工作。军校潜伏之中共党员、政治教官钟韵策反一批人打人游干班任职，掌握了国民党准备潜伏的人员名单及计划、暗号、化名等极为重要的情报资料，为解放后肃反、镇反提供了重要依据。郭勋祺、姚国俊、张汉初这些国民党将领，由于与共产党有联系，受到蒋介石的软禁与排斥，不予重用。他们此时利用过去的私人关系，打通“关节”，掌握了一部分实权，如姚国俊向军校刚上任的校长张耀明

担保,推荐从北平参加傅作义和平起义的徐幼常任军校二十四期总队长,领取了一批枪支弹药,随即秘密交给了川西地下武装。民革组织川西崇宁武装起义需要崇宁一带的军用地图,就派打入军校二十二期学习的中共党员黎一上窃取,后来案发,黎一上死于十二眼桥的大屠杀。解放后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地下党员廖烈夫是教育长李永中的内侄,党组织通过他做李永中的策反工作。

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已将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完全包围,胡宗南重新调整部署,准备向西昌方向突围,而军校校长张耀明见大势已去,弃校逃往台湾。张耀明抵台后,蒋介石严厉地问他:“我的学生呢?”张瞠目结舌,羞愧难言。蒋将张拘禁,不久又放了出来。这位“送终将军”从此不再被录用,1972年10月,病逝于台北。

军校师生13500余人在李永中、吴起舞、徐幼常、肖平波等几位将军的率领下,先后在四川大邑、郫县、灌县宣布起义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队长李邦藩(黄埔四期)顽抗被打死,游干街班班副肖步鹏(黄埔五期)起义后又暗中参加反革命活动,被清查出来后,送战犯管理所改造,在押期间病故。

军校师生起义后,李永中、吴起舞、徐幼常、肖平波经过重庆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后,调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教。李永中于1980年退休回四川荣昌安度晚年,1983年因病逝世,终年79岁。吴起舞于1956年从南京军事学院转业到山东济南黄委会山东黄河河务局工作,1969年因肺癌逝世,终年65岁。徐幼常从南京军事学院转业后,任四川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1984年因病逝世,终年78岁。姚国俊解放后一直在四川省政协任常委,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成都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92年因病逝世,终年87岁。肖平波由

南京军事学院转业到江苏省南京市政协工作,1984年病逝,终年78岁

军校起义学生均分配到解放军18兵团各军及2野12军工作。其中部分参加进军西藏,部分参加抗美援朝,而大部分经过学习转入地方从事各项建设工作,许多人已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由孙中山于1924年创办的黄埔军校,在1949年重新回到人民怀抱。

蒋介石到台湾后,在凤山再建陆军军官学校,从第二十四期招生办起,到1998年止,已办到六十六期。不过,它与黄埔军校已毫无共同之处,是一所完全性质不同的军事学校了。从1924年起,到1949年止,黄埔军校共毕业20多万名学生。现在,在大陆最后的第二十四期学生,最年轻的也年近古稀了,多数已是耄耋老人。他们在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元帅的题词“为黄埔同学立言,为祖国统一尽力”的鼓舞下,继续发挥余热。正是:一国两制英明策,骨肉关情意最真;为问台澎诸战友,何时破浪作归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水底捞月 胡宗南梦落西昌 兵败大陆 蒋政权偏安台湾

话说“西北王”、“黄埔”一期毕业的胡宗南一直坐镇西安，以对延安进行防范。1949年5月20日，西安宣布解放，他被迫退出这块经营了20多年的“老巢”。解放军为扩大战果，继续追击，胡宗南退守汉中，企图在这一带争取喘息时间，整训部队，与人民解放军对峙于秦岭。这时，他手下有三个兵团，即李文（黄埔一期）的5兵团，裴昌会的7兵团和李振的18兵团，共有13个军，加上干部训练团、原军校七分校学生总队等，约计30多万官兵。在陕南基地他苦心经营并想使自己的这点“本钱”不致赔光。为此曾与他在黄埔一期的老同学、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在汉中会面，彻夜长谈，想方设法保住这点老本；但蒋介石不听别人的规劝，一定要他保卫大西南。在重庆解放后，他又退往成都，妄图实行“川西决战”，因而致使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不得不赔进去，最后输光为止。

为了彻底解决蒋介石手中的这最后一张王牌，争取胡宗南走傅作义、陶峙岳的光荣起义道路，周恩来亲自做工作，把胡公冕专门从上海请到西安，要其选派人员潜入汉中，做胡宗南的策反工作。

胡公冕原是胡宗南的浙江同乡，胡宗南在黄埔军校上学的时候，胡公冕是黄埔军校管理部卫兵长，是1921年10月就加入

中共的老党员。“四·一二”政变后，胡公冕被通缉，一度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后被国民党逮捕，1936年获释去陕西。抗日战争时期，被胡宗南荐为陕西岷县地区行政专员，两人相处关系甚好。胡公冕写信劝胡宗南认清时局，早日投向人民，以减轻自己的罪恶。但胡宗南不听劝告，决心与人民为敌，誓死效忠蒋家王朝。在清涧战役中，胡宗南手下的29军76师24旅旅长、黄埔三期毕业的张新被俘，经过学习，他自愿到汉中去做胡宗南的策反工作，胡宗南三次传见张新，竟当面大哭起来，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士为知己者亡！我不能不想想校长，不能对不起……对不起校长哇！”胡宗南最终还是让侍勤队队长唐西园将张新扣押。张新由汉中、绵阳、成都、广汉，最后押解到金堂县，趁国民党部队混乱之际，途中越狱潜逃。

胡宗南不听胡公冕的劝导，又扣押前来策反的张新，一心想把部队撤到西康、滇西，妄图逃避全军覆灭的命运。但胡宗南的逃跑计划被蒋介石一再否决。胡宗南从重庆回到汉中后，把自己关在汉台的房间里，谁也不见。他拉上窗帘，点上红烛，陷入彷徨，嘴里暗暗骂蒋介石这个“老糊涂”，“自己几十万军队被他毁了”。

胡宗南闹情绪期间，解放军2野已突破川东防线，宋希濂吓得朝泸州方向逃跑。1949年11月28日，蒋介石不得不亲自给胡宗南打电话，说：“重庆的川军不中用，你快速调第1军第1师来重庆机场，以保护我飞往成都。”同时命令胡宗南本人也由汉中直飞成都，好为他保驾。胡宗南放下电话，就对他的参谋长、黄埔四期毕业的罗列说：“我军的失败，就在于老是被动。重庆都守不住，成都是川西平原，历代兵家谁能守住成都？”

重庆11月30日解放，2野3兵团、5兵团像利箭直插四川西南，大迂回到宜宾、泸州、邛崃，截断国民党军向云南、西康的

退路。华北野战军 18 兵团拨归 2 野指挥,李井泉、周士第(黄埔一期毕业)在贺龙的率领下,于 1949 年 12 月初,首先扫清陇南的残敌,翻越秦岭,14 日解放广元,17 日攻占剑门关,25 天时间里,追击前进 1600 多里,直逼成都。解放军 18 兵团 60 军军长王新亭率 178 师、179 师、180 师从中路经广元剑阁、绵阳、广汉逼近成都。61 军军长韦杰率 181 师、182 师、183 师经巴中、苍溪从东路直逼川西。62 军军长刘忠率 184 师、185 师、186 师经陇南翻越秦岭、岷山、武都、临江直抵广汉、郫县、灌县,从西路包围成都。

胡宗南在 11 月下旬率残部由陕西汉中进入四川时,“蜀道”早已难上加难了。胡宗南的部队一路逃溃,一路炸桥,确实给解放军带来很大困难,但解放军势如破竹,日夜兼程南下,追得胡宗南部拼命逃窜。大部队抵达成都附近后,蒋介石对胡宗南说:“准备用两个军守乐山,两个军守雅安,所有部队向西康转进,这是逃跑,这是撤退,不行。我们要实行川西大决战,死守成都。”

随即任命顾祝同为西南最高军政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长官职,指挥所有在川西的国民党军队,作最后挣扎。

1949 年 12 月 9 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12 月 11 日,川康军政首脑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在四川彭县联名起义,接着,黄埔军校李永中、吴起舞、徐幼常也率师生 13000 多人在郫县、大邑、灌县宣布起义;12 月 22 日,裴昌会的 7 兵团在四川德阳以西的孝泉镇起义,16 兵团由董宋珩率领在什邡起义;12 月 23 日,国民党联勤 4 补给区司令曾庆集等率西南联勤 80 多个单位在成都起义;第 15 兵团罗广文部于 12 月 24 日发出起义通电;胡宗南的 18 兵团司令官李振也于 12 月 25 日,分别起义。胡宗南感到成都已不可守,决定将长官部撤至西昌,12 月

23日,他同参谋长罗列等人由成都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去西昌,起飞后因西昌气候不好,飞机改飞海南岛三亚机场降落。

胡宗南逃离成都后,所部有如群龙无首,更加混乱,他的几十万大军不战而溃,所剩的李文(黄埔一期生)5兵团沿新津河南岸,经蒲江、邛崃向雅安方向突围,妄图向西康、云南撤退。但该兵团一开始行动,就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其左右两翼不断受到截击,互相失去联系,前进非常困难。这时,第1军军长、黄埔五期毕业的陈鞠旅,学生总队长、黄埔五期毕业的王应尊等做李文的工作,并派兵团参谋长吴文烈、副参谋长袁致中(黄埔六期)与解放军2野联系,刘伯承、邓小平致电欢迎国民党5兵团起义。至此,胡宗南的3个兵团,除少数部队逃往西昌外,其余大部投诚或起义。

胡宗南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于12月28日由海南岛飞往西昌,这时,成都已于12月27日解放。他在西昌住进邛海新村。这邛海位于西昌以南,水面有500多亩宽,是一个风景幽美的地区。新村原是蒋介石在西昌的行辕,1938年由行辕主任张笃伦所建,都是平房,散建在山的半坡上,作为疗养圣地那是再适宜不过了。然而,胡宗南这时哪有那份闲情逸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点上红烛,绕室徘徊,他时而痛苦地自言自语道:“我的40万人马,3个兵团,全完啦”;时而又抱头痛哭,面壁狂喊:“校长你害得我好苦啊!部队让你整光,还硬要我飞来西昌干什么?这西昌是兵家禁地,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死在这里呀。”

胡宗南在西昌令电台与正在川西溃逃的部队联络,到12月29日上午止,仅与国民党27军军长、黄埔五期毕业的刘孟濂联络上,知刘带着残部1000多人,从四川乐山逃过了蓑衣岭,正在冷猪坪与刘文辉的~~第~~军作战。到了晚上,电台又与56军军长、黄埔四期毕业的胡长青联系上了,知胡亦率残部千余人从邛崃

窜到了西康省的汉源县。胡宗南派胡长青任 7 兵团司令,留在汉源,一方面防卫西昌北大门,一方面联络收编由川西逃来西康的残部。当时,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在刘文辉起义后,兼任西康省主席,他自恃资格老,不愿受胡宗南的羁勒,想早日逃往台湾,但胡宗南坚决不让他走,贺亦无可奈何。

1950 年元旦,胡宗南为鼓舞士气,在邛海新村门口的“观海台”举行阅兵典礼,参加阅兵受检的部队,只有他早期用飞机运来的第 1 军第 1 师朱光祖的一个团,其军容之“壮”就可想而知了。直到 1950 年 3 月,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太子”蒋经国秘密飞到西昌,召开了在大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替胡宗南鼓气,胡宗南才重新振作精神,去完成蒋介石给他的两个任务:一是固守西昌 3 个月,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二是收容川西突围的残部,加以整编,保卫西南大陆。

1950 年 3 月 27 日,人民解放军突然逼近西昌的飞机场,胡宗南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以送秘书长赵龙文赴台北汇报军情为名,将西昌的防务和收容的 6 万余名官兵,在机场悄悄交给参谋长罗列指挥,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乘飞机逃到了台湾。

胡宗南走后,他的残部被围歼,罗列经过千难险阻,于 1950 年 7 月潜回成都。1951 年 2 月由成都潜逃至宜昌,于 3 月 27 日再次蒙混过关逃到香港,4 月 15 日终于到了台湾。从西昌战役结束到踏上台湾宝岛,整整费了一年时光,罗列多难而未死,深得蒋介石的赏识。1959 年 7 月他被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在黄埔四期同学中,罗列的军职是很高的,仅次于国防部长高魁元。这位西昌之役的幸存者,据说终生都不愿再言“西昌”。胡长青率残部与解放军激战,一触即溃,解放军 550 团穷追不舍,胡长青腿部负伤,血流如注。当时他由勤务兵用担架抬着逃命,无奈解放军追得太急,勤务兵最后看看还是顾自己的命要紧,扔下胡

长青便落荒而逃。胡长青被抛弃于荒野,后为西康省越西县大瑞乡民陈继元发现,奄奄一息的胡长青摸出随身携带的黄金求救,陈继元将胡长青背至杨柳树王清云家中,正准备向越西县城抬送时,胡长青因流血过多,气绝身亡。又据一份资料报道,胡长青在被抬往越西县城途中,怕被解放军俘虏,趁人不注意时,用手枪自戕,时间是1950年3月18日下午4时。这是在大陆国民党黄埔四期毕业的一位军长的结局。刘孟濂则于1950年6月战败被俘,不久死亡。胡宗南的副参谋长、黄埔六期毕业的沈策被俘。胡宗南的40万大军至此算是干干净净地被歼灭了。

西昌战役,自1950年3月12日始,前后历时20余天,至4月初胜利结束,计歼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部、西昌警备司令部、国民党5兵团、7兵团兵团司令部、第2军部、3军部、27军部、69军部、124军部,还有各种地方反动武装司令部10余个,共计10300人。其中国民党上将2人、中将8人、少将30多人,缴获飞机3架、迫击炮24门、六〇炮36门、轻重机枪292挺、各种枪支3867支、汽车11辆、战马340匹、电台8部、各种炮弹7000余发、各种子弹34万余发。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彻底崩溃,蒋介石的“军事西昌”“陆上台湾”终成呓语。

且说胡宗南于1950年3月27日凌晨1时从西昌起飞逃到海口降落,这时海口也朝不保夕,胡宗南在海南岛逗留了七天,于4月4日飞抵台南,仅住一宿,第二天即飞抵台北。在那里,刚刚“复职”不久的总统蒋介石没有召见他,刚刚就职不久的行政院长陈诚也没有召见他。胡宗南被失败的阴云笼罩着,感到精疲力尽,心力交瘁。已经54岁的胡宗南仿佛一下子衰老了,回忆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他在黄埔学生中保持着几个“冠军”纪录: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第一个当上军长;第一个当上战区司令长官;第一个晋升为上将。这不能说蒋介石不宠爱他。国

国民党军中有“陈胡汤”之说，陈即陈诚，胡即胡宗南，汤即汤恩伯，号称国民党军中“三鼎甲”。他胡宗南是黄埔一期中的佼佼者：他引荐戴笠入黄埔，是“十三太保”中的老大，又曾拒当孔祥熙的乘龙快婿，在“反共”中发迹，关中坐大，西北称王，拥兵 50 万，号称“西北王”，惨淡经营 20 多年。要不是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刚愎自用，胡不会败得这么惨，要说追究责任，首先就应该追究校长。

早在 1950 年 3 月 27 日，即胡宗南从西昌逃抵海南岛的那天，台北国民党政府就命令撤销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免去胡宗南的副长官兼参谋长、代厅长官职务，调胡宗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战略顾问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职。同时，胡宗南在台南设立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驻台办事处亦奉命结束，电台通讯人员改拨联勤总部通讯署接管，其他官兵调离或遣散。这时胡宗南真正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兵马，没有部属，没有地盘，也没有权力。这是他自 1924 年底从黄埔军校毕业带兵打仗以来，20 多年来第一次经历的挫折，那狼狈不堪、空虚寂寞的样子及其失魂落魄的复杂心情，真是难以用笔墨形容。

胡宗南在台北办完应办的公事后，即携夫人叶霞翟与刚刚呀呀学语的幼子，避往台湾岛最东部的花莲海滨。花莲是台湾著名的风景旅游区，背靠青葱茂密的群山，面临辽阔的太平洋，海涛起伏，碧波荡漾，远离市廛，环境幽美。胡宗南来这里，其目的是避免以败将身份出现在台北公开场合所带来的尴尬与羞愧，休整一下自己十分疲惫的身体，清理一下自己十分混乱和濒于崩溃的头脑。

胡宗南，号琴斋，1896 年 5 月 12 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3 岁时父亲胡际春任浙江孝丰县收粮主事，全家遂迁至孝丰城西十里鹤鹿溪居住。1902 年 2 月，胡宗南入县立高小读书，由于胡

身材矮小,体质很差,考黄埔时差点未被录取,但胡宗南天资聪明,学习成绩极佳,考试时经常为全校第一名。胡宗南的伯父胡际清是浙江湖州商会会长王绘青家中的账房先生,胡际清的夫人褚素贞也很喜欢胡宗南。胡宗南中学将毕业时,其伯父和伯母带着胡宗南到湖州道场山万寿寺去烧香拜佛。为胡宗南问卜求签,问个前程。

老和尚看了几眼胡宗南,点着头说:“这孩相貌倒也不错,至于前程,还是听听神佛之语吧!”当下,老和尚要胡宗南用清水洗过手,而后烧好香,拜了佛,这才从神龛前取过签筒,摇了摇,对胡宗南说:“你抽一支吧!”

胡宗南随便取出一支,老和尚看了看,没有说话,而是把签递给了胡际清,胡际清接过一看,只见签上写着:

象曰:一轮明月照水中,只见影儿不见踪。愚夫当财下去取,摸来摸去一场空。

诗曰:水底明月不可捞,占者逢之运不高。交易出行难获得,走失行人无音耗。

断曰:求名不遂,疾病未愈;婚姻无成,合伙不利。

胡际清看了,知道这个签求得不好,就把签交还给老和尚:“求师傅指点迷津。”

老和尚说:“签语上写得很明白,这个卦名为‘水底捞月’,诸事不成,是下下卦,舍侄的前程怕是……”老和尚舌头打了个卷儿道:“凡事要当心为好。”

胡际清听了,脸色黯然,褚素贞也很懊丧。胡宗南没有开口,出了庙门,哼了哼说:“成事在人,谋事在天!”

胡宗南的伯父最信求神拜佛,一生很重视机遇与命运,他还是说:“不管如何,日后处处要小心为好。”

胡宗南不信鬼神,他一生总算一帆风顺,从入黄埔遇见廖仲

恺给他写条子“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点是不应该不录取的”，到与蒋介石召见认孝丰小同乡，机遇总算不错，从一名小学老师混成“西北王”，确实风光一时。尤其是1947年攻占延安后，蒋介石建议把延安改成“宗南”县，后因胡宗南的牛皮不攻自破，此建议才作罢。

胡宗南一生为蒋介石卖命，到头来真的落了个水底捞月一场空。如果胡宗南就此在花莲隐居当寓公，也算他有福。可惜好景不长，没有多久，台北政府中许多监察委员却不愿放过他，对胡宗南提出了弹劾。如何弹劾，此是后话。

且说西南战役结束后，1950年元月10日，毛泽东致电4野领导：“争取春夏两季解决海南岛问题。”2月上旬，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主持召开了海南参战部队的广州会议，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取得解决海南岛问题的一致意见。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成椭圆形，面积有58000平方公里，人口有300万，海岸线长达1200公里；其北岸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海峡最窄处36公里，最宽处为50公里。全岛为山地地形，中部突出，有五指山为主干向四方绵延的山脉与丘岭。那里丛林密布，居民稀少，不适于大兵团作战，而岛四周有十数个天然良港，大都可停泊军舰或炮舰。

解放军从打大小金门岛受挫中吸取教训，4野林彪向中央军委上报了解放海南岛的计划：

以40军、43军两个军，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1个团与工兵一部，共计10万人，组织渡海作战兵团，由13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准备各种船只2000多艘，培养水手6000多名。

部队日夜在海上训练，使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意图无法隐藏。

海南岛国民党守军薛岳见这阵势，即采取了紧急措施。1950年2月初，开始禁止船只出入，断绝交通；2月中旬，又集中5个师的兵力“围剿”由冯白驹领导的中共琼崖纵队，同时又以海、空军向大陆沿海广泛袭扰，破坏解放军的战役准备。

1949年10月，广东解放后，逃到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余部5个军19个师及海军第3舰队和空军4个大队共约10万人。郑介民的弟弟、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郑庭烽任21兵团副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李玉堂任海南东路防卫指挥官；黄埔一期毕业的容有略任64军军长兼海南防卫第3路司令；企图长期盘踞，修筑“伯陵防线”，以抵挡解放军渡海。

1950年3月5日至31日，解放军4野15兵团40军、43军在琼崖纵队接应下，先后以两个团又三个营分批偷渡登陆，加强了岛上的接应力量。我4野两个军的主力10万大军在无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以木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于4月16日发起渡海登陆作战，冲破敌人海陆空的重重阻拦，在琼崖纵队和预先登陆部队的接应下，胜利登陆。经连续作战，共歼敌3万余人；李玉堂、郑庭烽纷纷坐飞机逃往台湾。这次战役，开创了解放军海上作战胜利的先例，创造了木船战胜兵舰的奇迹。

4月30日，国民党在海南的统治，彻底结束。

5月12日，福建南部沿海的东山岛解放；18日，舟山群岛也回到人民怀抱。

10月7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藏军第九代本主官桑格旺堆于11日起义；19日，昌都解放。紧接着，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谈判。1951年5月23日，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9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野5兵团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的先遣部队进入拉萨；10月26日，张国华、谭冠三两位将军率18军所属52师、53

师、54师进入拉萨，举行了入城仪式。从此，西藏高原插上了五星红旗。

蒋介石别无选择，只好退居台湾，以海峡为“楚河汉界”，开始了他的偏安生涯。

台湾本岛面积35759平方公里，人口624万，1949年12月，台湾总人口增至756万，在新增的130多万人中，有60万人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台湾本地人习惯称大陆来的人为“外省人”。蒋介石曾说：“处绝地也可以生……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以复兴。”

早在1946年10月25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赴台湾视察。10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干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其将无奈我何乎！

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陈诚是蒋介石在黄埔的“八大金刚”之一，又是他的嫡系将领。蒋介石让陈诚掌管台湾，为自己留下一块安身之地，从那时起，他便留了退路。

李宗仁这样回忆蒋介石的安排：“此次新职突然发表时，前主席（台湾）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1949年1月5日他便在台北就职视事；其行动之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中共发表首批43人的战犯名单后，蒋介石、陈诚榜上有名，两人心照不宣，知道此时此刻同舟共济至为重要。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后，又于1949年1月18日兼任台湾警备司令，集党政军

大权于一身。陈诚是靠“土木系”起家的，所谓“土”即国民党的第十一师，原由陈诚任师长，江西“剿共”时期，11师扩编为十八军；“木”字即“十八”二字的合并；“土”即“十一”二字的合并。陈诚升任18军军长。18军除两个师外，还有一个工程旅，旅长由黄埔一期毕业的李延年担任。1948年年底，在淮海战役中，18军被歼灭，陈诚的得力部将黄维、吴绍周被俘。后来，陈诚委托12兵团副司令官胡璉（黄埔四期生）收容残部，补充新兵，在赣东重新编成18军，以18军的老干部、黄埔四期毕业的高魁元任军长。高魁元到台湾后，升任为国防部部长。陈诚先到台湾视事，为蒋介石退守台湾做好铺垫。

蒋介石首先是将中国的贵重文物，有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及外交部物品共3348箱盗运至台湾；其次是责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国库所存全部黄金、白银、美钞从上海中央银行取出。在蒋介石下野前10天（即1949年1月10日）派蒋经国回上海，将中央银行现金全部转移到台湾。据国民党《中央日报》1960年6月2日透露：

在某一个深夜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黄埔一期）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边，中央银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诚主席打电话给俞鸿钧。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中央银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时才感觉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

后来，据中央银行稽核处长李立侠回忆，抢运黄金共分三批：

第一批,也是主要的一批,是1948年12月1日午夜由上海装运,总数为2004000余两,运至基隆;第二批运走522000余两,运至厦门,再转运台湾;第三批是俞鸿钧辞职以后,刘攻芸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由汤恩伯亲临央行运走198000两;当时离上海解放已不到10天了。前后三批,共抢运黄金2775000两。同时运往台湾的还有1520万银元,另有15374000美元则存进美国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户。

据国民政府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盎司,外汇约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元上下。这批金、银运到台湾后,奠定了陈诚在台湾政坛崛起的资本。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上台后,即电令陈诚将运往台湾的黄金、白银、美钞,运返福州财政部国库;陈诚拒不执行,李宗仁只得大量印发“金元券”“银元券”代现金,弄得市场物价飞涨,通货贬值,民怨沸腾。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成都作垂死挣扎失败后飞离大陆,逃到台湾,住在台北大溪。因为大溪的风景美丽,与浙江奉化溪口相似,他很喜欢。台北北郊约30华里的草山有一幢别墅,名叫“士林”,原是台湾糖业公司的宾馆,那里多温泉,环境幽美。蒋介石觉得草山有“大王落草”之意,不吉利,遂改草山为“阳明山”,蒋将草山改名一来避晦,二来表明他对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的崇敬之情。这里,成了蒋介石的官邸。不久,他的夫人宋美龄也从美国来到台北。

1950年1月23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议由蒋介石恢复总统职权,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撤销,军事交国防部,行政院长阎锡山辞职,遗缺有三人呼声较大:陈诚、王宠惠、王世杰。最后蒋介石

认为陈诚在撤退前后主持台湾军政大计，厥功甚伟，不但使台湾度过危难，而且舆论上反映也较好。蒋介石复职后，陈诚立即交权甘为副手，所以被任命为行宪后第五任行政院院长。不过，此时的国民政府，只有行政院，而代总统李宗仁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就医。李宗仁在纽约机场下飞机后曾作一公开讲话，称“此行全系就医性质，一俟身体复员，便当束装返回”。由于蒋介石迫使李宗仁“退位”，李宗仁采取“既不返台，也不辞职”的策略，蒋最后就“径自复职”了。

据李宗仁回忆：

“七月间，我还在广州的时候，黄埔系将领及蒋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复职的企图，然而那时尚无人敢公开提出。抵渝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了。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了。这时，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对蒋已不再以‘总裁’而径以‘总统’称呼。我深知蒋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

“果然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便先后来找我，他们不敢明言要我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我拍一电报请蒋来渝坐镇。其实，蒋一直在飞来飞去，向来不需要我敦请，现在何以忽然要我拍电报促驾呢？他们辞穷，便隐约说出希望我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劝进’。

“当吴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时，我勃然大怒道：‘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他们见我态度坚决，才不敢勉强。”

蒋李矛盾，终于公开爆发。1950年2月21日，国民党非常

委员会致电李宗仁,限他三天内回到台北,不然就被视为放弃代总统职权。李宗仁拒绝回台。2月25日,监察院弹劾李宗仁。3月1日,蒋介石宣布正式复职,亦即复任中华民国总统。

俗话说:“树倒猴猕散。”蒋介石虽然又坐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但捧场的人却不大踊跃,许多当年追随他的文臣武将,都纷纷离他而去;一些高官富贾,开始远走高飞,溜之大吉。因为他们一来怕共产党要用武力解放台湾,二来与蒋介石也离心离德,恩恩怨怨一言难尽。

宋子文因侵吞大笔公款,又被中共列为重要战犯。他于1949年1月24日便辞去了广东省长职务,带着妻子张乐怡先走香港;5月16日到法国巴黎治病,6月10日带着外文护照踏上美国国土,从此一去不复返,当了美国“寓公”。他似乎不再关心妹夫的事业,而是理财要紧。

孔祥熙早就被挤掉了财政部长的位置,从1948年起,就和宋霭龄在美国纽约里弗代尔的私人别墅里过着富足的流亡生活,而且继续在美国经营他的银行业,把山西人理财的本领传播到西方自由世界。

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俩是蒋介石创办黄埔军校时的得力助手。陈立夫当过黄埔军校办公厅英文秘书,1950年8月赴美国侨居。1969年4月才回台湾定居。陈果夫当过黄埔军校招生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组织部部长,“中统”创始人,1948年赴台湾治疗肺炎、喉结核等疾病,1951年8月25日在台北病逝,终年59岁。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到了台湾时代就只剩下蒋介石一家了。

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和黄埔军校师生,纷纷遭到蒋介石的贬逐。有些曾经在大陆名噪一时的将领,逃到台湾后,蒋介石不再启用,从此消声匿迹。“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何应钦即被蒋

介石打入“冷宫”，只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退出权力圈的何应钦平常靠“三打”（打桥牌、打猎、打球）消磨时光，贤妻王文湘花容月貌，曾是贵州一枝名花，两人感情甚笃，虽晚年无子嗣也未纳过妾，同仁戏称为“中国第一好丈夫”。王文湘去世后，何应钦倍感孤寂，落叶归根之心与日俱增，但不敢表露真情。倒是他的老朋友张大千了解他的苦衷，在何 90 大寿时，特亲笔画了一幅《泥荡风景图》作为寿礼，泥荡即泥函村，在何应钦的故里贵州省兴义县，这幅画何应钦爱不释手，当作珍品。晚年他致力于当“道德专家”，搞传统文化道德重振运动，周游四海，结下不少人缘。1987 年 10 月 21 日何应钦病逝于台北，终年 98 岁。

“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顾祝同到台湾后，曾以参谋总长身份兼代国防部长，但蒋介石很快将其调至“战略顾问委员会”任副主任，与何应钦一道坐冷板凳，1972 年改任“总统府”顾问，其实仅有虚名罢了。1987 年 1 月 12 日，顾祝同在台北病逝，终年 96 岁。

“黄埔八大金刚”的钱大钧在逃到台湾后，挂名为战略顾问，实际上从事体育联合会常务监事工作，多次以领队身份带足球、篮球球队到汉城、罗马等地参加比赛，晚年购买了 5 架 727 喷气客机，任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弃军从商。1982 年 7 月 21 日，钱大钧病逝于台北三军总医院，终年 89 岁。

至于另几位“金刚”刘峙、蒋鼎文、陈继承结局也很相似。刘峙在淮海战役后，以败将之身受到蒋介石的“撤职”处分，骂他“缺德少才，贻误大局”。刘带着三姨太逃往九龙，后又赴印度尼西亚以教书糊口。1953 年 1 月经何应钦说情，国防部才寄给他一张“入台证”。刘峙到台湾后，任行政院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住在台中，平时深居简出，晚年出版了《我的回忆》一书，对黄埔历史有所介绍。1971 年 1 月 15 日，刘峙在台中市荣民医院病逝，终年 79 岁。

蒋鼎文早就离开军界经商,在上海开轮船公司,1949年3月逃往台湾,对其亲友说:“此后以天为盖,以地为底,未知葬身何所?”他也被蒋介石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74年1月2日,病逝于台北,终年79岁。

陈继承在抗战时当黄埔军校教育长多年,可谓“桃李满天下”。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由于与傅作义关系搞不好,而被蒋介石调回南京任南京卫戍司令,南京解放后,逃往台湾,1952年奉命退役,1972年12月在台北病逝,终年78岁。

“黄埔八大金刚”中最红的要数陈诚。他从1949年3月起,在台湾推行新的施政方针,推行地方自治,施行“土地改革”,发展台湾经济,确实为蒋介石做了在台的“奠基”工作。陈诚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甘拜下风。尽管他后来被选为“副总统”,成为台湾国民党第二号首领,但他清楚接班的事轮不到他,“高处不胜寒”,不如小心翼翼,保存自己那点力量。因此,陈诚“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忍气吞声,固非陈诚所愿。台湾作家江南十分体贴他这种心情:“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象,因而,影响病情。”陈诚个性极强,不肯让人,如若侍候于老蒋,犹可言之;而现在却要他低眉顺眼于小蒋面前,实在是强他所难了。实际上,陈诚与蒋经国的矛盾,由来已久。蒋介石当然要安排“太子”继承他的“王朝”事业,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之名次,一直紧追陈诚,屈于第二。同时,“太子派”在党、政部门分占要角,陈诚系人马逐渐失势,这使陈诚难于谅解。虽然陈诚连任三届“副总统”,还一度担任国民党副总裁,但在蒋氏父子看来,陈诚已病人膏肓,故而优渥依然。1965年3月5日下午7时,一个被西方人士称以“军人政治家”、台湾老百姓称为“陈诚伯伯”的国民党强人型政治领袖、叱咤风云达40年之久的“副总

统”、68岁的黄埔耆宿陈诚溘然长逝。

在“黄埔八大金刚”中,惟一留在大陆的张治中,建国后先后担任一届、二届、三和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和二届人大常委,三届人大副委员长,历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公余之暇,他外出视察、度假,与老友见见面,还多次与邵力子等到北京“功德林”会见被关押的战犯杜聿明、黄维、范汉杰、王耀武等。张治中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彭德怀、陈毅、陶铸等中共领导人也都时相过从,关系不错。张治中的家庭生活温馨而和睦。张夫人洪希厚属于旧式家庭妇女,虽没有文化,但相夫教子,克尽为妻为母之道,为张治中所敬重。两人相伴相倚,幸福圆满地走完了人生之旅。除了长子张一真在台经商,受父株连被台湾当局限制出境外,张治中的子女都在他身边。张素我在外贸学院任教,张一纯在北京电力局,张素央在体委,张素初、张素久在文教界工作。在他的子女中,有4人是张治中写信从香港、美国召回的。张治中晚年写出《六十自述》一书。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由周恩来送到301医疗“保护”起来,才躲过浩劫。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逝世,终年79岁。他在遗嘱中发出“台湾是迟早一定要回归祖国”这样的呼声。这位在黄埔的红色教官,临终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实为憾事。

蒋介石在台湾大搞“整肃”运动,胡宗南遭到46名“监察委员”的联署弹劾,案由为:“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弹胡案”后因108名“立法委员”为胡辩护,国防部军法处才判决宣布:李梦彪弹劾胡宗南各项,均与事实相反,不能成立,应予不付军法会审。胡宗南,这位被周恩来称之为“志大才疏”的“西北王”,在台又被陈诚排挤,多年被蒋介石闲置不用,以后虽担任“战略顾问”,也徒有虚名,本来还算强壮的身体也染上沉疴,于1962年2月在台北逝世,终年

66岁。

蒋介石为了稳定台湾局势,也为了推卸战败的责任,执法立威,大张旗鼓地在1950年6月开展了一次“肃清共谍”的运动,并严厉惩处“失职高级官员”。

1950年6月9日,国防部副参谋总长吴石(黄埔军校教官)与第4兵站总监陈宝泉以“通共罪”被枪毙。

6月14日,第6兵团司令官、黄埔一期毕业的李延年与73军军长、黄埔三期毕业的李天霞被指控在平潭战役不力,分别被处以有期徒刑12年和8年。

6月16日,原浙江省主席陈仪以“通共罪”被处决。

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审查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兵变案”。事出在台湾特务机关,抓到一名叫郭廷亮的“匪谍”。该“犯”是孙立人部队的少校营长,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百余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调查结果,证明孙立人与此案并无直接责任,但有所谓失察之罪,蒋介石亲批“毋庸议处”,嘱孙立人在家安心读书,由“国防部随时察考”。这位非黄埔出身的东方“隆美尔”倍受嫉妒倾轧之苦,被蒋介石软禁了一辈子,成为张学良第二。在蒋氏父子死后,他才得以恢复自由,但已是白发老翁了。

风华当年的黄埔一期学生关麟征、宣铁吾、侯镜如、李默庵、何绍周不愿逃往台湾,先后在香港定居。侯镜如、李默庵后来返回大陆,从事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孙元良、贺衷寒、张镇、桂永清、肖赞育、郑介民这些黄埔一期生在逃到台湾后,也先后逝世;即使大陆时期最后一批23期毕业的小师弟,算来也应是华发早生,岁过甲子矣!正是: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论功行赏 黄埔将帅授军衔 刘帅办学 战场对手会金陵

话说旋乾转坤,日月清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当了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工作比较繁忙。从此,他的主要精力全部用于国家建设与外交工作上,对于军事方面的工作就很少过问了。

1955年4月14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我国代表团部分成员乘坐的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4月11日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5个小时后,在大纳土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机上的中、越代表团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殉难,其中有中国著名文化名人郑振铎等。消息传来,令北京各界人士十分震惊,尤其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在未得到确切消息之前,不知周恩来和陈毅是否遇险,全家人陷入极度恐慌与思念之中。周恩来刚从医院动手术出院不久,怎么能经得住这样大的打击呢?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央军委主持军衔评审的彭德怀、罗荣桓那里,也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波。因为周恩来、陈毅都是定为元帅的人选,如果他俩人有所不测,则全部军衔评定人选要被打乱,人员又得重新调整,这可不是什么小事;由于每一位元帅、将军的军衔评定,都得经过复杂的审批

手续,元帅、上将、中将军衔人选,要经过毛泽东批准,所以,国防部与总政治部最关心这一事态的发展。好在不久“克什米尔公主”号殉难人员已搞清楚。事件的起因为蒋介石集团指挥其在香港的特务机关于飞机右翼内部安置定时炸弹所造成。蒋介石集团特务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其原因在于亚非首脑会议把蒋介石集团排除在外。出席这一会议的有亚非 29 个国家。蒋介石被排除在外,他深感外交上的孤立,才想借机谋杀周恩来,给北京以打击。当 1955 年 4 月 16 日下午 6 时周恩来出现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时,机场上爆发了雷鸣般地掌声,周恩来成了亚非政府首脑会议上的“明星”。这次会议达成了关于国家之间和平相处的十项原则,史称“万隆精神”。

周恩来、陈毅安全返回北京时,我国军队实行军衔制的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建国前,我军曾两次拟议实行军衔制,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一直未能实行。只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参照国民党军队的军衔级别对个别同志授予过军衔。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的需要,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挂中将军衔。部分八路军将领和驻各地办事处的干部也非正式地佩戴过上校、少校军衔,驻各地办事处主任一般佩戴上校军衔。在抗战胜利后,解放军派部分同志到东北工作,当时苏联军队驻东北,为便于同苏军的联络,中共中央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上校军衔,并以中俄两种文字下达了任命书,这是我军第一次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授予军衔。此后在 1946 年国共双方和谈期间,派到军调处的解放军代表也都被授予了相应的军衔,如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驻太原授予少将军衔;黄埔五期毕业的许光达驻本溪,授予少将军衔;黄埔四期毕业的李逸民驻朝阳,授予

上校军衔。许光达穿上带有少将军衔的呢料军服后，他的妻子邹靖华望着丈夫笑道：“你穿这套军装倒是蛮神气的。”许光达说：“人是衣服马是鞍嘛！不过，我还是觉得穿土八路的衣服舒心，披上这张老虎皮觉得丢人！”邹靖华问：“国民党不是在通缉你吗？”许答：“我现在可是他们党国邀请的贵客，今非昔比了。”邹笑道：“当心老百姓把你当坏蛋杀了！”许说：“那可就听天由命了。”

在建国后，为加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很快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1950年9月，解放军总干部部设置了军衔奖励处，便开始研究军衔制的问题。1955年2月8日，“全国人大”一届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军衔制度。

按照军官服役条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是应该授衔的。为此，在初步方案中，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授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应该评为元帅。以后不久，彭德怀、罗荣桓等向毛泽东汇报军衔评定工作。毛泽东说：“你们现在评定军衔，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也是一件很不好搞的工作。听说，你们要给我一个大元帅，这个大可不必，让我穿着大元帅的制服到群众中去讲话多不方便呀！我自己也感到不舒服。依我看，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为好。”当时在场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邓子恢、张鼎臣等同志都表态不参加评定军衔。许光达时任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知道要被评为大将，写信给毛泽东郑重请求降为上将，毛泽东对许光达请求降衔表示非常高兴，认为这种谦虚精神值得人们学习。

1955年9月27日下午4时起，一辆辆小轿车开进中南海，

停在怀仁堂前的广场上。

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都身着海蓝色的元帅服，精神抖擞地走下车来，笑容满面地相互打着招呼。

“我们的总司令来了！”陈毅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高声地喊了一句，话刚落音，朱德双手抱拳：“各位早来了！”然后神采奕奕地走进休息室。

陈毅爱开玩笑，走到朱老总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说：“老总呀，穿起这身行头好漂亮哟！比在南昌起义时还年轻嘛！”

提到南昌起义，大家一下子想到了叶挺。“要是叶挺还活着，新四军里就应该有两个元帅。”陈毅说道。

贺龙说：“叶挺如果还健在，今天也将穿上元帅服和我们一起。”

周恩来身穿灰色中山装，大步走进休息室，非常高兴地说：“大家都穿上了新衣服。祝贺大家！”叶剑英拱手相迎。

贺龙走过来真诚地说：“我们的周副主席也应该授衔嘛！”周恩来笑着摆摆手，说：“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是为诸位元帅服务的，当好你们的后勤嘛。”

下午5时正，毛泽东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微笑而慈祥地第一个走上主席台，和台下的人们招了招手。随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出现在主席台上，会场内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授衔典礼开始。奏国歌后，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毛泽东亲手把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

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有功人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关人员,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的有功人员。

这次被授予元帅军衔的有 10 人,他们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大将 10 名,他们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同时还授将军军衔,上将 57 名,中将 175 名,少将 800 名,校级军官 3.2 万名,尉级军官 49.8 万名,准尉 11.3 万名。

将军军衔由国务院举行授衔典礼,习仲勋宣读命令,周恩来把将军军衔的命令分别颁发给粟裕等在京的将官,随后,各大军区也分别举行了授衔仪式。

1924 年由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其中属于赤黄埔系的师生,包括少数国民党黄埔毕业的起义将领,均授予了军衔。

林彪,黄埔四期毕业,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授元帅军衔。

陈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授元帅军衔。

徐向前,黄埔一期毕业,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战略研究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授元帅军衔。

聂荣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授元帅军衔。

叶剑英,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授元帅军衔。

陈赓,黄埔一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授大将军衔。

罗瑞卿,黄埔六期毕业,时任公安部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

兼政委,授予大将军衔。

许光达,黄埔五期毕业,时任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授大将军衔。

周士第,黄埔一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外军训练部长,授上将军衔。

张宗逊,黄埔五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授上将军衔。

陈奇涵,黄埔军校学生队长,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授上将军衔。

陈伯钧,黄埔六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授上将军衔。

宋时轮,黄埔五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授上将军衔。

杨至成,黄埔五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授上将军衔。

郭天民,黄埔六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部长,授上将军衔。

陈明仁,黄埔一期毕业,原国民党 1 兵团司令官,时任解放军 21 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授上将军衔。

阎揆要,黄埔一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授中将军衔。

彭明治,黄埔一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授中将军衔。

唐天际,黄埔四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授中将军衔。

郭化若,黄埔四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授中将军衔。

王诤,黄埔六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通讯部部长,授中将军衔。

倪志亮,黄埔四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授中将军衔。

常乾坤,黄埔三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授中将军衔。

谭希林,黄埔五期毕业,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授中将军衔。

曾泽生,黄埔军校高教班毕业,国民党 60 军军长,1948 年 12 月在长春起义,时任解放军 50 军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授中将军衔。

方之中,黄埔四期毕业,时任河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授少将军衔。

周文在,黄埔六期毕业,时任福建省军区副政委,授少将军衔。

张开荆,黄埔六期毕业,时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授少将军衔。

李逸民,黄埔四期毕业,时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授少将军衔。

袁也烈,原黄埔军校入伍生队指导员,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授少将军衔。

曹广化,黄埔四期毕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授少将军衔。

洪水,黄埔四期毕业,越南国籍,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军委《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授少将军衔;1956 年 6 月返回越南。

廖运周,黄埔军校五期毕业,1948 年 11 月 27 日率国民党 85

军 110 师起义,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授少将军衔。

1955 年 10 月 1 日授军衔的黄埔师生共有 33 位,其中元帅 5 人,大将 3 人,上将 8 人,中将 9 人,少将 8 人。

当时一部分黄埔师生已转入地方工作,没有参加授衔。如黄埔四期毕业的李运昌,曾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员,1955 年任国务院交通部副部长;程子华是黄埔六期毕业,曾任 13 兵团司令员,授衔时转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任主任;陶铸是黄埔五期肄业,曾任 4 野政治部副主任,授衔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世英,黄埔四期毕业,曾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天津警备副司令,授衔时已转业到山西省任省长;成仿吾,原在黄埔军校任兵器处处长,曾任八路军 5 纵队副司令,授衔时转到山东大学任校长;刘型,黄埔六期毕业,曾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1955 年授军衔时,调北京地质学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袁仲贤,黄埔一期毕业,解放战争时任 3 野 8 兵团政委,1955 年授军衔时调中国驻印度大使;雷经天,原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宣传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3 野两广纵队政委,1955 年授军衔时任最高法院中南分院院长;莫文骅,黄埔军校五期毕业,解放后任广西南宁市市长,以后调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授中将军衔。

1955 年 9 月 27 日下午 6 时半,在《胜利进行曲》的军乐声中,授元帅军衔仪式宣告结束。

朱德第一个走上台来,在毛泽东面前,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军礼,伸出双手接过毛泽东主席授予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第二个走上台的是彭德怀。这位出生入死、有鲜明个性的“彭大将军”,横刀立马,转战南北,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授元帅当之无愧。

紧接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依次走上主席台，从毛泽东那双手手中接过金光闪闪的勋章。

随后，周恩来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等在北京的将军。

晚间，举行宴会，冷餐和水酒，在军乐声中和一片欢呼声中，将帅们举杯庆贺。俗云：“一将成名万骨枯。”战争年代，黄埔军校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师生如熊雄、金佛庄、鲁易、毛泽覃、孙炳文、项英、恽代英、肖楚女、蔡申熙、曹渊、董朗、黄锦辉、蒋先云、李之龙、彭干臣、王尔琢、吴展、许继慎、宣侠父、卢德铭、周逸群、姜镜堂、吴光浩、肖人鹄、熊受暄、朱云卿、段德昌、李鸣珂、刘志丹、唐赤英、伍中豪、左权、唐澍、孙德清、冯达飞、邓萍、杨林、袁国平、曾中生、赵尚志、潘忠汝、赵一曼、段玉林、宋绮云、周维炯、黄公略、叶挺等，如果能活到今天，那他们都当之无愧地会进入将军的行列。

在授军衔的那天，由于刘伯承与林彪因病在青岛疗养，没有回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授衔仪式，所以，中南海的历史档案上，只有8位元帅参加授衔的纪录。

四天之后，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国庆六周年阅兵典礼，人民解放军官兵一律穿着佩戴军衔标志的新式制服，其英姿焕发，令人耳目一新。

为了缅怀先烈们在革命战争中的功绩，又对当今未授军衔的一大批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军事家给以高度评价。经中央军委研究，认定有36位军事家是中国革命战争最终取得辉煌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叶挺、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

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

在这36位军事家中，周恩来、陈毅、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陈赓、罗瑞卿、许光达、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黄公略、刘志丹是黄埔出身的。由此可见黄埔军校是培养将军的摇篮。叶挺的《囚歌》；段德昌、曾中生在身遭错误路线迫害处境中的所言所行；黄公略、刘志丹、左权等在战斗第一线身先士卒、血沃中华的牺牲场景，都集中映现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人格的力量是最具感召力的，他们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成为一切追求光明与美好生活的中华儿女的精神动力。沧海桑田，往事历历在目，他们的优秀品质，应是后人需要继承与弘扬的。

话分两头。且说刘伯承元帅没有参加1955年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授衔仪式，他在风景优美的避暑胜地青岛，已经厌烦了疗养的舒适消闲生活。在战争年代养成的军人作风与生活习惯，使他时刻忘不了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这是一所培养高级军事将领的军事学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把全部心血与精力倾注在这所崭新的军事学府的建设上，因而积劳成疾。中央军委安排刘伯承在青岛疗养，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好为国防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建国后，都考虑到：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部队军政素质的高低和战斗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部队军官培训质量的好坏，所以，办军事学院，应该选拔卓越的军事将领去主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乎同时想到了刘伯承。

刘伯承不仅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和统帅之一，长

期指挥过一个方面的大军作战,具有极丰富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实践经验,而且他还多次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承毅然剪掉辫子投奔四川万县参加革命学生军,以优异成绩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毕业后到同盟会员熊克武任师长的川军第5师任职,不久升任排长。在护国战争中,刘伯承组织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担任军事指挥,开展游击活动,袭击、骚扰北洋军。在1916年3月率部进攻丰都时,一颗子弹从刘伯承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战争虽然夺去了他的一只右眼,但“独眼将军”的称号不胫而走。刘伯承认识了吴玉章、杨闇公后,就开始踏上革命征程,1926年5月加入共产党,从此,他成为一名卓越的无产阶级战士。

刘伯承参加南昌起义,后由党中央派往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因成绩优异,又被推荐提前进入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夏,刘伯承回国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第二年冬来到江西中央苏区,毛泽东立即委任他为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负责培养红军指挥员。毛泽东风趣地对刘伯承说:“我们要把红军学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军学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办了个“黄埔”,如今毛泽东要刘伯承办个“红埔”,为红军培养军事干部。刘伯承不拘一格延揽人才,当时在红军中的黄埔学生杨林、郭化若、邓萍、叶剑英、左权、陈赓等都在红军学校当过教员。刘伯承提出“政教合一”的主张,各级领导既是行政管理干部又是教员,也是学员。学员队按战斗序列编成若干营、连,便于学习与作战。1931年冬,周恩来视察了红军学校的工作,并检阅了队列和刺刀表演。当时,他非常兴奋地称赞,“红埔”比“黄埔”办得好,我们的腰杆子又粗又硬了。刘伯承办“红埔”两年,共招6期学员,培养了11500名红军干部,他们成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中坚力

量。正像《工农红军学校毕业歌》歌词所说的：“革命潮流正高涨，我们学业成。拿起枪炮上前线，奋勇不顾身。领导战斗员，配合工农兵，巩固革命根据地，展开革命战争。曙光在前，革命胜利要争先。全国红旗插遍，愈艰苦愈有劲，列宁主义者工农的先锋……”

刘伯承在抗战期间领导过红军大学，解放战争期间兼任中原大学、2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他具有创建和领导军事院校的实际经验。

就这样，在1950年10月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决定由刘伯承主持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10月27日，刘伯承飞抵北京，接受创办陆军大学的重任。这一个月，周恩来三次接见刘伯承，向他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创办陆军大学及教学方针的具体指示，提出了陆军大学临时党委会委员名单，以及有关大学组织机构的设想方案。中共中央原计划将陆军大学校址设在北京，刘伯承多次到北京西山一带勘查地形，选择校址。后来，刘伯承考虑到国家正值经济恢复时期，新建一所正规的大学会给国家带来负担，况且，如等校舍竣工，又要拖延一定时间。于是，他向中央建议，以南京华东军政大学的校址为陆军大学的校址。刘伯承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准。

在北京，刘伯承对创建陆军大学有了比较成熟而系统的设想和计划。11月13日，他向毛泽东主席呈送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的报告，建议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刘伯承提出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悉与指挥现代各种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讯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

1950年11月中旬,刘伯承肩负着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重任,由北京动身,前往南京。

刘伯承办军事学院时,在人事安排问题上从来不搞个人小圈子。他反对任人唯亲,力行任人为贤。早在来南京前,他就说:“我不带什么班子,只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几个人干干净净地去南京!”

当时,创办军事学院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非常缺乏师资力量。虽然有苏联军事顾问,但毕竟不能全盘照搬苏联那一套。刘伯承为解决这个困难,四处奔波,动员有关部门调出优秀人才,加强学院的师资力量。尽管如此,仍是满足不了学院的需求。就在这时,有关方面给军事学院推荐了200多位在战争年代起义或被我军收留、收容的国民党军官和军事理论研究人员,其中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或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的校级、将级军官,有些还是留过学,在苏联、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进修过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刘伯承求贤若渴,他认为:这些人所掌握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除去反动的战争史观及其他糟粕,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刘伯承相信:这些人只要依附人民、依附共产党、认真改造世界观,努力工作,是能有所作为的。他为启用国民党将领任军事教员,曾用反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

“蒋百里,大家说他是中国的军事学家,他也曾煞费苦心研究过军事,然而由于他属于中国士大夫阶级,主要依附于没落的封建阶级反革命派,反对人民革命,所以每次都打败仗。他帮助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打仗,被革命所击败了;后来他又依附蒋介石,也无所作为,以致于死。杨杰将军,大家也说他是一个军事学家,但他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时候,做不出什么事来。……这两位军事学家,不能说他们

学而无成,而只能说是由于他们研究军事为反革命服务而一事无成。”

南京军事学院于1951年1月15日正式召开成立典礼大会,中共中央军委特赠给大会题词“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陈毅代表军委莅临大会并致词,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各军区、各野战军等方面均派代表参加了开学典礼。刘伯承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任务》的报告。他激动地说:

“我以十分的敬意与荣幸来宣布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成立。公元1951年1月15日这个日子,从此即成为我们军事学院创办的纪念日。”

中央军委抽调了四川达县的陈伯钧任军事学院副院长,刘伯承是开县人,两人都是四川同乡,而且陈伯钧还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学生,经过严格的军事养成教育,双方合作办学,相得益彰。

陈伯钧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平定夏斗寅的叛变,后经熊修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他随武汉分校编入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2方面军教导团。8月4日,教导团在东下南昌响应八一南昌起义途经九江时,被张发奎缴械。陈伯钧辗转来到高安,由党组织介绍到20军独立团任副官。陈伯钧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参加过反“围剿”战争。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当过抗大训练部部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后来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任4野12兵团司令员,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到南京军事学院后,他担任过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兼学术研究部部长、教育长、副院长,积极协助院长刘伯承主持全院工作。后来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接替叶剑英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从事军事

教育 24 年,为人民解放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高级指挥员。

且说刘伯承从全国各地招聘、挑选军事人才充实军事学院教师队伍。原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黄埔五期毕业的郭汝瑰,曾留学日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24 期毕业;1949 年 12 月 9 日率国民党 72 军起义。郭汝瑰 1929 年经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赴日本后脱离组织关系。刘伯承发现郭汝瑰是个人才,便把他从四川省交通厅厅长的职位上抽下来,进南京军事学院当了教员。在刘伯承的关怀下,郭汝瑰对军事条令、术语、译名作了修订。以后编《中国军事史》时,他被推荐任主编。

黄埔军校三期毕业,曾在德国陆军学校 21 期毕业的李永中,一直在黄埔军校任教育处处长。原教育长吴允周逃台后,李永中升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他率黄埔军校师生起义后,在重庆西南军政大学高研班学习,后被刘伯承招聘赴南京军事学院任教。笔者先父吴起舞,原任黄埔军校训导处处长(即政治部主任),是黄埔四期和陆军大学将官班四期的毕业生,也被招聘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原国民党整编 75 师中将师长、黄埔六期毕业的沈澄年,原国民党 35 军军长朱大纯,原国民党 87 军副军长、南京警备区 99 师师长、黄埔六期毕业的王宴清,国民党 18 军 11 师师长、黄埔六期毕业的王元直等一大批既有军事理论基础,又有军事教育实践经验的黄埔毕业生,均被刘伯承延揽到军事学院任教,充实师资队伍。即使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国民党战犯,只要有真才实学,也可报名来军事学院任教。如国民党 49 军中将军长郑庭笈,黄埔五期、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在辽沈战役中被俘。沈阳军区参谋处赵处长到抚顺来找郑庭笈谈话,征求他的意见,可否上军事学院任教员。郑庭笈由于是广东南海人,从未当过教官,就一口谢绝了。新 6 军军长、黄埔六期毕业的李涛,后来去齐齐哈尔解放军步兵学校当了教员,1953 年

又被送回绥化解放军官团高级队,后病故于沈阳军区军法处看守所。

大批国民党将军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后,有些工农出身,从未进过军事学校的旅长、师长他们像小学生一样,坐在教室里当学生。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过去“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敌人;现在学习使用新式武器是必要的,但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呢?刘伯承为此专门开大会发表讲话。他说:“就是在过去的战斗年代里,大兵团作战也有协同问题,而现在我们正处于喷气武器和原子武器的时代,诸兵种协同作战则成为现代战争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指挥部队作战如同使用一台完整复杂的机器,一颗螺丝钉出了毛病,就会影响全体。还是把思想束缚在‘小米加步枪’上,就不能适应现代战争,打起仗来要吃亏。”许多国民党将领走上讲台,也有思想顾虑,怕学生瞧不起,认为自己在战场上是“败军之将”,又有何脸面在学生面前大谈战略战术。刘伯承针对这部分教员,又耐心开导,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放开手脚、卸下包袱、大胆执教。刘伯承经常引用《孙子兵法》第一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此来启发教员认真负责教学。后来,他总结了一套军事教学方法,称为“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纵横连贯,编织起来”。南京军事学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凡部队团级干部以上的指挥员,基本上都进军事学院进修过。如解放军高级将领杨成武、杨得志、秦基伟、张万年、迟浩田等,都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毕业生。1958年以后,军事学院迁至北京改称国防大学,师资队伍又重新补充了一些科班出身的军事人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惟一培养团级以上指挥员、参谋人员的高等军事学府。原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一批起义将领教职员,在1955年军衔制正式执行前,大部分转业到各省市从事地方工作,完成了他们的历史

使命。

1949年底,蒋介石率国民党残余军队撤退到台湾。当时进入台湾的部队,番号多,人员复杂。陈诚决心予以整编训练,规定队伍登上台湾岛之前,先要缴械,以免流为散兵游勇,影响治安;登陆之后,集中管训。于是取消了十几个兵团司令部,30余个军的番号,并裁并了一些军事单位。

在大陆黄埔军校起义后,台湾“国防部”于1950年10月,在原陆军军官学校台湾凤山第四军官训练班旧址恢复陆军军官学校,并任命罗友伦为中将校长,重新按黄埔军校期别续招第二十四期学生。1954年10月,学校仿照美国西点军校改革学制,学期4年,每年夏季进行10周军事教育,掌握基本军事知识;其余时间,实施理工科大学教育,掌握理工科大学生必须具备的科学知识。该校毕业生,既颁发军校毕业证书,也授予理工科学士学位。从军校毕业的学生,还要送到各兵种学校受专业军事教育,然后再分配到部队服役,军衔从少尉起,直至中校;如果要再晋升,必须进“三军大学”或参谋学院深造。

从1967年开始,台湾三军(陆、海、空)8所学校为期11周的人员生训练,统由凤山陆军军官学校负责。在台湾的陆军军官学校至1997年止,历任校长均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是:罗友伦(五期)、谢肇齐(六期)、徐汝诚(六期)、艾煖(八期)、张立夫(八期)、林初耀(十期)、秦祖熙(十一期)、言百谦(十六期)、许历农(十六期)、朱致远(十六期)、卢光义(二十二期)、黄幸强(二十二期)、黄耀羽(二十四期)、汤元普(二十八期)、胡家骥(二十九期)、杨德智(三十三期)。台陆军军官学校从1950年8月至1997年共办四十四期,毕业学生14200人,1997年已办到六十六期。

黄埔军校从 1924 年 5 月创办到 1949 年底,在大陆共 25 年多的时间,历经黄埔、南京、成都三个时期,从第一期至第二十三期共毕业学生 5 万左右,加上各分校、兵种学校及有关训练机构代训各期学生 19 万多人,军官高等教育班 7000 多人,总计毕业学生 252000 名左右。

黄埔军校毕竟是历史的产物,1949 年基本上走完了它的办学历程。蒋介石到台湾后,虽然继续办下去,但内容实质已完全变样。尤其是蒋经国上台以后,从大陆逃到台湾的黄埔毕业生,由于年事已高,均已退役。如当过台湾“国防部长”的高魁元(4 期)、郝柏村(8 期)、郑为元(8 期)。黄埔毕业生在军队中逐步由台湾本土人顶替,黄埔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小。

黄埔军校的历史揭过了一页,留在大陆的二十三期小师弟也年过花甲,他们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留有马蹄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网开一面 战犯特赦重做人 把盏言欢 师生一笑泯恩仇

话说春去秋来，斗转星移，日月如梭，转眼就进入“大跃进”的1959年年末。这一年的冬天特暖，坐落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个原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为一座监狱。这座监狱是以效法日本改良司法的名目修建的，监狱构造取型于日本，后又参照德国模式。在这座监狱大门口，守卫线以内，竖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13行碑记，记叙建造监狱的经过。1915年（民国4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时期，司法总长罗文干才最终完成这项工程，此即著名的第二模范监狱。

建国后，功德林监狱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时，改作北京战犯管理处，管理处处长就是原漳河训练班的姚伦。姚伦原是公安部十三局局长。

功德林占地近百亩，有高大的围墙和宽敞的大院，进了功德林大门，迎面是一个广场。广场上原有一个处死囚犯的绞刑架，现尚存插木桩的深坑。大门南面，有三幢房子，前两幢为2层楼房，后一幢是平房，作为客厅用，厅内铺设讲究，有沙发、地毯之类装饰，是专门接待国内外参观者的地方。三幢房屋之间，有两个花园，在后花园里，有一株名贵的梅花树，开花季节，树叶淡绿，花瓣粉红，甚是雅艳。大门东面，是成排的平房，监狱的中心。

是辐射型的八条胡同。胡同按“甲乙丙丁戊己庚申”依次排号；胡同交叉口是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八角楼，哨兵站在楼上，便可监视各条胡同的情况。八角楼角，又有几个小八角楼，小八角楼的大门，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一个铁栅，再朝后走，有南北对称的两排平房，平房之间是一个运动场。后院则是一块约 20 亩的菜园地，当中还打了一口井用以浇园。院内四周尽是梧桐树，绿树成荫。在繁华的闹市区有这样一块环境幽美的地方，着实令人羡慕！然而，谁又能想到功德林竟是关押战犯的地方呢？

早在 1946 年 6 月，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反人民的全面内战。1948 年 11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这时解放战争已是胜利在望，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如何处置，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命令》明确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其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只要犯下‘命令’所列十二条罪恶行为之一者，均应加以逮捕，并以战犯论处。”《命令》还宣布我军对待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人员的政策是：“首恶必惩，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建国之初，对国民党战犯的管理是分散的，办法也不统一。在战场上俘获的战犯同其他被俘人员一起，由各野战军所属解放军官训练团管理，后于 1955 年 12 月 31 日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1956 年 1 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北京召开战犯管理工作会议，确定了统一的管教制度和生活待遇标准。同年 3 月，经审定，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共 926 名，他们都是犯有严重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省以上党政人员和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全部国民党战犯分别集中关押在公安部监狱以及辽宁抚顺、山东济南、陕西西安、四川重庆和内蒙古 6 处。除了国民党战犯外，还有由苏联移交过来的日本战犯 969 名、伪满战犯 61 名、伪蒙疆战犯 10 名和阎锡

山部队中的日本战犯 100 多名,共计约 3000 人。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处理战犯问题,特别是“一个不杀”的方针,作了详细的说明。毛泽东说:“反革命可不可以改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改变。但是,在我国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了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名声是不好的。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之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决定由社会知名人士成立了一个“九人小组”,其中有齐燕铭、于毅夫、梅龚彬、张梓祯、肖向荣、屈武、黄雍、李俊龙、凌云。黄雍湖南平江人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任中央军校调查处副处长、黄埔同学会负责人等职;1949 年 8 月曾参加湖南和平起义工作;解放后任湖南省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候补委员等职。因为他与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曾扩情、李仙洲、范汉杰是黄埔同期同学,所以政协主席周恩来提名他参加公安部“九人小组”工作。另外,张治中、傅作义、侯镜如等社会知名人士、黄埔军校师生也参与对战犯的思想疏导工作。

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他对党中央关于改造和处置战犯的政策体会最深。早在他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时,对办案就极为认

真。一天,他接到通知,要他去处理卫生处给干部吃了毒药的案件。吃了毒药的两个干部,一个是军团机要科长,另一个是警卫连指导员。当时给他俩发药的游胜华大夫已被关押起来。罗瑞卿深入了解情况,从医务处获悉正在使用的这批治疟疾的喹宁片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医生对药品存放没有标签,也没有检验设备,全凭医生的印象或口感来确定是何种药,游胜华将吗啡错当喹宁,结果引起中毒。事情终于查清,罗释放了游胜华并向他道了歉。1936年12月,罗瑞卿作为中共代表团随周恩来来到西安,负责安全工作,他发现驻地附近有一家牙科诊所值得怀疑,但去调查的几位同志都没有发现问题,于是他决定亲自出马。这天,罗瑞卿换上便装独自去了诊所。他与老医生在交谈中发现许多疑点,当晚就逮捕了这位老中医。原来,罗瑞卿在与他交谈时,发现他说话的习惯与中国人不同,有时不自觉地带有日语词汇;另外他作为一名老中医,却对中国医学历史常识很不了解,竟然把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说成是秦朝的。后来经过审讯,证实这个医生是个日本特务。1953年,某大区公安部对在押的3名职级较高、罪行较重、民愤极大的国民党战犯拟处以死刑,请示公安部,罗瑞卿当即批示“刀下留人,杀之可惜”,并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1956年1月10日,全国重要战犯集中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总共约200余人。他们当中毕业于黄埔军校、官阶在中将以上、职务在军长以上的有杜聿明、宋希濂、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曾扩情、周振强、韩浚、黄维、郭一予、胡靖安、康泽、方靖、严翊、廖耀湘、宋瑞珂、李以勳、王耀武、郑庭笈、文强、林伟俦、梁培璜、邱维达、沈蕴存、邱行湘、刘镇湘、曹天戈、黄淑、陈金城、杨光钰、刘嘉树、何文鼎等30多人;黄埔军校毕业、官阶至少将以上、职务在师长以上的有沈策、陈远湘、覃道善、杨伯涛、李正谊、熊新民、周开成等多人。他们之中有的是同期同学,有的是前后

期同学,想不到竟在功德林又成为“同犯”,昔日在战场上难得一见,如今竟能朝夕相处,因而也常感到欣慰。

周恩来指示,要分批组织在押战犯到各地,包括他们曾经犯过罪的地方去参观,看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周恩来当年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宋希濂、黄维、杜聿明、范汉杰、王耀武、康泽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其中有些人还打过交道。共产党人也讲“私情”,周恩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一再强调:“一定要尊重战犯们的人格,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1956年1月全国公安厅(局)长和战犯管理所所长会议以后,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中央的决定和指示,是打破旧监狱与社会相隔绝,运用社会、群众力量教育和改造罪犯工作的又一次大胆尝试。

自1956年2月到8月,被关押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共分三批,先后参观了大江南北的十几座城市;而被关押的900多名国内战犯,其参观的地区和单位那就更多了。黄埔军校毕业的一批战犯、伪满皇帝溥仪,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康健东、周养浩、鲍志鸿、何崇校等先后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这是使他们转变思想的最好办法。如果只在生活上给予优待、在人格上给予尊重、在劳动中锻炼、在学习上读马列主义,那是无法从根本上改造思想的。杜聿明过去是东北最高军事负责人,他在抗战胜利后去接收东北时,看到许多工厂都不冒烟,工人失业,老百姓流离失所。1957年他去参观时,只有短短的几年,东北便成为祖国的重工业基地:旧工厂扩大了,新工厂如雨后春笋,处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感动得不止一次地痛哭流泪。

不仅让战犯们去外地工厂、农村参观,而且从1956年“五一”劳动节开始,每逢国庆节,按照毛泽东的提议,都要让他们在公安部临街大楼上观看庆祝游行。1956年国庆节时,在天安门

城楼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毛泽东忽然想起了这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于是他向在城楼上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徐子荣问道:“战犯们是否来观礼了?”罗瑞卿一时答不上,就叫徐子荣找凌云。他们体会毛泽东的意思,商量就于当晚在公安部临街大楼上搭起看台,组织战犯们参观天安门广场的焰火晚会。从这一年起,公安部就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每年的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都组织战犯们白天观礼,晚间看焰火。公安部并通知各地:凡设有战犯管理所的地方,都照北京模式办理。

除了组织战犯参观工厂、农村外,还广泛地组织战犯家属子女、亲戚朋友来功德林探望。通过探视会面,互相了解情况,交流感情,心脉相通,让战犯们感到党的关心与家属们的温暖,从而使他们消除顾虑,充满信心,重新做人。康泽、杜聿明、黄维在关押期间都有慢性疾病,都及时得到治疗。黄维在《功德林改造生活纪实》一文中写道:

1952年开始,我害病了。结核病突然暴发。本来我身体是很壮实的,没有害过什么大病,可是被俘后,心情不好,对改造生活思想上想不通,于是到了1952年4月,病发了。这一病还很厉害、很凶。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精囊结核、副睾结核,好几种结核病一齐暴发出来。其中特别是急性腹膜结核、腹膜炎最危险,因为腹水很多,肚皮肿胀得老高老高,两条腿肿得发亮。从发病那天开始,我就躺下不能动了,这一躺就整整躺了四年的时间。管理处把我送进了现在的复兴医院。复兴医院那时是公安部的职工医院。我们这些国民党战犯也在那里看病。我们在复兴医院住院,事先都是由管理人员联系好了的,一去就可以马上住院。那时复兴医院专门单独划出来几个病房,供战犯

们住院治疗使用。我们住院都是单间,不和别的病人接触,战犯管理所派专人管理,什么都不用自己发愁,由他们安排妥当。

当时给我治病,那是费了相当大的力气的。那时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如链霉素和青霉素,我们国内自己还不能生产,都得靠苏联进口。可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而英、美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虽然过关,却对中国大陆封锁。于是,我需要的药物都是通过公安部的卫生机构,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买回来的。所以我的病治疗得很及时,很不错。事实上,在国民党战犯中,除了我以外,杜聿明、康泽、文强以及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这些人,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他们都和我一样,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

黄维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1948年12月15日在淮海战役中,于双堆集被俘。当时他是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官,被俘后化名方正馨,他是江西弋阳人,14军军部上尉司书。负责管理12兵团俘虏工作的是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部长杨松青,他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称黄维为老大哥。黄维拒写劝降信,拒不让照相,拒不承认有罪,思想相当顽固,当别人问他有罪否?他回答说:“我的最大错误就是打了败仗!”到北京功德林后,他与梁培璜打架、要发明“永动机”,曾闹过不少笑话。但是,在共产党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认罪态度很好。

过去在战场上,国民党反动派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较量是失败了,现在战犯们的改造,有人喻之为又一场无硝烟的决斗,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都经历了由对抗、观望、迟疑、动摇到认罪改造的复杂思想斗争过程。康泽是国民党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黄埔三期毕业生。当他身患重病时,功德林将

他送进协和医院住了很长一个时期,并给以精心的治疗和照顾,还让他远在美国的儿子来北京探望他。杜聿明原是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黄埔一期毕业。原来他就患有比较严重的慢性疾病,过去,蒋介石不让他去美国治疗,要他上战场卖命;如今,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却得到了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送进医院治好了病,过去,蒋介石不让他去美国治疗,要他上战场卖命;如今,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却得到了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送进医院治好了病。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

《特赦令》公布前四天,即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周恩来、罗瑞卿、张治中、屈武、邵力子等。周恩来提出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在这之前,党中央就已责成有关部门为特赦国内战犯进行了研究和安排。当时,考虑过“特赦”与“大赦”的不同含义,认为不论是根据我们的现行宪法,还是着眼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是考虑在押国内战犯的历史及现状,实行“特赦”是最为合情、合理而又合法的。与会人士认为:共产党的政策光明磊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民主协商与肝胆相照的精神。于是毛泽东向全国人大提出在国庆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同意这个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12月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宣布:第一批特赦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和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伪锡察盟全军副司令雄努敦都布等33名战犯。

功德林监狱的铁门打开了,随着第一批战犯的特赦,直到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战犯特赦,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周振强、杨伯涛、邱行湘、李仙洲、范汉杰、宋瑞珂、陈金城、罗历戎、李以劭、廖耀湘、林伟俦、何文鼎、黄淑、韩凌、覃道善、康泽、严翊、曹天戈、方靖、杨光钰、李德生、黄维、郭一予、刘镇湘、文强、胡靖安、沈策、周开成、陈远湘、沈蕴存、何崇校等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共产党的关怀下,重新开始了光明的生活。

当第一批战犯从公安部首长那里领到《特赦通知书》时,他们不禁热泪盈眶,低头欲泣,深感共产党的政策英明。被邀请参加特赦的战犯家属,有杨伯涛的儿子杨健华,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郑庭笈的女儿郑心楠,她在北京某中学读书。家属在大会上讲话,宣誓:“一定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以报答共产党天高地厚之恩。”杜聿明代表特赦战犯上台讲话,他声泪俱下,无限感激,表示今后要重新做人,为建设祖国贡献余生。

在首批被特赦的33名战犯中,杜聿明、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周振强、陈长捷、卢浚泉、溥仪共十一人;住在北京崇内旅馆听候安排。当天下午,他们由殷兆玉秘书陪同,乘大轿车直驶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将宴请他们。在西花厅,周恩来满面笑容,挥手示意请大家坐下。总理按座次逐一询问每人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然后大家攀谈起来。周恩来是第一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说:“我在黄埔军校年龄还不到三十岁。有很多学生的年龄比我大,我当时感到有很大压力。”曾扩情答话说:“我那时已三十开外了,我这个学生还比老师大几岁哩。”周恩来还就满族旗人的服装和礼节情况,指出和汉人不同的特征,和末代皇帝溥仪谈起家常来。当年任武汉分校文书、中共武汉分校党委书记的陈毅副总理诙谐地对溥仪说:“我早年在北京读书

时,还是你的臣民哩。”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气氛极为融洽。这时杜聿明很惭愧地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下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有负老师的期望。”周恩来回答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说罢,两人爽朗地笑了起来。杜聿明又向陈老总作检讨:“我在淮海战场刚刚被俘时,老总要见见我,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肯见,是顽固透顶,罪加一等。”陈毅副总理摆摆手,笑道:“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嘛!”周恩来、陈毅对特赦战犯这样慈祥的态度,与他们亲切地谈话。当年的师生情谊,有如阵阵暖流,沁人心脾,使他们紧张的心情消失殆尽。周恩来讲话后,章士钊恳切地对大家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对各位将军特赦,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按照总理指示,继续完成改造思想的光荣任务。”会见气氛如此融洽,使大家深为感动。回到崇内旅馆后,杜聿明、王耀武等人自己花钱制作了一块“感恩匾”,亲自抬到功德林。当时管理所感到很突然,急忙请示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答复说:“他们的到来,说明了对我们党很有感情。现在人家都已经是公民了,这次到来是朋友之间的会见,应该请他们留下,还要好好款待款待!”事后,管理所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杜聿明声称自己是“回娘家”。向功德林尚未特赦的同学传达了周恩来等接见的盛况;会开得很生动,有声有色,管教者与被管教者都很激动。

1960年10月,张治中将军在北京颐和园介寿堂休养。周恩来让张治中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邀请在京的黄埔同学到颐和园聚会,并嘱有家属的也要偕同参加。周恩来又打电话给陈赓,要他一定偕夫人同往。

10月19日晨,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北京郊区的红星人民公社,接在那里插队劳动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强、

郑庭笈及杨伯涛六人来颐和园。已在颐和园等候的,有黄埔军校师生邵力子、郑洞国、侯镜如、黄雍、李奇中、覃异之、周嘉彬以及他们的夫人等20余人。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陈赓和夫人傅涯,在张治中和夫人洪希厚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大家起立鼓掌欢迎。

周恩来在同大家一一握手后,招呼大家坐下,他说:“这次集会 是黄埔师生联欢。文白(张治中)先生在颐和园休息,趁这个机会请文白先生邀约大家到这里见面。大家工作得很好,我 很早就想和大家谈谈的。今天的聚会,特地把杜聿明等六人也请了来,对他们的进步,在座的师友们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接着,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杜聿明等人在红星人民公社的生活、学习和劳动情况。杜聿明作了汇报,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周恩来说:“你们是第一批特赦的,要做改造好的标兵。你们被特赦了,但是过去的历史罪恶还是客观存在,不能改变的,不能因为特赦就一起抹掉了。当然,人的思想行为是可以改变的。赦人不赦罪,大家要引以为戒,继续改造自己。”

杜聿明等六人听得很仔细,总理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来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让他们很受感动。他们一再向老师表示决心:“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办,继续改造自己。”

黄埔师生欢聚一堂,这是难得的机会。张治中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名义,宴请大家把盏言欢,品茗叙旧。虽说昔日的光景不会再来,但昔日的友情却依旧萌芽吐绿。

午宴过后,少憩片刻,周恩来依然兴致勃勃,他精力充沛地对工作人员说:“大家聚会不容易,要留个纪念,在哪里拍几张照好?”工作人员遂引导着他们一行人,来到颐和园的昆明湖北岸的牌楼前,以万寿山为背景,拍了几张集体照。为了勉励杜聿明

等人的改造,让他们首批特赦的六名黄埔同学站在周恩来左右,单独留影。这一张珍贵的合影,后来成为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他们的子孙的“传家宝”。

郑庭笈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广东文昌人,他原是国民党第49军中将军长,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俘。他有个哥哥叫郑挺锋,任国民党第94军中将军长,在傅作义手下当差,郑庭笈曾写信劝降。郑庭笈的夫人冯莉娟带着五个子女原本买好船票从海口赴台湾,听到丈夫的录音广播,又见到亲笔来信,于是就留在大陆。郑庭笈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冯莉娟含辛茹苦抚养孩子,日子过得极为艰难。由于生活所迫,1958年两人离了婚。郑庭笈被特赦后,周恩来关切地说:“她是否再婚了?”郑答:“没有。”周恩来转向在座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动员他俩复婚。”在周恩来的关心下,郑庭笈与冯莉娟破镜重圆。1961年3月1日,郑庭笈与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强、杨伯涛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郑的夫人冯莉娟也被全国政协安排到机关做打字工作,其五个子女都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参加革命工作。郑庭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每当回想起在战犯管理所的生活时,郑总会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在人的一生中,也许会产生根本的转折。11年的改造生活,使我好像从血雨腥风中走来,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找到了我的人生归宿。”

陈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他和宋希濂一同赴广州考黄埔军校,在陈赓的影响下,宋思想倾向进步。1927年后,宋希濂追随蒋介石,与陈赓分道扬镳。1949年,时任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的宋希濂,在兵败大渡河后,他成了同学、同乡陈赓手下的俘虏。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

陈赓,1950年春因公来到四川重庆,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的陪同下,驱车来到昔日戴笠在杨家山住过的公馆里,会见了他的黄埔同学宋希濂、曾扩情和钟彬。身居高位的陈赓主动看望当时关在歌乐山麓白公馆的在押战犯。这使宋希濂既高兴又惭愧。陈赓握住宋希濂的手说:“你好啊!我们又好久没见面了,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身体是个宝啊,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做不成,你说呢?”宋希濂被陈赓那爽朗的笑声所感动,连声说:“惭愧得很,没想到您还会来看我!”

“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陈赓问。

“记得,西安事变后,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来看我。”宋希濂答道。

陈赓回忆道:“是啊!又是10多年了。那次我是奉周恩来之命特地去看你的。我当时对你说,我们一同投奔黄埔,现在又同是师长,只不过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来了!这该给日本人记上一功。”西安一别,匆匆十年。

陈赓在重庆与宋希濂见面后,1959年12月宋希濂特赦时,陈赓由于在广州休养,没有再见面。1960年4月,陈赓回到北京。7日,在北京民族饭店,他设宴招待了黄埔军校六名被特赦的老同学,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作陪,宴会举杯共饮,边吃边谈,这是一次老同学的聚餐。陈赓说:“来,我们拿出黄埔的精神,把桌上的菜扫光!”这年的8月份,陈赓又在四川饭店邀请黄埔同学郑洞国、陈明仁、侯镜如、唐生明作陪,再一次宴请了从功德林走出来的杜聿明、宋希濂等六名同学,宾主言欢,畅叙旧情,干戈化玉帛。正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心向祖国 李宗仁叶落归根 风流诸葛 白崇禧暴死台北

话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解放军就在福建沿海厉兵秣马,大有一举用武力解放台湾之势。虽然那时解放军海军才刚刚组建,肖劲光是首任海军司令,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十艘舰艇分别属华东军区海军海防第一、二舰队和江防舰队,但用武力解放台湾的决心仍然是很大的。然而,时局动荡,风云突变,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使新中国在东北、东南两个战略重地受到美、蒋的严重威胁。国力脆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同时在南北两地用兵在军事上是犯兵家大忌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经过慎密考虑,决定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方针取代“解放台湾,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因而台湾问题随之被搁置下来,蒋介石得以苟延残喘,偏安一隅。朝鲜停战后,使中国有了集中精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中央政府随即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运动。在军事上,解放军开始猛烈炮击金门,又于1955年2月底,先后解放了大陈岛、鱼山岛、披山岛等岛屿。蒋介石损兵折将,黄埔军校高教班毕业的吉星文师长被炮弹炸死。台湾大型巡洋舰“太平号”在渔山西南海面执行夜间巡航时,被解放军的鱼雷快艇击沉,在淮海战役中的败将、

台湾金门防卫司令、黄埔四期毕业的胡璉在金门龟缩于地下碉堡之中，得幸免于死。

与此同时，解放军海军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成长壮大起来。周恩来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3亿美元的军事贷款协定，中央决定将其中的一半，即1.5亿美元拨给海军建设使用，于是海军舰队实力大大增强。

中共中央大力加强政治宣传与外交行动，台湾当局如惊弓之鸟，惶恐不安。

1955年夏，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局势和中美关系的谈话与声明，迅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年8月，从美国新泽西州传来了李宗仁非同凡响的回声。他公开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解决台湾的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经过谈判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第二条，美国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自治州。然后，在美国撤走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地区的非军事化。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免除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经过长期的和平，两个敌对政府间的彼此仇视就会逐渐消失，然后就能够为国家统一作出安排。

蒋先生比我年长4岁，今年67岁了，他在漫长的一生中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回顾一下近百年来我国所发生的一切，能像我一样客观地展望一下我们可爱祖国的前程，我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李宗仁的这个“建议”发表后,立刻引起中外的轰动和各方面的强烈反应。李宗仁是1949年11月20日上午由广西南宁乘飞机前往香港的。12月5日,李宗仁决心与蒋介石决裂,他偕夫人郭德洁、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以及内政部长李汉魂、私人医生孙晓山、秘书黄雪邨、英文秘书黄颖娴共八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赴美,当时到机场送行的仅有童冠贤、叶公超和程思远等人。12月7日,李宗仁抵达旧金山,6小时后飞机转飞纽约,当晚住进了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医院,医治胃疾。出院后,他和夫人郭德洁选中美丽而宁静的盎格鲁村镇,花了6万美元购置一座二层楼房定居下来。

李宗仁在美国侨居,成为一介平民。他目睹蒋介石在台湾的倒行逆施,心中颇为愤怒。1954年1月22日,李自知自己的“副总统”头衔也终将不保,于是先发制人,抢先在台湾“国大”召开前发表了“致蒋公开信”。信中对蒋执政二十余年来,“政出独裁,民国草芥,贪污自私”,的行为作了充分揭露,指斥蒋的嫡系部队“竄败”。对李的这一公开信,蒋已不屑一顾。1954年3月1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了所谓一届国大二次会议,会上通过监察院所提的“弹劾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案”,投票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李宗仁后来把希望寄托在“第三势力”方面,由张发奎、顾孟余等人组成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也无形解散。李宗仁在寂寞彷徨中听到周恩来的万隆会议讲话和声明,更感到流落异邦的苦闷之深。在悔悟之后,他决心为祖国和平统一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对李宗仁的“建议”,首先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及海外的那些所谓“忠贞之士”起来反对,强烈谴责李宗仁“叛党背过”;其次是一些一度与李搞“第三势力”的人士宣布与李分道扬镳,发誓不与其“同流合污”;再次是海内外的爱国人士则积极赞成李的建

议,并开始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奔走呼号,献计献策。同时国际舆论对“建议”也评价不一,有赞扬者,有批评者。一时间吵得沸沸扬扬,形成一股“李宗仁冲击波”。

中国人民从李宗仁的简短声明与建议中,立即感觉到这位过去曾是“战犯”的国民党二号人物一方面他对过去有所悔悟,另一方面对祖国他萌生了一片忠诚。周恩来对李宗仁可谓知之最深。当年在广州黄埔军校时,李宗仁的国民革命军第7军,在东征、北伐中一马当先,立下过汗马功劳。他本人曾任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抗战时任黄埔军校校务委员,在打倒军阀和抵御倭寇的战争中出过大力。台儿庄一战,周恩来曾派张爱萍赴徐州与李宗仁长谈,激励了李宗仁的斗志,结果取得台儿庄大捷。1938年7月6日,李宗仁由潢川5战区指挥部回到武昌人东湖疗养院治疗牙疾,适逢周恩来也住东湖,周特在寓所设便宴招待李宗仁,商谈团结抗战问题。此次会晤,周征得李同意,在5战区成立一个抗战工作委员会,由中共派李一范当政治部主任,李相符任副主任,在河南信阳一带活动,致使5战区内抗日力量得到很大发展。

周恩来没有仅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去体谅李宗仁的痛苦呼声,而是因之在脑海里萌发构思着祖国统一的宏伟蓝图:要树立一个榜样,让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人看到,共产党对其过去的敌人,只要他们改变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中国人民就欢迎他们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东北“剿总”司令官卫立煌,在大陆快解放时,他逃到香港,1955年3月15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回到祖国的怀抱。因此周恩来想,只要我们做工作,李宗仁也会回来的。

周恩来立即派人去香港,向前国民党中央委员、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程思远先生了解李宗仁的思想转变过程;并邀请程思远

先生来北京具体协商。1955年8月14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在呈送中央的报告中分析李宗仁思想转变的原因有二:第一,受周恩来万隆会议上的声明的影响;第二,中国政府对台湾的和平攻势及卫立煌归国的影响。

1956年5月1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款待从香港返大陆观光的程思远先生,对程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回到香港维多利亚海北岸海滨寓所后,回想起昨天在北京见到了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刘仲容、余心清这些老同事、老朋友,真是群贤毕集,极一时之盛,觉得周恩来不但态度诚恳,平易近人,而且对国际关系了若指掌,真是一位非常干练的杰出政治家。

程思远的北京之行,后来反映到远在美国的李宗仁那里,引起了李宗仁的严厉批评。他在复程思远的信中说:“此行关系重大,事前竟不相谋,如此轻率从事,实属令人不解。”

曾几何时,风云突变,1957年“反右”运动搞得过火,程思远劝李宗仁回国一事,只好暂时不提。

1958年末,程思远的女儿、香港著名演员林黛(原名程月如)凭《金莲花》、《貂蝉》两影片得到最佳女主角奖。后来她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课下之余,经常到李宗仁家里做客。李见到林黛后,一种念旧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与香港的程思远又恢复通信,商讨天下大势。李在一封信中提到,他藏有许多名人书画,不忍其将流落异邦,拟献给祖国以寄故国之情、恋乡之思。与此同时,他又托一个广西同乡、香港《大公报》社长彝费民带信给李济深(原黄埔军校副校长),明示他有叶落归根之想。李济

深转信给周恩来，周却表示“时机尚未成熟”。对此，许多人深感不解。其实，周恩来的考虑是非常有道理的。第一，从李宗仁的处境来看，他一直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特工人员的严密监控，稍有不慎，会危及他的生命安全；第二，李宗仁思想转变得还不是很充分，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台湾、“第三势力”和中美关系的影响。针对上述情况，周恩来在1959年至1965年的六年时间内，主要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帮助李宗仁摆脱上述四方面关系的影响。周恩来多次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必须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不要在中美之间做文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美国插手；第二，耐心等待有利时机，精心部署巧妙安排李宗仁安全离美返国。为了李宗仁返国，程思远曾五次来到北京，而每次他都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1960年，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回到香港，程思远告诉她：“德公（李宗仁字德邻）送给国家的一些历代名画，经有关部门鉴定，有的是赝品，但政府体念德公爱国的热诚，要派我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并送给他一笔旅费，以壮行色。”郭德洁听后，心中不免一阵激动。

1963年11月15日深夜，程思远与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秘密商谈李宗仁回国的事。周恩来要程思远带“四可”、“四不要”的原则及过好“五关”的要求去欧洲的瑞士苏黎世同李宗仁商量，由于不便笔记，程思远就原原本本地背下来。这“四可”是：李德邻可以回国看看，以后仍回到美国；李先生返美以后，仍可以随时回来，祖国永远向他开着大门；李先生可以离美住欧洲一个时期，以后再回来看看；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四不要”是：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五关”是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亲友关。以上原则，表明了祖国对李宗仁的无比宽

大和关怀。

程思远于1963年12月20日到瑞士苏黎世会晤李宗仁。久别重逢,两人不禁热泪盈眶。此时李已73岁,人逾古稀之年,久居异国,总有叶落归根之想。李宗仁对周恩来的“四可”原则满怀感激之情,并决定返回纽约后说服夫人郭德洁一同回祖国定居。

1965年6月28日,程思远飞抵瑞士苏黎世,见到了李宗仁夫妇。在中共方面的具体安排下,李宗仁冲破重重险阻,几经辗转,终于在7月18日抵达上海。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外交部长陈毅同行,他们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进行了一次长谈。为了隆重接待李宗仁回国,周恩来于7月20日上午,提前20分钟乘飞机飞回北京,等李宗仁夫妇抵达北京时,周恩来、彭真等在机场等候迎接。李宗仁在首都机场发表公开声明,希望海外侨胞和各方面爱国人士,坚决走反帝爱国的道路。他说:“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他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返回祖国怀抱,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

9月26日,李宗仁又邀请中外记者500余人在北京政协礼堂三楼举行记者招待会。招待会规模空前,场面宏大。为此,周恩来还专门指定了吴冷西等四人成立了顾问小组。李宗仁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目前处境尴尬,深望国民党同仁好自为之,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应毅然奋起,相率归来,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在记者招待会主席台上,李宗仁居中,两旁坐着程思远和刘仲容以及五种外语的翻译人员。为了开好会,周恩来还让自己的随身英语翻译冀朝铸为李宗仁做招待会的现场英语翻译。冀朝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英语流畅,反应敏锐,属一流的翻译水平。对此,李宗仁十分满意。

李宗仁归国后，与郭沫若、沈雁冰、许德珩、叶剑英、罗瑞卿、邵力子、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黄埔军校师生见了面。1966年初，党中央还专门安排李宗仁夫妇到广东、广西老家参观游览。这年2月，他们来到南宁。3月8日，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乳癌日趋恶化，留在了南宁明园饭店休息，李宗仁及其他人员继续去柳州、桂林参观。此前，周恩来已专门关照有关方面把位于文明路的李宗仁原私邸修好，并重新设置家具，好让他们夫妇有暇时来往。李宗仁十分感谢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但由于夫人郭德洁因病不能同来，未免触景伤情，所以宁愿在榕湖宾馆一楼下榻。

3月17日傍晚，李宗仁接到南宁电话，说郭德洁的乳癌转为肝昏迷。肝昏迷这是一个病理上的名词，意指她的乳癌把胆囊破坏了，以致她面色蜡黄，进入昏迷状态。这预示着她将不久于人世。李宗仁听到消息，立刻赶回，于19日，以专机把她送返北京。由于郭德洁已是乳癌晚期，郭本人又不愿动手术，终于3月21日逝世，享年60岁。

周恩来、彭真以及彭真夫人张洁亲自参加了郭德洁的遗体告别仪式。郭德洁原名郭儒仙，1923年，年轻的李宗仁当上了定桂军司令后，由玉林迁往桂平。当时郭是桂平女中的校花。一次女中校长请李宗仁去演讲，郭作为学生代表上前献花祝辞，两人一见钟情。“美女嫁英雄”，17岁的郭德洁成为李宗仁的第二夫人。德洁这名字是李宗仁给她取的。两人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在海外渡过了16年的流亡生活。李宗仁的原配夫人李秀文也是福寿过人、富贵双全的闺秀；李宗仁配得这位“福星”，以后才官运亨通，大难不死。1990年，李秀文百岁大寿，新华社发了一则消息为老人祝寿。

郭德洁去世后，李宗仁触目伤情，不能自己。周恩来关怀李

的健康,建议李由旧友刘斐、陈此生、黄琪翔、黄绍竑、程思远以及郭德洁女士的胞弟郭德刚先生一行陪同,于5月初前往华东参观,藉此转移环境,排遣情怀。他们首先到了南京,看到中山陵园依旧,只是人事全非,而李别有一番感慨。李一行又去了无锡、上海、杭州。后来关心李宗仁的老友从中作媒,李与北京积水潭医院不满30岁的青年护士胡友松相识。在双方有意的情况下,李娶胡为妻,当上了白发新郎。李从北戴河度蜜月回来,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已开始横扫中国大地。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李宗仁夫妇与章士钊、张治中、何香凝、程潜、傅作义等民主人士一起,住进了北京西郊解放军301医院,被特殊措施保护起来。1969年1月31日凌晨零点30分,李宗仁因患大肠癌去世,终年79岁。逝世前,在病榻上口授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说:“在我快要离别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称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周恩来情钟海峡两岸,心系祖国统一。李宗仁幡然醒悟,毅然归国。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副校长谱写了一曲令人回味无穷的校园歌。昔人已逝,故梦未圆?李宗仁终于圆了叶落归根的夙愿。

话分两头。再说李宗仁的回国,对于在台湾的白崇禧来说,却是致命的一击。本来,在台湾当局于1954年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后,白崇禧即与李宗仁断绝了一切往来。白崇禧是黄埔军校的校务委员,1948年6月任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坐镇武汉。在国共和谈破裂后,毛泽东致电林彪:“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

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在解放军4野的穷追猛打下,从武汉一直逃到广西,最终被彻底消灭。白崇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蒋介石骗到台湾。这位“八桂骁将”用大半生心血建立起来的桂系部队被歼灭后,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据记载,当白获悉全军覆灭的消息时,“形容憔悴、两眼无神、精神涣散、声语低沉”,与往昔神采飞扬、一向自负的“小诸葛”判若两人。

白崇禧以武力为后盾,支持李宗仁两次逼蒋下台;如今李宗仁在美国又公开与蒋闹对立,这使在台湾寄人篱下的白崇禧日子更不好过。

白崇禧是1949年12月30日从海口乘专机飞台的。他到台湾的时候,蒋介石因尚要利用白崇禧牵制在美国的李宗仁,故对白表示了一定的礼遇。因此,白崇禧于1950年3月间,将在香港的家眷20多人接到台湾,在台南盖了两栋房子,安置他长兄、九兄、六弟、二妹等亲属。白崇禧一家则在台北市松江路127号一幢旧式平房中,与夫人马佩璋及其子女共同生活。白崇禧的侄儿白先义与笔者是黄埔二十二期同学,白先义毕业后分配到台湾。据称白先义因白崇禧的关系,在军中服役不甚顺达,退役后深居简出,靠退休金打发日子。白崇禧刚到台湾时,有些朋友感到难以理解,就问白:“你怎么全家都搬来了?某人到美国去,某人到日本去,某人到泰国去,某人在香港,某人都办好了出境签证,你还搬到这里来?”当时台湾政局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原与蒋介石有些隔阂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都纷纷远走高飞,连陈立夫、卫立煌、关麟征、宣铁吾、李默庵这样一些“亲信”人物都离他而去,不愿入台,而白崇禧却说:“我们大陆丢了,我是现役军人,负很大罪过,中央不处罚我,自己良心自责。台湾是复兴基地,祖国领土就只剩这一点点,希

望在这里生根,发展回去。除此以外,现役军人死无葬身之处,跑到哪里去?”

白崇禧在台湾过着“待罪生涯”,与国民党元老、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何应钦经常去郊外打猎,以消磨时光,排遣忧闷。一天,他两人相邀一同打猎,途中谈起时局,两人都认为希望渺茫,感到前途绝望。白崇禧说:“我是信仰宗教的人,对世界局势,人类的前途,真主会有一个安排,我们打猎吧!”白崇禧心中很茫然,不知这一生怎么个结局。

蒋介石在台湾想名正言顺复职,但李宗仁的“代总统”职务尚未解除,蒋一面发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监察院等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同时派吴忠信找白崇禧,要其写信规劝李宗仁。于是,白崇禧又与吴忠信联名发了一个电报,说明海内外要求“总统”复职,朝野也希望蒋介石上台领导国民党搞“革命实践”运动,重振旗鼓,反攻大陆。希望李宗仁答应以“副总统兼特使”名义继续留美国养病,争取美援、内外相维系、共维国势。1950年1月16日,白崇禧又与在台桂系将领及高级干部李品仙、雷殷、刘士毅、邱昌渭联名给李宗仁发了电报,提出六点意见,最后建议:如须继续在美休养,深恐久旷国务,应请致电中央,自动解除“代总统”职务。

李宗仁早已决定要以“代总统”的名义与蒋介石对抗到底。他恨白崇禧不念几十年风雨同舟的桂系感情,居然在台湾帮蒋介石摇旗呐喊。本在大陆解放前夕,李宗仁与白崇禧就因意见不一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而今对白的来电他本可以不予理睬,但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李宗仁还是于1950年1月18日让他的秘书黄雪邨出面给白崇禧等人复电,答复如下:

一、德公割治经过良好,但身体尚未复原,故一时不能返国。

二、职位问题，德公固愿引退，惟一再考虑，认为现在既无法召开国民大会，则行政院长代理过三个月即违宪，而德公并非代理介公，而系代理‘总统’职位，因此，介公复职亦违宪，如同志不谅德公苦衷，宁愿受责难，不愿使本党毁法。

三、德公在美，非不能行使职权，如阁院长辞职，即可提组阁人选。

四、美不援台，实由杜(鲁门)、艾(奇逊)对介公之成见。对德公则无此种情形。

总之，李宗仁的态度是既不返台，也不辞职。白崇禧将此电转给蒋介石，蒋见李死活不就范，也不再与李打笔墨官司。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文告，宣布复职。白电李“望保持缄默，勿表反对”，但李于3月1日下午，在纽约招待记者，公开指责蒋氏复职为违宪。为此，白又奉蒋之命写了一封信给李宗仁，责备其不该唱反调。白在信中说：“‘总统’复职文告发表后，吾公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此举有失国人同情。……而中央对公则仁至义尽矣。崇禧过去推心置腹，询及刍蕘，岂以善始未能善终。大陆戡乱之时，‘总统’复职之时，为国家……一再进言，弃若敝屣……今者受宵小之蛊惑，为共匪之工具……”

白崇禧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蒋介石要他如此写，他又怎能违抗呢？李宗仁见白态度这般顽固，从此以后，桂系两巨头几十年结下的友情至此算正式寿终正寝。

蒋介石复职后，掌握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便开始清算大陆失败的责任。因“通共罪”判处死刑的有原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国防部次长吴石。蒋政府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罪判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9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有期徒刑12年；以“山东孟良崮战役援救张灵甫不力，贻

误战机”罪判处黄埔三期毕业生、国民党 73 军中将军长李天霞有期徒刑 8 年。黄埔一期毕业生、第 10 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因在兖州战役中退却被判重刑。这样，国民党的一些败将人人自危，胡宗南被弹劾，李宗仁也被弹劾，白崇禧无疑也是导致国民党江山垮台的“罪人”之一。对李宗仁远走美国，蒋无能为力引渡，而送上门来的白崇禧就成为蒋介石清算的重点对象。

蒋介石将白崇禧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在国防部保密局的监控人员档案里，白崇禧的代号为“老妹子”，毛人凤这位黄埔六期毕业的学生居然对校务委员白崇禧进行监视。保密局在白崇禧公馆对面设了一个派出所，对白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地监视。有一次，白的轿车开出去后，即发现后面跟着一辆吉普车，走了不多久，后面的吉普车抛了锚，白知道那是一辆盯梢的车，连忙命自己的司机停车，并派侍从人员去告诉那辆车上的人不要急，慢慢修。白崇禧自觉停车等他们，奉命监视的特工人员没料到被白崇禧看出了行藏，显得非常尴尬。还有一次，白崇禧与一些老友在咖啡馆喝咖啡，临走时白将另外两桌客人的账也付了。白的朋友对此莫名其妙。白连忙解释说：“我看出他们是监视我的人，这个客我应该请。”从这点小事上看，白崇禧不愧为“小诸葛”。

蒋经国于 1952 年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组长。别小看这只是一个“组长”，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统归其管辖指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下设保安处，连毛人凤的保密局也要归他管。蒋经国对外公开职务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但他对情报工作从不放松。在蒋介石提出“保密防谍”的口号后，台湾开始实行大搜捕、大屠杀，一时台湾血雨腥风，人人自危。白崇禧、薛岳这样的党国功臣也不例外，蒋经国派特工人员将他两家进行了彻底搜查，连地板都被挖开检查了一番。当时白很生气，立

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回答说：“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问蒋介石。蒋介石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两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还有一次，白崇禧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奉命盯梢的特工就对她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对此很生气，从皮包中取出信，随手撕得粉碎，怒道：“没什么要紧事，不必交出邮寄了。”

蒋介石不仅对白崇禧实行监控，而且还在政治上给以打压，不予任用。1952年10月，蒋介石在台湾召开国民党“七大”，宣布国民党改造结束，蒋连任总裁。由蒋提名陈诚、蒋经国等32人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同时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以安置失势的“党国元老”。蒋介石提名何应钦、于右任、阎锡山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赴台“归队”的国民党第6届中常委，除已当选为7届中央委员外，其余均提名为“中央评议委员”，而惟独不提白崇禧。一些“党国元老”为白抱不平，特推选于右任、居正两人往见蒋介石，问这是什么原因。蒋听后说：“健生，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就这样结束了谈话，白崇禧仍然名落孙山。

对于蒋介石的打击迫害，白崇禧心中当然最清楚。桂系与蒋的矛盾由来已久，俗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白既已在蒋的手中，迟早这“逼宫下野”之仇是要报的。因此白崇禧本人反而很坦然，他私下对人说：“经过这一次大失败，总要找个人来顶罪，任何朝代都一样，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蒋介石不想公开处罚白崇禧，但湖北人没有忘记他。由湖北籍“国大代表”但衡今在何成浚的幕后操纵下，领衔在设计委员会会议上对白崇禧提出弹劾案，欲报当年白崇禧在湖北横征暴敛之仇。但衡今说：“军费方面，吞没中央银行黄金7万两，吞

没汉口中央银行库存白银 370 多万两；军事责任方面，在华中拥兵不救援徐州，不遵从统帅调兵命令，拥兵自卫。”要求“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复兴。”对此弹劾，白崇禧非常恐惧，他担心蒋会借此清算自己，因此连忙出来托词辩护。陈诚出面为白开脱：“华中的事，但委员所提的不是事实，有出入，你们要知道真相可以来问我。”这样，弹劾风波才压下去。

白崇禧在台湾还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大代表”、“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的头衔，从事一些无关要紧的礼仪性活动，而平时他则在家读书写字，下棋打猎。白夫人嗜好麻将，但白崇禧从不参与，他认为打麻将玩物丧志。1962 年 12 月 4 日，马佩璋因患高血压症逝世于台北，终年 59 岁。

马佩璋是广西桂林人，秀外慧中，是典型的贤妻良母。1925 年她与白崇禧在桂林完婚，其时白崇禧 32 岁，马佩璋 22 岁。马佩璋育有子女 10 人，子 7 人：先道、先德、先诚、先忠、先勇、先刚、先敬；女 3 人：先智、先慧、先明。长子先道为白崇禧与南宁女子王某所生，其余皆马佩璋亲生。白崇禧的子女 10 人均学有所成，五子先勇毕业于台湾大学，后留学美国，在美国依阿华大学攻读硕士，是当代知名作家。

白崇禧丧妻之后，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后派出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等人，访问白崇禧 128 次，时间持续了三年零十个月，直至 1966 年 11 月 24 日白崇禧逝世前 8 天为止，由白口述自己的回忆录。贾廷诗等人将白氏口述回忆录整理成《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分上下册由台北公开出版。

1964 年 2 月 12 日，李宗仁在美国《先驱论坛报》发表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再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应该效仿戴高乐将军的法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

系正常化。李在美的活动,使蒋介石大为恼火。蒋介石为阻止李宗仁回大陆,除了派遣特工人员到瑞士苏黎世进行活动外,又将白崇禧推了出来。在蒋的授意下,白崇禧于1964年3月18日致电李宗仁称:

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共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共匪建交之后,我公竟于二月十二日投函纽约《先驱论坛报》,公然支持共匪,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共匪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优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李宗仁夫妇在回国途中,即有两名台湾驻日内瓦的工作人员来到苏黎世,找到郭德洁胞弟郭德刚开设的饭店,手持白崇禧的电报,说要面交李宗仁。郭德洁的妹夫也携带一笔巨款到了香港,打听李宗仁在苏黎世的地址。然而,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李宗仁冲破台湾当局的干涉和破坏,于1965年7月17日抵达上海,于20日抵达北京,受到很高的礼遇。毛泽东风趣地对李宗仁说:“吓!吓!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为‘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李宗仁一时无话可答,机智的程思远立刻为他解围,说:“宗仁先生与蒋介石合作,才是误上贼船。如今我们已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彼岸了。”毛泽东开怀大笑。

李宗仁回国,白崇禧牵制李宗仁的价值消失,白也就自身难保了。白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曾很痛苦地对身旁的人说:“德

邻投匪,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岂止是没脸见人?蒋介石命令毛人凤对白直接采取制裁措施,毛人凤将这一任务交给特工谷正文办理。谷正文奉命后即积极策划暗杀行动,并确定行动的最高原则是绝不留下半点痕迹,以免外界怀疑是一起政治谋杀。谷正文收买了白氏身边一位姓杨的副官。杨副官提供白崇禧去花莲县寿丰半山打猎的消息,谷正文密令“侦防组”将猎区小型轨道车的螺丝拧松,这样就会不留痕迹地使轨道台车发生“意外事故”,而使白崇禧死于“车祸”。

事发当天,白崇禧一行兴致很高地去打猎,10点37分,白一行人通过预定的谋杀地点后,“侦防组”的行动人员迅速爬到桥下,将支撑桥面木墩的螺丝一一松开,然后躲人不远处的树林里,静候白下山。下午3时许,寂静的山中传来轨道台车的响声,两辆车从高山背而滑出,相距约30米。前面一辆车上坐着林意双乡长父子与一名助理,白崇禧与两名副官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当第一辆车滑到已经去掉了螺丝钉的桥面时,突然连人带车一起坠入50米的深谷中,当场车毁人亡。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白崇禧的一名副官用力将白推出车外,自己则随车跌入深谷。白从地上爬起来,拍去尘上,望着谷底下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一场虚惊使他悟到了某些蹊跷。在经历了这次险情后,白行动更加谨慎,不再外出打猎。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谷正文发现白崇禧与身边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侦防组”决定从这里下手。他们买通医生下重药,致白崇禧于死地。一天,谷正文打电话给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听说白将军来你这里买药?”赖少魂答道:“是的,正文兄,不过,白将军不是病,他想补……”谷正文说:“不管他是买什么,你要发挥自己的专长,总统要你多照顾白将军,须以猛药起沉痾,重病得下猛药。”这赖少魂心领神会,使年近古稀的白崇禧不

胜药力，一补不起。俗云“房中之事能杀人。”女色犹如伐性的斧，不多久，白崇禧即油尽灯枯。1966年12月1日晚，张小姐与往常一样到白宅夜宿。就在这天晚上终于发生了“马上杀”的悲剧。第二天早晨，白崇禧的副官发现主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而张小姐却早已离去。这位国民党一级上将、黄埔军校的校务委员、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小诸葛，却在失意中做了风流的花下鬼。是年，白崇禧73岁。

白崇禧死后，蒋介石大作表面文章，12月9日上午，在台北市殡仪馆景行厅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自颁发了“軫念勋猷”挽额以及“旌忠状”。上午7时50分，蒋介石亲临景行厅向白崇禧遗体鞠躬，并献花致祭，两千余人参加了公祭仪式。

白崇禧生前为台南郑成功祠题联：

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
正人扶正义，七鯨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

这幅对联也可看作白崇禧的夫子之道，这位毕生反共的“名将”，自觉充当了孤臣孽子，实为憾事。正是：上将声威比诸葛，难留青史纪殊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恩怨未尽 蒋介石梦断宝岛 巨星殒落 周恩来临终遗恨

话说 20 世纪 70 年代,台湾上空阴云四起,凝聚不散。这几年,蒋介石心情不好,身体也明显衰弱,主要是因为在外交上的一连串失败,使得他坐卧不宁。1971 年 4 月 10 日,他在台北士林官邸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就“乒乓外交”一事对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北美舆论界提出“警告”：“中共这种在国外进行渗透与颠覆的战术已获得初步成果,中共最近数月所展开的‘笑脸宣传’,依本人看来,只是一种欺诈的战略,共产党的基本阴谋并未改变,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本人竭诚希望,自由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张开眼睛窥见这些事实,切勿为中共的和平攻势所诱而坠入陷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就在蒋介石发表谈话的这一天,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跨过了中国广东深圳的罗浮桥。

4 月 12 日,当中美两国乒乓健儿在北京举行友谊比赛时,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奉蒋介石之命,由陈香梅女士陪同,来白宫向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行,他要卸任回台湾去了。周书楷思考再三,用外交辞令婉转地对尼克松说:“蒋总统希望你要采取冷静态度,对任何这种姿态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但尼克松转了话题,说了些客气话,周书楷只好起身告辞。这时,客厅里的人都仿佛觉察到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周书楷也许是一去

不复返了。

中国以“小球推动大球”。1972年4月,在中美关系断绝达22年之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民间代表团访问了美国。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关注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注意观察着尼克松的每次讲话和行动。周恩来还特意指定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没有恢复工作的老师定期研究国际局势。四位老师,也是黄埔的精英,他们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关于打开中美关系僵局、保持中、美、苏战略格局平衡的建议。继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不久,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会见了毛泽东,并与周恩来共同发表《中美上海公报》。公报中提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问题。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两国政府实现邦交正常化。数月间,2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于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外大使,纷纷下旗归台,台北“外交部”被人讽刺为“绝交部”。

蒋介石受到世界人民的孤立。世界局势的变化,对台湾来说,如同“大地震”一样;但蒋介石还是老调重弹,说什么“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这篇在1972年6月10日发表的“文告”,并没有安定人心,反而使台湾老百姓感到大船要下沉,纷纷申请签证出国。

蒋介石这年已86岁,垂垂老矣!他连忙要蒋经国任行政院长,以便安排后事。

1972年3月,蒋介石做过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

炎宿疾,健康从此一蹶不振。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日趋孤立的颓势,有如当头棒那样,给这位政治强人以致命的一击。其实,蒋介石真正的病因,只有台湾当局极少数高层人士清楚。

自蒋逃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身体并无严重的疾病,只是一件意外的车祸将他几乎推到了死亡的边缘。那是1969年7月的一天,蒋介石在酷热难熬的夏季,按照惯例要到外地渡假避暑。这一年他并未远行,还是留在台北草山(即阳明山)士林官邸消夏。草山占地250公顷,绿树成荫,温泉洋楼,清幽恬静,戒备森严,安全可靠。阳明山士林官邸的家具,都是1949年从大陆空运来的,他也感到亲切。这天下午,蒋介石决定偕夫人宋美龄乘车沿着一条曲折盘旋的公路直向阳明山山顶上开去。当时在头岭的拐弯处,前方突兀地冲出一辆开得飞快的军用吉普车,与蒋介石的前导警卫车相遇。由于前导警卫车急忙刹车,蒋的轿车毫无准备,猛地撞在前导警卫车的后尾,致使手拄拐杖昏昏欲睡的蒋介石猝不及防,朝前撞去,头撞在挡风玻璃上,玻璃哗啦一声被撞得粉碎,蒋口中的假牙不翼而飞。蒋胸部受重伤,满脸鲜血,几乎昏死过去。后来急送阳明山医院抢救,医生发现蒋介石的伤势很重,重创部位在胸腔,下肢及盆骨也有多处伤口。宋美龄坐在轿车内的后排,只受轻伤。在车祸发生后,台湾当局最初认定是一场有意制造的政治谋杀事件,后经台北警备司令部调查,才发现是一位少将师长因开会后急于返城而无意间肇事。蒋介石从这次车祸后,身体受到创伤,此后便经常染病在身,健康每况愈下。1972年7月,蒋介石因患流行性感冒转为急性肺炎,住进荣民总医院长达1年零4个月之久。1974年12月,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因感染感冒而引发肺炎,并且由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期使用抗生素药物,以致细菌抵抗药物的耐药性增强,治疗颇感费事。1975年1月9日夜間,

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脱险。从此以后,蒋介石的病情加重,不仅感冒频仍,而且并发肺炎,心跳停止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得不用起搏器。

宋美龄长期在美国生活,对美国的医疗技术十分崇拜,有些近于迷信。她见以王师揆、余南庚、陈耀翰为首的医疗小组不能使蒋的疾病有明显的改观,便决定请来了一位美国胸腔专家为蒋治病。此人否定了王师揆主任医师的保守治疗方案,主张为蒋介石进行一次肺部穿刺手术。美国专家的冒险主张很快地遭到王师揆等人的坚决抵制,但却得到了宋美龄的首肯与支持。王师揆认为蒋介石已届古稀高龄,又有严重的心脏病,如果在美国人手术时万一发生血压、心跳异常等意外,蒋介石将随时有生命之虞。但是刚愎自用的宋美龄以第一夫人之尊,力排众议,不听劝告,使美国胸腔专家对蒋介石的肺部穿刺手术得以实施。手术时须从蒋的胸腔中抽出 500 毫升脓血,可是随之而来的副作用却使宋美龄、蒋经国大吃一惊。蒋介石卧床不起,高烧到摄氏 40 度,经久不退,且又伴有大小便出血的严重症状,心脏停止跳动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缩短。在宋美龄的一意孤行之下,由于美国胸腔专家的插手,蒋介石的死亡便提前逼近了。

蒋经国见父亲的病情毫无起色,已深感不安。3月29日,蒋介石在台北市郊草山官邸口授了遗嘱。蒋介石仿照孙中山临终的做法,在台北自己的卧室中,躺在病床上一句一句地慢慢说,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笔录。他的口授笔录遗嘱全文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的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

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光复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力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蒋中正

4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蒋经国早上前来蒋介石卧室请安。这天，蒋介石精神特别好，也许这是“回光返照”，他破例起床坐在轮椅上，面带笑容，问起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张伯苓生于1876年，按照中国习惯，1975年是他百岁诞辰。张伯苓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就读时的校长，后来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51年病逝于天津。

到了下午，医疗小组报告了如下情况：“蒋介石腹部不适，同时小便量减少。医疗小组认为蒋公心脏功能欠佳，因之血液循环不畅；体内组织可能有积水现象，于是授以少量利尿剂，此使蒋公排出500c.c.之小便。下午4时许，小睡片刻。”

可是，到了晚上8时30分钟，蒋经国前来探望父亲时，发觉情况有变。医疗小组的报告如下：

下午8时15分，病情恶化。医生发现老人脉搏又突然转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等急救，一二分钟后，心脏跳动及呼吸即恢复正常。但

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跳动,于是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然而此次效果不佳,心脏虽尚时跳时停,呼吸终未恢复,须赖电击以中止不正常心律,脉搏、血压已不能测出。

至11时30分钟许,蒋公双目瞳孔已经放大,急救工作仍继续施行,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最后乃应用电极直接刺入心脏,刺激心脏,但回天无术。

1975年4月5日晚11时55分,蒋介石在台北市郊草山官邸死去,享年89岁。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随侍在侧。台湾党政军要员听到蒋介石死讯后,当夜皆赶到草山官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即4月6日凌晨1点50分,台湾国民党政府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的死亡为“崩殂”。我国帝王之死称“崩殂”,可见这“驾崩”该有多么大的悲伤。上午6时半,在草山官邸中正楼,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常委紧急会议。先由总统特别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报告了蒋的病情及死亡经过。然后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由副总统严家淦自即日起继任总统,并在官邸举行了简短的宣誓就职仪式。会议决定从4月6日起历时一个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纪念馆”五天供人们瞻仰。

各国对蒋介石的死亡反应冷淡,美国想派一位农业部长来台北吊丧,后经台北政府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非勒来。在参加葬礼的外宾中,较显赫的要首推南朝鲜总理金钟泌了。日本前两位首相佐藤荣作与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仅称友人代表。当时

葬礼十分冷清。

4月28日,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蒋介石生前所任是国民党总裁,据蒋经国解释,自他父亲逝世不再设总裁,以资纪念。这样,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也就由孙中山时称总理,到蒋介石时称总裁,到蒋经国时称主席,三易其名。这样,三个名称都指代国民党三任首脑,总理、总裁、主席各有所指,不会混淆。

蒋介石之死,毛泽东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哦,他死了。”此时此际,在毛泽东眼里,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个“穷寇”罢了,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犹未尽释,还耿耿于怀。不过,这时毛泽东视力已减弱,1974年8月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对一个手不释卷的人来说,这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蒋介石的死,北京新华通讯社只发了简短不到10个字的新闻:“蒋介石病死在台湾。”当时北京也正忙于开追悼会,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因病逝世,7日举行追悼大会。而周恩来则于1974年6月1日就进驻北京解放军305医院,他是从收音机的广播中听到蒋介石死讯的,其表情也很冷淡。

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厝蒋介石之灵柩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蒋介石在南京紫金山选墓经过是这样的:1931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6周年纪念日,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也进入不惑之年,他和文武随员来到南京紫金山谒陵,礼毕,步出灵堂。当时中山陵还未建成,陵园花木正在整理,而中山陵西侧的明孝陵却是苍松翠柏,枝繁叶茂。蒋介石颇通堪舆之术,看到这里,认定此处风水不错,自己百年之后,如果葬在这里,真乃大幸。于是,他下山后,就电令湖北省政府,要建设厅长肖萱即日来宁。原来,肖是蒋的亲信,平日亦喜阴阳堪舆之术;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之墓地就是由肖萱选定的,结果蒋氏飞黄腾达。肖

到南京后,方知蒋要他帮选坟地,他自感此事责任重大,便又请他的老师刘松君来宁共同察看。肖、刘一起到紫金山察看,一致肯定蒋选的墓址大环境风水好。接着,他俩又到溪口、苏州一带察看了半个月,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说:“紫金山最高峰下这块地方,山势雄壮,局面开阔,位置适中,堪称最佳,甚至比明孝陵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还要好,可保万世基业。”蒋介石听后很高兴,于是蒋氏百年之后的墓穴地就这样选定了。尔后,蒋介石给予刘松君以国民政府顾问待遇,月支薪水 200 元,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停止发放,而肖萱则因替蒋氏选墓地,在湖北省任厅长,一直受到恩宠。此是闲话不提。

且说这慈湖,是蒋介石于 1961 年在台北市 60 公里处的桃园县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茔地。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原因是这里的风景很像故乡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母亲的坟庐,他曾起名为“慈庵”,而今蒋介石在福安里村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为“慈湖”。他常来此地的头寮宾馆小住,并嘱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日后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但是,国民党还有“光复大陆”的未来吗?请听蒋介石的追随者“仰面呼天”的长叹吧:“苦雨凄风挽蒋公,大陆倚谁去反攻?”

在蒋介石死后,他把国民党大权传给蒋经国,蒋经国任国民党主席,严家淦只当了 3 年零 20 天的“过渡总统”,1978 年蒋经国正式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这位青出于蓝的政治家摆脱父亲“反攻大陆”的陈辞滥调的束缚,致力于建设,他的口头禅就是:“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在父亲的庇阴下,他刻苦自励,不仅继承了其父衣钵,而且加以发扬光大,把台湾建成亚洲四小龙之一,叫人刮目相看。

不过，蒋经国也办了一件“极不得人心”的事，那就是正当为他父亲治丧大殓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从与台北近在咫尺的香港，突然传来了前国民党的 10 名特赦战犯由北京抵达香港的消息。1975 年 4 月 14 日，当这 10 人在中共的欢送下兴高采烈地从深圳跨过罗湖桥时，在台北市介寿路的“总统府”里，严家淦、蒋经国被这条消息惊得目瞪口呆。这 10 名被共产党关押了 25 个春秋的前国民党将领，不迟不早，偏偏在蒋介石刚刚死去不久突如其来地要回台湾探亲定居。

台湾当局的情报部门很快便弄清了这 10 名国民党将领的身份，他们是：前国民党 51 军中将军长王秉钺、前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前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前国民党 68 军政工处长张铁石、前国民党 25 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国民党 281 师上校团长赵一雪、前国民党 204 师 612 团上校团长张海商、前国民党 150 师上校团长杨南邨、前国防部青年救国赣东服务队少将队长蔡省三、前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副司令王云沛。

年轻气盛的蒋经国认为这是共产党的统战阴谋，力排众议拒绝这 10 人回台探亲定居。这一表态使在大陆幻想国民党复辟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梦想彻底破灭，也令一般人感到太不近人情。10 名特赦人员一人在香港自杀，三人赴美，三人回大陆，三人在香港定居。香港《晶报》在 6 月 16 日发表一篇题为《大蒋化小，小蒋化脓了》的社论。该文称：“张铁石之被‘拖死’，谁尸其咎？”据《明报》透露：处理十人回台事的决策者是蒋经国。蒋经国的决策是“拖”字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快报》谈张铁石之被拖死时，则对决策者加“脓包”二字，“脓包决策者”蒋经国做得比他老子更绝。13 年后，即 1988 年 1 月 8 日，蒋经国死于心脏呼吸衰竭，终年 79 岁。蒋家王朝至此已一去不复返了。

计算起来,自蒋介石上台,至蒋经国下台,整整一个“甲子”。不过,蒋经国的逝世,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发出唁电:

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这封被人称为“四十年第一电”的中共中央唁电,显示了中共愿意化解前嫌,争取两党和解合作、齐心协力振兴中华之诚意,并在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蒋经国逝世后,台湾军方的强人、黄埔十二期毕业的郝柏村已是三次蝉联“参谋总长”,但终因年龄超出国民党当局的“法律范围”,“军事强人”的地位来日无多。蒋经国之后的台湾,从大陆去的黄埔二十二期毕业生,其在军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笔者同期同学罗本立任“三军大学”校长、黄幸强任陆军总司令、卢光义任凤山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曹思齐任陆军参谋长、汪多智任陆军副总司令、程邦治任金门防卫司令官,军衔均是中将、上将。这些同学都是台湾少壮派将领的中坚分子,也是继黄埔十六期之后,将星最多的族群。进入九十年代后,这批将星也垂垂老矣,大部分已退役。代之而起的,是台湾本土出身的不知名的后起之秀。

闲话少说,再回到蒋介石逝世。停放蒋介石灵柩的“慈湖行馆”,不断有人去参观。蒋介石的尸体经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胸前佩带勋章,装在一个黑色大理石棺廓里,停放在正厅。接连正厅的厢房,保持着蒋介石生前卧室的原样,供人参观。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便条信纸,上面是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四个行书体的字“能屈能伸”。蒋介石死在台湾,灵柩浮厝;中共有言在先,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蒋介石的棺柩可移葬他生前希望的南京紫金山麓。

话分两头,再说说北京。

1976年元旦,北国风光,天寒地冻,满目冰霜。无线电波伴着寒流,向千家万户传递着气势磅礴的声浪: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泽东主席 1965 年 5 月重上井冈山时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广播员用庄重的语调朗诵完这一首《重上井冈山》之后,又用一种轻松的语调播出同一位诗人在同年写的另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在北京郊区解放军 305 医院的特护病房里,播音员朗诵的电波在荡漾,周恩来凝神地听着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这两首诗词。

周恩来是 1974 年 6 月 1 日中午,从曾经居住了 25 年的中南

海西花厅乘车住进医院的。这一走,周恩来便没有再回中南海。

周恩来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生老病死乃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他说:“地球上一切有生命的物质都经过生长、发育、衰老和死亡的过程,新陈代谢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人是生物,所以必然符合生老病死这一规律,这便是恩格斯说的‘生即意味着死’的道理。”

1976年元旦将要来临,周恩来卧床不起已有两个多月了,他全身消瘦使面颊凹陷,颧骨凸起更加明显,灰白的头发稀疏蓬乱。当时他那著名的“美髯公”之称,已变为满脸络腮胡子、灰暗憔悴的病容。北京饭店朱殿华师傅第三次捎来口信,请求在元旦以前为周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他身边工作人员将朱师傅的这个请求报告了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够接受朱师傅的一片心意,为他理发。可是,周恩来听后无力地闭上眼睛,在沉思良久后,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不,还是算了吧,不要叫他来了,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很难过的。”朱师傅一直为周恩来理发,两人如同亲密无间的朋友,周恩来不愿朱师傅心里难过,所以拒绝派人去请朱师傅来。敬爱的周总理心里想的始终是别人。

毛泽东的诗词通过广播,使刚从昏睡中醒来的周恩来情绪为之一振。这天下午,《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的两首诗词,他吩咐工作人员念给他听。这种情形,医护人员认为属于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周恩来自患癌症以来,毕竟先后经受了89次输血与13次手术,他的身体已受到严重的打击,免疫力及抵抗力已弱到极点。1975年12月7日午夜,周恩来突然发生昏厥,医疗组组长吴阶平,专家陶寿琪、谢荣等人倍加警惕,不敢有丝毫懈怠,经过应急抢救,总算转危为安。

4年前,1972年,“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已持续了七年,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动荡之中。由于中共最高领袖的失误,加上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的相继形成,使八亿神州人民饱经忧患。俗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57年反右开始,全国55万余人沦为“右派”。章伯钧、罗隆基、马寅初、储安平、章乃器、叶笃义这些民主党派人士被打成右派后,从此销声匿迹于社会;即使党内许多知名人士,如艾青、丁玲、冯雪峰、秦兆阳、钟惦斐、刘绍棠等也同样被打成了右派。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陈明仁等,要不是周恩来力保,也险遭不测。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就抓住陈明仁不放,他恶狠狠地对55军政委王振乾说:“陈明仁是明码实价的右派,你们为何放掉不抓?”王振乾反驳道:“既然是明码的,那又何必去抓?由你们上面酌情去定好了。”陈明仁当时任解放军55军军长,王振乾任55军政委,王对陈是有一定了解的。他认为,不能任意将一位起义将领打成右派,所以王振乾对黄永胜的主观认定进行了反驳。正当陈明仁将大难临头之际,王振乾将情况汇报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恩来立即电示,要好好团结像陈明仁这样的高级爱国将领,一定要做好工作,使他永远有为祖国建功立业的机会。但是,经过反右这场风暴,周恩来几十年来殚精竭虑构筑起来的统一战线成果,受到了极大地摧残。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开始对“三面红旗”及其社会形势进行反思。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泽东递过一张条子:“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康生指的就是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李建彤所著历史小说《刘志丹》。刘志丹是黄埔四期毕业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红军将领。由于康生的诬蔑,《刘志丹》一书的作者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

媳,她有感于刘志丹的光辉革命传奇经历,认为可教育年轻一代,于是便与她的丈夫、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商量,写了这部传记作品。康生没有看过书稿,却以他超乎寻常的嗅觉,断言这本书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结果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受审长达16年,其中关押了8年,受牵连的人无法统计,据说达万人之多。“文革”的爆发,使这批人受到更严厉地打击与迫害。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早已被撤职,“文革”时他又被弄到北京郊区,惨死在那里,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在那时已关押了6年,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揪斗致死,罪名是“为小说提供炮弹”;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刘宗勉受此案牵连,被沉到河底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肉刑折磨致死;《刘志丹》一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的全家被赶到农村;连李建彤采访时为她带路的群众王悦贤、刘景华也被害致死。

1967年6月,国防部副部长、黄埔五期毕业的许光达大将因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1969年4月6日,“和平将军”张治中因病逝世,终年79岁。

196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强迫他迁往河南省开封市,因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和抢救,怨死于河南省开封市,终年71岁。

196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宣部部长、黄埔五期毕业生陶铸同志,因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在安徽合肥逝世,终年61岁。

1971年9月13日,林彪私乘飞机,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1972年1月6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埔六期毕业的罗瑞卿受林彪迫害，与罗瑞卿一起被打倒的，还有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当时称“彭罗陆杨”。罗瑞卿于1966年8月，被关进了当年关国民党战犯的秦城监狱。这座监狱是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时修建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国民党战犯杜聿明、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罗历戎、黄维都曾在这里住过。直到罗瑞卿关进来的时候，黄维、文强、陈士章、郭一予、刘镇湘、陈远湘这些国民党军长、师长还仍在里面服刑。他们都是黄埔毕业生。

罗瑞卿住15号囚室，贺龙住21号囚室，彭德怀住4号囚室。曾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作“罗长子”的罗瑞卿大将，被林彪打成“黑帮分子”后，他实在想不通，并于1966年3月18日跳楼自杀，但死神没有收留他；手术之后，左小腿以下三分之一被切除，成为永久地残废。这年的12月24日，不能行走的罗大将被放到柳条筐里抬到首都体育馆的批判大会会场，接受对他的“打倒”、“火烧”、“油炸”。

毛泽东发表的诗词，除了使周恩来感到兴奋外，还有两位巨人也在心潮起伏。一位就是住在北京后海南沿柳荫街小翔凤5号的叶剑英。柳荫街又称“元帅街”、“将军街”，因为这条街上住着叶剑英和徐向前。年近8旬的叶帅在1976年元旦，也在凝神聆听广播这两首诗词。听后，他不止一次地连称：“绝妙好词！绝妙好词！”他准备驱车去305医院看望周恩来，也让他分享这两首词的乐趣。叶剑英与周恩来的友谊已有半个世纪，当年在黄埔军校时，他们就情同手足，感情甚笃。

另一位就是住在北京宽街的邓小平。他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正在挨批。

元旦过后的一天夜晚，叶剑英驱车来到305医院。他被眼

前的情景惊呆了。在静静的病房里，周恩来斜倚在病床上，正在聚精会神地听护士给他读毛泽东的两首词。叶帅静静地站在病榻前，一直等着读完。本想将满腹心事尽情倾诉，但看到周恩来消瘦的脸上，显露出癌症晚期痛苦而又勉强作出的笑容，他便不忍心再开口了。

周恩来看到最近刮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声声高、步步紧，更是忧心如焚。正是由于受到这种复杂而深沉的思绪所支配，周恩来长时间地痛楚地望着叶剑英，似乎有千言万语要叮嘱，有千斤重担要交付给这位曾经与自己生死与共并可以信赖的战友。此刻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去评论毛泽东的诗词和《人民日报》那篇元旦献辞了。

中国有句民谣说：“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年又是龙年，龙还未抬头，一颗巨星悄然隐去。1976年1月9日零点，在哀乐中，无线电波伴着凛冽的寒风播放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巨星殒落，江河呜咽，大地哀号，整个中国在寒风和哀乐声中震颤！

周恩来没有儿女，没有财产，一身布衣，两袖清风。他是平民“宰相”，能“为民做主”；他是清官，是好官，是黄埔军校的创办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周恩来的逝世，老百姓如同亲生父母逝世一般，沉浸在极大的悲哀之中。

1976年,按照民间说法,是龙年,这年份本该是吉祥如意的一年,但却成了极为哀痛的一年。

1976年,人祸天灾,接二连三。周恩来不幸逝世后的半年,即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丰南地区发生8.6级大地震,总共死亡24万多人,重伤16万多人。“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以“全国还有其他大事:学习、批邓、抓革命、促生产”为由,限制发表抗震救灾的稿件。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昏迷了。从昏迷中醒来后,他问身边的李志绥医生:“我还有救吗?”李志绥回答:“有希望。”然后,毛又昏迷过去了。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医生赶紧在毛泽东的鼻孔里插输氧管。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全部赶到,在毛泽东住处的过道里,观看电视荧屏上显示的毛泽东心电波曲线。

9月9日零时10分,那曲线在颤动了几下之后,变成了一根直线,毛泽东的一生,从此画上了句号。这年他83岁。相传,毛泽东进北京城后,汪东兴的警卫部队代号为“8341”部队,这是一位相命先生给毛泽东算命时说出的一个隐语。当时许多人猜不透这表示什么意思,毛泽东就将这“8341”留给汪东兴作警卫部队番号。在巨星殒落后,这谜底终于揭晓:毛泽东寿命83岁,毛泽东从1935年长征到遵义时掌握领导权,直至逝世刚好41年。这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内在规律可循?这只好留给后人研究了。1976年9月11日深夜,毛泽东永远地离开了他生活28年的中南海。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北京玉泉山九号楼主人、国防部部长叶剑英元帅像往常一样,起床,用餐,散步,看报,读书,一切都是有序地进行着。这天下午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按照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事前的安排,以召开政治局会议为名,将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网打尽。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写了一首《快刀斩麻除四害》的诗，全文如下：

王八乌龟梦发财，洪水江波起上海。
文面鼠辈大流氓，绞尽脑汁想上台。

张牙舞爪阴气露，春风作面容狼豺。
桥上抽板设陷阱，杀尽忠良心太坏。

江湖巫婆臭戏子，青从蛇口毒牙栽。
碎骨吸髓欲称王，尸落黄泉鬼不睬。

姚士吠狗爬得快，文过饰非两面派。
元凶恶鬼徒遮日，焚作骨灰烘中埋。

大江南北是愤慨，快刀斩麻除四害。
人民欢呼新胜利，心花怒放乐开怀。

以上四首诗的每一句首字相联，则是：“王洪文绞，张春桥杀，江青碎尸，姚文元焚，大快人心。”堪称一绝，值得回味。

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中起过决定性作用。徐向前、聂荣臻元帅表示完全支持和拥护对“四人帮”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徐帅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帅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他情不自禁地给中央写信说：“‘四人帮’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决心在党中央领导下，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陈云高兴地说：“叶剑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个

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胡耀邦激动地说：“叶老师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党和国家立了不朽的功勋！”胡向叶致祝词：“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并表达了三条祝愿：第一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条，冤案一理，人心大快；第三条，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面对一片赞扬声、欢呼声，叶剑英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却异常冷静和谦虚。每当人们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总是把这场斗争的胜利归功于党和人民，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前后，党内外一些领导人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他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毛泽东生前送给叶剑英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一生在关键时刻都作出过重大决策，孙中山蒙难广州之际，身为营长的叶剑英，率部登上宝璧舰，挺进白鹅潭，勇敢作战与巡防，护卫大总统凡 50 余日，直至脱险。正是：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黄埔建会 海峡两岸情谊深 老骥伏枥 统一祖国待同舟

话说从1975年4月5日至1976年9月9日,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四位曾经叱咤中国当代历史风云的人物蒋介石、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世。在这四位重要人物去世之后,国共双方领导核心都从第一代转入第二代。

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1978年5月20日就任“中华民国”第六届“总统”,成了蒋介石名副其实的继承人。

在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以叶剑英为主的老师们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的浩劫。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

邓小平和蒋经国早在1925年便相互认识,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他从法国辗转来到苏联。而蒋经国则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邓文仪等30多名留学生一同到了苏联,他们同时进了一所由第三国际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邓小平21岁,蒋经国16岁,邓文仪21岁。邓小平是有名的“小钢炮”,这绰号既形象地指他的身材矮小,又包含有他那善于辩论的口才。这年年底,

蒋经国加入共青团，而团小组长就是邓小平。蒋经国与邓小平个子都不高，站队时他俩总是站在一起，肩并着肩。想不到，在半个多世纪后，他俩分别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代领袖。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此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开始认真纠正以前的“左”倾错误。

12月2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为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彭德怀、陶铸（黄埔五期毕业）举行追悼大会。陶铸所写的《松树的风格》被教育部选入初中语文教材；陶铸的一生，就像松树一样，苍劲挺拔，百折不弯。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对台工作方针也有重大改变，我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万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同时又明确宣布：“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

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地方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台湾海峡的“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还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信息,探亲访友,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

在此之前,台湾海峡两岸从来没有停止过交往,为寻求以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途径,国共双方通过秘密渠道接触过多次,只是由于条件不成熟,没有取得明显地进展。

建国不久,时任广州市长的叶剑英与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秘密相晤,叶剑英劝他留下来,保留他在中国银行的董事职位,结果张嘉璈去了澳洲;第二次是周恩来接见“云南王”龙云的儿子、黄埔十期毕业的龙绳武,希望他到海外做些有益于祖国统一的工作,结果他经香港去了台湾。这两次接触虽未取得具体效果,但却使台湾当局得到了祖国大陆愿意和谈的信息。1950年6月1日,蒋介石命蒋经国派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李次白秘密前往大陆,试探国共和谈的可能性,因当时朝鲜战争爆发,蒋经国命令胡伟克将李次白召回。李次白是解放军3野司令员陈毅兄嫂的哥哥,据说李次白这位国民党退踞台湾后的第一位“秘密来使”来到上海,是奉命传话中共不要过紧逼台。李次白通过妹夫、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陈孟熙,见到了陈毅,把该传的话传了,但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陈毅于1950年6月指示3野9兵团司令员、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宋时轮秘密派蒋经国的亲信、国民党青年军预备干部总队少将总队长贾亦斌潜赴香港,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策反工作。蒋经国痛恨贾亦斌的战场“倒戈”,当获悉贾亦斌抵香港后,曾悬赏美金20万元活捉贾亦斌,因此,贾亦斌不得不返回大陆,后任

中共华东局台湾工委对敌工作部副部长。1978年贾亦斌从上海调往北京,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翌年,他随以王首道为团长的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美国,见到了徐思贤等蒋经国的故友。在回国后,贾亦斌给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贾亦斌在信中传递了希望蒋经国以民族大义为重,做功德无量的两岸和平统一推进者的信息。在信的末尾,他附了一首1980年在浙江奉化溪口蒋经国旧居写的诗,《重游溪口感怀》:

溪口睽违州一春,迎春雪后景依然。
喜看墨迹今犹在,传语家乡色更新。
借宿旧居怀旧雨,伫闻新曲谱新篇。
妙高台望归帆至,晚节芬芳忠孝全。

正当贾亦斌不辞劳苦地为祖国和平统一奔走呼号的时候,蒋经国也开始卸下“蒋介石包袱”,排除种种阻力,采取允许探亲、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措施。在这种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的开明之举刚刚收到效果不久,1988年1月13日下午3时50分,蒋经国便逝世了,贾亦斌失去了这样一个极好的机遇,国共第三次合作日程不得不再次推迟。

蒋介石曾经过一年多的考虑,于1957年初召香港国民党负责人许孝炎来台湾,表示本着知己知彼的原则,探清大陆和谈虚实,拟派人赴大陆一行。至于人选,不拟从台湾派出,可在海外选择。许孝炎提出原立法院长童冠贤、立法院秘书长陈克文、立法委员宋宜山三人,让蒋定夺。结果蒋以宋宜山是宋希濂的兄长,以探亲名义去较妥。宋宜山是南京中央党校毕业生,也进过黄埔,曾被派往英国留学,解放前夕一直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人事处长;他是湖南人,与黄埔四期的唐生明是挚友。其认为由唐作中间人,晋见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湖南籍的李维汉最恰当。

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出发,经广州北上,到北京后下榻北京饭店,当天就会见了唐生明;唐是受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委托而出而接待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东兴楼设宴招待宋宜山,具体问题由李维汉与宋宜山会谈。在商谈中,中央提出,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成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外国军事力量要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在北京住了两个星期,除会谈外,还参观了北京工农业生产,游览了北京名胜古迹,并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看望了弟弟宋希濂。5月回到香港后,他写了一份长达1万多字的报告,阐述北京见闻及中共态度。蒋介石看完报告,颇不高兴,叫宋不必回台湾了,薪金可按月汇去。1972年,因宋宜山出席了章士钊的追悼会,蒋介石以“通匪罪”将宋宜山开除出立法院;后宋宜山和夫人陈淑芳一直在香港安度晚年。

1957年反右斗争,国共双方暂停了秘密往来。1958年在“八·二三”炮轰金门的紧张时刻,一位神秘人物穿梭于香港与北京,此人便是著名老报人曹聚仁。曹聚仁,字挺岫,浙江浦江人,曾任上海《申报》、《立报》记者,中央通讯社记者。在全国解放后,他在香港从事新闻记者工作。从1950年开始,他就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不断回大陆参观访问,最远到过鸭绿江,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接见。回到香港后,他写了《南来篇》一文,宣称“我从光明中来”,在港澳台引起重视。曹聚仁几经往返大陆,直到1965年夏天,双方达成了六条共识: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的‘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二十年为期；期满再行恰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在返回香港后，蒋介石派蒋经国亲到香港，把曹聚仁秘密接到台中日月潭，与蒋氏父子进行了直接交谈。曹聚仁以他的真知卓见，终于说服蒋介石，使这块“顽石”点头，口气有所松动。在这次会晤中，曹聚仁还出示了毛泽东仿晏几道的《临江仙》格调写给蒋的一首词，其中最有意义的两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诗句道出了毛泽东希望“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的诚意。曹聚仁的发妻王春翠户口在浙江兰溪县蒋畈村，曹聚仁不仅与发妻在北京崇文门的新侨饭店相聚，而且经周恩来批准，将王春翠的户口由农村迁往南京，与曹聚仁的九旬老母住在一起，这使曹聚仁十分感动。曹往返香港北京多次，每次途经金华时，就想念尚在兰溪的妻子王春翠，但因重任在身，无暇去看她，曹聚仁只得写诗一首，略表思念之情：

细雨霏微薄如纱，横云绕处是金华。
山称南北弓牛背，塔或有无问井蛙。

意涩怯题八咏壁，舌干苦忆白莲花。
初平叱石浑何事，归梦年年不到家。

国共密谈，不久因“文化大革命”临近而被耽搁了下来。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终于没有盼到国共第三次合作，病逝于澳门镜湖医院，终年72岁。当时，他的第二夫人邓珂云及长女、次子在侧。邓珂云在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一书《后记》中，隐约写及他为国共第三次合作奔走的业绩：“他终于能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效力而感到自慰。他为此奔走呼号，竭尽全力，直至生命的最终。”

曹聚仁一介书生，无党无派，为国共再次合作独来独往，在海峡两岸领导层中保持个人的友谊，毫无偏见，因而受到双方领导人的信任与尊重。如果有朝一日国共再度合作，祖国和平统一，那么应对曹聚仁先生立碑记功，永铭其劳。

还有一位为和平统一祖国奔波的老者，他就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章士钊。1973年5月中旬，年过92岁高龄的章士钊，带着女儿、儿子、秘书、医生、护士及厨师，乘“中国民航”专机飞抵香港。24年前，章士钊是国民党和谈代表，随张治中赴北平。和谈破裂，他留下来了，一直从事文史工作。章士钊是湖南长沙人，字行严，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编。辛亥革命后，他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与毛泽东关系甚好。毛泽东为支持部分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向章士钊借现洋20,000元。解放后，毛泽东偿还这笔巨债，他用稿酬每年还给章士钊2000元，10年还清，这使章士钊很感动。章士钊这次来香港名为探亲，他的奚夫人于1970年死于肺炎，另一位殷夫人在香港，已多年未见，这次就是专为探殷夫人而去的。当然，香港当局并不相信章士钊是为探亲而来，认为他另有使命。

屈指算来,1949年留下来的国民党和谈代表相继逝世:首席代表张治中于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代表黄绍竑于1966年9月去世;代表邵力子于1967年12月25日去世。因此,毛泽东点将,非章士钊莫属了。章士钊为促进海峡两岸和解,曾于1961年和1964年两次赴香港。这一回,毛泽东考虑到,随着基辛格、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以及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台湾正处于动荡之中,需要加强和谈工作。正巧,章士钊有意于干他的“老本行”,这样,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以探亲名义,派章士钊飞往香港。章士钊到香港之后,通过他的各种老关系,跟台湾国民党联系。不料,他毕竟年事已高,来香港一个半月后,于1973年7月1日就病逝在那里。

章士钊病逝后,北京方面依靠屈武,从事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未竟之业。屈武本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又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而且跟蒋经国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有同窗之谊。1949年9月,于右任单身被挟持去了台湾,妻子高仲林及女儿女婿留在祖国。于右任思念妻女,常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联系。1961年3月,于右任给吴季玉的信中谈及,妻子将过80大寿,十分挂念。当时正巧,章士钊由香港回北京,章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胡子最近给香港吴季玉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胡子”是对于右任老先生的尊称,因为于右任蓄有白须。周恩来见到这封信后,很快将信转给屈武,并要屈武为岳母在西安隆重祝寿。事后,屈武托吴季玉转信给于右任,说是“濂溪先生”关照为老夫人祝寿。此“濂溪先生”即当年在重庆时周恩来的隐称;邵力子知道这一隐称,嘱屈武写上,于右任一一看便知。于右任于1964年11月3日病

逝于台北。病重之际,他写下《望大陆》一诗,表达了自己对故土的思念: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土不可见兮,永不相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81年9月30日,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宣布了九条《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其要点为:

一、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统一大业;

二、建议双方为通邮、通商、通航、旅游及文化之交流提供方便;

三、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自治权,保留军队;

四、台湾现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人民有愿回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大陆投资,保证其合法

权益和利润；

九、欢迎台湾人士采取多种方式提供建议，商量国事。

叶剑英的九条建议，是一个实行“一国两制”的完整构想。

叶帅的建议，得到台湾人民的拥护。同年11月3日，台湾《政治评论》月刊社长、台湾警备司令部顾问马璧教授由台湾回大陆定居到达北京。之后，又有许多台胞返大陆定居。

1982年7月24日，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之子廖承志也以同窗好友的身份致信蒋经国，呼吁和平统一祖国。信中说：“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又说：“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廖廓海天，不归何待？”

俗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共发出的和平号召和廖承志的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蒋经国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同年8月17日，宋美龄在美国发表了致廖承志的公开信，谈两岸关系问题。蒋经国也决定派人来大陆，商谈祖国统一问题。蒋经国派往大陆的秘密使者名叫沈诚，是黄埔军校十七期毕业生。40多年前，沈诚就追随蒋经国，在台湾“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任职，后又担任蒋经国的侍从参谋，退役前官阶为陆军少将。退役后，沈诚在香港经商。从1981年开始，曾三次前往北京，分别受到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邓颖超的接见。1987年3月29日，沈诚回到台北，转交了国家主席杨尚昆致蒋经国的一封亲笔信。蒋经国反复看了多遍，在盱衡全局之后，他认识到只有和平统

一,回归祖国,才是台湾的惟一出路。4月4日,他在慈湖的书房里召见沈诚,他说:“我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党对党中央层次的对等谈判是可行的。”现在该到下决心的时候了。12月7日,蒋经国再次召见沈诚,充满信心地说:“明年1月初,将在国民党中常委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不幸的是,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逝世。为了堵住沈诚的嘴,李登辉上台后竟下令将沈诚关押起来,不审不判,不明不白地关押了一年多,才释放出来。

在蒋经国死后,海峡两岸仍有一些接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颖超致信宋美龄。1984年2月16日,宋美龄致信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主张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1988年5月,邓颖超也致信宋美龄,呼吁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信中写道:

环顾当今世界,风云迭起,台湾前途,令人不安。今经国不幸逝世,情势更趋复杂。此间诸友及我甚为关切,丞盼夫人与当政诸公,力维安定祥和局势,并早定大计,推动国家早日统一。我方认为,只要国共两党为国家民族计,推诚相见,以平等之态度共商国是,则一切都好商量,所虑问题均不难解决。

我亦年逾八十,今虽卸政繁荷,然念念不可置之者,唯国家统一一端耳。“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与夫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深愿与夫人共谋我国家民族之统一,俾我中华腾飞于世界。

继1981年国庆32周年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简称“叶九条”)后,198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解决台湾问题。面对这种情况,为调动在大陆黄埔军

校同学的积极性,发挥大陆黄埔同学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中的作用,1983年春节,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些黄埔同学建议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他们的意见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关怀下,中央决定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共中央委派黄埔一期毕业的徐向前元帅、原黄埔军校教官聂荣臻元帅、政治教官许德珩、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程子华等同志到黄埔同学会工作。

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正是黄埔军校成立60周年校庆,来自海内外数百名黄埔校友欢聚在祖国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成立大会。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徐向前、乌兰夫、习仲勋、杨尚昆、杨静仁等参加了大会,并会见了海内外黄埔校友。中央军委副主席、当年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为大会送来贺词:“发扬黄埔精神,致力振兴中华。”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和聂荣臻元帅为成立大会挥笔题词;徐向前元帅为成立大会送来了贺信,贺信开宗名义地肯定“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的黄埔以其特殊的贡献为中国革命谱写了光辉篇章”,明确提出海内外黄埔同学,要“切记孙中山先生教导,发扬黄埔精神,惟以国家统一民族强盛为己任,抛嫌释怨,携手合作,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贡献余力,为中国革命和自己的历史增光添彩”。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海内外黄埔同学的真挚感情和殷切期望。

这次会议通过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章程》,选举出第一届理事会成员,推举徐向前为第一任会长,聂荣臻、许德珩为顾问。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侯镜如、郑洞国、宋希濂、李默庵为副会长,另有程子华、蔡文治(美国)、李以勳(香港)、林伟俦(加拿大)、温佐慈(瑞士)、宋瑞珂、赵子立、张伯权(香港)、高存信、文强、覃异之、郭化若、阎揆要等17人为理事。

在黄埔同学会成立后,根据工作需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先后成立了黄埔同学会,共发展会员4万多人。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广交朋友,联络友谊,宣传党的政策,做好对台湾黄埔同学的联络、团结工作。谚云:“一日同窗,终身不弃。”1987年底,台湾当局部分开放台胞赴大陆探亲以后,两岸近40多年的隔绝局面终于被打破,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台湾当时有2100万人,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人员约150万人。40多年来,海峡两岸同胞饱尝骨肉分离之苦,他们渴望亲人团聚,祖国统一。正如台北《中国导报》1983年12月31日社评所说:“中国统一这个大问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论走到哪个社会哪个阶层,大家都在说:早该统一了,不能再拖了,拖不下去了。”

从大陆去台湾的黄埔同学都年事已高,思乡心切,他们盼望能回大陆探亲访友,母子见面,夫妻重逢。黄埔六期毕业的国民党退役军人方晓松于1993年11月间,回到祖国,在陕西西安川秦酒家举行了久别重逢的金婚庆典。方晓松在1949年9月赴台时,妻子曹碧文带着三个女儿留在大陆。漫长的岁月,孤寂的生活使她对夫妻团圆丧失了信心。方晓松熬得头发白了,心也碎了,如今能重逢,简直像做梦一样。像方晓松这样饱尝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痛苦的海峡两岸黄埔同学,何止千万?方晓松曾在胡宗南部队任国民党36军123师师长,是湖南醴陵人。30年代在国共合作时期,他与西安女子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曹碧文结婚,以后两人分离达50年;如今重逢,在庆金婚时,方晓松已84岁。如果海峡两岸再不统一,那后会就遥遥无期了。

曾任国民党兵团参谋长的黄埔七期毕业生张伯权,解放后一直居住在香港。在黄埔同学会成立后,他被选为理事。他写

下这首诗,向台湾故旧表达他心灵深处的呼声:

游子何年渡海瀛?空劳州戟倚门庭。
鸦啼月冷悲残夜,鹧唱山深隐哭声。
去国人难忘永好,归宗谁不恪精诚。
台澎旧是伤心地,万岁千秋有定评。

张伯权后来当选为黄埔同学会副会长,1994年3月23日,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他生前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可惜没有亲眼看到香港回归祖国。

曾任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局长的黄埔一期同学邓文仪,1949年到台湾后,先后他担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内务部政务次长、“行政院”顾问等职。为谋求和平统一祖国,他与黄埔一期学长刘璠等于1991年4月发起组成“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呼吁两岸黄埔同学为和平统一中国共同奋斗。1991年4月3日至23日,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组成恭谒黄帝陵、中山陵访问团。访问团一行31人,在荣誉会长邓文仪、会长刘璠、执行长张琦率领下,时隔30载,重返大陆。他们先后到广州黄埔军校旧址、西安、北京、南京等地访问,一路上寻根祭祖,弘扬爱国精神,伸张力促祖国统一之大义,成为海峡两岸黄埔同学来往中的一件幸事。邓文仪一行,有黄埔一期到三十九期的诸多同学,也有几位同学的夫人,平均年龄65岁,由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荫东、副秘书长刘钧和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周益三等人陪同,前往陕西黄陵县晋谒“人文初祖”轩辕黄帝。邓文仪对记者说:“我是为促进祖国统一打冲锋来了。”又说:“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1991年4月5日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黄埔四海同心会访问团高举旌旗,上书:“万里寻根古柏千丛迎赤子,亿民戴德心香一柱祭黄陵。”在

热烈的掌声中,邓文仪、刘璠二老向黄帝陵敬献了花篮。访问团副发言人黄璠先生朗读了祭文,祭文中曰:“……四十寒暑,祭奠愧疚,两岸黄埔,相期互助。率团谒陵,同心相求,河山一统,万世千秋。”祭文词句凝练,一字千钧,盼望祖国早日统一之心昭然可见。

随后,访问团绕陵一周。接着,由邓文仪、刘璠学长等亲手植下了两株翠柏。邓文仪这年86岁。65年前,他和邓小平、蒋经国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他和黄埔同学康泽、郑介民观点右倾,经常受到左派同学的冷嘲热讽,显得很孤立。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文仪表面上不露声色,暗中积极活动准备回国。第2年2月他回到广州,就投靠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他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主持军校的“清党”工作。以后邓文仪追随蒋介石,成为蒋的侍从秘书。后陈赓被捕,邓文仪联合10名同学具保,要求蒋介石无罪释放,总算尽了一点同窗之谊。邓文仪是蒋介石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1935年被派往苏联,任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他与中共人士潘汉年有过多接触,也与第三国际中共代表王明打过交道。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的身份,成了满天飞的“钦差大臣”,他负责战地宣传和军事政治工作,哪里失败,他就去哪里鼓舞士气。在战场上他曾劝说过李弥、王耀武、李延年、陈明仁、李及兰等黄埔将领要他们永远跟着蒋介石,不成功则成仁。败逃台湾后,邓文仪皈依道教,影息山林,崇尚老聃,讲道论德;从1983年起担任台湾道教总会理事长。虽然邓文仪坚持反共立场,但他晚年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依然是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欢迎的。

访问团成员刘璠也是黄埔一期毕业,湖南益阳人,曾任国民党军粤汉铁路司令,情报局设计委员。40年代末去台湾,与邓

文仪发起组织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被选为会长。这次来黄陵谒祖时，他已是85岁高龄的老者。他随访问团成员向桥山顶拾级而上，毫无倦色，行人相见，无不颌首称道。访问团成员周乐军是黄埔十五期同学，他这次来黄陵心情格外激动。半个世纪之前，他曾经率领一个排在黄帝陵驻守；从那时起一别50年，如今他再度来到这里，正可谓“古柏今犹绿，战士白发增”。访问团成员陈舜钦是黄埔六期同学，当记者访问他时，他说：“祭了黄帝陵，更能感受到我们都是黄帝子孙。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位伟人，他的功德上通天道，下贯地道……国家不统一，我们愧对黄帝呀！”75岁的陈舜钦说古论今，见地深刻，他说：“为什么说海峡两岸是一家人呢？我分析可以从三方面解释：一是血统，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二是史统，两岸有共同的历史传统；三是道统，我们民族有良好的伦理道德。作为中国人，我们要有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对实现和平统一很重要，这样才能抵制外来破坏祖国统一势力的影响。”访问团一行游览了西安，受到陕西省黄埔同学会会长、黄埔四期毕业的周益三等热情地欢迎和招待。访问团成员、台湾空军官校通讯官刘晓岚诗兴大发，当众挥毫写下：

睽违卅载雁南征，乡思万缕故人情。
轩辕有道开盛世，今朝离德哭黄陵。

邓文仪一行32人在祭黄帝陵时，参观了这里的名胜古迹：一号古墓葬环绕陵冢周围的数千株千年古柏，其郁郁葱葱，苍劲挺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震撼。古往今来，炎黄子孙的始祖黄帝陵象征着龙的传人，后来者都以自己是黄帝子孙而感到自豪。1937年毛泽东为祭黄帝陵曾题词为：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黄埔同学在祭黄帝陵后，深感国共两次分裂，两次合作，无数黄埔同学曾血洒沙场，其恩怨何时能终了？俗云：“一将成名万骨枯。”当年征战疆场，如今已事过境迁，黄埔同学均已进入耄耋之年，海峡两岸应该携起手来，共创未来的前程；分裂只会造成更大的失败，国共两党第一、第二次合作，都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将来第三次合作，前景必更为灿烂辉煌。“祖国尚未统一，同学仍须努力”，此为真理矣！

邓文仪一行于4月8日返回北京，受到黄埔同学会的热情接待。黄埔同学会副会长、黄埔一期同学李默庵特意从上海赶回北京，与邓文仪见面。黄埔同学会理事、黄埔六期同学、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也参加了会见。邓文仪说：“一年前，我曾以私人的名义，访问过大陆，正是我那次访问，对于联合在台的黄埔同学袁朴、刘咏尧、刘璠、张炎元、王中柱、张琦等发起成立‘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起到了重要作用。”1990年5月10日，徐向前元帅会见了台湾黄埔一期同学邓文仪；5月11日，聂荣臻元帅会见了邓文仪；5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邓文仪，畅叙了半个世纪之前在莫斯科的同窗之谊，并就“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两党对等谈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4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了邓文仪一行，黄埔同学会负责人侯镜如、李默庵、覃异之、赵子立、杨荫东等在座。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帅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副会长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这两位黄埔一期的兄长没有再见到邓文仪一行。岁月不饶

人,毕竟他们年事已高。

邓文仪一行在返台后,刚过一年,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元帅逝世,享年93岁。在台湾的黄埔学生邓文仪、刘璠、刘咏尧、王叔铭、刘安祺、张炎元、何志浩、张琦,他们以“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的名义,向聂荣臻老师敬送了挽联:

百战沙场,功耀华夏,星沉南海千古恨;
一代人杰,劫尊元帅,月冷西山万民悲。

1993年2月13日,宋希濂副会长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86岁。在这以后,侯镜如、张伯权、郭汝瑰等黄埔同学会的副会长也相继过世。1998年7月13日,邓文仪在美国病逝,享年93岁。同年9月16日,黄埔一期的刘咏尧也乘鹤仙去;他曾于1993年8月6日以台湾“中国和平统一协进会访问团”名誉团长的身份前来北京访问,受到黄埔同学会会长李默庵等人的接待。

黄埔同学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不顾年迈体弱,奔走于海峡两岸,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97年7月1日,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为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做出了风范。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首都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大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提出:“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一切华夏子孙的殷切愿望。”

黄埔军校同学遍及海内外,在台湾军界,黄埔同学仍占一定数量,国民党13大中常委中,有32人是黄埔同学,对台湾政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1998年10月15日,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上海新锦江饭店进行“对话”。双方达成四项共识,决定海协、海基两会要进行政治、经济

对话以及汪道涵在适当的时候访问台湾等。1999年澳门回归，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当亦为期不远矣。

全世界华人盼祖国统一，黄埔军校同学要在祖国和平统一工作中发挥余热，贡献力量。正是：

晚年逢盛世，黄埔续新篇。

引吭歌统一，俯首荐余年。

两岸三通直，炎黄一线牵。

一国两制好，祖国大团圆。

海水冲不淡中华民族的血脉，风暴扯不断炎黄子孙的筋骨。
血总是浓于水，海峡上空的残云总会散去。

天下大势，分久则必合，毕竟人心挡不住，来日相逢正有期。

主要参考书目

1.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图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湖南省档案馆校编:《黄埔军校同学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4. 王永均编著:《黄埔军校三百名将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 阎文庄等编:《黄埔军校》,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
6. 王辉强主编:《黄埔军校秘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 张军赋主编:《黄埔将星血战录》,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 姜廷玉主编:《黄埔军校百将传》,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 张智强著:《铁血黄埔》,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0. 尹家民著:《蒋介石与黄埔三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11. 尹家民著:《蒋介石与黄埔四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12. 徐晓林等著:《黄埔恩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 陈宇著:《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年》,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
14. 张庆军等著:《黄埔军人魂》(上、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15. 钟声主编:《台湾军界大腕》,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
16. 韩冬梅编著:《黄埔军校将帅沉浮录》(上、下册),中国社会

出版社,1996年版。

17. 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1~7集),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8. 徐平主编:《败军之将——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金城出版社,1997年版。
19. 袁小伦著:《周恩来与蒋介石》,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20. 宋平著:《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 树军编著:《中南海历史档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22. 程思远著:《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23. 叶永烈著:《国共风云》,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
24. 宋健著:《辉煌与罪恶》——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主力”征战秘史,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
25. 刘秉荣著:《国民政府秘史》(上、下册),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26.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7. 老木编著:《血祭黄埔》(上、下册),新世界出版社,1995年版。
28. [英]迪克·威尔逊著:《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29. 张学继等著:《白崇禧》,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0. 成元功主编:《周恩来历险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31. 红叶编著:《蒋氏父子》,台声出版社,1988年版。
32. 江天著:《周恩来与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3. 地久、克锋编著:《潮涨潮落——国共角逐台湾海峡纪实》,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
34. 少效著:《大崩溃》(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5. 吕荣斌著:《周恩来在国统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36. 谭属春等:《叱咤风云——36位军事家》,长城出版社,1997年版。
37. 刘秉荣著:《魂飘重宵九——苏区“肃反”大纪实》(上、下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38. 杨桦等著:《蒋家御林军国民党整编74师兴亡录》,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9. 熊敏等著:《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0. 余科杰、程杞国主编:《开国奠基:中国1949年纪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1. 刘志强等著:《国共交恶:中国1927年纪实》,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2. 徐济德著:《陈诚的军政生涯》,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43. 刘秉荣著:《军阀秘闻》,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
44. 刘学琦等主编:《将帅风范词典》,(上、下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
45. 范硕著:《叶剑英在1976》(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46. 张桥编:《蒋冯闫桂中原大血战》,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47. 曹英编:《军统实录》,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48. 于文编:《兵败大陆》,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49. 秦彤等著:《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时刻》,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版。
50. 陈奇文等著:《国共人物血缘情》,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51. 陈宇著:《魂断天府》,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

52. 陈宇著:《最后大决战》,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
53. 陈宇著:《梦落月城》,黄河出版社,1993年版。
54. 曲央编:《天子门生:十三太保闹中华》,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55. 西尔泉:《177万军人之生》,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
56. 郑淑芬等:《中国近代现代暗杀内幕》,(现代部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7. 章荣等:《抗日十大战役》,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年版。
58. 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9. 汪朝光著:《和谈将军张治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0. 吴都编:《铁血南国:北伐名将谱》,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61. 曹平编:《民国巨人死亡之谜》,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62. 刘绮菲编:《蒋介石的大囚徒实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63. 张植信主编:《黄埔军校同学诗词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4. 肖宇编:《民国官僚的黑色档案》,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65. 宇文编:《民国三军秘录》,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66. 余敏辉编:《梦断总统府》,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67.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68. 黄埔军校同学会:《黄埔》双月刊,(创刊号至1998年)。
- 69.《纵横》杂志(1988~199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
- 70.《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
71. 陈予欢编著:《黄埔军校将帅录》,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
72. 任海生著:《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

-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西北大学历史系编 1979年版。
- 《张治中回忆录》 文史资料出版社。
- 《白崇禧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版。
- 《杜聿明将军》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
-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 刘镜平著:《戴安澜将军殉国亲见记》载《黄埔》杂志 1992年第2期。
- 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1年版。
- 莫文骅著:《回忆解放北平前后》 北京出版社 1983年版。
- 赵文田著:《戴季陶自杀真相揭秘》 团结出版社 1994年版。
- 注:海外版本参考书从略。